第四卷・1958-1961

中華人民共和國史

烏托邦運動

從大躍進到大饑荒

林蘊暉 著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第四卷 • 1958-1961

中華人民共和國史

烏托邦運動

從大躍進到大饑荒

林蘊暉 著

中華人民共和國史

第四卷
烏托邦運動

從大躍進到大飢荒
(1958-1961)

林蘊暉 著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目　录

總序：
世紀視野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史

導言

第一章　多快好省總路線出台

一、趕超新思路在高層統一
1.毛澤東趕超戰略的新思路
2.反「反冒進」的醞釀與發動
3.批評反冒進「是政治問題」
4.毛澤東提倡個人崇拜
二、鼓動提前實現《農業四十條》
1.《人民日報》吹響「大躍進」的號角
2.大躍進形勢始於大搞農田水利
3.人大一屆五次會議的熾熱空氣
三、大躍進的全面發動
1.中共召開八大二次會議
2.劉少奇闡釋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
3.毛澤東號召破除迷信
4.眾代表登台表決心
5.周恩來、陳雲檢討
6.中共中央的人事安排
四、為總路線掃清各方障礙
1.反中共黨內的「右派」
2.敲打軍隊高層將帥
3.全總批右傾機會主義

第二章　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興起

一、全黨全民辦工業

1.縣社工業遍地開花
2.技術革新的群眾運動
3.一再提前的趕超時間表
二、農業生產大颳浮誇風
1.浮誇從深耕密植開始
2.媒體大量報道農業「放衛星」
3.省委書記與科學家的論證
4.各方人士的現場調查
三、小社併大社的由來
1.毛澤東的大社情結
2.農業社規模的起落
3.成都會議的決策
四、人民公社的出現
1.中央領導人「吹烏托邦」
2.陳伯達披露毛澤東的設想
3.最早出現的一批公社
4.毛澤東視察冀豫魯津

第三章　大煉鋼鐵和人民公社化運動

一、北戴河會議決議
1.緊急動員鋼鐵翻番
2.共產主義已為期不遠
3.破除資產階級法權
二、全民大煉鋼鐵運動
1.各行各業為大煉鋼鐵讓路
2.毛澤東南巡督陣
3.「小土群」村村點火
4.「九千萬人上山」及其後果
三、人民公社化高潮
1.一哄而起的人民公社
2.「一大二公」的公社特色
3.徐水式的「共產主義」
四、教科文衛大躍進
1.「擂紅旗，拔白旗」
2.教育制度的革命
3.科學界的趕超運動

4.文化事業大躍進
5.除「四害」講衛生運動

第四章　炮擊金門與第二次台海危機

一、美、蔣固守台灣的各自打算
1.台灣問題的由來
2.美、蔣策劃共同防禦
3.第一次台海危機
二、炮擊金門的最初意圖
1.中國呼籲中美直接談判
2.美國無意緩和中美關係
3.炮擊金鬥的決策
三、由「聯美壓蔣」到「聯蔣抗美」
1.「八·二三」炮戰引起的震動
2.美國的底牌和美、蔣矛盾
3.毛澤東的策略：「聯蔣抗美」
四、**1958**年後的中美大使級會談
1.「支應差事」式的談判
2.王炳南總結百次會談
3.華沙通道的一次實質性作用
4.中美大使級會談的終結

第五章　西藏平叛與西藏的社會改革

一、西藏解放後面臨的形勢
1.《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條協議》
2.西藏解放後面臨的複雜鬥爭
3.中央宣布「六年不改」的方針
二、西藏上層反動集團發動叛亂
1.川滇甘青藏區的局部平叛
2.西藏地區的局部叛亂
三、人民解放軍奉命平息
1.拉薩全城發生叛亂
2.中央決心徹底平叛
3.進軍山南摧毀叛亂中心
4.平息納木湖等地區的武裝叛亂
5.肅清邊沿地區的叛亂武裝

四、民主改革和西藏自治區的建立
1.「邊平邊改」的民主改革
2.「穩定發展」西藏經濟
3.西藏自治區正式成立

第六章　毛澤東「壓縮空氣」及其底線

一、一次鄭州會議到八屆六中全會
1.公社所有制問題引起的關注
2.對向共產主義過渡的左思右慮
3.「過渡」和指標問題的討論
4.關於兩個「過渡」的界限
二、整頓公社和二次鄭州會議
1.1959年初的農村形勢
2.人民公社的初步整頓
3.反對兩個平均主義
三、二次整社和降低鋼鐵指標
1.三級所有，隊為基礎
2.鋼鐵產量月月欠帳
3.七中全會決定降低指標
4.對1958年「大冒」的交代
四、二屆全國人大和鋼鐵指標再調整
1.全國人大二屆一次會議
2.關於農村政策的〈黨內通信〉
3.陳雲受命落實鋼鐵指標
五、中共黨內對形勢的不同估計
1.黨內主流看法的基調
2.來自黨內中下層的質疑
3.少數高層領導人的擔憂

第七章　廬山會議發生的重大轉折

一、毛澤東為繼續躍進定基調
1.到韶山、登廬山豪情不減
2.「神仙會」的討論主題
3.各路「諸侯」的不同見解
二、彭德懷上書毛澤東
1.被毛澤東批發的「意見書」

2.與會者的最初反應
3.明知不可為而為的張聞天
三、彭黃張周被打成反黨集團
1.來自莫斯科的不和諧音
2.毛澤東密切關注各方動態
3.七月二十三日廬山風雲突變
4.清算彭德懷的歷史舊賬
5.八中全會定性為「反黨集團」
四、全國范圍的反右傾斗爭
1.軍委會議追逼軍事俱樂部
2.外事系統追查「里通外國」
3.層層抓右傾機會主義分子
第八章　堅持「躍進」經濟跌入谷底
一、捍衛「三面紅旗」
1.批駁「國民經濟比例失調」論
2.批判包產到戶和解散公共食堂
二、毛澤東讀書漫談理論
1.毛、劉、周各組讀書小組
2.毛澤東自信發展了馬列主義
3.讀書談話的傳達和效應
三、城鄉再颳躍進風
1.人大通過的躍進計劃
2.農村再次趁窮過渡
3.城市建立人民公社
4.工業指標再度升高
四、寫「十年總結」醞釀轉彎
1.中央下令再煞「三風」
2.調運糧食的緊急指示
3.毛澤東提出要扭轉被動局面
五、中蘇關係惡化對內政的影響
1.兩黨分歧的由來
2.中蘇第一次正面衝突
3.爭扛列寧主義的旗幟
4.布加勒斯特的較量
5.撤走專家，關係惡化

6.發憤圖強，自力更生
六、學習「毛著」與突出政治
1.掀起學習《毛選》的熱潮
2.突出政治與鼓吹個人崇拜
3.對宣傳毛澤東思想的不同聲音
七、經濟跌入谷底，農村災情瀰漫
1.全國保鋼比例更失調
2.糧食危機嚴重顯露
3.「信陽事件」東窗事發
4.關於非正常死亡的考證

第九章　制定政策挽救農村危局

一、挽救農村局面的緊急措施
1.國民經濟大滑坡
2.十二條緊急指示
3.緊急指示信的貫徹
二、確定調整國民經濟的「八字」方針
1.決定退卻的中央全會
2.農村整風整社運動
3.管理體制的收權措施
三、草擬人民公社六十條
1.毛澤東高倡調查研究
2.三大秘書匯報問題
3.《農業六十條》的草擬
4.再次疾呼調查研究
5.老百姓的強烈要求
四、常委下鄉體察民願
1.睡在養豬場的劉主席
2.周恩來在河北農村
3.鄧小平考察京郊
4.朱德、陳雲南下調查
五、公社體制的再次退卻
1.北京會議再議農村形勢
2.《農業六十條》修正草案
3.落實退賠、解散食堂
4.基本核算單位再下放

六、責任田的出現和分歧
1.包產到戶的出現
2.責任田風波暗起

第十章　實行全面調整重建社會秩序

一、挽救糧食危機多管齊下
1.全力支援農業恢復
2.進口糧食應急度荒
3.網開一面穩定市場
4.精簡壓縮城市人口
二、工業戰線的退卻
1.延誤了的工業調整
2.該退的堅決退下來
三、各項政策條例的制訂
1.流通體制的鬆動
2.手工業的恢復
3.工業體制的調整
4.整頓文教工作秩序
5.科技政策的調整
6.重申「雙百」方針
四、調整政治關係共渡難關
1.黨內的甄別平反
2.調整統一戰線政策
3.為知識分子鬆綁
五、文化領域的短暫春天
1.《海瑞罷官》與《李慧娘》
2.《燕山夜話》和《三家村札記》
六、逆境者的批評和反思

附錄

大事記
1958年
1959年
1960年
1961年
參考文獻

一、檔案
二、文獻資料
三、著作
四、論文
五、回憶錄和口述史料
六、報刊

總序：世紀視野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史

金觀濤

經過差不多近七年的努力，十卷本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終於分批出版、與讀者見面了。對我來説，也鬆了一口氣。因為我一直把能否出版一套忠於史實、觀點開放的中國當代史視為對中國歷史學家的考驗。

把當代中國人經歷的驚心動魄歲月轉化為歷史著作，是我們這一代人的普遍願望。我們這一代人和人民一起經歷了苦難，又見證了啟蒙時期思想的風雨雷霆，這一切理應成為不可磨滅的歷史。然而我深知這一工作又是多麼困難。

首先，作者必須掌握盡可能完備的史料，特別是檔案文獻。近年來，出版了大量回憶錄和口述歷史資料，但是很多重大事件以及與中共高層決策有關的檔案至今尚未完全開放，為寫作帶來困難。在歷史學家的寫作中，除盡可能全面地掌握史料外，更為複雜和重要的，是對史料的辨偽和確定其在決策過程中起過的作用，只有少數長期關注該領域的專家才具備這種能力。十分幸運的是，本套書的撰寫正是依靠了這批有深厚檔案功底、又長期從事當代中國史研究的專家。他們足跡遍及全國各省及市縣檔案資料館，搜集整理檔案並對史料辨偽。史料之豐富、辨析之充分，正是本套書的重要特色。

歷史研究者的目標是追求歷史的真實，這是一個漫長而艱難的過程。搜集史料、整理檔案只是第一步。歷史學家在研究和寫作中都會有這樣一種體會：如果不能做到對歷史場景的同情了解，不能在內心重演歷史事件展開過程以及理會當時支配事件展開的普遍觀念，就無法接近歷史的真實。本套書以1949年至1981年中國大陸發生的重大歷史事件為論述主線，這二十餘年正是毛澤東思想支配中國的時期，發生了世界歷史上獨特的令人很難理解的現象，如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由於本套書的作者都是中國近幾十年巨變的親歷者，完全了解這些事件發生時的社會氛圍，這就使他們具備了某種比西方史家寫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的優勢。當然，作者要發揮這種優勢，僅僅停留在感性階段是遠遠不夠的；還必須從某一種意識形態中走出來、盡可能價值中立地審視過去，達到反思的高度，以獲得超越的視野。開始注意到支配社會行動的普遍觀念與重大社會事件的互動，特別是這些事件是如何從中央決策到地方、再到基層展開的，是本套書的另一特色。由於各卷作者是獨立寫作，分批出版，雖然現在對全套書作出整體評價尚為時過早，但是，我可以不無自豪地説，中國人終於開始為不尋常的二十世紀中國撰寫大型歷史著作

了。

一開始，我們就決定不設主編，以便各位作者在寫作時有更大的自由，並表達多元的價值。由此帶來一個問題，這就是如何統一風格，使十卷著作組成連續的整體。我們的解決辦法是在動筆之前充分討論各卷內容，每年舉行一到兩次工作會議，切磋寫作中碰到的問題。至今，我仍不能忘懷一次又一次的國史寫作討論會。窗外是北國的寒冬，大家聚集在不大的會議室中不分晝夜地討論，最後形成會議紀要。這一場景使我想起1970年代末青年時代和朋友的徹夜長談。很多時候，大家就某一觀點，細節甚至是提法，進行無休止的辯論。使我十分感動的是，無論在討論中發生多大的爭論，甚至是立場和價值上的分歧，最後都能在忠於歷史事實之上得到統一。根據時段，本書大約以兩三年為一卷，每卷由一位或兩位作者撰寫，而其它作者都把自己對該時段的見解和史料提供給該卷作者，整個寫作過程中表現出一種今日中國學術界罕見的真誠合作精神。在此意義上講，這套書是整個團隊共同努力的成果。

組織編寫和出版《中華人民共和國史》，是我擔任香港中文大學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期間所做的最重要事情之一。這套書的出版，首先要感謝沈志華和李丹慧夫婦，從確定撰寫計劃到尋找適當的作者以及整體工作的協調，他們都是名副其實的組織者。其次，我要感謝青峰和先後在《二十一世紀》編輯室工作的同事黎耀強先生、林立偉先生、張志偉先生、朱敏翎小姐和張素芬小姐。他們在青峰的帶領下，以巨大的熱忱和一絲不苟的敬業精神投入編輯出版工作，否則，如此繁重而浩大的編輯出版工程是不可能完成的。我還要感謝中大中國研究服務中心為本書作者提供的支持和熱情周到的服務。最後，我要感謝方正兄，該書從醞釀到出版，一直得到他在精神上和各方面的支持。他雖已退休數年，但仍念念不忘這套書的出版，認為它對香港中文大學有着重要性。在這些中大同事身上，我仍可以感受到高錕教授任中大校長時期那種注重中國研究在當今世界意義的「中大精神」。

這套書出版之時，我也到達退休年齡，將開始人生的新階段。我想指出的是，由於可以看到的檔案和其它種種限制，這套書只寫到1981年。如果不談此後發生的波瀾壯闊的80年代啟蒙運動，以及由此引發的1989年震驚世界的事件，我們仍無法理解今日中國和世界。在這一意義上，僅僅由前十卷組成的二十一世紀中華人民共和國史是不完備的，寫史的任務並沒有完成。中國從來就有忠於事實和敢言的歷史傳統，但很少有史家為當代寫史，故這套書的出版是一種新現象。它說明中國歷史學家已走出僅僅用春秋筆法褒貶益損，並展示了一種可能性，這就是歷史反思意識已經產生，並開始指向新的深度。我期待着後繼者。

2007年12月于香港中文大學

導言

1958年到1961年，在共和國大地上，先是發動「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爾後由此引起了三年大饑荒，這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是一個大興奮和大災難交替的年代。對這四年的歷史，在中共黨史學界和國史學界均有不少記述。從現已出版的著作看，最為詳細的應屬蕭冬連領銜撰寫的《求索中國：「文革」前十年史》（北京：紅旗出版社，1999），而李銳以回憶錄方式撰寫的《「大躍進」親歷記》（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1996；海口：南方出版社，1999）和《廬山會議實錄》（北京：春秋出版社、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史料最為詳實和珍貴。專題研究性的著作有：謝春濤著《大躍進狂潮》（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廬山風雲》（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96）、蕭冬連著《共和國年輪（1961）》（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國外學者的研究，以羅德里克·麥克法夸爾（Roderic　MacFarquhar）的《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二卷·大躍進（1958-1960）》（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為代表，在中國影響最大，廖蓋隆讚曰：「為了揭示『文化大革命』發生的原因，作者搜集、整理、查閱了非常豐富的資料，從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方面，從中央、地方乃至基層等各個層次，以及當代國際共運和東西方關係等各個角度，進行了大量周密的分析和研究。」[1]不過，由於成文時間較早（英文版1982年出版），現在可以見到的大量文獻資料當時尚未公布。1990年代以來，香港出版的有：丁抒著《人禍》（1988-1989年在《九十年代》連載，2005年香港《九十年代》雜誌出版單行本）；曹樹基著《大饑荒：1959-1961年的中國人口》（香港：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5）；賈斯柏·貝克（Jasper　Becker）著，姜和平譯《餓鬼：毛時代大饑荒揭秘》（香港：明鏡出版社，2005）。

眾所周知，毛澤東在1958年發動大躍進時，開出了一張不同尋常的時間表，先是十五年趕超英國；然後是十年趕上英國，再有十年趕上美國；再是七年趕英，十五年趕美；最後是趕超英國，不是十五年，也不是七年，只需要二年到三年。一哄而起的人民公社，被認為是架起了由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金橋，供給制、公共食堂被譽為是共產主義的「萌芽」，一時間，竟然向世人宣布：「共產主義在我國的實現，已經不是甚麼遙遠將來的事情了。」這種被後人看來有違常識的天方夜譚，是怎樣設計出來，又何以能夠得到上下左右的認可，從而掀起一場

群眾性的狂熱？學者們對此提出有以下觀點：

有的認為：第一，中國當時的經濟模式是欠發達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模式。愈是欠發達的國家，其內外壓力愈大。「大躍進」的發生與此有關；第二，為了走自己的路。「大躍進」發起的年代，人們以前所未有的「衝動」，來進行一場屬於中國人自己的超越前人的工業化實驗；第三，理論約束與現實矛盾。一方面必須遵循馬克思主義關於社會生產的一般原理，尊重蘇聯某些經驗；另一方面又必須創造一整套符合自己情況的方法、政策。一方面要爭取高於資本主義甚至社會主義蘇聯的發展速度；再一方面，又面臨着基礎薄弱、技術落後，人口眾多的現狀。這些矛盾給發展戰略帶來潛移默化的影響；第四，造「因利制權」之勢。1950年代後半期世界局勢相對平穩，毛澤東有「因利制權」的戰略考慮。「大躍進」的發生，同這一個時期內外環境特點以及中國試圖加以利用它們的戰略考慮有關。[2]

有學者補充說：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大陣營處於冷戰對峙的格局之中，毛澤東「左」的錯誤的發展，對馬克思主義「破除資產階級法權思想」和「從必然王國到自由王國飛躍」的思想觀點的錯誤理解及宣傳，群眾對領袖的盲目崇拜，是導致「大躍進」運動發生的社會歷史原因。[3]而毛澤東對於1956年周恩來等領導的「反冒進」的批評，直接導致了「大躍進」的發生。[4]

也有學者認為：「大躍進」的發生，與對革命經驗的採借有關：以群眾運動作為經濟建設的主要運作方式；在分配方面倡導恢復供給制；在激勵機制方面突出政治掛帥；在領導體制方面實行黨的一元化領導。[5]可以說，「大躍進」是中共在延安時期領導的「大生產運動」的再現。[6]

還有學者指出：不應該把個人或某些階層對「大躍進」的影響因素誇大。廣泛存在於社會各階層的烏托邦思想、濃厚的不誠實氛圍、傳統的生育觀帶來的人口壓力等三個方面對「大躍進」的形成有重大影響。[7]顯然，人民公社所以一時為廣大農民接受，與整個社會深厚的農業社會主義思想有關，當時的領導人曾明確表示，先人的烏托邦現在已有條件得到實現了。

關於導致「大躍進」的外部因素，學者們認為，除了東西方冷戰格局的背景，使處於落後狀態的中國領導人有一種搶速度的緊迫感之外，社會主義陣營的趕超浪潮也是影響和推動「大躍進」發生的重要國際因素。[8]

上述國內外學者的研究成果，為本書的寫作，提供了重要的參考和借鑑。而上世紀末到本世紀初，由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和其它一些中央機構編輯、出版的大量文獻、年譜、大事記等史料集，領導人的傳記、回憶錄、口述史等等，更為人們研究這段歷史提供了較此前更多的客觀

依據。

本書的寫作，遵循以事實為依據，進行客觀敘述的原則，在吸取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力求對這一時段人們關注的問題做出貼近歷史實際的記述。涉及的主要問題有：

第一，大躍進的發動者，無疑是毛澤東。問題是在中共高層是如何取得一致的？

第二，如果説，高層領導人頭腦發熱，那群眾的熱情又是怎樣被鼓起來的，並曾一度為人民公社的建立而歡欣鼓舞呢？

第三，超英趕美的時間表一再縮短，這場數字遊戲是怎樣編織出來的？

第四，接近天文數字的農業高產「衛星」、鋼鐵高產「衛星」，為甚麼人們一時都信以為「真」？

第五，供給制、公共食堂，這些人民公社中的共產主義「萌芽」和「因素」，在領導層和農民群眾之間出現的矛盾，何以遲遲得不到解決？

第六，從1959年開始的大饑荒是怎樣造成的，主要是「天災」還是「人禍」？各地的嚴重情況為甚麼遲遲反映不到最高層，農村大量非正常死亡的真實情況如何？

第七，1958年到1960年間，中，蘇兩黨領導人發生的嚴重分歧對大躍進和大饑荒產生了哪些影響？

第八，大躍進在科技、教育、文化、衛生等各個領域的反映，以及對不同階層的影響。

第九，為挽救危局，當年採取了哪些措施，在整個社會趨向穩定的同時又潛伏着怎樣的危機？

有關以上諸多問題，除為多數學者共同採用的史料外，本書還選用了若干人們未曾使用過的和新公布的史料。如：

毛澤東發動大躍進，除在黨內高層嚴厲批評反冒進，把有關經濟建設的不同意見提到了「政治」、「路線」、「主義」的高度外，同時在省級領導層開展了反右派鬥爭，全國（除台灣、西藏）二十七個省、市、自治區中有九個省區和全國總工會的領導人（省委第一書記、書記處書記，省長、副省長，全國總工會主要負責人）被打成「右派分子」或「右派反黨集團」。對1958年的軍隊整風，提出要學習蘇聯「朱可夫事件」的材料，吸取教訓，對軍隊將帥進行敲打。

在成都會議上提出「要崇拜真理」，「一個班要崇拜班長」以後，當年5月召開的中共八大二次會議，掀起了對毛澤東個人崇拜的第一個浪潮，從中央到地方的領導人，紛紛發言指出：對毛澤東的崇拜就是崇拜真理；毛澤東著作，是活的馬克思主義；學馬列，主要是讀毛著；總路線是馬列主義的新發展，具有世界意義等等。

有關基層群眾響應大躍進的號召，掀起的群眾運動，有出席全國人大一屆五次會議、中共八大二次會議的地方各級領導人、工農業勞動模範、科學工作者，技術人員、文化界人士、黨員代表的發言，表態；中央和地方報刊報導的各地農田水利建設、技術革新、大辦地方工業等群眾運動的火熱場景。

新華社編的《內部參考》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出現的問題和情況也有很多報導：公共食堂發生斷炊，浮腫病開始在農村出現，農民盲目外流，農村勞動力短缺和出勤率下降，城鄉糧食危機，中下層幹部對大躍進、人民公社的質疑，大煉鋼鐵造成的破壞，鋼鐵生產計劃難以完成等情況。

「信陽事件」採用了《「信陽事件」專題研究報告》未刊稿、《信陽事件》未刊稿，以及當年的中共信陽地委副書記、行政公署專員張樹藩的遺作等材料。有關因大饑荒引起非正常死亡的問題，除介紹國內外學界的研究情況外，筆者還根據趙發生主編的《當代中國的糧食工作》、許滌新主編的《當代中國的人口》、袁永熙主編的《中國人口》等著作提供的數據，作了估算。

歷史是一面鏡子，以史為鑑，鑑往知來，中外古今的哲人都是這樣說的。恩格斯說過：「偉大的階級，正如偉大的民族一樣，無論從哪方面學習都不如從自己所犯錯誤中學習來得快。」這就是筆者寫作《烏托邦運動：從大躍進到大饑荒（1958-1961）》這一卷的初衷。

[1] 1988年12月，廖蓋隆為該書中譯本作序。見〔英〕羅德里克·麥克法夸爾著，《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翻譯組譯：《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二卷（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頁3。

[2] 李向前：〈「大躍進」歷史成因芻論〉，《中共黨史研究》，1995年第1期。

[3] 王軍正：〈「大躍進」發生的社會歷史原因探析〉，《西安聯合大學學報），2001年第3期。

[4] 王玉貴：〈毛澤東對中央一線領導的嚴厲批評與「大躍進的發動」〉，《廣西黨史》1996年第1期。

[5] 何雲峰：〈「大躍進」運動對革命經驗的採借〉，《黃河水利職業技術學院學報》，1999年第4期。

[6] 朱地：〈也論「大躍進」的緣起——評《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的有關論述〉，《中共黨史研究》，2001年第1期。

[7] 李若建：〈「大躍進」的社會基礎〉，《中山大學學報》，2000年第4期。

[8] 劉建國：〈社會主義陣營的趕超浪潮與中國大躍進運動的發生〉，《江漢論壇》2000年第4期。

第一章

多快好省總路線出台

從1955年批判農業合作化的所謂「小腳女人」開始，毛澤東逐漸形成社會主義建設有兩種指導方針的觀點：一種叫多、快、好、省；一種叫少、慢、差、費。1956年的蘇共二十大，揭露了斯大林所犯的嚴重錯誤，毛澤東決意要走出一條較之蘇聯更快的路，但在黨內卻受到了劉少奇、周恩來等反冒進的「阻撓」。在取得反擊資產階級「右派」鬥爭的勝利，又在1957年莫斯科會議上獲得極高聲譽，並向全世界宣告十五年趕超英國之後，毛澤東深感要加快社會主義建設的速度，首先要使中共黨內的思想，尤其是黨的高層思想統一到多、快、好、省上來。

一、趕超新思路在高層統一

1.毛澤東趕超戰略的新思路

從發展戰略的角度來看，後進國家的發展都有一個趕超的緊迫感。對處於資本主義包圍形勢下的新興的社會主義國家來說，更是這樣。列寧在1917年就提出：「或是滅亡，或是在經濟方面也趕上並且超過先進國家。」[1]斯大林在1931年也說：「延緩速度就是落後。而落後者是要挨打的。」他還強調：「我們比先進國家落後了五十年至一百年。我們應當在十年內跑完這一段距離。或者我們做到這一點，或者我們被人打倒。」[2]蘇聯在斯大林的領導下，採取了優先發展重工業的高速發展戰略，雖然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影響了農業和輕工業的發展，終究使蘇聯在短期內實現了由農業國到工業國的轉變。

新中國建立不久，毛澤東就說過，我們現在只能造桌子椅子，茶碗茶壺，但是一輛汽車，一架飛機、一輛坦克都不能造。因此，從1953年起實施的國民經濟第一個五年計劃，走的就是蘇聯工業化的趕超型道路。由毛澤東審定、中共中央批準的關於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學習和宣傳提綱中寫道：

> 資本主義國家從發展輕工業開始，一般是花了五十年到一百年的時間才能實現工業化，而蘇聯採用了社會主義工業化的方針，從重工業建設開始，在十多年中（從一九二一年開始到一九三二年第一個五年計劃完成）就實現了國家工業化。蘇聯過去所走的道路正是我們今天要學習的榜樣。[3]

毛澤東公開提出趕超資本主義國家的問題，是1955年。這年的3月21日，他在中共全國代表會議開幕詞中說：

> 要在大約三個五年計劃期間內使國家基本上工業化，並且要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完成社會主義改造，要在大約幾十年內追上或趕過世界上最強大的資本主義國家。[4]

同年10月，毛澤東在中共七屆六中全會上講話，第一次把美國作為趕超目標，並同向共產主義過渡聯繫起來。他說，大約十五年左右，即三個五年計劃左右，基本上建成社會主義。還要加一點：大約五十年到七十五年左右，即十個到十五個五年計劃左右，可以爭取趕上或超過美國。在這個時期內，國際、國內、黨內、黨外，一定會發生許多嚴重的複雜的程度不同的衝突和鬥爭……。但我們是馬克思主義者，一切困難都是可以克服的，一定會出現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中國，五十年以後會

出現一個共產主義的中國。[5]

1955年秋冬，由批判農業合作化中的「右傾」引發的社會主義改造熱潮，使毛澤東極為興奮，曾被認為是最困難的問題——對農民的改造，竟然在短短的三年時間就順利解決了，不僅沒有像蘇聯那樣引起社會的極大震動，而且經濟的發展在總體上是向上升的。對毛澤東這時的心態，逄先知在〈毛澤東和他的秘書田家英〉一文中有如下描述：

> 他（指毛——引者注）對田說，他很高興，1949年全國解放時都沒有這樣高興。這個話真實地反映了毛澤東當時的心態。對毛來說，全國解放是早已料到的，早有準備的，而農業合作化的勝利來得這樣快，這樣順利，卻出乎他的意料。他一向認為，改造五億人口的個體農民是最艱難的事業，需要花費很長的時間和做許多細緻的工作才能完成。誰知道，這麼困難的問題，經過二三次會議，作一篇報告，就如此順利地解決了，那末，還有甚麼比這個更困難的問題不能解決呢？[6]

於是，毛提出要利用目前國際休戰時間，利用這個國際和平時期，進一步加快發展，提前完成社會主義工業化的要求。在他看來，只要採取像農業合作化一樣，批判各條戰線的右傾思想，把群眾發動起來，是完全有可能的。

1956年2月，蘇共二十大對斯大林錯誤的揭露，使毛認為，蘇聯的道路也不完全是正確的。中國有可能走出一條比蘇聯更快的發展道路。當年4月4日，在討論《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最後一次修改稿的會上，毛澤東說道，對蘇共二十大的議論，問題在於我們自己從中得到甚麼教益。他說：

> 最重要的是要獨立思考，把馬列主義的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具體實際相結合。民主革命時期我們在吃了大虧之後才成功地實現了這種結合，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現在是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我們要進行第二次結合，找出在中國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這個問題我幾年前就開始考慮，先在農業合作化問題上考慮怎樣把合作社辦得又多又快又好，後來又在建設上考慮能否不用或少用蘇聯的拐杖，不像第一個五年計劃那樣搬蘇聯的一套，自己根據中國的國情，建設得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現在感謝赫魯曉夫揭開了蓋子，我們應從各方面考應如何按照中國的情況辦事，不要再像過去那樣迷信了。其實，過去我們也不是完全迷信，有自己的獨創。現在更要努力找到中國建設社會主義的具體道路。[7]

《論十大關係》中提出，實行重工業，輕工業和農業同時並舉，發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等方針。就是在「以蘇為鑑」的基礎上提出來的。所以，8月30日，毛在中共八大預備會議第一次會議講話中就極為自信地說：

> 我們這個國家建設起來，是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將完全改變過去一百多年落後的那種情況，被人家看不起的那種情況，倒霉的那種情況，而且會趕上世界上最強大的資本主義國家，就是美國。……這是一種責任。你有那麼多人，你有那麼一塊大地方，資源那麼豐富，又聽說搞了社會主義，據說是有優越性，結果你搞了五六十年還不能超過美國，你像個甚麼樣子呢？那就要從地球上開除你的球籍！所以，超過美國，不僅有可能，而且完全有必要，完全應該。[8]

1957年7月，毛澤東在談到中國未來發展的進程時又說過同樣的話：

> 在我國建立一個現代化的工業基礎和現代化的農業基礎，從現在起，還要十年至十五年。……十年至十五年以後的任務，則是進一步發展生產力，進一步擴大工人階級知識分子的隊伍，準備看逐步地由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必要條件，準備以八個至十個五年計劃在經濟上趕上並超過美國。[9]

由這年夏季開始發動的反擊「資產階級右派」的鬥爭，和農村的社會主義大辯論。除了使人們更加堅信社會主義的美好未來，並由此引發出一股力爭儘快改變貧窮落後面貌的熱情，也使毛澤東認為找到一條動員群眾的好方法，這就是「四大」——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他在中共八屆三中全會講話中極其興奮地說：

> 1957年中國革命創造了一個最革命最生動最民主的群眾鬥爭形式，就是大鳴大放大辨論和大字報。革命的內部（容）我到了適合自己發展的形式。從此無論大是大非、小是小非的問題，與論是革命的問題、建設的問題，都可以用辯論的形式去迅速地解決。[10]

1956年到1957年期間，由於中國共產黨在蘇共二十大以後，尤其是波蘭、匈牙利事件以後，在澄清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內部的思想混亂，維護社會主義陣營的團結方面發揮的重要作用，使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在社會主義陣營及世界共產黨中的威望大增。以至1957年在莫斯科舉行的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上，毛澤東事實上成了會議的主角。這時，毛澤東明顯感到的是「政治大國」與「經濟小國」地位的不相稱。因此，他在赫魯曉夫宣布，蘇聯將在十五年後趕上和超過美國之後，提出中國要在十五年後趕上和超過英國。他在莫斯科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上說：

> 中國從政治上、人口上說是個大國，從經濟上說現在還是個小國。他們想努力，他們非常熱心工作，要把中國變成一個真正的大國。赫魯曉夫同志告訴我們，十五年後，蘇聯可以超過美國。我也可以講，十五年後，我們可能趕上或者超過英國。[11]

可以認為，毛澤東趕超戰略的新思路，這時已基本形成。這就是用「四大」的方法，通過不斷批判「右傾保守」思想，把各階層人民群眾動員起來，充分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就有可能克服各種困難，在短期內使中國的經濟發展來一個大飛躍。

1958年元旦，《人民日報》發表題為〈乘風破浪〉的社論。其內容就是根據毛澤東在莫斯科會議上的多次講話精神寫的。社論突出強調「多、快、好、省」的方針，並提出「鼓足幹勁，力爭上游」的口號。同時，向全國人民鄭重宣告：

> 我們要在十五年左右的時間內，在鋼鐵和其它重要工業產品產量方面趕上和超過英國；在這以後，還要進一步發展生產力，準備再用二十年到三十年的時間在經濟上趕上並且超過美國，以便逐步地由社會主義社會過渡到共產主義社會。這是我國人民光榮的偉大的和艱巨的歷史任務。[12]

這篇社論，實際上是向全中國人民發出的一個動員令。

1958年來到時的形勢，國際上，蘇聯兩顆人造衛星的發射成功，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的莫斯科會議，使當年波蘭和匈牙利事件籠罩在社會主義陣營上空的烏雲已為之一掃，出現了毛澤東概括的「東風壓倒西風」的勢頭。中國國內，第一個五年計劃已勝利完成，為國民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奠定了基礎，初步積累了大規模經濟建設的經驗；1957年秋冬，由《全國農業發展綱要（修正草案）》的公布，在全國農村掀起的大興農田水利建設的熱潮，既反映了人民群眾生產建設熱情的高漲，又表露了人們對改變「一窮二白」落後面貌的迫切期盼。因此，整個來說，對加速國內的經濟建設，是有利的。但是，由於毛澤東的過分自信，決意乘着這股有利形勢，推行他認為的馬克思主義路線，從1958年元月起，首先向黨內高層發難，展開一場反對「反冒進」的鬥爭。

2.反「反冒進」的醞釀與發動

然而，1956年中共八大前後，由反對經濟建設中急躁冒進而制定的「在綜合平衡中穩步前進」的方針，不只在全黨「言猶在耳」，而且在現實生活中的成效有目共睹。中共八大《關於政治報告的決議》明確寫明：「黨的任務，就是要隨時注意防止和糾正右傾保守的或『左』傾冒險的傾向，積極地而又穩妥可靠地推進國民經濟的發展。」因此，要使這個超高速發展的趕超戰略在政治上、理論上站住腳，不批倒「綜合平衡」、「穩步前進」論，就難以把全黨、全民調動起來。

毛澤東在去莫斯科前舉行的中共八屆三中全會上，就開了批評1956年反冒進的頭，提出要恢復「多、快、好、省」、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促進委員會這三條；重申：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社會主義

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這是當前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此後，各省領導人已開始緊跟步伐。毛從蘇聯回國後，繼續思考如何取得更高發展速度的問題。他歷來認為，北京的空氣沉悶，華東的空氣活躍。[13]用地方來促中央，是毛澤東實現他的思想主張的重要一着棋。1955年秋掀起的農業合作化熱潮，就是以地方來促中央的範例。事隔兩年之後，毛為了實現他的戰略宏圖，決心再次以地方來促中央。12月8日，毛澤東離開北京，前往西子湖畔的杭州。

毛此次到達杭州，正值中共浙江省委和上海市委即將舉行黨代表大會的前夕，他隨即召集上海市及華東各省負責人：柯慶施、舒同、曾希聖、劉順元，江渭清、葉飛、江華等開會，向他們講了主要矛盾、整風重點等問題，並對浙江省委向黨代會的工作報告作了討論。[14]隨後，又親自審閱了上海市委向黨代會的報告，並作了一些修改。[15]後來，中共浙江省委第一書記江華和中共上海市委第一書記柯慶施在黨代大會上的報告，都受到毛澤東的讚賞。這兩個報告在《人民日報》發表時，毛澤東親自寫編者按，要全黨學習。

在中共地方黨委中，緊隨毛澤東其後並公開批判1956年反冒進的，柯慶施是第一人。1957年12月25日，柯在中共上海市第一屆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上，以《乘風破浪，加速建設社會主義的新上海》為題的報告中，首先闡述了毛澤東關於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是當前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的論斷。隨後，談了上海完成一五計劃的情況，工業產值超過計劃163%，整個形勢一片大好。批評「有一部分同志曾經認為我們上海的各項工作都『冒進』了」的說法。認為對上海工業方針的爭論，突出地表現在這一點上。他在引用毛澤東《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序言中，強調要在各個領域不斷批判右傾保守思想的一段話後說：

> 我們認為，既然是幹社會主義革命、幹社會主義建設，幹這種前無古人的事業，幹這種同帝國主義爭時間、比速度的事業，那就必須有一股革命的幹勁。……在我們看來，凡是經過努力可以做到的事情，就努力做到，這才是正常現象；不去努力做到，這才是不正常現象。否則，就談不到革命態度、革命氣概和革命速度，就談不到盡可能快地把我國建設成一個社會主義強國。因此，我們應該堅決貫徹執行多、快、好、省的勤儉建國方針。……這是一個促進的而不是「促退」的方針，走在現在的國際環境中，我國社會主義建設所應該採取的唯一正確方針。而且是一個已經在實踐中證明行之有效的正確方針。[16]

柯強調：「在整風運動中，必須批判這種右傾保守觀點，改正各種不正常現象，以便迎接新的建設高潮，促進建設事業的新高潮。」李銳回憶說，「1958年我同陳雲接觸時，陳向我說過這樣的話：柯慶施是一個手中隨時拿着大棒的人。」[17]

柯慶施還是最早具體落實毛澤東提出十五年趕超英國、提前實現農業發展綱要的地方官員，他在報告中提出上海趕超的主要目標是；一般輕工業，紡織工業、機電工業、化學工業部門要根據具體情況，爭取若干品質較低的主要產品，在第二、第三兩個五年計劃期間，逐步地趕上或者超過英國或美國同類產品的品質水準。爭取《全國農業發展綱要（修正草案）》的提前實現，在五年內，糧食每畝平均年產量達到一千五百斤到二千斤，皮棉每畝平均年產量達到一百五十斤到二百斤。

柯以「乘風破浪」作為報告的結語。他說：

> 中國有一句古話，叫做「乘風破浪」。我想很可以用這句話來描寫我們目前的形勢和任務。我們的前面有浪，這就是我們在建設社會主義事業中所必然遇到各種困難。但是我們的後面有風，這就是廣大的黨員群眾和人民群眾的日益高漲的革命積極性。這是一股具有無限潛力的風，這是一股不可抗拒的風。只要我們堅決依靠群眾的這種革命積極性，我們就一定能夠克服我們前進道路上的任何困難。讓我們用乘風破浪的革命氣概勇敢前進！[18]

這真有一點毛澤東後來提倡的高屋建瓴，所向披靡的味道。可見，毛澤東欣賞柯慶施，絕非偶然。

經過這段在華東的醞釀，毛澤東反「反冒進」的意圖在地方「諸侯」中開始有了回應，於是決心正面向黨內高層發難，展開一場反對「反冒進」的鬥爭。

1958年1月2日至4日，毛澤東在杭州召集有部分中央領導人和部分地方負責人參加的工作會議。[19]到會的有：柯慶施、舒同、曾希聖、劉順元、江渭清、葉飛、江華、胡喬木、陳丕顯、林鐵、石西民、張春橋等。周恩來陪同也門王國巴德爾王太子于1月1日到達杭州，也參加了會議。[20]此次會議，討論了黨領導經濟建設的方法問題、政治與業務的關係問題、技術革命問題等。毛澤東先後兩次講話。

在3日的會議上，毛澤東一上來就批評所謂的右傾保守。

毛說：批評右傾保守，就很舒服，愈批評愈高興。他表揚甘肅省大搞農田水利建設的勁頭說：甘肅一千多萬人口，勁頭很厲害，值得去學習。他認為，1956年工業產值增長31%，沒有1956年的突飛猛進，就不能完成五年計劃。因此，要愉快地批鬥右傾。他批評有些業務部門的負責人，說話是口邊政治很少，平素不大談政治，忙得很，一談就是業務。他提出，一定要批評不問政治的傾向，同時要反對空頭政治家。一種是不懂業務，空頭政治家，一種是迷失方向的經濟家或其它技術家，都是不好的。明顯地表露了對國務院管經濟工作的領導人的不滿。

接着，毛表揚了上海和浙江。說：上海提要有幹勁，很好，《浙江日報》社論〈是促進派，還是促退派〉，《人民日報》要轉載。

在4日的會上，毛澤東從哲學的角度講平衡與不平衡的辯證法，用以批評經濟發展計劃必須考慮綜合平衡的觀點。他說：《哲學研究》第五期上李達的一篇文章，第六期上馮友蘭的一篇文章，都可以看一看。形式邏輯是量變階段的科學，是辯證法的組成部分。量變與質變是對立的統一。事物有它的相對的固定性。定出計劃。做出決議，是相對的平衡。定了以後，還是要變。平衡、鞏固、一致……都是暫時的，不平衡、鬧矛盾是絕對的。不平衡不僅是社會法則，也是宇宙法則。剛剛平衡，立即突破；剛剛平衡，又不平衡。他強調，我們的經驗就是要不斷革命。要趁熱打鐵，不能斷氣。

就在這次杭州會議上，毛澤東就1956年的反冒進，當面向周恩來發了火。他後來在南寧會議上說：杭州會議，我在那裏放火！「我是放恩來的火，有柯老（指柯慶施——引者注）為證，就在杭州，實在憋不住了。幾年之氣，就向薄一波發洩。我說：我不聽你這一套，你講甚麼呀？我幾年都不看預算了，橫直你是強迫簽字」[21]毛還向周恩來「發了一通牢騷」，說：「農村社會主義高潮一書的序言，對全國發生了很大的影響，是『個人崇拜』『崇拜偶像』？不管甚麼原因，全國各地報紙、大小刊物都登載了，發生了很大的影響。這樣我就成了『冒進的罪魁禍首』。為甚麼軍隊多了幾十萬人，招收工人學徒多了一百多萬人？我說各部門都有對形勢估計不足的情況，反對右傾保守為甚麼要多加人，我不懂，我也不知道。」[22]「你們那時候（指反冒進——引者注）不僅脫離了各省，而且脫離了多數的部。」[23]

如果說，隨後的南寧會議是毛澤東反「反冒進」的高峰，那末，杭州會議是這個高峰的發端。

3.批評反冒進「是政治問題」

1958年1月6日，周恩來陪同外賓回到北京，立即為即將召開的一屆人大五次會議做準備。考慮到1958年的預算和年度計劃需要研究確定，周恩來向毛澤東建議，是否在人大召開前先開一次黨內會議討論一下。毛表示同意，並親自寫了準備到南寧去開會的通知：[24]

> 吳冷西，總理，少奇，李富春，薄一波，黃敬，王鶴壽，李先念，陳雲，鄧小平，彭真，喬木，陳伯達，田家英，歐陽欽，劉仁，張德生，李井泉，潘復生，王任重，楊尚奎，陶鑄，周小舟（已到），史向生，劉建勳，韋國清，毛澤東，共二十六（二十七）人，於11日、12日兩天到齊，在南寧開十天會，廿號完畢（中間休息二天到三天，實際開會七天到八天）。
>
> 譚震林管中央，總司令掛帥。陳毅管國務院。

1月11日，南寧會議如期召開。毛澤東所點的人中，陳雲、鄧小

平、張德生、潘復生沒有到會。周恩來因送巴德爾王子離京，13日才到達南寧。會議的重點本來是總結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執行情況和討論第二個五年計劃及長遠規劃等問題。但在開會的第一天，毛澤東就提出反冒進的問題，並定性為「政治問題」。把中共八屆三中全會以來對反冒進的批評推向高潮。

根據毛澤東的意見，會上向到會者散發了十二份反冒進的材料，主要有：1956年6月25日，李先念在全國人大一屆三次會議作的《關於1955年國家決算和1956年國家預算的報告》中關於反冒進的一段話；1956年6月20日，《人民日報》社論——〈要反對保守主義，也要反對急躁冒進情緒〉；1956年11月10日，周恩來在中共八屆二中全會上《關於一九五七年度計劃的報告》節錄。

11日，毛澤東在會上說：不要提「反冒進」這個名詞好不好？這是政治問題。一反就泄了氣，六億人一泄了氣不得了。[25]

他扳起手指頭，提出著名的成績與錯誤是「九個指頭與一個指頭」說。他向在座的人說，拿出兩隻手來給人家看，看幾個指頭生了瘡。「庫空如洗」，「市場緊張」，多用了人，多花了錢，要不要反？這些東西要反，如果當時不提「反冒進」，只講一個指頭長了瘡，就不會形成一股風，吹掉了三個東西：一為多快好省，二為四十條綱要，三為促進委員會。這些都是屬於政治問題，而不屬於業務。一個指頭有毛病，整一下就好了，原來「庫空如洗」，「市場緊張」，過了半年不就變了嗎？十個指頭問題要搞清楚，這是關係六億人口的問題。究竟成績是主要的，還是錯誤是主要的？

毛強調要反分散主義，提出了八句歌訣：大權獨攬，小權分散；黨委決定，各方去辦；辦也有決，不離原則；工作檢查，黨委有責。他說，過去中央只攬了一個革命，一個農業，其它實權在國務院。有人反對黨政不分，想把大權攬過去，讓黨委搞點小權，最好的好意也是想將一半大權攬過來。這樣就沒有集中了。集中只集中到黨委，到政治局、書記處、常委，只能有一個核心。這顯然是指周恩來在向黨中央攬權。[26]

第二天，毛澤東更把反冒進說成是「攻其一點，不及其餘」，離右派只剩五十米遠了。他批評說：「我們要注意，最怕的是六億人民沒有勁，抬不起頭來就很不好。群眾觀點是從六億人口出發。看問題要分別主流、支流，本質、現象。」他接着批評說：「1955年夏季，北戴河會議『冒進』，想把鋼搞到一千五百萬噸（第二個五年計劃），1956年夏季北戴河開會『反冒進』。人心總是不齊的。」「右派的進攻，把一些同志拋到和右派差不多的邊緣，只剩了五十米，慌起來了，甚麼『今不如昔』，『冒進的損失比保守的損失大』。

政治局要研究為甚麼寫反冒進的那篇社論，我批了『不看』二字，

那是管我的，所以我不看，那篇東西，格子沒有劃好，一個指頭有毛病，九與一之比，不弄清楚這個比例關係，就是资產階級的方法論……攻擊一點，不及其餘。」[27]

他批評周恩來說，「反冒進」，脫離了大多數部長、省委書記，脫離了六億人民。「請你看篇文章，宋玉的《登徒子好色賦》，這篇文章使登徒子二千年不得翻身，他的方法是『攻其一點，不及其餘』。」

關於毛澤東對反冒進那篇《人民日報》社論的批評，吳冷西有過詳細的記述。他在《憶毛主席》一書中寫道：

> 1月12日，南寧會議開始，毛主席一上來就講他建國八年來一直為工作方法而奮鬥，1956年「反冒進」是錯誤的。
>
> ……他嚴厲地批評了國務院的政府工作報告、財政工作報告和計劃工作報告，也指出《人民日報》1956年6月20日反冒進的社論（題目叫做〈要反對保守主義，也要反對急躁情緒〉）是非常錯誤的。……
>
> 毛主席把《人民日報》社論的摘要在會議上印發，並且加上批語：「庸俗的馬克思主義，庸俗的辯證法。文章好像既反『左』又反右，但實際上並沒有反右，而是專門反『左』，而且尖銳地針對我的。」
>
> 毛主席在會議過程中，多次批評《人民日報》的社論，並且把這篇社論作為當時中央一些同志『反冒進』的證明。他逐段逐段地批判這篇社論。
>
> ……
>
> 毛主席還說，社論引用了我在《中國農村社會主義高潮》一書序言的話。看來作者的用意一來不要冒犯我，二來是借刀殺人。但引用時又砍頭去尾，只要中間一段，不引用全文，因為一引用全文就否定作者的觀點了。我寫的序言全文的主要鋒芒是對着右傾保守的。社論引了我說掃盲用急躁冒進的辦法是不對的這些話，用來作為反對急躁冒進的根據。社論表面上既反「左」也反右，沒有重點。實際上重點落在「反冒進」上面。作者引用我的話來反對我。[28]

毛澤東對反冒進這些措詞嚴厲的批評，使「會議從一開始空氣就非常緊張了」。[29]

1月13日晚，周恩來飛抵南寧，同日到達的有柯慶施。當天晚上，毛澤東約周恩來、劉少奇談話，直到深夜。

在16日的會上，毛澤東拿出柯慶施在上海市黨代會作的《乘風破浪，加速建設社會主義的新上海》的報告當眾羞辱周恩來，問道：「恩來，你是總理，這篇文章，你寫得出來寫不出來？！」周回答說：「我寫不出來。」毛說：「老柯這篇文章把我們都比下去了。上海有一百萬

無產階級，又是资產階級最集中的地方，工業總產值佔全國五分之一，資本主義從上海產生，歷史最久，階級鬥爭最尖銳。這樣的地方才能產生這樣一篇文章。」[30]

薄一波在1983年接受訪問時回憶當時的情況說：「這次會議，毛主席對總理批評得很厲害。毛主席說：『你不是反冒進嗎？我是反反冒進的。』」「會上，康生是得彩的，柯慶施、李井泉是很積極了，對總理的批評其態度是使人難堪的。」「會議整整開了十幾天，大會小會，非常緊張。」[31]聽了毛的批評，周和到會的副總理們「坐臥不安」。[32]周的經濟秘書顧明回憶說：「幾乎每天晚上，先念、一波等都聚在總理那裏討論到夜裏二三點，商議怎麽檢討等等。那時，會議的形勢很緊張。」[33]

1月19日，毛澤東約周恩來單獨談話。隨後，繼續進行大會討論。會議從晚上8點多一直開到深夜1點多。周恩來在大會發言，對反冒進承擔了責任。

他檢討：「反冒進」這個問題，是一段時間（1956年夏季到冬季）帶方針性的動搖和錯誤。

> 「反冒進」是由於不認識或者不完全認識生產關係改變後生產力將要有躍進的發展，因而在放手發動群眾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中表示畏縮，常常只看見物不看見人，尤其是把許多個別現象誇大成為一般現象或者主要现象，這是一種右傾保守主義思想。

周被迫承認，「反冒進」的结果損害了三個東西——促進委員會、農業四十條、多快好省，使1957年的工農業生產受到了一些影響，基本建設也減少了一些項目，而最重要的是群眾和幹部的勁頭得不到支持，反而受到束縛，使我們建設走群眾路線這一方針受到某些損害。並上綱說：

> 這個方針是與主席的促進方針相反的促退方針。實行這個方針，不管你主觀想法如何，事實上總是違背了主席的方針的。越是不自覺這是方針性的違背，就越嚴重越危險。

周表示：「這一『反冒進』的錯誤，我要負主要责任。」[34]

1月21日，毛澤東作總結性發言，提出：「從1958年起，在繼續完成思想、政治革命的同時，著重點應放在技術革命方面。」關於「反冒進」問題，他強調教訓是：「反掉了三個東西，把一些同志拋到（同）右派似乎相近的地位。」並明確提出今後要「以一個人為核心」。[35]

南寧會議最後形成了《工作方法六十條》。其中不乏具有指導意義的工作方法，但當時起主導作用的是推動「大躍進」的錯誤做法。

其一，提出了「生產計劃三本賬」。中央兩本賬：一本是必成的，第二本是期成的；地方也有兩本賬：第一本是中央的第二本，在地方是

必成的，第二本在地方是期成的。[36]

其二，提出了一些脱離實際的過高指標，主要有：各地方的工業產值，「爭取在五年內，或者七年內，或者十年內，超過當地的農業產值。各省市對於這件事要立即着手訂計劃，今年七月一日以前訂出來」。「在今後五年內，或者六年內，或者七年內，或者八年內，完成《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的規定（原規定十二年完成——筆者註）。各省委、直屬市委、自治區黨委對於這個問題應當研究一下。就全國範圍來看，五年完成四十條不能普遍作到，六年或者七年可能普遍作到，八年就更加有可能普遍作到」。[37]

其三，提出「五年看三年，三年看頭年，每年看前冬」；「十年決於三年。爭取在三年內大部分地區的面貌基本改觀」；「苦戰三年』等急於求成的口號。[38]樹立了湖北、四川、陝西，廣西幾個農業社明顯含有水分的高產榜樣，介紹説：「湖北孝感縣的聯盟農業社，一部分土地每年種一造，畝產2130斤；四川仁壽縣的前進農業社，一部分土地一造畝產1680斤；陝西宜君縣的清河農業社，這個社在山區，一部分土地一造畝產1654斤；廣西百色縣的拿坡農業社，一部分土地一造畝產1600斤。這些單季高產的經驗，各地可以研究試行。」[39]《六十條》，把杭州會議上談到的「不斷革命」和打破平衡論的觀點分別列條，作為批判反冒進的理論武器和經濟工作的指導思想肯定下來，否定了國民經濟必須在綜合平衡中發展的規律。

關於南寧會議的氣氛，參加會議的李鋭回憶説：

> 在南寧會議上，形勢當然是一邊倒。與會者都程度不同地接受了毛澤東的教誨：「頭腦大大清醒起來」，都表示要當促進派。記得三峽問題谈完後，周小舟向我介紹那幾十條時，説大家都希望主席多談一些，多受到一些啟發，甚至表示他也想將英文撿起來。李井泉等人還從自己的工作出發，説明「反冒進」受到的損失；有不少人匯報時，談了反省性的意見。批反冒進首當其衝的是周恩來、陳雲，以及國務院財經方面負責人，他們曾是反冒進的主角。周恩來除在會議上表態外，還單獨向毛澤東作了检討。事實上，凡犯有「反冒進」錯誤的人，都得一再檢討下去。
>
> ……
>
> 在南寧會議上再次受到表揚的是柯慶施，以及湖北的王任重等。……柯慶施成了頭號標兵。陶鑄等人就表示，我們要「趕上柯老，我們要趕」。[40]

這表明，經過南寧會議，省一級的領導基本上都已被動員了起來。

為傳達南寧會議的精神，2月13日至23日，中共中央在北京舉行政治局擴大會議。會上繼續批評反冒進，只是氣氛較之南寧會議略為缓和。在南寧會議上受到批評而沒有到會的陳雲，2月18日在會上檢討在反冒進中的「錯誤」，表示對反冒進中財貿工作的「錯誤」要負主要責

任；陳雲還就毛澤東指責國務院不讓他本人和政治局參與設計五年計劃和年度計劃，總是讓他「強迫簽字」，「事實上是一種封鎖」的批評檢討說，在財經工作中，對毛澤東和政治局採取了「傾盆大雨」、「本本主義」的辦法。[41]毛澤東在會上說：「以後反冒進的口號不要提，反右傾保守的口號要提。」他還說：「冒是有一點冒，而不應該提甚麼反冒進的口號。」「今年下半年，你們就看到要有一個大冒就是了，我看是比那一年冒還要厲害。」[42]由此，只許反右，不許反左，就成為中共黨內的一條定律。

南寧會議反反冒進的結果，毛澤東是滿意的。但要把反冒進的氣氛徹底改變過來，使1958年「有一個大冒」，他認為火候還不夠。於是他提出，再到成都去開一次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他說：「我們在南寧是半個中國了，華東、中南、華南這三個區域，東北找了一個歐陽欽，華北找了一個劉仁，西北是張德生，西南是李井泉。這一次我們是到成都，大概三月上旬，去談一談。」[43]

4.毛澤東提倡個人崇拜

3月8日至26日[44]，中共中央在四川省成都市郊金牛霸賓馆舉行工作會議。到會的有中共中央主要領導人、中央有關部門負責人和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他們是：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陳雲、鄧小平、羅榮桓，李富春、彭德懷、李先念、烏蘭夫、陳伯達、薄一波、譚震林、胡喬木、吳冷西、田家英、李鋭、王鶴壽、廖魯言、滕代遠、彭濤、林鐵、劉仁、陶魯笳、黃火青、歐陽欽、黃歐東、吳德、柯慶施、陶鑄、王任重、李井泉、謝富治、周林、張德生、張仲良、高鋒、王恩茂、李大章等三十九人。

毛澤東先後有六次講話和多次插話，對反冒進再次進行批評。他把冒進與反冒進的爭論，進一步定性為馬克思主義與非馬克思主義之爭，並突出強調了「一個班必須崇拜班長」。

3月9日，會議一開始，毛澤東提出二十五個問題，要求大家討論。主要是有關大躍進和高速度的問題。他說：「兩種方法的比較，一種是馬克思主義的『冒進』，一種是非馬克思主義的『反冒進』。南寧會議批判了『反冒進』的錯誤。究竟採取哪一種？我看應採取『冒進』。很多問題都可以這樣提。」又說：「過去八年的經驗，應加總結。南寧會議提出，反冒進是個方針性問題，有許多同志緊張，現在好了。談清楚的目的在大家有共同語言，绝無要哪一個同志不好混之意，而是為了做好工作，好混，绝非不好混。」[45]

3月10日，毛澤東著重談到建國以後，學習蘇聯犯有教條主義偏向，特別談了反對個人崇拜的問題。他說：

赫魯曉夫一棍子打死斯大林也是一種壓力，中國黨內多數人是不同意的，但也有一些人屈服於這種壓力，要學打倒個人崇拜。有些人對反個人崇拜很感興趣。個人崇拜有兩種，一種是正確的崇拜，如對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正確的東西，我們必須崇拜，永遠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們手裏，為甚麼不崇拜呢？我們相信真理，真理是客觀存在的反映。（引者註，李銳筆記有以下一句話：一個班必須崇拜班長，不崇拜不得了。）另一種是不正確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從，這就不對了。反個人崇拜的目的也有兩種，一種是反對不正確的崇拜，一種是反對崇拜別人，要求崇拜自己。[46]（引者註，李銳筆記還有以下的話：「打死斯大林，有些人有共鳴，有個人目的，就是為了想讓別人崇拜自己。列寧在世時，許多人批評他獨裁。……列寧回答很乾脆：與其讓你獨裁，不如我獨裁好。……不要信這個邪，你反對個人崇拜，反到天上去，無非想自己獨裁。」[47]）

從3月10日到19日，有十六位地方負責人在會上發言，談本省、市經濟方面的基本情況和躍進計劃。毛澤東則多有插話。[48]內容有：關於階級關係及處理問題；關於階級鬥爭和黨內鬥爭問題；關於人民內部矛盾問題；關於社會主義建設路線的形成；關於工業、農業並舉和農業機械化問題；關於大辦地方工業問題；關於計劃指標和兩本賬的問題；關於領導幹部要讀書，要又紅又專問題；關於教育與文化的問題；關於規章制度等問題。其中，重點是他關於加快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指導思想和路線，最具代表性的如：

「1958年的勁頭，開始於三中全會。」「現在要苦戰三年，形成一條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路線。」「學蘇聯首先在路線上學。斯大林基本上正確，但有錯誤。他們不工農並舉，反對大中小。我們是大中小結合，基礎放在小的上，靠地方，靠小的。他們是靠標準設計，幹部，技術。」「技術決定一切，政治思想不要了？幹部決定一切，群眾不要了？全面的提法就是又紅又專，領導和群眾相結合，要技術又要政治思想；要幹部又要群眾，要民主又要集中。」

毛雖然也說：關於定計劃指標等，還得留有餘地。但對《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訂的指標，仍要不斷提前實現。他說，這次會議應對時間取得一致看法。並提出，除四害可三年到五年。一年突擊，三年推廣，第五年掃尾。糧棉是五年至十年。綠化三年到五年。又說，實現綱要，遼寧三年，廣東五年，是左派；三年恐怕有困難，可以三到五年，上面可以長打一點，讓下面超過。毛極其自信地說：中國創造了一條經驗：合作化增產，農業牧業都如此。今年如果能增加一千億斤糧食，七百億斤也好，整個地球就翻過來了。

在3月20日的講話中，毛澤東再次說：河南提出一年實現四、五、八，水利化，除四害，消滅文盲。可能有些能做到，即使全部能做到，

也不要登報，兩年可以做到，也不要登報，內部可以通報。……各省不要一陣風，説河南一年，大家都一年，説河南第一，各省都要爭個第一，那就不好。總有個第一，「狀元三年一個，美人千載難逢」。可以讓河南試驗一年，讓河南當狀元。如果河南靈了，明年各省再來一個運動，大躍進，豈不更好。他接着説：如果在一年內實現四、五、八，消滅文盲，當然可能缺點很大，起碼是工作粗糙，群眾過分緊張。我們做工作要轟轟烈烈，高高興興，不要尋尋覓覓，冷冷清清。只要路線正確——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那麼後一年、二年、三年至五年完成四十條，那也不能算沒有面子，不能算不榮譽，也許還更好一些。……遲一年有何關係？也許更好些。一定要四年、五年才完成，那也不對，問題是看條件如何，群眾覺悟提高沒有？需要多少年，那是客觀存在的事情。他再次強調：搞社會主義有兩條路線：是冷冷清清、慢慢吞吞好，還是轟轟烈烈、高高興興好？十年、八年搞個四十條，那樣慢一些，人人都不舒暢，那樣搞社會主義也不會開除黨籍。蘇聯四十年才搞得那麼點糧食和東西，假如我們十八年能比上四十年當然好，也應當如此。因為我們人多，政治條件不同，比較生動活潑，列寧主義比較多。他們把列寧主義一部分喪失了，死氣沉沉。毛還説：社會主義的建設路線，還在創造中，基本觀點已經有了。[49]毛澤東決心超過蘇聯的雄心，溢於言表。

22日，毛澤東在講話中，突出強調了要「破除迷信」。他説，要有勢如破竹、高屋建瓴的氣概。經典著作要尊重，但不要迷信。要尊重馬恩列斯，但不可迷信，當作神明，不敢觸動。馬克思主義本身就是創造出來的，要用點思想，不能抄書照搬。馬克思主義者恐懼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不怕帝國主義，而怕教授，這也是怪事。從古以來，創新思想、新學派的人，都是學問不足的青年人。他們一眼看出一種新東西，就抓住向老古董開戰。而有學問的老古董，總是反對他們的。問題是你方向對不對，去不去抓。學問是抓出來的。歷史難道不是如此嗎？我們開頭搞革命，還不是一些娃娃，二十多歲，而那時的統治者袁世凱、段祺瑞、譚延闓、趙恆惕都是老氣橫秋的。講學問，他們多；講真理，我們多。張奚若批評我們「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視既往，迷信將來」。無產階級就是這樣嘛！任何一個階級都是好大喜功的。不「好大喜功」，難道「好小喜過」？……我們就是這個章程，搞水利、整風、反右派，六億人口搞大運動，不都是好大喜功嗎？我們搞平均先進定額，不是急功近利嗎？不鄙視舊制度、反動的生產關係，我們幹甚麼？我們不迷信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我們還幹甚麼？我們這些人錯誤是有的，主觀主義也是有的，但是「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視既往，迷信將來」是正確的，這就是我們的章程。[50]

周恩來、陳雲再次就反冒進問題在會上進行了檢討。

從南寧會議以來，毛澤東批評反冒進，主要是點了主持經濟工作的國務院领導人周恩來、陳雲的名。作為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並參與制定反冒進方針的劉少奇，雖然沒有被毛澤東點名，但心情是同樣沉重的，他深感自己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因此，在3月26日的會議上也作了檢討發言。劉少奇檢討説：自己的設想「同主席的設想是有距離的」，主席的設想「確實是高明，使人折服」。以前對建設速度估計不足，沒有料到水利、生產運動發展得這樣快。是否可以再快一點，還是可能的。對社會主義建設的速度，我覺得快點慢點都可以，「沒有意識到是一個方針路線的爭論」。為了跟上毛澤東，劉少奇也説，人們往往容易看到急性病，而忽視慢性病的危害。慢性病的損失不亞於急性病，我們要注意發現慢性病，去及時糾正它。並強調：「從當前來講，右傾保守的危險還是主要的。」急性病也要防止，但即使有些地方在建設上犯了急性病的毛病，也並不可怕。[51]

26日是會議的最後一天，毛澤東對會議表示滿意。他説：這次會議開得還可以，只是事先沒有想到虛實並舉，實多了一點。但也有好處，一次解決大批問題，並且是跟地方同志一道談的，這就比較合乎實際。同時提出，下次會議重點放在工業，7月間開。毛説：現在有些問題還是不摸底。對農業了解比較清楚，工業、商業、文教都不清楚。工業方面，除到會的幾個部接觸了一下外，其餘沒有摸。煤、電、石油、機械、建築、地質、交通、郵電、輕工業、商業都沒有接觸。財經貿易，還有文教歷來沒有摸過，林業也沒有摸過。今年有些要摸一摸，政治局、書記處都要摸一摸。政治局開座談會是個好辦法。過去有一句口號：「工農商學兵團結起來，打倒帝國主義」，現在還是工農商學兵團结起來（學是文教、兵是國防）。今後這五年，還是要抓這五個方面。接着，毛澤東提出了一個重要的理論觀點：中國社會還存在兩個剝削階級、兩個勞動階级。他説：

> 我們國內存在着兩個剝削階級、兩個勞動階級：第一個剝削階級是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资本主義的殘餘，地、富、反、壞未改造好的部分，再加上右派（全國右派在這些人中，可能有十萬以上，改造好的不算），他們反社會主義，是敵人。改造好的地、富不算，反革命改造好的刑滿释放有選舉權的不算。富農，一無剝削，二有選舉權，但人們不歡迎他。右派原來是與我們合作的，如羅隆基、章伯鈞、章乃器等，他們反共反社會主義，是國內的國民黨，故看作敵人。他們是帝國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封建主義的代理人。帝國主義、台灣蔣介石非常赞成右派，非常關心他們的命運，杜勒斯很關心右派。地、富、反、壞、右是可以改造的，大多數是可以改造好的。
>
> 第二個剝削階級是民族资產階級及其知議分子。民主黨派中右派只佔10%，其餘90%是中間派和左派。资產階級知識分子

中，右派只佔2.5%，老教授中右派的比例就大了。全國大概有右派分子三十萬人，其中縣以上和大專的是十六萬人。我們對右派的方針是孤立、分化、改造，除極少數違法者以外，不捉不辦，給選票，以便分化改造他們。中間派對我們又反又不反，又擁護共產黨又反對共產黨。如陳叔通、章士釗，反社會主義不反共產黨。針對民族资產階級二百萬人要很好地做工作，他們是可以轉變的。

勞動階級是：工人、農民，過去被剝削或不剝削人的獨立勞動者。[52]

成都會議的氣氛與南寧會議相比較，是更多地在務實。如果說，在南寧，與會者主要是覺得思想上得到了啟發；在成都，則個個表態大幹快上。這時，已經基本形成的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的總路線，不只再沒有人敢於懷疑和反對，而是已形成個個恐後爭先的局面。在中共中央，不但周恩來、陳雲失去了說話的资格，就連劉少奇也難以與毛澤東平等對話了。[53]在毛澤東倡導要有「正確的個人崇拜」，「一個班要崇拜班長」的命題下，更有人推波助瀾，柯慶施在會上號召：「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從毛主席要服從到盲從的程度。」[54]正如毛澤東本人所說的，反對迷信別人，是要別人迷信自己；反對別人的個人崇拜，是要搞自己的個人崇拜。在成都會議上，毛澤東號召破除對蘇聯經驗、經典著作、大學教授的迷信，正是要樹立對他的個人迷信。從此，中共中央的核心領導圈——中共中央政治局，實際上成了毛澤東的一言堂，政治經濟等大權也就完全集中在毛澤東一人之手。

成都會議共通過了三十九個文件，其中：關於1958年計劃和預算指標的意見，關於發展地方工業問題的意見，關於小型農業合作社合併為大社的意見，關於加強對殘存的私營工業、個體手工業和對小商小販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指示等，都直接推動了後來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

所有這一切，就為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通過多快好省的總路線，全面發動大躍進做好了準備。成都會議結束不久，中共中央就發出了《關於召開黨的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的通知》。

毛澤東則由重慶沿江而下，於3月31日抵武漢，下榻東湖湖濱別墅。這是一棟石頭建築，坐落在東湖岸邊。4月1日至9日，毛澤東召集華東和中南的一些沒有參加成都會議的省委書記在東湖開會。他們是：舒同、曾希聖、江渭清、葉飛、吳芝圃、周小舟。主要是讓他們了解成都會議的情況，同時聽取他們匯報「苦戰三年」的打算。大體上每隔一天開半天會，其餘時間由大家看成都會議通過的文件，並由譚震林、柯慶施和陶鑄介紹成都會議的情況。毛澤東在聽取匯報時，有很多插話，講了要壓缩空氣，留有餘地，但其着眼點卻在要人們警惕黨內的觀潮

派、算賬派，秋後出來算賬。[55]

當周小舟匯報湖南也處於高潮時，毛正色説，現在我擔心會不會再來一個反冒進。今年幹勁這麼大，如果不豐收，群眾情绪受挫折，就會反映到上層建築上來，一些幹部、民主人士，黨內有右傾情绪的人，就會出來颳颱風，觀潮派、算賬派就會出來説話。「樓觀滄海月，門對浙江潮」。各省要向地、縣講清楚，要有精神準備。

葉飛匯報福建的情況時，毛澤東再次講了觀潮派，算帳派問題。他説，中庸之道，實際上是落後論，四平八穩，成為一派。所謂穩妥可靠，結果是既不穩妥，又不可靠。我們這樣大的國家，這樣穩，會出大禍。一旦發生事情，時間過去了，就要失敗，就要出大事。對於穩妥派，有個辦法，到了一定時候就提出新的口號，使他無法穩。這一派，人數可能比較多，穩健派、觀潮派、等潮派，如果來一個災荒，他們還是要出來講話的：「看你們躍吧！」「老子講過，現在如何呢？」「冒進」是穩健派反對躍進的口號，我們要準備這一着。又説，現在講躍進不挨罵，講冒進就要挨罵，實際冒進是穩妥派安在正確派頭上的。1956年上半年勁大，下半年就挨罵；1958年上半年勁更大，下半年是否挨罵呢？現在客觀上逼着我們答覆這個問題。應當是把工作措施辦好，準備挨罵，對者改正，不對者頂住。

毛澤東在多次講話中，還反覆談到過渡時期階級鬥爭的形勢，兩個剝削階級，兩個勞動階级，劃清敵我矛盾與人民內部矛盾的界限等問題。他説，過渡時期階級鬥爭的形勢究竟怎樣？兩條道路鬥爭，恐怕還有幾個回合，這是可以設想的。我們要有策略，要冷一冷，然後再放一放，不冷不放他不會出來的，盡在反右派高潮中就不會出來，當然也有沉不住氣的。

至此，從1月杭州會議批判反冒進開始，毛澤東要把多快好省作為總路線已經定了下來，在經濟建設戰線發動一場比1956年更大躍進的造勢運動，已基本達到目的。「觀潮派」、「算賬派」兩頂帽子的拋出，就使黨內所有的人在日後無法提出異議；在把「反冒進」與所謂资產階級右派連在一起之後，又強調兩個階級、兩條道路鬥爭還將反覆，更預示着把黨內的不同意見直接與階級鬥爭掛上了鉤。

[1] 列寧：〈大禍臨頭，出路何在〉（1917年9月10-14日），載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列寧選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頁169。

[2] 斯大林：〈論經濟工作人員的任務〉（1931年2月4日），載《斯大林全集》，第十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頁37，38。

[3] 〈為動員一切力量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鬥爭——關於寫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學習和宣傳提綱〉（中共中央宣傳部1953年12月印發，經過中共中央批準），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四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頁706。

[4] 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的開幕詞〉（1955年3月21日），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文集》，第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頁392。

[5] 毛澤東：〈在中共七屆六中全會（擴大）上的結論〉（記錄稿）（1955年10月11日）。

[6] 董邊、譚德山、曾自編：《毛澤東和他的秘書田家英》，增訂本（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頁50。

[7] 吳冷西：《憶毛主席——我親身經歷的若干重大歷史事件片斷》（北京：新華出版，1995），頁9-10。

[8] 顧龍生編著：《毛澤東經濟年譜》（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頁381。

[9] 毛澤東，〈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勢〉（1957年7月），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六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杜，1992），頁549-550。

[10] 毛澤東：〈在中共八屆三中全會上的講話提綱〉（1957年10月9日），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六冊，頁592。

[11] 毛澤東：〈在莫斯科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上的的講話〉（1957年11月18日），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頁327。

[12] 〈人民日報〉，1958年1月1日社論。

[13] 1980年11月上旬，陳雲在同胡喬木談〈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起草問題時說：「毛主席的錯誤，地方有些人，有相當大的責任。毛主席老講北京空氣不好，不願呆在北京，這些話的意思，就是不願同中央常委談話、見面。他願意見的首先是華東的柯慶施，其次是西南，再次是中南。」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陳雲年譜（1905-1995）》，下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頁260-261。

[14] 1957年12月17日上午2時，毛澤東寫信給秘書葉子龍：「請於今日上午8、9時通知舒同、曾希聖、江渭清、劉順元、柯慶施、葉飛、周總理等七位同志看〈中國共產黨浙江省委員會向中國共產黨浙江省第二屆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的工作報告〉這個文件，在下午1時以前看完。其它工作，可以移到明天上午去做。」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六冊，頁671；另參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金沖及主編：《周恩來傳（1949-1976）》（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頁1364。

[15] 毛澤東：〈關於通知閱看浙江省委工作報告給葉子龍的信〉（1957年12月17日），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六冊，頁673，注2。

[16] 《人民日報》，1958年1月25日。

[17] 李鋭：《「大躍進」親歷紀》（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1996），頁57。

[18] 《人民日報》，1958年1月25日。

[19] 關於1958年1月杭州會議召開的具體時間有以下四種說法：第一，2至4日說。見《毛澤東文集》，第七卷，頁362，注3：杭州會議，指中共中央1958年1月2日至4日在浙江杭州召開的有部分中央領導人和部分地方負責人參加的工作會議；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頁116;《周恩來傳（1949-1976）》，頁1364：1月2日至4日，出席毛澤東召開的杭州會議。第二，3至4日說。見鄭謙、韓鋼：《毛澤東晚年歲月》（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93），頁75：1月3日至4日，毛澤東在杭州召集的小型會議。第三，3至8日說。見李鋭：《「大躍進」親歷記》，頁59。1958年1月3日至8日，毛澤東親自到杭州召開了華東六省市黨的負責人會議。第四，1月上旬說。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七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頁10，注1：1958年1月上旬毛澤東在杭州召集有部分省、市委書記參加的工作會議。本文採納2至4日說，據《周恩來傳》注，其根據為：中央工作大事記，1958年1月2日。

[20] 中央工作大事記，1958年1月2日。參見《周恩來傳（1949-1976）》，頁1364-1365。

[21] 〈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記錄〉（1958年5月29日）。參見《周恩來傳（1949-1976）》，頁1365。

[22] 《毛澤東在南寧會議上的講話記綠》，1958年1月12日），參見《周恩來傳（1949-1976）》，頁1365。

[23] 熊華源、廖心文：《周恩來總理生涯》（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頁239。

[24] 毛澤東：〈關於召開南寧會議的通知〉（1958年1月），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七冊，頁11。

[25] 〈毛澤東在南寧會議上的講話記錄稿〉（1958年1月11日），參見李鋭：《「大躍進」親曆記》，頁62。

[26] 毛澤東在《工作方法六十條》中解釋說：「這八句歌訣，產生於1953年，就是為了反對那時的分散主義而想出來的。」所謂1953年那時的分散主義，指的是政務院1952年12月批準財政部發布的「新稅制」，毛澤東認為此事未經中央討論（事實是向他做過匯報），政務院犯了分散主義錯誤。為此，中共中央作出加強中央對於政府工作領導的決定，并決定撤销以周恩來為書記的中央人民政府黨組幹事會。

[27] 〈毛澤東在南寧會議上的講話記錄稿〉（1958年1月12日）。

[28] 吳冷西：《憶毛主席》，頁46-51。

[29] 吳冷西：《憶毛主席》，頁49。

[30] 〈毛澤東在南寧會議上的講話記錄〉（1958年1月16日），參見熊華山、廖山文：

《周恩來總理生涯》，頁240-241。

[31] 熊華山、廖山文：《周恩來總理生涯》，頁241。

[32] 顧明：〈歷盡艱辛創四化〉，載程華：《周恩來和他的秘書們》（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2），頁18。

[33] 〈顧明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召開的座談會上的講話記錄〉（1987年1月9日），載《周恩來傳（1949-1976），頁1367-1368。

[34] 〈周恩來在南寧會議上的發言提綱手稿〉（1958年1月19日），載《周恩來傳（1949-1976）》，頁1368-1369。

[35] 毛澤東：〈在南寧會議上的結論提綱〉（1958年1月21日），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七冊，頁27-28。

[36] 毛澤東：〈工作方法六十條（草案）〉（1958年1月），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十一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頁42。

[37] 毛澤東：〈工作方法六十條（草案）〉（1958年1月），載《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十一冊，頁42-43。

[38] 毛澤東：〈工作方法六十條（草案）〉（1958年1月），頁41、43。

[39] 毛澤東：〈工作方法六十條（草案）〉（1958年1月），頁57。

[40] 李銳：《「大躍進」親歷記》，頁72-73。

[41]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陳雲年譜（1905-1995）》，中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頁400-410。

[42] 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發言記錄（1958年2月18日）。

[43] 《周恩來傳（1949-1976）》，頁1376。

[44] 關於成都會議的時間有兩種說法：一是3月8日至26日說，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七冊，頁120，注1；《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卷，頁133。二是3月9日至26日說，見李銳：《「大躍進」親歷記》，頁160。本文採納3月8日至26日說。

[45] 李銳：《「大躍進」親歷記》，頁162，165。

[46] 毛澤東：〈在成都會議上的講話〉（1958年3月），載《毛澤東文集》，第七卷，頁369。

[47] 毛澤東：〈在成都會議上的講話〉（1958年3月），載《毛澤東文集》，第七卷，頁174。

[48] 毛澤東：〈在成都會議上的講話〉（1958年3月），載《毛澤東文集》，第七卷，頁177-195。

[49] 李銳：《「大躍進」親歷記》，頁208-209、213。

[50] 毛澤東在成都會議上的講話記錄稿（1958年3月22日）。

[51]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金沖及主編：《劉少奇傳》，下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頁828-829。

[52] 李銳：《「大躍進」親歷記》，頁254。

[53] 李銳在《「大躍進」親歷記》頁69中說：「由於在一篇定性為反毛澤東的錯誤的社論（指1956年反冒進的社論——引者注）原稿上，有劉少奇修改的筆跡，劉也就同這一『錯誤』脫不了干係了。黨內唯一還可以同毛澤東以平等的態度討論問題的劉少奇，從此似乎也今非昔比了。南寧會議之後，逐漸使毛澤東奠定了他在中央的特殊地位，這是黨內生活的極大變化。在1980年討論黨的第二個《歷史決議》草稿時，胡喬木同我談過這樣的看法，胡耀邦也有過這樣的說法。」

[54] 李銳：《「大躍進」親歷記》，頁259。

[55] 東湖會議記錄稿：毛澤東在吳芝圃等人發言時的插話及4月6日的講話；李銳：《「大躍進」親歷記》，頁265-266。

二、鼓動提前實現《農業四十條》

1.《人民日報》吹響「大躍進」的號角

毛澤東在成都會議上曾說：「1958年的勁頭，開始於三中全會。」[1]因為按毛自己的說法，八屆三中全會恢復了多快好省、四十條和促進會。會後，《全國農業發展綱要（修正草案）》公開發表。1957年10月27日《人民日報》以〈建設社會主義農村的偉大綱領〉為題發表社論，要求「有關農業和農村的各方面的工作在十二年內都按照必要和可能，實現一個巨大的躍進」。正式向全黨、全國吹響了「大躍進」的號角，也是第一次以號召的形式使用「躍進」一詞。此後，《人民日報》連續發表題為：〈發動全民，討論四十條綱要，掀起農業生產的新高潮〉、〈必須堅持多快好省的建設方針〉、〈豐收再豐收，躍進再躍進〉等社論；12月2日，劉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在中國工會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致祝詞，向全國人民提出了用十五年時間，在鋼鐵和其他重要工業產品的產量方面趕上或者超過英國的任務。1958年元旦，《人民日報》發表〈乘風破浪〉的社論。這一系列社論的主要精神，是批判右傾保守思想，宣傳多、快、好、省的建設方針。為鼓舞人們的社會主義積極性，提前實現《農業四十條》和趕超英國的任務打氣、鼓勁。

《人民日報》的社論指出：全國農業發展綱要是建設中國社會主義農村和保證中國順利實現工業化的偉大綱領。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實踐結果，證明了多快好省的方針是切實可行的。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全國已出現一大批光榮的先行者。他們分布在十四個省市的六十九個縣、市，[2]提前十年或十一年達到或超過了《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規定的畝產糧食四百斤、五百斤、八百斤的指標（其中有四個縣在1956年達到，1957年因受災未達到）；其中有八個縣市的糧食畝產量達到了千斤以上。至於達到四百斤、五百斤、八百斤的鄉、社，就更多了。據十三個省的不完全統計，就有25806個農業社。棉花產量超過綱要最高指標（畝產一百斤皮棉）的已經有五個縣、市。由此證明，能不能躍進的問題，事實上已不存在了。

社論批評，還有少數有保守思想的人實際上在反對這個方針。說有些人害了右傾保守的毛病，像蝸牛一樣爬行得很慢，他們不了解在農業合作化以後，我們就有條件也有必要在生產戰線上來一個大的躍進。因而在1956年秋天以後的一段時間裏，在某些部門、某些單位、某些幹部中間颳起了一股風，把多快好省的方針颳掉了。

社論認為，現在的問題是，在不少幹部和群眾中還存在着右傾保守

思想。他們認為農業生產受自然條件和當前技術水平的限制，只能漸進，不能躍進；或者認為別的地方可以躍進，自己這個地方不能躍進。社論説，自然條件對農業生產確有很大的影響。但是，我們不可坐待老天爺的恩賜，而應該努力改造自然，限制自然，利用自然，把提高糧食產量的主動權掌握在自己手裏。我們幹的是革命的事業，對於我們來説，最最需要的是革命的樂觀主義，是「愚公移山」的英雄氣概。沒有革命的志氣，甚麼事也做不成。因此，在變革的過程中，右傾保守思想是經常存在的，需要用很大的力量同它進行鬥爭。必須不斷地、經常地反對右傾保守思想，才能勝利前進，才能實現生產大躍進。

社論強調，目前，在《全國農業發展綱要（修正草案）》的推動下，農村中已經掀起了一個興修農田水利和積肥的高潮，工業方面也正在走向新的高潮，當前的重要任務，就是要在充分可靠的基礎上，把1958年的各項計劃指標訂得盡可能先進些，從而把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更多、更快、更好、更省地大大向前推進一步。

元旦社論號召人們，乘壓倒西風的東風前進，乘壓倒右派、壓倒官僚主義、壓倒保守思想的共產主義風前進！

2.大躍進形勢始於大搞農田水利

在這陣陣批判右傾保守，鼓動多、快，好、省，力爭提前實現《綱要》的勁風之下，各省、市、自治區先後掀起爭取提前實現《四十條綱要》的熱潮。

當時認為，要實現糧食畝產四百、五百、八百斤的目標，除了多施肥和精耕細作外，關鍵就在於水。但到1957年，全國水田和水澆地只佔全部耕地的四分之一。1957年8月，全國農田水利會議提出1958年擴大灌溉面積的指標是4408萬畝。但到10月，《全國農業發展綱要（修正草案）》公布以後，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召開的第四次農村工作會議，就將1958年的指標修改為6184萬畝；12月，國家經委召開的全國計劃會議，又修改為9221萬畝。[3]中國共產黨，在革命戰爭年代形成了一個傳統，就是凡是上級黨組織已經決定並下達了的任務，下級黨組織和各級幹部總是保證提前或超額完成。1957年冬季的農田水利建設和積肥運動高潮正是這樣推起來的。

早在1957年12月7日，中共中央就轉發了河南省委的《關於當前農業生產新高潮的情況簡報》。內稱，通過開展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和對《全國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的全民大討論，河南全省農村出現了大躍進的局面。全省一千五百餘萬人參加抗旱種麥，接着掀起了以大興水利和大量積肥為中心的冬季生產運動。目前投入的勞動力已有九百九十一萬餘人。[4]

《人民日報》12月23日報道：據二十個省區到1957年12月20日不完全統計，每天出工興修水利的人數，達到六千三百萬人以上。安徽省每天平均出工人數達一千一百餘萬人，佔全省農業勞動力的80%左右；河南、山東、四川等省出工的勞動力也有七八百萬人之多。許多縣、區、鄉、社，投入興修水利，積肥和其他農業基本建設的人數達到總勞動力的80%到90%以上，甚至連當地的城鎮居民、學生、駐軍、手工業者也都參加了轟轟烈烈的興修水利運動。群眾的口號是：「早出工，晚收工，月亮底下當英雄」；「大風吹不走高潮，天冷凍不了決心」；「把田地作戰線，塘壩當戰場，鋤頭扁擔當刀槍，決心要把旱澇災害早消滅」。當年報道說，據十六個省不完全統計，截止12月20日，已經完成的各項工程的效益，就可以擴大灌溉面積3390萬畝，佔1958年度計劃指標9221萬畝的36%以上。從全國進度來看，由10月中旬到12月上旬，約兩個月時間，平均每月完成1500萬畝左右。[5]

應該承認，當年被農業發展綱要調動起來的廣大農民群眾的勞動積極性，期盼通過短期突擊，盡快改變貧窮落後面貌而不畏艱險、不惜犧牲的精神，是十分可貴，令人起敬的。如：

河南省伏牛山區禹縣人民在興修水利中喊出了：「山硬硬不過決心，山高高不過腳心」的口號，決心要在一年完成五年的治山工程。豫北鹽鹼地區連年災荒的原陽縣人民提出：「咬緊牙關，苦戰三年，鼓起一股勁，變三紅（紅薯、紅高粱、紅辣椒）為三白（白米、白麵、白棉花），變鹽鹼凹地為稻田，把原陽變成小江南。」密縣河西鄉群眾提出：「禿嶺大又大，暴水似惡霸，大家齊動手，消滅水惡霸，要在六十天，坡田水利化，實現四、五、八。」[6]

陝西省蒲城縣農民群眾提出：「清早上地滿天星，晚間回來雞叫聲。」「抓晴天，搶陰天，小風小雪是好天；汽燈底下是白天，爭取一天當兩天」的口號。[7]

吉林省群眾提出的口號是：「不怕風吹、不怕天寒，修完工程再過年」；「贪大黑，起大早，跟着月亮跑」。[8]

在「苦幹三年，征服千年旱災」的戰鬥口號下，廣西省的農民群眾表示：經费自己籌，石灰自己燒，泥箕自己編，石料自己打，沙子自己找，木料自己砍。山藤代繩索，柴火代油燈，舊料代新料。「不靠老天靠自家，興修水利戰勝它，就是老天不下雨，也叫禾苗出嫩芽」。「千年苦旱淚漣漣，只知求神和拜天，如今有了共產黨，修好水利慶豐年」。[9]

下面的這種热勁，反映到上面，使上面的頭腦更熱。於是，又提出了在春耕前完成1958年全年指標的任務。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副部長、國務院第七辦公室副主任陳正人，12月22日在對全國各地農村工作人員和農業社社員發表的廣播談話中提出：「從現在到明年春耕，約還有三

個月到四個月的時間；必須每月完成1500萬畝以上才能實現9221萬畝的計劃任務」的要求，各級領導親自出馬，由黨委第一書記掛帥，充分發動群眾，推廣先進經驗，最大限度地提高勞動生產率，再接再厲，把水利運動推向新的高潮。[10]

3.人大一屆五次會議的熾熱空氣

就在遍地吹起躍進之風的時刻，全國人大一屆五次會議於1958年2月1日至11日在北京舉行。

會前，毛澤東在1月28日召集最高國務會議第十四次會議，討論1958年的預算和經濟計劃，為全國人大一屆五次會議做準備。毛在會上首先講話：

> 七八年來，都看出我們這個民族有希望，特別是在去年一年，使得廣大群眾感覺到光明的前途。幾億人口，精神發揚起來。經過大鳴、大放、大辯論，把一些問題搞清楚，任務也提得適當了，比如十五年趕上英國，又多、又快、又好、又省之類。四十條農業綱要重新發布，給群眾很大的鼓勵。許多認為做不到的事情，現在群眾覺得做得到。
>
> 我們這個民族在覺醒起來，好像我們大家今天早晨醒來一樣，在逐步覺醒。因為覺醒了，才把帝國主義、封建主義打掉；因為覺醒了，才把私有財產制度廢除；因為覺醒了，才進行整風，批評右派。現在還要革掉一個東西：我們是又窮又白。白紙好寫字，窮就要革命，要幹，就有一股幹勁。現在的生產節約，各種社會風氣的改革，就是希望我們的國家成為一個大國，一個強國。現在的情況完全不相稱，還比不上比利時，比利時有七百萬噸鋼，我們只有五百多萬噸，糧食水平很低，不識字的人很多。因此，現在這個覺醒，群眾這個熱潮，我們要好好注意。我看，我們這個民族現在好比打破原子核釋放出热能來。[11]

毛充滿信心地表示，有了群眾的這種熱能，十五年趕上英國是完全可能的。他稱讚《人民日報》元旦社論的標題：「鼓足幹勁，力爭上游」這兩句話。他提倡：要有幹勁，要鼓足勇氣，力爭上游。毛最後強調，現在我們是進行一場新的戰爭，向地球開戰，工作重心轉到技術革命，要革地球的命。「十五年趕上英國，這個事情要變成一個主要的事情。」

這樣，第十四次最高國務會議，就為全國人大一屆五次會議營造了一個大躍進的氛圍。

出席全國人大一屆五次會議的代表975人，政府各部門的負責人、各國駐華使節和在京訪問的一部分外賓列席了會議。這次會議的主要議程是：審查和批準1958年國家預算；決定1958年度國民經濟計劃。會

議聽取了周恩來總理兼外長《目前國際形勢和我國外交政策》的報告，國務院副總理兼財政部長李先念《關於1957年國家預算執行情況和1958年國家預算草案的報告》，國務院副總理兼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薄一波《關於1958年度國民經濟計劃草案的報告》，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兼秘書長彭真《全國人大常委會的工作報告》和中國文字改革工作委員會主任吳玉章《關於當前文字改革工作和漢語拼音方案的報告》。

大會進行期間，中共中央批發了1958年2月2日，中共河南省委向中央呈送了關於傳達和討論工作方法六十條的報告。報告將河南省原定糧食畝產量1962年達到四百二十斤、1967年達到五百八十斤，改為1962年保證達到六百斤，爭取九百斤；將原定皮棉畝產量1962年達到六十斤、1967年達到九十斤，改為1962年達到一百斤；甚至還提出1959年全省實現水利化，1962年全省平均每畝施用化肥五十斤，五年內全省達到平均每人一頭豬，四年完成土壤改良，三年基本上變成四無省（指無麻雀、老鼠、蒼蠅、蚊子）等，以此表示對「大躍進」的決心[12]。這無疑是對河南省委的讚賞，希望各省效仿。

在全國人大會議上，各省，自治區、直轄市的人大代表，紛紛上台匯報本省農田水利建設的躍進形勢，爭相表示一定要實現農業生產「大躍進」的誓言（共有316位代表在大會上作了發言或聯合發言）。大會氣氛空前熱烈。

廣東省提出，今年可以辦到的事情決不推到明年去做，以十二萬分的勁頭，堅決實現1958年增產糧食二十八億斤的農業躍進計劃。1962年糧食平均畝產由現有的440斤提高到800斤，1967年達到1000斤，實現糧食千斤省[13]。

陝西省表示，1958年計劃糧食總產量為115億斤；皮棉總產量達到240萬擔。爭取八到十年，使八百里秦川糧食畝產跨過長江，達到800斤[14]。

安徽省決心，爭取在今後五年到七年內實現農業發展綱要，把安徽省糧食產量由1957年的240億斤提高到510億斤左右；把薄弱的地方工業在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力爭趕上或超過農業產值；並使文化教育和各項工作都迅速跟上來[15]。

江西省要求，1958年全省糧食總產量在140億斤的基礎上達到175億斤，增產三十五億斤，比1957年增產25%；棉花總產量達到六十五萬擔，比1957年增產44%；麻類總產量達到120萬擔，比1957年增產110%；油脂總產量達到2.1億斤，比1957年增產75%；生豬產量達到800萬頭，比1957年增產80%[16]。

山東省訂的指標是，1958年糧食總產量保證達到320億斤，爭取達到350億斤；棉花總產量保證達到480萬擔，爭取達到535萬擔。爭取在

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基本上提前實現《農業發展綱要（修正草案）》的指標要求，爭取全省糧食產量達到600億斤，使全省人均佔有量達到1000斤[17]。

山西省宣稱，三年基本改變農業生產面貌。1958年全省糧食畝產量，由1956年的一百五十六斤達到二百斤；棉花畝產皮棉由1957年的四十斤達到六十斤。經過三年苦戰之後，糧食畝產達到三百斤，棉花畝產達到九十斤。到1962年糧食畝產達到四百斤，爭取達到五百斤；棉花畝產達到一百二十斤[18]。

來自基層的全國人大代表，通過介紹各自的農業增產經驗，表達實現農業生產大躍進的決心：

雲南省宜良縣永新農業生產合作社的張惠英介紹「肥料革命」的經驗說：過去的肥料來源很少，只知道用猪、牛、馬糞和老牆土，在社會主義大辯論以後，發動群眾動腦筋、想辦法，終於找出了十八種肥源，用衛生運動和積肥運動相結合的辦法，提出「牲畜要有廄，家家有廁所，廁所要加蓋，人人勤積肥，路上無糞便」。全社開展了積肥和衛生評比運動。全社不分男女老少，個個積綠肥、鏟火土、掃煙筒、挖老牆土、挖溝泥、搜集亂頭髮、猪毛和碎皮，積小便，打掃房屋和街頭衛生，形成了家家有尿盆，人人帶尿罐的習慣。這樣，既做到了積肥，又使過去不乾淨的地方變得整齊清潔了。再加上相應的水利建設，今年的生產指標是，糧食每畝平均產量達到1110斤。「我們有決心，也有信心達到這個目標」[19]。

全國勞動模範、山西省平順縣西溝鄉金星農業社的李順達、申紀蘭發言說[20]：1956年《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公布後，我們社就制訂過一個十二年的遠景規劃。要求糧食畝產量，1962年達到五百斤，1967年達到七百斤。現在看來，這個指標不是高了而是低了。1957年，我們社的糧食畝產量已經達到四百八十八斤。經過社員們辯論，多數人認為，今年過黃河，五年跨長江，八年成為千斤社，是完全可能的。為了實現這個規劃，我們把1958年的糧食產量提高到六百斤。

在農業大躍進的聲浪中，工人老大哥理所當然地不能落後。鋼鐵工業和各行各業的代表均在會上表達了趕超英國的決心和各自的目標：

全國勞動模範王崇倫等代表鞍山全體職工表示，為實現十五年趕上英國的偉大任務，鞍鋼職工決心以高度的勞動熱情、千方百計地挖掘增產潛力，更多、更快、更好、更省地生產鋼鐵，隨時響應國家的號召，完成國家給予的任務。經群眾討論，初步確定1958年生產生鐵產量比1957年增長16.1%；鋼生產比1957年增長25.4%；鋼材生產比1957年增長16.9%[21]。

太原鋼鐵廠的工人說：「不鼓起更大幹勁來，怎配稱工人老大哥」。現在全廠職工躍進再躍進的滾滾巨浪，正在改變着全廠的精神面

貌和生產面貌。比指標、學先進、趕英國已經成為每個職工的自覺行動，全廠1958年的計劃是：總產值為1.80291億元，與國家計劃1.49626億元相比，提高20.49%；與1957年實際完成產值1.46769億元相比，增長22.83%。全廠職工正在為完成和超額完成這個計劃展開热火朝天的社會主義競賽運動。可以斷言，憑着全國人民英勇的社會主義幹勁，不用十五年，就可以趕上英國，把這個老牌帝國主義遠遠拋在我們後面、再後面。[22]

四川省代表説：重慶鋼鐵公司職工「立志要和英國赛跑」。經過算細賬，挖潛力，原來每屆平爐的壽命一般是300爐左右，1月上旬創造了爐龄500爐的新記錄。接着就提出向全國最高記錄599爐進軍，現在已經突破了600爐，正向650爐猛進。煉鋼工人還提出向全國各先進廠學習，質量要趕上上海鋼鐵一廠，保證煉出兩萬噸優質鋼，煉爐率達到並超過天津鋼板廠的水平，保證把每爐鋼的冶煉時間比原計劃再缩短十六分鐘。軋鋼車間1月份開展每班400分鐘軋鋼競赛，力爭儘量缩短非生產時間。現在，每班生產時間已實際達到450分鐘，有的已達到每班465分鐘的最高紀錄。煉鐵車間的燒結礦年初的日產量為四十到五十鍋，現在提出了日產七十二鍋的保證。全廠保證1958年鋼產量比1957年提高17.86%，鋼材提高11.71%，生產總值提高8.5%，勞動生產率提高10.52%，成本比1957年降低7.2%。[23]

上海的工人代表説，黨中央發出十五年趕超英國的號召後，上海廣大職工見面的第一句問話：「同志，你拿甚麼實際行動來趕過英國的工業水平？」他們到處翻雜誌，找资料，拿本廠產品和英國同類產品反覆比較，從各方面提出趕上英國工業產品的具體規劃。據不完全统計，從元旦到1月24日為止，已經提出趕上英國或其他资本主義國家（沒有英國同類產品可資比較，就同其他资本主義國家的同類產品比）先進工業品具體規劃的有394個廠，525種產品。上海大中華橡膠廠職工經過研究訂出了技術措施，在四年內使「雙錢牌」汽車輪胎趕上英國老牌「鄧祿普」汽車輪胎。上海國營第二毛纺廠製造的精纺呢絨經過研究試驗，只要兩年就可以在織品表面的光彩程度、紗支匀淨度和質地柔軟等方面趕上並超過英國同類產品[24]。上海華孚金筆廠職工提出：「英雄金筆」，要以「英雄氣概」，在兩年內趕上或超過美國「派克金筆」的躍進目標。全廠掀起了「趕上美國，壓倒派克」的高潮。[25]

2月12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讚揚這是「一次爭取大躍進的大會」，揭開了1958年，國民經濟新躍進的序幕。社論認為，為了爭取國民經濟的新躍進，1958年各項經濟指標訂得是比較積極的。工業生產總值計劃比1957年增長14.67%（1957年，增長6.99%）。農業生產總值計劃比1957年增長6.1%，糧食生產增長5.9%（1957年，分別增長3.5%和1.7%）。國家用於基本建設的投资，計劃比1957年增長

17.8%。社論強調：我們的口號是苦戰三年，爭取在三年內使全國大部分地區的面貌基本改觀。三年看頭年，我們必須千方百計地努力爭取我國國民經濟在今年內打一個大勝仗。

要求工業總產值比上年增長14.6%，農業總值比上年增長6.1%，已經大大高於一五計劃期間的正常年份，但較之爾後不斷膨脹的氣溫來說，頭腦還算是冷靜的。

[1] 李銳：《「大躍進」親歷記》，頁180。

[2] 1956年、1957年糧食畝產達到四、五、八指標的六十九個縣、市為：天津市；河北省的正定、嵩城、遵化、撫寧、盧龍、安國、藁城、新樂、邢台市、石家莊市、樂亭；遼寧省的撫順市；甘肅省的敦煌、張掖、臨澤、臨夏市；陝西省的長安、高陵、咸陽市、西安市；河南省的孟縣、安陽市；山東省的黃縣；安徽省的安慶市；福建省的龍溪、海澄、雲霄、南安、長樂、福州市、漳州市；浙江省的黃岩、慈溪、溫嶺、溫州市；四川省的新繁、新都、綿竹、雙流、溫江、郫縣、成都市、內江市、廣漢；廣東省的潮安、普寧、揭陽、澄海、潮陽、饒平、南澳、汕頭市、佛山市、潮州市、連平、豐順；湖北省的孝感、黃陂、大悟、浠水、紅安、新洲、麻城、雲夢、廣濟、漢川、漢陽；雲南省的宜良。《人民日報》，1957年12月25日。

[3] 水利部部長傅作義在全國人大一屆五次會議上的發言：〈四個月的成就等於四千年的一半〉，《新華半月刊》，1958年第5號，頁65。

[4] 李農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錄》，第二卷，上冊（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頁128-129。

[5]〈先進的再先進！遲緩的趕上去！〉，《新華半月刊》，1958年第2號，頁107。

[6] 趙文甫在全國人大一屆五次會議上的發言，《新華半月刊》，1958年第5號，頁40-41。

[7] 蘇資琛：〈陝西農業生產高潮勢如排山倒海〉，《新華半月刊》，1958年第6號，頁53。

[8] 栗又文：〈大嶺群眾根治水患幹勁十足〉，《新華半月刊》，1958年第5號，頁75。

[9] 覃應機：〈苦戰三年征服千年旱〉，《新華半月刊》，1958年第6號，頁26-27。

[10]〈先進的再先進！遲緩的趕上去！〉，《新華半月刊》，1958年第2號，頁107-108。

[11] 《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四次會議上的講話記錄》（1958年1月28日），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逄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上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頁781。

[12] 〈河南省委關於傳達和討論毛主席六十條指示向中央的報告〉（1958年2月2日），載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農業委員會辦公室編：《農業集體化重要文件彙編（1958-1981）》，下冊（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1），頁3-6。

[13] 區夢覺：〈有信心有把握實現千斤省〉，《新華半月刊》，1958年第5號，頁52、54。

[14] 趙壽山：〈要八百里秦川畝產八百斤〉，《新華半月刊》，1958年第五號，頁59。

[15] 黃岩：〈一個冬天超過以往八年〉，《新華半月刊》，1958年第五號，頁81。

[16] 劉俊秀：〈快馬加鞭全面躍進　十年規劃五年完成〉，《新華半月刊》，1958年第6號，頁29。

[17] 趙健民：〈山東人民爭取今年大豐收〉，《新華半月刊》，1958年第6號，頁80。

[18] 陶魯茄：〈山西農業生產面貌　三年內將基本改觀〉，《新華半月刊》，1958年第8號，頁44。

[19] 張惠英：〈水利要突擊　肥料要革命〉，《新華半月刊》，1958年第6號，頁41。

[20] 李順達、申紀蘭：〈今年過黃河　五年跨長江　力爭八年畝產千斤糧〉，《新華半月刊》，1958年第6號，頁91-93。

[21] 王崇倫、胡兆森、孟泰、邵象華、張明山聯合發言：〈鞍山職工的雄偉計劃〉，《新華半月刊》，1958年第6號，頁34-45。

[22] 王貴英：〈不鼓起更大幹勁來　怎配稱工人老大哥〉，《新華半月刊》，1958年第8號，頁27、28。

[23] 黃榮昌：〈鋼鐵工人下決心和英國賽跑〉，《新華半月刊》，1958年第5號，頁44-45。

[24] 張祺：〈為了迅速趕上英國工業水平　上海職工大大發揮革命幹勁〉，《新華半月刊》，1958年第5號，頁42-44。

[25] 湯蒂因：〈「英雄金筆」的「英雄氣概」〉，《新華半月刊》，1958年第8號，頁39。

三、大躍進的全面發動

1.中共召開八大二次會議

1958年5月5日至23日，中共八大二次會議在北京舉行。將黨的全國代表大會改為常任制，是中共八大黨章做的新規定：「全國代表大會會議由中央委員會每年召開一次。」[1]八大二次會議，是中共歷史上召開的唯一一次常任制性質的會議。

八大二次會議的主題是制定和通過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毛澤東在會上説道：「不開會大家想法不同，開個會，採取比較合理的意見，作個報告，搞個決議，全國人民就有了方向。」[2]八大二次會議，就是年初的杭州會議、南寧會議到成都會議，而最终形成的结果。目的是進一步統一黨內外對「大躍進」的認識，使初步掀起的「大躍進」形勢在全國範圍開花結果。所以説，這次會議是「大躍進」運動全面發動的標誌。

5日上午，大會舉行預備會議。通過大會日程和主席團名單。主席團由四十四人組成，常委是：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鄧小平、彭真、烏蘭夫、柯慶施、李井泉。同時組成華北、東北、西北、西南、中南、華東，中直、解放軍八個代表團。代表團正副團長分別是：華北：林鐵，陶魯笳；東北：歐陽欽、吳德；西北：張德生、張仲良；西南：李井泉、謝富治；中南：陶鑄、王任重；華東：柯慶施、曾希聖；中央和國家機關：楊尚昆；解放軍：聶榮臻、蕭華。

劉少奇代表中央委員會作工作報告，鄧小平作關於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的莫斯科會議的報告，譚震林作關於《農業發展綱要（第二次修正草案）》的説明。

在大會上發言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周恩來、朱德、陳雲、陳毅、李先念，政治局候補委員烏蘭夫、張聞天、陸定一、陳伯達、康生、薄一波，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王稼祥、李雪峰；以及中央國家機關各部門負責人，人民解放軍、全國總工會等群眾團體、地方各级黨委負責人，工礦企業的黨委書記、工廠廠長、技師，鄉，鎮合作社的支部書記，農業合作社和供销合作社主任，學校校長和黨委書記等117人。另有145人作了書面發言。

代表們對各項議程討論以後，23日的大會通過了：《關於中央委員會工作報告的決議》，《關於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的莫斯科會議的決議》，《全國農業發展綱要（第二次修正草案）》；增選王任重等二十五人為中央委員會候補委員。[3]

中共八大二次會議是對八大一次會議的否定。它改變了關於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的判斷，繼續把工人階級同资產階級的矛盾當作主要矛盾，強調有兩個剝削階級和兩個勞動階級；推翻了「要隨時注意防止和糾正右傾保守的或『左』傾冒險的傾向，積極地而又穩妥可靠地推進國民經濟的發展」的正確方針，確立了打破平衡，超英趕美的超高速發展戰略；拋棄了1956年起步探索中國自己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思路，進一步陷入了僵化的斯大林模式的死胡同。前兩點，集中反映在大會通過的關於中央委員會工作報告的決議；後一點突出反映在大會通過的關於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的莫斯科會議的決議。[4]

2.劉少奇闡釋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

八大二次會議的主要任務，是確定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因此，劉少奇代表中央委員會作的工作報告，就是大會最主要的議程。

對這個工作報告稿的起草，胡繩有過一段回憶，他説：「陳伯達那時候為會議寫報告，感覺到好難寫。總路線要講奮鬥甚麽，為甚麽奮鬥，怎樣奮鬥。這句話裏只有一句稍微實在的就是『建設社會主義』，這是很明確的，不是建設別的甚麽。鼓足幹勁，無非是説大家努力吧。力爭上游，力爭站在前頭。多快好省，也是抽象的。陳伯達儘量把毛主席論述十大關係的問題，農、輕、重啊，小土群啊，把這些東西搬進去。不然總路線就變成大家一齊努力，搞得好一點。這是甚麽總路線啊？！甚麽時候提出一個號召來，都是要大家努力來做。」[5]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七冊，收錄了毛澤東在5月13日，24日對工作報告稿修改後寫給胡喬木的兩封信[6]，肯定了胡「改得很好」。表明，工作報告稿的最後修改、潤色是由胡喬木完成的。

報告內容分為：國際和國內形勢，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黨的目前任務三個部分。

關於國際形勢，報告著重闡述了毛澤東在莫斯科會議上概括的「東風壓倒西風」的論斷。國內形勢，闡述了毛澤東有關「我國現在有兩個剝削階級和兩個勞動階級」，以及在整個過渡時期，無產階級同资產階級的鬥爭，社會主義道路同资本主義道路的鬥爭，始终是我國內部的主要矛盾的觀點。報告認為，整風運動和反右派鬥爭的勝利，在最廣大的人民群眾中形成了一個共產主義的思想大解放，深刻地改變了國內階級力量的對比。熱情讚揚了廣大勞動群眾在生產勞動中表現出的相互協作和自我犧牲精神，稱為如列寧所説的，是「共產主義的實際開端」，是「有世界歷史意義的轉變的開端」。斷言，中國現正經歷着如馬克思預言的，無產階级革命將使我們進入「一天等於二十年」的偉大時期。

關於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報告回顧了從1955年夏季毛澤東〈關於

農業合作化問題〉開始，醞釀提出多快好省路線的歷程，嚴厲批評了1956年的「反冒進」。指責有些人，沒有從1956年-1957年-1958年，在生產戰線上出現的高潮-低潮-更大的高潮，這個馬鞍形中得到教訓，意欲到秋後「算賬」。「讓他們等着算賬吧，他們總是要輸的。」現在全國的廣大群眾對於生產的躍進充滿信心，而且決心把社會主義建設的速度繼續提高。報告說：

在八年建設過程中逐步形成起來的黨的社會主義建設的總路線，已經在實踐中一步又一步地證明了自己的正確性。……

黨中央認為，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的基本點是：調動一切積極因素，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的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鞏固無產階級專政和無產階級的國際團結；在繼續完成經濟戰線、政治戰線和思想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的同時，逐步實現技術革命和文化革命；在重工業優先發展的條件下，工業和農業同時並舉；在集中領導、全面規劃、分工協作的條件下，中央工業和地方工業同時並舉，大型企業和中小型企業同時並舉；通過這些，盡快地把我國建成為一個具有現代工業、現代農業和現代科學文化的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7]

為實現黨的總路線，報告突出強調了建設速度問題。指出，我國經濟本來很落後，外部還有帝國主義，只有盡可能地加快建設，才能盡快地鞏固我們的社會主義國家，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報告批評有些人不認識提高建設速度的重要性，不贊成多快好省的建設方針，提出了這樣那樣的反對意見。斷言這些意見，「都是站不住腳的」。

報告在闡述了工業和農業同時並舉，中央工業和地方工業、大型企業和中小型企業同時並舉的方針之後說：

黨的社會主義建設的總路線是黨的群眾路線在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的應用和發展。把集中領導和分散經營充分地结合起來，把中央的力量和地方的力量、國家的力量和群眾的力量充分地結合起來，把大型的事業和中小型事業，提高的工作和普及的工作充分地结合起來，這一切，不但適用於工業，而且適用於其他經濟事業和文化事業，適用於技術革命和文化革命的整個事業。……

黨在目前的任務，就是要在整風運動的基礎上，進一步地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有系統地改進國家工作，加強各級黨組織的工作，百折不撓地為貫徹執行社會主義建設的總路線而鬥爭。[8]

由上可見，劉少奇的報告，全面地反映了毛澤東從南寧會議嚴厲批評「反冒進」以來，以超高速度建設社會主義的思想。6月21日，《人民日報》社論——〈力爭高速度〉，畫龍點睛地說：

用最高的速度來發展我國的社會生產力，實现國家工業化和

> 農業现代化，是總路線的基本精神。它像一根紅線，貫穿在總路線的各個方面。如果不要求高速度，當然沒有甚麼多快好省的問題；那樣，也就不需要鼓足幹勁，也就無所謂力爭上游了。因此可以說，速度是總路線的靈魂。

3.毛澤東號召破除迷信

中共八大二次會議期間，毛澤東於5月8日、17日、20日、23日先後在全體會議上作了四次講話。多數內容是在成都會議上講到過的，值得注意的是關於「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想敢說敢做」；「準備黨內分裂」；「插紅旗，辨風向」這三個問題。

破除迷信：

毛澤東在8日講的第一句話說，我講一個破除迷信。他在談「我們大多數同志有些怕资產階級教授，整風以後慢慢地不大怕了」以後接着說：

> 是不是還有另外的一種「怕」，即怕無產階级教授，怕馬克思。馬克思住在很高的樓上，好像高不可攀，要搭很長的梯子才能上去，於是乎說：「我這一輩子沒有希望了。」不要怕嘛。馬克思也是兩雙眼睛，兩雙手，跟我們差不多，無非是腦子裏有一大堆馬克思主義，但是，我們在樓下的人，不一定要怕樓上的人。我們讀一部分基本的東西就够了。我們做的超過了馬克思，列寧說的做的都超過了馬克思，如帝國主義論。馬克思沒有做十月革命，列寧做了；馬克思沒有做中國這樣大的革命，我們的實踐超過了馬克思。實踐當中是要出道理的。馬克思革命沒有革成功，我們革成功了。這種革命的實踐，反映在意識形態上，就是理論。[9]

毛要人們「不要妄自菲薄，不要看不起自己」。他說，自古以來，很多學者、發明家，創立新學派開始都是年輕的，學問比較少的，都是被人看不起的，或是被壓迫的人。這些人到後來才變成壯年、老年、學問多的人。是不是所有的人都是這樣？這是不是一個普遍規律？他從古到今舉了諸多事例之後說：「舉這麼多例子，目的就是說明青年人是要戰勝老年人，學問少的人可以打倒學問多的人，不要為大學問家所嚇倒。要敢想，敢說，敢做；不要不敢想，不敢說，不敢做。」[10]

毛以帶諷刺的口吻說：過去有不少人認為工業高不可攀，神秘得很，認為「搞工業化不容易呀」。總之，迷信很大。我也不懂工業，可說一竅不通，可是我不相信工業就是高不可攀。我同幾個搞工業的同志談過，我說，不要把它看得那樣嚴重，這是不正常的心理狀態。開始不懂，學過幾年也就懂了，有甚麼了不起。我看，大概只要十幾年功夫，我們的國家就可以變成工業國。……我看只要十五年就可以趕上或者超

過英國；並且還要趕上美國，照李富春同志的說法，最多二十年也就夠了。美國算不算數？也算數，也不算。……現在你厲害，過幾年我們趕上了，就比你厲害。……這樣說是不是狂妄呢？不是，我們不是狂人，是實事求是的馬列主義者，革命者。我們主張俄國的革命熱情與美國的求實精神統一起來。在文學上，就是要革命的浪漫主義與現實主義的統一。

毛極其自信地說：中國應當成為世界上第一個大國，因為中國人口世界第一個多嘛！過去林彪同志在延安曾談過，將來中國應比蘇聯強。那時我還有點不大相信，我想蘇聯也在進步呀！現在我相信了，完全有可能。我們這麼多人，現在六億，再過十年，十五年八億，人多總要做事，總不能光睡覺嘛！吃了飯就幹社會主義，無非是搞工業、農業、文化科學嘛！因此說，十幾二十年就可以趕上世界上一切國家，還可能超過美國。[11]

在17日的談話中，毛說：我們不提「幹部決定一切」，「技術決定一切」的口號，這是斯大林提出的……，有片面性，不夠全面。幹部決定一切，那群眾呢？技術決定一切，那政治呢？這就缺乏辯證法。……我們的口號是多些、快些、好些，省些。這是不是高明些呢？我看我們的口號是高明些，應當高明一些。因為是先生教出來的學生，學生應當比先生強。後來者居上嘛！我看我們的共產主義，可能比蘇聯提前到來。又說：蘇聯建設社會主義，那是一種方法。我們可不可能有另一種方法呢？都是搞社會主義，都是馬列主義，他們是由上而下的方法，我們是搞發動群眾，搞階級鬥爭。列寧比斯大林強，我們採用了列寧的，而不採用斯大林的。斯大林在《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中說：革命後的改革是從上而下的和平改革，他不搞自下而上的階級鬥爭……。我們有從上而下，又加了一個從下而上的紮根串連，群眾性的階級鬥爭。現在搞建設，要有決議案，政府發指示、規章制度等等，從上而下的要一點；但大量的還是發動群眾自己來搞，搞群眾運動。為甚麼他四十年搞了五千一百萬噸鋼，我們搞五千萬噸只需要十五年或者到1963年就可以了……。我們是否可以比他們快？我看是可以的。[12]

講「破除迷信」，不要有奴隸思想，要講理論與實踐相結合，要有創造精神，從一般意義上說，都沒有錯。然而，在既不要迷信美國，也不要迷信蘇聯和馬克思的同時，卻要人們迷信自己在革命戰爭年代的經驗——階級鬥爭加群眾運動，以為靠這一着就能超越一切。即用「十幾二十年」時間，實現「趕上世界上一切國家」——英國、蘇聯和美國。這又是在推崇迷信了。

準備黨內分裂：

毛在17日的講話中，專門講了一個「要準備對付災難」的問題。他

說：無非是大旱大澇，赤地千里。還要準備打大戰。……還要準備黨內分裂。現在看來，一般的不會有，但可能性是有；我們搞得好，就不會有分裂。蘇聯就出現了這個問題，出現了兩個集團，莫洛托夫和赫魯曉夫。……假如有人不顧大局，如高崗、饒漱石那樣不顧大局，出現黨內分裂，就要亂一陣子。但又會走向反面，不平衡走向反面就是平衡。黨大會代表，特別是中央委員更要注意，要顧大局。誰不顧大局，誰就會摔跟頭。凡是不顧大局鬧分裂的，有甚麼好結果？[13]

在20日的講話中，毛再次講到要準備黨內分裂的問題。他說：我們黨有四次分裂：第一次陳獨秀，第二次羅章龍，第三次張國燾，第四次是高崗……今後還會不會有新的分裂？我看有可能，只要有黨就有可能，一百年以後還會有。我們的辦法是團結——批評——團結，懲前毖後，治病救人。又說：有些人說，這樣講了不舒服，我看講了舒服，講了大家就有了精神準備？實際上南斯拉夫不是分裂了嗎？過去陳獨秀、羅章龍、高崗搞分裂，最近有沙文漢、李世農、孫作賓、陳再勵等，也搞分裂。北京的政法系統垮了，文藝系統垮得更多，人類靈魂工程師垮了。這些垮了有甚麼不好呢？我看是好事，這是政治上的分裂。新陳代謝嘛！[14]

毛澤東在會上反覆講要準備黨內分裂，顯然是有所指的。從南寧會議上講「反冒進」把一些同志拋到離右派只有五十米，到多次講各省被打成「右派」、「反黨分子」的沙文漢等事例，又說經過整風，「反冒進」事件現在搞清楚了，經過團结鬥爭，在新的基礎上達到了新的團結。無疑是要在周恩來等曾經「反冒進」的領導人的頭上掛上一把劍。

插紅旗，辨風向：

毛在20日講話中講道：世界上甚麼地方都要插旗子的，是插紅旗還是插白旗？……凡是有人的地方都要插旗子，不是紅旗，就是白旗，或是灰色的旗子；不是無產階級插紅旗，就是资產階級插白旗。去年五六月間，學校、機關、工廠究竟插甚麼旗？雙方都在爭奪。我們要插紅旗，资產階級要插白旗。現在有少數落後的合作社、工廠、機關、學校，它們那裏不是紅旗，而是白旗或是灰旗。我們應當到落後的地方走一走，發動群眾，貼大宇報，把紅旗插起來。

毛接着說：為了插旗子，就要提高嗅覺，學會辨別風向，看颳甚麼風。「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世界總是分黨派的，社會上的人總是分左、中、右三種，有的處於落後狀態，有的處於中間狀態，有的處於先進狀態。現在的任務是：先進的要爭取中間的人，改造落後的人。右派插的是白旗，插資產階级的旗子。中間分子插的旗子是灰色的，爭取他們到左邊來，插下紅旗。……我特別請同志們注意的問題，就是辨別風向，要有辨別力。有無辨別力是極端重要的。

中國有很多有才有學的人，但是他們不能辨別風向。斯大林説過，領導者要有預見。預見就是辨別風向。就是在還沒有颳風的時候，就能感到風要來了，颳小風時就知道要颳大風。站在看台上，甚麼東西都看不到，這種人是沒有用處的。沒有預見性，特別是當事物已經普遍存在了，還看不到，就會給右派以可乘之機，你看不到，他們就來了。[15]

在23日的閉幕會上，毛再次講插紅旗，辨風向問題。他説：上次講的「風向」，不是「方向」，風向，即東風還是西風。這時，毛又點了「反冒進」問題。他説：「反冒進」的風，是1956年6月開始的，本來提了多快好省、促進會、四十條、十大關係。4月份政治局擴大會，各省市的同志都來參加的，但是沒有明確的決議，這是個缺點，只訂了君子協議，大家贊成。……1956年11月開的二中全會，也沒有明確的決議，但有個報告。會上，著重談千方百計，增產節約，用一切方法增產節約，那股風沒能擋住。現在壞事變成好事了，使我們有了比較了。他強調：今天，我主要講辨別甚麼風向。大風是容易知道的，十二級颱風人人容易辨別，人吹得不舒服，房子吹倒了，樹木吹倒了。小風不容易辨別，領導幹部更加要注意。宋玉寫了篇《風賦》，值得看一看。他説風有兩種，一種是貴族之風，一種是平民之風（所謂「大王之風」、「庶人之風」)。風有小風、中風、大風。宋玉是楚國的文學家。他説：「夫風生於地，起於青萍之末，侵淫谿谷，盛怒於土囊之口。」……。風「起於青萍之末」的時候，最難辨別。[16]

毛在这裏講的紅旗、白旗，東風、西風，內涵是含混的。一會是指先進、落後；一會指無產階級、资產階級。但整個來看，是指階級鬥爭。他要人們特別注意辨別風向，就是階級鬥爭的風向；是社會主義還是资本主義的風向。而且把「反冒進」也歸入了這一範疇。

總之，毛澤東在大會上的多次講話，意在要人們相信，堅決貫徹多快好省的總路線，就是堅持了馬列主義，堅持了社會主義方向；就有可能在短期內趕上和超過一切發達國家，並比蘇聯提前實現共產主義。這在與會代表中，引起了極大的共鳴。

4.眾代表登台表決心

代表們討論和發言[17]，主要是圍繞劉少奇的報告尤其是毛澤東的講話展開的。內容集中在批判右傾保守，對毛澤東就是要崇拜，超英趕美的決心三個層面。

(1)批判經驗主義和右傾保守

在討論劉少奇的報告中，雖然也有比較冷靜的意見。如有人認為，要求1972年在農業產量和單產上超過一切资本主義國家，可能辦不到，

報告應留有餘地。又如對「七個月內擴大灌溉面積3.5億畝」、「今年1至4月，全國造林2.9億畝」等數字，有人提出應估計到有些灌溉設施不一定頂用，可否改為完成初步灌溉面積；造林數字按成活率，打個七折為好。等等。但是，比較多的還是集中在批判經驗主義、右傾保守方面。

有人提出，在現實生活中，教條主義與經驗主義哪種最為危險？多數人認為實際工作中經驗主義多一些，更頑固些。「反冒進」的思想主要屬於經驗主義。是路線性質的錯誤，必須予以徹底批判。有人聯繫到八大的報告，提出中央有的同志對毛澤東的意見是否尊重？八大就沒有提多快好省和《農業四十條》，「二五」計劃的指標也很保守。

不少人認為，在幹部隊伍中，對建設速度問題，還存在種種錯誤思想。如「右比左好」、「慢比快好」、「技術條件不夠」等右傾保守思想。提出，一定要按毛澤東提出的，以虛帶實，以紅帶專，以政治帶業務。要批判洋奴思想，肅清资產階級學術思想。對那種認為加快建設速度，增加國家積累，就會影響人民生活的改善，會出問題的說法，必須加以批判。

有些省的領導人的發言批判說：「懷疑毛主席多快好省的方針的人，首先就是從懷疑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能否實現開始。」「1956年的『反冒進』，是對多快好省的建設社會主義總路線的懷疑和動搖。」有的發言還聯繫批判本省的「右傾分子」。河南省委書記吳芝圃的發言題目就是：〈右傾機會主義是當前黨的主要危險〉，揭發批判時任河南省委第一書記潘復生所謂「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

(2)崇拜毛澤東就是崇拜真理

按照毛澤東的思路，代表們檢討和批判了對「資產階級」教授和外國的迷信。

北京組認為，资產階級知識分子用「洋人」、「外國」、「學問」嚇唬人，實際上沒甚麼學問。妄稱：馬寅初近來寫一本書，題目很大，胡說一氣，笑話連篇；從前蔡元培一篇講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文章，也是通篇不知所云。提出，應該打破理論工作的神秘觀點，只要把實際中的經驗和群眾中的許多創造總结出來，就是很好的馬克思主義。

江蘇組認為，毛澤東的指示把我們從兩個思想束缚中解放出來，這就是：一方面要反對民族自卑感，不僅要敢於超過英美，而且也要敢於超過蘇聯，事實上我國在建設方面已經超過上述國家；另一方面要反對勞動人民的自卑感，勞動人民是歷史的創造者，中國六億勞動人民，真正解放了思想，敢想、敢說、敢做，我們社會主義建設的前途定會是一片光明。

代表們還說，毛澤東關於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講話，有極其深

刻、偉大的意義，是真正的思想大革命、大解放。七年趕上英國，再加八年趕上美國是完全可能的。問題不在於能不能趕，而在於敢不敢趕，毛的話使人們從思想上解決了這個問題。在黨中央和毛澤東的正確領導下，中國建設社會主義的速度，必將打破古今中外的一切紀錄，也將大大超過蘇聯建設社會主義的速度。

與之同時，人們認為，毛澤東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克思主義；中共黨內不存在個人崇拜問題。

上海組認為，毛澤東的講話，不僅總結了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基本問題，而且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經驗的總結。特別是在民主集中制，發揮群眾的積極性、破除迷信、發揚獨創精神等問題上，發展了馬列主義，具有國際意義。山東組、新疆組認為，毛澤東的講話貫串着一條紅線，就是辯證法。是唯物論、辯證法在中國的重大發展，並且還在發展，這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寶庫的偉大貢獻。他們說，毛澤東的講話，使大家從正面到反面，從理論到實踐，透徹地理解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的正確性，有很大的教育意義。

代表們説，為了解放思想，加速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必須對毛澤東的講話進行認真的系統的學習。現在的問題恰恰是，過去的學習偏重學馬恩列斯原著，而對毛澤東的著作學習得不夠。有的發言說，黨內有不少同志對毛澤東的著作，不去努力鑽研，卻轉而向外國的書本尋找經驗，這當然還是崇拜「洋人」思想的表現。毛澤東的著作不僅是我們取得革命勝利的偉大武器，而且是取得建設勝利的偉大武器，事實説明，圍繞着毛澤東的著作來學習外國的經典著作，對於我們更為有效。人們指出，過去中央規定的幹部必讀十二本書，都是馬恩列斯的經典著作，沒有把毛澤東的著作編進去。因此，建議中央作出規定，必須重新規定幹部必讀書，把毛澤東著作確定為幹部必讀的主要內容。今後幹部必讀，應以學毛著為主。這是活的辯證法，活的馬克思主義，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際相结合的光輝典範。有人提出，應當確定毛澤東主義的提法。

與會者認為，中國共產黨不存在個人崇拜問題。因為中國幾十年革命和建設的歷史經驗證明，毛澤東是真理的代表。湖南組提出，對毛澤東的崇拜，不是崇拜個人，是崇拜真理。

有些中央領導人在發言中也説：黨的這條總路線，「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践相結合的毛澤東思想的又一光輝範例，同時也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社會主義建設學説的新發展」。「擁護和相信毛主席就是擁護和相信真理」。「毛主席是真理的代表」。[18]

在黨的代表大會上，從中央到地方的領導人，對毛澤東個人的如此頌揚，是建國以來所未曾有過的。強調對毛澤東的崇拜就是崇拜真理；

毛澤東著作，是活的馬克思主義；學馬列，主要是讀毛著；總路線是馬列主義的新發展，具有世界意義等等。實際上就開了1960年代中國造神運動的先河。

(3)高唱趕超目標和躍進措施

正是在這種盲目自信的氛圍下，各省、區和部門的領導人，紛紛向大會報告各自要實現的趕超目標和躍進措施。

四川省委第一書記李井泉發言說，總路線是從我國幾年來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中，也是從正確地運用蘇聯的建設經驗中，經過毛主席和黨中央的反覆思考和研究所總結出來的。它是「中國型」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同時又具有世界意義。只要全黨對於這條總路線深信不疑，可以斷定，也將同1945年黨的七大提出的黨的總路線一樣，一定可以動員全黨和全國人民來完成自己的歷史任務，一定可以爭取在較短的時間內，把我國建成為具有現代工業、現代農業、現代科學文化的社會主義強國。關於四川省發展地方工業的設想，李說：決心爭取提前三年或五年實現《全國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修正草案）》，爭取五年內使地方工業總產值超過農業總產值，在1962年達到145億元（或者還更多一點），比1957年的36.1億元增長三倍（或者更多一點，但不包括中央現有工業和準備新建工業的產值）。具體指標有，煤產量1958年達到1000萬噸左右（1957年為516萬噸）；小高爐的鐵產量1958年達到六十萬噸左右（1957年為20.5萬噸）。李充滿信心地說，我們認為這個指標是比較有把握實現的。

廣東省委第一書記陶鑄發言說：要貫徹執行多快好省的建設社會主義總路線，最根本的問題就是必須走群眾路線。生產力中最重要的是人，人民群眾是歷史的主人。特別是在社會主義制度下，以共產主義來提高人的覺悟，建立新的人與人的相互關係，人民群眾能發揮出來的力量，就更加難以估量。陶在列舉廣東的事例後說，原來認為廣東實現工業化，不要十年也要八年，現在大有可能在今、明兩年內，使工業產值趕上農業產值，三五年內基本上實現農業機械化、半機械化。糧食生產也可在1960年實現畝產八百斤的指標，今年就可以增產六十億斤，增長25%，一年超過以往五年。這樣快的糧食增產速度，在廣東歷史上是從來沒有的。

冶金工業部部長王鶴壽作了〈十五年趕上美國〉的發言。他說，我們根據毛主席的思想和黨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再次和各省、市研究了鋼鐵工業的發展速度後，我們的結論是：明年鋼產量達到一千二百萬噸以上，1962年達到三千萬噸以上，1967年達到七千萬噸以上，1972年達到一億二千萬噸以上，是完全有把握的。也就是說，鋼產量五年超過英國；十五年趕上美國。王鶴壽說，在這次代表大會上提出十五年趕

上美國，是有極重大的政治意義的。這是一個世界範圍內的興無滅資的問題。因為在不久的時間內，超過英國已經是很清楚的了。而美國，目前卻以資本主義世界「天之驕子」的樣子在那裏「神裏神氣」，我們以最快的速度趕上和超過它，就預示着資本主義世界滅亡的速度加快。

石油部[19]副部長李人俊發言説，石油工業能跟兄弟戰線一起大躍進。我們的目標是1962年生產原油一千五百萬噸，天然氣三十億立方米，基本適應工農業的發展，保證滿足國防方面的需要；在十五年內趕上鋼鐵產量（一噸鋼一噸油），到1972年，原油生產水準超過一億噸。鐵道部部長滕代遠，作了十五年內修建十二萬公里鐵路的發言。

李富春作〈趕上英國、再趕上美國，第二個五年是關鍵〉的書面發言。其中説道：

我們參照目前各省、市、自治區和中央各部門初步提出的規劃，經過中央經濟小組討論之後，提出初步設想的第二個五年工農業生產的主要指標：1962年發電量900-1100億度（前為必成數，後為期成數。下同）；原煤3.8-4.2億噸；原油800-1500萬噸；鋼2500-3000萬噸；糧食6000-7000億斤；棉花6500-7500萬擔。以此估算，1962年工業總產值大約為2300-2900億元，比1957年增長2-3倍，每年平均增長26%-32%；1962年農副業總產值大約為1200-1370億元，比1957年增長80%-110%，平均每年增長13%-16%。

關於超英趕美的時間。李指出，只要我們爭取完成和超額完成上述初步設想的第二個五年計劃的第二本賬，我國就完全有可能在1962年或更多一點時間內，在鋼鐵和其他主要工業產品產量方面趕上或超過英國；在趕上英國的基礎上，經過進一步的努力，就可能在1972年或再多一點時間內，在鋼鐵和其他主要工業產品產量方面趕上美國。因此，第二個五年是趕上英國和趕上美國的關鍵。我們認為，不要十五年，甚至不要十年，只要七八年的時間，就可以在鋼鐵和其他主要工業產品產量方面，趕上或超過英國；不要二十五年，只要十五年或者再多一點的時間就可能趕上美國。這樣，過去資本主義國家花費了一二百年時間所達到的工業水準，我們就可能用二十年左右的時間來趕上它們。至於農業，只要在五年到七年內實現農業發展綱要，逐步實現農業的化學化、機械化和電氣化，那我們的農業發展，就可把一切資本主義國家遠遠地拋在後面。

上海市委第一書記柯慶施的發言，更為代表們描繪了一幅共產主義的圖畫。柯説：在十五年內我國將在工農業生產方面趕超資本主義國家，同時在文化建設方面我國也將隨着經濟建設的發展達到繁榮，人們的精神面貌將大為改觀。他具體描述道：

> 我們可以這樣設想：到那時，小學教育，中學教育早已普及，在廣大鄉村中，也都辦了大學或專科學校。我們的人民，人

人「知書達理」，像毛澤東同志曾經預言過的，大家都能夠讀《資本論》，大家都懂得高等數學，甚麼天文學……電子學等等，都會變為普通人的常識。那時，我們將不止有幾十萬、幾百萬個科學文化方面的專家，而且將從現代化工農業生產實踐中鍛煉出幾千萬個專門人才。

到那時，人們將過着極為文明、衛生的生活，蒼蠅、蚊子、臭蟲、老鼠、麻雀等等早已斷子絕孫，人們只有到博物館裏才能看到這些東西的標本。那時，城市變成了大花園，農村變成了工廠林立、街道整潔、衛生體育設備齊全的小城市，「村村流水，戶戶垂楊」。那時人們的疾病將大大減少，健康水準將大大提高，而逐漸成為德智體全面發展的新人類。

到那時，新的文化藝術生活，將成為工人、農民生活中的家常便飯。人們不但可以經常看到電影，而且可以從電視裏學科學、學先進經驗，同先進人物會見，看到整個地球以至整個宇宙許許多多的新東西。整個文藝園地處處「百花齊放」，天天「推陳出新」。

到那時，共產主義的道德風尚已經基本驅逐了舊社會遺留下來的舊思想、舊習慣。反映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為社會主義經濟基礎服務的，並且保證進一步向共產主義社會過渡的新道德，將成為人們的思想和行動的規範。

綜合這四個方面，那時，城市和鄉村的差別，體力勞動同腦力勞動的差別，將逐漸消失，而共產主義的最後建成，也就離我們不遠了。

對右傾保守的激烈批判，對毛澤東崇拜的急速升溫，超英趕美的豪言壯語，對美好未來詩歌般的描繪，使人們不難看出，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不只是「大躍進」的動員大會，而且是名副其實的「大躍進」的誓師大會。

5.周恩來、陳雲檢討

中共黨內，自延安整風以來，就形成了一個黨內鬥爭的思維定式和傳統。即對犯有「錯誤」的人的批判，必須挖犯錯誤的社會根源——從思想方法，政治傾向，組織生活三個方面追根溯源。以把「錯誤」批倒批臭。而批判者的調子愈高，就表明他的覺悟愈高。

儘管1956年的「反冒進」問題，毛澤東從南寧會議批到成都會議，並曾說過「反冒進」的問題不要再提了；八大二次會議上，劉少奇的報告又專門批評了「反冒進」的所謂錯誤。但與會代表中仍有些人抓住不放。有人提出：報告對於「反冒進」問題的思想根源、錯誤性質和後果的分析不夠充分。他們認為，「反冒進」的思想根源，在中央工作的個

別同志來説是思想方法問題；在地方工作的一些同志中則不僅是思想方法問題，有些人是由於嚴重右傾和對社會主義事業缺乏熱情或嚴重對黨不滿，因而借「反冒進」之名對黨進行攻擊的。就全國説，「反冒進」的錯誤雖然是思想方法的錯誤，但不是一般方法的錯誤，而是在建設路線上帶根本性質的錯誤。因此，他們提出，批判的分量要重一些，對立面要明確，特別是對思想方法和思想根源要集中分析批判。還有人認為，這種錯誤主要不是來自地方，而是來自中央機關的一些同志，中央要多負一些責任。有人發言説：「反冒進」的問題必須加以清算。「反冒進」的時間雖然很短，但對廣大人民群眾的積極性的挫折和打擊很大，影響很廣。右派分子就抓住我們這一點，説全面：「冒進」了，否定我國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成就。幹部很害怕「反冒進」，思想總是不解放，小心謹慎超過敢想、敢説、敢幹，結果甚麼都照章辦事。為了更好地貫徹執行多快好省的路線，必須把「反冒進」的問題徹底弄清楚。只有批判得徹底，批判得深，批判得透，才能解放思想。於是大會又掀起一個徹底批判「反冒進」的浪潮。

在這種氛圍下，提出「反冒進」正確主張的周恩來、陳雲、李先念、薄一波等人，不得不繼南寧會議以來為此反覆檢討之後，在這次大會上再次進行全面檢討。[20]

首先在大會上檢討「反冒進」問題的是李先念。

5月15日，李先念發言説，幾年來，財政工作當中確實出現了不少缺點，甚至在一個時候一個問題上也發生過帶有方針性的錯誤。我們往往考慮平衡和穩定多、考慮建設速度少，往往是一怕預算發生赤宇，二怕市場波動。因此只好在預算收支數字上打圈子，打來打去還是得不到一個好的出路，結果只能是尋尋覓覓，冷冷清清，不是轟轟烈烈，勢如破竹。當1956年建設躍進中出現一些個別缺點的時候，我們只是抓住了事物的局部現象，沒有抓住事物的本質，誇大缺點，低估成績，把1956年的躍進説成是一種「冒進」。「反冒進」的錯誤給工作帶來了相當大的損失，这裏面我是有責任的。

根據5月15日毛澤東在陳雲發言稿上的批示：「此件可以用了，並且可以在明天講。」[21]陳雲16日在大會發言。他檢討説：從1956年下半年到1957年上半年的這一段時間內，我對於我國經過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三大改造以後，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形勢估計不足，對於1956年生產高潮的偉大成就估計不足，對當時大躍進中出現的個別缺點……，估計得過分誇大了。這樣從部分情況出發來解決問題，就不會正確地理解九個指頭和一個指頭的問題，就不可避免地要犯錯誤。我在1957年1月省市委書記會議上所説的爭取市場穩定和財政平衡的方法，就是從局部現象出發，因而不是從積極方面，千方百計地去發動群眾增加生產，來克服困難，而是採取了消極的方法，遷就了困難。過多地注

意物，對於群眾的革命積極性估計不足；過多地注意了分配方面的關係，對於擴大生產重視不夠；過多地注意了所謂「穩」，而不是積極爭取一切可能爭取的東西。這些錯誤，曾經使群眾的積極性受到損害，並且減低了1956年的經濟發展速度。「反冒進」的錯誤是看不見和低估當時群眾性生產高潮的偉大成績，是誇大估計了當時財政和市場的緊張情況。我是財貿工作的主要負責人，對於當時財政和市場緊張的錯誤看法，首先而且主要的是我的看法。因此，對於當時「反冒進」的那個方針性的錯誤，我負有主要的責任，首先在思想影響上負有主要的責任。

同日，薄一波在大會上作檢討發言。他說：現在看得很清楚，1956年的「反冒進」是完全錯誤的，這是一個帶方針性的錯誤。對於這個錯誤，我也是有責任的。在「反冒進」錯誤的影響下編制的1957年計劃是保守的。而且在思想沒有完全解放的情況下，編制出來的1958年計劃的第一本賬，也對當前大躍進的形勢估計不足。今天看來，問題的嚴重性還不在於生產和建設的指標高一點或低一點，而在於「反冒進」大大挫傷了人民群眾和廣大幹部的積極性，給開始出現的群眾性的生產建設高潮，潑了冷水。這是必須引為教訓的。

周恩來作為總理，是1956年「反冒進」這一正確決策的主要負責人。自1月杭州會議以來，毛澤東對「反冒進」的嚴厲指責，對問題的性質一再上綱，周恩來雖已多次作了檢討，但仍要在這次大會上再作檢討，這對處於國家經濟建設第一線的領導人來說，不能不是一件十分矛盾和痛苦的事。從5月10日起，周就開始進行認真準備。5月15日晚間，毛澤東又分別約陳雲、周恩來進行了長時間的談話。對周在八大二次會議發言稿的起草過程，其內心複雜和矛盾的狀態，時任周恩來學習秘書的范若愚有過如下回憶:[22]

> 1958年，在成都會議期間，周恩來同志對我說，回到北京以後準備一個在八大二次會議上的發言稿，要我到總理辦公室的宿舍住幾天。回到北京後，我就到總理辦公室去住，聽候周恩來同志給我布置工作。有一天，周恩來同志對我說，他這次發言，主要是做「檢討」，因為「犯了反冒進的錯誤」，在南寧會議上已經被提出來了。由於我沒有隨他去過南寧，也不瞭解那次會議的內容，只是在這次談話中，我才知道。
>
> 周恩來同志指示我：過去起草文件，是他先談內容，由我記錄下來整理成書面材料。這次發言，不能像過去那樣，因這是自己的檢討發言，不能由別人起草，只能他講一句，我記一句。只是在文字的連接上，做一點工作。周恩來同志還說，關於他這次「犯錯誤」的問題，他已和毛澤東同志當面談過了，主要原因在於他的思想跟不上毛澤東同志。這說明必須努力學習毛澤東思想。周恩來同志在講了這些情況後，就開始起草發言稿的開頭部分，他說一句，我記一句。

就在這個時候，陳雲同志打來電話，陳雲講的甚麼，我只聽到一兩句（他們使用的電話機有增音裝置），周恩來同志說的話，我當然聽清了。打完電話之後，他就說得很慢了，有時甚至五六分鐘說不出來。這時，我意識到，在反冒進這個問題上，他的內心有矛盾，因而他找不到恰當詞句表達他想說的話。在這種情況下，我建議，我暫時離開他的辦公室，讓他安靜地構思，等他想好一段再叫我來，記錄一段。我覺得，這時我如果守候在他的身旁，對他是一種精神上的負擔，會妨礙他構思和措辭。周恩來同志同意了我的意見，當時已經深夜12時了，我回到宿舍和衣躺在牀上，等候隨叫隨去。

在第二天淩晨2時許，鄧大姐把我叫去，她說：「恩來獨自坐在辦公室發呆，怎麼你卻睡覺去了？」，我把周恩來同志同意了我的建議的情況講了以後，鄧大姐說：「走，我帶你去和他談。還是由他口授內容，你整理成文字材料。」這樣，我隨鄧大姐到了周恩來同志辦公室，她和周恩來同志爭論了很久，最後，周恩來同志勉強地同意，還是由他口授內容，我回到宿舍去整理記錄。在整理到學習毛澤東思想問題時，我引了一句成語說：「我和毛主席風雨同舟，朝夕與共，但是在思想上還跟不上毛主席……」後來，我把整理後的記錄請周恩來同志審閱時，他看到「風雨同舟，朝夕與共」這句成語時，嚴厲地批評了我。他說，在關於他和毛澤東同志的關係上，在整風以後，還可以引用這句成語，但是在整風以前，不能引用。「這也說明你對黨史知識知道得太少。」周恩來同志講這些話時，幾乎流出了眼淚。

最後，他逐字逐句地自己動筆修改一遍，又親自補充了幾段，才打印出來，送交政治局常委和書記處傳閱。後來稿子退回，周恩來同志看過以後，又要我把批在稿子上的話謄寫清楚，再打印一次。我看到政治局常委和書記處提的意見，把「檢討」部分中的一些話刪掉了，有些話改得分量較輕了。我看了之後，心裏的緊張情緒才緩和下來。但是，我發現周恩來同志在起草這個發言稿的十多天內，兩鬢的白髮又增添了。

5月17日，周恩來在大會上發言。為與大躍進的氣氛相合拍，周首先稱頌了當前的「大躍進」形勢。他說：這次會議，是一個思想解放的大會，也是一個充滿共產主義風格的大會。大會的發言豐富多彩、生動地反映了人民在生產大躍進、思想大解放中的建設奇跡和革命氣概。真是一天等於二十年，半年超過幾千年。處在這個偉大的時代，只要是一個真正的革命者，就不能不為這種共產主義的豪情壯舉所激動，也就不能不衷心地承認黨中央和毛主席建設路線的正確，同時，也就會更加認識「反冒進」錯誤的嚴重。我是「反冒進」錯誤的主要負責人，應該從這個錯誤中得到更多的教訓。

周按照毛的定性，承認「反冒進」是犯了方針性的錯誤。在過去一段時間內，曾經減低了我國的建設速度，損害了幹部和群眾的生產和建

設的積極性。它不是個別問題上的錯誤，而是在一段時間內關於社會主義建設規模和速度問題上方針性的錯誤。周說，對於這一點，我在相當時間沒有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就在这裏。

周還不得不痛苦地將「反冒進」的錯誤，同右派的「猖狂進攻」聯繫起來。他說：「反冒進」的錯誤是嚴重的，幸而由於黨中央和毛主席的正確領導和及時糾正，也還由於資產階級的右派從反面教育了我們，因此才使得這個錯誤沒有繼續發展成為更嚴重的錯誤。在這個嚴重的階級鬥爭面前，我開始覺醒，因而在1957年6月政府工作報告中，徹底拋棄了對1956年建設「冒進」的錯誤估計，堅決肯定了1956年的建設是躍進的發展。這是一個認識上的轉折點。這是從敵對方面得到的教訓，而更重要的教育，還是三中全會上毛主席關於重新恢復多快好省、《農業四十條》，「促進派」的宣言，接着有杭州會議、南寧會議和成都會議的整風。同時，我又接觸了生產大躍進中的一些群眾實際活動。這樣，才從整風和實踐中真正認識到黨的這個社會主義建設路線的無比光輝和無窮無盡的力量。

周檢討自己犯錯誤的根源說：「反冒進」的錯誤，不是偶然發生的。這個錯誤的思想根源是主觀主義和形而上學。在多數問題上表現為經驗主義，在某些問題上表現為教條主義，還有些問題上則表現為兩者的混合。思想方法上的這些錯誤，結果造成了建設工作中的右傾保守的錯誤。這樣，就違背了毛主席一貫主張的社會主義建設的總路線，總方針。

除了檢討思想根源外，周還深挖了組織根源。他說：除了前面所說的認織和方法上的錯誤以外，還應該特別指出，「反冒進」的錯誤，是同政府工作中脫離黨的領導的傾向分不開的，也是同脫離實際、脫離群眾的工作作風分不開的。過去一個時期，政府工作特別是財經建設工作，重業務，輕政治，務「實」不務虛，政治空氣淡薄，事務主義嚴重，抓小不抓大，主次分不清。有些重大的工作問題，沒有及時地向中央請示報告，更沒有經常地系統地向中央反映情況。即使請示了，報告了，也不是「毛毛細雨」，而是「傾盆大雨」，材料數字一大堆，使中央對於須要作出決定的問題，來不及進行仔細的分析研究。對於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缺乏認真的研究和討論，領會不深不透，因而就不能正確地在政府工作中加以貫徹。

周總結教訓，專門講了一段「向毛主席學習」的話。他說：「中國幾十年革命和建設的歷史經驗證明，毛主席是真理的代表。離開或者違背他的領導和指示，就常常迷失方向，發生錯誤，損害黨和人民的利益，我所犯的多次錯誤就足以證明這一點；反過來，做對了的時候和做對了的事情，又都是同毛主席的正確領導和領導思想分不開的。」

類似的話，周恩來在中共七大之前就曾經講過。1943年7月16日周

恩來由重慶返回延安。8月2日，中共中央辦公廳舉行歡迎會，周恩來在會上致詞，其中有一段說：

> 我們黨二十二年的歷史證明：毛澤東同志的意見，是貫串着整個黨的歷史時期，發展成為一條馬列主義中國化，也就是中國共產主義的路線！
>
> 毛澤東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國共產黨的方向！
>
> 毛澤東同志的路線，就是中國的布爾什維克的路線！[23]

歷史地看，周在1943年的話，是出於內心的，反映了那個時代中共黨內多數領導人的心態。而1958年，周關於學習毛澤東的一段話，則包含着自南寧會議以來沉重的政治壓力和組織壓力。

在周恩來，陳雲等先後作了符合大會基調的檢討之後，毛澤東公開表示，「反冒進」問題解決了，中央是團結的。5月20日，他在大會上作第三次講話中說道：「現在我們很團結，沒有甚麼事，中央和地方都很好。經過整風，「反冒進」事件現在搞清楚了，經過團結鬥爭，在新的基礎上達到了新的團結。」但是，毛在多次講話中一再說，要對「觀潮派、秋後算賬派」進行鬥爭，要準備黨內分裂，等等，又顯然是對黨內有過不同意見的人發出的警示。

6.中共中央的人事安排

八大二次會議閉幕後，5月25日，中共中央舉行八屆五中全會。[24]主要議程是，增選中央領導機構成員。會議增選林彪為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務委員；增選柯慶施、李井泉、譚震林為政治局委員；增選李富春、李先念為中央書記處書記。決定楊獻珍、王恩茂由中央委員會候補委員依次遞補為中央委員會委員。

會議還決定由中央主辦一個革命的、批判的、理論和實際相結合的雜誌，定名為「紅旗」，每半月出版一次，由陳伯達擔任總編輯。會議要求全黨積極地支持這個雜誌，要求各級黨委經常供給稿件。會議決定，除了在中央成立一個編輯部以外，上海局和各省、市、自治區黨委都應當分別成立一個編輯小組，負責徵集、初步審定和修改稿件。

八大二次會議結束後，周恩來向中共中央提出「繼續擔任國務院總理是否適當的問題」。與此同時，彭德懷也向中央提出「不擔任國防部長的工作」。6月9日，毛澤東在中南海游泳池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討論他們提出的請求。出席會議的有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林彪、鄧小平、彭真、彭德懷、賀龍、羅榮桓、陳毅、李先念、陳伯達、葉劍英、黃克誠。與會者一致認為：「他們應該繼續擔任現任的工作，沒有必要加以改變。」會後，毛澤東囑咐總書記

鄧小平起草一個會議紀要。22日，鄧小平將寫好的會議紀要報送毛澤東。毛當即批示：「退（楊）尚昆存。」[25]

這次會議還討論了中共中央關於成立財經、政法、外事、科學、文教等小組的決定，具體組成是：陳雲任財經小組組長；彭真任政法小組組長；陳毅任外事小組組長；聶榮臻任科學小組組長；陸定一任文教小組組長。6月16日，中共中央下發通知，毛澤東在通知中寫道：「這些小組是黨中央的，直隸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向他們直接做報告。大政方針在政治局，具體部署在書記處。只有一個『政治設計院』，沒有兩個『政治設計院』。大政方針和具體部署，都是一元化，黨政不分。具體執行和細節決策屬政府機構及其黨組。對大政方針和具體部署，政府機構及其黨組有建議之權，但決定權在黨中央。政府機構及其黨組和黨中央一同有檢查之權。」[26]

這是繼1953年3月《中央關於加強中央人民政府各部門向中央請示報告制度及加強中央對於政府工作領導的決定》之後，又一個把政府工作權力集中於中共中央的決定。毛澤東也由此直接掌控了政府各部門的工作，尤其是經濟建設工作。周恩來儘管繼續保留了總理職務，但已失去了對中國經濟建設走向的發言權。

[1] 《中國共產黨章程》（1956年9月26日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九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頁329。

[2] 李銳：《「大躍進」親歷記》，頁277-278。

[3] 中共八大二次會議增選的二十五名候補中央委員是：王任重、張仲良、陶魯笳、彭濤、劉建勳、趙毅敏、孔原、唐亮、劉子厚、張蘇、楊一辰、汪鋒、周一舟、方毅、王尚榮、劉震、張平化、張勁夫、韓先楚、李頡伯、廖志高、趙伯平、孫志遠、張愛萍、姚依林。

[4] 〈中國共產黨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關於在莫斯科舉行的各國共產黨和工業黨代表會議的決議〉，強調莫斯科宣言「闡明了各國共產黨在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中必須遵守的共同原則」，尖銳批判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七大」綱領，是在一系列根本問題上背叛馬克思列寧主義原則的「修正主義綱領」，甚至認為：「1948年共產黨情報局『關於南斯拉夫共產黨狀況的決議』中，對於南斯拉夫共產黨背棄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原則而走上了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錯誤道路所進行的批評，基本上是正確的和必要的。」這不僅開了一國共產黨在自己的代表大會上批判另一國共產黨綱領的先例，而且堵死了中國探索自己社會主義道路之門。

[5] 胡繩：〈談黨的「八大懸案」〉，《中央黨史研究》，2002年第6期，頁66-67。

[6] 毛澤東：〈對劉少奇八大二次會議工作報告稿的批語和修改〉(1958年5月13日，24日），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七冊，頁221。

[7] 劉少奇：〈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向第八屆全國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的工作報告〉(1958年5月5日），載《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十一冊，頁303-304。

[8] 劉少奇：〈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向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的工作報告〉(1958年5月5日），載《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十一冊，頁311-312。

[9] 毛澤東：〈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的講話提綱〉（註2）（1958年5月），載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七冊，頁206。

[10] 毛澤東：〈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的講話提綱〉（註5)(1958年5月），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七冊，頁208。為證明這個真理，5月18日，毛澤東將安東機器廠試製成功三十馬力拖拉機的報告印發大會，并寫了「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的批語。

[11] 〈毛澤東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的講話記錄稿〉(1958年5月8日），載李銳：《「大躍進」親歷記》，頁288、292-293。

[12] 〈毛澤東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的講話記錄稿〉(1958年5月17日），載李銳：《「大躍進」親歷記》，頁345-346、347-348。

[13] 〈毛澤東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的講話記錄稿〉(1958年5月17日），載李銳：《「大

躍進」親歷記》，頁350-351。

[14] 〈毛澤東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的講話記錄稿〉(1958年5月20日），載李鋭：《「大躍進」親歷記》，頁360-361。

[15] 〈毛澤東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的講話記錄稿〉(1958年5月20日），載李鋭：《「大躍進」親歷記》，頁356-358。

[16] 〈毛澤東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的講話記錄稿〉(1958年5月20日），載李鋭：《「大躍進」親歷記》，頁372-373。

[17] 中共八大二次會議的大會發言和小組討論的發言，均未在報刊上公開報導。此處所引小組討論和大會發言的內容，均錄自李鋭：《「大躍進」親歷記》，頁284-286，300-309，317-329，352-354，363-367。

[18] 《毛澤東傳（1949-1976）》，上冊，頁821-822。

[19] 1955年7月30日，全國人大一屆二次會議通過成立石油工業部的決議，時任解放軍後勤學院院長的李聚奎被任命為首任石油工業部部長。1958年，因李聚奎認為在現有條件下，石油產量難以在當年增加20%，實現由1957年的150萬噸提高到180萬噸的要求，於1958年2月調回總後勤部任政委。石油工業部部長由餘秋里接任。

[20] 李鋭：《「大躍進」親歷記》，頁329-337。

[21] 毛澤東：〈對陳雲在八大二次會議上的發言稿的批語和修改〉（1958年5月15日），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七冊，頁227。

[22] 范若愚：〈歷史最終會把一切納入正軌〉，載李琦主編：《在周恩來身邊的日子裏：西花廳工作人員的回憶》（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84），頁45-46。

[23] 周恩來：〈在延安歡迎會上的演説〉（1943年8月2日），載《周恩來選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頁138。

[24] 〈新華半月刊〉，1958年第11號，頁19。

[25]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紀要〉，（1958年6月22日），鄧小平手稿。參見《周恩來傳（1949-1976）》，頁1396。

[26] 毛澤東：〈對中央決定成立財經、政法、外事、科學、文教各小組的通知的批語和修改〉（1958年6月8日），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七冊，頁268-269。

四、為總路線掃清各方障礙

1.反中共黨內的「右派」

從1955年農業合作化反右傾引起的急躁冒進，1956年反冒進，1957年秋冬開始反反冒進，這場黨內兩種不同意見的分歧，在中共省級領導人中，有着同樣尖銳的反映。因此，在毛澤東狠批反冒進的同時，對這部分省級領導人進行批判、整肅也就理所當然。如果毛澤東斥責反冒進離右派只五十米，沒有把周恩來等領導人打成右派，但這一部分省級和有關部門領導人就在劫難逃了。[1]

毛澤東在1958年3月的成都會議上説：「與其你獨裁，不如我獨裁好」這句話時，就舉了各省、區黨委的例子。毛説：「現在各省也有這樣的例子：是江華獨裁，還是沙文漢獨裁？廣東、內蒙、新疆、青海、甘肅、安徽、山東省等地，都發生這樣的問題。」[2]又説，分兩種情況，一種有反黨集團，廣東、廣西、安徽、浙江、山東、新疆、甘肅、青海八省區有，要推翻領導，自己掛帥。也有另一種情況，像四川那樣的，是右派活動。是不是各省都大同小異，這是階級鬥爭的規律。階級鬥爭發展到這個階段，隱藏在黨內的資產階級分子一定會暴露出來，不出來反而是怪事。黨內思想動向值得注意。毛還説，地方主義者，實際是右派，是資產階級在黨內的代表。[3]

縱觀當年各省、區黨委揭發批判的省級領導人，除廣東省委書記、省長古大存，省委書記、副省長馮白駒從1950年代初就被扣有地方主義帽子，這時又被定為右派、反黨[4]以外，絕大多數是1955年夏季農業合作化反「右傾」中持不同意見者，少數是1958年「大躍進」發動起來以後，一些堅持不隨風起舞的人。中共浙江省委反對沙文漢（省委常委、省長）、楊思一（省委常委、副省長）的鬥爭開展得最早，[5]開了中共黨內把省級領導人打成右派分子的先河。緊隨其後的是安徽省委書記、副省長李世農；[6]甘肅省委常委、副省長孫殿才；[7]青海省委書記，省長孫作賓；[8]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書記處書記賽甫拉也夫，自治區黨委常委伊敏諾夫、艾斯海提；河南省委第一書記潘復生；[9]廣西省委常委、副省長陳再勵；[10]山東省委常委、副省長王卓如，副省長袁子揚；遼寧省委書記王錚，省委書記兼省長杜者蘅，省委書記、副省長李濤；[11]河北省委常委、統戰部部長劉洪濤；[12]雲南省委常委、省委組織部部長鄭敦，[13]等等，均被扣上了右派分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地方民族主義分子、反黨集團的帽子，被開除出黨。在省一級領導人中，以河南省反對原省委第一書記潘復生的鬥爭搞得最兇，在全省範圍

層層開展打倒「潘家店」的反右傾鬥爭。從當時公布的材料來看，被打倒對象的所謂罪行，主要分以下幾類：

(1)對**1955**年農業合作化反右傾持反對意見

安徽省委指責李世農：反對省委的反右傾決定，向黨發動猖狂進攻。誣衊省委提出反右傾之後，下面「搞得很糟」。說1957年大放大鳴期間，李世農公然攻擊省委的反右傾方針，否定反右成績，叫囂：「反右發生了偏差，省委要負主要責任」，講反右成績是主要的，這是個「老公式」。還散播「合作化後，已經沒有兩條道路鬥爭」，現在經濟基礎已經改變，今後鬥爭只是「新舊思想的鬥爭」，資產階級走社會主義的道路是「自己階級的志願」等等反動謬論，企圖以此取消階級鬥爭，取消無產階級專政。[14]

(2)反對農業合作化的急躁冒進，侵犯中農利益

廣西區黨委批判陳再勵等，從1956年6月中共廣西省第一屆第一次會議開始，就打着「反冒進」、「反主觀主義」的旗幟，極力詆毀農業合作化和農業生產取得的巨大成就，攻擊黨的領導進行破壞黨的團結的活動。到1957年6月，中央宣布處理廣西因災餓死人事件[15]時，他們在黨內檢查因災餓死人事件的會議上，硬把因災餓死人事件說成是合作化和糧食統購統銷政策所帶來的惡果，並進而全盤否定廣西工作成績，認為黨在農村工作上「犯了路線錯誤」，要求「重新估計農村工作」，要省委「肯定錯誤」。指責陳再勵「這一右派集團攻擊的首要目標，是1955年下半年到1956年上半年的農業合作化和伴隨而來的農業生產高潮」。「根本否定廣大農民實現社會主義農業合作化的迫切要求，把農民群眾的社會主義積極性說成是『強迫出來的』」。「竭力攻擊合作社，把合作社的生產說得一團糟，說合作社『只顧集體，不顧個人』，要求無限制地發展社員家庭副業，藉以瓦解合作社的集體生產，使農民從合作化的道路上倒退回去」。[16]

甘肅省委批判孫殿才說：「1956年，是我省大變革、大躍進、國民經濟全面高漲的一年。但是這個右派集團，不僅閉起眼睛否認這個事實，而且誣衊我們的工作是『一團糟』，是『今不如昔』。孫殿才視察銀川、吳忠地區時，只聽地主、富農和一些右派分子的反映，代表那些人把合作化誣衊得一無是處，甚至造謠說：『銀川種了六萬畝棉花，百分之九十沒有希望』，『京祖一零七（水稻良種）連種子也收不回來』，『複種的莊稼都沒結籽』。說社員『沒錢買油鹽洋火，幾家子點一盞燈』，『拉雙輪雙鏵犁，把婦女們身體搞壞了』。這個集團的其他成員說：『五百萬畝水地是六百條人命換來的』。『增產二十六億斤是省委虛報成績』，諷刺省委對1956年工作的估價是『阿Q精神』，『禿子頭上沒毛，還怕人家說光』。」「這個右派集團不僅百般反對社會主

義，而且極力保護資本主義。在羊群入社問題上，孫殿才、陳成義等拚命反對省委的意見，硬說羊群不是『生產資料』，而是『生活資料』。孫殿才在視察銀川、吳忠途中，到處指責下邊羊群入社搞得太快了，折價太低了，自留量太少了，分紅比例太低了。並且命令縣、區黨委限時給有些地主、富農退回羊子。他主張『三四十隻以下的羊群不入社』，入社時『三百隻以下的戶自留百分之五，三百隻以上的戶自留百分之十』，『不論大小，平均折價綿羊每隻十二元，山羊每隻八元』（高於當時一般折價一倍多）。對於分紅比例，他認為應該由三七分（私三社七）、四六分提高到對半分。」「1957年春，銀川地區的單幹戶有所謂『不賣糧、不交公糧、不出義務工、不開會、不挖渠、不買公債、不交水利費、不管國家大事』等八大自由，梁大鈞對此不僅不加過問，而且不同意省委進行批判。對於有引起群眾的倒販統購物資行為，也不予制止，並且提倡私人跑運輸，做買賣。在他的『社開大片、隊開中片、社員開小片』和『膠輪小車拴一輛，掙下錢來歸自己』的口號鼓舞下，資本主義在銀川專區一度自由泛濫。有些社員私人開荒十多畝，有些社員拆了房子買膠輪車，以致1957年銀川專區有十四萬畝水地、十八萬畝山地未種上，有些地方甚至麥子熟了無人收割。農業社的生產受了很大影響。」[17]

(3)對1956年農村鬧社風潮的處理，反對用專政的辦法，主張要照顧農民利益

河南揭發潘復生的問題，主要是1956年農業合作社高級化以後農村出現鬧社風潮，潘不贊成用專政的辦法，主張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指責潘在1957年6月25日公開發布的「關於獎勵發展農業生產，爭取秋季大豐收的宣傳要點」，是「發展資本主義的綱領」。其基本精神，是鼓勵和支持了富裕中農退社、鬧社的資本主義思想；片面地提倡和獎勵私人開荒、植樹、繁殖耕畜、大量養豬，擴大自留地，提高糧食留量標準，發展個人家庭副業，強調開放自由市場等，企圖以發展私有經濟，損害社會主義經濟的辦法來刺激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並上綱為「否認階級鬥爭，否認兩條道路鬥爭，製造階級鬥爭熄滅論」；「反對合作化，反對糧食統購統銷」；「和右派裏外呼應向黨進攻」；「欺騙中央，與中央的正確路線相對抗」。將潘定性「是一個披着馬列主義外衣隱藏在黨內進行反黨反社會主義活動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18]

(4)反對社會主義改造中違犯民族政策

青海省委批判孫作賓的「罪行」，列舉的主要事實是：「他們反對社會主義，反對對畜牧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他們要『採取別的方法，不走合作化的道路而解決牧業區的私有制』，直接與黨中央確定的『依靠勞動牧民，團結一切可能團結的力量，在穩步發展畜牧業生產的基礎

上，逐步實現對畜牧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這一正確方針相抗衡。」指責孫作賓利用1956年中央指示檢查民族政策執行情況，乘機向黨進攻。在1957年初由孫主持的本省民族統戰政策執行情況的檢查中，大做其反黨文章；攻其一點，儘量誇大，不及其餘。一口否定黨在青海地區幾年來所取得的人所共知的偉大成績，別有用心的專找缺點和『陰暗面』，到處煽風點火。孫作賓儼然以『統戰專家』『少數民族的救星』自居，污衊省委『不管大事』，『不管民族政策』，企圖推翻省委領導。」[19]

(5)對總路線、大躍進持有不同意見

遼寧省委揭發批判「王錚為首的反黨宗派活動」，是在「大躍進」高潮時期的1958年10月間進行的。指責王錚等人反對黨中央的工會工作方針，有「嚴重的經濟主義和工團主義的反動思想」。「對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對水、肥、土、種、密加田間管理的重大方針執行不力。」在成都會議之後，「公開反對中央的工農業並舉方針」。「不執行中央發展工業的大中小相結合的方針，只抓大的、洋的，不抓小的、土的，使我省地方工業的發展受到很大的影響。」[20]10月31日，《遼寧日報》發表題為〈插紅旗，拔白旗，開展全省翻身運動〉的社論説：為甚麼在全國轟轟烈烈大躍進中，遼寧僅有一般進步而沒有大躍進？為甚麼各種條件都很好而不能爭得上游？當然原因很多，最根本的原因是王錚為首的反黨宗派活動。他們抗拒中央某些重大方針政策，反對和抵制黨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的若干基本點，反對大、中、小結合，反對工農業並舉，不執行毛主席的農業「憲法」。「這是一場思想戰線和政治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的尖鋭鬥爭，拔掉了他們這面大白旗，插起了共產主義的紅旗，取得了保衛黨、保衛社會主義、保衛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偉大勝利，將對遼寧省的各項建設事業發生深遠的影響，為遼寧省翻身運動打下良好的基礎。」[21]

以上表明，相當多數被打成右派、反黨分子的主要「罪行」，是由1955年夏季反對農業合作化中的「右傾」引起省委內部的意見分歧。由於1956年春到1957年夏，中共中央針對社會主義改造急速發展引起的混亂，曾着力解決農業合作化引起的農民與合作社、合作社與合作社、農民和國家、合作社和國家之間的矛盾，調整了若干與農民（牧民）利益相關的政策，使黨內對反右傾持不同意見的一方重新佔了上風。但到1957年反右派鬥爭，把因對糧食統購統銷和農業合作化有意見的人，視為向黨、向社會主義進攻，定為「資產階級右派」，並重申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是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以後。1956年堅持按《論十大關係》、「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和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的方針行事的領導人，就被認為是一直在向黨開「頂風船」了。沙文漢、李世農、孫殿才、孫作賓、潘復生等正是這種「不識時務」的省級領導人。

廣西的陳再勵等人想以中央處理廣西餓死人事件為契機，藉以糾正省委領導工作中的「左」傾錯誤，顯然又與正在批「反冒進」，發動「大躍進」的大氣候不合。遼寧省委對王錚等人的批判，更是為了給遼寧不旺的「大躍進」之火添上一把「柴」。1958年的「大躍進」，正是伴隨着對黨內持正確意見的領導人進行不斷打擊而發動起來的。

說1958年中共黨內的反右派，是為「大躍進」掃清障礙，並非是用今天的眼光強加給歷史。當年《人民日報》發表曾希聖在省委擴大會議的總結發言時，編者按語就是這樣評價的。編者按讚揚：

> 安徽省委第六次擴大會議揭露李世農反黨集團，是我們黨在整風運動中的一個巨大勝利。經過這次會議，不只清除了隱藏在安徽黨組織內的一窩右派分子……而且通過大鳴大放大辯論，有力地批判了黨內各種錯誤思想，大大提高了黨內的思想水準，端正了兩條道路鬥爭的政治方向。安徽省委第一書記曾希聖同志在這次會議上的總結發言……對於如何正確地認識和執行黨的路線和政策，如何加強黨的團結，如何學會和暗藏的敵人作鬥爭，如何掌握整風方法改進我們的思想和工作作風等等重大問題，都作了很好的論述。[22]

後來的事實證明，凡在這場反對省級領導右傾反黨鬥爭中搞得兇的地方，1958年的「共產風」，「浮誇風」、「平調風」颳得也愈兇，造成的後果也更嚴重。河南、安徽、廣西均是如此。

2.敲打軍隊高層將帥

毛澤東指示軍隊整風

1958年夏，中共中央軍委舉行的擴大會議，史家一般稱之為反教條主義的會議。其實，這並不是毛澤東指示軍隊整風的最初主題。早在1958年1月21日，毛澤東在南寧會議的结論中講到軍隊問題時説：

> 黨委要抓軍事。軍隊必須放在黨的領導和監督之下。要好好同軍事工作方面的同志們商量。一年抓四次。在整風中，建議軍隊拿幾天時間討論一次朱可夫所犯嚴重錯誤的問題，此事由軍委發出指示和有關朱可夫錯誤的材料，吸取蘇聯的教訓。[23]

在3月的成都會議期間，毛澤東講到建國後學習蘇聯，出現了教條主義的錯誤。毛在3月9日的講話中說到：建國後學習蘇聯出了教條主義，「忘記了歷史上教條主義的教訓。歷史教訓就是理論要和實際結合，理論從實踐中來，又到實踐中去。建國後，這個道理沒有用到經濟戰線上」。又說：「軍事系統也受此災難，規章制度訓練部門搬得多。」[24]3月10日，又說：「全國解放後（1950年到1957年），在經濟工作和文教工作中產生了教條主義；軍事工作中搬了一部分教條，基

本原則堅持了，還不能說是教條主義。」[25]

4月8日，毛澤東在武昌會議上講到黨的領導問題時強調：黨要抓工、農、兵、學、商、思六大問題。今年都要抓。7月再談一次，可以在一個地方，分兩批談。4、5、6三個月抓工、商、學，結合抓軍隊。7月以後秋季再著重抓軍隊。要教育軍隊，不要像匈牙利軍隊一樣爛掉了。[26]

毛澤東的上述多次講話表明，關於學習蘇聯犯了教條主義，他認為問題嚴重的是經濟和文教戰線；至於軍事工作中的教條主義，他看得並不怎麼嚴重，反而說軍隊「基本原則堅持了」。可見，毛認為軍隊要突出解決的問題是，要吸取蘇聯朱可夫所犯錯誤的教訓，防止像匈牙利軍隊一樣爛掉了；其次才是教條主義的問題。矛頭指向，是向軍隊高層將帥敲警鐘，要他們牢記「黨指揮槍」的原則，不得居功自傲。

軍委會拿粟裕開刀

成都會議曾根據毛澤東的建議作了《中共中央關於軍事工作的決議》，「建議軍委召集一次擴大會議，用整風方式，討論軍事建設中的重要問題，統一認識，提高覺悟，並在這個基礎上使各項工作得以貫徹」。[27]據此，1958年5月27日，中共中央軍委擴大會議在北京舉行。會議一開始，首先把矛頭指向高級將領的「個人主義」。

彭德懷作為中央軍委日常工作的主持者，決不會認為毛澤東要軍隊將帥接受朱可夫事件的教訓，是包括他在內的。因此，理所當然地要尋找不服從他領導的人，這便是時任總參謀長的粟裕。

粟裕，是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功赫赫的名將。1946年，根據中共中央的決定，粟裕就在陳毅領導下，挑起了華東戰場戰役指揮的重任，並多次向中央軍委提出具有戰略意義的建議，為中央軍委和毛澤東採納，對奪取解放戰爭在全國的勝利具有重大影響。在1955年被授予大將軍銜的十名大將中，粟裕名列第一，绝非偶然。1951年11月，中央軍委任命粟裕為總參謀部第二副總參謀長；1954年10月，粟裕被任命為總參謀長。

粟裕就任第二副總長時，總參謀長徐向前因病在治療休養，由第一副總參謀長聶榮臻代總參謀長。1952年7月，彭德懷接替周恩來主持中央軍委日常工作。粟裕在聶、彭二帥領導下工作，難免發生不同意見的碰撞，以至個人之間的誤會。[28]

5月24日，彭德懷在預備會議（又稱小型會議）[29]上就會議的主題講話說：

> 我們是人民的軍隊，過去的任務是打破國民黨的國家機構，現在要保衛人民的國家機構，這就要解決人民軍隊的三大問題：一是建軍原則，包括黨的領導，軍民關係，軍隊內部關係等問題。二是建軍方針，原先的方針是現代化、正规化，後來主席提出建設優良的现代化革命軍隊，這兩個方針在1954年春高幹會文

件中，我們同時都用過。現在看來，只提出现代化、正規化的方針，就可能產生否定我軍優良傳统的偏向，事實上也一度產生過，不如提建設優良的现代化革命軍隊好。大家可以考慮。三是戰略方針問題，它關係着軍隊三大方面的工作：關係着戰爭準備，關係着組織編制和各軍、兵種建設的重點，關係着訓練和科學研究。我們這次會議最根本的目的，就是要把這三方面的問題搞一致。在這種一致的基礎上，其他的不一致就比較好解決了。[30]

時任軍委秘書長的黃克誠回憶説，彭德懷在開幕式上強調：會議主要任務是整風、整編，方式是大鳴放、大爭辯。[31]

為解決好黨的領導問題，在5月26日的小型會議上，軍委責成粟裕就所謂「總參與國防部關係」等問題作檢討。27日，會議正式開幕，會上就所謂「總參與國防部關係」問題，強加給粟裕「一貫反領導」、「向國防部要權」、「告洋狀」等罪名。[32]迫使粟裕在會上進行檢討。

批粟裕，毛澤東最初是表示支持的。5月30日，黃克誠傳達毛澤東的指示：「把火線扯開，挑起戰來，以便更好地解決問題。」[33]彭德懷在會上説：朱可夫事件就暴露了蘇軍在（不少地方違背列寧建軍原則）這方面的弱點。……我們所以要嚴肅地批判教條主義，就是為了把我軍優良傳統牢固地傳下去。不然的話，當我們這批老的骨幹逐漸死去以後，我軍就可能有像匈牙利軍隊那樣變質垮台的危險。[34]

於是，會議從6月7日起，擴大到全軍軍以上單位和部分師級單位的主要領導幹部，人員增加到一千四百多人。大會的主持者，既不顧歷史的基本事實，也不願聽粟裕的説明，批判粟裕的調門一再升溫。但是，粟裕終究不是毛澤東預先設定要整的對象。有一次毛澤東找蕭勁光談話，問蕭對粟裕的看法。蕭勁光説：「粟裕同志為人正派，沒有二心，是好人。」毛點頭表示贊同。就在粟裕第二次在大會作檢討之前，毛澤東為粟裕説了一段話：「粟裕同志戰爭年代打仗打得好，是為公的。到北京以後是為公還是為私？不能説都是為私吧！請大家來判斷。」[35]

7月14日，粟裕在大會上作第二次檢討，把別人強加的罪名，差不多都認了下來，才算基本過關。8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解除粟裕總參謀長職務」，並決定將他的「錯誤」口頭傳達到軍隊團一級、地方地委一級。[36]

方強上書與會議轉向

就在大會批判粟裕不久，時任海軍副司令員、海軍學院院長方強，於5月29日就會議的開法給會義主席團寫了一封信，闡述了自己的意見。信中説：

> 這次軍委擴大會議，確定了整風和整編兩個內容，要解決軍

隊建設中的思想問題，以求得認識上的統一，會議採取大鳴大放、大辯論的方法都是對的。但這次整風的指導思想是甚麼，要解決哪些主要的思想問題，解決甚麼主要矛盾，還須有明確的必要，否則會議就開不好。我認為這次軍委擴大會議，應當解決我軍當前建設中的主要矛盾：即一方面我們要建設一支現代化的優良的革命軍隊：另一方面在各項工作中還或多或少存在着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阻礙我軍的發展。建議這次軍委擴大會議的指導思想應當是認真貫徹黨的八大二次會議精神，在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總路線的指導下，以反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為綱，检查軍隊各方面的工作。

……

我們軍隊曾有過一個時期，有這樣一種趨向，只強調正規化，不重視發揚我軍的光榮優良傳统；只強調業務技術，不強調政治；只講集中，不重視民主；只講學習蘇聯（這是必要的），不注意總结自己的經驗；只強調首長教育部屬，不走群眾路線，不講我軍官兵互教的優良傳统方法；只講紀律服從，不講政治自覺；只講遵守規章制度，不注意發揚群眾的創造精神和積極性；只講軍銜等級，不講或少講官兵政治平等……。這種種，使我軍的一些優良傳統，在某個時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削弱，甚至使我軍某些根本制度發生過搖擺。[37]

6月5日，毛澤東對方強的信寫了以下批語：[38]

此件寫得很好，提出了問題，彭、黄、鄧看後還我。我暫時不宜於講話，先要讓他們把問題都放出來。過幾天，我準備找各小組長分別談一下，調查一下情況，摸一下底。

毛在方強信中說到，建軍方針、建軍路線、戰略方針都是正確的，不存在甚麼根本性的問題處批道：「不存在問題麼？」在信中講到不重視發揚我軍的光榮優良傳統處，毛批道：「一方面有優良傳統，另一方面，就整個歷史説來不佔全軍統治地位的另一個惡劣傳統是存在着，即非馬克思主義的，有時是反馬克思主義的傳統，例如教條主義，軍閥主義。」

毛還就此寫信給主持會議的彭德懷和黃克誠（並指示閱後退鄧小平）說：

有些同志對會議的開法感到不滿。此事容易，調整一下就好了。振起生氣，大有可為。请小平商彭黃召集七八個同志經常談一下，似可不必開小型會，只開大會和小組會。如何，請酌定。

6月7日，毛澤東又專給鄧小平寫信[39]説：

6、7兩月份，你應做兩件事：（一）第二個五年计劃的布局，如你自己所提的；（二）幫助德懷同志將軍事會議開好，開鍵是本月一個月，宜與彭等少數同志每三天商量一次。大事抓起

來幹，多快好省。

這樣，軍委會議的主題才由批判粟裕的個人主義轉向反對教條主義。

關於1958年軍委擴大會議把反對教條主義作為會議的中心主題，林彪在1959年8月31日軍委擴大會議第一綜合小組會上的發言中説，去年軍委擴大會議反教條主義的情況，他記得很清楚。在軍委擴大會以前，彭德懷的態度是不明確的，當時軍委擴大會議馬上就要開，但並沒有確定以反教條主義為主題。在他看到訓練總監部關於對反教條主義爭論的材料以後，就認為這個問題很重要，應該以這個為主題。於是他就把這個情況報告給毛主席，毛主席認為應該開展這個鬥爭。林彪説：

> 這才有去年以反教條主義為中心的軍委擴大會。這個會議是多少年來第一次大規模的會議，會後軍隊思想才有一個大的轉變。中央、主席有決定，彭德懷才有180度大轉彎來領導這個會議。[40]

林彪這番話説明，是他的意見才使毛澤東下決心扭轉了會議的主題。但從現有材料來看，直接引出毛澤東指示會議轉向反教條主義，是方強寫給大會主席團的那封信。

6月9日下午，黃克誠傳達毛澤東的指示説，主席對我們的會議決心很大，開不好，大家就不要走。會議要擴大範圍。每個師的黨委書記都來（軍分區的不來）。黃還傳達了毛澤東講的一個理論問題，説：

> 教條主義不懂得社會存在決定人的意識，意識又反過來影響（推動）社會存在。大國有大國的憲法，小國有小國的憲法，教條主義卻不承認這條真理。蘇軍條令、規章制度，是在蘇聯土壤條件中產生的，這些人不承認中國的社會（客觀）存在，不承認中國有它特殊的東西。[41]

根據毛澤東的意見，鄧小平開始直接過問這次軍委會議。反教條主義開始成為會議的中心議題。對此後會議的發展，黃克誠回憶説：

> 中央委託鄧小平召集各位元帥開會，認為軍委擴大會議溫度不夠高，決定採用整風方式開會，會議發言與大小字報相結合，一周內使空氣緊張起來。

毛主席召集主席團和組長座談，指出：這次會議主要是打倒奴隸思想，埋葬教條主義，大鳴大放，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吸取教訓，着眼於團結全黨、全軍。會議中，整風、反教條聲勢日大，整編已提不上日程。[42]

軍隊高層在會前的不同意見

軍隊開展反對學習蘇軍中出現的教條主義，始於1956年蘇共二十大以後。但在對具體程度和影響的估計上，軍隊上層明顯存在着兩種不同

的意見。

「一定要將蘇聯的一切先進經驗都學到手，改變我軍的落後狀態，建設我軍為世界上第二支最優良的現代化軍隊」。[43]「應該在全國掀起一個學習蘇聯的高潮，來建設我們的國家」。[44]都是由毛澤東親自提出的。這對長期在農村游擊環境中成長起來的人民解放軍幹部來說，是一個很大的轉折，不少人本能地反映出一種抵觸情緒。政治上一生謹慎，時任軍事學院院長兼政治委員的劉伯承，在建院之初，根據毛澤東的指示精神和軍隊幹部的實際情況，對學院的訓練工作就非常明確地提出「反對經驗主義，防止教條主義」的指導方針。在1956年6月，中共中央發出「克服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和外國經驗中的教條主義傾向」的有關指示以後，劉伯承當即領導檢查建院五年多來在學習蘇聯軍事科學中，出現的某些教條主義傾向，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

這時，一位在軍事學院學習的戰役系學員寫信給彭德懷，認為在向蘇軍學習中，學院在教材、教學方法，對待我們的經驗的態度以及其他方面，「也產生了教條主義傾向」。因而，對學院提出的「反對經驗主義，防止教條主義」的這一帶方針性的口號提出質疑。[45]不久，軍事學院戰史教授會主任蔡鐵根[46]致信中共中央總書記鄧小平，對向蘇軍學習的問題談了自己的看法。蔡的基本觀點是：蘇聯軍事科學是一個完整的系統科學，只有全部學會、學通，融會貫通之後，才談得到批判。我們在學習和運用蘇軍這一整套的時候，卻往往是割裂開來，隨意取捨。結果弄得四分五裂，驢唇不對馬嘴。還美其名曰「批判地接受」。最後執行不通，不說自己學習上有問題，還說蘇軍的東西不適合我軍的情況。蔡認為：「這不是一個小問題，而是一個不容忽視的重大問題，是一個關係着建軍思想和軍事路線的問題，是直接關係着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安危問題。」建議中央和軍委給予重視。[47]彭德懷將蔡鐵根的這封信立即批示印發：軍委主席、委員及總參謀長、副總參謀長、各部首長、國防部各副部長閱。

為了解軍事學院是否犯有教條主義。主管全軍院校工作的副總參謀長張宗遜，率領工作組到南京，在軍事學院和總高級步兵學校召集多次座談會，隨後寫了一份調查報告。報告在肯定幾年來院校學習蘇軍經驗取得成績的同時，指出學習中有片面性，把許多不適用於中國軍隊的東西也學來了。[48]彭德懷看了張宗遜的報告，感到軍事學院的問題，很有必要親自去進行了解，以便着手解決。在得到毛澤東同意[49]後，彭德懷、陳賡、譚政於1957年2月27日率領總參謀部和總政治部工作組一行到達南京。彭在軍事學院聽取學員、各級領導及機關幹部的匯報後，3月2日與學院領導幹部（劉伯承院長在上海休養，缺席）談了對學院教學工作的意見。彭德懷回到北京後，將在軍事學院的講話作了斟酌修改，向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央軍委寫了專題報告。

報告説：「軍事學院自1950年成立以來，經過全院同志的積極努力，克服困難，取得了許多工作成績。」「但是在過去幾年的教學中，存在一個很大的缺點，就是教學工作中的教條主義相當嚴重。」報告認為:（學院）「在成立了六年多之後，對於结合我國我軍的實際情況進行教學，仍然沒有引起應有的重視。特別是經過1956年9月全院學過五個整風文件，學院中的許多同志已經感到有反對教條主義必要之後，而院黨委仍然徘徊、猶豫、拖延，未能下定決心，就使黨委領導在教學工作上落後於客觀實際了。」[50]

軍事學院黨委對彭德懷報告中，不顧軍事學院的基本事實，給學院戴上「教條主義相當嚴重」的帽子，以及不提學院在學習中央規定的五個文件、反對教條主義中工作有何改進，有何成績，而得出軍事學院黨委對反對教條主義「仍然徘徊、猶豫、拖延，未能下定決心」的結綸，顯然難以接受。學院黨委召開擴大會議作出的《關於深入開展反對教條主義的決定》，對彭德懷報告中關於教學工作教條主義相當嚴重的批評，委婉地陳述了自己的看法。即肯定「學院成立以來的工作成績是基本的、主要的」，缺點和錯誤的性質是「在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和外國經驗中的教條主義傾向」。[51]

對軍事訓練工作中的教條主義錯誤如何估計，在主管全軍訓練工作的訓練總監部內部也出現兩種意見。一種意見認為：「軍事學院是教條主義的大本營」；「訓練總監部是教條主義司令部」。時任訓練總監部副部長的蕭克則持另一種意見。他在回憶錄中寫道：

> 我對那種認為教條主義是訓練和教學工作中主要傾向的觀點，是不同意的，特別是把軍事學院冠之以「教條主義大本營」的説法，不滿意。我認為，工作中有缺點、有錯誤，可以批評，可以糾正，但不能誇大事態。[52]

蕭克接着寫道，他對彭德懷在紀念蘇聯紅軍建軍三十周年大會上作報告（徽求意見稿）中一段「否定正規化和現代化兩個口號的説法不大贊同」。於是，就給彭寫了一封信。「信中寫到：『我們過去提出這個口號對不對？我認為是對的。……在執行這一口號中，有若干同志產生錯誤認識和產生一些偏差，這是必須批判和堅決糾正的，因此建議將批評的火力集中在這些傾向方面，而不要批評口號本身。』……誰知，這封信在反教條主義後竟成了我向彭老總進攻的罪證，説我是『挑刺挑到國防部了』。」[53]

1958年3月，訓練總監部召開機關四級幹部會議。會上，對批評「軍事學院是教條主義的大本營」、「訓練總監部是教條主義的司令部」持不同意見的一方佔了上風，並對原訓總副部長張宗遜（時任副總參謀長）開展尖鋭批評，[54]並將他作為「保守主義」的代表進行批判。在會議快要结束的時候，總政治部派來了由組織部長劉其人任組長

的工作組，明確表態：訓練總監部是搞教條主義的。並宣布：「訓總的四級幹部會，是向黨進攻的會，因為反對張宗遜就是反對彭總，就是反黨反中央。」[55]於是，會議轉向反對教條主義。這是軍隊內部在反對教條主義問題上，兩種不同意見的一次正面交鋒。

但是，曾主持訓總工作多年的葉劍英對此並未理會。4月8日，他在軍事學院全院教職學員大會上發表講話，對軍事學院工作中的成績作了充分肯定，反對給軍事學院戴教條主義的帽子，並主動承擔責任。他說：「有人說學院是教條主義的頭頭，但應該說，全軍包括院校和部隊都有教條主義的成份，當然不必按上一個教條主義的帽子。過去軍事訓練中出現教條主義傾向，主要責任在領導。訓總首先應作自我批評，不要把責任推到底下，因為我們照搬、照翻、照印、照發，毫無疑問你們底下只好照辦，我們四照，你們只一照。」[56]這是在軍委擴大會議之前，葉劍英的一次鄭重表態。

劉伯承、蕭克成了鬥爭重點

軍委擴大會議的重點，正式轉向反教條主義，是6月20日。這一天，擴大會舉行全體大會，正式出席的1004人，列席的438人，大會主席團由三十二人增加到四十一人。彭德懷代表主席團首先講話，一開頭就提出了兩條軍事路線鬥爭，從戰爭年代教條主義的危害，講到全國勝利後軍事教條主義的復活，反對毛澤東建軍思想和戰略方針，一下子就把問題上了綱。彭德懷還帶着情緒說：「我這個人是沒有學問的，是丘八學校和農民學校出身的，出身寒微，是難以使人信服的。就是他們所說的，反教條主義的人都是沒有學問的。在這方面我有自卑感。」[57]

在軍委擴大會議期間，毛澤東先後作了三次講話。[58]6月21日，在全體會議講話說：

> 他這幾年對軍事沒有抓。軍事工作基本上做得好，有成績，也有缺點。軍委有責任，中央也有責任。大家對軍委、對彭德懷的批評，也就是對他的批評。

關於教條主義問題，他說我軍有兩種傳統，一是優良傳統，一是錯誤傳統。一是馬克思主義傳統，一是非馬克思主義傳統。解放後又出現教條主義，看來有一點，分量可以研究。說完全沒有，是不妥當的，不加分析的搬外國，是妄自菲薄，不相信自己。

23日，毛澤東召集軍委委員和各組組長舉行座談。他多次插話說：

人民解放軍有沒有教條主義呢？我在成都會議上說過，搬是搬了一些，但基本原則堅持下來了。現在有四（三？）種說法：一種說沒，一種說有，一種說相當多。說沒有教條主義是不符合實際的。究竟有多少，這次军委會議要實事求是地加以研究，不要誇大，也不要缩小，要堅持真理，修正錯誤。學習蘇聯的方針是堅定不移的，因為它是第一個

社會主義國家，但一定要有選擇地學，因此就要堅決反對教條主義，打倒奴隸思想，埋葬教條主義。

十大軍事原則，是根據十年內戰、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初期經驗，在反攻時期提出來的，是馬列主義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戰爭實踐相結合的產物。運用十大軍事原則，取得了解放戰爭、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當然還有其他原因）。十大軍事原則目前還可以用，今後有許多地方還可以用。但馬列主義不是停止的，是向前發展的，十大軍事原則也要根據今後戰爭的實際情況，加以補充和發展，有的可能要修改。現在「小米加步槍」的經驗還是重要的，新的沒有，就把「小米加步槍」否定了是錯誤的。當然，停留在舊階段也是不對的。

現在學校奇怪得很，中國革命戰爭自己的經驗不講，專門講「十大打擊」，[59]而我們幾十個打擊也有，卻不講。應該主要講自己的，另外參考人家的。

在29日召集的各組組長座談會上，毛澤東批評軍事學院和訓練總監部說：不知道軍事學院、訓總到底有多少馬克思列寧主義。馬列主義本來是行動的指南，而他們當作死條條來啃，馬克思、列寧在的話，一定批評他們是教條主義。並點名批評了劉伯承和蕭克，指責他們犯了教條主義錯誤。說：「蕭克同志的錯誤是嚴重的。過去沒有這樣的時機開這樣大的會議，今天有了這個時機，我們可以挖挖教條主義的根子。」毛澤東說：「蘇聯打敗過十四個帝國主義國家的干涉，那很久了。蘇聯有二次世界大戰的經驗。我們打敗過蔣介石、日本帝國主義、美帝國主義，我們有豐富的經驗，比蘇聯的多，把自己的經驗看得那麼不值錢是不對的。（林彪插話說：我們的經驗很豐富，不要把黃金當黃土甩掉了。）要以我為主，學習別人的先進經驗。」毛強調：這個會議主要是打倒奴隸思想，埋葬教條主義，以整風方式大鳴大放，破除迷信，提高思想，吸取經驗教訓，主要是教育全黨全軍，團結全黨全軍。因此，會議上可以指名批評。

會議根據毛澤東的指示精神，採取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的方式，批判軍隊工作中的所謂教條主義路線、資產階級軍事路線、反黨宗派活動等等，開展所謂的兩條軍事路線的鬥爭。先後點了蕭克、李達、陳伯鈞、宋時輪、粟裕、葉劍英、劉伯承的名。

7月10日，劉伯承不得不抱病到中南海懷仁堂的大會上作檢討。蕭克也作了檢討。但會議的鬥爭氣氛，愈來愈猛。給蕭克、李達戴上了「反黨宗派集團」的帽子，說他們是「有計劃、有組織地向中央、軍委的正確路線猖狂進攻」。軍委訓練總監部軍事科學和條令處原處長蔡鐵根在會上說明，「共同條令是經彭總修改、軍委例會通過和毛主席批準的」，話未說完，竟被當場摘掉軍銜和帽徽，連轟帶扭，趕出會場，關押起來。[60]

7月19日，彭德懷作會議總結。他説：「在軍事訓練部門和某些院校中，極少數同志具有資產階級的軍事思想，他們一直堅持反馬克思主義的軍事路線，抗拒中央和軍委關於反教條主義的指示，嚴重地阻礙了反教條主義運動的開展。其中，蕭克同志，不僅一貫堅持资產階級的軍事路線，反對馬克思主義的軍事路線，而且從極端嚴重的资產階級個人野心出發，進行反黨反領導的宗派活動，企圖以他的面貌來改變我們人民軍隊的面貌。」「錯誤的軍事路線產生的主要根源是：過渡時期，资本主義和社會主義，资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兩條道路，兩個階級的鬥爭，在我軍內部的反映。」[61]

7月22日，大會通過《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擴大會議決議》説：「訓練總監部和一些院校，教條主義傾向直到最近仍然佔着統治地位。而且某些個別同志，還堅持了一條與黨的軍事路線相對抗的资產階級的軍事路線。」「現在我軍中兩條軍事路線的鬥爭，基本上是我軍歷史上正確路線和錯誤路線的鬥爭在新條件下的反映。」「這樣兩條軍事路線的鬥爭，貫穿着我軍三十多年的歷史」，「目前軍隊中的錯誤軍事路線，實際上是歷史上的錯誤路線在某些範圍內的復活」。「錯誤路線可以在受過歷史裁判以後捲土重來，在一段時間和一些部門、一些單位中可以横行無忌，俘虜群眾，甚至有計劃有組織地向中央和軍委的正確路線猖狂進攻，這就證明，兩條路線的鬥爭是一個長期的艱苦的過程。」《決議》要求：「目前的鬥爭必須在全軍認真開展」。會議通過《關於處理蕭克同志所犯錯誤的決議》説：「本會議對蕭克同志的錯誤，暫不作最後結論」，待大會閉幕後在軍委、總政治部的領導下，進一步徹底揭發檢查後，再作結論。[62]

此後，由總政治部派出工作組到訓練總監部，指定訓總組成新的臨時黨委，舉行由二百多人參加的部黨委擴大會議，把蕭克、李達、郭天民三個部領導及李鍾奇、吳偉、趙凌漢、葉楚屏，杨力勇、李文芳，王波、劉光第、王時彥、陳绪英等人打成「反黨分子」。隨後，總政治部向中共中央寫了《關於以蕭克同志為首的資產階級軍事路線和反黨宗派活動》的報告，給蕭克、李達作了：一貫堅持「資產階級軍事路線」，「公開抗拒中央關於反教條主義的指示」，「有組織、有計劃地向黨的正確路線開展猖狂進攻」，以及「卑鄙的野心家和軍閥主義」的結論。與之同時，高等軍事學院和軍事科學院舉行兩院黨委聯席擴大會議，對劉伯承、陳伯鈞、宋時輪等進行揭發批判，並作結論説：「過去南京軍事學院成立以來所犯的资產階級軍事路線的錯誤。這條錯誤路線在较長時間內和中央正確的軍事路線相對抗，是我軍歷史上兩條路線鬥爭在新條件下的反映。這條錯誤路線統治學院數年之久，在軍事訓練和科學研究中表現最為嚴重，其影響遍及全軍，其發生發展過程是由盲目到自覺，由實際工作中的錯誤發展到路線錯誤。」[63]

這樣，這場反教條主義的鬥爭，就在實際上把從1953年以來，軍隊轉入正規化、現代化建設的成績一概抹殺了。一大批為軍隊正規化、現代化建設做出貢獻的幹部受到殘酷鬥爭，無情打擊，[64]整個人民解放軍的建設也隨之轉向。在政治掛帥的口號下，搞軍事訓練被斥為「资產階級單純軍事觀點」；強調大打人民戰爭，使諸軍兵種聯合作戰的協同訓練受到削弱；培養現代化軍政指揮員的軍隊院校工作，受到嚴重打擊。因而，使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現代化建設進程，延誤了一個時代。

對毛澤東而言，這次軍委擴大會議，是否實現了他要軍隊將帥接受「朱可夫事件」教訓的初衷，後人無法猜測。[65]但從強化毛澤東和毛澤東軍事思想在軍隊不可動搖的地位來說，這個目的是達到了的。

3.全總批右傾機會主義

就在中共中央提出十五年趕超英國，全國各省市大搞農田水利建設的群眾運動高潮迭起的時候，全國總工會在整風中，卻提出要糾正工會成為「行政的尾巴」的傾向，要照顧工人合理的切身利益等問題。這無疑被認為，與加強黨的一元化領導、與正在興起的發揚「共產主義風格」的「大躍進」是不相容的。於是，在全國總工會系统，又展開了一場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鬥爭。

《中共中央關於工會組織問題的意見》，[66]是1958年3月22日在成都會議通過，4月2日經中央政治局批準同意的。其主要目的，是把各級工會置於同級黨委的領導之下。該《意見》稱：

> 為了便利工作，精簡機構，更好地發揮工會組織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的積極作用，各級工會組織應該以由同級黨委領導為主，同時接受上級工會的領導。各省、市、自治區工會聯合會可以考慮改為省、市、自治區總工會。產業工會的組織也應該作適當的調整；有的可以保留；有的可以適當合併；有的可以保留名義，實際上成為各級工會的一個部門；有的可以取消。
>
> 建議全國總工會黨組根據具體情況和工作需要加以研究，提出具體措施，報中央批準。

要整頓組織，必先整頓思想。就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結束不幾天，1958年5月26日至8月5日，中共全國總工會黨組舉行第三次擴大會議。關於此次會議的基本情況，會議決議中說：會議是按照中央指示的方針，在中央的直接領導下進行的。會議徹底檢查了全國總工會的工作，開展了敵我鬥爭和兩條路線的鬥爭，樹起了紅旗，拔掉了白旗，劃清了大是大非，端正了工會工作的政治方向……。會議除了把全總的工作人員陳用文（《工人日報》社長）和秦達遠（全總書記處辦公室主任）劃為階級異己分子、修正主義者和反革命分子進行鬥爭外，主要揭發批判

了全國總工會主席賴若愚的所謂嚴重右傾機會主義錯誤。指責賴若愚：「反對黨對工會的領導，向黨向政府爭奪權力，篡改黨的工運方針，崇拜工人的自發運動；他們披着馬列主義的外衣，運用詭辯的方法，在一系列問題上進行反黨、反中央的宗派活動。」[67]那末，這場鬥爭是由何引起的呢？

一向以維護工人利益為己任，團结工人向資本家、向北洋軍閥、國民黨反動统治和帝國主義進行鬥爭的工會組織，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後，其社會地位、作用以及與共產黨和行政的關係等就是擺在面前的新問題。其中帶有根本性質的是，工會在接受共產黨領導的同時，是否具有自己組織上的獨立性；在肯定工人利益與國家利益一致的前提下，是否承認也存在着矛盾；工會在調節工人與行政的矛盾中，是否有維護工人利益的責任。歸结到一點，工會的主要任務是甚麼？維護工人的權益是否還應是工會的主要任務？

早在1950年7月，時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三書記的鄧子恢，鑑於當時工會工作脫離工人群眾，公营工廠中有些工會組織不重視維護工人群眾的正當利益，放棄工會應有的獨立的主動的工作等情況，明確提出，公營企業中的工會工作者與企業行政管理人員、政府工作人員之間，在「基本立場」一致即雙方都是為國家、同時也是為工人自己的利益服務這樣的前提下，在「具體立場」上仍有所區別。他們各自的工作崗位、任務不同。即在公營工廠中，工會仍有「代表工人利益」、「保護工人群眾日常切身利益」的基本任務，而不能脫離這個基本任務，形成為「廠方的附屬品」。[68]這個意見，當時曾受到中共中央東北局書記高崗的反對，他認為在公營工廠中，沒有階級剝削，沒有階級矛盾，行政與工會的利益是一致的，行政與工會沒有立場的不同。認為鄧子恢「具體立場不同」的說法，模糊了工人階級在國家政權中的領導地位；模糊了公營企業的社會主義性質；模糊了公營企業與私營企業在本質上的區別。1951年10月，全國總工會常務副主席、黨組書記李立三，向毛澤東寫了《關於在工會工作中發生爭論的問題的意見向毛主席的報告》。指出：有同志認為在國營企業中公私利益是完全一致的，無所矛盾，甚至否認「公私兼顧」的政策可以適用國營企業。另一種意見認為在國營企業中公私利益是基本一致的，但在有關工人生活的勞動條件等總是存在有矛盾的，但這種矛盾的性質是工人階級內部的矛盾，因而是可以而且應當用協調的方法，即公私兼顧的方法來求得解決的。李立三明確表示：「我個人是同意後一種意見的。我覺得公私關係問題，不僅在目前國營企業中，而且在將來社會主義時期各種對內政策問題上也還是一個主要問題，否認公私兼顧的原則可以運用到國營企業中的意見，可能是不妥當的。」[69]但李立三的意見為毛澤東否定，在1951年12月舉行的中共全國總工會黨組第一次擴大會議上，李立三受到批判，並被扣上了

三頂帽子：（一）在工會工作的根本方針問題上犯有狹隘經濟主義的錯誤；（二）在工會和黨的關係問題上犯有嚴重的工團主義錯誤；（三）在工作方法上犯有主觀主義、形式主義、事務主義甚至家長製的錯誤。其性質：「是嚴重的原則錯誤」，「表現了社會民主黨的傾向」，「是完全反馬克思主義的，是對於職工運動和我們黨的事業極其有害的」。[70]

賴若愚正是在1951年這次會議解除了李立三的職務後，接任全國總工會主席的。因此，他執政以後，無疑是執行經中共中央批準的全總黨組第一次擴大會議決議的路線。全國工會在動員工人群眾全力保證第一個五年計劃工業化建設的順利實施，起了重要作用。但是，隨著國家建設的發展，國家、生產單位、生產者個人之間的矛盾也時有發生。1956年一年中，全總收到的報告和直接處理的事件就達八十六起之多（罷工二十九起，請願五十七起，其中來全總請願的二十四起）。[71]在1957年2月毛澤東作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的講話之後，4月10日，中共中央下發了《關於研究有關工人階級的幾個重要問題的通知》，提出：為了總結幾年來的工作經驗，克服各方面存在的缺點，進一步發揚廣大職工群眾的積極性，完成社會主義工業化的艱巨任務，中央準備在今年內召開的中央會議上，對有關工人階級的下列幾個方面的問題加以討論。（一）關於職工群眾參加企業管理問題。（二）關於職工生活問題。（三）關於工人階級內部的團結和教育問題。（四）關於企業中黨、工會和青年團組織工作問題，必須在總結已有經驗的基礎上，適應新的情況，在各方面有所改進。

中共中央的上述精神和意圖，促使廣大做工會工作的幹部進行反思。人們開始對全總黨組第一次擴大會議對李立三的批判提出了質疑。認為李立三承認工人與國家利益一致，也承認存在矛盾的觀點，是對的；李立三認為，矛盾主要表現在分配上，也沒有錯；當時並不存在經濟主義、工團主義的嚴重錯誤；尤其是1953年在工會系統自上而下地批經濟主義，造成了不良後果，比較普通的現象是工會幹部不敢代表工人的正當利益，堅持真理，因而脫離了工人群眾。在這種背景下，全國總工會根據中共中央開展整風的指示，進行整風。

1957年5月7日，賴若愚在回答《工人日報》記者提問，5月10日在全總直屬機關作整風動員報告中，都明確指出當前工會工作中的主要問題，是脫離了工人群眾。他舉例説：「1956年，群眾鬧事增多，而在鬧事中間，除了個別例外，群眾都把工會撇在一邊。群眾根據幾年來的經驗，認為依靠工會組織解決問題往往是解決不了的。……這些都説明工會脫離群眾的現象是嚴重的，」[72]賴認為，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是工會與各方面的關係比較難處理。這主要是工會與行政的關係，工會與黨的關係。他指出：

> 工會與行政在根本上是一致的，這樣説法是沒有錯誤的，而且是首先應當肯定的。……但是強調了工會與行政的一致性以後，卻忽略了兩者的差別，甚至有一個時期，只準一致，不準不一致。這樣，工會所做的工作，差不多都是行政領導布置的事情。结果，形成工會與行政「一鼻孔出氣」，模糊了工會工作的特點。在過去一個時期，工會對群眾的支持是不夠的，工會好像是行政的代表，代表行政説話，因此，在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時候，也就起不了甚麼作用。
>
> 工會必須在黨的領導下進行工作，這是毫無疑問的，應該強調的。但從組織上來説，工會是一個獨立的組織。它必須傾聽群眾的意見，根據群眾的意見來辦事。工會組織要很好地把黨的領導和群眾意見這兩個方面結合起來，即通過群眾自己的獨立活動來體現黨的領導。過去，我們在這個問題上也解決得不好，強調了黨的領導（這是對的），而忽略了工會在組織上的獨立性。所以有人説黨委設了「工會部」就夠了，何必還要工會呢？[73]

據此，賴若愚提出，整風主要解決好工會工作中存在的主觀主義和官僚主義。應該説，這是一服並不對症的處方。

隨後，《工人日報》記者採訪了全國總工會辦公室副主任李修仁，把李随同全總領導人視察京漢、粵漢鐵路沿線十個城市有關工礦企業群眾工作的見聞和觀感，以〈工會工作「走馬觀花」記〉為題在《工人日報》發表。接着發表了《工人日報》社長陳用文随同賴若愚訪問山西、陝西、甘肅三個省工會，太原、西安、蘭州三個市工會和臨潼縣工會後寫的〈西行紀要〉。這兩篇文章反映了工會工作脱離群眾的大量事實，以及工人群眾的要求和希望。

1957年9月，中共全國總工會黨組舉行第二次擴大會議，將當前工會工作意見分歧最大的三個問題提交會議討論：一、關於1951年12月全總黨組擴大會議；二、工會「七大」以來工會工作的估價；三、當前工會工作的主要問題。目的是：「辨清是非，統一認識，為即將召開的中國工會第八次代表大會作好思想準備」。上述三個問題，中心是第一個問題，即如何評估第一次黨組擴大會議對經濟主義、工團主義的批判，以及會議確定的工會工作的方針是否是完全正確的。

這時，全國範圍反擊所謂资產階級右派鬥爭已進入高潮，因此，會議一開始，全總黨組就認為，幾個月來，對第一次黨組擴大會議提出的種種懷疑和反對意見，已經在許多工會工作者中間引起了新的思想混亂。對過去工作的成就不敢肯定，對於黨組擴大會議所確定的工會工作的方針任務發生了動搖，對於全總領導以及對黨和行政方面的消極抱怨情緒有所滋長。這是思想政治戰線上的鬥爭在工會內部的反映。

賴若愚在會上作報告，對懷疑第一次黨組擴大會議正確性的觀點，一一作了批駁，指出：「一切懷疑黨組擴大會議決議的論據是站不住腳

的。雖然在貫徹黨組擴大會議決議的過程中有過一些缺點，但黨組擴大會議所確定的工會工作的方針、任務，不僅在過去，而且在現在還是正確的。」他認為：「目前工會幹部中的思想混亂，不是一般的思想問題，而是有關工會工作根本方針、任務的分歧。」「它實際上是工會工作的兩條路線的鬥爭。」這次整風，就是要通過大辯論，澄清思想，統一認識，提高覺悟，把工會幹部團結在黨的周圍。[74]關於工會的地位和作用，主要是工會與黨和行政的關係問題，賴又重複了批判李立三時的解釋，並強調只有把這兩個問題搞清楚，才能正確地掌握黨對工會工作的正確路線，才能使我們在實際工作中不致重複過去犯過的錯誤。

這樣，全總黨組第二次擴大會議，並沒有能解決工會工作中存在的實際矛盾和問題。值得注意的是：會議儘管全盤肯定了第一次擴大會議對李立三的批判，及會議確定的工會工作方針；但對持懷疑甚至反對意見的人，並沒有把他們當作右派進行鬥爭。賴若愚當時指出，「對工會工作有錯誤看法的同志並非多數……；一部分人則處於中間狀態，認識模糊，遇到外界影響，就發生懷疑動搖。這一部分同志只要經過認真的學習，就可以清醒過來，堅定起來。有很少數的人，對上述工會工作的方針有嚴重的懷疑，甚至提出完全反對的意見。這種人的意見，是造成這次思想混亂的主要因素，所以必須予以嚴肅的批判。」但他強調：「對於工會工作問題的研究，必須和反對资產階級右派分子對黨的猖狂進攻嚴格區別開來。」[75]這樣實際上就把這部分持反對意見的人，保護了下來。這在反對所謂资產階級右派鬥爭的高潮期，是難能可貴的。

然而，賴若愚在這次會議上，雖然繼續維護了第一次黨組擴大會議批判李立三的觀點，但他在此前對幾年來工會工作存在問題的看法——「工會與行政『一鼻孔出氣』，模糊了工會工作的特點」，「工會對群眾的支持是不夠的，工會好像是行政的代表，代表行政說話」；「強調了黨的領導（這是對的），而忽略了工會在組織上的獨立性」等等，並不能因此而被人們遺忘。何況他在這次會議上又公開保護了對工會工作方針持反對意見的人。這不能不引起「立場堅定」的一部分人，在全黨批判右傾保守的形勢下，站出來對他揭發批判。

1958年5月20日，賴若愚因病逝世。23日，中共八大二次會議閉幕。26日，全總黨組召開第三次擴大會議揭發批判賴若愚右傾、反黨。劉寧一在大會上作《關於批判賴若愚嚴重反黨錯誤的總結發言》；劉瀾濤代表中共中央書記處在會上發言；會議通過決議，指責賴若愚、董昕等人犯了「嚴重右傾機會主義和宗派主義」的錯誤，屬於「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性質。[76]8月11日，《中共中央關於全總黨組第三次擴大會議结束的通知》，高度評價了此次全總黨組擴大會議。文中說：

這次會議，徹底揭發和鬥爭了混入黨內的階級異己分子、修

正主義者陳用文（《工人日报》社長）和反革命分子秦達遠（曾任全總書記處辦公室主任），徹底揭發和清算了全國總工會以賴若愚、董昕為首的少數領導人所犯的嚴重右倾機會主義和宗派主義錯誤，並在此基礎上，批判了工會工作中的教條主義，根據黨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的精神，確定了今後工會工作的具體任務，製定了改進工會工作的若干重要措施。會議徹底解決了近十年來工會工作中存在着的根本問題。[77]

至此，就在全國黨、政、軍、工會各系統，完成了對與總路線、大躍進在指導思想上不合拍幹部的整肅，把中共全黨各方面幹部的思想統一到「毛澤東思想紅旗」下，使毛澤東年初預言，1958年下半年「要有一個大冒」變成現實。

[1]　對1957年在中共省級領導層反右派一事，時任江蘇省委第一書記的江渭清在回憶錄《七十年征程：江渭清回憶錄》（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6）中有這樣一段記載。1957年7月上旬，南京已熱似火爐，毛澤東不避酷暑專赴南京，召集部分省、市委第一書記談話，親自過問抓右派問題。毛澤東問：「你們江蘇省委書記、常委裏頭，有沒有右派？為什麼不反？」江渭清回答説：「主席啊！哪能一個人沒有幾句錯話呢？您老人家説的嘛十句話有九句講對，就打九十分；八句講對，就打八十分……」毛澤東聽了頓時生氣起來。他拍着沙發邊的茶几，説：「你到底反不反右派？」我想：自己是省委第一書記，是省委一班人的班長，如果書記、常委內有「右派」，那我就是「頭」。所以，我秉公直言：「要反右派可以，請您老人家下令把我調開，另外派人來。因為是我先「右」嘛！您先撤了我，讓別人來反。」聽了江渭清這麼表態，毛澤東倒消了氣，説：「那好嘛，你就不要反嘛！」毛還帶着幽默的口吻説：「渭清啊！你是捨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江回答説：「主席啊！我是捨得一身剮，要為您老人家護駕！」此後，江蘇省委和各地、市、縣主要領導中沒有抓一個右派，與兄弟省形成鮮明對照。

[2] 李鋭：《「大躍進」親歷記》，頁174。

[3]　毛澤東：在成都會議上的插話（1958年3月），參見李鋭：《「大躍進」親歷記〉》，頁180、181。

[4] 1982年1月，中共廣東省委書記對古大存等人的問題進行覆查，決定予以平反。

[5]　1957年12月13日，中共浙江省第二屆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通過〈關於開除右派分子沙文漢、楊思一、彭瑞林、孫章錄黨籍的決議〉，《人民日報》，1957年12月27日；《新華半月刊》，1958年第2號，頁16-18。1981年4月，中共浙江省委對沙文漢等人的問題進行覆查，決定予以改正。《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七冊，頁209-210。

[6]　1958年1月27日，中共安徽省委擴大的第六次全體會議作出〈關於開除李世農、楊效椿、李鋭黨籍的決議〉，見《人民日報》，1958年3月10日；《新華半月刊》，1958年第7號，頁37-39。1962年7月，中共安徽省委對李世農等人的問題進行甄別，並報中央監察委員會同意，決定撤銷關於開除李世農黨籍的決議，恢復其黨籍、名譽、職務和級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七冊，頁209。

[7]　1958年2月，中共甘肅省第二屆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通過開除省委常委、副省長孫殿才，省委委員、銀川地委第一書記梁大鈞，省委秘書長陸為公等人黨籍的決議，《甘肅日報》，1958年8月16日；《新華半月刊》，1958年第17號，頁27-29。1963年9月，中共甘肅省委對孫殿才的問題進行甄別，改為警告處分；1982年8月，中共甘肅省委再度對孫殿才等人的問題進行覆查，並報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批準，決定予以平反。《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七冊，頁210。

[8]　1958年3月，中共青海省第二屆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擴大）會議徹底粉碎了右派分子孫作賓地反黨陰謀，《青海日報》，1958年3月11日；《新華半月刊》，1958年第17號，頁31-33。1978年5月，中共青海省委對孫作賓的問題進行覆查，並報中共中央同意，決定予以改正。《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七冊，頁210。

[9]〈中共河南省委舉行第九次全體會議（擴大）揭露批判右傾機會主義潘復生等反黨反社會主義言行〉，《河南日報》，1958年7月4日；《新華半月刊》，1958年第15號，頁67-73。1962年5月，中共河南省委對潘復生的問題進行覆查，並報中共中央同意，決定予以平反。《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七冊，頁210。

[10]〈中共廣西僮族自治區代表大會徹底揭發與批判以陳再勵為首的右派集團和右派分子徐江萍〉，《人民日報》，1958年7月15日；《新華半月刊》，1958年第16號，頁34-35。

1979年1月，廣西壯族自治區黨委對陳再勵等人的問題進行覆查，決定予以改正。《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七冊，頁210。

[11] 〈中共遼寧省委召開擴大會議進行整風，粉碎了以王錚為首的反黨宗派活動〉，《遼寧日報》，1958年10月31日；《新華半月刊》，1958年第22號，頁36-39。

[12] 《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錄》，第二卷，上冊，頁176。

[13] 〈中共雲南省委揭露一個反黨集團〉，《人民日報》，1958年5月26日。

[14] 中共安徽省委擴大的第六次全體會議：〈關於開除李世農、楊效椿、李銳黨籍的決議〉，（1958年1月27日），《新華半月刊》，1958年第7號，頁37-39。

[15] 《人民日報》1957年6月18日，公布了中共中央、國務院給廣西因災餓死人事件中負有責任的有關人員處分的決定。指出，造成此次嚴重事件的原因，是省、地、縣的一些領導幹部漠視群眾疾苦，報喜不報憂；忽視災情的嚴重性，沒有積極採取措施，做好救災中的糧食供應工作；有的幹部既不深入瞭解災情，又不相信下面幹部的反映，甚至批評反映減產和災情的幹部為「右傾」，進行壓制。據此決定：撤銷陳漫達中共廣西省委第一書記、省人民委員會委員的職務；撤銷郝中士中共廣西省委書記、副省長職務；撤銷蕭一舟中共廣西省委書記、副省長職務；撤銷楊林中共平樂地委書記職務，留黨察看一年；撤銷何庶民中共平樂地委副書記職務；撤銷矯志周中共平樂縣委書記職務；撤銷王文陸荔浦縣委書記職務；給予中共荔浦縣委副書記艾治國嚴重警告處分；給予中共橫縣縣委書記薛秋水留黨察一年處分。撤銷段書香平樂專署副專員職務；給予荔浦縣副縣長李善本記大過處分。

[16] 〈中共廣西僮族自治區代表大會徹底揭發與批判以陳再勵為首的右派集團和右派分子徐江萍〉，《人民日報》，1958年7月15日；《新華半月刊》，1958年第16號，頁34-35。

[17] 孫仲良：〈徹底粉碎孫殿才、陳成義、梁大鈞右派集團，堅決反對地方主義〉，《甘肅日報》，1958年8月16日；《新華半月刊》，1958年第17號，頁27-29。

[18] 〈中共河南省委舉行第九次全體會議（擴大）揭發批判右傾機會主義潘復生等反黨反社會主義言行〉，《新華半月刊》，1958年第15號，頁67-73。

[19] 〈中共青海省委第二屆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擴大）會議徹底粉碎了右派分子孫作賓的反黨陰謀〉，《青海日報》，1958年3月11日；《新華半月刊》〉，1958年第17號，頁29-31。

[20] 〈中共遼寧省委召開擴大會議進行整風，粉碎了以王錚為首的反黨宗派活動〉，《遼寧日報》，1958年10月31日；《新華半月刊》，1958年第22號，頁36-39。

[21] 《新華半月刊》，1958年第22號，頁40。

[22] 《人民日報》，1958年3月10日；《新華半月刊》，1958年第7號，頁29。

[23] 毛澤東：〈在南寧會議上的结論提綱〉（1958年1月21日），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七冊，頁29。「朱可夫事件」——朱可夫，蘇軍元帥，蘇德戰爭期間，曾任僅次於斯大林的副最高统帥。在計劃、準備和指揮莫斯科會戰、斯大林格勒會戰和柏林戰役等一系列決定性戰役中起過重要作用。可謂「功高震主」。戰後，曾擔任首任駐德蘇軍總司令和德國蘇軍佔領區最高行政長官。後被斯大林貶為地方軍區司令員。斯大林逝世後，出任國防部副部長、部長。1957年6月，莫洛托夫、馬林科夫等在蘇共中央主席團會議上，決定罷黜第一書記赫魯曉夫。赫魯曉夫不服，要求召閑中央全會。朱可夫命令國防部門用軍用飛機火速將各地的中央委員接到莫斯科，為赫魯曉夫擊敗莫洛托夫等人，並把他們打成「反黨集團」起了決定性作用。但朱可夫在軍隊中權力的膨脹，又引起了赫魯曉夫的警惕。同年10月，蘇共中央全會以朱可夫「破壞了黨的列寧主義原則」的罪名，解除了他的蘇共中央主席團委員和中央委員，並決定解除其國防部長的職務。

[24] 李銳：《「大躍進」親歷記》，頁167。

[25] 李銳：《「大躍進」親歷記》，頁172。

[26] 〈毛澤東在武昌會議上的講話記錄稿〉（1958年4月8日）。

[27] 《彭德懷傳》編寫組：《彭德懷傳》（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3），頁550。

[28] 1952年7月，聶榮臻任總長時，對呈送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的文件有控制。據時任總參作戰部部長的張震回憶説：「聶總説：毛主席他們管的事多，太忙了。你們的東西事無巨細地都報上去不好，以後報到我这裏就行了，需要毛主席他們知道的由我批後轉報。從那以後，我們送到毛主席、劉少奇同志、朱老總那裏的東西就少了。後來毛主席召開會，把幾個老帥都找去，我也被叫去。毛主席對我説，早先還見得着你們作戰部的報告，後來也看不到了，現在黨政民系統的東西一大桌菜吃不完，軍事系統就沒有吃的，乾餓。」毛澤東批評後，粟裕認為向毛主席反映情況少，自己也是有責任的。剛到總參謀部工作時，毛澤東就規定粟裕每半月向他直接匯報一次工作。粟裕起先是按規定執行了的，聶代總長有了以上交代後，執行就不夠堅決了。同時，粟裕認為，自己是副總長，作為總參領導人之一也應該承擔一定責任，便也向毛澤東作了書面檢討，檢討了未按毛澤東要求每半月報告一次情況的錯誤，並且説雖然毛澤東沒有指名批評他，但對他的教育很大。不料毛澤東在他的檢討上作了批示，不但寫上「此種檢討很好」，而且把粟裕和聶榮臻的工作做了對比，肯定了粟裕半年來的工作，對聶又作了批評。此事，引起了聶榮臻的很大誤解。張震：《總參謀部回憶史料》（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5），頁326；《粟裕傳》編寫組：《粟裕傳》（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0），頁

938-939。彭德懷主持軍委日常工作後，粟與彭在對未來戰爭的認識和戰爭準備問題上，存有分歧，有時粟還與彭據理力爭。1954年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決定在國務院設立國防部，為了體現國防部的領導，許多原來有中央軍委和總部頒發的命令、指示，都要求改由國防部署名。但哪些文件以國防部的名義發，哪些不用，又無明確規定。總參為中央軍委起草的和總參下發的命令、文電，常常因署名問題受到批評。文件有時沒有署國防部的名受批評，有時署了也受批評。為此粟裕提過希望加以明確的意見，以便在日常工作中有所遵循。1955年3月16日中央軍委會議決定，責成總參起草國防部與總參職責條例。《粟裕傳》，頁939-941。

[29] 預備會議有軍委委員、軍隊系統的中共中央委員、各軍區、各軍兵種黨委書記共五十六人，實際到會四十人。軍委擴大會議開幕以後作為「小型會議」經常舉行。《彭德懷傳》，頁551。

[30]《彭德懷傳》，頁551-552。

[31] 黃克誠：《黃克誠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頁246；《粟裕傳》，頁936。

[32] 所謂「一貫反領導」，主要是指粟裕與聶榮臻、彭德懷的關係。「告洋狀」、「裏通外國」，指1957年11月粟裕在蘇聯訪問時，拜會了蘇軍總參謀長索科洛夫斯基（Vasily Sokolovsky）。粟裕鑑於軍委責成總參謀部起草國防部及總參職責條例，雖已五易其稿，尚未獲得通過，從借鑑蘇軍經驗出發，趁便向蘇軍總長提出請對方提供一份蘇軍「關於國防部和總參謀部工作職責的書面材料」，以作參考一事。《粟裕傳》，頁941-942。

[33] 黃克誠：《黃克誠自述》，頁246。

[34] 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頁288；黃克誠：《黃克誠自述》，頁246。

[35]《粟裕傳》，頁944。1960年1月，粟裕在上海參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毛澤東在會上講話時，特地轉過臉來朝着粟裕說：粟裕呀，你的事可不能怪我呀！那是他們那個千人大會搞的。《粟裕傳》，頁948。

[36]《粟裕傳》，頁944。對粟裕1958年蒙冤的正式公開平反，是1994年12月25日，中央軍委副主席劉華清、張震聯名在《人民日報》、《解放军报》發表的〈追憶粟裕同志〉一文，正式宣稱：「1958年，粟裕同志在軍委擴大會議上受到錯誤的批判，並因此長期受到不公正的對待。這是歷史上的一個失誤。這個看法，也是中央軍事委員會的意见。」《粟裕傳》，頁952。

[37] 方強：〈關於對軍委擴大會議開法的意見給會議主席團的信〉（1958年5月29日），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七冊，頁261-263。

[38] 毛澤東：〈在方強對軍委擴大會議開法的意見上的批語〉（1958年6月5日），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七冊，頁260-261。

[39] 毛澤東：〈關於做好第二個五年計劃布局和開好軍委會議問題給鄧小平的信〉（1958年6月7日），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七冊，頁264。

[40]《彭德懷傳》，頁553。

[41]〈黃克誠在全體大會上的傳達記錄〉，見《彭德懷傳》，頁552。

[42] 黃克誠：《黃克誠自述》，頁246-247。《粟裕年譜》1958年5月26、28日、6月4日，記載：鄧小平主持元帥會議批判粟裕。中共江蘇省委黨史辦公室編：《粟裕年譜》（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6），頁627。

[43] 毛澤東：〈轉發蕭向榮關於各軍事部門與蘇聯顧問的關係的總結的批語〉（1953年1月1日），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四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0），頁1。

[44] 毛澤東：〈在全國政協一屆四次會議閉幕會上的談話〉（1953年2月7日），載《毛澤東文集》，第六卷，頁264。

[45]《彭德懷傳》，頁546。

[46] 蔡鐵根調軍事學院前，任軍委訓練總監部軍事科學和條令部的處長。

[47]《彭德懷傳》，頁546-547。

[48] 張宗遜：〈關於幾年訓練工作的我見〉，《解放軍報》，1957年2月9日。

[49] 毛澤東指示：「請注意軍中思想動態，政治教育情況。」《彭德懷傳》，頁548。

[50]《劉伯承傳》編寫組；《劉伯承傳》（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2），頁657；彭德懷：〈在聽取軍事學院匯報中的談話〉（1957年3月2日），載《彭德懷傳》，頁548-549。

[51]《劉伯承傳》，頁658-659。

[52] 蕭克：《蕭克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7），頁443。

[53] 蕭克：《蕭克回憶錄》，頁445-446。

[54] 批評張宗遜過去對學蘇聯叫得最響，指張提出：「要堅持不走樣地學；要把蘇聯顧問教的東西，原原本本地學到手，即使當前用不上也不要緊；要堅持先學後用，高學低用，死學活用等等，」而現在又把學習蘇聯都說成是教條主義，說學習蘇聯「學得越多，中毒越深」、「南京軍事學院幾年来的教學是教條，危險的是繼續學下去」，從一個極端跳到另一個極端。

[55] 蕭克：《蕭克回憶錄》，頁448。

[56] 《葉劍英傳》編寫組：《葉劍英傳》（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5），頁515；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頁285-286（葉劍英在軍事學院講話的時間是4月8日，叢進書中誤寫成4月18日了）。

[57] 《彭德懷傳》，頁554。

[58] 〈毛澤東在軍委擴大會議期間三次講話記錄稿〉；《彭德懷傳》，頁554-555；《劉伯承傳》，頁664。

[59] 指1941-1945年蘇德戰爭期間，蘇聯保衛斯大林格勒等十大戰役的戰例。

[60] 蕭克在回憶錄中說：在「文化大革命」期間，造反派要蔡認罪，蔡說我在軍隊訓練工作中沒有罪，他們誣我為大右派，是他們有罪。造反派便以現行反革命罪把蔡鐵根這位堅持真理的硬漢子，無法無天的殺害了。蕭克：《蕭克回憶錄》，頁453。據查：蔡鐵根，1958年反教條主義受批判後，1959年4月被劃為右派分子，開除黨籍、軍籍，降為行政15級，安排到江蘇省常州市工業局工作。「文化大革命」開始不久，造反派誣衊蔡為現行反革命，當即被捕入獄。1970年3月17日被殺害。1980年1月8日，中共常州市委為蔡鐵根平反昭雪，恢複名譽。

[61] 《彭德懷傳》，頁555-556；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頁291。

[62] 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頁291-292。

[63] 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頁292-293。

[64] 劉伯承被免去高等軍事學院院長兼政治委員的職務；粟裕被免去總參謀長的職務；訓練總監部被撤銷，蕭克、李達的國防部副部長也被免職並調離軍隊。陳绪英等則被開除軍籍，送邊疆勞動改造。1978年11月7日，總政治部在《關於蕭克、李遠等同志申訴問題的處理意見》的通知中，撤销了「以蕭克同志為首的资產階級軍事路線和反黨宗派活動」的结論；1986年10月27日，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代表中央在劉伯承追悼大會上致悼詞說：「1958年，在對建軍工作中的所謂教條主義倾向的批判中，劉伯承同志受到了不公正的對待，仍嚴格自責。1980年，鄧小平明確指出：「那次反教條主義是錯誤的。」這也是黨中央一致的意見，1987年11月25日，總政治部和中央軍委紀律檢查委員會發出《關於蕭克、李達同志的所謂教條主義問題徹底平反的通知》，宣布：「關於1958年反教條主義的問題在為劉伯承同志致的悼詞中，黨中央已經作了徹底否定」，根劇中央的指示精神，經中央軍委批準，決定「為在1958年因所謂教條主義問題上受到錯誤處理的蕭克、李達、郭天民、李鐘奇、吳偉、趙凌漢、葉楚屏、楊力勇、李文芳、王波等同志徹底平反」。

[65] 黃克誠後來回憶說：這次會議，實際是中央領導軍委整風，為彭德懷始料不及，我們未能領會中央精神，所以主持會議顯得很被動。這可能是：毛主席在匈牙利事件之後，開始擔心我軍領導出問題。也許這就是廬山會議的先兆。黃克誠：《黃克誠自述》，頁247。

[66] 李桂才主編：《中國工會四十年（1948-1988）資料選編》（瀋陽:遼寧人民出版杜，1990），頁738。

[67] 〈全國總工會黨組第三次擴大會議的決議〉（1958年8月5日），載《中國工會四十年（1948-1988）資料編選》，頁796-797。

[68] 鄧子恢：〈關於中南區的工會工作〉（1950年7月），載《中國工會四十年（1948-1988）資料選編》，頁142-145。

[69] 李立三：〈關於在工會工作中發生爭論的問題的意見向毛主席的報告〉（1951年10月2日），載《中國工會四十年（1948-1988）資料選編》，頁214-215。

[70] 〈關於全國總工會工作的決議〉（1951年12月22日全國總工會黨組擴大會議通過），載《中國工會四十年（1948-1988）資料選編》，頁295-301。

[71] 〈中華全國總工會黨組關於職工罷工請願情況的報告〉（1957年2月），載《中國工會四十年（1948-1988）資料選編》，頁574。

[72] 賴若愚：〈在全國總工會直屬機關黨員幹部大會上的整風動員報告〉（1957年5月10日），載《中國工會四十年（1948-1988）資料選編》，頁595。

[73] 賴若愚：〈在全國總工會直屬機關黨員幹部大會上的整風動員報告〉（1957年5月10日），載《中國工會四十年（1948-1988）資料選編》，頁599-560。

[74] 賴若愚：〈關於當前工會工作的若干問題〉（1957年9月5日在全總黨組擴大會議上的報告），載《中國工會四十年（1948-1988）資料選編》，頁668、693、694。

[75] 賴若愚：〈關於當前工會工作的若干問題〉（1957年9月5日在全總黨組擴大會議上的報告），載《中國工會四十年（1948-1988）資料選編》，頁695-694。

[76] 《中國工會四十年（1948-1988）資料選編》，頁796。

[77] 《中國工會四十年（1948-1988）資料選編》，頁768。1979年6月18日，中華全國總工會黨組向中共中央並中央纪委報告說：1958年，全總黨組第三次擴大會議，對當時的全總領導人賴若愚、董昕等同志進行批判鬥爭。除賴若愚同志當時已經病故，未予處分外，經中央監委批準，對董昕、陳用文、王榕、李修仁、吳平、邵井蛙、劉永生、劉健農、馮宿海、陶泊等十位同志分別給予處分。另外，秦達遠同志被當成現行反革命逮捕法辦。在貫徹會議的過程中，全國各地又批判、鬥爭、處分了不少同志。根據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精神，我們對這次

會議的問題進行了覆查。經覆查證明，這是一大錯案，應予徹底平反。中共中央於同年9月19日批示：中央同意中華全國總工會黨組1979年6月18日〈對中華全國總工會黨組第三次擴大會議的覆查結論〉及〈中華全國總工會黨組第三次擴大會議的覆查報告〉。並決定撤销1958年9月30日中發〔58〕851號文件，其中包括〈關於全總黨組第三次擴大會議向中央的報告〉、〈劉瀾濤同志在全國總工會黨組第三次擴大會議上的發言〉和〈全國總工會黨組第三次擴大會議的決議〉三個文件。

第二章

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興起

在農業掀起大躍進局面的同時，工業戰線的大躍進也開始發動。工業大躍進的基本思路是幾個並舉，實際上主要是調動地方辦工業的積極性，強調地方都要在短期內使工業產值超過農業產值，形成地區工業體系。為此，大規模下放權力，實行群眾動員，破除規章製度，大搞群眾性技術革新。很快，地方工業遍地開花，各顯其能。在上下互動中，趕超英美的時間表一再提前。在小社併大社和農業高產競放「衛星」的兩股浪潮中，毛澤東和中共其他領導人認為找到了消滅工農差別、城鄉差別、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差別——通向共產主義的途徑。於是，被當作過渡到共產主義的「金橋」——人民公社應運而生。

一、全黨全民辦工業

1.縣社工業遍地開花

毛澤東在杭州會議上就曾提出，第二個五年計劃，各省地方工業產值比例要超過農業產值（包括下放給地方管的工業在內）。在《工作方法六十條》中，專門寫了一條縣以上各級黨委「要抓社會主義工業工作」。具體規定：「各地方的工業產值（包括中央下放的廠礦、原來的地方國營工業和手工業的產值，不包括中央直屬廠礦的產值）爭取在五年內，或者七年內，或者十年內超過當地的農業產值。」[1]與之相應的是，總路線規定了發展工業的一系列並舉方針，即：在集中領導、全面規劃，分工協作的條件下，實行中央工業和地方工業同時並舉，大型企業和中小型企業同時並舉。[2]中共中央為此作出如下決策：

1958年2月6日，首先作出關於召開地區性協作會議的決定。將全國劃分七個協作區，任務是：通過定期和不定期的會議，使各省、市、區互通情報，交流經驗，互相協作，彼此支援，調節矛盾，互相評比，以促進共同發展。[3]具體劃分是：

遼寧，吉林、黑龍江、東蒙為東北協作區，由黑龍江省委第一書記歐陽欽為會議召集人；

北京、天津、河北、山東、山西、內蒙古、河南為華北協作區，由河北省委第一書記林鐵為會議召集人；

上海、江蘇、浙江、安徽、福建，山東、江西為華東協作區，由上海市委第一書記柯慶施為會議召集人；

廣東、廣西，湖南、福建、江西為華南協作區，由廣東省委第一書記陶鑄為會議召集人；

湖北、湖南、江西、河南、安徽為華中協作區，由湖北省委第一書記王任重為會議召集人；

雲南、貴州、四川、西藏、陝西為西南協作區，由四川省委第一書記李井泉為會議召集人；

陝西、甘肅，青海、新疆、寧夏為西北協作區，由陝西省委第一書記張德生為會議召集人。

6月1日，《中共中央關於加強協作區工作的決定》，把協作會議正式改名為協作區，進一步擴大了協作區的職權，要求各協作區根據自己的資源等條件，逐步形成若干個具有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的經濟區域。任命原會議召集人為協作區主任委員。[4]

2至3月，中共中央陸續發出《關於下放幹部進行勞動鍛煉的指

示》、《關於改進物资分配體製問題的意見》、《關於發展地方工業問題的意見》，批轉了紡織工業部黨組《關於紡織企業全部下放交地方管理的報告》。規定：

幹部下放的主要方向是農村。為的是貫徹執行在優先發展重工業的基礎上工農業同時並舉的方針，迅速實現全國農業發展綱要，大力增加農業、林業、牧業的生產，在短期內改變我國農業和農村的面貌，在農村中有系統地展開技術革命和文化革命。[5]

各省、市、自治區，在國營工廠保證完成生產任務的條件下，有權調劑國營工廠物资的多餘部分；對各國營工廠超額生產的部分，可按各地需要情況，按比例提成；地方管理的國營企業，超額生產部分可以全部歸地方。[6]

地方工業的建設资金，除了少數較大的重要建設項目，主要由中央投资以外，其他一般建設項目所需的资金，主要應該由地方自籌來解決。地方資金的來源，主要應該依靠地方財政籌集，地方工業企業的內部積累，手工業合作社和農業社的積累。此外，必要時，還可以發行地方建設公債。[7]

4月，中共中央又下達了《關於在發展中央工業和發展地方工業同時並舉的方針下有關協作和平衡的幾項規定》、《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工業企業下放的幾項決定》、《國務院關於改進税收管理體製的規定》。

決定對各類產品實行分級管理、分級平衡的製度；關於基本建設的管理程序，各省、市，自治區興辦的限額以上建設項目，除了提出簡要的計劃任務書，報送中央批準外，其他設計和預算文件，一律由省，市、自治區自行審查批準。[8]

決定將國務院各主管工業部門，不論輕工業或者重工業部門，以及部分非工業部門所管理的企業，除開一些主要的、特殊的以及「試驗田」性質的企業仍歸中央繼續管理以外，其餘企業，原則上一律下放，歸地方管理。[9]

税收管理改進的原則是：凡是可以由省、自治區、直轄市負责管理的税收，應當交給省、自治區、直轄市管理；若干仍然由中央管理的税收，在一定的範圍內，給省、自治區、直轄市以機動調整的權限；並且允許省、自治區、直轄市製定税收辦法，開徵地區性的税收。[10]

所有這些，不僅在人才、物资、資金等方面給地方辦工業以有力的支持，而且賦予了各級地方黨政領導調動人、財、物等资源以很大的權力。截止1958年6月15日，九個工業部與各省、市、自治區陸續完成了880多個下放單位的交接工作，佔中央各工業部所屬企業和事業單位1200個總數的80%左右。[11]

各級地方領導人對地方辦工業本來就有積極性。所以，自杭州會議

以後，各地就出現大辦工業的熱潮。原來工業不發達的省份尤甚。1958年3月，國家經委在給中央的報告中說：現在看，各地方的幹勁比中央各部門還要足一些，特別是甘肅、陝西、雲南、貴州、湖南、安徽、河南七省，都計劃把今年的工業總產值比去年提高到50%以上。這又反過來促進了其他省份領導也不甘或不敢落後，而要迅速提高工業比重，唯一的辦法就是全民大辦工業。因此，就出現了「縣縣辦工廠，鄉鄉辦工廠，規模之大，聲勢之壯，前所未有」。[12]

據當年報道：

> 甘肅省，1958年1月到3月，全省辦廠一千多個，3月到5月，建廠三千五百個，5月到6月，全省廠礦數目猛增到二十二萬個。其中省辦的二千五百多個，縣辦的一萬五千多個，鄉辦的一萬六千多個，社辦的十八萬五千多個。出現了十多個「萬廠縣」，二十多個「千廠鄉」，五十多個百廠社。全省每個鄉平均有一百一十個廠礦，每個農業社平均有十二個廠礦。
>
> 河北省定縣，在一個多月的時間內就建起1530個中、小型工廠，平均每天有三十五個工廠投入生產。
>
> 人口僅有十三萬多的內蒙古呼倫貝爾盟布特哈旗，到5月底就建廠礦307座。[13]

安徽省安慶地區十三個縣統計，到1958年5月底止，僅社辦工廠就達到19418個。[14]

對地方辦工業的热情，中共山西省委第一書記陶魯笳介紹該省的情況[15]說：

> 自今年2月間，我們以沁縣的縣、鄉、社辦工業的經驗為典型，開了一次全省性的地方工業工作的现場會議，到现在，不過三個多月，沁縣的經驗，真像星星之火，飛快地燃遍了全省。據最近统計，預計在今年內全省新建大、中、小工廠將達到一萬三千多個，90%以上是縣、鄉、社辦的小型工廠，其中有二千多個工廠已經建成並投入生產。全省自籌的工業建設资金已達2.1億元，其中，群眾和幹部投资即有九千多萬元。預計今年全省地方工業的總產值將比1957年增長80%。如此高的速度，如此大的規模，都是我們原來所沒有預想到的。而這種新的局面的出現充分説明：實現工業化和「十五年趕上英國」的口號，不單單是工人階級的戰鬥口號，同時由於農民也在出錢、出力大辦工業，所以它已經成為全民的戰鬥口號了。

這些數字，雖然帶有相當水分，但基本上反映了當年全國各地大辦工業的热烈場景。為解決资金、技術、設備等困難，當年的基本做法是：用行政手段集中一切可以集中的资金；組織城鄉協作；採取土法上馬。如：

河南省新鄉市為籌集资金，通過發動群眾，從市財政科、手工業

局、建設局、商業局、服務局、市聯社、工業局、糧食局、合作糞場等系統，一直到民政科的社會救濟费，甚至連黨费、工會费也被動員來投资工業。這樣，很快從年初只準備二三十萬元的工業投资，躍升到一千二百萬元。此外，新鄉市還動員郊區農民自籌五六百萬元來搞工業。再就是通過發展儲蓄事業來籌集資金。銀行過去規定不準把儲蓄款項投资搞基本建投，現在打破常規，市委規定：新鄉市的儲蓄款項除上繳九十萬元之外，都歸市裏適當調度使用。1957年全市實際完成儲蓄額是五十萬元，1958年要保證達到三百萬元，爭取六百萬元以上。[16]新鄉市這種竭澤而漁的做法，在當時帶有相當的普遍性。

設備和技術，主要通過組織城鄉協作來解決。就是由城市、由大的工業企業出錢、出人才技術、出設備幫助建廠。山西省當年就以城市為中心，劃分了六個城鄉協作區。各地在縣與縣之間又以較大的縣城為中心，縱橫交錯地組織了許多小的城鄉協作區。在每個縣的範圍內，也以縣和集鎮為中心，組織了大大小小的城鄉協作區。如太原市和十八個縣製訂了一個相互協作發展工農業的規劃：三年內，太原市幫助十八個縣新建或擴建一大批中小廠礦，使這些縣初步地實現農業機械化、農村電力化。1958年協助各縣新建、擴建工廠167個（這比省工業廳和十八個縣原來計劃新建、擴建的工廠多104個），包括有農業機械修配廠、水泥廠、煉鐵蔽、煉鋼廠、煉鉛鋅廠、煉錳廠、煉鎳廠、硫酸廠、煉焦油廠、煤礦、耐火材料廠、石膏廠、氮肥廠、機製紙廠、石棉廠、澱粉廠、黃金開採、火力發電廠、變電站等。這些新建企業，由太原市投资一千萬到一千五百萬元；由太原市各大廠礦拿出125台自己不用的機牀和電機設備，並組織包括有各類技術人員的三個綜合小組，分頭到各縣幫助進行資源調查和地方工業的規劃，幫助各縣培養縣營企業所需的技術力量，幫助各縣逐步地建立勘察隊伍和建築隊伍。依照這個規劃，十八個縣成為供應太原市所需副食品的基地，同時也是提供勞動力保證太原市工業發展需要的基地。此外，太原市還要求每個縣在年內收集廢鋼爛鐵十噸至三十噸，以供市內重工業工廠的需要。除太原以外，大同、長治、陽泉等市以及其他縣城和工礦區也大體按此做法。[17]

縣、社工業，更多的是立足於自力更生，採用土法上馬。

河北省邢台縣，原本有十六個農具製造修配廠和木業社，縣裏認為只要再加些設備，就可以製造出新產品四十四種——小型拖拉機、播種機、收割機、中耕器、靈巧水泵、小型鑽探機、低窪地區的鏟土機等。為爭取原材料自給；縣裏決定：1958年建立八個小型煉鐵高爐（爭取完成十二個），7至8月分別投入生產，產鐵達到1200噸。1959年小高爐累計發展到十五個，年產量達到2.2萬噸，除滿足本縣自用外，還可以交給國家一萬噸；1958年建立四個小型土法煉鋼廠，8月投入生產，至年底產鋼2.5萬斤。1959年累建為五個，全年產量達到七萬斤；1958年建

立小型水泥廠九十九個，產水泥2700噸。1959年在改進生產方式前提下年產達到一萬噸，基本上達到自給；1958年建立土法煉鉛礦一個，9月投入生產，至年底產鉛1.5萬斤，1959年加以擴建，全年總產量達到五萬斤。[18]

社辦工業，相對更較简單。海倫縣福海鄉新建農業社，本着白手起家，勤儉辦廠的方針，僅花180元，就辦起了顆粒肥料廠、小烘爐、木工組、被服加工廠、鉀鹽製造廠，皮革廠，聯合加工廠（包括碾米、鍘草、飼料粉碎、發電）、酒廠等八個社辦廠，並很快投入生產。[19]

1958年全黨全民辦工業，社社辦工廠，村村辦企業，一時確如雨後春筍般從地下冒了出來，除了批判右傾保守的壓力，基層幹部和群眾的盲目情绪，來自横向的相互攀比外，與以上這種種做法也直接有關。其中組織城鄉協作，土法上馬等辦法，運用適度，是會有成效的；社辦工業，雖然基本上只是一種手工勞動的小作坊，但它確是社隊企業的萌芽。然而，採取停止社會其他領域的運轉，調集全部资金投資辦工業；以為小高爐的土法冶煉就能頂上洋高爐用等等，卻造成了一種假象，似乎在中國實現工業化並非難事。實際上，後來造成的結果，卻是負數。

2.技術革新的群眾運動

實現工業大躍進的第二項重要措施，是號召破除「限製生產力發展的規章製度」，開展群眾性的技術革新運動。

毛澤東在《工作方法六十條》中號召：「現在要來一個技術革命」。要求各級黨委和領導人，「在多快好省地按計劃按比例地發展社會主義事業的前提下，在群眾覺悟提高的基礎上，允許並且鼓勵群眾的那些打破限製生產力發展的規章製度的創舉」。[20]

1958年3月3日，中共中央下達了《關於開展反浪费反保守運動的指示》。強調：「這是一個社會主義的生產大躍進和文化大躍進的運動，是在全民整風運動中改進整個國家工作和促進全民大幹勁的一個帶有決定性的運動。」「中央決定以兩個月到三個月的時間，在全國進一步普遍地開展反浪费、反保守、比先進、比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運動。」指示指出：

> 在運動過程中，會不斷出现驚人的奇跡，出现各種平日難以達到的先進的速度和先進的指標，樹立起各種先進的典型和旗幟。……我們應該歡迎和讚揚群眾在各個戰線上的躍進，促進落後的部分趕上去，力求在先進的基礎上達到新的運動的平衡，並且審訂原來的規劃。
>
> 原來一些不利於生產力發展的規章製度，會在運動中不斷地為群眾的創舉所打破。我們必須對於群眾的創造。虛心地加以研

究，按照發展的需要和群眾在實战中的考驗，重新審訂原來的規章製度。凡是真正束縛生產力發展而又可以迅速修改的，應該立即修改。[21]

根據中央的指示，各地聞風而動，反浪费、反保守、比先進、比多快好省運動（簡稱「雙反」、「雙比」）的展開，形成了工礦企業大躍進的新形勢。

3月29日《人民日報》報道[22]説：

化工部在反浪費、反保守運動中，重新審查和修改了廠房設計，一個年產八萬噸接觸法硫酸廠，根據原來設計，需要投资八百二十萬元，现在只需500萬元就夠了。這一設計修改，原來準備興建30個廠的投資，现在可以興建五十個廠，硫酸產量由原來的240萬噸增加到400萬噸，這是工廠設计大躍進的事例之一。

北京市規劃局設計院，從反對設計浪費和保守以來，检查了130項設计工項，修改了550張圖紙，為國家節約资金九百多萬元，這是民用建築設計大躍進的事例之一。

石家莊動力機械廠生產的鍋駝機，每馬力九十公斤，跟最先進的煤氣機比起來重量要大七十公斤，經設计人員研究，準備降到二十三公斤，這是機械產品設計中大躍進的事例之一。

重慶建設機牀廠，由「雙反」運動很快發展成為一個以破除陳规陋矩為中心的技術革新運動。該廠廠長報告説：全廠對原有的749種規章製度，修改了249種，廢除了196種，兩項共佔59%。將1927種表報，合併、簡化和廢除了993種，佔51.5%。陳规陋矩破除後，群眾的思想更加活潑了，幹勁和鑽勁更大了，生產效率提高幾倍、幾十倍、幾百倍、幾千倍直到萬倍。如青年銑工廖世剛採用了多刀、多卡、多機牀管理的先進方法，並把銑牀加工改為冲牀加工，生產接連提高了1680倍，以十一天半的時間，完成了五年計劃的工作量。老鉗工曾德智將手工操作改為機械操作，生產一下就提高21243倍。全廠出現了空前規模的大量技術革新者，提高生產效率50%以上的就有3681人，佔全廠工人的35%。第一季度生產計劃完成128%，比1957年同期的生產實際增長44%。整個企業充滿着蓬蓬勃勃的新氣象。[23]

由技術革新，創造出新的先進定額的報道可謂連績不斷。中共吉林省委第一書記吳德介紹該省情況説：

長春市動力機械廠車工王德澤搞了九項技術革新和創造，八個月完成了八年的生產任務；吉林市省機械廠鍛工周玉嶺改進和創造了三十六種工具，現在正幹着1962年第三季度的工作。技術革新運動開展以後，有些廠子作到了「粗牀幹细活」，「小牀幹大活」，「老機器當新機器」，「低級廠幹高級廠的活」。在只有1780名職工的省機械廠，從3月中旬掀起技術革新運動，僅僅四十幾天的時間，群眾就提出了革新和創造218件，經鑑定採納

180件，结果全廠六十六個工組，有二十七個工組的全部工人提高工作效率半倍到三倍以上，66%的工人突破了80%以上的定額，單項產品超過定額五倍到十倍的546人，十倍少項以上至五十三倍的三十四人。……在已經出現的千百件技術革新中，有不目已使我們的某些生產技術的水平、迅速接近、達到或者超過了世界先進水平。如豐滿水力發電廠試驗成功的送電線雙周率高周波保護裝置，根據現有资料對照，在世界各國同類裝置中，是可以名列前茅的，同美英兩國的相較，比他們的可靠，又不那樣複雜；石峴、開山屯兩個造紙廠的木漿蒸煮時間，在幾天之內創造了超過加拿大的記錄。類此達到或接近世界先進水平的項目，僅僅吉林市的各廠，一個3月份，就出现十五項。[24]

長春第一汽車製造廠也創造了班產翻番的新紀錄。就是班產百輛汽車（兩班任務一班幹）生產大試驗的成功。他們提出的口號是：「今年多品種，明年幹五萬，三年收回本，成本減一半；五年增十倍（以1957年出產一萬輛為基數），品種八十五；遠景十五年，年產三十萬；全面大躍進，整風是關鍵。」[25]

上海開展比先進、比多快好省的運動，具體落實到想辦法、找關键、比智慧、比措施。3月24日，上海傳出的電話消息説，江南造船廠抓住缩短造船修船周期的關鍵，訂出先進的指標和措施，原來造5000噸的船用十八個月，現在九個月就完工；修船周期也縮短一半。許多工廠的生產能力都增長了一倍、兩倍以上，最多的永泰電機廠產值比1957年增加二十六倍，新產品不斷出現。[26]

群眾性的技術革新運動，確有很多好的創造發明，對提高勞動生產率起到了促進作用。但在當時，也確實使人們產生了一種誤解，以為「一天等於二十年」的時代真的已經降臨了。毛澤東在看了上海報道的這則消息後，寫了一則批語説：「落後分子覺悟起來，共產主義精神高漲，這是目前國內形勢的顯著特點。」[27]其實，在破除迷信，貶低知識分子、專家教授作用的當時，僅僅依靠發動群眾，並不可能在科學技術上產生有利於提高生產力的重大發明。

3.一再提前的趕超時間表

地方工業的迅猛發展，群眾性技術革新運動的發明創造，捷報頻傳，極大地增強了各工業部門超英趕美的信心，中共中央領導人更認為這已是指日可待的事了。

化學工業部部長彭濤，1958年3月4日在給毛澤東並中央的報告中，就提出了通過地方大辦化肥廠，在化肥數量上趕超英國的意見。他說：

為了適應農業發展的需要和到1962年實現化學肥料生產700萬噸的規劃，除在中央和省兩級辦化肥廠外，還準備在專署和縣

兩級開辦化肥廠，這樣，四級同時舉辦化肥廠，到1962年氮肥產量可達到1800-2000萬噸，再加上500-700萬噸磷肥和部分鉀肥，就可以在數量上把英國遠遠地拋在後面，在每畝施肥量上，十年內趕上英國，也就有希望了。[28]

5月，彭濤又在《人民日報》發表文章提出，至今仍處於嚴重落後狀態的中國化學工業，也能夠在短期內趕上一切資本主義國家。其根據：一是，幾年來的事實證明：地方是能夠辦好化學工業的，並且地方辦起來，往往比中央（部）辦得更多、更快、更好、更省。如中央管的太原化工廠辦了七年，還沒有一個車間投入生產，但這個廠的很多產品，地方工廠早就生產了；二是，最近的事實又證明：群眾是可以用土辦法來辦化學工業的。像四川省奉節縣利用琉磺腳渣生產硫酸銨、用燒窯廢氣生產碳酸氫銨等化學肥料；江蘇省常州市利用礱糠製造普通玻璃和甲醇、糠醛、醋酸等有機產品；三是，幾年的事實還證明：其他部門也可以舉辦化學工業。如：鋼鐵聯合企業中附設化工廠、煉油廠附設化工車間等。總之，只要打破神秘觀點，由少數人辦化學工業變為全民辦化學工業，就能為化學工業的發展，開拓出一條寬廣的道路。[29]

第一機械工業部部長趙爾陸，提出「生產更多更好的機器保證社會主義建設高速度發展」。趙説，工業上十五年要經上英國，《農業綱要四十條》要提前實現，地方工業總產值要提前超過農業總產值，加上機械工業本身發展的需要，都要求在短期內提供更多、更好的機器設備。趙提出高速度發展機械工業的路子，除了「全國一盤棋，各區也各有一盤棋」、「改變體製，面向全國」外，重要一條是「破除迷信，依靠群眾，開展技術革命」。趙説：

在大躍進中，群眾的新創造有如百花齊放、層出不窮。過去設計一個中等的柴油機廠要將近兩年時間，現在只要兩個多月時間就可以設計出來。煤氣機的發生爐，過去用鋼板，沒有鋼板就沒有辦法，天津專區大膽改用磚砌的土爐子代替，不但省鋼材，而且效率高，現在已大量推廣。東北機械廠一個工人出身的車間主任，研究出用氧氣瓶或鋼管來做鍋駝機的鍋爐，用鋼省一半，燒的煤也少一半。汽車底盤的大樑，原來是要用三千五百噸大壓力機壓製，南京汽車製配廠在大躍進中，沒有這樣大的壓力機，經過工人與工程師想辦法，用小壓力機分五段壓製，經過試驗，完全合用。許許多多的例子説明，群眾中有無數的英雄好漢，只要充分發動起來，讓他們敢想、敢做，加以引導和提高，就一定能夠人才輩出，困難讓路。在技術工作上走群眾路線，使群眾作技術的主人，這是機械工業技術革命中的根本問題。[30]

4月間，水利電力部向中共中央報送的電力工業第二個五年計劃，第一條是加快電力工業發展速度，十年趕上英國；第二條是發揮地方積極性，促進全國電氣化；第三條是放手發動群眾，全民辦電。

可見，寄希望於全黨全民辦工業，就有可能在短期內迅速增加產品的數量，已成為全國上下的共識。正是從這個基點出發，就有了1958年工業品產量指標的一再加碼，超英趕美時間表的一再提前。

4月15日，毛澤東在廣州寫的〈介紹一個合作社〉的短文中，通過介紹河南省封丘縣應舉農業生產合作社依靠集體力量，戰勝自然災害，改變落後面貌的事跡，斷言：「由此看來，我國在工農業生產方面趕上資本主義大國，可能不需要從前所想的那樣長的時間了。」對這一論斷的提出過程，《毛澤東傳》有如下解讀：

> 這句話，原來寫的是：「由此看來，我國趕上英美不需要從前所想的那樣長的時間了，二十五年或者更多一點時間也就夠了。」胡喬木在綜合各方面意見時，寫了一個建議：「原說十五年趕上英國，現說不需要從前所想的那樣長的時間，二十五年就可以趕上英美，似覺複雜；可否改為：我國趕上英國固然不需要很長時間，就是趕上美國，也不需要從前所想的……？」看了胡喬木的意見，毛澤東作了修改。同時，在寫給劉少奇、鄧小平、周恩來、陳雲、胡喬木、吳冷西的信裏，解釋說：「十年可以趕上英國，再有十年可以趕上美國，說『二十五年或者更多一點時間趕上英美』是留了五年到七年的餘地的。『十五年趕上英國』的口號仍不變。」毛澤東仍堅持自己的預計，十年趕英，二十年趕美，而且認為說二十五年已是留了五至七年的餘地。但考慮到此文要公開發表，為慎重起見，所以作了這個修改，並且申明，「十五年趕上英國」的口號仍不變。其實，毛澤東的這個新的預計，在3月成都會議上就說出來了。4月2日在會見波蘭政府代表團時又說了一次：「我們中國趕上英國可能不要十五年，可能只要十年或十一年。」「再有二十年就趕上美國。」[31]

4月27日，毛澤東在廣州召集的中央各部委負責人會議上，又進一步提出：「十五年能否超過美國？」[32]

5月，毛澤東提出，在黨內小範圍裏頭，應掌握的口徑是「七年趕英，十五年趕美」。按照他的意見，中共中央向八大二次會議的工作報告，把原來「十五年或者更長的時間趕上英國」，改為「十五年或者更短的時間趕上英國」。5月8日，他在大會上講話說：我看十五年趕上英國，趕上美國，差不多。照李富春同志的話，稍微多一點時間，比如二十年，那是盡夠的。但這個不發表，十五年趕上英國的口號不要變。「不要改變我們的口號，不要加上甚麼十五年或者二十年趕上美國。但是高級幹部，全國代表大會代表應當知道這個方向。」[33]

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及其稍後一個時期，工農業生產戰線上的「躍進」捷報不斷飛來。5月18日，毛澤東就安東機器廠這個小廠，工人們經多次失敗，克服技術、工具、材料設備和財務上的困難，終於試製成功三十馬力拖拉機的報告，寫下了「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的批語。斷言，這種「大無畏創造精神，對於我國七年趕上英國、再加八

年或者十年趕上美國的任務，必然會有重大的幫助」。[34]

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裏，毛澤東對趕英趕美時間的改變，明顯反映了他對中國經濟發展速度估計上的變化。為了跟上毛澤東的時間表、跟上地方工業發展的大躍進形勢，各部委紛紛向毛澤東報告，有信心完成更高的生產指標。6月6日，冶金工業部部長王鶴壽在給毛澤東的報告中說：

> 我們找林鐵商談了華北區的鋼鐵建設問題，他們原來的計劃較小，商談結果，認為爭取明年底達到生產能力八百萬噸是可能的，我們兩方面都有信心爭取完成這個指標。這兩天我們在研究有色金屬工業規劃，9日以後冶金部黨組的同志分頭到各區去，協同各省市採取措施。我們有極大信心完成和超過現在預定的指標。[35]

毛澤東當即將這個報告批給鄧小平，並寫道：「1962年，可產六千萬噸鋼。」[36]這個數字，比王鶴壽在八大二次會議上報告1962年達到三千萬噸[37]翻了一番。

6月12日，國家經委黨組向黨中央報告：地方冶金工業的「躍進」指標，已經大大超過「二五」計劃第二本賬。計劃今年興建小高爐12694座，大部分年內可投入生產，地方鐵產量今年可達440萬噸，比去年增長7.9倍；興建轉爐220座，電爐四十三座，地方鋼產量今年可達200萬噸，比去年增長2.5倍。根據地方冶金工業的飛躍發展，估計明年全國鋼鐵產量可以比今年預計完成數翻一番。

6月16日，國務院副總理兼國家計劃委員會主任李富春將國家計委彙總，經中央財經小組討論提出新的《第二個五年計劃要點》，報送中共中央政治局。《要點》估計，1958年鋼產量可能達到八百五十萬噸到九百萬噸。「為了實現第二個五年的指標，1959年有決定的意義，必須爭取1959年有一個比1958年更大的躍進，例如工業方面，鋼產量超過二千萬噸，爭取達到二千五百萬噸，超過日本，超過英國」。「現在看，以鋼鐵為主的幾種工業產品的產量，有可能不用三年趕上和超過英國，全國農業發展綱要有可能三年基本實現」。[38]

6月17日，國務院副總理兼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薄一波，在中南海西樓向中央政治局匯報1958年計劃執行情況和1959年設想。會議由劉少奇主持，中央常委除毛澤東外，全部到會。薄一波談到鋼鐵生產時說，預計今年鋼產量將達到九百萬噸，初步安排，明年計劃為二千萬噸或二千萬噸以上。討論中有兩種不同意見：一種同意薄的建議；另一種認為1959年的指標還可以更高一點。會議從下午3點開到晚上11點，未能達成一致。

第二天（18）日，毛澤東在中南海游泳池召集有中央常委和有關負責人參加的談話會。到會的有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鄧小平、

彭真、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廖魯言、黄克誠、王鶴壽等。在談到鋼鐵生產時，毛表示他贊成提高鋼指標。於是決定，1958年的鋼產量的預計完成數改為一千萬噸，1959年的鋼產量指標改為二千五百萬噸。毛澤東對薄一波說：現在農業已經有辦法了，叫做「以糧為綱，全面發展」，你工業怎麼辦？薄未加思索，回答說：工業就「以鋼為綱，帶動一切」吧！毛說：對，就按這麼辦。他還認為，機械工業也很重要，並議論了工業交通各行業之間的關係，提出機械工業也是綱，電力和鐵路是先行。[39]

會後，薄一波按會上定的數字重新修改了17日的《匯報提要》，並稱:「1959年我國主要工業產品的產量，除電力外，都將超過英國的生產水平。」[40]同時寫了以下一段話：

> 基本建設投資首先保證兩個「綱」和兩個「先行」部門的需要。兩個「綱」就是冶金工業和機械工業。兩個「先行」部門，就是電力和鐵路。綱舉目張，其他一切東西都帶動起來了。這是工業部署上的戰略問題，必須有統一的看法。[41]

以上部委送來的報告，把超英趕美的時間一再提前，使毛澤東極度興奮，他認為李富春的報告，「可以大開眼界」。17日，他在李的報告上批示說：

> 此件即刻印發軍委會議各同志。很好一個文件，值得認真一讀，可以大開眼界。這是你們自己的事情。沒有现代化工業，哪有現代化國防？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破除迷信，獨立自主地幹工業、幹農業、幹技術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隸思想，埋葬教條主義，認真学習外國的好經驗，也一定研究外國的壞經驗——引以為戒，這就是我們的路線。經濟戰線上如此，軍事戰線上也完全應當如此。[42]

就在這種不斷爭先的氣氛下，6月19日，毛澤東作出了1958年鋼鐵翻番的決策。對這一過程，陳雲有過具體說明：

> 6月19號晚上開各大區協作會議以前，主席在北京游泳池召集中央一些同志，王鶴壽也參加了。主席問他，去年是五百三，今年可不可以翻一番？王鶴壽說，好吧！布置一下看。第二天就布置了。所以，是6月19號才決定搞一千一。[43]

事隔兩天，6月21日，冶金部黨組再就產鋼計劃向毛澤東、中共中央報告說：

> 華東區提出爭取明年華東區鋼的生產能力達到八百萬噸。[44]這是一個極重要的建議指標。根據這一指標，我國鋼鐵工業的發展，又將進入一個新的水平。我們和華東區的同志研究了爭取明年達到生產能力八百萬噸的措施，同時其他各大協作區也在最近分別召開冶金工業的規劃會議，研究各大協作區明年及第二

個五年計劃的指標。從各大協作區會議的情況看，明年鋼的產量可以超過三千萬噸，而1962年的生產水平則將可能達到八九千萬噸以上。目前冶金部正用全力協同各區，共同組織設計、設備製造以及技術力量的培養等項工作。[45]

冶金部的這個報告，更堅定了毛澤東對鋼鐵翻番的信心。他批示：「此件發給各大協作區，各省、市、自治區黨委，各中央委員，中央各部委，中央國家機關各黨組，軍委會議各同志。」[46]

22日，毛澤東將薄一波17日報告的題目改為「兩年超過英國（向政治局的報告）」，並加批示說：

此件印發軍委會議各同志。超過英國，不是十五年，也不是七，只需要兩年到三年，兩年是可能的。这裏主要是鋼。只要1959年達到二千五百萬噸，我們就鋼的產量上超過英國了。[47]

同日，毛澤東在冶金工業部送來的《1962年主要冶金產品生產水平的規劃》上批道：

此件印發軍委會議各同志。只要1962年達到六千萬噸鋼，超過美國就不難了。必須力爭在鋼的產量上在1959年達到二千五百萬噸，首先超過英國。[48]

1958年的钢鐵產量，2月召開的全國人大一屆一次會議定為624.8萬噸；[49]3月成都會議通過的《關於1958年計劃和預算第二本賬的意見》，把鋼產量提高到七百萬噸；[50]5月中共八大二次會議期間，中共中央批準1958年國民經濟計劃第二本賬，鋼產量又提高到711萬噸。[51]但到6月，指標突然節節攀高，最後定為1100萬噸。與之相應的是：1957年11月提出「十五年或者更多一點時間趕上英國」；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會議在內部提出「七年趕英，十五年趕美」；6月，先是「五年超過英國，十年趕上美國」，最後認定「兩年超過英國」。速度變化之快，簡直令人眼花缭亂，目不暇接。

從整個決策過程看，毛澤東反反冒進，批消極平衡在先；各部委、省區層層反保守緊隨其後；在群眾運動、土法上馬的地方大辦工業氛圍下，似乎工業生產即可創造奇跡，反過來上層再將指標不斷加碼。如此造成一種惡性循環，鋼產數字愈報愈大，趕超時間愈來愈短。最後做出了這種違背常識的決策。對此，薄一波有過一段說法：

毛主席下「一〇七〇」的決心，除了他本人出於急於趕上英國的迫切心情以外，還有多方面的影響促成。王鶴壽同志多次提供的鋼鐵生產順利發展的材料有影響。我17日的匯報、18日的談話，頭腦不冷靜，未能堅持實事求是的精神，也有影響。但是，有決定性影響的，還是來自柯慶施同志。他當時是上海市委第一書記，也是新成立的華東協作區主任，6月中旬來京開協作區主任會議之前，他主持了一次華東協作區會議，規劃1959年華東五

省市（不含山東）鋼的生產能力達到八百萬噸。這五省市煤鐵資源很少，1959年就能達到八百萬噸鋼的生產能力，其他煤鐵資源豐富的地區，不是能夠搞得更多嗎？我沒有參加那幾天的協作區主任會議，柯慶施同志在毛主席面前怎樣吹的，我不得而知，但是，我可以斷定，毛主席受了他的影響。這有毛主席後來多次的谈話為證。例如，1958年11月30日，在武漢召開的政治局常委和協作區主任會議上，毛主席對柯慶施同志說：「你過去幹勁沖天，條件沒有」，說華東搞六百萬噸到八百萬噸，「這幾個月我們想了一下，沒有那個條件，比如沒有煤、鐵怎麼搞法！」又如：1959年7月23日，毛主席在廬山會議上的講話，談到闖「一〇七〇」這個禍時說：「第一個負責任的是我」。「至於柯老，你那個發明權怎麼辦（柯回答：我也有责任）？可不可以這樣講：你也有責任。但是，你是不是比我輕一點呀？因為你那只是意識形態。我雖然沒有你那個氣魄：你（一個協作區）一年要搞八百萬噸，我全國只搞一〇七〇萬噸。」毛主席這些話清楚地表明，是柯慶施同志促使他闖下這個亂子。[52]

李銳也有一段話可作佐證：

（1958年）6月10日左右，我應召同毛澤東談了一次話，是在中南海的游泳池邊。他精神抖擻，興致很高，首先就談到全年的鋼要翻一番。這真使我嚇了一跳。……後來才知道，柯慶施在八大二次會議選入中央政治局後，他主持華東區協作會議時，就確定華東七省市1959年要生產鋼六百萬噸到八百萬噸。這個指標極大鼓舞了毛，1958年鋼的原定指標八百萬噸已經很高了（要增長1/2），他卻認為既然能搞到八百萬噸，現在就把地方積極性調動起來，何必不索性翻一番呢？[53]

[1] 毛澤東：〈工作方法六十條（草案）〉（1958年1月），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十一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頁40-41。

[2] 劉少奇：〈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向第八屆全國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的工作報告〉（1958年5月5日），載《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十一冊，頁303-304。

[3] 〈中共中央關於召開地區性的協作會議的決定〉（1958年2月6日），載《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十一冊，頁157-158。

[4] 《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十一冊，頁346-348。

[5] 〈中共中央關於下放幹部進行勞動鍛煉的指示〉（1958年2月28日），載《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十一冊，頁194。

[6] 〈中共中央關於改進物資分配體製問題的意見〉（1958年3月23日成都會議通過，同年4月2日政治局會議同意），載《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十一冊，頁219。

[7] 〈中共中央關於發展地方工業問題的意見〉（1958年3月23日成都會議通過，同年4月5日政治局會議批準），載《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十一冊，頁225。

[8] 〈中共中央關於發展中央工業和發展地方工業同時並舉的方針下有關協作和平衡的幾項規定問題的意見〉（1958年4月5日），載《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十一冊，頁241-242。

[9] 〈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工業企業下放的幾項決定〉（1958年4月11日國務院全體會議第75次會議通過），載《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十一冊，頁264。

[10] 〈國務院關於改進稅收管理體製的規定〉（1958年4月11日國務院全體會議第75次會議批準，同年6月5日全國人大常委會第97次會議批準，同年6月9日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命令公布施行），載《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十一冊，頁269。

[11] 《當代中國的經濟體製改革》編輯委員會編：《當代中國的經濟體製改革》（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頁70、71。

[12] 國家經委黨組：〈關於一九五八年計劃第二本帳的報告〉（1958年3月7日），轉引自武力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1949-1999）》，上冊（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1999），頁424。

[13] 轉引自蕭冬連等：《求索中国：「文革」前十年史》，上冊（北京：紅旗出版社，1999），頁346。

[14] 中共安徽省委編輯室：《農業社大辦工業》（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58）），頁1。轉引自《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1949-1999）》，上冊，頁424。

[15] 陶魯笳：〈論工農關係和城鄉關係的新發展〉，《新華半月刊》，1958年第11號，頁37。

[16] 中共新鄉市委副書記羅毅：〈新鄉市在躍進中——新鄉市怎樣貫徹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的報告〉，《新華半月刊》，1958年第11號，頁42。

[17] 陶魯笳：〈論工農關係和城鄉關係的新發展〉，《新華半月刊》，1958年第11號，頁37。

[18] 中共河北省邢台縣委第一書記張玉美：〈農業需要甚麼就生產甚麼〉，《新華半月刊》，1958年第11號，頁56-57。

[19] 新建農業生產合作社主任吳恩濤：〈新建農業社是怎麼樣辦起工業來的〉，《新華半月刊》，1958年第15號，頁130。原載《奮鬥》，1958年第1期。

[20] 〈工作方法六十條（草案）〉（1958年1月），載《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十一冊，頁45、49。

[21] 〈中共中央關於開展反浪費反保守運動的指示〉（1958年3月3日），載《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十一冊，頁203。

[22] 〈火燒技術設計上的浪費和保守〉，《人民日報》社論，1958年3月29日；《新華半月刊》，1958年第8號，頁106-107。

[23] 重慶建設機牀廠廠長譚凱豐：〈破除陳規陋矩，解放生產力〉，《人民日報》，1958年5月13日；《新華半月刊》，1958年第11號，頁46-47。

[24] 中共吉林省委第一書記吳德：〈解放思想、迎接技術革命〉，《人民日報》，1958年5月24日；《新華半月刊》，1958年第11號，頁58-59。

[25] 第一汽車製造廠廠長饒斌：〈由三萬輛汽車到七萬輛汽車〉，《人民日報》，1958年5月16日；《新華半月刊》，1958年第11號，頁50-51。

[26] 〈上海最近情況（3月24日電話消息）〉，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七冊，頁155-156。

[27] 毛澤東：〈對《上海最近情況（3月24日電話消息）》的批語〉（1958年3月25日），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七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頁155。

[28] 彭濤：〈關於發展有機合成化學工業給毛澤東並中央的報告〉（1958年3月21日），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七冊，頁150-151。

[29] 彭濤：〈我們要在化學工業上同一切資本主義國家較量較量〉，《人民日報》，1958年5月29日；《新華半月刊》，1958年第11號，頁65-67。

[30] 趙爾陸：〈生產更多功能更好的機器保證社會主義建設高速度發展〉，《人民日報》，1958年5月31日；《新華半月刊》，1958年第11號，頁70。

[31]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逄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上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頁811-812。

[32] 毛澤東：〈在廣州召集的中央各部委負責人會議上的講話提綱〉（1958年4月27日），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七冊，頁188。

[33] 《毛澤東傳（1976-1976）》，上冊，頁815、817。

[34] 毛澤東：〈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1958年5月18日），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七冊，頁236。

[35] 王鶴壽：〈關於發展冶金工業報告〉（1958年6月6日），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七冊，頁267。

[36] 毛澤東：〈在王鶴壽關於發展冶金工業報告上的批語〉（1958年6月7日），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七冊，頁267。

[37] 王鶴壽在八大二次會議上發言說：「冶金部再次和各省、市、區研究了鋼產量的發展速度後，認為1959年可以達到一千二百萬噸，1962年三千萬噸，1967年七千萬噸，1972年一億二千萬噸，五年可以超過英國，十五年趕上美國。」見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頁695。

[38]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頁697。

[39]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頁698-699。

[40] 薄一波：〈關於1958年形勢和1959年的經濟發展向中央政治局的報告〉（1958年6月17日），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七冊，頁278。

[41]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頁699。

[42] 毛澤東：〈關於向軍委會議印發李富春第二個五年計劃要點的批語〉（1958年6月17日），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七冊，頁273。

[43] 1958年8月21日，陳雲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轉引自《毛澤東傳（1949-1976）》，上冊，頁824-825。

[44] 6月中旬，華東協作區舉行會議，規劃1959年華東五省市（不含山東）鋼的生產能力達到八百萬噸。薄一波著：《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頁700-701。

[45] 〈冶金部黨組關於產鋼計劃給毛澤東，中央的報告〉（1958年6月21日），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七冊，頁281-282。

[46] 毛澤東：〈轉發冶金部黨組關於產鋼計劃的批語〉（1958年6月22日），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七冊，頁281。

[47] 毛澤東：〈關於向軍委會議印發《兩年超過英國》報告的批語〉（1958年6月22日），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七冊，頁278。

[48] 毛澤東：〈關於向軍委會議印發冶金部一九六二年主要冶金產品生產水平規劃的批語〉（1958年6月22日），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七冊，頁279。

[49] 薄一波：〈關於1958年度國民經濟計劃（草案）的報告〉（1958年2月3日），載《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十一冊，頁118。

[50] 李晨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錄》，第二卷，上冊（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頁164。

[51] 《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錄》，第二卷，上冊，頁188。

[52]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頁700-701。

[53] 李鋭《「大躍進」親歷記》，下冊（海口：南方出版社，1999）頁1-2。

二、農業生產大颳浮誇風

從1957年冬季採用大兵團作戰的方式，大搞農田水利建設起，就基本上開始了用群眾運動搞生產的局面。在1958年初提出「苦戰三年，改變面貌」，三年看頭年等口號以後，各地紛紛改訂計劃，提高糧、棉等農作物的單位面積產量，以爭取提前、提前、再提前實現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各省在傳達3月成都會議精神後，立即提出了更高的指標。如：首先提出「苦幹三年，改變面貌」的河南省委負責人宣布：「水利化已經做到，已完成五十二億土方的水利工程。」提出了一年翻一番，以及一年完成三年規劃的可能性。曾在南寧會議上受到表揚的安徽省委負責人則表示：「水利落在河南後面了，現在是趕河南，4月底可以到四十五億土方。四十九個縣可以宣布水利化。」還說：「完成農業四十條，不要七年了，可能是三到五年。」[1]恐後爭先之風，已露端倪。

1.浮誇從深耕密植開始

毛澤東抓農業，除了十分重視指標以外，還非常重視農業的增產措施和群眾的幹勁。農業增產措施，除大興水利建設之外，就是耕地深翻改土、合理密植，工具改革、養豬積肥等。著名的「農業八字憲法」（土、肥、水、種、密、保、管、工），就是在抓農業增產措施基礎上總結概括出來的。

但是，當年領袖號召甚麼，下面就推廣甚麼，而且翻着番地發揮。

薄一波回憶說，毛澤東聽說山東有個大山農業生產合作社，因為深翻土地增產，「不多不少，增產百分之百」，就鼓勵各省搞深翻。他對湖南省負責人說：「深翻換土，大有味道，寧可一畝地花一百個工、幾百個工也要幹」；又對陝西省負責人說：「訂個五年計劃，用人海戰術，把耕地全部翻一遍」。[2]

河南省長葛縣縣委第一書記在八大二次會議發言，專門介紹深翻地的經驗，說他們縣到1958年4月底，三十三萬畝早秋地都深翻了一遍，深度在一尺左右，計劃年內把全縣一百一十二萬畝土地「來一個大翻身」。並說土地經過深翻，可以充分發揮水、肥的效能，使產量增加百分之幾十以至一倍、幾倍。

5月17日，毛澤東在大會議話時，號召在全國推廣長葛縣的經驗。他說：

> 感谢河南長葛縣委第一書記的發言，他講的土地大翻身，我

在這裏聽了一遍，回去又看了一遍。他講的深翻土地一尺五寸，將一百一十二萬畝全年全部深翻一遍，爭取畝產九百斤。這就提出一個新問題，各縣是否都能做到？長葛縣能做到，別的縣難道就不行吗？一年不行，兩年不行，三年還不行吗？四年還不行吗？無論如何五年總可以翻一遍了吧！深翻一尺五寸，這是一個大發明。在第二個五年計劃把全縣土地都深翻一遍，沒有好工具，就用長葛縣那樣的工具，就用他們這個辦法。[3]

接着，毛澤東又講了合理密植的問題。他説：

過去只説水、肥、土，種子，現在還有一個密植。在四十條中單列一項合理密植。廣東一畝要種三萬墩，每墩三根秧，每秧三根苗，就二十七萬個穗；每穗平均六十粒，共1620萬粒；每二萬粒一斤，一畝不是810斤嗎？這只是紙上談兵，拿到手裏才算數。北方的麥子、穀子、玉米、高粱、大豆等，都可以這樣算一下。要充分利用陽光和空氣。現在不是在反浪費嗎？要反對浪费陽光和空氣。太陽每天辛辛苦苦地工作，你們都不利用。空氣中的二氧化碳被植物吸收變成碳水化合物，太陽照在植物上起光合作用，製造它需要的東西——碳水化合物。[4]

在此前的農田水利建設和深翻改土中，已經出現了工具改革的苗頭，並開始形成了一種群眾運動。毛澤東對此高度重視，他在3月的成都會議上就强調指出：

改良農具的群眾運動，應該推廣到一切地方去，它的意義很大，是技術革命的萌芽，是一個偉大的革命運動。因為幾億農民在動手動腳，否定肩挑的反面，一搞就節省勞動力幾倍、十倍。……運動的特點是迅速有效，群眾積極性起來了，每天有新的創造，將來還會有各種新的發明。現代化、機械化與改良農具是對立的統一，兩者應同時進行，請各省市迅速推進。群眾性的創造是無窮無盡的，河南、河北已形成群眾運動，是自下而上搞起來的。我們發现了好的東西，就要加以總結推廣。[5]

這樣，深翻、密植和工具改革的群眾運動很快在各地推開。廣大農村掀起了工具改革的熱潮——「車子化運動」、「滾珠軸承化運動」、「繩索牽引機化運動」，五花八門。只要一處出現「發明」，立即就會報道宣傳，很快被普遍推廣。

中共陝西省大荔縣委，聽了毛澤東關於改革農具運動的指示後，當即向群眾提出「苦戰一年，普遍地實現土機械化（指使用改良的畜力機械、手工機械、自然動力機械等）」的口號。全縣除了各個農業社的木工組、鐵工組和改良農具的能手積極行動起來以外，鄉、社幹部，復員軍人，回鄉學生，青年老年，男的女的都參加到改良農具的行列中來了。縣委向上級匯報情況説：「目前總的情況是：天天有發明，鄉鄉有創造，社社有改良，樣樣活路有新工具。據不完全統計，除了正在試製

的小麥收割機、『土汽車』、『土火車』、人搖木製雙輪雙鏵犁等以外，已經試驗成功的改良農具，由3月下旬的五十四種，到4月下旬增加到221種，推廣了34600件。其中有汲水灌溉、耕作、運輸、農副產品加工等方面的工具。」改良農具的普遍推廣，大大減輕了農民笨重的體力勞動，節省了大量勞動力。這又解決了大躍進中所缺勞力的不足，並大量增加糧棉產量。[6]

如果說，改良農具能否見效，還比較容易看得出來；深翻土地、合理密植，就得經過一茬農作物的收獲才見分曉，因此，並不易被農民接受。基層幹部為貫徹上級推廣的「先進經驗」，就採用大辯論開路，按領導布置做就插紅旗，不聽則插白旗。結果，深翻變成翻得愈深愈好，有的竟有翻到一丈二尺深的；合理密植，也變得愈密愈好，有一些地方一畝地下種幾百斤的給插紅旗，按農民自己的經驗下種的給插白旗。對當年這種領導方法，薄一波評論說，過高的指標，求成過急的要求，靠大辯論開路的颳風式的領導方法，所帶來的副作用，最大的還是由此引發出來的各級幹部的浮誇風。[7]

但所有這些，在當時都被認為是取得高產的有效措施，並將會取得立竿見影的效果。

2.媒體大量報道農業「放衛星」

1957年，蘇聯成功發射了兩顆人造地球衛星。因此，在1958年比喻「一天等於二十年」的氣氛下，人們把「高」上了天的產量，稱之謂「放衛星」。從夏收開始，各地紛紛報道小麥、早稻豐收放「衛星」的記錄。

6月8日，《人民日報》首先刊登了〈衛星社坐上了衛星，五畝小麥畝產2105斤〉的「豐產新紀錄」的報道。12日，《人民日報》以大字標題在第一版頭條位置刊登〈衛星農業社發出第二顆「衛星」〉的高產消息——2.9畝小麥試驗田，畝產達3530斤，並發表社論〈向創造奇跡的農民兄弟祝賀〉。

6月16日，新華社報道，湖北省谷城縣星光社王明進試驗田的小麥畝產4353斤。23日，《人民日報》報道湖北省谷城縣先鋒農業社小麥試驗田畝產4689斤。

7月12日，《人民日報》報道河南省西平縣城關鎮和平農業社2畝小麥創畝產7320斤的記錄。18日，《人民日報》報道福建省閩侯縣連坂農業社2.6畝早稻試驗田畝產5806斤。25日，新華社報道，江西省波陽縣桂湖農業社幹部試驗田早稻畝產9195斤。31日，《人民日報》報道湖北省應城縣春光農業社生產隊長甘銀發種的早稻平均畝產10597斤。

8月13日，《人民日報》在第一版頭條位置用通欄套紅大字標題刊

登新華社消息：湖北省麻城縣麻溪河鄉建國第一農業社出現「天下第一田」，創造了平均畝產乾穀36956斤的驚人紀錄。是截至目前，我國早稻大豐收中放射出的大批高產「衛星」中的「冠軍」。

9月5日，《人民日報》報道廣東省連縣1.73畝中稻畝產60437斤。18日，《人民日報》又報道：廣西省環江縣紅旗人民公社放了一顆「中稻高產衛星」，畝產量高達十三萬多斤。

截至9月25日資料，小麥畝產最高數是青海柴達木盆地賽什克農場第一生產隊的8586斤，稻穀畝產最高數為廣西環江縣紅旗人民公社130435斤。[8]

除了小麥、水稻「衛星」以外，《人民日報》和一些省報，還連續發表了玉米、高粱、穀子、蕃薯、芝麻、南瓜、芋頭、蠶豆、蘋果等農作物和蔬菜、水果的高產「元帥」。

為強化高產衛星的輿論效果，報紙都配發有現場照片。作為中國最具權威的《人民日報》，8月13日刊登的一幅照片是：四個小孩（兩男兩女）站在豐收的早稻田裏——「看稻子長得如此『稠密』，孩子們就像站在沙發上」。實際上，那些離奇的糧食高額豐產典型，基本上都是採用「併田」方法（把許多塊茁壯的成熟或基本成熟的莊稼移栽到一塊田裏）假造出來的；也有的是按密植株數推算出來的，如山東壽張縣推算，一畝穀子密植四五十萬株，一棵穀穗一兩穀，一畝就是三萬斤。但在當初，各級領導機關和新聞單位，以至包括毛澤東本人在內，都是深信不疑的。

當年3月，河南省新鄉地委轉送了封丘縣委3月20日寫的一份報告：〈一個苦戰二年改變了面貌的合作社〉。報告介紹了該縣的應舉農業社，1957年秋後提出「苦戰三、五年，豫北變江南，鹽鹼地變稻田」；「1958年實現水利化，過黃河，跨長江，變年年受災為季季豐收，永遠摘掉災區帽子」的戰鬥口號後，社員的方向明確，幹勁十足。他們的順口溜是：「一股勁，齊向前。修渠道，改稻田。保豐收，滅災害，好生活，萬萬年。」由於社員的辛勤勞動，現已修成了河渠縱橫的大面積稻田，今年計劃種稻2830畝，豐收的年景在望。這種面貌一新的氣象，緊緊吸引着社員的心坎。大家都抱定一個願望，就是要走向社會主義的幸福生活。毛澤東讀後，非常興奮，專門寫了〈介紹一個合作社〉的短文予以歌頌：

> 〈一年苦戰二年改变了面貌的合作社〉，這篇文章值得一讀。共產主義精神在全國蓬勃發展。廣大群眾的政治覺悟迅速提高。群眾中的落後階層奮發起來努力趕上先進階層，這個事實標誌着我國社會主義的經濟革命（生產關係方面尚未完成的部分）、政治革命、思想革命、技術革命、文化革命正在向前奮進。由此看來，我國在工農業生產方面趕上資本主義大國，可能

不需要從前所想的那樣長的時間了。除了黨的领導之外，六億人口是一個決定的因素。人多議論多，熱氣高幹勁大。從來也沒有看見人民群眾像现在這樣精神振奮，鬥志昂揚，意氣風發。……中國勞動人民還有過去那一副奴隸相麼？沒有了，他們做了主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上面的勞動人民，現在真正開始統治這塊地方了。[9]

6月14日，毛澤東在中南海接見應舉農業社社長崔希廉，對他們取得的成績作了鼓勵。還説：「不要很久，全國每人每年就可以平均有糧食一千斤，猪肉一百斤，油二十斤，棉花二十斤，再過一個時期，每人每年有糧食一千五百斤」。[10]

6月16日，國務院副總理兼財政部部長李先念，向中央政治局報送第二個五年財政計劃要點，其中談到「今年麥季增產已經達到三百五十多億斤，比1957年全年糧食增產的數字一百五十億斤還要多二百億斤」。[11]毛澤東18日批道：「此件很好，印發軍委會議各同志。」[12]22日，毛澤東批發農業部報送的關於第二個五年農業發展規劃（要點）的報告，將題目改為「農業大有希望（農業部向政治局提出——第二個五年計劃期內農業方面所要達到的目的）」。[13]

6月24日，鄧子恢給毛澤東報送了夏收增產統計的報告。「主要內容是：一、從河南、湖南等十七個省區已報來的增產統計數，共339億斤；二、甘肅、新疆、北京三個省區市增產估計數共十五億斤；三、據二十個省市統計加估計，今年夏收總產量達到951億斤，去年是596億斤，今年比去年增產355億斤；四、按夏收推算，全年糧食總產可突破5200億斤，增產可達2100億斤。這樣，今年即可超過八大規定的第二個五年計劃的糧食產量指標。」毛澤東於25日批示：「此件印發軍委會議各同志，是一個好消息。」又批：「克誠辦。辦後，將此稿送小平，印發在京各中委、各部長。」可見毛澤東的喜悦之情。[14]

在此期間，譚震林在安徽合肥主持召開華東四省一市第一次農業協作會議。6月25日，譚將自己在會上的總結報給毛澤東説，華東閩、浙、蘇、皖、上海四省一市今年糧食總產量可能達到一千二百多億斤，比1957年增加五百多億斤。這就是説，華東四省一市平均每人一千斤糧食的任務，原先設想要四年五年完成，今年一年就完成了。全國糧食的產量，估計可能達到五千億斤以上。[15]這個消息，更使毛澤東感到興奮，他將譚的總結報告推薦給《紅旗》雜誌，公開發表。

3.省委書記與科學家的論證

在一片歡欣鼓舞聲中，也並非沒有人私下流露出一絲懷疑。因此，在報道高產衛星消息的同時，報刊上高調批判「懷疑論」和「唯條件

論」，《人民日報》7月23日社論〈今年夏季大豐收説明了甚麼？〉宣稱：我國農業發展速度已經進入了一個「由漸進到躍進的階段」，「只要我們需要，要生產多少就可以生產出多少糧食來」；8月3日社論〈年底算賬派輸定了〉、8月13日社論〈祝早稻花生雙星高照〉都引用了「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的豪言壯語。省委書記和有的科學家也參加了這場大合唱。

中共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吳芝圃，6月15日接受《人民日報》記者採訪，就河南省小麥豐收發表談話。吳芝圃理直氣壯地批駁對農業大躍進抱懷疑態度的「悲觀論」者説：

> 在去年，不少的「悲觀論」者，曾引用「河南地瘠民貧，耕作粗放」、「小麥是低產作物」等「論據」，斷言今年只能增產百分之幾，絕對不能增產百分之幾十，但今年全省不分山區、沙區，平原和災區到處豐收，小麥畝產千斤，已成為普遍现象，最高的遂平縣術星農業社創造的畝產記錄每畝達3530斤。事實雄辯地證明了：小麥不僅不是甚麼低產作物，它已經邁進高產作物的行列了，只要我們認真貫徹總路線，不論在甚麼地方，生產都能大躍進。所有的「觀潮派」和「秋後算賬派」，他們在河南永遠也看不到他們的「潮」、算不出他們的「賬」了。[16]

6月16日，《中國青年報》發表著名科學家錢學森的署名文章〈糧食畝產量會有多少？〉。錢文認為，現在畝產3000多斤不是頂點。因為，農業生產的最終極限決定於每年單位面積上的太陽光能，如果把這個光能換算農產品，要比現在的年產量高出很多。「現在我們來算一算：把每年射到一畝地上的太陽光能的30%作為植物可以利用的部分，而植物利用這些太陽光能把空氣裏的二氧化碳和水分製造成自己的養料，供給自己發育、生長結實，再把其中的五分之一算是可吃的糧食，那麼稻麥每年的畝產量就不僅僅是現在的二千多斤或三千多斤，而是兩千多斤的二十倍！」文章還説：「只要我們有必需的水利、肥料等等條件，加上人們的不斷創造，產量的提高是沒有問題的。今天條件不具備，明天就會創造出來；今天還沒有，明天一定會有！」[17]這樣，錢文不只對二三千斤的畝產記錄作了肯定，而且為畝產四五萬斤的「衛星」提供了「科學」論證。

中共廣東省委第一書記陶鑄，在7月15日出版的《紅旗》雜誌發表文章：〈駁「糧食增產有限論」〉。文中説道：

> 農業生產是一種人與自然的鬥爭。對於這種鬥爭，存在着兩種不同的看法：從剝削制度解放出來的人民是力求主宰自然、征服自然呢，還是甘心處於自然的主宰之下而成為它的奴隸呢？在「糧食增產有限論」者看來，大自然神秘得很，不可能為人們所認識，人們更不可能改造它。我們共產黨人則認為，自然發展的規律，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但是當人們正確地掌握了自然

的規律，就能夠駕馭自然，改造自然。

文章進而說：

> 今年的糧食增產還只是在水稻增產的途程上跨出第一步，如果需要的話，到1962年廣東就可以達到畝產糧食3000斤或者更多一點。一向被認為是低產作物的小麥，今年尚且出现畝產7000多斤的記錄，那麽，高產作物的水稻，在廣東一年可以種三造，達到畝產一萬斤也應當是可能的。[18]

這就把人的主觀意志誇大到極致，陷入了主觀唯心論。

7月23日，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業部發布《1958年夏收糧食作物生產公報》說：1958年夏收糧食作物總產量達到1010億斤，比上年增加413億斤，增長69%。平均畝產187斤，比上年增長70%。在夏收糧食作物中，冬小麥總產量達到689億斤，比上年增加279億斤，增長68%。平均畝產193斤，比上年增長71%。並據此宣稱：「今年我國小麥總產量已經超過美國。」[19]《人民日報》據此發表社論說：一切以為農業產量只能按百分之幾的速度而不能按百分之幾十的速度增長的「悲觀論調」已經完全破產了。並由此得出結論說：夏季生產大躍進的偉大勝利，進一步增強了我們爭取今年秋季生產大躍進的信心。既然一向被認為「低產作物」的小麥都能以71%的速度躍進，那麽高產作物的水稻、玉米、甘蔗為甚麽不能更加大量地增產呢？棉花的產量為甚麽不能躍進呢？我們要乘勝猛進，毫不懈怠……。只要我們需要，要生產多少就可以生產多少糧食出來。[20]

4.各方人士的現場調查

省委書記們拍着胸脯批驳「懷疑論」、「悲觀論」，可能有一種政治上的考慮；科學家的論證，該是比較「客觀」的了；更何況還有實地調查呢。

8月11日《人民日報》發表記者冒茀君、石正章、檀英和三人寫的〈發射早稻高產「衛星」目擊記〉。文中說：

> 到了安徽省樅陽縣高豐社以後，一股辦喜事的氣氛強烈地感染着我們。在一個不大的莊子裏，停放着許多汽車。社員們笑容滿面地接待遠方的來客。客人中有上海來的，有四川來的，有貴州來的，有遼寧來的，也有從安徽省各地來的。這個社的一塊早稻豐產試驗田就要收割了。不論主人和客人，個個都懷着喜悅期待而又激動的心情。要看這顆早稻高產「衛星」究竟有多大。
>
> 當我們走到這塊「衛星」田的時候，都禁不住驚叫起來：「好傢伙，長得這麽好的一塊稻！」這塊田呈長方形，共一畝零四厘二毫，田裏長的稻子就像堆的稻場似的，足足有二尺多厚，

最厚的地方有三尺以上，一眼望去，田面上铺着一片金黄色的稻穗，擠得滿滿的，很少看見葉子，因為葉子都壓到稻穗底下去了。我們用手撥開表面的一層稻穗，看到下面還有一層一層像平鋪的稻穗。有個同志用手插進去，驚喜地說：「啊呀，好像插在稻籮裏了。」我們又隨手摘下幾個稻穗數了一下，最多一穗是三百四十粒，一穗是二百九十七粒，最少的一穗是二百零六粒。這塊田是採用2×3寸密植的，每畝約有十一萬蔸，二百四十萬穗。用力拔起一株稻來看，葉子有四五分寬，稻桿非常堅硬，有筷子那樣粗。稻桿幾乎一根挨着一根，密密的擠在一起了，約成四十多度的角度一邊傾斜着。一個社員告訴我們說：「在抽穗成熟以前，每株稻都筆直的立着，約有中等身材的人一般高。抽穗灌漿以後，稻穗沉沉下垂，壓彎了腰，就漸漸變成現在這個樣子了。」這位社員又說：「稻株沒有倒伏，栽得密是原因之一，一根緊靠一根，要倒伏也倒不下來。」這時很多參觀的人在田邊進行各種各樣的活動：農業科學工作者正在採集標本，攝影記者和攝影師正在尋找異乎尋常的稻穗。上海、四川、貴州等地參觀團的同志，想從田中間挖出一平方尺全蔸水稻，進行科學研究。可是他們沒有辦法走進田去，只好在田兩角挖了兩塊。我們詳細地觀察這塊早稻，想起前幾天在一個農業社裏，有個社員曾經形容他們的早稻說：「我們的早稻長得連一個雞蛋放在稻面上也滾不下去。」現在看了這塊早稻田以後，我們可以毫不誇大地說，在這塊田平鋪着的兩三尺厚的稻面上，就是放上個西瓜也不會掉下地去。

收割這塊早稻田的社員，不管老年人和青年人都沒有經驗。7日上午，社裏動員六十多人來收割，從11時開鐮，到12時只割了一尺多寬。中共安徽省委書記閔傳榮在田裏看到人不夠，急的直喊：「怎麼只來這幾個人挑稻呀，趕快增加人。」後來增加到三百多人，從下午2時起邊割、邊打、邊運，經過曝曬以後過秤。這樣一直幹到下午6點半鐘，才將這塊早稻全部割完。初打一遍，但稻秸上的稻粒仍未打淨，第二天又打了半天多，直到下午4點才最後打完。割稻的時候，田裏站滿了人，放着十五個禾桶，前面的人把稻割下，後面的人隨着拿起就打，一面打，一面就有人把稻秸和稻穀運走。因為稻子又密又壯，割打都十分费力，割一會就要另換鐮刀。一個社員說：「真是怪事，今年割稻真是遇仙了，愈割愈多。往年收打一畝田稻，三五個人一天就行了，今天三百多人一天還對付不了。」

……

在收打過程中，最緊張的時候是八日下午。這時每個人都急切地想知道最後定下來的產量。過秤的地方擠滿了人。很多眼睛注視着兩把算盤。「一萬四了」，「一萬五了」，「一萬六了」，隨着產量的增加，人們的情緒就像潮水一樣不斷地高漲着。

慶祝會開始了，當計算小組公布最後計算出來的產量是畝產

> 一萬六千二百二十七斤十三兩的時候，全場都沸騰起來了，鑼鼓聲、鞭炮聲、歡呼聲、鼓掌聲響成一片。一個社員扛着一面巨大的紅旗，爬上一座像小山的稻堆頂，這時攝影師把這一個動人的鏡頭拍攝下來。慶祝會上，很多參觀團的負责人致賀詞、獻旗，他們歡呼這個偉大的勝利，祝賀這個偉大的勝利。[21]

8月27日，《人民日報》發表中共中央辦公廳派赴山東省壽張縣調查組的一封通信，題為〈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信中說，今年壽張縣的糧食單位產量，縣委的口號是「確保雙千斤，力爭三千斤」。但實際在搞全縣範圍的畝產萬斤糧的高額豐產運動中，一畝地要產五萬斤、十萬斤以至幾十萬斤紅薯，一畝地要產一至二萬斤玉米、穀子，這樣高的指標，當地幹部和群眾，講起來很平常，一點也不神秘，一般的社也是八千斤、七千斤，提五千斤指標的已經很少，至於一千斤至二千斤，根本沒人提了。他們的措施是在足水、足肥、深翻土地的基礎上放手密植，再加上「田間管理如繡花」的管理。一畝穀子由過去的三萬多株密植到一十萬、二十多萬株。《人民日報》加的編者按說：這封信生動地反映了那裏大躍進的形勢，提出了一些足以啟發思想的問題。[22]

一向豪爽、正直的國務院副總理兼外交部長陳毅元帥，本來對這些衛星感到疑惑，但在親臨實地轉了一圈以後，也被蒙住了。9月26日。《人民日報》刊登陳的〈廣東番禺縣訪問記〉。文中說：

> 今年4月間，我到四川省內江縣順江農業社去了一趟。那裏田野間發生的巨大變化，第一次引起了我思想上的震動。我親眼看到了五萬斤的番薯田。去四川訪問前，在北京聽說有人要搞這麼高的豐產試驗，不怎麼相信。根據個人的經驗，單位面積產量一下子要提高這樣多，實在不容易一下子想得通。到現場一看，信服了。
>
> 最近，聽說廣東有畝產一百萬斤番薯、六十萬斤甘蔗、五萬斤水稻（是一次插秧而不是併田的）的高產試驗田，這引起了我思想上的第二次震動。所以有番禺之行。9月4日上午，我們走出了廣州市郊，到達番禺縣大石鄉。我首先去參觀那塊番薯試驗田。這塊試驗田像個蒼翠的山崗，又像一幢幢綠色的樓房，雄偉的氣勢，遠遠就吸引住我。最初我還想，一畝田收獲一百萬斤番薯，該要插多少薯苗？插得下插不下？插下了，要長薯塊。薯塊又往那裏長？到了现場一看，一問，真是一目了然，完全信服。這塊一畝五厘地的試驗田，是用土壘成了七壟高遠八尺的梯形的高畦。每畦插薯苗六千株，一共有四萬二千株。鄉黨委書記解释說：每株年產二十五斤（採取分期抽挖薯塊和間補薯苗的辦法），合計一畝全年便可產105萬斤。這塊試驗田充分體現出人民群眾的無比創造力，他們的高度的科學水平。它的特點是立體種植，「高空」發展，這就大大擴大了種植面積，使大量的薯塊有「容身」之地。在梯形的高畦上搭上四層的金字塔形的竹架，把密密麻麻的薯蔓掛起來。這就不但可以避免薯蔓與薯塊分爭養

分，而且擴大日照面積，增強光合作用。追肥，用的叫做「按位施肥」辦法，群眾也叫「打針」，它的作用是把肥料施到人們預定的位置，引着塊朝那裏生長。我認為。這在科學上是個重大的革新。我看，畝產一百萬斤是有把握達到的，退一步說，即使畝產六十萬斤，這在農業科學上也是空前的偉舉。

我們又參觀了兩塊水稻高產試驗田。一塊插秧的，指標是畝產五萬斤；另一塊直播的，指標是畝產三萬斤。禾苗生勢都很好。在那塊五萬斤的試驗田裏，每平方寸都插秧十二三條秧，一共是七百多萬條，沒有甚麼株距、行距。田裏十多個男女社員正在按照規定的技術措施，用竹子把禾苗輪回分夾成一行行，使它通風透氣和增強日照。如果說，高產試驗田有科學試驗意義，那末，大面積豐產試驗田則是有普遍意義。我們看了高產試驗田之後，又興致勃勃地去看大石鄉的萬畝豐產試驗田。在連成一大片的圍田裏，整千的男女社員一排排、一組組的在田裏幹活。有的給禾苗「餵飯」（施追肥），有的替禾苗「理髮」（剪葉尾）。有一個社員隨便拔了一蔸禾苗讓我們看，可說是長得根深、稈壯、條數多。接着，我們又到了番禺縣城郊鄉參觀畝產六十萬斤的甘蔗試驗田。他們採取移植的辦法在一畝地種上了九萬根，現在每根重三斤左右，合計已有二十七萬斤。甘蔗長得一人多高了，密密層層。看來槍弹打也打不透。现在距離收獲還有四個多月，六十萬斤肯定是可以拿到手的。

番禺縣的事實還證明，農業科學以至工業科學都不是高不可攀的事。只要走群眾路線，使科學從狭窄的樊籠裏解放出來，就能飛躍前進。一滴水可以透視太陽，我所到的是番禺縣的普通鄉村，這是我們國家的最基層。在这裏所看到的種種變化，也就看到了中國六億人民正在做着震驚世界的事情！

這場農業高產「衛星」的海外奇談，就這樣被層層「驗收」了。以致中國的高層領導人，不只以為中國的糧食問題已經解決，而是在考慮糧食多了怎麼辦？

[1] 《毛澤東傳（1949-1976）》，上冊，頁803-804，808。
[2]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頁683。
[3] 李鋭：《「大躍進」親歷記》（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1996），頁343。
[4] 李鋭：《「大躍進」親歷記》，頁343。
[5] 李鋭：《「大躍進」親歷記》，頁208。
[6] 師道鐸：〈農具大革新，生產大躍進〉，《紅旗》，1958年第13號；《新華半月刊》，1958年第13號，頁87-88。
[7]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興事件的回顧》，下卷，頁685。
[8] 《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錄》，第二卷，上冊，頁197-198。
[9] 毛澤東：〈介紹一個合作社〉（1958年4月15日），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七冊，頁177-178。
[10] 顧龍生編著：《毛澤東經濟年譜》（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頁423。
[11] 李先念：〈關於第二個五年財政計劃要點的報告〉（1958年6月6日），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七冊，頁276。
[12] 毛澤東：〈關於向軍委會議印發李先念第二個五年財政計劃要點的批語〉（1958年6月18日），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七冊，頁273。
[13] 毛澤東：〈關於向軍委會議印發《農業大有希望》報告的批語〉（1958年6月22日），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七冊，頁280。

[14]　　毛澤東：〈關於向軍委會議印發鄧子恢夏收增產統計報告的批語〉（1958年6月25日），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七冊，頁289-290。

[15]《毛澤東傳（1949-1976）》，上冊，頁825-826。

[16]　　〈吳芝圃同志就河南省小麥豐收發表的談話〉，《人民日報》，1958年6月15日；《新華半月刊》，1958年第13號，頁79-80。

[17]《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錄》，第二卷，上冊，頁201。

[18]《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錄》，第二卷，上冊，頁215。

[19]　公報說：按最近數字，我國冬小麥、春小麥合計總產量為779億斤（未收春小麥以90億斤計），而據美國農業部7月10日的估計：美國今年的小麥產量為13.4349億蒲式耳（每蒲式耳為27.22公斤），相當於731.33億斤。其中冬小麥為11.2972蒲式耳，相當於615億斤，春小麥2.1376億蒲式耳，相當於116.3億斤。今年我國小麥產量至少超過美國小麥產量40多億斤；《新華半月刊》，1958年第15號，頁105。

[20]　〈今年夏季大豐收說明了甚麼？〉，《人民日報》社論，1958年7月23日；《新華半月刊》，1958年第15號，頁107。

[21]　冒茀君、石正章、檀英和：〈發射早稻高產「衛星」目擊記〉，《人民日報》，1958年8月11日。轉引自沈久泉等選編：《老新聞——共和國往事（1956-1958）》（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頁163-166。

[22]《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錄》，第二卷，上冊，頁227-228。

三、小社併大社的由來

1958年興辦人民公社，是由原來農業生產合作社的小社併大社而來。辦合作社要辦大社，就毛澤東而言，也是由來已久。

1.毛澤東的大社情結

從農業互助合作運動起始，單幹還是參加互助合作，就被看成是農村走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互助組被看成是具有社會主義萌芽；實行土地入股，土地和勞力參加分紅的初級合作社，屬於半社會主義；只有土地和主要生產工具都歸集體所有，實行按勞分配的高級合作社，才是完全的社會主義。基於這種價值觀念，伴隨着互助合作運動的開展，「贪多」、「貪大」、「求純」（數量愈多愈好，規模愈大愈好，公有化程度愈高愈好）的偏向時有發生。1953年和1955年，根據中央農村工作部的意見，中共中央曾兩次糾正急躁冒進，整頓社隊規模。

對辦大社，毛澤東則持有自己獨到的意見。就在1953年第一次糾正急躁冒進，各地整頓工作取得成效，生產形勢趨於穩定的時候。毛聽信陳伯達説，中央農村工作部反冒進變成了「冒退」的不實反映，[1]開始對上半年的反對急躁冒進不滿。1953年10月15日，在農業互助合作第三次會議召開前夕，毛與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副部長陳伯達、廖魯言談話時，就強調搞合作社要搞大社。他説：

> 互助組還不能阻止農民賣地，要合作社，要大合作社才行。大合作社也可使得農民不必出租土地了，一二百户的大合作社帶幾户鰥寡孤獨，問題就解決了。……合作社不能搞大的，搞中的；不能搞中的，搞小的。但能搞中的就應當搞中的，能搞大的就應當搞大的，不要看見大的就不高興。一二百户的社算大的了。甚至也可以是三四百户。在大社之下設幾個分社，這也是一種創造，不一定去解散大社。所謂辦好，也不是完全都好。各種經驗，都要吸取，不要用一個規格到處套。[2]

在談到城市郊區合作化問題時，毛説：「城市郊區土地肥沃，土地平坦，又是公有的，可以首先搞大社。」他甚至提議，「在城市郊區，蔬菜生產搞互助組，供應不好解決，可以不經互助組，就搞半社會主義的合作社，甚至搞完全社會主義的合作社。這個問題，可以研究一下。」[3]

在这裏，毛澤東對農業生產合作社的發展，不只要求「辦大社」，

而且希望辦完全社會主義的高級社。因為，在他看來，「對於農村的陣地，社會主義不去佔領，資本主義就必然會去佔領」。[4]只有解決了所有制問題，即改變農民的個體私有制為集體所有制，改變資本家私有制為全民所有制，才最终戰勝了資本主義，建立起社會主義；才有利於提高生產力，完成國家工業化。

1955年下半年，因毛澤東《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的報告和中共七屆六中全會，批判農業合作化問題上的所謂右傾機會主義，全國掀起了農業合作化的熱潮。在此期間，各地黨委紛紛向上報告本地組織合作社的經驗。為推動運動的發展，毛澤東以極大的精力，選編了《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一書（1956年2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發行），並親自為每篇文章寫了編者按語。其中對辦大社、高級社的經驗尤為推崇。

中共新海連市委的文章，介紹了一個擁有578戶，佔全鄉可組織農戶93%的大社（全社勞動力1568個，入社土地3344畝，另有新墾荒地2200畝，租入土地350畝）——朝陽鄉前進農業生產合作社有六大優越性：大力平整了土地；實行因地種植；進行了各種技術改革；擴大了複種面積，改一熟田為兩熟田；低產作物改高產作物；發揮勞動力的作用，進行各種基本建設。結論是：「社愈大，優越性愈大」。[5]毛澤東為該文加上〈大社的優越性〉的標題，並在編者按中稱讚說：

> 這篇文章寫得很好，值得一閱。现在辦的半社會主義的合作社，為了易於辦成，為了使幹部和群眾迅速取得經驗，二三十户的小社為多。但是小社人少地少資金少，不能進行大規模的經營，不能使用機器。這種小社仍然束縛生產力的發展，不能停留太久，應當逐步合併。有些地方可以一鄉為一個社，少數地方可以幾鄉為一個社，當然會有很多地方一鄉有幾個社的。不但平原地區可以辦大社，山區也可以辦大社。安徽佛子嶺水庫所在的一個鄉，全是山地，縱橫幾十里，就辦成了一個大規模的農林牧综合經營的合作社。[6]

中共北京市委農村工作部，介紹了北京郊區東冉村鄉遠大農業生產合作社，由初級社轉為高級社，並與該鄉四季青社合併成五百多戶大社的經驗。毛澤東為這篇題為〈一個從初級形式過渡到高級形式的合作社〉的文章，寫編者按說：

> 對於條件已經成熟了的合作社。就應當考慮使它們從初级形式轉到高級形式上去，以便使生產力和生產獲得進一步的發展。因為初級形式的合作社保存了半私有制，到了一定的時候，這種半私有制就束縛了生產力的發展，人們就要求改變這種制度，使合作社成為生產資料完全公有化的集體經營的經濟團體。生產力一經進一步解放，生產就會有更大的發展。……現在辦的合作社一般地是小型社，向高級社轉變的時候，應當取得群眾同意，把許多小型社合併起來成為大型社。如果能夠在這兩年使得每個區

> 都有一個至幾個這樣的合作社，並且在群眾中顯出它們比較初級社具有更大的優越性，那就可以使以後幾年的併社升級工作，獲得有利的條件。這個工作，要同發展生產的全面規劃配合起來。當着人們看見了大型社和高級社比較小型社和初級社更為有利的時候，當着人們看見長期規劃將給他們帶來比較现在高得多的物質和文化的生活水平的時候，他們就會同意併社和升級的。[7]

關於大社的優越性，還有北京市上報的另一篇文章：〈紅星集體農莊的遠景規劃〉，對該農莊從1956年到1972年的發展，分別作了土地利用規劃（土地連片，劃定輪作區，建設莊員住宅區，修建排水溝渠工程，公路幹路和防風護田林帶）；發展養畜業規劃（到1962年全農莊擁有大小乳牛1900頭，集體飼養種猪325口）；培養技術幹部規劃（七年內培養畜牧獸醫四十名，養牛技術人員二十名，養猪技術人員十九名，農業技術人員四十五名，果樹技術人員七名，蔬菜技術人員八名，林業管理技術人員三到四名）；文化福利設施規劃（從1956年起，各大隊建立託兒所、閱覽室和小型俱樂部各一處，在農莊中心區建立中學一處，1957年以前幹部和青年莊員全部掃除文盲）等等。毛澤東對此大加讚賞，並對辦大社寄極大期望，他在編者按中寫道：

> 這是一個全鄉一千多户建成一個大合作社（他們叫做集體農莊，即是合作社）的七年遠景計劃，可作各地參考。為甚麼要有這樣的長遠計劃，人們看一看它的內容就知道了。人類的發展有了幾十萬年，在中國這個地方，直到现在方才取得了按照計劃發展自己的經濟和文化的條件。自從取得了這個條件，我國的面目就將一年一年地起變化。每一個五年將有一個較大的變化，積幾個五年将有一個更大的變化。[8]

以上幾例，不難看出毛澤東對辦大社、辦高級社的熱情，和他對大社、高級社將使中國農村面貌根本改變的厚望。

2.農業社規模的起落

毛澤東親自編輯的《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一書的出版發行，使1955年秋冬掀起的農業合作化高潮進一步升溫——初級農業社的併社升級的熱潮。1956年4月30日《人民日報》公布的材料説：在農業合作化運動大發展的同時，很多農業生產合作社作了適當的合併，由於小社併大社的結果，3月底的社數比1955年底減少了81.6萬個，入社農戶增加了3122萬多戶，平均每社已由四十戶增加到九十八戶（初級社平均五十戶，高級社平均250戶）。[9]據資料顯示，當時盲目辦起的大社，有一兩千戶，甚至五六千戶的聯村、聯鄉的高級社。1956年3月，四川省的高級社平均每社268戶，千戶以上的大社三十一個，最大的社1800多戶。同年4月，廣西壯族自治區高級社平均每社367戶，最大的千餘戶，

一鄉一社佔社總數的86.84%。雲南省文山縣石洞鄉，還出現由土、苗、倮、仆、漢五個民族組成的有403戶的紅旗高級社。[10]像這種大轟大哄發展起來的大社、高級社，必然帶來生產的混亂和人心的不穩定。當年，山西省汾陽縣與中外馳名的汾酒之鄉——杏花村為鄰的賈家莊海燕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就是一例。

在全國批判「小腳女人」的影響下，中共汾陽縣委為盡快改變農業生產條件，提高農作物的產量，作出了「應當使每人有一畝水地」的規劃。賈家莊鄉政府，積極響應縣委號召，決心在三年內實現一人有一畝水地的任務。賈家莊是全縣的先進鄉，全鄉有四個村，都組織了初級社。但在開展水利建設方面，因自然條件不同，都存在各自的困難。西陳家莊村大人多旱地多，發展水地缺水源；太平、董寺兩村，地下水源豐富，但村小人少，力量不足，無力開發；賈家莊是下濕鹽鹼地多，要改變濕陰鹼地的面貌，需在下游挖通退水渠道。在「化」得快是積極，「高」得快是先進，社辦得越大越光榮的思想指導下，鄉政府認為把四個村合在一起，辦成一個社，這對興修水利和發展生產將是有利的。經四個村幹部同意，由鄉政府申報，縣委批準，1956年農曆正月21日正式成立了海燕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四個村17300畝土地全歸社集體所有，取消了土地分紅，實行由社統一核算。除社員自留地外，集體經營部分全部按勞分配。各村的債權、債務，以及牲畜、農具作價等賬務都移交海燕社處理。

海燕社成立後，對農田水利建設，擴大灌溉面積，平田整地創造了條件。但由於高級合作化發展過快，規模過大，突然取消土地分紅，富村群眾感到吃虧。1956年盲目強調改變耕作制度，不顧客觀條件，把棉花種到8400畝，玉茭種到4093畝，兩項種植面積佔到全社耕地面積的72.1%，結果，有879畝棉花沒收成，2000畝玉茭種在鹽鹼地和下濕地裏，產量很低，其中有304畝顆粒未收。賈家莊的糧食總產，1956年為32.5萬斤，比1955年減32%。社員人均分配收入六十八元，比1955年減收33.7%。[11]

鑑於各地出現的種種問題，1956年9月12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下達了《關於加強農業生產合作社的生產領導和組織建設的指示》，對合作社的規模作了如下規定：

> 合作社規模大小，是合作社組織建設的一個重大問題。現有合作社的規模多數是合理的，但是部分地方也曾一度出現片面貪大的偏向，給經營管理和合作社內部團結增加了一些困難。中央認為合作社規模的大小，應該根據有利於生產，有利於團結，適合當前的管理水平，便於聯繫社員的原則加以規定。在目前條件下，合作社的規模，山區以一百户左右，丘陵區二百户左右，平原區三百户左右為適宜，超過三百户以上的大村也可以一村一社。今後建社併社的時候，應該按照這種規模進行。至於現有的

大社，凡能辦好的應該努力辦好，凡不利於生產、多數社員要求分開的，應該適當分開。無論併社或分社，都必須經過協商確實取得合作社幹部、社員的自願，決不能只由上面機械規定，強制合作社執行。[12]

這個規定，雖已大大超過初級社時的規模，但總算有了一個戶數的約束。1957年9月14日，中共中央又接連發出：《關於整頓農業生產合作社的指示》、《關於做好農業合作社生產管理工作的指示》，指出：

> 幾年來各地實踐的結果，證明大社、大隊一般是不適合於當前生產條件的，也證明中央1956年9月指示中規定合作社規模的一般標準，是適宜的。因此，除少數確實辦好了的大社以外，現在規模仍然過大而又沒有辦好的社，均應根據社員要求，適當分小。今後社的組織規模，一般應該以百户以上的村為單位，實行一村一社。有些過小的自然村，相隔又很近的，可以幾村辦一社。過大的自然村，可以一村一社，也可以一村數社……關於生產隊的規模，一般應該以居住接近，二十户左右為宜……
>
> 社和生產隊的組織規模確定了之後，應該宣布在今後十年內不予變動。[13]

按照中共中央的部署，經過1956年和1957年的多次整頓，1956年春高級社的平均規模為250戶左右，年底缩至200戶左右；1957年社的規模繼續缩小，平均減至150.7戶左右。[14]另有材料顯示：1957年底，高級社平均為158.7戶，較1956年底的199戶減少40.3戶，較1956年1月268.5戶減少109.8戶。[15]與此同時，有關生產管理的「三包一獎」制度、勞動分配制度也基本落實。社員情緒趨於穩定，1957年也取得了好的收成。

但是，随着農村社會主義大辯論的深入，《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的公布，農田水利建設運動的興起，新一輪的併社升級又開始出現，使剛宣布社隊規模「今後十年內不予變動」這句話成了歷史。

3.成都會議的決策

毛澤東最初主張辦大社，一個主要的理由，就是小社不能辦大事，只有大社才能進行大規模的經營和建設。這個看法，在1957至1958年冬春的農田水利建設中，似乎得到了驗證。1957年秋，黨內批評右傾保守思想，批評反冒進，在農村開展社會主義大辯論。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在今冬明春大規模開展興修農田水利和積肥運動的決定》。随後，全國農村掀起空前規模的農田水利建設和積肥運動熱潮。一些跨村的工程建設遇到了社與社之間的矛盾以及勞力和資金方面的困難，許多地方一些農業合作社自發地合併成大社，試圖通過併社集中勞力、物資和資

金，解決面臨的問題。

四川瀘縣的併社工作就是在冬季生產運動的高潮中進行的。當時，興修水利、積造肥料和改良土壤的任務很大，而全縣平均每個農業社只有六十多戶，人力物力都感不足；在土地方面，也由於小社分布零散，不便統一規劃；特別是不少農業社領導骨幹薄弱，財務制度混亂，嚴重地阻礙着生產的發展。廣大農民紛紛要求併小社為大社。中共瀘縣縣委決定進行併社工作，在春耕前夕把全縣三千多個中、小型農業社合併成七百多個大社，社的規模平均在二百五十戶左右。[16]

其間，廣西也出現併社現象。

毛澤東得知後，引起很大興趣。他在1958年1月的南寧會議上，就說：「可以搞聯邦政府，社內有社。」後來正式提出小社併大社的主張。[17]並指示中央有關部門起草《關於把小型的農業合作社適當地合併為大社的意見》。1958年3月，成都會議通過了這個文件。4月上旬，由中共中央政治局批準後發出。《意見》指出：

> 我國農業正在迅速地實現農田水利化，並將在幾年內逐步實現耕作機械化，在這種情況下，農業生產合作社如果規模過小，在生產的組織和發展方面勢將發生許多不便。為了適應農業生產和文化革命的需要，在有條件的地方，把小型的農業生產合作社有計劃地適當地合併為大型的合作社是必要的。[18]

中央政治局同時批準的還有《中共中央關於農業機械化問題的意見》。《意見》首先強調：「有廣大農民參加的群眾性的農具改革運動是技術革命的萌芽，是一個偉大的革命運動，全國各地應當普遍地積極推廣，並且經過這個運動逐步過渡到半機械化和機械化。」因此，「不要單純等待農業機器，而放鬆了新式畜力農具和改良農具的推廣」。《意見》提出：「我們的任務是：在七年內（爭取五年內做到）基本上實現農業機械化和半機械化，實現農業生產力的大發展。」農業機械的製造，除了大型的和技術要求較高的農業機器以外。一般的應該以地方工業為主。為適應農業機械的生產和修配，應當在縣、鄉設立農機修配站。認定：「實現農業機械化，主要靠農業合作社自己的力量。只有這樣，才能使農業機械化的事業辦得更多、更快、更好、更省。」[19]

這樣，一種打破社與社界限和工農業分工的大社，就在適應「農田水利化」、「耕作機械化」的要求下，紛紛出現。

4月12日，《人民日報》頭版頭條，以〈聯鄉併社發展生產力〉為題，報道了福建省閩侯縣在3月間，把城門、下洋、龍江三個鄉合併為一個鄉、把二十三個農業生產合作社合併為一個社的消息，並用「編輯的話」的形式，將中央把小社併大社的意見的主要觀點公開發表。

在全省開展併社工作，遼寧省和廣東兩省是走在前面的。

遼寧省在5月間進行了小社併大社的工作，將9600個社併成1461個

大社，平均每社2000戶左右，其中萬戶以上的社九個，最大的1.8萬戶。併社的同時，調整了鄉的規模。全省由2854個鄉合併成1226個鄉，基本上實現了一鄉一社。中共遼寧省委農村工作部，在總結全省併社運動來得如此迅猛的原因説，這次群眾性的併社運動的形成，一方面是由於，從1956年起，全省就辦了399個千戶以上的大社，這些大社辦得都不錯，在生產上顯示了很大的優越性。「另一方面，是由於去冬今春在農村掀起大規模的農田水利高潮之後，很快就顯示出，現有社的規模不能適應農業生產大躍進的矛盾。小社不但許多事情沒有力量舉辦，而且使人們連想都不敢想，既限制了自然資源的開發和利用，也限制了人们的思想解放。正如群眾所説：『小社已經成為大躍進的絆腳石。』由於大社優越性的實際教育和生產的迫切需要，所以群眾對小社併大社表現了強烈的要求。領導提出併社以前，群眾紛紛向領導上申請併社；領導提出併社之後，便馬上行動起來，表現了一種勢如破竹的氣概」。[20]

5、6月間，河南信陽地區的遂平、平輿兩縣的小社也先後都併成了大社。7月下旬，農業部在哈爾濱召開東北地區農業協作會議，肯定並推廣了遼寧的經驗。黑龍江、吉林和內蒙古都準備在秋收前後着手進行併社工作。[21]

由於不少地方的併社是在原有行政區劃內完成的，實際上已在向鄉社合一，政社合一轉變。但在當時還沒有統一的名稱。在河南省，有的叫集體農莊，有的叫社會主義大院。遼寧省蓋平縣一個大社稱「太陽升共產主義農場」，四川有稱「國營農場」的。然而，在中共中央領導人中間，這時已開始醞釀新的農村基層組織結構問題了。

[1]《鄧子恢傳》編輯委員會編：《鄧子恢傳》（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頁463。

[2] 毛澤東：〈關於農業互助合作的兩次談話〉（1953年10月15日、11月4日），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文集》，第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頁299-300。

[3] 毛澤東：〈關於農業互助合作的兩次談話〉，頁300、306。

[4] 毛澤東：〈關於農業互助合作的兩次談話〉，頁299。

[5] 中共新海連市委員會：〈大社的優越性〉（1955年9月21日），載《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中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頁611-622。

[6]《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中冊，頁611。

[7]《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上冊，頁285-286。

[8]《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上冊，頁311。

[9] 劉國新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錄》，第一卷，下冊（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頁1421。

[10] 高化民：《農業合作化運動始末》（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99），頁308-309。

[11] 山西省汾陽縣農業合作化史編委辦公室安廣禮、任達甫、王林强：〈賈家莊農業合作化史〉，《當代中國農業合作化》編輯室編：《中國農業合作史資料》，1990年第4期，頁40-41。

[12]《當代中國農業合作化》編輯室編：《建國以來農業合作化史料彙編》（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2），頁392。

[13]《建國以來農業合作化史料彙編》，頁450。

[14]《中國農業合作史資料》，1989年第1期，頁26。

[15] 高化民：《農業合作化運動始末》，頁343。

[16]《人民日報》，1958年4月23日。

[17]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頁729。

[18]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農業委員會辦公廳編：《農業集體化重要文件彙編（1958-1981）》，下冊（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1），頁15。

[19] 〈中共中央關於農業機械化問題的意見〉（1958年3月22日），載《農業集體化重要文件彙編（1958-1981）》，下冊，頁17-18。

[20] 中共遼寧省委農村工作部：〈遼寧省併社運動〉（1958年9月），載《建國以來農業合作化史料彙編》，頁472。

[21] 《人民日報》，1958年7月21日。

四、人民公社的出現

1.中央領導人「吹烏托邦」

共產主義，在中國共產黨的黨章總綱中，從來是作為最高綱領來提的。但在提出十五年趕超英國的口號以後，共產主義對中國來說，似乎已經不是原來認為那麼遙遠的事了。《人民日報》1958年元旦社論就寫有這樣一段話：

> 我們要在十五年左右的時間內，在鋼鐵和其他重要工業產品產量方面趕上和超過英國；在這以後，還要進一步發展生產力，準備再用二十年到三十年的時間在經濟上趕上並且超過美國，以便逐步地由社會主義社會過渡到共產主義社會。

中共八大二次會議期間，毛澤東在5月17日的講話提綱中則明確提出：

> 我們不提「技術決定一切」，「幹部決定一切」之類的口號，也不提列寧的「蘇維埃加電氣化=共產主義」的口號。而提我們現在的一些口號，反而快些好些，為甚麼？
>
> 我們的口號高明些，幹部、技術、共產主義可能提前到來。[1]

隨着大躍進形勢的發展，人們對趕超英、美，以至過渡到共產主義是愈來愈樂觀了。

鄉社合一的主張最早是陳伯達提出來的。1956年冬，陳到福建蓮塘鄉搞農村調查，1957年初給中央寫了個報告，提出很多意見。其中就有：一、「可以把鄉（村）和社合在一起，使合作社成為真正的基層；二、可以考慮把供銷合作社和信貸合作社併到農業生產合作社」。[2]中央書記處討論後認為，「這兩個問題牽扯較大，必須慎重考慮」，決定暫不實行。但據胡喬木回憶，（1958年）2、3月間，毛澤東跟陳伯達談過一次話，說鄉社合一，將來就是共產主義雛形，甚麼都管，工農商學兵。這是同陳伯達個人的談話，當時還沒有在中央討論過。[3]

在大搞農田水利建設的高潮中，地方工業也遍地開花，農村勞動力開始緊張。有的地方為了盡可能多地將勞動力用到工農業生產上去，開始辦起了簡陋的公共食堂和託兒所。為了讓青年農民學到農業技術，吉林省延邊地區、河南省的登封縣、湖南省的瀏陽縣等地的農村辦起了「農業大學」。在這種背景下，劉少奇等中央領導人開始議論起共產主義公社問題。薄一波回憶說，陸定一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的發言、1958

年11月7日劉少奇在第一次鄭州會議上的講話，都談到中共中央領導人最早議論共產主義公社的情況。劉少奇在第一次鄭州會議上說：

> 公社這個名詞，我記得，在这裏（鄭州火車站——薄一波註，下同），跟吳芝圃同志談過。在去廣州開會（1958年4月底去廣州向毛澤東匯報八大二次會議的準備情況）的火車上，有我、恩來、定一、鄧力群，我們四個人吹半工半讀，吹教育如何普及，另外就吹公社，吹烏托邦，吹過渡到共產主義。說建設社會主義這個時候就為共產主義準備條件，要使前一階段為後一個階段準備條件，我們搞革命就是這樣的，開始搞前一步的時候，就想到下一步，為下一步創造條件。我們現在建設社會主義，就要為共產主義創造一些順利條件。還吹空想社會主義，還吹托兒所，集體化，生活集體化，還吹工廠辦學校，學校辦工廠，半工半讀。要鄧力群去編空想社會主義，要定一編馬恩列斯論共產主義。下了火車，在這個地方，大概有十幾分鐘，跟吳芝圃同志說，我們有這樣一個想法，你們可以試驗一下。他熱情很高，採取的辦法也很快（吳芝圃插話：那個時候，托兒所也有了，食堂也有了，大社也有了，還不叫公社），工農商學也有了，就是不叫公社。鄉社合併是老早就有的。陸定一回去，馬上就編了那本書。八大二次會議，我去講了一個半工半讀和生活集體化。後頭要北京試驗，要天津（泛指河北省，因為當時天津市屬河北省，是河北的省會）試驗。公社就是這樣來的。事實上已經有了，他們叫大社。陸定一同志在八大二次會議發言裏邊講了這個東西。[4]

5月19日，陸定一在八大二次會議上作《馬克思主義是發展的》發言，結尾部分說：

> 毛主席和少奇同志，談到幾十年以後我國的情景時，曾經這樣說：那時我們的鄉村中將是許多共產主義的公社，每個公社有自己的農業、工業，有大學、中學、小學，有醫院，有科學研究機關，有商店和服務行業，有交通事業，有托兒所和公共食堂，有俱樂部，也有維持治安的民警等等。若干鄉鎮公社圍繞着城市，又成為更大的共產主義公社。前人的烏托邦的夢想，將被實現，並將被超過。我們的教育事業和其他文教事業，也將朝著這個目標去發展。[5]

據薄一波分析，雖然陸定一這段話也包括劉少奇在火車上「吹」的那些內容，但主要是轉達毛澤東在廣州向他們四人談的內容。[6]

陸定一返回北京後，根據劉少奇交待的任務，立即組織中共中央宣傳部的工作人員全力突擊，於6月間編出《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論共產主義社會》一書的初稿。8月，由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編者的話」說：「在我國社會主義建設處於『一天等於二十年』的大躍進形勢之下，人們都不能不關心着我國將如何由社會主義社會逐步過渡到共產主義社會的問題。為了啟發思考，展望未來的前景，我們就編

了這樣一本書來供大家學習和參考。」[7]書中第一條語錄，就是恩格斯1845年2月8日〈在愛北斐特的演說〉中描繪共產主義社會概況的幾段話。這條語錄提到共產主義社會的基層組織是「公社」，並認為「在這種社會裏，管理機構必須管理的不僅是社會生活的個別方面，而且是整個社會生活的一切表現、一切方面」。薄一波在回憶中說：這部書的編出，對毛澤東最後決定把新合併起來的大社叫做人民公社看來起了不小的促進作用。因此，在後來的北戴河會議上，毛澤東一再向與會者推薦這本書。[8]

2.陳伯達披露毛澤東的設想

7月1日，中共中央的理論刊物《紅旗》第三期，發表陳伯達的署名文章：〈全新的社會，全新的人〉。文章著重介紹了同期發表的中共湖北省鄂城縣委寫的：〈旭光一社用土辦法辦小小工廠〉和〈旭光一社是怎樣領導和管理小小工廠的〉兩篇通訊。陳文指出：

> 這一個合作社的情況，是高度發揚地方首創精神和群眾首創精神的一個光彩奪目的典型，在實際上是我國社會主義國民經濟普遍高漲的一個縮影。所説的「這些小工廠辦得快、生產快、收效大」，恰好説明地方的、群眾的首創精神在迅速實现全國工業化的鬥爭中所將起的作用。通過這兩篇通訊，我們看到在大躍進中的中國，看到全新的社會，全新的人。……用毛澤東同志的話來説，他們正在原來那個空白點上，「寫最新最美的文字」，「畫最新最美的畫圖」。

文章具體介紹了旭光合作社的九條做法。其中第一條：「把一個合作社變成一個既有農業合作又有工業合作的基層組織單位，實際上是農業和工業相結合的人民公社。」然後得出結論説：

> 可以不可以説，這個合作社的所作所為，在實際上是指出了我國能夠以史無前例的高速度發展生產力、能夠比較迅速地消滅工業同農業之間的區別以及腦力勞動同體力勞動之間的區別，從而為我國從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創造出順利條件的一種正確道路呢？我想，完全可以這末説。
>
> ……
>
> 兩篇通訊的題目，都很謙遜地寫着「小小工廠」的字樣。但是，這類同農業相結合的合作社的「小小工廠」，卻具有無限的生命力，因為它們所代表的，是不可抵抗的、新生的、前進的力量，是共產主義的力量。

如果説，上文把農業合作社辦工廠，看成是為從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創造了一條正確道路，並第一次使用了人民公社的名稱。那末，

陳伯達同日在北京大學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三十七周年大會上，作的題為〈在毛澤東同志的旗幟下〉的長篇演講，就在公開場合，從歷史到現實，引經據典，透露了毛澤東關於共產主義公社的基本構想。他在演講中說：

> 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著作中想為無產階級專政實現後可以採取的十項措施的最後兩項是：「將農業同工業結合起來，促使城鄉差別狀態逐漸消滅」；「將教育同物質生產結合起來」。在现在中國的實際運動中，毛澤東同志所提出而為黨的「八大」二次會議所通過的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和它所包含的幾個基本點正在使這兩項措施的實現條件和具體形式，逐步明朗化。毛澤東同志說，我們的方向，應該逐步地有秩序地把「工（工業）、農（農業）、商（交換）、學（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裝）」組成為一個大公社，從而構成為我國社會的基本單位。在這樣的公社裏面，工業、農業和交換是人們的物質生活；文化教育是反映這種物質生活的人們的精神生活；全民武裝是為着保衛這種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在全世界上人剝削人的制度還沒有徹底消滅以前，這種全民武裝是完全必要的。毛澤東同志關於這種公社的思想，是從現實生活的經驗所得的結論。
>
> 很顯然，在毛澤東思想的指導下，在毛澤東同志的旗幟下，在這樣「一天等於二十年」的國民經濟和文化普遍高漲的時候，人們已經可以看得見我國將由社會主義逐步過渡到共產主義的為期不遠的前景。[9]

關於人民公社的起源，陳伯達後來在第一次鄭州會議上锐：「人民公社，我沒有感性知識，主席要我們到天津（當時河北的省會）去，到天津後，跟安國、徐水、定縣、正定幾個縣委的同志談了一下。安國的同志説過這個問題：他們有五萬畝窪地要搞成稻田。他們説，既然調了很多勞動力，大家協作，把窪地變成稻田，就不如搞成一個大社。」[10]

3.最早出現的一批公社

中共上層議論共產主義公社的信息，很快在各地得到了反響——有的地方已經把合併的大社稱為共產主義公社了。

浙江省諸暨縣城南鄉6月中旬成立的大社，就叫「紅旗共產主義公社」；6月底，遼寧省安東縣的前陽地區，由前陽、新安等五個農業生產合作社合併的大社，叫「前陽公社」，並且是中共安東地委和安東縣委進行「由集體所有制過渡到全民所有制」的試點。

6月底7月初，晉、冀、魯、豫、陝五省和北京市在鄭州召開農業協作會議。譚震林在作結論時，講了農業生產合作社的變革問題，他說：「農業大豐收，在農村已開始了新的變革，在合作社組織上和合作社的

經營管理上、規模上開始了變革，它已經不能按照原來那些方法、那一套制度、那一套形式來發展了，需要有所改變了。」「像遂平縣嵖岈山衛星社已經不是農業合作社，而是共產主義公社」。「華東有百分之十到十五的合作社需要過渡，由現在的狀況過渡到更高級。辦法是直接到國營農場，……有些地方搞公社，……大概是一萬戶左右」。[11]會後，譚震林向信陽地委的負責人講了一番黨中央和毛澤東關於辦公社的設想和道理。他對共產主義公社的前景作了如下描述：

> 首先，有好的食物，而不僅僅是填飽肚子。每頓有肉、雞、魚、蛋，還有更精美的食物如猴頭、燕窩、海味等等，都是按需供給。
>
> 第二，衣服穿著方面，一切要求都可以滿足。有各種花色和品種的服裝，而不是清一色的黑色和藍色。將來，普通服裝僅作為工作服使用，下班後，人們就換上皮服、呢絨和羊毛制服，當人民公社都養了狐狸，那時外套就都是狐皮的了。
>
> 第三，房屋都達到現代城市的標準。現代化是甚麼？人民公社。在屋子的北廂有供暖設備，南廂有空調設備，人們都住在高樓裏，不用說，裏面有電燈、電話、自來水、無線電和電視。
>
> 第四，除了跑步的選手外，旅客和行人都有交通工具，航班通向各個方向，每個省都有飛機場，每個地方都有飛機製造廠的日子也不遠了。
>
> 第五，每個人都受高等教育，教育已經普及。[12]

譚震林的活動和講話說明，組織共產主義公社，已開始成為有領導的行為了。

前述陳伯達在北京大學的演講，使組織公社的領導意圖更明白地反映了出來。於是，最先得到資訊的河南省，7月間，在併大社的基礎上，迅速掀起了組織人民公社的熱潮。8月10日，中共河南新鄉地委向省委和中央匯報，已辦起354個人民公社，平均每社5345戶，其中：7月18日成立的修武縣人民公社是一縣一社，共29193戶。8月13日中共河南省委向中共中央電話匯報說，全省已建立公社1463個，佔計劃數的52.42%。[13]

在此期間，《紅旗》雜誌常任編輯李友九帶着任務於7月17日到達已改名為衛星人民公社的嵖岈山衛星農業社。8月8日，李友九給總編輯陳伯達寫信匯報衛星人民公社的情況說：他們这裏併大社，原來也只是為了併大一點，好搞建設。到鄭州一匯報，譚震林和他們講了一番「工、農、商、學、兵」辦「公社」的道理，回來就叫成公社了。公社這個名詞群眾還不習慣，有寫成「共社」的，有寫成「工社」的。李還隨信寄去一份《嵖岈山衛星人民公社試行簡章（第二次草稿）》，並說明這份草稿是他和河南省委書記處書記史向生、省委農村工作部副部長

崔光華、信陽地委書記路憲文，在这裏「大匯合，大研究」之後寫成的。陳伯達收到後，即將《簡章》草稿的複製件和李友九的信轉報毛澤東。此《簡章》草稿引起毛的極大興趣，他後來說：「我在河南調查之後，叫河南同志跟《紅旗》雜誌合作，搞了一個衛星公社的章程，我得了那個東西，如獲至寶。」[14]

4.毛澤東視察冀豫魯津

就在各地競放「衛星」，興辦大社的時刻，毛澤東於8月上旬外出農村視察，以確定下一步的決心。

8月4日，毛澤東第一站來到河北徐水縣，河北省委書記解學恭、副省長張明河、保定地委書記李悅農和徐水縣委第一書記張國忠陪同視察。《人民日報》記者康濯作了長篇報道。[15]其中說，下午4點半鐘，毛澤東穿着灰褲子，白襯衣，精力充沛，滿臉紅光，首先到了南梨園鄉的大寺各莊農業社，他向社幹部問道：

「今年的麥子收得好嗎？」

社主任李江生答：「很好！比哪一年都強。」

毛又問：「每畝平均多少斤？」

支書閻玉如答：「七百五十四斤！」

毛笑着讚嘆道：「不少呀！」隨後又問，大秋作物的預計產量，社裏的、全縣的。

縣委書記張國忠說：「今年全縣夏秋兩季一共計劃要拿到十二億斤糧食，平均每畝產兩千斤。主要是山藥高產，全縣共種了春夏山藥三十五萬畝。」

毛聽後說道：「要收那麼多糧食呀！」「你們夏收才拿到九千多萬斤糧食呢！秋季要收十一億呀！你們全縣三十一萬多人口，怎麼能吃得完那麼多糧食啊？你們糧食多了怎麼辦啊？」

張國忠答道：「我們糧食多了換機器。」

毛說：「又不光是你們糧食多，哪一個縣糧食都多！你換機器，人家不要你的糧食呀！」

李江生說：「我們拿山藥造酒精。」

毛說：「那就得每一個縣都造酒精！哪裏用得了那麼多酒精啊！」

張國忠笑道：「我們只是光在考慮怎麼多打糧食！」

毛說：「也要考慮怎麼吃糧食哩！」「其實糧食多了還是好！」「多了，國家不要，誰也不要，農業社員們自己多吃嘛！一天吃五頓也行嘛！」

隨後，毛澤東視察了糧食加工廠、供銷部、醫院、豬場、縫紉廠，又參觀了幼兒園和敬老院。從敬老院食堂出來，毛對陪同的人們說：

「這婦女勞力解放得很徹底哩！」

保定地委書記李悦農説：这裏的婦女都脫離了炕台，鍋台、磨台，碾台這四台。

毛説：「是呀！人人都吃食堂，社社都辦幼兒園……」毛看了看張國忠説：「這個縣是十一萬多勞力，抽出了四萬多搞水利、打機井、辦工業，只有七萬多人搞農業嘛！」隨後又同解學恭、張明河説：「他們道又解放婦女勞力，又搞軍事化，全縣農業社搞了九十多個團，二百多個營。他們就是這個辦法哩！」

這段話表明，毛澤東對徐水搞軍事化的一套做法很感興趣。

毛澤東走進了一塊半人高的棉花地邊。他一邊讚美着這塊經濟作物，一邊分開密密擠擠的棉枝向地裏走。但走了幾步，就停了下來説：

「我鑽不進去了啦！」並問道：「這一畝可以收多少棉花呀？」

李江生説：「一千斤皮棉。」

毛澤東一邊從棉花地裏走出來，一邊説：「那就是三千斤籽棉囉！」

再往前走，毛澤東又看了黍子，玉米和穀子，看了糞堆形的山藥和每條道栽四行秧子、八行秧子以及十二行秧子的幾種山藥。在每一塊不同的地裏，都要問每畝栽多少棵秧子，施多少底肥，追肥怎麼上，畝產多少斤，毛聽到那些山藥都是畝產二十五萬斤，有的竟計劃畝產一百萬斤，不禁又笑問道：

「你們這糧食吃不完，怎麽辦呀？」又對鄉、社幹部説：「糧食多了，以後就少種一些，一天做半天活兒，另外半天搞文化，學科學，鬧文化娛樂，辦大學中學，你們看好麽？」

有人告訴毛説，這個社已經辦起了共產主義的紅專大學。毛又驚又喜地「啊」了一聲，笑着直點頭。

臨別時，毛澤東和鄉社幹部一再握手，並説：「耽誤了你們不少的工夫！」「祝你們豐收！秋後我要有時間的話，再來看你們。」

在視察了河北的徐水、安國、定縣三縣以後，毛澤東不顧疲勞，頂着炎炎烈日，趕赴河南。8月6日至8日視察了河南的新鄉縣七里營人民公社的社辦工業和棉田；襄城縣粱莊、薛元等農業社種植的煙葉和穀子；長葛縣「五四」農業社的玉米田和商丘縣道口鄉中華農業社種植的紅薯和稻子。陪同視察的有中共河南省委第一書記、河南省省長吳芝圃，中共河南省省委書記處書記楊蔚屏、史向生。6日下午，毛澤東到達新鄉縣七里營人民公社，詢問了這個公社的情況，參觀了這個公社的託兒所、「幸福院」、食堂、麵粉加工廠、滾珠軸承廠，又到田間觀看了棉花的生長情況。他從棉花地裏走出來向社幹部説：「像這樣的棉花有多少？」社長王文生説：「七里營生產隊一萬零五百畝，有五千多畝是這樣的。每畝保證皮棉一千斤，爭取二千斤。」毛澤東笑着向吳芝圃

說：「吳書記，有希望啊！你們河南都像這樣就好了。」吳芝圃說：「有這麼一個社就不愁有更多這樣的社」，毛說：「對！有這樣一個社，就會有好多社。」並指出：「人民公社是個好名字，包括工、農、商、學、兵，它的特點一曰大，二曰公。」[16]

接下來，8月9日毛澤東到了山東。毛對陪同視察的中共山東省委書記處書記譚啟龍、裴孟飛說，部署各項工作必須通過群眾鳴放辯論。計劃、指標不經過群眾辯論，主意是你們的；辯論後，群眾自己是主人了，幹勁自然更足。他一再強調領導必須多到下面去看，幫助基層幹部總結經驗，就地進行指導。還談了辦大社的優越性。當譚啟龍匯報說歷城縣北園鄉準備辦大農場時，毛說：「還是辦人民公社好，它的好處是，可以把工、農、商、學、兵合在一起，便於領導。」在去北園農業社的路上，毛看到路旁稈粗穗大的穀子時，接連向陪同他參觀的譚啟龍、歷城縣委第一書記呂少泉等人讚揚說：「你們的小米長得不孬嘛，我看群眾幹勁不小！」在視察稻田的時候，毛一邊看，一邊詢問水稻的品種、深耕、密植等情況。當問到計劃產量時，社主任李書成說：「五十畝高額豐產田，原來計劃畝產二萬斤，現在我們要爭取產四萬斤，過去一畝只產二、三百斤。」毛澤東聽了高興地說：「好，你這個人，不幹就不幹，一幹就幹大的。」[17]

8月10日至13日，毛澤東在天津視察。視察期間他提出：「地方應該想辦法建成獨立的工業體系。首先是協作區，然後是許多省，只要有條件，應建立起比較獨立的但是情況不同的工業體系。」他還說：「一個糧食、一個鋼鐵，有了這兩樣東西就甚麼都好辦了。」[18]

毛澤東一路視察興致很高，對農民群眾的幹勁和大躍進的形勢十分滿意；對各地所報的漫無邊際的高產數字，深信不疑；他對幹部和群眾的鼓勵，使人們激動不已，《人民日報》報道說：

> 掌聲和歡呼聲響成一片。「毛主席萬歲！」「共產黨萬歲！」「鼓足幹進！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更快更早地向共產主義邁進！」這些口號，發自和毛主席心連着心的人們的心坎上、心尖上。……
>
> 人們興奮地跳起來，興奮地心神無主地南北跑動。人們歡呼領袖，向領袖伸過手來。我們偉大的領袖，……他那集中了上下古今的勞動人民智慧的眼睛看着大家，他那大山般魁偉的身軀和海洋般寬闊的額頭，發出萬道光彩，照射到每一個徐水人的火焰熊熊的心上。

這確是如實地反映了當年群眾與領袖同樣火熱的心。於是，反過來又進一步助長了幹部和群眾的「熱情」和「幹勁」。中共徐水縣委在毛澤東離開的當夜召開了全縣的電話會議，「鄉鄉社社都在電話會議上向黨和毛主席保證一定要使今年的糧食和工業等各個戰線上都獲得大豐

收」。全縣十一萬多名農民經過兩天一夜的苦戰，就積肥31.46萬多車，大秋作物追肥6.66萬多畝，除草八萬多畝。中共定縣縣委也召開了三百多負責幹部參加的緊急會議，全縣在兩天時間內除大搞積肥追肥外，並新建起化肥廠2320座。安國縣決定1958年全縣糧食產量力爭達到畝產四千五百斤，為保證實現明年畝產小麥二千斤的計劃，決定每畝施底肥十五萬斤，全縣鄉鄉社社都召開了躍進大會，形成一個新的生產高潮。[19]山東北園農業社的中共總支委員會舉行會議，決定立即動員全體社員，採取一切措施，保證豐產水稻和各項作物的計劃產量，還要大量培植各種「衛星」田；同時決定把毛澤東來農業社視察的情況寫成喜報，送給全縣所有的農業社，「使全縣人民共用毛主席對他們的關懷」，並且和全縣各農業社攜手並進，決心為實現雙千斤縣而奮鬥。[20]

8月18日，《人民日報》隨行採訪的記者以〈人民公社好〉為題，第一次發表了河南信陽專區建立人民公社的新聞。文中把毛澤東在河南和山東關於：「人民公社是個好名字，包括工、農、商、學、兵，它的特點一曰大，二曰公。」「還是辦人民公社好」的談話內容，發了出去。報道說：

> 在祖國全面大躍進的鼓舞下，一個由社會主義邁向共產主義的偉大社會變革——建立人民公社的運動，正在河南信陽地區蓬蓬勃勃地展開。經過試辦的經驗證明：這種鄉社合一的、把工農商學兵合為一體，統一領導和管理的人民公社制度，更能適應我國農村社會生產力的進一步發展，比一般合作社顯示出更大的優越性，更能有效地促進工農業的更大躍進，從而加速農業機械化、電氣化的發展過程，是全面發展農村經濟、文化事業、在廣大農村中建立共產主義制度的最好的基層組織形式。人民公社的建立，標誌着我國農業合作化制度又開始向前大大邁進了一步。[21]

全國聞風而動，一場史無前例的「人民公社化運動」由此興起。毛澤東看了報紙，連說「糟糕」，[22]因為畢竟此事還未經中央政治局討論過。不過，事已如此，毛澤東也只好聽其自然，何況從內心深處講，他對人民公社確實由衷的喜愛呢！

逄先知在〈毛澤東與他的秘書田家英〉的長文中，有一節談到人民公社的興起。在說到「1958年夏，人民公社一出現，就引起毛澤東極大的興趣和關注」之後，胡喬木親自加寫了一段話：

> 這是因為人民公社本來就是毛澤東想像中的農村烏托邦，他沒有想到，他的烏托邦被陳伯達在北京大學講了出來，這個講話又被發表在當時剛剛出世的陳伯達本人主編的黨中央理論刊物《紅旗》上（《紅旗》也是在毛澤東再三督促下問世的），也就不脛而走，也就有一些人異牀同夢，人民公社居然堂而皇之地成

為當年中國農村的「新生事物」。[23]

「人民公社本來就是毛澤東想像中的農村烏托邦」，這是對毛澤東的人民公社情結的點睛之筆。

[1] 毛澤東1958年5月17日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全體會議上的講話提綱，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七冊，頁197。

[2] 《陳伯達同志關於福建蓮塘鄉農業生產合作社的一些問題向中央和主席的報告》，（1957年1月7日）。

[3] 周承恩：〈人民公社和社會主義建設中的空想論〉，《中共黨史研究》，1988年第5期。

[4]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頁731-732。

[5] 陳清泉、宋廣渭：《陸定一傳》（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9），頁488。

[6]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頁733。

[7] 人民出版社編輯：《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論共產主義社會》（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8]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頁736。

[9] 《紅旗》，1958年第4期。

[10]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頁737。

[11]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頁737。

[12] 淩志軍：《歷史不再徘徊——人民公社在中國的興起和失敗》（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頁61-62。

[13]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頁739。

[14]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頁738。

[15] 康濯：〈毛主席到了徐水〉，《人民日報》，1958年8月11日；《新華半月刊》，1958年第16號，頁35-37。

[16] 《人民日報》，1958年8月12-13日。

[17] 《人民日報》，1958年8月13日。

[18] 《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錄》，第二卷，上冊，頁222。

[19] 《人民日報》，1958年8月11日。

[20] 《人民日報》，1958年8月13日。

[21] 《新華半月刊》，1958年第17號，頁63。

[22] 權延赤：《衛士長談毛澤東》（北京：北京出版社，1989），頁31。

[23] 逄先知：〈永遠懷戀胡喬木同志〉，載劉中海、鄭惠、程中原編：《回憶胡喬木》（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4），頁69。

第三章

大煉鋼鐵和人民公社化運動

一、北戴河會議決議

北戴河會議，是1958年8月17日至30日在北戴河舉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參加會議的，除中央政治局委員外，有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和中央各部委負責人。會議期間，還交叉舉行有協作區主任會議；省、市、自治區工業書記會議。

對農業高產「衛星」和鋼鐵翻番，在中共高層並非無人耽憂。

周恩來在7月上旬，曾借着毛澤東批評有的地區報告糧食產量不夠實事求是的「東風」，在廣州召集一些縣的負責人了解情況，指出報糧食產量要避免虛假性，要保證社員的口糧，並告誡與會人員，千萬不要講大話，損害群眾的利益。[1]

7月17日，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根據毛澤東的意見，對1959年的鋼產量，初步提出三個方案：2500萬噸，或2700萬噸，或2800萬噸。會後，周恩來就國民經濟的躍進問題，為中共中央起草政治局會議文件。其中提到，1958年整個國民經濟全面大躍進已成定局。同時指出，有些大協作區提出的生產指標過高，不少缺口難以解決。認為，建設指標定得過高，「可能在以後出現大的馬鞍形」，對國民經濟的發展帶來不利影響。提出，對各大協作區提出的指標，應當作適當的調整。[2]

當時擔任毛澤東兼職秘書的水利電力部副部長李銳，在參加華東協作區計劃會議後，於7月7日直接給毛澤東寫了一封長信，委婉地反映了華東1959年產鋼六百萬噸的計劃對機械工業造成的嚴重困難，以及電力難以相應保證計劃的完成等情況。希望引起毛對這種不切實際的高指標的關注。[3]

但正如陳雲當時在私下談話説，現在熱度太高，提不同意見沒人聽。有一次，薛暮橋和宋劭文去見陳雲，希望陳找毛澤東談談他對「大躍進」中的一些問題的想法，陳雲説：「現在不是毛主席一個人熱，全國許多領導都熱，不吃一點苦頭，這些話是聽不進去的。」[4]

北戴河會議，正是這種熾熱「氣溫」在中共黨內達到顛峰的表現。

會議除重點討論了計劃、鋼鐵、人民公社外，還討論了教育、財貿、勞動制度等問題。通過了《關於1959年計劃和第二個五年計劃問題的決定》、《關於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關於教育工作的指示》等四十個文件。發表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號召全黨全民為生產一千零七十萬噸鋼而奮鬥」的會議公報。

1.緊急動員鋼鐵翻番

1958年產鋼1100萬噸，是6月19日定的任務。雖然6月20日就作了布置，但7月份只產鋼七十萬噸。從1月到7月底，累計生產鋼380多萬噸，同1100萬噸的年計劃比，相差約700多萬噸。8月16日，即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開幕前一天的預備會議上，毛澤東感到計劃有完不成的危險，決定大搞群眾運動，實行書記掛帥，全黨全民辦鋼鐵。王鶴壽後來在一個報告中說：「今年（指1958年——引者註），在鋼鐵工業發展上（也在整個工業發展上），有兩個偉大的日子。」指的就是：6月19日，毛澤東提出鋼產量翻一番的任務；8月16日，毛澤東提出書記掛帥，全黨全民辦鋼鐵工業的方針。[5]

因為鋼鐵翻番存在落空的危險。所以，8月17日，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開幕這天，毛澤東一開場就說，鋼由1957年的534萬噸翻一番，達到1100萬噸，到年底只有四個月十三天了，有完不成的危險，中心問題是沒有鐵。現在（各省）都打了電話，發動了，可是還要抓緊些，要催回電話，要保證。[6]為使任務落實，他多次提出：第一書記要掛帥；要保證重點；要拚命幹。

毛強調說：「第一書記要親自抓工業。」省委書記回去以後，要立刻建立無產階級專政。條子要靈，一個地區一個主，一省只能有一個頭，「冤有頭，債有主」。邯鄲有一個合作社，趕一輛大車到邯鋼要鐵，不給就不走。各地那麼多人亂跑，要根本禁止。要逐級搞平衡，逐級上報，社向縣，縣向專，專向省，這叫社會主義秩序。中央也只有一個頭，中央鋼鐵的頭是王鶴壽，機械的頭是趙爾陸。又說，「統一計劃，分級管理，重點建設，枝葉扶持」。分級是在統一計劃下，只搞分散不搞獨裁不行。必須有控制，不能專講民主。馬克思與秦始皇要結合起來。[7]

關於保證重點。毛說，明年搞2700至3000萬噸鋼，五十萬台機牀，完成這些，就是勝利。因此，要拚命幹。要一星期抓一次，還有十九個星期，要抓十九次。24號開工業書記和廠黨委書記會議，看有沒有把握。1100萬噸鋼，必須保證完成。經過三令五申，仍完不成任務，或者有鐵不拿出來者，對搞分散主義的，就要執行紀律。紀律處分有六種：一警告，二記過，三撤職留任，四撤職，五留黨察看，六開除黨籍。不然反而不利。我看1100萬噸鋼有完不成的危險。問題是我提出的，實現不了，我要作檢討。有些人不懂得，不完成1100萬噸鋼，是關係全國人民利益的大事。要拚命幹，「拚命幹」三個字下面要加著重號。上海有十多萬噸廢鐵回爐。要大收廢鋼廢鐵，暫時沒有經濟價值的鐵路，如寧波，膠東線，可以拆除，或者搬到重要地點去。首先保證冶金設備——高爐、平爐、軋鋼機，以及發電機和重要鐵路、重點工程、車牀，吊車。要向幹部和人民講清楚，首先保證幾件大事，才是萬年幸福。還有133天，十九個星期，要每星期抓一次，一定要抓好。[8]

可以認為，為實現鋼產量在1958年達到1100萬噸，毛澤東在这裏是下了死命令的。

會議討論中，李富春就1959年的計劃和「二五」計劃問題發言，他説，為保證在「二五」計劃內完成社會主義工業化，基本上建成各大區的工業體系。1959年要保證生產鋼2700至3000萬噸，1960年4500至5000萬噸，以鋼為綱，苦戰三年，爭取5000萬噸。李對1958年的估計是：農業大躍進帶動工業大躍進，糧食、棉花基本上過關了；工業是四五月份才開始躍進的，因此還要努力。他表示，鋼1100萬噸，一噸也不能少。根據毛澤東的指示，李説，爭取七年時間，1960年鋼5000萬噸，1962年8000萬噸到一億噸，1964年1.6億噸。第二個五年計劃完成社會主義建設，第三個五年計劃某些方面開始向共產主義過渡。可不可以設想，公社化了，糧食問題解決以後，吃飯不要錢；棉花問題解決後，穿衣、鞋子不要錢；到第三個五年計劃之後，衣食住行都不要錢，就全面向共產主義過渡。[9]

陳雲著重談了鋼鐵生產問題。陳説，頭一天各省市同志到了之後，到主席那裏去，他説少一噸都不行的，少一噸就失敗。他批評中央的一些領導機關都去搞計劃了，沒有搞生產。陳雲説，今年的鋼鐵生產計劃能否完成很擔心，7月份只完成380萬噸，離1100萬噸很遠。向毛澤東匯報後，毛有八條指示：一、抓生產，經委由薄一波負責；王鶴壽，趙爾陸也要抓生產。二、原材料的調配要服從國家計劃，分配鋼材要照顧重點，又要照顧農民的需要。三、抓設備，盡快把設備安裝起來投入生產。四、機械工業收到材料後，第一是製造煉鋼煉鐵和軋鋼設備。五、各省、市委每個禮拜抓一次鋼鐵生產。六、冶金部的直屬廠要加五十萬噸的任務，作為保險系數。各地也要有這個計劃。七、調撥材料生產要有紀律：一警告，二記過，三撤職留任，四留黨察看，五撤職，六開除黨籍。八、開一個各省市工業書記會議。[10]

陳雲在傳達毛的指示後説：我們今年要生產1100萬噸鋼，已經傳到國外去了（鄧小平插話：給赫魯曉夫打了保票的）。7月31日到8月3日，赫魯曉夫來華訪問期間，毛主席跟赫魯曉夫講：我們今年生產鋼1070萬噸，明年是2500萬到3000萬噸。赫魯曉夫不大相信，説中國的同志提出來的計劃大概我們相信可以完成。究竟具體情況怎樣，他不問，那是很大的懷疑。陳雲還説，赫魯曉夫那天簽公報的時候，他的總顧問阿爾希波夫（Ivan Arkhipov）（建國初期在華蘇聯專家總顧問）跟赫魯曉夫一起來了，我跟他講，我們明年的（鋼產量）計劃完成得了完成不了？他不回答，笑一下，説很大的計劃，偉大的計劃，能完成百分之八十、九十也是很好的。他是沒有信心的。（阿爾希波夫這幾句話，在會上引起了大家的憤慨。）[11]

在29日的會議上，陳雲談了六條意見：一，抓好土爐子，主要關鍵

是土爐子，否則鋼鐵生產今年就完不成，像主席所說就是失敗。土爐子成為今年的一個主要問題。二、機械工業的任務，首先是發動群眾，挖掘潛力。三、目前存在的以物易物的現象必須制止。四、已經簽訂的合同要遵守。五、中央和地方必須共同努力。六、要召集一次基本建設會議。[12]

薄一波在會上說：「主席指示，對土爐子要有信心，不能泄氣。即使在一百個土爐子中，只有一個出鐵，那就很好，就算插上了紅旗，其餘九十九個都應當向它學習。」[13]

會議最後一天，毛澤東號召「要緊急動員」。對能否實現鋼鐵翻番，表現出嚴重焦慮。他說：今年還有四個月，我犯了錯誤，早抓一個月就好了。6月19日出了題目，但沒有具體措施，大家都抓計劃去了。熱情好的，但對今年的生產有所放鬆，我沒有搞好，責任是我的，不是大家的。從8月21日起，還有十九個星期，133天，一天不多，一天不少，現在又過了十天，相當危險。要緊急動員，能否完成，我有懷疑，我是「觀潮派」。明年1月1日能不能搞到，一是題目出錯了，二是工作沒有抓緊，是我的錯誤。今年1100萬噸鋼，到底紮實不紮實，我是懷疑的，拿到手才算數。毛借用孫中山兩句警語，告誡大家：「鋼鐵尚未完成，同志仍須努力。」[14]

在省、市、自治區工業書記們思想統一後，30日下午，薄一波領着主要鋼鐵產區的工業書記，鞍鋼、武鋼、太鋼等幾個大廠的黨委書記，去見毛澤東，一個一個向毛當面擔保。[15]

毛澤東首先問上海市副市長馬天水行不行，馬回答說可以；

問鞍山市委書記趙敏行不行，趙也說可以；

問武漢市委書記，也說行；

問太原市委書記，也回答可以。

又問重慶、北京，天津、唐山、馬鞍山鋼鐵基地的市委書記，大家都說行。

問到冶金部副部長劉彬，毛說：「就看你拿主意啦。」劉回答說：「可以，我們都做了計算了。」

毛又問冶金部辦公廳主任（主要管建設和計劃）袁賓華：「你是經常接觸基層的，你說究竟有沒有把握？」袁說：「冶金工業的生產，從礦山、冶煉、軋製到機修、運輸等等有十個環節，我們樹了十面紅旗（先進單位），只十面紅旗能站得住，他們的經驗能夠推廣，我看有希望。」

然後問到冶金部部長王鶴壽，王說：「主席只要下了決心，我們可以動員全國的力量實現這個目標。我們認為，實現這個目標是可以的。」（王後來檢討說：他所以敢於向毛澤東拍胸脯，是想借毛澤東的威望把鋼鐵搞上去。）

最後問到薄一波，薄説：「主席，我建議把1070萬噸登報，登報以後，大家都看得到了，義無反顧，就會努力奮鬥。」

毛澤東聽後説：「這是個好主意。根據你們剛才講的不是1070，是1100多萬噸，發表1070，那我們兜裏還裝有幾十萬噸。」

於是，薄一波馬上拿起電話，通知起草公報的胡喬木，説毛主席講了，把1070寫到公報上。[16]

這時，毛澤東雖然唸了一句古詩：「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但他眼面前出現的卻是一派「無限風光在險峰」的景象。

8月31日，薄一波在工業書記會議上作總結發言，傳達毛澤東的話：要破除迷信，美國算不了甚麼。用不了一二十年，蘇聯可以變為兩個美國，我們可以變為四個美國。[17]

總之，一方面，1958年鋼鐵翻番的指標，存在落空的危險，使陳雲不得不説出「土爐子是關鍵」的話。明擺着靠「洋爐子」已無法完成任務，只有靠土爐子，各地分攤。另一方面，毛澤東仍然亢奮無比，一般地趕超英美，已不在話下，連蘇聯也只變成兩個美國，中國則變成了四個美國，英、美、蘇都被遠遠地拋在後面了。

根據薄一波的建議，胡喬木把1958年產鋼1070萬噸寫進了會議公報。9月1日，《人民日報》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號召全黨全民為生產一千零七十萬噸鋼而奮鬥」為通欄標題，向全國發表了北戴河會議公報。[18]公報説：

> 工業的生產和建設必須首先保證重點。工業的中心問題是鋼鐵生產和機械的生產，而機械生產的發展又決定於鋼鐵生產的發展。根據當前全國人民對於鋼鐵的巨大需要和對於鋼鐵生產的巨大努力，根據鋼鐵冶煉設備正在逐月增加和迅速投入生產的情況，鋼鐵生產的飛躍發展是必要的和可能的。

據此，會議認為：

> 按照今年2月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所通過的1958年國民經濟計劃，今年鋼產量是620萬噸，比去年增產八十五萬噸，這個數字早已顯得不夠了。今年5月底，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建議把今年的鋼產量增加到800萬噸至850萬噸。現在看來，這個數字仍然嫌低。

進而，公報説：

> 會議經過討論，決定號召全黨和全國人民用最大的努力，為在1958年生產1070萬噸鋼，即比1957年的產量535萬噸增加一倍而奮鬥。

會議通過的《關於1959年計劃和第二個五年計劃問題的決定》規定：1959年國民經濟計劃的主要目標是：糧食產量達到8000億斤到10000億斤，鋼產量達到2700萬噸，爭取3000萬噸，銅四十萬噸，鋁三

十萬噸，機牀產量三十萬噸，發電量550億度，煤3.7億噸，石油800萬噸，化肥530萬噸，棉紗1000萬件，新建鐵路10500公里。為實現上述指標，並為1960年的建設作準備，在預計的1959年國家財政收支的722億元中，用於基本建設投資將為500億元；地方和企業用於基本建設的自籌資金在外。

規定1962年第二個五年計劃完成時要達到的各項主要指標是：鋼產量8000至10000萬噸，鐵9000至11000萬噸，煤九至十一億噸，糧食13000至15000億斤，棉花1.5億擔，基本建設總投資3850至4300億元。

以上這些天文數字，大概就是毛澤東用不了一二十年，中國就可以變為四個美國的數字基礎。

2.共產主義已為期不遠

與鋼鐵翻番相比，毛澤東在北戴河會議上對農村的形勢要樂觀得多。

在講到農村問題時，毛首先談的是糧食。他説，糧食產量今年可能達到6500億斤，一説7000億斤，6.5億人口，每人1000斤。明年每人爭取達到1500斤，後年2000斤，是否搞到2500至3000斤，這是方針問題，大家議一議。是否可以無限制地發展糧食，我看超過3000斤就不好辦了。

然後説到深耕、密植。毛説，這是目前農業的主要方向。深耕是個大水庫，大肥料庫。不深耕，水裝不了，肥放不進，不能分層施，水肥再多也不行。他提出，北方要深耕一尺，南方要深耕七八寸，分層施肥，使土壤團粒結構增多，每個團粒又是一個小水庫、小肥料庫。深耕使地上水與地下水接起。密植的基礎是深耕，否則密植也無用。深耕有利於除草，把根挖掉，又有利於除蟲，草翻到底又可以變成肥料。這樣一來，一畝可以當三畝，我們的土地多了。現在全國平均每人三畝地。我們向下邊刨，就可以高產，苦戰三年之後，土地觀念要改變，種那樣多的地幹甚麼？將來可以拿三分之一的土地種樹，然後過幾年再縮一畝。過去平原綠化不起來，到那時就能綠化了。如果不深耕，就沒有這種可能。

於是，又談到人口問題。説，人口的觀念要改變，現在是人少，不是人多了，過去我説搞八億，現在看來搞十幾億人口也不要緊，不成問題。但也不要提倡多子女。文化水平提高以後就會真正節育了。大概三六十八億，我看不會多。[19]

這些議論，顯然是由「糧食多了」的基本估計而來。

具體到組織人民公社。

毛首先講到「如獲至寶」的河南試辦人民公社的簡章。他說：

> 嵖岈山公社章程，《紅旗》雜誌要登出來，各地方不一定都照此辦，可以創造各種形式。要好好吹一下，一個省找十來個人先吹。大社要與自然條件、人口、文化等各種條件結合起來。河北省劉子厚同志，找了十來個人吹共產主義思想作風，很有勁，你們回去也這樣吹一下。[20]

關於人民公社的性質、所有制和分配制度。毛說：

> 名稱怎麼叫法？可以叫人民公社，也可以不叫，我的意見叫人民公社。這仍然是社會主義性質的，不過分強調共產主義。人民公社一曰大二曰公。人多，地大，生產規模大，各種事業大；政社是合一的；搞公共食堂；自留地取消，雞、鴨、屋前屋後的小樹還是自己的，這些到將來也不存在了。糧食多了，可以搞供給制，還是按勞付酬，工資按各盡所能發給個人，不交給家長，青年、婦女都高興，這對個性解放有很大好處。搞人民公社，我看又是農村走在前頭，城市還未搞，工人的級別待遇比較複雜。不論城鄉，應當是社會主義制度加共產主義思想。蘇聯片面強調物質刺激，搞重罰重賞。我們現在搞社會主義，也有共產主義的萌芽。學校、工廠、街道都可以搞人民公社。不要幾年功夫，就把大家組成大公社。[21]

對人民公社所謂的「共產主義因素」，毛大加讚賞。他說：

> 人民公社，有共產主義萌芽。產品十分豐富。糧食、棉花、油料實行共產。那時道德大為進步，勞動不要監督，要他休息不休息。……人民公社大協作，自帶工具、糧食，工人敲鑼打鼓，不要計件工資，這些都是共產主義的萌芽，是資產階級法權制度的破壞。希望大家對這些問題的看法吹一下，把兩本有關文件看一下，把實踐中共產主義道德因素在增長的情況也吹一下。過去革命打仗死很多人，是不要代價的，現在為甚麼不可以這樣幹呢？如果做到吃飯不要錢，這是一個變化；大概十年左右，可能產品非常豐富，道德非常高尚；我們就可以從吃飯、穿衣、住房子上實行共產主義。公共食堂，吃飯不要錢，就是共產主義。將來一律叫公社，不叫工廠，……城市、鄉村一律叫公社，大學，街道都辦成公社。鄉、社合一，政、社合一，暫時掛兩個牌子。公社中設一個內務部（行政科）管生死登記、婚姻、人口，民事。[22]

在这裏，毛澤東明確地把人民公社與共產主義直接聯繫了起來。「共產主義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橋樑」這兩句頌詞，其理論依據就出於此。

關於建立人民公社問題。譚震林在會上發言說：

> 人民公社，先要大，小了不行；另一個是由集體所有制變為全民所有制。……成都會議作了小社併大社的決定，會後各地方

> 採取了一些行動，比較快點的是遼寧、廣東，接着是河南、河北、江蘇、浙江作了規劃，其他省份也作了些規劃。併得快的是遼寧，全省都併完，一個省併成一千四百個社；河南現在差不多也快併完了，全省原來兩千多個社，併成一千幾百個；河北估計8月底也完了。積累和消費問題，生活水準放在當地富裕中農的平均水準。59年計劃，第一步每人一千五百斤，第二步每人二千斤。[23]

劉少奇説：大城市郊區再不要搞工業了，把農業和原有的工業結合起來。公社是由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最好形式。社的規模大小和快慢由各地決定，不要性急，不要強迫，要大鳴大放。建立公社有些地方要分兩步、三步走，有的地方不必要。公社建立後商業就不要了，只要一個批發部。[24]

雖然劉少奇在这裏説，搞公社「不要性急」，可分「兩步、三步走」。但全國的形勢，如譚震林所説，是一大，二公、三快，已成基本定局。

會議通過的《關於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25]對中國農村的基本狀況作了這樣的估計：

> 人民公社是形勢發展的必然趨勢。大型的綜合性的人民公社不僅已經在若干地方普遍發展起來，有的地方發展得很快，很可能不久就会在全國範圍內出現一個發展人民公社的高潮，且有不可阻擋之勢。

《決議》認為，人民公社發展的主要基礎是：

> 農業的生產全面的不斷的躍進和五億農民愈來愈高的政治覺悟。……大規模的農田基本建設和先進的農業技術措施，要求投入更多的勞力，農村工業的發展也要求從農業生產戰線上轉移一部分勞動力，我國農村實現機械化、電氣化的要求已愈來愈迫切；在農田基本建設和爭取豐收的鬥爭中，打破社界、鄉界、縣界的大協作，組織軍事化、行動戰鬥化、生活集體化成為群眾性的行動，進一步提高了五億農民的共產主義覺悟；公共食堂、幼兒園、託兒所、縫衣組、理髮室、公共浴堂、幸福院、農業中學、紅專學校等等，把農民引向了更幸福的集體生活，進一步培養和鍛煉着農民群眾的集體主義思想。所有這些，都説明幾十户、幾百户的單一的農業生產合作社已不能適應形勢發展的要求。在目前形勢下，建立農林牧副漁全面發展、工農商學兵互相結合的人民公社，是指導農民加速社會主義建設，提前建成社會主義並逐步過渡到共產主義所必須採取的基本方針。

關於公社的規模，《決議》提出：就目前説，一般以一鄉一社、兩千戶左右較為合適。雖然提到：某些鄉界遼闊、人煙稀少的地方可以少於兩千戶，一鄉數社。但更強調：有的地方根據自然地形條件和生產發展的需要，也可以由數鄉併為一鄉，組成一社，六七千戶左右。至於達

到萬戶或兩萬戶以上的，也不要去反對。甚至還說：人民公社進一步發展的趨勢，有可能以縣為單位組成聯社。現在就應該對人民公社的分布，以縣為單位進行規劃，作合理的布局。同時明確：人民公社要實行政社合一，鄉黨委就是社黨委，鄉人民委員會就是社務委員會的體制。

關於人民公社的所有制和分配制度，《決議》規定：人民公社建成以後，在目前還是以採用集體所有制為好。但又認為：實際上，人民公社的集體所有制中，就已經包含有若干全民所有制的成份了。這種全民所有制，將在不斷發展中繼續增長，逐步代替集體所有制。至於由集體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過渡的時間，《決議》估計：有些地方可能較快，三四年內就可以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較慢，需要五六年或者更長一些的時間。關於分配制度，《決議》說，即使過渡到了全民所有制，人民公社的性質還是社會主義的，仍應實行「各盡所能，按勞取酬」。然後再經過多少年，社會產品極大地豐富了，全體人民的共產主義的思想覺悟和道德品質都極大地提高了，全民教育普及並且提高了，社會主義時期還不得不保存的舊社會遺留下來的工農差別、城鄉差別、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的差別，都逐步地消失了，反映這些差別的不平等的資產階級法權的殘餘，也逐步地消失了，國家職能只是為了對付外部敵人的侵略，對內已經不起作用了，在這種時候，我國社會就將進入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共產主義時代。

《決議》在最後，對共產主義在中國的實現，作了極其大膽而樂觀的預測：

> 建立人民公社首先是為了加快社會主義建設的速度，而建設社會主義是為了過渡到共產主義積極地作好準備。看來，共產主義在我國的實現，已經不是甚麼遙遠將來的事情了，我們應該積極地運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條過渡到共產主義的具體途徑。

由此，早已出現的「共產風」、「浮誇風」、「瞎指揮風」進一步盛行了起來。

3.破除資產階級法權

圍繞向共產主義過渡的設想，毛澤東在多次講話中強調：「要破除資產階級法權」。

8月19日，毛在講話中說：社會主義，農民會先走一步。他提出：要破除資產階級的法權思想。例如爭地位，爭級別，要加班费，腦力勞動者工资多，體力勞動者工资少等，都是资產階級思想的殘餘。「各取所值」是法律規定的，也是资產階級的東西。將來坐汽車要不要分等级？不一定要有專車，對老年人、體弱者，可以照顧一下，其餘就不分

等級了。[26]

8月21日，毛又說：

> 要使同志們了解，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對生產關係，包括所有制、相互關係、分配三個部分關係，他們接觸到了，但沒有展開。……人們在勞動中的相互關係，是生產關係中的重要部分。搞生產關係，不搞相互關係，是不可能的。所有制改變以後，人們的平等關係，不會自然出現的。中國如果不解決人與人的相互關係，要大躍進是不可能的。
>
> 在所有制解決以後，資產階級的法權制度還存在，如等級制度，領導與群眾的關係。……要考慮取消薪水制，恢復供給制問題。過去搞軍隊，沒有薪水，沒有八小時工作制，上下一致，官兵一致，軍民打成一片，成千成萬的人調動起來，共產主義精神很好。……空想社會主義的一些理想，我們要實行。
>
> 過去我們成百萬的人，在階級鬥爭中，鍛煉成為群眾擁護的共產主義戰士。搞供给制，過共產主義生活，這是馬克思主義作風與資產階級作風的對立。我看還是農村作風，游擊習氣好。二十二年的戰爭都打勝了，為甚麼共產主義不行了呢？為甚麼要搞工資制？這是向資產階級讓步，是借農村作風和游擊習氣來貶低我們，如果發展了個人主義，……是不是由幹部帶頭恢復供給制？……恢復供給制，好像「倒退」。「倒退」就是進步，因為我們進城後退了，现在要恢復進步，我們帶頭把六億人民帶成共產主義作風。[27]

「資產階級法權」這個概念，是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一書中提出來的。其本意是指，在共產主義社會的第一階段，社會的分配原則，只能是等量的勞動，獲取等量的報酬。它在形式上是平等的，但在事實上又是不平等的。馬克思把這種平等的權利稱之謂：『在原則上仍然是資產階級的法權』（後來譯為：「資產階級式的權利」[28]）。馬克思闡述的這個觀點，是批判拉薩爾（Ferdinand Lassalle）提出的「平等的權利」、「公平的分配」，指出絕對的「平等」和「公平」只能是空想。因為「權利永遠不能超出社會的經濟結構以及由經濟結構所制約的社會的文化發展」。[29]

可見，毛澤東在这裏大談「破除資產階級法權」，是把馬克思的本意完全弄反了，並且又把它與資產階級思想等同起來。在毛看來，平均主義才是共產主義。這就是他所說的：「空想社會主義的一些理想，我們要實行。」因此，他提倡要廢除等級，廢除薪金，實行供給制。進而擴展到政治、思想、人與人關係等一切方面，都要破除所謂的「資產階級法權」。通過實行「吃飯不要錢」，「供给制」，就使共產主義得以逐步實現。毛澤東以極大興趣極力推崇人民公社，與他認為人民公社將利於消滅一切差別，使絕對平均的共產主義理想變成現實是一致的。

毛澤東要破除的資產階級法權的思想，得到了柯慶施的快速響應，柯指示上海市委宣傳部部長張春橋寫文章。張以〈破除资產階級法權思想〉為題撰文，對戰爭年代供給制的軍事共產主義大加讚揚，說它「標誌着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作風，毛澤東的思想作風」。實行薪金制是黨內不少人接受了資產階級思想的影響。於是提出，在大躍進的新的條件下，徹底恢復和發揚黨的軍事共產主義的光榮傳統，徹底破除資產階級的法權思想。[30]張文發表在1958年9月16日出版的中共上海市委的黨刊——《解放》第六期上。毛澤東閱後，很是讚賞。《人民日報》10月13日轉載時，毛親自寫了編者按：

> 這個問題需要討論，因為它是當前一個重要的問題。我們認為張文基本上是正確的，但有一些片面性，就是說，對歷史過程解釋得不完全。但他鮮明地提出了這個問題，引人注意。文章又通俗易懂，很好讀。

此後，破除资產階級法權問題，在全國引起討論。僅《人民日報》發表的文章，就有四五十篇之多。上海市社科聯組織了六次專題座談，並出有專輯。可見，在當年共產風盛行之時，破除資產階級法權思想的影響之大。

對這個問題，胡喬木在1980年代曾有過多次評論。他說：

> 《哥達纲領批判》有它的負面影響。當然劃分了共產主義的兩個階段有很大好處，但是提出了一個资產階級法權。怎麼過渡到共產主義，馬克思沒有講，講了一個物資的極大豐富、大量湧現，前提是人的全面發展，從分工中解放出來，不是反過來講首先發展生產力。以後列寧在《國家與革命》中把资產階級法權說死了，說生產资料所有制方面的資產階級法權已經剝奪了，但在交換範圍裏的资產階級法權還沒有剝奪。既然有资產階級法權，就要有資產階級國家，结果就好像真是一個资產階級國家。從资產階級權利到资產階級國家已經走得很遠了。這樣就可以引出貝特蘭的理論。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以後，就要搞過渡，就要拉平，不要着力搞生產。要實現人與人之間的平等，階層與階層之間的平等，地區與地區之間的平等。[31]
>
> 實事求是來說，毛主席在八大以後，他對中國社會主義怎麼發展，逐漸形成了一種思想，這種思想在黨內有時可以暫時地表面上得到多數的接受，但是實際上多數同志是不赞成的。毛主席認為要搞社會主義，從1974年理論指示所說的，表现得比較清楚，他就是要限制商品，限制貨幣，限制工资這幾樣東西……。從1958年成都會議上反對资產階級法權起，就有了這種思想的萌芽。到1958年北戴河會議就講要實行供給制，說進城後搞工资制沒有理由。毛主席的這種思想雖然沒有在正式文件中表達，他感到這個想法得不到多數赞成，但是他的這個思想一直保留着並且在發展。他認為這才是社會主義革命……。[32]

毛澤東的社會主義藍圖，不只對1958年的大躍進運動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發生了巨大影響，而且是他晚年一直為之實現的夢想。

北戴河會議公報和關於建立人民公社的決議發表以後，從1958年9月起，中國大地迅即掀起一陣九千萬人上山的大煉鋼鐵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狂熱風暴。

[1]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頁152。

[2]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卷，頁156。

[3] 李銳：《「大躍進」親歷記》，下冊（海口：南方出版社，1999），頁86。

[4] 孫業禮、熊亮華：《共和國經濟風雲中的陳雲》（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頁150。

[5]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頁703。

[6] 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1958年8月17日），載李銳：《「大躍進」親歷記》，下冊，頁90。

[7] 毛澤東在各大協作區主任會議上的講話（1958年8月19日），載李銳：《「大躍進」親歷記》，下冊，頁96、97-98。

[8] 毛澤東在第二次協作區主任會議上的講話（1958年8月21日），載李銳：《「大躍進」親歷記》，下冊，頁102。

[9] 李銳：《「大躍進」親歷記》，下冊，頁101。

[10] 李銳：《「大躍進」親歷記》下冊，頁107-109。

[11]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憶》，下卷，頁704。

[12] 李銳：《「大躍進」親歷記》，下冊，頁126。

[13]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頁705。

[14] 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1958年8月30日），載李銳：《「大躍進」親歷記》，下冊，頁121。

[15]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頁705。

[16] 蕭冬連等：《求索中國：「文革」前十年史》（北京：紅旗出版社，1999），頁371-372。

[17] 李銳：《「大躍進」親歷記》下冊，頁127。

[18] 《新華半月刊》，1958年第18號，頁1。

[19] 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1958年8月17日），載李銳：《「大躍進」親歷記》，下冊，頁91、94。

[20] 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1958年8月17日）；毛澤東在第二次協作區主任會議上的講話（1958年8月21日），載李銳：《「大躍進」親歷記》，下冊，頁91、105。）

[21] 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1958年8月19日），載李銳：《「大躍進」親歷記》，下冊，頁98。

[22] 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1958年8月21日），載李銳：《「大躍進」親歷記》，下冊，頁106-107。

[23] 李銳：《「大躍進」親歷記》，下冊，頁109-110。

[24] 李銳：《「大躍進」親歷記》，下冊，頁110。

[25]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十一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頁446-450。

[26] 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1958年8月19日），載李銳：《「大躍進」親歷記》，下冊，頁97。

[27] 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讲話（1958年8月21日），載李銳：《「大躍進」親歷記》，下冊。頁103-106。

[28] 張仲實：〈對於「資產階級法權」一詞譯法的意見〉，載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黨史黨建政工教研室編：《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第二十二冊（北京：國防大學出版社，1986），頁541-542。

[29]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頁11、12。

[30] 張春橋：〈破除資產階級的法權思想〉，《人民日報》，1958年10月13日。

[31] 胡喬木：〈對一九五七年後幾段歷史的議論〉（1980年5月24日），載《胡喬木傳》編寫組編：《胡喬木談中共黨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頁60-61。

[32] 胡喬木：〈要把毛主席晚年的錯誤同毛澤東思想加以區別〉（1980年7月3日），載《胡喬木談中共黨史》，頁74。

二、全民大煉鋼鐵運動

1.各行各業為大煉鋼鐵讓路

南寧會議後大批「反冒進」，促使各行各業鼓幹勁、爭上游。各地方紛紛修訂原定計劃，給原指標加碼。根據十五年在鋼鐵等主要工業產品產量上趕超英國的目標，鋼鐵工業自然首當其衝。

1958年3月8日《人民日報》報道：鞍鋼第二煉鋼廠青年團結爐，在2月份創造了大型平爐爐底利用係數（即每一晝夜一平方米爐底面積的出鋼噸數）達到10.64的全國最高紀錄，走進了世界先進平爐的行列。這個紀錄比目前本廠其他平爐的爐底利用系數平均高出3.03，超過了著名的鞍鋼第一煉鋼廠青年友誼爐1957年創造的10.22的紀錄；接近了蘇聯最先進的平爐——馬格尼托哥爾斯克鋼鐵聯合企業17號平爐1957年創造的10.77的記錄，報道說，如果鞍鋼所有平爐都能達到這樣的成績，就可以在完成1958年增產計劃的基礎上，再增產120萬噸鋼。按照這種計算，冶金部在3月上旬修訂了一個月前通過的鋼產量計劃，提出當年產鋼700萬噸（比原定指標提高七十七萬噸）。

把先進定額當作平均定額，作為制訂計劃的依據。這本身就違背了常識。但毛澤東對這個計劃數字並不滿意。4月下半月，毛找冶金部黨組幾位負責人談話。他說：你們不要怕鋼鐵生產多了沒地方放，可以放到我的院子裏嘛！1956年投資多了一些，工業生產快了一些，就有人害怕，慌慌忙忙出來反冒進。舊的平衡總是要在發展中被打破的，然後，又在新的基礎上達到新的平衡，這是馬克思主義。反冒進就是不懂這個辯證法。我們這樣一個大國現在才能生產幾百萬噸鋼，太可憐了，工業不發達就要受帝國主義欺負。中國一個省就有歐洲一個國家大，光論人口和面積都比歐洲的一個國家的人口多、面積大；歐洲沒有統一，歐洲的各國都發展起來了；而我國從秦始皇時就統一了，統一當然有好處，但中央集權也限制了地方的發展。你們應該對一個省像對一個國家那樣考慮它的發展。

5月1日《人民日報》報道：我國鋼鐵工業基本建設工人發動了「速度快一倍，投資一當二」的競賽。現有廠礦的生產工人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不斷地創造「多快好省」的新紀錄。1958年施工的鋼鐵工業基本建設項目有四十九個（不包括為數眾多的地方小型鋼鐵工業），預計年內開工投入生產的項目，將使國家增加年產157萬噸生鐵和103萬噸鋼的新設備，幾乎達到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增加的全部設備能力的一半。當年開始新建和擴建的湖南、太原、石景山、馬鞍山、重慶等五個中型鋼

鐵聯合企業，打破了過去的施工常規，打算以前所未有的新速度着手提前施工。僅僅這五個中型企業，在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全部建成後的鋼鐵年產量，就超過1957年全國的總產量。上海第三鋼廠1957年平爐平均利用系數10.88噸（註：高於鞍鋼和蘇聯），今年的大躍進指標為12.345噸，達到這個指標，生產潛力就可增長44%。同一天該報在〈讓高爐轉爐滿布城鄉，讓鐵水鋼水全國奔流，二十四個省區大辦鋼鐵廠〉的標題下，報道說：目前已經動手籌建的地方小型煉鐵廠和鋼鐵廠約有六十個。河北省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幾乎沒有地方鋼鐵工業，現在正動工興建七個鋼鐵廠，共二十五座小高爐，有五座已投入生產。最近河南工業廳組織七個專區、三個市、四十九個縣籌建鋼鐵廠的人員，到蘇州煉鋼廠去觀摩學習，擬定了一個建設小高爐一百多座、土爐一千多座的具體計劃。貴州省第一座鋼鐵廠已經在貴陽動工興建，這是一個包括高爐、煉鋼和軋鋼的聯合企業，建成後年產大型鋼材四萬噸。鐵礦資源豐富的內蒙古自治區，1958年7月份就有四十座小高爐可以投入生產。石家莊鋼鐵廠第一批建設的三座小高爐，有一座已在4月13日出鐵。

層層捷報的生產「大躍進」，反過來推動了鋼指標的再度提高。

6月19日，決定鋼鐵翻番。7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以鋼為綱〉的文章。從此，以大煉鋼鐵為中心的「大躍進」運動進入高潮，與前一段不同的是，把鋼鐵擺在了一切行業之首。

在北戴河會議公布鋼產量翻番任務時，1958年的鋼產量8月底才累計完成450萬噸，要完成1070至1150萬噸的任務，在此後短短的四個月內必須產鋼600至700萬噸。也就是說，要在餘下的三分之一的時間內完成將近三分之二的任務。顯然，這是不太可能的。但北戴河會議一聲號令，「苦戰四個月，為鋼產量翻番而奮鬥」的口號響遍全國，生產任務變成了政治任務。

9月1日，《人民日報》在發表北戴河會議公報的同時，發表了題為〈立即行動起來，完成把鋼產量翻一番的偉大任務〉的社論，要求「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的第一書記必須把領導鋼鐵生產當作首要任務，每個星期檢查一次生產進度，採取最有效的辦法，調動各方面的力量，組織各方面的協作，解決生產中的一切困難問題」。

此後，中央先後四次召開電話會議催促。[1]

在9月4日的電話會議上，譚震林傳達說：主席提出，明年糧食再翻一番，又提出今年1100萬噸鋼一噸也不能少，少一斤也不行，少了就是失敗了。這個要求也不能不完成。這就勢必要逼得我們又要拿出相當的勞動力去挖鐵礦，去辦小高爐。彭真說：主席要求在9月15日鋼鐵有一個大躍進，因為9月是要命的一個月。

9月24日中央書記處召開電話會，要求到30日，要達到日產鋼六萬噸、鐵十萬噸，否則是不行的。

9月25日，中共中央又召開電話會議，更進一步提出了從省、地、縣到鄉，各級黨委第一書記都要親自掛帥、親臨鋼鐵生產現場、日夜不停地指揮作戰的要求。計劃10月份在全國建起三十幾萬座小高爐。

周恩來受毛澤東委託，分管冶金工業，並擔任鋼鐵大躍進領導小組組長，多次主持召開鋼鐵工業會議，組織各有關部門的協作會議。在9月14日的會上商定了十七條措施：增強採礦技術力量；改善鐵路運輸；抽調萬名大、中專和中等技術學校的學生和教職員分赴各省市小高爐、土高爐幫助建立分析化驗室，培訓分析化驗人員，作為下鄉勞動鍛煉；加緊廢鋼鐵回收工作，等。15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了《鋼鐵生產緊急匯報會商定事項的通知》。28日，周恩來又召開鋼鐵生產匯報會。[2]

根據中央指示精神，各地黨委紛紛由第一書記掛帥，搞動員，抓措施，成立指揮部，全黨全民各行各業編成鋼鐵師、運輸营、採礦隊等和各種野戰軍、後勤部，力保鋼鐵元帥升帳。河北省委成立大煉鋼鐵指揮部，指揮長由省委書記親自擔任，要求第一抓領導，第二抓組織，第三充分依靠群眾，第四抓生產。山西省組織工作團，技術指導團。內蒙古自治區黨委採取了「五抓」（抓生產、原料、設備、技術、運輸）的辦法。江蘇省委要求土爐建設要普遍實行「五定」（定型、定群、定量，定員、定制度）。浙江省委要求領導同志上山下鄉，「不流鐵水不離爐，不見鐵礦不下山」。安徽省委成立了把機械、電力、交通、建築、物资、商業等有關部門统一組織起來的冶金工業指揮部。福建省各地黨委第一書記親自帶領幹部群眾上山下廠猛攻鋼鐵。冶金部抽調各方面的技術力量派往各省、市、自治區。

為讓鋼鐵工業先行，9月5日，《人民日報》再發〈全力保證鋼鐵生產〉的社論，進一步提出了「停車讓路，首先為鋼」的號召。要求「各部門、各地方都要把鋼鐵的生產和建設放在首要的地位。當鋼鐵工業的發展與其他工業的發展，在設備、材料、動力、人力等方面發生矛盾的時候，其他工業應該主動放棄或降低自己的要求，讓路給鋼鐵工業先行」。「不管哪一個地方哪一個部門，有材料、有設備、有交通運輸工具，必須首先讓給鋼鐵工業；有製造能力，必須首先為鋼鐵工業而生產；電力必須首先輸送給鋼鐵工業；煤炭及其他燃料必須首先滿足鋼鐵工業的需要；有勞動力和技術力量，必須首先調給鋼鐵工業。」

此外，中央及有關部門還相繼發出了全民大辦煤炭、大辦電力、大辦地質等指示，要求採取各種緊急措施，保證鋼產量指標翻番任務的完成。為解決運輸問題，要求各地成立強有力的運輸指揮部，統一指揮當地的交通運輸，調動機關、學校、部隊等一切可以調動的力量，調集火車、汽車、輪船、飛機、人力車、獸力車甚至小汽車等一切交通運輸工具，投入全民搞運輸保證出鋼鐵運動。

2.毛澤東南巡督陣

為了解各地對北戴河會議決定的落實情況，毛澤東於9月10日至29日赴南方視察，同行的有國防委員會副主席張治中，第一站到武漢。毛澤東在武漢會見了老友李達。

李達，時任武漢大學校長，是中共一大代表，馬克思主義哲學家，早年與毛澤東私交甚篤。李達對《人民日報》刊登「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的文章和口號，早就深感不安。得悉毛澤東來到武漢巡視，決意前去面陳異見。毛澤東熱情地接待了李達，李直率地向毛提出：

「潤之，『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這句話通不通？」

毛悠然地說：「這個口號有兩重性。」並列舉長征為例，說人的主觀能動性可以克服有時候看起來不可能克服的困難。人想飛上天，於是有了飛機，人想日行千里，於是發明了火車。

李打斷毛的話說：「你的時間有限，我的時間也有限，你說這個口號有兩重性，實際上是肯定這個口號是不是？」

毛有些不悅地說：「肯定怎麼樣？否定又怎麼樣？」

李說：「肯定這個口號就是認為人的主觀能動性是無限大，就是錯誤。人的主觀能動性的發揮，離不開一定的條件。一個人要拚命，『以一當十』可以，最後總有個限度，终有寡不敵眾的時候。一夫當關，萬夫莫開，要有一定的地形條件，人的主觀能動性是不能無限大的。現在人們的膽子太大了，潤之，你不要火上加油，否則可能是一場災難。」「你腦子發熱，達到三十九度發高燒，下面就會燒到四十度，四十一度，四十二度，這樣中國人民就要遭受大災大難了！」

這是毛澤東自批判反冒進以來，從未聽人說過的反對意見。對此，毛不以為然地回答說：「你說我發燒，我看你也有些發燒了，也有攝氏百把度的。」

這次老朋友相見，就這樣不歡而散。

李達的話，對毛澤東雖有觸動，但使他振奮的是，業已發動起來的城鄉群眾熱情參與的「大躍進」的火紅景象。

9月13日到19日，毛在湖北看了武漢鋼鐵公司第一爐出鐵、第一紗廠的小高爐出鐵，武漢大學化學系師生辦的許多小型化學工廠，武漢重型機牀廠，並到大冶、黃石港看了大冶鐵山和黃石港特殊鋼廠。

13日，首先來到正在興建的武漢鋼鐵公司，武鋼總經理李一清和副總經理韓寧夫將毛澤東一行迎接到一幢低矮的簡易活動房（公司的辦公區）內，毛向武鋼的負责人介紹了同行的國防委員會副主席張治中。大家入座以後，韓寧夫向毛澤東介紹武鋼的總平面圖。

毛關心地問：「甚麼時候可以出鐵呀？」「是不是有把握呢？」當聽說有百分之九十九的把握，但也可能有預計不到的萬一時，毛笑着

說：「今天看不到，我明天再來，明天看不到，我以後還來，總而言之，我三顧茅廬也要看到你們出鐵。」

在介紹礦山情況的時候，毛說：「你們礦裏的銅也含得不少嘛，年產多少？」韓寧夫回答後，毛笑着說：「看來，你們這個鋼鐵公司應該叫鋼鐵銅公司。」介紹到煉焦廠能收回二百多種產品時，毛又問：「你們收回多少種？」回答說：「十一種。」有人插話說「別的化工廠已能提煉一百八十多種產品來」，毛聽後鼓勵說：「你們也可以收回，應該多搞些。你们這樣大的企業，應該辦點化學工業，辦點機械工業，辦點建築材料工業，各種工業都辦點，辦成綜合性聯合企業。」

話題轉到一號高爐時，毛聽說一號高爐七十多公尺高，十二公尺直徑粗，日產二千噸生鐵時，滿意地說：「你們的高爐不同一般，應該叫大大高爐。」於是，毛一行離開簡易活動房，來到一號高爐。毛沿着鐵梯健步登上高爐爐台，與在那裏等候的十四位為武鋼建設立下功勞的模範人物一一握手問好，然後與張治中等在爐前工休息室屋頂的小平台上坐下來，等着觀看火紅的鐵龍奔騰而出。只聽得廠長發出「出鐵」的命令，出鐵口打開了，爐內噴出大團大團焰火般的火花，緊接着風呼火嘯地射出一道閃電似的烈火，照耀得滿爐台通紅。火龍般的鐵水順沙溝蜿蜒奔騰而去，一路噼啪作響，閃耀着金花，從出鐵台飛瀉而下，垂掛成一束耀眼的火柱傾進鐵水罐裏。毛興奮地站了起來，與在場的人們一起，朝爐台上忙碌的爐前工們鼓掌致意。當毛問到鐵水流出多少時，李一清答道：「一百噸。」毛邊走邊說：「就出這麼一點，再多一點嘛！」當聽到解釋說：「第一爐鐵只要溫度好就行，少一點沒關係」時，毛又興奮起來說：「不要緊，會多的，會多的。下次我再來看！」

毛一行到一號煉焦爐，這時，第十三號孔的爐門打開了，通紅的焦炭穿過火架車，像牆壁倒塌似地倒在消火車上。消火車帶着紅焦開進消火塔，冰涼的地下水立即把火熄滅，在車頂上捲起巨大的蘑菇狀的白煙，形成了一幅宏偉壯麗的圖景。毛澤東看得出神，問：「多少時間出一次。」廠長回答：「平均九分鐘一次。」毛看看手錶說：「好呀，再看第二次。」

在看了二十三號孔的又一次出焦過程後，毛仍意猶未盡，對王任重說：「沒有看好，人太多，受限制。不是我看群眾，是群眾看了我。要到晚上看就好了！」離開武鋼時，毛叮囑李一清：

像武鋼這樣的大型企業，可以逐步地辦成綜合性的聯合企業，除生產多種鋼鐵產品外，還要辦點機械工業、化學工業和建築工業等。這樣的大型企業除工業外，農、商、學、兵都要有一點。[3]

9月15日，毛澤東來到距武漢一百公里的武鋼大冶鐵礦，視察了正在搞剝離工程的露天採場。毛向礦山負责人詢問了礦山的蘊藏量和礦石的品位，並對礦工的安全表示關切。

視察過程中，毛和上述企業約四萬名職工見面時，讚揚了他們在大辦鋼鐵中所表現出的充沛的革命幹勁和創造精神。毛澤東非常興奮，對陪同視察的王任重說：許多事情看來怪得很，要就沒有，或者很少，要就很多很多。……全國也一樣，過去九年搞了幾百萬噸，今年幾個月就可能增加幾百萬噸，你看怪不怪。王任重回答：主席一再強調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很重要。放手發動群眾，充分發揮群眾的積極性和創造性，這樣一來許多發明創造出來了，許多奇跡也出來了。[4]

毛離開湖北乘輪船順江而下，於16日抵達安徽的安慶，看了安慶一個中學的小高爐和由機關辦的小高爐群，然後經桐城、舒城、肥西到合肥，沿途看到要走幾十公里或者幾百公里路到有鐵礦石可找的縣份去挖礦、煉鐵的廣大人流，在合肥看了兩個中型鋼鐵廠、工農業產品和發明的展覽館；20日看了馬鞍山鋼鐵廠。後經南京到上海，在上海看了一個鋼鐵廠。29日返回北京。

10月1日，《人民日報》刊登〈毛主席巡視大江南北回京後對記者發表重要談話〉。毛說：

> 此次旅行，看到了人民群眾很大的幹勁，在這個基礎上各項任務都是可以完成的。首先應當完成鋼鐵戰線上的任務。在鋼鐵戰線上，廣大群眾已經發動起來了。但是就全國來說，有一些地方，有一些企業，對於發動群眾的工作還沒有做好，沒有開群眾大會，沒有將任務、理由和方法，向群眾講得清清楚楚，並在群眾中展開辯論。到現在，我們還有一些同志不願意在工業方面搞大規模的群眾運動，他們把在工業戰線上搞群眾運動，說成是「不正規」貶之為「農村作風」、「游擊習氣」。這顯然是不對的。
>
> 在大干鋼鐵的同時，不要把農業丟了。人民公社一定要把小麥種好，把油菜種好，把土地深翻好。1959年農業方面的任務，應當比1958年有一個更大的躍進。為此，應當把工業方面和農業方面的勞動力好好組織起來，人民公社應當普遍推廣。[5]

毛對新華社記者的談話，表明他對已經發動起來的群眾性大煉鋼鐵運動感到滿意，增強了鋼鐵翻番的信心；同時，又批評了還沒有用主要精力抓「小土群」的地區和領導人，要求把全民大煉鋼鐵的火燒得更旺。

3.「小土群」村村點火

大搞土法煉鐵，是大辦地方工業形勢下出現的。土洋並舉，作為實行工業化三個並舉方針寫進了中共八大二次會議的政治報告。但在鋼鐵產量明顯落後的情況下，人們對土法煉鋼仍持懷疑。到7月底，全國建成小土高爐三萬餘座，僅湖南一省就14936座。可見，在全國極不平

衡。因此，在北戴河會議上就要求各地大搞小高爐和土高爐，以生產煉鋼所需的大量生鐵。《人民日報》先後發表了〈土洋並舉是加速發展鋼鐵工業的捷徑〉、〈關鍵在於大搞群眾運動〉、〈開展煉鋼的群眾運動〉和〈讓土法煉鋼遍地開花〉等社論，極力宣傳土法煉鋼對於鋼產量翻番的意義。

在〈土洋並舉是加速發展鋼鐵工業的捷徑〉[6]的社論中，點明要趕超英國，我們靠的就是這涓涓細水匯大川的辦法。社論開頭就說：

> 一個以鋼為綱、帶動工業全面發展的工業建設的新高潮己經形成。轉爐高爐遍地開花，鋼水鐵水到處奔流的日子，即將到來。

社論用問答式的寫法向全國傳達了毛澤東的鋼鐵翻番的構想：

> 我國鋼鐵工業能不能以最高的速度，比如說，每年產量的增長率不是百分之幾、百分之十幾或者百分之幾十，而是百分之百甚至更高的比例發展呢？答曰：可能性是存在的，問題是我們想不想、要不要高速度？我們想要，就有；不想要，就沒有。也許會有人說：「要高速度就有高速度，是否有點脫離實際的唯心主義味道呢？」我們說，这裏一點也沒有唯心論，而是完全從實際出發，是有根據的。

根據是甚麼呢？文中回答說：

> 这裏講的實際和根據主要有兩個：
>
> 第一，是我國礦產資源豐富。煉鐵需要大量的煤，而在我國兩千多個縣中，就有一千五百多個縣有煤；鋼鐵的原料——鐵礦石，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探明的鐵礦儲量已達五十六億噸。
>
> 第二，就是毛澤東同志在〈介紹一個合作社〉一文中指出的：我們有黨的領導和六億人民，這是一個決定的因素。人是生產力的最活躍因素。人多力量大。人民是這樣形容自己的力量的：「我們一跺脚，大地震動；我們吹口氣，滚滚河水讓路；我們一舉手，巍峨大山膽寒；我們一邁腿，谁也不敢阻擋；我們是勞動人民，我們的力量無敵。」（上鋼一廠民歌）……完全可以這樣說，要求高速度地發展工業的本身，就是一種激發六億人民積極性的動力。

有了资源和豪言壯語，當然還不能解決問題，依靠現有大企業挖潛力也有限度，為確保目標的實現，社論提出：「我們贊成以『小』和『土』為主的主張。」文中說：

> 小的「土」的煉鐵爐、煉鋼爐，比起大型的、中型的現代化鋼鐵廠來，技術的確是落後的，但是卻具有現代鋼鐵廠所沒有的優點。這就是投资少、設備簡單、技術容易為群眾所掌握、建設時間短。以小型的和「土」的為主，我們就可以在目前技術骨幹

缺乏、鋼材供應不足、現代設備供應不上，資金也不十分充裕的情況下，發動全黨全民來辦鋼鐵工業。……在有資源的地方，不僅冶金工業部門可以辦，而且所有的工業部門都可以辦；不僅工廠可以辦；而且機關，部隊、學校、街道、手工業合作社、農業合作社都可以辦；很快就可以做到高爐、平爐、轉爐遍地開花，鐵水鋼水到處奔流。……一個小爐子煉出來的鋼和鐵雖然不多，但用一萬個、幾萬個小爐子煉出來的就可以匯成滔滔的鋼鐵洪流。例如，河南省依靠群眾力量，今年可以建成三萬多個土高爐和簡易小高爐，煉鐵能力可以達到四百萬噸，相當於现在鞍鋼的生鐵產量！我們不説每一個省和自治區都建成這麼多小爐子，只説有四分之一的省和自治區做到吧，那不就等於我國多有七個鞍鋼了嗎？我國鋼鐵產量趕上英國的日子，不就可以大大提前了嗎？

為大力推廣「小土群」，冶金部等單位積極組織召開土法煉鐵、土法煉鋼的現場會議，以推動全國範圍的土法煉製鋼鐵運動，使「小土群」同「大洋群」配合起來完成任務。

全民大煉鋼鐵，動員了廣大工人、幹部、學生、居民直至鄉村農民。8月底以前，全國已建成一批年產鋼在十萬噸以下的小高爐。9月以後，新建了幾十萬個。「小土群」的土高爐，更是無處不在，幾萬、幾十萬，成百萬個一哄而起。不但工廠、公社，而且部隊、機關、學校，甚至外交部、安徽省委機關也建土高爐，辦煉鐵廠。這種高爐，大的不過幾米高，小的容積僅一立方米多，不但磚瓦窯、瓷窯改成了土高爐。就連侵華日軍和國民黨軍留下來的碉堡、炮樓，也都改成土法煉鋼的爐具。為了解決鋼鐵戰線煤炭不足的問題，煤炭部提出，一方面，原有的大煤礦進一步加緊生產；另一方面，全民大辦「小煤窯」，發動「小土群」的運動，「用分散的小煤窯對分散的小土群」，僅小煤窖開挖十萬多個。煤炭不足，各地還大量砍伐樹木燒成木炭代替。高品位的礦缺乏，就用低品位礦石代替，沒有礦石，甚至把家庭用的鐵鍋砸碎當原料。與大煉鋼鐵相配套：大辦地質，全國上千萬人進山找礦；大辦運輸，組成了數以千萬計的運輸大軍，各行各業男女老幼，既用現代化車輛，也用原始運輸工具，晝夜不停，搶運大煉鋼鐵所需的各種物資。

9月24日《人民日報》介紹湖南邵陽專區的經驗：

他們組織全民大辯論，駁倒了「農民煉不出鐵來」的「懷疑論」、「條件論」等右倾保守思想……，在全區組織了萬餘幹部、九十三萬群眾投入煉鐵運動。沒有礦，他們説：「把地球挖穿，也要挖出礦來」。僅一個湘鄉縣，就發動了七萬多人找到一百二十處鐵礦和五十一處煤礦。焦煤運不及，他們自己去挑，去搬。僅一個漣源縣就發動二萬多人排成長蛇陣，從山上運下六千多噸焦煤。

新華社10月19日報道，廣西鹿寨縣在17日下午2時到18日下午2

時，一天內生產生鐵20.7243萬噸；另產燒結鐵28.8139萬噸。放出全國最大的生鐵「衛星」。他們的經驗是：

> 集中了群眾的智慧，把小煉鐵窯改為大窯，並廣泛利用舊的磚瓦窯、石灰窯、炮樓、碉堡等來煉鐵。新建的煉鐵窯平均每個容量為50噸，最大的達15300噸。[7]

各方群眾，響應共產黨的號召，為了鋼鐵翻番，為了國家的富強，自願貢獻一切和不怕苦不怕累的忘我精神，充分反映了中國人民既純樸、真誠又幼稚、天真。對群眾大煉鋼鐵的情景，當年有如下生動報道：

> ——坩堝爐旁圍着一大群人，他們伸長着脖子，緊張地探視着發白光的熾熱的爐窯，偶爾閉閉眼，用手巾擦擦鼻子上滴出的汗。這些人是誰呢？他們有的身着整齊的軍裝，有的胸上佩有校章，有的只戴有工作號碼，有的甚麼標誌也沒有。他們都是到重慶大學學習坩鍋爐煉鋼技術的。
>
> ——四川農學院掀起了捐獻廢鋼廢鐵廢銅的熱潮。一周多的時間內全院就捐獻了廢鐵鍋十二噸半。師生員工在「分秒必爭，斤兩必抓」的口號下，對本單位和自己家裏的東西，進行了翻箱倒櫃的清理。各系各單位除了把擠壓和暫不需用的器材，通過調用或借用等辦法，拿去支援鋼鐵生產外……還早出晚歸的四處尋找廢鐵渣和廢鐵礦，在周公山，在車站附近，許多埋藏在地下若干年的廢鐵和廢鐵礦石，也被同學們發掘了出來，一背一背地一車一車地搬到捐獻台。[8]
>
> ——河南省洛陽市西工區十二個小學聯合建成紅領巾鋼鐵廠。……工廠按照兒童不同的年齡、體格和生活興趣，在教學和生產中採取了各種措施。從七歲到九歲的一、二、三年級學生在廠外勞動兩小時，參加拾廢鐵、挖淘鐵砂、揀木柴、松紅瓦片等勞動，把他們喜歡往衣服小口袋裏裝木頭、鐵釘的興趣轉移到有意義的勞動方面來。在廠內勞動的大孩子們，都是半天學習，半天生產，在勞動組織上作了合理的分工，十四五歲的參加做砂型、配料、機械管理、吹氧一類輕便的活。年紀更大一些的就抬鐵水包，鍛造、搪爐子等……。[9]
>
> ——月光下，一片叮噹之聲。我一口氣穿過了幾條大街和小巷，看到家家都在敲碎碗片。我問一位老大爺：「你敲這幹嗎？」老大爺回答說：「做耐火磚呀！」……「我們泰州市計劃要造三百個高爐，二十天內就要全部出鐵呢！造高爐就要耐火磚，現在我們每家計劃要交六斤碎碗片敲成的細粉，可單是前四天裏我就敲了二十斤，我和我的小孫子要爭取交六十斤呢！」[10]

據统計，7月底，全國用在鋼鐵戰線上的勞動力已有幾十萬人。8月底，增至幾百萬人。9月底，猛增到五千萬人，10月底，又增到六千多

萬人。1958年末，達到了九千多萬人，加上其他戰線直接和間接支援的，全國投入大煉鋼鐵連動的勞動力超過了一億，佔全國人口的1/6。

4.「九千萬人上山」及其後果

就在「小土群」如雨後春筍般地從地裏冒出來的同時，報刊不斷報道各地大放「鋼鐵高產衛星」。9月14日，貴州省首放「衛星」宣布生產生鐵14000噸，提前超額完成了9月份的9000噸生鐵生產計劃。曾在農業方面「名列前茅」的河南省不甘示弱，馬上宣布僅9月15日一天，全省產鐵11894噸，日產生鐵千噸以上的縣出現了八個，其中禹縣日產生鐵高達4396噸。9月29日，是中央確定的放「衛星」的日子，全國日產鋼近六萬噸，鐵近三十萬噸，出現了九個日產生鐵超過萬噸的省，七十三個日產生鐵超過萬噸的縣，和兩個日產5000噸鋼、一個日產4000噸鋼的省。10月15日到21日是中央確定的高產周，10月26日《人民日報》稱：「一周內鋼的平均日產量比以前十四天的平均產量增加了85%，其中鋼的最高日產量曾達到十萬多噸。」在此期間，毫無鋼鐵工業基礎的廣西壯族自治區「後來居上」，連放幾顆特大衛星。環江縣產生鐵6300噸，忻城縣日產煤炭六十七萬多噸，鹿寨縣日產生鐵竟然「高達」二十萬噸。

這種用「小土群」的辦法，大煉鋼鐵的群眾運動，實際情況究竟怎樣？河南禹縣等地就是典型一例。

時任中央工業部副部長高揚，1958年9月率該部工作組到河南禹縣、方山、魯山等地了解大煉鋼鐵的情況。初到方山一看，的確一派熱火朝天的景象。與高揚同時去禹縣採訪的《人民日報》編輯夏景凡，曾描寫當時的情形：

> 來禹縣四五天，看了一些群眾大煉鋼鐵的場面，很受感動。这裏群眾大煉鋼鐵的勁頭，真是大得無可比擬。通往山區的大路上，日日夜夜都是擰成繩的人群、馬牛群、牛車群、小土車群、自行車群……所有可以用來運輸的東西都用上了，大汽車也很多，公路上經常發生擁擠和等路的現象。山溝裏的景象更是壯觀：滿山遍野的人堆，一片片的土爐群，狼煙沖天，人聲吵雜，加上千萬風箱、風葫蘆、鼓風機抽動的聲音，真是熱鬧極了。……在这裏佔人最多的工作除運輸外，要算是作鼓風的人了。少數國營廠有極少數電力或柴油機帶動的鼓風機；公社辦的廠，則多是用人力絞動的風葫蘆和無數的大小風箱；原來在家裏用來做飯，廟會上用來製水煎包子和炸油饅的風箱，都拿來用上了；前幾天在方山『三八婦女煉鋼廠』，還看到許多從三里、五里、十里、八里趕來支援的老太太和孩子們；他們一個個都拿着在家煽火做飯和夏天拂暑用的芭蕉扇和雞毛扇，目的是想為煉鐵鼓風的。説起來這可能是笑話，但群眾這種熱情實在動人。特別是看

到那些老太太一手扶着拐杖，一手拿着扇子，踏着雨後的稀泥向山上爬行時，真是激動人心！

透過這種熱熱鬧鬧的場面，高揚一行很快就發現了問題。禹縣的山區聚集了本縣及來自許昌以東各縣村莊成千的男女青年，他們煉鐵用的所謂「鐵礦石」，誰也説不清含鐵量是多少，甚至很難説是鐵礦石，所用的燃料也不是焦炭而是煤。煉鐵是用土磚砌成的窰或利用舊磚窰，放進煤和鐵礦石用柴點火，等煤燃燒完或火滅了，所謂「煉鐵」就算告成。高揚親眼看到煉出來的根本不是甚麼鐵，只是一些燻得烏黑的石頭。後來有人説是「燒結鐵」，其實根本就沒有燒結。高揚當時就向禹縣縣委書記刁文指出，这裏有嚴重的弄虛作假現象，上報的數字90%以上都與實際不符，全縣很少有一類鐵，有的廠甚至根本沒有一類鐵，也報了許多一類鐵的產量。全縣平日沒有甚麼日產量，只有放衛星時集中報一下，而且許多是把鐵礦石裝進大土爐便上報了產鐵量。對這種弄虛作假的情況，高揚無法容忍，當即向中央工業部寫了考察報告，並向中監委寫了報告（他當時還是中監委委員）。

在这裏採訪的夏景凡從高揚處了解了上述情況，還從當時也在禹縣調查的冶金部幾位技術幹部那裏又知道了不少弄虛作假的情況。冶金部幾位幹部認為：这裏對甚麼是一類鐵，甚麼是二類鐵，各廠劃分全不一樣，有的廠上報一類鐵的產量大大超過實際產量。如方山鎮衛星社煉鐵廠9月15日第一次放「衛星」時，上報一類鐵日產量210噸，實際上並不是一類鐵；從該廠建立到9月28日上報鐵產量共計1860噸，其中一類鐵212噸，實際上所能生產的一類鐵不超過一噸，二類鐵不超過兩噸。在計算產量時是把幾天的產量算成一天的產量。

冶金部的幹部還把方山區兩次放「衛星」的上報產量與實際產量比了一下。兩次放「衛星」，方山區各廠共上報17816噸，其中一類鐵1335噸；據他們實地調查和報表計算，實際完成一類鐵不超過200噸，前面提到的「三八婦女煉鐵廠」上報產量總計587噸，其中一類鐵十一噸，二類鐵八十噸，三類嫌496噸。這些產量除調走二類鐵兩噸外，其餘全部存在廠裏。冶金部的人到廠裏實地調查發現：一類鐵僅0.8噸，與其上報數相差十二倍；二類鐵不超過三噸，與其上報數相差二十七倍；三類鐵不超過八十噸，與其上報數相差六倍。

夏景凡自己也作了實地考察，他在各廠除了看到人山人海外，很少看到流出鐵水，很難找到一座正常生產的土高爐。

然而就在高揚率領的工作組及冶金部和《人民日報》編輯調查期間，禹縣於9月30日又放了第三次「衛星」。本來這天下雨。土高爐生產受到影響，但晚上縣委書記刁文宣布第三次「衛星」的產量為6022噸，其中一類鐵200至300噸。高揚及工作組、冶金部的人都對這個產量抱有疑問，可是第二天縣鋼鐵辦公室上報產量提高到35000噸，而且報

到了中央，在報紙上公布了這個日產鐵的「記錄」。

因高揚等人在調查期間對當地的弄虛作假提出意見，地方領導對他們的態度也由熱變冷，最後轉為「敵視」。因為當高揚指出禹縣大煉鋼鐵弄虛作假時，河南省委正向中央報捷，並在報紙上公布日產鐵三萬噸的「成績」，高揚的意見被縣委、地委立即反映到省委，他還沒到省委匯報之前，中央工業部部長即來電話，命令立即率工作組回北京。高揚向河南省委吳芝圃、楊蔚屏介紹到禹縣、魯山等地考察的所見所聞時，吳、楊等人態度極為冷淡。高揚回到北京便受到部長的批評。[11]

周恩來對各地大放鋼鐵衛星，也持懷疑態度。周問曾留學日本，在鞍鋼幹過的工作秘書顧明，河南新鄉放出生鐵102萬噸的高產衛星，有無可能？顧明回答説：我們在鞍鋼，煉一噸生鐵，貧礦石要三、四噸，煉焦用煤要二、三噸，加上石灰石、輔助材料等要十多噸。102萬噸生鐵，要1000多萬噸的運輸量，新鄉那裏的運輸能力怎麼可能做得到呢？周囑顧明去河南實地了解情況。顧將土法煉出的所謂生鐵帶回來，最好的是含鐵成份較多的海綿鐵。周見了樣品，説「這哪裏是鐵嘛！」，這塊「衛星鐵」一直擺在總理辦公室的書架上。[12]

與「小土群」不同的是，大中型鋼鐵廠，則採用拼設備和加強勞動強度的辦法。作為鋼鐵工業主力軍的鞍鋼，根據鋼產量翻一番的計劃，1958年產鋼任務為450萬噸，1至8月實際產鋼233萬噸，比上年同期增長29.8%，只完成躍進計劃的51.9%。照此速度生產下去，不可能完成任務。遼寧省委、鞍山市委認為鞍鋼生產進度上不去，是鞍鋼有「右傾保守」思想在作怪，在鞍鋼大搞「拔白旗」運動。9月25日，鞍山市委召開三萬人大會，動員為完成450萬噸鋼而奮鬥。李富春在大會講話：「誰有更多的共產主義思想，誰就會創造奇跡，誰不打破常規，誰就要失敗。」「不要被某些事故嚇倒，也不要被大的企業和現代化的技術所嚇倒，更不要被懷疑派所嚇倒。一次失敗，再來第二次、第三次，一定要把紅旗插起來。」

鞍鋼「拔白旗」首先從煉鐵廠開始。被「拔」的有一面「大白旗」、七面「小白旗」，所謂「大白旗」，就是蔡和森先烈的兒子、留蘇歸來的煉鐵專家、總工程師蔡博。致使許多幹部不敢抓技術、抓管理，群眾的積極性受挫。違反規章制度，生產中出現了一系列問題。由於超負荷，爐體事故時有發生；高爐連續工作，缺少維修，發生漏鋼事故；平爐因等鋼模，鋼水在爐內呆得時間過長，對爐體侵蝕過大，造成爐體事故。浪費嚴重，成本上升，質量下降。1957年全公司因公死亡四十三人，1958年上升到六十五人。煉鋼設備事故1958年比1957年增加4.6倍。平爐冶煉時間1958年比1957年平均每爐延長三十二分鐘。每噸鐵成本1958年比1957年增加13%。生鐵合格率1958年比1957年下降4.09%。鋼材一級品率1958年比1957年下降3.67%。由於取消計件工資

和必要的獎勵，極大地挫傷了廣大職工的積極性。

全國範圍內經過四個月的突擊蠻幹，加上相當程度的虛報浮誇，鋼鐵產量迅速增加。12月19日，《人民日報》發表消息：〈一年間鋼產加番，在世界鋼鐵史上寫下了輝煌一章，1070萬噸鋼——黨的偉大號召勝利實現〉。到年底，則宣布完成鋼產量1108萬噸，生鐵1369萬噸，超額完成了1958年鋼產量翻番的任務。實際情況是，不但相當數量是不合格的廢鐵，而且給國民經濟的發展造成了嚴重的傷害。

其一，投入大，效益低，勞民傷財。

經核實：在公布完成的1108萬噸鋼中，被稱為「洋鋼」的合格好鋼只有800萬噸；在1369萬噸生鐵中，被稱為「洋鐵」的合格生鐵只有953萬噸。[13]其餘308萬噸土鋼和416萬噸土鐵，均為不合格產品，有些完全是廢鋼、廢鐵。

全國「小土群」煉鐵中，到底搞了多少小土爐？《當代中國的鋼鐵工業》中稱，小土爐和小高爐共二十四萬座，其中小高爐為六萬座，小土爐為十八萬座。[14]《薛暮橋回憶錄》記載：「除新建十萬個小高爐（稱小洋群）外，還造了大約六十萬個土高爐（稱小土群）。[15]按冶金部原定標準，生鐵含硫量不得高於0.1%。北戴河會議後，放寬標準，改為0.2%。但有些地區小高爐生產的鐵，含硫量竟超過2%、3%，有的甚至高達6%。這種當時名叫「燒結鐵」的高硫鐵根本不能煉鋼。用小高爐和土高爐煉鐵、煉鋼，成本費用高。薄一波回憶說：當時每噸大高爐的生鐵成本，鞍鋼為85.4元，石（景山）鋼為112.6元，國家規定的調撥價為150元。小高爐（容積在五十五立方米以下的）的煉鐵成本，原設計為153元，實際都在200元以上，多數為250至300元之間，有的高達460元。為鼓勵群眾煉鐵的積極性，國家規定從1958年9月1日起，小高爐生鐵調撥價提高到200元，虧損部分由國家財政補貼。當時估計1958年只補貼15億元左右，但據1959年12月10日財政部的報告，實際補貼了40億元（當年支付21.2億元、第二年決算追加補貼18.8億元），而1958年財政總收入才387.6億元，光補貼小高爐虧損就超過財政收入的1/10。這還不包括因提高調撥價格和土鐵質量差，而使煉鋼廠增加的支出和減少的收入。[16]李銳回憶當年的情況說：一噸生鐵的成本費，大高爐是100元，小高爐是345元，最高達到600元，超過大高爐鐵的成本四至六倍。據國家統計局估算，1958年土法煉鋼、煉鐵的虧損達50億元，佔當年國內生產總產值的3.8%。[17]國家花費了大量補貼。[18]

森林資源的破壞更是驚人。據《當代中國的林業》記載：

> 這次林木大破壞不僅範圍廣，規模大，而且時斷時續，此起彼伏，從1958年開始，前後延續四年之久。林木破壞的原因主要有三個方面：一是各地大練鋼鐵，大辦社隊食堂，大修水利和大

> 搞工具改革，砍伐了大量林木；二是在木材生產中的高指標、瞎指揮，造成亂砍濫伐，集中過量採伐；三是困難時期毀林開荒，生產救災，毀掉不少林木。其中以第一方面的破壞最為嚴重，遍及全國各地，毀掉的林木也最多。……遼寧省的彰武、康平、新民等縣的農田防護林被砍掉70%；豫東防護林被破壞了80%，使開封縣的四十萬畝耕地因此撂荒；冀西防擭林被砍掉四萬畝，占防護林面積1/3以上；河北省固安縣境內的永定河下游防護林被破壞了一半；陝西省榆林、橫山等縣毀林、刨沙蒿達200萬畝；甘肅省的河西防護林和固沙林被砍掉22.4萬畝。各地經濟林也遭到大破壞。全國油茶林減少了10%，油桐林減少了20%。經過這次破壞，有些地區的森林資源減少很多。湖北省1957年林木蓄積量為4122萬立方米（不包括神農架林區），經過幾年破壞後，僅剩下2733萬立方米，減少了34%。廣西1958年因燒炭、煉鋼砍伐木材1750萬立方米，相當於當年國家計劃在該自治區收購木材127萬立方米的十倍以上。[19]

其二，否定科學，盲目蠻幹，事故倍增。

大搞群眾運動，號召破除迷信，否定遵守規章制度的必要性，單純追求產量，盲目拼設備，管理陷於混亂，導致大量人力、物力、財力被白白浪費，不少設備因超負荷帶病運轉遭到損壞。有些企業把計劃、設計、技術檢驗、技術安全、設備動力、工藝等重要科、室撤消，管理人員下放當工人，有關權限下放給車間、工段或班組。有些企業推行「工人自我管理」或「無人管理」。有些企業甚至把所有規章制度都説成是教條主義或壓制工人積極性的條條框框一腳踢開。以致像鞍鋼煉鐵廠這樣的大廠，都接連發生建廠以來少見的惡性事故，死二十二人。當時全國最大的第十號高爐，投產不到一個月，就發生九起重大事故。[20]其他鋼鐵企業也是重大事故不斷。

1958年10月以後，在基本建設中，面對鋼材等物資緊缺，一些建築工地因陋就簡，用木材、竹材代替鋼筋，用磚木結構甚至磚拱結構代替鋼筋混凝土結構，並將這些做法當作節約的經驗加以宣傳推廣。片面理解快速施工，不顧開工前的準備程度，苦戰幾晝夜、人海戰術、急於「放衛星」等現象，在全國普遍發生。於是，工程質量事故的數量、傷亡的人數比歷年大增，1958年工傷事故共死亡五萬人。[21]

其三，國民經濟比例嚴重失調。

為保證實現鋼產量翻番指標，鋼鐵工業本身的基本建設規模增加了，與鋼鐵工業有關的煤、電、運輸等部門的建設項目同樣增加，拉長了1958年的基本建設戰線。據《中國統計年鑒》介紹，1958年施工的大中型項目由原計劃的1135個猛增到1587個，比1957年增加595個。基建投資由1957年的138億元增加到279.06億元，增加84.5%，積累率由1957年的24.9%增加到33.9%。

工業內部與工交之間比例失調。一是重工業內部比例失調，鐵、煤、有色金屬的供給滿足不了鋼的高指標需要，來不及新建大企業，就逼着老企業拚命增產，大量興辦耗料大、質量差的小企業，造成資源被強化開採。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每新增一噸煉鐵能力，相應要增加四噸鐵礦開採能力、一噸煉焦能力；而1958年每新增一噸煉鐵能力，只新增1.5噸鐵礦開採能力和0.3噸煉焦能力。二是輕重工業比例失調，強調工業生產「以鋼為綱」，其他工業「停車讓路」，調配給輕工業部門的原料和燃料大大減少。如：8、9月份，東北三省電力不足，減去輕工業電力負荷的2/3，使紙張減產十萬噸左右。北京王麻子刀剪廠有三百多人被抽調去煉鋼、煉鐵，只留下二十多人生產，使刀剪產量從每月3.5萬把降為3000把，剪子品種由二百多種減到十一種，刀的品種由360種減為七種。三是工業與交通運輸的比例失調，交通運輸跟不上工業的高速發展。1958年交通運輸貨運量做很大努力才增長40%，而同期煤炭增長107.7%，生鐵增長130.5%，因而到了年底，仍有大量煤炭、礦石運不出去。在1958年的貨運量中，正常的運輸能力只佔80%，其餘20%靠全民搞運輸，特別是發動農民搞突擊才達到的。

工業發展過急，影響了農業的發展。在大辦工業、大練鋼鐵過程中調用了農村中大量青壯勞力，參加農業勞動的多為婦女老弱等半勞動力。農業與工業勞動者的比例由上年的13.8:1下降到3.5:1。當時正值秋收季節，為完成鋼鐵翻番任務，約有九千萬人上山採礦煉鐵，不少莊稼無人收割，不少地區，糧食、棉花因無人收割而爛在地裏，以致當年豐產未能豐收。根據中央農村工作部的保守看法，1958年農作物估計有10%未收回。

由於以大煉鋼鐵為中心的全民大辦工業的需要，使全國職工總人數由1957年底的2451萬人猛增到4352萬人，超過了國民經濟特別是農業負擔能力，增加了國家的財政支出和商品糧銷量，擴大了社會購買力，加劇了社會商品的供需矛盾。

這種種問題，對國民經濟發展造成的影響，是廣泛而長遠的，可謂「傷筋動骨」。

面對大煉鋼鐵造成的災難，人們雖然不能閉眼不見事實，但卻硬着頭皮充當好漢。阿Q式地說甚麼：不能光算經濟帳，而要算政治帳。如1959年1月15日，王任重在湖北省四級幹部會議上說：

> 大辦鋼鐵運動的收獲，是煉鐵煉人，一舉兩得，出了八十多萬噸鐵，鍛煉了幾百萬人。即使有些地方上山的人很多，出的鐵很少，或者白跑了一趟，挖了些黑石頭回來，也是勝利，等於全民探礦嘛。我們不要單純從經濟上看，經濟上的收獲很大，政治的收獲更大。[22]

[1] 李銳：《「大躍進」親歷記》，下冊，頁218-219；蕭冬連等：《求索中國：「文革」

前十年史》，上冊，頁385。

[2]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卷，頁169-170。

[3] 劉文龍、劉家富：〈鋼鐵要過關，鋼鐵要過江〉，載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科研局編：《毛澤東的足跡》（北京：中國黨史出版社，1993），頁398-404。

[4] 中國湖北省委黨刊：《七一》，1958年第5期。

[5] 《新華半月刊》，1958年第19號，頁1。

[6] 《人民日報》，1958年8月8日。

[7] 〈全國最大生鐵衛星上天——廣西鹿寨縣日產二十萬噸多〉，《中國青年報》，1958年10月20日。轉引自沈久泉等選編：《老新聞——共和國往事（1956-1958）》（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頁188-189。

[8] 〈一切為了鋼〉，《光明日報》，1958年10月23日。轉引自《老新聞——共和國往事（1956-1958）》，頁191-192。

[9] 〈小學煉鋼樹起一面紅旗——洛陽紅領巾鋼鐵廠妥善安排生產和教學，日產鋼四十噸〉，《光明日報》，1958年10月26日。轉引自《老新聞——共和國往事（1956-1958）》，頁192-193。

[10] 〈新人新風氣〉，《人民日報》，1958年8月22日。轉引自《老新聞——共和國往事（1956-1958）》，頁197。

[11] 1959年廬山會議後，高揚大挨批判鬥爭，上綱上線，到1960年7月，結束批鬥，定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下放到貴州一個工廠。1962年7月，高揚得到平反復職。李銳：《「大躍進」親歷記》，下冊，頁224-227。

[12] 顧明：《歷盡艱辛創四化》，載程華：《周恩來和他的秘書們》（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2），頁19。

[13] 周恩來：《關於調整一九五九年國民經濟計劃主要指標和進一步開展增產節約運動的報告》（1959年8月26日在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五次會議上），載《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第二十三冊，頁131-132。

[14] 周傳典等主編：《當代中國的鋼鐵工業》（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6），頁72。

[15] 薛暮橋：《薛暮橋回憶錄》（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頁255。

[16]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頁712。

[17] 國家統計局國民經濟綜合統計司編：《新中國五十年統計資料彙編》（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1999），頁3。

[18] 李銳：《「大躍進」親歷記》，下冊，頁234。

[19] 《當代中國叢書》編輯部編：《當代中國的林業》（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頁105。

[20]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頁716。

[21] 李銳：《「大躍進」親歷記》，下冊，頁233。

[22] 李銳：《「大躍進」親歷記》，下冊，頁235。

三、人民公社化高潮

1.一哄而起的人民公社

與全民大煉鋼鐵同時展開，而比鋼鐵躍進來得更猛的是人民公社化高潮。原來的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全部變成了「一大二公、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

9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的北戴河會議公報中，就明確提到：

> 會議熱烈地討論了在全國農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問題。會議指出：把規模較小的農業生產合作社合併和改變成為規模較大的、工農商學兵合一的、鄉社合一的、集體化程度更高的人民公社，是目前農村生產飛躍發展、農民覺悟迅速提高的必然趨勢。人民公社是加速社會主義建設和過渡到共產主義的一種最好的組織形式，並將發展成為未來的共產主義社會的基層舉位。

同日出版的《紅旗》雜誌第七期，發表〈迎接人民公社化高潮〉的社論和《嵖岈山衛星公社試行簡章（草稿）》。向全國介紹了衛星公社一「大」二「公」的具體做法。主要內容是：

> 人民公社的宗旨是鞏固社會主義制度，並且積極地創造條件，準備逐步過渡到共產主義制度。
>
> 各個農業社合併為公社，根據共產主義大協作的精神，應該將一切公有財產交給公社，多者不退，少者不補。社員轉入公社，應該交出全部自留地，並且將私有的房基、牲畜、林木等生產資料轉為全社公有。
>
> 公社按照鄉的範圍建立，一鄉一社。為了便利工作，實行鄉社結合，鄉長兼任社長，副鄉長兼任副社長，公社管理委員會的辦事機構，兼任鄉人民委員會的辦事機構。公社實行集中領導，分級管理。生產大隊是管理生產、進行經濟核算的單位。盈虧由公社統一負責。生產隊是組織勞動的基本單位。
>
> 社員分配，實行工資制和糧食供給制。以生產隊為單位建立公共食堂和託兒所。

9月4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從「衛星」公社簡章看如何辦公社〉，讚揚了嵖岈山衛星公社「在若干方面突破了集體所有制的框框」，「取消了生產資料私有制的某些最後殘餘」的做法。

9月10日，《中共中央關於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公開發表。《人民日報》同日發表社論：〈先把人民公社的架子搭起來〉。11日發表8月29日北戴河會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今冬明春在農村中

普遍進行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教育的指示》。強調：已經大大發展起來的「城鄉協作，工農業協作，大公無私，互相支援的可歌可頌的共產主義行動」，「是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最可珍貴的精神力量和物質基礎」。「要充分發揚『拔白旗、插紅旗』的共產主義風格」，就「農業社如何合理分配？如何由農業社轉為人民公社？......這兩個問題展開鳴放辯論，並且引導農民用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精神來解決這兩個問題」。[1]

在此期間，各級領導人紛紛發表文章，闡明由農業社轉變為人民公社的必然性、重要性；報刊記者相繼報道各地辦人民公社的辦法和經驗。《紅旗》雜誌第八、第九期先後發表了：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吳芝圃：〈由農業生產合作社到人民公社〉、[2]河北省委第一書記林鐵：〈河北省的人民公社運動〉、[3]山東省委書記譚啟龍：〈「還是辦人民公社好」〉[4]等人的文章。《人民日報》先後刊載了：河南省委農村工作部鞏固人民公社的「五項措施」；[5]河南省遂平縣委副書記趙光：〈口糧供給加基本工資制——遂平縣衛星人民公社的分配制度〉；[6]《人民日報》記者苐君報道：〈江淮人民公社就實論虛駁倒「吃虧論」〉；[7]《人民日報》記者周祖佑：〈鄉社合一有哪些好處？〉；[8]《河北日報》刊載了該報記者言魯、燃天：〈安國縣在建立人民公社運動中怎樣解決的經濟政策問題〉[9]等文章、報道。對中共中央關於建立人民公社的決議作了積極響應和宣傳。

這時，一個大辦人民公社的全民運動，迅速在全國農村廣泛開展起來。

自從8月初，公開報道了毛澤東「還是人民公社好」的號召後，全國各地普遍開始了大辦人民公社。行動最快的河南省，僅8月一個月時間，全省農村在原有38473個農業社、平均每社260戶的基礎上，就建成了大型的綜合性的人民公社1378個，平均每社7200多戶，入社農戶佔全省農戶總數的99.98%。9月10日，關於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公布後，全國範圍內掀起了大辦人民公社的熱潮。其來勢之猛，速度之快，規模之大，遠遠超過了1955年下半年農業合作化運動的熱潮。根據1958年9月30日，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人民公社化運動簡報》第四期報道：「截至本月底，全國已基本實現人民公社化。」具體情況是：

全國二十七個省、市、自治區有十二個省、市、區100%的農戶加入了人民公社。十個省、區已有85%以上農戶加入了人民公社。四個省、區（浙江、貴州、寧夏、新疆），在國慶節前也可基本實現公社化。只雲南一省計劃在10月底完成。截止9月29日統計，全國共建起人民公社23384個，加入農戶112174651戶，佔總農戶的90.4%。[10]

2.「一大二公」的公社特色

人民公社的特點，當時被概括為：「一大二公，政社合一。」

所謂「大」，就是社的規模大。

在人民公社化前，全國有七十四萬個農業生產合作社，每社平均約有170戶，二千多畝土地和350個左右的勞動力。人民公社化以後，變成了2.65萬個人民公社，每社平均約有五千戶，六萬多畝土地和10000個左右的勞動力。農業生產合作社，基本上是一村一社，一鄉數社；人民公社，則變成了一鄉一社，甚至數鄉一社，規模擴大了十倍以至幾十倍之多。如：河南省遂平縣楊店、土山等五個鄉、二十七個農業生產合作社，合併建立了9369戶、43263人的衛星人民公社。商城縣何店、豐集等十個鄉，六十八個農業生產合作社，合併建立有20457戶、98273人的超英人民公社。這種情況，並非個別。根據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統計：

在十一個省、市、區7589個公社中，五千戶以下的5287個；五千戶至一萬戶的1718個；一萬戶至二萬戶的533個；二萬戶以上的五十一個。河南、吉林等十三個省，已有九十四個縣以縣為單位，建立了縣人民公社或聯社。[11]

可以想見，要在一個擁有幾萬乃至幾十萬人口，分布在幾百乃至上千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統一調度以手工勞動為基礎的農業生產，會造成多麼大的混亂和人力物力的浪費。

人民公社的「公」，首先是生產資料所有制的「公」。

組建人民公社，農業生產合作社的土地、耕畜、農具等生產資料及其他公共財產全部轉歸公社所有，實行全社統一核算；社員原來經營的自留地以及個人擁有的林木、牲畜等財產，被收歸公社經營和轉為公社所有，消滅了生產資料「私有制的殘餘」；國家把糧食、商業、財政、銀行等部門在農村的基層機構下放給人民公社管理經營，使公社的集體所有制經濟中增加了若干全民所有制的成份。

這種把經濟條件不同的社拉到一起統一核算，使窮社共了富社的產；消滅所謂生產資料私有制的殘餘，使集體共了個人的產；把全民所有制的部分企業下放給人民公社，使公社共了國家的產的做法，後來被稱為「共產風」。[12]大辦農村人民公社的過程，實際上就是大颳「共產風」的過程。

其二，人民公社的「公」，還表現在領導體制和分配制度方面。

農業生產合作社，實行的基本是多勞多得的按勞分配製，人民公社普遍實行的是供給制和工資制相結合的分配制度。根據人民公社不同的經濟條件，供給制主要有糧食供給制，伙食供給制和生活基本需要供給制三種形式，這部分在社員的收入中分別佔50%，60%和80%；工資制

是在供給制之外，按照多勞多得的原則支付給社員一定數額的貨幣，這在社員的收入中分別佔50%、40%和20%。實行最為普遍的是「吃飯不要錢」的糧食供給制和伙食供給制。除此之外，還有相當一部分人民公社實行「七包」、「十包」的生活基本需要供給制。所謂「七包」，是對人民公社全體人員的吃飯、穿衣、居住、生育、教育、看病、婚喪等生活需要部分，均由公社供給。所謂「十包」，就是除上述「七包」外，還包烤火、理髮、看電影看戲等生活費用。

可見，無論是所有制，或是分配制度，人民公社的「公」，就是一個「平」——搞絕對平均，它是對毛澤東號召「破除資產階級法權思想」，強調戰爭年代的軍事共產主義傳統的直接回應。是小農的空想社會主義思想的反映。

其三，人民公社由「一大二公」派生出來的，是管理上的高度集中統一。

在人民公社化之前，農村實行的是鄉社分立的管理體制，鄉是基層政權，社是農業經濟組織。人民公社建立，確立了政社合一、分級管理的體制。人民公社既是一級政權機構，又是一種經濟組織。它不但負責全社的農業生產，而且還對工、商、學、兵等統一管理。在人民公社內部，將公社劃分為若干個生產大隊，生產大隊又劃分為若干個生產小隊，實行三級管理。公社統管全社的生產安排、勞力調配、物資調撥和產品分配，生產大隊負責生產管理和部分經濟核算，生產小隊只是一個具體組織生產的基本單位。這種政社合一的領導體制，就使公社領導實際在使用行政手段直接管理經濟，既違反經濟規律和自然規律，又侵犯了生產單位應有的自主權利。

在管理方式上，實行組織軍事化、行動戰鬥化和生活集體化。

所謂組織軍事化、行動戰鬥化，就是把人民公社的男女勞力，全部編成團、營、連、排、班的軍事建制，實行統一的軍事指揮，在各種「大辦」中像參加戰鬥那樣進行部署、調動。

所謂生活集體化，就是大辦公共食堂、託兒所、幼兒園、幸福院等公共事業，把以家庭為單位的傳統生活方式改變為以生產隊為單位的集體生活方式。當時，各地的人民公社普遍建立了以民兵為主體的勞動大軍，辦起了以公共食堂為主要形式的公共事業。到9月底為止，山西省就建立起一支429萬多人的勞動大軍。甘肅、四川、廣西、雲南等省區也都按照冶煉鋼鐵、興修水利、農業生產、築路運輸等方面組織了很多「野戰兵團」。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的《簡報》稱：到9月底止，據江西、陝西、河北、福建四省不完全統計，共建立公共食堂563373處，託兒所、幼兒園599331個。此外，老年幸福院、婦產院、澡堂等組織也都有很大發展。[13]

農民對人民公社大颳「共產風」，搞「一平二調」，以及生產上的

瞎指揮，不能不有所反抗。因為作為小農來説，「共」別人的產是會舉雙手擁護的；但當別人來「共」他自己的產，就必然本能地進行反抗。對農業社轉為人民公社期間，農民這種複雜的心理和表現，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的《簡報》曾有如下的敘述：

> 在鞏固人民公社的工作中，農村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教育更深了一步，因而各階層的思想情況暴露得愈加深刻，思想鬥爭愈加尖鋭，真理也愈辯愈明，據若干典型調查：堅決走公社化道路的佔80%多，其中主要是貧農、下中農，他們的反映是：「決心辦公社，意志堅如鋼，把心交給黨，把人交給社」。基本擁護，但有若干思想顧慮或誤解的佔10%左右。抵觸不滿的佔5%左右，其中主要是部分富裕中農。這部分富裕中農，在思想教育愈深入，愈接近解決具體問題的時候，他們的資本主義傾向就更加明顯地暴露出來，兩條道路的鬥爭也就更加鮮明。在處理殘存的生產資料上，少數富裕中農對私有制度留戀不捨，千方百計的隱瞞、分散財產，想「留一手」、「撈一把」，甚至大肆揮霍浪費。安徽省舒城縣舒茶公社富裕中農到處宣傳，「辦了公社明年茶樹就不是我們的了，今年秋茶要多撈一把，把它摘得枝葉不留」。有的富裕中農，鼓勵幹部分公共財產、私分糧食、少報收入、多報開支。表現在分配上，是「多積累，少消費」與「多消費，少積累」的鬥爭。廣大貧農、下中農在共產主義的前途鼓舞下，一致主張今年少分紅，多積累。而少數富裕中農，則到處宣傳「多收多分」、「產量翻一番，生活大改善」，並積極主張按小社分配。他們認為大社分配是「酸菜煮豬肉，油水都被酸菜沾去了」。表現在集體生活上，是「多集中，少自由」和「多自由，少集中」的鬥爭。廣大貧農、下中農堅決要求多辦公共福利事業。而少數富裕中農，則到處散布「不自由」、「不習慣」等論調。目前各地，正就以上種種思想，展開大鳴、大放、大辯論。結果是個人主義、本位主義、資本主義受到了深刻的批判，廣大群眾的集體主義、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思想進一步提高。據各地反映，凡是抓緊了政治掛帥，運用大鳴、大放、大辯論這一工作方法的地方，在處理各項經濟問題時，都做到又快、又好、又順利，達到大家滿意，增強團結。反之單純忙於處理經濟問題，結果是愈處理問題愈多，糾纏不清，影響了生產，影響了運動的健康發展。[14]

《簡報》的這段文字，雖然抹上了一層階級鬥爭的色彩，但卻生動地披露了農民對大颳「共產風」——搞絕對平均主義的矛盾心態；又反映了公社化運動，是在用大辯論開路，給農民施加政治壓力，這種變相的強迫命令手段下給哄起來的。這就是在一片敲鑼打鼓、鞭炮齊鳴、萬眾歡呼聲背後的人民公社化運動。

3.徐水式的「共產主義」

實現人民公社化，中共中央《決議》明確指出，是為了「加速社會主義建設，提前建成社會主義並逐步過渡到共產主義」。又說：「人民公社的集體所有制中，就已經包含有若干全民所有制的成份了。這種全民所有制，將在不斷發展中繼續增長，逐步地代替集體所有制。」由集體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過渡，少則三四年，多則五六年就可完成。號召運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條過渡到共產主義的具體途徑」，並斷言：「共產主義在我國的實現，已經不是甚麼遙遠將來的事情了。」

因此，當人民公社建立之時，也就形成了一股「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的狂熱」。例如：中共中央確定的共產主義試點單位——徐水縣，他們向共產主義邁進的規劃是，1963年進入共產主義社會；以提出「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出名的山東省壽張縣，計劃兩年實現共產主義；同樣激進的山東省範縣（今屬河南省），在1958年10月28日的萬人大會上宣布：「1960年過渡到共產主義」，還用詩一樣的語言具體描繪了進入共產主義的美好圖畫。

最早發現徐水這顆「明星」，是1958年初春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譚震林到河北省保定地區視察，對徐水水利化建設的成績和經驗作了肯定。接着，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副部長兼國務院農辦副主任陳正人，奉命到徐水總結經驗。1958年3月14日，陳正人將徐水縣實現農田水利化情況的報告送到中央，當即轉到在成都主持中央會議的毛澤東手中。毛閱後，於3月21日批道：「此件連同譚震林的報告（指：關於第二個五年計劃水利建設的初步安排的報告——引者註）付討論。徐水縣的經驗普遍推廣。」[15]4月17日，《人民日報》又在醒目地位全文刊登了〈中共河北省委關於徐水縣委組織農業生產大躍進領導經驗的總結〉。5月，徐水縣委書記張國忠作為河北省的代表，出席在北京舉行的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一個默默無聞的徐水，一夜之間成了耀眼的明星。縣委書記張國忠也成了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的中心人物。

7月7日，中共徐水縣委發出《關於改革勞動組織和家務勞動普遍實行大協作的指示》，要求發動一場生產和生活方式大革命。實現：行動軍事化，田間管理工廠化，思想共產主義化，領導方法群眾化。「四化」的核心是行動軍事化。張國忠強調說：

> 要做到全民皆兵，思想行動一致；要以黨的組織為核心，把全民團結在黨的周圍，充分發揮黨員、團員和民兵的作用。鄉、社、隊都要實行軍事化的編制，鄉要建立社會主義躍進兵團，設總指揮（司令員）、政委、後勤部主任等職，由書記、鄉長出任；社要建立營、連、排的組織，每個排要有政治幹事，負責掌握思想情況和組織辨論；每個村為一個營或一個連。鄉要劃分若干戰區，鄉黨委分片包乾。使這一軍事組織真正成為堅強的農業社會主義躍進兵團。[16]

於是，幾天之間，徐水全縣建立了93個團，229個營，1099個連，3365個排。有的鄉還按勞力強弱、年齡大小，組成「青年火箭排」、「壯年躍進排」、「婦女突擊排」、「少年先鋒排」。上下工列隊，按口令行進，戰前有動員，收工有講評。以實行統一調配勞動力的大協作。為促成家務勞動集體化和社會化，社社建立了公共食堂、託兒所、幼兒園、幸福院等。全縣共辦食堂1693個，在食堂吃飯的社員達22.5639萬人，佔全縣70.5%的人口進了食堂。一時間，徐水縣成了一個大兵營。

毛澤東8月4日在徐水視察時，對軍事化表示很滿意。8月5日，徐水縣委召開全縣共產主義的思想文化躍進大會，張國忠在會上講話，提出：「向共產主義進軍」。8月6日，陳正人奉中央之命，到徐水搞「共產主義試點」，隨身帶來馬克思的《哥達綱領批判》和康有為的《大同書》。8日，他召集河北省委常委、副省長胡開明，省委秘書長尹哲和保定地委、徐水縣鄉村的幹部進行座談。陳說：第二個五年計劃，社會主義差不多了，第三個五年計劃，就要向共產主義過渡了。又說，劉少奇同志指示：在徐水搞一下試點。陳提出，要使徐水的發展速度比其他地方走在前頭兩三年，按照共產主義的標準和要求，對工業、農業、文化、教育和生活搞一個具體規劃。他要求大家學習《共產黨宣言》和他帶來的那兩本書。為搞好規劃，組成了一個有一百多人參加的「共產主義試點規劃小組」。22日，《中共徐水縣委關於加速社會主義建設向共產主義邁進的規劃（草案）》出台，提出：「奮鬥目標是：1959年基本完成社會主義建設，並開始向共產主義過渡，到1963年即進入偉大的共產主義社會。」

對甚麼是共產主義，張國忠8月5日在全縣共產主義的思想文化躍進大會上說：「現在高級社改為公社，就是共產主義的基層組織。」「把人民的生活、政治、經濟、文化教育都包括在內。」「大車、牲口全要公有，……存款還算自己的，生活用品是自己的。這就叫共產。愈共愈好，一共就富了。」[17]

9月1日，《人民日報》向全國人民透露了以下信息：「徐水的人民公社將會在不遠的期間，把社員們帶向人類歷史上最高的仙境，這就是那『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自由王國的時光。」

當北戴河會議精神傳達下來以後。徐水縣更是倍受鼓舞。9月15日，徐水成立了「徐水縣人民總公社」（後改稱徐水人民公社），就是全縣合成一個公社，實行縣一級核算。9月20日，徐水縣出台《關於人民公社實行供給制的試行草案》。決定：全縣實行供給制。即「每個人的吃飯、穿衣及主要生活必需品的需要，由公社有限制的、按照工農商學兵大體平等的標準計劃供應」，洗澡、理髮、看戲、看電影也都有公社統一包了起來。為解決男女老幼的不同需要，還規定給每人發一定數

量的津貼。具體標準是：

農民：根據勞動態度、技術高低、勞力強弱分為三等：一等每月三元，二等二元，三等一元；

工人分為七等：最低一等一元，最高七等十六元；

幹部分為四等：縣級十六元，科級十二元，一般幹部及教員八元，勤雜人員六元。

供給制的實行，被認為是徐水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標誌。當試行草案公布後，人們抬着「慶賀全民實行供給制」、「向共產主義過渡」的紅匾，敲鑼打鼓，高喊「擁護供給制」、「以實際行動加速向共產主義過渡」等口號，進行了遊行。

向共產主義過渡，並非徐水一家。

山東省範縣縣委書記謝惠玉在1958年10月28日的萬人大會上宣布「1960年過渡到共產主義」，並具體描繪了他們的「共產主義」美好圖畫。謝惠玉作的範縣兩年過渡到共產主義的規劃報告，被鄭重地摘要登在中共中央宣傳部11月4日編印的《宣教動態》上。題目是：〈山東範縣提出1960年過渡到共產主義〉。[18]其要點是：

> 一、工業。一年實現地方工業網，二年實現工業化、電氣化。……完成這些規劃後，我社將是：各種工廠遍地起，處處煙囪如林立，工廠機器轟轟響，大小機器自己使，生產操作按電鈕，難分勞動和休息。能產鋼鐵能產布，能造化肥發電機，拖拉機汽車也會造，生產用品樣樣齊，果品罐頭範縣酒，何時需要何時有，電燈電話收音機，使用起來真便利，這樣的日子何時到，苦幹二年拿到手裏。
>
> 二、農業生產萬斤化。……今年的水利要實現河網化。59年全部土地田園化，灌溉自流化、標準化，60年達到灌溉電氣化、自流化。到那時，田間耕作用機器，灌溉自流用電力；糧食畝產好幾萬，堆大敢與泰山比；棉絮開放似雪野，花生多得不用提；豐收一年頂百季，人人喜得了不的。
>
> 三、林業、漁業、畜牧業和多種經濟。根據三分之一的土地種莊稼，三分之一的土地植樹，三分之一的土地休閒的要求，59年在林旁、宅旁、公路旁、渠道旁、水庫池塘旁、河旁，堤旁、墳墓陵園實行綠化。
>
> 更富有詩意的是關於共產主義樂園建設的規劃：
>
> 1、根據全公社農業生產布局和有利於生產，美化環境的原則，把全縣九百九十三個自然村在三年內合併為二十五個合乎共產主義的新樂園。每個新樂園內設有：婦產院、劇院、影院、幼兒園、養老院、療養院、休假院、公園、託兒所、衛生所、圖書館、展覽館、文化館、理髮館、青年食堂、養老院食堂、大禮堂、會議廳、餐廳、跳舞廳、浴池、養魚池、供應站、廣播站、

體育場、發電廠、自來水供應站、畜牧場等，達到八院、二所、四館、三廳、兩池、三站、四場。

2、根據共產主義新樂園的規劃，范縣築成「經三、緯五」八條寬達三十公尺的大馬路，貫串到全公社二十五個新樂園。田間也修成筆桿條直四通八達的十二公尺寬的管理區道，除當中鋪成馬路外，兩旁培植果樹和花草。總之要實現：新樂園真正強，四面八方是樓房，有大學有工廠，公園街上百花香，柏油馬路明又亮，汽車穿梭排成行，有電影有戲院，勞動以後去聽唱，冬天室內有暖氣，夏天開開電扇乘乘涼，生活真是大變樣，萬年幸福樂無疆。……

真正達到：各種生產用機器，勞動學習娛樂「三八制」；出門坐上電汽車，到處花香真噴鼻；室內室外公路電燈化，有事搖搖電話機，定時廣播有喇叭；飯前飯後開開收音機，北京上海好戲隨便聽聽它。

謝惠玉最後總結說，1960年基本實行「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共產主義分配制度。到那時：

人人進入新樂園，吃喝穿用不要錢；

雞鴨魚肉味道鮮，頓頓要吃四大盤；

天天可以吃水果，各樣衣服穿不完；

人人都說天堂好，天堂不如新樂園。

對這位極富語言天才的書記，畫出如此美好的藍圖，毛澤東讀後，也深受感動。11月6日，毛作了如下批示：

此件很有意思，是一首詩，似乎也是可行的。時間似太促，只三年。也不要緊，三年完不成，順延可也。陳伯達、張春橋、李友九三同志有意思前去看一看嗎？行路匪遙，一周可以往還，會後出征，以為如何？[19]

當年，對共產主義抱着熾熱的憧憬，在中共中央高層，也非毛澤東一人。

在北戴河會議前，劉少奇對各地出現的託兒所、公共食堂、供給制、家務勞動社會化，婦女解放等新事物同樣抱有極大熱情。他同毛澤東一樣認為，這些都是共產主義生活的雛形。這一時期，劉講話的一個主題，就是「吹共產主義」。6月14日，劉少奇同全國婦聯黨組談話時轉達毛澤東的話說：空想社會主義者的想法現在實現了。7月5日，劉少奇在北京石景山發電廠同工人座談時說：

現在趕上英國不是十幾年，二年三年就行了。十五年是趕上美國的問題。其實也用不了十五年，七八年就行了。國家大有希望，大有前途，超過英美就變成世界上最富強的國家。

> 中國進入共產主義，不要好久，你們大多數人可以看到共產主義。[20]

9月19日至28日，劉少奇到江蘇視察，走遍江南江北，許多城市和鄉村，行程數千里。9月30日，《人民日報》發表了〈劉少奇同志視察江蘇城鄉〉的報導。文中說：「少奇同志關於如何貫徹黨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關於如何建設美好的共產主義生活以及培養人民共產主義精神的指示，給大家打開了廣闊的眼界，增添了巨大的精神力量。」劉少奇一路上非常關心人民公社實行糧食供給制的問題。當中共蘇州地委第一書記儲江匯報說：「群眾都非常贊成實行糧食供給制，他們說：『一個心思丟下了，一個心思又來了。』丟下的是幾千年愁吃愁穿的苦心思，又來的心思是怎樣把生產搞得更好，不然就對不起共產黨。」劉聽後說：

> 這兩句話，兩個心思，很值得我們深思。有人擔心，實行糧食供給制，會不會增加懶人？蘇州的農民的這兩句話，給我們作了最有力的回答。這說明他們不是變懶了，而是情緒更加高了，生產積極了。這就是人民的共產主義覺悟提高的表現，是共產主義道德品質更加提高的標誌。……只有徹底地實現共產主義，才能徹底的消滅懶漢。[21]

9月10至29日，鄧小平、李富春一行到黑龍江、吉林、遼寧三省視察。[22]鄧小平在雙城縣幸福人民公社、蓋平縣太陽升人民公社視察時說：公社是建立在生產大發展和人民政治覺悟提高的基礎上的。他希望公社在最近制定出一個長遠計劃，並向他們生動地描繪了農村建設的遠景。鄧說：

> 將來要把農村的居民點都建設成一座座漂亮的城市，有電影院、劇院、運動場；房屋都要改建；城中遍種花果；工農商學兵全面發展。大城市所有的一切，你們都可以有。這樣，就可以消滅城鄉差別。這種居民點，人少了是辦不起來的，大約是數萬人一處。

鄧小平對哈爾濱市的中小學貫徹勞動和教育相結合的教學方法表示滿意。他指示說：

> 勞動的收入，不要按人分配，最好是由學校統一掌握。除了給困難學生一些補助外，應當儘量用來舉辦公共福利事業，逐漸做到不收學雜費用、免費洗澡理髮、統一發給鞋襪和零用、以至吃飯穿衣都不要錢。總之，要培養共產主義思想，貫徹共產主義精神，不能助長個人主義。

對共產主義的嚮往，是歷代共產黨人的理想。馬克思雖不願為未來共產主義描繪完整的藍圖。但在《共產黨宣言》、《哥達綱領批判》等著作中，還是簡約地談到了共產主義的某些特徵，諸如沒有商品、沒有

貨幣、沒有國家，消滅分工，消滅差別，各盡所能，各取所需，實現人的全面發展，物質極大湧流……。這些「桃花源」式的理想，曾使無數共產黨人為之傾倒。

執政後的共產黨領袖們，對何時進入共產主義，更有一種把理想變成現實的迫切感和責任感。早在1920年，列寧〈在俄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演說〉中，就說過一二十年過渡到共產主義的話。他說：

> 現在五十歲左右的這一代人，是不能希望看到共產主義社會了，那時候他們都死了。至於現在十五歲的這一代人，就可以看到共產主義社會，也要親身建設這個社會。……現在是十五歲、再過一二十年就會生活在共產主義社會裏的這一代青年……要保證共產主義建設成功。[23]

由斯大林審定，於1938年出版的《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在談到1936年通過的新憲法時宣布：

> 蘇聯已進入新的發展時期，進入完成社會主義社會建設並逐漸過渡到以「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的共產主義原則為社會生活準則的共產主義社會的時期。[24]

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創建人的毛澤東等人，在向共產主義過渡問題上，其急切心情也不例外。1949年，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中曾說道：「康有為寫了《大同書》，他沒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條到達大同的路。」[25]當他1958年在北戴河說，空想社會主義的一些理想，我們要實行的時候。也就意味着，現在已經找到了「到達大同的路」。這也就是他本人早年的「新村」理想。

1919年12月，毛澤東在《湖南教育月刊》上發表的〈學生之工作〉中就曾具體提出過建設「新村」的計劃，具體設想是：

> 合若干之新家庭，即可創造一種新社會。新社會之種類不可盡舉，舉其著者：公共育兒院、公共療養院、公共學校、公共圖書館、公共銀行、公共農場、公共工作廠、公共消費社、公共劇院、公共病院、公園、博物館、自治會。合此等之新學校、新社會，而為一「新村」。吾以為嶽麓山一帶，乃汀城附近最適宜建設新村之地也。

1958年的人民公社化運動，雖非早年「新村」計劃的簡單翻版。但與早年接受康有為「大同書」的影響，幾十年戰爭年代軍事共產主義的經驗都是直接有關連的。

[1] 《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十一冊，頁451-452。
[2] 《紅旗》，1958年第8期。
[3] 《紅旗》，1958年第9期。
[4] 《紅旗》，1958年第9期。
[5] 《人民日報》，1958年9月19日。

[6]《人民日報》，1958年9月20日。

[7]《人民日報》，1958年9月18日。

[8]《人民日報》，1958年9月18日。

[9]《河北日報》，1958年9月4日。

[10] 〈全國基本實現了農村人民公社化〉（1958年9月30日），《人民公社化運動簡報》，第四期。轉引自《當代中國農業合作化》編輯室：《建國以來農業合作化史料彙編》（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2），頁503-504。

[11]《建國以來農業合作化史料彙編》，頁503。

[12] 薄一波在《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頁756）中說：「共產風」這個詞，是毛主席在1959年2月27日到3月5日召開的第二次鄭州會議講話中首先使用的。當時他說：「公社在1958年秋季成立之後，颳起了一陣『共產風』。主要內容有三條：一是貧富拉平，二是積累太多，義務勞動太多，三是『共』各種『產』。」

[13] 〈全國基本實現了農村人民公社化〉（1958年9月30日），《人民公社化運動簡報》，第四期。轉引自《建國以來農業合作化史料彙編》，頁503。

[14] 〈全國基本實現了農村人民公社化〉（1958年9月30日），《人民公社化運動簡報》，第四期。轉引自《建國以來農業合作化史料彙編》，頁503。

[15] 毛澤東：〈關於推廣徐水縣實現農田水利化經驗的批語〉（1958年3月21日），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七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頁143。

[16] 李鋭：《「大躍進」親歷記》，下冊，頁24-25。

[17] 李鋭：《「大躍進」親歷記》，下冊，頁28。

[18]《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七冊，頁495-497。

[19] 毛澤東：〈對《山東範縣提出一九六〇年過渡到共產主義》一文的批語〉（1958年11月6日），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七冊，頁494。

[20] 劉少奇在石景山發電廠工人座談會上的談話記錄（1958年7月5日），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金沖及主編：《劉少奇傳》，下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頁832-833。

[21] 〈劉少奇同志視察江蘇城鄉〉，《人民日報》，1958年9月30日；《新華半月刊》，1958年第20號，頁27-28。

[22] 〈鄧小平、李富春同志視察遼吉黑三省時強調說東北要大挖潛力支援全國〉，《人民日報》，1958年10月1日；《新華半月刊》，1958年第20號，頁32-33。

[23]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列寧選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頁359。

[24] 聯共（布）中央特設委員會編，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譯：《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頁381。

[25] 毛澤東：〈論人民民主專政——紀念中國共產黨二十八周年〉（1949年6月30日），載《毛澤東選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頁1471。

四、教科文衛大躍進

1.「插紅旗，拔白旗」

1957年反擊「資產階級右派」的鬥爭，中共中央徹底改變了1956年1月周恩來在知識分子問題會議上關於知識分子的絕大部分：「已經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的結論，重新給他們戴上了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帽子。強調「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必須徹底改造」，並提出培養自己的「又紅又專」的紅色專家的任務。1958年初，中共中央統戰部根據黨中央、毛澤東的指示和部署，領導和推動黨外人士開展整風運動，強調民主黨派、知識分子和工商業者要實現由資本主義立場到社會主義立場的根本改造。中央統戰部部長李維漢，2月27日在各民主黨派負責人座談會上講話説：要通過整風掀起一個自我改造運動，來一個自我改造的大競賽，在立場上和思想上來一個大躍進。[1]3月初，中央統戰部相繼發出：《關於資產階級分子、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和民主黨派成員的自我改造問題的通知》、《關於説明和推動各民主黨派組織進行一般整風的工作中應注意的幾個問題的通知》。

於是，在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中掀起了一場制定集體和個人改造規劃，進行挑戰、評比、競賽的群眾運動。3月2日，《光明日報》報導：九三學社三十多位中央委員、學者簽署的「社會主義競賽決心書」，向全國高級知識分子挑戰；中國民主促進會中央通過「自我改造決心書」，爭取在三年內使民進成員的左派和中左分子達到80%的目標。3月3日，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央舉行中央整風動員大會，民革中央主席李濟深等三十四人提出了社會主義競賽的決心書。民革中央決定：「把心交給黨，在改造政治立場上來一個大躍進。」3月16日，北京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一萬多人，在天安門廣場舉行「社會主義自我改造促進大會」，並在東西長安大街遊行。會上通過了《自我改造公約》表示要「把心交出來」，為促進社會主義事業「貢獻出全部知識和力量」。[2]3月20日，上海市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舉行社會主義自我改造促進大會和遊行，爭相表示：「把心交給黨，把知識交給人民。」「一定當左派！」其他各地區也紛紛響應，向黨「交心」。[3]在此期間，中國教育工會全國委員會二屆七次主席團會議號召教育、科學工作者迅速掀起一個「決心做左派、苦戰三年到五年，成為又紅又專、更紅更專的工人階級知識分子」的社會主義競賽高潮。[4]

然而，毛澤東並不相信知識分子們的這些表態，他在成都會議上講：「科學院哲學研究所被敵人統治着。」「有些同志甘願當資產階級

反動派學者的奴隸，是殖民地人民精神不振（做久了奴隸的反映）。」「對於資產階級教授們的學問，應以狗屁視之，等於烏有，鄙視，藐視，蔑視，等於對英美西方世界的力量和學問應當鄙視藐視蔑視一樣。」[5]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毛澤東強調說，「外行領導內行，是一般規律」。「插紅旗，辨風向」，「不是無產階級插紅旗，就是資產階級插白旗，或者其他人插灰旗。」他提出要「敢於插紅旗，拔黑旗、灰旗」。[6]如果說，1957年的反「右派」鬥爭，主要是為了鞏固共產黨在政治上的領導權；那毛澤東在这裏提出的問題，是要把學術領域的領導權從「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手中奪過來，建立共產黨在學術上的領導權。

毛澤東「插紅旗，拔白旗」的精神，很快在高等學校和科研單位得到貫徹。正當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整風交心運動進入高潮，全國各高等學校、科研機構相繼展開一場以反浪費、反保守，開展兩條道路、兩種方法鬥爭為中心的「雙反」運動；以教學改革為中心的全面躍進運動；大搞科學研究的群眾運動。貫串其中的是「拔白旗、插紅旗」，紅專辯論，批判資產階級教育思想、學術思想等一系列「興無滅資」的思想鬥爭。一批有獨立見解的專家、教授被當作「白旗」拔掉；一些潛心研究學問和科學研究的知識分子被戴上「白專」帽子；一大批有造詣的學界泰斗，被當作資產階級學術思想的代表進行批判，他們的學術思想被宣判為「偽科學」，他們的終身學術事業被宣布為「白專道路」。

北京大學3月10日召開「雙反」運動全校師生誓師大會，當天就貼出大字報八萬八千張。對老教師的學術思想一概當作資產階級學術思想進行批判，被批判的教師一概被作為「白旗」。其中有：對校長馬寅初的《新人口論》和經濟學觀點的批判；哲學系對馮友蘭、賀麟和心理學專業教授唐鉞等人的批判；中文系對游國恩、王瑤、林庚的批判。化學系的傅鷹教授，從運動開始，就憂心忡忡，他曾對化學系領導說，希望這次不要像「三反」那樣，不要傷人，免得老教師在運動後期失去積極性，喪失信心。然而，不到一個月，系裏就給他貼了三百多張大字報。《光明日報》5月1日報導，北大化學系的教師以教研室為單位，連續八天深入地討論了老教授傅鷹的白專道路問題，幫助傅鷹教授拔除白旗。對北大學術思想批判的情況，《光明日報》作了連續報導，例如：〈馬寅初輕視革命農民，為資產階級當「辯護律師」〉，〈馮友蘭假借百家爭鳴，高舉白旗傳播修正主義〉，〈賀麟痛恨哲學的黨性原則，露骨地為唯心主義招魂〉。同時發表有學校黨委、行政負責人或共產黨員的批判文章：〈攻克最後的資產階級思想堡壘〉，〈不容個人主義「負隅頑抗」〉，〈自我批判要真、準、恨、狠〉，〈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不該劃入剝削階級的行列麼？〉；被批判者則以〈向工人階級投降〉，〈徹底

批判以「我」為中心的思想〉，〈挖掉資產階級個人主義膿瘡〉為題進行檢討（其中就有傅鷹——出於無奈寫下的〈向真理投降〉）。北大全校受到批判的文理科教師共計有六十多人。該校中文、歷史、經濟、法律、西語、物理、化學七個系共有教授、副教授七十六人，受到批判者三十三人，占43.4%。北京師範大學受批判的教授、副教授和講師，僅中文系就有十人。[7]中央音樂學院的馬思聰、沈湘也被作為「白旗」受到打擊。康生在7月間還提出「拔銀幕上的白旗」。《花好月圓》、《球場風波》、《情長誼深》、《青春的腳步》、《上海姑娘》、《不夜城》、《誰是被遺棄的人》、《懸崖》、《生活的浪花》等影片都作為銀幕上的「白旗」受到批判。

7月1日，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徐冰作《關於資產階級分子、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和民主黨派的根本改造問題的報告》，其中提出，「今後對於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根本改造，應該緊緊抓住業務和政治、理論和實際、技術和群眾、教育和勞動相結合和個人利益必須服從集體利益的方針。」這是思想戰線上階級鬥爭的繼續，強調對他們的資產階級立場和資產階級思想，「要整臭」，「整的愈臭，才更有可能把他們的文化技術和工農大眾結合在一起，政治掛帥，知識公開，作出更多的貢獻，使技術革命和文化革命開出燦爛的花朵」。[8]8月30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學術批判是自我革命〉，提出高等學校的領導者要大膽地發動群眾，幫助資產階級學者進行學術思想批判。

於是，這場對資產階級學術思想的批判，在全國更激烈地開展起來。僅《光明日報》在1958年就發表二百五十多篇批判文章，約一百萬字，批判了八十多人。除前述北大已被點名者外，學術界的知名教授還有：數學界的齊民友、華羅庚、吳文俊；心理學界的彭飛、朱智賢、曹日昌、潘菽；史學界的陳寅恪、周谷城；法律學方面的芮沐、龔祥瑞；文學界的劉大杰、王力、高名凱、朱德熙、鄭振鐸、朱光潛等。當時影響較大的批判有：對馬寅初的「團團轉理論」和馬爾薩斯人口論的批判；對資產階級心理學的批判；對數學特殊論的批判；對文學研究中的資產階級學術思想的批判。採用的方法，名曰「大辯論」，實為政治圍攻。

如：對馬寅初〈新人口論〉的批判。馬氏理論的基本觀點是：「我國最大的矛盾是人口增加太快。[9]」「中國人口如繼續這樣無限制發展下去，就一定成為生產力發展的阻礙。」主張必須控制人口增長；不但要控制人口的數量，而且要提高人口的質量。為此，他提出，國家要制定人口政策；節制生育，控制人口增長；實行計劃生育，廣泛宣傳避孕。

當時的批判文章，指責馬寅初的觀點「在理論上是錯誤的，在政治上是有害的」。「基本思想是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按其本質來說是舊

的馬爾薩斯的人口論。」認為，在社會主義制度下，較多的人口，不是更大的自然壓力，而是更大的社會的生產力。「社會主義國家把人口的增長看作加速社會主義建設及共產主義建設，推動社會進步的偉大力量。斷言，社會主義國家決不懼怕人口的高速度增長，而為人口高速增長創設一切有利條件。」有的指責「馬寅初的『人口質量論』更為反動」，「是帝國主義歷來誣衊中國人民的濫調」，「實質上是為帝國主義國家的資產階級幫了忙，是為帝國主義『種族優越論』作了辯護」。甚至辱罵「限制人口的數量，改善人口的質量」的主張，是「喪盡廉恥的洋奴才的卑躬屈節效忠于外國主子的賣國理論」。[10]這場錯誤批判一直持續到1960年，但馬寅初並未屈服。1960年1月，馬寅初被迫辭去北京大學校長職務。[11]

歷史表明：1960年代，中國人口的盲目增長，是與對馬寅初的錯誤批判、與毛澤東在人口問題上的錯誤決策有着直接關聯的。「錯批馬寅初，誤增三億人」一説，不無道理。

又如：對心理學「資產階級方向」的批判。1958年7月下旬，從北京師範大學批該校心理學教授彭飛、朱智賢開始，北京、上海、天津、瀋陽、武漢和四川等地的高等學校和科研單位，相繼召開「資產階級心理學」批判會。批判「資產階級教授」關於人類有共有的心理過程、心理形式和心理規律的學説，是抹煞心理活動的階級性，宣揚資產階級人性論；是反對馬克思主義哲學，推崇資本主義國家尤其是美國資產階級心理學。強調：心理學是「純社會科學」，人的一切心理活動都是有階級性的。「資產階級專家把心理學列為邊緣科學（界乎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之間——引者注），其實質是為了反對階級分析，企圖削弱這門科學的黨性。」提出，要重建「無產階級的心理學」。[12]完全是一種全盤否定原有科學成果、胡亂給學者扣政治帽子、對學科亂貼政治標簽的做法。

三如：武漢大學對數學系黨總支書記齊民友的批判。齊民友對「數學能不能聯繫實際」，「數學能不能走群眾路線，辦學靠誰」等問題，持有與「教育革命」要求不同的看法。他認為，數學有它的特殊性，與物理、化學不同，要求數學理論聯繫實際、體力勞動與腦力勞動相結合不大好搞。數學是一門嚴格的科學，只有經過按部就班、嚴格訓練才能掌握。在數學領域誰最有知識，誰最有發言權。不是靠走群眾路線所能解決的。於是，齊遭到一百多次大小辯論會的批判，稱之為「百團大戰」。齊被指責為「一面資產階級帥字白旗」，「資產階級『專家』代表」，在數學改革中反對黨的教學方針。被戴上「否定黨的領導」、「反對黨的教育方針」、「走資本主義老路」的帽子。8月20日，《人民日報》發表評論員文章，〈拔掉教育戰線上的白旗〉，文中説，齊民友代表的是「一套完整的資產階級教育思想」。是一場「階級鬥爭」。

武漢大學的「拔白旗」運動，全校有三百九十一人受到批判，其中教師八十四人，佔教師總數的14%；教授、副教授三十二人，佔其總數的40%。[13]

再如，鄭振鐸認為中國文學受印度文學的影響很深，批判文章就說他是「民族虛無主義者」，批判他的《中國俗文學史》，是對勞動人民「惡毒的歪曲和誣衊」。對於王瑤的《中國新文學史稿》，批判文章給它扣上了「不遺餘力的抹煞黨的領導作用」的政治帽子。更為荒唐的是，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對著名考古學家裴文中的批判，說裴「由於忽視了政治掛帥而造成了嚴重的學術脫離政治的傾向，他自然是考古學上的一面資產階級的白旗，那麼就應該把它拔下來」。[14]

實踐證明，無論是急風驟雨式的整風「交心」，或是武斷粗暴的「拔白旗」的學術批判，不但無益於調動知識分子、民主黨派成員的積極性，相反在知識分子的心靈深處造成了巨大的創傷，在學術上製造了混亂，阻礙了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不少學科，甚至中國經濟、社會的發展。

2.教育制度的革命

1958年開始的教育革命，是以勤工儉學、教育與勞動生產相結合，實行中央和地方兩條腿走路為指導方針，開始實行教育體制改革的。

毛澤東在《工作方法六十條》中提出：

> 一切中等技術學校和技工學校，凡是可能的，一律試辦工廠或者農場，進行生產，做到自給或半自給。學生實行半工半讀。……
>
> 一切高等工業學校的可以進行生產的實驗室和附屬工廠，除了保證教學和科學研究的需要以外，都應當盡可能地進行生產。此外，還可以由學生和教師同當地的工廠訂立參加勞動的合同。
>
> 一切農業學校除了在自己的農場進行生產，還可以同當地的農業合作社訂立參加勞動的合同，並且派教師住到合作社去，使理論和實際結合。……
>
> 農村裏的中小學，都要同當地的農業合作社訂立合同，參加農、副業生產勞動。……
>
> 大學校和城裏的中等學校，在可能條件下，可以由幾個學校聯合設立附屬工廠或者作坊，也可以同工廠、工地或者服務性行業訂立參加勞動的合同。
>
> 一切有土地的大中小學，應當設立附屬農場；沒有土地而鄰近郊區的學校，可以到農業合作社參加勞動。[15]

《人民日報》1958年1月20日發表社論：〈兩個好榜樣〉，推薦河

南長葛縣第三初級中學、貴州仁懷縣群力農場業餘初級中學實行勤工儉學的經驗。指出：勤工儉學是一件有意義的值得大力提倡的事情。它是革新學習風氣，進一步促進我國教育事業蓬勃發展的一件大事。20日，《人民日報》報導西安第一航空技工學校實行半工半讀，經費自給自足的做法。2月10日，《人民日報》發表〈貫徹群眾辦學，勤工儉學的方針〉的社論。指出，一年來各地群眾自己舉辦中、小學校，找到了勤工儉學的道路……。它意味着我們的學校正在徹底地擺脫資產階級的教育思想，循着理論聯繫實際，腦力勞動同體力勞動結合的社會主義教育的軌道前進。社論説，過去的教育改革工作有很大的成績，但教育方針本身也有不夠明確的地方，突出表現在理論脫離實際、教育脫離生產、腦力勞動脫離體力勞動的現象還相當嚴重。這實質上就是資產階級教育思想在我們教育事業中的反映。據此，社論提出，為了貫徹群眾辦學、勤工儉學的方針，應該在教育工作者的隊伍和學生中展開一場大辯論，使這種勤儉辦學、勤工儉學的新風氣普及全國，使我國的教育事業向前躍進。[16]

2月9日和12日，國務院總理周恩來邀請出席全國人大一屆五次會議的高等學校的人大代表和首都各高等院校負責人舉行教育問題座談會。周恩來在會上講話指出，文教戰線和其他戰線一樣，在整風運動中進行兩種鬥爭：一種是資本主義道路和社會主義道路的鬥爭，這種鬥爭還應繼續下去。另一種是建設社會主義是實行多快好省還是實行少慢差費的方法的鬥爭，這兩種方法的鬥爭在文教戰線上也存在着。文教戰線勤工儉學的好經驗，是更好、更快地建設社會主義的方法。希望大家根據本地的情況加以推廣，使落後的趕上先進，先進的更先進，把教育工作大大推向前進。康生在會上發言，提出在高等學校要實行「三勤」和「三放」。「三勤」是：勤儉辦學，勤儉生產，勤工儉學。「三放」是：幹部下放勞動，學校開放大門，校部黨政幹部下放班系。[17]

5月30日，劉少奇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講話，肯定我國應有兩種教育制度、兩種勞動制度。即：一種是全日制的學校教育制度和工廠農村的勞動制度；一種是半工半讀的教育制度和勞動制度。[18]後來，劉少奇在河南開封視察，談到半工半讀制度的意義時説，「半工半讀，可以搞到高中，也可以搞到大學。」「將來出來，既是大學畢業，也是技術工人。這是過渡到共產主義的一個條件。」[19]

為使黨內在教育方針上統一思想，中共中央於4月和6月在北京連續召開教育工作會議，討論教育方針，批判教育部門的教條主義、右傾保守思想和教育脫離生產勞動、脫離實際，以及忽視政治、忽視黨的領導的錯誤。會後，陸定一寫了〈教育必須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的文章。毛澤東對陸文十分讚賞，批示：「很好，登《紅旗》。題目特大，全文宜用較大字型，例如四號或五號，不用新五。」親自為之修改增補，並寫

了編輯部按語：[20]

> 陸定一同志這篇文章，是根據黨中央召集的教育工作會議的結論寫出的。黨中央對這個問題即將有指示發給各級黨委。我們希望各級黨委在討論黨的指示的時候，結合陸定一同志的文章予以討論。在學校黨委討論此事的時侯，可以吸收非黨的教授參加。

《紅旗》雜誌1958年第7期刊載了陸定一的文章。文章對教育方針、教育政策、教育制度、教育方法等一系列問題作了闡述：

> 中國共產黨的教育方針，向來就是，教育為工人階級的政治服務。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為了實現這個方針，教育必須由共產黨領導。這個方針，是同資產階級的教育方針針鋒相對的。……在我們的社會主義國家中，資產階級的教育方針表現為：為教育而教育，勞心與勞力分離，教育由專家領導。

陸定一的文章，體現了毛澤東關於教育的一些根本性想法。9月8日毛在最高國務會議上説：

> 教育這個東西比較帶原則性，牽涉廣大知識界，是一個革命。幾千年來，都是教育脫離勞動，現在要結合，這是一個基本原則。大體上有這樣幾條：一條是教育勞動相結合，一條是黨的領導，還有一條是群眾路線。群眾路線懂得，沒有問題，中心問題是教育勞動相結合。……我在天津看了兩個大學，有幾個大工廠，那些學生們在那裏作工。老讀書，實在不是一種辦法。書是甚麼東西呢？書就是一些觀念形態，人家寫的，讓這些沒有經驗的娃娃來讀，淨搞意識形態，別的東西看不到。如果是學校辦工廠，工廠辦學校，學校有農場，人民公社辦學校，勤工儉學，或者半工半讀，學習和勞動就結合起來了。這是一大改革。[21]

後來，毛在1966年的《五七指示》[22]中提出的各行各業都要亦工、亦農、亦武、亦文的思想，與1958年的主張完全是一脈相承。

9月19日，中共中央、國務院正式下達《關於教育工作的指示》，強調「黨的教育工作方針同資產階級教育工作方針之間的鬥爭，按其性質來説，是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之間的鬥爭」。「在一切學校中，必須把生產勞動列為正式課程。每個學生必須依照規定參加一定時間的勞動。」「今後的方向，是學校辦工廠和農場，工廠和農業合作社辦學校。」「教育的目的，是培養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勞動者。」現行的學制「需要積極地和妥當地加以改革」，「高等學校的教材，應該在黨委領導下採取黨委、教師、學生『三結合』的方法，經過大鳴大爭大辯，認真予以修訂」。教育是人民群眾的事業，應當貫徹全黨全民辦學。要批判把教育工作神秘化，「外行不能領導內行」，「黨委不懂教育」，「群眾不懂教育」，「學生不能批評先生」等錯誤思想。全國應在三年到五年內，基本上完成掃除文盲、普及小學教育的任

務。爭取以十五年左右的時間來普及高等教育。[23]

根據中央的精神，高等學校開展群眾性的教學改革運動。許多學校調整了系科、專業，組建新專業；將生產勞動引入教學計劃；師生下廠下鄉搞現場教學、調查研究、參加實際工作；搞單科獨進或按生產過程組織各門課程的綜合教學；聘請「土專家」、勞動模範、生產能手到學校任教，工人、農民上講台。

與之相應的是，組織高等學校學生和青年教師集體著書，編寫講義、教材的活動進入高潮。如：北京師範大學全校十個系的高年級學生共成立了256個教學改革小組。學生和教師發生不同意見，學生就採取所謂「打擂台」的方式，和教師分頭準備提綱，然後討論，共同制定新的大綱；有的採取「唱對台戲」的辦法，學生和教師各自制定教學大綱方案，然後兩方面擺出來，進行評比，展開辯論。物理系電工組的學生覺得教師編的大綱「空」，就去工廠找工人，提出電工課新內容。中文系學生收集歷代大量民歌和民間文學資料，同教師展開九次辯論，「終於推倒以剝削階級文學為正宗的舊教學大綱。建立了以人民文學為主線的新大綱。」據報導，該校這樣由學生提出的教學大綱共169份，教學計劃四十七份，在一個月左右的時間內，基本上完成了127門課的教學大綱的改革工作。[24]清華大學機械、電機、土木、水利、建築、動力等六個系的學生和青年教師，編寫出教材、教學與科研參考資料等九十五種；內蒙古大學師生編寫出《內蒙古現代革命史》等。10月4日，《人民日報》發表〈根據黨的教育方針來改革教材〉的社論，推薦河南省農業林業教育工作者編寫教材的經驗，提出編教材也要兩條腿走路，中央編、地方編、專家編、教師和群眾也編。這一些新編教材和大綱，除了服務於批臭「資產階級學術權威」的政治需要外，並沒有真正的學術價值。

根據實行勤工儉學和半工半讀的指示，各地大中學校都掀起了大辦工廠、農場的熱潮。清華大學、武漢大學、哈爾濱工業大學等全日制全國重點高等學校，就曾宣布實行半工半讀。湖南省有一些大學和大批中學與工廠合併，據1958年11月的不完全統計，湖南全省已有五所高等學校和四十所中等學校分別與工廠合併，有六十七所正在準備與工廠合併，還有部分學校與農場或人民公社的生產隊合併。中共四川省營山縣委通知全縣中小學校實行半工半讀。安徽師範專科學校有的班級勤工儉學時間，每人每週達二十小時；雲南有的高等學校半天學習、半天勞動，或白天學習、晚上勞動。[25]

7月23日《光明日報》報導：北京大學物理系半導體專門化四年級的一百一十多名學生，為籌集建設半導體工廠的資金，到車站參加卸煤，到工地進行挑土等勞動。北京醫學院藥學系的學生用蘆席搭成了幾個廠房，利用舊機器，改裝了茶爐房的爐灶，生產出了很好的藥品。石

家莊醫士學校辦起了一座年產五噸細菌肥料廠，得到了中共石家莊地委的獎旗。這篇報導還列舉了各地一些學校辦工廠的數字：合肥的四所高校已辦和在辦的工廠就有一百五十多座，長春的汽車拖拉機學院已辦大小工廠一百二十多座，山東大學從6月底到7月13日已建和在建的工廠有五十八座。不僅理工科辦工廠，文科也大辦工廠。中國人民大學馬列主義基礎系和中共黨史系的學生，兩天內就開辦了包括煉鐵、煉鋼、化肥、造紙等小型工廠五十多座。山東大學文科各系學生辦起了鋼鐵廠、金屬加工廠、農場、捕魚大隊十五六個。這表明，學校辦工廠、辦農場，已與當時工農業「大躍進」的氣氛完全融合到了一起。

再就是颳起了大辦學校的浮誇風。1958年6月底，全國有十五個省、市、自治區宣布「普及了小學教育」；全國有1517個縣、市上報「普及了小學教育」，占全國縣市總數的66.7%。河南省開封縣大放「衛星」，宣稱：11月10日至12日三天時間實現了全縣「大學化」，建立了以中學為基礎的，從幼兒園到大學的新型普通「大學」十四所（全縣十三個人民公社，每社一所，縣辦一所），共1998個班，學生71037人。除了這些虛假報導外。真實情況是：1958年高等學校由1957年的229所發展到791所；在校學生數由1957年的44.1萬人，增加到66萬人。「紅專大學」蜂擁而上，不知其數。中等專業學校（含中師）由1957年的1320所，增加到3113所，在校學生數由1957年的77.8萬人增加到147萬人。農、職業中學原來沒有一所，一下子發展到二萬多所，在校學生達到200萬人。成人中等學校在校學生數由1957年的330萬多人增加到564萬多人。由於教育經費增加無幾，1957年為19.52億元，1958年只增加3100萬元；教育經費占國家財政總支出的比重由1957年的6.42%下降到4.84%。教育事業的發展大大超過了國民經濟所能承擔的能力，造成了教育與經濟嚴重的比例失調。[26]

總之，1958年的這場教育革命造成了極大的混亂。1960年代初，周揚在一次會上就1958年的教育革命說道：

> 基本理論知識、基本歷史知識以及基本技能的訓練，在一些學校裏就有所削弱。有些學校政治活動搞得太多，教學的時間可以擠掉。學校停止教學搞政治運動，就等於工廠裏停止生產搞政治運動。學校把教學，主要是課堂教學擠到了一個不重要的地位，有些學校甚至不敢提以教學為主，出現了「生產帶教學」這麼一些不妥當不正確的口號。[27]

陸定一後來在上海交通大學的一次談話中也曾說過：

> 關於教育革命，1958年提出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的口號，對不對？這個口號還是對的，我們理工科大學還是要實行這種結合。可是提的時間不恰當，辦法不對，沒有詳細規定具體辦法，先在少數學校試驗，然後推廣。結果是全國一哄而起，實際上形

成一個時期的停課。那年秋天，我到各省看一看，小學、中學、大學都不讀書，上山去找鐵、找煤、挖紅薯……，實際上把教育搞亂了。[28]

當然，1958年開始的教育革命，也有一些積極的東西。有些高等學校闖出了教學、科研、生產勞動三結合的新路子，實行「真刀真槍」地搞畢業設計（論文）——清華大學承擔了密雲水庫和北京歷史博物館工程，南京工學院承擔了北京火車站的工程設計，[29]與業務部門合作搞科研等，也為後來的教育改革提供了經驗。

3.科學界的趕超運動

同教育界一樣，科學界1958年也捲入了「大躍進」的浪潮。

南寧會議大批「反冒進」之後，1958年2月13日到15日，中國科學院在北京舉行各研究所所長會議，部署科學工作大躍進。會議提出的口號是：鼓起幹勁、多快好省、一心一德、又紅又專、重視勞動、服從組織、加強合作、實現規劃。院長郭沫若傳達了毛澤東的指示，號召科學工作者拿出吃奶的力氣來，促使科學大躍進。郭沫若説，過去的兩年為科學技術大躍進作了許多準備工作；國家第一個五年計劃已超額完成，為科學技術提供了更好的裝備；國家對科學事業發展的需要已經大大增加，現在科學工作者不是英雄無用武之地，而是地無用武之英雄了！會上，許多人發言認為，科學工作和工農業生產一樣，完全可以採取「多快好省」的方法來一個大躍進。同時強調科學工作者的思想躍進是科學躍進的前提，科學大躍進的關鍵在於科學工作者的思想改造，而老科學家的思想改造尤其重要。不少研究所負責人在會上提出了本所的躍進目標：光學精密機械儀器研究所副所長龔祖同提出：「苦幹五年，爭取提前兩年（即在八年內）在光學精密機械儀器的主要方面趕上世界先進水平。」石油研究所所長張大煜表示，在五年、七年之後，我國在頁岩油、水煤氣合成石油生產方面將遠遠超過英國、西德和美國，並在科學研究工作方面達到國際水平。[30]

3月，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主任聶榮臻強調：「為了實現科學事業的大躍進，就一定要明確科學必須為生產大躍進服務這個根本方針。」[31]此後，中科院各研究所紛紛制定躍進計劃。5月15日，中國科學院向中共八大二次會議報告了全院的躍進計劃，包括二十四個方面的任務，其中直接為工農業等國民經濟服務的就達十八項之多，另有四項明確提出要趕超世界先進水平。6月3日和5日，中科院北京地區各研究單位舉行躍進大會，響應中共八大二次會議號召，莊嚴誓師，「以排山倒海之勢發起向世界科學高峰的大進軍」，參加大會的有在京學部委員、各所工作人員和外地單位負責人共一千八百人。各單位在這次大會

上提出的指標比不久前在各學部躍進會上提出的指標又有提高，而且互相挑戰，彼此競賽，指標一再躍進。

自動化研究所保證在五年之內，和其他部門密切協作，解決三峽綜合自動化的主要技術問題；在自動化工業生產方面，搞出一套最新穎的儀錶和自動化技術工具的標準化和系列化。地質研究所決心把原定十年完成的三十四種稀有元素的研究提前完成，並在石油地質的研究上趕上世界先進水平。水利科學研究院要在最短期間提出小河流水文計算必需的资料和方法，做到哪裏有水利工程，哪裏就有水文資料和方法。生物學部昆蟲研究所增加的新指標是：提前一年完成六六六水稻內吸作用和殺螟毒效的研究；再提前一年在兩年內完成全國糧食昆蟲區的調查；立即提出綜合防治棉蟲的方案。植物學家決心在三年內完成下列指標：制定固沙方案，防止沙漠南移，保護農田；把草原地區牧草產量提高三至十倍。動物研究所動物形態學組的專家們決定：大力研究器官與組織的再生和衰老問題，以及神經系統與內分泌器官的關係問題，滿足人類延長壽命的願望。[32]

《人民日報》報道，就在中科院各研究單位提出躍進規劃的同時，最新的捷報已經紛紛傳來。地質研究所的青年研究人員向大會報喜，該所中心分析室經過躍進，已經把每個岩石標本分析的時間由過去的九天縮短到現在的一天。化學研究所的青年工作人員突擊十三個晝夜，已將一向視為神秘的十一種稀土元素提取出來，而且光譜純度一般達到國際水平，其中鉺的光譜純度超過了英國名牌約翰遜廠的產品。應用物理研究所的研究人員和工廠工人奮戰一天，做出了過去認為要幾年才能做出來的六十五兆周一百毫瓦的高頻晶體管、比長儀、低位錯的鍺單晶、純度達五個九的銻等等。[33]

6月，中科院黨組向中共中央提出了《關於自然科學研究工作十年趕上美國問題向中央的報告》。報告提出十年內做到三件事：一、掌握新技術，重點項目是衛星上天和原子能和平利用；二、促進國民經濟的科學化，能夠依靠自己的力量獨立解決中國工業、農業、交通和衛生事業中重大複雜的科學技術問題；三、培養和建立一支有四五十萬人的又紅又專的科學幹部隊伍。

全院躍進的形勢導致了中國科學院組織機構的急劇膨脹，特別是1958年4月，中共中央成都會議作出了關於在各省、市、自治區建立中國科學院分院的決定以後，各省、市、自治區紛紛建立起地方分院，到1960年底，全國大陸除西藏外，已有二十六個省、市、自治區建立了分院，據不完全統計，全國共有224個院屬研究所（包括與地方雙重領導的研究所），分院和地方科學研究機構的工作人員已達35318人。[34]

8月2日，《人民日報》發表：聶榮臻〈全黨抓科學技術工作，實現技術革命〉的文章。在此前後，在大搞技術革命和文化革命的號召下，

高等學校、中等專業學校以至一些中小學校掀起了科學研究大躍進的热潮，大搞以「猛攻尖端科學」、「生產尖端產品」、「技術革新」、「創造發明」等為內容的群眾運動。並在「七一」、「八一」、「十一」等紀念日前搞突擊、苦戰，開展獻禮活動。

1958年種種違背科學發展規律，人為地去追求高指標的「科學躍進」，加上有強烈政治色彩的定期「獻禮」而出現的浮誇風，以及由於批判「外行不能領導內行」的觀點，從領導到群眾接受了「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的信念，出現的再一股惡風——瞎指揮風。這種高指標、浮誇風和瞎指揮的結果，使科學研究的正常秩序和人們的思想被擾亂，造成人力，財力、物力和時間的極大浪費。當時，許多躍進項目不再徵求科學家的意見而根據政治需要進行，有的科學家提出了自己的不同看法。如金屬研究所所長李薰拒絕在所內建土高爐煉鋼，由於他的聲望，金屬研究所沒有捲進大煉鋼鐵的熱潮。但是更多的敢於堅持科學精神的、持有異議的科學家卻遭到了批判。不少科學家只能緘口不言。如此的「科學躍進」，使中國科學院元氣大傷。如：

當時應用物理研究所提出若干天內做出80K的超導體，是根本不可能的事，但低溫學家卻毫無發言權。在全面號召「大辦原子能和加速器」的影響下，中國科學院很快就成立了七個這類研究所，最後只有上海原子核研究所能夠維持下來。北京的六個同生物學有關的研究所被迫與農民「打擂台」，提出了一些他們自己也不相信能實現的「農業豐產」指標。許多科學工作者還為此去試驗田裏消耗了一年多的時光。

對糧食綜合利用的研究，是作為政治任務下達的。8月初，毛澤東視察徐水時，提出了要考慮糧食生產多了怎麼辦？8月6日和7日，中國科學院領導層連續開會，研究落實毛澤東提出的科研項目，最後把糧食綜合利用和研究的任務下達給六個化學和生物學的研究所。[35]六個研究所接受任務後，停止了許多已經連續多年的重要研究課題，抽調了一大批研究技術人員，於8月25日同時啟動糧食綜合利用的研究，以解決擴大糧食用途和利用糧食解決有機化學工業原料來源這兩個問題。事實上，把澱粉、蛋白質這樣的大分子量化合物分解成相對小分子量的化合物來利用，是不合算的。世界糧食生產大國都不走用糧食轉化為基本有機化工原料的路子。因此，儘管有的研究組把糧食轉化為酒精，再以酒精製取乙烯（製備合成產物的重要原料）；有的以酒精製取丁二烯，再由丁二烯製乙苯（均為製造合成橡膠和其他高分子化合物的主要原料）；有的從大米中分離出澱粉，然後製造林業工業上應用的膠合劑、造紙工業上用的洗滌劑、塗料；有的從糧食分離蛋白質，用蛋白質生產塑料和人造羊毛，等等。[36]但所有這些「成果」都不實用，不切合實際。何況中國的糧食還根本不夠吃。用了那麼多人力、物力，花了一年多時間，來做那麼多工作，最後全是白費。

當然，「大躍進」期間，科學技術工作也有一定發展，在歷史上也留下一定的正面影響。如半導體、電子學、計算機、自動化等學科在1958年以後發展比較快。一些重大的科研項目是在1958年提出並開始工作的，第一個人造衛星和人工合成胰島素的設想是1958年提出的，原子彈、導彈的很多研究也是從這個時期開始的。同時，開闢了一些新的研究領域，獲得了重大成果，除了計算機、半導體等四項新技術外，高溫合金、特殊化學材料、超純金屬、超純分析、高能燃料、水聲、稀有元素地質、高空物理、地球化學、微波技術、爆炸力學、新型光學儀器等領域是這個時期新開闢的。在這些研究中，獲得了一批重要的成果，如高效能炸藥、真空閥門、高溫塗層、氟有機塑料、順丁橡膠、大功率微波電子管、天文望遠鏡、大型經緯儀、硅半導體器件、攀枝花礦石冶煉，等等。不過，同嚴重的後果比較起來，科學技術這些發展是有限的。

歷史的教訓告訴人們，科學探索既需要勇氣與創造，又需要實事求是的精神；科學應該高速度分秒必爭地發展，又需要腳踏實地、一絲不苟的嚴謹作風；任何違背科學精神的行動只會帶來與願望相反的不利後果；科學家無窮潛力的發揮，需要的是愛護和激勵而不是批判和傷害。

4.文化事業大躍進

幾乎與工農業「大躍進」興起的同時，文藝界也開始了「大躍進」。

在1958年2月上旬舉行的全國人大一屆五次會議上，文化部副部長錢俊瑞在〈鼓足革命幹勁、促進文化高潮〉的發言中，就明確提出了文化工作大躍進的問題。他具體介紹了湖北省孝感專區的經驗，要各地仿辦。錢說，孝感專區對去冬今春配合農業生產大躍進，作了一個群眾文化宣傳運動的規劃。這個規劃要求全區組織一支五十多萬人的文化宣傳大軍，其中包括專業文化隊伍2108人，業餘文化隊伍58375人；根據各縣、區、鄉、社的典型材料，創作宣傳演唱材料5949件，其中劇本321個，供應各種宣傳资料49萬份，圖畫276幅；舉辦固定的展覽室17個，流動展覽6438次；舉辦大、小戲曲歌舞會演298次；編壁報5860塊，黑板報23080塊，布置宣傳櫥窗228個。同時要求發展農村俱樂部681個，發展宣傳員63000人。錢提出，這樣的規劃在全國各省、專、縣也都可以仿辦。他還要求：全國一切文化機關、團體和文化工作者，緊緊跟上今年工農業生產的大躍進，面向工廠、面向農村、大量創作為群眾所喜愛的促進大躍進的新作品和新電影，大大地加強對工農群眾業餘文化活動的輔導，大量供應他們各項文娱資料；協同現在大批的下放幹部，在工廠、農村大大開展群眾業餘文化活動，並且在群眾自願的原則下，幫

助發展群眾業餘文化組織，首先是俱樂部的組織。大力發展群眾自辦的文化事業和群眾業餘文化活動，這就是在1958年，在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全國文化工作積極發展的主要方向。[37]也是在這次大會上，音樂工作者提出，1958年要「掀起一個社會主義的歌詠浪潮」。[38]體育工作者更提出：為使體育運動更好地為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服務，體育事業也必須不斷躍進。力爭在十年左右在主要運動項目上，趕上世界水平。[39]

全國人大會議剛閉幕，中國文聯及各協會、各研究會即分別召開會議，討論進一步發展文藝創作以適應全國生產大躍進的形勢，與會者認為，國家現正處在各項社會主義建設事業飛躍前進的時候，如何把社會主義建設突飛猛進的面貌和勞動人民的英雄氣概在文藝創作中反映出來，以進一步鼓舞人們創造性的勞動熱情，是全國文藝工作者的責任。提出要「在文藝創作方面也來一個大躍進」。會上，不少作家、藝術家發言，表示了對「大躍進」的熱情。老舍說：黨中央指出，對各種建設事業成效的估計，應該是五年看三年，三年看頭年，我們文藝創作也應該這樣。1958年是「二五」計劃的第一年，又是建國十周年的前一年，文藝界一定要有一股熱情和幹勁，拿出一些較好的東西來。歐陽予倩說，劇作家應當多寫，題材、風格要多樣，在藝術創作上也要力求多、快、好、省。中宣部副部長、全國文聯副主席周揚在會上發言，對「要文藝創作來一個大躍進」提出了具體要求。[40]

為推動文藝「大躍進」的展開，3月7日，中國作協向全國作家發出〈作家們！躍進，大躍進〉的一封號召信。[41]

信中充滿激情地說：

> 六億人民的社會主義大躍進的高潮已到，人人興奮，個個當先，隨時隨地出现奇跡。一天的奇跡就够寫成許多部史詩、戲劇和小說的。作家、理論家、翻譯家同志們，我們怎能不高興、不狂喜，不想變成三頭六臂，眼觀六路，耳聽八方，雙管齊下，快馬加鞭，及時報道，及時歌颂，鼓舞更大的幹勁，叫前人所不敢夢想的每一天，每一小時，每一分鐘，都實现在我們眼前呢！

這封信要求作家們：

> 修正補充原訂計劃，把量力而為，從容不迫變為全力以赴，即刻殺上前去，叫我們的计劃成為作家隊伍中的「急先鋒」的計劃。每個計劃都必須增補上反映和鼓舞當前大躍進的短小精悍的作品若干篇。原定的長篇一定要照计劃而行，既快又好，保證質量。同時，也必定寫些短的，隨時發表。我們舞長槍，也耍短棒，不論長短，一概要有所創造。……要注意到：學習新的技巧，充實寫作本領，使我們的思想躍進，本領也躍進。沒寫過詩的，試試看；詩能更快地反映當前现實。沒寫過歌詞的，試試看；全國到處都迫切需要配合躍進的新歌，大家都唱起來，幹勁

就更大。寫評論的試試創作，創作的也試試評論。同樣地，試試相聲、鼓詞，以至各種戲曲。要叫我們的計劃湊在一起就是文學的百貨供應總站，要甚麼有甚麼，而且具有新的風格，和有普及而提高的特色。

繼文聯、作協之後，文化部也很快作出關於促進影片生產大躍進的決定。要求各製片廠必須繼續鼓舞群眾對大躍進的熱情，在電影製片工作中全面地貫徹多、快、好、省的總方針，大力爭取完成並且超過各廠的生產計劃。為了實現電影大躍進，文化部電影局提出，1958年完成大型藝術片八十部。其他各片種產量也都增加到一倍或一倍以上；1958年生產各種電影放映機3800台（較1957年增加69%）。要求做到「省有製片廠、縣有電影院，社有放映隊」。全年全國映出四百萬場，達到三十億觀眾人次，上繳發行放映利潤及稅金10700萬元。此後，在全國電影發行放映戰線也颳起浮誇風，出現「通宵場」、「雞叫場」等等。

北戴河會議宣布鋼鐵翻番以後，中共中央宣傳部於9月13日至20日召開文藝創作座談會。與會者表示要像生產1070萬噸鋼一樣，在文學、電影、戲劇、音樂、美術、理論研究等方面都爭取「大躍進」，放「衛星」。10月，文化部在河南省鄭州市召開全國文化行政會議。討論擬定了1959年和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全國文化事業的方針和規劃。要求在幾年內達到「人人能讀書，人人能唱歌，人人能創作，人人能舞蹈，人人能畫畫……」；「要全黨全民辦文化，行行放衛星、層層放衛星」。

在上級領導和機關部門的要求下，各地文化部門下達了放藝術「衛星」的指標，以及硬性攤派任務的現象。有些地方提出了「消滅空白點和空白人」，要求把小孩和老人都組織到文藝活動中來。除了扭秧歌等群眾性歌舞活動外，搞得最火紅的要算是新民歌運動了。

這種新民歌最早是出現在1957年冬至1958年春的興修農田水利和積肥運動中。這些生產中的順口溜，頗為毛澤東所重視。1958年成都會議上他說：印了一些詩（指會議印發的一些古詩），盡是老古董。搞點民歌好不好？請各位同志負個責任，回去以後搜集點民歌。各階層的人，青年，小孩都有許多民歌，搞幾個點試辦，每人發三五張紙，寫寫民歌，不能寫的找人代寫，限期十天搜集。這樣，會收到大批舊民歌，下次會印一本出來。毛還說：我看中國詩的出路恐怕是兩條：第一條是民歌；第二條是古典，這兩面都提倡學習，結果要產生一個新詩。現在的新詩不成型，不引人注意，誰去讀那個新詩。將來我看是古典同民歌這兩個東西結婚，產生第三個東西。形式是民族的形式，內容應當是現實主義與浪漫的主義的對立統一。搜集民歌的工作，北京大學做了很多。我們來搞，可能找到幾百萬成千萬首的民歌，這不費很多的勞力，比看杜甫、李白的詩舒服一些。[42]

於是，成都會議後，搜集民歌的工作立即在全國範圍內鋪開。許多

省、市、自治區的黨委宣傳部專門發出搜集民歌的通知。4月14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大規模地收集全國民歌〉。社論說：從已經搜集發表在報刊的民歌來看，這些群眾的智慧和熱情的產物，生動地反映了我國人民生產建設的波瀾壯闊的氣勢，表現了勞動群眾的社會主義覺悟的高漲。「詩言志」，這些社會主義的民歌的確表達了群眾建設社會主義的高尚志向和豪邁的氣魄。社論熱情歡呼：這是一個出詩的時代，我們需要用鑽探機深入地挖掘詩歌的大地，使民歌、山歌、民間敘事詩等等像原油一樣噴射出來。4月26日，中國文聯、作家協會和民間文學研究會舉行民歌座談會，提出收集、整理民歌、民謠的工作，建議成立全國編選機構，統一規劃。《文藝報》第九期以〈採風大軍總動員〉為題，作了報導。

《民間文學》從三月號起，開始選登各地大躍進民歌。各地很快就編出了一本本「新民歌」集——「大躍進民歌集」。為了編這些民歌，各地發動群眾編歌「作詩」，當作任務布置下去，甚至規定硬指標，上自六七十歲的老翁，下至八九歲的孩童，人人都要作詩。當年被當作範例廣為傳播的有：

天上沒有玉皇，地上沒有龍王，
我就是玉皇，我就是就龍王，
喝令三山五嶺開道，我來了。

幹勁真是大，碰天天要破，跺地地要塌，
海洋能馴服，大山能搬家，天塌社員補，
地裂社員納，黨的好領導，集體力量大。

太陽太陽我問你，敢不敢來比一比？
我們出工老半天，你睡懶覺遲遲起；
我們摸黑才回來，你早收工進地裏。
太陽太陽我問你，敢不敢來比一比？

乾部能拿梯，我們能上天，
乾部能下海，我們能擒龍，
乾部能翻山，大海我們填。

千條龍，萬條龍，首尾銜接上高峰，

張口噴出江海水，滿山遍野響漂漂，
天旱也要吃飽飯，乾坤掌握人手中。

說到就能做到，请記下我們的誓言：
七八年不趕過英國，算不得英雄好漢。
爐膛鋼水沸騰騰，條條火龍往外奔。
千度高溫算得啥，不及工人火熱心。

榔頭一舉火花濺，奇跡猶如春潮泛。
一錘一個新記錄，五年计劃三錘完。

從內容上看，這些新民歌，基本上都是「大躍進」時代的豪言壯語，反映了濃烈的主觀唯心主義的唯意志論氣氛。但在當時，卻受到了領導層的極大肯定和推廣。

1958年《紅旗》第一期刊登周揚的〈新民歌開拓了詩歌的新道路〉。文章開頭引用了一首民歌：

如今唱歌用籮装，千籮萬籮堆滿倉，
別看都是口頭語，搬到田裏變米糧。
種田要用好鋤頭，唱歌要用好歌手；
如今歌手人人是，唱得長江水倒流。

周揚解釋說：這是安徽省新出版的《大躍進民歌》第一卷的卷頭詩，它表明「人民群眾對自己旺盛的詩歌創作作了一個充滿自信而又正確的評價」。「解放了的人民在為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偉大鬥爭中所顯示出來的革命幹勁，必然要在意識形態上，在他們口頭的或文字的創作上表現出來。」「這是一種新的、社會主義的民歌；它開拓了民歌發展的新紀元，同時也開拓了我國詩歌的新道路。」周由此展望說：「群眾詩歌創作將日益發達和繁榮，未來的民間歌手和詩人，將會源源不斷出現，他們中間的傑出者將會成為我們詩壇的重鎮。民間歌手和知識分子詩人之間的界線將會逐漸消泯。到那時，人人是詩人，詩為人人所共賞。這樣的時代不久就會到來的。」[43]

如是，新民歌不只是被當作鼓舞生產熱情的號角，而是被賦予了取消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差別的意義。人人能作詩，人人能賞詩，這正是毛澤東關於「社會主義新人」亦工亦農，能文能武的理想。

對當年這種新民歌的群眾運動，《人民日報》也及時作了報道。其中有：

福建省同安縣民歌協會創辦的「田頭詩壇」。即在田頭上掛上黑板，在勞動中誰有感觸想寫詩，就直接在黑板上寫。報道稱讚：「半夜三更戰鼓鳴，群英躍馬齊出征，試驗田中比幹勁，光榮榜上爭題名。」「鐵鎬高舉起，猛刨深睡地，田上翻三番，畝產三萬一。」說，這樣的詩句，令人愈讀愈愛讀。[44]

江蘇省常熟縣白茆鄉，是和平人民公社的所在地。報道說：「走進公社的大門樓，一排寫滿詩歌的白粉牆迎面撲來。歌頌人民公社，歌頌共產主義的新山歌，簡直叫你目不暇接。橫穿街道的巨幅標語寫的是詩，田間鼓動牌，責任牌上也寫的是詩，展覽會裏的說明詞是詩，連食堂、旅館的走廊和牆壁上也全寫滿了詩。」其中有：

小農經濟獨木橋，合作社是康莊道，
人民公社辦起來，天堂哪有人間好！

東風力量大無窮，
吹得迷信連根拔，
吹得保守一掃空，
吹得落後沉海底，
吹得貧窮影無蹤。
白茆鄉大變樣，
白茆塘開得像運河樣，
兩岸房子造得一式樣，
屋後花園門前場，
電燈照得滿場亮。

為新民歌而歡呼的，不僅有周揚這樣中共高層意識形態管理部門的負責人，還有聞名中外的文學家。1958年6月16日，郭沫若為《大躍進之歌》作序說：「目前的中國真正是詩歌的汪洋大海，詩歌的新宇宙。六億人民彷彿都是詩人，創造力的大解放就像火山爆發一樣，氣勢磅礴，空前未有。」「在这裏似乎顯示着新詩歌的一個方向。」[45]其熱情溢於言表。

應該說，當年人民群眾的熱情和幹勁，確實是極可貴的。1958年中國電影界曾取得不小的成績，全年拍攝了九十六部故事片，八部戲曲藝術片。故事片主要有《黑山阻擊戰》、《長空比翼》、《紅孩子》、《鐵窗烈火》、《英雄虎膽》、《黨的女兒》、《永不消逝的電波》、《狼牙山五壯士》、《黎明河邊》等；戲曲片有京劇《群英會》、《借東風》、《望江亭》、越劇《情探》、豫劇《穆桂英掛帥》、贛劇《珍

珠記》、秦腔《火焰駒》、曲劇《下鄉與趕腳》。但是，虛假的浮誇風，也把人們颳得個個暈頭轉向，僅就新民歌而言：河北豐潤縣出了個萬詩鄉，據下鄉幹部反映：詩並不全是群眾創作的，而是幾個下放幹部連夜趕出來的。徐水人民公社畫的壁畫，是花錢從天津請人畫的，冒稱群眾創作。周恩來就曾對文藝界放衛星提出異議，明確表示，不贊成要求文藝簡單配合政策的做法。指出，精神產品不能放衛星。[46]

5.除「四害」講衛生運動

醫療衛生工作的大躍進，是跟著提前實現《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的一股風颳起來的。1957年中共八屆三中全會對除「四害」、講衛生、消滅疾病運動進行了討論。根據這次全會的精神，當年11月，中央愛國衛生運動委員會和衛生部專門召開了十五個省、市愛國衛生運動經驗交流大會，為全面深入地推進這個運動進行思想上和組織上的準備。1958年1月8日，中共中央發布了關於開展以除「四害」為中心的爱國衛生運動的通知。2月12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在《關於除四害講衛生的指示》中說：

> 一個以除四害為中心的愛國衛生運動的高潮已經在全國形成。在全國各省市，廣大群眾正在大規模地行動起來，消滅老鼠、麻雀、蒼蠅、蚊子，提倡衛生，撲滅危害當地人民最嚴重的疾病，並且紛紛提出規劃，準備在幾年時間內提前實現《全國農業發展纲要（修正草案）》所提出的要求。截止目前為止，據不完全统計，提前實現「四無」的省和直屬市，已經有北京定為兩年，河南定為三年，上海定為三至五年，江蘇定為四年，山東、山西、浙江、福建、廣東、雲南、甘肅、遼寧、黑龍江定為五年，安徽定為五至八年。決定在今年內就實現「四無」的市和縣，有江蘇的南京、常州、鎮江，南通，山東的濟南、陽信、單縣，河南的鄭州、開封、洛陽、焦作、登封，甘肅的蘭州，山西的屯留，河北的蠡縣，河間。

指示要求，「各省、市、自治區和專區必須在1958年上半年定出本區的除四害、講衛生、消滅重要疾病的年度計劃和長期計劃，並按月按季加以檢查評比通報。力求在1958年內為這一工作打下堅固的基礎，在幾年內消滅四害，基本上消滅危害人民最嚴重的疾病，使全國的衛生狀況大為改觀。」[47]

《人民日報》為此配發〈一定要在全中國除盡「四害」〉的社論，介紹了歷史上多發鼠疫的福建省澄歧村，從1956年起發動群眾消滅老鼠，經過一年多的艱苦努力，基本上實現了消滅老鼠，也消滅了鼠疫的無鼠村；山東省莒南縣程家峧村，經過五年的不懈奮鬥，使原來落後的山區村莊成了消滅四害的模範村等事例，得出的結論是：「事在人

為」。強調：全黨和全國人民的任務就是堅決執行黨中央和國務院的指示，鼓足幹勁，雷厲風行，按月按季檢查督促，堅持到底，使我國成為富強康樂的「四無」之邦。[48]

就在同一時間，衛生部部長李德全在全國人大一屆五次會議上發言提議：「在1958年內每省至少出現一個到幾個四無縣或市；省市以下的地、縣、區、鄉、社、街道辦事處則應創造出更多的四無單位。」希望各地「現在就要為在12月召開的各省市除四害運動的評比大會，積極做好準備工作」。[49]各省市代表也在會上紛紛登台表態：

浙江省代表說：杭州市決心要在兩年內消滅「四害」，同時還要消滅釘螺、蟑螂、臭蟲，使杭州成為又美麗又清潔的「七無」城市。[50]江蘇省代表說，江蘇人民將用四年時間基本上消滅「天上飛、地下鑽、繁殖快、分布廣的蒼蠅、蚊子、老鼠、麻雀」，兩年內「消滅吸血蟲病」。[51]甘肅省代表在會上表示：「甘肅計劃三年內肅清『七害』（老鼠、麻雀、蒼蠅、蚊子、臭蟲、虱子、白蛉子）」[52]。北京市代表以〈首都布下天羅地網，鼠雀蚊蠅無處躲藏〉為題發言說，首都人民「正從四面八方，布下天羅地網，一定要搞得它上天無路，入地無門，徹底消滅乾淨」[53]。山西省代表匯報了稷山縣太陽村變成「四無」村的經驗，並說：該縣1958年國慶節前將成為「四無」縣。山西在三年到五年內，也將成為「四無」省。表示山西人民將滿懷信心地開足馬力勇往直前！[54]

此後，全國城鄉掀起了以除害滅病為中心的群眾性愛國衛生運動。如重慶市滅鼠，安慶市滅蚊，都曾取得過一定效果。四川省重慶市除有家鼠、田鼠外，在全市蛛網交錯、長達144公里的下水道中還藏有許多溝鼠。全市人民在市委領導下，同時採取行動，在通向下水道的七千多個深井處點火煙燻，消滅了大量的溝鼠。安徽安慶市瀕臨長江，歷來蚊蟲多，全市居民除了清除孳生地，並在同一時間內展開煙海戰術，先室外，後室內，用藥物煙燻，一舉消滅大量蚊子。

在除「四害」運動中，聲勢最盛的是消滅麻雀。1958年4月20日、29日《人民日報〉相繼報道了北京和上海圍殲麻雀的戰況，標題分別為：〈人民首都不容麻雀生存——三百萬人總動員第一天殲滅八萬三〉；〈上海人民大戰一天——滅麻雀掏雀蛋共二十五萬隻〉。[55]報道說：

> 19日清晨4時左右，首都數百萬剿雀大軍拿起鑼鼓響器、竹竿彩旗，開始走向指定的戰鬥崗位。八百三十多個投藥區撒上了毒餌，二百多個射擊區埋伏了大批神槍手。5時正，當北京市圍剿麻雀總指揮王崑崙副市長一聲令下，全市八千七百多平方公里的廣大地區裏，立刻鑼鼓喧天，鞭炮齊鳴，槍聲轟響，彩旗搖動，房上、樹上、院裏到處是人，千千萬萬雙眼睛監视着天空。

假人、草人隨風搖擺，也來助威。不論白髮老人或幾歲小孩，不論是工人、農民、乾部、學生、戰士，人人手持武器，各盡所能。全市形成了一個聲勢浩大的「麻雀過街，人人喊打」的局面。被轟趕的麻雀在天羅地網中到處亂飛，找不到棲息之所。一些疲於奔命的麻雀被轟入施放毒餌的诱捕區和火槍殲滅區。有的吃了毒米中毒喪命；有的在火搶聲裏中彈死亡。

為了摸清「敵情」，圍剿麻雀總指揮部還派出三十輛摩托車四出偵察。解放軍的神搶手也馳赴八寶山等處支援殲滅麻雀。市、區總指揮、副總指揮等乘車分別指揮作戰。

在天壇「戰區」到處是鞭炮和鑼鼓聲，三十多個神射手埋伏在殲滅區裏。他們一天之中殲滅麻雀九百六十六隻，其中累死的佔40%。在南苑東鐵匠營鄉承壽寺生產站的毒餌诱捕區，在兩個小時內就毒死麻雀四百隻。宣武區陶然亭一帶共出動了兩千居民圍剿麻雀，他們把麻雀哄趕到陶然亭公園的殲滅區和陶然亭游泳池的毒餌區裏，在大半天時間裏，共消滅麻雀五百二十隻。在海澱區玉淵潭四周十里的範圍內，三千多人從水、旱兩路夹攻麻雀。人們從四面八方把麻雀趕到湖心樹上，神搶手駕着小船集中射擊，只見被打死和疲憊不堪的麻雀紛紛墜落水中。

新華社記者從上海報道說：

上海市人民27日展開了一場全面圍剿麻雀大戰。這一天共殲滅麻雀二十萬一千六百二十四隻，搗毀雀窩十一萬零六百二十一個。

大戰前夜，全市便已布置了一個天羅地網。在每個建築物上都安有草人、假人，平均每十平方公尺就設有一個驅趕麻雀的崗哨。早晨5時，全市滅雀總指揮、上海市副市長金仲華向全市人民發布總攻擊命令以後，設在大樓屋頂上、樹上、路旁、田野間無數的崗哨立刻金鼓齊鳴，紅旗飛舞，對麻雀展開了轟、趕、捕、打。由於上海人口密集，保證安全，沒有採用槍打，施用毒餌也只有極個別地區。早晨，麻雀還沒有找到食物的時候，便受到轟趕；黃昏時分，麻雀歸窝找不到家，疲倦不堪，有很多自行墜落或被捕。

掏獲麻雀蛋是這次戰果中的一大部分。上海市先進生產者、上海鋼鐵二廠魯佛祥父子四人，跟着雀糞的痕跡找到六百多個雀窝，因此掏到了七百五十隻雀蛋和三隻麻雀。徐匯區的居民一邊轟趕，一邊把鴿籠開放，許多麻雀避進鴿籠，活捉到許多。

全市滅雀總指揮金仲華晚上7時向全市人民祝贺獲得的輝煌戰果。……他要求市民們總结經驗，準備到麥熟收割以後再舉行一次全面圍剿大戰。

這兩篇報道，真可謂是文情並茂，形象生動的佳作，使後人能如臨其境地了解到當年圍剿麻雀之戰的盛況。但如京滬兩市的總指揮所表示

的那樣，戰鬥並未結束，1958年12月13日，上海全市再次開展麻雀大戰，光這一天，又消滅麻雀194432隻。上海作家沙葉新在〈1958年的中國麻雀〉這篇雜文中寫道：

> 1958年我隨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在嘉定縣華亭鄉建農四社進行教育革命，住在胡家村。12月13日這一天的日記寫着「市裏決定今日打麻雀，郊區也不例外。上午三分隊打，下午我們分隊打」。如今看來我所親歷的這一偉大事件記祿得實在是過於簡略了，真是愧對歷史。經回憶，記得那天我和同學們分別爬在公路兩邊的一些大樹上，不停地敲着鑼鼓、臉盆和一切能發出聲音的東西，使疲於奔命、驚魂未定的麻雀繞樹三匝，無枝可依，然後紛紛墜地身亡；如果解剖當年千千萬萬鎩羽就斃的麻雀，我敢說，十有九是急性心肌梗塞，累死的嚇死的！

對此，葉沙新大有感慨地寫道：

> 每種生靈都難免有災有難，但不論是過街之鼠、碰壁之蠅、喪家之犬、毀窟之兔、熱鍋之蟻、涸轍之鱼、甕中之鱉、虎口之羊，都不如1958年的中國之雀那樣的遭罪；那是一場浩劫，那是滅頂之災。

對消滅麻雀，一開始就有科學家提出不同意見，認為麻雀並非害鳥，牠雖有食穀為害的一面，但更重要的是園林果木中害蟲的天敵。1957年10月26日公布的「四十條」修正草案，雖曾改為「打麻雀是為了保護莊稼，在城裏和林區的麻雀，可以不要消滅」。但1958年麻雀並未能逃過一劫。在科學家們的再三「申訴」下，1960年3月16日，毛澤東在為中共中央起草的《中央關於衛生工作的指示》中才提出：「麻雀不要打了，代之以臭蟲，口號是『除掉老鼠、臭蟲、蒼蠅、蚊蟲』」。[56]

愛國衛生運動的另一項重要內容是消滅地方性的嚴重疾病。福建，浙江、江蘇、湖南、江西等省都是血吸蟲病最嚴重的地區。在1958年愛國衛生運動中，各地人民政府一邊組織醫療隊伍救治病人，一邊發動群眾展開了大規模的滅螺工作。浙江嘉興地區還創造了一種迅速滅病的做法。中央防治血吸蟲病九人小組負責人在一篇文章中介紹說：「以前有些醫學專家死啃着二十天的長程療法，硬說推廣『三天短療法會多死人』。經過第四次全國防治血吸蟲病會議，採取鳴放、爭辯的方式，掃除了某些專家的保守思想、個人權威思想和教條主義的思想障礙，於是三天療法在今春得以普遍推行。」

1958年6月30日，《人民日報》報道了江西省餘江縣已經根除血吸蟲病的消息，並配發社論〈反覆鬥爭，消滅血吸蟲病〉，宣稱：「今年頭五個月，在防治血吸蟲病工作上，打了一個大勝仗。五個月取得的成績，使觀潮派不得不認輸了。事實告訴我們：安徽省已有十一個縣市基

本消滅釘螺，全省血吸蟲病流行區基本管好糞便，治療病人也完成指標的40%以上。湖南省預計在6月底可將全省已發現的二十萬病人治療一遍，並計劃進一步覆查和治療復發病人。浙江省收治了三十五萬餘名病人，達到原訂治療六十萬人的指標的58.3%。」

對全國防治疾病在短期內取得如此巨大成績，毛澤東興奮不已，他在7月1日寫下七律二首，並在題記中寫道：

> 讀六月三十日《人民日報》，餘江縣消滅了吸血蟲。浮想聯翩，夜不能寐。微風拂煦，旭日臨窗。遙望南天，欣然命筆。
>
> 诗曰：
>
> 綠水清山枉自多，華佗無奈小蟲何！千村薜荔人遺失，萬户蕭疏鬼唱歌。坐地日行八萬里，巡天遥看一千河。牛郎欲問瘟神事，一樣悲歡逐逝波。
>
> 其二
>
> 春風楊柳萬千條，六億神州盡舜堯。紅雨隨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為橋。天連五嶺银鋤落，地動三河鐵臂搖。借問瘟君欲何往，紙船明燭照天燒。

詩人從連神醫華陀都無可奈何的血吸蟲，人民群眾一經發動起來，很快就被消滅一事，聯想到「天連五嶺銀鋤落，地動三河鐵臂搖」的工農業全面大躍進的情景，使他堅信，在「六億神州盡舜堯」的今天，還有甚麼事情辦不到呢？

但是細看當年報紙上報道，寫的都是治療了多少病人。並沒有說治癒了多少病人。應當承認防治工作取得不小的成績，但宣布根絕了血吸蟲病，顯然是誇大了的。

總之，1958年的愛國衛生運動在除害滅病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高指標、瞎指揮、浮誇風，也使愛國衛生運動發生了很大的偏差。在不少地方和單位出現了命令主義和形式主義：一是不顧實地情況和群眾存在的實際困難，只是按照領導下達的指標要求，以行政手段強制群眾辦那些在當時條件下根本辦不到的事情。如在夏秋季節不見一個蒼蠅，一個蚊子，一隻麻雀；廁所都要實現香化，美化，見不到糞；如果辦不到，就要給那些當事人以各種形式的懲罰。二是不講求防治疾病的實際效果，不考慮經濟、文化等各種條件的實際差別，更不注意各個不同民族的風俗習慣的差異，而是以一個模式、一個標準來要求。例如改良廁所，整修街道，粉刷牆壁，往往都是在一個公社甚至一個縣的範圍內實行統一的規格，以致造成大拆大修，勞民傷財。如此等等，都脫離了實際，違背了群眾的心願。其結果是嚴重地挫傷了群眾參加愛國衛生運動的積極性，致使已經取得的一些成果也沒有鞏固下來。

[1] 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下冊（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6），頁846。

[2] 〈向前，向前，向左邊邁步前進〉，《光明日報》，1958年3月17日。轉引自《老新聞——共和國往事（1956-1958）》，頁222-225。

[3] 〈一定當左派〉，《光明日報》，1958年3月21日。轉引自《老新聞——共和國往事（1956-1958）》，頁225-226。

[4] 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編：《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大事記（1949-1982）》（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1983），頁216-217。

[5] 毛澤東1958年3月22日在成都會議上的講話提綱，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七冊，頁115-118。

[6] 毛澤東1958年5月20日在中共八大二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提綱，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七冊，頁200、203。

[7] 穆欣：《辦〈光明日報〉十年自述（1957-1967）》（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4），頁110-111。

[8] 徐冰：〈關於資產階級分子、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和民主黨派的根本改造問題的報告〉（1958年7月1日），載《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第二十二冊，頁476。

[9] 1953年全國人口普查，中國人口總數已達六億以上。如以每年淨增率0.2%計算，十五年後中國人口將達八億。

[10] 穆欣：《辦〈光明日報〉十年自述（1957-1967）》，頁56、59。

[11] 1979年9月11日，中共中央批準中共北京大學委員會7月23日所作的《關於為馬寅初先生平反的報告》和《關於馬寅初先生的平反決定》，指出：「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論》的觀點是正確的，許多主張是可行的。他認為國民經濟要綜合平衡，各部門應有計劃按比例地發展，也是正確的。強加于馬寅初先生的『藉學術研究為名，向黨向社會主義進攻』、『一貫為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服務』、『一貫反對黨、反對社會主義、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等誣衊不實之詞，應一律予以推倒。黨委決定為馬寅初先生徹底平反，恢復名譽。」

[12] 穆欣：《辦〈光明日報〉十年自述（1957-1967）》，頁85-87。

[13] 李銳：《「大躍進」親歷記》，下冊，頁310-315。

[14] 李銳：《「大躍進」親歷記》，下冊，頁304。

[15] 毛澤東：〈工作方法六十條（草案）〉（1958年1月），載《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十一冊，頁56-57。

[16] 《新華半月刊》，1958年第5號，頁155-157。

[17] 《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大事記（1949-1982）》，頁214。

[18] 劉少奇：〈我國應有兩種教育制度，兩種勞動制度〉（1958年5月30日），載《劉少奇選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頁323-327。

[19]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劉少奇年譜（1898-1969）》，下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頁438。

[20] 毛澤東：〈對陸定一《教育必須與生產勞動相結合》一文的批語、按語和修改〉（1958年8月），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七冊，頁338-339。

[21] 毛澤東1958年9月8日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結束語，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七冊，頁396。

[22] 1966年5月7日，毛澤東致信林彪，認為軍隊是個大學校，「學政治、學軍事、學文化。又能從事農副業生產。又能辦一些中小工廠，生產自己需要的若干產品和與國家等價交換的產品，又能從事群眾工作，參加工廠農村的社教四清運動……。又要隨時參加批判資產階級的文化革命鬥爭。這樣，軍學、軍農、軍工、軍民這幾項都可以兼起來。」「工人也是這樣，以工為主」；「農民以農為主」；「學生也是這樣，以學為主，兼學別樣，即不但學文，也要學工、學農、學軍，也要批判資產階級。學制要編短，教育要革命，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第十二冊，頁53-54。

[23] 〈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教育工作的指示〉（1958年9月19日），載《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十一冊，頁489-498。

[24] 〈北京師大實行黨委、專家、學生三結合制定新的教學大綱〉，《人民日報》，1958年7月17日。

[25] 穆欣：《辦〈光明日報〉十年自述（1957-1967）》，頁120。

[26] 何東昌主編：《當代中國教育》，上冊（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6），頁71。

[27] 周揚在全國高校文科和藝術院校教材編選計劃會議上的講話（1961年4月），載北京師大高等學校幹部進修班編：《中國高等教育文獻法令選編》，頁165；穆欣：《辦〈光明日報〉十年自述（1957-1967）》，頁126。

[28] 陸定一：《陸定一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頁700。

[29] 《當代中國教育》，上冊，頁74。

[30] 〈科學院舉行研究所所長會議，部署科學工作大躍進〉，《人民日報》，1958年2月21日；《新華半月刊》，1958年第6號，頁150。

[31] 聶榮臻：〈科學事業必須為生產大躍進服務——在科學規劃委員會第五次會議上的講話〉，《人民日報》，1958年3月15日；《新華半月刊》，1958年第7號，頁145。

[32] 〈中國科學院北京地區各研究單位舉行躍進大會〉，《人民日報》，1958年6月8日；《新華半月刊》，1958年第13號，頁121-122。

[33] 〈中個科學院北京地區各研究單位舉行躍進大會〉，《人民日報》，1958年6月8日；《新華半月刊》，1958年第13號，頁122。

[34] 錢臨照、谷羽主編：《中國科學院》，上冊（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4），頁90。在大躍進中，科研機構的急劇膨脹是缺乏生命力的。當時，多數分院是在地方領導支持下，採取邊建邊幹邊學的方針成立的一些研究所。但這二十六個省的分院中，相當一批分院沒有一個高級研究人員，多數機構僅擁有少數大學生和中專生，多數成員是中學生，因此「邊學」對這些機構成為首要任務。許多分院成立了數個研究所，但沒有一個研究所有專職所長。有的分院是先掛起牌子，但沒有研究機構，也很少有研究活動。由於分院的研究力量薄弱，就只能依靠當地的高等學校。整個來說，在大躍進中建立起來的分院及其研究機構的共同特點是：缺少研究人員和設備，任務方向不明確，能進行科學研究並生存下來的是極少數。如上海原子核研究所和瀋陽自動化研究所等，這是和當地具有相當的經濟、社會、教育和科學環境分不開的，而這些條件為許多其他地區所不具備。

[35] 長春的應用化學研究所、大連的石油研究所、北京的化學研究所、上海的有機化學研究所、生物化學研究所和植物生理研究所。

[36] 薛攀皋：〈自然科學研究盲目聽命政治的教訓——荒唐的科研課題「糧食多了怎麼辦」，載邱石編：《共和國重大決策出台前後》，第三卷，上冊（北京：經濟日報出版社，1998），頁236-239。

[37] 錢俊瑞：〈鼓足革命幹勁　促進文化高潮〉，《新華半月刊》，1958年6月號，頁33。

[38] 瞿希賢、郎毓秀、馬思聰、賀綠汙、呂驥：〈掀起一個社會主義的歌詠浪潮〉，《新華半月刊》，1958年第7號，頁73-74。

[39] 榮高棠：〈力爭十年左右在主要運動項目上趕上世界水平〉，《新華半月刊》，1958年第6號，頁73-74。

[40] 中國文聯及各協會，各研究會討論發展文藝創作適應全國生產大躍進，《人民日報》，1958年2月19日；《新華半月刊》，1958年第7號，頁152-153。

[41]〈作家們！躍進，大躍進！〉，《人民日報》，1958年3月8日；《新華半月刊》1958年第7號，頁153-154。

[42] 李鋭：《「大躍進」親歷記》（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1996），頁233-234；《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七冊，頁124。

[43]《新華半月刊》，1958年第12號，頁127、129。

[44] 〈田頭設詩壇〉，《人民日報》，1958年9月4日。轉引自《老新聞——共和國往事（1956-1958）》，頁260-261。

[45] 龔濟民、方仁念：《郭沫若年譜》，下冊（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頁228。

[46]《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卷，頁199。

[47]《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十一冊，頁164、171-172。

[48] 〈一定要在全中國除盡「四害」〉，《人民日報》社論，1958年2月13日；《新華半月刊》，1958年第5號，頁154-155。

[49] 李德全：〈除四害，講衛生，造福人民，造福子孫〉，《新華半月刊》，1958年第5號，頁91。

[50] 張杏花：〈搬倒垃圾山，填平「禍害」河，小營巷要一年內滅盡「七害」〉，《新華半月刊》，1958年第5號，頁54。

[51] 管文蔚：〈兩年內要消滅吸血蟲病〉，《新華半月刊》，1958年第6號，頁39-40。

[52] 鄧寶珊：〈甘肅計劃三年內肅清「七害」〉，《新華半月刊》，1958年第6號，頁44-45。

[53] 吳晗：〈首都布下天羅地網，鼠雀蚊蠅無處躲藏〉，《新華半月刊》，1958年第6號，頁93-94。

[54] 李輝：〈富足、文明、美麗的社會主義新農村〉，《新華半月刊》，1958年第6號，頁96。

[55] 見〈老新聞——共和國往事（1956-1958）〉，頁247-249。

[56] 最早提出不同意見的，是在1956年10月中國動物大會期間，以實驗生物學家朱洗為首的一批鳥類、動物學家，他廣徵博引，舉出國內外許多歷史上正反兩方面的事例，説明麻雀益多害少。朱洗還説了這樣一個故事：1774年普魯士國王曾下令消滅麻雀，捕殺有獎，幾年中，麻雀捉光了，各地果園卻布滿了害蟲，果子滅絕，樹葉也光了。國王於是不得不收回成命，還得從國外運回麻雀種。當時，朱洗，動物學家薛德焴、張作人，生理學家馮德培等的合理意

見，並未為毛澤東接受。在1959年的廬山會議上，講到麻雀問題時，毛澤東說：「有人提四害不行，除四害放鬆了，還要搞，麻雀現在成了大問題，還是要除。」1959年11月27日，中國科學院黨組書記、副院長張勁夫專就麻雀問題將科學家的意见向毛澤東提交了一份報告，毛将這個報告作為中央杭州會議的文件印發。於是才有1960年3月16日「麻雀不要打了」的指示。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九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頁81。這是「大躍進」年代，科學家堅持真理而被採納的少有事件。令人遺憾的是，朱洗1962年病逝以後，「文化大革命」中竟被扣上「公開反對毛主席，把毛主席消滅麻雀同封建帝王滅雀類比」等罪名，受到挖墳、砸碑、曝屍的野蠻懲罰，「四人幫」倒台後，冤案才得平反。

第四章

炮擊金門與第二次台海危機

解放台灣，完成新政權的統一大業，本是中國的內政。由於美國陳兵台灣海峽，支持蔣介石政權，這就增加了一層中美關係的因素，使問題複雜化了。在朝鮮戰場上，中美雙方雖然在軍事上打了一個平手，但在總體實力上中國仍是一個弱國。美國出於其對亞太地區戰略的考慮，堅持敵視新中國，並憑藉其實力，對中國大陸形成威脅，為中國領導人所不能容忍。1958年發動的超英趕美的「大躍進」，就是想在短時間內根本改變中國的弱國地位。當年8月的金門炮戰，其戰略意圖，如毛澤東所言：「直接對蔣，間接對美。」也是要讓美國正視中國的存在，並挫敗美國搞「一中一台」或「兩個中國」的圖謀。

一、美、蔣固守台灣的各自打算

1.台灣問題的由來

台灣自古以來就是中國領土。1894年甲午戰敗以後，台灣被日本實行殖民統治達五十年。1945年8月，日本無條件投降。根據《開羅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的規定，台灣和澎湖列島歸還中國。1949年5月26日，國民黨政府在大陸潰敗後，退守台灣，從而形成了台灣與大陸分割和對峙的局面。

1949年4月，中國人民解放軍順利渡過長江向南挺進，進攻台灣的準備工作隨即提上日程。是年10月下旬和11月初，人民解放軍發動了奪取福建沿海的金門島和浙江沿海的登步島的戰鬥，因渡海作戰的經驗不足和技術裝備的缺乏，兩次戰鬥均告失利。尤其是金門一役，損失慘重。[1]這說明沒有一定的海、空軍力量，攻佔台灣是不可能的。

早在1949年7月，劉少奇秘密訪蘇期間，中方就曾向斯大林說明準備在1950年進攻台灣的設想，提出向蘇聯購買二百架左右的飛機，並請代訓飛行員。斯大林表示同意，並於8月18日雙方草簽了蘇聯援助中國建立空軍的協定。鑑於金門，登步兩戰失利，毛澤東在12月訪蘇期間，曾委婉地向斯大林提出，請蘇聯「派自願飛行人員或秘密軍事特遣艦隊協助奪取台灣」。斯大林考慮這樣做有可能引起美國的干涉，未予同意。[2]

這時，美國的基本打算是，「不讓台、澎落入共產黨手中」，並將「該島嶼與中國大陸隔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美國國務院就基本確定了把中國大陸和台灣分開的對華政策。其中，對國民黨的政策是，取消對國民黨政府和軍隊提供軍事援助的決定；不通過武力手段防止台灣與「中共」控制的大陸分離；一旦因第三者因素引起台灣衝突，美國可參照聯合國憲章原則，即不排除引用「民族自決」的原則。對大陸「新政權」，美國將設法使北京與莫斯科的關係逆轉；不考慮給予「中共」經濟援助，但可由民間商業或團體保持同中國大陸的接觸；不把「承認」「中共」作為壓其讓步的籌碼。[3]這表明，美國统治集團已經認識到「通過外交和經濟手段防止台灣失陷」已不能奏效。國民黨已失去整個大陸，台灣落入共產黨手中只是時間問題。於是，一方面準備從中國大陸和台灣「脫身」；同時又不甘心，即一旦台灣出現事變，美國將用所謂「民族自決」原則進行干涉。

但是，美國軍方並不赞同這種對台灣「聽之任之」的政策，美軍太平洋戰區總司令、盟軍日本佔領軍總司令麥克阿瑟（Douglas

Macrthur）就曾批評白宮對亞洲的發展缺乏戰略眼光，建議通過向蔣介石增加援助以阻止共產黨勢力的擴張。國防部長約翰遜（Louis Johnson）還通過參謀長聯席會議於1949年12月23日，作出了向台灣立即進行「小規模的」軍事援助的建議。

美國國務院則認為，國民黨的敗局已定，繼續用軍事援助或派遣軍事顧問的辦法去防止台灣「失陷」，「成功的機會很小」，一旦失敗，將有損美國聲譽。

白宮最終採納了國務院的方案。1950年1月5日，美國總統杜魯門（Harry S.Truman）就台灣問題發表公開聲明，重申《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關於台灣歸還中國的決定，明確表示過去四年來美國及其他盟國承認中國對該島行使主權。表明：美國目前無意在台灣獲取特別權利或建立軍事基地；不擬使用武裝部隊干預其現在局勢；不擬遵循任何足以把美國捲入中國內爭中的途徑；也不擬以對在台灣的中國軍隊供給軍事援助或提供意見。1月12日，國務卿艾奇遜（Dean G.Acheson）發表講話，明確說明從阿留申群島經日本、琉球，到菲律賓，是美國在西太平洋必須保衛的安全防線，正式把台灣劃在美國的遠東防線之外。

杜魯門的聲明和艾奇遜講話，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斯大林對美國的擔心，使他同意將蘇聯給中國三億貸款的一半，用於購買進攻台灣最需要的海軍裝備。但仍避免承諾利用蘇聯的飛機和軍艦來進攻台灣。

《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的簽訂，使美國內部對杜魯門準備放棄台灣的反對聲浪升高。這時，美國中央情報局對中國人民解放軍攻台時間重新作了估計，認為中共攻台可能拖到下一年，在此期間，如美大力扶蔣頂住，有希望從長部署抵制中共的方略。於是，來自軍方和國會山的武裝「保台」的主張逐漸佔據上風。麥克阿瑟在1950年5月19日和6月14日就曾兩次向華盛頓提交備忘錄，強調了台湾對美國全球戰略的意義，稱台灣就好比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艦和潛艇基地」。提出，台灣的歸屬問題須要重新考慮，「台灣的最終命運……取決於美國」，美國應在此「劃線」，採取斷然措施，「決不能讓台灣落入共產黨手中」。[4]5月間，剛被任命為國務院顧問不久的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也提出一份主張台灣「中立化」的備忘錄。但要從年初的「美國不擬捲入中國內爭」的公開表態，轉向直接以武力干涉中國內爭，還需要尋找藉口。

1950年6月25日，朝鮮戰爭爆發。27日，杜魯門發表聲明，宣布派遣美國第七艦隊侵入台灣海峽，以阻止中國大陸攻佔台灣，同時要求國民黨停止對中國大陸的海空軍事行動，以免另生事端。同時提出「台灣地位未定論」。聲稱台灣「未來的地位必須等待太平洋安全的恢復，對日和約的簽訂或經由聯合國考慮」。至此，美國武力干涉台灣的政策最

後形成。杜魯門宣布出兵台灣海峽，對於時刻擔心人民解放軍攻打台灣的國民黨政府來説，無疑是一服有力的強心劑。但對美方提出的「台灣地位未定論」，蔣介石則深感憤怒。[5]28日，國民黨政府的「外交部長」葉公超發表聲明，歡迎美國「協防」台灣；同時指出：「台灣係中國领土之一部分」。隨後，美國即以各種「顧問團」和「考察團」的名義，向台灣派駐武裝人員。

美軍進駐台灣，使中國政府解放台灣的計劃遇到新的更大障礙。由此，台灣問題不只是國共兩黨之間的較量，更突出的是中美兩國之間的較量，因而更加複雜化了。1950年10月，中國人民志願軍入朝作戰之後，中國政府進攻台灣的計劃即被擱置起來。

2.美、蔣策劃共同防禦

隨着武力干涉台灣政策的確定，美國即由扶持島內外反國民黨的地方勢力和「台獨」分子，轉向繼續支持台灣國民黨當局。1950年8月底，杜魯門批準向台灣當局提供1.4億美元軍事援助的計劃。隨着朝鮮戰事的發展，美國和台灣當局在1951年2月9日達成了《共同防禦援助協議》。根據這個協議，美國可向台灣方面提供軍事援助。5月1日，「美國軍事援助顧問團」正式在台灣成立，該小組的活動包括將台灣國民黨軍隊整編成三十一個「有戰鬥力」的步兵師；8月，「顧問團」團長威廉·蔡斯（William C.Chase）將軍報告説：美國軍事援助顧問小組已經決定訓練和援助總數達六十萬人的國民黨軍隊。[6]9月下旬，美國在台的軍事人員達到二百八十人。[7]美國對台灣的經濟援助尤其是軍事項目的援助也逐年增長：1951年財政年度為9803.4萬美元；1952年財政年度為8148.2萬美元；1953年財政年度達10550萬美元。[8]

蔣介石退守台灣以後，對在大陸的失敗進行了檢討，在國民黨內部開展了「改造」運動，基本上消滅了長期存在於黨內的各種派系，完成了蔣氏父子清一色的统治；在台灣農村開始實行土地改革，利用從大陸掠走的大筆資金和美援，以購買的方式收購田地分配給農民，刺激了工農業的發展。使國民黨在台灣的統治開始得到鞏固。

1953年1月，艾森豪威爾（Dwight D.Eisenhower）就任美國總統。2月2日，艾森豪威爾在向國會遞交的國情諮文中決定變更第七艦隊的任務，稱：「我已發布命令，第七艦隊不再被用以保護共產黨中國」。[9]這一聲明實際上是在「放蔣出籠」，即鼓勵國民黨軍襲擾大陸。其目的在於配合朝鮮戰場，對中國施壓。但並不同意蔣介石借助美國作過分舉動。因此，美國政府又明確向蔣介石表示，如台灣當局事先未獲美國同意而主動對大陸採取攻擊行動，美國不承諾抵抗大陸的反擊。4月8日，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做出決定，要求台灣當局保證，不得對大陸採取有

可能將美國拖入戰爭的攻擊性行動；在未獲保證之前，停止向台灣運輸噴氣式飛機，已運抵台灣的也暫緩交付。

國民黨退守台灣以後，一直夢想反攻大陸，曾提出「一年準備，兩年反攻，三年掃蕩，五年成功」的口號。但蔣介石心裏清楚，不把美國拖進來，連台灣本身都難以保全，更不用說反攻大陸了。因此，迫切期盼同美國締結共同防禦條約，使美台之間的關係以條約的形式固定下來。1953年3月，國民黨通過其「駐美大使」顧維鈞向美國國務卿杜勒斯提出締結共同防禦條約問題，遭杜勒斯婉拒。6月，蔣介石親自致函艾森豪威爾提出，為遏制共產主義的「侵略擴張」，應組織亞洲的雙邊和多邊共同安全條約。艾森豪威爾覆信表示，共同安全的安排應通過亞洲國家自身來實現，拒絕由美國出面組織的建議。[10]

朝鮮停戰以後，針對遠東出現的新形勢，美國重新審查了對華政策。國家安全委員會制訂的《美國對共產黨中國的政策》規定，美國不謀求動用美國武裝力量或支持台灣當局推翻中共政權，但力爭通過戰爭以外的各種手段削弱中共在亞洲的地位，阻滯其實力的增強，包括繼續承認台灣當局，支持其在聯合國和其他國際組織中的代表權，勸說其他國家採取同樣政策；繼續對中共施加政治、經濟壓力，等等。同時出台的《美國對台灣及中華民國的目標和行動方針》指出，不使台灣落入共產黨手中是遠東防禦政策的基點；提高台灣當局和軍隊的效率和威信，利用其軍事潛力並使台灣成為美國基地符合美國的安全政策……。文件一方面規定，應盡可能採取一切必要安排將台灣、澎湖納入美國遠東防禦圈中；但同時表示，目前同台灣締結一項地區性安全安排時機還不成熟。[11]

美國在與台灣締結共同防禦條約問題上所以躊躇不前，是雙方利益存在分歧：一是領土適用範圍。美國承諾協防台、澎，但對沿海島嶼則希望保持某種模糊政策，而台灣當局對據守沿海三十多個島嶼則不能放棄；二是美國既不願條約束縛了台灣當局對大陸的襲擾，又不願因支持國民黨「反攻大陸」將美國拖入戰爭。台灣當局則急於簽訂這樣一個條約，使美國確認將在一個長時期內對台灣的支持和援助。後來，蔣介石不得不向美方表示讓步。1954年6月28日，蔣介石召見即將回國述職的美國駐台灣「大使」，要他轉告艾森豪威爾總統，他願意滿足美國的要求：在採取任何重大軍事行動前，先徵求美國的同意。[12]

3.第一次台海危機

朝鮮戰爭期間，國民黨軍隊一直在大陸沿海進行武裝襲擾，採用「以大吃小，速進速退」的戰術，對大陸沿海海防薄弱的島嶼實行「打了就跑」的襲擊。其中雖屢遭失敗，但在1952年對福建湄州島、南日島

和浙江平陽縣烏岩、霧城的襲擊曾一度得手，使當地的解放軍駐軍和地方政權受到損失。如：1952年10月11日，國民黨軍出動九千餘人，在海軍艦艇和飛機掩護下猛襲南日島，島上解放軍守軍一個連經激戰大部犧牲，少部被俘，島上政權被摧毀。當晚，大陸增援部隊到達，因對敵情不明，增援部隊一千多人登陸後，經奮勇殺敵，斃傷敵軍数百人，終因寡不敵眾，全部損失。當福建軍區再調部隊反擊時，國民黨軍已於13日夜全部撤離。此次南日島戰鬥，解放軍損失部隊1300人。[13]

1953年初，蔣介石宣布這一年是「反攻年」。6月8日，當朝鮮停戰談判最後達成協議時，蔣介石擔心中美之間的緊張局勢出現緩和，決定採取一次大的軍事行動，以拉住美國。7月16日拂曉，國民黨軍一萬多人，以陸海空三軍配合，向福建省沿海第二大島——東山島實施登陸和空降。由於解放軍沿海各部吸取了南日島失利的教訓，加強了沿海反襲擊的準備，福建軍區及時向東山島增援，經兩晝一夜的激戰，國民黨軍被迫撤退，逃回金門。此役，解放軍以傷亡、失蹤1250人的代價，殲滅國民黨軍3379人（斃傷2477人，俘虜842人）；擊毀敵坦克兩輛，擊沉小型登陸艇三艘，擊落飛機兩架。[14]

7月27日，朝鮮停戰協定簽字生效。台灣問題重新擺到中國政府面前，這既是實施統一台灣戰略的既定方針，也包含着打破美國支持蔣介石在沿海採取攻擊行動的目的。因為台灣當局的軍事行動事實上與美國在台灣海峽的軍事活動聯繫在一起，是美國敵視中國政策的組成部分。

1953年10月，華東軍區司令員陳毅向中央軍委提出：利用我在朝鮮戰場勝利的勢頭，準備用五個軍的兵力解放金門，並突擊修建福建幾個機場和鷹廈、福州鐵路，廈門海堤。中央軍委、毛澤東批準了這個提議。一個月後，毛澤東要求暫緩攻打金門，首先解放浙江沿海島嶼。其原因：

一是考慮朝鮮停戰後的國際形勢，尤其是印度支那局勢，這時還不宜進行大規模的登陸作戰，以在東南沿海進行小規模作戰為好。

二是國內大規模經濟建設剛開始起步，需要有一個較為緩和的周邊環境。金門國民黨守軍多達六萬人，非採取大規模進攻難以奏效，這樣勢必引起美國較強烈的反應。在浙江以東的島嶼作戰，引起的反響相對較小。

三是以當時人民解放軍的作戰能力，攻打浙東沿海島嶼較之攻打金門更有把握。因此時福建省內鐵路未通，可起降噴氣式飛機的機場也未建成。在浙江東部沿海作戰，上海和浙江的現有機場和海軍基地，即可用於支援。

據此，中央軍委決定：採取從小到大、逐島進攻，由北向南，解放華東沿海島嶼的方針。經中央軍委批準，華東軍區從1954年1月起，開始着手解放浙東沿海島嶼的戰役準備。3月，解放軍加強了在浙東沿海

的軍事行動，先後攻佔了東磯列島等島嶼，基本控制了浙江沿海地區的制海權和制空權。[15]

1954年4月21日至7月21日，中國和美、蘇、英、法並列，作為五大國之一參加了以討論朝鮮問題和印度支那問題為主題的日內瓦會議。印度支那停戰問題獲得解決。鑑於遠東地區的三個戰場（朝鮮、印度支那、台灣）中的兩個（朝鮮和印支）都已停戰，南北朝鮮、南北越南的分治狀況已成定局，美國正在組織《東南亞集體防務條約》，並企圖把台灣海峽兩岸的分裂局面固定化。為防止美台簽訂共同防禦條約，造成南北朝鮮、南北越南的類似局面，中國領導人決定採取主動。

中國代表團在赴日內瓦之前，中共中央就基本確定了爭取與美國代表團進行外交接觸，以破壞蔣介石與美國簽約的政治圖謀。[16]毛澤東當時講，我們就是要用與美國談判美國人最關心的僑民遣返問題作誘餌，促使美國不跟台灣訂立共同防禦條約。7月初，周恩來利用日內瓦會議休會期間，回國向中央匯報會議情況。毛澤東在7月6日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進一步談到他的這一設想。毛說：「我們要破壞美國跟台灣訂條約的可能，還要想一些辦法，並且要作宣傳。」除了在公開的宣傳中罵美國搞台獨，罵蔣介石賣國以外，外交上尤其要做些工作。比如可以表示願意在僑民問題上與美國政府進行接觸，「以迫使美國跟台灣不要訂條約」。否則的話，美蔣共同防禦條約一旦簽訂，中美關係，以及台灣問題的解決，都可能「成為很長時期的僵局」。[17]

根據毛澤東的提議，7月23日《人民日報》受命發表社論，突出強調：「中國人民一定要解放台灣，不達目的，決不休止。」[18]7月27日，毛澤東在給周恩來的電報中稱：「在朝鮮載爭結束之後我們沒有及時（約遲了半年時間）地向全國人民提出這個任務，沒有及時地根據這個任務在軍事方面、外交方面和宣傳方面採取必要措施和進行有效的工作，這是不妥當的，如我們現在還不提出這個任務，還不進行工作，那我們將犯一個嚴重的政治錯誤。」[19]8月1日，朱德在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節發表講話，強調「中國人民一定要解放台灣」。8月11日，周恩來總理在中央人民政府會議上鄭重宣布：「解放台灣是中國的主權和內政，決不允許他國干涉。」同日，中國政府號召全國人民和解放軍為完成解放台灣而「奮鬥到底」。8月22日，中國各民主黨派和人民團體發表宣言，擁護中國政府的決定。

與之同時，在軍事上也積極採取行動。這不僅在政治外交上意義重大，而且對正在加緊進行的國內經濟建設也具有重大意義。長期以來，國民黨軍佔據着浙江沿海大陳島等島嶼，對進出中國最大的工商業中心城市上海的商船威脅甚大，已經到了不能不解決的時候了。既然遲早都要動武，正可以乘此顯示一下中國政府必欲解放台灣的決心，同時也可以激發人民的熱情，以推動國家建設任務的完成。如果這就是刺激的

話，與其拖着不去刺激美國，使大陸沿海始終處在國民黨武力威脅之下，並且在外交上使自己解放台灣的問題陷入更大的被動，倒不如乘現在來刺激它一下，看看能不能就此「擊破美蔣軍事條約」。即便美台簽訂《共同防禦條約》，也可在此之前，奪取浙江沿海的大陳等島嶼。

中國政府在行動上顯示決心解放台灣的同時，通過外交渠道向美國傳遞信息，希望美國在某種程度上改變敵視中國的政策。8月24日，毛澤東接見英國工黨代表團時説：「我們希望工黨朋友們勸説美國人：（一）把第七艦隊拿走，不要管台灣的事，因為台灣是中國的地方；（二）不要搞東南亞條約，這也是違反歷史的，要搞就搞集體和平公約；（三）不要武裝日本。」[20]

但是，美國遏制中國的政策已定。面對中國的政治、軍事攻勢，美國採取了以武力相威脅的強硬路線。8月3日，杜勒斯叫囂美國要用海空軍「保護台灣和澎湖列島」。8月17日，艾森豪威爾宣布第七艦隊要干涉中國解放台灣。8月19日，美太平洋艦隊總司令斯圖普（Arthur D.Struble）率軍艦六艘駛入大陳島一帶海面，並出動六百多架次飛機在大陳島海面上空活動。同時加快了與蔣介石簽約的磋商。[21]

為顯示中國政府捍衛領土不惜一戰的決心，9月3日和10日，解放軍先後炮擊金門和馬祖島嶼。國民黨軍則以炮火還擊，從9月6日起出動飛機連續轟炸廈門大嶝，9日出動艦隻攻擊梧嶼白石炮台。第一次台海危機爆發。

10月10日，中國政府向聯合國控訴美國武裝侵佔中國領土台灣，同時聲明：中國決定解放一江山、大陳等沿海島嶼。期間，美國與台灣當局正式進行締約談判。12月2日，美國國務卿在台灣簽訂了美台《共同防禦條約》。蔣介石得到了美國協防台灣的承諾，同時也作了兩大讓步：其一，條約只適用台灣和澎湖的範圍，即不包括大陸沿海島嶼；其二，蔣介石對大陸動用武力，必須與美國人「共同協議」。條約簽訂以後，美國海空軍在台湾海峽的活動開始嚣張起來。

在美國的軍事威脅面前，中國政府決定不能示弱，11月23日，中國政府不顧美國的「高度關切」，堅持判處十三名被俘美國軍事情報人員四至二十年不等的有期徒刑，並繼續執行攻擊一江山島等浙東沿海島嶼的計劃。1955年1月18日，人民解放軍在華東軍區參謀長張愛萍的統一指揮下，陸、海、空三軍首次協同作戰，對一江山島發起攻擊。經過一天的激烈戰鬥，解放軍完全佔領一江山島全殲守軍（擊斃567人，俘虜519人）。解放軍犧牲393人，負傷1027人。[22]

解放軍攻佔一江山島後，大陳島就暴露在解放軍的大炮射程和空軍轟炸的範圍以內，國民黨軍明顯難以堅守。台灣當局向美國求助。這時，美國既不想參戰，又不便對國民黨軍丟棄不管，遂決定説服蔣介石將大陳島守軍撤回台灣。為使國民黨軍安全撤離，1955年1月24日，杜

勒斯將此事通知蘇聯外長莫洛托夫（Vyacheslav Molotov），希望蘇方勸説中共，在國民黨軍撤退時不要加以攻擊。[23]中國政府為避免中美發生直接軍事衝突，中央軍委於2月2日下達指示：蔣軍從大陳島撤退時，我軍不要向港口及靠近港口一帶射擊，讓敵人安全撤走。[24]2月8日到12日，美軍派出大量艦隻到大陳，並以飛機護航，接運守島的國民黨軍二萬五千人、裹脅島上居民一萬八千人去台灣。2月12日至14日，解放軍佔領了上下大陳島。到25日，浙東沿海島嶼全部解放。[25]

中國政府鑑於國內的主要任務是進行經濟建設，在沿海地區採取有限的軍事行動，其目的主要是為了懲罰國民黨軍，顯示反對美國侵略台灣和分裂中國的決心，並無意引發中美之間的戰爭。因此，在浙東沿海取得勝利之後，中國政府適時地採取了緩和緊張局勢的措施。

[1] 詳見徐焰：《金門之戰》（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2）；國史館史料處編：《金門古寧頭·舟山登步島之戰史料初輯》（台北：國史館，1979）。

[2] 詳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劉少奇年譜（1898-1969）》，下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頁219；沈志華：《毛澤東、斯大林與朝鮮戰爭》（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3）。

[3] 參見蘇格：《美國對華政策與台灣問題》（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8），頁122。

[4] 參見蘇格：《美國對華政策與台灣問題》，頁146。

[5] 6月28日，蔣介石在日記中寫道：「晨，閱報見杜魯門聲明，『催促中國政府停止對大陸的一切海空活動，第七艦隊將觀察此一要求是否已付諸實施，至於台灣未來地位，應待太平洋區域安全恢復後，與日本成立合約時再予討論，或由聯合國予以考慮』一節，其對我台灣主權地位無視，與使我海空軍不能對我大陸領土匪區進攻，視我一如殖民地之不若，痛辱盡極。」李雲漢等編：《總統蔣公大事長篇初稿》，卷九（台北：財團法人中正文教基金會，2002），頁184-185。

[6] 蘇格：《美國對華政策與台灣問題》，頁164。

[7] 蘇格：《美國對華政策與台灣問題》，頁164。

[8] 蘇格：《美國對華政策與台灣問題》，頁165。

[9] 戴超武：《敵對與危機的年代：1954-1958年的中美關係》（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頁104。

[10] 參見陶文釗主編：《中美關係史（1949-1972）》（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頁215-216。

[11] 《中美關係史（1949-1972）》，頁217-218。

[12] 《中美關係史（1949-1972）》，頁219-220。

[13] 餘雁：《五十年國事紀要·軍事卷》（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頁275。

[14] 餘雁：《五十年國事紀要·軍事卷》，頁281。

[15] 餘雁：《五十年國事紀要·軍事卷》，頁284-285。

[16] 周恩來6月3日發給毛澤東、劉少奇的電報中特別講到，中國代表團已經告訴英國方面，願意經過英國介紹與美國進行直接接觸。依照周恩來的行事風格，這一重大外交行動，顯然是中共中央決定在先。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頁375。

[17] 毛澤東：〈同一切願意和平的國家團結合作〉（1945年7月7日），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文集》，第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頁333-334。

[18] 《人民日報》社論，1954年7月23日。

[19] 中共中央致周恩來電（1954年7月27日），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逄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上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頁585。

[20]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外交文選》（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世界知識出版社，1994），頁162。

[21] 蕭冬達：《五十年國事紀要·外交卷》（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頁154。

[22] 餘雁：《五十年國事紀要·軍事卷》，頁293-294。

[23] 韓懷智、譚旌樵主編：《當代中國軍隊的軍事工作》（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頁270。

[24] 中國軍事博物館編：《毛澤東軍事活動紀事》（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4），頁

891。

[25] 餘雁：《五十年國事紀要·軍事卷》，頁295；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部編：《中國人民解放軍六十年大事記（1927-1987）》（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88），頁545。

二、炮擊金門的最初意圖

1.中國呼籲中美直接談判

中國政府對付美國政府的孤立和封鎖政策，從一開始就準備了兩手：一手在外交上和軍事上進行針鋒相對的鬥爭；一手不放棄緩和兩國關係的努力。[1]

為了緩和台灣海峽和遠東緊張局勢，爭取有利的國際環境，中國政府謀求用和平方式解決爭端。1955年3月5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表示中國贊成舉行一個由中國、美國、英國、蘇聯、印度、緬甸、印尼、巴基斯坦和錫蘭參加的國際會議，討論緩和台灣地區的緊張局勢問題。

世界各國尤其亞洲周邊國家，對台灣地區局勢感到擔憂，害怕中美發生直接衝突殃及自身，危及亞洲和平。1955年4月，國務院總理周恩來率團去印尼萬隆參加亞洲會議之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討論《參加亞洲會議的方案》中，就確定了「我們主張通過國際協商和緩並消除國際緊張局勢，包括台灣地區的緊張局勢在內」[2]的方針。會議期間，周恩來先後十二次同各國領導人會談，闡釋中國政府在台灣問題上的立場和意見。4月23日，周恩來出席緬甸、錫蘭、中國、印度，印度尼西亞、巴基斯坦、菲律賓和泰國等八國代表團團長會議，當有人問到台灣和平解放後是否可以委任蔣介石為將軍時，周恩來回答：完全可以。隨後，發表聲明：

> 中國同美國人民是友好的。中國人民不要同美國打仗。中國政府願意同美國政府坐下來談判，討論和緩遠東緊張局勢的問題，特別是和緩台灣地區的緊張局勢問題。[3]

中國政府的聲明，在全世界引起強烈反響，尤其在亞洲國家中贏得了好評。會後，蘇聯、英國、印度、緬甸、印尼分別在中美之間進行外交斡旋，以促進中美兩國直接談判。從5月中旬到6月間，周恩來分別會見上述各國使節，僅同專程來華斡旋的印度駐聯合國代表梅農（V.K.Krishna Menon）就進行了六次會談。5月13日，周恩來在向全國人大常委會作亞非會議的報告中鄭重指出：

> 台灣是中國的領土，生活在台灣的人民是中國人民，中國人民解放台灣是中國的內政問題。美國侵佔台灣造成了台灣地區的緊張局勢，這是中美之間的國際問題。這兩個問題不能混為一談。……為了和緩台灣地區的緊張局勢，中國政府願意同美國政府坐下來谈判。

同時表示：

> 中國人民解放台灣有兩種可能的方式，即戰爭的方式和和平的方式，中國人民願意在可能的條件下，爭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灣。[4]

此時，美國政府懷着它自己的目的，也在考慮中美直接談判的可能。周恩來4月23日的聲明和5月13日關於以和平方式解放台灣的講話，都引起了美方的注意。5月上旬，英國駐華代辦杜維廉（Humphrey Trevelyan）會見周恩來，表示願為中美直接談判進行斡旋。5月26日，周恩來明確答覆杜維廉：中國赞成通過中美談判以「緩和和消除台灣地區的緊張局勢」。杜勒斯得到這一口信後，與艾森豪威爾商議，最終放棄了不與中國政府接觸的僵硬政策，接受了中國方面提出的舉行中美直接談判的建議，決定中美雙方可以「交換特派官員」進行直接談判。7月11日，杜勒斯請英國政府向中國政府轉達美國的建議：中美兩國進行大使級會談。周恩來在7月13日作出答覆，接受美國的建議。經過雙方商定，7月25日，中美雙方同時發表了新聞公報，宣布：兩國大使級代表的第一次會晤於1955年8月1日在日內瓦舉行。中方代表是駐波蘭大使王炳南，美方代表是駐捷克斯洛伐克大使約翰遜（U. Alexis Johnson）。[5]

中美大使級會談的舉行，是由國際上多方面的因素促成的，也是中國政府從1954年以來在東南沿海鬥爭的成果。

2.美國無意緩和中美關係

美國參加中美會談，服務於它有限的具體目標。1955年7月29日，杜勒斯向即將參加會談的約翰遜大使發出十八點指示，其主要精神是，在會談中不涉及外交承認中國的問題，只談「雙方之間的實際問題」。具體目標有二：一是要求中國在台灣地區放棄使用武力；二是使雙方平民回國，要求中國釋放在押的美國人犯。[6]

使雙方人員回國，這是1954年已經談判過的問題，是會談中雙方立場易於接近的唯一問題。為給會談創造良好開端，1955年8月1日，中方代表王炳南在日內瓦舉行的中美大使級會談第一次會議上，單方面宣布，中國最高法院於7月31日判決，提前釋放阿諾德等（John K.Arnold）十一名美國間諜，美方代表表示感謝。經過一個多月的討價還價，9月10日，中美雙方達成一項關於遣返平民的「協議聲明」。這也是中美大使級會談中達成的唯一協議。根據這個協議，中國爭取了一批中國僑民和留學生回國，其中有著名物理學家錢學森。[7]

會談轉入實質性問題——台灣問題之後，立即陷入了僵局。10月27

日，中方代表王炳南提出兩國協議聲明草案，包括兩項主要內容：中國和美國同意，「它們應該用和平方法解決它們之間的爭端而不訴諸威脅或武力」；中國和美國「決定舉行外長會議，協商解決和緩和消除台灣地區緊張局勢的問題」。美方代表約翰遜按照美國政府既定方針，拒絕了這個協議草案。11月10日，美方提出自己的方案，內容也是兩條，第一條美國要求在台灣地區擁有「單獨和集體防禦」權利，實質是要中國政府承認美國侵佔台灣的合法地位；第二條要求中國放棄對台灣使用武力，這等於要中國放棄解放台灣的權利。王炳南大使指出，台灣問題有兩個方面，一方面，美國侵佔台灣已經成了國際爭端，美國應該放棄對中國使用武力，從台灣和台灣海峽撤出它的一切武裝力量；另一方面，中國用甚麼方式解放台灣，這是中國的內政，美國無權要求中國不使用武力，雖然中國政府一再聲明願在可能條件下爭取用和平方式解放台灣，但這決不能成為中美會談的議題。

美國政府對於會談毫無誠意，它在獲準中國釋放美國在押人員之後，並不願為緩和中美關係做任何努力，為的是：避免會談造成美國將承認中國的印象。因而，一味採取拖延策略，決不接受中方關於準備兩國外長會談的提議。

中國的方針是積極促進會談，先就一些次要問題達成協議，以求在實質性問題——台灣問題上取得突破。1956年1月、3月和6月，中國政府三次公布會談經過，使美國拖延會談真相大白於天下，敦促美國認真對待會談。在「互不使用武力」問題卡殼之後，1956年8月21日，中方提出討論禁運問題，美方以只有對「放棄使用武力」問題達成協議後才能討論禁運問題為理由，加以拒绝。此時，會談只是應付差事，常常是王炳南和約翰遜兩人交鋒幾句，即行散會。王炳南回憶説：「會談仍在繼續。我幾乎已經不抱任何希望了。」[8]

為了打破僵局，尋求突破。周恩來在1956年8月宣布一項重大決定：中國政府單方面取消不讓美國記者進入中國的禁令，並向美國十五家新聞機構發出邀請，請他們派記者來華作為期一個月的訪問。在會談中，中方代表也提出了關於促進中美人員來往和文化交流，準許對方新聞記者進行新聞採訪等提議，想以此推動會談，使中美關係有所鬆動。

中國政府這一着妙棋，震動了美國新聞界和國務院。美國新聞界為之興奮，向國務院不斷施加壓力。有幾名記者不顧禁令，勇敢地衝破封鎖，訪問了中國。杜勒斯終於不得不做出回應，在與新聞界悄悄協商之後，於1957年8月宣布，美國將準許二十四個新聞機構派遣記者到中國採訪，但決不同意中國派相等人數的記者去美國訪問。中方在日內瓦會談中提出的多種協議草案，均被美國拒絕。美國對華政策從有所鬆動到重新強硬，在一定程度上也同1956年發生的波蘭、匈牙利事件後美國調整對社會主義國家的冷戰政策有關。

這種無結果的會談進行到1957年12月12日第七十三次會談時，約翰遜大使宣布，他將撤出會談，調任美國駐泰國大使，今後將由美國駐捷克使館一秘馬丁代表美國參加會談。表明美國在單方面宣布將雙方會談降級。中方當即表示不能同意。[9]致使中美大使級會談中斷。

1958年2月10日，周恩來在全國人大一屆五次會議上講話揭露說：「美國同中國舉行大使級的會談，而在會談中又要求中國承認它侵佔台灣的現狀。這在實質上就是企圖製造『兩個中國』，中國方面當然绝對不能容許。」[10]

3.炮擊金門的決策

1954至1955年的台海危機，就曾使毛澤東等中國領導人強烈地意識到，跟美國這樣的國家打交道，除非自己擁有足夠的實力，否則就只能永遠處於被動地位，受人白眼，甚至被人所擺布。中美大使級會談的過程，更進一步證明這一客觀現實。

早在1955年秋天，注意到中美大使級會談中美國代表想盡辦法不和中國代表討論台灣問題，毛澤東就已經憋着一口氣，暗下決心要靠迅速提升自己國家的實力來迫使美國改變態度。1955年10月，毛在同工商界人士座談時說：「我們的目標是要趕上美國，並且要超過美國。美國只有一億多人口，我國有六億多人口，我們應該趕上美國。……哪一天趕上美國，我們才吐一口氣。現在我們不像樣子嘛，要受人欺負。」「我們一定要爭這一口氣。」[11]

美國無意緩和兩國爭端，還表現在不斷加劇台灣海峽的緊張局勢上。就在會談期間，美國一直在加強在台灣的軍事實力。1955年3月3日，《美台共同防禦條約》生效。1956年1月又簽訂了美台軍事協定。美國向台灣派駐了「協防台灣司令」，將美駐台軍事顧問團擴充到2600人。美空軍第十三特種航空隊進駐台灣。1957年5月7日，美駐台協防司令殷格索爾（Stuart H.Ingersoll）宣布，美國在台灣部署了可攜帶原子彈頭的「鬥牛士」導彈和電導導彈，增強了國民黨軍的防衛和進攻能力。

在外交上，美國的態度更趨強硬。杜勒斯不斷地發表反華言論。1956年1月，他聲稱，如果中國以武力解放台灣和澎湖列島，「那麼我們將進行戰鬥」。1957年4月20日，美國國務院發表聲明：「美國將單方面禁止對共產黨中國的一切貿易」。5月13日，杜勒斯在馬尼拉條約理事會上重申美國對華政策三原則：不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繼續承認「中華民國」；反對中華人民共和國進入聯合國。6月28日，杜勒斯在舊金山發表對華政策演說，稱要盡一切可能使共產主義這種現象在中國消逝。[12]

但是，美台軍事關係加強的同時，矛盾也在加劇。美國雖然堅持「協防台澎]，但並不支持蔣介石固守金門、馬祖，這就使美蔣之間心存芥蒂。國民黨當局還擔心中美會談會做出不利於它的妥協。其策略是不斷地發出「反攻大陸」的叫囂，加強對大陸的間諜活動和軍事骚擾。從1957年開始，台灣海峽局勢重新緊張起來。國民黨軍的飛機深入大陸內地雲、貴、川、青海等地，空投特務，散發傳單，甚至出動飛機轟炸福建沿海。經過國民黨軍的長期設防，至1950年代中期，金門已構成堅固築壘地域，成為國民黨軍屏障台灣的據點和竄犯大陸的基地。1957年底，金門設有防衛司令部，轄六個步兵師和特種兵部隊，共八萬五千餘人，其中各種地面炮兵三十一個營又兩個連，有七十五毫米以上口徑火炮三百八十門。[13]這種類似賭博的軍事部署，對蔣介石來說有多重用意，一則視固守金、馬為「反攻大陸」的精神支柱；二則把美國進一步與自己拴在一起，使其更難勸他撤退，一有機會便拉美國下水。

鑑於美國對改善中美關係毫無誠意的現實，毛澤東開始醞釀調整對付美國的政策。1958年6月16日，毛澤東在中南海游泳池召開會議，討論外交問題。中國政府決不能容忍台灣問題由此沉寂而使分割之勢固定化和永久化，決定對美鬥爭採取針鋒相對，以文對文，以武對武，先禮後兵的方針。[14]

在此之前，中國政府一直在為解決福建前線的後勤運輸保障和制空權問題，進行鐵路和機場建設。1957年12月28日，由江西鷹潭到廈門的鐵路正式通車。同時，毛澤東提出空軍入閩的問題，12月18日，毛澤東指示彭德懷：「請考慮我空軍1958年入福建的問題。」[15]1958年7月24日，中央軍委命令組建福州軍區空軍司令部，空軍部隊隨即在連降暴雨的惡劣氣候下完成轉場任務。並在7月29日至8月14日期間，擊落擊傷國民黨軍來犯的飛機九架，取得了福建沿海地區的制空權。[16]

1958年6月30日，中國政府發表《關於中美大使級會談的聲明》。提出「中國政府要求美國政府在從今天起的十五日以內派出大使級代表，恢復會談。否則，中國政府就不能不認為美國已經決心破裂中美大使級會談。」[17]

這時，美國既不能無視中國政府的聲明，又不願認真對待。7月1日，杜勒斯就中國政府聲明發表談話。聲稱，不受《十五天限期的最後通牒的約束》。又説，如果中共接受華沙為會談地點的話，美國將指派其駐波蘭的大使參加會談。[18]

中國政府要求美國派出大使級代表恢復會談的15天期限，沒有得到美國政府的正式答覆。1958年7月14日，伊拉克爆發革命，推翻了費薩爾王朝統治，建立了伊拉克共和國，同時宣布伊拉克退出由美英組織的巴格達條約組織。次日，美國決定出兵支持親美的黎巴嫩政權，英軍也迅速在約旦登陸。此後蘇聯在中東也有所動作。中東局勢驟然緊張，成

為國際注目的焦點。世界各地進步輿論紛紛譴責美國干涉中東內政，聲援中東人民的反侵略鬥爭。美國此時宣布其遠東地區駐軍進入戒備狀態。台灣當局則想趁火打劫，伺機擴大事態，7月17日宣布國民黨軍處於特別戒備狀態。[19]同時加緊軍事演習和空中偵察，擺出反攻大陸的姿態。

在中美關係問題上，毛澤東的目光並不僅僅局限於台灣海峽，而是有他的全球性戰略考慮。在中國共產黨人的心目中，美國帝國主義不只是中國人民的敵人，也是全世界被壓迫民族和被壓迫人民的共同敵人。支持世界被壓迫民族和被壓迫人民的反帝鬥爭，是已經獲得解放的中國人民義不容辭的義務。1957年1月27日，毛澤東分析國際形勢說，帝國主義國家同社會主義國家矛盾雖然很厲害，但帝國主義國家現在是在假借反共產主義之名來爭奪亞洲、非洲十億人口的地盤，重點又在中東，按這個構想：毛認為，社會主義國家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主要不是直接對抗，而是應該支持世界民族解放運動，把台灣問題與支持中東人民反美鬥爭結合起來，正可以相互策應，互為後盾，使美國四處緊張，首尾失據，既可減輕中東人民的壓力，又可試出美國在台灣問題上的底牌。中美大使級會談，本來就是通過製造台海緊張關係逼出來的。為了讓美國知道輕視中國的後果，毛澤東決心再度在台灣海峽搞一點緊張局勢，即利用杜勒斯說的「戰爭邊緣政策」，「給美國人一點顏色看」。[20]現在，美國出兵黎巴嫩，正好是在台灣海峽做文章的時機。

1958年7月15日至18日，毛澤東連續召集會議，做出了炮擊金門的決定。18日晚，毛澤東召集軍事部門各有關負責人的會議，對炮擊金門下達指示。毛說：金門炮戰，意在擊美。支持阿拉伯人民的反侵略鬥爭，不能僅限於道義上，還要有實際行動的支持。金門、馬祖是中國領土，打金門、馬祖，懲罰國民黨軍，是中國的內政，敵人找不到藉口，但對美帝國主義則有牽制作用。他設想，以地面炮兵實施主要打擊，準備打兩三個月；以兩個空軍師於炮擊的同時或稍後，轉場南下，分別進駐汕頭、連城。[21]關於炮擊金門與對美政策的關係，毛澤東在一個批示中說，炮擊的目的是「直接對蔣，間接對美」。「是偵察美國人的決心，是考驗美國人的決心」。[22]

就在中央軍委做出部署，炮戰即將開始的時候，因蘇方提出建立長波電臺和聯合艦隊引起中方的高度敏感：赫魯曉夫將於7月31日來華與毛澤東會談。因炮擊金門並未告知蘇聯，為避免使事情複雜化，7月27日上午，毛澤東下令暫停炮擊行動。他在給彭德懷、黃克誠的信中說：「睡不者覺，想了一下。打金門停止若干天似較適宜。目前不打，看一看形勢。」[23]

這時美方的情況是，8月10日，杜勒斯發表聲明，表示要不遺餘力地扼殺伊拉克政權。美國國務院向駐外使團發出〈關於不承認共產黨政

府的備忘錄〉，並提出要警惕蘇中聯盟的危險性。[24]期間，美國對台灣海峽的局勢做出了三項決定：一、增派航空母艦和戰鬥機，向台灣提供登陸艇、響尾蛇導彈、火炮和軍需。二、通過杜勒斯覆函美國眾議院外委會主席摩根（Thomas E. Morgan），向中國施壓。三、授權駐台大使對《美台共同防禦條約》的換文加以「澄清」，如中國大舉進攻外島，可以進行報復，但小型進攻不在其列。[25]

然而，對中國領導人而言，無論是外交恐嚇，還是「戰爭邊緣」政策，都動搖不了反對美帝國主義侵佔台灣海峽的決心。

1958年8月17日，毛澤東在北戴河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中共中央做出炮擊金門的最後決定。18日淩晨1時，毛澤東致信彭德懷，親自部署炮打金門。他在廣州軍區給中央軍委的報告上批示說：「準備打金門，直接對蔣，間接對美。因此不要在廣州深圳方面進行演習了，不要去驚動英國人。」並指示：「請叫空司注意：台灣方面可能出動大編隊空軍（例如幾十架到百多架）向我反擊，奪回金、馬制空權。因此，我應迅速即準備以大編隊擊敗之。追擊不要越過金、馬線。」8月20日下午，毛澤東召集周恩來、鄧小平、林彪、黃克誠、葉飛、蕭勁光、陳錫聯、王秉章、王尚榮、陶勇開會，具體部署金門作戰。[26]決定，暫時不打馬祖，集中火力炮擊金門。

炮擊金門既是武仗，更是文仗，因而，每一步驟都在毛澤東和周恩來的直接掌握之中，滲透了中國領導人妥善處理中美蔣三角關係的策略思想。「直接對蔣，間接對美」就是這次炮擊金門的戰略意圖和指導方針。儘量避免與美國人直接交鋒，辦法是只打金門，不打台灣。後來毛澤東說：「我們整金門，我們是整家法，這是我們國內的事。當然整台灣也是整家法，不過，那個地方有你美國兵，那我還是暫時不去。」[27]即便如此，毛澤東對炮擊金門會不會傷及國民黨守軍中的美國顧問人員也格外重視。

負責前線指揮的福州軍區第一政委葉飛回憶說：

> 21日下午3點鐘，毛主席找我去他的住處，我知道這是要我去接受命令了。一見到主席，我先彙報了炮擊的準備情況。彭老總、林彪參加了，少奇、總理沒有在，總參作戰部部長王尚榮也在。地圖是攤在地毯上的。
>
> 主席聽我彙報時，精力非常集中。彙報完了，他別的沒有說，突然提出這麼一個問題：你們用這麼多的炮打，會不會把美國人打死啊？那個時侯，國民黨軍中的美國顧問一直配備到營一級。我說：那是打得到的。聽我這樣一說，主席又考慮了十多分鐘沒有說話。後來又問：能不能避免不打到美國人？我說：避免不了。主席聽後，再也不問其它問題，也不給我指示，就宣布休息。這是主席要進一步考慮問題。

第二天繼續開會。這個時侯，主席下決心了，說：那好，照計劃打，並要我在北戴河指揮。[28]

總之，對中共中央、毛澤東而言，炮擊金門主要不是一場軍事仗，而是一場政治仗、外交仗和宣傳仗。其根本目的，不在於是否佔領金門，也不在於消滅多少敵人，而在於牽制美國的軍事力量，懲罰台灣當局，模清美國對華戰略的底盤；通過有限的軍事行動，維護國家的領海權益和沿海地區的安寧，以及鼓舞國內「大躍進」的士氣。由於美國和台灣當局對這一戰略意圖並不清楚，因此，炮擊開始以後，中國共產黨、國民黨和美國三方圍繞着金門島進行了激烈而又微妙的鬥爭，使得這場戰鬥成為世界軍事史上罕見的奇特鬥爭。

[1] 在1954年日內瓦會議期間，中國代表團主動和審慎地提出了與美國人直接會談的建議，促成了中國代表、外交部辦公室主任王炳南與美國代表，美駐捷克大使約翰遜（U.Alexis Johnson）之間就兩國僑民回國問題進行會談。由於美國的僵硬態度，這次會談未就雙方平民回國問題達成協議。

[2]《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卷，頁461。

[3]《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卷，頁470。

[4] 周恩來：《關於亞非會議的報告》（1955年5月13日），載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黨史黨建政工教研室編：《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第二十冊，上冊（北京：國防大學出版社，1960），頁580。

[5]《人民日報》，1955年7月25日。

[6] 資中筠主編：《戰後美國外交史：從杜魯門到里根》，上冊（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4），頁299。

[7] 1950年代末，周恩來在一次會上說，中美大使級會談至今雖然沒有取得實質性成果，但畢竟就兩國僑民問題進行了具體的建設性的接觸，我們要回了一個錢學森。單就這件事來說，會談也是值得的，有價值的。王炳南《中美會談九年回顧》（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85），頁55-56。

[8] 王炳南：《中美會談九年回顧》，頁62。

[9] 王炳南：《中美會談九年回顧》，頁65。

[10] 周恩來：〈目前國際形勢和我國外交政策〉（1958年2月10日）載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學院政治理論教研室編：《黨史參考資料：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第三冊，上冊，（南京，1960），頁8。

[11] 毛澤東：〈在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問題座談會上的講話〉（1955年10月29日），載《毛澤東文集》，第六卷，頁500。

[12] 世界知識出版社編輯部編：《杜勒斯言論選集》（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59），頁314。

[13] 餘雁：《五十年國事紀要·軍事卷》，頁301。

[14]《毛澤東傳（1949-1976）》，上冊，頁851。

[15] 毛澤東對彭德懷轉來的副總參謀長陳賡1957年12月9日關於台灣飛機侵入大陸活動情況和加強內地防空作戰部署的報告的批語，手稿，1957年12月18日。《毛澤東傳（1949-1976）》，上冊，頁852。

[16]《毛澤東傳（1949-1976）》，上冊，頁552。

[17]《人民日報》，1958年7月1日。

[18] 蘇格：《美國對華政策與台海問題》，頁293-294；《戰後美國外交史：從杜魯門到雷根》，上冊，頁301；蕭冬連：《五十年國事紀要·外交卷》，頁162。

[19] 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部：《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七十年》（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97），頁480。

[20] 吳冷西：《十年論戰：1956-1966中蘇關係回憶錄》（北京：中央文獻出版杜，1999），頁189。

[21]《當代中國軍隊的軍事工作》，頁387。

[22] 周恩來軍事活動紀事編寫組編：《周恩來軍事活動紀事（1918-1975）》，下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頁381；張培森主編：《張聞天年譜》，下冊（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0），頁1097-1098；〈中國政府有關中美大使級會談的聲明〉，（1958年6月30），載《中美關係資料彙編》，第二輯（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60）頁2626-2628；毛

澤東給彭德懷的信，手稿，1958年8月18日，載《毛澤東傳（1949-1976）》，上冊，頁857；吳冷西：《憶毛主席》（北京：新華出版社，1995），頁76-77。

[23] 《毛澤東傳（1949-1976）》，上冊，頁854。

[24] 赫魯曉夫這次雖是秘密訪問，但根據中方的要求，在1958年8月3日公開發表了〈毛澤東和赫魯曉夫會談公報〉，其中提及中蘇兩國國防部長參加了這次首腦會談。「雙方就目前國際形勢下兩國所面臨的在亞洲方面和歐洲方面的一系列重大問題充分地交換了意見，並且對於反對侵略和維護和平所應採取的措施達成了完全一致的協定。」這不能不引起美方的注意。但事實上，毛澤東在和赫魯曉夫會談中，並未談及炮擊金門一事。1959年9月，赫魯曉夫再次來華時，毛澤東對他說：「那時他們做得不對，不應該把兵艦調來調去。美國人沒有多大本領。他們以為我們在炮打金門問題上達成了協定。其實，那時我們雙方並沒有談這個問題。當時所以沒有跟你們談，是因為我們有這種想法，但是還沒有最後決定。我們沒有想到打炮會引起起這麼大的風彼，只是想打一下，沒曾想到他們調動這麼多的兵艦。你們走了以後，我們在8月中旬才決定打。因為8月20、21號聯合國要通過美國撤軍的決議，所以，我們8月21號沒打，23號才打。美國人在黎巴嫩總是受到全世界人民的反對，生怕別人打他。美國人沒有立刻弄清楚我們的目的，以為我們要打台灣，就把他們的軍隊從地中海、太平洋、西太平洋、日本、菲律賓調來。等到地中海艦隊開到新加坡的時候，一看沒有甚麼事情啦，就在新加坡停下來啦，引起了印尼的恐慌。我們一罵，他們就退回菲律賓去了，住了兩個禮拜。可以看得出來，美國人這次部署很慌很亂。」見毛澤東和赫魯曉夫談話紀要（1959年9月30日），載《毛澤東傳（1949-1976）》，上冊，頁855-856。

[25] 林正義：《一九五八年台海危機期間美國對華政策》（臺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5），頁56-58。

[26] 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部：《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七十年》，頁481；葉飛：《葉飛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杜，1988），頁654。

[27] 《毛澤東傳（1949-1976）》，上冊，頁865。

[28] 《毛澤東傳（1949-1976）》，上冊，頁857。羅元生在《百戰將星——王尚榮》一書中說：毛澤東在連夜反復考慮後，第二天就提出，還是先打幾百發，由小到大比較好。經過葉飛等人的爭取，毛澤東才勉強同意先打一萬發，而又過了一夜思考之後，他還是堅持不能打到美國人。在他經過葉飛發往前線的指示中稱：此次炮擊先不打地面目標，只打水面船隻，使用炮彈三千到六千發；打地面時，不打其指揮機構；尤其不要打美國軍艦及島上的美國人。這一決定突出地反映出毛澤東對中美關係的重視。直到彭德懷明確表示希望按照福建前線指揮部的意見進行炮擊，並強調「估計美軍不會參加」後，毛澤東才在最後關頭同意照最初的方案實施炮擊，仍著重打敵指揮機構、炮兵陣地，雷達站和料羅灣的艦艇等。羅元生：《百戰將星——王尚榮》（北京：解放軍文藝出版社：1999），頁267-269。

三、由「聯美壓蔣」到「聯蔣抗美」

1.「八·二三」炮戰引起的震動

大金門島面積僅一百二十平方公里，小金門島面積僅十平方公里，島上卻有駐軍八萬五千人和五萬居民。駐金門的國民黨軍，占台灣國民黨軍總數的1/6左右，盤踞在大、小金門和大擔、二擔等九個島嶼上，配備有105毫米口徑以上的火炮308門，四十毫米以上的高射炮146門，輕型戰車和自行火炮106輛。金門防衛司令部位於大金門的制高點太武山。金門距台灣港口的航線長約一百二十海里，島上十三萬軍民的基本衣食及各種軍需都要依賴於台灣供應。主要的供應方式是海運，停靠碼頭是大金門島南端背對大陸的料羅灣。另有兩座可降落大型運輸機的機場，部分急需的物資則實行空運。平均每天的運輸量為四百噸左右，以維持守軍的基本生活和最低限度的作戰需要。1958年8月6日，台灣當局命令軍隊進入緊急戒備狀態，並增兵沿海諸島，至8月中旬金門兵力達到九萬六千人，馬祖四萬人。[1]

當時台灣國民黨空軍擁有飛機六百餘架，其中作戰飛機四百餘架，全部系美國裝備和訓練，有一定的戰鬥力。在台灣還駐有美國空軍的一個航空兵師，裝備有最新式的F-100戰鬥機，它們既可保護台灣上空，又能作為台灣空軍進入大陸作戰的後盾，使得國民黨空軍可以無後顧之憂地投入全部力量到大陸進行空戰。

為實現陸海空三軍配合全面封鎖金門的作戰部署，人民解放軍海軍奉命由南海艦隊、東海艦隊調集三個魚雷快艇大隊、兩個獵潛艇大隊和一個高速炮艇中隊等水面艦艇入閩參戰；空軍則以二十三個殲擊機團共520架殲擊機（蘇制米格17）進入第一線和第二線機場。當時，在福建前線參戰的陸海空部隊，共有459門大炮、八十多艘艦艇和200多架飛機。[2]各部在8月20日晚全部進入預設陣地的指定位置。8月21日，中央軍委下達命令，決定從23日開始對金門進行炮擊。先打三天，走出第一步，看看台灣當局的動態後，再決定下一步。根據這一命令，人民解放軍計劃對金門國民黨守軍只用炮兵火力轟擊和實施海上封鎖，空軍用於在大陸上空擔任掩護，只有在國民黨空軍轟炸大陸時才出擊轟炸金門。[3]

8月23日下午5時30分，一聲令下，炮擊金門作戰正式開始。459門火炮待續八十五分鐘，發射了三萬多發炮彈。當時，正是金門島上國民黨軍的開飯時間。國民黨軍多在工事外面，金門防衛部的中將副司令官趙家驤、章傑和澎湖防衛司令部中將副司令官吉星文等官兵六百多人當

場被炮彈擊斃，兩名美軍顧問也被炮擊喪生。國民黨軍炮兵在遭突襲二十分鐘後，才開始還擊，發射炮彈二千餘發，其火力很快被壓制下去。8月24日，解放軍炮兵和海軍實行聯合打擊，重創國民黨軍「中海」號大型運輸艦，擊沉由大型坦克登陸艦改裝的「台生」號貨輪（23日已被擊傷）。[4]經過這兩次打擊，島上軍用設施和通信系統，被炮擊摧毀或嚴重破壞。

毛澤東最初設想是，通過炮擊封鎖金門。利用美蔣在協防金門、馬祖等沿海島嶼問題上的矛盾，以迫使蔣介石放棄金門，達到收復金門的作戰目的，又不給美國以武力干涉的藉口。毛在8月23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說，我們的要求是美國從台灣撇退，蔣軍從金門、馬祖撤退。你不撤我就打。台灣太遠打不到，我就打金、馬。這肯定會引起國際震動，不僅美國人震動，亞洲人震動，歐洲人也震動。[5]

果然，金門炮響後，台灣驚恐萬狀。全世界也「滿天風雨，煙霧沖天」。[6]

美國政府迅速做出反應，8月25日，艾森豪威爾在白宮召集會議討論對策。決定進一步加強已在台灣海峽的第七艦隊，加強台灣的空防力量，向台灣提供導彈和登陸艇，在公海為國民黨向金門運輸給養提供護航。會後，迅即從地中海、美國西海岸以及菲律賓調來第六艦隊的一半艦隻。美軍在台灣海峽集中了五艘航空母艦、三艘重巡洋艦、四十一艘驅逐艦，七艘攻擊型潛水艇。美國空軍第四十六巡邏航空隊，第一海軍陸戰隊航空隊進駐台灣、菲律賓。3800名海軍陸戰隊登陸台灣南部。[7]據稱，這次調動是美國戰後最大的一次軍事集結。

台灣方面則向美提出緊急求救。27日，美國駐台「使館」把蔣介石給艾森豪威爾的求援信轉到了華盛頓。要求美方採取兩項應急措施：（1）以美台的聯合軍事力量「阻遏中共繼續擴大其侵略行徑」；（2）同意台灣採取單獨行動，立即轟炸金門對面的中共海空軍和炮兵基地。並要求美方公開聲明：中共目前對金門的侵略行動構成對台灣和澎湖的安全威脅，如中共繼續進攻金門，美國政府將使用其軍事力量協防兩島，以確保台、澎的安全；授權第七艦隊將為台灣與金門、馬祖之間的海上通道提供護航；授權美國駐台軍事指揮官可進行相關決策，而不必事事請示華盛頓。[8]

當時正在休假的杜勒斯指示國務院：立即給蔣介石一個臨時答覆；尋求總統做出指示，讓國務院和國防部協調決定採取漸進的行動，以便導致採用核武器來制止對沿海諸島的軍事行動。[9]28日，美國國務院發表聲明，聲稱美國不會把「中共」對沿海諸島的進攻視為有限的軍事行動。29日，艾森豪威爾再次在白宮舉行會議，決定暫時擱置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同意在公海為國民黨向金、馬補給提供護航。蔣介石對此表示「深深的失望」，稱這對他在金門、馬祖的守軍是「不人道的」，

「不公正的」，這「不是一個盟國的政策」。[10]

進入9月以後，國民黨軍的武器、彈藥補給日益困難，還擔心人民解放軍會實行登陸，不得不注意彈藥的節約使用，故不再輕易還擊，只是偶爾進行一些不規律的擾亂性射擊。金門炮戰很快形成一邊倒的局面，但要對國民黨軍守島炮兵實行全面的火力殲滅，也非易事。在炮擊和封鎖金門十天后，毛澤東於9月3日要求自9月4日起停止炮擊三天，以觀各方動態。9月4日當天，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發表了關於領海問題的聲明，宣布領海寬度為十二海里。

9月4日，杜勒斯經總統授權發表聲明，稱：美國負有條約義務幫助台灣不受武裝進攻，美國「已經意識到確保與保護金門和馬祖已經同保衛台灣日益相關」，「如果情勢必須實現《福摩薩決議案》的目標，總統將毫不猶豫這樣做」。公開威脅要把美國在台灣海峽的「協防」範圍擴大到金門、馬祖。同時又表示，美國並沒有放棄和平解決中美在台海地區爭端的希望。[11]其目的在「讓共產黨猜不透」。[12]通過這種戰爭訛詐，使中國領導人因猜不透美國的底盤而就此止步。

對於美國的戰爭訛詐，中國政府採取了嚴正的原則立場。9月6日，周恩來總理發表聲明，指出：台、澎、金、馬自古是中國領土，中國政府完全有權對盤踞在沿海島嶼的蔣介石部隊給予堅決打擊和採取必要的軍事行動，任何外來的干涉，都是侵犯中國主權的罪惡行為。同時表示，既然美國願意進行和談，中國政府準備恢復兩國大使級會談。

中國政府決定炮擊金門，事先未同蘇聯政府商量。7月31日至8月3日，赫魯曉夫來華訪問期間，毛澤東與他會談也未同他談及此事。[13]炮擊開始後，台灣海峽形勢頓時緊張起來，蘇聯對中國事先未作商量的做法表示不滿，對中國的做法也不摸底。周恩來接見蘇聯駐華使館參贊蘇達利柯夫（N.G.Sudarikov），表示歡迎蘇聯外交部長葛羅米柯（Andrei Gromyko）來華訪問。向他解釋了中國政府對台灣海峽形勢的分析、美蔣矛盾以及中國的立場、策略和所採取的行動。著重說明中國炮擊金門、馬祖並不是就要用武力解放台灣，只是要懲罰國民黨部隊，阻止美國搞「兩個中國」，如果打出亂子，中國自己承擔後果，不拖蘇聯下水。[14]9月7日，赫魯曉夫致函艾森豪威爾，呼籲美國政府在台灣海峽地區慎重行事，不要輕易採取可能帶來不可收拾的後果的步驟。公開表示：美國對中國的侵犯就是對蘇聯的侵犯，蘇聯不會「無動於衷」、「袖手旁觀」。[15]

台灣海峽的局勢，也引起中國周邊鄰國的關注。9月8日，越南民主共和國主席胡志明致電毛澤東詢問，鑑於台灣情況的緊張，美帝態度之頑固，請您告訴我們：（甲）可能不可能發生美華戰爭？（乙）我們越南應該有甚麼準備？10日，毛澤東回電說：「（甲）美國人怕打仗，就目前說，很少可能大打起來；（乙）貴國似可以照常工作。」[16]

2.美國的底牌和美、蔣矛盾

艾森豪威爾和杜勒斯的「戰爭邊緣」政策，在美國國內及其盟國掀起軒然大波，紛紛表示反對美國為金門、馬祖而同中國作戰。除了南朝鮮李承晚外，幾乎所有國家，包括日本、英國等美國的主要盟國，都明確地反對美國干涉金門、馬祖之戰。美國國內反戰空氣甚濃。連赫爾利（Patrick J. Hurley）這種敵視中國的人都認為，美政府在執行一種「自殺政策」。蘇聯的表態對美國的行動也起了一定的制約作用。在這種形勢下，美國政府不得不審慎行事。即：一面對周恩來總理9月6日的聲明表示歡迎；另一面又應蔣介石的請求，於9月7日出動兩艘巡洋艦、五艘驅逐艦到金門海域，為國民黨軍運輸艦護航（但內部規定美國軍艦接近金門後，必須停在離海灘三海里外的海上）[17]

對於美國軍艦到金門海域直接介入中國內戰、侵犯中國主權的行動，中國外交部當天提出了嚴正抗議。毛澤東隨即做出相應對策。早在大舉炮擊金門之初，毛澤東在8月25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就說過：從這幾天的反應看，美國人很怕我們不僅要登陸金門、馬祖，而且準備解放台灣。其實，我們向金門打了幾萬發炮彈，是火力偵察。我們不說一定登陸金門，也不說不登陸。我們相機行事，慎之又慎，三思而行。因為登陸金門不是一件小事，而是關係重大。問題不在於那裏有九萬五千蔣軍，這個好辦，而在於美國政府的態度。美國同國民黨訂了共同防禦條約，防禦範圍是否包括金門、馬祖在內，沒有明確規定。美國人是否把這兩個包袱也背上，還得觀察。打炮的主要目的不是要偵察蔣軍的防禦，而是偵察美國人的決心，考驗美國人的決心。毛還說：我們宣傳上目前暫不直接聯繫金門打炮。現在要養精蓄銳，引而不發。[18]現在，美國軍艦的出動，正好為這種考驗提供了機會。經過反復考慮，9月8日，毛澤東命令福建前線炮兵，待美、蔣船隊再次接近金門時即開炮轟擊。但「只打蔣艦，不打美艦」，美艦開火時沒有命令不許還擊。[19]

當日，美國第七艦隊旗艦重巡洋艦「海倫娜」率六艘驅逐艦的混合艦隊，護送國民黨運輸船隊向金門料羅灣碼頭實施補給。當美、蔣船隻混合編隊接近金門時，人民解放軍前線炮兵部隊以四十三個炮兵營組成的炮群猛烈開火，當即擊沉國民黨軍的登陸艦「美樂」號，其餘國民黨軍艦只慌忙逃走。出乎前線指揮員意料的是，美國軍艦一炮未發，在旗艦指揮下急忙來了一個180度的大轉彎，撤到距金門五至十二海里遠的海域中徘徊觀望。

9月9日，杜勒斯公開發表聲明，宣布「美國決定使護航的美艦保持在沿海島嶼三海里之外」，進一步表明了美國的態度。9月11日，四艘美國軍艦再次掩護國民黨軍的四艘運輸艦、七艘作戰艦向金門駛來。周

恩來親自部署此次炮擊行動。上午11時以後，美、蔣混合編隊侵入金門海域的中國領海。前線解放軍炮兵按照周恩來的命令，從14時57分起，以四十個地面炮兵營又六個海岸炮兵連的強大火力，射擊駛近料羅灣的國民黨軍運輸艦和金門島上的目標。國民黨軍的運輸艦吸取了前次的教訓，不再等待美艦的掩護，一遭打擊急忙向外海逃走。美國軍艦則同前次一樣，仍一炮未發，馬上退向外海。

這兩次炮擊，使中國政府摸清了美國的戰略意圖和美台《共同防禦條約》的底盤，認識到美國是在確保其既得利益的前提下對社會主義國家在戰略上取守勢。同時毛澤東還認為美國在金門、馬祖問題上實行的是脫身政策。摸清了美國的戰略底盤，這就為確定下一步大政方針提供了依據。

對毛澤東在這場對美、蔣鬥爭策略和分寸的掌握，葉飛回憶說：

> 金門向台灣告急，蔣介石便請求美國軍艦護航。這樣，事情就搞複雜了。怎麼樣對付美國人護航呢？美國的軍艦左右配置，國民黨軍的艦隻夾在中間，而且間隔只有二海里。毛主席下令，「只準打蔣艦，不準打美艦。」要我們避開美艦護航，等蔣艦到港口後才能開炮，還要我們每半小時向北京報告一次。這個指示可難執行了，不好掌握。我們又請示一個問題；如果護航的美艦向我們開炮怎麼辦？毛主席馬上答覆，「如果美艦開炮，不準還炮。」我怕是電話裏沒有傳清楚，又重複問了三遍，答覆是「不準還擊」。於是，我向各炮群下達主席的命令。
>
> 這個時候，蔣艦已進至港口卸貨，再不打不行了。我馬上請示北京，才下令開炮。我們一頓密集的炮擊，一下子擊沉了一艘蔣艦。我們的炮聲一響，美艦不但沒有還擊，反而調轉頭就跑，大出洋相！美艦一跑，蔣艦孤孤單單的，完全暴露在我炮火之下，向台灣告急。台灣方面問：朋友呢？蔣艦說：甚麼朋友不朋友，早就逃跑了，他們互相指責，罵美國人混蛋。
>
> 事後我才明白，毛主席這個動作很高明。主席的意圖是要摸美國人的底。美國人表面上氣勢洶洶，究竟敢不敢和我們打？原來美國是只紙老虎，一打起來就跑了。金門炮戰，是我們與美國互相摸底的一出戲，一出很緊張很有意思的戲。[20]

台灣方面對美國在固守金門、馬祖的支持的有限性，美國的護航艦隻不肯進入金門周圍三海里水域，拒絕台灣要求美空軍參戰，表現出極大的不滿。9月8日，蔣介石接見美駐台大使莊萊德（Eveott F, Drumwright），對美國政策抱怨不已，蔣對莊萊德說，與中共談判不會有任何結果，中共會利用談判，尋找機會對台灣發起進攻；台灣公眾很難理解美國的立場。[21]這時，美國政府則處於兩難境地。一方面認為，「如果僅僅從軍事角度出發，應該撤離沿海諸島」，這些島嶼是守不住的，而且也未必是防守台灣、澎湖所需要的，至於蔣介石把金門、

馬祖用作反攻大陸的踏腳石，這根本是「不現實的」；另一方面，美國又要在它不承認的中國政府的武力面前「表現出堅定性和勇氣」。[22]9月11日：艾森豪威爾發表關於台灣海峽局勢的電視廣播講話。宣稱，對中國政府「利用武裝部隊征服新地區的長久計劃」，美國決不能姑息，決不會後退。表示美國的武裝部隊「隨時準備保衛不得使用武力來達到侵略目的這一原則」。另一方面又説，用談判解決分歧是比訴諸武力好得多的道路，「這條道路是暢通的和準備好了的」，他不相信「中共領袖會堅決執行軍事侵略的方針」，他「相信不會有任何戰爭」。[23]表示中美之間可以恢復談判。

9月8日、9日兩天，毛澤東召集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彭真、張聞天、黃克誠、王炳南、喬冠華等人，商談中國政府關於緩和台灣海峽地區緊張局勢的方案。中國參加中美會談的首席代表王炳南彙報了此前中美大使級會談的情況。鑑於頭兩年會談美方的僵硬和敷衍態度，決定改變過去由易而難逐步取得諒解的方針，確定「一攬子」解決台灣問題的新方針，即台灣問題不解決，其它問題都談不上。[24]

9月15日，中斷了九個月之久的中美大使級會談復會，會址從日內瓦移到華沙。中國駐波蘭大使王炳南及其助手黃華、賴亞力、姚廣同美國駐波蘭大使比姆（Jacob D. Beam）正式開始討論台灣海峽的局勢。美國大使比姆首先發言提出，中美雙方的共同任務是緩和台灣海峽的緊張局勢，並要求中國停止炮擊，實行所謂「停火」。對此，王炳南予以反駁，説他無權代表台海當局講話，重申了解放台灣、澎湖列島和金門、馬祖是中國內政，要求美國方面從台灣撤軍。[25]

9月17日，周恩來致電在外地視察的毛澤東，提出中美會談的政策建議。周認為：

> 我們應該採取積極進攻的方針，先以針鋒相對的策略壓倒對方，才有可能接觸到具體問題。估計美方在第二次會談上仍會在停火問題上與我方繼續糾纏，以配合美在聯合國大會中的行動……。為針對這一極大可能，我方擬在第二次會議上提出要求美國從台灣、澎湖列島和台灣海峽撤出它的一切武裝力量，停止向中國領海、領空的一切軍事挑釁和干涉中國內政的行為，以和緩和消除目前台灣海峽地區的緊張局勢的反建議，並説明這是解除對和平威脅的迫切前提。關於停火和撤軍的鬥爭，估計會進行幾個回合，在三四次會議後，可以看出美方究竟有無意思要蔣軍從沿海島嶼撤走，同時聯大是否要討論台灣海峽局勢問題也可判明，到時看情況再考慮我方提案是否公布。[26]

隨後，周恩來在同陳雲、彭真、張聞天、廖承志以及外交部副部長章漢夫等商議後，於18日再電毛澤東，提出了「從各方面擴大要求美軍停止挑釁和從台灣海峽撤退」的外交活動的具體辦法。[27]

毛澤東完全贊同周恩來的建議。9月19日，毛極其興奮地致信周恩

來説：「18日夜來信收到，極好，有了主動了，讀完後很高興，即照辦。我們這種新方針、新策略、是主動的、攻勢的和有理的，高屋建瓴，勢如破竹，是我們外交鬥爭的必需形態。」[28]

中國大使根據國內的指示，在會談中以十分鮮明的立場，堅決拒絕在中美會談中討論「停火」問題。

22日，周恩來致信毛澤東，請示沿海軍事鬥爭方針。周提出：「在目前形勢下對金門作戰方針，仍以打而不登，斷而不死，使敵晝夜驚慌，不得安寧為妥。」當日，毛澤東覆電表示完全同意，認為周「對金門作戰方針問題上的批語是很對的，即照此辦理，使我們完全立於不敗之地，完全立於主動地位」。[29]

這時，台灣海峽的形勢既未趨緩，也未升級。美國政府則想利用華沙談判壓中國同意停止對金門的炮擊；同時壓蔣介石不得自行其是。而蔣介石則一心想使台灣海峽地區軍事行動升級，以便導致美國同意協防沿海諸島，支持他對大陸進行報復。為此，蔣介石親自出面製造輿論，他頻頻接見美國記者，作公開表態，要脅美國。9月17日，蔣説，中共對金門的進攻是進攻台灣的序幕，「無金、馬就無台、澎」，「到了最後生死存亡關頭，除了採取行使自衛權之緊急行動，即有效的報復行動，無法繼續撐持時，美國為了人道，為了正義，以及為了遏阻侵略，保衛世界和平安全所負的責任。我不相信它會妨礙我們採取這一緊急性的自衛報復行動」。9月29日，蔣又在記者招待會上反復表示，反對中美大使級談判。並稱，「金門戰事在任何情勢之下，才是我們的生死關頭，……今天不能預為確定。如果到了這個時機，需要我們採取緊急行動，我相信盟邦必須繼續以條約的精神支持我們遏阻共匪侵略之目的，必不致中途後退。而我們在緊急狀態中，亦不容為了考慮盟邦態度如何，而瞻顧徘徊。」[30]這就是説，必要時，他將顧不得條約的約束，而將自行其是了。

蔣介石的一再公開表態，美國也只得公開闡述自己的立場了。9月30日，杜勒斯在記者招待會上被問到美國是否期待國民黨人返回大陸時，杜稱：「那純粹是一種假設。」記者又問國民黨軍隊是否應該撤離金門？杜説，在攻擊面前撤退是不明智的，那會對其他國家產生不良影響，影響士氣。但如果有某種停火，就可以撤軍，「把如此眾多的部隊部署在這些島上是不明智的，我們認為把這些部隊保持在那裏是相當愚蠢的……是既不明智又不謹慎的。」[31]10月1日，艾森豪威爾在記者招待會上也説：我們認為基本的問題是避免在武力面前退卻，在解決國際社會中的這些問題時不訴諸武力。如果我們不忠實於這個原則，那麼最後我們是會吃苦頭的。但他同時認為，國民黨把大量軍隊駐紮在沿海島嶼上並不是一件好事情。[32]杜勒斯和艾森豪威爾的講話，標誌着美國對金門、馬祖的政策從「協防」，轉為「脫身」，目的是以放棄金門、

馬祖換取長期佔據台灣的合法地位。美國一方面勸説蔣介石以撤退金門、馬祖換取台灣、澎湖的苟安，一面想與中共做筆交易，以放棄金門、馬祖取得中共不對台灣使用武力的承諾。

杜勒斯的表態令台灣當局極度惱怒。10月1日，蔣介石在高雄對美聯社記者發表談話，與杜勒斯針鋒相對。蔣表示：他反對削減在沿海島嶼的武裝部隊或是沿海島嶼的地位有任何改變。並稱這「也就是在保障美國在遠東的防務」。蔣強調説：「就假定杜勒斯先生説過據説是他説過的話，這也只是單方面的聲明，因此我的政府沒有任何義務來遵守它。」[33]顯然，蔣介石已忍無可忍，雙方矛盾進一步擴大並公開化。

3.毛澤東的策略：「聯蔣抗美」

9月30日和10月1日，杜勒斯與艾森豪威爾的講話和美蔣矛盾的公開化，引起中國領導人的密切注意。在這種情況下，是先收復金門、馬祖，「聯美壓蔣」？還是把金門、馬祖留在蔣介石手中，「聯蔣抗美」？就有必要重作權衡。

毛澤東最初確有希望美國能夠像三年前逼迫蔣介石從大陳島撤軍那樣，再度逼蔣介石讓駐守金、馬的國民黨軍「這十一萬人走路」。[34]這時，毛澤東決定改變原來方案，暫不解決金門、馬祖問題。毛在分析杜勒斯的談話時指出：「把金門、馬祖讓給我們是杜勒斯的方針，他想以撤出金門、馬祖交換我們不收復台灣以及澎湖列島。」如果因為奪取金、馬而使台灣遠離了中國大陸，便應了美國的圖謀，那將是一件得不償失的事情。毛轉而強調：

> 我們跟蔣介石有共同點：第一是蔣不願撤出金馬，我讓金馬留在蔣手中有利於就近保持接觸，要打就打，要停就停，對美一緊一松，主動權在我。第二是蔣介石要死守台灣，我們在一個相當時期內不打算也不可能解放台灣。第三是我在蔣介石同美國人的鬥爭中保持「中立」，讓蔣介石跟美國人鬥，實際上是支持蔣介石跟美國人鬥。美國想霸佔台灣，逼蔣介石完全成為美國的附庸。蔣介石和蔣經國都還有一點反美的積極性。

此外，鑑於「最近臺北發生蔣介石策動人打砸美國大使館的事情。這些跡象表明，我們和蔣介石是有共同點的，是可以在一定程度和一定範圍內聯合反美，不讓美國完全霸佔台灣。」[35]

早在1958年9月4日，杜勒斯公開威脅要把美國在台灣海峽的「協防」範圍擴大到金門、馬祖之後。9月5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五次會議的講話中，就明確提出了被稱為「絞索政策」的對美戰略。毛説：

> 美國現在在我們这裏來了個「大包乾」制度，索性把金門、

馬祖，還有些甚麼大擔島、二擔島、東碇島一切包過去，我看它就舒服了。它上了我們的絞索，美國的頸吊在我們中國的鐵的絞索上面。台灣也是個絞索，不過要隔得遠一點。它要把金門這一套包括進去，那它的頭更接近我們，我們哪一天踢它一腳，它走不掉，因為它被一根索子絞住了。[36]

10月3日、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舉行會議，討論台灣海峽形勢。

周恩來發言指出，杜勒斯的談話，表明美國想趁此機會製造「兩個中國」，要我們承擔不用武力解放台灣的義務。以此為條件，美國可能要台灣放棄所謂「反攻大陸」的計劃，並從金門、馬祖撤退。杜勒斯這個政策。一句話就是以金、馬換台、澎，這同我們最近在華沙中美大使級會談中偵察美方底牌的情況是一致的。美方在會談中說的甚至比杜勒斯更露骨。

劉少奇和鄧小平都認為中美雙方都在摸底，現在雙方都比較瞭解對方的意圖了。

毛澤東說，偵察任務已經完成，問題是下一步棋怎麼走。可以設想，讓金門、馬祖留在蔣介石手裏如何？這樣做的好處是金門、馬祖離大陸很近，我們可以通過这裏同國民黨保持接觸，甚麼時侯需要就甚麼時候打炮，甚麼時候需要緊張一點就把絞索拉緊一點，甚麼時候需要緩和一下就把絞索放鬆一下，可以作為對付美國人的一個手段。

與會者同意毛澤東提出的「聯蔣抗美」的新方針。讓蔣軍繼續留在金、馬，使美國當局背上這個包袱。

最後，毛說，方針已定，還是打而不登，斷而不死，讓蔣軍留在金門、馬祖。但打也不是天天打，更不是每次都打幾萬發炮彈，可以打打停停，一時大打，一時小打，一天只零零落落地打幾百發。但我們在宣傳上仍要大張旗鼓，堅持台灣問題是中國內政，向金、馬打炮是中國內戰的繼續，任何外國和國際組織都不能干涉；美國在台灣駐紮陸、空軍是侵犯中國領土、主權，美艦雲集台灣海峽是蓄意製造緊張局勢，都必須完全撇退；反對美國製造「兩個中國」，反對美國霸佔台灣合法化。我們和蔣介石通過談判解決金、馬以至台、澎問題。[37]

稍後，毛澤東會見在香港定居的新加坡《南洋商報》撰稿人曹聚仁，作陪的有周恩來、李濟探、張治中、程潛、章士釗。毛澤東向曹明確闡明了對美對台的基本方針。

毛說：「只要蔣氏父子能抵制美國，我們可以同他合作。我們贊成蔣介石保住金、馬的方針。如蔣撤退金、馬，大勢已去，人心動搖，很可能垮。只要不同美國搞在一起，台、澎、金、馬都可由蔣管，可管多少年，但要通航，不要來大陸搞特務活動。台、澎、金、馬要整個回來。」

「我們的方針是孤立美國。他只有走路一條，不走只有被動。要告訴台灣，我們在華沙根本不談台灣問題，只談要美國人走路。蔣不要怕我們同美國人一起整他。」

「他們同美國的連理枝解散，同大陸連起來，枝連起來，根還是你的，可以活下去，可以搞你的一套。」

章士釗插話說：「這樣，美援會斷絕。」

毛說：「我們全部供應。他的軍隊可以保存，我不壓迫他裁兵，不要他簡政，讓他搞三民主義，反共在他那裏反，但不要派飛機、派特務來搗亂。他不來白色特務，我也不去紅色特務。」

曹聚仁問：「台灣有人問生活方式怎樣」

毛說：「照他們自己的生活方式。」[38]

周恩來還說：「美國企圖以金門、馬祖換台灣、澎湖，我們根本不同它談。台灣抗美就是立功。希望台灣的小三角（指蔣介石、陳誠、蔣經國）團結起來，最好是一個當總統，一個當行政院長，一個將來當副院長。」[39]

後來，毛澤東向各民主黨派負責人解釋說，開始我們想打金門、馬祖，後來一看形勢，金門、馬祖收回就執行了杜勒斯的政治路線，還是留在蔣介石手上好。要解決，台、澎、金、馬一起解決，中國之大，何必急於搞金門、馬祖？[40]10月5日和14日，周恩來兩次會見蘇聯駐華臨時代辦安東諾夫（S.F.Antonov），說明中國政府從原來準備分「兩步走」到台、澎、金、馬「一攬子解決」的目的是，「不能讓美（國）換來一個凍結台灣海峽的局面」。周說：「我們這一方針簡單講來就是要使台、澎、金、馬仍留在蔣手裏，不使之完全落到美國手裏。」因為蔣介石也不贊成美國的做法，一方面是怕影響蔣軍的士氣，另一方面也不願意完全受美國控制。「因此，在這個問題上，我們和蔣找到了共同點，可以聯合起來，一致反對美國。」[41]

毛澤東調整對金門、馬祖的方針，有多重戰略策略的考慮。首先，挫敗美國製造「兩個中國」，進而把台灣變成美國永久殖民地的陰謀。台灣留在蔣介石手中，強於完全落入美國之手，如果逼蔣撤退金門、馬祖，他就很難保住在台、澎的地位。周恩來講，清朝統治階級的方針是「寧予外人，不給家奴」，我們則是「寧予家奴，不給外人」。[42]其次，把金門、馬祖留在蔣介石手裏可以拖住美國。[43]毛澤東認為，美國在台灣及世界各地的一切軍事基地和軍事干涉，都是套在美國脖子上的絞索。美國停留愈久，絞索愈緊。台灣是一根絞索，但離得太遠，把美國拖在金門、馬祖，絞索可以隨時抓在中國手裏。有利於與美國的談判和鬥爭。其三，金門、馬祖留在蔣介石手裏，必然加深美蔣之間的矛盾，這將激發蔣介石的民族性，也保留了一個大陸同台灣對話和接觸的

形式。逼蔣撤退金門、馬祖，雙方完全隔離，既打不着，又談不攏，不利於統一進程。[44]

既然要向蔣介石國民黨示以善意，大規模懲罰性的炮擊自然就不再需要了。10月5日8時，毛澤東下令福建前線部隊：「不管有無美機美艦護航，10月6、7兩日，我軍一炮不發；敵方向我炮擊，我也一炮不還。偃旗息鼓，觀察兩天，再作道理。」[45]中央軍委根據毛澤東的意圖，做出了「打而不登，封而不死」的具體部署。

為向國民黨明確傳遞「聯蔣抗美」的資訊，加深台美之間的矛盾。10月6日，《人民日報》發表由毛澤東起草、以國防部長彭德懷名義發布的《告台灣同胞書》。文告説：「我們都是中國人。三十六計，和為上計。……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沒有兩個中國。這一點，也是你們同意的。」「美國人總有一天肯定要拋棄你們的。」「杜勒斯9月30日的談話，端倪已見。」台灣問題應由國共兩黨「舉行談判，實行和平解決」。文告宣布從6日起，停止炮擊一周，讓台灣充分自由地輸送供應品，條件是美國不得護航，如果護航，立即開炮。10月13日，彭德懷下令再停止炮擊兩周，條件依舊。中國對金門島的猛烈炮擊和封鎖，戛然而止，外界摸不着頭腦。美國人樂意把中國的舉助與杜勒斯的聲明聯繫起來。殊不知，毛澤東的方針與杜勒斯的想法正相對立。

正如毛澤東、周恩來所料，中國每次提出暫停炮擊，都造成了美蔣關係的新波折。第一次停火的當天，美國國務院就聲明暗示停止護航，蔣介石急忙發表談話，意在拖住美國。10月8日，美不顧蔣的請求，宣布暫停護航。[46]10月14日，中國決定再停火兩周的第二天，杜勒斯召見台「外交部長」葉公超，要求葉公超「巧妙地向蔣介石提出撤出沿海島嶼的問題」。10月13日，美國防部長麥肯羅依（Neil H. McElroy）在台勸説蔣介石撤退，未果。[47]10月18日，蔣介石對《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記者發表談話，反復強調沿海島嶼的重要性。蔣甚至説：「我們希望再次強調金門作為整個西太平洋美國陣地的屏障的重要性。必須守住金門、馬祖和其它沿海島嶼，因為它們是保衛台灣海峽和西太平洋必不可少的。如果金門失守，第七艦隊和中國共產黨軍隊將立即有發生衝突的危險。現在應該由美國人民來判斷保持沿海島嶼是否合乎他們的最大利益。」[48]

10月21日，杜勒斯親自出馬，飛赴台灣與蔣介石會談，目的是要蔣介石同意放棄以武力進攻大陸，並「從沿海島嶼撤出幾乎所有的守衛部隊」，而美國則給蔣一些登陸裝備，一旦今後條件具備，蔣仍可以有反攻大陸的能力，這樣可以避免使美國捲入與中國的直接軍事衝突。[49]

中國政府洞悉杜勒斯台灣之行的目的，是壓蔣介石從金、馬撤軍，製造「兩個中國」。因此，當杜勒斯飛赴台灣之時，下令恢復對金門的炮擊和封鎖，以為蔣介石討價還價、拒絕撤退增加砝碼。在21日到23日

的三次蔣、杜會談中，蔣介石拒絕接受杜勒斯提出的從沿海島嶼撤軍的建議，表示原則上同意削減沿海島嶼的駐軍，換取美國提高島上駐軍武器裝備的水準。在美國的壓力下，蔣介石同意在《聯合公報》中宣布放棄以武力重返大陸的承諾。10月23日，雙方發表了〈聯合公報〉。[50]

毛澤東在10月22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説，美國人力圖把蔣介石的「中華民國」變成附屬國甚至託管地。蔣介石拚死保持自己的半獨立性，這就發生了矛盾。「這次杜勒斯同蔣介石吵了一頓，説明我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聯蔣抗美。我們暫不解放台灣，可以使蔣介石放心同美國鬧獨立性。我們不登陸金門，但又不答應美國人所謂的『停火』，這更可以使美蔣吵起架來，過去一個月，我們的方針是打而不登，斷而不死。現在仍然是打而不登，斷而不死更可以寬一些，以利於支持蔣介石抗美」。根據毛澤東的提議，會議確定了「單日打炮，雙日不打」的方針。[51]彭德懷名義發表了《再告台灣同胞書》。文告要台灣當局劃清內戰與外侮的界線，一致對外，並稱：一切愛國者都有出路，不要怕甚麼帝國主義。文告宣布：「我們兩黨間的事情很好辦。我已命令福建前線，逢雙日不打金門的飛機場、料羅灣的碼頭、海灘和船隻，使大金門、小金門、大擔、二擔大小島嶼上的軍民同胞都得到充分的供應，包括糧食、蔬菜、食油、燃料和軍事裝備在內，以利你們長期固守。如有不足，只要你們開口，我們可以供應，化敵為友，此其時矣。」[52]六天之後，10月31日，中央軍委又進一步決定：「今後逢雙日對任何目標一律不打炮，使國民黨軍人員能走出工事自由活動，曬曬太陽，以利其長期固守；逢單日略為打一點炮，炮彈一般不超過二百發。」[53]從此，福建前線出現了逢單日打，雙日不打的戲劇性場面。中國的意圖，與其説主要對蔣，不如説主要對美，打是為了給蔣介石一個拒絕撤退的理由，不打是為了使蔣軍獲得補給的時間，使其能堅持下去，而且炮擊只打沙灘，不打民房與工事。

經過1958年炮擊金門，中國領導人摸清了美國人和蔣介石的底牌和他們之間的分歧，對台灣及沿海島嶼的政策也就更加明晰和成熟，這就是把金門、馬祖留在蔣介石手中，作為連接台灣和大陸的紐帶，以此反對美國隔離台灣，「劃峽而治」，製造「兩個中國」的企圖；繼續推動和平統一台灣的進程，待將來時機成熟，將台，澎、金、馬一攬子解決。在行動上放鬆了對沿海島嶼的壓力。人民解放軍的海上部署收縮到舟山基地至羅源灣一帶，空軍的活動也限制在大陸邊緣，台灣海峽局勢相對平靜，間或的打炮成為例行公事。1959年1月9日，中央軍委指示：「今後逢單日不一定都打炮」。[54]標誌着金門炮戰事實上宣告結束。

經過這次危機，蔣介石逐漸明白了大陸的意圖，他的「反共複國」政策也發生了微妙變化。雖然在公開場合，台灣當局否認台灣放棄了「反攻大陸」的口號，但重點已由「政治反攻」代替軍事冒險。1958年

12月23日，蔣介石在「光復大陸設計委員會」上講，「反攻」計劃，「主義為主，武力為從」。1959年1月1日，蔣介石的元旦講話公開宣稱：「反攻複國的戰略，始終是以政治為主，以軍事為從。」台灣當局的政策重點由軍事備戰轉向經營和建設台灣。[55]

自1961年12月起，中央軍委又通知福建前線，停止實彈射擊，只打宣傳彈。隨後，國民黨軍基本上也照此辦理。國共之間這種象徵性的炮擊一直持續到1978年底。1979年1月，因中美建交，美軍撤出台灣，台灣海峽兩岸中國人之間的問題更便於和平解決。同年1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宣布：爭取祖國和平統一的大政方針。同日，國防部長徐向前也發表聲明，停止對金門等沿海國民黨軍所占島實行炮擊。以金門炮擊為標誌的國共之間象徵性戰爭，至此完全結束。

[1] 《中美關係史（1949-1972）》，頁254。

[2] 餘雁：《五十年國事紀要·軍事卷》，頁303；《毛澤東傳（1949-1976）》，上冊，頁858。

[3] 餘雁：《五十年國事紀要·軍事卷》，頁306。

[4] 餘雁：《五十年國事紀要·軍事卷》，頁307、308。

[5] 吳冷西：《憶毛主席》，頁74。

[6] 毛澤東：《在第十五次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1958年9月5日），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七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頁386。

[7] 《戰後美國外交史：從杜魯門到雷根》，上冊，頁303說：美國在台灣海峽集結了七艘航空母艦。王炳南：《中美會談九年回顧》，頁69說：美國那時共有十二條航空母艦，在台灣海峽就集結了六條。

[8] 《中美關係史（1949-1972）》，頁257-258。

[9] 《中美關係史（1949-1972）》，頁258。

[10] 《中美關係史（1949-1972）》，頁259。

[11] 戴超武：《敵對與危機的年代：1954-1958年的中美開系》（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頁382-383。

[12] 艾森豪威爾（Dwigbt D. Eisenhower）著，靜海譯：《締造和平》（北京：三聯書店，1977），頁329。

[13] 參見沈志華：〈1958年炮擊金門前中國是否告知蘇聯？——兼談冷戰史研究中史料的解讀與利用〉，《中共黨史研究》，2004年第3期。

[14]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卷，頁166。

[15] 《人民日報》，1958年9月16日。

[16]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七冊，頁413。

[17] 餘雁：《五十年國事紀要·軍事卷》，頁315。

[18] 吳冷西：《憶毛主席》，頁76、77。當時，解放軍高層領導人員並不完全瞭解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的作戰意圖。8月27日起，解放軍總政治部用福建前線指揮所的名義，連續播發了一篇廣播稿，敦促防守金門的國民黨軍官兵放下武器，其中提到「對金門的登陸進攻已經迫在眉睫」，引起外電的關注。9月1日前後、毛澤東從外電報導中得知這一情況，嚴厲批評這是違反集中統一原則。毛責成中央軍委起草〈對台灣和沿海蔣占島嶼軍事鬥爭的指示〉稿，9月3日經他審閱修改複下發。指示指出：「台灣和沿海蔣占島嶼是目前國際階級鬥爭中最嚴重最複雜的焦點之一。」「解放台海和沿海蔣占島嶼雖然屬於我國內政問題，但實際上已變成一種複雜嚴重的國際鬥爭，我們不要把這個鬥爭簡單化，而要把它看作是包括軍事、政治、外交、經濟、宣傳的錯綜複雜的鬥爭。台灣和沿海蔣占島嶼問題的全部，徹底解決，不是短時間的事，而是一種持久的鬥爭，我們必須有長期的打算。」指示對沿海鬥爭方針作了四條規定：一、繼續炮擊金門，但目前不宜進行登陸作戰。二、炮擊封鎖金門的活動，必須有節奏，打打看看，看看打打。三、海軍、空軍不得進入公海作戰。蔣機不轟炸大陸，我也不轟炸金、馬；蔣軍轟炸大陸，我轟炸金、馬，但不轟炸台灣。四、我軍不準主動攻擊美軍。如果美軍侵入我領海、領空，我必須堅決打擊。指示還指出：一切重要行動和宣傳（文告、談話、口號、社論、新聞、廣播）都必須遵守集中統一的原則，不得自作主張。參見王焰主編：《彭德懷年譜》（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頁698；鄭文翰等：《秘書日記裏的彭老總》（北京：軍事科學出版

社，1998），頁336、337。

[19] 葉飛：《葉飛回憶錄》，頁660。

[20] 《毛澤東傳（1949-1976）》，上冊，頁860-861。

[21] 《中美開系史（1949-1972）》，頁265。

[22] 《中美關係史（1949-1972）》，頁265。

[23] 《中美關係史（1949-1972）》，頁266。

[24] 王炳南：《中美會談九年回顧》，頁71。

[25] 王炳南：《中美會談九年回顧》，頁76-77。

[26] 毛澤東於9月10日離開北京，到外地視察「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情況，把台灣海峽的鬥爭委託周恩來等人處理。《周恩來軍事活動紀事（1918-1975）》，下卷，頁462-463。

[27]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卷，頁171。

[28] 《毛譚東外交文選》，頁353。

[29]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卷，頁173。

[30] 《中美關係史（1949-1971）》，頁268。

[31] 《中美關係史（1949-1972）》，頁268-269。

[32] 戴超武：《敵對與危機的年代》，頁419。

[33] 《中美關係資料彙編》，第二輯，頁2824-2826。

[34] 毛澤東：〈在第十五次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1958年9月8日），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七冊，頁398。

[35] 吳冷西：《十年論戰》，頁184-190。

[36]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七冊，頁384。

[37]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卷，頁177-178。

[38] 毛澤東同曹聚仁談話紀要，1958年10月13日。載《毛澤東傳（1949-1976）》，上冊，頁880-881。據《周恩來軍事活動紀事（1918-1975）》記載，在毛澤東接見曹聚仁之前，9月8日，周恩來曾接見曹，向曹指出，美國目前是虛張聲勢，到了戰爭邊緣又害怕了，美國的軍事力量也是有限的。周進一步向曹闡明，金門、馬祖的蔣軍有三條路可走：一是與島共存亡；二是全師而還，好處是金、馬駐軍占國民黨軍隊三分之一，可以作為蔣介石對美國講話的資本；三是美國逼蔣軍撤退，這條路是不光彩的。10日，周再次接見曹，托曹返港後以最快的辦法轉告台方，為了寬大並給予蔣介石面子，「我們準備以七天的期限，準其在此期間由蔣軍船隻運送糧食，彈藥和藥品至金門、馬祖。但前提條件是決不能由美國飛機和軍艦護航，否則我們一定要向蔣軍船隻開炮。周強調，即使發生所謂局部戰爭，但只要打起仗來，就不可能準確的局限於沿海的炮兵陣地，屆時戰爭可能擴大。無論如何，受損失的首先都是台灣。內政問題應該自己來談判解決，台灣應該大膽一些，美國可以公開同我們談，為什麼國共兩黨不能再來一次公開談判呢?」《周恩來軍事活動紀事（1918-19751）》，下卷，頁461-462。毛澤東10月13日的這次談話，更是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基本方針的具體化。後來，周恩來把它概括為「一綱四目」，1963年初通過張治中致陳誠的信轉達給台海當局。「一綱」是：只要台灣歸回祖國，其它一切問題悉尊重總裁（指蔣介石）與兄意見妥善處理。「四目」包括：台灣歸回祖國後，除外交必須統一於中央外，所有軍政大權人事安排等悉由總裁與兄全權處理；所有軍政及建設費用，不足之數，悉由中央撥付；台灣之社會改革，可以從緩，必待條件成熟，並尊重總裁與兄意見協商決定，然後進行；雙方互約不派人進行破壞對方團結之事。張治中給陳誠的信，1963年1月4日。載《毛澤東傳（1949-1976）》，上冊，頁881。

[39]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卷，頁181。

[40] 毛澤東在民主黨派負責人座談會上的講話記錄，1958年9月15日。載《毛澤東傳（1949-1976）》，上冊，頁878-879。

[41] 周恩來會見蘇聯駐華大使館代辦安東諾夫談話記錄，1958年10月14日。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金沖及主編：《周恩來傳（1949-1976）》（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頁1432。

[42] 《周恩來傳（1949-1976）》，頁1432。

[43] 1958年9月5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五次會議的講話提出了著名的「絞索政策」。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七冊，頁384。

[44] 《毛澤東（1949-1976）》，上冊，頁865-866，878-879。

[45] 毛澤東給彭德懷，黃克誠的信，手稿，1958年10月5日。轉引自《毛澤東傳（1949-1976），上冊，頁875。》

[46] 《中美關係資料彙編》，第二輯，頁2844-2845。

[47] 《中美關係史（1949-1972），頁273。》

[48] 戴超武：《敵對與危機的年代》，頁461-462。

[49] 戴超武：《敵對與危機的年代》，頁464-468。

[50] 戴超武：《敵對與危機的年代》，頁469-470。

[51] 吳冷西：《億毛主席》，頁88-89。
[52] 《人民日報》，1958年10月26日。
[53] 餘雁：《五十年國事紀要·軍事卷》，頁326。
[54] 《當代中國軍隊的軍事工作》，上冊，頁417。
[55] 蕭冬連：《五十年國事紀要·外交卷》，頁172。

四、1958年後的中美大使級會談

1.「支應差事」式的談判

對恢復中美大使級會談，中國政府十分重視。毛澤東親自向王炳南交待會談中應該注意的事項。毛説，在同美國人的會談中，你要多用一種勸説的方法，譬如説，你們美國是一個大國，我們中國也不小，你們何必為了僅僅不到一千萬人口的台灣島嶼和六億中國人民為敵呢？你們現在的做法究竟對美國有甚麼好處呢？毛還説，在會談中要多用腦子，謙虛謹慎，説話時不要對美國人使用像板門店談判那樣過分刺激的語言，不要傷害美國民族的感情。中國人民和美國人民都是偉大的民族，應該和好。[1]在會談中，美國駐波蘭大使比姆與其前任詹森一樣，也從不使用惡語攻擊。只是由於美國政府毫無誠意，不願談涉及台灣的實質問題。因此，從1958年9月15日中美大使級會談在波蘭華沙恢愎以後，一直了無進展。會談成了「支應差事，流於形式的東西」。

王炳南回憶説：華沙會談開始一段時期後，美國對台灣的態度依舊，沒有任何鬆動的跡象，因而會談又陷入程式化。我每次發言的開場白都要重申中國政府對台灣問題的立場，美國若不放棄在台灣問題上干涉中國內政的做法，中美之間不可能解決其它問題。[2]

這時，杜勒斯精心設計了一個《聲明草案》，由美方大使比姆在9月30日第七十八次會議上提出。《聲明草案》開頭用一種平行的格式説明中、美各自對台灣問題的看法，並寫上蘇聯支持中國，接着説，中國政府應停止對金門、馬祖的軍事活動等等。顯然，這個《聲明草案》沒有甚麼新的內容，只是換一種形式掩蓋美國繼續侵犯中國主權和在台灣海峽進行軍事活動的煙幕。因而，為中方斷然拒絕。

在10月25日《再告台灣同胞書》宣告：「雙日不打單日打」以後，有一次正值雙日會談。比姆對此非常高興，他表示希望永遠停止炮擊。王炳南指出，打炮不打炮是中方單方面行動，與中美會談無關。會談應該討論美國永遠全面地從台灣撤軍。

1959年底，堅持與中國政府頑固作對，始終不願在對華政策上有所改變的杜勒斯離任，新任國務卿赫脫（Christian A.Herter）仍繼承了杜勒斯的一套，並沒有給會談帶來甚麼起色。1960年3月，以羅馬天主教主教身份在華進行間諜活動的美國人華理杜，被中國司法機關逮捕並判處死刑。在3月22日的會談中，中方將華理杜在華進行間諜活動，企圖顛覆中國政府的事實，及中國司法機關的判決通知美方比姆大使。比姆感到驚訝並提出抗議。王炳南嚴正指出，華理杜所犯罪行嚴重，證據確

鑿，無可抵賴，有權提出抗議的是中國，而不是美國。此後，美國在中國的罪犯問題，就成為每次會談美方緊緊抓住不放的問題，無理要求中國政府釋放這批罪犯，遭到中方理所當然的回絕。

2.王炳南總結百次會談

1960年9月6日，是從1955年8月1日在日內瓦舉行第一次中美會談以來的第一百次會談。為讓世人瞭解中美會談所以停滯不前的真相，並推動今後會談的進展。中方大使王炳南在會上作一個總結性的發言。

王炳南指出，在五年以來的百次會談中，中國方面始終本着通過談判解決爭端的態度來和美方進行會談，而美國方面毫無解決爭端的誠意，並且還在繼續擴大和加劇台灣地區的緊張局勢。

王回顧説，中美會談在進入第二項議程，即雙方有爭執的其它實際問題以來，情況是不能令人滿意的。中國方面一直採取積極態度，作了不斷的努力，先後提出了十個合情合理的方案，以謀求和緩台灣地區緊張局勢和改善中美關係的途徑，可是美國方面採取截然相反的態度。美國一方面曲解關於雙方平民回國問題的協定，硬要把協定運用於所有在中國犯有嚴重罪行的美國犯人，要求無條件釋放這些犯人，這是無理的，是對中國內政的干涉；另一方面，美國政府卻又違反平民回國的協議，阻撓在美國的中國人回國。

針對美國拒絕對中國放棄使用武力，不肯從台灣和台灣海峽地區撤出一切武裝力量的現實。王鄭重指出，和緩和消除台灣地區緊張局勢，是中美會談的關鍵，是考驗有無談判誠意的試金石。你們美國政府為了永久霸佔台灣，甚至把台灣蔣介石政權説成是中國的「合法政府」，並硬説美軍侵佔台灣是根據同蔣介石集團的所謂「條約義務」。這種旨在製造「兩個中國」，並把台灣變成美國殖民地的陰謀手法，已是世人皆知了。

鑑於會談迄今毫無成果，王炳南指出，中美之間的爭端能否解決，單憑中國一方的努力是不行的，現在是美國重新認真考慮你們對中美會談的態度，特別是認真考慮把美國的一切武裝力量撤出台灣和台灣海峽的時候了，遲考慮不如早考慮，遲走不如早走。早考慮，早走，你們可以早得到解脫。

為打破目前中美關係的僵局，王大使就中美互換記者再次提出一個新方案。王強調説：中國的宗旨是，中美記者互換是為了消除中美兩國人民之間的隔閡，初步改善目前兩國之間又冷又僵的關係，其目的是為了進一步促使兩國根據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和平解決美國武裝部隊從台灣和台灣海峽撤走的問題。[3]

美國大使比姆對王炳南這番慷慨陳詞，表示失望，再次拒絕了中方

提出的新方案。

1960年底，美國舉行大選。肯尼迪（John F.Kennedy）勝選，於1961年1月就任美國總統，繼續在全球推行咄咄逼人的攻勢政策。中國政府雖然不放棄通過中美談判解決兩國爭端的方針，但對於近期內取得成果並不抱希望。在毛澤東和周恩來看來，肯尼迪的民主黨政府的對華政策，與艾森豪威爾的共和黨政府並沒有甚麼不同。然而，中美雙方都有意使會議延續，畢竟在兩國既沒有外交關係，也沒有正式的貿易聯繫和文化聯繫的情況下，中美會談是兩國保持某種接觸，交換一些意見的唯一管道。通過這個有用的管道，可以闡明各自的立場，從而減少錯誤估計和誤解，避免由此造成的危機。1961年9月，比姆奉調回國，出任美國軍備控制和裁軍署副署長新職。美國選派有過在上海當總領事經歷的卡伯特（John M. Cabot）接任駐華沙大使。王炳南的對手又易新人。

3.華沙通道的一次實質性作用

中美華沙會談的通道，發生的一次較為實質性的作用，是1962年中美雙方及時溝通，制止了蔣介石的一次「反攻大陸」的軍事冒險行動。

1962年，中國政府得到情報，蔣介石正在大量購進新式武器，並改裝了飛機，增加裝油量，使之能來往於台灣與大陸。台灣當局還宣布延長服兵役時間，士兵一律不準離開營房，隨時待命，他們的鞋上和皮帶上都刻有「光復大陸」的字樣，據說還從日本大量購買血漿。看來蔣介石準備鋌而走險，要與大陸大幹一場。

蔣介石改變「政治為主，武力為從」的方針，再次決定進行軍事冒險，這與當時美國的動向和大陸的形勢有關。60年代初，隨着國際形勢的變化和美國政府的更迭，美台之間的分歧和矛盾再次突出，「蜜月」時期已經過去。美台關係會朝哪個方向發展，不十分確定。台灣在國際上的地位下降，雖幾經抗爭，蔣介石還是得默認蒙古人民共和國加入聯合國（在他繪製的地圖中，蒙古依然劃歸為中國領土），自己在聯合國的席位根基也不穩，國際上和美國政府搞「兩個中國」和「一中一台」的輿論增多，這是蔣介石絕對不肯接受的。在中國，任何統治者搞分疆裂土，放棄領土完整都會為人民和歷史所唾棄。蔣介石既不願背這種罵名，更不甘心長期孤懸海外。如果接受「獨立台灣國」，不僅重返大陸永遠無望，而且在台灣本島也難有立足之地。在這種情況下，蔣介石希望在台灣海峽製造一些緊張局勢，一則可以拖住美國，二則造成一定聲勢，配合其經濟成就，引起國際社會注目，三則可以試探一下美國對台灣反攻大陸的真實立場。

1959年到1961年中國大陸面臨嚴重經濟困難，也使蔣介石對反攻

大陸成功抱有一定的幻想。自1960年以來，蔣介石就在密切注視着中國大陸發生的饑荒，尋找着機會。1962年夏，中國國內的困難狀況更加突出，在中國政府開放向香港移民的限制之後，從內地流向香港的人員平均每月達數千人之多，問題嚴重到引起聯合國關注的程度。正如周恩來所説：「蔣介石認為目前是進犯大陸的好時機。在外中共與蘇聯不和，在內有嚴重的自然災害，真是千戰難逢，蔣介石是下決心要大幹一場了」。[4]

中國領導人對形勢作了充分的估計和冷靜的分析，一方面，在軍事上積極部署，從全國各地向福建緊急集結部隊，解放軍總參媒部制定了具體作戰方案。同時也認為，雖然蔣介石反攻大陸決心很大，但還存在一些困難，關鍵要看美國的態度，若美國不支持，蔣介石勢單力薄，難成大器。因此，在外交上確定了以美制台的方針。

為了更準確地向美國傳遞資訊，摸準美國政府的態度，周恩來決定利用華沙通道。1962年5月間，周恩來召見回國休假的中方首席談判代表王炳南，指示他要儘快通過會談，找機會瞭解美國的態度。王炳南奉命迅即動身趕回華沙。

美國對台灣海峽再次出現的緊張局勢，也極為關注。1962年3月，蔣介石和蔣經國與美國助理國務卿哈里曼（W. Averell Harriman）、國務院情報司司長希爾斯曼（Roger　Hilsman）談話，竭力鼓吹「大陸人民對共產黨的反抗一觸即發」，希望美國支持他的反攻大陸行動。3月14日，哈里曼訪台歸國後説：「無論共產黨政權是否搖搖欲墜，美國不支持國民政府反攻大陸。」30日，肯尼迪親自出面澄清：關於台灣當局的「反攻大陸」，美台雙方未曾進行磋商。

此時，美國政府對國共雙方的動機和態勢做了一番分析，認為大陸雖有困難，還未達到「一觸即發」，國民黨不可能一舉「統一中國」；如美國捲入其中，勢必陷入與中國的長期戰爭；中國在前線集結兵力，主要在於戒備，不太可能再次主動進攻金門、馬祖；中國對美國的態度有疑問，美國必須設法不使對方對自己的態度產生誤解，應該向中國表明，美國不支持蔣介石反攻大陸，也不會放棄台灣。美國政府指示其會談代表卡伯特於6月27日的中美會談中向王炳南傳遞上述資訊。

不等卡伯特約見，王炳南奉命於6月23日主動約見卡伯特，請卡伯特到王在華沙的官邸喝茶。

在輕鬆的氣氛中，王炳南首先談到東南亞的局勢。説明中國政府對東南亞局勢的發展感到擔心。今年以來，美國增兵越南，出兵泰國，加緊干涉老撾，東南亞局勢已經發展到隨時可能引起大規模國際衝突的邊緣。中國政府的態度一向是克制的，儘管蔣介石殘部參加了老撾內戰，中國的安全正遭受到日益嚴重的威脅，中國仍然沒有放棄和平解決老撾問題，沒有放棄在不干涉有關國家內政的基礎上，使印度支那和整個東

南亞局勢緩和下來。但是，局勢能不能緩和下來，關鍵並不掌握在中國手裏。

接着，王把話鋒一轉，指出，中國政府還要提請美國政府注意台灣海峽的緊張局勢。王炳南強調説，美國政府完全清楚蔣介石集團準備竄犯大陸沿海地區的情況，這種準備工作正是在美國的支持、鼓勵和配合下進行的。自從今年2月以來蔣介石集團就進行了準備竄犯大陸沿海地區的戰爭動員和軍事部署，提前徵集兵員入伍，延長現役士兵服役期限等等，準備渡海登陸。蔣介石集團在美國參與或配合下，進行了頻繁的登陸實戰演習和對大陸沿海地區的偵察活動，為蔣介石準備進犯大陸打氣叫好。美國政府增加了對蔣介石的「軍事援助」和「經濟援助」。美國的如意算盤顯然是，支持和鼓勵蔣介石進行軍事冒險，不管冒險的結果如何，美國都可以收到打擊和進一步控制台灣的實利。在美國支持和鼓勵下，蔣介石集團正在躍躍欲試。

王在反復談及美國政府在蔣介石準備反攻大陸的背後所起的作用以後，説，中國人民同蔣介石打過幾十年的交道，完全懂得怎樣對付他。中國政府必須指出，美國政府是在玩火，蔣介石一旦向大陸挑起戰爭，其結果絕不會對美國帶來任何好處，美國政府必須對蔣介石冒險行動和由此而產生的一切後果負完全責任。

最後，王以警告的口吻説，我可以斷定，蔣介石竄犯大陸之日，就是中國人民解放台灣之時！王請卡伯特將局勢的嚴重性，立即報告美國政府。[5]

卡伯特聽完王炳南這一番話，表示很欣賞王的坦率精神，他將儘快把這個情況電告美國政府。接着，卡伯特很爽快地説，在目前情況下，美國決不會支援蔣介石發動對中國大陸的進攻。蔣介石對美國承擔了義務，未經美國同意，蔣介石不得對中國大陸發動進攻。卡伯特説，我向貴大使保證，我們絕不要一場世界大戰，我們要盡一切力量來防止這種事情。

卡伯特在告別時，甚至對王説，如果蔣介石要行動，我們兩家聯合起來制止他。[6]聽了卡伯特的明確表態，王炳南松了一口氣，美國的態度終於摸清了，他一刻也不遲疑地把談話內容報告了國內。

6月27日，肯尼迪在記者招待會上強調，美國在台海地區的政策是「和平和防禦性的」，如對金門、馬祖的攻擊是對台灣的攻擊的一部分，美國將防衛金門、馬祖，但又説，在未獲得美國同意之前，國民黨將不採取「反攻大陸」的行動。同時，美國出動第七艦隊，加強在台海巡邏，既向中國顯示不退出台灣的決心，又阻止國民黨對大陸的軍事行動。

7月12日，中國外交部部長陳毅在朝鮮駐華大使舉行的宴會上發出警告：蔣介石對大陸的軍事冒險不論是遲是早，規模是大是小，美國政

府必須對此承擔責任。

經過中、美、蔣三方的幕後活動，各自對對方的態度都摸清了底。由於美國持不支持態度，蔣介石難以對大陸發動大規模軍事行動，「反攻大陸」的蠢動被制止了。

4.中美大使級會談的終結

馬拉松式的中美會談，雙方代表也一再變換。1961年11月28日，第一百零七次會議後，美方比姆大使離任，由新任美國駐波蘭大使卡伯特接任。1964年4月8日第一百二十次會議後，中方代表王炳南奉調回國，結束了長達9年中美會談的經歷，中國新任駐波蘭大使王國權接任。1965年12月16日的第一百二十八次會議，美方又改由新任駐波蘭大使格羅諾斯基（John A.Gronouski）接任。1967年6月14日，第一百三十三次會議後，中方代表王國權離任回國，由中國駐波蘭代辦陳東擔任。

從1958年9月開始，到1968年年初中斷，華沙會談總共進行了六十一次，與此前的日內瓦會談相比，明顯的區別是會談內容，不再限於平民遣返、台灣問題，而是擴展到核問題、印度支那問題等多個領域。儘管未能達成任何協定，但卻一直保持了當時中美唯一直接接觸的管道。1970年1月20日，中美華沙大使級會談再度恢復，美方代表是美國駐波蘭大使斯托塞爾（Walter Stoessel），中方代表是中國駐波蘭代辦雷陽。經過第一百三十五、一百三十六兩次會談，中美關係取得了兩點進展：一是在台灣問題上，美國政府首次提到，不妨礙台灣海峽兩岸的中國人自己「達成任何和平解決」；中國政府也表示了相應的靈活態度，不再堅持台灣問題不解決，其它問題一概不談的「一攬子」解決方案。二是兩國代表第一次面對面地表明了願意改善關係的願望，並且都希望實現更高級別的會談。1971年7月，美國國家安全助理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博士作為尼克松（Richard M. Nixon）總統的特使秘密訪華，雙方確定巴黎為今後秘密聯繫的管道，中美華沙會談不再恢復。這樣，自1955年以來時斷時續堅持了十六年之久的中美大使級會談，正式結束了它的歷史使命。

[1] 王炳南：《中美會談九年回顧》，頁72-73。
[2] 王炳南：《中美會談九年回顧》，頁77。
[3] 王炳南：《中美會談九年回顧》，頁79-82。
[4] 王炳南：《中美會談九年回顧》，頁86。
[5] 王炳南：《中美會談九年回顧》，頁88-89。
[6] 王炳南：《中美會談九年回顧》，頁89-90。

第五章

西藏平叛與西藏的社會改革

一、西藏解放後面臨的形勢

1.《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條協議》

1949年底，祖國大陸除西藏外，所有少數民族地區均已解放。

解放西藏，完成祖國大陸的統一，是中國政府堅定不移的立場。1950年1月10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十八軍接受了解放西藏的任務。在進軍前，第二野戰軍和西南軍區司令員劉伯承、賀龍，政治委員鄧小平向十八軍軍長張國華等傳達了毛澤東主席的指示：進軍西藏宜早不宜遲，進藏部隊要認真執行民族政策、宗教政策做好統戰工作，爭取上層，影響和團結群眾，爭取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愛國力量，集中打擊帝國主義及一切親帝分裂主義分子。鄧小平指出：到西藏去，就是靠政策走路、靠政策吃飯，政策就是生命。要用正確的政策去掃除中外反動派的妖言迷霧，消除歷史上造成的民族隔閡的成見。

對於西藏的解放，中央政府決定採取和平的方針。因此，中央在下令進軍西藏的同時，通知西藏地方當局派代表到北京進行關於和平解放西藏的談判。

但是，帝國主義者和西藏統治集團中的親帝分裂主義分子，千方百計阻撓人民解放軍向西藏進軍，妄想把西藏從祖國分裂出去，搞所謂「西藏獨立」。他們於1949年7月製造的驅逐國民政府蒙藏委員會駐拉薩辦事處官員的事件，以及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之後，策劃組織的所謂「親善使團」，聲言要分赴美、英、印度、尼泊爾和北京，表示所謂西藏「獨立」，就是這種陰謀的暴露。對西藏當局進行的所謂「獨立」活動，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發言人於1950年1月20日給予了嚴厲的譴責，並再次申明中央政府的嚴正立場。與此同時，班禪堪布會議廳及各地藏族愛國人士，紛紛致電、發表談話、召開座談會，揭露帝國主義和拉薩當局的陰媒活動，一致要求人民解放軍早日解放西藏。

帝國主義者和西藏親帝分裂主義分子揚言派「親善使團」，搞所謂「獨立」的陰謀雖未得逞，但拉薩當局仍未停止與帝國主義勾結。他們企圖玩弄兩面派手法，繼續與中央對抗。即：一方面派出一個代表團，於1950年2月由拉薩起程，聲稱要到北京與中央人民政府談判，但卻長時間滯留印度，等待時局變化；另一方面，西藏政府則成立應變機構，積極擴軍備戰，把原有的藏軍從十四個代本（相當於團的建制）擴充為十七個代本，並將由英美武器裝備起來的第三、九、十代本的精銳兵力部署在昌都一線，企圖憑藉金沙江天險阻止解放軍西進。在此情況下，中央並未放棄爭取和平解放的努力，仍然希望西藏地方政府改變錯誤立

場，對中央的方針作出積極的回應。這時，著名的藏族愛國人士、西康省甘孜白利寺的格達活佛，於1950年5月5日致電朱德總司令，表示願在人民解放軍進軍西藏前前往拉薩，勸説達賴接受中央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針。中央人民政府同意了他的請求。但格達活佛到達昌都後，不幸於8月22日中毒身亡。由於西藏當局蓄意要在軍事上與中央較量，人民解放軍被迫於1950年10月進行了昌都戰役，消滅了藏軍主力，給帝國主義和西藏親帝分裂主義勢力以沉重打擊。這時，以大紮攝政為首的一小撮親帝分子，挾持達賴喇嘛逃往亞東，企圖把他帶出國外。而以阿沛·阿旺晉美為代表的愛國人士則反對達賴喇嘛逃往國外，主張與中央人民政府和平談判。

昌都戰役結束後，中央仍堅持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針，要求西藏地方政府迅速派代表赴北京談判。在大勢所趨的情況下，親帝分子大紮攝政下臺，達賴開始親政。1951年2月，西藏地方政府委派噶倫阿沛·阿旺晉美及凱墨·索安旺堆、土丹旦達、土登列門、桑頗·登增頓珠等五人為全權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委派李維漢及張經武、張國華、孫志遠為全權代表，進行和平談判。4月29日，關於和平解放西藏問題的談判在北京舉行。經過二十多天的充分協商，雙方代表於5月23日簽訂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定》。這個協議除前言外共十七條，故稱為《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十七條協議》。[1]

《十七條協議》的簽訂，標誌着帝國主義侵略和分裂陰謀的破產，標誌着西藏人民迎來了歷史的新紀元。5月24日，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澤東在中南海懷仁堂接見西藏地方政府和談代表團，並舉行盛大宴會。毛澤東在宴會致詞説：

> 幾百年來，中國各族人民之間是不團結的，特別是漢民族與西藏民族之間是不團結的，西藏民族內部也不團結。這是反動的清朝政府和蔣介石政府統治的結果，也是帝國主義挑撥離間的結果。現在，達賴喇嘛所領導的力量與班禪額爾德尼所領導的力量與中央人民政府之間，都團結起來了，這是中國人民打倒了帝國主義及國內反動統治之後才達到的。這種團結是兄弟般的團結，不是一方面壓迫另一方面。這種團結是各方面共同努力的結果。今後，在這一團結基礎之上，我們各民族之間，將在各方面，將在政治、經濟、文化等一切方面，得到發展和進步。[2]

《和平解放西藏協議》簽訂後，中央人民政府派駐西藏的代表張經武，即前往亞東會見達賴喇嘛。1951年8月下旬，張經武和達賴一同回到拉薩。同年10月下旬，張國華、譚冠三率領的主力部隊進入拉薩。西北軍區派出的由範明、慕生忠兩將軍率領的另一支部隊，也從北路同時到達拉薩。從此以後，西藏地區就開始進入認真執行《協議》和逐步建設新西藏的過程。

2.西藏解放後面臨的複雜鬥爭

人民解放軍和中央機關的工作人員入藏後，本着《十七條協議》的基本精神，堅持國家統一、民族平等的政策，在保衛祖國邊疆的同時，對以達賴為首的原西藏上層統治集團採取了團結教育和改造的方針，説明他們認識社會進步的潮流，爭取其改變極不合理的黑暗的農奴制度。但是，西藏上層中的反動集團卻始終與外國勢力相勾結，不斷進行分裂祖國的活動，並頑固維護反動的農奴制度，拒絕進行社會改革。西藏的噶廈政府故意讓民間的反動分子出面，建立稱為「人民會議」的反動組織，[3]同中央政府和解放軍對抗。這樣，人民解放軍進藏後就面臨着統一與反統一，改革與反改革的激烈鬥爭。在1956年發生局部叛亂前，鬥爭的主要形式是非武裝的政治鬥爭。

1952年1月13日，噶廈政府的司倫魯康娃召集政府官員秘密開會，確定要進行驅逐解放軍的軍事準備。他們決定將昌都戰役後仍保存下來的藏軍主力第一、第二、第六代本集中在拉薩，並作好戰鬥準備。然後，以所謂的「人民會議」出面「請願」，以藏軍作後盾，企圖掀起一個驅趕解放軍的浪潮。

3月30日「人民會議」派代表正式上街請願，3月31日和4月1日又組織人在拉薩街頭示威，並糾集數百名流氓和喇嘛包圍中央代表駐地，尋釁鬧事。大批藏軍也包圍中央代表駐地和中央辦事處、銀行等處，噶廈政府兩司倫還從日喀則調來炮兵代本，接應市內的騷亂。

解放軍第十八軍軍直機關和第五十二師進駐拉薩後，因供應困難，不足萬人的部隊分散在數百里長的地區，多數單位為解決供應困難已準備轉入春耕生產。面對緊張形勢，3月底西藏軍區將在外準備開荒生產的軍機關一部和第一五五團緊急調至拉薩附近，準備應付叛亂。在安排必要自衛措施的同時，中共西藏工委決定本着團結愛國的精神，著重爭取西藏上層人士出面平息騷亂。

毛澤東對於拉薩的這次以「請願」為名掀起的騷亂非常關注，他於4月6日為中共中央起草了給西南局、西藏工委的指示，分析了整個西藏的形勢，認為西藏不比新疆，無論政治上、經濟上西藏均比新疆差得多。據此指出：「看來不但是兩司倫，而且還有達賴及其集團的多數，都覺得協定是勉強接受，不願意實行。我們在目前不僅沒有全部實行協定的物質基礎，也沒有全部實行協定的群眾基礎，也沒有全部實行協定的上層基礎，勉強實行，害多利少。」毛指示説：「他們以保護西藏民族利益的面目出現，他們知道在軍事力量方面弱於我們，但在社會勢力方面則強於我們。我們應當在事實上接受這次請願，把協定的全部實行延緩下去。……我們目前在形式上要採取攻勢，責備此次示威和請願的無理（破壞協定），但在實際上要準備讓步，等候條件成熟，準備將來

的進攻（即實行協定）。」[4]毛澤東的這一指示，不僅為平息偽「人民會議」鬧事規定了一個指導原則，也為當時的西藏工作確定了一個總方針。即：在人民解放軍剛剛入藏，公路不通，後方供應無保障，缺乏群眾基礎和上層基礎的情況下，採取形式上的攻勢和實際上的守勢，條件不成熟可暫緩實行《十七條協議》。

中共西藏工委根據中央指示，一面要求軍區機關、部隊和炮兵營仍儘量避免衝突；一面向噶廈政府提出應撤銷支持「人民會議」的魯康娃和洛桑扎西的司倫職務，並切實維護好拉薩治安，制止鬧事。4月19日，張經武單獨前往布達拉宮面見達賴喇嘛，嚴肅而又坦率地傳達了中央政府的意見，並提出撤銷兩位司倫的職務。

達賴當時表面上接受了中央的意見，於4月27日下令將兩位司倫撤職，然而事後又對他們加以「慰問」。5月1日，西藏地方政府張貼布告下令解散「人民會議」，調來的藏軍也紛紛撤回。西藏上層的反動勢力雖然一度收斂了其公開的分裂行動，卻始終沒有放棄其對抗中央和準備叛亂的活動。一部分逃往印度的西藏上層反動分子以噶倫堡為中心，勾結國外勢力，繼續策劃「西藏獨立」的陰謀。在拉薩和各地的反動農奴主因害怕廣大農奴覺悟，一直阻撓群眾與解放軍和中央進藏人員接觸，限制藏族青年響應中央政府號召參加工作和學習，並製造攻擊共產黨的種種讕言以欺騙下層群眾。

1952年4月28日，流落內地已有二十九年的班禪額爾德尼及其行轅在人民解放軍護送下回藏，進入拉薩。因《十七條協議》規定了班禪固有的地位和職權應維持，達賴也已於上一年正式表態承認班禪的轉世靈童，噶廈政府不得不組織了比較隆重的歡迎儀式。隨後，班禪回到日喀則，在中共西藏工委的支持下，恢復了原有的地位和職權，這在當時對於穩定西藏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打擊反動勢力的進攻時，中共西藏工委和解放軍駐藏部隊在事實上也做了一些讓步，以促進局勢的緩和。按照毛澤東關於「暫時一切仍舊，拖下去」的精神，在《十七條協議》上已規定、卻最為噶廈政府所不滿的內容，如成立西藏軍政委員會和改編藏軍等，這時都不實行。根據毛澤東提出的「我們則只做生產、貿易、修路、醫藥、統戰（團結多數，耐心教育）等好事，以爭取群眾，等候時機成熟再談全部實行協定的問題」的指示，駐藏解放軍部隊在以上層統戰工作為主的同時，還組織了文工隊、醫療隊在駐地進行宣傳和巡迴醫療。

西藏和平解放之初，由於歷史遺留的民族隔閡，藏族各界對解放軍和漢族幹部普遍存有戒心，開始不願接近，而對給他們看病的醫生比較歡迎。如大貴族功德林扎莎平時不願接觸解放軍，可是當董金增大夫給他治好了心臟病後，主動向西藏軍區張國華司令員提出要辦一百桌酒席感謝解放軍，經謝絕後仍辦了十幾桌。各地的上層僧侶和廣大貧苦農

奴，也紛紛找解放軍看病。在這種情況下，駐藏部隊又興辦一些公共福利事業，並招收貧苦農奴到內地學習，修建學校。

為了打破西藏上層中的反動分子在糧食問題上刁難進藏部隊，妄圖把解放軍困死和餓跑的圖謀，西藏軍區還提出了「向荒野進軍，向土地要糧、向沙灘要菜」的口號，駐藏部隊指戰員和全體進藏機關人員都行動起來，開展了農業生產。1952年內就開荒一萬六千餘畝。雖然由於高原氣候條件差，收穫量很有限，尚不能解決部隊的大部需要，卻多少緩解了供應上的緊張局面。

3.中央宣布「六年不改」的方針

早在人民解放軍進軍西藏之初，中央人民政府就已經看到了西藏的這種現實情況，毛澤東當時指出：「在西藏考慮任何問題，首先要想到民族和宗教兩件事情。一切工作必須慎重穩進。」鄧小平也提出：「一切問題的處理，必須是穩步前進，就是說要摸著石頭過河。」[5]中央對於觸動西藏農奴制度基礎的改革，更強調要慎重穩進。

為了促使西藏上層人士覺悟，毛澤東、周恩來等黨和國家的領導人都親自向西藏上層人士做說服工作，中共西藏工委和解放軍駐藏部隊的領導也向西藏各界大力宣傳了黨的政策以及對西藏改革所要採取的方針。毛澤東在接見西藏上層人士時，曾以佛祖釋迦牟尼為免除眾生痛苦不當王子，以及當時黨內外的領導人雖然出身于剝削階級家庭，卻走上革命道路為例，勸導西藏上層人士為本民族的繁榮發展，應自動進行改革。黨和國家領導人還明確向西藏上層人士說明，今後改革時仍堅持和平改革的方針，對待西藏上層人士不採取內地土地改革的辦法，而仿照對內地民族資產階級的優厚政策，由國家以贖買的方式收購農奴主的生產資料分給貧苦農奴，使廣大農奴得到解放。毛澤東還專門對中央統戰部的領導說：你們研究一下，搞一個等量的辦法，他們在老百姓手中拿多少錢，我們就給他們多少錢，叫他們不要再去剝削老百姓，把土地給老百姓。

為了說明民主改革是社會進步的大勢所趨，西藏工委盡力勸導西藏地方的官員、高級僧侶和貴族組織參觀團到內地參觀學習。1955年至1956年，內地實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後，上海有的資本家一年可以拿一二十萬定息，毛澤東還以這個例子對西藏貴族說，你們那裏有沒有那樣大的貴族？你們可以到上海看一看他。

對於西藏政教合一的最高領導人達賴喇嘛和班禪額爾德尼，中央特別予以了關心和幫助。1954年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召開，經中共中央邀請，西藏的兩大宗教領袖達賴和班禪於9月4日到達北京參加大會，毛澤東主席隨即接見了達賴和班禪。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達

賴被選為全國人大副委員長；班禪在全國政協二屆一次會議上當選為政協副主席。

達賴在參加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訪問內地期間，在公開場合和私下裏都有許多擁護國家統一的表示。其他許多西藏上層人士，對毛澤東等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耐心教導也深受教育。據當時西藏政府的四大噶倫之一的拉魯·次旺多吉[6]回憶，1955年他在擔任西藏參觀團團長到北京參觀時，受到毛澤東兩次接見。毛主席坦率地問：「西藏實行民主改革，你們怕不怕？」拉魯回答說：「怕！」毛主席說：「不用怕，我們不僅不會殺害貴族，而且會保障你們的生活。我們要讓西藏全體人民都能過上好日子。」[7]拉魯說，他當時也很受感動。但是，達賴返藏後，又陷入代表反動農奴主貴族集團利益和分裂主義勢力的謀士、經師等人的環繞之中，日益走上與祖國離心離德的道路。拉魯等上層人士為維護自己的農奴主階級的地位，還是一度走上了武裝對抗民主改革的道路。

在當時的西藏上層中，也有阿沛·阿旺晉美等一部分人受中央的教育和影響，提出了改革農奴制的進步要求。這一時期，由於康藏和青藏兩公路的通車促成內地與西藏的聯繫更加緊密，在西藏許多地方成立了醫院、學校，免費給藏民治病並招收藏族學員。國家還向西藏發放無息農業貸款，平價供應茶葉，並開始建設發電站、皮革廠、鐵工廠，培訓出了西藏第一代產業工人。拉薩等城鎮的學校、機關中的藏族青少年中也建立起青年團和少先隊組織，這使得西藏土地上出現了許多新事物，改革的呼聲也隨之出現。

1956年4月，拉薩舉行了西藏自治區籌備委負會[8]成立大會，國務院副總理陳毅率中央代表團前往出席。在自治區籌委會成立大會上，開始提出西藏的改革問題。擔任籌委會主任的達賴在開幕詞中也表示，願意根據西藏的「具體情況和西藏領導人員及廣大人民的意志和願望逐步的進行民主改革和社會改革」。

西藏上層反動集團在風聞改革後，出於維護本階級利益的動機就在積極地籌劃和採取反抗措施。自1955年起，偽「人民會議」分子的活動，就得到部分西藏上層人士或明或暗的支持。這時，鄰近西藏的四川彝區和甘孜藏區開始的民主改革，使西藏部分上層人士產生了恐懼，反動分子乘機煽起反對改革的逆浪。偽「人民會議」的原班人馬改旗易號，在拉薩成立反動組織「四水六岡」（藏語「曲細岡珠」，意為「四條河，六座山」，泛指甘、青、川、滇、藏等省藏族聚居的地方），與西藏上層分裂主義分子和外國勢力加緊聯絡，成為後來發動西藏全區性叛亂的率先組織者和先鋒力量。

西藏上層農奴主貴族集團加緊分裂活動，是與當時的國際形勢尤其是印度政府的態度分不開的。1950年代前期，中印友好一度成為兩國關

係主流。但印度政府在西藏問題上一直採取兩面立場：一方面反對在國際上孤立新中國，承認西藏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一方面又利用它同西藏在宗教、文化和經濟上的聯繫，支持和慫恿西藏反動上層集團進行分裂祖國的活動。人民解放軍進駐西藏時，印度仍在西藏保持著原先英國派駐的所謂「護商」的軍隊，並控制著西藏的郵政、電報等企業。中國政府從發展中印兩國友好關係的願望出發，未採取任何強行驅趕或接管的措施，而是希望雙方通過談判和友好協商予以解決。1954年中印雙方達成協議，印度取消它從英國繼承的在西藏的特權，將其在西藏的郵政、電訊設施和十二個驛站交給中國，並撤走駐江孜和亞東的武裝部隊。

在當時的形勢下，中央政府對於西藏的民主改革問題持比較慎重的態度。1956年8月8日，毛澤東在覆信達賴喇嘛時就指出：「西藏現在還不是實行社會改革的時候，大家談一談，先作充分的精神上的準備，等到大家想通了，各方面都安排好了，然後再做，可以少出亂子，最後是不出亂子。」[9]此後，中央明確宣告，第二個五年計劃之內即在1956年至1962年之內對西藏不進行民主改革，第三個五年計劃期間是否進行改革也要到那時候看情況再定，讓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層人士有一個充分的考慮時間，以利於條件成熟時，和平地穩妥地實行改革。這就是：西藏「六年不改」的決定。

印度政府放棄在西藏特權時，卻有一批政界人物在「友好」的外衣下加緊了對西藏的顛覆活動。1956年，印度領導人以本國舉行慶祝佛教始祖釋迦牟尼涅槃二千五百周年的儀式為由，邀請達賴喇嘛和班禪額爾德尼參加。

對於印度的邀請，中國政府表示這是促進兩國友好、和平共處的表現。中央人民政府對達賴、班禪表示，是否去印度由他們自己決定。就達賴、班禪去印一事，中共中央在毛澤東主持下專門進行了研究。毛澤東在中共八屆二中全會上說：

> 現在達賴他們想去印度朝佛。讓他去，還是不讓他去？中央認為，還是讓他去好，不讓他去不好。過幾天他就要動身了。勸他坐飛機，他不坐，要坐汽車，通過噶倫堡，而噶倫堡有各國的偵探，有國民黨的特務。要估計到達賴可能不回來，不僅不回來，而且天天罵娘，說「共產黨侵略西藏」等等，甚至在印度宣布「西藏獨立」；他也可能指使西藏上層反動分子來一個號召，大鬧起事，要把我們轟走，而他自己卻說他不在那裏，不負責任。這種可能，是從壞的方面著想。出現這種壞的情況，我也高興。我們西藏工委和軍隊要準備着，把堡壘修起來，把糧食、水多搞一點。我們就是那幾個兵，橫直各有各的自由，你要打，我就防，你要攻，我就守。

毛澤東還以當年叛逃投奔國民黨的中共領導人張國燾為例，風趣地

解釋這一決定的意義説：

> 我們有經驗一條，就是張國燾跑了並不壞。捆綁不成夫妻。他不愛你這個地方了，他想跑，就讓他跑。跑出去對我們有甚麼壞處呢？沒有甚麼壞處，無非是罵人。[10]

根據中共中央應付最壞可能的要求，駐藏解放軍各部隊、中央駐藏各機關和內地入藏的工人都作了應變準備。在重要的部門和交通點上修築了部分工事，儲備了糧彈，準備叛亂分子進行挑釁或發動進攻。當達賴離藏時，西藏的一些分裂主義分子就積極準備在拉薩發動暴動，以造成「獨立」聲勢，配合外國勢力將達賴留在印度。但是鑑於解放軍駐藏部隊已嚴陣以待，西藏地方政府內的愛國人士又堅決反對這種做法，分裂主義分子一時未敢輕舉妄動。

達賴及其左右1956年11月到達印度後，印度政府別有用心地給予超乎尋常的禮遇和接待。在一次招待會上，印度孟買市長竟然公開胡説甚麼「西藏是一個國家」，印方並在許多場合懸掛起標誌「西藏獨立」的「雪山獅子旗」。在國外勢力和西藏反動分子的拉攏下，達賴及其家屬和大部分隨行人員產生了思想波動，遲遲下不了返回西藏的決心。1956年年底，周恩來再次訪問印度。他一方面對尼赫魯（Jawaharial Nehru）政府做工作；一面受中央的委託勸説達賴返回祖國。在同尼赫魯的談話中，周恩來就達賴問題指出，達賴、班禪是尼赫魯親自寫信邀請的，他們到達後印方的許多所作所為卻是違反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尼赫魯開始對此不承認，當周恩來列舉了大量事實後，尼赫魯又推説他不知道，可能是下面的人幹的，要查一查。周恩來隨即向尼赫魯指出，達賴如被留在印度，一錢不值，只能成為你們的包袱。在周恩來的嚴正態度面前，尼赫魯允諾把達賴、班禪送回中國。[11]

周恩來訪印期間還找達賴及在印西藏上層人士談話，向達賴及其隨行官員傳達了中央政府關於西藏「六年不改」的決定，並分別對他們進行細緻的思想工作。當時達賴稱中央六年不改的方針和周總理講的都很好，但是件大事，他還年輕，不能一個人做主，要同隨行官員商量後再回答。當時隨同達賴訪印的噶倫之一阿沛·阿旺晉美後來回憶説：

> 我們隨行的主要官員認真討論了周總理同達賴喇嘛的談話後認為，在西藏從和平解放到1956年，在貫徹執行中央人民政府同西藏地方政府達成的十七條協議方面，沒有任何違背協議的地方。因此，對西藏工作提不出任何意見。但是在康區和甘青等藏族地區的民主改革中，有一些不好的做法，希望中央予以重視並認真糾正。周總理採納了這個意見。[12]

經過周恩來的勸説，達賴一行於1957年2月15日越過邊境回到西藏亞東，4月2日返回拉薩。班禪先于達賴喇嘛返回了西藏。

達賴返藏，使西藏分裂主義勢力受到一次沉重打擊，解放軍駐藏部

隊和中央駐藏各單位的備戰狀況也得到了緩解。1957年2月27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會議上講話，就西藏問題明確宣布：

> 西藏由於條件還不成熟，還沒有進行民主改革。按照中央和西藏地方政府的十七條協議，社會制度的改革必須實行，但是何時實行，要待西藏大多數人民群眾和領袖人物認為可行的時候，才能作出決定，不能性急。現在已決定在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不進行改革。在第三個五年計劃期內是否進行改革，要到那時看情況才能決定。[13]

根據中央暫不進行民主改革的決定，中共西藏工委和解放軍西藏駐軍採取了收縮的方針，大量減少了駐藏人員，以節省開支並減輕西藏上層人士的疑慮。中央政府「六年不改」的方針，是對西藏上層的一次重大讓步，體現了中央等待西藏上層覺悟，促進其自行改革的政策。然而，西藏地方政府內的反動當權者和多數農奴主貴族拒絕中央的幫助，在對抗改革和背叛祖國的道路上愈走愈遠。

[1]　（1）西藏人民團結起來，驅逐帝國主義侵略勢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祖國大家庭中來。（2）西藏地方政府積極協助人民解放軍進入西藏，鞏固國防。（3）根據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的民族政策，在中央人民政府統一領導之下，西藏人民有實行民族區域自治的權利。（4）對於西藏的現行政治制度，中央不予變更。達賴喇嘛的固有地位及職權，中央亦不予變更。各級官員照常供職。（5）班禪額爾德尼的固有地位及職權，應予維持。（6）達賴喇嘛和班禪額爾德尼的固有地位及職權，系指十三世達賴喇嘛與九世班禪額爾德尼彼此和好相處時的地位及職權。（7）實行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規定的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風俗習慣，保護喇嘛寺廟。寺廟的收入，中央不予變更。（8）西藏軍隊逐步改編為人民解放軍，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武裝的一部分。（9）依據西藏的實際情況，逐步發展西藏民族的語言、文字和學校教育。（10）依據西藏的實際情況，逐步發展西藏的農牧工商業，改善人民生活。（11）有關西藏的各項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強迫。西藏地方政府應自動進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時，得採取與西藏領導人員協商的方法解決之。（12）過去親帝國主義和親國民黨的官員，只要堅決脫離與帝國主義和國民黨的關係，不進行破壞和反抗，仍可繼續供職，不究既往。（13）進入西藏的人民解放軍遵守上列各項政策，同時買賣公平，不妄取人民一針一線。（14）中央人民政府統一處理西藏地區的一切涉外事宜，並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領土主權的基礎上，與鄰邦和平相處，建立和發展公平的通商貿易關係。（15）為保證本協議之執行，中央人民政府在西藏設立軍政委員會和軍區司令部，除中央人民政府派去的人員外，儘量吸收西藏地方人員參加工作。參加軍政委員會的西藏地方人員，得包括西藏地方政府及各地區、各主要寺廟的愛國分子，由中央人民政府指定的代表與有關各方面協商提出名單，報請中央人民政府任命。（16）軍政委員會、軍區司令部及入藏人民解放軍所需經費，由中央人民政府供給。西藏地方政府應協助人民解放軍購買和運輸糧秣及其它日用品。（17）本協議於簽字蓋章後立即生效。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二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頁283-287。

[2] 毛澤東：〈在慶祝簽訂和平解放西藏辦法協議宴會上的講話〉（1951年5月24日），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文集》，第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頁168。

[3]　這個組織最早於1950年12月由拉薩城內的商人阿樂澤群等招募無業流氓組織起來，在噶廈政府允許下，和拉薩三大寺（哲蚌寺、沙拉寺、噶丹寺）的一些反對解放軍進藏的上層活佛、喇嘛聯合起來，打出了「人民會議」的旗號，並於1951年11月正式擬定「請願書」，要求解放軍退出西藏

[4]　毛澤東：〈關於西藏工作的方針〉（1952年4月6日），載《毛澤東文集》，第六卷，頁228-229。

[5] 韓俠：〈西藏現代革命史研究概述〉，《中共黨史研究》，1990年第1期。

[6] 拉魯·次旺多吉在1959年拉薩叛亂時因擔任叛軍總司令被捕，1965年被特赦。

[7] 拉魯·次旺多吉：〈回顧我所走過的道路〉，載《西藏文史資料選輯》，第三輯（北京：民族出版社，1984），頁11。

[8] 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主要是一個協商過渡性的辦事機構，還不是正式的政府機關。

[9]　中國軍事博物館編著：《毛澤東軍事活動紀事》（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4），頁

899。

[10] 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1956年11月15日），載《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頁326-327。

[11] 張彤：〈對印自衛反擊戰前後的回憶〉，載外交部外交史編輯室編：《新中國外交風雲》（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0），頁68-69。

[12] 《中國藏學》，1988年第2期。

[13] 毛澤東：〈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1957年2月27日），載《毛澤東選集》，第五卷，頁386-387。

二、西藏上層反動集團發動叛亂

1.川滇甘青藏區的局部平叛

人民解放軍入藏後，雖然一直採取慎重緩進的方針，然而代表祖國統一和社會進步的力量同代表野蠻落後的農奴制的舊勢力仍不可避免地發生尖鋭的矛盾和衝突。這不僅反映在政治、經濟、文化上的對立和鬥爭，軍事上也經常出現緊張對峙的場面。在解放軍入藏後的幾年內，藏軍一直未接受改編，各寺廟普遍有武裝喇嘛，農奴主莊園也幾乎都有槍支，使西藏及其周圍四省藏區的反動統治者在解放後還長期保存着武裝力量，叛亂的嫌、隱患始終存在。

西藏和藏族地區是兩個概念：西藏就是前藏、後藏、阿里、金沙江以西地區，包括昌都地區，只有110-120萬人口；藏族則牽連到青海、甘肅、四川、雲南好幾個省的藏民聚居區。當內地社會主義改造提前完成之際，中共中央統戰部提出1956年至1962年的統一戰線工作方針時，曾設想：在青海，甘肅、四川，作出一個和平改造的榜樣，讓西藏地區的群眾、西藏地區的上層人物去看一看這個榜樣，如果他們覺得很好，回去也願意進行改革，這樣就加速了西藏的和平改造。[1]根據這一設想，中央統戰部和四川省委確定於1955年末在川西彝區對奴隸制度進行改革後，川西藏族聚集的康區也隨之準備開始進行民主改革。

對於中央確定以和平贖買方式進行的改革，彝區和藏區的奴隸主、農奴主都拒不接受，並掀起了武裝叛亂。人民解放軍在一面等待西藏上層覺悟的同時，一面不得不在鄰近西藏的幾省藏區開始進行平叛作戰。從1956年至1959年春，川、雲、甘、青藏區和西藏的叛亂由小到大，逐步蔓延，人民解放軍的平叛作戰也不斷擴大。

1955年12月，四川西部大小涼山的奴隸主集團發動了武裝叛亂，叛亂很快蔓延至十四個縣。1956年3月在川西理塘又發生藏族農奴主組織的叛亂，阿壩藏族地區的綽斯甲、四土、若爾蓋、松潘、黑水等地的反動頭人接着響應武裝叛亂。四川西部康巴（「康巴」一詞，「康」係康區之意，「巴」是指藏人）叛亂發生，成為整個藏區叛亂的開端。由於叛亂首領打着民族宗教的旗號，一時脅迫許多少數民族群眾加入叛亂隊伍。據統計，當時川西參加叛亂的藏彝武裝人員達十餘萬，有槍八萬枝，叛亂地區波及四十三個縣，四百五十個鄉。叛亂武裝分子圍攻縣城十二座，襲擊區、鄉政府和解放軍守點分隊二百處，伏擊三百起，殘殺地方幹部和積極分子達二千餘人。[2]

康巴叛亂發展到如此大的規模，重要原因是西藏反動勢力的支持和

煽動。川西康區距西藏僅金沙江一江之隔，噶廈政府長期利用宗教、民族關係插手當地事務。西藏地方政府的首席噶倫索康、達賴的副經師赤江於1955年隨達賴從內地返藏期間，在通過康區的沿途接見了前來拜佛的頭人、喇嘛和活佛，大肆鼓吹藏族應「獨立」，要他們抗拒改革，並表示噶廈政府和外國都可大力支援。隨後，噶廈政府和偽「人民會議」分子又向康區頭人提供了武器和經費，並建立了密切的聯繫。確定在「江東」（金沙江以東）可以搞「武的一手」，即以武裝反抗共產黨，在「江西」（金沙江以西）則搞「文的一手」，即以政治方式對抗改革。川西民主改革試點開始後，康區的頭人就利用手中還掌握着的政教合一的基層政權，以宗教情緒對藏民進行煽動，組織了武裝暴亂。隨後，滇西北德欽一帶藏族聚居區的土司頭人也以對抗民主改革為旗幟，煽動部分藏民發動武裝叛亂。

叛亂出現後，解放軍成都軍區先後調集了三十四個團共計六萬五千人兵力，對康區和大小涼山叛亂武裝進行了鎮壓。成都軍區首先以五個團的兵力打垮了彝區的叛亂武裝，在1956年1月下旬基本平息了涼山地區的叛亂。然後集中力量，投入康區的平叛作戰。

在鎮壓康巴叛亂的作戰開始時，解放軍成都軍區以內衛部隊四個團另一個營的兵力重點布置於川藏公路沿線的德格、甘孜、爐霍及理塘等地固守要點，並保護公路的暢通。同時從重慶、成都抽調內衛部隊四個團另一個營，兼程趕赴叛亂地區，並在蘭州軍區、昆明軍區和空軍部隊的配合下，對叛亂武裝予以打擊，同時阻止其向西藏逃竄。

經過有力的軍事打擊，大股叛亂武裝很快分化瓦解。考慮到參加叛亂的人員中有許多受欺騙的少數民族群眾，平叛部隊根據「以政治爭取為主與軍事打擊相結合」的方針，開展政治攻勢，宣傳黨的民族政策，在群眾中掀起了「呼夫喚子」運動，使許多受脅迫的參叛人員繳械投降。對於組織叛亂的一些土司頭人也展開了勸説工作，爭取了部分人停止叛亂活動。但仍有一部分叛亂首領和骨幹分子拒絕和談，依托高山密林與平叛部隊周旋，繼續負隅頑抗。解放軍採取在叛亂腹心地帶分區駐點的方式，再組織強有力的武工隊，深入發動群眾，實行「邊打邊改」的方針，進行民主改革，解放廣大農奴，開展一地鞏固一地，穩定一個地區再轉一個地區。為配合解放軍在康藏公路附近平叛，當地黨政軍部門還組織十六萬人的自衛武裝和二十二萬人的群眾聯防。經過艱苦努力，至1957年末共作戰六千餘次，斃傷叛亂分子兩萬餘人，俘虜兩萬餘人，爭取四萬餘人回家，繳獲各種槍六萬餘枝。[3]康區大規模的武裝叛亂基本平息。

在康巴叛亂發生後，中央政府仍希望西藏上層能夠及早覺悟，並對制止康巴地區的叛亂發揮些作用。1956年5月8日，毛澤東指示中共四川省委和西康特委：對西藏方面前往西康的考察團應予以熱情接待，將四

川藏區發生叛亂的原因、平亂情況、黨的政策和工作辦法老老實實地告訴他們，我們工作中的某些缺點錯誤也可以告訴他們，並請他們幫助做些安撫工作。[4]但西藏上層中的反動分子以中央的誠懇態度為軟弱可欺。在康巴叛亂發生後，噶廈政府和昌都地區的農奴主不斷秘密地向金沙江以東運送武器和物資，並收容西逃的叛亂分子。美國中央情報局同康巴叛亂武裝直接建立了聯繫，並開闢了空投武器彈藥的空投線。經由美赴印的西藏上層人士安排，美國中央情報局還接受了一些康巴叛亂分子，對其進行訓練，培養這些特務分子作為指揮叛亂的骨幹。

1957年4月，粟裕總參謀長視察了川西平叛作戰地區，並親自冒着危險進入叛區了解情況，切實感覺到平叛鬥爭中存在的問題。他在視察中特別教育指戰員要提高對平叛鬥爭意義的認識，重視民族政策問題，發動群眾孤立敵人。粟裕還強調：少數民族地區的民主改革，除會有階級鬥爭外，還會有民族鬥爭的內容，因而在這個鬥爭中，政治鬥爭佔很大的比重，這是非常重要的。必須很好地執行政策紀律，重視政治工作。當時參加平叛的成都軍區和昆明軍區部隊實行了「分兵以發動群眾，集中以應付敵人」的作戰原則，從而使改革和平叛更好地結合起來。

1958年4月，解放軍成都軍區調集七個團的兵力，發起平息康南地區叛亂的戰鬥，至6月底粉碎了以巴塘東南為基地的打着「安日新康」旗號的叛亂武裝，消滅其三萬一千餘人，繳槍千餘枝。隨後叛亂首領仍聚集部眾四處活動，解放軍平叛部隊轉入清剿，到10月底共殲滅叛亂分子五萬五千餘人，擊斃主要頭目，康南地區的武裝叛亂基本得到平息。[5]此後，平叛部隊又轉入康北地區的平叛作戰。

1958年3月至8月，甘肅和青海藏區又發生嚴重的叛亂，先後參加者達到十三萬人，叛亂地區達四十二萬平方公里。[6]此前，一些青海和甘南的頭人、喇嘛以到拉薩「朝佛」為名尋求支持，噶廈政府和一些反動喇嘛、活佛對他們大加鼓勵，煽動他們以武力對抗改革，並派騾隊向甘青藏區輸送武器。一些長期受甘青藏區頭人庇護的馬步芳匪幫殘餘分子，也積極參與軍事籌劃。甘青藏區的反動頭人和上層僧侶打起宗教和民族的旗幟發動了大規模叛亂後，圍攻各州、縣政府，破壞公路，殺害黨政幹部和藏族群眾中的積極分子，搶劫貿易公司，使當地黨政機關和人民解放軍守點分隊一時陷入極為困難的狀況之下。

面對嚴重的叛亂局面，中央軍委下達了平息叛亂的命令。蘭州軍區投入了部分兵力和民兵進行平叛，第五十四軍第一三四師也奉調進入青海參戰。平叛部隊首先消滅頑固的叛亂骨幹武裝，隨後對叛眾進行宣傳教育，促使大批受蒙騙的藏民不斷來降，很快使大股叛亂武裝全部瓦解。據統計，共殲滅叛亂武裝十一萬六千餘人，收繳各種槍七萬餘枝。[7]

在1958年內，昆明軍區部隊也對中甸地區的藏族叛亂武裝進行了打擊，基本平息了該地的叛亂。

川西的康巴叛亂和甘、青、滇藏區的叛亂，是西藏大規模叛亂的前奏。解放軍在這些地區進行的平叛作戰雖然相繼取得了勝利，卻遷延日久，許多地區一再出現復叛現象，平叛作戰遇到了許多比預想更為複雜的問題。當時內地正在搞「大躍進」，極「左」思潮影響到平叛鬥爭出現擴大化的傾向，其中青海省平叛鬥爭中的錯誤尤為嚴重。主要是過分強調軍事打擊，忽視政治爭取。有些單位將全區性叛亂當成「全民性」叛亂，不加區別地單純軍事打擊，加上在平叛鬥爭的同時強辦人民公社，政治上、軍事上的打擊擴大化與經濟上的亂沒收結合在一起，使得情況更為複雜化。

1961年7月，中央統戰部在蘭州召開西北民族工作會議，青海省委也召開三級幹部會，檢討平叛工作中的錯誤。[8]對1960年代前期甘南和青海平叛的情況進行覆查，凡屬錯捕錯鬥錯殺錯處理的幹部、群眾和上層人士，一律平反，並做好善後工作。還將在押的二萬四千人宣布無罪釋放或「教育釋放」，重新安置幾百名民族宗教上層人士，並恢復了部分寺院。

2.西藏地區的局部叛亂

西藏地區的局部叛亂，始於1956年夏天的昌都以東地區。西藏和平解放時，昌都地區以原統治機構為基礎成立了各級解放委員會，作為政權機構，此後該地不再歸噶廈政府直接管轄，仍屬西藏地區的一部分。當地一部分反動頭人在康巴叛亂分子的配合下，向解放軍駐昌都地區部隊連連發起襲擊。8月5日，西藏軍區地質勘測隊隨蘇聯專家外出，路上遭叛亂武裝百餘人伏擊，勘測隊犧牲四人，傷五人。6月13日，西藏軍區汽車團的八十餘輛汽車組成的運輸隊在江達以西的山腳下又遭叛亂武裝伏擊。

面對昌都地區出現的叛亂，駐西藏的解放軍根據政治爭取和軍事自衛相結合的原則，以部分兵力向叛亂武裝發起一些小規棋的進剿，同時還儘量爭取西藏上層出面共同制止叛亂，對已叛亂的頭人也進行爭取工作勸其歸來並不咎既往。採取這些措施的結果，使噶廈政府直接接管轄的地區內暫時未發生叛亂，昌都地區的叛亂在1957年內也有所收斂。

1957年至1958年，竄入西藏各地的康巴叛亂分子不斷增加，隨後又有部分青海和雲南藏區的叛亂分子竄入西藏腹地。「四水六崗」、拉薩三大寺和藏軍為武裝叛亂簽訂了同盟書，劃分了各自的武裝行動任務和地區。從1958年6月起，聚集拉薩的康巴叛亂武裝相繼移至各任務區，其主力進入雅魯藏布江以南靠近印度的山南地區，使這一產糧較多

比較富裕的地區成為叛亂武裝的主要「根據地」。美國情報機關也加強了對西藏山南地區的叛亂武裝的支援，除派遣剛剛在關島接受過特工訓練的藏族特務攜帶電台到那裏建立聯絡，並空投物資接濟外，美國中央情報局還在國內科羅拉多州的洛基山的利德維爾附近選中了一塊海拔三千米左右的高原營地——哈爾營，作為「康巴遊擊隊員訓練基地」，並經印度接運叛亂分子到此進行「遊擊戰」的訓練。

儘管西藏上層反動集團在分裂祖國、破壞民族團結、策動叛亂的道路上愈走愈遠，中央政府還是強調以民族團結為重，盡可能顯示寬大忍讓，耐心等待他們覺悟，同時也提出了鄭重的警告。1958年7月16日，中共中央在批覆西藏可能發生叛亂問題的報告中指出：要對噶倫們表示嚴正態度，指出他們採取縱容叛亂分子的立場是錯誤的。中央的方針是和平改革，但是，如果反動分子一定要武裝叛亂，中央就要堅決實行武裝平息叛亂。[9]

1958年下半年，噶廈政府直轄的西藏內地出現了局部叛亂。叛亂武裝在多處圍攻黨政機關，在主要交通幹線伏擊解放軍運輸車輛，攻打養路道班，搶劫運輸物資。9月17日，西藏軍區門診部十六名醫護人員乘汽車一輛前往日喀則，車行至麻江遭到一百餘名叛亂分子的伏擊。因兩邊高地上火力密集，車上人員只得依托車輛頑強抵抗，激戰半小時，最後與衝下來的敵人拼手榴彈，醫療隊全部傷亡。叛亂分子又用刀砍殺未死的傷員，結果十六名男女醫護人員全部犧牲，汽車也被焚毀。

儘管局部叛亂日益擴大，中央政府仍決定在軍事上仍採取守勢。8月18日，中共中央總書記鄧小平對西藏軍區司令員張國華、副司令員鄧少東指出：要鞏固自己的陣地，維護交通，有把握的就打，沒有把握的就不打，讓他們鬧大點，鬧得愈大，改革就愈徹底；解放軍不要輕易上陣，不要輕易把部隊拉上去；要提高警惕，生產時把槍放在旁邊。[10]

西藏軍區在總體上採取守勢的同時，也使用了一部分兵力，對直接威脅到保留的工作點和公路線的局部地區，進行小規模平叛。8月下旬，西藏軍區得知康巴叛匪頭子公布扎西率眾將從山南去青柯寺藏軍的軍械庫取軍火，於8月27日至10月13日派出部分兵力對其進行追殲。經過一個半月的追擊，解放軍部隊共擊斃和俘虜其955人，不過這股叛匪仍取到了武器並得以逃竄。從9月20日起，西藏軍區昌都警備區以十六個連的兵力，在寧靜以北對曾經襲擊過竹卡溜索橋的以普巴本為首的叛亂分子展開圍剿，戰鬥至12月5日結束，共交火八十五次，殲滅俘虜叛亂分子共1213名。通過這一次激戰，使當地叛亂武裝遭受殲滅性打擊，僅普巴本等叛首在逃，昌都以南局勢暫時趨於穩定。

1958年10月末，西藏叛亂武裝又開始包圍和進攻駐雅魯藏布江以南的山南黨政機關和解放軍駐軍。叛亂武裝對澤當進行長時間的包圍和封鎖圍困，並從翌年2月起輪番發起進攻。當時解放軍守備部隊不停地投

入戰鬥，山南分工委的機關幹部、職工、家屬，以及避居分工委內的藏族愛國人士都拿起武器，各自分工，不顧疲勞日夜戰鬥，堅守崗位。山南保衛戰持續了近半年，在斷絕水源和糧食的情況下，守備人員每天只吃兩餐稀飯，靠雨水解渴，終於堅守到增援部隊到來。

鑑於整個西藏地區叛亂日益擴大的趨勢，1958年11月，拉薩、日喀則、昌都的各機關都成立民兵團（營），幹部、職工及部分家屬都配發了武器，以應付可能發生的全面叛亂。進入1959年年初，除山南外，西藏各地叛亂武裝也開始分別圍攻分散孤立的黨政機關和部隊守備點。札木中心縣委、波密縣委和丁青縣委都遭長期包圍和反覆進攻。

接到局部叛亂不斷擴大的報告，中央政府認為西藏反動分子的這種行動只能促使群眾覺悟和改革早日到來，並為鍛煉部隊提供一個機會。1959年1月29日，毛澤東在西藏軍區關於邊壩地區等地叛匪活動的電報上批示：「這種戰爭很有益處，可以發動群眾，可以鍛煉部隊。」[11]2月18日和19日，毛澤東在中央辦公廳關於西藏武裝叛亂情況簡報和解放軍總參謀部作戰部關於平叛情況報告上又作了批示，指出：我們不怕叛亂，可以鍛煉軍隊，可以鍛煉基本群眾，有益於將來實行徹底改革。[12]

事實表明，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層反動集團為了永遠保持其封建農奴制度，妄圖實現外國反動勢力多年策劃的所謂「西藏獨立」，拒絕履行與中央政府達成的《十七條協議》，對中央的教育和警告置若罔聞，決心與中央武力對抗。這樣，中央政府同西藏反動勢力進行一場總決戰已無可避免。

[1] 李維漢：《統一戰線問題與民族問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頁140。

[2] 鄧禮峰編著：《新中國軍事活動紀實（1949-1959）》（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9），頁430。

[3] 《新軍事活動紀實（1949-1959）》，頁431。

[4] 《毛澤東軍事活動紀事》，頁898。

[5] 《毛澤東軍事活動紀事》，頁898。

[6] 《新中國軍事活動紀實（1949-1959）》，頁50。

[7] 《新中國軍事活動紀實（1949-1959）》，頁505。

[8] 甘、青平叛戰爭中，發生了嚴重的擴大化錯誤，其突出的表現是：（一）有些地區不僅在平叛中不分叛亂分子和被裹脅的群眾，亂打亂殺，而且對未參加叛亂的、甚至有功的少數民族幹部、積極分子、勞動群眾以及上層愛國人士實行亂打亂殺。（二）有些地方對上層人士不分是否參加叛亂，實行亂捕亂判刑亂戴帽。（三）有些地方平叛後對少數民族幹部、群眾進行集訓和審查，錯誤地打擊了一大批幹部和群眾。李維漢：《统一戰線與民族問題》，頁586。

[9] 《新中國軍事活動紀實（1949-1959）》，頁512。

[10] 《新中國軍事活動紀實（1949-1959）》，頁518。

[11] 《毛澤東軍事活動紀事》，頁914。

[12] 《毛澤東軍事活動紀事》，頁915。

三、人民解放軍奉命平息

1.拉薩全城發生叛亂

1959年3月10日，西藏噶廈政府以達賴想到西藏軍區看演出為由，編造出「軍區想綁架達賴送往北京」的謠言，煽動拉薩全城暴亂。噶廈政府又以宗教號召和政令的形式打出「獨立」旗幟，向西藏各地發出了叛亂的命令。這一事件的發生，標誌着西藏地方政府內的反動勢力終於最後和中央政府決裂，徹底走上了背叛祖國的道路。叛亂分子以達賴為旗幟，利用宗教和民族情緒在西藏各地進行煽動，使得西藏地區的武裝叛亂由局部性叛亂演變為全區性叛亂。

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預定安排1959年4月在北京召開，中央人民政府事先通知擔任副委員長的達賴，希望屆時他能夠出席。這時西藏的反動勢力就大肆活動，散布謠言，阻止達賴去北京。2月間達賴本人提出，想到西藏軍區禮堂看節目，經噶廈政府和西藏軍區相商，演出時間定在3月10日下午。

3月9日夜間至10日早晨，拉薩市內突然發生了大規模騷動。由朗子轄（即噶廈的拉薩市政府）墨本（即市長）及西藏警察代本出面，在市民中散布謠言說：達賴喇嘛10日要去軍區赴宴，漢人準備在宴會上毒死達賴（一說是要把達賴和噶廈主要官員抓上飛機送往內地），要求藏人都去達賴居住的羅布林卡「請願」，阻止達賴去軍區。一些康巴武裝叛亂分子也騎馬帶槍奔馳於市內，脅迫群眾快去羅布林卡。阿沛·阿旺晉美對此回憶說：「三月十日上午八點多鐘，西藏拉薩街頭一片混亂，人們哭喊着奔走相告：『到羅布林卡去保護如意至寶吧！漢人要把他劫走了。』這喊聲對篤信佛教的藏族人民簡直是一聲炸雷。於是，人們懷着震驚、惶惑、恐怖的心情，湧向羅布林卡，以保護達賴為名，包圍了羅布林卡，揭開了武裝叛亂的帷幕。」[1]

在上層反動分子煽動下，3月10日上午許多不明真相的僧俗群眾包圍達賴的夏宮羅布林卡，一些叛亂分子乘機打傷西藏軍區副司令員桑頗·才旺仁增，殺害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委員、藏族愛國人士堪窮·索郎降措，並在拉薩街頭拖屍示眾。此時拉薩市內一片恐怖氣氛，商店關門，市民搶貯飲水。一夥康巴叛亂分子公然持搶上街進行威脅，許多暴徒還在市內街上貼標語、向解放軍執勤人員和中央駐藏機關工作人員投石頭、搗毀交通指揮亭，打砸機關和貿易公司門窗，西藏軍區和中央駐藏的工作人員在這種情況下都已無法外出。當天，策劃叛亂的首領們召集會議，正式宣布：「從10日起就正式站起來，同中央決裂，為爭取西藏

獨立而幹到底。」

在市內騷亂之後，叛亂集團又開始了軍事行動。3月10日黃昏，大批康巴叛亂分子和武裝喇嘛進入市區，原分散在拉薩周圍的武裝叛亂分子在天黑後也分小股陸續向市區集結。藏軍第一、第二、第六代本共二千馀人集結於拉薩城內，完全進入臨戰狀態。叛亂武裝大量進入拉薩後，加強了鳥瞰整個拉薩城的制高點藥王山的戰鬥工事，並控制了羅布林卡及其北側到城區的公路，佔據了城區的部分街道房屋。一些叛亂武裝分子甚至近逼到西藏軍區門外，在解放軍哨兵旁邊挖掘工事。噶廈政府還打開軍械庫公開給叛亂分子和市民發放槍枝彈藥，拉薩市內的武裝衝突，已面臨一觸即發的形勢。

3月10日以後，反動分子及其驅使的部分群眾不斷在拉薩街頭示威遊行，並打出「雪山獅子旗」，藏軍、康巴叛亂分子及三大寺的反動喇嘛將解放軍西藏軍區司令部和中央政府駐藏機關包圍，做出種種挑釁行為並進行零星射擊。在3月10日和11日的偽「人民代表會議」上，以警衛達賴的名義成立了叛亂軍事指揮機構，並任命了號稱西藏四大貴族之一的拉魯·次旺多吉為「西藏獨立國」武裝總司令部的「總司令」。剛成立的叛亂指揮機構派人星夜分赴西藏各地送噶廈政府的命令，以「保衛達賴」為名，要求各地響應拉薩的行動。

2.中央決心徹底平叛

這時，拉薩城內解放軍戰鬥部隊只有十三個步兵連、一個炮兵團和部分後勤人員，處於七千多名有組織的叛亂武裝的包圍中，形勢十分嚴峻。鑑於大規模的平叛已不可避免，西藏軍區原有部隊難以擔負全區性平叛任務，3月13日，中央軍委下令調動增援部隊入藏平叛。根據命令，第五十四軍第一三四師於3月17日從蘭州出發進藏，[2]其餘增援部隊也陸續向西藏開進。

毛澤東於3月上旬到南方視察。3月12日至15日，毛連續三次從武昌打電報向中央提出，拉薩上層反動集團可能認為我們示弱、膽怯、無能。建議在西藏軍事上採取守勢，政治上採取攻勢，目的是分化上層，教育下層。並請中央考慮對達賴可能出走在政治上採取何種態度和須採取的措施。3月17日，劉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西藏藏軍叛亂的緊急情況和毛澤東的建議。會上，劉少奇和鄧小平都認為，當前首先是準備堅決平息叛亂，改組西藏地方政府，改組藏軍，實行政教分離，然後全面實行民主改革。周恩來指出，這次事件同印度當局有關，英國和美國政府在幕後很積極，支持印度當局，把印度推到第一線。叛亂的指揮中心在印度的噶倫堡。[3]會議對平息西藏叛亂作了相應的部署。

根據中央的指示，駐藏解放軍部隊堅持後發制人的原則。儘管叛亂分子多方挑釁，經常將石頭投到西藏軍區部隊駐地院內，圍住軍區大樓持槍叫囂辱罵並時常對空鳴槍，各駐軍部隊仍堅持「不打第一槍」的原則，保持了克制態度。同時，西藏工委和軍區為應付叛亂分子的進攻，將駐拉薩的部隊、地方機關單位統一組織起來，劃分八個防禦區域，明確各區域的指揮員。所有機關、企事業單位都組織了民兵自衛，加強了防禦工事，儲備了糧、柴、水和彈藥，準備長期堅守作戰。與此同時，在政治上大力揭露叛亂集團的罪行。在拉薩城內的叛亂喧囂聲中，西藏軍區部隊和黨政機關仍通過各種形式對人民群眾廣泛展開宣傳，揭露叛亂罪惡事實真相和反動分子的陰謀。由於中國共產黨在西藏長期的反帝愛國統一戰線工作，以及不斷地有針對性地對上層人士的爭取工作，因此，儘管噶廈政府下了命令，武裝叛亂分子又大肆進行威脅，在西藏地方政府中仍有許多官員堅決反對叛亂或者不參加叛亂。西藏兩大神王之一的班禪額爾德尼更是堅持愛國立場，在他的居住地日喀則堅決抵制了叛亂，隨後又趕到北京參加了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在大會上發言嚴正譴責了叛亂行為。當時參加了叛亂活動和外逃的噶廈政府的官員中，也有不少人是出於被脅迫。在叛亂分子殺害和威脅愛國人士時，西藏工委、西藏軍區還採取措施保護上層愛國人士及藏族幹部、學生、工人和他們家屬的安全。

3月17日，叛亂武裝向駐拉薩某交通部門民兵連射擊並發起進攻，該連對叛亂武裝還擊了兩發六十毫米迫擊炮彈，落於空曠地帶。這兩發炮彈每顆重僅一公斤多，威力不過略大於一顆手榴彈，射出後並未造成任何殺傷和破壞。叛亂集團卻以所謂「漢人兩發炮弹打到羅布林卡北圍牆之外，威脅達賴安全」為藉口，要挾達賴盡快外逃。17日當晚，達賴及其家屬，噶廈政府的三名噶倫索康、柳霞、夏蘇以及達賴的經師、副經師等離開羅布林卡，在達賴的姐夫彭措扎西率領的藏軍第二代本的簇擁下，南渡拉薩河逃向山南，沿途都有叛亂集團早已安排好的武裝接應。

達賴在叛亂武裝的「護送」下出走後，留在拉薩的叛亂集團繼續加緊軍事叛亂的準備。拉薩市內的電話線都被叛亂分子割斷，電線桿被砍倒，來自各地的叛亂分子還在不斷湧入拉薩。為了爭取政治上的有理、有利地位，西藏軍區部隊掩護內地駐拉薩的宣傳機關積極行動起來，大力搜集叛亂武裝的罪證。軍區派出裝甲車，運載中央新聞電影製片廠的記者一再前往拉薩城內外叛亂分子佔據的陣地前，現場拍攝叛亂分子的活動實況。當叛亂分子在布達拉宮前召集城內婦女「賭咒罰誓」要「趕走漢人」時，攝影記者還背起衝鋒槍走到會場中進行拍攝。針對反動勢力的煽動，西藏工委和西藏軍區也針鋒相對地向藏族群眾散發了宣傳品，揭露叛亂分子的罪行。

3月20日淩晨，西藏軍區派出執行任務的一個連前進至拉薩河南岸牛尾山西側時，在黑暗中遭叛亂分子射擊。拉薩河南岸的槍炮聲響起後，城內的叛亂武裝也隨之向城區、郊區各機關、部隊、企事業單位駐地進行猛烈射擊。處於臨戰準備中的解放軍各部隊和民兵被迫實行自衛，向叛亂武裝開槍開炮，平叛作戰就此打響。

戰鬥打響後，西藏軍區召開幹部緊急會議，在譚冠三政委、鄧少東副司令員主持下確定，不待內地的增援部隊到達，即以現有機動作戰部隊在民兵配合下平息市區內的叛亂。解放軍駐拉薩部隊在數量居劣勢的情況下，首先集中炮兵火力急襲藏軍長期佔領的藥王山，於中午攻佔這個俯瞰全城的制高點。同日下午，西藏軍區部隊以集中兵力各個殲擊的方式，先以炮兵掩護步兵和汽車兵向叛亂司令部羅布林卡發起攻擊。在猛烈的打擊下，叛亂分子企圖從院內外逃被打退後，平叛部隊乘機從正門尾隨突入院內，展開近戰，從西面進攻的部隊也於20時30分衝入院內，叛亂分子潰逃。奪取羅布林卡後，西藏軍區決定轉移兵力逐個攻擊市內叛亂據點。

3月21日晨，解放軍平叛部隊對拉薩市區的叛亂武裝達成合圍，一部分叛亂武裝見勢不妙向郊區逃跑，大部叛亂武裝仍憑藉寺院和民房進行頑抗。在小昭寺內的叛亂分子還打出「雪山獅子旗」，氣焰十分囂張。當日下午15時，解放軍平叛部隊向小昭寺發起衝擊，經半個小時激戰殲滅了寺內的反動武裝。此後，部隊繼續向拉薩市內叛亂武裝盤據的各據點發起攻擊，先後攻佔恩珠昆倉宅、朗加多吉宅、木耳寺等主要據點，並將市內殘餘的叛亂骨幹分子包圍於大昭寺內。22日拂曉，經過解放軍宣傳政策，大昭寺內的叛亂分子全部投降，市內少數頑固的叛亂分子向外逃走，拉薩叛亂就此平息。

拉薩市內的平叛戰鬥展開後的第二天，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於3月21日及時發出了《關於堅決平定西藏叛亂的政治工作指示》，要求平叛部隊必須把軍事鬥爭、政治爭取和發動群眾三者緊密結合起來，並重申了黨的民族政策、俘虜政策和宗教政策，指出：「凡在戰鬥中手持武器與我對抗者，堅決予以消滅；但當他們放下武器以後，就應當實行優待；嚴格禁止打罵、侮辱、虐待和殺害俘虜；受傷的給以治療，投誠的一律歡迎、優待。對於被脅迫逃走的人民群眾，特別是婦孺老幼，應當進行艱苦的工作，爭取他們脱離反動派，回家生產。」「對喇嘛寺一律加以保護（包括一切文物古跡）。必須尊重人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參加叛亂的西藏統治集團中，有不少人是猶豫動搖的，應對他們進行瓦解和爭取工作。」駐藏部隊嚴格執行了黨的政策。在拉薩市內作戰時，西藏軍區部隊還特別注意保護寺院及其他文物古跡。對叛亂分子盤踞的有重要影響的文化建築物，部隊都不使用重火器強攻而以其他方式力爭使叛亂分子投降。在平叛戰鬥期間，布達拉宮、羅布林卡、大昭寺

的主體建築和甘丹寺、色拉寺、哲蚌寺都完好無損，各處所存的重要文物也及時受到保護。解放軍指戰員模範遵守紀律和政策的實際行動，有力地教育和感動了廣大藏族群眾，保證了平叛鬥爭的順利進行。戰鬥結束後，許多人民群眾焚香頂禮，額手稱慶，紛紛向黨政幹部和解放軍官兵控訴叛亂分子的罪行，交出叛亂分子遺棄的武器彈藥，協助解放軍肅清殘敵。

拉薩平叛戰鬥結束後，因原來的噶廈政府官員大都逃散，3月23日西藏軍區成立拉薩市軍事管制委員會，接管拉薩地區政治、軍事、民政事宜。從3月24日起，市內商店陸續開門營業，人民生活恢復正常。拉薩平叛戰鬥的初戰勝利，打亂了西藏上層反動集團的武裝叛亂部署，使西藏全區性武裝叛亂失去了指揮中心。由於增援部隊尚未到達，西藏軍區參戰的兵力不足，因而未能全殲拉薩城內的叛亂武裝，使其一部逃至外地。

3月28日，由國務院總理周恩來簽發的《關於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的命令》正式公布。《命令》決定由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職權。在達賴喇嘛被劫持期間，由班禪額爾德尼代理主任委員。任命常務委員帕巴拉·卓列朗杰為副主任委員，常務委員兼秘書長阿沛·阿旺晉美為副主任委員兼秘書長。撤销叛國分子索康·旺清格勒等十八人的自治區籌備委員會委員和一切職務，並按國家法律分別給予懲處。《命令》希望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領導全藏僧俗人民，團結一致，共同努力，協助人民解放軍迅速平息叛亂，鞏固國防，保護各族人民利益，安定社會秩序，為建設民主和社會主義的新西藏而奮鬥。[4]隨後，國務院發布布告，鑑於昌都地區人民解放委員會（即1950年代初成立的昌都地區最高行政機關）及其所轄各宗（縣）人民解放委員會的大部分委員參加了叛亂，決定撤销該兩級解放委員會。政權機構的改革，標誌着西藏的社會性質起了根本的變化。

3.進軍山南摧毀叛亂中心

在拉薩平叛勝利之後，位於雅魯藏布江以南、與不丹和印度相鄰的山南地區成為西藏全區性叛亂的主要基地和指揮中心。叛亂武裝企圖以此地為長期頑抗的根據地，並爭取「國際援助」。因此，盡快佔領山南地區，摧毀叛亂武裝新的指揮中心，斷絕其國外接濟的主要通道，就成為平息整個西藏地區叛亂的首要任務。1959年4月西藏軍區以新入藏增援的第五十四軍部隊為主力，分路渡過雅魯藏布江，以分進合擊的方式發起了山南戰役。

達賴一行於3月17日渡過拉薩河南逃，25日到達山南地區的隆子宗（縣），叛亂集團宣布該地為「第二國都」。但達賴等人只在山南短暫

停留，随即繼續南下，於3月31日越過「麥克馬洪線」進入印佔區。[5]對於達賴入印和西藏出現的嚴重叛亂，國際上就西藏問題掀起了一股反華逆流。美國政府一再表示支持和同情西藏叛亂分子，印度政府也公開表示「同情」，並派印軍在邊境地區的實際控制線附近接應出逃人員。

根據中央軍委決定，進藏增援的部隊於3月下旬相繼到達。除西藏軍區指揮下的平叛部隊外，成都軍區副司令員黃新亭率領軍區前進指揮所，負責指揮昌都地區的平叛部隊。

山南戰役開始前，平叛部隊投入了四個團的兵力，從4月4日至9日分五路向山南地區開進。部隊以分進合擊，迂迴包圍的手段突破叛亂武裝的沿江防線，強渡雅魯藏布江，向縱深穿插。各部隊渡江後，同已經被圍困在澤當地區的解放軍分隊一起內外夾擊叛亂武裝。叛亂分子發現解放軍渡江後，迅即逃竄。西藏軍區随即調整部署，要求部隊長途奔襲，盡快佔領出境的各路口，封鎖叛亂武裝的逃路。

在向邊境穿插前進中，參加平叛的部隊不顧疲勞和對高原氣候的不適應，在地形複雜的山區長途跋涉，克服了重重困難，在短期內佔領山南地區，經過不斷的反覆清剿，基本肅清當地的叛亂分子。山南戰役至4月底基本結束，此次戰役一舉蕩平了西藏叛亂集團的主要巢穴，封鎖了亞東以東，米林以西邊境線，割斷了叛亂分子與國外陸上聯繫的主要通道。只是部隊剛剛進入西藏內地作戰，地形敵情均不熟悉，未能完成殲滅敵人主力的計劃。

山南戰役臨近結束時，新華社於4月23日發出報道，宣布山南地區和喜馬拉雅山以北所有邊境要點全部在人民解放軍控制之下。4月25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歡呼討平西藏山南叛匪的重大勝利〉指出：山南地區平息叛亂的偉大勝利，是對西藏叛國集團一個致命的打擊，也是對帝國主義和外國擴張主義者一個沉重的打擊。這個勝利，不僅加強了國家統一和民族團結的事業，並且鞏固了我國西南的國防，維護了我國的領土主權的完整。

4.平息納木湖等地區的武裝叛亂

拉薩、山南地區的武裝叛亂被平息以後，聚集在纳木湖、麥地卡和昌都等重點地區的叛亂武裝仍然十分猖狂，危害甚大。因此，駐藏解放軍又相繼在這些地區展開了平叛鬥爭。

由於西藏面積廣闊，解放軍西藏軍區部隊和成都軍區、蘭州軍區參戰的部隊在供應困難、參戰兵力有限的情況下，決定採取集中部隊分區平叛的方式。先消滅對威脅較大的叛亂武裝，淨化一地，鞏固一地，再轉一地。

1959年7月間，西藏軍區部隊在藏北進行的纳木湖地區的平叛，是

西藏牧區平叛的首次作戰。這一帶地域廣闊，人口稀少且多係放牧為生，有數千名武裝叛亂分子在此地流竄。西藏軍區指揮部隊開始採取前堵後追的方式，形成東西夾擊之勢，並由進至羊八井、當雄一線的部隊分路由南向北進擊，於7月6日將叛亂武裝包圍於納木湖以南的山區。經兩日激戰，殲滅部分叛亂武裝，隨即嚴密封鎖山口要道，逐山逐溝地進行搜索，至7月29日全部肅清了這一地區的叛亂武裝。在納木湖作戰中，平叛部隊嚴格執行政策，對被裹脅參叛的群眾一律不捕不押，盡可能避免傷害牲畜。即使是持槍者，也採取先包圍喊話，不抵抗就不開槍的原則。通過發動投誠人員進行勸説，使大批參叛人員投降。

8月至9月間，西藏軍區部隊又在藏北的麥地卡進行平叛作戰。拉薩東北以彭錯湖為中心的麥地卡地區，當時集中了叛亂武裝分子約五千人，他們殘害人民，並襲擊青藏公路道班，為禍嚴重。平叛部隊於8月26日到達指定地點，切斷了叛亂分子東逃的道路，接着對這一地區形成合圍，再從外向內推進，逐步缩小包圍圈，經七天作戰殲滅了大股之敵，隨後部隊劃分區域，以分片包乾的方式進行清剿，至9月中旬基本肅清了當地叛亂武裝。

同年4月至10月，解放軍在昌都地區也進行了兩次大規模的平叛作戰。昌都地區早在1956年就發生了武裝叛亂，拉薩叛亂發生後，當地反動勢力活動更加猖狂，並脅迫當地成年男子參加叛亂活動，使昌都地區田園荒蕪，給群眾帶來極大災難。在西藏軍匾進行山南戰役的同時，解放軍成都軍區前進指揮所指揮昌都地區的部隊全面展開了平叛作戰。因這一地區面積大，交通不便，部隊機動困難，於是採取了首先集中兵力平息瀾滄江以東地區的叛亂，然後再解決瀾滄江以西地區的叛亂武裝。4月中旬，平叛部隊首先向昌都東北的江達、拉多和類烏齊發起進剿，粉碎了那裏的集股叛亂分子。昆明軍區部隊也在滇藏邊界的鹽井地區殲滅藏族叛亂武裝四百三十餘人，從而粉碎了當地的大股叛亂武裝。同年秋天，平叛部隊又集中兵力平息了昌都東南的貢覺、察雅、左貢、洛隆和丁青地區的叛亂，使當地嚴重的局面得以缓解，特別是肅清了威脅川藏公路的重點叛亂地區。

進入1960年初，西藏地區的大部分成股叛亂武裝已被打垮，人口稠密和接近交通要道的地區基本獲得解放。

5.肅清邊沿地區的叛亂武裝

西藏東北部恩達、丁青、嘉黎、扎木之間的地區，屬高寒地帶，氣候惡劣，每年9月至翌年5月大雪封山，除主要道路外，一般小路均不能通行。西藏各主要地區和交通要道附近的武裝叛亂被平息後，由青海、康巴、昌都東部等地逃來的叛亂武裝，加上叛亂首領強迫徵集當地成年

男子參叛，使叛亂武裝的人數達到萬人以上。在美國受過訓練的藏族特工人員，已被陸續空投回西藏，他們一面用所攜的電台同設在印度的叛亂指揮機構聯絡，一面擔負起「游擊戰」的指揮並對叛亂分子進行訓練。外來飛機一再飛抵叛亂武裝的聚集區域實施空投，除了投下食物藥品外，還投下適合於游擊戰的美製無後座力炮、高射機槍、輕機槍、衝鋒槍、步槍和大批彈藥。叛亂武裝得到境外武器彈藥的接濟和「遊擊戰」的專門訓練，戰鬥力有一定程度的提高，這就增加了平叛作戰的難度。為徹底平息全區性的叛亂，西藏軍區仍採取集中兵力分區作戰的方式，逐次肅清各個地區的叛亂武裝。

1960年2月至4月間，解放軍發起了西藏平叛期間規模最大、也最為艱苦的昌都以西的恩達、丁青、扎木地區的作戰。在制定進剿計劃時，為了達到出敵不意和不過多影響群眾春耕播種，西藏軍區決定進剿時間提前到大雪封山的2月間開始。昌都以西地區平均海拔四千米以上，雪山和森林交錯，並有許多河流，在冬季未結束前除少數道路外一般不能通行。這時發起進剿，有利於封鎖叛亂武裝的逃路。不過因氣候惡劣，參戰部隊也要在嚴峻的自然環境下行動。1960年2月15日，參戰各部隊向預定地區開進，並於29日全面打響，形成了合圍之勢。平叛部隊將合圍圈向內壓縮一百公里，然後以三分之一的兵力進行堵擊，其餘部隊分路向心攻擊。

叛亂武裝遭此沉重打擊，一部被殲，其餘化大股為小股，想藉深山密林，分散隱藏流竄，妄圖尋機突圍。在進剿部隊向包圍圈內壓缩時，擔負堵擊任務的部隊在戰區邊緣忍受着零下四十度的嚴寒，以生米生麵充飢，日夜巡邏，攔堵企圖外逃的叛亂分子。在惡劣的自然條件下，有不少指戰員犧牲和傷病。然而他們在極為惡劣的環境堅守四十多天，消滅了大部分企圖突圍之敵。向包圍圈內進擊的部隊擊潰成股叛亂武裝後轉入搜剿，經一個半月戰鬥掃除了當地叛亂武裝。

1960年4月末至6月上旬，平叛部隊又向殘餘叛亂武裝集中的溫泉、那曲以北的青藏交界地區發起進剿。該地雪山草原相接，山上終年積雪，長期盤踞着部分青海、西藏的叛亂武裝，有一批剛剛在美國受過訓練的藏族特務空降到此，並有境外的飛機空投械彈物資。在這批空降特務的控制指揮下，叛亂武裝成立了所謂「馬基列空」（總司令部），並按照營、連、排編隊，進行軍事訓練，建立起當時指揮西藏叛亂武裝的中心和主要「根據地」。為掃除該地的叛亂武裝，解放軍參戰各部隊從4月29日起向預定目標隱蔽開進，5月5日拂曉達成戰役合圍。各部隊首先在合圍圈外控制要地，阻敵突圍，主力分多路多箭頭向中心地區之敵發起總攻。叛亂分子開始還進行了較為頑強的抵抗，不久其大股武裝即在解放軍猛烈打擊下崩潰，殘餘力量分成小股四處流竄，有些潛入深山崖洞，有的伺機突圍。從5月中旬起，進剿部隊全面展開搜剿，至6月5

日將殘敵大部肅清，少數利用空隙向鄰區逃竄。

至1960秋初，西藏全區只有昌都東南地區還有較多的成股叛亂武裝活動。該地東鄰金沙江，西靠怒江，山脈綿亙，原始森林密布，交通閉塞，地形十分複雜，平叛鬥爭屢經反覆。1959年在昌都東部被打垮的叛亂武裝殘餘，也多竄入此地隱蔽活動。為完成在昌都地區持續了幾年的平叛鬥爭，平叛部隊經過一段休整並認真檢查了政策執行情況之後，從1960年10月中旬起對昌都東南之寧靜（芒康）、三岩（雄松）地區的叛亂武裝再次發起進剿。部隊經分路奔襲，於10月16日達成合圍，然後各部隊分路進擊，殲滅了大部分成股叛亂武裝，殘餘叛亂分子就地潛藏或流竄於原始森林之中，部隊遂轉入分散清剿。在進行寧靜、三岩地區戰鬥的同時，昌都其餘部隊在昌都北部及鹽井、扎玉等地展開了清剿。由於政策落實，群眾支援部隊平叛的積極性增高，一些參叛人員的家屬也動員家人投降，並協助部隊捉拿叛首。當時搜剿部隊在昌都北部生俘了重要叛首齊美公布·呷日本·才旺多吉。寧靜、三岩地區的另一主要叛首、原國民黨少將八角喇嘛在偵捕隊的不斷搜捕下，只帶領一名親信在山野躲藏三個月，後因飢餓無食被迫出來尋找解放軍繳械投降。

至1961年初，西藏全區只有千餘武裝叛亂分子在活動，大都為漏網的頑固分子，主要集中在昌都的東南部和鄰近青藏交界處。西藏軍區根據這一形勢，統一組織軍民以合圍搜剿、專案偵捕和邊偵邊打的方式，對殘存的叛匪進行清剿。平叛部隊實施分區包乾清剿，並特別加強了重點地區的領導和力量。昌都地區是這一年平叛鬥爭的重點，肅清殘餘叛亂分子的工作進展較快。西藏全區殘存的重要叛首，如寧靜地區叛亂武裝司令札巴、副司令麥巴，叛首吉錯本·龍中郭布和六名空降特務，都陸續被俘獲或擊斃。至1961年底，西藏殘餘的叛亂分子大部投降，少數被殲，平叛鬥爭至此勝利結束。

經過近三年的平叛鬥爭，整個西藏地區的武裝叛亂被徹底平息。人民解放軍共殲滅叛亂武裝共9.3萬人。[6]據不完全统計，藏族同胞支援解放軍平叛行動達1.58萬餘人次，計43.9萬餘工日；支援畜力10.4萬餘頭（匹）次，計286.62萬餘工日。藏族同胞的有力支援，為平叛鬥爭的勝利提供了可靠的保證。

平叛鬥爭的勝利，有力地打擊了西藏上層集團中少數分裂分子勾結國外勢力分裂中國的陰謀，維護了祖國統一，增進了民族團結。随着平叛鬥爭的勝利，百萬農奴摧毀了西藏的封建農奴制度，進行了民主改革，推翻三大領主的统治，建立了各級民主政權，廣大農牧民由此翻身做了主人。

[1] 《中國藏學》，1988年第2期。

[2] 《新中國軍事活動紀實》，頁541。

[3]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頁212。

[4]《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卷，頁214。

[5] 在達賴出逃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裏，中央政府還希望他能夠與叛亂分子劃清界限並返回祖國，因而保留其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主任的職務。直至1964年12月17日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開會期間才公開宣布，鑑於達賴在國外的言行已嚴重背叛祖國，國務院第151次會議作出撤銷達賴的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職務的決定。

[6] 在這些殲敵數量統計之中，大部分人為俘虜和招降。這些被俘和投降者又大都是在叛亂的封建領主和高級僧侶欺騙威逼下被迫跟隨作亂的一般群眾和普通僧人。解放軍對於這些被威脅參加叛亂的群眾，不論他們是主動的或是被動的放下武器，經短期教育後，都發給路費遣送回家參加生產不再當作叛亂分子對待。對於平叛作戰中的負傷者，也都給予醫治。所以大多數被列入被殲叛亂分子數字之內的人，在戰時或戰後就已很快轉變為和平居民。見《新中國軍事活動紀實》，頁543。

四、民主改革和西藏自治區的建立

1.「邊平邊改」的民主改革

西藏和川、青、甘、滇四省藏區發生大規模叛亂的事實證明，西藏和平解放時還遺留下來的政教合一的神權統治和農奴制度，是西藏反動勢力賴以發動叛亂的社會基礎。要從根本上消除叛亂，必須鏟除原西藏政教合一的社會基礎，使藏族廣大貧苦農奴和奴隸得到解放。

就在1959年3月西藏叛亂開始不久，3月21日，經周恩來總理改定的〈中央關於在西藏平息叛亂中實現民主改革的若干政策問題的指示〉稿即指出：

> 西藏噶廈政府背叛祖國，局勢迫使我們提前同西藏上層反動分裂主義分子進行決戰。六年不改的政策自然不能再繼續下去。必須堅決放手發動群眾，實行民主改革。民主改革在平叛的口號下充分進行。可實行邊平邊改、先平先改和未平地區暫緩改革的方針。改革要在照顧西藏特點的原則下進行。實行民主改革的階級路線，是依靠勞動人民，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有步驟有區別地消滅封建農奴制度。繼續堅持保護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牧區不進行民主改革。工商業一律不動。對外貿易统一由國家經營。在改革中，要放手發動群眾，領導群眾進行诉苦運動，對叛亂分子應當展開面對面的説理鬥爭。要教育全軍堅持黨的民族政策，遵守在平息叛亂與民主改革中的各項政策。[1]

全面平叛展開之後，中共中央於1959年5月正式確定了實行民主改革的各項政策，將各地平叛的軍事鬥爭與民主改革结合進行，以「邊平邊改」的方式徹底平定叛亂。即一方面以軍事手段摧毀農奴主階級的軍事力量即叛亂武裝，掃除改革的障礙；一方面以民主改革滿足群眾對土地、牲畜等生產資料的要求，廢除三大領主的封建特權，解除廣大農奴和奴隸對農奴主的人身依附關係，完成生產资料所有制的徹底變革。從而達到到廢除西藏上層僧侶和貴族對農牧奴專政的政教合一的農奴制度，完全解放百萬農奴，在西藏建立人民民主制度的目的。從1959年春至1961年的三年間，經過解放軍驻藏部隊、廣大漢藏族幹部和群眾的努力，西藏地區的民主改革勝利完成。

西藏農村民主改革的具體步驟和方法是：對封建農奴主階級佔有的生產資料，採取分步驟解決的辦法。首先，對叛亂領主及其代理人的土地實行「誰種誰收」。接着進行「三反」（反叛亂、反烏拉、反奴役）、「雙減」（減租、減息）。對未叛領主及其代理人實行減租、減

息。根據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第二次全體委員會通過的《西藏地區減租減息實施方案》，對未叛領主及其代理人的地租實行「二八」減租，1958年前的欠租一律免交，對未叛領主及其代理人在1958年以前放給農民及其他勞動人民的舊債一律廢除。1959年9月，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第三次全體委員會會議，制訂和通過了《西藏地區土地制度改革的實施辦法》。根據西藏農奴主只佔全區人口的2%，農奴主代理人約佔全區人口3%，以及西藏全部耕地中，西藏地方政府佔36%，寺廟佔34%，封建領主佔30%等情況，制定了《關於劃分西藏農村階級的方案》和《關於執行贖買政策的具體辦法》。方案規定，在農村只劃農奴主和農奴兩大階級。農奴主階級又分為農奴主和農奴主代理人兩個階層。農奴階級又分為富裕農奴、中等農奴和貧苦農奴幾個階層。

在土地改革中，西藏地方政府的耕地全部分給農民，其債務、烏拉和差役予以廢除。封建領主的封建佔有制一律廢除，其中凡是參加叛亂者的耕地、房屋、耕畜、糧食和農具一律沒收，分給農民，其債務、烏拉和差役一律廢除。對於沒有參加叛亂的農奴主的土地、牲畜等生產资料，由政府作價贖買，然後分配給農民。在平息叛亂和民主改革中表現進步並且政治上有較大影響的進步人士，在他們放棄封建剝削之後，在政治上給予適當安排並在生活上予以照顧。根據土地改革實施辦法，對農奴不分男女老少，平分土地，在照顧原有耕地的基礎上按土地數量、質量，抽多補少，好壞搭配，進行分配。

經過民主改革，基本上摧毀了封建農奴社會的經濟基礎，確立了農民的個體所有制，廢除了三大領主對農奴的人身奴役，百萬農奴得到了解放。

經過民主改革，徹底摧毀了三大領主的封建專制政權，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權。過去受壓迫、受奴役的廣大農奴和奴隸，在政治上翻了身，作了新社會的主人。解放了的農奴，有了自己的土地、牲畜，生產積極性大大高漲，改革的第一年就獲得了豐收。

西藏牧區的民主改革，有不同於其他牧區的特點。西藏全區從事牧業生產的人口約三十萬。純牧區主要分布在西藏的西部和北部地區。這片綿延數十萬平方公里的草場，就是有名的羌塘草原。在这裏放牧的牲畜約佔全區牲畜的一半，其餘的分布在半牧區，20%分布在農業區。民主改革前，西藏全區共有大小牲畜近一千萬頭（隻）。

在民主改革時，除沒收叛亂領主和叛亂牧主的牲畜分給原放牧者及貧苦牧民所有外，整個牧區包括牲畜在內的生產资料所有制不予變更，不分不鬥，不劃階級。

牧區民主改革的基本任務是：平息叛亂，安定人心，建設人民政權，保護和發展牲畜，逐步改善牧民生活。改革的步驟是：第一步對叛亂領主、代理人和牧主的牲畜實行「誰放牧歸誰所有」，第二步在「三

反」（反對叛亂、反對烏拉差役、反對奴役）的基礎上，實行牧工、牧主兩利政策，就是減輕牧主對牧工的剝削，廢除人身依附關係，保障牧工的政治權利，適當改善牧工的生活。

在牧區不公開劃階級，但在內部要將領主、牧主劃出來，其餘劃為牧民。在西藏構成牧主的條件是：佔有大量牲畜（按當地習慣折合綿羊二千隻以上），僱用長年牧工三人以上（一百八十個短工折合一個長工），剝削收入佔其總收入（受三大領主剝削部分應予抵销）70%以上。

由於西藏牧區實行上述方針、政策，團結了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民主改革進行得比較順利，保護了牲畜和畜牧業生產的發展。

從1959年夏天起至1961年，西藏全區已有二百七十個區、一千三百多個鄉建立了人民政權。有六千名藏族幹部擔任了各級政權的領導，其中95%是翻身農奴出身。在民主改革的過程中，中央規定對西藏未參叛的上層人士仍全部實行原先設想的贖買政策，將其土地和多餘財產分配給廣大貧苦農奴，然後由國家付給贖金。政府還給他們安排適當的職務，生活上予以適當照顧。這樣，全區未參加叛亂的農奴主及其代理人二千三百餘戶全部辦理了贖買手續，得到了妥善安置。[2]

2.「穩定發展」西藏經濟

西藏在實行「邊平邊改」的同時，內地還處在「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高潮期，「左」的思潮也一度影響到西藏地區的民主改革，在農村和牧區造成了混亂。中央及時發現，並作了糾正。

1960年8月，周恩來會見阿沛·阿旺晉美時，跟他們說：「不要急於搞合作社，不要急於抄內地一套」；「穩定一個時期，搞好生產」；「要發展人口，發展生產」，達到「人畜兩旺」。[3]12月，周恩來在同中共西藏工委負責人張國華等談話時再次強調：西藏民主改革後的所有制至少四年不變，四年肯定不搞合作社，只搞互助組。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保護勞動力，發展生產。西藏人口少，更要注意保護勞動力，這是一切的一切。颳「共產風」、浮誇風，忽視對勞動力的保護，教訓太大了。你們要多想些辦法，不要急於搞社會主義改造。西藏的經濟條件不再前進，就搞社會主義改造是行不通的。[4]

1960年11月15日，中央在西藏試辦農業生產合作社問題的批覆中指出，西藏地區幾年之內不進行社會主義改造，不要試辦農業生產合作社。1961年1月23日，毛澤東在同班禪談話中指出，西藏社會制度經過改革，從封建農奴制度變成了農牧民個體所有制，要安定一個時期。現在只搞互助組，不搞合作社，發展生產，使農牧民安定下來，生活得到改善。1月24日，周恩來在與班禪、張經武談話時也説到，西藏地區遼

闊，不要主觀，一切從群眾的需要出發。西藏的方針、政策概括起來就是，土地所有制是農民個體所有制，這個制度要繼續好多年，中心是增加生產，這條要堅定不移地執行下去。前一時期，工委工作有點急，搞了合作社，有的甚至用了人民公社的名字。現在就是把農民佔有土地的制度鞏固下來。[5]

1961年春，周恩來、鄧小平召開會議，討論西藏工作，著重研究西藏工作的方針和若干重要問題，並於同年4月21日下達了中央《關於西藏工作方針的指示》。中央提出，今後的西藏工作必須採取穩定發展的方針，從今年（指1961年）算起，五年以內不搞社會主義改造，不搞合作社（連試點也不搞），更不搞人民公社，集中力量把民主革命搞徹底，讓勞動人民的個體所有制穩定下來，讓農（牧）民的經濟得到發展，讓翻了身的農奴群眾能夠確實嘗到民主改革給他們帶來的好處。在這五年之內，黨在西藏的一切政策，包括經濟政策、財貿政策、社會改革政策、民族政策、對上層人士的團结改造政策、宗教政策等等，都一定要力求穩妥，都要防「左」防急。[6]

據此，中共西藏工委1961年制定了《關於農村工作中若干具體政策的規定》和《關於牧區當前若干政策的規定》，後來又制定了農牧區的一系列政策，穩定了農牧民個體所有制和牧主所有制。實行「穩定發展」方針的西藏農村和牧區，到1964年，全區建立了二萬二千多個農業互助組，入組農民佔農業人口的90%左右，同時在牧區建立了幾千個牧業互助組。同改革前的1958年相比，1965年，糧食增長了88.6%，牲畜增長了54.1%，農牧民生活得到了明顯的改善。

3.西藏自治區正式成立

為由自治區籌備委員會過渡到自治區政府的建立，1961年8月2日，自治區籌備委員會通過進行民主選舉試點工作的決議。1963年3月8日，西藏第一個由人民選舉產生的縣級人民政權機關——乃東縣人民委員會成立。1965年8月13日，西藏全區縣级選舉工作結束。選舉產生了縣级人民政府，並選出出席自治區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8月25日，全國人大常委會批準國務院議案，通過關於成立西藏自治區的決議。

1965年9月1日至9日，西藏自治區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在拉薩舉行。這次會議，是百萬翻身農奴當家作主的大會。出席大會的代表三百零一名。其中藏族代表二百二十六人，門巴族、珞巴族、回族、纳西族、怒族和其他代表共十六人，佔代表總數的80%以上。藏族和其他少數民族代表中，絕大多數是翻身農奴和奴隸，也有一部分是愛國進步的上層人士和宗教界人士。

中共中央和國務院派出以中共中央委員、國務院副總理謝富治為團

長、中央人民政府駐西藏代表張經武，國家民委副主任劉春為副團長的中央代表團，[7]到拉薩祝贺西藏自治區成立。

中共西藏自治區委員會第一書記張國華在會上作題為《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為爭取社會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為建設社會主義的新西藏而奮鬥》的政治報告。對西藏十五年來的工作進行了總結。提出以後的主要任務是：繼續大力開展互助合作運動，發展農牧業生產；積極地進行社會主義建設；在條件成熟的情況下，逐步地、穩妥地、分期分批地實現社會主義改造；加強國防建設，保衛國防，鞏固國防。

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代理主任委員阿沛·阿旺晉美在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工作報告中，回顧了在籌備西藏自治區成立過程中所經歷的鬥爭，列舉了籌委會成立之後西藏在經濟、文化方面所取得的主要成績。

經大會代表投票選舉，產生了西藏自治區人民委員會。阿沛·阿旺晉美當選為自治區人民委員會主席，周仁山、帕巴拉·格列朗杰、郭錫蘭，協繞頓珠（楊東生）、朗頓·貢噶旺秋、崔科·頓珠才仁、生欽·洛桑堅贊當選為副主席，達瓦、仁欽索朗、扎西平措等三十七人當選為自治區人民委員會委員。

9月9日，西藏自治區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通過一系列決議後勝利閉幕，宣告西藏自治區正式成立。

至此，民族區域自治制度[8]在省一級範圍全部建立。[9]

[1] 《周恩來年谱（1949-1976）》，中卷，頁212-213。

[2] 鄭英：〈西藏和平解放四十年與黨的統一戰線〉，載西藏自治區文史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西藏文史資料選輯：紀念西藏和平解放四十週年專輯》（拉薩：西藏人民出版社，1991），頁157。

[3] 周恩來會見阿沛·阿旺晉美談話記錄（1960年8月31日），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金沖及主編：《周恩來傳（1949-1976）》（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頁1498。

[4] 周恩來會見張國華等談話記錄（1960年12月5日），載《周恩來傳（1949-1976）》，頁1498。

[5] 丹增、張向明主編：《當代中國的西藏》，上冊（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1），頁299。

[6] 《當代中國的西藏》，上冊，頁299。

[7] 代表團包括中央各部門，二十七個省市自治區，十六個少數民族自治地方的代表，共七十六人。

[8] 中國是一個以漢民族為主的多民族國家，正確處理和解決國內的民族問題，關係國家統一的全局性問題。中國共產黨建黨之初曾提出「民族自決」和建立「聯邦共和國」的口號。抗日戰爭期間，為團結全民族抗擊日本侵略者，又曾提出動員一切少數民族，在民族自治的原則下共同抗日的主張。但在中共七大黨章總綱中仍保留了為建立「新民主主義聯邦共和國」而奮鬥的口號。因此，在1949年召開全國政治協商會議起草《共同綱領》的過程中，如何有利於國家的統一，就成了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毛澤東提出：要考慮到底是搞聯邦，還是搞統一共和國，民族區域自治？看來恐怕還是不要搞聯邦。時任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的李維漢，根據毛澤東的意見作了深入研究後提出：第一，蘇聯少數民族人口與俄羅斯民族大體相等，各七千幾百萬人。我國少數民族只占全國總人口的6%，並且呈現出大分散小聚居的狀態，漢族和少數民族之間，幾個少數民族之間往往互相雜居或交錯聚居。第二，蘇聯實行聯邦制是逼出來的。本來，馬、恩、列、斯都主張在統一的（單一制的）國家內實行地方自治和民族區域自治，只在例外的情況下允許聯邦制。但俄國經過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許多民族實際上已經分離為不同國家，因此不得不採取聯邦制把按照蘇維埃形式組成的各個國家聯合起來，作為走向完全統一的過渡形式。而我國則不同，國內各民族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由平等聯合進行革命，到平等聯合建立統一的人民共和國，並沒有經過民族分離，始終都是一個統一的國家。（楊靜仁等：〈深切懷念我國統一戰線和民族工作的著名理論家〉，《人民政協報》，1984年9月12日）毛

澤東和中共中央完全贊同李維漢的分析，確定新中國在統一的（單一制的）國家內，實行民族區域自治制，而不實行聯邦制。1949年9月7日，周恩來在向政協代表作《關於人民政協的幾個問題》的報告，談到國家制度問題時說，中國是多民族國家！我們主張民族自治，但一定要防止帝國主義利用民族問題來破壞中國的統一。「為了這一點，我們國家的名稱叫中華人民共和國，而不叫聯邦」。「我們雖然不是聯邦，但卻主張民族區城自治，行使民族自治的權力」。由此，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就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項基本國策和基本制度被確定了下來。

[9]　內蒙古自治區1947年成立，新疆維吾爾自治區1955年成立，廣西壯族自治區，寧夏回族自治區1958年成立。

第六章

毛澤東「壓縮空氣」及其底線

一、一次鄭州會議到八屆六中全會

1.公社所有制問題引起的關注

在人民公社化運動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的狂潮中，人們對高產衛星和徐水式的共產主義，是有懷疑的。拖着抱病之軀來徐水參觀的羅榮桓元帥，在看了牆上寫着「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之類口號，畫着碩大如牛的肥猪，幾個人才抬得動的大白菜；而幼兒園裏孩子呆板地回答着參觀者的提問，敬老院空徒四壁，只有目光癡呆的老人後，感嘆地對同行的聶榮臻元帥說：「這樣的敬老院，我可不來住。」在天津勝芳參觀畝產二十萬斤的密植高產衛星田時，羅榮桓彎下腰，用手杖捅一桶那密不透風的稻棵，仔細地觀看了地頭上放著的鼓風機和拉起的電燈，問陪同參觀的公社書記：「為甚麼要用鼓風機吹？」公社書記説：「不吹，空氣不流通，稻子就會腐爛。」羅又問：「是不是所有的田地都能用上鼓風機？」公社書記搖搖頭說:「不是。」羅説：「那你們這塊試驗田，既然不能推廣，這試驗還不能算是成功。」有人插話說：「可要鼓氣，不要泄氣呀！」羅笑着説：「這個氣還是少鼓一點為好。我們總還懂得點科學嘛！種田不講科學不行。」[1]薄一波回憶説，參加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的代表，曾集體到徐水參觀。當記者站在一片成熟的棉田當中，看到棉桃之上掛滿棉花，滿眼一片潔白，準備以棉桃為背景為薄拍照時，同去參觀的同伴將薄拉開，説：「別照，假的。」薄細看後，「也看出假來了」。[2]

9月上旬，安徽靈壁縣無署名給毛澤東的信中反映鄉社幹部不顧當地災情，謊報產量，吊打威逼群眾等情況；[3]9月30日，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在《人民公社化運動简報》第四期，反映相當一部分農民對一平二調的共產風懷有不滿情緒的情況，引起毛澤東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發展情況的關注。他決定再次到河北去看一看。

10月14日至17日，毛澤東在天津同天津市委和河北省委負責人談話；聽取河北省委和天津地委、保定地委負責人，徐水、安國、唐縣、正定四縣的縣委負責人匯報。主題都是談人民公社和鋼鐵生產問題。回到北京後，毛接到中共中央辦公廳機要室10月18日關於在河北省徐水縣勞動中所見所聞的情況報告，報告中雖然對公社的情況説了一些正面的話，但如實反映了基層存在着「主觀主義和強迫命令」、對群眾「往往採取簡單粗暴的工作方法」；弄虛作假，「縣裏和各公社的預產估計也多半大於實際產量」；亂提無法兌現的口號，「1960年建成社會主義，1963年建成共產主義」，「到那時候，吃甚麼有甚麼，穿甚麼有甚麼，

要甚麼有甚麼」等問題。[4]毛澤東看後，暫時沒有表態。[5]

為了解更多的實際情況，10月19日，毛澤東接連寫兩封信給陳伯達，命陳伯達與張春橋去河南遂平縣嵖岈山衛星人民公社進行調查，為中央即將開會討論公社問題準備意見。並囑陳將《馬、恩、列、斯論共產主義社會》一書帶去，邊調查，邊讀書。還建議把胡繩、李友九带去，「練習去向勞動人民做調查工作的方法和態度，善於看問題和提問題」。[6]

10月23日，毛澤東又給已經到達河南的陳伯達寫了一封信，要他們在衛星公社搞一個星期調查，包括調查團（社）、營（大隊）、連（隊）的各項問題。然後找遂平縣級幹部座談幾次，研究全縣各項問題。26日，毛澤東決定增派吳冷西、田家英去河南調查。地點：一是新鄉地區的修武縣（十三萬人口，以一縣一社聞名）；二是全國第一個打出「人民公社」牌子的新鄉縣的七里營公社（一鄉一社）。

毛在與吳、田二人談話時說：[7]

> 大躍進和公社化，搞得好了可以互相促進，使中國的落後面貌大為改觀；搞得不好，也可能變成災難。你們這次下去，主要是了解公社化後的情況。北戴河會議時我說過公社的優點是一大二公。现在看來，人們的頭腦發熱，似乎愈大愈好，愈公愈好。你們要去的修武縣，全縣已成了一個公社。我還要派人去了解山東壽張縣，聽說那裏準備苦戰三年進入共產主義。我們共產黨人的最终目標是建立共產主義社會，這是沒有問題的。現在的問題在於：甚麼是共產主義社會，現在並不是人人認識一致，甚至在高級幹部中也各說各的，其中有不少胡話。

毛指出，下去調查，要保持冷靜的頭腦。特別當記者的，不能道聽途説，人云亦云，要做冷靜的促進派。他還特意交待：下去調查時不要各级領導作陪，要找生產隊長就只找生產隊長，不要公社書記、大隊長參加；要找群眾談話就不要找幹部參加；要找縣委書記也只請他本人來談，因為人多了談話就有顧慮（同級幹部如此，上級幹部更如此）。找群眾談話要有各個階層的人物，尤其要注意中農的態度。還可以找下放幹部談話，他們可能顧慮較少。總之要了解各種人的真實想法。助手中可以選一兩位女同志，那樣同農村婦女談話比較方便。

吳冷西回憶毛的這次談話說：「這是大躍進中我第一次聽到毛澤東說要做『冷靜的促進派』。回想從1958年初的南寧會議起，毛主席的多次談話，給我強烈的印象就是報紙要促進，不要促退。」[8]

28日，毛澤東覆信陳伯達，要他在遂平調查完成後，再去附近某一個縣做幾天調查，以资比較。然後回到鄭州。

同日，中共中央書記處舉行會議，分析農村人民公社化後生產资料所有制等問題。[9]此時，中央已發出在武漢召開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

記會議和八屆六中全會的通知。

10月29日至11月4日，吳冷西、田家英各自帶助手分別在修武縣和七里營人民公社進行調查。跟隨田家英一起調查的逄先知回憶說：[10]

> 當時，下去的同志包括田家英在內，對人民公社都沒有也不可能從根本上去懷疑它。但通過調查，卻發現問題不少，有些問題使人非常焦急，例如，普遍實行「大兵團作戰」，社員每天只能睡三個小時，連續一二十天，搞得人困馬乏，難以為繼，勞動效率大大下降。大家都希望向毛澤東反映，愈快愈好。田家英還從下放幹部那裏了解到當地虛報產量的真實情況。當時，關於人民公社性質問題，是從中央到地方各級幹部議論的重要問題之一，也是田著重調查研究的一個問題。基層幹部中不少人認為人民公社是全民所有制。田家英開始沒有表示自己的看法，但從修武縣委書記的一席話中得到一個啟發。那位書記同志說：人民公社如果是全民所有制，那末，遇到豐年，修武縣的農民是不會願意把糧食無償調出來的；遇到歉年，國家能夠無償地調糧食給修武縣吗？田家英聽了覺得有理，非常重視。
>
> 我們還參觀了大煉鋼鐵的場面。那是一個晚上，在一個煉鐵點上，只見人山人海，火光映天，人們通宵不眠，大幹特幹。指揮者不斷地做鼓動工作，嗓子都喊啞了，說那天夜裏要放「衛星」。當時我們這些參觀者儘管對那種做法抱有懷疑，但對群眾的幹勁不能不表示讚嘆。
>
> 大煉鋼鐵不僅造成大量資財的嚴重浪费，更重要的是耽誤了農業收獲季節。我們親眼看到，就要到手的豐收糧食，因無勞力收獲而爛在地裏。

吳冷西的回憶還記述了當年新鄉七里營公社實行供給制的情況，即所謂「十六包」：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學、育、婚、樂，以至理髮、洗澡、缝紉、電费，都由公社包下來。每人一年的费用需七十八元。在新鄉的興寧人民公社，還了解到要取消家庭的做法。即全公社實行軍事化，將二萬多人編成十五個營五十個連，社員男女老幼分開，按連、排居住在集體宿舍。實行禮拜六制度，回家度周末。對這種荒唐的做法，吳冷西回憶說，當時已顧不得下來調查前「不要随便表示意見」的守則，忍不住指出這種拆散家庭的做法十分錯誤，共產主義不是不要家庭。那些公社幹部還想不通，說河南許多地方都這樣做，並說有位中央負責同志當時就說過共產主義社會也要革家庭的命。[11]

毛澤東10月31日乘專列離開北京前往鄭州，路經新鄉稍停，吳冷西、田家英登車随毛澤東赴鄭州，向毛匯報了修武縣一縣一社和七里營公社「十六包」等情況。[12]陳伯達、張春橋去遂平調查的一組人已先期到達鄭州，他們搞了一個《遂平衛星人民公社章程》，主張取消商品交換，實行產品調撥。[13]

2.對向共產主義過渡的左思右慮

經過以上的多方準備，11月2日至10日，毛澤東在鄭州主持召開了有部分中央領導人、大區負責人、部分省市委書記參加的中央工作會議（後來稱為：「第一次鄭州會議」）。[14]會議開始後，有的省委書記提出《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已經過時，應搞一個新四十條，於是會議就有了兩個議題。

11月3日下午，毛澤東召集林鐵（河北）、吳芝圃（河南）、張德生（陕西）、張仲良（甘肅）、王任重（湖北）、陶魯笳（山西），舒同（山東）、曾希聖（安徽）、周小舟（湖南）九個省委第一書記，以及陳伯達等人開會。聽取他們關於人民公社問題的匯報。毛澤東一面提問，一面發表意見。會上，在商品交換問題上引出了不同看法。

吳芝圃匯報説：「關於交換問題，有些東西是調撥，交換的範圍缩小了。」

陳伯達：「現金結算減少了。遂平縣現金結算，去年佔70%，今年倒過來，非現金結算佔70%。」

毛澤東：「現金結算，非現金結算，是一回事嘛！」

陳伯達：「是一件事，但不用貨幣來往了，有性質上的不同，沒有货幣流通了。」

毛澤東：「外國资本家每天數鈔票，誰去數呀？還不是銀行裏頭算一算賬。资本家交換貨物，哪一個見現金？我們現在也是這樣，就是不數票子。當然，性質不同。我也沒有學過货幣學。」

曾希聖：「我們發現這樣一個問題，單是生產糧食的地區，貨幣很少，沒有貨幣流通了。經濟作物地區货幣多，货幣比較容易流通。」

毛澤東：「必須使每個公社，並且使每個生產隊，除了生產糧食以外，都要生產商品作物。西安會議[15]沒有提倡這個事，他們一心一意要取消商業。」「每一個人民公社除生產糧食以外，必須大量生產經濟作物，能夠賺錢的，能夠交換的，有農業品，有工業品，總之是生產商品。這個問題不提倡，以為人民公社就是個國家，完全都自給，哪有這個事？生產總是分工的。大的分工就是工業、農業。既有分工，搞工業的就不能生產糧食、棉花、油料，他就沒有吃的，只好交換。」「三國時候，張魯的『社會主義』是行不長的，因為他不搞工業，農業也不發達。」

這大概是人民公社興起以後，對商品、貨幣問題的最初議論。

在匯報家庭問題時，吳芝圃反映：有的幹部提出，在共產主義實現以前就消滅家庭。毛澤東説：「現在不是消滅家庭，而是廢除家長制。」他又重複了一遍：「廢除家長制，肯定不是廢除家庭制度。」[16]

就在這次會上，確定搞一個新四十條，以取代《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毛澤東指定吳芝圃負總责，下分工業、農業、教育科學文化、公社體制四個小組，分別由王任重、曾希聖、舒同、河南省委書記處書記史向生負责。要求4日開始討論，7日拿出初稿。

4日下午繼續開會，聽取新四十條起草情況的匯報。吳芝圃説，議了一個題目，叫「人民公社發展綱要四十條」，第二個題目叫「共產主義建設十年規劃綱要」。毛澤東説：「你現在涉及到共產主義，這個問題就大了，全世界都不理解了。現在的題目，我看還是社會主義。不要一扯就扯到共產主義。」於是，甚麼是共產主義的問題就提了出來。

關於工農業的指標，起草人提出一些嚇人的超高指標，例如，十年內，鋼產量達到四億噸，機牀一千萬台，煤四十億噸，糧食畝產由原定的四百斤、五百斤、八百斤，分別提高到四千斤、五千斤、八千斤，叫「新四、五、八」。毛澤東聽了，沒有反對。他説：「我看這個文件要發表，要過了苦戰三年之後。」並問道：「你這是內部盤子吧，不寫在文件上吧！」關於文件的題目，毛澤東接受陳伯達的意見，改成「全國的十年建設規劃」。

為搞這個全國十年建設規劃，毛澤東提議進一步擴大會議規模，請上海的柯慶施、廣東的陶鑄、東北的歐陽欽、四川的李井泉，中央分管農業和工業的譚震林、李富春等參加。[17]

5日開會時，李富春、柯慶施、歐陽欽到會。毛澤東問新到會的人：「把你們請來，有甚麼新聞？」

柯慶施第一個發言，他主要反映城市裏有些混亂，搶購商品，提銀行存款，購置高檔商品，怕廢除票子。毛澤東説：「陳伯達就有這個傾向。」會上，其他人也反映了類似的情況，毛澤東對此十分關切。他説，綱要裏要寫這個問題，有個安定人心的問題。

當史向生再次提出十年內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時候，毛澤東闡述了他的觀點：「修武一縣一社，它的東西在縣的範圍可以調撥，但河南省去調就不行，國家調更不行。修武的糧，七里營的棉，是要交換的，不能調撥。不要把修武、徐水、遂平與鞍鋼、上綱、上海國棉一廠混同了。（史問：到底是甚麼所有制？）總不能説全民所有制，可以説縣全民所有制，小全民所有制，大集體所有制。把全民、集體混起來，恐怕不利。好像我們現在差不多了，共產主義已經來了。這麼快，太快了！奮鬥太容易了！把它們提得過高，跟鞍鋼一樣，而實際上不是，就不好了。這是客觀規律。」這時，毛澤東聯想到他在北戴河會議決議上加的那句話。他説：「我現在顧慮，我們在北戴河開那個口子，説少者三四年，多者五六年，或者更多一點時間，即由集體所有制搞成全民所有制，像工廠那樣，是不是開了海口，講快了？」「北戴河決議要有點修改才好。」

這似乎表明，在由集體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過渡的時間問題上，毛澤東有些猶豫了。

6日、7日兩天晚上，繼續開會。劉少奇、陳雲、鄧小平、譚震林、楊尚昆等也到鄭州與會。毛澤東提議由鄧小平代替吳芝圃主持社會主義建設綱要四十條的起草工作，並搞一個鄭州會議紀要。他認為，四十條綱要，問題甚大，建議把時間拉長，將十年改為十五年。文件定名為《十五年社會主義建設綱要四十條》。他提出三個問題要大家研究：

第一個問題，甚麼叫從集體所有制過渡到全民所有制？甚麼叫從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實現這些過渡需要甚麼條件，要多長時間？毛認為，過渡到全民所有制的主要標誌，就是產品可以在全國調撥，像國營企業鞍鋼那樣。關於過渡到共產主義的問題，他提醒大家，「我們不要冒險」。

第二個問題是鋼的指標。

第三個問題是城市人民公社如何搞。毛說，城市人民公社是可以搞的，問題是要有步驟，基本原則是不降低現有的工资標準，要有優越性。有先有後，北京、上海慢一點。他再次批評人民公社是全民所有制的說法，要求每個公社生產商品，不要忌諱「商品」這兩個字。[18]

經過兩天討論，對《十五年社會主義建設綱要四十條》初稿又作了補充修改。8日，送毛澤東審閱，他略有修改，交鄧小平閱辦。9日上午，會議繼續進行。毛澤東主要就綱要四十條講了以下問題：

在講了家庭、商品、资產階級法權、高指標、工作方法這五個問題之後，毛把話題轉到斯大林《關於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一書。「現在有一種偏向，好像共產主義越快越好。實行共產主義是要有步驟的。山東范縣提出兩年實現共產主義，要派人去調查一下。現在有些人總是想在三五年內搞成共產主義。」[19]

這次會議起草的另一個文件《鄭州會議紀要》，11月7日形成初稿。毛澤東改過兩遍，把文件名稱改為《鄭州會議關於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草案）》。決議草案分六個部分：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甚麼叫建成社會主義；公社問題；城市公社問題；要抓農業；工作方法；幾個具體政策問題。

11月10日上午和下午，毛澤東兩次講話，談他對這個決議的修改意見，和對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一書的看法，並再次批評了混淆集體所有制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和取消商品的錯誤觀點。

毛還反覆講了商品生產不能與資本主義混為一談的道理。指出，只要存在兩種所有制，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就是極其必要、極其有用的。對河南省提出的四年過渡到共產主義，毛批評他們「馬克思主義『太多』了」。他強調說：「不要急於在四年搞成。不要以為四年之後河南的農民就會同鄭州的工人一樣，這是不可能的。我們搞革命戰爭用了二

十二年，曾經耐心地等得民主革命的勝利。搞社會主義沒有耐心怎麼行？沒有耐心是不行的。」[20]

從第一次鄭州會議討論的問題，尤其是毛澤東的多次講話來看，對社會主義社會還要發展商品生產、商品交換這一點是明確和肯定了；對搞浮誇、弄虛作假、捆人打人的粗暴作風都有批評；對急於向全民所有制過渡、急於向共產主義過渡也有所制止。但整個來說，對甚麼是集體所有制，甚麼是全民所有制，在甚麼條件下才能由集體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過渡？甚麼是社會主義，甚麼是共產主義，在甚麼條件下才能由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仍然是沒有劃出明確的界限。毛在11月6日對〈山東范縣提出一九六〇年過渡到共產主義〉一文寫下的批語，充分表露了這種感情。[21]

正是基於這種猶豫矛盾的心態，對問題尚無清晰把握和明確定見，毛澤東在鄭州會議結束後，很快就對原本要將《鄭州會議關於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草案）》經中央政治局確認後，即下發各地貫徹執行的意圖作了改變。11月12日，毛寫信給鄧小平說：

> 想了一下，那個關於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草案），還是稍等一下（大約兩個星期左右），帶到武昌會議上再談一下，得到更多同志的同意（可能有好的意見提出來，須作若干修改，也說不定），然後作為正式文件發出，較為妥當。這並不妨礙各省同志按照他們帶去的草案立即在幹部中傳達、討論和實行。是否如此，請你同北京同志們商量酌定。既然如此，鄭州會議就是一個為武昌會議準備文件的會議，因此不要發公報。[22]

毛澤東在同一天寫給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的信中，對所以作這種改變解釋說：「因為這是一個大問題」。[23]

3.「過渡」和指標問題的討論

第一次鄭州會議結束後，劉少奇、陳雲、鄧小平等返回北京，從13日至19日連續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通報會議精神，討論會議制定的兩個文件，組織學習斯大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

毛澤東繼續在鄭州作調查研究，先後約中共河南許昌、洛陽、新鄉、開封地委書記和魯山、商丘、信陽、禹縣縣委書記談話；會見中南海機關下放在河南滎陽勞動的十八名幹部。13日離開鄭州，途經孝感，與湖北省、地、縣委書記及長風公社、五店公社書記談話。15日到達武昌。[24]關於毛澤東在孝感與省、地、縣負責人的談話，史家有如下記載：[25]

11月14日，毛的專列停在湖北孝感火車站，他先接見了解放軍十五軍的負責人。接着接見湖北省委書記王任重，副書記王延春、副秘書長

梅白，還有全國勞動模範官木生、勤儉持家模範晏桃香、長風人民公社書記朱朝啟等人。

梅白代表王任重匯報。毛澤東說：「現在我們的日子不好過，自己騙自己，這也許是下情不能上達。」梅白說：「彭真同志說主席對湖北年產六百億斤糧食要摸個底，允不允許講真話？」毛澤東說：「就是要你講真話。」

梅白開始如實匯報：「我剛從我的家鄉黃梅回來。在黃梅我秘密調查了六十個生產隊。在端午節前的一個多月，平均每人每日只有四兩二錢糧食。李家灣的書記說實話，平均每人每日四兩四錢。黃岡地委還要從黃梅調出四十萬斤糧食，老百姓就要餓肚皮。我提議取消這個決定，經姜一和任重同志同意停止了調糧。從調糧情況看，我估計全省1958年能搞到二百億斤左右，至多二百二十億斤。」

毛聽後，既自責又傷感地說：「毛澤東啊毛澤東，腦子發熱，決定一切呀！始作俑者，其無後乎？」

梅白講完，孝感地委書記王家吉說：「梅白同志說的符合我們孝感的實際情況。」

孝感縣委書記王振民說：「高指標是中央壓省委，省委壓地委，地委壓縣委，一級一級壓下來的。」

這時，指定接見的婦女代表晏桃香來了。由於連日夜戰，她感冒了。一到專列前就打噴嚏。秘書葉子龍怕傳染給毛澤東，不讓她上車。正交涉時，毛澤東見了，說：「快讓她上來，怕甚麼，少奇肝炎多年也沒有傳染給我。來，小姑娘，請坐。」

晏桃香怯生生坐在對面。毛澤東問：「你怎麼感冒了？」

「報告主席……」

「不要報告，大家平起平坐，隨便談心。」

晏桃香說：「昨夜我開通宵夜車鋤棉梗，天亮通知我開座談會，一直打噴嚏，來之前我先吃了藥的。」

「你們開夜車點燈嗎？」

「三百瓦電燈，還有二十盞汽燈。」

「你赞成開夜車嗎？」

「說實話不贊成，但上面要我們開夜車，我是婦女主任，不能不開。我認為開夜車划不來，花錢很多，费力很大，第二天還打不起精神，大家都不願意。」

「你認為你所在的生產隊糧食產量能達到指標嗎？」

「差十萬八千里。」

「那麼你想如何辦呢？」

「希望上面實事求是。」

毛澤東轉向勞模官木生。官木生說：「現在的生產指標，不造假不

見報。省委書記都有責任，省壓地委，地委壓縣，縣壓到我頭上。我解放以來是勞模，都帶頭幹，但是糧食產量我不敢帶頭，帶這個頭是無良心，老百姓就要餓飯。我們現在不實事求是，要求中央實事求是，事實上有的人已經開始餓飯了。老百姓擔心：算盤一響，眼淚一淌。」

毛澤東動了感情，流着淚說：「你們要我實事求是，我就希望看到你們實事求是。我不該同意湖北六百億斤糧指標。六百億斤是主觀主義，官僚主義，不好。這個問題不怪任重，不怪你們，怪我，怪我這個中央主席。」

基層幹部和群眾走後，毛澤東對省、地、縣書記們說：「多好的人民啊！我們對不起人民。唐代詩人韋應物有句詩：『邑有流亡愧俸錢』，我現在的心情是『國有流亡愧此生』。」

這一路上了解到的情況，更堅定了毛澤東要壓缩空氣的決心。對毛澤東來到武昌後的情況，吳冷西回憶說：

> 毛主席14日到達武昌，住東湖賓館。他要我和田家英參加湖北省委書記王任重和張平化同志主持的座谈會。這些座談會從14日接連開到20日，實際上是調查會。14日毛主席聽取了王任重同志匯報湖北全省的情況和恩施、孝感、沔陽、襄陽等縣公社化的情況。接着由麻城，鄂城、黄岡、棗陽等縣的縣委書記以及一些公社黨委書記和鋼鐵廠廠長、下放幹部先後作了匯報。毛主席沒有到場的我們事後都向他匯報了。我們著重向他反映了縣委特別是公社書記、鋼鐵廠廠長匯報中提到辦大社中，富隊和貧隊之間的矛盾，群眾對「軍事化」、「食堂化」抵觸甚大，大辨鋼鐵中好鐵只有兩三成，幹部作風浮誇、粗暴等問題。[26]

以上種種情況，進一步促使毛澤東思考在鄭州會議提出壓缩空氣的問題。隨之舉行的武昌會議和八屆六中全會，就是在這種思想指導下進行的。

11月21日到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武昌舉行。毛澤東主持會議。參加會議的除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員、候補委員外，還有中央書記處的部分成員，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和中央各部委負责人。中央常委除周恩來、朱德，林彪外都已到會。會議的主要議題是：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草案和1959年國民經濟計劃指標的安排。

在21日的會議上，毛澤東談了八個問題：一、過渡到共產主義問題；二、十五年規劃問題；三、這次會議的任務問題；四、劃線問題；五、消滅階級問題；六、商品經濟問題；七、減少任務問題；八、人民公社整頓問題。[27]其中最主要的是：向共產主義過渡和建設速度這兩個問題。毛說：「這一向，在我的腦筋裏頭，十五個吊桶打水，七上八下，就是剛才講的那些問題，究竟這樣好還是那樣好。」

關於向共產主義過渡的問題。毛說：我們鄉以上的幹部，沒有一百萬，也有幾十萬，就是要過渡得快，愈早愈好，搶先於蘇聯。我們現在

是一窮二白，五億多農民人均年收入不到八十元，是不是窮得要命？我們現在吹得太大了，我看是不合事實，沒有反映客觀實際。蘇聯1938年宣布社會主義建成了，現在又提出，從現在起十二年準備進入共產主義的條件，因此，我們就要謹慎。我們有說兩年的，也有說三年的，也有說四年的，也有說五年的，就要進入了，哪有那個事呀？范縣說兩年進入共產主義，我派了幾個同志去看了看，他們說「難於進」。

關於鄭州會議上搞的那個《十五年社會主義建設綱要四十條（草案）》，毛說，那些數目字根據不足，放兩年再說，不可外傳，勿務虛名而受實禍，虛名也得不了，說你們中國人吹牛。他提議，這次會罐的重點，就是討論關於人民公社的決議和1959年的計劃安排，為召開六中全會做準備。於是，集中反映「大躍進」中追求高指標達到登峰造極的那個「綱要四十條草案」，被擱置了起來。

在談到1959年的任務時，毛說：工業任務、水利任務、糧食任務都要適當收缩。實在壓得透不過氣，壓得太重。我們在這一次唱個低調，把腦筋壓缩一下，把空氣變成固體空氣。胡琴不要拉得太緊，搞得太緊，就有斷弦的危險。可能性有兩種，一種是現實的可能性，一種是非現實的可能性。能夠由可能性轉化成有現實性的那種可能性，就是現實的可能性。所謂非現實的可能性，就是空的，不能實現的。

關於1959年的鋼產量指標，北戴河會議提出二千七百萬噸到三千萬噸，毛澤東是很贊成的，當時想的是，生產這麽多鋼的出路，幹甚麼用？現在覺得問題不妙了，究竟有沒有可能？於是他在講話中提出：「鋼三千萬噸，要不要那麽多？能不能搞那麽多？」這時，鄧小平馬上插話說：「是不是搞三千萬噸，是值得考慮的。」薄一波接着說：「三千萬噸，我們在下面稍微議了一下，是值得考慮的。現在六千萬人上山，造成各方面這樣緊張的局勢，這實在是值得考慮的。」毛問：「明年老老實實就是翻一番，有沒有危險？」薄答：「翻一番沒有問題，比較穩妥。」

22日凌晨，毛召集李富春、薄一波、王鶴壽、趙爾陸徵詢鋼產量指標的意見。他最後提出，不是三千萬噸有無把握的問題，而是一千八百萬噸有無把握的問題。22日晚，毛澤東與劉少奇、陳雲、鄧小平等召集七個協作區組長開會，向他們摸底：翻一番是否可能？反覆問他們：一千八百萬噸靠不靠得住？對毛澤東找各大協作區組長開會的情況，吳冷西回憶說：

> 第二天（11月22日）晚上，毛主席把我和田家英找去谈話，主要是談宣傳上要壓縮空氣、實事求是的問題。……
>
> 毛主席的談話是從當天（11月22日）下午他找各大協作區組長談話說起的……。毛主席设想可否把鋼產量的指標從三千萬噸減為一千八百萬噸。他原想説服他們，结果反而是各組長力圖説

服毛主席維持原來的指標。毛主席說，他們都想打通我的思想，我硬是想不通，因為他們缺乏根據。他們有的大區明年要增加鋼產兩倍，有的省要增加四倍，有的省要增加十幾倍，有的省竟然要增加三十倍。這怎麼能叫人相信？

……

毛主席又說，其實一千八百萬噸鋼的指標不是機會主義，能否完成還是個問題，因為今年（1958年）預計煉出的一千萬噸出頭的鋼產量中，好鋼只有八百五十萬噸，看來鄭州會議讀了幾天書並沒有解決思想問題，大家頭腦還是發熱。1958年鋼鐵翻一番就使得六千萬人上山，鬧得天下大亂。明年再來個翻一番以至翻幾番怎麼得了？[28]

對毛澤東在這段時間關注鋼產量指標的心情，薄一波也曾說過一句非常形象的話：「毛主席非常關心這件事，夜不能寐。」[29]

23日，毛澤東在會上再次講話，[30]就1959年鋼產量的指標問題提出，要壓缩空氣，使各項指標切實可靠。

針對「大躍進」中浮誇風所以會颳到那樣嚴重的程度，毛澤東專門講了一個「作假問題」。他建議在關於人民公社的決議裏把反對作假的問題專門寫一條。他說：「建議跟縣委書記、公社黨委書記切實談一下，要老老實實，不要作假。本來不行，就讓人家罵，臉上無光，也不要緊。不要去爭虛榮。……現在的嚴重問題是，不僅下面作假，而且我們相信，從中央、省、地到縣都相信，主要是前三級相信，這就危險。」他強調說：「希望中央、省、地這三級都懂得這個問題，有個清醒頭腦，打個折扣。」

關於由集體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過渡、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的問題，毛澤東在講話過程中，彭真、劉少奇、鄧小平、李井泉、柯慶施等都有插話，形成了一段討論。

當毛講到，北戴河會議文件有個缺點，就是年限快了一點。但辦不到，要改一下。蘇聯生活水平比我們高，還未過渡。北京大學有個教授到徐水一看，說：「一塊錢的共產主義，老子不幹」。這時彭真首先插話。

彭真：轉得太快也不利，不要太快也不要太慢。

毛：十年裏三三制，農產品調撥三分之一，可能是三分之一的全民所有制。……還有完成三化，機械化、電氣化，要五年到十年。佔壓倒優勢才叫化。

劉少奇：達到150-200元的消费水平就可以轉一批，將來分批轉，這樣有利，否則，等到更高了，轉起來困難多，反而不利。

……

彭真：我們搞了土改，就搞大合作，又搞公社，只要每人到

150-200元就可以過渡，太多了，如羅馬尼亞那樣，農民比工人收入多時就不好轉了。把「三化」壓低，趁熱打鐵，早轉比晚轉好，三四年即可過渡。

毛：照你的講法，十八年建成社會主義大有希望。

……

毛：按少奇、彭真的意見是趁窮之勢來過渡，趁窮過渡可以有利些，不然就難過渡。劃線問題請同志們注意呀！線是劃的，就是如何劃，請你們去討論，搞幾條準備。

鄧小平：不能和蘇聯的標準一樣。

毛：一定要高於蘇聯。[31]

這段記錄向人們表明：連劉少奇、彭真這樣的高層領導人都主張「趁窮過渡」，可見急於實現共產主義的思潮在中共黨內蔓延的程度；毛澤東儘管對劉、彭的意見不以為然，認為北戴河提出三四年、五六年的時間太短，是個缺點，但他並不認為共產主義是遙遠的事。1958年11月21日，毛在中央政治局武昌擴大會議上的講話提綱中寫道：

> 過渡到共產主義問題。中國和蘇聯哪個先過渡到共產主義？要從各方面慎重考慮。中國早過渡究竟有無可能，是否有利。即使有可能，也可以用社會主義之名，行共產主義之實。[32]

可見，在毛看來，中國較之蘇聯還是有可能先進入共產主義，只不過要考慮國際影響，不要讓蘇聯臉上無光，還是讓蘇聯先進為好，僅此而已。這就是毛澤東當時的基本思想。

4.關於兩個「過渡」的界限

經過武昌會議的討論，中共高層對於一些突出問題的認識漸趨一致，文件起草也大體成熟。1958年11月28日到12月10日，中共中央在武昌舉行八屆六中全會，討論和修改醞釀多時的《關於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草案）》、《關於一九五九年國民經濟計劃的決議（草案）》。出席的有：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林彪、鄧小平、林伯渠、董必武、彭真、羅榮桓，陳毅、李富春、彭德懷、劉伯承、贺龍、李先念、柯慶施、李井泉、譚震林等中央委員八十四人，候補中央委員八十二人。不是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的中央有關部門的負責人和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列席了會議。全會通過了：《關於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中共中央關於一九五九年國民經濟計劃的決議》、《中國共產黨八屆六中全會同意毛澤東同志提出的關於他不作下屆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候選人的建議的決定》。並於12月17日，由新華社公布：《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第六次全體會議公

報》。

《關於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33]是在《鄭州會議關於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草案）》的基礎上，重新改寫的。《決議》在高度評價農村人民公社建立的重大歷史意義的同時，著重闡述了兩個問題：一、關於由集體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過渡、由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二、關於社會主義社會的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

針對當時人們把人民公社所有制當作已經是全民所有制、急於向共產主義過渡的誤解和傾向，《決議》指出：「無論由社會主義的集體所有制向社會主義的全民所有制過渡，還是由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都必須以一定程度的生產力發展為基礎。」「我國现在的生產力發展水平，畢竟還是很低的。」「因此，我們既然熱心於共產主義事業，就必須首先熱心於發展我們的生產力，首先用大力實現我們的社會主義工業化計劃，而不應當無根據地宣布農村的人民公社『立即實行全民所有制』，甚至『立即進入共產主義』，等等。那樣作，不僅是一種輕率的表現，而且將大大降低共產主義在人民心目中的標準，使共產主義偉大的理想受到歪曲和庸俗化，助長小資產階級的平均主義傾向，不利於社會主義建設的發展。」

針對那種以為人民公社就已經是全民所有制，可以實行共產主義的分配原則，因而不再需要商品交換的糊塗觀念，《決議》指出：「人民公社無論在工業方面和農業方面，既要發展直接滿足本社需要的自給性生產，又必須盡可能廣泛地發展商品性生產。」「只有這樣，整個社會經濟才能以較快的速度向前發展，而各個公社也才能夠換回必要的機器和設備，實現農業機械化、電氣化，也才能夠換回所需要的消費物資和現金，以便供應社員和發放工資，並使工資逐步增長。」強調:「繼續發展商品生產和繼續保持按勞分配的原則，對於發展社會主義經濟是兩個重大的原則問題，必須在全黨統一認識。有些人在企圖過早地『進入共產主義』的同時，企圖過早地取消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過早地否定商品、價值、货幣、價格的積極作用，這種想法是對於發展社會主義建設不利的，因而是不正確的。」

《決議》就上述兩個問題所作的有針對性的說明，其基本精神對扭轉當時中共黨內那種急於搞共產主義的情緒，是有積極意義的。但《決議》又堅持認為，由集體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過渡，也並不是遙遠將來的事，說甚麼:「如果不及時地發展和完成這種轉變，老是維持集體所有制的現狀，讓公社社員的眼光只是局限在較小範圍的集體利益的圈子裏，那就將妨礙社會生產力的繼續發展和人民覺悟的繼續提高，因而是不適當的。」

《決議》還強調：「人民公社實行的供給制，開始帶有共產主義的按需分配的萌芽。」隨着人民公社的發展，由集體所有制過渡到全民所

有制，「它的共產主義因素將有新的增長」，「隨着社會產品由於全國工農業日益高漲，逐步由不豐富到豐富，公社分配制度中的供給部分逐步由少到多、供給標準逐步由低到高……，準備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條件也將逐步成熟起來。忽視甚至阻礙這個發展過程，把共產主義推向遙遠的將來，自然是不適當的」。

這又表明，這個《決議》，並沒有能真正從理論和政策上劃清兩個過渡的界限，只不過是要人們把過渡的時間表推遲十五年到二十年[34]罷了。毛澤東對共產主義嚮往的心態，在會議期間先後（12月7日和9日）為印發《張魯傳》所寫的批語中，對農業社會主義的讚賞，就是明顯的表露。[35]

《中共中央關於一九五九年國民經濟計劃的決議》，雖然根據毛澤東「壓缩空氣」的精神，除對基建投资（由原定的五百億元降為三百六十億元）、鋼產量（由原定的三千萬噸降到一千八百萬噸到二千萬噸）作了壓缩，其他項目基本上保持了北戴河會議提出的高指標。而糧食指標卻由原定的八千億斤到一萬億斤提高到一萬零五百億斤。因此，整個來説，仍然是一個無法完成的高指標。「會議期間，陳雲覺得鋼的指標還是難於完成，建議以不公布為好，但這個建議未能反映給毛澤東。」[36]

從第一次鄭州會議到八屆六中全會，歷時一個多月，毛澤東連續主持召開三次中央會議，终於使人民公社化以來出現的急於向全民所有制過渡、急於向共產主義過渡的傾向得到了遏制，頭腦稍微冷靜了一些。但由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引發的問題還遠遠沒有充分暴露，包括毛澤東在內，期待1959年繼續躍進的思想並未有根本變化。

[1]《羅榮桓傳》編寫組：《羅榮桓傳》（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1），頁558-559。

[2]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頁751。

[3] 毛澤東：〈對一封反映安徽省靈璧縣災情來信的批語〉（1958年10月20日），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七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頁436。

[4] 中共中央辦公廳機要室1958年10月18日關於在河北省徐水縣勞動中所見所聞的情況給毛澤東的報告。《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七冊，頁522-524。

[5] 毛澤東：〈對中辦機要室關於在徐水縣勞動中所見所聞情況報告的批語〉（1958年11月10日）。毛將此報告批送河北省委第一書記林鐵和省委書記處書記張承先，毛批曰：「此件是説徐水縣的情況的，長處短處都有，請你們研究一下，此種情況，可能不止一個社有。」又及：「此件，你們帶回去，我不要了。」《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七冊，頁522。

[6] 毛澤東：《關於到河南遂平調查人民公社問題給陳伯達的信》（1958年10月），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七冊，頁463-464。

[7] 吳冷西：《憶毛主席——我親身經歷的若干重大歷史事件片段》（北京：新華出版社，1995）頁95-97。

[8] 吳冷西：《憶毛主席》，頁96。

[9]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頁185。

[10] 董邊、鐔德山、曾自編：《毛澤東和他的秘書田家英》，增訂本（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頁54-55。

[11] 吳冷西：《憶毛主席》，頁99-100。

[12] 在吳、田匯報中間毛澤東不斷插話。吳冷西記下的有：「毛主席談到修武一縣一社時

指出，一縣一社恐怕太大了，而且全縣各地生產水平很不平衡，平均分配會損害富隊富社的積極性。我們現在還是搞社會主義，還是要按勞分配。供給制只能搞公共食堂，而且要加強管理，其他只搞些公共福利事業，不要採取『包』的辦法，量力而為。」談到修武的全民所有制，毛說：「修武不同於鞍鋼，產品不能調撥，只能進行商品交換，不能稱為全民所有制，只能叫做集體所有制，千萬不能把兩者混同起來。修武縣委書記提出的問題，表明他實際上是不贊成搞全民所有制的。他提出的問題使我們想到：如果生產力沒有高度發展，像北戴河會議關於人民公社的決議中指出的，產品極為豐富，工業和農業都高度現代化，那末，生產關係上從集體所有制過渡到全民所有制，分配方式從按勞分配過渡到按需分配，是根本不可能的，這兩種所有制的接近是一個很長的歷史過程。」當匯報到有些公社搞集體住宿時，毛很生氣地說：「那種搞法不是給國民黨對我們的誣蠛幫了忙嗎？凡是這樣胡搞的地方我都支持群眾起來造反。這些幹部頭腦發昏了，怎麼共產黨不要家庭呢？」談到群眾大煉鋼鐵的幹勁很大，地裏莊稼沒有人收時，毛説：「1070萬噸的指標可能鬧得天下大亂。從北戴河會議到年底只有四個月，幾千萬人上山，農業可能豐産不豐收，食堂又放開肚皮吃，這怎麼得了？這次鄭州會議要叫大家冷靜下來。」見吳冷西：《憶毛主席》，頁102-103。

[13] 《毛澤東和他的秘書田家英》，頁56；吳冷西《憶毛主席》，頁103。關於產品交換一事，陳伯達有一段自己的説明，那是到遂平縣的晚上，一個年青的會計説：我們這個縣出沙子，用沙子去武漢換機器，這是產品交換。到鄭州在向毛主席正式匯報前閒聊時，談及此事，毛當即批評説：你主張產品交換，不要商品交換呢？陳聲明説：這是毛澤東對他的誤會。陳伯達著，陳曉農編注：《陳伯達遺稿：獄中自述及其他》（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98），頁72-73。

[14] 文中所引第一次鄭州會議的資料，除有註釋者外，均引自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逄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頁888-899。吳冷西、逄先知在上述回憶中都説，11月5日毛的專列經過新鄉，他們登車向毛匯報；吳還説，毛主席從11月6日起主持鄭州會議，這兩個時間均有誤。第一次鄭州會議開始的日期為11月2日。

[15] 西安會議，指1958年10月在西安召開的農業協作會議、會上有人提出取消農業，消滅貨幣的意見。

[16] 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記錄（1958年11月3日），載《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頁888-890。

[17] 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記錄（1958年11月4日），載《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頁890-891。

[18] 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記錄（1958年11月6日、7日），載《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頁892-893。

[19] 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記錄（1958年11月9日），載《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頁893-895。

[20] 毛澤東：〈關於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問題〉（1958年11月9日、10日），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頁439-441。

[21] 毛澤東寫到：「此件很有意思，是一首詩，似乎也是可行的。時間似太促，只三年，也不要緊，三年完不成，順延可也。」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七冊，頁494。

[22] 毛澤東：〈對《鄭州會議關於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的修改和信件〉（1958年11月10日、12日），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七冊，頁519-520。

[23] 毛澤東：〈對《鄭州會議關於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的修改和信件〉（1958年11月10日、12日），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七冊，頁520。

[24]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頁812。

[25] 蕭冬連等：《求索中國：「文革」前十年史》，上冊（北京：紅旗出版社，1999），頁447-448。

[26] 吳冷西：《憶毛主席》，頁105-106。吳説，毛澤東14日到達武昌，時間有誤，應為15日。

[27] 《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頁900-902。

[28] 吳冷西：《憶毛主席》，頁106-108。

[29]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頁815。

[30] 《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頁902-904。

[31] 毛澤東在武昌會議上的講話記錄，1958年11月21日。對這場討論，當年在會場直接聆聽的李鋭有一段記載：毛澤東在講話中承認，在向共產主義過渡的問題上，包括他自己在內的中國人大概是冒失鬼。開會的前幾天，11月15日《人民日報》發表了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一大的報告提綱，這個提綱提出蘇聯未來十五年的主要任務是全面地建立共產主義社會的物質技術基礎。毛要大家看看這個提綱：蘇聯已經四十一年了，還準備搞十二年（按應為十五年）。看它的思想是想過渡，但並沒有講過渡。赫魯曉夫很謹慎，他已經有了五千五百萬噸鋼，一億噸以上石油，他還那樣謹慎，還要十二年過渡。現在國內局勢，我們倒有幾十萬、上百萬的幹

部，就是想搶先，都想走的愈快愈好，對全局照顧得不夠。這時，毛批評北戴河講三、四年或五、六年或更多一點時間搞共產主義，是個缺點。他説，三個差別、資產階級法權沒消滅，沒有一二十年不行。現在是吃窮的飯，甚麽公共食堂，現在就是太快，少者三、四年，多者五、六年，我有點恐慌，怕犯甚麽冒險主義錯誤。但是，會上有不少人的意見仍然是快些過渡。如劉少奇説：達到150-200元的消費水平就可以轉一批（按：由集體所有制轉變為全民所有制），將來分批轉，這樣有利，否則，等到更高了，轉起來困難多，反而不利。彭真也認為：每人到150-200元就可以過渡，太多了，如羅馬尼亞那樣，農民比工人收入多時就不好轉了。把「三化」（即機械化、電氣化、園林化）壓低，趁熱打鐵，早轉比晚轉好，三、四年即過渡。對這種意見，毛不以為然。他説：整個中國要進入共產主義要多少時間，現在誰也不知道，難以設想，十年？十五年？二十年？三十年？蘇聯四十一年，再加十二年，五十三年還説是準備條件。中國人就那厲害？我們還只有九年，就起野心，這可能不可能？從全世界無產階級利益考慮，也是蘇聯先進好。也許在巴黎公社百年紀念時（1971年），蘇聯進入共產主義。我們十二年怎麽樣？也許可能，也許不可能，我看不可能。即令十年，到1968年我們已準備好了，也不進，至少等蘇聯進入兩三年后再進，免得列寧的黨、十月革命的國家無光。李鋭：《「大躍進」親歷記》，下冊（海口：南方出版社，1999），頁358-359。

[32]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七冊，頁553。

[33]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十一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頁598-623。

[34] 《決議》説：從現有的經驗看來，在我國的具體條件下，全面地實現社會主義的全民所有制的時間可能早一些，但也不會很早。……全部完成這個過程，從現在起，將需要經歷十五年、二十年或者更多一點的時間。

[35] 毛澤東在12月7日的批語中寫道：「这裏所説的群眾性醫療運動，有點像我們人民公社免費醫療的味道……。道路上飯鋪裏吃飯不要錢，最有意思，開了我們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的先河。大約有一千六百年的時間了，貧農、下中農的生產、消費和人們的心情還是大體相同的，都是一窮二白。……歷代都有大小規模不同的眾多的農民革命鬥爭，其性質當然與現在馬克思主義革命運動根本不相同。但有相同的一點，就是極端貧苦農民廣大階層夢想平等、自由，擺脱貧困，豐衣足食。在一方面，帶有資產階級急進民主派的性質。另一方面，則帶有原始社會主義性質，表現在互助關係上。……現在的人民公社運動，是有我國的歷史來源的。」在12月9日的批語中寫道：「行五斗米道，『民夷便樂』，可見大受群眾歡迎。其法、信教者出五斗米，以神道治病；置義舍（大路上的公共宿舍），吃飯不要錢（目的似乎是招來關中區域的流民）；修治道路（以犯輕微錯誤的人修路）；『犯法者三原而后行刑』（以説服為主要方法）；『不置長吏，階以祭酒為治』，祭酒『各領部眾，多者為治頭大祭酒』（近乎政社合一，勞武結合，但以小農經濟為基礎），這幾條，就是五斗米道的經濟、政治綱領。」毛澤東：〈為印發《張魯傳》寫的批語〉（1958年12月7日、10日），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七冊，頁627-629。

[36]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陳雲年譜（1905-1995）》，中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頁439。鄧力群回憶説：陳雲同志覺得這個數字太高，不托底，他跟胡喬木講，要胡喬木向毛主席反應，這個數字不要公開發表，不發新聞。喬木同志不敢去説。鄧力群：《我為少奇同志説些話》（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8），頁100-101。薄一波説：「八屆六中全會時，鋼的指標雖然降下來了，陳雲同志覺得還是難於完成，為慎重起見，建議以不公布為好〔這個建議沒有及時反映給主席，毛主席直到（1959年）4月2日上海會議期間才知道陳雲同志的意見〕。」見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頁828。李鋭説：「會議期間，陳雲曾向胡喬木談到，公報不要公布鋼、煤、糧、棉指標和1958年七千五百億斤糧食產量，喬木沒有向毛匯報。後來上海會議時，毛批評了喬木，説你有甚麽權利不報告中央副主席的意見；反過來表揚了陳雲，還説『真理有時在一個人手裏』。」見李鋭《「大躍進」親歷記》，下冊，頁391。

二、整頓公社和二次鄭州會議

1.1959年初的農村形勢

由於高指標引發的浮誇風，人民公社化引發的共產風，以及由此併發的瞎指揮風造成的後果，在1958年底開始逐步顯現。據新華社1959年年初編印的《內部參考》報道：有的地區公共食堂出現停伙，浮腫病在農村開始蔓延，大批農民流入城市謀求生路，農村勞動力嚴重缺乏，城市出現搶購日用工業品風潮，等等。舉其要者：

1月20日，新華社南京訊：江蘇徐州專區最近有兩千多個農村食堂停伙，其中以去年受災的邳縣、沛縣、新沂、銅山等縣停伙較多，群眾思想有不同程度的混亂。尤其是沒有向群眾進行宣傳和作適當安排就把食堂停伙的地區，群眾思想緊缩，惶惶不安，生活困難，生產勁頭不大。有些地區的水利建設、田間管理、積肥等冬季生產因此而停頓下來。[1]

1月27日，《內參》報道：

江蘇句容縣寶華公社侖頭、銅山兩個大隊自1958年4月至11月共死亡社員一百一十四人。死亡時間，以8月份最多，共四十七人，佔死者總數的41%。在死亡的一百一十四人中，因浮腫或與浮腫有關或乾瘦而死的五十七人（其中原無其他病症純因浮腫死的三十人。原因之一是與幹部對夏熟估產偏高，購糧任務過大，群眾口糧不足（侖頭大隊6、7、8三個月每人分糧不到四十斤，每月只有十三斤左右）。[2]

與之同時，農村疾病流行。

衛生部《衛生動態》報道，從1958年8月以來，各種流行病驟然上升。腸傷寒病在河北省五個專區流行，累計發病四萬三千餘人，死亡一千二百餘人，病死率2.8%。10月份以後，河南、山東等省部分地區亦開始流行。9、10月間，白喉在河南、湖南、安徽、福建、廣東、江西等省區相繼流行。其中，河南六十六個縣市發病人數達三萬三千餘人，死亡率高達7.8%。從11月份起，麻疹、流行性感冒、猩紅熱、百日咳、流行性腦脊髓膜炎等疾病急劇上升，12月份尤為顯著。麻疹在全國範圍內流行。據湖南、湖北、河南、河北、山西、四川、黑龍江、吉林、遼寧、江蘇、甘肅、青海、新疆、北京等十四個省、市、自治區部分地區不完全統計，從11月到12月中旬止，累計發病44.5萬餘人，比1957年同期全國發病人數（二十二萬）增加一倍多；流行性感冒在部分地區流行，據湖南、湖北、廣西、四川、甘肅、山西、黑龍江、河北等八省區部分地區不完全統計，從11月份到12月中旬止，發病人數共有三十一萬

六千餘人。1958年冬季傳染病的特點是：範圍廣，來得早，傳播快，合併症多，死亡率高。究其原因：一是勞動強度大，營養跟不上，抵抗力下降；二是忽視公共衛生；三是藥品供應不上；四是氣候乾燥，雨量少，容易感染。[3]

關於浮腫病的情況，《內參》報道：

1958年在雲南、四川、河南，甘肅、山東、湖南等省相繼發生「腫病」。其中，河南省從9月到12月20日止，據許昌、開封、南陽、洛陽等四個專區不完全統計，「腫病」患者有152132人，死亡7465人，病死率1.639%。四川省從10月下旬到11月，僅資陽縣就發現「浮腫」病人2078人，死亡405人。雲南省從2月到10月共有「腫病」患者334000人，死亡45000人，病死率13.77%。湖南省1至5月間，邵陽、湘潭等地區「腫病」患者達十萬餘人。「腫病」發生的原因，主要是營養不良。[4]

在飢餓和疾病的威逼下，大批農民盲目向城市流動。

據2月15日的不完全統計，僅北京的前門、永定門、豐台、西直門四個車站晚上露宿的就有二千多人。據2月12日到17日六天統計，外省農民盲目流入內蒙古呼和浩特和包頭兩市，共有8407人。上述外流農民，主要來自河北、山東、山西等省。[5]

由於1958年大煉鋼鐵和各級大辦工業，農村強勞力大多輸入工業戰線——據全國勞動工資計劃會議材料：1958年年末，全國職工總數達到4939萬人，比1957年增加2089萬人。[6]加上外流勞力，致使農村勞動力短缺，直接影響着農業生產。如：

福建省委書記江一真談當前備耕工作問題有三：缺乏勞力。大批農村勞力（一般在30%至40%左右）被抽調到縣、專、省支援工業基本建設，而且絕大多數是全勞力、強勞力，留在社裏搞農業的，多數是婦女、老頭、小孩，人數既少且弱。農具不足。小農具損害很多，大農具破爛不堪。僅莆田一個縣就缺少農具二十萬件。深翻過的土地，死土和活土混合在一起，不多下肥料，改良土壤，就可能引起減產。社員對農業再躍進失去了信心。[7]

雲南玉溪專區全區五十萬勞動力，調出支援國家建設、地方工業、水利、副業和管理工作的有二十九萬多人，佔勞動力的58%，且多是強勞力；參加農業生產的只有二十一萬多人，佔42%左右，且多是弱勞力。各公社脫產的文工團、郵遞、書報、招待、衛生工作人員和脫產的學員，往往佔總人口的10%。由於勞力過於分散，完成糧食增產任務，就感到非常吃力。[8]

以上情況，與中共八屆六中全會對農村形勢的估計、對1959年農業繼續躍進的期望，相距甚遠。

2.人民公社的初步整頓

為促進人民公社的鞏固，保證1959年工農業生產的更大躍進，中共八屆六中全會《關於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要求各省、市、自治區黨委抓緊1958年12月至1959年4月的五個月時間，緊密結合冬季和春季的生產任務，對本地區人民公社進行一次整頓工作。具體要求是：

對公社的生產規劃、分配狀況、生活福利、經營管理、財務工作、組織領導，做一次全面的深入的檢查。

對於黨員、幹部作風中的問題，要經過黨的教育和群眾鳴放加以處理。在處理的時候，要注意保護幹部和群眾的積極性……，對於犯了錯誤而又願意改正錯誤的人批判從嚴，處理從寬。對於混入公社領導機構的階級異己分子，和極少數作風惡劣、屢教不改的分子，應當發動群眾把他們從領導機構裏清除出去。[9]

據此，各省區在召開四級幹部會議傳達中共八屆六中全會精神的基礎上，通過試點，開展整社工作，重點是解決好分配問題。據中央農村工作部1959年1月對河南、湖北、黑龍江等二十三個省、市、區的21176個人民公社的統計，[10]實行工資制和供給制的情況是：實行基本供給制的989個社，佔總社數的4.67%；實行伙食供給制的16610個社，佔總社數的78.43%；實行糧食供給制的2872個社，佔總數的13.56%；實行糧食半供給制的261個社，佔總社數的1.23%。實行完全工资制的122個社，佔總社數的0.57%；實行完全按勞動日分配的322個社，佔總社數的1.52%。工资和供給部分的比例，一般是四比六；也有少數是各佔一半，甚至工資高於供给的。這表明實行供給制和半供全給制的佔絕大多數，基本上否定了按勞分配的原則。因此，各省根據六中全會精神，對分配的方式和比例作了調整：

中共山西省委提出，工資部分和供給部分的比例關係，一般以各佔50%為宜。工資部分，可以採取評工記分的勞動日基本報酬制和死級活評的等級工資制兩種辦法；在不同的管理區之間，應允許有不同的工資標準和差別。[11]

廣東新會縣，原來供給部分和工資部分的比例一般都是六比四或七比三，供給部分過多，社員們認為多勞不能多得，幹多幹少都一樣。整社中調整了分配比例，部分幹部和社員要求完全恢復高級社時的按勞取酬的分配制度。他們説，過去（指供給部分為主）的共產主義成份太多了，誰還願意積極呀！[12]

在解決公社分配問題的過程中，糧食問題突顯了出來。即農村普遍出現糧食緊張的局面，整社工作的重點很快轉向了解決糧食問題。

1959年1月24日，主管農村工作的中央書記處書記譚震林，對各地貫徹八屆六中全會決議的情況向毛澤東報告説：

> 各地傳達、討論中共八屆六中全會決議已深入到縣，整社試點工作也已經普遍進行。農村雖出現了各種困難和混亂現象，但估計經過四五個月的整頓後，一切都會轉入正常。只要我們不讓公社垮台，它就絕不會垮台。……今年農業生產高潮尚未形成，六中全會決議的宣傳還不夠有力，克服虛報浮誇把許多行之有效的領導方法都「克」掉了，這是最大的危險。至於勞動力緊張的狀況，今年還會繼續下去，經過安排可能會好一些。1958年的分配工作尚未做好，這對群眾的生產情緒有很大影響，在壓縮空氣後，又發生了瞞產私分的现象，增加了分配工作的困難，尚須努力一段時間，才能做好。[13]

中共廣東省委書記處書記趙紫陽在1月27日向省委報告說：

> 自去年12月中旬以來，糧食問題已經成為農村輿論的中心。雷南縣去年晚造生產有很大躍進，年底卻出现了糧食緊張的不正常現象。為此全縣召開了一系列幹部會議，结果查出瞞產私分的糧食7000萬斤。雷南縣的經驗證明，目前農村有大量糧食，糧食緊張完全是假象，是生產隊和分隊進行瞞產私分造成的。[14]

中共安徽省委也派出工作組對桐城縣的鬧糧情況進行調查。指出：

> 目前農村的所謂糧食問題，不是缺糧問題，也不是國家徵購任務過重的問題，而是思想問題，特別是基層幹部的思想問題。他們一怕糧食不實行「三包」辦法，而由公社統一分配；二怕報實產量會追加徵購任務；三怕春荒時調劑餘糧；四怕別隊不報實產，自己吃虧。因此許多基層幹部带頭瞞產私分，形成群眾性的鬧糧風潮。[15]

上述情況說明，農村人民公社建立以後出現的混亂，除了急於由集體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過渡、急於由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的原因以外，重要的還有社共隊的產、窮隊共富隊的產所出現的共產風，和無償地把窮隊富隊、窮村富村拉平的平均主義問題。但在當時，中共黨內高層的絕大多數幹部，並未弄清農村關係緊張的根由。1959年1月15日，湖北省委第一書記王任重在全省四級幹部會議上曾非常不滿地說：

> 有的公社調這也調不動，調那也調不動。我説，先禮後兵。經過教育，還是不服從國家統一计劃和調配的，就要給以必要的處理，從警告、撤職、直到開除黨籍。[16]

3.反對兩個平均主義

中共八屆六中全會以後，毛澤東對1959年的計劃指標能否落實放心不下，1959年1月18日，他召集陳雲、李富春，薄一波，李先念、彭德懷、譚震林討論經濟問題和工業問題。陳雲在會上説：過去，每年的工業產值中只有15%是靠當年建成的新廠完成的。但自從今年開始，情況

有了變化，工業產值中將有30%要靠當年建成的新廠完成。並認為，武昌會議制定的1959年的生產計劃指標過高，難於完成。毛澤東聽後說：「那就拉倒，甚至於這個總路線究竟正確不正確，我還得觀察」；毛要陳雲就這個問題講講話。[17]

根據毛澤東的建議，中央於1月26日至2月2日在北京召開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會議，討論1959年國民經濟計劃、輕工業和市場問題、農業問題、勞力調配問題等。毛澤東在2月1日和2日作了兩次講話，[18]基調是：1959年仍然是「鼓足幹勁，力爭上游」的一年。他在1日的講話中說：

> 去年十一、十二月壓缩空氣，群眾也要休息休息，鬆一點，不要緊，可以再鼓足幹勁。……今年已經展開了一個大躍進局面。像我們這樣一個國家，有人多、大國、资源、蘇聯經驗等條件，不會不躍進的。

在2日的講話中，毛澤東肯定1959年的計劃，是一個比較全面的計劃。「我們應當稱讚這個計劃。」他說：

> 现在有些人，一講起去年的缺點，講了幾十條，一無是處，這是形而上學地看問題。不管我們有多少缺點，歸根到底，不過是九個指頭與一個指頭的問題。我們在座的和不在座的高、中級幹部，都是想做好事的，至於结果壞是另一回事，主觀的東西要在客觀實踐中才能見效。……這次搞出的計劃，比較全面，形而上學較少，看到了其中的聯繫。……我們應當稱贊這個計剑，宣傳這個方法，既兩條腿走路，又有重點。

毛同時也承認：「關於國民經濟有計劃按比例發展的問題，我不甚了解，要研究。」他說：

> 搞經濟建設我們還是小孩，無經驗。同地球作戰，戰略戰術我們還不熟，要正面承認這些缺點和錯误。關於反映客觀规律，按比例發展，這個問題我是沒有解決的。現在我們似乎開始在这裏接觸這個問題了。请大家接觸這個問題，研究研究。

基於毛澤東的上述估計，這次北京會議基本上維持了武昌會議的計劃指標，沒有作進一步的調整。如果說，關於1959年工業生產的指標，毛澤東仍很有自信；那末，農村的糧食問題，仍使他睡不好覺。

繼1月底廣東省委報來趙紫陽在雷南縣反瞞產的信以後，2月5日的《內部參考》又刊登了廣東省反瞞產運動挖出黑糧二十八億斤的消息。[19]其中說：

> 大部分原農業社和和生產隊干部瞞產，不是一個簡单的本位主義作怪問題，它的背後還有更深的社會根源和思想根源。它反映的，實際上是公社化後，糧食消费起了根本性質的變化，但我們的指導思想和工作沒有緊緊跟上去。幾千年來，直到公共食堂

成立前，農民都是一家一户地管理糧食，消費糧食，公共食堂化後，農民將米缸從家裏搬到公共食堂去了。但是公共食堂能否長期辦下去？能否辦好？一些農民是懷疑的。這就是大部分幹部在糧食問題上鬧本位主義的社會根源。反瞞產中，許多地方幹部想報實產量但又不敢報，正是受到群眾一定壓力的結果，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公共食堂化，幾百口、幾千口的嘴巴要干部負责，因此，干部總是想手中多控制些糧食，以防發生困難時，自己有辦法。此外，晚稻收穫時，領導疏忽，糧食管理工作混亂，也為幹部瞞產開了方便之門。

對於農民瞞產私分，毛澤東早有所聞。但對農民瞞產的原因，毛澤東認為廣東省委的分析，找到了問題的癥結所在，遠比他原先的想法深刻得多。毛遂于2月22日將廣東省委報來的趙紫陽的信和省委的批語轉發各省、市、自治區黨委，並以中共中央名義寫了一個長篇批語。毛指示：「即送劉（少奇）、彭真、周（恩來）閱後，即刻印發，或用電報發去，愈快愈好。」毛還將中央批語，加上〈中央批轉一個重要文件〉的醒目標題。其中寫道：

> 趙紫陽同志给廣東省委關于解決糧食問題的信件及廣東省委的批語，極為重要，現在轉發你們。公社大隊長小隊長瞞產私分糧食一事，情況嚴重，造成人心不安，影響廣大基層幹部的共產主義品德，影響春耕和1959年大躍進的積極性，影響人民公社的鞏固，在全國是一個普遍存在的問題，必須立即解決。……六中全會開於人民公社的決議，肯定了公社在现階段仍為社會主義的集體所有制，這一點使群眾放了心。但公社很大，各大隊小隊仍怕公社拿走隊上的糧食，並且在秋收後已經瞞產私分了，故必須照雷南縣那樣宣布糧食和干部兩條正確的政策，並舉行一個堅決的教育運動，才能解決問題。只要政策和方法正確，解決問題的時間只需要十天或者半個月就夠了。此件可登黨刊，並可轉發各地、縣。[20]

為掌握第一手情況，毛澤東於2月23日再次登上專列南下，親自作調查研究。

毛先後同河北、山東、河南的省委、地委負責人以及山東歷城縣委第一書記和幾名基層幹部（一個公社黨委書記、一個管理區黨總支書記、一個生產隊長）進行座談。全國勞動模範呂鴻賓合作社發生的故事，給毛澤東留下了深刻印象。呂鴻賓社也是搞「共產」，開條子，調這調那。後來條子不靈了，就派人拿着秤去秤糧食，群眾進行抵制，就翻箱倒檯。這一條也不靈了，就扣帽子，批本位主義。最後還是不靈，於是，教育了呂鴻賓他們改變主意，用一把鑰匙（做思想工作）；一張布告（安民告示，講明政策）；一個樓梯（下決心解決所有制問題），這才解決了問題。[21]毛後來說：

> 「右倾」不是我一個人，山西同志也相當「右倾」。山西我

沒有去。我一到天津，天津同志也「右傾」，劉子厚跟我差不多。到了山東，就聽說呂鴻賓先「左傾」，後來「右傾」了。還有李先念，他也覺得過去「右傾」不夠。我一到河南，河南同志贊成我這個「右傾」。我26號晚上就見了他們，跟他們一吹，我就有勁了，我才敢於下決心召集這次會議。[22]

2月26日晚到3月5日下午，毛澤東在專列上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即第二次鄭州會議。參加會議的人員是逐步擴大的。第一天的與會者為：毛澤東、劉少奇、鄧小平、彭真、李先念、胡喬木，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吳芝圃，山東省委第一書記舒同，河北省委會記劉子厚，山西省委第一書記陶魯笳，陝西省委第一書記張德生。在27日的會議上，毛澤東作了長篇講話。[23]

毛澤東首先肯定了1958年在各個戰線上取得的「偉大的成績」。說：「懷疑或者否認1958年的大躍進，懷疑或者否認人民公社的優越性，這種觀點顯然是完全錯誤的。」這些人「或者是一個觀潮派算賬派，或者简直是敵對分子」。然後，他分析當前農村的矛盾說：

> 我認為人民公社现在有一個矛盾，一個可以說相當嚴重的矛盾，還沒有被許多同志所認識，它的性質還沒有被揭露，因而還沒有被解決……。
>
> 究竟是甚麼樣的一種矛盾呢？大家看到，目前我們跟農民的關係在一些事情上存在着一種相當緊張的狀態，突出的现象是在1958年農業大豐收以後，糧食、棉花、油料等等農產品的收購至今還有一部分沒有完成任務。再則全國（除少數災區外），幾乎普遍地發生瞞產私分，[24]大鬧糧食、油料、豬肉、蔬菜「不足」的風潮，其規模之大，較之1953年和1955年那兩次糧食風潮都有過之無不及。同志們，請你們想一想，這究竟是甚麼一回事呢？我認為，我們應當透過這種現象看出問題的本質即主要矛盾在甚麼地方。这裏面有幾方面的原因，但是我以為主要地應當從我們對農村人民公社所有制的認識和我們所採取的政策方面去尋找答案。

毛指出，這個矛盾的根子，是在公社化過程中各級大颳平均主義的「共產風」。六中全會決議有缺點，沒有弄清楚現在的公社存在着三級所有制。他說：目前的問題不是本位主義，而是領導者的平均主義和過分集中的傾向。據此，毛提出了「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公社體制。他指出：

> 目前我們的任務，就是要向廣大干部講清道理，經過充分的醞釀和討論，使他們得到真正的了解，然後我們和他們一起，共同妥善地堅決地糾正這些傾向，克服平均主義，改變權力、財力、人力過分集中於公社一級的狀態。……公社應當實行權力下放，三級管理，三級核算，並且以隊的核算為基礎。……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夠有效地去克服那種確實存在於一部分人中的本位

主義，鞏固公社制度。

接着，批評了公社化過程中颳起的「共產風」（據李鋭說：「共產風」這個詞，是毛在這次講話中首先使用的。[25]）。毛說：

> 公社在一九五八年秋季成立之後，颳起了一陣「共產風」。主要內容有三條：一是窮富拉平。二是積累太多，義務勞動太多。三是「共」各種「產」。[26]所謂「共」各種「產」，其中有各種不同情況。有些是應當歸社的，如大部分自留地。有些是不得不借用的，如公社公共事業所需要的部分房屋桌椅板凳和食堂所需要的刀鍋碗筷等。有些是不應當歸社而歸了社的，如雞鴨和部分的豬歸社而未作價。這樣一來，共產風就颳起來了。即是說，在某種範圍內，實際上造成了一部分無償佔有別人勞動成果的情況。

毛在強調了對勞動人民的勞動成果，不可以無償剝奪的同時說：「我們指出這一點，是為了說明勉強把窮富拉平，任意抽調生產隊的財產是不對的，而不是為了要在群眾中間去提倡算舊賬。相反，我們認為舊賬一般地不應當算。」

從武昌會議提出，人民公社從集體所有制到全民所有制需要有一個過程，到第二次鄭州會議提出，在人民公社內，由隊的小集體所有制到社的大集體所有制，也需要一個過程。就當時對這個問題的認識來說，是一個前進。但從根本上說，毛澤東並沒有改變對人民公社「一大二公」優越性的看法。在他看來，通過調整所有制的體制，確認生產隊（大體上是原高級社）所有制是基礎，實行三級核算，以解決窮隊共富隊的產的平均主義；明確承認多勞多得，按勞分配的原則，以克服社員分配中的平均主義。就可以調動農民的生產積極性，繼續實現大躍進，假以時日，人民公社就可以實現兩個過渡。毛曾尖銳指出：「這是毫無疑問的，這是完全肯定了的。如果對於這樣一個根本問題發生懷疑，那就是完全錯誤的，那就是右傾機會主義的。」然後他明確表示：

> 公社有了強大的經濟力量，就可以實現完全的公社所有制，也就可以進而實現全民所有制。時間大約需要兩個五年計劃，急了不行，欲速則不達。這也就是北戴河決議所說的，將需要三四年、五六年或者更長一些的時間。然後，再經過幾個發展階段，在十五年、二十年或者更多一些的時間以後，社會主義的公社就將發展成為共產主義的公社。

毛在全篇講話的最後，充滿信心地說：

> 經過這樣一個整頓和鞏固人民公社的過程，我們同群眾的團結將會更加緊密。在偉大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五億多農民一定會更加心情舒暢，更加充滿幹勁。我們一定能夠在1959年實現更大的躍進。人民公社的事業，一定能夠在鞏固的基礎上蒸蒸日上，勝利一定是我們的。

可以認為，這大概就是毛澤東自1958年11月第一次鄭州會議以來，在人民公社問題上，實行退卻的底限。但毛的這一有限退卻，一時還難以為各級幹部所接受。27日當夜，中共河南省委四級幹部會議辦公室，將白天毛澤東的講話傳達後，鞏縣、太康等九個縣幹部討論的反映上報。其中說：

> 絕大多數干部聽了主席指示的傳達後，都表示非常擁護，討論特別熱烈。但由於大家思想沒有準備，還存在着不少顧慮和糊涂認識。有人認為，生產隊成了一級核算單位，這下不背大包袱了，但统一種植計劃不好辦了，工業化機械化速度慢了，抽調勞力不好辦了，因此對人民公社統一調動人力、物力和財力的優越性發生懷疑。有人認為，這樣搞公社還有甚麼權？生產隊的權力大了，本位主義會更大。[27]

28日，毛澤東找來沒有參加第一天會議的另一批省、市委第一書記——上海的柯慶施、廣東的陶鑄、湖北的王任重、湖南的周小舟、安徽的曾希聖、江蘇的江渭清、四川的李井泉、甘肅的張仲良等開會，向他們講述了與第一天大致相同的內容。如同河南的縣級幹部一樣，省委書記們也缺少思想準備，一部分人對毛澤東提出的一套主張想不通，一時轉不過彎來。可以說，整個會議開得不大順利。因此，3月1日上午，毛澤東寫信給劉少奇、鄧小平，建議會議再延長兩天。3月1日下午，將27日、28日分別參加會的人合起來，繼續開會。毛澤東再次講了所有制、等價交換、按勞分配等問題。毛指出：「基礎是生產隊，你不從這一點說，甚麼拉平，甚麼過分集中，就沒有理論基礎了。得承認隊是基礎，跟它作買賣。它的東西，你不能說是你的，同它是買賣關係。」「六中全會到現在，兩個半月，根本沒有實行。人民公社決議沒有阻止一平、二調，三收款這股風。」「我的思想就不明確。主要責任中央擔，沒有說清楚這個事，以為一篇決議就可以解決了。」[28]

鑑於春耕在即，如果所有制問題不能很快落實，「共產風」得不到制止，將造成更嚴重後果。毛澤東希望將鄭州會議的精神迅速傳達下去，進行落實。3月2日凌展4時半，他再次寫信給劉少奇、鄧小平，要求各省根據河南的經驗，立即召開六級幹部會議，一竿子到底，作出統一決定，貫徹實施。

3月2日晚，繼續開會。周恩來、陳雲、彭德懷等幾位中央領導人都參加了。主要是研究如何傳達文件和如何開好六級幹部會。毛澤東第四次到會講話，他用郭嘉給曹操獻計——「先打呂布，後打袁紹」的三國故事，[29]告誡各級領導人不要多端寡要，多謀寡斷，而要能夠當機立斷。否則會誤大事。

關于這幾天開會的情況，與會者的心態和思想變化過程，王任重在他的日記中作了如下記載：

> 28日下午到了鄭州，晚上主席找我們七個人去談話，柯慶施，陶鑄、曾希聖、江渭清、周小舟和我，還有李井泉。主席的談話像丟了一個炸彈，使人一驚，思想一時轉不過彎來。1日上午繼續開會，由小平同志主持討論。看來大家還有相當大的抵觸情緒，怕變來變去影響生產。當天下午主席又找大家一起去談，從下午4時谈到晚上9點多鐘。就在這一天的午飯後，我睡了一覺起來，思想就開朗了，覺悟到主席抓住了根本問題、關鍵問題，而我們是直線，抓的是枝節問題，是改良主義的修修補補的辦法，不能徹底解決問題。
>
> 這次主席談话，我們幾個人跟他唱反調，再一次證明我們自己的思想水平低，相差太遠。
>
> 2號晚上主席又找大家去，當面宣布幾項結論，徵求大家意見。大家都同意了，是真同意了。他為了察言觀色，讓我們坐在他的對面。在這兩天主席寫了三封信，申述了他的主張，要各省開六級幹部大會，看來主席抓得很緊。[30]

3月5日，毛澤東主持最後一次會議。[31]毛澤東在講話中，再次強烈地表達了他對調整公社所有制體制的決心，目的是要大家明白問題的嚴重性，思想趕快轉彎，下定決心，堅決貫徹。會議最後形成的《鄭州會議記錄》，[32]主要內容是：毛澤東2月27日的講話；《關於人民公社管理體制的若干規定（草案）》。其中規定「當前整頓和建設人民公社的方針」是：

> 統一領導，隊為基礎；分級管理，權力下放；三級核算，各計盈虧：分配计劃，由社決定；適當積累，合理調劑；物資勞動，等價交換；按勞分配，承認差別。

從1958年12月中共八屆六中全會以來，毛澤東全力關注和思考的農村問題，似乎已經摸到了底，現在就只等貫徹落實了。這時，毛澤東對1959年即將出現一個繼續大躍進的局面，充滿信心。這在他3月9日寫的一封黨內通信中，有着明確的表達，即通過第二次鄭州會議精神的傳達貫徹：

> 3月份可以基本上澄清和解決人民公社問題中一大堆糊塗思想和矛盾抵觸問題。4月起，全黨全民就可以一個意向地展開今天的大躍進了。[33]

[1]〈徐州專區人民公社最近有兩千多個食堂停伙〉，《內部參考》，1959年1月24日。

[2]〈關於句容縣寶華公社侖頭、銅山大隊死人問題的調查〉，《內部參考》，1959年1月27日。

[3]〈1958年冬季疾病流行情況〉，《內部參考》，1959年1月10日。

[4]〈關于「肿病」发生的情况〉，《內部參考》，1959年1月10日。

[5]〈大批外地農民流入北京、包頭等市〉，《內部參考》，1959年2月24日。

[6] 據全國劳动工資计划會議材料：1958年年末，全國職工总数达到4939萬人，比1957年增加2089萬人。其中增加最多的是四川省（304万人）；山東、河北，河南、江蘇各增加一百萬人以上；遼寧、雲南、浙江、廣東、贵州、安徽、湖南、湖北、黑龍江、山西、江西、福建各增加五十萬人以上。〈去年全國新增職工二千萬以上〉，《內部參考》，1959年3月4日。

[7]〈福建省今年春耕準備工作不如去年〉，《內部參考》，1959年2月12日。

[8]〈玉溪專區纠正平均使用劳力的傾向〉，《內部參考》，1959年2月25日。

[9]《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十一冊，頁622-623。

[10]〈目前公社有那幾種分配形式〉，《內部參考》，1959年3月6日。

[11] 中共山西省委：〈關于整頓和鞏固人民公社的決議〉（1959年2月17日印發》，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八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頁78。

[12] 〈新會縣人民公社在发放第一次工資後出勤率、勞動效率為甚麼下降〉，《內部參考》，1959年1月19日。

[13] 谭震林：〈關於目前農村情况和農业生産問題的報告〉(1959年1月24日），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八冊，頁23-24。

[14] 趙紫陽：〈關於雷南縣幹部大會解決糧食問題的报告〉（1959年1月27日），载《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八冊，頁53-54。

[15] 〈是缺糧問題，还是思想問題？〉，《經濟消息》，第9期（1959年2月19日），载《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八冊，頁80-81。

[16] 李銳：《「大躍進」親歷记》，下冊，頁393。

[17]《陳雲年譜（1905-1951）》，下卷，頁4。

[18]《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八冊，頁32-34。

[19] 新华社：〈广东省反瞞產运动取得很大成績，基層干部報出黑糧二十八億斤〉，《內部参考》，1959年2月5日。

[20] 毛澤東：〈中央批转一個重要文件〉（1959年2月22日），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八冊，頁52-53。

[21]《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頁912-913；萧冬連等：《求索中國：文革前十年史》，上冊，頁458。

[22] 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記錄（1959年3月1日），《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頁915。

[23] 毛澤東：〈在鄭州會議上的讲話〉(1959年2月27日），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八冊，頁65-75。

[24] 毛澤東認為瞞產现象的本質，是所有制出了問題。這個分析是正確的。但説全國農村「幾乎普遍地發生瞞產私分」，這個估計是不符合實際的。根據這個估計，在此後開展的反瞞產私分，加劇了農村的缺糧程度，造成了嚴重後果。

[25] 李銳：《大躍進親歷記》，下冊，頁395。

[26] 李銳在《「大躍進」親歷記》，下冊，頁395-396中寫道：「湖北省當陽縣跑馬鄉曾發生過這樣一件事，1958年10月的某一天，該鄉召開社員大會，黨委書記當眾宣布，11月7日是全鄉社會主义结束的日子，8日進入共產主義，一切以共產主義方式來辦。會一開完，社員群眾紛紛上街去拿商店的東西，商店的東西拿光了，就拿別人的，随便甚麼东西都可以拿，你家的雞，我可以抓來吃；我们隊的菜，你們也可以任意來挖；甚至連小孩子也不分你我的；只是一條，老婆還不能随便拉別人的。可是，黨委書記竟然説，老婆能不能拉，還要請示上级。」李銳評論説：「在二十世纪的社會主義中國，出現這種現象，多麼荒唐，多麼可悲！這説明，在一個物質产品極端匱乏，文化素質十分低下的國度裏，人們只能以一種近乎野蠻人的方式去『實踐』所謂的『共產主義』。正如恩格斯在〈論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一文中所斷言的，愈是在經濟落後的條件下構築共產主義，離共產主義也就愈來愈遠。」

[27] 中共河南省委四级幹部會議辦公室整理的關於鞏縣、太康等九縣幹部讨論毛澤東在鄭州會議上的講話的情況報告，1959年2月27日夜。《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八冊，頁83。

[28] 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記錄（1959年3月1日），載《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頁918-919。

[29] 郭嘉向曹操説：袁紹這個人多端寡要，多謀寡斷，见事遲，得计遲。曹操聽了郭嘉的話，结果先打敗了呂布，又打敗了袁紹。毛澤東解释説，所謂见事遲，得计遲，就是形勢已经出來了，他還不能判斷，得出一個方針來，就處於被動。

[30] 王任重日记（1959年3月4日），載《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頁921。

[31] 這天會議，新增加的省，市、自治區負责人有：北京的劉仁、內蒙古的烏蘭夫、黑龍江的歐陽钦、吉林的吴德、遼寧的黄火青、福建的葉飛、浙江的江華、江西的邵式平、廣西的劉建勛、雲南的谢富治、新疆的王恩茂等。

[32] 〈鄭州會議記錄〉，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載《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十二冊，頁123-138。

[33] 毛澤東：〈黨內通信〉（1959年3月9日），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八冊，頁99-100。

三、二次整社和降低鋼鐵指標

1.三級所有，隊為基礎

第二次鄭州會議結束以後，各省、市、自治區立即召開六級幹部會議傳達貫徹。

3月7日，中共湖北省委就貫徹鄭州會議精神的情況向中央報告說：近幾天來，省委緊緊地抓住一條，即迅速、廣泛、深入地把鄭州會議的精神貫徹下去，召開了一系列各級幹部會議，並定於3月11日在武昌召開全省六級幹部大會，加上各地六百名觀潮派、算賬派，參加人數將達三千五百多人。目前省委常委擴大會議正根據鄭州會議精神和傳達後的反映，進行討論，寫出文件草稿，交六級幹部大會進一步討論。這次擴大會議提出：一、根據鄭州會議精神，在解決了所有制問題之後，還要解決兩條道路、兩種思想、兩種作風之間的矛盾，解決的辦法，就是整黨整社。二、從湖北的實際情況出發，原農業合作社（即現在的生產隊）上交公社的部分不宜太多，1958年為5%至10%，1959年為10%左右，最多不超過15%。生產隊的積累仍為8%左右。三、對原定的地方工業規劃和基建工程計劃做必要的調整。四、有關人民公社的具體政策問題，正在搜集、整理、研究和討論。[1]

毛澤東對各省召開六級幹部大會一事抓得很緊，惟恐延誤時機。3月8日他要求中央書記處用電話方式，將湖北省的報告，立即傳達各省、市、區黨委，以作參考。毛在批語中表揚了湖北的做法，說：「湖北的特點，就是快，有準備，有步驟。」「我認為，湖北省委的總方針是正確的，是符合鄭州會議的精神的。」[2]為使各省、區的會議開好，毛澤東於同日將河南省委3月6日報來的，河南省六级幹部會議關於人民公社的體制問題、分配問題、窮隊富隊問題和幾個具體政策意見問題的综合材料，以及河南省委據此做出的規定[3]批發各省區。當聽到湖南省委定於3月16日才召開六級幹部會的消息後，毛澤東於9日給各省、市、區黨委第一書記寫信督促，要求「立即召開」。他指出：

> 湖北省委定於3月11日開會，是適當的。太遲了，不利。時間太短，問題的分析、揭露和讨論，勢必不充分，解決得不會很適當和很徹底，就是說，不深不透。……有些同志或者會認為倉促、無準備，大會召開的時間應當推遲。我認為不宜如此。……從3月4日至10日，有六七天時間作準備，還不夠吗？頂夠了。拖長反而不好。[4]

同日，毛又介紹安徽的經驗，表揚：「安徽六級幹部大會定3月9日

開始，18日完畢，比湖北還早兩天，非常之好。」[5]3月13日，毛澤東又批發廣東省委的報告，推廣廣東「一面開會，一面即將方針直達各生產隊長，毫不拖泥帶水」的做法。並要各省「酌情採納」廣東的「三定五放」[6]的政策規定。[7]

各省區在討論落實把生產隊作為公社的基本核算單位時，究竟是現在的生產大隊（管理區），還是生產隊（原高級社），出現了不同意見：河南省委最先提出，以大隊為基礎；湖北省委提出，以生產隊為基本核算單位。湖北的理由是：人民公社是在原來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的基礎上建立和發展起來的，這樣做有利於解決大集體和小集體的矛盾，發揮廣大農民群眾的積極性，有利於團結、生產和人民公社的鞏固。[8]廣東省委提出的「三定」，也規定：「基本核算單位，一律以原來的高級社為基礎」。[9]而湖南省委則同意河南的做法，以生產大隊（管理區）為基本核算單位。[10]這樣，明顯形成了兩種意見。山東省召開的六級幹部會議中，對以生產隊還是以管理區為基本核算單位已展開爭論。[11]毛澤東以為，此事關係重大。3月15日，他給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寫信指出：

> 河南、湖南兩省均主張以生產大隊（管理區）為基本核算單位，湖北、廣東兩省均主張以生產隊即原高級社為基本核算單位，究竟哪一種主張較好呢？或者二者可以並行呢？據王任重同志說，湖北大會這幾天正辯論這個問題，兩派意見鬥爭激烈。大體上，縣委，公社黨委、大隊（管理區）多主張以大隊為基本核算單位，生產隊（即原高級社）支書絕大多數，或者全體主張以生產隊為基本核算單位。我感覺這個問題關係重大，關係到三千多萬生產隊長小隊長等基層幹部和幾億農民的直接利益問題……，而在目前這個時期脫離群眾，是很危險的，今年生產將不能達到目的。……《鄭州會議記錄》上所謂「隊為基礎」，指的是生產隊，即原高級社，而不是生產大隊（管理區）。總之，要按照群眾意見辦事。無論甚麼辦法，只有適合群眾的要求，才行得通，否則終久是行不通的。[12]

3月17日，毛澤東又給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寫了第二封信，向他們指出：六級幹部大會，除公社、管理區（即生產大隊）、生產隊（即原高級社）三級所有、三級管理，三級核算之外，還應該討論生產小隊（生產小組或作業組）的部分所有制的問題。[13]

各地在接到毛澤東的指示後，縣和公社這兩级幹部也勉強接受了以生產隊（原高級社）為基本核算單位的意見。河北、山東、四川、福建、浙江、安徽等省基本上都確定了以生產隊為基本核算單位。河南省也改變了原來以生產大隊為基本核算單位的決定。對於縣、公社幹部思想是如何轉彎的，中共河南洛陽地委在給省委的報告中說：

> 關于公社的基本核算單位問題，各縣生產隊長和群眾中的絕

大多數主張以高級社為基本核算單位，但縣委、公社及相當多的管理區干部，則堅持以大隊（管理區）為主。其實有些縣委干部是了解群眾情緒的，之所以不敢改变政策措施，主要是怕犯右傾機會主義錯誤，加上省委曾有「以大隊為基礎」的規定，因而採取了一面執行一面又拖泥帶水的態度。17日晨傳達了主席關於這一問題的指示後，以高級社為基礎這條方針定了，會議開得很順利。[14]

這就向人們道出了自1955年夏季批判農業合作化中的所謂「右傾」以來，「右傾機會主義」已成為懸在全黨幹部頭上的一把利劍，時刻擔心它會落在自己的腦殼上。因此，「寧左勿右」已成為中共黨內的一種怪癖。「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為何會一哄而起；「共產風」竟無人敢於站出來抵制；就在毛澤東提出要「壓縮空氣」以來，想糾正一些錯誤做法也阻力重重。其根源皆出於此。

儘管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單位，放到生產隊（原高級社），已基本得到統一，但農村問題還遠沒有完全解決。毛澤東從鄭州一路南下，先後在武昌、長沙停留，了解鄭州會議精神貫徹的情況。20日到達江西南昌，召集中共江西省委和部分地、市委負责人進行座談。毛澤東向他們談了部分小隊所有制、小集體向大集體過渡、供給制和公共食堂等問題。這表明，毛澤東還在繼續調查和思考人民公社的有關問題，他所以督促各省抓緊時間召開六級幹部大會，原因之一是準備3月下旬在上海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進一步討論並做出決定。

2.鋼鐵產量月月欠帳

中共八屆六中全會，根據毛澤東「壓縮空氣」的精神，將北戴河提出1959年鋼產量三千萬噸的指標降低為一千八百萬噸左右。《人民日報》1959年的元旦社論稱：「根據黨的八屆六中全會提出的主要指標而安排的1959年的國民經濟計劃，將是一個偉大的躍進計劃，同時又是一個建築在客觀可能性基礎上的可靠的計劃。」[15]但據新華社《內參》報道，從1959年1月開始，鋼鐵生產的指標，月月都沒有完成計劃。記者報道説：

開年以來，全國鋼鐵生產計劃完成得不好。1月份全國產鋼七十七萬噸，僅為去年12月份產量的47.4%；產鐵一百四十二萬噸，為去年12月份的51.5%；產鋼材五十二萬噸，為去年12月份的83.9%。按照今年第一季度鋼鐵生產計劃的要求，全季平均每天應該生產鋼三萬三千噸，鐵五萬七千噸，鋼材二萬二千噸；而實際上1月份每天只生產鋼二萬五千噸，鐵四萬六千噸，鋼材一萬七千噸，比計劃欠了很多。[16]

對鋼鐵生產未能按月完成計劃，冶金工業部黨組認為：一是，各

省、區生鐵調運沒有按計劃進行，嚴重影響到鋼和鋼材產量。二是，煤和焦炭供應不足，各地小高爐開爐情況很不好。如浙江省開工生產的小高爐尚不到全部高爐的四分之一，江蘇省不到三分之一，河北省、安徽省不到五分之二；有些地方小高爐不得不根據焦炭的供應量來制訂生鐵產量。三是，提高質量的措施沒有及時跟上。四是，生產準備工作抓得晚了。去年年末保證「1070」的計劃完成，把主要的和輔助的原材料吃光了，1月份缺乏後備，形成「寅吃卯糧」的局面。生產設備由於去年突擊生產，應該檢修的也未來得及檢修。可見，除指標不切實際以外，主要原因是：1958年放「衛星」，拼設備，竭澤而漁式地蠻幹，致使1959年生產的各個環節難以正常運轉。

與完成年度生產計劃直接有關的基本建設進度，也不如人意。據國家统計局的统計資料，要求在一季度內竣工投入生產的工程，很多都不能如期完成。如：冶金工業方面，截至3月中旬，要求在一季度投入生產的255立方米以上的高爐六座，只完成兩座；三噸以上的轉爐十二座，只完成一座；軋鋼機261套，只完成十六套；紅旗二號簡易焦爐3300座，只建成二十四座，投入生產三座。[17]

有關重大建設項目設備成套生產和供應存在嚴重脱節的問題，1958年底就基本暴露了出來。1959年1月2日，中共中央向上海局和各省市區黨委發出通知，中央派出六個小組，[18]於1月5日左右到達各地，進行設備成套的重點檢查。檢查的範圍以冶金設備（煉鐵、煉鋼和軋鋼）發電設備的成套生產和供應為中心，同時也檢查其他行業重點單位的配套工作。1月4日，國家建委開會，陳雲向參與檢查組的人員講話，他首先談到，當前為甚麼要抓成套？第一個五年計劃設備都靠國外進口，現在基建規模如此擴大，主機要由國內解決。1958年只注意了主角，對配角注意不夠，愈砍愈不成套。1958年體制下放，分級管理，舊的協作關係打破了，新的協作關係沒有建立起來。如大連機車廠，機架原由上海供給，現改由冶金部門供應，為別人打雜，地方不幹了。此外配角都想升格當主角，也造成混亂。長春汽車廠的配套設備無人負責。陳雲提出，設備沒有成套的問題，要從生產廠礦和基建單位兩方面檢查。東北、華東著重生產，西北、西南著重基建。下去調查二十天，找出典型和問題，回來再開會和解決問題。[19]

1月17日晚8時，陳雲主持召開各檢查組的電話匯報會。谷牧首先匯報上海的情況，指出存在三大矛盾：一是供需矛盾，即能力與材料供應不足的矛盾；二是自己需要與供應外地的矛盾，包括保證重點與照顧一般的矛盾；三是新老任務的矛盾，要完成去年積累下來的配套任務，勢必影響今年的計劃。目前，上海市場，五金、交電材料90%以上品種脫销。王新三匯報東北冶金和發電設備配套情況，提出亟待解決的問題：一是協作關係應迅速定下來；二是制止不正常的以货易货；三是強化產

品質量檢查。對存在的問題，各組匯報內容大體相同。1月下旬，各檢查組回到北京，連同北京的檢查組，由陳雲主持進行匯報、討論。3月初，建委召開全國基建會議，討論設備成套問題。隨後，建委黨組向中央作了「關於設備成套問題的檢查總結報告」。3月20日，中央轉發了建委黨組的報告，並作批示説：

> 工礦企業的建設必須根據今年大躍進的特點，按重重急急排隊的次序，保證按期建成並投入生產，以滿足生產大躍進對它們的要求。為此，必須使成套設備的製造、供應和安裝之間的安排，緊密结合，一一落實。由建委領導，經委、計委、一機部、商業部和有關工交各部人員參加，成立設備成套辦公室，務必在5月以前做出顯著成績。

在此之前，國家經委主任薄一波在2月24日向中央報送了關於冶金、機械、煤炭三部生產情況和計劃安排的匯報提綱，反映了鋼材、設備分配不足的情況，建議中央召開第一書記電話會議並由負責同志掛帥，下去督戰。中共中央3月9日批轉了薄一波的報告，指出：今後工業生產發生的問題和須要採取的措施，責成國家經委負責解決。

由於洗煤、煉焦、礦山設備、電力設備和運輸設備等薄弱環節非短期所能解決，計劃仍然難以完成。據1959年5月4日《內參》報道：4月份，全國預計產鐵一百六十五萬噸，完成月計劃82%；鋼九十三萬噸，完成月計劃74%；鋼材六十四萬噸，完成月計劃75%。平均日產量都沒有達到計劃的要求。1到4月份累計產鐵六百零七萬噸，鋼四百三十六萬噸，鋼材二百二十八萬續。同樣，因原材料的短缺，城鄉日用工業品市場也出現緊張局面。廣東省，從1959年2月以來，全省大、中、小城绩普遍出現日用工業品脱销、半脱销的品種日渐增多。廣州市脱销、半脱销的產品共達二千二百多種；汕頭市脱销、半脱销的品種有七千多種。[20]

為了討論經濟工作、人民公社的整頓工作和有關國家機構的人事配備等問題，3月25日至4月5日，毛澤東在上海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和中共八屆七中全會。

3.七中全會決定降低指標

中央在上海召開會議，中共上海市委專門在原法國俱樂部對面，以十五天時間的「躍進」速度蓋了一座能容納一兩百人的小禮堂。對會議期間的生活，親臨其境的李鋭説：上海主人殷勤招待，集中川粵揚魯四大菜系名廚，每餐都由客人自由點菜。……這種同當時社會供應形成鮮明對照的生活，曾引起黃克誠的批評。[21]

3月25日至4月1日，中央政治局舉行擴大會議（俗稱：上海會

議）；4月2日到5日召開八屆七中全會。3月25日，毛澤東講話；26日，聽取薄一波作關於第一季度工業計劃執行情況和第二季度安排的報告；28日，李先念作關於財貿工作的情況和意見的報告。從3月28日到4月1日，會議主要討論了1959年的計劃指標、第一季度工業計劃執行情況和第二季度的安排、財貿工作等問題。4月2日到4日，主要討論人民公社問題。5日，七中全會通過有關決定。

會前和會議期間，毛澤東先後接到安徽、山西、山東、湖北等省有關貫徹鄭州會議召開的各級幹部會議的報告。其中對「算帳」、「怕變」等問題都有反映。關於「算賬」，山西的報告中說：

> 運城縣五級幹部會議在解決思想問題的過程中，宣布了將過去一個時期公社一級扣用原高級合作社的现金收入四百六十四萬元全部退還給原高級合作社。許多社員聽到了情不自禁地高興得跳了起來。各縣五級幹部會議和全民討論的情況證明，主席提出的舊賬要算、要處理的指示，是完全正確的，是群眾的一個迫切要求。[22]

湖北省關於麻城縣萬人大會情況的報告則談到：

> 幾天來，麻城的經驗，使我們認識到解決好小集體和社員的矛盾的重要性，它關係到黨的政策能否一直貫徹到群眾中去，而算清生產隊的賬，則是其中的一個關鍵。因此說，算帳是政治問題、政策問題、立場問題，一定要算，算到底。打開算賬的局面，關鍵在於深入開展思想動員，防止任何簡單粗暴行為。要採取「兩頭擠」的辦法，一方面加強對生產隊幹部的教育，動員他們交代問題：另一方面要發動小隊長，依靠他們幫助隊幹部弄清賬目。總之，要靠思想教育、靠群眾、靠算帳，三者結合，才能弄清問題。

毛澤東閱後，在3月30日、4月3日先後寫有批示，明確改變了鄭州會議關於舊賬一般不算的說法，毛寫道：

> 舊賬一般不算這句話，是寫到了鄭州講話裏面去了的，不對，應改為舊賬一般要算。算賬才能實行那個客觀存在的價值法則。這個法則是一個偉大的學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會我們的幾千萬幹部和幾萬萬人民，才有可能建設我們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否則一切都不可能。對群眾不能解怨氣。對幹部，他們將被我們毀掉。有百害而無一利。一個公社竟可以將原高級社的现金收入四百多萬元退還原主，為甚麼別的社不可以退還呢？不要「善財難捨」。須知這是劫財，不是善財。無償佔有別人勞動是不許可的。[23]

又指出：

> 算賬才能團結：算賬才能幫助幹部從貪污浪费的海洋中拔出身來，一身清淨；算賬才能教會幹部學會經營管理方法；算賬才

> 能教會五億農民自己管理自己的公社，監督公社的各級幹部只許辦好事，不許辦壞事，實現群眾的監督，實現真正的民主集中制。[24]

毛還具體指出要算清兩方面的賬：一是縣、社要向生產隊算清過去幾個月大調大抓的賬，解決大集體與小集體間的矛盾，以糾正「共產風」；二是生產隊幹部與生產小隊幹部算清同社員群眾的賬，解決小集體與社員的矛盾、幹部與群眾的矛盾。毛指出，後者「是一個以貪污形式無償佔有別人勞動的問題，是一個普遍的問題」，並以為，沒有省的決心、縣的直接領導，問題是不能解決的。

關於「怕變」的問題，山東濟寧地區五級幹部會議的反映是：

有人說「共產黨和孫悟空一樣，多變」。怕變的原因在於：一、辦初級社不到兩年，生產剛有勁了，就轉高級社；高級社不到兩年，就轉公社。希望將公社制度和各項政策用法律固定下來。二、國家统購政策曾宣布三年不變，實際上年年變；每年夏收前說不變，秋後就變了。希望上面定任務時估計足一點，定下來就不要再變。[25]

毛澤東對這個問題批示說：

> （一）不得群眾同意不變；（二）變的時候，一定要以有利於生產隊，不使生產隊、小隊、群眾任何一個單位一個個人吃虧為原則；（三）以公社級大發展和窮隊大發展為基礎，這是從不使富隊吃虧反而有好處這樣一個原則出發的具體措施；（四）先變鄉，後變區。三、五、七年之後，群眾要變的話，先变到縣。何時到區不能定，现在設想，大概要十年、十五年或者二十年之後，才有可能變。因此，不要怕。[26]

中央政治局將擴大會議討論形成的上海會議紀要《關於人民公社的十三個問題》，提交七中全會通過。在分組討論中，對所有制結構，意見與文件基本一致；但在分配問題上，主要是供給制和公共食堂問題上，則有不同——主張減少供給部分，加大按勞分配部分；不主張辦全年和全民的公共食堂。4月5日，七中全會原則通過了這「十三個問題」的會議紀要，後經修改，把原稿中的一些問題單獨列出，成為《關於人民公社的十八個問題》，4月20日，由中共中央辦公廳正式下達。

會議紀要接受了大家的意見，在寫明人民公社實行三級管理、三級核算，以生產隊作為基本核算單位的同時，把生產小隊的部分所有制單獨作為一個問題，指明「生產隊下面的生產小隊就是包產單位」，「作為包產單位的生產小隊也應當有部分的所有制和一定的管理權限」。對「舊賬」的清算和處理，具體定了八條原則。關於收益分配，規定在扣除各種提留和上交部分以後，直接分配給社員的部分，應佔總收入的50%左右到60%左右。但對公社具有「共產主義因素」的供給制和公共食堂仍舊作了肯定，強調：「人民公社實行供給制，符合於絕大多數農

民群眾的要求，得到了他們的擁護，因此必須堅持下去。」具體做法，可根據各自情況，分別實行「伙食供給制（包括油鹽蔬菜等）或者糧食供給制（不包括油鹽蔬菜等）」。少數生產水平低、收入少的公社，可「實行糧食半供給制」，即一部分口糧為供給制，另一部分口糧的代價在工资中扣除。這樣，公共食堂也就在必須堅持之列，只是規定食堂可以在口糧依人定量的基礎上，實行飯票制度，社員節餘的糧票，可以從食堂換出糧食或者現金，歸自己所有。[27]

關於1959年計劃指標的討論，由鄧小平主持。

對八屆六中全會訂的各項計劃指標，是否應作進一步調整，黨內的認識很不一致。不少人從维護「三面紅旗」出發，堅持原有指標。在上海會議上，西南的李井泉表示，如果其他省完不成糧食指標，四川可以再分擔一些，無非是多增產紅薯，允許一斤紅薯頂一斤糧（當時國家規定，四斤紅薯頂一斤糧）；華東的柯慶施則表示，如果別的省完不成鋼指標，上海可以再分擔些。這就使其他一些地方黨委領導人，明知指標難以完成，卻處在一種左右為難的尷尬境地。

為便於统一思想，毛澤東讓大家先閱讀薄一波將要在會上作的《關於第一季度工業計劃執行情況和第二季度安排的報告》。3月26日下午，薄一波在會上發言。當薄談到煉鋼設備未能按計劃完成時，毛澤東插話説：搞了十年工業，積累了十年經驗，還不曉得一套一套要抓。安排了九十八套（指大中型軋鋼機），2月底還報可完成三十一套，结果只搞了十六套，還有一部分配不齊全，這是甚麼人辦工業，是大少爺。現在工業要出「秦始皇」，我看你們搞工業的人不狠，老是講仁義道德，搞那麼多仁義道德，結果一事無成。搞那麼多幹甚麼（指基建項目）？削它五百項，如果不夠，再削，削六百項。周恩來插話：要有決心，頭上要沾點血。毛説：根本不要決心，幹掉就完了。周説：這句話就是決心。鄧小平插話：一千多個項目，一季度只有二十多個投入生產。毛接着説：何必那麼忙？急得要死，一定要搞一千多項，又搞不成。搞成我赞成，問題是你搞不成。從前講輕重缓急，現在講重重急急要排隊，算得一點經驗了，重中有重，急中有急。[28]

3月28日，李先念作關於財貿工作的情況和意見的報告。鄧小平隨後講了降低指標問題。他説：

> 現在提出一個計劃問題，计劃要放在切實可靠的基礎上，中央、地方都覺得有些問題，主要是肩膀上的擔子重得很，感到為難。講出來好，應該實事求是解決。總的情況就是原材料不足，又主要是鋼材不足。武昌會議是按鋼材1400萬噸（加100萬噸進口）來订的计劃，王鶴壽講，即使搞到2000萬噸鋼，鋼材不會超過1200萬噸，加進口95萬噸，不到1300萬噸。問題擺的很明白，即使是1500萬噸鋼材，也不可能完成，所以存在危險。大家一致赞成這樣一個辦法，把計劃定在確實可靠的基礎上，寧肯超

過，大家心情舒暢一點。想把我們的计劃放在一千一百萬噸鋼材的基礎上，包一千八百萬噸（鋼）。保重點，冶金部十八個企業，是一千二百萬噸，趙爾陸的企業是一百萬噸，呂正操的企業是四十萬噸。不下這樣一個決心，計劃有危險。」[29]

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都同意鄧的意見。4月4日下午，全會開大會。李富春發言，決定把原來2000萬噸鋼的計劃，調到1800萬噸（其中好鋼1650萬噸）；基本建設投资原來安排360億元，調到260至280億元；基建項目原安排1500個，現削減500個，剩下1000個。劉少奇說：1650萬噸，還有很多問題，如煤、礦、專用線、調運，需要很多措施。武昌會議定的2000萬噸是比較難達到的，要努力爭取1800萬噸。

4月7日，中共八屆七中全會發表公報。公布了全會決定的鋼、煤、糧、棉四大指標。公報稱，全會通過了1959年國民經濟計劃草案。這個草案是根據八屆六中全會提出的鋼產量1800萬噸、煤產量三億八千萬噸、糧食產量一萬零五百億斤、棉花產量一億擔這四大指標和今年第一季度生產和建設的情況而編制的。這個計劃草案的編制，對於我國物質技術條件的客觀可能性和人民群眾革命幹勁的主觀能動性，都作了認真的考慮。這是一個能夠實現國民經濟繼續大躍進的宏偉計劃。[30]

4.對1958年「大冒」的交代

毛澤東在1958年初批「反冒進」時就說過：「今年下半年，你們就看到要有一個大冒就是了，我看是比那一年冒還要厲害。」[31]1958年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確實是「大冒」了一下，於是從當年11月第一次鄭州會議以來，經武昌會議、八屆六中全會、第二次鄭州會議、上海會議直到八屆七中全會，無論是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單位，還是1959年的生產指標，不得不作節節後退。對這一年間的大起大落，人們思想上不可能沒有很多疑團，總路線究竟對不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是否搞糟了？在七中全會的最後一天，4月5日上午，毛澤東在全會上作的長篇發言，就是要對這一年的大躍進進行總結，並回答人們的疑問。

毛從9時到12時，整整用了一個上午，一口氣講了十六個問題：多謀善斷；留有餘地；波浪式的前進；依照形勢改變計劃；善於觀察形勢；當機立斷；與人通氣；解除封鎖；一個人有時勝過多數人，因為真理在他手裏，不在多數人手裏；凡是看不懂的文件，禁止拿出來；權利集中在政治局常委和書記處，我為正帥，鄧小平為副帥；找幾個通訊員，等等。就內容而言，可分以下幾個層面：

（1）1958年的問題，是工作方法問題，總路線是正確的。

（2）承認自己也「熱過一陣子」、「也有武斷」。

毛說：「北戴河會議時，指標定得太高。6、7、8、9月，我也熱過一陣子。」又說：「我也有武斷」，比如第二次鄭州會議說：「一般不算舊賬。」「還有公社若干問題決議，分級管理，社為基本核算單位。」

對此，毛解釋說：「但是八月在北戴河開會，沒有人提議在我那個地方召集個小會，討論一下1959年的指標。那時我的主要精力是搞金門打炮，人民公社的問題不是主要的，那是譚老（指譚震林——引者註）掛帥，我只寫了一段。」至於六中全會關於公社問題的決議，毛說：是「別人寫的意見，不是我的意見。我看了這個東西，我不懂，只是一個模模糊糊的印象；公社好。至於內部情況，我不懂。你們寫了，我覺得好」。

這就是說，第一，北戴河會議定的高指標，當時沒有人提出不同意見；第二，人民公社一事，是譚震林搞的；第三，六中全會的決議，我也是同意了別人的意見。再一個原因是，雖然有人提出了正確意見，但是意見沒有反映到我耳朵裏。他批評胡喬木說：

> 去年武昌會議的公報，陳雲同志提議四大指標是不是不寫，被喬木頂回去了，沒有反映，4月2日喬木才告诉我，認為大會通過了嘛！有兩個觀點不正確：第一，大家有時會犯錯誤，而一兩個人是正確的。列寧常佔少數，我也有時一個人孤立。第二，組織關係不正確，你喬木是個秘書，對於副主席的建議不反映。起草憲法時，總理建議增加文化一條，給杭州打電話，喬木也頂了回去，沒有報告。武昌會議是陳雲一個人正確，但未反映到我耳朵裏。1月上旬也是陳雲正確。

（3）計劃中的高指標，主要是計劃部門及其負責人「少謀武斷」、滿打滿算，不留餘地造成的。毛提出要「多謀善斷」。

（4）計劃可以根據形勢作升降，但反冒進是錯誤的。

對1958年到1959年計劃的再三變動，毛從理論上作了闡述，說「事物發展的規律」，總是「波浪式前進」。但這與1956年的反冒進不同，批反冒進是正確的。社會主義建設要懂得波浪式的前進。「天增歲月人增壽，春滿乾坤福滿門」。不能天天搞高潮，我不反對波浪式，但在群眾中公開反冒進是不對的，這是潑冷水、泄氣的辦法。我只是不同意反「冒進」，同意按照形勢改變計劃。我所反對的是公開在群眾中間，在報纸上反「冒進」。

（5）要善於觀察形勢，作出判斷，定下決心。

只有觀察形勢正確，才能當機立斷。有的同志上不摸底，下不摸底；有的工作也有斷，但斷的不恰當，有點武斷。要善於分析情況，抓緊時機，當機立斷，下定決心，這樣才能得出正確的方針政策。

毛再次批評不與他通氣，對他進行「封鎖」。說這次上海會議，3

月25日要開會，要解決甚麼問題，誰也不知道，中央委員、政治局主席也不知道，各省第一書記也不知道。為甚麼不先通氣？為甚麼不把題目和簡單意見通知人家？為甚麼只顧自己梳洗打扮？我說了一萬次了，大鬧了一頓是南寧會議。又說：平時不向中央反映情況，開會才拿一大堆材料來，平時不下毛毛雨，到時就下傾盆大雨。他就是不給你反映情況，不匯報，不請示，就是不讓你知道。開會前一天不知道，第二天聽訓。名曰主席、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實際是跑龍套而已。你們不解除封鎖，我是不高興的，我號召被封鎖者起來造反，反對傾盆大雨。

（6）權力要集中在常委和書記處，我為正帥，鄧為副帥。

在分析了問題都出在計劃部門，對他封鎖，搞傾盆大雨等等之後，毛強調權力要集中，他要掛帥。他說：權力集中在常委和書記處，我叫毛澤東，掛正帥，就是大元帥；鄧小平掛副元帥，為副總司令，我們倆人一正一副，你是總書記嘛！我向你們要求這個權力，要你們通過。中央常委七個人，書記處十二個人，十幾個人集中領導。但要掛帥，沒有元帥怎麼行？我姓毛，毛遂自薦，我要掛帥，六億六千萬人，一千三百萬黨員，不掛帥不行。

又說：一朝權在手，就把令來行。……要當秦始皇。

（7）不要怕鬼，要敢於「冒死上諫」。

毛澤東講要敢於向他反映意見，「要解放思想，不要怕鬼」。提倡要有「六不怕」的精神——殺頭、開除黨籍、撤職、留黨察看、記大過、老婆離婚。他說：明朝有廷杖制，頂了皇帝就打，廷杖打死者幾百人、千把人，至於推出午門斩首者更多。但是那些人敢講，冒死上諫。我們共產黨高级幹部很不勇敢，不肯尖銳。無非是怕穿小鞋，怕失掉職務，怕失掉選票。又說：我送了《明史·海瑞傳》給彭德懷同志看了。你看那海瑞那麼尖銳，他寫給皇帝的那封信，那時很不客氣，皇帝看了這封信丟到地下，然後又撿起來看一看，又丟到地下，然後又撿起來，想一想，覺得這個人還是好人，但是終歸把他捉到班房裏頭，恨透了，準備把他殺掉。……我們的同志哪有海瑞那樣的勇敢，海瑞比包文正不知要高明多少。

（8）以井岡山以來的歷史，說明真理有時在一個人手裏。

毛說：一個人有時勝過多數人，真理在他手裏，不在多數人手裏。並以馬克思、列寧為例。然後說他在歷史上被批判為「槍杆子主義」，認識論上是「狹隘經驗論」，政治上是一貫「右傾機會主義」、布哈林主義。這些打擊，激發他對抗這些。有時他只有一票，決不屈服。

然後，毛算起了歷史老賬。

他批評彭德懷說：我這個人是許多人恨的，特別是彭德懷同志，他是恨死了我的。因為我跟他鬧彆扭鬧得相當多。會理會議、延安會議，中央蘇區江口會議，我們倆個人鬥。我跟彭德懷同志的政策是這樣的：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接着，毛一個個點名說：

> 我們這些老同志沒有打過架的相當少，不打不相識。你打過來，我打過去。我跟恩來打過架沒有？跟彭德懷打過架沒有？跟朱德打過架沒有？跟你（指劉少奇）也打過架，就是合作化問題，對於洛甫的處置問題，翻你的案，也打過架。跟陳雲我們打過架。跟林彪也打過架，我們在閩西一路合作得很好，遵義會議以後我跟你們兩位（一個林、一個彭）都分裂了，搞了一個會理會議整你們。因為你們要把我們搞掉，要搞掉三個人，一個毛澤東，一個朱德，一個周恩來，你們要來組織司令部，你們沒有紀律，你們是錯誤的，那得整……蕭勁光我跟你打過仗沒有？那個仗恐怕是我錯的多，你正確的多。但是那個時候你也有錯誤，你一點錯誤沒有？
>
> 劉伯承同志我們兩個不是鬥得厲害？我還寫了書，戰略問題，那就是批評你的，你也沒有答覆。後來你在軍事學院大概是想答覆一下，沒有尖銳地提出那些問題來批評，因為我那篇《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是不能駁的，是駁不了的。那裏頭批評了劉伯承，批評了任弼時，沒有指名字。任弼時封我一個「狹隘經驗論」：劉伯承封我一個「怕打爛罈罈罐罐」，軍事上不行。還有已經死了的凱豐同志，那時他是博古派……。至於跟粟裕同志，蕭克同志，還有陳伯鈞，還有郭化若同志，我們幾個人是歷來鬥的，他們是我的反對派。但是你們是反對派，你們的官還可以做，我不報復。去年報復一次，不是我的報復。去年報復是開軍委擴大會議，四五百人，是你們犯了錯誤，把你們這一批評，我就開心了。

毛在歷數了眾人之後說，我得罪了你們，全體不投票，一個也沒有，包括劉少奇、周恩來、陳雲，林彪、董必武、朱總司令，你們都不投我的票那也好，我無非是拉倒。如果你們不投我的票，那就拉倒。

對毛澤東道篇講話，史家有不同的評論。

逄先知、金沖及主編的《毛澤東傳》認為，毛講的這十幾個問題，「都是有針對性的，從不同的側面，初步總結了「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以來的一些教訓」。[32]

李銳認為：毛「如此疾言厲色，說古道今，沖天怨氣，無窮感慨，來回顧「大躍進」一年多來出現的情況和問題，是誰也沒有精神準備的」。「關於鋼鐵等高指標問題，到上海會議時大家都有了一定的覺醒，毛澤東也感到要下樓來，他的這篇講話可說是一張樓梯」。李銳談到他與田家英、胡喬木當時的共同感受時說：「毛提起海瑞的說法不止這一次，實際上還是要求不要出海瑞。」「我們共同感到，這一年多來，亂子鬧得太多太集中，毛也感到自己有責任，卻又不願意直接痛快承當起來（他有一種不能下「罪己詔」的情結）。因此，通篇講話很是

情緒化，談到歷史教訓，反覆舉了那麼多人那麼多的例子，都曾經反對過他的……。以此證明，他是一貫正確的，反對過他的人都是不正確的。於是強調掛帥、主帥副帥的問題。證之三個月後的廬山會議，上海會議這一長篇講話简直是可怕的伏筆。」[33]

儘管看問題的角度各有不同，但也有一個共同點，即都認為是毛澤東對1958年的總結和交待。

[1] 中共湖北省委：〈關於貫徹鄭州會議精神的情況给中央的报告〉(1959年3月7日），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八冊，頁94-95。

[2] 毛澤東：〈關於傳達湖北省委貫徹鄭州會議精神的情況報告的兩個批語》（1959年3月8日），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八冊，頁93。

[3] 〈中共河南省委關於人民公社管理體制和若干政策的規定（草案）》（1959年3月6日），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八冊，頁97。

[4] 毛澤東：《黨內通信》（1959年3月9日），載《建國以來毛澤东文稿》，第八冊，頁99-100。

[5] 毛澤東：〈介绍安徽的經驗〉(1959年3月9日），载《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八冊，頁102。

[6] 「三定」：一定基本核算單位，一律以原來的高级社為基礎；二定領導人员，迅速搭起組織与管理生產機構的架子；三定1959年生產計劃和糧、油、豬等商品包幹任務，生產隊（或大隊）完成任務后的其餘部分即歸隊自行支配。「五放」：一、下放勞動力，使生產隊（或大隊）的勞動力固定下來；二、下放生產資料歸生產隊（或大隊）所有；三，下放畜牧業歸生產隊（或大隊）所有和經營管理。果樹及魚塘等亦可同樣下放；四、下放原有的肥料廠；五、下放糧食，食堂糧食消費由各隊自行安排。《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八冊，頁108-109。

[7] 毛澤東：〈轉發廣東省委關於貫徹鄭州會議精神的報告的批語〉（1959年3月13日），载《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八冊，頁108。

[8] 〈中共湖北省委關于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草案）〉(1959年3月8日），载《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八冊，頁118-119。

[9] 〈中共广東省委關于貫徹郑州會議精神的报告〉（1959年3月11日），载《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八冊，頁108。

[10] 毛澤東：〈黨內通信〉(1959年3月15日），载《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八冊，頁110。

[11] 〈中共山東省委關於貫徹鄭州會議指示精神給中央的報告〉(1959年3月10日），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八冊，頁114。

[12] 毛澤東：〈黨內通信〉(1959年3月15日），载《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八冊，頁111-112。

[13] 毛澤東：〈黨內通信〉（1959年3月17日），载《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八冊，頁123、124。

[14] 中共河南省委轉發的洛陽地委1959年3月18日21时給各市委、縣委並報中央、毛澤东的报告，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八冊，頁137。

[15] 〈迎接新的更偉大的勝利〉，《人民日報》社論，1959年1月1日；《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十二冊，頁6。

[16] 〈當前全國鋼鐵生產為甚麼沒有完成計劃？〉，《內部參考》，1959年2月21日。

[17] 〈一季度基本建設計劃完成得不好〉，《內部參考》，1959年4月7日。

[18] 六個小組的負責人是：東北組組長：國家經委副主任王新三、水電部副部長李銳，以遼寧（瀋陽）、黑龍江（哈爾濱）為重點；華東組組長：國家經委副主任谷牧、副組長：一機部副部長汪道涵，以上海為重點；華北組組長：冶金部副部長高揚，以太原、包頭（包鋼）為重點；中南組組長：國家經委副主任葉林，以武漢為重點；西南組組長：一機部副部長黎玉，以貴州（貴陽）為重點；西北組組長：國家建委副主任楊作材，以蘭州為重點。各協作區辦公廳主任為各組副組長。

[19] 李銳：《「大躍進」親歷記》，下冊，頁410-411。

[20] 〈廣東研究和解決日用工業品供應緊張問題〉，《內部參考》，1959年5月4日。

[21] 李銳：《「大躍進」親歷記》，下冊，頁445。

[22] 中共山西省委第一書記陶魯笳關於山西各縣五級幹部大會情況給毛澤東的報告（1959年3月29日），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八冊，頁175。

[23] 毛澤東：〈關於人民公社化運動中的舊賬一般要算等問題的批註〉（1939年3月30日），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八冊，頁172-173。

[24]　毛澤東：〈介紹麻城的經驗〉（1959年4月3日），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八冊，頁187。

[25]　1959年3月28日山東省委書記譚啟龍給第一書記舒同和譚震林的信，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八冊，頁180-181。

[26]　毛澤東：〈關於改變集體所有制體制的幾條原則〉（1959年3月31日），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八冊，頁180。3月23日，毛澤東在中共安徽省桐城縣委的報告上，作有〈關於社會主義集體所有制過渡問題的批註〉：至少在二十年內，不是由社會主義到共產主義過渡的問題，不可能這樣快。在大約五年至十年內，也還不是在整個國家內就能完成由集體所有制到全民所有制的過渡問題。而是只看情況，逐步地完成由基本的小集體所有制首先過渡到以一個鄉為範圍的大集體所有制。然後經過若干年的發展，情況表示確有可能又有必要的時候，才可再考慮實行過渡到以一個區為範圍的更大的集體所有制，過渡的時候，一定要使每一個小集體都不吃虧，而且都感到比較不過渡對於每一個小集體每一個個人都更為有利些，要是出於各個小集體和大多数社員的要求，否則談不到這種過渡，不管過渡到鄉或區的大集體。目前生產隊這種小集體總還是一級核算單位。《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八冊，頁148。

[27]　〈關於人民公社的十八個問題（中共中央政治局一九五九年四月上海會議紀要）〉，載《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十二冊，頁162-181。

[28]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頁83；李銳：《「大躍進」親歷記》，下冊，頁443。

[29]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頁830-831。

[30]　《中國共產黨八屆七中全會公報》（1959年4月7日），載《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十二冊，頁183。

[31] 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記錄（1958年2月18日）。

[32] 《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頁939。

[33] 李銳：《「大躍進」親歷記》，下冊，頁471、472、473-474。

四、二屆全國人大和鋼鐵指標再調整

1.全國人大二屆一次會議

中共八屆七中全會討論和通過的幾項重要決定，為全國人大二屆一次會議的召開作了準備。4月18日至28日，全國人大二屆一次會議在北京舉行。與會的全國人大代表1148人。毛澤東主持會議開幕。周恩來總理向大會作政府工作報告；國務院副總理兼國家計委主任李富春作1959年國民經濟計劃草案的報告；國務院副總理兼財政部長李先念作關於1958年國家決算和1959年國家預算草案的報告；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彭真作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大常委會的工作報告。與會代表本着「在各個戰線努力實現新的大躍進」的精神，討論通過了各項報告和中共八屆七中全會通過提交大會的1959年的國民經濟計劃草案。[1]大會認為：1959年國民經濟計劃是一個繼續大躍進的計劃，實現這一計劃不僅是必要的，經過全國人民的努力奮鬥，也是可能的。代表們強烈譴責原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層反動集團所發動的背叛祖國、破壞統一的武裝叛亂。通過了「關於西藏問題的決議」「關於撤销司法部、監察部的決議」。出席大會的全體代表，以無記名投票的方式，選舉出了新一屆的國家機構領導人員：

劉少奇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宋慶齡、董必武為副主席。

朱德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長，林伯渠、李濟深、羅榮桓、沈鈞儒、郭沫若、黃炎培、彭真、李維漢、陳叔通、達賴喇嘛、丹增嘉措、賽福鼎·艾則孜、程潛、班禅額爾德尼·卻吉堅贊、何香凝、劉伯承、林楓為副委員長。

謝覺哉為最高人民法院院長。

張鼎承為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

根據國家主席劉少奇的提名，大會決定周恩來為國務院總理。

根據周恩來的提議，大會決定陳雲、林彪、彭德懷、鄧小平、鄧子恢、賀龍、陳毅、烏蘭夫、李富春、李先念、聶榮臻、薄一波、譚震林、陸定一、羅瑞卿、習仲勳為國務院副總理。

根據劉少奇的提名，任命彭德懷、林彪、劉伯承、賀龍、陳毅、鄧小平、羅榮桓、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程潛、張治中、傅作義、衛立煌為國防委員會副主席。

大會號召，全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主席所提出的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的指導下，更加緊密地團結起來，繼續在社會主義建設的各個戰線上努力實現新的大躍進，

開展全民的增產節約運動，爭取用新的輝煌成就迎接偉大的國慶十周年，為完成和超額完成1959年國民經濟計劃而奮鬥！

關於毛澤東不再擔任國家主席，選舉劉少奇為國家主席一事，是經過很長時間醞釀，多方面做了工作，才定下來的。

1956年里，在北戴河討論修改中共八大政治報告稿期間，毛澤東在一次幾十人參加的會議上談過這個意見。後來毛說：「此事（指不再當下屆國家主席——引者註），去年在北戴河已在幾十人的會上談過，大家認為可行。並且談到黨的主席，也認為將來適當時機可行，只是暫時還不可行。」[2]

1957年4月30日，毛澤東在有黨和國家領導人、各民主黨派負責人、無黨派民主人士參加的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二次（擴大）會議上講話中說：「明年二屆人大，一定辭去國家主席，減少一部分工作，以便集中精力研究一些問題。瑞士有七人委負會，總統是輪流當的。我們幾年輪一次總可以，採取逐步脱身政策。不赞成也沒辦法，不能強加於人。如赞成，要透點消息出去，否則老百姓不了解。」[3]

第二天，陳叔通、黃炎培聯名寫信給劉少奇和周恩來，表示不同意毛澤東辭去國家主席一職。毛於5月5日在批示中，除對陳、黃所述理由作了解釋外，對他們提出在憲法中增加一句「連選不得過兩任」的意見，明確表示贊同，他批道：「可以考慮修改憲法，主席，副主席連選時可以再任一期，即在今年人代大會修改憲法，請鄧小平同志準備。」

毛在批語中還說：「現在黨內高級領導同志對此事想通了的多起來了，而黨外人士因為交換意見太少，想不通的還多，因此，有提出來從容交換意見的必要。」他請劉少奇召集一次有一百人左右參加的政治局會議，展開討論一次，取得同意。

經過多方面的工作，1958年12月，中共八屆六中全會通過《同意毛澤東同志提出的關於他不作下屆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候選人的建議的決定》。《決定》指出：

> 毛澤東同志不擔任國家主席的職務，專做黨中央的主席，可以使他更能夠集中精力來處理黨和國家的方針、政策、路線的問題，也有可能使他騰出較多的時間，從事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工作，而並不妨礙他對於國家工作繼續發揮領導作用。……毛澤東同志是全國各族人民衷心愛戴的久經考驗的領袖，在他不再擔任國家主席的職務以後，他仍然是全國各族人民的領袖。在將來，如果出現某種特殊情況需要他再擔任這種工作的時候，仍然可以根據人民的意見和黨的決定，再提他擔任國家主席的職務。[4]

中共黨史專家龔育之認為，這個關於毛澤東不再擔任下屆國家主席的決定，同1956年中共八大通過的黨章規定「中央委員會認為有必要的時候，可以設立中央委員會名譽主席一人」一樣，具有廢除最高領導職

務終身制的意義。龔說：「黨的八大前後毛澤東關於及時實行黨和國家最高領導層的新老交替和平穩過渡，是有很深遠的戰略考慮的，他那時的設想是我們黨的一份珍貴的政治文明的遺產。」「當然，後來的實際情況是毛澤東這些好的設想沒有很好實現。」[5]

就在八屆六中全會同意毛澤東不再作下屆國家主席候選人的同時，中共黨內對由何人作國家主席候選人也開始醞釀，時任國家副主席的朱德，無疑是考慮的人選之一。1958年12月29日，朱德給總書記鄧小平寫信提議劉少奇為候選人。朱在信中說：

> 我提議以劉少奇同志作為國家主席候選人更為適當。他的威望、能力、忠誠於人民革命事業，為黨內黨外、國內國外的革命人民所敬仰，一致贊同的。因此，名單中，委員長一席，可再考慮，以便整體的安排。至於我的工作歷來聽黨安排，派甚麼做甚麼，祈無顧慮。

中共中央接受了朱德的建議。在1959年4月召開的八屆七中全會上，一致通過以劉少奇作為中共中央向全國人大二屆一次會議提議的國家主席候選人。4月5日，鄧小平向全會所作的《兩個問題的說明（要點）——關於經濟工作和國家機構的人事配備》中說：

> 國家主席有好幾位同志可做，如朱德同志，如黨內幾位老同志，都可以做，但是大家考慮的结果，以少奇同志擔任這個職務，比較更為適當些。國家主席不單是一個很高的榮譽職務，而是有一些相當具體麻煩的事要做，例如出國、會談、接待等等。所以，以少奇同志的能力和资望，以他现在在黨內所負的责任，出而兼任國家主席職務，是比較好的。

4月15日，毛澤東主持召開最高國務會議第十六次會議，就國家機構領導人候選人的提名方案，徵求各界人士的意見。毛對國家主席候選人向大家作解釋說：

> 為甚麼國家主席候選人是劉少奇同志，而不是朱德同志？朱德同志是很有威望的，劉少奇同志也是很有威望的。為甚麼是這個，不是那個？因為我們共產黨主持工作，我算一個，但是我是不管日常事務的。有時候管一點，有時候不管。經常管的是誰呢？是少奇同志。我一離開北京，都是他代理我的工作。這已經是多年了。在延安開始就是如此，现在到北京已經又十年了。在延安，比如我到重慶去，代理我的工作就是少奇同志。以他擔任主席比較適合。同時，朱德同志極力推薦少奇同志。我說，你們對調一下，把少奇同志過去的工作（委員長）請你做，他很高興。在上海會議，在七中全會，就決定這樣做。宋副委員長改任國家副主席，還有董必武同志擔任副主席，一正兩副。

全國人大二屆一次會議閉幕後，4月30日，劉少奇等新當選的國家領導人在北京會見各國駐華使節。中國新一屆國家領導人的產生，在國

內外引起熱烈反響：

北京高校師生認為：「少奇同志是在長期革命鬥爭中鍛煉出來的，是我們革命的傑出領導人之一，我們非常熱愛他。」「董必武同志是黨內的元老，德高望重，作副主席也很合適。周總理是個全才，工作作的很出色，繼續擔任總理很好。」「宋慶齡在國際上有較高的威望，對民主革命有較大的貢獻，一直靠近黨，當選副主席也很合適。」[6]

廣州市的泰國歸僑認為：「宋慶齡在海外僑胞中有很大的影響，她當副主席對爭取臺灣愛國人士和加強統戰工作，都有很大的作用」；印尼歸僑認為：「印尼總統蘇加諾是孫中山的崇拜者，她當選副主席，對團結民族主義國家有作用。」廣州市高校師生認為：宋慶齡當選副主席，「可以進一步加強國家團結」；「可以更好地做國外的統戰工作」；「有利於和平解放臺灣」。[7]

美聯社報道說：共產黨中國新任主席劉少奇是一個「經常被稱為是中國共產黨的理論家」。「從本質上來說，他是一個有實際工作經驗的人，是一個傑出的組織者。」[8]美國官員們認為：「劉現在在政治局副主席和國防委員會副主席這兩個權力很大的職位之外又擔任了主席，這使他有了很有利的條件繼承毛的地位。」[9]英國的中國問題專家認為：「劉是中國政權的『二號人物』。」「提升他的目的，是要使他更好地為中國群眾所了解，因為中國人到目前為止只知道毛是政權和國家唯一的——幾乎是神聖的——象徵。」[10]

當然，西方世界也有另一種說法，如美國新聞處以「帷幕的背後」為題發表評論說：

> 劉的新職務——接替毛出任中國共產黨政府「主席」或總統——使他比他的主要競爭者周恩來總理高過了一頭。但是，儘管劉有這個冠冕堂皇的頭銜，他像周一樣，仍然不過是毛的主要助手之一，因為，毛無疑依舊是共產黨中國的第一號人物。而且在他放棄他作為共產黨首腦的權力和威望以前，他將繼續佔據這個地位。
>
> 接替他的領導權的人才是當毛最終辭職或者讓位的時候統治共產黨中國的人。目前，劉看來將是最可能的候選人。北平電臺正式把他看成是一位「僅次於毛澤東的領袖」。但是在共產黨特權集團中，得寵的人變換不定，今天的第二號人物，到明天很可能成為代人受過的人。[11]

無論是正面還是負面的反應，都說明中國這個東方大國，在國際上已不可再被忽視。

全國政協三屆一次會議與全國人大二屆一次會議同時舉行。會議選舉毛澤東為全國政協名譽主席，周恩來為主席；彭真、李濟深、郭沫若、沈鈞儒、黃炎培、李維漢、李四光、陳叔通、陳嘉庚、包爾漢、陳

毅、康生、帕巴拉·格列朗傑、阿沛·阿旺晉美為副主席；徐冰為秘書長，王從吾等一百四十三人為常務委員。

2.關於農村政策的〈黨內通信〉

中共八屆七中全會以後，各地為落實《關於人民公社的十八個問題》的各項政策，分別召開公社代表大會。通過算清經濟賬和作風賬，調動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以確保夏季豐收。

但是，退錢、退物是個困難的過程，阻力主要來自公社一級，因為「共產風」主要是實行公社所有制，「共」了各生產隊的「產」。許多公社黨委書記，雖然在口頭上承認「一平二調三收款」是錯誤的，但要退款則沒有現錢。真實情況是，有的公社確實把錢花光了，但大部分是捨不得把錢拿出來。退物也是一樣，把好的留下，壞的退給生產隊。

在中央和省的一再督促下，退賠工作才有了進展。湖北省麻城縣召開萬人退賠大會，縣、公社當場宣布，拿出現金320萬元，以及大量農具、牲畜、家畜等，分別退還給生產隊。

在算賬退賠過程中，暴露出大量的公社、生產隊、甚至生產小隊幹部多吃多佔、貪污的問題。如：麻城縣宋埠公社一百一十六個生產隊幹部貪污挪用66116元，平均每人570元；白果城關公社五百四十九個幹部，共貪污87451元，人均159元；三合公社一個生產隊的會計貪污816元。又如：河南省一百二十萬農村基層幹部在算賬退賠中，批評改正的有四十多萬人，開除、處罰了三千六百人，受刑事處分的七百二十人。

河北省霸縣後奕、堂二裏兩公社召開黨代表大會，代表們對幹部的強迫命令作風和貪污行為進行了揭發。許多老年代表說：「1958年少收了糧食，主要是幹部的主觀主義鬧的。」農業生產這門活計，複雜得很，土地千差萬別，但在去年的生產領導中，包括今年的春耕春種在內，不管你這地怎麼樣，都得按照一套法碼辦事。去年非要我們把已經種上的豆子，穀子拔了種山芋，你不照著辦還不行。後奕公社羅家營代表揭發黨支部書記，用以多報少，隱瞞產量等辦法，先後六次貪污一千五百多元。生產隊長羅增為了報假條貪污，一人刻了四個假戳，貪污的錢隨意揮霍浪費，並賄請到該村工作的幹部。代表們說：「群眾想念黨，知道這些人是兔子尾巴——長不了，要不，群眾早反了。」[12]

通過算賬對公社進行整頓，黨群關係，幹群關係得到了明顯的改善。5月3日，中共湖北省委向中央的報告說：

> 麻城縣萬人大會以後，以生產隊為單位，放手發動群眾，邊算賬，邊兌現，全面地徹底地貫徹政策，進一步整頓、鞏固人民公社。算賬兌現後，廣大幹部群眾在思想上起了很大變化，整個農村形勢根本好轉。政策兌現後，幹部轉變作風也開始兌現……

出現了一個紮紮實實的生產新高潮。[13]

就在這時，各地春荒缺糧的情況紛紛反映到中央。

4月6日，國務院秘書廳就山東、江蘇、河南、河北、安徽五省缺糧情況及處理辦法給國務院秘書長習仲勳並總理、副總理做了報告。

4月7日，山東省民政廳副廳長武思平，向內務部部長辦公會議匯報了該省當前春荒情況和制止春荒發展的措施說：今年山東春荒很嚴重，波及八個專區的四十二個縣（市），1400萬人。濟寧專區最重，十七個縣（市）1053萬人中，就有十六個縣（市）787萬人發生春荒；聊城專區十五個縣（市）中，有九個縣（市）545萬人發生春荒。截至3月底統計，全省共外流、逃荒的農民六十八萬人（實際超過此數），僅濟寧專區就達三十二萬人。濟寧專區有七個縣患浮腫病的達十二萬九千多人，金鄉縣因浮腫病已死亡111人。濟寧專區的三萬七千多處食堂，因缺糧、缺柴停伙最多時達一萬六千多處。濟寧專區十個縣，從1959年1月以來，共發生非正常死亡四百三十三起。該區的鄆城、金鄉、巨野等縣均發生搶糧事件；鄆城縣自春節以來，發生搶糧九十六起，被搶糧食十一萬八千多斤，其中國庫糧九萬多斤。牲畜大批死亡，金鄉縣五萬頭牲口，1958年秋至今已死二萬五千頭；單縣死了八萬頭，佔全縣總數的30%以上。現省的黨政領導已深入農村，積極採取措施，安排群眾生活。[14]

4月9日，中央救災委員會辦公室又上報了十五省春荒情況統計表。

內務部《救災工作簡報》稱：廣東省春荒已涉及湛江、江門、汕頭、韶關、佛山等五個專區和海南行政區的二十五個縣。據統計，在夏收前每人每月安排糧食不足十五斤的有639萬多人，佔全省農業人口的19%。從3月到4月底累計，全省患腫病的有58421人，其中湛江專區為34859人；吃木薯中毒死亡的八十二人；與糧食有關而死的409人（其中自殺的38人）；無糧食吃而上山挖野生植物的有16700人；逃荒的有10377人（其中逃往港澳的有1220人）；發生搶糧事件二十起，參加人數1260人；因糧食問題而請願、鬧事、罷工、械鬥的有二十一起，參加人數4030人。在省級機關採取一些措施後，大部地區春荒情況已有緩和，但個別地區還相當嚴重，且有發展趨勢。如江門專區4月底統計患浮腫病的有8852人，到5月8日發展到一萬一千多人；韶關專區的英德縣現在患腫病的有一萬多人，比4月底增加了十倍。廣西壯族自治區，也有少數地區出現嚴重情況：玉林專區的博白、玉林、貴縣有水腫病人8108人，已死亡六人。博白縣鴉山公社桂花大隊4月15日前患腫病的有三十四人，4月29日增加到140人。百色專區田林縣舊州公社平林大隊，因吃代食品過多，引起非正常死亡，從元月到4月13日已有三十六人。南寧專區的個別公社，也發生了搶糧、鬥毆事件。[15]

毛澤東在看了國務院秘書廳的報告、中央救災委員會的統計表以

後，於4月17日將文件批給周恩來總理。建議將這兩個文件「立刻印三十份，以十五份，在三日內，用飛機送到十五省委第一書記手收，請他們迅即處理，以救2517萬人的暫時（兩個月）緊急危機」。並囑咐周說：「由你找人大代表中十五省在京開會的代表談一次（著重五省），每人分發文件一份。」毛還為這兩個文件加了一個使人警醒的題目：〈十五省二千五百一十七萬人無飯吃大問題〉。[16]4月26日，毛澤東在內務部的一個報告上批示，要求省市自治區黨委，「務必要採取措施，妥善安排，渡過春荒，安全地接上麥收和早稻，多種瓜菜，注意有吃而又省吃，閒時少吃，忙時多吃。千萬不可大意」。[17]

鑑於糧食問題的嚴重，為在整社的同時，安排好農業生產和農民生活，毛澤東在4月29日直接給省、地、縣、公社、生產隊和小隊幹部寫了一封〈黨內通信〉，談了包產、密植、節約糧食、播種面積、機械化、講真話六個問題。批評了1958年的浮誇風，「吹牛而已」。強調今年「包產一定要落實。根本不要管上級規定的那一套指標」。「只管現實可能性」。密植，不是「愈密愈好」，要適度。「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無用，而且害人不淺。」故而，「得由生產隊、生產小隊商量決定」。針對1958年提出「放開肚皮吃飯」的錯誤口號，強調節約糧食「要十分抓緊」。提出了「按人定量，忙時多吃，閒時少吃」的要求。並告誡說：「在十年內，一切大話、高調，切不可講，講就是十分危險的。須知我國是一個有六億五千萬人口的大國，吃飯是第一件大事。」改變了原來土地實行輪休的設想，指出，「少種、高產、多收的計劃，是一個遠景計劃……，但在十年內不能全部實行，也不能大部實行……。三年以內，要力爭多種」。總結1958年出現的浮誇風說：「應當說，有許多假話是上面壓出來的。上面『一吹二壓三許願』，使下面很難辦。因此，幹勁一定要有，假話一定不可講。」信的最後說：「同現在流行的一些高調比較起來，我在这裏唱的是低調，意在真正調動積極性，達到增產的目的。」[18]

毛澤東這六點指示傳達下去以後，基層幹部反映非常強烈，認為：六個問題非常紮實，非常切合群眾要求，今後的工作更好做了。廣東省揭陽縣安樂公社安樂大隊的總支書記，聽了傳達之後，興奮得拍著大腿說：「今後就敢說老實話了。不然，說話總是要咬着自己的舌頭。」榕城公社社長陳長耀說：「過去有許多事情明知不好，就是不敢講出來。」澄海公社黨委書記林朝廷說：「去年他到外地參觀以後，覺得產量只有五六百斤，多的也不過七百斤，但是報紙卻報得很高；又說，要吃三餐乾飯，自己覺得不好，又不敢說，只好用『一個黨員的黨內反映的名義』，寫信給陶鑄同志，提出了產量浮誇和不能吃三餐乾飯的問題。幾個月來，他一直不敢說出這件事，直到這次聽了傳達才敢說。」浙江省桐廬縣新登公社青何生產隊的隊長卞竺生，原是省一屆人大代

表，1958年因反對縣委提出的「放開肚皮吃飯，不計定量」的口號；反對縣裏和鄉裏提出辦人多的大食堂；反對過分密植；抵制縣、鄉叫普遍移秧併田等錯誤做法，被批為「右傾保守」。卞在聽了傳達後，以一個「普通農民」的名義給毛澤東寫信說：「我是一個普通農民，自學習了您給五級幹部關於農業方面的六個問題的指示以後，心裏感到非常愉快。無論幹活和做工作，都覺得一點也不吃力了。」[19]

為使毛澤東的六點意見迅速落到實處，中共中央於5月7日發出《關於農業生產的五條緊急指示》。[20]同日，中共中央又就分配私人自留地問題發出指示：自留地的多少，應當按照原高級合作社章程的規定，按人口計算，不超過每人平均佔有土地的5%。也可以按豬計算，每頭豬撥給一分或者二分飼料地，由各省、市、自治區黨委根據當地的具體情況，自行決定。並提出：「此事要快，請你們早作決定，下達執行。[21]6月11日，中共中央對社員私養家禽、家畜和自留地等四個問題再次發出指示要求將中央的規定，「用布告的形式向群眾公布，並且認真實行，取信於民」。同時指出：

> 這種大集體當中的小私有，在一個長時期內是必要的，有利於生產的發展，也有利於人民生活的安排，允許這種小私有，實際是保護社員在集體勞動時間以外的勞動果實，並不是甚麼「發展資本主義」。……經驗證明，禁止搞這些家庭副業，一切歸公的簡單辦法，是有害的，也是行不通的。[22]

繼所有制確定以生產隊為基礎以後，又規定分給農民自留地，允許私養家禽、家畜，這就在保持人民公社的架構下，相當程度地恢復了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的政策。

從5月下旬開始，從南到北將漸次進入夏收夏種的農忙季節。為使整社工作不影響農業生產，中共中央在5月25日指示各省、市、自治區黨委：「從現在起，集中全力搞好農業生產」。還沒有召開代表大會進行算賬的公社，可以等到秋收後或其他農事間隙時間，再來清理1958年的賬目，開代表大會改選幹部。並向農民解釋清楚，「賬一定要算清，只是暫時停一下，以免影響當前生產」。[23]

3.陳雲受命落實鋼鐵指標

中共八屆七中全會以後，李富春和薄一波按毛澤東在會上的批評，於4月15日，就鋼鐵生產問題向毛澤東報告並作自我批評說：

> 主席在七中全會上對我們的指示和批評，我們還在進一步思索和檢查。我們的心情是沉重中包含着愉快。沉重者是工作沒有做好，愉快者是思想比較開動了。這半年來，特別是武昌會議以後，我們的腦子有些僵了，總往好的一面想，在許多問題上摸得

不深，材料掌握不確，抓得不狠，少謀無斷，以致在計劃工作中犯了主觀片面的錯誤。[24]

隨後，國家計委副主任賈拓夫組織人員，與國家統計局一道，核實1958年的銅、煤、糧、棉四大指標的實際完成情況。結果發現：鋼產量中，好鋼只有800萬噸；鐵產量為1369萬噸，其中有一部分還是小高爐煉出的土鐵。煤產量為3.7億噸，也包括一部分小煤窖的產量。糧食產量，因農民上山煉鋼鐵，影響收割，實際收成也沒有達到4000億斤。棉花產量為3938萬擔，也是豐產不豐收。根據這個情況，賈拓夫向計委黨組提交的報告指出，嚴重的比例失調問題主要是鋼的指標訂得過高，產生了一系列的矛盾；1959年鋼產量計劃是完不成的，大體可以按1200至1250萬噸比較切合實際。

陳雲看到這份報告以後，十分重視。同一時間，周恩來找國家計委計劃局局長廖季立談1958年鋼產量核實情況，廖如實提出上海會議鋼產量指標難以完成，周恩來深感不安。毛澤東聽到有關方面的反映後，也對1959年的指標放心不下。

上海會議擬定的1959年第二季度鋼材分配方案是250萬噸，由於生產上不去，只有205萬噸可供分配，缺口近五十萬噸。原定的第二季度的工業生產計劃和基本建設計劃，也將因此延緩。由於計劃的不確定性，導致企業單位生產秩序混亂，人們反映說，這個時期的生產是「長江後浪壓前浪，做做停停做做停」。

由於工業生產全力保鋼，日用工業品和副食品供應的緊張情況也已突顯。遼寧、山東、山西、內蒙、吉林、廣州等省區的商業廳局反映，5月份出現了搶購針棉織品的現象。5月下旬全國手工業合作總社召開的省市自治區聯社主任會議反映，各地日用小產品（包括一些名牌產品）和工藝美術品停產、減產的情況相當嚴重，市場供應十分緊張。上海市的副食品供應不足的情況，1958年下半年就已出現，1959年春節以後，更趨緊張。從1月到4月副食品供應量與1958年同期相比，豬減少35.929%，牛減少44.4%，家禽減少75.19%，鮮蛋減少79.56%，水產減少1.89%。目前，市民每月供應六兩豬肉的標準也難以維持。食用植物油的供應，更是四處告急（出口、城鎮、農村、工業用油），國家無法面面照顧，大有顧此失彼之勢。[25]

針對上述情況，中央書記處在4月29日和30日連續開會，討論經濟形勢尤其是鋼鐵指標問題。會議決定，責成陳雲領導的中央財經小組，摸清楚實際情況，對生產做出切實可行的安排。總的精神是：穩定陣地再前進。

從1958年提出工業「以鋼為綱」的口號以後，鋼鐵指標就成了一個政治問題，要實事求是地把鋼鐵高指標壓下來，很可能有被扣上「促退派」、「秋後算賬派」的帽子。陳雲接受任務以後，沒有顧及這些。從

5月3日到9日，連續主持中央財經小組會議，聽取冶金部的匯報。陳雲一開場就明確表態說：「因為我是共產黨員，我不能耍滑頭。要不然我也可以不再理這個指標調整問題。請大家來談談1959年計劃究竟怎麼處理好。」他提出：「是否請考慮以下四個問題：第一，是多一點，還是少一點？我看要穩住陣腳再前進。第二，質量、品種同數量的關係。要重視質量、品種，寧肯少些，但要好些。第三，重點和一般的關係。第四，今年和明年的關係，今年少些可能好些，明年可以上去多些、好些。」除冶金部外，又同國家計委的有關負責人進行座談，聽取他們的意見。經常參加會議的有李富春、薄一波、趙爾陸和國家計委、建委的有關負責人。關於鋼鐵生產指標：冶金部提出1959年鋼材生產指標的三個數字：900萬噸，950萬噸，1000萬噸。與之相應的鋼生產指標是：1300萬噸，1400萬噸，1500萬噸。

國家計委重工業計劃局提出的數字是：鋼材可靠指標850萬噸到900萬噸，爭取950萬噸；與之相應，鋼的可靠指標1250萬噸到1300萬噸，爭取1400萬噸。

負責年度計劃的國家經委冶金局提出，鋼的可靠指標1300萬噸，爭取1500萬噸。

總之，基本估計都比上海會議定的鋼材1150萬噸，鋼1650萬噸的指標要低。經反覆研究，陳雲、李富春、薄一波、趙爾陸，都同意鋼材的可靠指標初步定為900萬噸，鋼產量定為1300萬噸。當時冶金部參加會議的人仍不願把指標壓得太低，說指標低了就會泄氣。會議最後決定，按1300萬噸鋼的方案報中央政治局研究決定，並責成賈拓夫負責以計委名義向政治局寫出報告。賈拓夫從六個方面闡述了當時經濟形勢面臨的嚴峻局面，以此說明指標下調的依據。李富春看後，認為不妥。不能把困難形勢寫得太刺眼，讓人感覺「漆黑一團」，要考慮到當時的政治氣候，因此囑人另寫了一份報告，第二天直送政治局。

5月11日，中央政治局開會聽取陳雲落實鋼鐵指標的意見，討論國家計委的報告。陳雲認為，鋼材的可靠指標可以初步定為900萬噸，鋼的生產指標是1300萬噸。理由是：第一，從鋼鐵工業內部的各個環節來看，這個指標比較可靠。第二，從今年頭四個月生產情況看，這個指標也是可能完成的，問題在於要保證質量。第三，只要煉出1300萬噸好鋼，就能軋出900萬噸鋼材，但鋼材品種還有問題。陳雲指出：這次對鋼鐵生產指標的研究，只限於鋼鐵工業內部的各個環節，不可能完全確當，鋼鐵工業只是整個工業和國民經濟中的一個環節，需要經過綜合研究以後才會更清楚。要使廣大幹部和群眾懂得，退到可靠的陣地才能站穩，站穩了才能更踏實地前進。陳還特別強調了當前需要著重注意的三個問題：要強調改進質量；既要保證重點又要照顧一般；既要照顧明年又要照顧長遠。如果兩者不能兼顧，就要為長遠打算。[26]

陳雲匯報後，鄧小平表示贊成陳雲的意見，退到可靠陣地，然後再前進。為了消除大家對降低指標在政治上的顧慮，鄧指出，現在有兩種方法，一種方法是指標定得蠻大，最後不落實，分不到東西；第二種方法是落實的，落實後再前進，後者可能更快，前者反而更慢。這樣做是不是機會主義？不是，不但不是機會主義，不這樣做反而錯誤更大。這幾個月心情不舒暢，四大指標公布以後，一直比較被動。現在唯一的辦法是把指標退下來，擺脫被動局面，退而後進。按第二種辦法做，決不是機會主義。現在這樣做可以爭取主動，能達到更高、更好。明確表示，同意照900萬噸鋼材先分840萬噸，留有餘地。

周恩來、劉少奇也都表示同意陳雲的意見。

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了國家計委的報告和陳雲的意見。會後，陳雲專就鋼鐵指標問題給毛澤東寫信，實事求是地把中央財經小組落實鋼鐵指標的考慮和分歧作了匯報。陳說：

> 今年究竟能夠可靠地生產多少鋼材和多少鋼，議論是不一的。多教人的意見，把今年鋼材生產可靠指標定在900萬噸，以此作為分配給各部和各省市的數量，把將來超過的數量作為奮鬥和爭取的目標。但冶金部有不同意見，認為這個數量太少了，會使下面泄氣。各省市的同志也有不同的意見。

他個人認為，為了安定生產秩序，不使計劃再變動太多，以900萬噸鋼材來分配較為可靠，如果哪個月生產超過了月定指標，第二個月就可將超過的部分再分下去，這樣並不妨礙超產。

針對說指標定低了會影響群眾積極性的說法，陳雲明確表示不贊成。他說，把生產數字定得少一點會泄氣，我看也不見得。正如少奇同志在政治局講的，定高了，做不到，反而會泄氣。

對小高爐存在的問題，陳說，小高爐煉出的九百多萬噸鐵，含硫量超過冶金部規定0.2%標準的，有40%以上，有的說至少有50%。這種情況不改變，將有四五百萬噸生鐵含硫超過標準，既不能用於鑄造，也不能在煉鋼後軋成有用的鋼材。這是勞民傷財，如不改進，就搞不到一千三百萬噸鋼和九百萬噸鋼材。因此，洗煤去硫，是能否完成擬議中的鋼材指標的關鍵。[27]

6月13日，毛澤東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研究工農業生產和市場問題。周恩來、李富春、李先念、廖魯言等在會上匯報了有關情況。會議正式決定，將1959年的鋼產指標降到一千三百萬噸，對基本建設項目也作了較大幅度的壓縮。根據這次會議的精神，中共中央在同一天發出《關於調整1959年主要物資分配和基本建設計劃的緊急指示》，批準國家計委《關於1959年主要物資分配和基本建設計劃調整方案的報告》。為緩和市場的緊張形勢，中共中央還發出《關於大力緊縮社會購買力和在群眾中解釋當前經濟情況的緊急指示》[28]、批轉了《上海市

委關於當前副食品、日用工業品問題的報告》。[29]

[1] 計劃草案規定：1959年工農業總產值為2870億元，比1958年增長40%。其中，工業和手工業產值為1650億元，比1958年增長41%，農業總產值為1220億元，比1958年增提39%。鋼1800萬噸，煤38000萬噸，糧食10500億斤，棉花1億擔。基本建設投資總額為270億元，比1958年增長26%，限額以上的建設項目1092個。李富春：《關於一九五九年國民經濟計劃草案的報告》（1959年4月21日），載《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十二冊，頁242-247。

[2] 《關於不再當下屆國家主席的批語》，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六冊，頁457。

[3] 《毛澤東傳（1949-1976）》，上冊，頁672-673。

[4] 《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十一冊，頁647。

[5] 龔育之：《毛澤東與八大黨章的兩個特點》，《中共黨史研究》，2004年第2期，頁5。

[6] 〈北京高等學校師生對劉少奇同志等當選為新的國家領導人的反應〉，《內部參考》，1959年5月1日。

[7] 〈廣州市人民對宋慶齡當選為國家副主席議論很多〉，《內部參考》，1959年5月1日。

[8] 〈美聯社說劉少奇主席既有實際工作經驗又是一位傑出的組織者〉，《內部參考》，1959年4月29日。

[9] 〈美官員承認在毛主席領導下我國家領導人合作得很好〉，《內部參考》，1959年4月29日。

[10] 〈法新社造謠說由於傳統關係宋慶齡才未當選為國家主席〉，《內部參考》，1959年4月29日。

[11] 〈美新处誣衊我國領袖正在進行「衣缽鬥爭」〉，《內部參考》，1959年4月29日。

[12] 〈公社黨代會上代表們對領導提出的批評〉，《內部參考》，1959年5月12日。

[13] 中共湖北省委關於麻城縣發動群眾開展算賬兑現運動情況給中央的報告（1959年，5月3日），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八冊，頁262。

[14] 〈山東省春荒嚴重〉，《內部參考》，1959年4月12日。

[15] 內務部《救災工作簡報》編：〈廣東、廣西春荒嚴重〉，《內部參考》，1959年5月19日。

[16] 毛澤東：〈關於解決春荒缺糧問題的批語〉（1959年4月17日），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八冊，頁209。

[17] 毛澤東：〈關於妥善安排渡過春荒的批語〉（1959年4月26日），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八冊，頁226。

[18] 毛澤東：〈黨內通信〉（1959年4月29日），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八冊，頁235-237。

[19] 〈一個「普通農民」給毛主席的信〉，《內部參考》，1959年6月28日。

[20] 〈中共中央關於農業的五條緊急指示〉（1959年5月7日），載《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十二冊，頁292-293。

[21] 〈中共中央關於分配私人自留地以利發展豬雞鵝鴨問題的指示〉（1959年5月7日），載《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十二冊，頁294。

[22] 〈中共中央關於社員私養家禽、家畜和自留地等四個問題的指示〉（1959年6月11日，載《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十二冊，頁382-384。

[23] 〈中共中央對算賬和召開社代表大會等問題的指示〉（1959年5月25日），載《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十二冊，頁352-353。

[24]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頁832-833。

[25] 〈中共中央關於採取非常措施解決當前石油供應問題的緊急指示〉（1959年5月26日），載《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十二冊，頁354。

[26] 《陳雲年譜（1905-1995）》，下卷，頁18-19。

[27] 陳雲：〈就鋼鐵指標問題給毛澤東同志的信（1959年5月15日）〉，載《陳雲文選》，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頁139-140。

[28] 《緊急指示》責成各級主要負責幹部立即向全體黨內外幹部、城鄉廣大群眾報告目前全國經濟情況和黨所採取的各項措施，首先肯定成績，同時做適當的自我批評，擺正九個指頭和一個指頭的關係，著重說明目前市場的緊張並不是由於工農業生產沒有躍進，而是由於城鄉消費量和社會購買力的增長太快，使他們消除疑慮和誤解，獲得力量和信心，動員廣大幹部和群眾團結起來，為克服困難，實現1959年的偉大躍進而奮鬥。《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十二冊，頁374-381。

[29] 中共中央批示說：副食品和日用工業品供應緊張，是目前經濟生活中一個最突出的問題，是有關黨群關係的一個重要問題，是經濟問題，也是重大的政治問題。中央要求各地區、各部門大力抓副食品、日用工業品的生產，抓壓縮社會購買力的措施，上下一齊動手解決這個

問題。大家想一想，難道一個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连副食品、日用工業品這樣的問題都不能解決嗎麽？取得政權的無產階級和農民，不僅能夠省吃儉用，克服一時的困難，而且能夠大力增加副食品、日用工業品的生產，從根本上解決這個問題，應當有這樣的信心和志氣。《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十二冊，頁402-403。

五、中共黨內對形勢的不同估計

1.黨內主流看法的基調

在6月13日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就高指標等問題講了話，闡明了他對形勢的基本看法：「知道了缺點，這就是有成績。」

毛說：

「本來是一些好事，因為一些指標那麼一高，每天處於被動。工業指標，農業指標，有一部分主觀主義，對客觀必然性認識不足。」「工業也好，農業也好，指標我們都是同意了的。比如去年12月武昌會議的兩千萬噸鋼。到了今年1月，有些同志以陳雲同志為代表，提出兩千萬噸難於完成。可是那個時候還難於改變。因為還是1月，人們還想大幹一番。那個時候可以轉一下，轉得比較主動些。但是要轉成上海會議的一千六百五十萬噸的指標不可能，轉成現在的一千三百萬噸也不可能。世界上的人，自己不碰釘子，沒有經驗，總是不轉彎。」

「今年根本不要理那個一萬零五百億斤[1]，就是按照去年的實際產量，只增一成、二成、三成。……我們過日子還是放在四千八百億斤。」「那麼高的指標，吹了，不要了。我們自己立一個菩薩，就在那裏迷信這個菩薩。要破除迷信。甚麼兩千萬噸鋼，多少萬擔棉花，根本不理。一個時候，我們自己頭腦發昏。」「明年的工業指標切記不可高，我看大體就是今年的指標，低一點也可以。」

「許多問題是料不到的。誰知道吹『共產風』？根本不管價值法則、等價交換，一辦公社，『共產風』就吹出來了，沒有料到。現在落實到一千三百萬噸鋼，我也沒有料到。許多事情是料不到的。糧食那麼緊張，去年大豐收，今年大緊張，也沒有料到。要隨時注意新問題，發現新問題。雖然出了這麼多亂子，但是最大的成績是自從去年北戴河會議以來，各級黨委注意搞經濟了。」

毛最後說：「我到井岡山，頭一仗就是敗仗。這是一個好經驗，吃了虧嘛。」[2]毛還表示，過去的大躍進，使全黨注意抓工業，這是極大的收穫，出現了一些問題，知道了缺點，這就是有成績。[3]

毛澤東認為，把高指標降下來，加上正在採取的一系列措施，經濟形勢將很快根本好轉。1959年6月11日，李先念就1959年社會商品購買力和商品供應量之間的平衡問題，向中央寫了報告，其中說：「幾個月來根據中央歷次會議的精神，全黨在農副產品收購方面，在日用工業品生產方面，都做了許多工作，但是至今沒有得到根本好轉。」毛看後批道：「沒有根本好轉，但是已經開始有了好轉。再有幾個月，根本好轉

就會來了，這是明白無疑的。」[4]毛的自信表露無遺。

對形勢的樂觀估計，並不只限於毛澤東個人，湖北省委在傳達討論上海會議精神給中央的報告，對1958年的總結和對1959年的展望，就具有相當的代表性。報告認為：1958年大躍進，兩條經驗，一條教訓。兩條經驗，一是，1958年的大躍進為今後工農業高速的發展開闢了道路，造成了大躍進的局勢。二是，「放手發動群眾，一切經過試驗」。這是保證多快好省的總路線能夠實現的關鍵。一條教訓，是勝利沖昏了頭腦。報告說：

> 大家認為，把1959年和1958年相比，既要充分估計困難的一方面，又要充分估計有利的一方面，而且有利的方面是主要的。現在的情況可以說是有困難、有辦法、有希望。只要全黨團結一致，兢兢業業，依靠群眾，發動群眾，把沖天幹勁和科學精神結合起來，充分地運用1958年的經驗，並且把失敗的教訓轉化為前進的積極因素，就能戰勝困難，在1958年勝利的基礎上，爭取更大的勝利。[5]

湖北省委在7月上旬舉行經濟工作會議，省委第一書記王任重在總結講話中強調：1959年必須繼續組織大躍進。糧食爭取秋後完全好轉，一般副食品爭取春節前基本好轉，到明年5月30日前徹底好轉。他說：目前我們的形勢是有利的，比去年同期好。因為去年此時雖然供應不那麼緊張，但它是愈來愈走下坡路。現在供應雖然還相當緊張，但是在向好轉方面走。為了繼續躍進，必須抓住兩個問題：（1）大力貫徹執行黨的各項政策；（2）大搞群眾運動，插紅旗樹標兵、抓落後趕先進。說大話是不對的，但革命者要立大志、建大業，因此，仍要發揚共產主義風格。[6]

湖北省委的這種情緒，在1958年積極推動大躍進的省級領導人中，是很有代表性的。

2.來自黨內中下層的質疑

但是，在地、縣委書記以及一般幹部中，有相當一部分人對1958年的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有着不同看法，對繼續搞大躍進表現出沒有信心。中共中央《關於大力緊縮社會購買力和在群眾中解釋當前經濟情況的緊急指示》下達後，各地先後召開經濟工作會議，統一對經濟形勢的認識，並向群眾做解釋工作。在這過程中，人們對大躍進、人民公社的懷疑和埋怨情緒公開暴露了出來。

在湖北省的經濟工作會議中，有人在小組討論發言說：「1958年犯了左傾冒險主義錯誤。」「去年大辦鋼鐵是『得不償失』。」「一面說躍進，一面餓肚皮，怎樣也不好解釋。」因此，地、縣級領導人對1959

年的生產指標，都是「保險」、「再保險」，多一斤也不接受。對上面提出的「工農商交並舉」的方針，提出質疑，有人提出：「過去工農並舉的兩條腿走路的方針都沒有貫徹執行好，現在又加了兩條腿——四條腿走路更難走了，怎樣舉法，鬧不清。」[7]

在中共江西省委黨校學習的幹部，有將近半數的人認為：

人民公社沒有優越性，「目前的人民公社跟高級社幾乎一樣，不知是誰想出來的新名堂，似乎要與眾不同（蘇聯也沒有），出風頭，好像要趕到『世界的前頭』」。公社化，「給生產帶來了很大的破壞，如森林遭到破壞，農具、生產無人管理，勞力大批外流」；「出現了殺雞、殺豬，『一平、二調、三收款』」。他們形容：「公社的出現並不是甚麼『萬事俱備（指建社條件），只欠東風』（指公社），而是『火燒戰船（指成立公社把高級社的生產關係搞掉了），一掃而光（指一平二調三收款）。公社化運動的情況猶如『大霧滿江（指颳共產風），萬箭齊發（指共產風帶來的過分集中），十萬狼牙（指農貸十億元），一去不返』。」

《中央關於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有左傾情緒，人民公社的廣泛建立，是左傾思想的復活」。「決議中提出的『三化』（指組織軍事化、行動戰鬥化、生活集體化——引者註），『是一句迷惑群眾的假話』，實行『三化』，只有集中，沒有民主，只有紀律，沒有自由，甚麼民主、自由、心情舒暢、生動活潑的話，只是說得好聽，並無實際內容。它與『三化』是勢不兩立的，不可能同時存在。」「目前出現的問題是帶有全國性的，這就說明中央決議有毛病。」

「『共產風』是從上面颳下來的，中央、省、地委應負責任。」「武漢會議時說中國實現共產主義比蘇聯容易，比蘇聯快，因此『共產風』愈颳愈大。」「中央、省委有錯，下面也有錯。」

「工資制與供給制相結合的分配制度提得過早了，不夠合理，結果農民大失所望，應該取消。」「公共食堂不是共產主義因素，現在不要，將來也不要。」「公共食堂害多利少，增加人民內部矛盾，群眾不滿，飲食不便。」「食堂有三大壞處：排隊；搶；浪費糧食，又浪費錢。」[8]

天津市和平區二千四百多名科以上黨員幹部討論中央緊急指示時，反映出對1958年大躍進的懷疑情緒，談出了七大埋怨。主要是：埋怨領導好造大計劃；埋怨農村工作搞得不好（去年不給農民自留地，不叫農民自己養豬，結果豬肉少了，弄得人心惶惶。農村糧食這樣緊張，是不聽農民的話的結果，如單純強調密植，造成了減產）；埋怨宣傳工作有毛病（去年宣傳这裏大躍進，那裏大豐收，結果並不是這樣）。[9]

在天津的一般幹部和職工中，有些人認為：「現在農村糧食緊張和城市副食品緊張都是公社化鬧的。」他們提出：「去年取消自留地，今

年恢後自留地；去年搞食堂，今年散伙；去年搞供給制、幾包，今年按勞取酬，是不是過去搞錯了。」認為「煉鋼勞民傷財，得不償失，只鬧了個形式」。[10]

中央國家機關幹部在傳達討論中央緊急指示中，也提出了很多不同意見。如：

國務院機關的一位幹部說：「1958年糧食增產一倍，中國人口並沒有增加一倍，社會購買力也沒有增加一倍，為甚麼糧食今年這樣緊張？」一機部一位副局長說：「當前出現了糧食愈來愈少，市場供應愈來愈緊，生活水準愈來愈低的嚴重局面，我思想上就產生了這樣一個疑問：1958年增產的那麼多的糧食哪裏去了？長此下去，擔心會出現不好的結果，人民內部矛盾能否引起爆發性的矛盾？不知中央考慮到這個問題沒有？」對以鋼為綱，氣象局有些幹部認為：「去年煉鋼是得不償失。」一機部一個副處長說：「去年以鋼為綱，一切為了鋼。由於鋼的指標不穩，影響了其他所有部門。」[11]

這些由中下層幹部和職工流露出來的困惑、質疑和埋怨情緒，在當時具有相當的代表性。這種情緒不能不反映到黨內上層中來。

3.少數高層領導人的擔憂

在毛澤東領導採取措施，穩定城鄉生產和市場的同時，中央其他領導人對現實城鄉形勢也十分關注，分別到外地視察，了解情況。

1958年12月，在武昌會議西北組討論1958年糧食產量時，不少人贊成公布一萬億斤或一萬二千億斤。彭德懷明確表示不同意見，直截了當地指出：「糧食沒有那麼多。」曾受到一些人的批評，說：「老總啊，你這也懷疑，那也懷疑，可怎麼辦呢？」彭解釋說：「公布的數字寧可少一些，將來追加數字比較主動；公布的數字多了，將來被動。」會後，彭德懷帶着疑惑回湖南家鄉作調查。[12]

彭到湖南，省委第一書記周小舟陪同視察。在大躍進中，周小舟是少有頭腦相對冷靜的省委書記之一。周向彭說，省委前些時候開常委會，大家都不同意把當年的糧食產量估計得那麼多，也不同意把次年的糧食產量指標訂得那麼高。所以，近幾個月來湖南老是挨批評，還被拔了「白旗」。關於土法煉鋼，周說，全省共建起五萬多個小高爐，生了火的還不到一半，出了鐵的就更少。周還向彭說，公共食堂沒有給群眾帶來甚麼方便，反而造成人力物力的很大浪費。並認為，供給制窮的時候不能搞，富裕的時候也不能搞。

彭德懷到了湘潭，沒有住縣裏的招待所，而是住進了烏石彭家圍子自己的舊居。當天晚上，鄉親們都來看望，彭親切地向大家詢問了家鄉的生活和生產情況。在公社和大隊幹部座談會上，有的幹部談到今年糧

食大豐收，吳公塘生產隊畝產過千斤時，彭德懷立即同幹部們步行數里到吳公塘田邊，打着手電筒，蹲下身來拔起一蔸禾茬，數着一蔸禾上有多少株稻桿，每個穗上大約有多少顆稻穀，細心計算着每畝地的產量。他對幹部說：「我最近看過不少地方，有的講畝產幾千斤，上萬斤，吹得很厲害。老實說，我是有懷疑的。我們當幹部的，辦事一定要實事求是，不能搞浮誇。」公社幹部說，他們公社的煉鐵廠出了六百四十多噸鐵。彭又去了公社煉鐵廠。彭看到為了那麼一點鐵，集中公社、大隊全部勞力運料，丟開農業生產，讓稻穀爛在地裏；為了解決燃料問題，拆毀了社員許多住房，砍伐了大片山林；為了收集原料，連社員的農具和做飯的鐵鍋都砸了……這種種情形，十分感慨，這是多麼大的代價呀！他對幹部和社員說：「過去技術落後，民間須要製造農具用這種小土爐煉鐵。現在大規模這樣搞，看來不是好辦法。」

在烏石，彭德懷還看了烏石學校的教室和教員們的宿舍，嚐了學生們的飯菜。參觀了趙家弄子大隊十分簡陋的幼兒園；許家塘大隊的敬老院，了解到老人們每人每餐只能吃到二三兩（十六兩一斤），數九寒天還睡在光光的篾席上，連褥單都沒有，被子也破爛不堪。彭緊鎖眉頭忍不住說：「這叫甚麼敬老院、幸福院！」行前，彭德懷給幼兒園和敬老院，各捐了二百元錢，讓幹部給孩子們添些生活必需用品，為老人們添置些鋪墊。

讓彭德懷感觸頗深的，還有幹部作風問題。鄉親們反映說，由於上邊給的任務又重又急，基層幹部的領導作風也就愈來愈壞。不講民主，強迫命令，隨便打人、罵人、捆綁人的現象，相當普遍，而且愈來愈嚴重。彭對前來送行的幹部們叮嘱說：今後再不準搞瞎指揮，不準搞浮誇，不準說假話，不準強迫命令，不準打人罵人，不準罰口糧，不準拆毀社員房屋，不準砍伐山林。

離開烏石，周小舟陪彭來到毛澤東的故鄉韶山公社，情況與烏石大隊大同小異。隨後到了平江——三十年前平江起義的地方。在參觀平江縣工農業生產展覽館時，他吃驚地發現有兩個數字竟然是顛倒著公布的：把收成最好的1957年的糧食高產數字，公布為1958年的產量；而把1958年較低的數字，說成是1957年的產量。對如此造假的做法，彭深感憂慮。就在平江，一位戰爭年代負傷致殘的紅軍戰士，在人群中悄悄地給彭送了一張紙條。上面寫著：

穀撒地，
薯葉枯，
青壯煉鐵去，
收禾童與姑。
來年日子怎麼過？

請為人民鼓嚨胡。

彭德懷看後小心翼翼地把紙條夾在自己的筆記本裏。他在筆記中寫道：「這是群眾多麼沉痛的呼聲！」

多年以後，薄一波回憶當年在湖南相遇時的情景說：

這年，我也去湖南調查。我和彭德懷同志在株洲相遇。彭德懷同志說，1958年的糧食產量絕對沒有公布的數字那樣高，[13]徵購一千二百億斤很危險，最多只能徵購九百億斤。在這個問題上我和他的調查有同感。他建議聯名給中央發電報反映。我說，我們還是分別向中央反映好些，他同意這樣做。[14]

彭德懷如實地向中央寫信反映情況，建議把當年的徵購糧減到九百億斤。

在4月的上海會議期間，陳雲和彭德懷同住在瑞金二路五號，同席進餐，飯後一起散步，交談過不少問題，而且對許多問題的看法比較一致。彭德懷對陳雲堅持實事求是，不隨聲附和而又勇於直言的精神，是很佩服的。在交談中，彭德懷獲得了不少啟示。[15]

對1958年的大躍進，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外交部常務副部長張聞天一直抱有自己的看法。1958年11月，在武昌舉行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張聞天曾就社會主義階段應強調按勞分配的原則作了發言，並批評了許多地方取消計件工資的做法。但發言很快被有的負責人頂了回來，說要著重強調兩條戰線的鬥爭，並說：計件工資「不是取消，是共產主義風格大大發揚，是工人自己提出來要取消」。[16]使張的意見未能展開。

1959年1月，張聞天就中央宣傳部門研究改進大躍進、人民公社宣傳方式方法問題，對身邊工作人員說：「宣傳上應該總結的不是技術問題，而是理論問題。」[17]此後，張在外交部的幹部會議上談對中共八屆六中全會精神的體會，對大躍進、人民公社涉及的一些理論問題作了分析。指出：「按勞分配是社會主義的經濟規律，也是社會主義分配原則，不是資產階級法權。」「在社會主義條件下，按勞分配是唯一平等的分配標準。」「要求目前實行按需分配，是種平均主義思想。攻擊按勞分配就是攻擊社會主義。」「過分強調主觀能動性而忽視物質條件也是不對的。人改造物質世界，歸根結蒂要發展生產，光憑主觀想像是不行的。」建設社會主義「需要沖天的幹勁，也需要一定的物質技術條件」。「強調前者是唯心主義，強調後者是機械唯物論。兩者結合才是馬列主義。」我們現在搞「以鋼為綱」，而「綱與目必須相適應，才能一馬當先，萬馬奔騰；否則元帥走得太快，其他的東西就會掉隊」。「重點突出不能離開有計劃按比例發展的原則。」在生產與生活的關係問題上，張認為：「使用群眾的積極性而不關心其生活條件，可以支援一個時期，不能持久。」現在大家幹勁大，溫度很高，成績很大，「但

有些地方冷靜不夠，甚至作風上發生虛假，不實事求是等問題」。他說：「每一事物都有兩面性。過分強調了一面，就會否定另一面」，因此，「要糾正片面性」。[18]

3月，張聞天偕夫人劉英在廣西、廣東調查考察了二十天。一路上所見所聞，使他深感問題的嚴重性，由於黨內外民主生活受到嚴重損害，正確意見受到壓抑，虛報浮誇之風盛行。講話要看上面喜好，不敢講真話，怕插白旗，怕戴帽子。如：

19日，海南同崖縣縣委書記向他反映該縣公社化後，無人負責現象嚴重，工具、糧食、牲口等均無人負責。椰林裏的椰子隨便吃，一個椰林就吃了二十萬個椰子。全縣六萬個農戶，每戶至少吃了兩隻雞，豬也殺得多。農民認為反正這些東西都是公社的了，不是自己的了。張向隨行秘書說，現在的情況同蘇聯農業集體化過程中勝利衝昏頭腦的情況一樣。[19]

21日，張在海南石碌參觀華南熱帶作物研究所，當見到二十個小高爐只有四個點了火，便向秘書表示：光是看造成了多少小高爐有甚麼用？我們上面計算今年能產多少鐵，根據就是造了多少個小高爐，一個小高爐能產多少鐵。這樣的計劃一定會落空。[20]

27日，在廣州鋼鐵廠，問及職工糧食定量壓低後夠不夠吃，工廠負責人面有難色，又仍回答：「夠吃」。張對此私下表示：看來下面的同志要講真話真難呵。此前對於海南省有的地方餓死人都不敢說就深有感觸，曾對夫人劉英說：現在黨內缺乏一種人們可以暢所欲言的氣氛，領導上總是喜歡聽好聽的。[21]

八屆七中全會結束後，從上海返回北京，張聞天與國務院副總理兼財政部長李先念、福州軍區司令員韓先楚同坐一節車廂。途中相互交談了大躍進出現的種種問題：基本建設項目上馬太多，人力、物力、財力分散不集中，浪費大，結果少；工業產品品質差，大量積壓，影響對外出口信譽；農產品購銷計劃完不成，影響生產和人民生活；財政發生大量赤字，等等。李先念也發表一些相同看法。韓先楚則對報上宣傳的紅安密植有意見，並申明這不是唱反調。張接着說，可見黨內是有不同意見的，不過就是敢不敢講罷了。[22]

6月20日和23日下午，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書記處先後召開會議，討論報刊宣傳問題。張聞天在兩次會議上發言，主張講實情，把目前的困難和我們工作中的缺點向人民講清楚，認為掩飾缺點並不能鼓勁。有的與會者反對他的發言，責備他講喪氣話，是對形勢估計悲觀的一種右的論調，強調要在兩條戰線上開展鬥爭。張聞天聽了激動得爭執了起來，說不要這樣扣帽子。會後，張對夫人劉英說：「現在不能講缺點，一講缺點就有人扣帽子。」又說：「愈是不要我講，我愈是要講，我腦子裏就是存在着這些東西，不能不講。」[23]

6月21日，星期日。張聞天在中南海西樓看電影后遇彭德懷，受邀到彭的住處小坐。兩人交談中都認為去年9月以後一段時期「左」的錯誤嚴重。彭舉一個省發現大量浮腫病為例説，要不是黨中央毛澤東同志威信高，就會發生匈牙利事件。張談了小高爐煉鐵得不償失，花了多少勞力，也妨礙了秋收。去年要是不這樣搞，今年日子就好過多了。兩人談起1958年的南寧會議，認為中國黨內也要注意防止史達林晚年的問題。張説，4月29日的〈黨內通信〉是起了好的作用，但以毛澤東的個人名義發下去也有突出個人的作用。彭提出中央這次也應該做個檢討，講講缺點，總結些經驗。張表示贊同。[24]

張聞天的這些言論，表明他不只看到大躍進和人民公社一系列「左」的錯誤，更看到問題的嚴重性還在於黨內個人專斷和個人崇拜之風的滋長，黨內失去了正常的民主氛圍。

中共中央副主席、剛就任全國人大常委委員長的朱德，對人民公社化以後的所有制問題，也抱有自己的看法。他認為不能完全否定「個人所有制」。

1959年5月20日，朱德對國務院副總理李富春説，農業的基本問題是全民所有制、集體所有制和個人所有制結合的問題。不與個人所有制結合，農民就沒有積極性。我看要退回去，退到允許個人所有制的存在是合理合法的。否則，農民總要向外跑，不安定。又説：過去的商業網點被打破了，結果東西沒有了，吃了虧。這實質上還是一個所有制問題，即把全民所有制、集體所有制、個人所有制三者的關係混淆了。[25]

5月27日，朱德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董必武、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林楓一起到東北的遼寧、吉林、黑龍江三省視察。在視察途中和回京後，朱德、董必武、林楓聯名向中央和毛澤東寫報告反映沿途看到的情況，內容主要是關係群眾基本生活的食堂和住房問題。

他們認為：「在當前的群眾生活中，食堂問題是一件大事。」「这裏大部分群眾不願意參加常年食堂，原因是：（1）東北冬季時間長，各家都需要燒炕取暖，如果食堂和家裏立兩爐火，浪費很多煤火；（2）食堂設備條件差，不能做到家裏那樣飯熱炕暖；（3）自留地分下去後，在家裏做飯可與飼養家畜家禽結合起來；（4）群眾感到在食堂吃飯，對來人做客、婚喪嫁娶有諸多不便。」

為此建議：「在今年的夏季分配中，應該強調把糧食分到戶，允許社員自己在家裏做飯。願意入食堂者，可以自由結夥，重新集中糧食。」

關於群眾住房問題，報告中說：「在公社化以前，群眾建築了不少房屋。公社化以後，由於群眾對住房私有政策一度發生誤解，對自己居住的房屋不修不建。根據這一情況，今後除貫徹執行房權私有的政策

外，還應該採取一些措施，鼓勵群眾自己修建房屋。黑龍江省委最近提倡建房儲蓄，並準備供應群眾一部分木材和玻璃，這一措施是很好的。」

此後不久，朱德還召集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負責幹部談話，嚴厲批評了「共產風」，指示他們根據憲法和黨的有關決議，研究保護公民合法的生活資料所有權問題，並提出具體意見供中央參考。

對大躍進造成國民經濟比例嚴重失調等問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兼外交部長陳毅和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在同外賓談話中，也都坦率地談過。

6月8日，陳毅在與社會主義國家駐華大使們會談時就承認，在追求高速度的建設過程中，破壞了各個經濟部門的計劃性和按比例發展的原則。[26]

6月17日，周恩來會見蘇聯部長會議副主席扎夏迪科時說：1959年的國民經濟計劃指標定得高了，因為制定計劃時沒考慮客觀條件和國家的現實能力；到1958年底，國家經濟發展已出現嚴重困難，一些國民經濟部門之間已出現比例失調。周說：繼續採用大煉鋼鐵式的群眾運動方式來發展工業是不行的。現在「已經完全清楚，小型傳統礦井和冶煉爐是不可能成為現代工業發展的基礎的」。周還說：「開始大躍進運動之後，我們曾經請求蘇聯擴大設備供應，並請求儘快提供這些設備。但是，當設備運來之後，才發現我們無法安裝它們，因為我們沒有相應的配套設備，因此，這些運來的設備只好堆放在那裏。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是我們思想比較混亂，不能將力量集中在一些最重要的建設項目上。我們當然應該為此而道歉。」[27]

以上表明，在1959年上半年，中共黨內從中下層到高層，對1958年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引起的問題，明顯存在著與主流不同的另一種認識和意見。這種不同估計和評價，在此後不久召開的廬山會議上終於引發了一場嚴重的衝突。

[1] 指1958年12月中共八屆六中全會定的1959年糧食計劃產量。

[2] 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講話記錄（1959年6月13日），載《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頁948-949。

[3] 楊尚昆：《楊尚昆日記》，上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頁398。

[4] 毛澤東：〈關於一九五九年市場供應情況的批註〉（1959年6月），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八冊，頁320。

[5] 〈湖北省委關於省委擴大會議的情況報告〉（1959年4月26日），載《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十二冊，頁296-305。

[6] 〈湖北經濟工作會議上地縣委書記等對若干問題的看法〉，《內部參考》，1959年7月8日。

[7] 〈湖北經濟工作會議上地縣委書記等對若干問題的看法〉，《內部參考》，1959年7月8日。

[8] 〈江西省中級黨校學員對人民公社的各種看法〉，《內部參考》，1959年7月16日。

[9] 〈天津和平區幹部在討論中央「六一」指示时談出「七大理想」〉，《內部參考》，1959年6月21日。

[10] 〈天津進行經濟宣傳的收穫和各階層暴露出來的問題〉，《內部參考》，1959年7月8日。

[11]〈中央國家機關幹部對中央六一指示的反應〉，《內部參考》，1959年6月21日。

[12] 彭德懷在湖南調查的情況，參見《彭德懷傳》編寫組：《彭德懷傳》（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3），頁578-582。

[13] 1958年12月17日，中共八屆六中全會公報公布的糧食產量是：七千五百億斤。《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十一冊，頁650。

[14]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頁857。

[15] 孫業禮、熊亮華：《共和國經濟風雲中的陳雲》（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頁173。

[16] 《中共八屆八中全會文件彙集》，轉引自程中原：《張聞天傳》（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0），頁720。

[17] 張培森主編：《張聞天年譜》，下卷（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0），頁1122。

[18]《張聞天年譜》，下卷，頁1123。

[19]《張聞天年譜》，下卷，頁1128。

[20]《張聞天年譜》，下卷，頁1129。

[21]《張聞天年譜》，下卷，頁1130。

[22]《張聞天年譜》，下卷，頁1131。

[23]《張聞天年譜》，下卷，頁1144。

[24]《張聞天年譜》，下卷，頁1144-1145。

[25]《朱德傳》，頁690。

[26] 轉引自沈志華：〈蘇聯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態度和結果〉，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中共黨史資料》，2003年第1期

[27] 斯卡奇科夫給蘇共中央的報告，1959年7月2日，轉引自沈志華：〈蘇聯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態度和結果〉，《中共黨史資料》，2003年第1期。據《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卷，頁237-238記載：6月17日接見蘇聯部長會議副主席扎夏迪科，說我國去年大躍進搞了四個月，對經驗沒有很好總結，今年煤炭部和冶金部定的指標高了一些，地方更沒有經驗，去年大搞工業，主要是煤和鐵，其他工業部門也都在躍進，這樣就失去了平衡。各部門之間不平衡，煤炭和交通運輸不平衡，機械製造和鋼鐵不平衡，生產和生活不平衡，供應顯得緊張。有些問題在當時看來可以辦到，但是未能更進一步估計一下明天如何，去年主要是追求數量，今年要在提高品質的基礎上提高數量，從而降低成本，減少勞動力。

第七章

廬山會議發生的重大轉折

一、毛澤東為繼續躍進定基調

1.到韶山、登廬山豪情不減

1959年6月20日晚12時過後，毛澤東再次登上專列南下，途經武漢，暢遊了長江，24日下午到達長沙。同行的有湖北省委第一書記王任重。在長沙稍事休息，25日，由湖南省委第一書記周小舟陪同，毛澤東回到了闊別三十二年的故鄉——韶山。此前，毛澤東曾與公安部長羅瑞卿「約法三章」：「一是不要派部隊去韶山，特別不要派公安人員；二是使我行動自由；三是我要廣泛接見群眾。」[1]

韶山，位於湘潭縣城西四十公里，湘鄉、寧鄉、湘潭三縣交界處，四周峰巒迭起，氣勢磅礴，是南嶽七十二峰之一。相傳虞舜南巡經過此峰，演奏韶樂，故名。[2]韶山沖就在這韶山峰的腳下。

毛到韶山松山一號寓所，即吩咐：「把这裏的山神土地（意指公社書記、大隊書記——筆者注）找來。」公社書記毛繼生等到後，毛澤東對他們說：「我離開韶山幾十年啦，要請鄉親們吃頓便飯，敘敘舊。請你們幫我辦一下。」具體應邀請的人，毛說：一是我的戚族、老表、堂兄弟，二是韶山沖烈軍屬，三是老地下黨員，四是農民協會老自衛隊員。時間安排在26日晚上。

第二天一早，毛澤東就要毛繼生領他到父母墳上看看。走了半個多小時，毛在隨行人員的陪同下，來到土地沖楠竹托。毛將工作人員在路上用松枝做的花圈恭敬地放在父母墳前，靜立片刻說：父親、母親，你的兒子回來了，前人辛苦，後人幸福。然後深深地鞠了一躬。算是盡了一份孝心。

此後，毛澤東走訪了幾戶社員家庭，瞭解當地的糧食產量，社員的口糧標準。又看了自己的舊居。然後來到韶山學校，接受了少先隊員的鮮花和紅領巾，留下了一幀被詩人臧克家稱頌是「可以聽得見笑聲的照片」。下午，毛又拜揖了毛氏宗祠，到韶山水庫游泳。晚上，被邀請的鄉親們先由毛主持開座談會，毛向大家說：

「我離開韶山三十多年了，難得回來一次，今天請大家來，很想聽聽各位的意見，特別是想請你們老人對我提點意見，你們對當地政府有甚麼看法和意見，對生產生活安徘有甚麼意見、建議，甚至對我本人有甚麼意見，都請儘量提，放心講，不要有顧慮。」

在毛的一再啟發下。有的老人才開口說：

「主席，意見是有，就是如今講不得，講了要挨辯論，挨鬥爭！」

「過去先犁田要過鐵板，踩田要過腳板。」「有句老話，一腳踩到

底，石穀八斗米。如今插板板寸，腳都進不得，產量低了。聽說是您讓搞的，我們沒辦法。不知您到底怎麼講的？」

毛解釋說：「是我讓搞的。」但「我主張的是合理密植，不是主張愈密愈好」。毛問大家「我那六條（指4月29日的〈黨內通信〉）你們知道嗎？」

有人答：「哪六條？韶山不曉得。聽說有的地方就不準念。您的政策到下邊就變卦。」這時，人們開始七嘴八舌說開了。有人提出，現在食堂糧食少了一點，每天得「兩斤米才行」。「韶山過去糧食比較足，山上種玉米、紅薯等經濟作物，可現在不種了，這是為甚麼啊？」「農民糧食不夠吃，還要上交各種糧，剩下就不多了，不少人連飯都吃不上了！有的幹部瞎指揮，不講理。不交糧或交不起的就打人罵人！」「現在種田和過去不一樣了，說畝產幾萬斤，十幾萬斤，深耕要翻幾番。我們不同意，就說是『老保守』。如今對老年人太不尊重了。還要挨辯論，挨鬥爭。聽說外地比韶山還厲害！」「現在吃食堂，搞集中，男女要分開。古來都是各家各戶，夫妻同住，互相照顧，現在男女分開，這是甚麼世道？請問主席這是誰搞的？」

毛聽了以後，頗有感慨地說：「你們這些意見提得好。這種意見只能在家鄉才能聽到，我在中央、在別的地方是聽不到的。」「我謝謝你們，我單獨和你們幾位照個相。」

照完相，毛又對大家說：「鄉親們：你們提意見是對黨的熱愛，對政府的支持，希望你們今後多提意見，大膽講，我們會儘量採納的。回到北京後，中央要開會，好好研究，向全國下個文，統一解決食堂問題。」「我們搞社會主義經驗不足，出了一些問題，中央要負責，特別我要負責。」

毛又徵求當地幹部有甚麼意見和要求，並囑咐說：「你們當幹部的要關心群眾生活，搞好生產，把韶山建設好。韶山是我的家鄉，外賓常來，不能丟人。如果韶山搞不上去，生活不好，也會影響社會主義國家的聲譽。」

與會者齊聲表示；「請主席放心，我們一定帶領群眾建設好主席的家鄉，把生產、生活搞上去。」

隨後毛澤東招待鄉親們吃飯。毛向大家敬酒說：「我離開韶山三十多年，東奔西跑回不來。今天毛三伢子特請各位長輩、親朋、革命老人吃頓便飯，敬大家一杯酒。」隨後又來到毛宇居面前給他敬酒，毛宇居趕緊舉杯起身說：「主席敬酒，豈敢豈敢！」毛澤東說，「敬老尊賢，應該應該！」毛宇居是毛澤東的堂兄，又是他的塾師，很有學問，人品正派，可靠可信，家鄉的不少事毛都委託他辦。所以，毛對他格外尊敬和感激。[3]

送走客人，毛澤東回到松山一號。夜深人靜，這一天看到的和聽到

的種種情況，使他久久不能平靜，隨要值班衛士拿來紙筆，寫下了《七律·到韶山》的詩篇。詩前小序寫道：

> 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五日，到韶山。離別這個地方已有三十二周年了。

詩雲：

> 別夢依稀咒逝川，故園三十二年前。
>
> 紅旗卷起農奴戰，黑手高懸霸主鞭。
>
> 為有犧牲多壯志，敢教日月換新天。
>
> 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煙。

從這首詩中，可以看出，毛澤東在家鄉，儘管因聽到鄉親父老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諸多怨言，反映出強烈的不滿情緒，很有感慨；看到鄉親們因饑腸轆轆，在飯桌上如風捲殘雲一掃而光的表現，內心也不是滋味。但在他的腦海深處，1959年仍是一派繼續大躍進的豪邁景象。

為總結經驗，繼續躍進，毛澤東離開北京南下途中就考慮到廬山舉行一次會議。據楊尚昆1959年6月21日日記記載：

> 主席已到鄭州，來電話提議召開省市委書記座談會，地點在廬山，徵求常委同志的意見，12時在少奇同志處開會，同意主席提議，並決定我後天先去廬山。[4]

6月28日，毛澤東從長沙給正在武漢的周恩來通電話，商量廬山會議召開的具體問題。毛說，人們的頭腦有些發熱，需要冷靜下來學點政治經濟學。這次會議不要搞得太緊張，要適當注意休息。毛還告訴周恩來他出的一些題目，讓與會者討論。[5]當夜，毛澤東由長沙抵武昌。29日下午，毛在武昌（他乘坐的輪船上）召集各協作區主任（柯慶施、李井泉、王任重、張德生、歐陽欽、林鐵等）開會，議論了上山討論的十四個題目。[6]6月30日下午，毛澤東乘船離開武昌，晚11時半到達九江，第二天一早乘車上了廬山。毛澤東生性喜好山水，到廬山後，興致很好，當晚作七律《登廬山》：

> 一山飛峙大江邊，躍上蔥蘢四百旋。
>
> 冷眼向洋看世界，熱風吹雨灑江天。
>
> 雲橫九派浮黃鶴，浪下三吳起白煙。
>
> 陶令不知何處去，桃花源裏可耕田。[7]

這首詩與《到韶山》一樣，表現了詩人的樂觀心情和豪興不減。

2.「神仙會」的討論主題

與毛澤東先後到廬山的中共中央常委有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和鄧小平因健康原因沒有上山，林彪在北戴河休養）。7月2日下午，毛澤東召集部分中央領導人和各協作區主任[8]開會，研究會議要討論的問題和會議的開法。根據毛澤東的意見，共提出了十九個問題。會議的具體開法，決定採取先分後合的辦法，先分組開座談會，討論十九個問題，然後再用兩三天時間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必要的文件。

會務方面將毛澤東在6月29日和7月2日兩次會議上的講話，整理成一個講話記錄，共十八個問題（略去了國際問題）。7月2日夜裏，毛澤東把這十八個問題重新修改一遍，要楊尚昆印發會議。這十八個問題，核心是三大問題：怎樣估計目前的形勢？1958年有哪些經驗教訓？今後怎麼辦？毛澤東的基本看法是：

關於形勢，他認為形勢總的是好的，而且在繼續好轉，這要肯定下來，同時也認為存在的問題不少。毛說：

> 國內形勢是好是壞？大形勢還好，有點壞，但還不至於壞到「報老爺，大事不好」的程度。八大二次會議的方針對不對？我看要堅持。總的說來，像湖南省一個同志所說的，是兩句話：「有偉大的成績，有豐富的經驗。」「有豐富的經驗」，說得很巧妙，實際上是：有偉大的成績，有不少的問題，前途是光明的。……去年大躍進、大豐收，今年是大春荒。現在形勢在好轉，我看了四個省，河北、河南、湖南、湖北，大體可以代表全國。今年夏收估產普遍偏低，這是一個好現象。
>
> 今年這時的形勢和去年這時的形勢比較，哪個形勢好？去年這時很快地颳起了「共產風」，今年不會颳，比去年好。明年「五一」可以完全好轉。

關於經驗教訓，除了具體政策層面的問題外，毛主要講了高指標、浮誇風和綜合平衡等問題。關於今後的任務，毛說了他的意見：

> 今年鋼的產量是否定一千三百萬噸？能超過就超過，不能超過就算了。今後應由中央確定方針，再交業務部門算賬。糧食有多少？去年增產有無三成？今後是否每年增加三成？每年增加一千億斤，搞到一萬億斤，要好幾年。明年鋼增加多少？增加四百萬噸，是一千七百萬噸。後年再增加四百萬噸。十五年內主要工業產品的數量趕上和超過英國的口號還要堅持。總之，要量力而行，留有餘地，讓下麵超過。人的腦子是逐漸變實際的，主觀主義減少了。去年做了一件蠢事，就是要把好幾年的指標在一年內達到，像糧食的指標一萬零五百億斤，恐怕要到1964年才能達到。

對如何完成任務：毛澤東提出的指導思想是：

> 過去安徘是重、輕、農，這個次序要反一下，現在是否提農、輕、重？要把農、輕、重的關係研究一下。過去搞過十大關

係，就是兩條腿走路，多快好省也是兩條腿，現在可以說是沒有執行，或者說是沒有很好地執行。過去是重、輕、農、商、交，現在強調把農業搞好，次序改為農、輕、重、交、商。這樣提還是優先發展生產資料，並不違反馬克思主義。……重工業要為輕工業、農業服務。過去陳雲同志提過：先市場，後基建，先安排好市場，再安排基建。有同志不贊成。現在看來，陳雲同志的意見是對的。要把衣、食、住、用、行五個字安徘好，這是六億五千萬人民安定不安定的問題。安排好了之後，就不會造反了。怎麼才會不造反？就是要使他們過得舒服，少說閒話，不罵我們。這樣有利於建設，同時國家也可以多積累。

毛澤東最後強調，全黨要統一思想。他說：

團結問題。要統一思想，對去年的估計是：有偉大成績，有不少問題，前途是光明的。缺點只是一、二、三個指頭的問題。許多問題是要經過較長的時間才看得出來的。過去一段時間的積極性中帶有一定的盲目性。這樣看問題，就能鼓起積極性來。[9]

毛澤東這一席話核心，就是：「成績偉大，問題不少，前途光明」這三句話。這就是說，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這三條必須肯定，不能動搖；問題雖然不少，但也只是一、二、三個指頭而已（當然，較之原來的「九個指頭與一個指頭」說有了一點前進）；現在的問題是要統一思想，鼓起勁來，繼續躍進。這就是毛召開廬山會議的意圖，也是他對形勢估計的底限。

3.各路「諸侯」的不同見解

會議開始，各小組討論毛澤東出的十八個題目，比較集中的是談形勢。由於在大躍進中所處的角色不同，對形勢的看法也就相距很遠。當年親身參加會議的李銳在他所著的《廬山會議實錄》中說：六個大區小組會的討論，大體上西北、東北和華北三組，較能敞開談，成績大講，缺點也隨便講；但中南、西南和華東三組則有所不同，缺點多講了一點，就會有人不高興，甚至打斷發言，護短的人還是比較多。[10]中南組幾位省委書記對形勢的基本看法是：

廣東省委第一書記陶鑄感嘆1958年的大躍進是：「九年慘澹經營，真是毀於一旦。」但他又認為：不能光看這一年、半年中發生的問題，要看三五年，看長遠些，看積極方面。廣東有了年產五百萬噸煤，五萬噸鋼的能力，也有了水壓機。去年苦戰一年，不後悔，兵無苦戰不行。不要光看消極東西，不要有埋怨情緒。去掉盲目性，主要是沒經驗。現在，落實指標已差不多了，仍要鼓起幹勁。人們對總路線是有懷疑的、定要堅信，不能動搖。

廣西壯族自治區第一書記劉建勳，回避了要害問題。泛泛地說甚麼

感覺有壓力。去年許多措施、作風，使幹群間有隔閡。缺點那麼多，講了就完了。再不搞甚麼八百斤、千斤省之類虛名了。

河南省是1958年冒尖的省份，吳芝圃發言，承認河南共產風颳得厲害，虛報浮誇也最厲害，影響全國，特表示向各省道歉。然後，話鋒一轉說：基層幹部嚴重違法亂紀者三千六百人，堅決清洗。農民的工具、樹木、房子等，都算了細賬，退賠了。由於得到群眾諒解，已有95%幹部連選連任。春節時有幾萬人浮腫。由於糧食大調動，比歷年春荒吃得好。人均一斤糧，鞏固食堂，勉強支撐下來。糧食基本供給制。食堂改革炊具，用磨面機。開辯論會後，現在食堂一個未散，如90%可以鞏固下來。多種經營好的，全省有10%發工資，從六七元到一元不等。5%自留地，一半在食堂，一半在私人。農業大膽試驗，創造了一些經驗。最大變化在水利。去年六百萬人上山搞鐵，從小土群到小洋群到洋鐵廠，算是有了工業。每縣有了個機械廠，可造鍋駝機。每個公社有個小修配廠，車牀多了。鐵今年可完成六七十萬噸，鋼五萬噸，就是品質難保證。總路線完全正確。「大躍進」是事實，只是步子大了，要退回來。錯誤已作適當檢討，怨氣還不是太大。……河南今後方針：一切為鞏固公社、食堂、豐收和「大躍進」。吳的發言，不只認為問題都已解決，而且對繼續「大躍進」充滿信心。

1958年同樣積極的王任重，較之吳芝圃頭腦相對要冷靜一些。發言談了湖北許多實際情況，心情表現沉重。他對1958年的看法是：成功與失敗都尖銳，取得的寶貴經驗，從經濟與政治兩方面說，都有長遠意義。教訓確實沉痛，比1954年大水災情更困難。今春五百萬人幾兩糧，吃稀飯，教訓才深刻。1954年沒吃過十二兩（注：指十六兩為一斤）以下。已死一千五百人，十五萬人浮腫病。早稻下來才能好轉。這是全黨全民教訓，很難過。……去年錯誤對經濟生活造成很大影響，決不可小視，有的要一兩年才能好轉。……總之，1958年有豐富經驗，也有深刻教訓，要作充分估計，不要怕錯誤說多了，影響積極性。講清楚，出點冷空氣，說右傾，我也不怕。王最後說：黨內有互相埋怨情緒，不利於團結。

在「大躍進」中相對冷靜的周小舟說：不可估計太樂觀。去年底，湖南號稱糧食翻了一番，達到四百五十億斤，估計只有三百三十億斤（後來落實到二百四十五億斤，只增產8%）。生鐵七十六萬噸，實際六十萬噸。……鋼指標定為一千零七十萬噸的決心是好的，但安排八百萬噸就好了。公社問題，當時似乎是因為農業、工業形勢所迫而建立公社，但太快、太大，幾股風一颳，愈包愈多（譚震林插話：「根本是把老規律打破了，不也過來了。」）現在條件下，農業、工業到底能按甚麼速度發展？農業不能30%，每年10%至20%還有可能。過去農業提出要趕日本，可見頭腦發熱程度。食堂問題，湖南的反對派有六條理由：

一、根本不節約；二、不利於養豬；三、破壞林業；四、不能積肥；五、不節約勞力；六、吃得不愉快……現在普遍人心思定。但轉彎也不宜太急，得慢慢轉。

以上的發言，儘管王任重、周小舟對問題看得比較重些，但誰也沒有觸到問題的痛處。

根據最初的會議安徘，準備通過一個由胡喬木、楊尚昆、陳伯達、吳冷西、田家英等起草的《廬山會議諸問題議定記錄》。在討論《議定記錄》草稿的小組會上，對形勢估計的分歧進一步暴露了出來。相當多的人認為：對「大躍進」取得的偉大成績和豐富經驗表達得不夠充分有力。或者認為對成績講得不夠，會對當前形勢有不利影響。或者說，成績寫得很抽象，缺點寫得很具體，這樣傳下去要洩氣的，今年計劃就會完不成。安徽省委第一書記曾希聖以安徽小高爐煉鐵為例，證明大辦鋼鐵的正確。他說：安徽小高爐一噸鐵的成本比武鋼成本的便宜九十多元，品質規格也可以用於建水庫。武鋼要八年才能做到年產三百八十萬噸，安徽今年就可出鐵一百四十萬噸，所以最大好處是爭取了時間。他認為安徽最大缺點是颳了共產風。下面幹部對於缺點的看法，「好比玻璃上滴了一點墨水，一擦就掉了」。「至於去年工農業比例失調，我不承認。工業、農業不都是增產很多嗎？工業內部的比例是有些失調，但是我的看法很樂觀，不經過這樣的大演習，我們受不到這樣的教育。」[11]

針對有人主張缺點要講透，認為會上有不願聽缺點的情況，使人感到有壓力等意見，不少人認為，形勢是完全可以好轉的，現在浙江、河南、河北都有好轉，有些地方群眾幹勁更踏實了。對緊張要分析是甚麼性質的緊張，究竟緊張到其麼程度。工業方面，無非是原材料緊張，經過調整平衡，加上增產節約，也是能夠解決的。對缺點不是不講，不在講多少，是要弄清它的性質。我們的缺點或錯誤不是方針路線性的，是在執行正確方針路線中產生的。會議不存在有怕說缺點的空氣，等等。[12]可見，對形勢的估計直接涉及到問題的性質，這是一根最最敏感的神經。

[1] 李家驥回憶，楊慶旺整理：《我做毛澤東衛士十三年》（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頁305。

[2] 《長沙府志》記載：古時这裏有韶氏三女，居山學道，有鳳凰銜天書至，女皆仙去。山上有鳳音亭，其南有東台、桃花洞仙跡可覓，这裏群山繞環，松柏蔥蘢，風景秀麗

[3] 毛澤東在韶山活動的資料，引自李家驥回憶，楊慶旺整理：《我做毛澤東衛士十三年》，頁305-306、310、324、332-336。

[4] 楊尚昆：《楊尚昆日記》，上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頁401。

[5]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逄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頁951。

[6] 《毛澤東傳（1949-1976）》，頁957-958。但據《楊尚昆日記》，上冊，頁404記載：6月29日晚間與漢口通電話，常委各同志已到漢，今日舉行了會議，主席對此次會議討論專案，提出了十四個問題，究竟是《毛澤東傳（1949-1976）》寫的協作區主任會議，還是楊尚昆說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有待進一步弄清。

[7] 李銳對《登廬山》原詩有如下解釋：小舟與我們同船來山，《到韶山》、《登廬山》兩

首詩，一上山毛澤東就寫給小舟和喬木二人，附信徵求意見。我與小舟同在中南組，這時他就興致勃勃地將原件給我看，並將兩首詩抄在我的記錄本後面。詩中詞句，同後來發表的有些出入。《登廬山》還有小序：1959年6月29日登廬山，望鄱陽湖、揚子江，千巒競秀，萬壑爭流，紅日方升，成詩八句。《登廬山》最佳兩句同後來發表的不同：「陶潛不受元嘉祿，只為當年不向前。」李銳：《廬山會議實錄》（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頁16。

[8] 到會的有劉少奇、周恩來、朱德、李先念、李富春、彭德懷、譚震林、柯慶施、李井泉、張德生、林鐵、歐陽欽、陶鑄、王任重、楊尚昆

[9] 毛澤東：（廬山會議討論的十八個問題）（1959年6月29日、7月2日），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文集》，第八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頁75-82。

[10] 李銳：《廬山會議實錄》，頁86。

[11] 李銳，《廬山會議實錄》，頁76-77。

[12] 李銳：《廬山會議實錄》，頁83-84。

二、彭德懷上書毛澤東

1.被毛澤東批發的「意見書」

1959年4月上海會議後，彭德懷於5月出訪東歐各國，6月中旬返回北京。第二天到國防部辦公樓，聽了軍委秘書長黃克誠關於國內情況的說明。山東荷澤地區的糧荒情況，已稍有緩和。但原說有餘糧的甘肅省，現已成了嚴重的缺糧省，運輸力缺乏，運糧進去也不容易。並說軍隊凡能抽出的運輸力已全部抽去了。彭要黃還是想辦法抽出一點運輸力來幫助地方。對中央即將在廬山召開的會議，彭對黃說，我現在很疲勞，想休息一下。廬山會議請你參加，因你是書記處書記，地方和軍隊情況都比較熟悉。[1]黃克誠說：「中央通知你去，沒通知我，我怎能替你去呢？我又問他：你是不是受了批評，心裏不舒服。彭說：也不是不服氣，就是感情上覺得彆扭。」[2]聽了黃克誠的勸說，彭德懷決定去廬山開會。

與彭德懷同行的有：賀龍、李富春、習仲勳、陸定一、康生、張聞天，賈拓夫等。這一行從北京出發，乘一組專列先到武漢，然後換乘江輪到九江，7月1日早晨由九江登岸乘汽車上山。彭德懷按慣例也同往常一樣參加西北組討論。從7月3日到10日的八天中，彭德懷先後作了七次發言和插話。講了一些別人所不敢說的話，贊同的人為他捏一把汗．也引起不同意見人的極大不快。彭說：

「解放以來，一連串的勝利，造成群眾的頭腦發熱，因而向毛主席反映情況只講可能和有利的因素。在大勝利中，容易看不見、聽不進反面的東西。」

「我們黨內總是『左』的難以糾正，右的比較好糾正；『左』的一來，壓倒一切，許多人不敢講話。」

「人民公社我認為是辦早了一些，高級社的優越性剛發揮，還沒有充分發揮就公社化，而且沒有經過試驗。如果試驗上一年半年再搞，就好了。」

「要找經驗教訓，不要埋怨，不要追究責任。人人有責，人人有一份，包括毛澤東同志在內。我也有一份，至少當時沒有反對。」

「現在是不管黨委集體領導的決定，而是個人決定；第一書記決定的算，第二書記決定的就不算。不建立集體威信，只建立個人威信，是很不正常的，是危險的。」

「成績是偉大的，缺點是一個短時閑（9月至11月）發生的，而影響不只三個月。換來的經驗教訓是寶貴的，要把（認識）問題搞一致，

就團結了。」

「毛主席家鄉的那個公社，去年搞的增產數，實際沒有那麼多嘛。我去了解了，實際只增產了百分之十三。我又問了周小舟，他說那個公社增產只有百分之十四，國家還給了不少貸款和幫助。」

「毛主席和黨中央在全中國人民心目中威信之高，是全世界找不到的。但濫用這種威信是不行的，去年亂傳毛主席的意見，問題不少。」

「過日子，國家也要注意。風景區，人工湖可以慢點，浪費很大。好多省都給主席修別墅，這總不是毛主席讓搞的。」

「甚麼『算帳派』，『觀潮派』，……帽子都有了，對於廣開言路有影響。有些人不說真話，摸領導人的心理。」[3]

由於小組討論中出現了一些相當不同甚至對立的意見，毛澤東於10日晚召集各小組組長開會講了一番他的意見。毛說：會議初步安排到15日，延長不延長到時再定。他強調：對形勢的看法如不能一致，就不能團結；要黨內團結，首先要把問題搞清楚。要思想統一。他說：去年北戴河會議的時候，人心高漲，但埋伏了一部分被動。不論誰批評，都要承認當時有一部分缺點錯誤。但毛認為：從一個局部、一個問題來講，可能是一個指頭或七個、九個指頭的問題；但從全域來講，是一個指頭與九個指頭，或三個指頭與七個指頭，最多是三個指頭的問題。成績還是主要的，沒有甚麼了不起。要找事情，可以找幾千幾百件不對頭的：但從總的形勢來說，還是九個指頭和一個指頭。並且，經過兩次鄭州會議、武昌會議、上海會議到這次廬山會議，問題已逐步得到解決。這樣的形勢分析，是關係全黨、全民的問題。有無信心，也是這次會議的重要問題。[4]

彭德懷覺得毛澤東的樂觀情緒，與當前全國城鄉現實的嚴峻形勢相距甚遠。如果會議就此匆匆結束，實際上就沒有解決甚麼問題。於是，他決心面見毛澤東當面談談自己對形勢的看法，由毛澤東出面繼續糾「左」。7月12日上午，彭德懷前往毛澤東的住地「美廬」，但警衛人員告訴彭說：「主席昨晚一夜未睡，剛剛躺下。」彭德懷只好悵然而歸。

此前，彭曾對人談過他的一些考慮：他認為劉少奇、周恩來、陳雲、鄧小平對當前黨在指導思想上的「左」都有覺察和擔心。但劉少奇不便講；周恩來剛被批了「反冒進」不能講；陳雲、鄧小平在山下沒有機會講；只有他來談比較適當。「如果有意見不講出來，那我們黨還有甚麼戰鬥力！」[5]

因此，在訪毛未遇以後，彭德懷決心給毛澤東寫信，向他傾訴自己的意見，希望毛能把會議引向深入。從7月13日中午到14日下午，經過兩次修改，經參謀謄抄後，彭德懷鄭重地簽上自己的名字，於14日下午5時半左右，着參謀王承光將信送給毛澤東的秘書高智。

彭德懷在後來被審查期間，談及寫這封信的動機時說道：

> 在當時（指1958年——引者注），某些地區嚴重地颳起了幾股黑風——共產風、浮誇風、強迫命令風。……這些風氣，在1958年12月我至烏石、平江等地時，給我的印象尤為深刻，因為有不少農民到我處申訴、告狀。由於這些黑風在某些地區颳起，直接影響了我黨基層組織在那些地區群眾中的威信，使中央領導同志在那些地區的威信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損失，更嚴重的是影響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我把這些問題概括為浮誇風、「小實產階級狂熱性」、強迫命令等。這些問題，在廬山會議初期，到會同志並沒有傾心呈腹地讓出來，鑑於以上情況，此促使我給主席寫信的念頭。[6]

但這拳拳之心，卻惹來一場莫名大災。導致廬山會議出現一場重大政治風暴的這封信，其主要內容分為兩個部分：一是對形勢的估計；二是主要經驗教訓。

關於形勢，彭指出：

「1958年大躍進的成績是肯定無疑的。」「這樣的增長速度，是世界各國未有過的。突破了社會主義建設速度的成規。」「基本上證實了多快好省的總路線是正確的。」

「1958年的基本建設，現在看來有些專案是過急過多了一些……這是一個缺點。」「基本原因是缺乏經驗」，「認識過遲」。「因此，1959就不僅沒有把步伐放慢一點，加以適當控制，而且繼續大躍進，這就使不平衡現象沒有得到及時調整，增加了新的暫時困難。」「國家計委雖有安排，但因各種原因難予決斷。」

「1958年農村公社化，是具有偉大意義的。」「雖然在所有制問題上，曾有一段混亂，具體工作中出現了一些缺點錯誤，……但是經過武昌、鄭州、上海等一系列會議，基本已經得到糾正。」

「在全民煉鋼鐵中，多辦了一些小土高爐，浪費了一些資源（物力、財力）和人力。」「雖然付出了一筆學費（補貼二十餘億），即在這一方面也是有失有得的。」

關於經驗教訓，彭強調了；

「正確的認識『積極平衡』的意義。」「現時我們在建設工作中所面臨的突出矛盾，是由於比例失調而引起各方面的緊張。就其性質看，這種情況的發展已影響到工農之間、城鄉之間和農民各階層之間的關係，因此也是具有政治性的。是關係到我們今後動員廣大群眾繼續實現躍進的關鍵所在。」

「我們在處理經濟建設中的問題時，總還沒有像處理炮擊金門、平定西藏叛亂等政治問題那樣得心應手。」

「過去一個時期，在我們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風方面，也暴露出不少值得注意的問題。這主要是：(1）浮誇風氣普遍地滋畏起來。……吹

遍各地區各部門，一些不可置信的奇跡也見之於報刊，確使黨的威信蒙受重大損失。」「（2）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使我們容易犯『左』的錯誤。在1958年的大躍進中，我和其它不少同志一樣，為大躍進的成績和群眾運動的熱情所迷惑，一些『左」的傾向有了相當程度的發展，總想一步跨進共產主義，搶先思想一度占了上風；把黨長期以來所形成的群眾路線和實事求是作風置諸腦後了。」「政治掛帥不可能代替經濟法則，更不能代替經濟工作中的具體措施。……糾正這些『左』的現象，一般要比反掉右傾保守思想還要困難些，這是我們黨的歷史經驗所證明了的。』[7]

上述內容，與彭在小組會上的發言相比，講缺點、錯誤既沒有直接提到毛澤東的名字，語氣也相對緩和很多。不只對大躍進的成績作了明確「肯定」，指出「總路線是正確的」；而且說了自武昌會議以來問題也基本得到「糾正」。顯然是經過反復斟酌，以免引起毛澤東的誤解。但是，說大煉鋼鐵是「有失有得」；因比例失調引起各方面的緊張，其性質「是具有政治性的」；處理經濟建設，沒有處理「政治問題那樣得心應手」；「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使我們容易犯『左』的錯誤」等語，仍然是非常搶眼的。

2.與會者的最初反應

正當彭德懷靜候毛澤東回音的時候，毛澤東於7月16日在彭德懷信上加上「彭德懷同志意見書」的題名，批示：「印發各同志參考。」[8]同日，毛澤東寫信給劉少奇、周恩來、楊尚昆，建議將原來各大區小組重新編組，以便廣博見聞。另一封信是要劉少奇等通知在北京的彭真、陳毅、黃克誠、安子文等上廬山開會，并徵詢在大連休養的陳雲的意見，「能來則來，不能來則不來」[9]

從7月17日起，按重新編組的小組開會，討論的內容逐漸由〈廬山會議諸問題議定記錄〉轉向了彭德懷的信。發言者對信的意見，主要集中在信的第二部分：關於「大躍進」，全民煉鋼，人民公社化等缺點、錯誤的評價，是甚麼性質的錯誤，如何看待1958年的經驗教訓問題。

黃克誠7月17日上山，19日在小組會上發言，「比較全面地闡述了自己的觀點，支持了彭德懷的意見」。對上山後頭兩天的情況，黃在回憶中說：

> 我記得是7月17日到達廬山。上山彼剛進住房，彭德懷就拿着他寫給毛主席的信給我看；我仔仔細細看了一遍，說：這封信提的意見我贊成，但信的寫法不好，語言中有些提法有刺激性，你那樣幹甚麼？他說：實際情況那麼嚴重，會上沒有人敢說尖銳的話，我就是要提得引起重視。我說：你總是感情用事，你和主

席共事多年，應該互相瞭解較深，這些話何不與主席當面交談，何必寫信。

當天晚上或第二天早晨，周小舟、周惠、李鋭三人到我住處看我。談起來，他們意見一致，都認為：不改變「左」的方針不行，而且感到會議有壓力，不能暢所次言。我因剛來，不瞭解情況，就説：不要急，先看一看。隨後我又和李先念談了談，先念也認為當時的做法太過了，一定要改變才行。

接看，我又和譚震林談，他是激進派，意見就完全相反了，而且他還問我；你為甚麼先去看先念，不先來找我，你受先念影響了。我説：我和先念有些看法相同，不能説是受他影響。我就闡述了自己的意見，因而和譚震林吵起來。……譚發火説：你是不是吃了狗肉，發熱了，這樣來勁！你要知道，我們找你上山，是搬救兵，想你支持表們的。我説：那你就想錯了，我不是救兵，是反兵。這「反兵」二字，是針對譚震林説的「搬救兵」而言，説明我和他意見相反，後來卻被人引為我「蓄意反黨」的證明。[10]

周小舟在小組討論中談到彭的信説：「彭總給主席的信，我認為總的精神是好的，我是同意的，至於某些提法、分寸、詞句，我認為是可以斟酌的。」[11]

趙鷟陸（一機部部長）説，對彭總的信感到同情，彭總的精神值得學習。建議書值得斟酌的是有個別問題的提法（如説缺點的性質是具有政治性的），分析不夠，容易引起誤會。[12]

陶魯茄（山西省委第一書記）説：我們目前需要彭總這樣的精神，信中的某些詞句容易引起誤會，可以不必爭論，主要應看精神。……缺點的性質問題，從理論上講，如有缺點錯誤，必然非「右」即「左」；大躍進中主要的傾向，肯定不能説右，當然就是「左」。彭總並未説黨的路線「左」了，只説缺點的性質屬於「左」的範疇，這是對的。問題是處理的方法，目前可以不公開提出反「左」，以免挫傷群眾的積極性。但將來一定時間，把執行總路線中的右和「左」的經驗教訓總結出來，還是必要的。[13]

賈拓夫（國家計委副主任）説：彭的意見書總的是好的，總的精神是同意的，這會推動大會的討論。上山時，自己腦子裝了很多問題，在西北組討論時，感到缺點講得不夠，應該在肯定成績下把一個指頭的問題講深講透，從而得到教訓。這些問題搞不清楚對今後的躍進是不利的。[14]

廖魯言（農業部長）説：「我認為彭總的精神、態度是很好的，把問題直截了當提出了，引起大家討綸，這已經起了很好的積極作用。這種精神，我們應該學習。至於信中的內容，有些問題的估計：例如『基本證實總路線是正確的』、『浮誇風吹遍了各地區各部門』、『小資產

階級狂熱性』等，不能同意。」

劉瀾彼（水利電力部部長）也說：「關於彭德懷同志給主席的信，有意見就說的精神是好的，主席講過多次，要大家有話就說，應當提倡這種精神。」

萬毅（第二機械工業部副部長兼總參裝備部部長）等人發言，也基本同意信中的內容和精神。

在小組會上，發表不同意彭德懷意見的如：

陳正人（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副部長、國務院農林辦公室副主任）認為，大部分地區的櫃食並不緊張，只有小部分地區緊張，市場情況也是如此。因此，不同意彭信中「由於比例失調而引起各方面的緊張」的說法。

賀龍認為，我們的缺點還不到一個指頭。「因此，我對彭總給主席的信，覺得在總的估計上是不恰當的，是把問題說得過於嚴重。」賀龍接着說：「我記起彭總在火車上曾說過：『如果不是中國工人農民好，可能要請紅軍來。』這當然把問題說得更走火了。」

張仲良（甘肅省委第一書記）不點名地批評了彭信中的觀點。他列舉了甘肅省1958年的糧食和大煉鋼鐵的數字說：這些成績說明「得不償失」的觀點是錯誤的，「有失有得」的看法也是不對的。「大躍進」的成績和缺點不能等量齊觀。

陶鑄說：「彭總的信的問題，不在於個別措詞的不當，而在於總的看法有問題。講成績與缺點也是九個指頭與一個指頭的關係，但從通篇精神看，對缺點的看法決不止一個指頭。這封信裏把去年工作中的一些缺點、錯誤，看成好像把整個階級關係搞翻了似的，看成為小資產階級狂熱性的表現，看成為去年一度出現的『左』的偏差，比反掉右傾保守還要困難些，是不正確的。」「這實際上會引導到懷疑黨的總路線的正確性，懷疑去年大躍進和偉大的群眾運動以及所取得的偉大勝利是否可靠。從我黨的歷史上看，如果真正是由於『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所產生的『左』的錯誤，那確實是難以糾正的。……因此目前黨的主要任務是反『左』。這樣就會把事情搞壞。雖然大家憂國憂民來提出問題，結果一定會適得其反。」

王任重說：在經濟建設中，究竟是「左」的危險是主要的，還是右的危險是主要的？從每項看來，主要的障礙可能還是右傾保守。他表示不能同意在經濟建設中糾正「左」的現象一般要比反掉右傾保守思想還要困難些的說法。他還說；「得不償失」的說法必須批判。

3.明知不可為而為的張聞天

就在各組討論對彭德懷的信，已經出現很多非難，甚至有說信的矛

頭是「針對著毛主席的」種種嚇人說法，會議氣氛明顯緊張的時候，張聞天準備在會上發言。在7月21日之前，田家英曾給張來過一個電話，向他「通風」，要他如果發言的話，「大煉鋼鐵」的問題別講了，因為「上面」有不同看法。21日上午，胡喬木也曾打電話給張，勸他少講一些。[15]張聞天也深知毛澤東「整人」的厲害。[16]但是，出於公心的他，毫無顧忌，7月21日下午在柯慶施任組長的第二組，作了長達三個小時的發言。講了十三個問題：（1）大躍進的成績，（2）缺點，（3）缺點的後果，（4）對缺點的估計，（5）產生缺點的原因，（6）主觀主義和片面性，（7）政治和經濟，（8）三種所有制的關係，（9）民主和集中，（10）缺點講透很必要，（11）光明前途問題，（12）關於彭德懷同志的意見書，(13）成績和缺點的關係。較之其它人的發言，張的針對性更強，言詞也更為尖銳。可真是「哪壺不開提哪壺」。

本來田家英、胡喬木已打了招呼，「『大煉鋼鐵』的問題別講了」。而張卻特別指出：

> 「全民練鋼」的口號本身是不妥當的。去年幹甚麼事情都提「全民」，甚至要求「全民寫詩」，搞得老百姓不勝其煩，所有的事情都搞「全民」，相互間勢必發生衝突，有些事勢必被擠掉。在煉鋼這件事情上，只能是鋼鐵工人再加上一部分人。全民煉鋼的方法也有問題。不經過事先調查資源，不知這有沒有鐵礦，條件還不那麼清楚，就搞幾千萬人盲目上山。……

張說，由於指標過高、求成過急，引起比例失調，就造成了很大損失。如：基建戰線太長；新增工人太多；許多企業產品不成套；許多企業原材料缺乏，經常停工待料；產品品質下降，技術水準下降。以上這些問題，反映到市場上，就是供應緊張。不僅個人消費品的供應緊張，而且生產資料的供應，即生產部門內部的工業與農業之間、各工業部門之間的供應關係也緊張。因為比例失調了，不失調，哪有那麼緊張？糧食緊張，只剩了這一點後備。食油緊張，城市供應定量降低，農村根本不供應，肉緊張，上海的供應量減少到每人每月六兩。物資缺乏，人民手中拿了貨幣買不到東西，物價有些上漲，甚至有黑市。人民對這些情況是不滿意的，當然沒有到憤怒、仇恨的地步。但是不舒服，閒話不少，他們不是同解放以前比，而是同1958年以前比，覺得今天不如那時。這就是說，市場供應問題，反映了人們之間的關係問題。

問題反映到財政金融上，是結餘用完；還有，國家的物資後備減少了、外貿也很緊張。經濟生活中這些方面的問題，應該同整個比例失調問題聯繫起來考察，不能誇大，但是要重視。

對「產生缺點的原因」：張認為，總結經驗時，不能滿足於說缺乏經驗，而應該從思想觀點、方法、作風上去探討。他說：

對於主觀和客親、精神和物質關係的瞭解有片面性。有一個時期．把主觀能動性強調到荒謬的程度。幹勁雖大，但是強調得過了分，還反對講條件，這就造成了主觀主義。這是違反馬列主義哲學的基本原理的。有良好的願望是好的，但是還要考慮實際可能。好大喜功也是好的，但要合乎實際，否則就會弄巧成拙，欲速不達，好事變壞事。……

按照馬列主義學説，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因此，領導經濟要政治掛帥，這是對的。但是光政治掛帥還不行，還要根據客觀經濟規律辦事。……有的人根本看不起經濟規律，認為只要政治掛帥就行。有的人公然違反客觀經濟統律，説是不用算經濟賬，只要算政治賬。這是不行的。我們的經濟活動，總是受經濟規律約束的。所以我們一定要按經濟規律辦事，不能光憑主觀願望，光憑政治上的要求。單靠提幾句政治口號，那是空的。今天總結經驗，應該著重從經濟規律上進行探討。……

「平衡是相對的，不平衡是絕對的。」這是法則，當然是對的。但是在經濟建設中正是要找出相對平衡，利用相對平衡，按照相對平衡辦事。

如果説，上面這些觀點，己經對毛澤東1958年提出的政治掛帥，群眾運動一套進行了批評，那更為尖鋭的是關於黨內民主的言論，直接指向了毛澤東本人。張聞天説：

主席常説，要敢於提不同意見，要捨得一身剮，不怕殺頭，等等，這是對的。但是光要求不怕殺頭還不行。人總是怕殺頭的，被國民黨殺頭不要緊，被共產黨殺頭還要遺臭萬年。所以，問題的另一面是要領導上造成一種空氣、環境，使得下面敢於發表不同意見，形成生動活潑、能夠自由交換意見的局面。……

這個問題對我們當權的政黨特別重要。我們不要怕沒有人歌功頌德。講共產黨英明、偉大，講我們的成績，因為這些是客觀存在的事實。怕的是人家不敢向我們提不同意見。決不能因為人家講幾句不同意見，就給扣上種種帽子。是否提錯了意見，就一定是觀潮派、機會主義、右派呢？這也不一定。……

總之，民主風氣很重要。要造成一種生龍活虎、心情舒暢的局面，才會有戰鬥力。過去一個時期就不是這樣，幾句話講的不對，就被扣上帽子，當成懷疑派、觀潮派，還被拔白旗，有些虛誇的反而受獎勵，被樹為紅旗。為甚麼這樣呢？為甚麼不能聽聽反面意見呢？刀把子、槍杆子，都在我們手裏，怕甚麼呢？真正堅持實事求是、堅持群眾路線的人一定能夠聽，也一定會聽的。聽反面意見，是堅持群眾路線，堅持實事求是的一個重要條件，毛主席關於群眾路線、實事求是的講話，我認為是講起來容易做起來難，真正要培養這種風氣不容易。

最後，張聞天對彭德懷的信作了表態。他説：

這份意見書提出了一些問題，中心內容是希望總結經驗，本意是很好的。但是從各方面的反應看，不少同志似乎對彭德懷同志這個出發點研究不多，只注意了他這封信中的一些具體說法。其實，他的信是好的，是肯定了成績的。他説，成績是基本的，這同大家說的一樣。至於個別説法，説得多一點少一點，關係就不大。

……

彭德懷同志説：「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使我們容易犯『左』的錯俱。」這個問題不說可能更好一點，說了也可以。究竟怎樣，可以考慮。但是，颳「共產風」恐怕也是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

至於説，「把黨長期以來所形成的群眾路線和實事求是作風置諸腦後了」，我認為，如果講的是一個時期的事，這樣講問題並不大。[17]

張聞天的發言，無疑是繼彭德懷的信之後，在廬山又爆了一顆重磅炸彈。

[1] 彭德懷：《彭德懷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頁267。

[2] 黃克誠：《黃克誠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頁248。

[3] 廬山會議文件：〈彭德懷在小組會議發言摘錄〉，載《彭德懷傳〉編寫組：《彭德懷傳》（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3），頁588-589，590。

[4] 李鋭：《廬山會議實錄》，頁54-60。

[5] 《彭德懷傳》，頁601-602。

[6] 彭德懷：《彭德懷自述》，頁274-602。

[7] 彭德懷：《彭德懷自述》，頁281-287。

[8] 毛澤東：〈印發《彭德懷同志的意見書》的批語〉，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八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頁358。

[9] 毛澤東：〈關於改變廬山會議人員分組辦法的建議〉、〈關於請彭真等來廬山參加會議給劉少奇等的信〉，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八冊，頁355、356。《鄧子恢傳》記載：廬山會議前不久，「鄧子恢又感身體不適，經衛生部組會診，他肝硬化有加重，糖尿病有發展，又只得去休養。」「在大連休養地，鄧子恢接到參加廬山會議的通知。這時，陳雲也在大連。他拿着通知到陳雲那裏，問去不去參加會議？陳雲告訴了鄧子恢廬山會議的一些情況，勸他不要去。廬山會議矯複：鄧子恢同身邊工作人員談起這件事，説：幸虧陳雲同志，不然，後果不堪設想。」《鄧子恢傳》編輯委員會編：《鄧子恢傳》（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頁533。

[10] 黃克誠：《黃克誠自述》，頁249-250。

[11] 李鋭：《廬山會議實錄》，頁80。

[12] 李鋭：《廬山會議實錄》，頁106。

[13] 李鋭：《廬山會議實錄》，頁106。

[14] 李鋭：《廬山會議實錄》，頁106-107。

[15] 程中原：《張聞天傳》（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0），頁737。李鋭：《廬山會議實錄》頁122中説：「就在張聞天將要發言的早晨，得悉風聲已緊的胡喬木，打電話關照，要他少講些缺點，尤其不要涉及全民煉鋼和得不償失的問題。」

[16] 李鋭：《廬山會議實錄》，頁100，原文是：在廬山時，張聞天的住處同彭德懷很近，早晚散步常見面，交談中張對彭談到對毛澤東的看法：「很英明，但整人也很厲害，同史達林晚年差不多；從中國歷史學了不少好東西：但也學了些統治階級的權術。」

[17] 張聞天，〈在廬山會議上的發言〉（1959年7月21日），載《張聞天文集》，第四卷（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5），頁322-327、329、330、331、337-338、341-342。

三、彭黃張周被打成反黨集團

1.來自莫斯科的不和諧音

正當中共中央在廬山開會的期間，莫斯科發表了赫魯曉夫與中共不同的聲音。

對1958年中國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蘇聯的態度前後是有變化的。起初對「大躍進」是熱情支持的。新華社記者當年從莫斯科發回的報導說：

> 他們（指蘇聯為中國制造訂貨的工業企業）為支援中國的大躍進、及時供應機器設備，採取了許多措施。在為中國裝造設備的工廠和車間裏，常常可以看到「提前為人民中國完成訂貨」的鼓動標語。工廠行政和黨組織也把檢查運往中國的機器設備的生產情況作為檢查整個生產情況的一項內容。對於中國的一些重點建設，如包頭鋼鐵聯合企業、三門峽水利樞紐工程、豐滿水電站、北京熱電站等，蘇聯有關的企業也率備提前完成訂貨。[1]

1959年4月21日，李富春在全國人大二屆一次會議上的報告，談到在「一五」計劃中蘇聯援建的專案總數為166個，在1959年以前全部建成和部分建成投產的有113個。從1959年開始，除已簽定的協議項目外，根據1958年8月8日和1959年2月7日中蘇兩國政府先後簽訂的兩次協議，蘇聯還將幫助中國進行125個企業的建設。[2]蘇聯對人民公社，則持較為謹慎的態度，直到1958年底，蘇聯領導人對公社的不同看法，才由西方開始流傳出來，

1958年12月17日，美國《華盛頓郵報》（Washington Post）刊載的一篇文章，披露了美國議員漢弗萊（Hubert Humphrey）12月4日在克里姆林宮同赫魯曉夫的談話。漢弗萊就中國的公社問赫魯曉夫蘇聯是否打算追隨中國的榜樣時，赫說：不，公社制度今天對俄國是不適宜的。赫還說，無論如何這個詞是用錯了，不知道為甚麽中國人選用了這個詞，因為「公社」一詞起源於法國大革命時代，它是一種城市的而不是農村的管理形式。赫接着說，無論如何，中國的制度實際上是反動的。蘇聯很久以前就曾嘗試過公社制度，但是行不通，而現在蘇聯採取的是物質刺激的方法。[3]

1959年1月，米高揚（Anastas Mikoyan）訪問美國。《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發表索爾茲伯里（Harrison Salisbury）寫的特稿，題為「米高揚說，公社在蘇聯的實驗中失敗了」。其中寫道：米高揚在加利福尼亞大學說，蘇聯已放棄了建立最近在共產黨中國所建立的那種

純粹公社的工作，因為發現如果沒有一種刺激性的制度、這種公社是行不通的。他説，俄國人在1918年和1919年建立了這樣的公社，但不久就發現如果經濟不發達，公社是行不通的。他説，除非有一種生產力非常發達的經濟，否則要執行「各盡所能，按需分配」這個共產主義原則是不可能的。他承認這種局面要在相當遠的將來才會存在，如像在蘇聯革命剛剛成功之後那種貧困的經濟條件下，純粹的公社是行不通的。他説，馬克思、列寧及其它共產主義哲學家們曾經承認，在到達純粹的共產主義社會之前，物質刺激是必要的。[4]

在蘇聯報刊上公開報導蘇聯領導人對人民公社的看法，是1959年7月21日，《真理報》（*Pravda*）刊載赫魯曉夫7月18日在波蘭波茲南省的「波拉夫采」生產合作社群眾大會上的講話。赫説：

> 可以理解，把個體經濟改造為集體經濟，這是個複雜的過程。我們在這條道路上曾經碰到過不少困難。在國內戰爭一結束之後，我們當時開始建立的不是農業勞動組合，而是公社。曾有人下了大致是這樣的論斷：「既然我們為共產主義奮鬥，那就讓我們來建立公社。」看來，當時許多人還不大明白，甚麼是共產主義和如何建設共產主義。
>
> 公社建立了，雖然當時既不具備物質條件，也不具備政治條件——我是指農民群眾的覺悟。結果是大家都想生活過得好．而在公共事業上又想少花些勞動。正所謂：「盡可能幹，按需要拿。」許多這樣的公社都沒有甚麼成績。於是黨走了列寧所指出的道路。它開始把農民組織在合作社中，組織到農業勞動組合中，在那裏人們集體地工作，但是按勞取酬。我們集體農莊逐浙牢固起來了，現在是蓬勃發展的社會主義農業的基礎，是改善農民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的基礎。但是，並不是所有地方的農業改造都是從勞動組合開始的。我們也曾有過共耕組，它在某種程度上類似你們的農業小組。
>
> 同志們，我們在建設集體農莊方面曾有過許多困難，但是我們都順利地克服了，現在我們已走上了康莊大道。集體農莊已成為農民的親切的家。[5]

值得指出的是，赫魯曉夫在波蘭的這篇講話，波蘭報紙發表時，刪去了有關公社的這一段話，而《真理報》則全文發表，明顯是為了講給中國「兄弟」聽的。

2.毛澤東密切關注各方動態

對各小組討論的情況，毛澤東一直密切關注。他7月10日的第二次講話，已對黨內愈來愈多的不同意見，表現出不滿，並把這些不同意見同右派進攻聯繫起來。他説：

對形勢的認識不一致，就不能團結。要黨內團結，首先要思想統一。黨外右派否定一切，說我們「人心喪盡了」，「修天安門前面的工程，如秦始皇修萬里長城」；說「過去歷代開創的時候，減稅薄賦，現在共產黨年年加重負擔」。所謂喪盡了，就是不僅資產階級、地主，而且農民，工人都不贊成了。天津有些局長、科長議論，去年大躍進是「得不償失」。是不是這樣？有些同志缺乏全面分析，要幫助他們認識。得的是甚麼？失的是甚麼？比如說，為甚麼大躍進之後又發生市場大緊張。不要戴帽子，不要罵一頓了事。

毛承認現在有些被動，但不會因此垮臺。他說：

去年北戴河會議的時侯，人心高漲，但埋伏了一部分被動，不論誰批評，都要承認當時有一部分缺点錯誤。簡單來說，就是三千萬噸鋼，基本建設一千九百項，糧食增產一倍，辦公社中颳「共產風」。這四件事搞得很被動。對農業生產的確估計過高，並且據此安排生活，有浪費。工業基本建設是搞多了，金木水火土分散了，工業生產指標過高，缺乏綜合平衡。為了三千萬噸鋼，引起了各方的不滿。現在我們有些被動，但也不是完全被動，不會因此垮臺。我不相信公社會垮，可能垮一部分，以後再辦。食堂即使垮了三分之一，也是好事。食堂準備留它一半，也是好事。垮了和堅持下來，我都贊成，兩邊都支持。其實，公共食堂在公社化之前就有了。

毛再次強調成績和錯誤是：九個指頭和一個指頭。

我們把道理講清楚，把問題擺開，也不戴帽子，甚麼「觀潮派」、「懷疑派」、「算帳派」、「保守派」等等，都不戴。總可以有百分之七十的人在總路線下面。世界上的將軍沒有一個沒打過敗仗的。在三仗中打兩個勝仗、一個敗仗就是好的，有威信。兩敗一勝就差一些。打了敗仗，可以取得經驗。要承認缺點錯誤。從局部來講，從一個問題說，可能是十個指頭，九個指頭，七個指頭，或者三個指頭、兩個指頭。但從全域來說，還是九個指頭和一個指頭的問題。要找問題，可以找幾千幾萬件不對頭的。但是從總的形勢來說，就是這樣：九個指頭和一個指頭。[6]

這次講話，毛澤東已明確亮出了自己的底線，即缺點錯誤可以講，但還只是局部問題。就全域而言，還是九個指頭和一個指頭的問題。他警告人們，在對形勢的估計上，認識不一致，黨內就不能團結，這是關係到全黨、全民的問題。

7月19日，毛澤東將中共中央宣傳部1959年6月20日編印的《宣教動態》第四十五期上登載的〈否定和懷疑一九五八年大躍進的基幹論點〉一文批示印發與會人員研究。並將標題改為〈天津一些同志對一九五八年大躍進的看法〉。[7]這篇文章主要介紹了以下四點看法：（一）認為工業上全民煉鋼是得不償失，農業上糧食不夠吃，市場上出現了前

所未有的緊張，黨的威信不如過去高了。（二）工業躍進了，農業沒躍進，認為「工農業沒有並舉」，國家重視「重工業，輕視農業」。（三）政治躍進了，經濟上沒躍進。特別是對「以鋼為綱」的方針有看法，認為煉鋼算政治賬可以，算經濟賬就不行了，其害處是，第一影響了秋收；第二，影響了工業生產；第三，砸了水車、鍋，煉出鋼來不能用；第四，國家賠了二十三個億。「總之是勞民傷財，很不合算，給生產、生活帶來很大困難，弄得全面緊張。」（四）認為人民公社「走得太快了、帶來了副作用」。

同日，毛批示印發的還有，中國駐蘇聯大使館1959年7月2日給外交部並中共中央送來一個報告。其中說道；最近在蘇聯部分幹部中，特別是在與我國有工作關係的某些幹部中，相當普還地流傳著有關我國當前某些困難情況的說法，談論我們沒有公開過的某些具體數字。這些議論的基本特點是拋開問題的主要方面，對中國的成績避而不談，專講毛病，結論是中國黨犯了錯誤。但也有不少幹部聽了這些話後，表示懷疑或不同看法。針對情況，我們建議領導上考慮是否有必要對我們的實際情況，由中央、外交部向兄弟國家黨或駐華使館作統一的說明和解釋，以爭取主動。毛澤東將這個報告加上《蘇聯一些同志對我大躍進議論紛紛》的標題，[8]指示與會人員研究。

毛澤東把這兩份材料批示印發與會人員，顯然是要引起人們注意，現在國內外已颳起一股否定「大躍進」的風。就在這個時候，傳來了赫魯曉夫在波蘭發表的關於公社的講話。

7月21日，毛澤東又將國家計委商業計劃局1959年7月9日上報的《對一九五九年下半年市場形勢的估計和一九六〇年的展望》材料批示印發與會人員。毛批示說，「印發各同志。值得一看，並應研究。」[9]商業計劃局提供的材料內容是，（一）對下半年市場形勢的估計。在中央發出六一指示和召開大中城市副食品、手工業生產會議之後，市場全面緊張的狀況即逐步停止發展。壓縮機關、團體購買力已見效果，商品供應狀況開始好轉。（二）對1960年市場情況的初步估計。明年的市場情況決定於今年的農業生產，目前農業生產的全局是好的。因此明年糧食作物有可能避免出現類似今年上半年的過分緊張局面，但棉、麻等輕工原料供應估計仍比較緊張，副食品、手工業品的情況則會比今年大為好轉。在毛澤東看來，這份材料，無疑是駁斥懷疑、否定大躍進，把目前形勢說得一團漆黑的有力證據。7月16日，毛澤東批示印發彭德懷的信後，同王任重在廬山水庫划船時，談到彭德懷信中的「小資產階級狂熱性」問題時，毛說「現在我不發言」。[10]但據《毛澤東傳》所記毛澤東20日淩晨的談話，似乎當時還沒有下定批判彭德懷的決心。《毛傳》中說：

7月20日淩晨1時至3時半，楊尚昆向他（指毛澤東——引者

注）匯報各組討論的情況時，他講了四點意見：一、欠債是要還的，不能出了錯誤，一推了之。去年犯了錯誤，每個人都有責任，首先是我。二、缺點還沒有完全改正，現在腰杆子還不硬，這是事實。不要迴避這些事情，要實事求是。三、有些氣就是要泄，浮誇風、瞎指揮，貪多貪大這些氣就是要泄。四、準備和那些「左派」，就是那些不願意承認錯誤，也不願意聽別人講他錯誤的人談一談，讓他們多聽取各方面的意兄。[11]

毛在这裏所説的不願意聽別人講他錯誤的人，就是柯慶施等一批1958年的積極分子。他們在會上對當年的所作所為，興風作浪，迎合抬轎，不僅沒有絲毫內疚，認真檢討，反而觸動不得，一觸即跳，一味護短、護身。

然而，7月21日張聞天發言以後，形勢急轉直下。毛澤東于22日找柯慶施、李井泉等人談話。柯慶施説，現在很需要毛主席出來講話，頂住這股風，不然隊伍就散了。他認為，彭德懷的信是對着總路線，對着毛主席的。[12]《毛傳》斷言：如果説，彭德懷的信觸動了毛澤東，對改變毛澤東着力糾「左」的初衷起了主要作用，張聞天的發言更進一步影響了這個變化；那末，柯慶施等人對毛澤東的進言，則直接促使毛澤東下了「反右傾」的決心。[13]

李鋭在《廬山會議實錄》中，對會議形勢突變的原因也有分析。他説：

會議已經開了二十天了，都想快點下山。可是，會議形勢的變化，不在會場上，而在會外的活動。譬如：有天劉瀾波告訴我，柯慶施向他説，主席跟柯慶施談到對喬木的觀感，説喬木跟他一二十年，總還是一介書生。……我連忙將柯慶施的話告訴田家英。田家英跟我談到他們的估計：「左派」司令部由柯慶施、李井泉等掛帥。他們組織人攻擊〈議定記錄〉，攻擊彭德懷的信，也攻周惠。他們知道彭德懷同毛澤東之間有歷史上的宿怨，説這封信的矛頭就是針對毛澤東的。「小產階級狂熱性」，「個人決定」，「政治性問題」，「糾『左』比糾右難」，「不那麼得心應手」，這些話都是指著毛主席説的。説犯了路線錯誤，自己是不能改正的，還有傳言，彭德懷在拉隊伍；説書記處成員，一半對一半（有一半拉過去了），等等。彭德懷在西北小組説的，「華北座談會操了我四十天娘」，以及反對唱《東方紅》，反對喊「萬歲」的話，都傳出來了。同時，在小組會對彭德懷的信有看法而不表態的人，有的到毛澤東處談了自己的意見，或者反映現在會議一個勁在洩氣，指標愈低愈好，「大躍進」再搞不起來了。[14]

這些傳到毛澤東耳邊的話，對毛不能不是一種強烈的刺激。但李鋭也認為，張聞天的這個長篇尖鋭的發言，可能是促使毛作23日講話的「最後一服催化劑」。[15]

3.七月二十三日廬山風雲突變

李銳在《廬山會議實錄》中寫道：「7月23日早晨，通知大家開會，聽主席講話（據傳，其它常委也同大家一樣，是臨時得到通知的）。」[16]《毛傳》中說，22日晚上，「毛澤東與劉少奇、周恩來商量準備第二天開大會」。[17]筆者查《劉少奇年譜》、《周恩來年譜》，均無1959年7月22日到毛澤東處談話的記載。至少沒有第一手材料證明，毛澤東在講話前與劉少奇、周恩來商量過。

在廬山的大禮堂，人們靜聽毛澤東開講。他劈頭上來就講了一句氣話；「你們講了那麼多，允許我講點把鐘，可不可以？吃了三次安眠藥，睡不着。」然後說，會上發言反映出「兩種傾向」，一種是觸動不得，不讓人家講缺點；一種是感到有壓力，不能講缺點。然後話鋒一轉，說：

> 現在是黨內黨外都在颳風。右派講，秦始皇為甚麼倒臺？就是因為修長城。現在我們修天安門，搞得一蹋糊塗，要垮臺了。黨內這一部分意見我還沒有看完，集中表現在江西黨校的反應。各地都有。邵大個（江西省長邵式平）你不必著急，你們搞出這個材料，實在好，今天就印出來。所有右派言論都印出來了，龍雲、陳銘樞、羅隆基、章伯鈞為代表。江西黨校是黨內的代表，這些人不是右派，可以變就是了，是動搖分子。他們看得不完全，有火氣。做點工作可以轉變過來。有些人歷史上有問題，挨過批評。例如廣東軍區的材料，有那么一批人，對形勢也認為一蹋糊涂。這些話都是會外講的話。我們這一回是會內會外結合，可惜廬山太小，不能把他們都請來。像江西黨校的人，羅隆基、陳銘樞，都請來，房子太小嘛！
>
> 不論甚么話都要讓講，無非是講得一蹋糊涂。這很好。愈講得一蹋糊涂越好，愈要聽。「硬著頭皮頂住」，反右時發明了這個名詞。我同某些同志講過，要頂住，頂一個月，兩個月，半年，一年，三年五年，十年八年。有的同志說「持久戰」，我很贊成。……為甚么要讓人家講呢？其原因在神州不會陸沉，天不會塌下來。為甚么呢？因為我們做了一些好事，腰桿子硬。……我們多數派同志們腰桿子要硬起來。為甚么不硬？無非是一個時期豬肉少了，頭發卡子少了，又沒有肥皂，叫做比例有所失調，工農業商業交通都緊張。我看沒有甚么可緊張的。

如果說，上面這些話還是針對一般來說的，那么下面的話就明顯指向了彭德懷信中的觀點了。

> 說我們脫離了群眾，我看是暫時的，就是兩三個月，春節前后。群眾還是擁護我們的，現在群眾和我們結合得很好。小資產階級狂熱性有一點，不那么多。我同意同志們的意見：問題主要是公社運動。……河南人、河北人創造了真理，有了羅斯福說的

「免于貧困的自由」：就是太窮了，想早點搞共產主義。現在聽說這些地方搞了共產主義，那還不去看看。對這種熱情如何看法？總不能說全是小資產階級狂熱性吧。我看不能那樣說。有一點小資產階級狂熱性，的確是狂熱。無非是想多一點、快一點。……他們要辦公社，辦食堂，搞大協作，大規模耕作，非常積極。他們要搞，你能說這是小資產階級狂熱性？這不是小資產階級，是貧農，下中農、無產階級、半無產階級。隨大流的這也可以那也可以。不愿意的只30%。總之，加40%為70%，三億五千萬人在一個時期內有狂熱性，他們要搞。

接着，毛澤東說了自從1958年11月鄭州會議以來，各級干部對去年的錯誤已經作了多次檢查。「我們作過多次檢討，難道就沒有聽到？」然后申明：

我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人先犯我，我后犯人。這個原則，現在也不放棄。

毛澤東斷言，現在有人對總路線發生動搖。他說：「我勸另一部分同志，在這樣的緊急關頭，不要動搖。據我觀察，有一部分同志是動搖的。」毛說黨內對「大躍進」，總路線、人民公社的態度，有四種人。「所謂四種人是：完全正確；基本正確但是部分不正確；基本不正確但部分正確；完全不正確。有些人在關鍵時是動搖的，在歷史的大風大浪中不堅定。」

這叫甚么階級呢？資產階級還是小資產階級？我現在不講。南寧會議、成都會議、二次黨代大會講過，對於1956年、1957年的那種動搖，對動搖分子，我不贊成戴帽子。講成是思想方法問題。也不講小資產階級，也不講資產階級。如果現在要講有小資產階級狂熱性，反過來講，那時的反冒進，就是一種資產階級的甚么性？狂熱？資產階級它不狂熱，是冷冷清清凄凄慘慘切切的泄氣性、悲觀性了。我們那個時候不戴帽子，因為這些同志跟右派不同，右派不搞社會主義，那些同志是要搞社會主義，沒經驗，一點風吹草動，就以為冒了，於是反冒進。（講到這里，偏過頭對坐在旁邊的周恩來說）總理，你那次反冒進，這回站住腳了，干勁很大，極大，是個樂觀主義了。因為受過那次教訓，相信陳云同志來了，他也會站住腳的。那次批周，陳的人，一部分人取其地位而代之，有點那個味道，沒有那么深，但是也相當深，就是不講冒了。不講反冒進，可是有反冒進的味道，比如「有失有得」，「失」放在前面，這都是仔細斟酌了的。如果要戴高帽子，這回是資產階級動搖性，或降一等，是小資產階級動搖性，是右的性質，往往是受資產階級影響，在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壓力之下，右起來的。

一個高級社（現在叫生產隊）一條錯誤，七十幾萬個生產隊，七十幾萬條錯誤，要登報，一年登到頭也登不完。這樣結果如何？國家必垮臺。就是帝國主義不來，人民也要起來革命，把

我們這些人統統打倒。……假如辦十件事，九件是壞的，都登在報上，一定滅亡，應當滅亡。那我就走，到農村去，率領農民推翻政府。你解放軍不跟我走，我就找紅軍去，我就另外組織解放軍。我看解放軍會跟我走的。

……列寧講，要別人堅定，首先自己要堅定；要別人不動搖，首先自己不要動搖。這又是一次教訓。……他們重復了1956年下半年、1957年上半年犯錯誤的同志的道路，他們不是右派，但是他們把自己拋到右派邊緣去了。我那時講，你們自己把自己拋到離右派三十公里，接近三十公里了，因為右派很歡迎這種論調。現在他們這種論調，右派一定歡迎。不歡迎才怪，距離右派不過還有三十公里。這種同志采取邊緣政策，相當危險。我這些話是在大庭廣眾當中講的，有些傷人。但現在不講，對這些同志不利。[18]

毛澤東一口氣講了近三個小時，通篇講話一再點到「小資產階級狂熱性」、「有失有得」，雖然沒有點名，明眼人都心知肚明指的就是彭德懷。問題的性質是「資產階級的動搖性」，「距離右派不過還有三十公里」，甚至把問題提到解放軍跟誰走的嚇人高度。對彭德懷來説，猶如晴天霹靂。散會后，人們從會場出來，大多是心情沉重。黃克誠回憶當時的情景説：

主席的講話對我們是當頭一棒，大家都十分震驚。彭德懷會后還曾向主席説，他的信是供主席參考，不應印發。但事已至此，彭的解釋還能有甚么用？我對主席的講話，思想不通，心情沉重；彭德懷負擔更重，我們兩人都吃不下晚飯：雖然住在同一棟房子里，但卻避免交談。我不明白主席為甚么忽然來一個大轉彎，把「糾左」的會議，變成了反「右」；反復思索，不得其解。[19]

毛澤東在7月10日講話亮出底牌后，11日夜晚，曾召見周小舟、周惠、李鋭談話。毛澤東還曾戲言：「我們來開個同鄉會。」對周小舟談到1958年颳共產風、浮夸風，不能怪公社書記，主要怪上面。「上有好者，下必甚焉」等一些尖鋭意見，毛曾表示：「我這個人也有胡思亂想。」有些事不能全怪下面，怪各部門，否則，王鶴壽會像蔣干一樣抱怨：曹營之事，難辦得很。當時，毛與三個聽者，一齊哄堂大笑，久久不息。[20]毛澤東在批示印發彭德懷信的第二天，17日下午5時到夜晚10時，又召見周小舟、周惠、胡喬木、田家英和李鋭談話。李鋭回憶説：這次談話，還是毛澤東談得多，也談得很融洽……。一起吃晚飯，喝茅臺，還敬了酒。毛説：關於總路線，真有70%擁護就不得了。真正骨干有30%也不得了了。大部分人是隨大流的。昨天晚上我談了（指組長會上）：現在的情況，實質是反冒進，我是反冒進的頭子。[21]時隔六天，毛澤東在23日的講話，對周小舟等人來説，顯然是難以接受。當天

晚上，李鋭、周小舟、周惠三人在一起發泄一肚子的不滿。周小舟懷疑毛澤東這篇講話，是否經過常委討論。按照講話精神發展下去，很像斯大林晚年，沒有真正的集體領導，只有個人獨斷專行。這樣，終將導致黨的分裂。周惠也認為，毛澤東對一些問題的決定，反復變化太快。李鋭說，這樣的講話不是「翻云覆雨」嗎？周小舟也認為這個講話，是「一百八十度轉變」使人轉不過彎來。周小舟提議去找黃克誠談，黃開始不同意，由於周的堅持，黃勉強答應。於是三人到了黃的住處，周小舟講了斯大林晚年的話；李鋭說了毛不能一手遮天。黃克誠勸大家不要激動，有意見還是當面去見毛澤東談談。這時彭德懷因軍事電報來找黃，周小舟等三人當即離去。就在三人從黃克誠住處出來，碰見了羅瑞卿。這個后來被稱為「二十三夜事件」[22]，成了把彭、黃、張、周打成反黨集團的一顆重鎊炸彈。

4.清算彭德懷的歷史舊賬

從7月23日下午起，分組討論毛澤東上午的講話。許多人在發言中，都不同程度地作了檢討，尤其是原來對彭德懷的信表示過同情或贊同的人。即使像譚震林、李井泉的發言，也帶有一點自我批評，對彭德懷的批評也比較和緩。譚震林說：自己重犯了「一觸即跳」的老毛病。去年颳「共產風」，「這是我要負責的」。他批評彭德懷的信「是煙幕加毒氣」。但認為彭德懷是一個忠心耿耿，為黨為國的好同志。他為革命事業是立下了不朽的功勞，這些誰都是無法否定的。李井泉承認去年頭腦確有發熱；也有官僚主義。李井泉批評彭德懷的信，本質的錯誤是沒有站在一億五千萬至三億五千萬的貧苦農民和九千萬辦鋼鐵群眾的感情與要求方面來看問題。實際上起了否定總路線的作用。只有柯慶施的調子最高，他批評彭德懷的信，實質上否定了「大躍進」，否定了總路線的正確。并說：「從黨的歷史上看，只要路線錯誤，就非要改造黨的領導機關不可，因為歷史證明，凡是路線錯誤自己是不能改正的。」王任重雖然沒有點彭德懷的名，但強烈表示：右派攻擊我們是「衛道者」、「歌德派」、「教條主義者」，我們就是要保衛總路線，歌人民之功，頌人民之德，絕不能動搖。期間，彭德懷、張聞天、黃克誠先后在小組會上作了檢討，周小舟則在小組作了一次說明性的檢討。

對各小組這種平和氣氛，毛澤東認為人們還沒有領會他的意圖。7月25日，毛澤東召集中央常委和協作區主任會議，講了四點意見：（一）會議也還要繼續開，相互有甚么意見都講完，敞開來講。（二）現在要對事也要對人。（三）前一段主要是糾「左」，現在要反右，因為現在右傾抬頭了。（四）要劃清界線，要跟動搖的，右傾的劃清界線。[23]

26日，各組傳達了毛澤東「對事也要對人」的講話。同日，毛澤東批示印發東北協作區委員會辦公廳綜合組組長（原國家計委的副局長）李云仲，關於目前經濟生活中的一些問題寫給他的一封信。李云仲在信中反映，最近一年來，我們在工作中犯有「左」傾冒險主義錯誤，其原因主要是在思想戰線上忽視了兩條戰線的斗爭，即在1957年整風反右的斗爭中沒有同時反對「左」傾冒險主義的危險。毛澤東為此寫了長篇批語，并加上了〈對於一封信的評論〉[24]的標題。

毛首先定性：信的作者搜集了一些材料，專門屬於缺點方面的。作者對成績方面的材料，根本不發生興趣。其「基本觀點是錯誤的，他幾乎否定一切」。「他是一個『得不償失』論者，某些地方簡直是『有失無得』論。」

然后，對信的作者的勇氣作了肯定。毛說，與黨內有些對成績估計不足，對缺點估計過高，但是不愿意講出自己的想法和看法，或者講一點留一點，而采取「足將進而趑趄，口將言而囁嚅」、躲躲閃閃的態度，大不相同。「他不隱蔽自己的政治觀點，他滿腔熱情地寫信給中央同志，希望中央采取步驟克服現在的困難。」并說「十年以來，還沒有一個愿意和敢於向中央中肯地有分析地系統地揭露我們計劃工作中的缺點，因而求得改正的同志。我就沒有看見這樣一個人」。

接着，毛斷言：

> 但是現在黨內黨外出現了一種新事物，就是右傾情緒、右傾思想、右傾活動已經增長，大有猖狂進攻之勢。這表現在此次會議印發各同志的許多材料上。……這種情況是資產階級性質的。……黨內遇到大問題有爭論，表現不同的觀點，有些人暫時搖擺，站在中間，有些人站到右邊去，是正常的現象，無須大驚小怪。歸根結底，錯誤觀點，乃至錯誤路線一定會被克服，大多數人，包括暫時搖擺、甚至犯路線錯誤的人，一定會在新的基礎上團結起來。反右必出「左」，反「左」必出右，這是必然性。時然而言，現在是講這一點的時候了。……現在這一次爭論，可能會被證明是一次意義重大的爭論。如同我們在革命時期各次重大爭論一樣，在新的歷史時期——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不可能是沒有爭論，風平浪靜的。廬山會議可能被證明是一次意義重大的會議。

毛最后說，他的這些意見在23日的講話中沒有講完，寫的這些「作為那次講話的補充」。

為證明「右傾情緒、右傾思想、右傾活動」在黨內外已形成一股猖狂進攻之勢，以及必須與之戰斗的嚴重性和迫切性。毛澤東又於7月27日批示印發〈江西省委黨校學員對人民公社的各種看法材料〉；7月29日批示印發：〈赫魯曉夫談蘇聯過去的公社〉、〈增城縣重災公社見聞〉、〈番禺縣有些農民自辦小型食堂〉三篇文章。[25]毛在批語中

說：

> 請同志們研究一下，看蘇聯曾經垮臺的公社和我們的人民公社是不是一個東西；看我們的人民公社究竟會不會垮臺；如果要垮的話，有哪些足以使它垮掉的因素；如果不垮的話，又是因為甚么。不合歷史要求的東西，一定垮掉，人為地維持不垮是不可能的。合乎歷史要求的東西，一定垮不了，人為地解散也是辦不到的。這是歷史唯物主義的大道理。請同志們看一看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序言。近來攻擊人民公社的人們就是抬出馬克思這一科學原則當作法寶，祭起來打我們，你們難道不害怕這個法寶嗎？

8月1日，毛澤東專就印發赫魯曉夫的講話寫信給中共中央聯絡部部長王稼祥，說：

> 此件請看一下，有些意思。我寫了幾句話，其意是駁赫魯曉夫的。將來我擬寫文宣傳人民公社的優越性。一個百花齊放，一個人民公社，一個大躍進，這三件，赫魯曉夫們是反對的，或者是懷疑的。我看他們是處於被動了，我們非常主動，你看如何？這三件要向全世界作戰，包括黨內大批反對派和懷疑派。[26]

毛澤東采取的這一系列措施，以及所發出的戰斗號令，使得廬山上的斗爭迅速升級。人們紛紛表態，踴躍發言，朝着彭德懷、張聞天開火，以劃清界線。

——有人歷數歷史上的錯誤路線：立三路線、一次王明路線、二次王明路線，高崗饒漱石事件，認為彭德懷凡緊要關頭都是動搖的，總是站在錯誤路線一邊。這次反對總路線，有其歷史根源。

——指責彭德懷思想上是個人英雄主義。自以為「有骨氣，不信邪」，以犯上為榮。說百團大戰就是無組織無紀律。還有人提到會理會議，反對毛澤東的軍事指揮問題。

——重提延安華北座談會批判彭德懷的錯誤：抗戰戰略方針上反對毛主席；打百團大戰；執行王明的一切通過統一戰線；歷來對群眾運動潑冷水；鬧獨立性。

——猖狂進攻已經到來，不僅是立場問題，動機不是為了黨的利益，而是別有用心，是要在黨內掀起一場斗爭，反對總路線，攻擊毛主席。彭、張等看到氣候已經合適，認為抓住了辮子。要向毛主席和中央算帳。

——而且還有個組織問題：此次彭德懷是元帥，張聞天是副帥。一封信，一個發言，都帶有反黨綱領性質。鋒芒指向黨中央和毛主席，是向黨的挑戰書。

——有人甚至質問：「是否同國際朋友的影響有關系？」「是否到國外取了甚么經回來了？」

與之同時，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召開八屆八中全會，修訂指標和討論路線問題。為在中央全會上深入批判彭德懷定調。7月31日和8月1日，毛澤東連續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對彭德懷進行面對面的揭發批判。出席會議的有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林彪，以及彭德懷、彭真、賀龍。黃克誠、周小舟、周惠、李銳四人列席。主要是毛澤東講，算彭的歷史賬。

毛對彭說：「我同你的關系，合作，不合作，三七開，融洽三成，搞不來七成，三十一年，是否如此？」[27]又說：彭「寫這信的目的就在於爭取群眾，組織隊伍」。（林彪插話，完全同意這個看法。）[28]

在8月1日的常委會上，朱德第一個發言，他態度溫和，僅就彭德懷信中的內容開始說了幾句。毛澤東認為沒有擊中要害，即將腿抬起，用手指搔了幾下鞋面，說「隔靴搔癢」。弄得朱德臉一紅，停止了發言。接着，林彪發言，他聲色俱厲地說彭德懷這回是招兵買馬來的，是野心家，陰謀家，偽君子。并說：「只有毛主席能當大英雄，別人誰也不要想當英雄，你我離得遠得很，不要打這個主意。」[29]毛澤東說，彭德懷他們是要瓦解黨，是有計劃、有組織、有準備，從右面向正確路線進攻。上次（指7月23日講話）說的不正確，說是無計劃、無準備、無組織，跑到右派旁邊。[30]毛還對著彭說：

> 你這個人有野心，歷來有野心。……你要用你的面目改造黨、改造世界。過去因各種原因未得到機會，這次從國際上取了點經（不能斷定），去年鄭州會議你未參加，武昌會議亂子一出，機會到了，出去考察，到了湖南。
>
> 上海會議重點是批評李富春，捎了你一句。去年八大二次會議我講過，準備對付分裂，是有所指的，就是指你。……
>
> 我六十六歲，你六十一歲，我快死了，許多同志有恐慌感，難對付你。[31]

把毛澤東這段話，與1958年1月他在南寧會議上提出，軍隊整風，要討論朱可夫所犯嚴重錯誤的問題，吸取蘇聯的教訓；7月23日的講話中提出，解放軍跟誰走的問題聯系起來看，他對彭德懷一直是不放心的。所以，黃克誠后來說，1958年毛澤東對軍隊整風的指示，「也許這就是廬山會議的先兆」。[32]

以上林彪定的「野心家，陰謀家，偽君子」；毛澤東定的「是有計劃、有組織、有準備」向黨進攻，就成為爾后中央全會批斗彭德懷的綱領性調子。

兩次常委會后，毛澤東把列席的黃克誠、周小舟、周惠、李銳四人給留了下來。說讓他們列席會議，是為了受教育，不要再受彭德懷和那封信的影響。毛澤東對爭取周小舟看得更重一些（周在延安時曾當過毛的秘書），希望他「不遠而復」，「迷途知返」，不要「走遠」了。

[33]8月1日晚10時，毛澤東寫信給周小舟，送上幾句勉勵他改正錯誤的話。信中說：

> 「迷途知返，往哲是與，不遠而復，先典攸高」，幾句見丘遲與陳伯之書。此書當作古典文學作品，可以一閱。「朱鮪喋血于友于，張繡剚刃於愛子，漢主不以為嫌〔疑〕，魏君待之若舊」，兩個故事，可看批注。

信的末尾，又囑：「如克誠有興趣，可給一閱。」[34]

此前，7月28日，毛澤東找陳伯達和田家英談話說：你們上廬山后表現了動搖。但你們還是贊成總路線，贊成人民公社的。你們的意見基本上是對的，但有些話不對，方向不對，立場不對。毛澤東還告誡他們，世界觀要不斷地改造，知識分子要不斷改造自己的世界觀，要經常注意不要翹尾巴，要學會夾著尾巴做人。7月30日，楊尚昆告訴陳伯達等人，說毛主席已經要他向各組組長打招呼，以后不要再提胡喬木、陳伯達、吳冷西、田家英的事情，要他們關照一下參加會議的同志，集中力量準備開好八屆八中全會。楊尚昆說，這是下停戰令了。[35]毛保護「秀才」過關，是因為「秀才」還可利用，也是為了集中力量，批倒彭、黃、張、周。

5.八中全會定性為「反黨集團」

從8月2日到8月16日，中共八屆八中全會整整開了半個月。出席會議的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一百四十七人，列席會議的十五人。中心是要與會人員與右傾機會主義劃清界線，繼續高舉總路線的旗幟，并在組織上把彭德懷等人定為反黨集團。為使會議集中力量批判彭德懷等人，毛澤東在2日和11日兩次講話定題、定調。他在2日的開幕會上提出，全會有兩個議題：改指標問題和路線問題。在簡略地談了修改指標以后，毛說：

> 我們的路線究竟對不對？現在有一些同志發生懷疑。去年八大二次會議所定的這條路線發生了問題。廬山政治局擴大會議已經一個月了。初上廬山還不清楚，有些同志要求民主，說我們現在沒有民主，說話不自由，有一種壓力，壓得他們不敢講話。……后頭才了解，為甚么有些人覺得沒有自由呢？就是他們要求一種緊張局勢。那種松松垮垮的情況，在他們看來不得要領，不過癮。他們要攻擊這個總路線，想要破壞這個總路線。他們要言論自由，是要破壞總路線的言論自由，批評總路線的言論自由，批評去年下半年、今年上半年這一年的工作（重點還在去年）。對於去年11月第一次鄭州會議到現在九個月間中央的這些工作（批評「左」的傾向，「共產風」不颳了，公社實行三級所有制，指標逐步落實），他們看不到，他們看不進去，他們以為要

重新議過。他們感覺到需要有一種空氣，需要有一種民主，并且認為過去就是不民主，許多問題沒有徹底討論。因此我們感黨政治局擴大會不夠了，這個民主還小了，現在就請同志們，大家來開中央全會，這個民主大一些。他們還可能要求擴大，我們還有一個辦法，有黨代表大會，準備明年春季開黨代表大會。……現在要求民主，又是1957年那個要求大民主，大鳴大放大辯論，這么一種形勢。

毛認為現在的形勢是團結還是分裂的問題，他向與會的中央委員們提出：

我們中央委員會這個團體，關系着中國的命運，現在社會主義的命運是在我們的肩上，我們擔負著這個命運，我們應該團結。現在有一種分裂的傾向。這種傾向，我在去年五月黨代表大會上講了的。我當時說，有兩個危險。一個是在國際上打世界大戰，一個是在國內把黨分裂開來。那個時候并沒有顯著的跡象，但是現在己經有顯著的跡象了，要分裂我們這個團體了。我看不行，不應該分裂，我們應該團結。那么，對於犯錯誤的同志怎么辦呢？從團結的愿望出發，經過批評或者斗爭，在新的基礎上達到團結的目的，懲前毖后，治病救人。只有這種辦法。

毛最后再次強調說：

我們反了九個月「左」傾了，現在基本上不是這一方面的問題了，現在廬山會議不是反「左的問題」了，而是反右的問題了。因為右傾機會主義在向着黨，向着黨的領導機關猖狂進攻，向着人民事業，向着六億人民的轟轟烈烈的社會主義事業進攻。[36]

在11日的全體會議上，毛澤東再次講話，為彭德懷的「錯誤」挖階級根源。他說：這些人「是以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的資格參加共產黨的」。「犯錯誤的同志，或者是主要的領袖，比如彭德懷同志，他這三十幾年，資產階級立場沒有變動過。」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他們是參加的，是積極的，但在方法上他們也常常搞錯。到無產階級革命階段，就發生變化，他們對於無產階級革命沒有精神準備的，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對他們來說是突如其來的。他們是「馬克思主義者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的同盟者」。這些就是彭德懷等這一次「迫不及待掛帥，組織派別，進行分裂活動」的由來。毛還進一步挖彭德懷與高崗、饒漱石「反黨集團」的關系，說：

高饒集團是在1953年嘛！形成這個集團的時候，是在抗美援朝的期間，1951至1953年三年形成的。我們知道彭德懷是陷得相當深的，那時是保護過關。是高饒聯盟，還是高彭聯盟？[37]

毛澤東把黨內與他持不同意見的人稱之為「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由來已久。1953年6月，在提出過渡時期總路線時就批評說：

「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以后，仍然停留在原來的地方。他們沒有懂得革命性質的轉變，還在繼續搞他們的『新民主主義』，不去搞社會主義改造。這就要犯右傾的錯誤。」[38]1955年，鄧子恢因農業合作化的速度與毛澤東發生爭論，毛批評鄧子恢「老是站在資產階級、富農或者具有資本主義自發傾向的富裕中農的立場上替較少的人打主意」。[39]「這就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這個錯誤論點的初始。由此發展到60年代，作出：老干部等於「民主派」，「民主派」等於「走資派」的論斷。可以說完全是一脈相承。

期間，毛澤東還連續寫了多個長篇批語和通信，對彭德懷，對所謂「軍事俱樂部」，[40]對所謂「右傾機會主義分子」進行嚴厲批判。

8月10日，毛為印發中共安徽省委1959年8月4日關於張愷帆下令解散無為縣食堂給中央并告安徽省委第一書記曾希圣的報告寫道：

> 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中央委員會里有，即軍事俱樂部的那些同志們；省級也有，例如安徽省委書記張愷帆。我懷疑這些人是混入黨內的投機分子。他們在由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中，站在資產階級立場，蓄謀破壞無產階級專政，分裂共產黨，在黨內組織派別，散布他們的影響，渙散無產階級先鋒隊，另立他們的機會主義的黨。這個集團的主要成分，原是高崗陰謀反黨集團的主要成員，就是明顯證據之一。……高崗集團的漏網殘餘，現在又在興風作浪，迫不及待，急於發難。[41]

8月15日，毛寫了〈如何對待革命的群眾運動〉的批語。其中說：

> 共產黨內的分裂派，右得無可再右的那些朋友們，你們聽見炮聲了嗎？打中了你們的要害沒有呢？你們是不愿意聽我的話的，我已「到了斯大林晚年」，又是「專橫獨斷」，不給你們「自由」和「民主」，又是「好大喜功」，「偏聽偏信」，又是「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又是「錯誤一定要錯到底才知道轉灣（彎）」，「一轉灣（彎）就是一百八十度」，「騙」了你們，把你們「當作大魚釣出來」，而且「有些像鐵托」，所有的人在我面前都不能講話了，只有你們的領袖才有講話的資格，簡直黑暗極了，似乎只有你們出來才能收拾時局似的，如此等等，這是你們的連珠炮，把個廬山幾乎轟掉了一半。好家伙，你們哪里肯聽我的那些昏話呢？……那么，好吧，請你們看看馬克思和列寧怎樣評論巴黎公社，列寧又怎樣評論俄國革命的情況吧！……你們看見列寧怎樣批判叛徒普列漢諾夫，批判那些「資本家老爺及其走狗」，「垂死的資產階級和依附于它的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的豬狗們」嗎？如未看見，請看一看，好嗎？[42]

8月16日，毛再寫〈機關槍和迫擊炮的來歷及其他〉。更作出嚇人聽聞的斷言，毛說：

> 廬山出現的這一場斗爭，是一場階級斗爭，是過去十年社會主義革命過程中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兩大對抗階級生死斗爭的繼

> 續。在中國，在我黨，這一類斗爭，看來還得斗下去，至少還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個世紀，總之要到階級完全滅亡，斗爭才會止息。……黨內斗爭，反映了社會上的階級斗爭。這是毫不足怪的。沒有這種斗爭，才是不可思議。……昨日還是功臣，今天變成禍首。「怎么搞的，是不是弄錯了？」人們不知道他們的歷史變化，不知道他們歷史的復雜和曲折。這不是很自然的嗎？[43]

在毛澤東這一系列的講話和批語指導下，會議氣氛進一步升溫。最激烈的場面，就是追逼「軍事俱樂部」和「斯大林晚年」的斗爭。且不論短兵相接的質問，僅從會議簡報刊登的發言可見一斑：

——彭德懷反對政治掛帥、第一書記掛帥，并不是對着我們的，正是對着毛澤東的。

——彭否定總路線，就是否定中央領導；彭德懷拿匈牙利作比是嚴重的，可怕得很。因為他是國防部長，意思就是說：人民起來鬧事，我軍隊就不跟中央，不歸中央了，你們去請紅軍吧。

——彭的信，到處是伏筆，他們是惡意的，是反上的惡意。

——彭這次向黨進攻，是有計劃、有準備、有組織、有目的的，有不可告人的秘密。他的信中有很多暗語。

——彭這次出國訪問中是否向外國人透露了他自己的觀點，以致赫魯曉夫在波蘭公開講他對人民公社的看法。

——這次事件，彭德懷是主帥，黃克誠、張聞天是兩相，興師動眾，向着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猖狂進攻，這是一次非常惡毒的篡黨陰謀。

——張聞天的發言，和香港報紙言論差不多，甚么「困難」、「緊張」、「毛澤東下臺」等等，所不同的是，香港報紙及右派是懷疑，張聞天是肯定。

——彭德懷的信與張聞天的發言，是一個向總路線進攻的綱領，他們企圖以這個綱領來代替黨的正確的總路線；他們的鋒芒是直接對著黨中央和毛澤東的，其目的是企圖分裂黨的團結實現他們的惡毒陰謀。所以，這次黨內的爭論實際上是階級斗爭在黨內的反映，彭德懷與張聞天代表着黨內的一小部分具有右傾思想的人和資產階級思想動搖分子，與黨外的資產階級的猖狂進攻遙相呼應。

——這次以彭德懷為主帥，張聞天為副帥發動的向黨的猖狂進攻和分裂黨的活動，有這么幾個特點：（1）軍人掛帥，文人當軍師，明目張膽地發表反黨綱領；（2）鋒芒是直接對著黨的總路線、黨中央和毛澤東的；（3）教條主義與經驗主義重新結合，卷土重來，但主帥是經驗主義者；（4）選擇黨內外出現了一種新的事物，就是右傾情緒、右傾思想、右傾活動已經出現在地平線上，大有猖狂進攻之勢的時候，也就是在黨遇到暫時的、局部的困難的時候，進行反黨分裂活動。

——黃克誠，你是黨中央書記處書記，你聽到把毛澤東看成「斯大林晚年」這樣的話，為甚么不氣憤？為甚么不臭罵你們「軍事俱樂部」的成員？為甚么不反映？你們究竟要搞甚么鬼？」[44]

對當時的批斗場景，王任重在日記中說：

> 自八中全會開始以后，對彭德懷的斗爭進入了緊張階段，晚會都停止了。小組并成大組。共分三個大組，李井泉小組對彭德懷，張德生小組對黃克誠，柯慶施小組對張聞天、周小舟。大組會采取了批評質問的方法，沒有長篇大論，但都很尖銳。這樣尖銳的斗爭終於迫使彭、黃，張不得不承認一些錯誤。特別是8號以后張聞天說出了「斯大林晚年」的話以后，形勢急轉直下。周惠、李銳交待出他們私下攻擊主席的一些言論，彭德懷和周小舟也不得不承認了。[45]

在這種極不正常的氛圍和巨大壓力下，從8月13日到15日，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不得不在大會作無休止的檢討。彭德懷在當年的筆記、1962年的申訴和1970年寫的自傳式材料中說：

> 7月26日，我出席了小組會，對我7月14日信內的「小資產階級狂熱性」作了檢討。……其實這些檢討是言不由衷的。
>
> 我在小組會上作了言不由衷的檢討之后，心情十分不安，多么難過啊！真如萬箭穿心似的。[46]
>
> 在會議發展的過程中，我采取了要甚么就給甚么的態度，只要不損害黨和人民的利益就行，而對自己的錯誤作了一些不合事實的夸大檢討。唯有所謂「軍事俱樂部」的問題，我堅持了實事求是的原則。[47]

對當年的處境和心情，黃克誠有過如下記述：

> 這個「斯大林晚年」問題一出，會議就像燒開了的水一樣，沸騰起來，似乎「反黨集團」、「湖南集團」等均由此得到了確證。我前一段在組會上那么理直氣壯地辯論，現在看來，都成了瞪着眼睛說謊話，證明我這個人非常不老實，完全不可信任。於是，「陰謀家」、「野心家」、「偽君子」的帽子都給我戴上了。身處此境，真是百口莫辯，跳進黃河洗不清，心里的那種痛苦，實在沒法形容。可是還得開會還得檢討，一次又一次，總是被認為不老實。[48]

關於張聞天的心情，他的秘書有一段回憶：

> 8月9日，聞天同志從會場回來，心情沉重，沒有講話，卻又坐上車子，讓開到牯嶺鎮外的山中。我跟去了。在蒼茫暮色中，他佇立在一塊巨巖邊，望著逐漸暗淡而模糊的遠方。許久，他慢慢回過頭來，說：他們在追「秘密反黨計劃」，好像誰先發言，誰后發言都是有組織有計劃的！又說：這種做法危險，沒有甚么材料，想這樣逼出一個「有計劃有組織」來。他眼中流露出難言

的憤激和疑慮。我看他為自己受錯誤批判的病苦倒不是太大，一片憂國憂民的赤子之心，才使他感到特別的惘然。[49]

周小舟對會上無理追逼的情況，在8月13日寫信給毛澤東，坦言自己的內心痛苦。他寫道：

> 推論結果，我必然是反黨、反中央、反主席的俱樂部成員之一，同時我有許多右傾思想和觀點，推論結果，又必然作出犯右傾機會主義路線錯誤的結論。……而解剖我們自己，披肝瀝膽，又感黨與實際情況確有出入。我想到假若戴上這樣兩頂帽子，我對主席、中央、全黨、湖南黨員和人民，甚至對自己的老婆和孩子，都必須説我犯了反黨、反中央、反主席、反總路線、右傾機會主義路線兩條錯誤，然后再説下去，勢必淚潸潸下，不盡欲言。[50]

對在中共中央委員會的全體會議上，竟然出現如此丑惡的狀況，也被打成「反黨集團」成員的李鋭感嘆説：

> 這十多天會，我心理狀態極為復雜，我覺得很悲觀，我想，這是中央委員會，這是我們黨最高領導層的會議，怎么竟沒有一個人敢於出來講半句公道話呢。[51]

8月16日，全會通過四個決議和決定：《為保衛黨的總路線、反對右傾機會主義而斗爭》、《關於開展增產節約運動的決議》、《關於以彭德懷同志為首的反黨集團的錯誤的決議》、《關於撤銷黃克誠同志中央書記處書記的決定》。關於「反黨集團」的決議，指責：「以彭德懷為首的反黨集團的活動，由來已久。」他們「在廬山會議期間和廬山會議以前的活動，是有目的、有準備、有計劃，有組織的活動」。是「具有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性質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的錯誤」。判定「彭德懷同志和他的同謀者、追隨者，本質上是在民主革命中參加我們黨的一部分資產階級革命家的代表」。「是黨和人民的社會主義事業的嚴重危險。」因此決定：「把彭德懷同志和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等同志調離國防、外交、省委第一書記等工作崗位」，但仍保留他們的「中央委員會委員、中央委員會候補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候補委員的職務」，「以觀后效」。[52]

毛澤東在全會閉幕會上講話説：「這次廬山會議解決了一個大問題。」「揭露了多年沒有解決的矛盾，并且把當前的形勢搞清楚了。當前的形勢主要是反右傾、鼓干勁。」廬山會議「避免了一個大馬鞍形，避免了一次黨的分裂」。[53]

8月17日，毛澤東主持召開中央工作會議。會上宣布了政治局常委會關于人事安排的意見：一、決定撤銷彭德懷國防部長和中央軍委委員的職務；二、決定撤銷黃克誠國防部副部長、總參謀長、中央軍委委員和秘書長的職務；三，決定林彪為中央軍委第一副主席兼國防部長，賀

龍為中央軍委第二副主席，聶榮臻為中央軍委第三副主席；四、決定羅瑞卿為國防部第一副部長、總參謀長、中央軍委委員和秘書長；五、撤銷張聞天外交部副部長職務。[54]劉少奇做了主要發言，主題是贊揚毛澤東。稱毛澤東的領導，「是最好的領導」、「最正確的領導」。主張積極地搞毛澤東的個人崇拜。他説：

> 在蘇共二十大以后，我們黨內也有人要在中國也反對「個人崇拜」，彭德懷同志就是有這個意見的。在西樓開會的時候，幾次提議不要唱《東方紅》，反對喊「毛主席萬歲」，這次又講了什么「斯大林晚年」，什么「沒有集體領導」，毛主席沒有自我批評，把一切功勞都歸于自己，等等。實際上，蘇共二十大以后，他就一貫要在中國搞反「個人崇拜」的運動。我想，我是積極地搞「個人崇拜」的，積極地提高某些個人的威信的。在七大以前，我就宣傳毛澤東同志的威信，在七大黨章上就寫上以毛澤東思想為指導思想這一條。黨要有領袖，領袖就要有威信。……反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的運動，赫魯曉夫搞這一手，我看也有許多不正確的地方，不應該那樣搞。所以在二十大以后，有人要反對毛澤東同志的「個人崇拜」，我想是完全不正確的，實際上是針對黨、針對無產階級事業、針對人民事業的一種破壞活動。[55]

毛澤東最后講話，肯定這次會開得好。但不要以為經過這次斗爭，就會風平浪靜，還要有颳政治臺風的準備。他説：總的形勢是好的。國內的政治情況，經濟情況，總的形勢是好的，有缺點，可以改，并且不難改。但是路線問題的爭論和斗爭，是否就此天下太平，四方無事了呢？現在看起來，我們是有保證的，我們的大多數、絕大多數，除極個別少數之外，是團結一致嘛。……但是也要估計到，不會是那么風平浪靜，要風平浪靜一個時期，是完全可能的，另一個時期要準備颳颱風的。這個政治臺風將來什么時候來呢？我就料不到，但有臺風要颳，這可以斷言的，不會沒有的，有階級存在嘛。在一個省，在地方，也有這個問題，要有準備。[56]

從7月2日到8月16日歷時四十六天的廬山會議，到此最終落幕。

廬山這場斗爭，使1957年在錯誤地劃定了五十多萬右派分子的基礎上，得出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矛盾仍然是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錯誤結論，又進一步升級，把黨內不同意見的爭論，錯誤地斷定為「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兩大對抗階級的生死斗爭的繼續」。這就是后來提出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依據。

在中共中央全會上，采用有罪推定的邏輯，強詞奪理，不容申辯，把彭德懷等敢于講真話，向中央反映自己意見的高層領導骨干，打成「反黨集團」，這種殘酷斗爭，無情打擊的錯誤斗爭方式，就使中國共產黨內從此跌入了萬馬齊暗的局面。

把維護毛澤東個人的威信看成就是維護黨的威信，就是維護全黨的大局，因而進一步大搞毛澤東的個人崇拜，也就為后來毛澤東得以「無發無天」地發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準備了條件。

總之，廬山會議這場斗爭，不只是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等被打成「反黨集團」、「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個人悲劇；更是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中華民族的悲劇。

在總結「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的教訓時，鄧小平指出，重要的問題是民主集中制，在黨中央「沒有形成的完善的制度」。「從1958年批評反冒進、1959年反右傾以來，黨和國家的民主生活逐漸不正常，一言堂、個人決定問題、個人崇拜、個人凌駕于組織之上一類家長制，不斷滋長。」[57]陳云説：「毛主席的錯誤問題，主要講他的破壞民主集中制，凌駕于黨之上，一意孤行，打擊同他意見不同的人。」[58]可見，1959年廬山會議對彭德懷等人的錯誤批判，實際上是共和國歷史出現逆轉的一個重要轉折點。

[1] 《人民日報》，1958年6月20日。當時，蘇聯幾乎所有的經濟區都有為中國生產訂貨的任務（其中有86個經濟區承擔的任務特別多），全蘇聯為中國製造訂貨的工業企業數以千計。

[2] 《人民日報》，1959年4月22日，1959年2月7日，周恩來同赫魯曉夫簽訂關於雙方擴大經濟合作的協定。協定規定，雙方合作於1959年到1967年間，在中國建設冶金、化學、煤炭、石油，機械製造等七十八個大型企業和電站，由蘇聯供應的設備，設計和各種技術援助的總值共五十億盧布左右，中國方面將根據中蘇現行貿易協定，向蘇聯供應商品。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頁205。

[3] 《內部參考》，1959年第2666號，頁8-10。

[4] 《內部參考》，1959年1月19日。

[5] 〈赫魯曉夫談蘇聯過去的公社〉（1959年7月18日），《內部參考》，1959年7月26日。

[6] 〈毛澤東在廬山會議上的講話記錄〉（1959年7月10日），載《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頁971-973。

[7] 毛澤東：〈印發《天津一些同志對一九五八年大躍進的看法》的批語〉（1959年7月19日），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八冊，頁366。

[8] 毛澤東：〈印發《蘇聯一些同志對我大躍進議論紛紛》的批語〉（1959年，月19日），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八冊，頁367。

[9] 毛澤東：〈對國家計委商計局關於市場情況的研究材料的批語〉（1959年7月21日，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八冊，頁371。

[10] 李鋭：《廬山會議實錄》，頁74。

[11] 楊尚昆：《楊尚昆日記》，上冊，頁412。吳冷西關於廬山會議的回憶，見《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頁982。

[12] 吳冷西關於廬山會議的回憶，見《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頁983。

[13] 《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頁983。

[14] 李鋭：《廬山會議實錄》，頁119。

[15] 李鋭：《廬山會議實錄》，頁127。

[16] 李鋭：《廬山會議實錄》，頁128，李鋭在頁74中還寫道：田家英同毛澤東的保衛負責人王敬先、英文秘書林克及機要秘書等，都關係密切，有甚麼動靜．田家英都會知道。

[17] 《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頁983。

[18] 李鋭：《廬山會議實錄》，頁128-135。《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頁983-986。

[19] 黃克誠：《黃克誠自述》，頁252-253。

[20] 李鋭：《廬山會議實錄》，頁62、63。

[21] 李鋭：《廬山會議實錄》，頁69-70。

[22] 李鋭：《廬山會議實錄》，頁141。

[23] 吳冷西關於廬山會議的回憶，見《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頁989。

[24] 毛澤東：〈對於一封信的評論〉（1959年7月26日），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

第八冊，頁377-381。

[25] 這三篇文章分別登在《內部參考》，第2830、2831期，1959年7月28日胡喬木呈送毛澤東閱。第2831期《內部參考》上還登載了中央社7月22日一則消息説：《紐約時報》今天在第一版上刊登了一則關於赫魯曉夫批評整個公社制度的華沙電訊，認為赫魯曉夫這番話是迄今為止一位蘇聯領袖對公社的想法所作的最直率的公開批評。在《紐約時報》駐華沙記者看來，赫魯曉夫這番話「可以認為是暗指中國共產黨人去年秋天的一些説法而言的。中國共產黨人曾説，建立公社是真正的通向共產主義的道路。這種看法似乎使俄國人感到煩惱，因為蘇聯報紙有三個月左右對於公社幾乎只字未提」。《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八冊，頁392。

[26] 毛澤東：〈關於研究人民公社問題的批語〉（1959年8月1日），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八冊，頁391。

[27] 《彭德懷傳》，頁623-624。

[28] 李鋭：《廬山會議實錄》，頁183。

[29] 《彭德懷傳》，頁624-625。

[30] 《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頁995。

[31] 《彭德懷傳》，頁626。

[32] 黃克誠：《黃克誠自述》，頁247。

[33] 李鋭：《廬山會議實錄》，頁208。

[34] 毛澤東：〈給周小舟的信〉（1959年8月1日），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八冊，頁397。

[35] 吳冷西關於廬山會議的回憶，見《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頁996。

[36] 毛澤東在中共八屆八中全會的講話記錄（1959年8月2日），載《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頁996-998。

[37] 李鋭：《廬山會議實錄》，頁287-288。

[38] 毛澤東：〈批判離開總路線的右傾觀點〉（1953年6月15日），載《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頁81。

[39] 毛澤東：〈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1955年7月31日），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文集》，第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頁433。

[40] 「軍事俱樂部」一詞，是毛澤東在8月2日寫給張聞天的信中提出的，信的開頭説：怎么搞的．你陷入那個軍事俱樂部去了。」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八冊，頁399。這就成了中共八屆八中全會上追查彭德懷「反黨集團」的一條根據。

[41] 毛澤東：〈關於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問題的批語〉（1989年8月10日），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八冊，頁431。

[42] 毛澤東；〈關於如何對待革命的群眾運動〉（1959年8月15日），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八冊，頁447-448。

[43] 毛澤東，〈機關槍和迫擊炮的來歷及其它〉（1959年8月16日），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八冊，頁451-452。

[44] 李鋭：《廬山會議實錄》，頁232-233、235、236、277。

[45] 王任重日記（1959年8月21），見《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頁1004。

[46] 《彭德懷傳》，頁619-620。

[47] 彭德懷：《彭德懷自述》，頁278。

[48] 黃克誠：《黃克誠自述》，頁259-260。

[49] 李鋭：《廬山會議實錄》，頁267；程中原：《張聞天傳》，頁759。

[50] 李鋭：《廬山會議實錄》，頁249。

[51] 李鋭：《廬山會議實錄》，頁265。

[52] 〈中國共產黨八屆八中全會關於以彭德懷同志為首的反黨集團的錯誤的決議〉，載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黨史黨建政工教研室編：《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第二十三冊（北京：國防大學出版社，1986），頁119-121。彭德懷，1974年11月29日被迫害致死。1978年12月24日，中共中央為彭德懷舉行追悼會，恢復彭德懷是優秀共產黨員、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黨、國家和軍隊杰出領導人的名譽。張聞天，1976年7月1日病逝，1979年8月25日，中共中央為張聞天舉行追悼會，莊嚴宣布：「現在，黨中央為張聞天同志一生的革命活動，作出全面、公正的評價，決定為他平反和恢復名譽。」黃克誠，1978年12月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上被增補為中央委員會委員，被選舉為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常務書記。1980年6月19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關於黃克誠同志的覆查結論〉指出：「根本不存在黃克誠參加高、饒反黨聯盟的問題。」周小舟，1966年12月26日在廣州含冤辭世。1981年中共中央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廬山會議的是非正式結論説：「毛澤東同志錯誤地發動了對彭德懷同志的批判，進而在全黨錯誤地開展了『反右傾』斗爭。八屆八中全會關於所謂『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反黨集團』的決議是完全錯誤的。」

[53] 毛澤東在中共中央八屆八中全會閉幕會上的講話記錄（1959年8月16日），轉引自《毛澤東傳（1946-1976）》，下冊，頁1006、1008。

[54] 金沖及主編：《周恩來傳（1949-1976）》（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頁1484。

[55] 李銳：《廬山會議實錄》：頁318-319。

[56] 李銳：《廬山會議實錄》：頁320-321。

[57] 鄧小平：《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1980年8月18日，載《鄧小平文選》，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頁330。

[58]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陳云年譜（1905-1995）》，下卷，頁260。

四、全國范圍的反右傾斗爭

1.軍委會議追逼軍事俱樂部

為肅清彭德懷在軍隊中的影響，中共中央決定召開中央軍委擴大會議，對彭德懷、黃克誠進行揭發批判。毛澤東在8月11日的講話中就提出：

> 是否要開一次軍委擴大會？有些同志建議，特別是軍隊方面的同志建議，這個问題今天要解決，如要開就發通知。（周恩來：小組很多同志主張開）我是贊成開的。因為不是講要「民主」嗎？擴大「民主」嗎？「集體領導」嘛！軍隊里頭散布這些毒素，「俱樂部」的毒素，不肅清是不好的。我主張開。每師來兩個人，師長同政委。……大概最多開半個月，兩個星期或十天，因為這個問題比較單純。[1]

因此，8月11日當天就發出召開軍委擴大會議的通知。8月18日，會議在北京舉行。到會人員是：大軍區領導除留一名值班外，全部到會；省軍區司令員、政委和野戰軍軍長，政委全部到會。此外，全軍軍以上單位各派兩名正職干部參加。實際到會人數為1070人。

會議由林彪、賀龍、聶榮臻、葉劍英等組成大會主席團領導，總政治部主任譚政、副主任蘭華任正、副秘書長。主要內容是揭發批判彭德懷、黃克誠的所謂「反黨罪行」、「資產階級軍事路線」，「軍事俱樂部」問題。前十天是聽取關于廬山會議情況的傳達；閱讀會議主要文件。24日，周恩來應大會主席團的要求，在會上作關于彭德懷同志歷史問題的報告，傳達中共中央八屆八中全會對彭德懷「錯誤」的批判。從8月29日起，由原來十五個小組改編為兩個綜合組，彭德懷、黃克誠各參加一個組，接受批判。

彭德懷參加第一組，會場設在中南海懷仁堂。根據廬山上揭發批判的路子，人們仍從歷史到現實：從平江起義的思想動機到廬山上書的政治目的；從抗日戰爭戰略方針的貫徹執行到1958年炮擊金門時的組織指揮；從紅一、三軍團的關系到所謂的「軍事俱樂部」的組織活動。對會場上的緊張氣氛，《彭德懷傳》有如下敘述：

9月3日，會議集中追查所謂「軍事俱樂部」的問題。因為這是毛澤東最先提出來的，彭德懷不得不耐心對待，認真回答。彭解釋說：「這是毛主席8月2日在給張聞天同志的信上首先提出來的，說『怎么搞的，你跑到軍事俱樂部去了』，并沒有具體指出還有什么人。其實，『軍事俱樂部』組織是沒有的，只是我們幾個對問題的認識上觀點比較一致，

事先并沒有什么策劃。

會上不斷有人起哄，逼彭交代「軍事俱樂部」的組織、綱領、目的、名單等等。在輪番追逼之下，彭德懷氣憤地說：「如果有這個俱樂部，那就是以彭德懷為首的反黨集團的四個人，其他再沒有了。」

有人喊：「你敢說真的沒有了？」

彭說：「沒有了。因為他們誰也不愿意來報名嘛！」

全場大嘩，人們批評彭「不嚴肅」，「不老實」。

彭無奈地說：「不實事求是，多講一些有什么好處！」[2]

后來，彭德懷在追述這段追逼「軍事俱樂部」的經歷時寫道：

> 對于這個問題，在廬山會議期間，就有追逼現象，特別以后在北京召開的軍委擴大會議期間（8月下旬至9月上旬），這種現象尤為嚴重。不供出所謂「軍事俱樂部」的組織、綱領，目的、名單，就給加上不老實、不坦白、狡猾等罪名。有一次，我在軍委擴大會議上作檢討時，有一小批同志大呼口號：「你快交代呀！」「不要再欺騙我們了！」逼得我氣急了。我說：「開除我的黨籍，拉我去槍斃了罷！你們哪一個是「軍事俱樂部」的成員，就自己來報名嘛！」有幾個同志說我「太頑固」，「太不嚴肅」。其實，在廬山會議結束后，我就想把我在軍隊三十年來的影響肅清、搞臭。這樣做，對保證人民解放軍在黨的領導下的進一步鞏固，是有好處的。我就是持著這個態度，趕回北京來作檢討的。但是我不能亂供什么「軍事俱樂部」的組織、綱領、目的，名單等，那樣做，會產生嚴重的后果。我只能毀滅自己，決不能損害黨所領導的人民軍隊。」[3]

會上追逼的另一個問題是所謂「里通外國」。在廬山會議上就有人提出：「是否同國際朋友的影響有關系？」「是否到國外取了什么經回來了？」軍委會議專門用了兩天時間進行揭發追查。彭德懷深知這個罪名的政治份量，他要求揭發者拿出事實來。對所謂彭曾與赫魯曉夫有過接觸，受到過單獨接見的問題。彭德懷詳細地提出了每次會見的時間、地點、陪同人員和翻譯人員名單。彭說：「我根本不懂外語，同外國人任何談話都要經過別人的翻譯，要里通外國，我怎么去密談？」期間，羅瑞卿奉命將隨同彭德懷出訪蘇聯和東歐八國的軍隊高級將領：王樹聲、張宗遜、蕭華、楊得志、陳伯鈞、陳熙、張學思、路楊、朱開印等人召集起來，進行揭發。并采取會上揭發與會外調查（向同時進行批判張聞天的外事工作會議核查，向有關駐外使館發電要求提供證明）相結合的方法，力圖突破。[4]但直到會議結束，仍無結果。對這種無中生有，憑空誣陷的惡劣做法，彭德懷悲憤至極，他在后來寫給中共中央的申訴中說：「為了把我搞臭，竟然把這樣丑惡的罪名加在我的頭上，使我難過極了。」[5]

在揭發所謂彭、黃搞宗派分裂活動「挑撥一、三軍團關系」問題

上，突然冒出了一個三軍團殺害一軍團干部的問題。

時任空軍政治委員的吳法憲（中將）站出來揭發說：「在這里，我要向彭德懷討還血債！」「彭德懷在長征途中欠下了一軍團的血債！是他下令殺害了一軍團的一位連長。」坐在主席臺上的林彪插話：他恨不得一口吃了一軍團，通統殺盡！因為一軍團是偉大領袖毛主席親手締造和親自領導的。[6]

對這種顛倒是非，血口噴人的揭發，會場上馬上有人起來反駁。時任北京軍區參謀長的鍾偉（少將）高聲說道：

> 胡說!你們完全是無中生有，造謠惑眾！你們當時在場嗎？我當時在場，事情是我干的。彭總不在場。也不知道這回事。現在要說清楚，那人是罪有應得，該殺！如果把他交給你林總，你當時也會下令槍斃他！理由只有一個：他臨陣脫逃，還要拉幾個戰士反水，你不殺了他，他就會反過手來殺我們！那是在一、三軍團強攻婁山關的戰斗中，面對敵人一次又一次的瘋狂反撲，那個連長丟下陣地，丟下戰友，逃跑了，被我們后續部隊捉住。經審訊，才知道他是一軍團的人，并且有一軍團的人作證。按說，應該把他交給你（發言者面向林彪）處理，可當時怎么交？陣地上，槍管子都打紅了......這本來是不足為怪的，執行戰場紀律嘛，有什么大驚小怪！我看是有人別有用心，扯歷史舊賬，制造事端，挑撥一、三軍團親如手足的關系，加害于人，他好在一旁幸災樂禍。[7]

鍾偉當面駁斥林彪和吳法憲，為彭德懷辯解，顯然不符合會議的要求，并為林彪所不容。總政治部保衛部部長史進前當即奉命帶領兩名荷槍實彈的戰士，將鍾偉當場逮捕，戴上手銬，架出會場。

這時，林彪講話說：

> 鍾偉事件的發生，不是偶然的，他這顆「定時炸彈」自我爆炸，是按預定時間有計劃有步驟進行的。這證明我們這次會開得是成功的，是有收獲的。他要爆炸，總比不爆炸好。等他鉆到你椅子底下再爆炸，就晚了......我們與彭德懷及其死黨的斗爭，不能局限于他們的某件事，某些言論，不能憑感情用事，要上升到路線高度去認識，去分析，去批判！與他們決裂，首先要從思想感情一刀兩斷，你感情上恨不起來，認識就上不去，覺悟就提不高。」[8]

仗義執言的鍾偉，就這樣被定成了彭、黃反黨分子。

從9月5日起，會議又劃分為五個小組。其中第一組負責查鄧華的問題；第二組負責查萬毅的問題；第三組負責查洪學智的問題；第四組負責查鍾偉的問題。

時任沈陽軍區司令員的鄧華（上將），也因為為彭德懷講了幾句公道話，認為彭歷史上是有功勞的，希望中央能寬大處理。并認為說彭德

懷是「偽君子」不合適，他舉例說，在朝鮮前線一次為彭德懷殺了一只狗，吃飯時，彭得知是專門為他做的，戰士們并沒有，因此，他根本就沒有下筷子，這時大家誰也沒敢動那一盤狗肉。最后，這盤狗肉還是送到偵察連給戰士們吃了。鄧華說，在幾十年戰爭中，彭德懷跟戰士們同甘共苦，是表里如一，首尾一貫的。怎么一個人一犯了錯誤，優點也變成了缺點？為此，黃永勝主持的小組追逼鄧華參與了「軍事俱樂部」的問題，黃永勝說：「高（崗）、彭就是個反黨聯盟羅，彭黃也是個反黨聯盟羅，高彭聯盟中你是個成員羅，彭黃反黨聯盟中你是個重要成員羅。你的錯誤性質就是反黨反中央的。」其他人跟着追逼說：實質上是這樣，不承認不行。這時，打了一輩子硬仗的鄧華將軍被逼得流下了眼淚，極其委曲地表示，「我的錯誤是嚴重的，但要說我反對中央和毛主席，說不過去嘛，我自己本心產生不出反對毛主席的念頭……。」黃永勝說：鄧華同志這條他現在接受不了，我們大家讓他考慮考慮再作檢討，我們小組通過《關于鄧華同志問題的小結》。鄧華再次表示：「這一條我接受不了。」黃永勝不耐煩地說：「在邏輯上說不過去！我們這個小組就這樣了，小組通過。」[9]

萬毅（中將）本與彭德懷并無歷史關系和個人交往，時任第二機械工業部副部長兼總參裝備部部長。因隨二機部部長宋任窮于7月15日上廬山向國防科委主任聶榮臻、國防部長彭德懷匯報工作，趕上會議討論彭德懷給毛澤東的信。萬毅參加第六組的討論。7月22日，萬毅發言說：「彭德懷同志把自己考慮到的主要問題提出來，對此次會議討論有推動作用；提出意見，精神是好的，是赤膽忠心的。但是有的問題說得簡單一些，如果再多說幾句話，多加分析就清楚了。」就因為這個發言，萬毅被劃進了「軍事俱樂部」成員。

洪學智因與黃克誠關系較深，與彭德懷也關系密切，在抗美援朝戰爭期間，洪學智為副司令員負責后勤工作，曾得到彭德懷的夸獎，說過朝鮮政府授予他的勳章應該給高麻子（高崗）洪麻子（洪學智）。洪在會上對彭、黃的問題又很少揭發。于是也被圍進了「軍事俱樂部」的圈子。

如此，軍委擴大會議就把鄧華、洪學智、萬毅，鍾偉四人打成「軍事俱樂部」的彭、黃反黨分子。

批斗黃克誠時，曾任新四軍第三師政治部主任的吳法憲（時任空軍政治委員），揭發老師長黃克誠「貪污」黃金案。[10]黃克誠向來被人認為清廉、克己，忽然間成了個「大貪污犯」（儘管熟悉黃的人并不相信），會場頓時又像爆了一顆炸彈。黃克誠當即寫信給主持軍委工作的林彪，要求迅速派人查清此案。羅瑞卿率領一批人親赴湖南，把當年曾擔任過財會工作的人員均召到長沙查對，因當年負責經管黃金的翁徐文一直將帳簿、單據完好無損地保存着，連當年經李富春批準由東北帶一

部分黃金到湖南的字據也在，結果什么問題也沒有查出來。這樣也就不再提及此事。黃克誠才得以解脫被誣陷之罪。

林彪在會上還攻擊朱德，誣衊說：「朱德，你當過一天總司令嗎？沒有，仗都是毛主席指揮打的……」朱德被迫在會上檢討：「對彭黃張周的反黨野心家的本質認識不夠，光從好的方面去想，認為他們已經改過了，同時和他們在思想上又有共同點，所以這次我同樣表現出嗅覺不靈，沒有及時識破他們反黨陰謀的本質。」「有幾位同志指出我有個人野心，我本來是不同意這種批評的。但再想一想，我既然同毛主席和其他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正確路線的同志在思想上有不一致的地方，而且在大是大非的路線問題上，曾有六七次沒有站在毛澤東同志的正確方面……既然如此，那么，同志們對我的批評不能說是沒有理由的，我愿意接受這個批評。」[11]

劉少奇在會上作了關于無產階級革命家對待革命群眾運動的態度問題和關于個人崇拜問題的講話，批評彭德懷不贊成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并說他「個人歷來是提倡『個人崇拜』的，在『七大』前，我就宣傳毛主席，現在我還要搞，還要搞林彪同志的、小平同志的『個人崇拜』，你們不贊成我搞，我也要搞的」。[12]

9月12日，大會通過《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擴大會議決議》，按照廬山會議的定性，把彭德懷、黃克誠誣為「十足的偽君子、野心家、陰謀家」，「篡軍、篡黨，篡國的陰謀由來已久」，「這次向黨進攻完全是有目的、有準備、有計劃、有組織的，是他們個人野心發展，利令智昏，不聽黨的勸告，無視黨的紀律的必然結果。」要求在全軍「徹底肅清彭黃在軍隊中所散布的毒素和惡劣影響」。

在軍委擴大會議結束以后，解放軍開展了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斗爭。各大軍區分別召開團以上干部會議，傳達中共八屆八中全會和軍委擴大會議精神，開展反右傾斗爭。參加會議的人數達28691人，占全軍團以上黨員干部的63%。期間，各省軍區和師、團則召開排以上黨員干部會議，傳達貫徹「兩會」精神，聯系本單位批判斗爭所謂「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據統計，截止到1959年10月19日，全軍受到重點批判的黨員干部有847人。到11月底，全軍共劃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1848人。其中團以上干部195人，占10.5%。

2.外事系統追查「里通外國」

在中央軍委舉行擴大會議揭發批判彭德懷、黃克誠的同時，8月24日，外事系統由陳毅主持召開揭發批判張聞天的會議。根據統一布置，除了翻歷史老賬，大會小會就集中在所謂「反黨集團」和「里通外國」這兩個問題上。「里通外國」追逼特緊。在廬山上就曾有人質問過這個

問題，張聞天嚴正聲明：「是完全沒有的。現在沒有，將來也不會有。」[13]

28日，張聞天向大會寫出書面檢討，其中說，在廬山同彭德懷交談中曾說過：「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問題時不易提不同意見，不民主。」兩人都說過毛澤東「個人說了算，集體領導不夠，要防止斯大林晚年的危險」。9月5日，向大會寫出第二次書面檢討，其中回答所謂「里通外國」罪名說：如果說，在「思想觀點上」蘇共領導者和我之間「在反對我黨總路線」這一點上有「共同點」，因而認為從政治思想上說我有里通外國的表現，那我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如果說，在組織上，即情報關系上，我有里通外國的問題，那我是不能接受的，因為根本沒有這類事情。」[14]對會上如此蠻橫無理的誣陷，張聞天痛苦至極，他回到家里，對夫人劉英說：「說別的什么，那是觀點不同，說我『里通外國』，真是冤枉！」不禁潸然淚下。

9月中旬，張聞天因連續遭受折磨，血壓猛增，前列腺肥大癥狀加劇，出現尿中毒被送進醫院。自此，對張聞天由面對面的批斗轉入專案審查階段。但外交部反右傾斗爭，并未就此打住，而是繼續窮追猛打，使許多人受到株連。曾跟張聞天工作時間較長，或者先后跟張聞天當過秘書的，或被認為同張聞天關系密切的干部——劉英、何方、徐達琛、李匯川、許文益被打成為「張聞天反黨宗派集團」的成員。

3.層層抓右傾機會主義分子

毛澤東在7月26日寫的《對于一封信的評論》中，就曾斷言，現在黨內黨外的「右傾情緒、右傾思想，右傾活動已經增長，大有猖狂進攻之勢」。[15]8月7日，經毛澤東批發的《中共中央關于反對右傾思想的指示》更認為：「現在右傾思想，已經成為工作中的主要危險。」[16]中共遼寧省委接到中央的反右傾指示后，當即兩次召開省委常委擴大會貫徹執行，并于8月9日向中央寫了報告。毛澤東12日即批示印發，「將」了各省一軍。毛澤東批示說：

> 各省、市、自治區的情況如何？遼寧那樣的反右傾、鼓干勁的部署，是否已經做了，效果如何？看來各地都有右傾情緒，右傾思想、右傾活動存在着，增長著。有各種不同程度的情況。有些地方存在着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向黨猖狂進攻的形勢。必須按照具體情況，加以分析，把這種歪氣邪氣打下去。遼寧做得很快，步驟也好，成效顯著。他們取得了主動權，迫使右傾機會主義分子處于被動。這個經驗，值得各地注意。[17]

8月14日，中共中央將遼寧省委執行中央反右傾指示的報告和毛澤東的批示轉發各地，要求「參照辦理」。16日，中共八屆八中全會通過

《為保衛黨的總路線、反對右傾機會主義而斗爭》的決議，要求中央和省、市、自治區兩級的領導干部和人民解放軍全體將領，必須在反對右傾機會主義斗爭中站穩立場，劃清思想界限。[18]于是，各級黨政機關的反右傾斗爭隨即展開。

各機關的反右傾運動，斗爭的主要對象是黨的各級領導干部，方式是通過傳達中共八屆八中全會《關于以彭德懷同志為首的反黨集團的錯誤的決議》和毛澤東的講話，開展鳴放辯論，自我檢查和發動群眾揭發，進行重點批判，最后組織處理。關于劃分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標準，中共中央轉發解放軍總政治部的規定有四條：一、公開散布系統的右傾言論，攻擊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二、積極支持以彭德懷同志為首的右傾機會主義反黨集團的綱領，公開為反黨集團辯護，攻擊黨中央和毛主席的；三、歷史上多次犯錯誤，屢教不改，對黨心懷不滿，這次又借批評大躍進中的缺點為名，猖狂向黨進行攻擊的；四、執行黨的路線、政策一貫嚴重右傾，1958年大躍進以來又有嚴重右傾言論和行動，而在學習八屆八中全會文件后仍然執迷不悟，不主動作深刻檢討的。處理辦法是：一、對情節嚴重而又態度惡劣者，撤銷其行政職務，黨內給以留黨察看的處分；個別堅持錯誤，頑抗到底者，開除黨籍，令其轉業。二、對情節較重，但檢討較好者，或情節較輕，但態度惡劣者，酌情撤銷其黨政職務或部分職務，并調離重要工作崗位和要害部門。[19]

關于中央和國家機關反右傾斗爭的情況，以國務院第二機械工業部為例，到10月12日，在北京的機關干部中，確定重點批判對象472人，占干部總數的7.4%。其中處級干部四十二人，占處級干部總數的26%。[20]但當時認為，各部門運動的開展還不令人滿意。10月19日的《情況簡報》第102號反映說，目前對運動領導的情況是：領導有把運動搞深搞透的決心，也有辦法的單位大約有80%；群眾已經發動，但領導缺乏決心和辦法的單位大約占10%；群眾既未發動起來，領導本身又怯于斗爭，致使運動進展遲緩的單位也占10%。毛澤東于10月22日指示彭真、楊尚昆，要他們對中央直屬機關的運動，「抓緊辦一下，使這個斗爭深入下去」。[21]這一抓，很快有了「效果」。11月19日的《情況簡報》中刊登〈中央國家機關的反右傾斗爭日益深入〉，文中說深入的表現是：群眾發動得愈加廣泛、深入；重點對象增加，批判也更加深入細致；領導核心健全有力。同時要求：繼續大膽發動群眾，充分運用大字報開展斗爭；對重點對象要有計劃、有步驟、深入細致地進行批判；必須有始有終，不能煮「夾生飯」。[22]據中共中央直屬機關黨委和中央國家機關黨委向中央的報告透露：在這場反右傾斗爭中，被作為重點批判的對象有1900人，其中司局長以上干部287人。[23]另據不完全統計，重點「幫助」了2714人，224人被定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24]

對中央機關反右傾運動的具體情況，龔育之在〈我的第二個上級——懷念秦川同志〉一文中有如下記述:

> 1959年，廬山會議反右傾，一時之間，秦川成了中宣部里的風云人物。這是怎么回事呢？原來1958年狂熱的大躍進后，1958年底1959年初黨中央開始注意糾正大躍進中的「左」。面對「六億」人口的宣傳處長秦川，常常下農村下工廠調查研究，比較了解實際情況，封「左」的錯誤有較多的覺察，對錯誤的后果有較深的憂慮。秦川寫了一個四川調查，還做了一篇內蒙講話，可惜現在我手頭都查不到了，只記得其中的獨特之處，是從理論上提出了一個尖銳問題：民主革命，起義，打仗，有勝利，有失敗，看得清楚；建設社會主義，是不是也有勝利和失敗？大躍進的超高指標沒有完成，還給國民經濟造成很大破壞，算不算一種失敗？這問題提得發人深省。但是，廬山會議一轉向，狠批彭、黃、張、周，狠批右傾機食主義路線，從中央批到全黨，在中宣部里，秦川就首當其沖了。辦公樓里大字報鋪天蓋地，說秦川的報告和講話不僅「從東海龍王那里搜羅來」很多「攻擊」大躍進的材料，而且拋出一個理論，大字報上把它概括、上綱為「社會主義失敗論」。社會主義還能失敗？宣傳這樣的理論，那還了得？于是，秦川成為部里頭號「右傾機會主義分子」。除了秦川以外，還有好幾位同志，大都是比較深入實際、了解民瘼的干部，也落入反右傾的網中。戴臨風同志，已經調往廣播事業局了，調動手續還沒有辦完，回到機關，看到批秦大字報，說了幾句為秦辯獲的話，被人聽見，也被端到大字報上來，受到猛烈抨擊。這場運動，中宣部落難共九人，大字報上曾經很傷人地稱他們為九條「大鯊魚」。[25]

各省、市、自治區機關的反右傾運動，也打了一批所謂「反黨集團」和「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最早被定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是中共安徽省委會記處書記、副省長張愷帆。「罪行」是：1959年7月初，張愷帆到無為縣檢查工作，下令解散食堂，向群眾宣布：吃飯還原、住房還原、小塊土地還原的「三還原」政策，并要繼維向下貫徹。違背了中央和省委的方針政策，特別是關于辦食堂的方針政策。1959年9月19日，中共安徽省委擴大會議作出「關于張愷帆、陸學斌反黨聯盟的決議」，決定給張愷帆開除黨籍，撤銷副省長職務的處分。[26]福建、青海，湖南、黑龍江、遼寧等省也都有省委書記、副書記、省長、副省長，廳局長，地、市、縣委書記被打成「反黨集團」、「反黨分子」的。截止到1959年12月10日，湖南全省縣以上機關單位共揭發出重點對象4696人，其中1630人初步定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和其他各類分子，占參加整風干部的1.96%。[27]據中共河南省委組織部的不完全統計，全省在整風反右傾運動中，受到批斗的干部有32100人；被劃為犯有嚴重右傾錯誤的干部16200人（其中科局級以上干部1738人）；被劃

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公社黨委書記以上干部189人。中共四川省委擴大會議，揭發出的所謂「右傾機會主義分子」，「階級異己分子」、「壞分子」六十一人，占到會總人數的3.87%。浙江省被確定為重點對象的，占省級機關黨員處長以上干部的4.6%；在縣委委員中，占4.5%；在公社黨委書記中，占5.29%。

在農村，「反右傾」斗爭的主要方式是整風整社，主要批判對象是基層干部和富裕中農。批判的重要內容，是自第一次鄭州會議以后，各地為糾正「五風」實行的政策措施，如：「包產到戶」，「地段責任制」、「生產小隊基本所有制」、家庭副業等。中央分別批轉河南、江蘇省委和農業部黨組的報告，認為上述措施是「猖狂的反對社會主義道路的逆流」，要求徹底加以揭發批判。[28]湖南省規定農村進行重點批判的對象，應占農村總人數的1%，每個大隊集中批判三五人。廣東省召開的縣、社幾級干部會議，被重點批判的基層干部占到會人數的3%，生產隊一級干部占10%左右。

在工廠除重點批判對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不滿的「右傾言論」外，還批判一些領導干部的「一長制」思想，說這是不要黨委領導，反對政治掛帥和群眾運動。在職工群眾中，還對被認為「忘了本的落后變質工人和階級異己分子」進行批判。

在高等院校和科研單位，斗爭的主要對象是「浸透了資產階級世界觀的黨員專家」。許多黨員專家被認為以專家資格反對黨的領導和群眾路線，受到批判和處分。北京大學參加整風學習的128名黨員骨干教師，多為校系兩級領導，其中二十七人被列為重點批判對象，占21%。清華大學參加運動的174名黨員骨干教師，有十七人被認為「有嚴重的資產階級思想，以專家自居，不服甚至反對黨的領導」。[29]

這次反右傾運動，錯誤打擊干部和群眾的規模，超過了1957年的反右派斗爭。據1962年甄別平反時的統計，被重點批判和劃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干部和黨員有三百幾十萬人之多。加上被定為「階級異己分子」等類名目的人數更大，截止1962年8月，全國得到平反的干部、黨員和群眾共六百多萬人。[30]1980年，人民解放軍為1959年因對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有意見而被定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右傾機會主義錯誤」或其他政治帽子平反的有17212人。[31]反右傾運動的直接后果是，從1958年11月第一次鄭州會議以后，剛剛稍有糾正的高指標、瞎指揮、浮夸風、共產風再度颳起。

[1] 李銳：《廬山會議實錄》：頁294-295。

[2] 《彭德懷傳》，頁645。

[3] 《彭德懷傳》，頁278-279。

[4] 1959年追查彭德懷所謂「里通外國」的直接受害者之一，是當時跟隨彭德懷出訪蘇聯東歐八國的首席翻譯趙仁堂（時任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學院翻譯室主任，大尉軍銜），因受到極大的政治壓力，無奈自殺身亡，年僅二十九歲。

[5] 1962年6月16日彭德懷給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的一封信。轉引自《彭德懷傳》，頁642。

[6] 《彭德懷傳》中還寫了一件事：「在8月28日的綜合組小組聯席會議上，有人説紅軍長征到達哈達鋪進行改編以后，一方面軍改為陝甘支隊，一、三兩個軍團編為兩師。因一軍團干部較多，就抽了兩個人到三軍團去參加領導工作。部隊向陝北進軍途中，有些意志薄弱的干部戰士，經不起艱苦環境的考驗，到了漢族居民地區，開小差脱離了部隊。當時，后有追兵前有敵軍堵截，紅軍處境危急。為了迅速制止部隊逃亡的惡劣傾向，三軍團曾以叛變革命的名義處決了個別逃跑的干部。以致部隊上下議論紛紛，懷疑這是一軍團派到三軍團的領導干部干的，剛經過整編的一、三軍團關系變得很緊張，出現了不團結的傾向。」「原三軍團的黃克誠是破壞一、三軍團團結搞宗派分裂活動的罪魁禍首。」「就在揭發人慷慨激昂發言的時候，北京軍區參謀長鍾偉突然站起來説道：「你瞎説，根本不是那么回事！紅軍離開哈達鋪以后，是我帶着一個營在后面擔任收容任務。你所説的處決衛生部的那個楊興仁，根本就不是黃克誠同志決定的，而是上邊給我的命令，我敢不執行嗎？這事××同志都知道嘛！」「鍾偉這個發言，引起會場一陣議論，立即遭到圍攻。」《彭德懷傳》，頁643。當年任陝甘支隊第二縱隊（由紅三軍團組成）第十一大隊政治委員的王明（即王平）回憶説：紅一方面軍北上途中，部分領導干部發生了一些過激情緒，特別是在哈達鋪整編以后，原紅三軍團的一些干部和部隊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整編時，從中央和紅一軍團調了一部分干部到二縱隊（即原三軍團）擔任領導工作，這部分干部對紅三軍團的干部戰士印象不好，看不起三軍團的同志……。在哈達鋪休息時間太短，體力沒有得到應有的恢復，接着又是長途行軍，掉隊人員增多本屬正常現象。但是紅一軍團來的干部和政治保衛機關卻認為這是情緒不振，甚至懷疑掉隊的人會投敵叛變。……據我和黃克誠回憶，當時保衛局處決的有原紅四師管理科長丘湘，曾在我團當過參謀長的康勝揚，原紅十團衛生隊政委曹企賢等。還有一些記不起名字了。曹企賢就是因為衛生隊丟了幾個病號而被處決的。黃克誠那時是第二縱隊政治部軍事裁判所所長，他堅決反對這種做法，處決人他拒絕簽發布告。但這是上頭保衛局決定的，儘管他不簽發，別人還是以他的名義簽發了布告。1959年廬山會議，又把軍事裁判所公布處決命令，全部算在黃克誠身上，這是違背歷史事實的，非常不公正的。王平：《王平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2），頁125。

[7] 辛子陵：《毛澤東全傳》，卷四（香港：立文出版社，1999），頁291-292。

[8] 辛子陵：《毛澤東全傳》，卷四，頁293。

[9] 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頁304；辛子陵：《毛澤東全傳》，卷四，頁293-294。

[10] 抗日戰爭期間，黃克誠任新四軍第三師師長，在蘇北抗日根據地經濟上有相當積累，1945年抗戰勝利后由蘇北開赴東北時，將部分經費兑換成了黃金。東北解放后，黃克誠調任湖南省委書記，經李富春批準，將剩餘的錢帶到了湖南，最后將這筆錢上交給湖南財政部門。黃克誠：《黃克誠自述》，頁264-265。

[11] 辛子陵：《毛澤東全傳》，卷四，頁296-297。

[12] 李晨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錄》，第二卷，上冊（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頁354。

[13] 張聞天1959年8月9日在小組會上的發言。程中原：《張聞天傳》，頁765。

[14] 張培森主編：《張聞天年譜》，下卷（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頁1156、1157。

[15] 毛澤東：〈對于一封信的評論〉（1959年7月26日），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八冊，頁379。

[16] 〈中共中央關于反對右傾思想的指示〉（1959年8月7日），載《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十二冊，頁496。

[17] 毛澤東：〈對遼寧省委執行中央關于反對右傾思想指示的情況報告的批語〉（1959年8月12日），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八冊，頁438。

[18] 〈為保衛當的總路線、反對右傾機會主義而斗爭——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八次全體會議決議〉（1959年8月16日），載《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十二冊，頁511。

[19] 中共中央批轉軍委總政治部〈關于劃分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標準和處理辦法〉（1959年11月21日），載《中華人民共和國實嫌〉，第二卷，上冊，頁381。

[20] 中共中央批轉第二機械工業部黨組《關于開展以反右傾、鼓干勁、保衛總路線為中心的整風運動的情況報告》（1959年10月20日）。

[21] 毛澤東：〈關于中直機關開展反右傾斗爭問題的批語〉（1959年8月22日），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八冊，頁557。

[22] 〈中央國家機關的反右傾斗爭日益深入〉，中共中央辦公廳1959年11月19日編印的《情況簡報》，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八冊，頁594。

[23] 《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錄》，第二卷，上冊，頁401。

[24] 劉友于等：《中國20世紀全史》，第八卷（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1），頁247。

[25] 龔育之：〈我的第二個上級——懷念秦川同志〉，載《黨史札記二集》（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頁237-238。反右傾后，秦川下放農村勞動，1962年七千人大會前后被安排到工交政治部工作。「文化大革命」后期，分配到北京工業大學任黨委書記。1982年任《人民日報》總編輯，1983年任社長。

[26]　6月20日，中共安徽省委常委擴大會議通過《關于張愷帆同志問題的甄別結論》，決定撤銷1959年的錯誤決議，恢復張愷帆的黨籍、名譽和原職務。同年7月18日，中共中央監察委員會批復：表示中央同意安徽省委「對張愷帆同志的甄別處理意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八冊，頁432、433。

[27]《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錄》，第二卷，上冊，頁385。

[28]　中共中央批轉農業部黨組《關于廬山會議以來農村形勢的報告》（1959年10月15日）。

[29]　中共中央批轉北京市委《關于高等學校揭發一批有嚴重資產階級思想的黨員專家的報告》（1960年1月6日）。

[30]　胡繩主編：《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1），頁379、395。

[31] 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頁228。

第八章
堅持「躍進」經濟跌入谷底

一、捍衛「三面紅旗」

1.批駁「國民經濟比例失調」論

政治上批右傾思想，組織上抓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為的是繼續推行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中共中央8月7日下發的〈關於反對右傾思想的指示〉，就明確提出「各級黨組織，必須抓緊8、9兩月，鼓足幹勁，堅決反對右傾思想……全面地掀起群眾性的增產節約運動新高潮，用光輝躍進的成就，迎接國慶十周年」。[1]8月16日，中共八屆八中全會通過的會議公報指出：「對於實現今年的繼續躍進來説，當前的主要危險是在某些幹部中滋長着右傾機會主義的思想。」「全會要求各級黨委堅決批判和克服某些幹部中的這種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思想，堅持政治掛帥，充分發動群眾，鼓足幹勁，努力完成和超額完成今年的躍進計劃。」[2]

為指導對所謂右傾機會主義思想的批判，《人民日報》、《紅旗》雜誌先後發表：〈「得不償失」論可以休矣〉、〈駁「國民經濟比例關係失調」的謬論〉等社論。

強調：「大煉鋼鐵的群眾運動，是全黨和全國人民貫徹執行黨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的一次偉大的實踐，是我國勞動人民為了盡速改變我國『一窮二白』的面貌而進行的一次偉大的鬥爭。這個鬥爭已經取得了我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輝煌的勝利。」説1958年鋼鐵工業的發展，「是空前的高速度」，並極大地改變了全國鋼鐵工業的布局。説甚麼，對發展小高爐的得與失，要從「對國家的經濟建設所發生的長遠的效果來算總帳」；「由『小土群』到『小洋群』，這是一個由普及到提高、由低級到高級的必然過程。沒有當初的『小土群』，也就沒有今天的『小洋群』。」結論是，「全民大煉鋼鐵運動完全不是『得不償失』，而是所得極大」。[3]

説甚麼：1958年重工業生產的發展，基本上保證了基本建設高速度增長的需要，同基本建設的擴大也是適應的。「『以鋼為綱』不是擠掉了其他部門，而是帶動了其他部門。」「國民經濟中主要比例關係是協調的、正常的。」「1958年國民經濟中的比例關係，不僅保證了當年國民經濟的大躍進，而且為1959年國民經濟的繼續躍進建立了基礎。」指责「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是「只見樹木，不見森林，攻其一點，不及其餘……，是完全荒謬的，是反映了资產階級在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飛躍發展面前的驚慌失措」。[4]

這些文章既是要為1958年「大躍進」進行辯護，又是在為當前的繼

續「躍進」尋找根據。但是，對那些強詞奪理的辯護和批判，連毛澤東看了心裏也有點打鼓。為摸清1958年的底細，毛於9月6日寫信給陳伯達，要他找國家統計局的幾位同志，座談研究一下〈駁「國民經濟比例失調」的謬論〉文中的論點是否都對。也就是說，依據是否可靠。陳伯達在召集國家統計局五位成員和其它一些研究經濟問題的人士開會座談後，於8日下午向毛澤東報告。同時附上一份國家統計局根據這次座談會內容整理的《我國1958年國民經濟比例關係資料》。陳報告說：在座談會上，大家基本上同意統計局提出的關於去年大躍進中比例關係的看法，認為去年國民經濟發展的比例關係是相適應的，而不是比例失調。其依據是：「第一部類和第二部類的比例關係是適當的。第一部類內部、第二部類內部的比例關係，基本上也是適當的。」「其中個別的、局部的失調，只是大踏步前進中的暫時性的現象，經過調整，都已經有了很大的改善。」[5]

從1950年代中期以來，在中共黨內，只要中央最高層一旦定了調，大家就只能跟著唱高調，誰也不敢唱低調，更不敢唱反調，這在彭德懷被打成「反黨集團」以後，情況就更是如此。薄一波在回顧上廬山前後的心態時就曾說過：

> 6月間，我請了一位同志按照我的意見準備了一篇題目叫做〈從一年來大躍進中吸取經驗教訓〉的發言稿，有一萬多字。我因工作不能脫身未能按時到會，是7月中旬才上廬山的。上廬山後，有幾位同志告訴我，會議的風向變了，因而我準備的發言稿未拿出來。……由於我預先準備的發言稿未在會上「曝光」，故未受到牽累。但我在上廬山前，曾在四個部作過報告，多次講過這些觀點，廬山會議之後，在「反右傾」的高潮中，中央和國家機關黨委根據領導指示曾把我的講話整理成材料上報。我當時按照領導同志要求向中央作自我批評，……總算通了關。[6]

正是出於這種政治氛圍，陳伯達召集的座談會得出的結論，是毫不奇怪的。出於同樣的原因，中央各部和各省、區黨委這時也紛紛向中央報告「大好形勢」，以及反「右傾」鬥爭出現的新氣象。

9月3日，中共河北省委給毛澤東並中央的報告說：目前工業戰線上已經立竿見影，鋼、鐵、煤的生產急劇上升，農業生產競賽運動已進入一個新的階段。6日，甘肅省委報告說：中央反右傾指示下達後，工業系統即開始檢查和批判右傾思想和鬆勁情緒，對於過去降低的計劃指標，重新作了調整。11日，甘肅又報：自從傳達八屆八中全會精神以來，我省各項工作飛速發展，變化很大，糧食問題也是如此。目前全省夏田普遍豐收，秋田生長很好，豐收在望。24日，石油工業部報告：石油工業在1959年仍然是一個大躍進的形勢。30日，浙江省委報告：以八中全會決議為武器，在幹部中開展一次反右傾、鼓幹勁的整風學習運

動，使總路線在廣大幹部的思想深處落腳生根。10月3日，四川省委報告，9月上、中旬各地相繼召開幹部會議，以八屆八中全會精神為綱，安排當前工作，掀起了一個反右傾、鼓幹勁，增加生產、厲行節約的新高潮。[7]毛澤東看了這些使他興奮的報告。一一批轉各地。

上述這一系列報告，允其是國家統計局提供的《我國1958年國民經濟比例關係資料》，使毛澤東更加相信，反右傾的決策是完全必要和正確的，並認為已經可以看到了反右傾取得的成果，這就是群眾性的大幹快上局面，又重新露頭。

關於1959年國民經濟計劃的主要指標，中共八中全會曾作了調整。8月26日，周恩來在向第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五次會議報告中說：同4月人代會相比，工業總產值由1650億元調整為1470億元，鋼由1800萬噸（包括土鋼）調整為1200萬噸（不包括土鋼），煤炭由3.8億噸調整為3.35億噸。農業總產值由1220億元調整為738億元，糧食產量由10500億斤調整為5500億斤，棉花產量由一億擔調整為4620萬擔。基本建設投資額由270億元調整為248億元，施工的限額以上工程項目由1092個調整為788個。[8]

由於各部門和省、市、自治區在反右傾運動中，都在重新調整指標。10月23日，國家計委和國家建委向中央提出報告增加當年開工的基本建設項目，使全年開工的限額以上的項目又回升到了一千個。11月22日，中共中央同意並轉發了這個報告，確定追加1959年基本建設投資13.6億元，加上原計劃的248億元、上年結轉投資二十億元和各部與地方自籌資金約三十億元，使1959年基本建設計劃投資總額達到311.6億元，比中共八中全會已調整為248億元的方案增加了63.6億元。[9]

在繼續實行大躍進的思想指導下，11月26日結束的第八次全國計劃會議提出1960年國民經濟計劃指標是：鋼1840萬噸，煤炭4.25億噸。糧食6500億斤（不含大豆），棉花6000萬擔。基本建設投資340億元，限額以上項目1596個。[10]1960年1月30日，中共中央批轉了國家計委《關於1960年國民經濟計劃的報告》，要求各地區和各部門照此安排工作。

2.批判包產到戶和解散公共食堂

如果說，對大煉鋼鐵得失的估計，直接關係到搞大躍進是否正確；那麼，是否允許包產到戶和解散公共食堂，就直接涉及到人民公社該不該搞了。因此，在批右傾，鼓幹勁的整社運動中，批包產到戶、批解散公共食堂也就勢所必然。

國家農業部黨組在廬山會議後給中共中央的一份報告中，就把第二次鄭州會議以後，各地落實生產小隊部分所有制的一些具體做法，作為

「右傾」表現加以批判。報告説：在5、6、7幾個月內，農村中也有局部地方曾經出現一股右傾的歪風。具體表現是：

包產到戶，實際是恢復單幹（甘肅武都縣隆興公社紅石生產隊搞包產到戶，並且把土地、車馬、農具按勞動力固定到戶。還有的把全部農活或者大部農活包工到戶，取消了或者基本取消了集體勞動，恢復單幹）；

利用「小私有」、「小自由」，大搞私人副業，「小私有」變成了「大私有」，「小自由」變成了「大自由」；

吹掉了部分供給制；

吹掉了公共食堂（山西公共食堂一度剩下不到農村戶口的20%；青海也曾有訴食堂的苦，颳了解散食堂的風）。[11]

中共江蘇省委在8月22日發出通知，要求對包產到戶「立即批判，加以糾正」。通知説：

> 最近發現有些地方把全部農活都包到戶；少數地方在全部農活包到戶的同時，還實行了全部或部分農作物〔如山芋等〕包產到戶的辦法，或者雖然沒有分開提出包產到戶，但採取了所謂「定田到戶，超產獎勵」等實際上是包產到戶的做法；還有些地方，甚至提出「土地分到戶，耕牛農具回老家」。必須指出，這些做法是錯誤的，都是右傾思想的表現。……實質上説是從集體退到單幹。[12]

中共中央當即將江蘇省委的報告批轉各地，強調：「凡有這種意見和活動的地方，都必須徹底地加以揭露和批判」。[13]

最先展開鬥爭的是河南。8月23日到9月25日，河南省委召開三級幹部會議，集中批判了以省委候補委員、新鄉地委第一書記耿起昌，洛陽地委第二書記王慧智在落實第二次鄭州會議精神時，搞包產到戶的兩個典型。

耿其昌在5月份整社期間，從加強田間管理出發，提出「包工到戶，定產到田，個人負責，超產獎勵（獎70%－90%）的主張，即把五十戶以上的生產隊分開，重新丈量土地、立界碑，按戶包給家長，在家長指導下幹活。明確告訴社員，長期固定下來，幾年不變。與之相應的是，主張公共食堂不要卡得太死，允許社員有一定的自由。[14]新鄉地區有60%以上的生產隊實行了這種包工包產到戶的做法。由於生產方式的改變，自然恢復了一家一戶的生活方式，強扭的公共食堂也就散夥了。

王慧智提出了一個《農村工作若干問題討論提綱》三十條。主要內容是：「包工包產到戶，以產定工，產工一致，全獎全罰，三年不變。」洛陽地區曾有八百個生產小組實行了包工包產到戶，有一百多個食堂散了夥。

河南省的三級幹部會議認為，耿其昌、王慧智「在整社和加強生產管理的掩護下，採取了對中央第二次鄭州會議的修正主義的作法」，「是極端落後的、倒退的、反動的」。「是人民公社化後農村富裕中農反對社會主義的反映。」「實際上是兩條道路、兩種所有制的鬥爭。」「反映了人民公社化以後農村階級鬥爭的新特點。」耿、王二人「已經墮落成為一個右傾機會主義分子」。[15]

同一時期，湖南省在全省展開了整社試點，要求：從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和制度上進一步鞏固人民公社。開展兩條道路的思想鬥爭，駁斥「大躍進是躍退」、「政府背了時，農民造了孽」；「人民公社不如高級社」、「供給制出懶漢，是貧農剝削中農」、「公共食堂不自由，吃不好」；「勞動太緊張，累死人」、「搞超產運動是勞民傷財」；「生活一天天差」等等謬論。對於試點結果，湖南省委報告說：「成年社員中堅決擁護公社和大躍進的，由原來的70%增加到90%；……反對的，由原來的10%減少到1.5%。」具體的表現是：修訂了秋冬生產計劃，一般都比原來的計劃提高50%以上。[16]

中共中央對河南、湖南兩省委開展的鬥爭作了充分肯定，並批示說：「目前在農村中正在進行著一場兩條道路的鬥爭，這場鬥爭是十年來農村中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條道路鬥爭的繼續，是一場很激烈很深刻的階級鬥爭。」兩個省的報告材料表明：「少數代表富裕中農利益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是怎樣倡狂地反對人民公社，反對供給制和公共食堂，反對大躍進、反對總路線和黨的領導，並且根本反對社會主義。」「他們所堅持的顯然是一條反動的資本主義道路。」各省、市、區黨委，都應該安排一個適當的時間，以進行兩條道路的鬥爭和社會主義教育為綱，進行一次整社、整風運動。[17]

對農村反右傾，批包產到戶的後果，國家農業部黨組報告說：「在農業生產和人民公社這兩方面都明顯表現出一種新的形勢。」[18]這就是人民公社搞所有制升級、堅持公共食堂和實行各種「大辦」。

[1] 〈中共中央反對右傾思想的指示〉（1959年8月7日），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十二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頁497-498。

[2] 〈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八次全體會議公報〉，《新華半月刊》，1959年第17號，頁2。

[3] 〈「得不償失」可以休矣〉，《人民日報》社論，1959年9月1日；《新華半月刊》，1959年第18號，頁51-53。

[4] 〈駁「國民經濟比例關係失調」的謬論〉，《紅旗》，1959年第18期社論；《新華半月刊》，1959年第18號，頁53-54。

[5]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八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頁514。

[6]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頁867-869。

[7]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八冊，頁509、526、529、539、545、548。

[8] 《當代中國的計劃工作》辦公室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大事輯要：1949-1985》（北京：紅旗出版社，1987），頁140。

[9]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大事輯要：1949-1985》，頁141-142。

[10]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大事輯要：1949-1985》，頁142。

[11]　農業部黨組：〈關於廬山會議以來農村形勢的報告〉（1959年9月29日），載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農業委員會辦公廳編：《農業集體化重要文件彙編（1958-1981）》，下冊（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社，1981），頁250。

[12]　　　　　　〈江蘇省委的通知〉(1959年8月22日），載《農業集體化重要文件彙編（1958-1981）》，下冊，頁251-252。

[13]　　〈中共中央批轉江蘇省委《關於立即糾正把全部農活包到戶和包產到戶的通知》〉（1959年10月13日），載《農業集體化重要文件彙編（1955-1981）》，下冊，頁251。

[14]　即：有小病的人、婦女月經期、婦女懷孕，有客人需要全家一塊招待、家裏有病人需要照顧、過年過節，有甚麼緊急事情，放假種自留地的時候、下雨不好走路的時候、在一定時候想吃稀飯等。

[15]　〈河南省委幾個典型材料的報告〉(1959年9月29日），載《農業集體化重要文件彙編（1958-1981）》，下冊，頁254-257。

[16]　　〈中共湖南省委農村工作部關於整社試點座談會的報告〉（1959年9月30日），載《農業集體化重要文件彙編（1958-1981))，下冊，頁264-265、266、269。

[17]　〈中共中央轉發湖南省委關於在十個公社中選擇十個大隊結合生產進行整社試點即進行兩條道路的鬥爭的經驗〉（1959年10月15日），載《農業集體化重要文件彙編（1958-1981）》，下冊，頁258-259。

[18]　農業部黨組：〈關於廬山會議以來農村形勢的報告〉(1959年9月29日），載《農業集體化重要文件彙編（1958-1981）》，下冊，頁249。

二、毛澤東讀書漫談理論

1.毛、劉、周各組讀書小組

早在1958年冬，毛澤東就提倡讀書。當時，「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正如火如荼，毛澤東在為「九個指頭」的成就欣喜的同時，也對「一個指頭」的問題進行思考。因此，1958年11月9日，在第一次鄭州會議期間，他就曾給中央、省、地、縣四級黨委委員寫了〈關於讀書的建議〉。要求聯繫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經濟建設，讀斯大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馬恩列斯論共產主義》兩本書。並說，將來有時間，可以再讀一本蘇聯編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為的是「使自己獲得一個清醒的頭腦，以利指導我們偉大的經濟工作」。並說：「現在很多人有一大堆混亂思想，讀這兩本書就有可能給以澄清。」[1]1959年6月29日，毛對即將在廬山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出了十八個問題，第一個就是「讀書」，具體要讀的就是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第三版）。毛說：我們提倡讀書，使這些同志不要像熱鍋上的螞蟻。整年整月陷入事務主義，搞得很忙亂，要使他們有時間想想問題。現在這些人都是熱鍋上的螞蟻，要把他們拿出來冷一下。[2]

但是，就在人們發熱的頭腦開始稍有降溫的時候，發生了廬山的反右傾鬥爭。為了回答國內外對大躍進、人民公社的質疑，為了從理論上論證總路線的正確性，毛澤東再次宣導讀書。對這時提出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理由，毛澤東說：對社會主義的探索，在理論上成系統的東西還不多，除了斯大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外，只有這本書。毛說：這本書「缺點有，但比較完整」。1960年1月17日，毛澤東在上海會議上又提出：中央各部門、各省、市、自治區都要以第一書記掛帥，組織讀政治經濟學的小組，先讀這本書的下半部，五一節以後讀上半部，讀的方法是用批判的方法，不是用教條主義的方法。他說：你不讀，我們也不瞭解蘇聯，不瞭解他講些甚麼事情，同時我們要寫教科書，也沒有比較。

1959年冬，毛澤東組織有陳伯達、胡繩、鄧力群、田家英等參加的讀書小組，從1959年12月10日至1960年2月9日，先後在杭州、上海和廣州，採取邊讀邊議的方法，通讀蘇聯科學院研究所編寫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修訂第三版下冊。在此之前，1959年11月2日至22日，劉少奇在海南崖縣（今三亞）組織了有經濟學家王學文、薛暮橋，以及廣東省委第一書記陶鑄、書記處書記林李明等參加的讀書小組；在此之後，周恩來在廣東從化於1960年2月13日至3月2日，組織了有李富春、陶

鑄、宋任窮、吳芝圃、胡繩、許滌新、薛暮橋、王鶴壽、呂正操、陳正人等人參加的讀書會。

2.毛澤東自信發展了馬列主義

對毛澤東這次讀書的情況，鄧力群回憶說：

> 毛主席對這次讀書活動親自安排，規定每天下午一起讀書，並吩咐胡繩、田家英和我輪流誦念，邊讀邊議。我們三人又商議了一下，作了分工：他們倆輪流朗讀，我作記錄。12月10日讀書開始，邊讀邊議，聽毛主席談話，大家也插幾句話。毛主席起初未注意我們的分工，問我：你怎麼不讀？我說：我的口音不標準。毛主席看看我，知道我在作記錄，就沒說什麼。

毛讀這本書時的評論分兩個部分，一是在書上做的批註，二是口頭議論。胡喬木讀後認為，毛的談話「記錄內容，批評教科書的居多，肯定的偏少；而旁批肯定教科書的是多數，批評的是少數」。[3]

無論是對教科書的肯定，還是批評，毛澤東所要尋找的是一條中國將超過蘇聯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在此之前，毛澤東就曾極其自信地說過：「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大發展在中國，這是毫無疑義的。」[4]

對毛澤東讀書的談話和批語，不少學者有過評論。應該說，毛澤東的讀書談話，不乏有見地的思想，但就主要傾向而言，則是以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的思想去批判教科書的觀點，用以回擊國內「右傾機會主義者」的進攻，國外赫魯曉夫、杜勒斯、尼赫魯的挑戰。[5]其主要觀點有：

(1)「窮是中國躍進的動力」

毛說：人類歷史一百萬年中：資產階級的三百年，是一個大躍進。無產階級為甚麼不能大躍進？我們的任務是要爭取把躍進繼續下去，要把全國人民的幹勁長期保持下去。[6]他肯定：（教科）書里講了高速度、按比例、計劃性，等等。這些都是講馬克思主義的。[7]

但批評說：教科書只講了政治環境要求高速度，沒有講社會主義制度本身許可高速度，這是一種片面性。如果只有需要，而沒有可能，那怎麼樣能高速度呢？[8]

那末，躍進的動力來自何處？毛認為：法國《快報》（*L'Exprese*）的評論中說：「窮是中國躍進的動力。」「窮是動力」，這句話講得很對。因為窮，就要幹，要革命，要不斷地革命。富了，事情就不妙了。中國現在不富，將來富了，也一定會發生問題。[9]毛說：我們現在就是要這樣幹，「開足馬力奮勇前進。」[10]我們的任務是，經過一二十年到幾十年的努力，在主要產品方面首先超過英國，然後超過美國。[11]

至於，實現高速度的方法，就是總路線規定的一系列並舉方針和大搞群眾運動。毛說：我們實行洋土並舉、大中小並舉的方針，不只是由技術落後，人口眾多，要求增加就業，主要是為了高速度。[12]毛批評：教科書有時也講發動群眾，也引了一些列寧關於發動群眾的好話，但是沒有展開，不敢像我們這樣大搞群眾運動，不講兩條腿走路。[13]

關於建設速度問題，劉少奇也十分關注。他說：現在我們既要高速度、又要按比例，是不是可能？這是矛盾的統一。他主張勒緊褲帶，以加快速度。劉說：苦戰三年，不增加工資，多積累。這是基本問題。積累多可以多搞基建。……看來苦戰三年過不了關，要苦戰五年到七年。[14]

(2)經濟愈落後，從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是愈容易

在讀到書中引用列寧的話：「由於歷史進程的曲折而不得不開始社會主義革命的那個國家愈落後，它由舊的資本主義關係過渡到社會主義關係就愈困難」時，毛說：這幾句，現在看來説得不對。事實證明，在資本主義有了一定發展水準的條件下，經濟愈落後，從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是愈容易，而不是愈由困難。人愈窮，才愈要革命。[15]

毛認為：社會主義的社會制度、生產關係，要鞏固：但是不能強調過分。[16]他批評教科書把這兩種公有制的形式（指：社會主義集體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説成是神聖不可侵犯的。[17]

毛説：北戴河會議關於人民公社的決議的第五段，[18]現在證明是正確的。首先社有化，然後國有化，這是一種必然的趨勢。[19]社會主義國家和社會主義建設不能一直建立在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兩個不同所有制的基礎上。[20]如果不從基本隊有制轉變為基本社有制，人民公社還不能鞏固，還可能垮臺。[21]

劉少奇也認為書中：講兩種所有制是「神聖不可侵犯的」，是動不得的。把差別長期保存下來，這是不妥當的。兩種所有制的差別是暫時現象，是能夠改變的。他強調：社會主義可以是全民所有制，不是到共產主義才能有。應該在社會主義階段做好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準備，否則到那時過渡不了……[22]

關於人民公社的所有制由隊有向社有過渡的條件。毛説：人民公社由基本隊有轉變為基本社有的一個決定性的條件，是社有經濟的收入占全社總收入的一半以上。在轉變的時候，是隊共社的產，而不是社共隊的產。社員在這種「共產」以後，比在這種「共產」以前有利。這樣，估計絕大多數人不會抵觸。[23]

教科書提到在蘇聯一些地區曾經成立過的農業公社時説，「這些公社在當時沒有生命力，因為它們是在技術不發達和產品不足的條件下產生的」。毛批評：這是一筆抹殺。[24]。毛認為：搞大公社是個重要問

題，量變了，一定會引起質變，會促進質變。我們的人民公社是「一大二公」，首先是「大」，接着必然提高「公」的水準，量變必然帶來部分的質變。[25]

(3)實行供給制，逐步達到按需分配

毛多處批評：教科書中不強調政治掛帥，反復強調物質刺激，引導人走向個人主義。[26]毛認為：應當講個人利益服從集體利益，暫時利益服從長遠利益，局部利益服從全局利益。[27]就個人利益而言，毛提出的原則是：一不死人，二不使身體弱下去，並且逐步略有增強，這兩條是基本的。有了這兩條，其它東西，有也可以，沒有也可以。[28]

因此，毛主張實行供給制。他説：在根據地的時候，我們實行供給制，人還健康些，還不為了追求待遇來吵架。解放後，實行工資制，評級了，反而問題發生得多……又説：我們的黨是連續打了二十多年仗的黨，長期實行供給制。……一直到解放初期，大體是過著平均主義的生活，工作都很努力，打仗都很勇敢，完全不是靠甚麼物質刺激，而是靠革命精神的鼓舞。……這些歷史經驗，對於我們解決社會主義建設的問題，有着很大的意義。[29]又説：按需分配是逐步實現的。可能是主要的物資能充分供應了，首先對這些物資實行按需分配，然後根據生產力的發展，推行到其它產品去。[30]

劉少奇也批評説：「按勞分配」萬歲，是難以走到共產主義的。他同樣認為實行供給制是通向按需分配的必由之路。劉説：按需分配，是逐步實現的。有些能夠滿足先。先從衣食的需要開始，讓人們先滿足吃、穿的需要，然後有甚麼東西，可以滿足甚麼東西（例如手錶就不是一下子就能滿足了的）。也可以半供給、半發工資。總之，不是所有的東西在一個早上都做到，而是逐步的。[31]

此外，毛澤東在談話中還用矛盾的普遍性，社會矛盾是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動力的哲學觀點，批評教科書：不敢承認他們國內還有階級鬥爭，還有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鬥爭。[32]毛認為：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矛盾、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兩個階級的矛盾。[33]

3.讀書談話的傳達和效應

毛澤東讀《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很快在中共黨內作了傳達。鄧力群回憶説：

> 在杭州的這段時間，讀完了第三十二章，第三十三章開了頭。我每天記錄，並在梅行同志幫助下。當天整理一遍。離開杭州前，將已讀部分談話記錄整理成冊，並冠以《讀〈政治經濟學

教科書》（社會主義部分）筆記》。經胡繩、田家美看過，做了個別文字改動。

1月4日，我們和毛主席離開杭州，去上海準備參加1月7日至17日在这裏舉行的政治局擴大會議。

5日下午，在停靠上海站的火車上，讀完了第三十三章，我即把整理好的記錄交給中央辦公廳，請他們打印、分送政治局常委。

政治局擴大會議分組討論時，各組要求參加毛主席讀書小組的人傳達毛主席讀書時的談話內客。我被分到朱德、鄧小平同志所在的組。我問：毛主席沒叫傳達，可以傳達嗎？鄧小平同志說：可以傳達。於是，我按照整理的記錄詳詳細細地做了傳達。陳伯達、胡總、田家英也在其它二個小組裏分別傳達了毛主席讀書的談話內容。

……

上海會議結束後，我們隨毛主席去廣州，在白雲山讀完了第三十四章至第三十六章和結束語，至此「教科書」下冊讀完，時值1960年2月9日。陶鑄、胡喬木同志參加了這段讀書活動。

在這期間，周總理向毛主席報告，說讀了毛主席關於教科書的談話，認為很好。他想組織國務院各部委的負責同志一起讀書，一起學習毛主席談話記錄。得到毛主席同意。他把送給他的那本談話記錄交給胡繩編一選本，印發國務院各部委、全國各省市自治區。「文化大革命」期間，這個選本在國內國外傳播很廣。

春節以後，回到北京。我到公安部黨組傳達毛主席在上海和廣州讀書談話內容。隨後，我又同梅行同志把毛主席在廣州讀書的談話記錄整理了一遍，毛主席讀政治經濟學的談話記錄就整理完全了。

胡繩編的那個選本印發以後，中共中央各部門、國務院各部委都分別組織領導同志讀書和學習毛主席的談話記錄。大概是1960年3、4月間，陸定一同志組織宣傳文教部門的負責同志讀書，要我去傳達。除了傳達整理出來的內容以外，還補充了一些沒有整理進那個本子裏面的內容。與會同志有的做了詳細筆記。

接着，在中央黨校向全國各省、市、自治區參加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編寫組的全體同志又做了一次詳細傳達。[34]

從鄧力群記述的上述過程，可以看出，毛澤東的讀書談話在1960年春季傳達的速度很快、面也很廣。因此，談話精神很快發酵—搞所有制過渡升級、強制鞏固公共食堂、大辦城市人民公社、要求提前實現全國農業發展綱要。

關於人民公社的所有制結構，從1958年12月中共八屆六中全會，提

出要劃清兩個界限：集體所有制與全民所有制的界限；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的界限，1959年3月第二次鄭州會議提出反對兩個平均主義《把富隊與窮隊拉平，在社員之間搞平均分配》。到4月的上海會議和中共八屆七中會議，已明確為「公社的三級所有制中，基本上是生產隊〔大體相當於原來的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所有制」，「生產小隊的部分所有制」。對糾正1958年人民公社化運動中颳起的「共產風」起了一定的抑制作用。然而，在大反「右傾」的情勢下，很快又提出了所有制過渡升級的問題。

1959年12月，主管農業的中央書記處書記譚震林召集浙、皖、蘇、滬四省市座談會，討論人民公社的過渡問題：並通過《關於人民公社過渡問題》的會議紀要。提出由基本隊有制向基本社有制過渡的條件和時間是：達到「分配給社員每人平均二百元左右」的收入標準；在條件較好的上海，大約三到五年的時間即可過渡。其他各省大約五年左右，或者更長一些時間。為實現分配給社員平均每人二百元的標準，要求「從現在起，就應當積極發展社有經濟，為過渡創造條件」。為此，必須「大搞社辦工業，大量發展農林牧漁副」。並在五年或稍長一些時間，「使社有經濟在公社經濟中佔的比重達到百分之五十以上」。紀要認為：「過渡的時間雖然有一個大致的杠子，但過渡必須根據各個公社的情況，有先有後……

一般公社的發展趨勢，將是分批過渡成熟一批過渡一批；有些公社，大隊情況基本平衡，同時具備了過渡條件的，也可以一起過渡。」[35]

這個紀要和毛澤東讀書談話的傳達，很快有人提出要強化幹部的「過渡意識」的建議。中共江蘇省委在關於整風運動的情況報告中說：這次整風運動，使我們深刻地感到，黨內有相當一部分同志對社會主義革命思想準備不夠。具體表現是：對小生產者和一部分富裕中農的自發資本主義傾向，比較普遍地意識不足；對高速度建設社會主義的思想準備不夠，不瞭解整個60年代都要連續躍進，都要高速度，積極創造條件，堅決向共產主義過渡；對於徹底消滅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思想和習慣勢力，認識不足；對於政治思想戰線上的階級鬥爭的長期性、複雜性、曲折性，波浪起伏的發展認識不足，對於意識形態方面的階級鬥爭，估計不足。據此提出：在黨員幹部中很好地確立不斷革命論和革命發展階段論相統一的思想，堅決把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底，並加速建設，準備條件向共產主義過渡，這是黨的思想建設的重要內容之一。[36]毛澤東對江蘇的意見十分欣賞，於3月6日批示說：

> 江蘇省委寫的關於整風中三個問題的分析，是正確的，應當提起你們大家一齊注意並採取具體措施逐步地解決這三個大問題。[37]

幾乎就在同時，全國農業工作會議提出了所有制過渡的時間表。3月7日，國務院農業部黨組向中央報告說，全國農業工作會議要求：1962年提前實現全國農業發展綱要；1967年按當時全國城鄉人口，每人平均佔有糧食1500斤。1967年提前實現農業機械化和在機械化基礎上的園田化。人民公社從基本隊有制過渡到基本社有制，三年積極準備，小部試點，五年大部，八年完成。[38]

為鞏固人民公社的共產主義因素，中共中央要求各地加強對公共食堂的領導，積極辦好公共食堂。據國家統計局統計，截至1959年底，全國農村已辦公共食堂391.9萬個，參加食堂吃飯的約四億人，占人民公社總人數的72.6%。其中：90%以上人口參加食堂的，有河南、湖南、四川、雲南、貴州、上海、安徽七個省市；70%至90%人口參加食堂的，有北京、新疆、浙江、廣西、廣東、河北、山西七個省市；50%至70%人口參加食堂的，有湖北、福建、江西、陝西、江蘇、寧夏六個省區；50%以下人口參加食堂的，有甘肅、山東、青海、吉林、黑龍江、遼寧，內蒙古七個省區，1960年2月，貴州省委向中央報告說，我省農村公共食堂現有十三萬多個，固定的或基本上固定的占80%左右，不固定的約占20%。辦得好的食堂，已成為生產小隊政治、經濟、文化活動的中心，鞏固了人民公社，生產也搞得很好，顯示了食堂的優越性和重要性。有的還提高了集體化的程度，形成了較大的居民點，為建設新村創造了條件。目前，當務之急是對不固定、不鞏固的食堂立即加以整頓。[39]

3月6日，中共中央批轉貴州省委《關於目前農村公共食堂情況的報告》時，加上了毛澤東代擬的批語，「貴州這一篇食堂報告，是一個科學總結，可以使我們在從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的事業中，在五年至十年內，躍進一大步。」毛要求各省、市、區「一律仿照執行，不應有例外」[40]

與之相應的是，提出了限制和收回社員的自留地問題。為鞏固公共食堂，河北省提出，對社員自留地應該採取限制和逐步削弱的辦法：一是嚴格控制自留地的數量，二是將現有自留地劃一部分給食堂種菜和飼料？三是小片開荒和零散閑地由生產隊統一規劃，適當分配給小隊經營，一律不許社員開荒。[41]

中央辦公廳在報告河北省的意見時說：其它各省，對這個問題還沒有提出意見。毛澤東指示：他們應當研究，提出意見。[42]顯然是贊同河北省取消自留地的主張。

[1] 毛澤東：《關於讀書的建議》（1958年11月9日）。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頁432-433。

[2] 毛澤東：（廬山會議討論的十八個問題）（1959年6月29日，7月2日），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文集》，第八卷，頁75-76。

[3] 鄧力群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學會1998年1月印的《毛澤東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註和談話》（清樣本）寫的後記。

[4]　毛澤東關於國際形勢的講話提綱（手稿），1959年12月，轉引自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逄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96）》，下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頁10。

[5]　毛澤東在讀書談話中説：1959廬山會議的這次曲折，國際上是全世界反華。我們的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引起全世界帝國主義的反對。杜勒斯反對我們的大躍進，説我們搞奴隸勞動；反對我們的人民公社，説公社破壞了家庭。社會主義國家也有些人不滿意、有些人懷疑。在亞洲，尼赫魯製造中印邊界事件，赫魯曉夫站在尼赫魯一邊反華。鄧力群編輯及整理：《毛澤東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註和談話》（清樣本）《北京：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學會，（1998）》，頁891。

[6]《毛澤東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註和談話》（清樣本），頁718。

[7]《毛澤東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註和談話》（清樣本），頁800。

[8]《毛澤東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註和談話》（清樣本），頁194。

[9]《毛澤東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註和談話》（清樣本），頁685-686。

[10]《毛澤東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註和談話》（清樣本），頁174。

[11]《毛澤東讀社會主義政洽經濟學批註和談話》（清樣本），頁685。

[12]《毛澤東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註和談話》（清樣本），頁204-205。

[13]《毛澤東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註和談話》（清樣本），頁801。

[14]　劉少奇在討論《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的發言。人民出版社資料室編：《批判資料──中國赫魯曉夫劉少奇反革命修正主義言論集1958.6-1967.7）》（北京：人民出版杜資料室，1967），頁29。

[15]《毛澤東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註和談話》（清樣本），頁145。

[16]《毛澤東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註和談話》（清樣本），頁736。

[17]《毛澤東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註和談話》（清樣本），頁329。

[18]　指人民公社由集體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的過渡。決議第五段説：「人民公社的集體所有制中。就已經包含有若干全民所有制的成分了。這種全民所有制將。在不斷發展中繼續增長。逐步地代替集體所有制。由集體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過渡，是一個過程，有些地方可能較快。三、四年內就可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較慢，需要五、六年或者更長一些的時間。」〈中共中央關於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1959年8月29日），載《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十一冊，頁449。

[19]《毛澤東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註和談話》（清樣本），頁456。

[20]《毛澤東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註和談話》（清樣本），頁215。

[21]《毛澤東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註和談話》（清樣本），頁77。

[22]　劉少奇在討論《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的發言。《批判資料──中國赫魯曉夫劉少奇反革命修正主義言論集》。頁115，125。

[23]《毛澤東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註和談話》（清樣本），頁276。

[24]《毛澤東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註和談話》（清樣本），頁224-225。

[25]《毛澤東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註和談話》（清樣本），頁568。

[26]《毛澤東讀社會主義政洽經濟學批註和談話》（清樣本），頁801。

[27]《毛澤東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畢批註和談話》（清樣本），頁431-432。

[28]《毛澤東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註和談話》（清樣本），頁462。

[29]《毛澤東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註和談話》（清樣本），頁474-475。

[30]《毛澤東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註和談話》（清樣本），頁283。

[31]　劉少奇在討論《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的發言《批判資料──中國赫魯曉夫劉少奇反革命修正主義言論集》，頁115，223。

[32]《毛澤東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註和談話》（清樣本），頁800。

[33]《毛澤東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註和談話》（清樣本），頁121。

[34]　鄧力群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學會1998年1月印的《毛澤東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註和談話》（清樣本）寫的後記。

[35]　　〈關於人民公社過渡問題──浙、皖、蘇、滬四省市座談會紀要〉（1959年12月25日），載《農業集體化重要文件彙編（1958-1951）》，下冊，頁275-277。

[36]　　中共中央辦公廳1960年3月1日編印的《情況簡報》103號，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九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頁52-53。

[37] 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九冊，頁52。

[38]　農業部黨組：〈關於全國農業工作會議的報告〉（1960年3月7日），載《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十三冊，頁100。

[39]　中共貴州省委：〈關於目前公共食堂情況的報告〉(1960年2月24日），載《農業集體化重要文件彙編（1958-1981）》，下冊，頁286-290。

[40]　（中共中央批轉貴州省委:〈關於目前農村公共食堂情況的報告〉(1960年3月6日），載《農業集體化重要文件彙編（1958-1981）下冊，頁285。

[41]　中共中央辦公廳根據河南、河北、山西、山東、甘肅、遼寧、吉林、黑龍江八省的電話匯報整理的〈八個省農村公共食堂情況〉，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九冊，頁74。

[42]　〈中央關於加強公共食堂領導的批語〉（1960年3月15日），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九冊，頁71。

三、城鄉再颳躍進風

1.人大通過的躍進計劃

為繼續實現大躍進，《人民日報》繼1960年元旦社論提出，要在整個60年代實現「連續躍進」的要求後，1月2日又發表〈開門紅，滿堂紅，紅到底〉的社論，要求在全國範圍，各行各業從第一季度起，平均日產量不低於或略高於1959年第四季度的水準，「並在這個基礎上穩步上升，實現月月紅、季季紅……全面躍進」。

3月30日至4月10日，全國人大舉行二屆二次會議，審議了國務院副總理兼國家計委主任李富春作的《關於1960年國民經濟計劃草案的報告》、國務院副總理兼財政部長李先念作的《關於1959年國家決算和1960年國家預算草案的報告》會議通過了上述兩個報告的決議、通過了《1956年到1967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及其相應的決議。批準了國務院副總理譚震林作的《為提前實現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而奮鬥》的報告。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在大會最後一天作了《當前國際形勢和我國對外關係問題》的講話。

會議通過的《1960年國民經濟計劃》規定的各項主要指標是：工農業總產值2980億元，比上年增長23%（其中農業增長12%，工業增長29%）。鋼產量1840萬噸，比上年增長38%；生鐵2750萬噸，比上年增長34%；煤炭4.25億噸，比上年增長22%；發電量555至580億度，比上年增長34%至40%。糧食5940億斤，棉花5300萬擔，各比上年增長10%。國家預算內基本建設投資325億元（不包括地方自籌的六十億元），當年施工的限額以上建設項目1520個。[1]會議通過的《關於為提前實現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而奮鬥的決議》，説1958年和1959年兩年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全國農業發展綱要的某些內容已經被實際生活所超過，有些已經基本實現、大部實現，或者在部分地區提前實現了。「這就使我們完全有可能再經過一個時期的艱苦努力提前兩年或者三年實現全國農業發展綱要。」[2]

《人民日報》3月31日發表〈一定要繼續躍進，一定能繼續躍進〉的社論，認為國民經濟的繼續躍進「一定能夠實現」。

3月29日至4月11日舉行的全國政協三屆二次會議的全體委員，列席了全國人大二屆二次會議。會議補選何香凝為政協第三屆全國委員會副主席。

2.農村再次趁窮過渡

人大通過的計劃指標雖仍偏高，相對來説還算比較冷靜。隨着毛澤東讀書談話的傳達和發酵，人民公社所有制過渡升級等問題再次提了出來為創造過渡條件，又要求大辦社有工業等各項事業。於是，「一平二調」的「共產風」，好大喜功的浮誇風和強迫命令風在農村再度颳起。

1960年2月，中共廣東省委在報告中就曾談到：（一）一些公社，為發展公社一級的經濟，積極做過渡的準備，重新出現亂抓亂調或無償抽調大隊的種苗、生產工具、建築材料及其它物資，佔用大隊的土地；無償、無限度地調用大隊的勞動力；將一些大隊或小隊轉為社辦農場，以此來擴大公社一級的經濟比重。（二）為多搞公共積累，該分給社員的沒有全部分到社員手上；有的甚至取消了工分，或是只記不清，不按勞動日發工資；個別地方將社員的自留地和家畜、家禽又集中了起來，並對社員家庭副業生產進行限制。（三）大搞非生產性的建築，建禮堂、辦公大樓，購置非生產性的設備，參觀評比大搞請客招待，擺宴席，講究場面，講究形式，財政開支無制度，不愛惜人力、物力、財力的大少爺作風十分嚴重。（四）不如實反映情況，謊報成績，隱瞞缺點，作風「浮而不深、粗而不細、華而不實」；只談高指標、大計劃，不具體研究條件，不認真採取措施，組織行動，説的多，做的少；不和群眾商量，草率決定，不關心群眾生活，不注意勞逸結合。[3]

山東也出現相同的情況，曲阜縣陳莊公社是省、地委搞過渡的試點，其它的公社幹部知道後認為：「普遍過渡的時候快到了」。因此，多數公社的領導幹部打算「秋後搞過渡」。在這陣過渡風颳起以後，各公社為發展社有經濟紛紛對生產隊搞「一平二調」。範縣新城公社乾路生產隊支部書記于保清説，「現在勞力牲畜隨便調，土地隨便佔，樹也隨便刨。59年社員一年未分到錢，誰餘誰缺也不知道，不清不混。」惠民縣姜樓公社副書記呂振清説：「俺社三千六百畝經濟林，已宣布歸社所有，公社搞了一萬畝林場，也是無償地佔用大隊的土地。」淄博市張店區房鎮公社生產大隊支書房久亮説：「公社把俺隊的馬車都集中起來，我們運肥運煤，都得交腳力，大隊支不起運費，現在誰也不想買馬車了。」随之而起的是浮誇風：聊城地區的壽張縣上報全縣養猪七十一萬頭，據幾個公社摸底，最多不超過四十萬頭。聊城地區上報大家畜懷孕率達到76%，據三個隊調查多的達60%，少的只有30%；上報種棉花390萬畝，省裏去調棉種時卻説已種四百五十萬畝。伴之而來的是幹部對社員的強迫命令風，無棣縣城關公社的黨委常委蘇保德，竟對社員幹活打盹，用鐵鍁鏟。[4]

山西省委4月召開的六級幹部會議上也反映，發展社營經濟中的「一平二調」現象是和搶過渡的思想分不開的。為發展公社一級的經

濟，各公社制定1960年發展社有經濟的計劃，有70%的公社有「一平二調」的打算，其辦法是：無償抽調；低價收買，不等價交換；不付現金，有價無款；攤派發展社辦經濟基金；隨意佔用管理區的土地；隨意抽調管理區的勞力。公社向管理區提取的積累，有的要佔管理區當年積累的70%至80%。鋪張浪费現象較普遍的是，大搞非生產性建築和購置，聞喜縣城關公社提出的口號是：「公園賽西湖，禮堂赛縣府，風景赛杭州。」太原市吳村公社提出破舊立新，把有七十四戶人家的居民點的住房全部拆掉。太谷縣胡村公社拆毀民房修了一條一百米長二十米宽的馬路。幹部作風方面，打人罵人，特權自私，腐化墮落，挾嫌報復也有所發展。洪洞縣雄火公社女社員高自英，因給婦女隊長王清提了兩條意見，王清就用各種辦法向高報復，最後高自英被迫自殺。[5]

為了盡快發展社有經濟，各地又出現了各種「大辦」一起上的熱潮。此前，毛澤東看到一篇天津市畜牧局整理的河北省吳橋縣王謙寺公社一個很窮的生產隊，因大力發展養豬，不僅解決了吃肉問題，而且解決了肥料問題，糧食產量一年翻了一番，窮隊變富隊的文章。毛讀後非常高興，當即给新華社社長吳冷西寫了一封長信。説道：「此件很好，請在新華社《内部参考》發表。看來，養猪業必須有一個大發展。除少數禁猪的民族以外，全國都應當仿照河北省吳撟縣王謙寺人民公社的辦法辦理。」毛批評説：「關鍵在於一個很大的幹勁。拖拖沓沓，困難重重，這也不可能，那也辦不到，這些都是儒夫和懶漢的世界觀，一點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雄心壯志都沒有，這些人離一個真正共產主義者的風格大約還有十萬八千里。」「各地公社養猪不亞於吳橋的，一定還有很多。全國都應大辦而特辦。要把此事看得和糧食同等重要」。[6]由此，在大辦養豬場的同時，颳起了一陣大辦之風——大辦社有工業、水利、交通等等。

3.城市建立人民公社

1958年的人民公社化運動，主要在農村進行。北戴河會議關於人民公社的決議，並沒有對城市提出要求。只是在公社化浪潮中，鄭州和哈爾濱等個別城市，自發地成立了人民公社，其性質類似社區服務性組織。當年12月，中共八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第一次正式提出成立城市人民公社的問題，並稱要使它成為舊城市改造和新城市建設的工具，成為生產、交換、分配和人民生活福利的統一組織者。但當時也只是要求「在城市繼續試點，一般不忙大量興辦」。

1960年2月22日，中華全國總工會城市人民公社組向中央報告了哈爾濱市香坊人民公社的發展情況；28日，中共河南省委向中央報告了城

市人民公社鞏固和發展情況。這兩個報告都突出介紹了辦城市人民公社的優越性，說它是對城市的一次全面徹底的社會主義改造；發揮了城市的潛力，促進了生產大發展，推動了全面大躍進；普遍辦起了集體福利事業，把廣大婦女從繁瑣的家務勞動中解放了出來；群眾的集體主義思想和共產主義的道德品質得到迅速提高；更利於對资產階級分子及其家屬的團結、教育、改造；進一步鞏固了人民民主專政。建議：必須進一步鞏固和發展城市人民公社。3月6日，劉少奇為中共中央起草關於城市人民公社問題的指示稿，明確提出：中央認為對於城市人民公社的組織試驗和推廣，應採取積極的態度。3月8日，毛澤東對指示稿作了修改，加寫了以下內容：

——看起來，以大工廠、以街道、以機關學校三種為中心，而又有各種所有制（國有制，社有集體制，社以下集體所有制）同時存在於一個公社內，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很好的。

——（北京、上海、天津、武漢、廣州——引者註）慢慢掛上公社牌子則是可以的。除這五個城市外，其他一切城市則應一律掛牌子，以一新耳目，振奮人心。

——中央希望今年上半年全國城市普遍試點，取得經驗，下半年普遍推廣。[7]

3月9日，中央《關於城市人民公社問題的指示》下達。《人民日報》接着發表社論，新華社也接連報道鄭州、哈爾濱、北京、重慶等城市人民公社的典型事跡。4月9日，出席全國人大二屆二次會議的北京、上海、天津、武漢、廣州五大城市的市委書記，在會上作了《建立城市人民公社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聯合發言，盛讚城市人民公社不僅能促進生產高速度的發展，而且還是徹底改造舊城市，使之適應於現階段社會主義建設和未來共產主義理想的重要工具，表示：大城市也必須逐步分批地實現人民公社化。會後，在全國迅速掀起了一個聲勢浩大的興辦城市人民公社的運動。據統計，截止1960年5月10日，在全國180多個大中城市、6900萬人口中，建立起1039個人民公社，入社人口3900多萬，佔全部城市人口的55.6%。公社興辦的工業生產單位九萬多個，服務站十萬多個，公共食堂九萬二千多個，托兒所（幼兒園）九萬五千多個。[8]

關於建立城市人民公社的具體政策，中共中央5月11日批轉了北京市委關於城市人民公社工作問題的報告。對北京市委提出的組織城市街道人民公社的步驟以及有關政策表示贊同，認為具有普遍意義。即：城市人民公社不僅應當有計劃地積極地分期分批地組織起來，而且應當學農村組織農業合作社時期一樣，先組織貧農下中農，以便先鞏固一批，在鞏固的基礎上再發展；先組織生產，後組織生活；有意識地讓一些资本家、高級知識分子、民主人士、舊官吏的家屬遲一些入社；不去動用

他們的生活資料和房屋；政社合一也遲一步正式提出；下放零售點服務業，一般應推後；暫不和大工廠、機關、學校合併組織。中央要求各地認真研究，使城市避免了像農村人民公社那樣一哄而起造成混亂局面。

4.工業指標再度升高

全國人大二屆二次會議剛通過的1960年國民經濟計劃，中共中央在4月14日又同意並批轉了冶金部提出的1960年鋼產量第三本賬的計劃和鐵道部、煤炭部及冶金部關於實現這個計劃的聯合報告，[9]5月份又對各項指標作了全面調整。5月10日，國家計委、經委、建委黨組向中央呈送了1960年工業生產、交通運輸、基本建設計劃第二本賬安排的報告。其中說，在4月份召開的工業書記會議上，大家認為：「當前國民經濟發展的形勢很好，下半年還會更好。」「一個以煤、鐵和交通運輸為中心的『小土群』、『小洋群』運動的高潮正在形成。」「為了促使國民經濟在1960年獲得更好、更大、更全面的躍進，有對一些主要指標及時地作出第二本賬的安排，使這本賬實際上成為黨內的第一本賬，作為對內的確保完成和超額完成的計劃。」根據「以鋼為綱，全面躍進」的方針，把鋼鐵生產大力搞上去，並且帶動其他工業的大發展。提出安排：鋼2040萬噸，比原計劃增加200萬噸；生鐵3100萬噸，增加300萬噸；煤炭4億6200萬噸，增加3700萬噸。預算內基本建設投資由原定的325億元增到382億元，增加五十七億元，新增限額以上的基建項目八十三個。[10]

中共中央5月30日批準了這個報告，並把鋼的指標由2040萬噸提高到2100至2200萬噸，作為第二本賬。中央批示，同意第二本賬的安排。強調：「這本賬實際上是黨內的第一本賬，作為對內的確保完成和超額完成的計劃，各部門、各地方安排工作、檢查工作，一律以此為準。」「要集中力量大抓煤、鐵、礦、運，以此為中心，大力保鋼，帶動其他。努力爭取今年鋼的產量達到2100萬噸到2200萬噸。」[11]

把鋼產量提高到2000萬噸以上，是毛澤東1月17日在上海會議閉幕會上提出來的。他當時說：「關於鋼產指標，按照中央的方案，第一本賬，即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提出的，是1835萬噸，第二本賬，爭取2000萬噸或者還稍多一點。」他認為：「廬山會議以後很靈，生產月月高漲，看來今年至少不弱於去年，可能比去年更好一些。」[12]

然而，實際情況，既不如毛澤東在1月間的樂觀估計，也非國家計委等三委黨組向中央報告所說的是甚麼「形勢很好」。1960年第一季度的鋼產量就低於1959年第四季度，4月份的生產更是繼續下降。據新華社報道：進入4月以來，鋼鐵生產情況不好，日產水平比3月份都有不同程度的降低。4月1至20日，鋼的日產水平平均是48200噸，比3月份日

產水平降低3400噸；鐵的平均日產水平是77700噸，比3月份降低3600噸左右。原因是設備缺乏檢修，原料供應不上。[13]這說明，鋼產量不只2200萬噸、2100萬噸完不成，就連2040萬噸也成問題。而鋼產量指標一再提高，必然衝亂了整個國民經濟計劃的安排，於是在全國又掀起了保鋼、保煤、保運輸的「躍進」高潮，使經濟生活發生了更大的危機。薄一波說：

> 回憶當時的情況，不僅幹部和群眾焦慮不安，處於第一線的經濟綜合部門更是緊張。為了確保中央確定的各項生產指標得以實現，國家計委和國家經委領導幹部集體辦公的會議室裏，都醒目地懸掛着工業主要產品的日進度表，如全國鋼、鐵、鋼材、原煤、焦炭等的日產量，鐵路日裝車量等，我和李富春同志天天看，看到產量逐日增加，心裏才踏實；看到產量下滑，就立即分析原因，採取措施解決。[14]

[1]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大事輯要：1949-1985），頁149。

[2] 〈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為提前實現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而奮鬥的決議〉(1960年4月10日），載《農業集體化重要文件彙編1958-1981》，下冊，頁298。

[3] 〈廣東省委關於當前人民公社中幾個問題的指示〉（1960年2月25日），載〈農業集體化重要文件〉（1958-1981），下冊，頁314-317。

[4] 〈山東六級幹部大會情況簡報〉，第二期（1960年3月），載《農業集體化重要文件彙編（1958-1981）》，下冊，頁320-323。

[5] 〈中共山西省委關於六級幹部會議情況的報告〉（1960年4月6日），載《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十三冊，頁239-249。

[6] 〈關於發展畜牧業問題〉（1959年10月31日），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八冊，頁572-573。

[7] 〈對中央關於城市人民公社問題指示稿的批語和修改〉（1960年3月8日），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九冊，頁54-55。

[8] 城市人民公社本來就是在工礦企業和街道組織之上建立起來的，因此，它不像農村人民公社那樣是個新建的獨立實體，隨着全國經濟形勢的日益惡化，1960年下半年以後，城市人民公社開始逐漸解體，自行消亡。

[9] 冶金部提出鋼產量的第二本賬為2040萬噸，第三本賬爭取達到2200萬噸。與之相配合，煤炭部提出全年煤炭產量爭取搞到4.62-4.7億噸；鐵道部提出爭取貨運量達到7.8-8億噸。參見《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大事輯要：1949-1985》，頁149。

[10] 國家計委、經委、建委黨組：〈關於一九六〇年工業生產、交通運輸、基本建設計劃第二本賬安排的報告〉（1960年5月10日），載《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十三冊，頁407-409。

[11] 〈中共中央同意國家計委、經委、建委黨組《關於一九六〇年工業生產、交通運輸、基本建設計劃第二本賬安排的報告》〉（1960年5月30日），載《建國以來重要文件選編》，第十三冊，頁406-407。

[12] 《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頁1049。

[13] 〈4月上、中旬鋼鐵生產情況不好〉（1960年4月27日），《內部參考》。

[14]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得回顧》，下卷，頁890-891。

四、寫「十年總結」醞釀轉彎

1.中央下令再煞「三風」

各地再颳「共產風」的情況，經新華社的《內部參考》和各省報告反映上來，很快引起高層對問題的重視。1960年3月23日，毛澤東在山東省六級幹部會議情況簡報上批示：[1]

> 在一些縣、社中，去年3月鄭州決議忘記了，去年4月上海會議十八個問題的規定也忘記了，共產風、浮誇風、命令風又都颳起來了。一些公社工作人員很狂妄，毫無紀律觀點，敢於不得上級批準，一平二調。另外還有三風：贪污、浪费、官僚主義，又大發作，危害人民。

毛指示：

> 這樣的胡鬧，要查清楚。……對於這些人，應當分別情況，適當處理。教育為主，懲辦為輔。對於那些最胡鬧的，堅決撤掉，換上新人。平調方面的處理，一定要算賬，全部退還，不許不退。對於大貪污，一定要法辦。一些縣委為甚麼沒有注意這些問題呢？他們嚴重地喪失了職守，以後務要注意改正。對於少數縣委實在不行的，也要堅決撤掉，換上新人。……在工作能力上實在不行、無法繼續下去的人們，也必須堅決撤換。

3月30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反對官僚主義的指示》，要求各地在3、4月間，利用省委召開六級幹部會議和縣委接着召開的四級幹部會議，對於那些不可允許的、極端嚴重的情況，務必徹底地整頓一次，到下半年再整一次。[2]

各省區根據中央指示召開六級幹部會議，整頓幹部作風。4月4日和11日，中共中央批轉江蘇省委關於高淳縣事件的通報和上海市委關於奉賢縣事件的報告。

江蘇省委的通報說：「高淳縣在1958年和1959年春，發生了浮腫病、消瘦病，婦女子宮下垂病患者一萬四千多人，非正常死亡六千多人，外流人口一萬多人。」該縣縣委採取了對待敵人的方法對待勞動人民，提出「那怕流血犧牲，也要保收三千斤水稻」，「深翻好像打仗，在戰場上如有士兵臨陣脫逃，可以就地正法！」等錯誤口號。造成部分基層幹部嚴重強迫命令，採取吊、打、關、押、罰跪、停睡等手段，甚至發生逼死人命的事件。

上海市委的報告說：自1958年春耕起到秋耕秋種，奉縣全縣因幹部強迫命令、違法亂紀而直接逼死的群眾有156人，無辜被撤職、停職的

幹部660人，各社和生產營，都設了「勞改隊」，先後勞改了2866人，對群眾捆綁、吊打、亂鬥、亂關，罰跪，遊街、停餐等更為普遍。為了消滅紅鈴蟲，被燒、拆民房1823間、倉庫1345間，強迫集中居住又拆民房2147間，興修水利拆民房3188間。報告描述：「站在高處看奉城，就像鬼子大掃蕩後的情景一模一樣」，「斷瓦殘壁，歷歷皆是，觸目驚心，一片淒涼」。

由於當時把農村的五風再起，看成主要是幹部作風問題，因此，對這些情節嚴重的惡劣事件當成是階級敵人搞階級報復，應用階級鬥爭的方法加以處理。中共中央在高淳事件的通報上批示說，這是「少數混入基層、黨內的壞分子乘機興風作浪」。並判定上海奉賢縣的問題是：「上海市奉賢縣原縣委書記王文忠、副書記李少峰和一些暗藏的特務分子、壞分子竊奪和把持縣委和有些公社的領導權，胡作非為，殘害群眾。」所以，並未能根本解決因反所謂右傾機會主義而帶來的嚴重問題，相反，認為所有制過渡只是條件問題，山西省委给中央的報告說：「當前全省實現由基本隊有制過渡到基本社有制的條件，還不成熟，但是為了摸索過渡的經驗和問題，全省有計劃有控制地組織一些過渡試點是必要的。」還說，六級幹部會議的討論，使大家「對公共食堂萬歲認識更深刻了」。[3]

2.調運糧食的緊急指示

全國人大二屆二次會議閉幕以後，毛澤東再次南下視察。

第一站是天津，4月30日，毛在專列上同譚震林、廖魯言、河北省和天津市的負責人劉子厚、萬曉塘談話。毛問國內形勢是不是比1月上海會議時好一點？譚震林答：「好得多。」並具體說：

> 看起來，今年工業產值可能翻一番。糧食形勢也是好的。我們派了十幾個考察團到安徽阜陽專區，考察的结果，他們反映的材料，事實上，那個死人是個別的，多數人治好了，外流的人數也不多，而且糧食吃得相當多。……他們这裏（指河北省）的大名縣也叫做有糧食問題的，我們也派了一個組去摸，一摸，實際並不是甚麼每天八兩、十二兩，而是吃一斤，人的臉都紅光滿面，不像吃八兩糧食的樣子。

又說：「現在我們發現縣委手上掌握的糧食，省裏不知道，有些地委也掌握着糧食，省委也不知道。」毛說：「這都是好事，雖然瞞着省委。」毛對河南省糧食統銷的面那麼大（全省差不多每個人都統銷）表示懷疑。譚說：這說明他們手裏有糧食，沒有糧食他不會那麼幹的。所以，實際吃的，並不是他們報的甚麼八兩、九兩、十一兩、十二兩。毛對此表示滿意，說：那好呀，那我又舒服一點。當毛澤東問到今年能搞

到多少糧食時，廖魯言很有把握地說：保收六千億斤。示意可能「超過」。[4]

5月2日，第二站到濟南，毛在專列上同山東省委負責人舒同、白如冰、裴孟飛等人談話，問到山東的旱情及糧食困難的情況，是不是要中央調點糧食？舒同說：中央答應一億。我們今年調出去三億五。5月6日，毛第三站到達鄭州，河南省委負責人吳芝圃等登上專列，毛即詢問河南的旱情。吳芝圃答：最怕夏旱、秋旱。不過今年的麥子還算不錯。去年工作上也有毛病，搞基本建設公用糧太多，抗旱也多吃了糧食。所以，今年浮腫多，主要是信陽專區，旁的專區也都有一點，不怎麼嚴重。信陽專區說病了十來萬人。正常死亡與浮腫病死亡也很難分，死亡率是增加的，信陽專區可能增加好幾萬人。

實際上，上面所說的並非真實情況。經濟學家薛暮橋回憶說：「1959年農業大減產，情況極為嚴重。但是公社幹部不敢反映農民的呼聲。」[5]譚震林、廖魯言所說的全是下面虛報的浮誇數字。1960年3月29日，周恩來就收到習仲勳送來的一封群眾來信，反映安徽和縣桐城閘和無為縣發生的「餓死人事件」和「田地荒蕪」等問題。周恩來當即將信批給安微省委第一書記曾希聖，要他派人前往兩縣調查。河南出現的浮腫病和非正常死亡的情況也遠比吳芝圃說的嚴重得多。其原因主要是「五風」氾濫，和根據虛誇數字徵購了過頭糧。加上1958年以來，工礦企業從農村大量招工，城鎮人口急速上升，1960年比1957年增加3124萬人。這一方面大大減少了農村的勞動力，另一方面又增加向農村徵購糧食的數量。伴隨所有制再度趁窮過渡，堅守「社會主義陣地」而出現的虛報浮誇和反「瞞產私分」，以及公共食堂的浪費和幹部的多吃多佔，農村早已出現糧荒。

據新華社報道，從1959年冬季起，被稱為「農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情況就不斷上升。1959年12月上半月，瀋陽市南站平均每天接收外流人口158名，下半月每天236名，1960年新年過後每天達800人左右；上海市在八個區調查，1960年1月份共動員12648人回鄉，同期流入19735人，入多於出。天津市1959年11月中旬有外流人口和限制遷入的人口86167人，較10月增加29.8%。[6]1960年1至2月，流入內蒙古自治區的外省人口共89200多人，90%以上是農民，他們分別來自遼寧、山東、吉林、河北、黑龍江等二十多個省……。[7]

另一方面的情況是，由於勞動強度大，缺糧，營養不良，各地開始出現大量浮腫病人。據不完全統計，截至1960年2月底，累計發病人數：湖北省28萬餘人，江蘇省11.12萬餘人，山東省2.6萬餘人，河南省平輿縣一個縣就有3.8萬餘人。[8]另據報道：江蘇省高淳縣從1959年入冬以來，浮腫、消瘦和其他疾病有新發展。據2月20日統計，全縣發病人數14715人，佔全縣總人口6.06%，其中浮腫病1860人，消瘦病6208

人，共佔病人總數的54.8%。……在發病人數上升的同時，死亡現象逐漸增多，全縣從1月份以來，共死亡1171人，佔農村人口總數的0.48%。[9]山東省沾化縣委第一書記也反映，有幾個公社水腫病較多，全縣春節後因此病死了500人。缺糧原因是賣了過頭糧。[10]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拜城縣九個公社，89000多人，……從1月到4月初，共死亡4700多人。據當時分析，其中70%左右是由於營養不良，患浮腫病、黃疸病而死。[11]

因缺少糧食，人們開始食用各種代食品，誤食有毒食品的中毒事件時有發生。據國家衛生部4月中旬通報，因誤食蒼耳幼苗的中毒事故：河南省蘭考縣有1100多人中毒，三十八人死亡；湖北省廣水鎮1200多人中毒，五十八人死亡；河北省徐水縣244人中毒，五人死亡。[12]

甘肅、寧夏、貴州等省區1960年1至3月，竟發生「吃人肉」這種駭人聽聞的惡性事件十七起。[13]

鑑於1960年夏糧比上一年又大幅度減產。夏收之後收購進度緩慢，1至7月累計徵購糧食244億斤，比上年同期減少26%。加之各地庫存減少，因此國家調撥不靈。1960年5月以後，應調出糧食的各省實際調出的糧食僅佔計劃數的一半，而糧食銷售量則不斷增加。1957年到1958年度糧食銷售量是423億斤，1959年到1960年度增到590億斤。為此，中共中央於5月28日發出《關於調運糧食的緊急指示》，指出：「近兩個月來，北京、天津、上海和遼寧省調入的糧食都不夠銷售，庫存已幾乎挖空了，如果不馬上突擊趕運一批糧食去接濟，就有脱銷的危險。」[14]指示要求：有關省、區必須立即採取有效措施，搶時間，把一切須要調運和能夠調運的糧食盡快地集運外調。6月6日，中央又發出《關於為京、津、滬和遼寧調運糧食的緊急指示》，[15]進一步指出：

> 入夏以後，北京、天津、上海、遼寧等大城市和工業區的糧食庫存非常薄弱，北京只能銷七天，天津只能銷十天，上海已經幾乎沒有大米庫存，遼寧十個城市只能銷八、九天。在最緊張的日子裏，京津滬庫存只剩幾千萬斤，甚至還不到，形勢十分危險。一旦發生斷糧，後果不堪設想。另外，1960年糧食出口收購計劃是一百億斤，而到5月底只能完成三十多億斤，在對外貿易方面也很被動。

這一嚴重情況，不能不使國務院總理周恩來晝夜予以關注。當時綜合部委設有兩個辦公室：一是李富春、薄一波負責的計委經委辦公室，二是李先念負責的財貿委辦公室。薄一波在回憶他們天天盯着鋼產量進度表的同時説：「李先念同志那裏也不輕鬆，各地要糧的電話晝夜打來，不能不急事急辦，只好採取『挖東補西』、『抽肥補瘦』等措施，緊急調運糧食，幫助斷糧地區渡難關。」[16]

1960年4月26日新華社電訊：內蒙古自治區積極響應中央號召，大

抓五十天，爭取在5月上旬基本完成1959至1960糧食年度糧食上調任務，大力支援北京、天津、上海和遼寧等地。這一年度全區糧食上調任務是十一億斤，到3月底已經上調六億六千萬斤，佔計劃的60%，下餘的四億多斤必須在5月10日前完成。[17]27日，新華社報道了黑龍江省緊急調運大量糧食支援缺糧地區的情況：4月25日，省委召開了有關糧食、交通運輸、商業等有關部門參加的電話會議，要求各地抽調足夠的裝卸車船的勞動力，大抓日進度，使日發運量由現在的三千二百萬斤提高到五千萬斤，力爭達到六千萬斤，以保證按時完成糧食上調任務。省委還規定，糧食調運，要先省外後省內，可以「先挖後補」，堅決壓縮城鎮糧食銷量，保證完成上調任務。[18]這兩則報道，充分反映了當時糧食調運的緊張程度。

3.毛澤東提出要扭轉被動局面

毛澤東在四五月間南下視察期間，就曾向省級負責人談到：「我們中央、省這兩級作上層工作的人不可能都去看公社，就是摘點要點去望一望，要靠下面反映；而下面反映的材料，就有一部分不可靠。總而言之，上級領導機關，比如中央一級，省一級，地委也是不甚了了。」[19]

這說明，毛澤東也意識到很難了解到下面的真實情況。他每到一地，耳聞目睹，都是好聽的和好看的，不是讓他看小塊豐產田裏長得差不多有一人高的莊稼，就是看展覽館的展品。當然，毛也有一點了解真情的管道。衛士長李銀橋回憶說：

> 1959年底，幾名休探親假的警衛戰士，奉命調查和匯報農村實情。他們帶回來農民吃的糠菜窩頭。一路上窩頭已經捂餿，交到毛澤東手中時，毛澤東受到震動。他用顫抖的手掰開窩頭分給我們身邊的工作人員：「吃，這是農民的口糧，我們每個人都要吃……」
>
> 我分了一小塊，放進嘴裏，嚼啊嚼，就是咽不下去。這窩頭與河南吃的烤麵包真是天地之差。我想起了馬維帶來的那個窩頭，想起了毛澤東講的「要想個辦法」……[20]

工業生產情況很差，糧食全面緊張，這些在初春還被掩蓋的情況都已浮出水面。使毛澤東感到十分被動。6月10日至18日，中央政治局在上海舉行擴大會議，主題是討論第二個五年計劃後三年的補充計劃。與1月間的上海會議強調1960年仍將是一個大躍進年不同，為扭轉騎虎難下的強撐躍進局面，毛在會上提出了，要轉入主動，改變被動局面，決心降低指標的建議。他在14日講話中就明確講了要降低計劃指標，把質量提到第一位的問題。在會議閉幕的一天，毛作了《十年總結》的講

話。

《十年總結》，首先是歷史地肯定總路線的正確。毛説：

> 前八年照抄外國的經驗。但從1956年提出十大關係起，開始找到自己的一條適合中國的路線。1957年反右整風鬥爭，是在社會主義革命過程中反映了客觀規律，而前者則是開始反映中國客觀經濟规律。1958年5月黨大會制定了一個較為完整的總路線，並且提出了打破迷信、敢想敢説敢做的思想。這就開始了1958年的大躍進。是年8月發現人民公社是可行的。

接着，敘述了人民公社興起和大煉鋼鐵並舉引起的亂子：

> 8月在北戴河，中央起草了一個人民公社決議，9月發表。幾個月內公社的架子就搭起來了，但是亂子出得不少，與秋冬大辦鋼鐵同時並舉，亂子就更多了。

在講了從1958年11月鄭州會議到1959年7月廬山會議，為糾正人民公社引起的多方面混亂，以及壓縮鋼鐵指標所作的努力之後，批評説：

> 管農業的同志，和管工業的同志、管商業的同志，在這一段時間內，思想方法有一些不對頭，忘記了實事求是的原則，有一些片面思想（形而上學思想）。

但對在廬山批彭德懷的所謂右傾機會主義，毛並不認錯，堅持説：

> 1959年夏季廬山會議，右傾機會主義猖狂進攻。他們教育了我們，使我們基本上清醒了。我們舉行反擊，獲得勝利。

接下來談到這次會議討論的計劃指標，認為：

> 1960年6月上海會議规定後三年的指標，仍然存在一個極大的危險，就是對於留有餘地，對於藏一手，對於實際可能性，還要打一個大大的折扣，當事人還不懂得。

講到这裏，毛異乎尋常地不再批1956年的反冒進，相反表揚了1956年在反冒進思想指導下周恩來主持制定的「二五」計劃。毛説：

> 1956年周恩來同志主持制定的第二個五年計劃，大部分指標，如鋼等，替我們留了三年餘地，多麼好啊！農業方面則犯了錯誤，指標高了，以至不可能完成。

於是，毛提出：

> 要下決心改，在今年7月的黨大會上一定要改過來。從此就完全主動了。

他告誡大家，主動權是一個極端重要的事情，它來自實事求是，來自客觀情況對於人們頭腦的真實的反映，即人們對於客觀外界的辯證法的認識過程。以此説明1958年犯高指標錯誤的根由。毛説：

> 我們過去十年的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就是這樣一

個過程。中間經過許多錯誤的認識，逐步改正這些錯誤，以歸於正確。现在就全黨同志來説，他們的思想並不都是正確的，有許多人並不懂得馬列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我們有責任幫助他們，特別是縣、社、隊的同志們。我本人也有過許多錯誤。有些是和當事人一同犯了的。……看來，錯誤不可能不犯。如列寧所説，不犯錯誤的人從來沒有。鄭重的黨在於重視錯誤，找出錯誤的原因，分析所以犯錯誤的主觀和客觀的原因，公開改正。我黨的總路線是正確的。實際工作也是基本上做得好的。有一部分錯誤大概也是難於避免的。哪裏有完全不犯錯誤、一次就完成了真理的所謂聖人呢？真理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逐步完成的。

最後，毛澤東用自由與必然的哲學範疇作總結。[21]

毛自己説，這篇講話稿是6月18日清晨用兩個小時寫成的。説明是經過了一段時間的反覆思考形成的成熟意見。儘管講話對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都肯定是正確的，也肯定反彭德懷的所謂右傾機會主義是個勝利；但終究承認高指標是犯了錯誤，承認主觀脱離了客觀，承認現在已處於被動，因此要下決心變為主動。這就為降低國民經濟計劃指標，以及爾後進行國民經濟的調整，開了一個口子。

正是在這種氣氛下，會議對國家計委提出的三年補充計劃的十四項指標，一壓再壓，作了大幅度的調整。在討論中，周恩來説：「這次搞得徹底一點，像主席《十年總結》説的，一次把這個主動權拿過來。」毛澤東説：「就是想得點自由，不然總是捆绑手脚，自己不得翻身。我當了這麽多年解放軍，结果自己又沒有解放。」鄧小平説：「我們這幾天都是搞的改良主義。」[22]會議明確了兩個問題：一是堅持以農業為基礎的方針，加快發展農業；二是強調作計劃要留有餘地。

但是，會議精神還沒有傳達貫徹，又遇到了外部因素的嚴重干擾。

[1] 〈中央轉發山東省六級幹部會情況簡報的批語〉（1960年3月23日），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九冊，頁98-99。

[2] 〈中央關於反對官僚主義的指示〉（1960年3月30日），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九冊，頁114。

[3] 〈中共山西省委關於六級幹部會議情況的報告〉（1960年4月6日），載《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十三冊，頁241，250。

[4] 《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頁1069-1070。

[5] 薛暮橋：《薛暮橋回憶錄》（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頁265。

[6] 〈各地農村人口盲目外流情況〉（1960年2月27日），《內部參考》，頁17。

[7] 〈大批外省人員流入內蒙古〉（1960年3月17日），《內部參考》，頁19。

[8] 〈各地積極治療浮腫病人〉（1960年3月3日），《內部參考》，頁8-9。

[9] 〈高淳縣發生浮腫消瘦病的情況〉（1960年3月17日），《內部參考》，頁20。

[10] 山東省六級幹部會秘書處編印：《會議情況》，第1期（1960年3月21日），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九冊，頁100。

[11] 〈新疆自治區黨委積極處理拜城縣發生浮腫病和死人的問題〉（1960年4月20日），《內部參考》，頁17。

[12] 〈衛生部要求各地宣傳禁食蒼耳子〉（1960年4月17日），《內部參考》，頁21-22。

[13] 〈甘肅等地發現「吃人肉」案件十七起〉（1960年4月14日），《內部參考》，頁25。

[14]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中共黨史大事年表》（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頁305。

[15]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全鑑》編輯委員會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全鑑》，第三卷（北京：團結出版社，1996），頁2621-2622。

[16]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頁891。

[17] 〈內蒙古積極調運糧食支援京津滬等地〉，《內部參考》，1969年4月27日。

[18] 〈黑龍江突擊調運糧食支援缺糧地區〉，《內部參考》，1960年4月30日。

[19] 《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頁1073。

[20] 權延赤：《衛士長談毛澤東》（北京：北京出版社，1989），頁36。

[21] 毛澤東〈十年總結〉（1960年6月18日），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九冊，頁213-216。

[22] 毛、周、鄧的講話，見1960年6月18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的講話記錄。載《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頁1082。

五、中蘇關係惡化對內政的影響

1.兩黨分歧的由來

正當中國國內面臨困難，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上海會議總结經驗教訓，對過高指標重新調整之際，從羅馬尼亞首都布加勒斯特傳來參加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的蘇共中央代表團，對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彭真率領的中共代表團發動突然襲擊實行圍攻的消息；此後不久，蘇聯政府單方面宣布撤走全部在華工作的蘇聯專家。這無疑是在向中國共產黨施壓，要中共聽從於蘇聯的指揮棒。中蘇雙方發生如此嚴重衝突，顯然非一日之寒。

中蘇分歧的最初由來，要追溯到1956年的蘇共二十大。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對蘇共二十大，總體上是贊同和支持的，同時也有不同意見：一是對斯大林的評價；二是對赫魯曉夫在大會報告提出和平共處，和平競賽，和平過渡的新路線。關於不同社會制度國家和平共處的外交政策，中共是贊同的。中國在1955年萬隆會議上正是高舉和平共處五項原則這個旗幟，贏得了勝利。謀求和平的周邊環境，是加快中國國內建設的客觀需要。早在蘇共二十大以前，1956年1月2日《人民日報》曾以〈和平共處思想的偉大勝利〉為題發表社論，讚揚蘇聯黨和政府領導人在國際上所作的努力。2月19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具有歷史意義的文件〉，稱讚赫魯曉夫在二十大的報告，「以現實生活本身的邏輯，論證了不同社會制度的國家可以和平共處的思想」。但對資本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有可能通過和平過渡的方法取得議會多數而奪得政權的觀點，中共則沒有公開表態。1956年9月舉行的中共八大，劉少奇在向大會的報告中專門就中國革命的經驗，闡發了被壓迫人民只有拿起武器才能奪得政權的觀點。委婉地表示了不贊同和平過渡的意見。在1957年莫斯科會議通過宣言時，中共代表團專門向蘇共中央提交了一份《關於和平過渡問題的意見提綱》，正面闡述了中共的意見。《提綱》指出：

「按照目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狀況，從策略觀點出發，提出和平過渡的願望是有益的，但不宜過多地強調和平過渡的可能。」「必須準備隨時迎接反擊反革命的襲擊，準備在工人階級奪取政權的革命緊要關頭，如果资產階級用武力來鎮壓人民革命（一般説來，這是必然的），就用武力去打倒它。」「取得議會的多數，並不等於舊國家機器（主要是武力）的摧毀，新國家機器（主要是武力）的建立。如果资產階級的軍閥官僚國家機器沒有被摧毀，無產階級及其可靠同盟者在議會中的多

數，或者是不可能的」，「或者是靠不住的」。[1]

在1957年到1958年的時候，在軍事上，中國面臨的一個問題是陸、海、空軍如何在新技術，新裝備方面有所發展；蘇聯遇到的則是怎樣在戰略上發揮太平洋艦隊作用的問題。有關建設長波電台和共同艦隊的問題就是在這個背景下提了出來。

1958年7月21日，蘇聯駐華大使尤金（Pavel Yudin）要求緊急會見毛澤東，說有重要的事情匯報。當日晚10時，毛澤東在中南海會見尤金，蘇方有使館參贊安東諾夫和魏列夏金，中方有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鄧小平、彭德懷、陳毅參加。尤金說明，他剛剛參加了蘇共中央主席團會議回到北京，並受委託向毛澤東匯報會議的情況。尤金談了中東局勢、南斯拉夫、幫助中國加強海軍和海岸防禦及蘇聯國內經濟情況等四個問題，會談持續了三個半小時。其中，主要討論的是海軍問題。尤金說，赫魯曉夫希望中國同志能了解，蘇聯的自然條件使其不可能充分發揮核潛艇艦隊的作用，而中國的海岸線很長，條件很好。同時考慮到將來如果打仗的話，中蘇共同的敵人是美國。因此，赫魯曉夫希望與中國同志一起商量，建立一支聯合潛艇艦隊，越南也可以參加。希望中共中央派周恩來、彭德懷去莫斯科具體商量。毛澤東立即指出，中國只是請蘇聯提供幫助，沒有考慮過「合作社」的問題。尤金匯報結束後，毛澤東即抓住聯合艦隊的問題，不斷追問：是否只搞合作社，蘇聯才幹，否則就不提供幫助？尤金一再解釋，這只是一個提議，要請中國同志去一起商量。但毛澤東強調，首先要確定方針，是中蘇合辦，還是蘇聯幫助中國辦。如果蘇聯不願提供幫助，中國可以不搞核潛艇。[2]

尤金等人回到使館後，連夜進行討論，最後得出結論：毛澤東反對建立中蘇聯合艦隊。尤金隨即起草了致蘇共中央的報告，並於天亮發出。[3]

第二天上午11時，毛澤東又將尤金等人召到中南海談話，這次參加的中方人員包括在京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全體委員——毛澤東似乎是在強調，他的談話表達了所有中國領導人的看法。毛澤東重申了不搞聯合艦隊的立場，並宣布撤回請蘇聯援助的要求，毛澤東的用詞比前一天更加激烈：「蘇聯同志勝利了四十年，有經驗。我們勝利才八年，沒有經驗，你們才提合營問題。」「你們就是不相信中國人，只相信俄國人。俄國人是上等人，中國人是下等人，毛手毛腳的，所以才產生了合營的問題。要合營，一切都合營，陸海空軍、工業、農業、文化、教育都合營，可以不可以？或者把一萬多公里長的海岸線都交給你們，我們只搞游擊隊。你們只搞了一點原子能，就要控制，就要租借權。」[4]並且說了很多對蘇聯不滿的話。[5]

尤金一再解釋，蘇共中央主席團開會時，關於所有權、租借權、指揮權的問題，一概沒有談到，也沒有說要在中國建立軍事基地，只是想

把這個問題提出來，與中國同志研究具體措施。[6]尤金還主動提出，他贊同最好是赫魯曉夫本人來中國，直接與毛澤東舉行會談。[7]

1958年7月31日，赫魯曉夫秘密來京訪問。當日下午5時至9時，毛澤東與赫魯曉夫在中南海懷仁堂舉行會談。赫魯曉夫首先對蘇聯為何提出潛艇艦隊的問題進行了長時間的解釋。他堅決否認蘇聯曾使用過「聯合艦隊」或「共同艦隊」的說法，認為是尤金轉達有誤，整個事情是「一次誤會」，並一口咬定，他本人和蘇共中央主席團討論這個問題時，「從來就沒有過像中國同志所想的那樣要共同指揮中國的艦隊，從來就沒有過兩國共有的想法和影子」。赫魯曉夫表示：「我們沒有想到，毛澤東同志竟把這個問題提高到侵犯主權的程度。你們這樣看我們，令我們感到傷心。」於是，毛澤東在發了一番牢騷後，主動結束了關於「合作社」問題的談話。雙方約定，以後「永遠不會提這樣的問題」。接着，赫魯曉夫開始談長波電台問題。赫魯曉夫推託說，這個問題蘇共中央沒有討論，是军方提出的。蘇聯的意圖是在中國南方建立一個長波電台，以便需要的時候用來指揮蘇聯在太平洋的艦隊。如果中國同意蘇聯通過提供貸款的方式參加電台的建設，那就更好了。電台的所有權屬於中國，蘇聯只是要求通過協議，允許蘇聯使用這個電台。同時，蘇聯在海參崴、千島群島和北海的電台也可以供中國使用。但如果中國不同意，蘇聯可以取消這個建議。毛澤東則強調，馬利諾夫斯基（Rodion Y. Malinovsky）提出蘇聯出錢，就是要有所有權。中國同意建立長波電台，费用全部由中國負擔，所有權是中國的，蘇聯可以使用。赫魯曉夫再次表示，所有權肯定是中國的，但蘇聯既然使用，出些錢也是應該的，可以用貸款的形式。毛澤東堅持：中國不需要貨款，如果蘇聯要出錢，中國就不搞了。關於這個問題的談話到此結束。[8]

對中蘇關係中的這場風波，逄先知、金沖及主編的《毛澤東傳》作了如下評述：

> 蘇聯在中國沿海建立「長波電台」和中蘇兩國建立「共同核潛艇艦隊」的要求，是7月21日蘇聯駐華大使尤金在中南海游泳池向毛澤東提出的，當即遭到毛澤東的拒絕。毛澤東把這個事件看作是蘇联企圖控制中國的一個嚴重步驟。22日毛澤東约見尤金，歷數蘇聯對待中國的老子黨作風和大國作風。參加這兩次談話的有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鄧小平、彭德懷、陳毅等。
>
> 毛澤東的態度，使赫魯曉夫感到問題嚴重，立即動身，秘密來華向毛澤東解釋。從7月31日到8月3日，毛澤東和赫魯曉夫舉行了四次會談，最後以赫魯曉夫收回要求而告平息。[9]

冷戰史專家沈志華根據中蘇雙方披露的資料，在〈赫魯曉夫、毛澤東與中蘇未實現的軍事合作－－關於防空協定、長波電台及聯合艦隊問

題的再討論〉[10]一文中，對毛澤東何以作出強烈反應，是否出於主權原因，作了新的解讀。沈文認為：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黨政軍領導人，幾乎都異口同聲地指責說，蘇聯的做法侵害了中國的主權，赫魯曉夫的意圖在於控制中國。長期以來，這種看法在中國社會上和史學界頗為流行，似乎已成歷史定案。然而，人們沒有看到，表面上的蜜月關係掩蓋了中蘇雙方在同盟中所處地位的微妙變化。中蘇領導人之間的分歧和爭吵，正是因為一方對同盟關係現狀已有不滿，且在努力促成和顯示這種變化，而另一方對此則沒有相應的察覺、行為方式依然如舊。因此，當毛澤東對赫魯曉夫的建議作出強烈反應以後，使莫斯科感到震驚和不安。事情過後，赫魯曉夫承認，蘇聯的建議「觸及了這個曾長時期受到外國征服者統治的國家的敏感問題」，「觸及了中國的主權」，也傷害了毛澤東和他的民族感情。赫魯曉夫曾親口對兒子說：「當時我們有些急躁，誇大了各國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國家一體化的意義」，並在回憶錄中後悔地說：「如果我們事先知道會有這樣的反應，那我們無論如何不會提出這個建議。」作者由此得出結論，蘇聯領導人的想法本無惡意，提出合资建設電台和組建聯合艦隊本身也沒有涉及國家主權問題，只是蘇聯建議的方式有些簡單、唐突，特別未能考慮到中國人的民族感情。同時指出，但作為蘇聯的盟國；特別是作為一國領袖，毛澤東對於一個具體的建議表現得如此激動，怒不可遏，卻是難以理解的，其中似乎另有原因。現在來分析，毛澤東的激烈反應固然與他的個人性格有很大關係，但更重要的恐怕在於中蘇之間同盟關係此時發生的微妙變化，以及在這一變化中毛澤東本人的心態。對於斯大林的大國主義和老子黨作風，毛澤東早就心存不滿，只是礙於當時中蘇兩國所處的不同地位而未曾表露。朝鮮戰爭使中國黨在社會主義陣營中的地位猛然提高，斯大林去世後，毛澤東的革命資歷又不亞於其他國家的共產黨首領，特別是在蘇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以後，蘇聯的威信受到打擊，而毛澤東則在某種程度上幫助赫魯曉夫渡過了難關。蘇聯黨居高臨下指揮各方的時代已經過去，至少在國際共運中北京已經可以同莫斯科平起平坐了。與毛澤東第一次訪蘇相比，1957年他在蘇聯的境遇也不可同日而語了。

沈文的結論是，既然各國共產黨都強調和承認國際共運必須有一個領導核心，並在意識形態一致性的前提下維護正統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指導地位，那麼也就在實際上放棄了各自的獨立性。於是，在黨政合一的政治體制下，在國家關係混同於黨際關係的狀態下，社會主義同盟中各國主權的完整性就很難得到保證。同時，這種關係範式壓抑了同盟各國追求獨立發展的民族感情和心理，表面的團結統一往往掩蓋了同盟內在的不穩定因素。平時大家以兄弟相稱，言談舉止無所顧忌，淡漠了正常的國家關係，一旦政治關係發生變化，或領導者地位和權威受到挑戰，或意識形態的正統性受到懷疑，那種籠罩在民族感情和心理上的陰

影就會立即顯露出來，侵犯國家主權就會成為指責同盟「為首」者的最常見的罪名，而這種同盟關係也就隨之遭到破壞。可以認為，中蘇在1950年代中期以後未能在軍事合作方面取得進展，反而導致雙邊關係惡化，究其根源，恐怕就在於社會主義陣營國家關係本身的政治特徵。中蘇關係最終破裂的根本原因也存在於社會主義國家關係範式和準則中的某種結構性失衡，而不應僅僅去追究哪一方的責任。[11]

因此，在7月31日赫魯曉夫秘密來訪與毛澤東會談以後，雖然蘇方向中國提供海軍新技術援助的問題得到了順利解決。但這場風波的陰影並未在兩國領導人的腦海中散去，中蘇關係並未因此好轉，反而愈來愈呈現出一種緊張狀態。

關於社會主義國家可以同资本主義國家和平共處，社會主義國家可以採取某些積極的步驟爭取國際形勢的缓和，這在中蘇雙方是沒有異議的。但在戰爭與和平的根本觀念和具體政策方面，雙方又存在着很大的不同。中方認為，社會主義國家同资本主義國家可以實行和平共處，第三次世界大戰有可能推遲或避免，但這主要有賴於社會主義陣營的壯大和殖民地人民鬥爭的發展；赫魯曉夫認為，和平共處是社會主義國家的根本路線，和平共處的局面主要靠大國之間——主要是蘇聯和美國兩國領導人通過談判來實現。1958年，美國和英國分別就停止核武器試驗問題表示願意同蘇聯進行談判，這對長期努力同美、英搞緩和的赫魯曉夫來說，似乎是已經看到了緩和的曙光。但在長波電台、共同艦隊風波過後，中蘇關係中發生了如下事件：

第一，1958年8月，當赫魯曉夫離開中國不久，中國軍隊開始了炮擊金門戰役，這不啻是向赫魯曉夫頭上潑了一盆冷水。在他看來，中國領導人在沒有任何通氣的情況下，突然採取如此重大的軍事舉動，不僅是無視中蘇軍事同盟的存在，而且是對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的極大藐視。

第二，在台海危機期間的9月24日，中國在溫州地區的空戰中，國民黨空軍發射的幾枚美國「響尾蛇」空空導彈（當時是很先進的），其中一枚墜地未爆。蘇聯軍事顧問得知後立即報告了莫斯科，引起蘇聯軍方的極大興趣。但蘇方幾次索要，中方開始不予理睬，這使赫魯曉夫非常氣憤。幾個月後，當中國不得不轉交這枚已經拆卸多次的「響尾蛇」導彈時，蘇方研究人員發現缺少了一個關鍵部件——紅外線彈頭傳感器。

第三，以上兩件事，直接引起了蘇聯領導人對中國這個盟國的疑慮。1959年6月20日，蘇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通知中方蘇聯停止供應中國原子彈樣品和生產原子彈的技術資料。理由是：一、國際上正在進行禁止使用核武器談判，在中國製造核武器會破壞談判；二、生產原子彈費用很高，是中國經濟無力承受的負擔；三、蘇聯擁有足夠數量的核

武器，可以保證自己的安全和保衛兄弟國家。中方認為，蘇聯單方面撕毀1957年10月中蘇兩國簽訂的《國防新技術協議》，是中蘇關係中一個重大事件，對蘇方在對華關係上將採取何種新方針，有待觀察，暫時未做答覆。

第四，1959年3月，中印邊境因印度巡邏隊越過中印邊界，在中國一側建立哨所，並向中國軍隊開槍射擊，引發了武裝衝突。蘇聯政府不顧中國政府的一再勸告，於9月9日發表塔斯社聲明，對中印邊境上發生的事件「表示遺憾」，認為這將「阻礙國際緊張局勢的緩和」，並且使赫魯曉夫和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相互訪問前夕的「局勢複雜起來」。對此，中方極為憤怒，認為這是公開暴露中蘇分歧，而偏袒印度的錯誤做法。

以上事件，無疑更加重了相互的不信任感。

2.中蘇第一次正面衝突

如前所述，1950年代中期，中國對蘇聯採取緩和美蘇關係的外交政策是支持的。但中國與蘇聯所處的環境不同，美國對中國仍頑固堅持不承認的敵視態度，實行孤立、封鎖中國的政策，繼續無理阻撓恢復中國在聯合國的席位。美國軍事力量在日本、南朝鮮、台灣、菲律賓、南越的存在，對中國構成很大威脅。從1955年開始的中美大使級會談，時續時斷，反映美國根本沒有誠意。因此，中國很難相信美國真會願意緩和國際局勢。

1959年9月15日到28日，赫魯曉夫到美國訪問，先後在華盛頓和戴維營與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進行了多次會談。會談公報稱，雙方主要討論了全面裁軍問題，另外也討論了德国問題、對德和約問題、柏林問題，以及兩國關係等一系列問題。公報沒有說會談達成甚麼具體協議，說明並沒有取得實質性的成果。但赫魯曉夫的這次訪問，是戰後蘇聯首腦第一次訪美，因此確實造成了某種緩和氣氛。蘇聯報刊宣傳「戴維營精神」標誌着「人類歷史新的轉折點」。中國政府對赫魯曉夫訪美的行動，曾表示了支持。9月29日，《人民日報》發表評論，認為對緩和國際緊張局勢是有益的。明確闡明：中國政府也主張緩和國際緊張局勢，赞成赫魯曉夫這種活動，赞成他為全面徹底裁軍這個目標而做的努力。當然，全面徹底裁軍能否實現，是不是按赫魯曉夫目前的做法去實現，中國政府抱有自己的看法。

9月30日，赫魯曉夫來到北京參加中國國慶十周年的活動，他是帶着所謂「戴維營精神」來的。在當晚周恩來總理舉行的國慶招待會上，赫魯曉夫作了長篇講話，在談到社會主義力量空前強大之後，他說：「這當然絕不是說，既然我們這麼強大就應該用武力去試試資本主義制

度的穩固性，這是不正確的。因為人民絕不會理解，也絕不會支持那些想這樣幹的人。」這話顯然是說給中國主人聽的，影射1958年中國炮擊金門和1959年中印邊境衝突事件，是在用武力「試試資本主義的穩固性」，是不可取的。

10月2日，中蘇兩黨領導人在中南海頤年堂舉行正式會談。赫魯曉夫首先向中共中央領導人通報蘇美會談情況，他認為：在美國政治活動家中間普遍存在着一種有利於對懸而未決的爭端問題進行和平調解的情緒，對於繼續沿着鞏固和平的道路堅定前進出現了完全現實的可能性。據此提出：社會主義陣營必須避免一切可以被反動派用來把世界重新拉回「冷戰」軌道去的可能性。他強調：社會主義陣營只有一個對外政策方針。接着，赫魯曉夫就1953年8月中國炮擊金門、1959年西藏平叛和中印邊境衝突等問題，對中共領導人提出批評和責難，說甚麼炮擊金門是「為了逗弄貓兒而向沿海島嶼打炮，那是不值得的」；因邊界爭端與印度發生衝突，就會把尼赫魯推到帝國主義一邊。這不利於「進一步緩和國際緊張局勢」。要求中共「應該尋求緩和局勢的途徑」，提出「我們必須協調國際政策」。他還具體提出，為着緩和跟美國人的關係，中國是不是可以把監獄裏的幾個美國人釋放？

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其他領導人明確指出，在台灣問題上，中國與美國和與蔣介石的關係是兩種性質不同的問題：中國跟美國的關係，是美國侵略中國的台灣，我們要求美國軍隊撤出台灣；至於中國怎樣解放台灣，這是中國的內政，只能由中國人自己解決，別人無權過問。中國決不作對台不使用武力的承諾。關於正在中國服刑的美國人，能否提前釋放，要按中國的法律辦事。中印邊境發生武裝衝突的問題，是印度軍隊入侵了中國領土並進行射擊，中國軍隊只是作了必要的反擊。蘇聯塔斯社發表不分是非，對中印各打五十大板，把中蘇雙方在這個問題上的分歧暴露在帝國主義和反動派面前的做法是錯誤的，中國並沒有改變同印度和平共處的睦鄰政策。逐一把赫魯曉夫頂了回去。

赫魯曉夫氣惱地說：為甚麼你們能批評我們，老大哥就不能批評你們。有一句套話叫「社會主義陣營以蘇聯為首」，但實際上，對蘇共中央的觀點連起碼的尊重都沒有。你們不是說我們太傲慢了嗎？[12]

這次中蘇兩黨領導人的會談，因問題涉及中國的根本主權和利益，因而引發了正面衝突，雙方發生激烈爭吵，互相指責和攻擊，最後不歡而散。[13]對赫魯曉夫訪美，給毛澤東留下的印象，是下面這首打油詩：

西海如今出聖人，塗脂抹粉上豪門。
一輛汽車幾間屋，三頭黃犢半盤銀。
舉世勞民同主子，萬年宇宙絕紛爭。

列寧火焰成灰燼，人類從此入大同。[14]

10月4日，赫魯曉夫離京回國。6日，他在海參崴發表演講，影射攻擊中國像「好鬥的公雞」，熱衷於戰爭；31日，在蘇聯最高蘇維埃會議上，赫魯曉夫又不指名地攻擊中國是「冒險主義」、「不戰不和的托洛茨基主義」。[15]12月1日。赫魯曉夫在匈牙利黨的代表大會上講話，再次影射攻擊中國黨，説甚麼建設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不落後也不搶先，形象地説，就是『互相對對表』。如果這個或者那個國家的領導人開始驕傲自大，這就會合乎敵人的利益。……而這樣做是不能容許的」。這就是説，各國黨要同蘇共保持一致。[16]12月30日，赫魯曉夫在回答阿根廷《號角報》（*Clarín*）社長的問題時，提出「要實現沒有武器、沒有軍隊、沒有戰爭的世界。」[17]蘇聯報刊根據赫魯曉夫提出的這個總目標，連篇宣傳和平共處、和平競賽、和平過渡。

這一切，在毛澤東看來完全是對列寧主義的背叛。

3.爭扛列寧主義的旗幟

1957年11月，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和工人黨發表的莫斯科宣言中指出：「在目前條件下，主要的危險是修正主義。」「資產階級影響的存在，是修正主義的國內根源。屈服於帝國主義的壓力，則是修正主義的國外根源。」對共產黨內出修正主義，毛澤東一直極為關注。1959年11月，毛澤東在杭州召開一次小範圍的會議，討論國際形勢。會前，毛要英文秘書林克為他找出杜勒斯關於和平演變的講話材料。毛在杜勒斯的講話材料上批道：這表明美帝國主義企圖用腐蝕蘇聯的辦法，陰謀使資本主義在蘇聯複辟，而達到美帝國主義用戰爭方法所達不到的侵略目的。第一次提出了防止和平演變的問題。11月12日，毛與華東各省市委第一書記談話，向他們解釋甚麼是杜勒斯的路線。

毛説：杜勒斯希望「蘇聯世界內部起變化」。一方面「決不結束冷戰」；另一方面，「用正義和法律代替武力」。他説：「放棄使用武力並不意味着維持現狀，而是意味着和平的轉變。」毛解釋説：「和平轉變誰呢？就是轉變我們這些國家，搞顛覆活動，內部轉到合乎他的那個思想。……就是説，他那個秩序要維持，不要動，要動我們，用和平轉變，腐蝕我們。」[18]

12月，毛在一個關於國際形勢的講話提綱中寫道：

敵人的策略是甚麼？

⑴和平旗子，大造導弹，大搞基地，準備用戰爭方法消滅社會主義。這是第一手。

⑵和平旗子，文化往來，人員往來，準備用腐蝕，演變方法

消滅社會主義。這是第二手。

……

有時和解，有時緊張；这裏和解，那裏緊張：歐洲和解，亞洲緊张；爭取機會主義，孤立馬列主義。

修正主義是否已經形成了系统，是否就是這樣堅決幹下去？

毛認為赫魯曉夫正在與帝國主義、反動民族主義和鐵托修正主義組織一次反華大合唱。據此，毛説：「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大發展在中國，這是毫無疑義的。赫魯曉夫們很幼稚。他不懂馬列主義。易受帝國主義的騙。」最後説：「共產主義競賽，不平衡是客觀規律，不依人的意思（志）而存在。對表論是反馬列主義的。提出對表論，表示了他們的極大恐慌。」[19]

1960年1月，中共中央在上海舉行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當前國際形勢和相關的國防戰略是會議的重要議題之一。會議認為，艾森豪威爾1960年初發表的新年國情咨文，表明美國的確是在準備戰爭。應該看到，美國的本質沒有改變，戰爭的危險仍然存在。我們的戰略準備，還是要放在它要打仗這個基點上，這樣才能有備無患。關於中蘇關係，分析存在兩種可能性，一是赫魯曉夫沿着修正主義的道路繼續滑下去；二是碰了釘子以後，可能有所改變。中國的方針是，堅持團結，同時進行適當的和必要的批評，對一些重大的國際問題，正面地發表我們的意見。毛澤東説，正面講道理時不要同蘇共、赫魯曉夫公開爭論，不點他們的名，不引用他們的話，但可以引用南斯拉夫人的話，用批評南方的觀點的形式講清道理。[20]會後，中央常委指定中央宣傳部組織起草文章，批評南斯拉夫黨的錯誤觀點，正面闡述與當前國際形勢密切有關的若干「馬列主義基本原理」，在紀念列寧誕辰九十周年時發表。

赫魯曉夫為使5月舉行的法、蘇、美、英四國首腦會議，開成一個旨在緩和國際形勢的會議，他準備單方面承諾蘇聯將裁軍一百二十萬，並將這個打算於1960年1月3日通知了中國領導人。中國政府對此高度關注。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決定，一方面贊成裁軍，另方面正式聲明沒有中國自己參加，不承擔任何義務。[21]

1月23日，赫魯曉夫就召開華沙條約國政治協商委員會例會致信毛澤東。毛回覆説，中共中央決定派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康生，中央委員、中國駐蘇大使劉曉，中央委員伍修權為代表，以觀察員身份出席會議。2月4日，華沙條約國政治協商會議在莫斯科舉行。會上，蘇聯宣布單方面裁軍一百二十萬，華約各國跟着宣布裁軍，共裁軍三百八十萬。會議通過宣言，説裁軍是當今世界的主要問題，蘇聯在聯合國十四屆大會上提出的全面徹底裁軍的建議，「反映了華約締約國和所有社會主義國家的立場」。2月6日，根據事先的準備，康生在會上發言。指出，帝

國主義性質不會改變，戰爭危險依然存在。由於美國在國際關係中一直對中國採取排斥的態度，因此「沒有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正式參加和它的代表的簽字，有關裁軍的國際協議和其他一切國際協議，當然都不能對中國具有任何約束力」。由於《人民日報》當天公開發表了康生的講話。使赫魯曉夫十分惱火，他在招待會上祝酒時，不指名地指責中國黨在拆蘇共的台。華沙條約國首腦會議結束後，赫魯曉夫率團出訪印度尼西亞和印度兩國。其時，正是印度議會和報紙就達賴喇嘛和中印邊界問題，對中國進行大肆攻擊；印度尼西亞掀起一場驅逐、迫害華僑的反華運動。赫魯曉夫在這兩國反對中國浪潮高漲的時候去訪問，也引起中國領導人的誤解。

鑑於赫魯曉夫在華沙條約國首腦會議上的表現，及其以後採取的行動，中國領導人認為，這是一個重要的標誌，説明赫魯曉夫為着追求跟西方達成妥協，要以反對中國來討好西方。中國必須通過自己的外交活動打開外交局面，以對付世界範圍的反華浪潮。3月初，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兩項決定：一是由周恩來總理率團訪問緬甸、印度、尼泊爾等國；二是將列寧有關帝國主義、戰爭與和平、無産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等問題的文章編成小冊子，同時根據列寧的觀點，寫出文章，在紀念列寧誕辰九十周年時一併發表，以回答現代修正主義對列寧觀點的歪曲、篡改和閹割。這表明，馬列主義的大旗，要由中國共產黨人來扛了。

根據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指示，由中央宣傳部協助陸定一準備在紀念列寧誕辰九十周年大會上的講話；由胡喬木牽頭負责起草《人民日報》社論；由陳伯達牽頭起草《紅旗》雜誌編輯部的文章。鄧小平主持中央書記處會議，討論文章應闡明的主要內容[22]和三篇文章的分工。

1960年4月16日，《紅旗》雜誌首先發表題為〈列寧主義萬歲〉的紀念文章。著重從理論上闡述列寧有關時代、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等觀點。指出，新技術革命和核武器的出現，雖然具有重要意義，但並沒有改變時代的本質，現在還是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結論是列寧主義並沒有過時。要堅持列寧主義的旗幟，堅持列寧的革命學説。

4月22日，首都北京舉行列寧誕生九十周年紀念大會，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央書記處會記、中央宣傳部部長陸定一在會上作長篇講話——〈在列寧的革命旗幟下團結起來〉。重點是批判和平過渡的觀點。強調列寧的精華就是他的革命精神，他在革命勝利前是如此，在取得革命勝利後也是如此。指出：現代修正主義是帝國主義政策的產物，它們被帝國主義的核訛詐政策嚇破了膽，自己害怕戰爭，也害怕革命，害怕由革命引起戰爭。它自己不想革命，也反對人家革命，既反對资本主義國家人民革命，也反對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人民革命。

同日，《人民日報》發表編輯部文章——〈沿着偉大列寧的道路前進〉。著重分析當前形勢，講述現代維護和平的鬥爭和反對美帝國主義為首的侵略和戰爭勢力的關係。強調中國人民在紀念列寧的時候面臨三大任務：建設社會主義；爭取世界和平；團結國際友人。爭取世界和平，就要反對美帝國主義為首的侵略和戰爭政策。文章列舉了美帝國主義在戴維營會談後的三十五個事例，揭露美國在繼續執行它的侵略和戰爭政策、擴軍備戰政策。號召團結世界上一切愛好和平的力量，首先是社會主義陣營，來反對美國帝國主義的侵略和戰爭政策。

嗣後，以《列寧主義萬歲》為書名，將三篇文章印成小冊子，並譯成英、俄、德、日、法文廣為發行。[23]

對中國黨發表〈列寧主義萬歲〉等三篇文章，蘇方很是惱怒。蘇共中央書記科茲洛夫（Frol Kozlov）在一份報告中說：「中國同志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思想和策略立場進行攻擊。借列寧誕辰九十周年之際，中國發表了一系列文章，直接或間接批評蘇共在列寧主義主要理論和策略問題上的立場。」「在這些反映中共中央觀點的文章中，可以看出，中國同志想做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導師和輔導員，企圖證明他們中國的觀點是唯一正確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觀點。」實際上，在這些文章中，教條主義和宗派主義，極左的漂亮詞句和單方面解釋列寧主義原則被當作是在正统地捍衛列寧主義。[24]

作為對中共的回答，蘇共中央書記庫西寧（Otto V. Kuusinen）4月22日在莫斯科作報告說：「只是重複帝國主義具有侵略性這樣一個老的真理是不夠的，教條主義的立場是落後的立場。」「新式的戰爭武器開始顯示出有利於和平的壓力。」「帝國主義內部出現了頭腦清醒的國際活動家，他們也意識到進行大規模毀滅性的戰爭是不理智的，這無疑對爭取和平的勝利鬥爭是有意義的。」[25]

毛澤東看了中共中央聯絡部報來的庫西寧的報告摘要後，明確表示「此文要批評」。他指示楊尚昆與鄧小平、陳伯達商辦：「要寫一篇〈同庫西寧同志商榷〉的文章，有根據地有説服力地批評庫西寧文章中錯誤觀點。」[26]

中方指責蘇方為修正主義，蘇方指責中方為教條主義。這種表現在意識形態上的爭論，已不簡單是一個理論上的爭論，它背後所反映的是：當今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由誰主宰，這樣一個領導權問題。

4.布加勒斯特的較量

蘇、美、英、法四國原先商定，將於1960年5月16日在巴黎舉行首腦會議，討論柏林問題。由於4月底發生了美國U-2飛機侵犯蘇聯領空被擊落的事件，5月10日，四國首腦齊集巴黎愛麗舍宮後，赫魯曉夫要求

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向蘇聯賠禮道歉，懲辦罪犯和保證不再做這種飛行。但是艾森豪威爾只同意在他的總統任內（1961年1月屆滿）不做這種飛行，其餘要求不予接受，會議因此流產。[27]

四國首腦會議的流產，中國迅即作出反應，公開表示支持蘇聯的立場，譴責美國對蘇聯的侵犯。5月9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對蘇聯的挑釁就是對整個社會主義陣營的挑釁〉，利用這一事件揭露美帝國主義。5月20日，北京舉行有一百二十萬人參加的示威遊行集會，支持蘇聯正義立場，反對美國破壞四國首腦會議。鄧小平在會上發表講話。期間，毛澤東頻繁接見亞、非、拉各國訪華代表團：5月3日，接見拉丁美洲、非洲十四國工會婦女代表團；7日，接見非洲十二國社會活動家、和平人士、工會等代表團；8日，接見拉丁美洲八國代表和著名人士；9日，接見伊拉克、伊朗、塞浦路斯三國代表團；14日，接見日本、古巴、巴西、阿根廷訪華代表團。毛向他們說明：

> 最近美國派U-2型飛機侵入蘇聯……。這件事再一次暴露出美帝國主義在虛偽和平的幌子下所進行的準備侵略戰爭的真面目，進一步向全世界證明了這樣的真理：對帝國主義不應當存有不切實際的幻想。曾經有些人把艾森豪威爾說成是一個十分愛好和平的人，我希望這些人能夠從這樣一件事實中覺悟起來。
>
> 我們支持首腦會議的召開，不管這種會議有無成就和成就大小，但是世界和平的取得，主要應當依靠各國人民的堅決鬥爭。[28]

毛澤東強調指出：「帝國主義最怕的是亞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覺悟，怕世界各國人民的覺悟。我們要團結起來把美帝國主義從亞洲、非洲、拉丁美洲趕回它的老家去。」

5月22日，毛澤東在杭州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討論四國首腦會議流產一事和對赫魯曉夫的看法。毛澤東分析說，赫魯曉夫這個人有兩面性。很難設想強大的社會主義蘇聯的首腦會向美國總統下跪。毛認為，赫魯曉夫在重大問題上的傾向是修正主義的，但也不能說他在所有問題上是徹頭徹尾的修正主義，不好說他的修正主義已經完全形成了。但總的來說，可以說他是半修正主義。這是毛澤東第一次明確將赫魯曉夫定性為半修正主義。[29]蘇聯擊落美國間諜飛機及赫魯曉夫在四國首腦會議中的強硬態度，表現出了對中國論點的某種趨同，據此，中共中央確定在即將舉行的世界工聯理事會北京會議上，應按照〈列寧主義萬歲〉三篇文章的觀點，來動員全世界人民維護世界和平，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和戰爭政策。

6月初，在世界工聯理事會會議開幕前，中蘇雙方即已圍繞世界工聯書記處準備的總報告展開了爭論。中國代表團認為，這個報告在戰爭與和平、民族解放運動、資本主義總危機等六個問題上的提法存在重大

的原則性錯誤，並且認為報告中對中國人民全心全意擁護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以加引號的方式予以表述，表現了對中國人民的不友好態度。6月1日，中蘇雙方工會代表團團長劉寧一和格里申（Viktor Grishin）舉行會談，蘇方拒絕了中方的種種指責，表示對大躍進、人民公社加引號只是蘇方行文的一種習慣性表達方式，絲毫不攙雜感情色彩。翌日，在十二國工會黨員代表舉行的會議上，有不少代表指責中國犯了「左派幼稚病」。6月3日至4日，世界工聯書記處和執行局召開會議，對報告進行了修改，中方仍然聲明對其中某些錯誤論點保留意見，但是同意把報告草案提交理事會討論。[30]

為了避免在大會上形成爭論，6月5日晚，中共中央召集十七國工會共產黨和工人黨黨員負责人四十餘人舉行座談會，進行內部交換意見。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出席了會議。鄧小平在會上闡述了中共中央在重大國際問題上的觀點，[31]但當第一個問題「關於我們的時代」談完以後，格里申表示反對、並且拒絕鄧小平的解釋，拒絕劉少奇和周恩來的挽留，帶頭退场，東歐國家的代表也紛紛跟着站起來，導致座談會中斷。此後，中國方面認為不能再期望關起門來與蘇共之間達成任何協議，於是決定積極展開活動，直接與各國代表接觸，宣傳中方的觀點。[32]

與此同時，在總決議、反對殖民主義文件和提案等三個起草委員會會議上，中方代表也與蘇方代表進行了「針鋒相對、寸土必爭的尖鋭鬥爭」。世界工聯書記處面臨失控的局面，為此召開緊急會議，蘇方代表表示「不同意的各點可以不寫」。終於達成了中方認為「比我們設想要好的決議」。[33]

會議結束後，劉寧一在給中央的報告中説，這樣全面展開反對半修正主義的鬥爭和把世界工聯理事會這個表決機器的指揮棒打翻，在工會會議上還是第一次。認為同修正主義和半修正主義的鬥爭是國際範圍階級鬥爭的反映，這次會議將發生深遠的影響。[34]

蘇聯領導人則認為，世界工聯理事會北京會議，「中國同志們的行為是分裂活動，中國人想把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工人運動置於自己的監督之下」。「中國同志們所走的道路使中國領導人和其他兄弟黨的分歧滲透到资產階級的報刊上，被我們的敵人用來破壞共產主義和工人運動，破壞工人階級在爭取和平和社會主義鬥爭中的統一。」[35]

6月7日，蘇共中央給中共中央來信，説明原先提議召開的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和工人黨會議推遲舉行，在布加勒斯特舉行兄弟黨「會晤」，就開會的時間、地點和內容交換意見。鑑於世界工聯理事會期間的交鋒，毛澤東分析説，這次去布加勒斯特開會，要做兩手準備，一是要準備他們整我們，二是要準備他們拉我們。拉我們好辦，無非是要我們多支持少批評，我們本來是採取團結為重的方針。要充分做思想準備

的是他們要整我們，把開不成首腦會議的氣都撒到我們身上，組織對我們圍攻。保持高度警惕並做充分準備沒有壞處。[36]中共中央決定由中央政治局委員彭真率代表團參加羅馬尼亞工人黨代表大會，同時參加在布加勒斯特舉行的兄弟黨「會晤」。中方決定參加會議的方針是：堅持團結，堅持原則，摸清情況，後發制人，據理辯論，留有餘地。

彭真率代表團於6月16日離京赴莫斯科，17日同蘇共中央主席團委員科茲洛夫（Frol Kozlov）會談。科茲洛夫對布加勒斯特「會晤」的打算避而不談，一開始就指責中國發表的三篇文章，以及在世界工聯的北京會議上宣傳自己的觀點，不只理論上是錯誤的，組織上也是錯誤的。彭真與之爭吵了八個小時。彭真一行抵達布加勒斯特後，遭到全面封鎖，根本無法同各國代表團接觸，對提出會見赫魯曉夫的要求，也是一直拖延。

6月20日至25日，羅馬尼亞工人黨舉行第三次代表大會。中國代表團與五十一個國家的「兄弟黨」代表一同參加。彭真被一同坐在主席台的其他一些人有意冷落。22日，赫魯曉夫與中國代表團會面，根據中央的原定方針，代表團採取多聽少説的方針，以摸清赫魯曉夫的底。赫魯曉夫説，你們搞大躍進，可是人民沒有褲子穿，窮得要命。你們搞百花齊放，現在怎麼樣，還放不放？你們那麼愛斯大林，你們把斯大林的棺材搬到北京去好了。我們可以送給你們。你們老講東風壓倒西風，就是你們中國想壓倒大家，要壓倒全世界。並就中國與印度、印度尼西亞的關係對中國進行攻擊和指責。這樣，代表團對布加勒斯特「會晤」的意圖基本摸清了，赫魯曉夫是要整中國。

6月23日，蘇共代表團交給中共代表團一封信，內容分為七個部分，批駁中國《列寧主義萬歲》三篇文章的觀點。實際上，這封信蘇共代表團早在21日就以「通知書」的名義發給了其他代表團。接着，又送來一份關於會議公報的稿子。這種架勢，明擺着是在對中共代表團搞一場突然襲擊。24日上午，十二個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代表團舉行「會晤」，一開始就形成對中共代表團的圍攻局面。其中發言比較激烈的有保加利亞、捷克斯洛伐克和民主德國的黨，波蘭和蒙古黨的發言比較一般，阿爾巴尼亞、朝鮮、越南黨的代表則表示不同意會議這樣開法。會上的發言，按照蘇方「通知書」的調門，指責中共在時代問題上重複列寧的論述是「教條主義」；中共「拒絕和平共處」，「希望戰爭」，「觀火」、「製造緊張局勢」，是「左傾冒險主義」；進行「托洛茨基式的分裂活動」，在國際群眾組織（世界工聯理事會）中採取「宗派主義立場」；公開發表康生在華沙條約國政治協商會議上的發言，是「向帝國主義送情報」，〈列寧主義萬歲〉等三篇文章「是南斯拉夫式的分裂活動」，等等。

赫魯曉夫最後發言，對中國的內政，外交各方面進行激烈攻擊。彭

真随即對赫魯曉夫作了回擊，批評他違背馬克思列寧主義。並對於蘇方事先擬定的公報提出修改意見，至於是否簽字，要請示中央。25日下午，毛澤東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討論中央給代表團的電報和為代表團起草的聲明。毛澤東指出：

> 現在我們跟赫魯曉夫的分歧，根本的問題是全世界社會主義國家以外的三分之二的人民要不要革命的問題，屬於社會主義國家三分之一的人民要不要繼續革命的問題，這是兩條路線分歧的根本問題。赫魯曉夫是代表老闆階級，代表资產階級，不要革命，不要繼續革命，不要共產主義。

會議決定中共代表團發表聲明，著重揭露蘇共對中國黨搞突然襲擊，對各國黨採取家長式、老子黨的專權態度。表示中國黨決不聽從任何人的指揮棒，決不向任何錯誤的觀點和做法屈服。重申中國黨是為團結而鬥爭的。

就在中國代表團等候中央指示的時候，25日，赫魯曉夫把本來是十二國黨的會晤一手操縱改為五十一國黨參加的會議。對會上的攻擊、謾罵，中國代表團採取哀兵姿態，以爭取時間，取得同情。當晚，代表團收到中央指示，立即將聲明稿翻譯成外文。在26日上午的會議上分發給各國代表團。赫魯曉夫對中國黨的強硬聲明，惱羞成怒，在下午的會議上再次擺出老子黨的架子，攻擊中國黨是「瘋子」，「要發動戰爭」，「把帝國主義壟斷资產階級的旗幟拿起來」，「純粹的民族主義」，等等。彭真當即予以還擊，指出赫魯曉夫的做法是為所欲為聽不得別人意見，誰不聽他的就組織對誰圍攻，還不準別人為自己辯護，這種行為完全破壞了國際準則。彭真發言時，赫魯曉夫非常激動，他跟彭你一句我一句地吵了起來。最後，中共代表團為緩和已經出現的嚴重分歧和對立，在會談公報上簽了字。

彭真率中共代表團於6月28日回到北京。6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舉行會議，聽取彭真匯報。會上，毛澤東說，赫魯曉夫打算圍攻我們，而我們是反圍攻，像過去中央蘇區那樣反「圍剿」。但是我們這個反「圍剿」要適可而止，要留有餘地，不要把子彈一次打完，能夠收時就收，有理有利有節。[37]這樣，中蘇關係惡化，已成定局。

5.撤走專家，關係惡化

就在中方準備休戰的時候，蘇共領導認為，布加勒斯特會議未能壓服中方，鬥爭必須繼續。7月13日，科茲洛夫在《關於布加勒斯特會議給蘇共中央的報告》中說明兩黨分歧時說：中共領導「在對外政策中表現出黷武主義和宗派主義」；在國內「社會改造過程中犯了左傾冒進的錯誤」，把自己的公社說成是「未來共產主義社會的基層單位」，冒充

為「共產主義樣板」。「把不同意他們意見的人稱作修正主義、帝國主義走卒和奸細。」「把自己擺在了與整個共產主義運動為敵的位置上。」造成這些謬誤的重要原因是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強調莫斯科宣言在指出修正主義「是當代條件下主要的危險」，同時也指出「教條主義宗派主義也可能成為一些黨一定發展階段的主要危險」。「現在中國同志的『左』傾宗派主義觀點和他們不正確的非共產主義的行動措施不僅是中國共產黨而且是整個共產主義運動的嚴重危險。」「所以，為順利地完成擺在共產黨和工人黨面前的任務，要求進一步開展既反對修正主義又反對教條主義和宗派主義的鬥爭。」[38]

為使中國黨屈服，赫魯曉夫決心進一步向中國施壓。7月16日，蘇聯政府突然照會中國外交部，不顧國際信義，提出撤走在華的蘇聯專家。7月25日，蘇聯政府又通知中國政府，從7月28日至9月1日，將全部在華專家1390人撤回，停止派遣專家900多名，停止執行343個專家合同和合同補充書。

蘇聯專家分布在中國經濟、國防、文化教育和科學研究等部門的250多個企業和事業單位，在技術設計、工程施工、設備安裝、產品試製和科學研究等方面擔負着重要任務。中國第一個五年計劃以來，蘇聯援助的304個項目中還有201個項目正在建設中，這些項目直接或簡接牽動着十二個方面的工作。蘇聯專家撤走，勢必打亂中國整個國民經濟建設的安排。

7月31日，中國外交部覆照蘇聯駐華大使館，指出蘇聯撤回專家的行動，違反中蘇友好條約，違反社會主義國家之間友好關係的準則，表示希望蘇聯政府重新考慮並改變此決定。蘇聯政府不予理睬，加緊了撤走專家的行動。毛澤東憤怒地説：還不如法國的資產階級，他們還有一點商業道德觀念。

中國政府對給予中國以幫助的蘇聯專家以禮相送。8月16日，周恩來總理為即將回國的蘇聯專家舉行告別宴會，對他們為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做出的巨大貢獻表示誠摯的感謝。周動情地説：「我們分開了，但相信兩國、兩國人民的友誼是永恆的。」講到最後，周説：「我的感情已經不允許我再講下去了……」。在座的蘇聯專家深受感動，有些人還流下了眼淚。

赫魯曉夫突然撤走專家、撕毀合同，不只是對正面臨嚴重困難的中國經濟雪上加霜，更是對中國人民感情上的嚴重傷害。

6.發憤圖強，自力更生

赫魯曉夫撤走專家雖屬突然，但中國政府並非完全沒有思想準備。中國駐蘇使館人員對蘇聯政府有意冷淡與中國的關係，拖延或不執行原

定合作和援助項目的情況，早有感覺，並曾向國內報告說：自我國紀念列寧誕辰九十周年的三篇文章發表後，許多跡象表明蘇聯在政治上對我冷淡，在經濟合作特別是重要關鍵項目的合作和援助上，逐步採取措施對我施加壓力。報告列舉了「我方去年提出聘請原子能方面的蘇聯專家，歷時數月，幾經催促，尚無答覆」。「許多協議拖延不執行；好幾個國防尖端項目拖了一年多沒有下文；對高、大、精、尖和機密項目控制愈來愈緊；對外事務聯繫管理更加集中，交涉談判中困難增加；較機密的學術會議不再邀請中方人員參加」等事例。[39]毛澤東當時在這則報告上批道：「態度有變化，正好迫使我們自力更生，壞事一定會變成好事。不是嗎？」[40]

為應付可能出現的變局，負責國防科研工作的國務院副總理聶榮臻在7月3日向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寫報告，建議：蘇聯在重要技術關鍵上卡我們，我們應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針；今後與蘇方的科技往來，凡協議上有的項目，我們到時候就要詢問，仍然要，但對方不給，绝不再催，掛上一筆賬。對蘇联專家，繼續貫徹堅持原則，堅持團結，多做工作的方針；獨立自主，立足國內，絕不意味著自己封鎖自己。[41]

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央領導人很快批準了聶榮臻的報告。

7月5日至8月10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開工作會議，討論國際問題和國內經濟問題。彭真在會上作布加勒斯特會議情況及中蘇兩黨分歧問題的報告，與會人員對赫魯曉夫在會上對中國代表團搞突然襲擊、組織圍攻的惡劣做法，表示極大憤慨。

從18日開始，會議轉向討論國內經濟問題。最突出的是糧食問題，還有尖端技術問題。就在這時，發生了蘇联撤走全部在華專家事件。毛澤東在18日的會上說，我們不要忘記蘇聯黨和人民在歷史上給我們很大幫助。現在不幫助了，我們只能採取自力更生、勤儉建國這個方針。我們既不能向赫魯曉夫乞求，也不能向美國乞求。現在我們可能而且必須搞自力更生。這是列寧主義的道路。一國可以取得無產階級革命的勝利，可以建設社會主義。為甚麼非要外國援助才行呢？我們要走列寧、斯大林的道路，一國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42]

在討論中，大家認為，應該把決心下在專家統統撤走、所有援助的設備統統不給、條約統統撕毀上。當然，估計他們還是想做生意的。我們要認真算一算帳，我們欠他的債怎麼辦？他們賴帳怎麼辦？經過計算，周恩來說，按八十億盧布算，過去我們每年還他五億元左右的樣子，如果按五億左右算，我們要十六年才能還清。如果提高一點，每年按八億算，那我們要十年才能夠還清。

中央政治局決定，要爭取五年還清。要號召各部門、各省勒緊腰帶，要爭這口氣，要盡快把欠蘇聯的債全部還清（中國共欠蘇聯的152

億盧布，真正屬於經濟援助的只佔四分之一，其他四分之三是抗美援朝時蘇方以半價賣給中國的軍火錢）。毛澤東在會上説，不管怎麼樣，過去我們答應買武器彈藥按半價的，現在我們還是按半價還債，一個錢也不賴。經濟建設的設備也是一個錢不賴，欠多少還多少。因為這是蘇聯人民的錢，我們要對得起蘇聯人民，在我們困難的時候他們幫助了我們。各地方、各部門要下決心把東西擠出來。要勒緊腰帶，爭取五年內把債務還清。會議決定：成立中央外貿小組，各地方也成立一個外貿小組。

7月31日，周恩來在中央工作會議上作蘇聯撤走專家和外貿問題的報告。當時，中國進出口贸易，對蘇貿易額佔着一半。中國出口的主要是糧、油、肉、蛋等農產品。因連續兩年農業大幅度減產，糧、油、肉、蛋等不能按計劃收購上來，對蘇貿易欠賬達二十五億盧布。與會人員了解到這種情況後，激起了勒緊腰帶還債的憤懣情緒。紛紛表示，「要爭口氣，明年把债還掉」。「共赴國難，有錢出錢，有力出力」。毛澤東拍板：「明年還清這個賬。」[43]

北戴河會議經過反覆討論，批準了李富春和薄一波聯名提出的《1960年第三季度工業交通生產中的主要措施的報告》，為扭轉第二季度以來主要產品下降的局面，解決基本建設戰線過長、物资使用分散的問題，必須削基建，保生產，集中力量把鋼、鐵、煤，運輸的生產搞上去。毛澤東雖也赞同調整，但他堅持認為其他方面可以減速，鋼鐵指標不能降低。號召全國大煉「爭氣鋼」。於是，會議决定，爭取當年生產二千萬噸，提前實現鋼產量趕上英國的任務。會議通過了《關於全黨動手，大辦農業，大辦糧食的指示》、《關於開展以保糧、保鋼為中心的增產節約運動的指示》、《關於全黨大搞對外貿易收購和出口運動的緊急指示》。

《關於開展以保糧、保鋼為中心的增產節約運動的指示》指出，目前最突出的問題，是糧、鋼的增產問題。如果不認真努力，今年糧、鋼生產指標和其他一些主要產品的生產計劃，就有完不成的危險。為使保證重點生產和重點建設方針的落實，確定：基本建設項目和生產任務排隊的原則是，先中央後地方；先重點後一般；先採掘工業和材料工業，後加工工業；先計劃內的，後計劃外的。堅決貫徹全國一盤棋的原則，反對本位主義。[44]

《關於全黨大搞對外貿易收購和出口運動的緊急指示》，首先指出了當前外貿工作的嚴峻形勢：截止7月25日，全年出口商品的收購計劃只完成原定指標的43.3%，出口計劃只完成38%。按照目前的進度計算，估計到年底，對社會主義國家欠帳可能達到十七至二十億元（其中對蘇聯的欠帳十四到十六億元）。為實現對蘇聯和東欧各國的貿易欠款做到今年少欠，明年還清的目標，中央決定今後三年必須堅持量出為

入、內銷一般服從外銷的對外貿易方針。宣布成立由周恩來、李富春、李先念組成的三人小組，建立對外貿易指揮部，全權指揮全國的收購、出口和調運運動。[45]

會議還制定了《關於向黨員幹部介紹布加勒斯特會議情況和中蘇關係問題的通知》。

會後，各省、市、區黨委相機召開常委擴大會或工作會議傳達北戴河會議精神，激起對修正主義的憤慨和發憤圖強的決心；對中央關於保糧，保鋼和保證完成外贸的三項指示作了研究和部署，[46]認為，蘇聯修正主義者已「不可能擔當起指導國際革命運動的職責，革命的重心已移向亞非拉，革命的指導中心已移到中國，我黨應把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領導責任擔當起來」。紛紛表示：「將化義憤為力量，奮發圖強，自力更生，勤儉建國，堅決執行中央關於保糧、保鋼，開展增產節約運動的指示，保證完成外貿任務，努力攀登科學技術尖端的高峰，給帝國主義、現代修正主義以更有力的打擊。」[47]

為加強對六個戰略性地區的各項工作、特別是建立區域性的比較完整的經濟體系工作的領導，中央政治局於9月決定成立六個中央局，[48]作為中共中央在各大區的派出機構。任命李雪峰為華北局第一書記，宋任窮為東北局第一書記，柯慶施為華東局第一書記，陶鑄為中南局第一書記，李井泉為西南局第一會記，劉瀾濤為西北局第一書記。[49]

[1] 中國共產黨代表團：〈關於和平過渡問題的意見提綱〉（1957年11月10日），載人民出版社編：《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論戰》（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頁111-113。

[2] 1958年7月21日毛澤東與尤金談話記錄。參見吳冷西：《十年論戰：1956-1966中蘇關係回憶錄》，上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頁157-160。

[3] 魏列夏金著，陳春華譯：〈1958年7-8月赫魯曉夫訪問北京〉，《中共黨史研究》，2000年第4期，頁100-101。

[4]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外交文選》（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世界知識出版社，1994），頁322-333。

[5] 參贊魏列夏金的回憶錄中說，毛澤東對蘇聯指責的主要內容有：在毛澤東第一次訪蘇時，斯大林在中國使館安裝竊聽器；蘇聯前任大使羅申（Nikolai Roshchin）在中國外交部發展情報員；貝利亞（Lavrenty Beria）與高崗勾結，多次派人與高崗聯絡；蘇聯駐新疆領事館通過非法渠道收集情報等等。儘管毛澤東一再聲稱，這些現象只是一個指頭與九個指頭的問題，但給蘇聯人留下的印象是：「毛澤東滔滔不絕地講了一整天」，「所有這些問題實際上都與中蘇兩國關係、兩黨關係」有關。他們感到「心情沉重」，並認識到「對中國的政策不完全理解，過高估計了共同的意識形態這一因素的重要性，而對國家利益的差異估計不足」。〈1958年7-8月赫魯曉夫訪問北京〉，頁101-103。

[6] 吳冷西：《十年論戰》，上冊，頁160-162。

[7] 毛澤東與尤金談話記錄（1958年7月22日），《黨的文獻》，1994年第1期。

[8] 毛澤東與赫魯曉夫的談話記錄，1958年7月31日，8月3日，引自沈志華，李丹慧收集和整理：《中蘇關係：俄國檔案原文複印件彙編》，第十二卷（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國際冷戰史研究中心存，2004)，未刊，頁3080-3095，3096-3098。沈志華提供了核檔案的中譯文（下同），筆者在此表示感謝。

[9] 《毛澤東傳（1949-1976）》，上冊，頁854。

[10] 《中共黨史研究》，2002年第5期。

[11] 沈志華：〈赫魯曉夫、毛澤東與中蘇未實現的軍事合作——關於遠東防空協定、長波電台及聯合艦隊問題的再討論〉，載沈志華、李丹慧：《戰後中蘇關係若干問題研究——來自中俄雙方的檔案文獻》（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頁398。

[12] 赫魯曉夫與毛澤東的會談記錄，1959年10月2日；蘇斯洛夫（Mikhail Suslov）就《關

於蘇聯黨政代表團之行的報告》給蘇共中央主席團的報告，1959年12月18日。引自沈志華、李丹慧收集和整理：《中蘇關係：俄國檔案原文複印件彙編》，第十三卷，頁3210-3222、3288-3324。另參見吳冷西：《十年論戰》，上冊，頁221-227。

[13] 赫魯曉夫與毛澤東的會談記錄，1959年10月2日；安東諾夫關於赫魯曉夫訪美與毛澤東的談話備忘錄，1959年10月14日，引自沈志華、李丹慧收集和整理：《中蘇關係：俄國檔案原文複印件彙編》，第十三卷，頁3210-3222、3223-3233。另參見吳冷西：《十年論戰》，上冊，頁221-227。

[14] 吳冷西：《十年論戰》，上冊，頁228。詩中：「一輛汽車幾間屋，三頭黃犢半盤銀」兩句，是指赫魯曉夫向中共领導人談他在美面看到美國人的生活是，差不多每個家庭都有汽車，一家都有幾間房子，住的很好，吃的也很好，生活水平很高；他在美國受到了热烈歡迎，一位農場主送他三頭良種牛、有位資本家送他一盤古銀幣。

[15] 吳冷西：《十年論戰》，上冊，頁227。

[16]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八冊，頁602-603。

[17] 吳冷西：《十年論戰》，上冊，頁261。

[18] 毛澤東、王稼祥同華東地區各省市委第一書記談話記錄（1959年11月12日），轉引自《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頁1027。

[19] 毛澤東〈關於國際形勢的講話提綱〉（1959年12月），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九冊，頁599-602。

[20] 吳冷西：《十年論戰》，上冊，頁245。

[21]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頁278。

[22] 會議認為，文章總體上要講清七個方面的問題：第一，要講世界形勢，講新技術——核武器出現後，世界形勢有甚麼變化，甚麼變了，甚麼沒有變，現在是甚麼時代，新時代是甚麼時代。因為修正主義一個重要觀點，是認為時代變了。第二，要講列寧主義是不是過時了，因為修正主義講列寧主義過時了，我們要明確回答：在當今這個時代，列寧主義沒有過時。第三，要講馬克思、列寧的革命學説，第四，講戰爭與和平的問題。第五，講帝國主義的本性變了沒有，要講清楚维護和平和反對帝國主義的關係。第六，講革命鬥爭和議會鬥爭的問題，闡明我們對和平過渡問題的觀點。第七，反對修正主義和教條主義問題。指出主要危險是修正主義。

[23] 這三篇文章發表後，不僅在西方輿論界引起軒然大波，而且使蘇聯的一般幹部和群眾受到極大震動——他們第一次知道雙方領導人之間存在着重大分歧，很多人甚至以為是翻譯出現了錯誤。詳見《內部參考》，1960年第3043、3046、3059，3062號。

[24] 科茲洛夫在蘇共中央全會上的報告（1960年7月13日），引自沈志華，李丹慧收集和整理：《中蘇關係：俄國檔案原文複印件彙編》，第十三卷，頁3346-3417。

[25] 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編印的一份內部刊物摘編（1960年4月26日），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九冊，頁169-170。

[26] 毛澤東：關於要寫一篇〈同庫西寧同志商榷〉的文章的批語（1960年4月）、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九冊，頁169。

[27] 參見王泰平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史（1957-1969）》，第二卷（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8），頁234。

[28] 毛澤東：〈接見日本、古巴、巴西、阿根廷訪華代表團時的談話〉（1960年5月14日），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九冊，頁188。

[29] 參見吳冷西：《十年論戰》，上冊，頁269-272。

[30] 沈志華、李丹慧採訪朱庭光記錄（2002年6月5日）。

[31] 吳冷西：《十年論戰》，上冊，頁276所記在中共中央6月5日召集的座談會上，由劉寧一致詞説明中共的基本觀點，有誤。

[32] 根據這一方針，翌日，周恩來設宴招待各國工會代表時發表講話説：和平「必須依靠人民自己起來同帝國主義鬥爭」，「向帝國主義乞求和平，是永遠得不到和平的』，「帝國主義侵略和好戰的本性是不可能改變的」，要「徹底揭穿現修正主義者的叛徒面目」。6月8日上午，中國工會代表、中華全國總工會副主席劉長勝在工聯理事大會上的發言中，全面論述了戰爭與和平問題，明確表明了與會議總報告不同的認識。參見沈志華、李丹慧採訪朱庭光記錄（2002年6月5日）。

[33] 沈志華、李丹慧採訪朱庭光記錄（2002年6月5日）。

[34] 參見劉寧一：《歷史回憶》（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1996）。

[35] 科茲洛夫在蘇共中央全會上的報告（1960年7月13日），引自沈志華、李丹慧收集和整理：《中蘇關係：俄國檔案原文複印件彙編》，第十三卷，頁3346-3417。

[36] 吳冷西：《十年論戰》，上冊，頁277。

[37] 吳冷西：《十年論戰》，上冊，頁298-299，《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頁1086中説：7月2日，毛澤東的專列停在天津，彭真專程趕來向毛匯報。

[38]　科茲洛夫在蘇共中央全會上的報告（1960年7月13日）、引自沈志華、李丹慧收集和整理：《中蘇關係：俄國檔案原文複印件彙編》，第十三卷，頁3346-3417。

[39]　中國駐蘇大使館給外交部蘇歐司並報劉曉大使的電報（1960年7月18日），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九冊，頁252-253。

[40]　毛澤東：〈在關於最近蘇聯對中國大使館的態度變化情況報告上的批語〉（1960年7月），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九冊，頁252。

[41] 聶榮臻：《聶榮臻回憶錄》，下冊（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4），頁807-808。

[42] 吳冷西：《十年論戰》，上冊，頁335。

[43]　周恩來在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記錄（1960年7月31日），轉引自《毛澤東傳（1949-19760）》，下冊，頁1089。

[44]　〈中共中央關於開展以保糧、保鋼為中心的增產節約運動的指示〉（1960年8月14日），載《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十三冊，頁528-535。

[45]　〈中共中央關於開展以保糧、保鋼為中心的增產節約運動的指示〉（1960年8月20日），載《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十三冊，頁512-513。

[46]　中共江蘇省委關於省委常委擴大會議第一階段情況給中央，上海局的報告（1960年8月24日），中共河南省委關於貫徹北戴河會議的部署給中央的報告（1960年8月24日），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九冊，頁267-277、278。

[47]　中共黑龍江省委關於傳達北戴河會議精神給中央並毛澤東的報告（1960年8月29日），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九冊，頁281-282。

[48]　華北局：北京、河北、內蒙、山西四省、市、自治區；東北局：黑龍江、吉林、遼寧三省；華東局：上海、江蘇、浙江、江西、福建、安徽、山東七省、市；中南局：廣東、廣西、湖南、湖北、河南五省區；西南局：四川、雲南、貴州、西藏四省、區；西北局：陝西、甘肅、青海、寧夏五省、區。

[49]　1961年1月18日，中共八屆九中全會批準中央政治局1960年9月關於成立中央局的決定，並通過決議。《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十四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頁75-77。

六、學習「毛著」與突出政治

1.掀起學習《毛選》的熱潮

新中國建立以後，學習《毛澤東選集》的第一個熱潮，是伴隨着《毛選》第一至三卷在1951到1953年的先後出版發行而掀起的。它是確立中國共產黨在上層建築意識形態領域的領導地位的根基，也是改造從舊中國過來的人們尤其是知識分子思想的主要武器。第二個學習熱潮則是由1960年9月《毛選》第四卷的出版發行而掀起來的。《毛選》第四卷所收錄的是1945年8月日本投降以後到1949年9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前，即全國解放戰爭時期毛澤東的重要著作。這本選集在這時出版發行，顯然與當時的國際、國內形勢有關。

選集收錄的〈抗日戟爭勝利後的時局和我們的方針〉、〈中共中央關於同國民黨進行和平談判的通知〉、〈關於重慶談判〉等文章，闡明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勝利以後，一方面盡力爭取和平，反對內戰，同時對國民黨假和談、真備戰的陰謀也積極做好應對的準備，即採取革命的兩手對付蔣介石的反革命兩手的策略；明確基本方針是，一切都放在自己力量的基點上，依靠自力更生。〈關於目前國際形勢的幾點估計〉，是説美蘇之間可以實行某種妥協，但资本主義世界的各國人民仍應按照自己的情況開展鬥爭，這種鬥爭不僅不會引發新的世界大戰，相反是制止新的世界大戰的力量保證。〈和美國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談話〉，提出了「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的著名論點，原子彈也是紙老虎，是用來嚇人的。我們在戰略上要藐視敵人，在戰術上要重視敵人。這些文章的重要觀點，在歷史上是針對斯大林擔心中國革命會引發美蘇大戰的顧慮，更是針對蔣介石玩弄和平花招，向人們闡明：既不要對帝國主義和反動派抱不切實際的幻想，也不要怕帝國主義和反動派的威嚇。用以堅定人們的必勝信念。

不難看出，《毛選》第四卷在國內經濟形勢繼續惡化，蘇聯又以撤回專家、撕毀合同、中止援助施加壓力的1960年出版發行，它所具有的雙重意義，即對外以中國自己的歷史經驗向人們闡明，中國共產黨在戰爭與和平等問題的觀點的正確性；對內以歷史經驗教育人民，丟掉幻想，準備鬥爭，不怕壓，不信邪，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定能取得勝利。歸結到一點：堅定對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的信念。9月28日，中共中央批準並轉發了中央宣傳部關於《毛澤東選集》第四卷的宣傳和學習問題的報告。[1]指出：

《毛澤東選集》第四卷，是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我國人民革命鬥爭的偉大記錄，是我國人民革命勝利經驗的结晶，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重大發展，是反對现代修正主義最好的教科書。……必將發生極其深遠、極其廣大的影響。

根據中宣部報告的精神，《人民日報》9月30日發表社論：〈毛澤東思想是中國人民大革命勝利的旗幟〉；《紅旗》雜誌第十九期發表林彪的署名文章：〈中國人民革命的勝利是毛澤東思想的勝利〉，《紅旗〉社論：〈在戰略上藐視敵人，在戰術上重視敵人〉；《紅旗〉第二十、二十一期合刊發表編輯部文章：〈中國人民革命勝利經驗的總結〉，對選集的主要內容和精神作了介紹和宣傳。由此掀起的學習《毛選》的第二個熱潮，對整個1960年代煽起對毛澤東個人崇拜的狂熱，在人們頭腦中灌輸反對修正主義的意識，堅信世界革命的中心已經轉移到了中國，要擔當起領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大任等等，產生了廣泛、深刻的影響。

2.突出政治與鼓吹個人崇拜

強調要政治掛帥，要崇拜真理，一個班要崇拜班長，都是1958年毛澤東為發動「大躍進」在成都會議上倡導而傳播開來的。中國的古訓説得好：「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如前文所述，在1958年的成都會議和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包括中央領導人在內的許多人的發言，就已經提出：「要宣傳毛主席的領袖作用，宣傳和學習毛主席的思想」[2]的問題。經過中共八大二次會議、1958年中共中央軍委會議反對所謂教條主義、1959年批判彭德懷所謂反對毛澤東而犯了反黨的罪行，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迅速升溫。1960年的現實形勢——對外反對「修正主義」；對內統一黨內外思想，克服困難，似乎更有搞毛澤東個人崇拜的需要。黨內一直在揣摸著毛澤東的心理行事的林彪、康生等人，在這種大氣候下，更是積極站出來推波助瀾，成了1960年代搞毛澤東個人崇拜的第一吹鼓手。

在1959年9月批判彭德懷的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林彪就向人們提出怎樣學習馬列主義的問題。他説：「我向同志們提議，主要是學習毛澤東同志的著作。這是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捷徑。」「是一本萬利的事情。」10月，林彪被任命為國防部長後發表的第一篇文章的題目是：「高舉黨的總路線和毛澤東軍事思想的紅旗闊步前進」。在1960年2月的全軍高級幹部會議上，林彪又提出學習毛澤東著作，要背「警句」，說：「我主張要背一點東西，首先把毛澤東同志的著作中最精髓最重要的話背下來。腦子裏就是要記住那麼幾條。」他以精神的東西可以轉化為物質的東西這個所謂哲學原理，強調突出政治訓練、作風建設的重要

性，並把毛澤東1939年為抗日軍政大學提的校訓[3]概括為「三八作風」，要求全軍貫徹執行。1960年9月，林彪在全軍高級幹部會議上講話提出了政治工作的「四個第一」：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思想第一。在此期間，康生也有創造，1959年12月2日，康生在軍事科學院和高等軍事學院作報告就為毛澤東思想下了新的定義，他說：「毛澤東思想是世界上分成帝國主義陣營和社會主義陣營兩大陣營，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進入一個新的歷史時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1960年1月4日，康生向中共中央黨校負責人指示說：毛澤東思想是「最高最後標準」。黨校學員「必須先學毛著，後學馬列著作」，這叫「先入為主」。

林彪為了排除障礙，使他提出的這一套得以順利貫徹，刻意在軍內製造了一起譚政「反黨」事件。在1960年9月14日至10月20日召開的軍委擴大會議上，他親自發動對總政治部主任譚政的揭發批判，指責「總政治部工作方向上發生了偏差」，通過了《關於譚政同志錯誤的決議》。[4]同時，通過了以林彪「四個第一」為指導思想起草的《關於加強軍隊政治思想工作的決議》[5]。這個被稱為在新的歷史時期繼承和發揚了1929年古田會議傳統的政治工作決議，其突出之點是：

為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在當代的地位下了定義。《決議》說：「毛澤東同志是當代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毛澤東思想是在帝國主義走向崩潰、社會主義走向勝利的時代，在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中，在黨和人民的集體奮鬥中，應用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6]創造性地發展了的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是中國人民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指針，是反對帝國主義的強大的思想武器，是反對修正主義和教條主義的強大的思想武器。」

稱讚林彪是創造性運用毛澤東思想的典範。《決議》說：「毛澤東思想無論過去、現在或將來，都是我軍建設的指針，也是我軍政治思想工作的指針。」「林彪同志根據毛澤東同志歷來的指示和當前的實際情況，提出了正確處理政治工作領域中的四個關係問題。……是創造性地運用毛澤東思想的範例。」強調政治工作第一。提出：「政治掛帥，也就是用毛澤東思想掛帥。」「號召人人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做毛主席的好戰士。」

提出要「大興三八作風」；「開展與無滅資鬥爭」。

毛澤東在12月14日、21日親自審閱和修改了這個決議。中共中央批準了《決議》並轉發到地委以上的地方黨委。中央在批示中對《決議》作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評價，說：

> 這個決議，缓承和發揚了1929年古田會議的傳统，在毛澤東思想的指導下，全面地總结了解放十一年來軍隊建設和政治思想工作的豐富經驗，明確地指出了在新的歷史時期中軍隊政治工作

> 的方向。提出了措施，打中了要害。……中央認為，決議所提出的這些問題，都是正確的和適時的。中央批準這個決議……。這個決議不僅是軍隊建設和軍隊政治思想工作的指針，而且它的基本精神，對於各級黨組織、政府機關以及學校、企業部門等都是有用的，可以發給地委以上機關閱讀。[7]

中共中央對《決議》的高度讚揚，也與當時的中蘇衝突有關。10月21日，陳毅元帥在軍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就明白指出，突出毛澤東思想，搞毛澤東的崇拜，是反對修正主義的需要，是爭奪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領導權的需要。

如果說，《毛澤東選集〉第四卷的出版，是掀起學習毛澤東著作新高潮和在全國範圍搞毛澤東個人崇拜的契機，那麽，中共中央轉發的這個加強軍隊政治思想工作的決議到全黨，則是掀起高潮的強大發動機。而在搞對毛澤東個人崇拜的同時，也大大提高了長期養病不出的林彪的威望。[8]

3.對宣傳毛澤東思想的不同聲音

儘管中共中央批準並轉發了由林彪主持的加強軍隊政治思想工作的決議。但在中共高層，對林彪鼓吹毛澤東思想那一套絕對化、庸俗化的做法，還是有着明顯不同意見的。

早在1960年3月25日，鄧小平在中共中央天津會議上講話，就提出要正確宣傳毛澤東思想。他指出：「第一，現在的主要問題是把毛澤東思想用得庸俗了，甚麽東西都説成是毛澤東思想。」「第二，馬克思列寧主義很少講了。這種情況，不少報紙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他說：「我們在宣傳毛澤東思想的時候，一定要按照中央的指示，把『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和『學習毛澤東同志的著作』並提。當然，也可以單獨提毛澤東思想，但是一定不要忘記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不要丟掉這個最根本的東西。」鄧小平鄭重地指出：「對待毛澤東思想是一個很嚴肅的原則性的問題，不要庸俗化，庸俗化對我們不利，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不利。」鄧小平還講到另一個敏感問題——集體領導問題。他說：「我們黨是集體領導，毛澤東同志是這個集體領導的代表人……。但是，切不可因此把毛澤東同志和黨中央分開，應該把毛澤東同志看作是黨的集體領導中的一個成員，把他在我們黨裏頭的作用説得合乎實際。」鄧小平説：中央已經發了一個指示，準備還要搞點材料，再發個指示。糾正這種傾向。[9]

1961年1月，林彪在《關於加強政治思想工作的指示》中，系統地提出了後來影響巨大，流傳甚廣的學《毛著》「二十一字方針」：「帶着問題學，活學活用，學用結合，急用先學、立竿見影」。對於林彪提

出的「二十一字」箴言，許多中央領導人有不同看法，因為它同中共中央和毛澤東自己歷來倡導的要系統學習馬列主義的方針相違背。與林彪發生正面衝突的，是林彪的老搭擋羅榮桓元帥。

羅榮桓，因譚政對林彪的一套説法和做法沒有積極貫徹，1960年10月受到林彪的批判後，再次出任總政治部主任。從1950年代起，羅就主張，學習毛澤東著作要結合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以黨史為線索，學習毛主席著作」。所以，在林彪提出「帶着問題學」的一套方針以後，1961年的1、2月間，羅榮桓就在不同場合闡述了自己的觀點。指出：「帶着問題學，就是要到《毛選》中去找答案。這樣提法不適當。」「還是應當學習立場、觀點、方法。」對林彪提出的「頂峰」論，羅榮桓也明確表示不同意。他説：「把毛澤東思想説成是當代思想的頂峰，那就沒有發展了？……毛澤東思想也要隨着時代的發展而發展嘛！」針對連隊基層幹部提出不知道如何學才能「立竿見影」的問題，羅榮桓回答説：「毛主席的著作，你們要認真學習，注意聯繫實際，領會精神實質。」「至於『見影』不『見影』，究竟何時可以『見影』，那是以後學習成效的問題，先不要考慮它。」3月，羅榮桓在視察長沙第一政治幹部學校時，對如何學習毛澤東著作講了自己的看法，並對林彪主張「背一點東西」，把《毛選》中「最精闢最重要的話背下來」提出不同意見，指出：「用教條主義態度對待毛澤東思想，那根本是牛頭不對馬嘴！」要求學校「組織學員學習毛主席著作時，不能只對書中的個別詞句，一兩句話發生興趣，要注意學習毛主席分析問題的立場、觀點、方法，領會精神實質……馬列主義從來就是反對教條、反對迷信的」。

1961年3月下旬，羅榮桓同意《解放軍報》將他視察部隊期間關於如何學毛著的談話公開發表。4月下旬，林彪指示《解放军報》「應經常選登毛主席有關語錄」。這時，中央軍委辦公廳通知，4月30日召開軍委常委會議。會議將要討論的文件中也含有「帶着問題學」這樣的話，羅榮桓感到有必要當面提出不同意見。

4月30日，林彪主持軍委常委會議。羅榮桓發言，直截了當地指出：「『帶着問題學』毛選，這句話要考慮，這句話有毛病。」林彪開始佯裝不知，然後又反問道：「那你説應該怎麼學呀？」羅榮桓説：「應當是學習毛主席著作的精神實質，『帶着問題學』，這句話改掉為好。」半晌，林彪無奈地説：「不好，就去掉嘛！」羅榮桓接着闡明他的觀點。這時，林彪不等羅榮桓把話説完，宣布：「好吧，散會！」便站起身，拂袖而去。

《解放軍報》遵照林彪的指示，從5月1日起開闢《毛主席語錄》專欄，內容要與當天報紙版面相吻合，以便大家「活學活用」。於是，毛澤東的著作和言論被分門別類，製成語錄，每天一條，見諸報端。報社抽專人每天查找語錄，然而，只登幾天，把毛選從頭到尾查遍，也找不

到合適的語錄。報社負責人向總政主任羅榮桓請示。羅榮桓明確答覆：

> 辦報紙主要是貫徹毛主席〈對晉綏日報編輯人員的談話〉的精神，……至於毛主席語錄，找幾條可以，找不到也可以。毛主席著作不可能對现在的甚麼事情都談到。要學習精神實質，不要像和尚唸經，敲破了木魚，還不知道西天佛祖在哪裏呢！[10]

在答復報社後，羅感到事情重要，立即給中共中央總書記鄧小平打電話。鄧小平把問題提到了中央書記處會議上討論。書記處一致贊同羅榮桓的意見。鄧小平後來回憶説：「林彪把毛澤東思想庸俗化的那套做法，羅榮桓同志首先表示不同意，説學習毛主席著作要學精神實質。當時書記處討論，贊成羅榮桓同志的這個意見。」[11]又説：「毛澤東思想是個思想體系。我和羅榮桓同志曾經同林彪作過鬥爭，批評他把毛澤東思想庸俗化。」[12]就是指的1961年的這件事。

對林彪那一套，當年主持中共意識形態工作的中央宣傳部領導人也不以為然。陸定一説：毛澤東思想再好也不能天天學天天用，比如宣威火腿，天天吃也膩了。打兵乓球贏了説是毛澤東思想的勝利，輸了呢？周揚説：毛澤東思想是靈魂，不是肉體。是紅線不是紅布。許立群説：立竿見影，陰天怎麼辦？[13]

1961年2月23日，中宣部向中央寫了一份題為《關於毛澤東思想和領袖革命事跡宣傳中一些問題的檢查報告》，這是中宣部對全國報刊書籍進行一次檢查的結果。

《報告》批評有的把「發明或發現，簡單、生硬地和毛澤東思想直接聯繫起來，或者説成是應用毛澤東思想的結果」；《體育報〉刊登的〈莊家富在紅專道路上前進〉一文，説莊家富「讀透《毛澤東選集》的戰略戰術部分，創造獨特的中國式橫拍打法」；《健康報》的社論把治療慢性病的一種方法即「綜合快速療法」，説成是「從理論上到實踐上應用了毛澤東同志的矛盾論學説」的結果；有的出版物把毛澤東的戰略戰術思想，牽強附會地和醫治疾病直接聯繫起來。一本名叫《雄心壯志》的書宣傳旅大市第二醫院內科醫生徐志運用毛澤東思想創造了醫治癌病的方法，説「根據『停停打打』的游擊戰術」，採取所謂「服服停停的游擊服藥方法」，「讓病魔摸不到服藥的規律」。

《報告》批評説：有的出版物，甚至把一些錯誤的措施不適當地説成是毛澤東思想的運用。例如，1959年4月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番禺南村農民學理論》一書，介紹農民學了《矛盾論》以後，為了解決缺乏肥料而拆了許多泥屋時説：「矛盾擺出來後，經過辯論分析，瓦崗社員亞娣就運用了《矛盾論》的原理對兒子説：保萬斤和缺肥是當前生產的主要矛盾，拆泥屋和個人生活有困難是次要矛盾，次要矛盾要服從主要矛盾，這樣就打通了兒子的思想，拆了自己的房屋。」……

《報告》在例舉上述事實後提出建議：

宣傳毛澤東思想和革命領袖事跡，是一件十分重大、嚴肅的事情。今後應當加強這一工作，但在宣傳中必須防止上述各種錯誤和缺點，以免造成政治上的損失。希望各地黨委和中央有關部黨組督促報刊書籍出版部門，認真對待這一工作，並將過去已經出版的出版物（包括革命回憶錄）進行一次檢查，分別各種錯誤、缺點的情況和程度，加以處理。有的應該停止發行，有的應加以修改後才能再版。今後各地報刊書籍出版機關，在發表這類文章或出版這類書籍時，一定要經過省（市）委或中央有關各部黨組的審查。當否，請予批示。

這份報告送到中央後，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彭真都畫了圈，並在3月15日，以中央名義轉發全國縣團級黨委，明確表示：「中央同意報告中的意見。」[14]

但是，這種正確意見並未能在中共黨內成為主流，在1962年1月「七千人大會」林彪歌頌毛澤東的講話[15]得到毛澤東的讚賞並轉發全黨以後，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進一步升溫。

[1] 〈中央統一中央宣傳部關於《毛澤東選集》第四卷的宣傳和學習問題的報告〉（1960年9月28日），載《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第二十三冊，頁364。

[2] 成都會議記錄（1958年3月25日），載《毛澤東傳（1949-1976）》，頁802。

[3] 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艱苦樸素的工作作風，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團結、緊張、嚴肅、活潑。

[4] 譚政，是中國工農紅軍初創時期的政治工作者，1937年10月被任命為中央軍委總政治部副主任。1944年4月，譚政以留守兵團政治部名義在中共西北局高幹會上作《關於軍隊政治工作問題的報告》（報告是在毛澤東、周恩來指導下，由譚政起草，經毛澤東審改），曾被視為軍隊政治工作的經典。解放戰爭時期任東北民主聯軍（後為東北野戰軍、第四野戰軍）政治部主任。1995年春，由中南軍區第三政委調任總政治部副主任。1956年9月，總政治部主任羅榮桓元帥因身體不好，向中央和毛澤東請辭並建議由副主任譚政接替主任一職，得到中央和毛澤東的批準。1959年，林彪接替彭德懷主持中央軍委工作以後，提出高舉毛澤東思想的一套提法和做法，譚政均持有不同意見，認為，學理論還是要系統地學，對毛澤東思想「不能庸俗化」。1960年10月，軍委擴大會議通過《關於譚政同志錯誤的決議》，說譚政「沒有高高地舉起毛澤東思想的紅旗」，「對於彭（德懷）黃（克誠）的錯誤路線，不抵制，不鬥爭」，對林彪的許多重要指示，沒有堅決執行。對「總政治部工作方向上發生的偏差」「應負主要的政治責任」。隨後召開的總政治部黨委擴大會議，對譚的批判進一步升級，定格為在軍隊中堅持毛澤東思想，繼續肅清彭黃影響的兩條路線鬥爭。1961年1月30日，總政黨委擴大會議向中央和毛澤東報告把譚政的「錯誤」定為「反黨、反毛主席」，「反對毛澤東思想」，「執行了彭德懷的資產階級軍事路線」，「抗拒新軍委和林彪同志的領導」，並把總政治部的組織部長劉其人、宣傳部長姜思毅、秘書長白文化、解放軍報社總編輯歐陽文與譚政一起打成反黨集團。中共中央批準了這個報告。1961年2月，中央撤銷了譚政的軍委常委、常委辦公會議成員，降職為總政治部副主任。1962年9月，在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又被撤去中央書記處書記的職務，調任福建省副省長。劉其人等也受到錯誤處分。1979年3月3日，總政治部作出《關於為「譚政反黨集團」冤案徹底平反的決定》。

[5] 《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十三冊，頁743-782。

[6] 「在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中，在黨和人民的集體奮鬥中，應用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這一句為毛澤東審改時親筆所加。毛澤東：〈對《關於加強軍隊政治思想工作的決議》和中央轉發這一決議的指示搞的批語和修改〉（1960年12月14日，21日），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九冊，頁384。

[7] 〈中共中央對軍委擴大會議《關於加強軍隊政治思想工作的決議》的批示〉（1960年12月21日），載《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十三冊，頁742-743。

[8] 1963年12月16日，毛澤東在〈關於工業部門學解放軍的信〉中說：「解放軍的思想政治工作和軍事工作，經林彪同志提出四個第一、三八作風之後，比較過去有了一個很大的發展，更具體化又更理論化了……。」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冊，頁455。

[9] 鄧小平：〈正確地宣傳毛澤東思想〉（1960年3月25日），載《鄧小平文選》，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頁283-284。

[10]　　　《羅榮桓傳》編寫組：《羅榮桓傳》（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1），頁590-592。

[11] 鄧小平：〈各方面都要整頓〉（1975年9月27日、10月4日），載《鄧小平文選》，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頁36。

[12]　鄧小平：〈「兩個凡是」不符合馬克思主義〉（1977年5月24日），載《鄧小平文選》，第二卷，頁39。

[13]　黎之：〈周揚與「文藝十條」〉，載王蒙、袁鷹主編：《憶周揚》（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頁282-283。

[14]　〈中共中央轉發中央宣傳部《關於毛澤東思想和領袖革命事跡宣傳中一些問題的檢查報告》〉（1961年3月15日），載《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十四冊，頁217-220。

[15]　林彪説：「在困難時期，要更加依靠中央的領導，更加依靠毛主席的領導，相信毛主席的領導。只有這樣，才更容易克服困難。事實證明，這些困難，恰恰是由於我們有許多事情沒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而造成的。如果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如都聽毛主席的話，那麼，問題會小很多，彎路會彎得小一些。我在中央的時間是不長的，但是從看得到，聽得到的，同志們的思想經常出現的三種狀況：一是毛主席的思想；二是『左』的思想；三是右的思想。當時和事後都證明，毛主席的思想是正確的。但是有些同志説是執行毛主席的思想，但是把事情偏往左拉，執行主席思想走了板，精神並不一致。當然也有右的問題。黨內外都是有的。……過去的工作搞得好的時候，正是毛主席思想不受干擾的時候。凡是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尊重，受到干擾時，就會出毛病。幾十年的歷史，就是這個歷史。因此，在困難時期，黨更需要團結，越要跟着毛主席走。」

七、經濟跌入谷底，農村災情瀰漫

1.全國保鋼比例更失調

自從8月14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開展以保糧保鋼為中心的增產節約運動的指示》以後，冶金工業部、煤炭部、鐵道部一起，就保鋼問題進行多次研究，提出了增產節約的緊急措施。9月17日，國家經委黨組向中央報告説鋼的生產：8月上旬是平均日產3.64萬噸、中旬4.07萬噸，下旬4.48萬噸；9月上旬4.81萬噸，中旬可望超過五萬噸。初步扭轉了4月份以來工業生產下降的趨勢。報告同時指出：但上升的速度是緩慢的，同今年的鋼產任務的要求還有相當的距離。看來，全年完成1900萬噸到1950萬噸鋼，3000萬噸以上的生鐵是可能的。當前，最迫切須要解決的問題是：煤炭的生產和調運；提高生鐵質量和集中使用生鐵；搞好運輸裝卸工作。[1]中央批準了國家經委黨組的報告，號召「工業交通戰線的全體同志們必須緊急動員起來，為在今年完成1900萬噸到1950萬噸鋼而奮鬥」。[2]

10月8日，中央書記處發出狠抓鋼鐵生產的通知後，經過突擊，11月中旬鋼平均日產量突破了六萬噸，當月下旬又很快跌落了下來。同時，鐵、煤、運輸也出現逐日下降的嚴重情況。11月下旬的平均日產量，鋼為5.73萬噸，鐵7.15萬噸，煤62.7萬噸，鐵路平均日裝車3.32萬輛。顯然，原定計劃難以完成。

據此，中共中央於12月3日又發出《關於保鋼問題的緊急指示》。強調：今年能不能完成1860萬噸鋼的生產任務，是國內國外注目的大事，是一個政治性問題。如果我們不立即抓緊時機，扭轉生產下降的局面，那麼，全年鋼鐵生產的任務就有完不成的危險。而一旦發生這種情況，對於我們目前國內外的政治鬥爭，對於明年爭取國民經濟的繼續躍進，都是不利的。中央要求，12月份的平均日產量：鋼確保6.2萬噸，爭取達到6.3萬噸；鐵確保7.8萬噸，爭取達到八萬噸；煤確保六十六萬噸，爭取達到六十八萬噸；鐵路平均日裝車確保4.1萬輛，爭取達到4.2萬輛。各地區、各部門要抓緊時機，克服困難，集中力量抓煤、鐵、鋼、運，把鋼的生產水平突上去，確保今年工業繼續躍進的勝利。[3]

由於集中力量保鋼，1960年鋼產量雖然極其勉強地完成了1866萬噸的計劃，[4]但是國民經濟的比例關係更加失調：首先是積累和消費的比例失調，1958年到1960年三年，積累率分別達到33.9%、43.9%、39.6%，大大超過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已經很高的年平均積累率24.2%。其次是工農業比例失調，重工業畸形發展，從1957年到1960

年，重工業增長2.3倍，農業卻下降22.8%。其三是工業內部各部門比例失調，鋼鐵生產擠佔能源、原材料和交通運輸生產，使其他部門無法正常生產；因重工業的投资佔總投资比重高達50%以上，輕工業受到擠壓，加上農業提供的原料大大減少，使輕工業生產急劇下降。由於基本建設規模過大，增加大量職工和投资，造成財政收支不平衡以及社會購買力和可供商品的比例嚴重失調，出現了巨大的財政赤字和市場緊張（全國市場商品供應明顯減少，有些生活必需品時有脫銷。根據國家统計局的分析報告，到1960年9月底，各地實行憑票憑證限量供應的商品已經達到三十多種[5]），加劇了已經出現的嚴重經濟危機。

2.糧食危機嚴重顯露

糧食問題在上半年就已相當緊張，儘管採取「挖東補西」、「抽肥補瘦」等措施，仍無濟於事。據糧食部計算，第三季度國家要從有關省區調運60.3億斤糧食用來保證京、津、滬、遼和出口的需要。這是一壓再壓的最低限度的需要數字。因為：第一，京、津、滬、遼第三季度城市銷糧預計要42.53億斤，9月末比6月末須要補充周轉糧庫存2.37億斤，共計44.9億斤。除京津滬遼本身徵購7.9億斤外，其餘三十七億斤必須依靠外省調入。第二，供應出口的糧食至少需要12.5億斤。第三，青海、西藏需要調入一億斤，省與省之間的季節調劑和品種調劑需要9.8億斤，共計10.8億斤。如此巨大的調撥數字為歷年所沒有，而國家庫存僅有300億斤，是1953年實行糧食統購统銷以來最低的一年。[6]問題的嚴重性可見一斑。

8月15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確保完成糧食調運計劃的指示》說：「8月上旬的糧食調運情況仍然不好。」「當前的糧食調運問題是拖不得的。因為現在的安排是一個蘿蔔頂一個眼，任何一個調出地區稍一拖延，等待調進的地方馬上就有脫銷的危險。」中央要求省、市、自治區黨委「堅決貫徹『吃飯第一』的精神，確保8月和以後每月糧食調運計劃的完成」。並再三叮囑：「時間緊迫，萬萬火急。」[7]9月2日，中共中央再發《關於繼續抓緊完成糧食調運計劃的指示》，進行督促。

問題顯然不是各地有糧不願往外調運，原因在於缺糧並不是個別地區。據中央財貿部第二十五期工作簡報反映，河北省新樂縣災區夏糧估產偏高，徵購以後，留糧不足。又據新華社8月31日和9月2日的《內部參考》反映，山東某些地方在麥收以後，腫病、非正常死亡和人口外流的現象還在繼續發生，偷青吃青現象很嚴重。另外，偷青吃青、人口外流、腫病和非正常死亡等現象，在河南、山西、安徽，江蘇等省也有發生。

全國糧食的購銷情況是：從7月1日到8月25日，徵購糧入庫139億

斤，比1959年同期的190億斤減少五十一億斤；在同時期內，銷貨152億斤，比1959年同期的139億斤，增加了十三億斤；一出一入為六十四億斤，庫存比1959年同期減少了100億斤（包括6月底以前的庫存減少在內）。

這萬萬火急的重擔不能不由國務院總理周恩來來承擔。在那段艱難的日子裏，周恩來親自指揮糧食的調度，被人們稱為「糧食調度的總指揮」。根據周恩來的工作台曆記載，那時，他每周要幾次約糧食部門的同志談話。時任糧食部黨組書記的陳國棟回憶說：

> 我一個禮拜要去總理那裏好幾次，主要是談糧食問題。他一般都是晚上找我們去，地點經常是他的辦公室。有時是晚上九十點鐘或深夜十一二點鐘去，談到第二天凌晨三四點鐘；有時是凌晨兩三點才去。[8]

周的秘書李岩回憶說：「各省市天天向中央告急，搞得總理吃不下飯，睡不好覺。」[9]周恩來聽取匯報，總是自己用筆計算，各地库存多少，每日銷售多少，可以調出多少，糧食存放在那裏等等，都要問得一清二楚。

當時，各省的糧食供應都很困難，包括一些產糧區也很緊張。周恩來則親自出面，做細緻的說服工作。如，中央本來已向黑龍江省下達了調撥二十八億斤糧食的任務，後來又提出要增加二億斤。使省委書記楊易辰覺得如果省內糧食出了問題，無法向全省人民交代。因此，向周恩來反映困難。楊易辰後來回憶說：

> 總理表現出高度民主作風。他並不打斷我的話也沒有強迫我執行命令，而是耐心地聽我講完，然後循循善誘地與我談……黑龍江有困難，但其他省份更困難，很多省死了不少人，國家要拿出糧食來幫助他們。在這種情況下，只有全國上下團结一致，同心同德，才能渡過難關。每一個黨員幹部，尤其是領導幹部，一定要顧全大局……。總理一席話，使我深受教育。……思想通了，在行動上我堅決執行了中央的調撥計劃，想辦法做好多方面的工作，與全省人民一道完成了調撥三十億斤的任務。[10]

鑑於當時的緊張情況，中央採取了壓縮城鄉口糧、食油的供應標準，實行「低標準、瓜菜代」的方針。[11]

中共中央在9月7日下發了《關於壓低農村和城市的口糧標準的指示》，規定淮河以南直到珠江流域的地區，維持平均每人全年原糧三百六十斤；淮河以北地區壓低到平均每人全年原糧三百斤左右；各省重災區則壓低到平均每人三百斤以下，並應將十二個月的糧食分作十三個月來吃。城市的口糧標準，除高溫、高空、井下和負擔重體力勞動的職工以外，其餘的全部城市人口，每人每月壓低口糧標準兩斤左右（商品糧）。[12]農村的實際情況是連降低後的標準也難以維持，據統計，

1960年全國農村平均每人全年糧食佔有量由1957年的589斤下降到429斤，每人每天平均口糧還不足一斤，災區每人每天只有幾兩。[13]為壓縮城市糧食銷量和城市口糧供應，除降低口糧標準外，還採取了以下措施：動員城市人口到農村去；對人口、工種、口糧定量進行檢查；加強戶口管理，嚴密糧食管理制度；城市飲食行業用糧，糕點和其他糧食製品，實行嚴格的憑糧票供應的制度等。[14]

9月23日，中共中央又下達了《關於壓縮食油銷量和加強油脂收購的指示》。指出，1960年預計食油總產量只有38億斤左右，比1959年減產20%以上。兩年來國家為了保證供應，已經挖用了四億多斤食油周轉庫存。截止9月10日，食油周轉庫存只有6.7億斤，這是統購統銷以來最低的一年。但食油的需求量卻大大增加，使國家供應和市場需求之間的矛盾突出起來。為此決定，1960年度食油銷售量嚴格控制在19.5億斤的指標內，比上年度減少3.8億斤，其中城市壓縮2.8億斤，農村壓縮一億斤。降低後的食用油定量標準為：中央直轄市和各省（區）人民委員會所在城市，每人每月從現有的標準十兩壓縮到七兩；省轄市和專轄市由七兩壓到五兩；縣城和集鎮由四兩壓到三兩。[15]

在此同時，中共中央提出了在全國實行「低標準，瓜菜代」的方針。[16]11月14日，又下達了《關於立即開展大規模採集和製造代食品運動的緊急指示》，要求各地抓緊秋收完畢的時機，大規模地動員群眾，採集和製造代食品，以克服困難，渡過災荒。中央根據科學院的建議，推薦：玉米根粉、小麥根粉、玉米稈麯粉、橡子麵粉、葉蛋白、人造肉精（一種食用酵母）、小球藻等代食品。《指示》決定成立以周恩來為首，李富春、李先念、譚震林、習仲勳參加的瓜菜代領導小組，並設立專門辦公室；要求各級黨委也成立瓜菜代領導小組和辦公室，負責對這一運動的具體指導。[17]

在採取了種種措施以後，糧食的購銷矛盾和壓力一點也沒有緩和。以至到11月份，北京、天津、上海三地，糧食隨到隨銷的緊張局面絲毫沒有改變。11月2日，中央書記處召開全國電話會議，要求全國每天糧食徵購量由目前的八九億斤提高到十至十五億斤，以保證調出的糧源。同時要進一步抓緊運輸，每天的調運量由目前的三四千萬斤提高到七八千萬斤。各省、區第一書記要像指揮戰鬥一樣，天天檢查，天天指揮。但是，原定11月份各個省、區調出糧食二十四億斤的任務，上旬應當完成八億斤，實際只完成三億七千萬斤，還不到應調出數的一半。11月17日，中共中央又發《關於立即抓緊糧食調運的通知》，要各地黨委立即把糧食的過秤入倉和調運工作，狠狠地抓起來。特別指出：在11月份中，黑龍江、吉林、內蒙、四川、安徽、浙江、江西、湖北、湖南等九個省，調出任務都在一億斤以上，這些省區能否完成調出任務，對全局的關係很大，務必特別抓緊。[18]

從8月15日中共中央發出的「萬萬火急」的「確保完成糧食調運計劃的指示」後，接連不斷地下發有關糧食問題的指示、通知，不難看出當年糧食問題的嚴峻程度。同時也表明單靠省與省之間的糧食調撥已不能完全解決問題。

3.「信陽事件」東窗事發

中央要求各地緊急調運糧食，同時也要求安排好農民的生活。1960年9月20日至22日，分管農業的國務院副總理譚震林在京主持召開晉、冀、魯、豫、北京五省市農業書記會議，要求安排好農村人民的生活，壓低口糧標準，大種蔬菜，搞代食品，辦好公共食堂，實行冬春一百天半日休息制；確保把由基本建設戰線壓縮回農村的勞動力，80%用於農業生產。還提出：「在今冬明春給廣大群眾以休生養息的機會。」[19]但是，各地在徵購糧食中，由浮誇風導致高估產、高徵購，伴隨而來的是強迫命令，因此，農村五風不時糾正，不時再颳。

10月10日，毛澤東在中共湖北省委書記處書記王延春關於沔陽縣貫徹政策試點情況的報告上批示：「湖北沔陽縣一平二調問題至今未解決、糧食減產、問題嚴重。」[20]王延春在報告中說：

> 這個公社（指沔陽縣通海口公社——引者註）的「共產風」，年年季季在颳，年年季季在處理，可是邊處理邊颳，一直颳到工作隊進村的時候——9月4日，這一天有的生產隊還在沒收社員的自留地。
>
> 颳「共產風」的單位，上自省級，下至小隊，一桿到底，根深蒂固。縣級直屬機關和派出機關在这裏颳「共產風」的有四十一個單位，公社的二十五個直屬企業，沒有不到生產隊颳「共產風」的。
>
> 颳「共產風」的範圍，大自土地、糧食、房屋，小至鐮刀、筷子、夜壺，甚麼都颳。全公社算了一筆賬，公颳調勞動力349個，土地8020畝，房屋1512棟，資金（包括分配未兑現的）53萬元，糧食53萬斤，農具35040件，耕牛84頭，木料等84萬斤，磚瓦147萬塊，家具24906件。
>
> ……
>
> 生產隊以下的「共產風」，更是一陣接着一陣，幹一件甚麼事情，搞一個什麼運動，就颳一次，就是一次大破壞。……
>
> ……
>
> 糧食上比較普遍的問題，是購過頭糧。……賣過頭糧的結果，不但在搬運、集併上造成很大的浪費，而且由於供應不及時，給生產隊帶來極大的困難，在糧食供應不上的時候，就沒收

社員的小雜糧、蔬菜，颳別隊的「共產風」。[21]

然而，更嚴重的問題還出在河南。10月24日，李富春將中共中央組織部、中央監察委員會四名幹部10月21日報來的關於河南省信陽地區大量餓死人和幹部嚴重違法亂紀等問題的調查材料呈送毛澤東。毛於26日批道：「請劉、周今日即看，下午談一下處理辦法。」[22]據王任重日記記載，26日，在毛澤東召集的華北、中南、東北、西北四個大區的省、市、自治區主要負責人會議上，討論了問題嚴重的而暴露比較早的山東、河南兩省的問題。河南省委主要負責人匯報了信陽事件，大家十分震驚。會議對他進行批評，指出他在政策上犯了嚴重的「左」傾錯誤。[23]1960年12月，信陽地委向中央的報告中說，根據初步揭發：

正陽縣原報去冬今春死一萬八千多人，現初步揭發已達八萬多人；新蔡縣原報去冬今春死三萬來人，現在增加到近十萬人。過去認為較好的社隊，現在揭發出來的問題很嚴重。四平縣原來只發現二郎廟公社問題嚴重，現在全縣十三個公社，除城關公社問題較輕外，其餘十二個社問題都很嚴重。遂平縣嵖岈山人民公社，過去只報死六百餘人，現在揭發死人近四千人，佔總人口百分之十，有的隊人口死亡達百分之三十左右。各種慘絕人寰的反革命暴行，各個縣、社幾乎都有，從初步揭發的材料看，不僅農村嚴重，而且城市、工廠、機關、學校、商店、醫院都很嚴重。光山縣十二個中學，有八個中學校長有人命血債，城關的高中和初中兩個學校，初步揭發，被打死、逼死的教員和學生即達二十八人，不論淮南、淮北廣大群眾在經濟上都遭受到了極大的摧殘，生活異常困難，真正是十室九空，家貧如洗。

信陽地區位於河南省的東南部，南以大別山脈為弧，北以淮河為弦，組成一弓形弧地。從大別山麓到淮河兩岸，依次毗鄰着山脈、丘陵、平原和窪地，兼有江北山地和淮河水鄉的特色。農業經濟發達，物產豐富，素有魚米之鄉的美稱。從50年代到60年代前期，信陽地區管轄有十八個縣市：信陽市、信陽縣、光山縣、羅山縣、潢川縣、商城縣、新縣、固始縣、息縣、淮濱縣、確山縣、上蔡縣、新蔡縣、西平縣、遂平縣、汝南縣、正陽縣、平輿縣。在1959年到1960年短短兩年時間，全區死亡人數如此之多，主要是1958年「大躍進」以來大颳浮誇風、共產風，引發高徵購，反瞞產，反右傾，強迫命令的惡性循環，導致大批農民飢餓、浮腫、死亡或因抗拒、偷糧、外逃等被幹部打死。

1958年，河南全省的糧食產量實際上只有281億斤，而河南省委竟然吹估為702億斤，最後導致了全省性的高徵購。基層幹部完不成徵購任務，就一味地「反瞞產」。因向農民逼糧食而實行捆、綁、吊、打、捕等現象，屢見不鮮。1958年11月底，在河南的密縣，就已經發生過餓死人的現象，1959年春天，豫東黃泛區內，浮腫病的泛濫和死人的事態便蔓延開來。1959年1、2月間，中共中央、國務院、內務部、糧食部連

續收到群眾來信，反映河南東部地區的夏邑、永城、虞城、柘城、鹿邑等縣，發生嚴重浮腫病和餓死人的現象。國務院副總理李富春於2月25日在署名為「夏邑縣劉堤圈車站南北的群眾」來信上批示：「此件送總理閱，是否國務院派人查一下。」2月27日，周恩來批示：「先電話告省人委後，由內務部、農業部、國務院派人限期查覆。」3月3日國務院秘書廳派李錦堂、劉文亭、曹國瑞、武郁慶等到河南會同省委、省人委、開封地委組成聯合工作組前往豫東地區調查。據開封地區統計，從1958年10月到1959年3月，因缺糧患浮腫病、餓死人的情況是：浮腫病人136114人，因浮腫病死亡7232人，死亡總人數16640人。由於及時採取了相應措施，安排群眾生活，基本上控制了發生大規模非正常死亡的現象。但河南省委主要負責人並未就此接受教訓。

1959年8月中旬，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吳芝圃從廬山回到鄭州，立即召開省地縣三級幹部會議，要求各縣市層層揪「小彭德懷」，在全省內又一次掀起了反對右傾機會主義鬥爭的高潮。1959年，河南遭逢水旱災害，糧食和經濟作物大幅度地減產，全年糧食的產量只有210億斤，但是吳芝圃一手高舉着高指標，硬是估產為450億斤；一手托着「右傾」大帽子，壓得人喘不過氣來，黨內人人自危，全省「恐右病」泛濫。「共產風」再度颳起，夾帶着瘋狂的「反瞞產」。這一回可不比1958年，哪個基層幹部完不成徵購任務，就是「小彭德懷」，就得像在土改時期鬥地主那樣挨鬥；而哪個農民若是交不夠糧食，就會被捆起來，吊打追逼，關押拘留，拆毀房屋……。一時間，全省上下都籠罩在陰霾的恐怖氣氛之中。

信陽地區糧食歉收。但各縣不敢據實上報，擔心被打成右傾。地委辦公室根據各縣上報的糧食產量匯總為七十二億斤，地委常委（九人）討論時，除專員張樹藩認為今年是歉收年，糧食總產量可能只有三十多億斤，最多不超過四十億斤；地委書記路憲文等八人堅持認為今年是豐收年。最後以五十億斤產量上報省委（實際產量只有二十多億斤）。據此，河南省委分配給信陽地區的徵購任務為九億斤，下面各級為超額完成任務，層層加碼，徵購數達到十億斤。高徵購任務下達以後，信陽地區各縣市馬上行動起來。1959年10月6日，在河南省委、省人委聯合召開的「反右傾，鼓幹勁，大規模地開展農產品徵購的群眾運動」的廣播大會上，省委書記宋致和表揚信陽地區進度最快，已完成徵購任務的百分之六十以上。為完成餘下百分之四十的徵購任務，信陽地委主要負責人，不僅不承認現實問題的嚴重性，反而認為農民將糧食瞞藏了起來，決定由地委主要領導人分片包乾，在全區開展反瞞产運動。地委書記路憲文說，當前發生的糧食問題，是兩條道路的鬥爭，必須狠狠打擊不法分子。私分瞞產是普遍的，多數是在幹部有組織有領導下進行的。對右傾分子的鬥爭不要手軟，要狠狠地鬥，狠狠地批，只有這樣才能把糧食

挖出來。實際上信陽地區已將老百姓的口糧、種子糧、飼料糧都徵購了，致使很多食堂開不了伙，浮腫病人日益增多，人們開始收藏紅薯葉、野菜；有的乾脆偷吃人肉。專員張樹藩分工到西平縣反瞞產，到公社調查，發現老百姓早已斷炊，遂決定開倉發糧，因此被地委常委決定批鬥並停職檢查。

在反右傾的旗幟下反瞞產，這就慫恿了各級幹部採用非法手段開始逼糧，慘劇就此釀成。為追逼糧食，可以隨意批鬥，濫用酷刑：拳打腳踢、揪耳朵、拔頭髮、牛低頭、背壓磨、蛤蟆架、燕子飛等等幾十種。[24]其中光山縣尤為惡劣，縣委第一書記馬龍山，帶頭鬥爭縣委書記張福洪的「右傾」，親自動手毒打，眾人拳打腳踢，活活地將張整死。這個縣的另一個縣委書記劉文彩，到一個公社去主持「反瞞產」運動，由於農民無糧上交，他便大打出手，一天竟連續拷打四十多個農民，一個體弱多病，身體骨瘦如柴的農民，被他當場活活地踢死；另有三位農民，儘管身體稍好，也被當場活活地打死。據有關資料説明，整個光山縣的公社一級幹部，親自主持和動手打人的竟佔93%。從1959年11月至1960年7月，信陽地區為追逼糧食，正式由公安機關逮捕的人數就達1774人，其中三十六人死於獄中；短期拘留10720人，死在拘留所的667人。[25]

活着的人為求生計，開始大量外逃。人員外流，勢必導致大批死人消息傳開。於是，信陽地委指示各縣市，要設崗攔堵，不準外逃。各村民兵在路口設卡，攔截外逃群眾，還專門設有收容所、監獄，隨意拘捕外逃人員，除沒收錢財、衣物外還要遭到毒打。[26]就在農民大量餓死或外逃之時，地委書記路憲文還在叱喝：「不是沒有糧食，而是糧食很多，百分之九十的人是因為思想問題。」1959年11月間，當他從潢川縣驅車返回地委，沿途親眼見到倒斃在公路旁邊的死人，攔車要糧的群眾，被父母遺棄的孩子時，他不僅置若罔聞。還下令要地區公安部門，「限期消滅人員的外流」；指示社隊的幹部民兵，封鎖村莊，不準群眾外出逃荒；指示城鎮機關、工廠、企業單位一律不準收留農村來人；還要求各個縣委做到「街頭、交通要道沒有一個流浪漢」等等。

儘管信陽地區各縣極力封鎖消息，採取縣委常委分片包乾，分頭布置，縣城四門持槍把守，公路要道設崗，縣境沿邊流動巡邏，汽車站派民警，長途汽車派黨員隊長駕駛，來往信件進行檢查，郵電局不準有發往北京和鄭州的信件，[27]然而，還是有一些信息傳到了北京。1960年2月，內務部派一位處長來信陽檢查災情。一天，路憲文找早被停職的張樹藩談話，要張從即日起開始工作，並囑張陪同到息縣和淮濱兩縣察看災情。張樹藩回憶説，所到之處，舉目淒涼，哀鴻遍野。這位處長向張樹藩詢問，災情如此嚴重，到底餓死人沒有？張答：有，而且還不少。只是由於自己從1959年9月以後一直被批鬥，對全區情況也不了解，估

計餓死在二十到三十萬人之間。這位處長感到問題嚴重，立即回京向部領導匯報。[28]在此同時，衛生部也收到河南固始縣委和省醫療隊聯合發來的關於固始縣發生的病情和已經死亡五萬多人的電報。

內務部領導聽取匯報後，立即向國務院秘書長習仲勳報告，習隨即向中央監委書記董必武匯報。這時，衛生部也將固始縣委和省醫療隊發來的電報轉報中央監委。信陽事件的黑幕由此初步揭開。但吳芝圃扔企圖捂住蓋子，不願向中央報告實情。4月，吳芝圃對路憲文説，信陽死了些人，你總結一下經驗教訓，向中央寫個報告，檢討一下就行了，不要有思想顧慮。不要調查，死人問題調查不清楚，愈查愈多，讓縣委書記估計報一下就行了。7月，河南省委決定在雞公山召開信陽地委擴大會議，由路憲文作檢討，對罪惡特大的光山縣委書記馬龍山實行逮捕法辦，以向中央交代。

正當河南省委極力捂蓋子的時候，中央監委書記董必武派人到信陽調查了三個月，查有實據的餓死人的數字為七十多萬（據1961年1月13日信陽地區呈報中央最後一次統計數字反映：全區總人口808.6526萬人，1959年11月至1960年10月，死亡人數107.0321萬人，佔總人口的13.2%）。調查組回到北京，向中央监委、中央組織部主要領導匯報了信陽地區的嚴重情況。當晚，中央組織部副部長安子文將情況報告了周恩來；中央监委副書記王從吾則向周恩來呈送了關於信陽事件的書面報告。周恩來召集國務院緊急會議進行討論，決定成立中央工作組；由中央監委副書記王從吾任組長，公安部副部長徐子榮、中央組織部副部長安子文為副組長，深入信陽地區，進一步調查情況，向中央作詳細匯報。工作組幾十人來到信陽，親眼看到許多村子已絕人跡，以及人吃人的慘狀，僅光山一縣就餓死二十萬人，見者無人不掉淚。

11月6日，中央書記處開會，聽取安子文匯報河南問題。[29]據中南局第一書記陶鑄談及工作組了解的情況：全省三分之一的地區人畜大量死亡，生產力大破壞，黨與群眾關係受到很大損害。信陽地區的光山、固始、潢川等縣遭到了毀滅性的摧殘。光山槐店公社很多村子都沒有了，一個小隊九十多人，只剩下三十多人了。[30]

毛澤東看了調查報告後，認為這是壞人當權的結果。他提出，信陽地區需要進行民主革命的補課，要徹底清除國民黨、地主階級的殘餘勢力。[31]毛在召集各中央局負責人的會議上對信陽事件定性説：信陽事件是打着共產黨的招牌的國民黨實行階級報復。他推論全國到處都有這樣的問題，只是程度不同。這一回發現有百分之幾、百分之十幾的地區階級敵人報復，就可以預見到若干年內還會有這樣的問題，這叫馬克思主義。

隨後，中央再派王從吾、徐子榮及中南局書記、湖北省委第一書記王任重到河南傳達中共中央、毛澤東的指示。河南省委遂決定改組信陽

地委的領導班子，並在信陽地區全面開展清查漏網地富和國民黨的殘渣餘孽，進行奪權鬥爭。信陽地委1960年12月22日向河南省委、中南局和中共中央的報告說：

> 全區十六個縣、市的整風運動都已經開展，187個公社，開展整風156個，佔83%；4497個大隊，開展整風2948個，佔62.9%。投入整風的工作隊中，有區級以上幹部二千餘人，參加整風學習的各級幹部十三萬餘人（其中：地專直二千餘人，縣直一萬餘人，公社一萬三千餘人，大隊、生產隊近十一萬人）。對於一部分有罪行和有嚴重錯誤的人，已經集訓八千餘人，特別集訓五千餘人，鬥爭和批判一萬餘人。有些罪大惡極民憤重大的已經做了初步處理，其中已經撤職查辦管教反省的983人，逮捕法辦的275人。已經有1327個大隊的領導權被奪了過來，正在進行奪取領導權鬥爭的有1621個大隊，其餘大隊正在積極進行準備，不久即可展開鬥爭。[32]

12月31日，毛澤東批示：這是一個好文件，全國三類社都應照此執行。[33]1961年1月1日，中共中央將信陽地委這個報告批轉各中央局和省、市、自治區。

關於信陽事件對幹部的處理情況，李銳先生在〈「信陽事件」及其教訓——《信陽事件》序言〉中寫道：

> 由於信陽事件當年中央定性為「階級報復」、「違法亂紀」的「反革命複辟」，有關人員的定罪最初都較為嚴重。從1960年9月到12月，信陽地區的十六個縣（市）委書記與縣長都被抓了起來，「其個人與家庭開始了長達二十年的厄運」。原來還準備大開殺戒，以平民憤。最後決定馬龍山和固始縣委書記楊守績處死刑，由毛澤東改為死緩。後來陸續發現餓死人是全國各地普遍的現象，信陽事件只是暴露較早，在信陽遭到逮捕法辦的縣領導幹部減為十二名。[34]

至此，震驚全國的信陽事件，算是有了一個結果。作為河南省委主要負責人的吳芝圃，在作了幾次檢討以後，於1962年5月調離河南，改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二書記。

歷史地看，把信陽事件定性為「階級報復」、「違法亂紀」的「反革命複辟」是不正確的，當年曾因此受到嚴重處理的固始縣委書記楊守績在1980年代申訴說：「『信陽事件』性質根本不是反革命復辟，責任也不都在下邊，省委有責任，地委有責任，縣委有責任，中央同樣有責任。」[35]這個說法是有一定道理的，當年其他各省普遍發生餓死人的現象就可證明。

4.關於非正常死亡的考證

1958年到1960年的三年「大躍進」，導致1959年至1961年的「三年嚴重困難」，以1960年為最甚。據《當代中國的糧食工作》披露，1959年到1961年，三年糧食的平均產量3.073億斤，比1957年減產21.2%。三年年平均糧食產量比1957年減少827.6億斤，而平均每年徵購的糧食則比1957年增加95.8億斤，糧食徵購佔總產量的比例三年平均高達34.4%，其中1959年高達39.6%。這就在廣大農村購了過頭糧。1960年12月，國務院財貿辦公室《關於糧食和市場問題的匯報提綱》分析説：「1958、1959兩年大約多徵購貿易糧二百億斤左右。」連續三年的高徵購，導致農村佔有糧食大幅度減少。全國農村平均每人全年糧食佔有量由1957年的589斤下降到1960年的429斤。1960、1961年兩年，農村每人每天平均口糧不足一斤，重災地區每人每天只有幾兩口糧。由於沒有了飼料糧，牲畜大批死亡，1961年末騾、馬、驢、牛的存欄頭數為6949萬頭，比1957年末存欄8382萬頭減少了17.1%；1961年末生豬存欄只有7227萬頭，比1957年末存欄14590萬頭減少一半以上。[36]

對當年餓飯的情景：飢餓——浮腫——死亡。顧準先生在他的「商城日記」中留有如下記載：

1959年11月4日

民工隊來買菜的人説，村裏的紅薯已經吃光了，這應該是真的。

劉引芝的父親死了。

腫病——勞動過渡，營養不良。

縫紉室張的哥嫂同時死亡，也是腫病。

11月13日

紅薯收穫……。薯塊水分多而澱粉少，脆弱極了，一碰就斷……。民工路過，欣羡不已。都到地頭來撿殘屑，揮之不去。

11月20日

二頓均已紅薯葉當菜。在冀魯豫時不能下咽的，這回全部吃完。

11月22日

第一天吃紅薯葉，三頓，每飯一碗。晚間菜稀飯，加大碗紅薯葉，翌晨拉肚子。

12月2日

我的胡蘿蔔挨偷了，被偷至少十幾個。蘿蔔種至少又有一個大的被偷了。昨下午，一個婦女當着下棚許多人，偷胡蘿蔔。當群眾飢餓的時候，如何看得住？

12月15日

昨天三稀，今天中午居然一頓乾飯，而早飯特稀。可以補充的食物了然無存，清晨傍午，頗為飢餓所苦。

……

徐家斷炊，趙家棚子砍公共食堂大鍋，都是徵購中的事。……估產過程中間，大力開展反對富裕農民路線，鬥爭私藏糧食，是今春所做的第一幕劇……。

12月17日

勞動隊的腫病病員，一下子在一個月中，從四十四人增加到七十多人。夏天來時，腫病是極個別的，不過李國慶之類真有心臟腎臟病的而已。9、10月間，七組：岳正中、李學海、劉代勤全腫了，人數增加到四十餘人。而今，一個月，一下加了三十餘人。六組，除一二人外，全都腫了。

……

昨晚，附近路倒屍二起……。

八組黃渤家中，老婆，父親，哥哥，二個小孩，在一個半月中相繼死亡。這個家庭也特別大，未死人前連黃渤本人共十五人，小孩七人。十五人中死五人，則死比例也不算小了。

一家連死幾人之例，已聽到的有：

柳學冠，母親和弟弟。

張保修，哥哥和嫂子。

12月22日

除民間大批腫死而外，商城發生人相食的事二起，19日城內公審，據説20日要公判。一是丈夫殺妻子，一是姑母吃侄女。[37]

楊顯惠在《夾邊溝記事》一書中，記述了當年震動中央的另一餓死人事件——甘肅「夾邊溝事件」。位於酒泉境內巴丹吉林沙漠邊緣的夾邊溝勞改農場，成立於1954年3月。1957年後專事「收容」右派分子（被開除公職判以勞教的三千多名右派）。

右派們剛到夾邊溝時每月定量是四十多斤糧……。但是1958年以後，糧食供應降為每月二十六斤，再降為二十斤，每天只有七兩糧食，體力嚴重透支的他們開始挨餓。隨着1958年冬天的到來，死神也隨之而至，一批體弱不堪的人最先命赴黃泉。在死神面前，人們開始了本能的掙扎求生……。如有了一點力氣，就到草灘上挖野菜、捋草籽，煮着吃下。體質稍好的，到草灘上挖鼠穴，搶奪地鼠過冬的口糧，看到蜥蜴，抓來燒着吃或煮了吃，有人因此中毒而亡。

……

1960年9月，夾邊溝農場除三四百名老弱病殘之外，悉數遷往高臺縣的明水農場。明水農場比夾邊溝的條件更為惡劣。沒有房子住，沒有糧食吃，沒有水喝，只有光禿禿的一片旱灘。一千多名右派……到了明水之後，這些人開始大面積出現浮腫。一位存活的人回憶道：

「他們在死前要浮腫，臉腫得像大南瓜，上眼泡和下眼泡腫得如同蘭州人冬天吃的軟兒梨，裏邊包着一包水。他們搖晃着身體走路，每邁一步需要停頓幾秒鐘。他們的嘴腫得往兩邊咧着，頭髮都豎了起來。嗓音變了，說話時發出尖尖的如同小狗叫的聲音，嗷嗷嗷的。」

死亡高峰不可避免地到來。1960年11月中旬，每天都有數十人死去。場部黨委書記慌了神，跑到張掖地委匯報情況，請地委給調點糧……。也就在這個時候，甘肅全省餓死上百萬人的慘劇震動中央，以監察部部長錢瑛為首的檢查團來到了甘肅。1960年12月2日，中央西北局書記劉瀾濤主持召開著名的蘭州會議，並迅速採取措施「搶救人命」。[38]

對這場災難主要源於天災還是人禍？人們仍有不同的認識。對這三年自然災害的程度也有兩種不同的估計：有研究者根據全國120個水文站的統計資料認定，1958年、1959年、1960年這三年，即便說不上風調雨順，至少沒有全國性的大的自然災害。氣象部門把全國氣象狀況劃為五個等級，叫做負二度區、負一度區、零度區、一度區和二度區，分別表明澇、偏澇、不澇不旱、偏旱、旱。就是說，結果愈接近零度，全局性的災害就愈少。在公布的從1954年到1972年長達十幾年的年份裏，1958年、1959年、1960年這三年，比1954年、1957年、1965年和1970年、1972年都更接近零度區值。[39]說明災害雖有，但並不嚴重。另有學者引用國家統計局綜合司編《新中國五十年統計資料彙編》中說：1959年全國出現了「受災範圍之大，在50年代是前所未有的」嚴重自然災害，受災面積達到4463萬公頃，成災（收成減產30%以上為成災）面積1373萬公頃。1960年，繼1959年大災害後，全國大陸除西藏外又發生了建國後最嚴重的災害，受災面積達6546萬公頃，成災面積2498萬公頃，受災面積居建國五十年來首位。1961年，全國連續第三年發生特大災害，受災面積6175萬公頃，僅次於1960年，為建國五十年來的第二位。成災面積達2883萬公頃，為1994年以前最高，其中四分之一面積絕收（減產80%以上為絕收）。由此認為：「1959-1961年確實發生了嚴重的自然災害，成為出現三年經濟困難的一個直接原因。」[40]

薄一波在三十年後回顧這段歷史，就曾坦誠地承認：

> 我國人民所經歷的1959-1961年「三年困難時期」，主要是「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和「反右傾」鬥爭造成的。在「三年困難時期」，全國廣大人民因食物缺乏、營養不良，相當普遍

地發生浮腫病，不少農村因饑饉死亡增加，據統計，1960年全國總人口減少一千多萬。在和平建設時期發生這種事情，我們作為共產黨人實在是愧對百姓，應該永誌不忘這沉痛的教訓！[41]

中國從1959年到1961年所發生的全國範圍的大饑荒，非正常死亡的人口總數究竟是多少，迄今還沒有一份官方的統計數字或研究報告。現有的半官方出版物及國內外學者研究的情況，大體有一千多萬、兩千多萬、三千多萬到四千多萬的四種說法：

《當代中國的人口》一書對1959至1961年的人口狀況有如下記述：

全國人口死亡率1960年高達25.43‰，農村地區高達28.58‰。據有關部門統計，超過20‰的有675個縣，其中超過100‰的有四個縣。根據這一時期不夠準確的統計數字，總人口變化情況是：三年累計，按總人口計算減少135萬人，按自然變動增加622萬人，兩者相差757萬人。從1964年普查結果看，三年困難時期裏這兩個數字都有一定問題。1959年是困難時期的第一年，這一年出生人數減少、死亡人數增加現象已開始。這年自然增長677萬，比前一年增長數下降40%是較接近實際的。而總人口增加1213萬，只比上一年少增128萬，增長率仍保持在1.8%是不符合實際的。原因是，當時不少地方政府不相信人口增長速度已減慢，特別是浮誇風盛行，有些地方為維持較高的增長率有意多報人口。從1960年看，總人口減少1000萬人，自然變動減少304萬人都偏低，實際人口減少還要多。1961年總人口繼續減少，而自然變動卻增加249萬。兩者方向相反，數字也都是不準確的。據1964年普查資料計算，在1962至1964年的三年中，總人口增加數和自然變動數不一致，主要是1961年以前統計不準造成的。據1964年普查資料回推，1961年人口應當是64508萬人，比原統計數約減少1486萬。[42]

中國科學院的一份國情報告中曾經提到：「三年困難時期，因糧食大幅度減產，按保守的估計，因營養不足而死亡約1500萬人，成為二十世紀中國最悲慘的事件之一」。[43]

中國人口學研究者蔣正華在1986年撰寫的《中國人口動態估計的方法與結果》的專論中，估算1958年到1963年中國非正常死亡人口約為一千七百萬。[44]

美國著名人口學家科爾（Ansley J. Coale）1984年寫的《從1952年到1982年中國人口的急劇變化》（*Rapid Population Change in China, 1952-1982*）一書，估算中國1958年到1963年非正常死亡人口約為二千七百萬。[45]

英國記者菲力普·蕭特（Philip Short）著的《毛澤東傳》（*Mao: A Life*）中說：「1959年和1960年，有大約二千萬人死魚飢餓……。1961年又有五百萬人餓死了。」據此，作者提出非正常死亡人數在二千萬到

三千萬之間。其依據是：「1980年，中國的頭號領導人胡耀邦公開承認饑荒的存在，確定死亡數目為二千萬人。這一數字依據了常委會編纂的臨時文件。以後一些西方作家和中國作家提議說，總死亡數目為四千萬人到六千萬人。然而，這些估計都是在受損嚴重的地區取得了數字後，再將之推廣到作為一個整體的國家後達到的數字，與那一段時期總的人口趨向的相互關聯鬆散。在缺乏與之相反的結論性證據的情況下，二千至三千萬額外死亡人數應當是最可信的。這個數字也的確是充足的。」[46]

賈斯伯·貝克（Jasper Becker）先生著的《餓鬼：毛時代大饑荒揭秘》（*Hungry Ghosts: Mao's Secret Famine*）認為，美國人口學家裘蒂絲·巴尼斯特（Judith Banister）博士在《中國人口的變化》（*China's Changing Population*）中得出在1958年到1961年的饑荒年間，中國「死亡人口比正常死亡人口超出三千萬」的結論，「這是目前能找到的最可靠的估計數字」。[47]

曹樹基先生在〈1959-1961年中國的人口死亡及其成因〉一文中，採用人口學和歷史地理學的方法，以縣級政區為基礎，以虛擬的「府」級政區為單位，重建1959至1961年中國各地非正常死亡人口數。結論說：1959至1961年中國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多達3245.8萬。[48]

丁抒先生在〈從「大躍進」到大饑荒〉一文中，以中國政府近年公布的人口統計數字為依據，指出：

> 有了逐年出生數、正常死亡率和統計局發表的人口數，我們就可以比較準確地計算非正常死亡人數了。計算結果是：1959年非正常死亡人數是212萬，其中196萬是農民。1960年至1962年間非正常死亡數分別是1778萬、1190萬和291萬。連同1958年的非正常死亡數，整個大躍進期間非正常死亡數約3500多萬。[49]

叢進先生在《曲折發展的歲月》中認為：按照當時出生與死亡相抵後20‰的人口淨增長率推算，正常情況下1961年總人口應比1959年增加2700萬人，加上前述減少的1300萬，1959年至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減少出生人口數，在4000萬人左右。[50]

金輝先生在〈「三年自然災害」備忘錄〉中的結論是：1959至1961年的三年災害中，非正常死亡人數可能高達4060萬。文中根據《中國統計年鑑（1984）》公布的1949年至1965年的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長率推論說：

1964年底總人口70499萬。從1964年的總人口數按公布增長率逐年遞減回去，就可以得到它：1963年底——68603萬（70499÷1.02764）；1962年底——66390萬（68603÷1.03333）；1961年底——64645萬（66390÷1.02699），甚至更低。它比公布的1961年總人口數65859萬少了1214萬。

我們以1959年底公布的總人口為基數，按1960年、1961年的公布增長率計算，得到的結果就比1961年的公布總人口多1295萬人。這樣，我們就有了三個數字：1324萬、1214萬、1295萬。三數平均為1278萬。其與公布總人口淨減數字1348萬之和為2626萬。

三年災難的後果之一，是使中國少增長了6000-8000萬人口。1959至1961年間非正常死亡2791萬，加上1961年公布總人口數中抹掉的這1270餘萬，中國在1959至1961年的三年災難中，非正常死亡人數可能高達4060萬。[51]

以上出現的不同數據，既有計算方法的不同，也有起止年代的不同（1959-1961，1958-1961，1958-1962，1958-1963），因而也就很難求出一個統一的數據。本文根據中國大陸出版的關於中國人口問題的專著：許滌新主編：《當代中國的人口》；袁永熙主編：《中國人口》（另有全國除台灣、西藏以外二十七省市的分冊）提供的數據（1959年到1961年的死亡人口總數，扣除按1957年正常年份死亡率的人數），計算出一組1959年到1961年三年大饑荒期間中國非正常死亡人口，以及據此推論出一組1958年到1962年非正常死亡人口的參考數字。

袁永熙主編：《中國人口·總論》中發表的資料[52]是：

1957年中國死亡687萬人，死亡率為10.80‰；

1959-1961年中國死亡人數和死亡率分別為：

1959年970萬人，14.59‰；

1960年1693萬人，25.43‰；

1961年939萬人，14.24‰。[53]

1959至1961三年共死亡3602萬人。按1957年正常死亡率三年應扣除2061萬人，餘下1541萬人為非正常死亡。

許滌新主編：《當代中國的人口》提供的1957、1959、1960、1961年的人口死亡率與《中國人口·總論》相同。但書中稱：從1964年人口普查的結果看，這段時間（指1959至1961——筆者註）的實際死亡率可能還要高。1963年底全國人口數為69172萬，1964年底為70499萬，全國增加人口1327萬人。而1964年全國自然增長率是27.64‰，增長人數應為1930萬，比總人口增長數多出603萬。這603萬人的虛報數如何產生的？根據1964年6月30日普查時人數69458萬人計算，上半年增加286萬人，下半年增加1041萬人，兩者的比例顯然不合理。問題就在於，這多出的603萬是以前的死亡人口未銷而留下的虛假數字。……這批死亡人數主要是1959至1961年三年困難時期積累下來的。如果把這603萬死亡人口考慮進去，1960年前後的死亡率可能要提高10‰左右。[54]

這樣，上述1959年到1961年非正常死亡的1541萬人加上603萬人，總計非正常死亡應為2144萬人。

須要指出的是：非正常死亡情況最早出現在1958年，如：四川、山東、河南，而甘肅1958年死亡率高達21.11‰；有的省份則延續到1962年，如四川。據劉洪康主編：《四川人口》中說：1958年至1962年，五年中四川省平均每年死亡231.62萬人，年平均死亡率為34.03‰。死亡人數最多的是1960年，達到及364.74萬人，死亡率高達59.97‰《四川省的普通死亡率僅為7.02‰）。[55]因此，從1958年到1962年間，中國大陸因大躍進導致非正常死亡人數，可能接近3000萬人。

儘管研究者對非正常死亡人口數量的說法不一，但無論是一千多萬，抑或四千多萬，都絲毫不會影響到對1958「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所造成的共和國歷史上這場災難的嚴重性的估計。

[1] 《當代中國經濟管理》編輯部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管理大事記》（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1986），頁146。

[2] 中共中央對國家經委黨組《關於以保鋼為中心的增產節約的緊急措施的報告》批示（1960年9月18日），載《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十三冊，頁582。原定的鋼產量：第一本賬1840萬噸，第二本賬2040萬噸，第三本帳2200萬噸。

[3]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大事輯要：1949-1985》，頁160；《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管理大事記》，頁151。

[4] 《當代中國的鋼鐵工業》在總結1960年的保鋼運動時說：「這一仗打得很艱苦，各鋼鐵廠都在拚設施，提高鋼鐵產量。到了年底，終於生產出來1866萬噸鋼和1111萬噸鋼材。由於鋼鐵企業設備能力不平衡，缺少軋剛設備，當年積壓了大批鋼錠，經濟效益是不好的。」周傳典等主編：《當代中國的鋼鐵工業》（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6），頁80。

[5] 王毅之主編：《當代中國的輕工業》（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6），頁199。

[6]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金沖及主編：《周恩來傳（1949-1976）》（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頁1559。

[7] 〈中共中央關於確保完成糧食調運計劃的指示〉（1960年8月15日），載《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十三冊，頁537。

[8] 力平等訪問陳國棟記錄（1981年12月），載熊華源、廖心文：《周恩來總理生涯》（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頁335-336。

[9] 轉引自《周恩來傳（1949-1976）》，頁1559。

[10] 楊易辰：〈深情的懷念〉，載《我們的周總理》編寫組：《我們的周總理》（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0），頁115。

[11] 在執行這一方針的同時，為照顧高級幹部和高級知識分子的生活，中共中央書記處於1960年8月1日批轉了國務院秘書長《關於對在京高級幹部和高級知識分子在副食品供應方面給予照顧的報告》，提出特殊供應辦法分三類：第一類，副委員長、副總理、國防委員會副主席、政協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和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每戶每天肉一斤，每月雞蛋六斤，白糖二斤，甲級煙兩條。第二類，人大、政協在京常委、國務院各部、委的正副部長，正副主任，高法副院長、高檢副檢察長，人大政協的副秘書長，各民主黨派中央的正副主席，高級知識分子中的一級人員，行政七級以上其他人員，每人每月肉四斤，白糖二斤，甲級煙兩條，雞蛋三斤。第三類，全國人大黨外代表，全國政協黨外委員，國務院各部委黨外正副司局長和黨外的國務院參事，各民主黨派中央常委，高級知識分子中的二、三級，行政十一級以上人員，每人每月肉二斤，白糖一斤，甲级煙兩條，雞蛋二斤（從十一月份開始，黨內幹部按上述標準減半供應），並於8月開始施行。這項特需供應的辦法是中央在副食品供應緊張的情況下採取的一項臨時措施。李晨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錄》，第二卷，上冊（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頁496-497。

[12] 〈中共中央關於壓低農村和城市的口糧標準的指示〉（1960年9月7日），載《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十三冊，頁565-570。

[13] 趙發生主編：《當代中國的糧食工作》（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頁108。

[14] 以北京市為例，經過3個月的整頓，全市244萬人壓縮口糧定量823萬斤，平均每人壓縮口糧3.3斤，加上核實人口、工種，取消不合理的補助糧，每月減少供應量530萬斤，兩者合計每月減少糧食供應量1353萬斤。《當代中國的糧食工作》，頁115。

[15] 〈中共中央關於壓縮食油銷量和加強油脂收購的指示〉（1960年9月23日），載《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十三冊，頁586。

[16] 中共中央批轉全國財貿書記會議〈關於堅決做好秋冬糧食工作的討論紀要〉（1960年10月16日），載《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十三冊，頁643。

[17] 〈中共中央關於立即開展大規模採集和製造代食品運動的緊急指示〉（1960年11月14日），載《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十三冊，頁688-689。

[18] 〈中共中央關於立即抓緊糧食調運的通知〉（1960年11月17日），載《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十三冊，頁702-703。

[19] 〈晉、冀、魯、豫、北京五省市農業書記會議紀要〉，載《農業集體化重要文件彙編（1958-1981）》，下冊，頁344-351。

[20] 毛澤東：〈關於轉發湖北和福建省委兩個文件的批語〉（1960年10月10日），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九冊，頁306。

[21] 王延春：〈關於沔陽縣貫徹政策試點情況的報告〉（1960年9月18日），載《農業集體化重要文件彙編（1958-1981）》，下冊，頁364-366。

[22] 毛澤東：〈對中組部、中監委關於信仰問題的調查材料的批語〉（1960年10月26日），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九冊，頁326。

[23] 《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頁1099。

[24] 潢川縣的付店公社，從公社第一書記到食堂炊事員，不少人都有命案。公社幹部15人中11人有命案；全公社大小幹部1316人中有626人打過人，171人打死過人。被打的群眾有2358人，被打致死304人，被逼死45人，被關押1098人。潢川油崗公社生產隊長以上幹部879人，有697人打過人。

[25] 光山縣的斛山公社，原有658個自然村，其中175個村人口完全死絕，佔原有村總數的26.6%；全公社原有8178戶，死絕的有1603戶，佔原有戶數的19.6%；全公社原有人口36110人，死亡13674人，佔原有人口的37.86%（其中餓死的有12962人，被打死的591人，被逼死的24人）；原有男女勞動力14517人，死亡6717人。光山縣的槐店公社的胡莊大隊，原有31個自然村，人口完全死絕的有15個村，佔原有村總數的48.3%；原有240戶，死絕68戶；原有人口1092人，死亡603人；原有男女勞動力593人，死亡335人。

[26] 潢川縣就設有收容所67處，收容群眾9330人。被毒打致殘致死高達2195人。

[27] 據統計共扣押信件12000多封。李銳：《李銳近作——世紀之交留言》（香港：中化國際出版集團有限公司，2003），頁206。1959年11月15日、12月7日，中共信陽縣監委副書記胡修玉兩次向中共中央寫匿名信反映信陽縣餓死人的情況，兩封信均被轉到信陽縣委，胡修玉為此遭到輪番批鬥，被定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受到留黨察看兩年、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勞動改造的嚴厲處分。1961年11月5日平反。《「信陽事件」專題研究報告》，未刊，1998。

[28] 張樹藩：〈信陽事件：一個沉痛的歷史教訓〉，《百年潮》，1998年第6期。

[29]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卷，頁366-367。

[30] 李銳：《李銳近作——世紀之交留言》，頁207。

[31] 毛澤東：〈在中央機關抽調萬名幹部下放基層情況報告上的批語〉（1960年11月15日），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九冊，頁349。

[32] 〈信陽地委關於整風運動和生產救災工作情況的報告〉（1960年12月22日），載《農業集體化重要文件彙編（1958-1981）》，下冊，頁419。

[33] 毛澤東：〈對信陽地委關於整風、生產救災情況報告和中央轉發這一報告的指示稿的批語和修改〉（1960年12月31日），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九冊，頁407。

[34] 李銳：《李銳近作——世紀之交留言》，頁207。

[35] 1979年，河南省委決定，對當年信陽事件受到刑事處理的幹部實行「三重新」，即重新入黨、重新定級、重新安排工作。但他們對「三重新」的安排都有意見。原羅山縣委書記許文波認為：「信陽事件」是個重大歷史事件，不是哪一個人的問題，而是關係到我黨對一個重大事件處理正確與否的問題。……「信陽事件」既不是「階級報復」，也不是「違法亂紀」完全是因為執行了極「左」路線，大颳共產風、浮誇風等五風達到了頂點，在糧食問題上執行了高指標、高估產、高征購所造成的。1985年，楊守績向省委申訴說：我認為我不是反革命，「信陽事件」性質根本不是反革命復辟，責任也不都在下邊，省委有責任，地委有責任，縣委有責任，中央同樣有責任。只處理下邊是不公平的，是違背歷史事實的。李銳：《李銳近作——世紀之交留言》，頁208-209。

[36] 《當代中國的糧食工作》，頁106、108。

[37] 顧準：《顧準日記》（北京：經濟出版社，1997），頁12、16、21、22、33、42、43、48、51-52、58。

[38] 李玉霄：〈楊顯惠：揭開夾邊溝事件真相〉，《南方人物周刊》，2004年第5期。

[39] 金輝：〈「三年自然災害」備忘錄〉，《社會》（上海），1993年第4、5合期。

[40] 陳東林：〈從災害經濟學角度對「三年自然災害」時期的考察〉，《當代中國史研究》，2004年第1期。

[41]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頁873。

[42] 許滌新主編：《當代中國的人口》（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頁8。

《當代中國的人口》直説，1961年以前的統計本身就不準。可以認為，1486萬的數字也就很難認為是準確的。

[43] 中國科學院國情分析研究小組：《生存與發展》（北京：科學出版社，1989），頁39。轉引自金輝：〈「三年自然災害」備忘錄〉，《社會》（上海），1993年第4、5合期。

[44] 轉引自李成瑞：〈「大躍進」引起的人口變動〉，《中共黨史研究》，1997年第2期。

[45] 轉引自李成瑞：〈「大躍進」引起的人口變動〉，《中共黨史研究》，1997年第2期。

[46] 菲力普·蕭特（Philip Short），仝小秋等譯著：《毛澤東傳》（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4），頁401。

[47] 賈斯伯·貝克（Jasper Becker）著，姜和平譯：《餓鬼：毛時代大饑荒揭秘》（香港：明鏡出版社，2005），頁394。

[48] 曹树基：《大饑荒：1959-1961年的中國人口》（香港：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5）。表一：1958-1962年全國各省災區非正常死亡人口：安徽633萬，四川940.2萬，貴州174.6萬，湖南248.6萬，甘肅102.3萬，河南293.9萬，廣西93.1萬，雲南80.4萬，山東180.6萬，江蘇152.7萬，湖北67.5萬，福建31.3萬，遼寧33萬，廣東65.7萬，黑龍江19萬，河北61萬，江西18.1萬，陝西18.7萬，吉林12萬，浙江14.1萬，山西6萬，合計：3245.8萬。

[49] 文章來源：http://www.xys.org/xys/ebooks/others/history/great_famine.txt。

[50] 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頁272。

[51] 《社會》（上海），1993年第3、4合期。

[52] 國家統計局人口統計司，公安部三局編：《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口統計資料彙編（1949-1985）》（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88）。

[53] 袁永熙主編：《中國人口·總論》（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91），頁148-149。

[54] 《當代中國的人口》，頁48-49。

[55] 劉洪康主編：《四川人口》（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91），頁120。原中共重慶市委辦公室副主任，兼共青團重慶市委書記廖伯康在一篇回憶文章中說，1962年6月28日下午在中南海向中共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楊尚昆匯報説，四川省1958年到1960年死亡1000萬人（1957年的《戶籍年報》四川省人口7215.7萬，1960年底為6236萬），1961年至1962年四川大約還有250萬人死亡，因此認為1958年至1962年四川省餓死1250萬人。廖伯康：〈歷史長河裏的一個漩渦——四川「蕭李廖事件」回眸〉，載當代口述史叢書總委會騙：《當代四川要事實錄》（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

第九章

制定政策挽救農村危局

一、挽救農村局面的緊急措施

1.國民經濟大滑坡

1960年強撐躍進的結果，是整個國民經濟陷入了極度困難的境地。主要表現：

首先是農牧業產品大幅度減產，出現全國性糧食和副食品危機。

據統計：1960年，糧食實產2870億斤。比1957年的3901億斤減少26%以上；棉花實產2126萬擔，比1957年的3280萬擔減少35%以上；油料作物實產3405萬擔，比1957年的7542萬擔減少一半多；豬的年底存欄數8227萬頭，比1957年的14590萬頭減少56%；大牲畜年底飼養量7336萬頭，比1957年的8382萬頭減少12.5%。大都退到1951年的水準，油料作物僅及1951年產量的一半。[1]

由於「大躍進」從農村大量招工到工礦企業，使城鎮人口猛增，1960年比1957年增加3124萬人，比1951年增加近一倍。為供應城鎮人口的商品糧，在農村採取高徵購辦法，1958至1960年三年中每年徵購糧都在1000億斤以上，分別佔當年總產量的比例是：1958年徵購1175億斤，佔29.4%；1959年1348億斤，佔39.7%；1960年1021億斤，佔35.6%。儘管徵購了過頭糧，仍不能維持城鎮的最低需要，不得不挖庫存。1960年末糧食庫存量降到573億斤，比1955年的804億斤減少29%。

農業大幅度減產，糧食庫存減少，這就形成了全國性的糧食危機。

其二，生產性基本建設規模膨脹，經濟結構比例嚴重失調。

「以鋼為綱」，「元帥升帳」。為實現鋼鐵翻番，大上基本建設。1958年到1960年每年新增基本建設投資都在百億元以上，1960年達384億元，比上年增加11%，比1957年增加1.8倍。在基本建設投資總額中，生產性建設投資所佔比重都在86%以上（1958年為88%，1959年為86.8%，1960年為86.4%），擠掉了非生產性的建設。1960年的鋼產量號稱達到1866萬噸，實際上包含大量不合格產品（1962年，鋼產量降到667萬噸）。[2]盲目追求擴大生產規模和忽視必要的非生產性建設，在設備更新和城市基礎設施以及居民住宅等方面，留下了大量的歷史欠帳。

三年中施工的大中型建設項目均在1300個以上，1960年達到1815個，比1957年的992個增加83%；而建成投產項目佔施工項目的比重，卻大幅下降，1957年為26.4%，1960年僅為9.8%。建設項目周期拖長，不僅不能促進經濟發展，反而擠佔了財力和物力，加劇了資金和物

資的全面緊張。

在工業建設投資中，主要用於重工業，擠掉了輕工業。三年「大躍進」，重工業的比重都在55-57%之間，超過了1957年的51.6%。

1960年在工農業總產值中，農業總產值的比重由1957年的43.3%下降為21.8%；在工業總產值中，輕工業產值的比重由1957年的55%下降為33.4%，重工業產值的比重由1957年的45%上升為66.6%，造成了畸形的結構。[3]

其三，財政收不抵支，出現赤字，造成通貨膨脹、物價上漲。

「大躍進」三年的財政支出大幅增加，1958年為409.40億元，比1957年增長35%；1959年為527.71億元，比1958年增長28.8%；1960年為582.13億元。[4]由於收不抵支，致使三年連續出現赤字：1958年21.8億元，1959年65.8億元，1960年高達81.8億元。為彌補財政赤字，不得不增發貨幣，形成通貨膨脹。1960年末，貨幣流通量達到95.9億元，比1957年的52.8億元增長82%；每元貨幣流通量擁有的商品庫存量，卻由1952年的5.2元降至4.1元。[5]由於市場商品匱乏，除肉、蛋、糖、肥皂等按戶憑證供應外，還制發了工業券，憑券購買日用工業品。

其四，經濟效益低下，人民生活水平下降。

在經濟效益方面，「一五」時期每百元積累新創造的國民收入平均達32元，「大躍進」期間連年下降，到1960年，每百元投資，不但不能增加國民收入，反而減少國民收入0.4元。在群眾生活方面，全國人均消費水平，按當年價格計算，1957年人均消費水準為102元，到1962年只有117元。而按1957年的不變價格計算，以1952年居民消費指數為100，則1957年的消費指數為122.9，而1962年的消費指數只有1040，人民生活水平全面下降。[6]

2.十二條緊急指示

就在河南、甘肅等省餓死人事件先後暴露的時候，毛澤東的韶山鄉親出於無奈，也不得不千里跋涉進京來告「御狀」。[7]

1960年9月下旬，毛澤東的堂弟毛澤榮、舅表弟文本仙來到北京，因時值國慶節前夕，兩位老人進京三天未能見毛，無奈先來到王季范（毛澤東的姨表兄，時任國務院參室參事）家商量見毛澤東事。王季範表示，願意作他們的參謀，與他們一起去面見毛澤東，並把他們要反映的情況作了文字整理。等候了幾天，毛澤東終於傳話召見了毛澤榮、文本仙、王季範。毛澤榮見到三哥，立即把兩年來家鄉出現的問題統統倒了出來（由王季範幫助整理了十個問題），主要是：

——公社和生產隊幹部向上虛報產量，又不按科學種田。為了多插一季稻，強令社員正月下種，結果爛了禾種，便砍社員們口糧。還盲目

下令密植，結果減了產；

——不少幹部作風不民主，有的作風惡劣，只能按他們講的辦，社員有意見不敢提，誰提出誰就會被戴上大帽子「反黨反紅旗」。

——大辦鋼鐵，大辦水利，青壯年全都上了工地，家裏只剩下婆婆老倌和細伢子，稻子爛在地裏，紅薯爛在土裏，都不能及時收回。弄得大家口糧奇缺。

——大割「資本主義尾巴」，社員的雞、鴨、豬等家蓄家禽一概沒收，搞得雞犬不寧，差不多都絕了種。

——公共食堂愈辦愈糟，糧食愈來愈缺乏，現在不少人只能吃到米糠煮爛白菜，社員出工不出力，也沒得力。不少人因經常吃不飽，得了浮腫病，療養院住了好多人，醫藥跟不上……。

毛澤榮説道：主席，這些情況，幹部都不敢給你匯報。你住北京城裏，天高皇帝遠，不知道。現在亂了套，會要餓死人，你得管一管呢！文本仙補充道：主席，你知道我們韶山是湘潭、湘鄉、寧鄉三縣交界的地方，三縣情況都一樣哩！你可以派人去調查。王季範附和説：是啊，你可以派我每年到兩個省去視察，以調查瞭解一些真實情況。

毛澤東完全瞭解鄉親們絕不會撒謊，聽到這些情況，心情很是沉重，他嘆息説：唉！華初（指毛華初，毛澤東的侄子）到那裏去了，從没有聽他在这裏講起這些事。問道：你們現在的口糧是怎麼分吃的？

小人每人三兩（指十兩制的新秤），大人一斤。毛澤榮答。

鄉親們所反映的情況，對毛澤東不能不有所觸動。

本來，中共中央在此前為緩解糧食危機，已經採取了種種措施。各地為貫徹中央關於「大辦糧食，大辦農業」和「堅決地認真地清理勞動力加強農業生產第一線」等指示，也相應地作了一些政策規定。如：廣西提出了《關於農村的十大政策》，規定要為社員留足基本口糧；落實包產，超產獎勵兑現；留足自留地；增加社員現金收入等。[8]湖北提出了《關於調動群眾積極性的十項措施》，強調了三級核算，隊為基礎的體制；集中優勢兵力到農業生產第一線；切實搞好分配，使80%以上的社員收入當年有所增加；嚴格執行「三包」獎賠制度和糧食、農副產品的徵購政策；允許社員適當經營個人的自留地等。[9]但這些措施一是遠水不解近火，二是只能治標不能治本。不能從根本上解決人民公社化引起農村的混亂。

就在農村落實上述政策的試點中，發現問題的根子還在「共產風」。如前文所引中共湖北省委書記處書記王延春在關於沔陽縣貫徹政策試點情況向省委的報告中説：

> 去年以來，縣委曾經將通海口公社，作為貫徹政策的重點，兩次大戰「共產風」。有些人滿以為問題解決了，事實並非如此。從這次暴露的情況看，各方面都存在着極其嚴重的問題，其

中颳「共產風」、亂指揮生產、糧食問題、自留地問題等最為嚴重。

這個公社的「共產風」，年年季季在颳，年年季季在處理，可是邊處理邊颳，一直颳到工作隊進村的時候——9月4日，這一天有的生產隊還在沒收社員的自留地。

颳「共產風」的單位，上至省級，下至小隊，一桿到底，根深蒂固。……

……

許多生產隊粗略地計算一下，「共產風」中所拆毀的房屋、死亡的耕牛、損壞的農具、家俱這幾項，若按人口平均，每人要損失五十元左右，多的達到一百多元，這個損失，就相當於一年到兩年的分配收入。

……

糧食上比較普遍的問題，是購過頭糧。……

颳共產風、瞎指揮單產、購過頭糧、沒收自留地的結果，是嚴重地挫傷了群眾的積極性，給生產隊造成驚人的損失。……

全公社的糧食單產，1958年是352斤，去年是311斤，今年預計只有297斤……。

碾盤生產隊，1957年總收入是二十三萬元，每人平均一百五十六元，今年預計總收入只有十四萬元，每人平均只有九十四元。連續三年，還沒有趕上1957年。

……

政策愈不貫徹，群眾愈沒有積極性，生產愈搞不好，生活愈發困難，生活愈困難，就愈颳「共產風」，相互影響，火上加油，愈來愈旺。

所以，只有抓住貫徹政策，徹底地處理「一平二調」，徹底地糾正生產上的瞎指揮，以及認真地解決糧食問題等等，才有可能真正地調動廣大群眾的生產積極性，才會有生產的迅速發展和人民公社的鞏固。[10]

10月23日至26日，毛澤東召集華北、中南、華南的一些省、市、自治區第一書記陶魯笳、劉子厚、劉仁、陶鑄、王任重、張平化、吳芝圃、劉建勳開會，聽取他們關於農業情況的匯報，討論如何糾正和堵塞「共產風」的問題。中央領導人劉少奇、周恩來、李富春、譚震林、李先念，以及廖魯言、陳正人參加了會議。會議對問題嚴重而暴露較早的山東和河南兩省的問題進行了討論，對河南省委主要負責人吳芝圃的錯誤作了批評。鑑於一些省份農村餓死人的嚴重情況，會議認為必須採取緊急措施，以制止並糾正農村人民公社的「共產風」。中央委託周恩來

主持起草《關於農村人民公社當前政策的緊急指示信》。[11]

10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了「緊急指示信」的第二稿。11月3日，毛澤東對「緊急指示信」作了審改，並批示：「用電報發出，愈快愈好。」[12]11月3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農村人民公社當前政策問題的緊急指示信》[13]，簡稱十二條：

(1)三級所有，隊為基礎，是現階段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這一制度從1961年算起，至少七年不變。

(2)堅決反對和徹底糾正一平二調的錯誤。凡是平調的各種財物，都必須認真清理，堅決退還。

(3)加強生產隊的基本所有制。生產隊是基本核算單位，絕不能削弱隊有經濟來發展社有經濟。

(4)堅持生產小隊的小部分所有制。勞力、土地、耕畜、農具必須堅決實行「四固定」，固定給小隊使用。生產隊對生產小隊實行包工、包產、包成本和超產獎勵制度。三包必須落實，獎罰必須兌現。

(5)允許社員經營少量的自留地和小規模的家庭副業。

(6)少扣多分，儘量做到百分之九十的社員增加收入。

(7)堅持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原則，供給部分和工資部分三七開。

(8)從各方面節約勞動力，加強農業生產第一線。

(9)安排好伙食，辦好公共食堂。

(10)有領導有計劃地恢復農村集市，活躍農村經濟。

(11)認真實行勞逸結合。必須堅決保證社員每天睡足八小時。可以實行男社員每月放假兩天、女社員每月放假四天的制度。

(12)放手發動群眾。整風整社。

值得指出的是，上述政策在1959年3月的第二次鄭州會議到5月中央發出《關於農業的五條緊急指示》、《關於分配私人自留地以利發展豬雞鵝鴨問題的指示》就基本都提了出來，只是由於廬山會議反彭德懷的所謂右傾機會主義，致使這些規定不僅沒有貫徹執行，相反重新大颳「共產風」。這十二條緊急指示，儘管對供給制和公共食堂仍在堅持，但就挽救當時農村的現實危機而言，仍有極為重要的意義。

3.緊急指示信的貫徹

對這封「緊急指示信」的貫徹，中共中央明確指示：要「原原本本地讀給全體黨員和幹部聽，讀給農民群眾和全體職工聽，反復解釋，做到家喻戶曉，把政策交給群眾，發動群眾監督黨員幹部認真地、不折不扣地貫徹執行」。還規定，「這個文件，除宣讀外，各級幹部都要分期分批開辦訓練班，學習一次，二次，三次。」[14]

為使上述要求真正落到實處，在「緊急指示信」下發的當日，中共

中央同時發出《關於貫徹執行「緊急指示信」的指示》，對貫徹落實的具體步驟、要求作了規定。以使全體幹部深刻認識一平二調的「共產風」破壞農業生產力的嚴重性，及其造成的危害。至遲要在12月中旬以前傳達到全體農村黨員、幹部和農民群眾中去。[15]

與之同時，中央決定抽調中央和國家機關幹部下放農村，以幫助地方貫徹中央政策的落實。11月10日，中央精簡幹部和安排勞動力五人小組向中央報告說：據11月9日統計，已初步確定下放幹部10176人，佔中央機關幹部的7.33%。準備在名單公布後，拿出一個月的時間，把這些幹部組織起來，學習中央關於農村工作的政策和決議。對下放幹部的分配，重點加強農村，適當照顧其它基層。到農村去的重點是那些農業生產任務重、問題多、基層嚴重不純的地區。[16]

在這場幹部下放運動中，毛澤東把他身邊的工作人員林克（毛澤東辦公室秘書）、高智（機要秘書）、葉子龍（中共中央辦公廳機要室主任）、李銀橋（毛澤東的衛士長）、王敬先（中央辦公廳警衛局副局長）、封耀松（毛澤東的衛士）也下放了下去。12月26日是毛澤東六十七歲生日，毛澤東邀下放的六人和汪東興一起吃飯。李銀橋回憶毛交待大家說：「現在老百姓遭了災。你們都去搞些調查研究。那裏到底有些甚麼問題啊，把情況反映上來。」停頓一下又說：「人民公社，大辦食堂，到底好不好？群眾有甚麼意見都反映上來。」大家無聲地點頭，神情肅然。毛澤東手指我和葉子龍：「你們下去，到山東去，廣泛調查研究。」

但是，毛對身邊工作人員去農村的心理也是很複雜的，26日夜間，他又寫一封信囑咐他們：「不去山東，改去信陽專區，那裏開始好轉，又有救濟糧吃，對你們身體會要好些。」又說：「你們如果飢餓，我給你們送牛羊肉去。」在信的末尾，毛又寫了幾句帶有傷感的話：「12月26日，我的生辰。明年我就有六十七歲了，老了，你們大有可為。」[17]

李銀橋的回憶，道出了毛澤東讓他身邊工作人員下放的意圖，就是他想要瞭解下邊的真實情況。自從1949年進城以後，毛澤東就難以直接接近群眾，一方面有保衛部門出於安全的考慮，使毛不能自由地走到群眾中去；更重要的是毛澤東從1950年代中後期起，愈來愈聽不得不同意見，尤其是反對意見，使得下面不得不看着「風向」說話，以投上所好。即是省級以上的幹部，以至中央其它領導人向毛澤東匯報情況，也得經過慎重選擇，拿捏分寸。

各地對中央緊急指示的貫徹，迅即行動。

湖北省的具體做法是，全省開三級幹部會議不作報告，原原本本傳達十二條。提出「揭開蓋子，放下包袱，肯定成績，糾正錯誤」的口號，讓大家一起動腦筋，充分發揚民主精神。省委宣布，凡是過去所說

的，與這次中央的十二條指示有出入的，都不算數，可以一風吹（過去三年所報的產量，凡是認為有問題的，都不算數，可以照實重報）。要求地委、縣委首先批評省委，然後縣委批評地委，最後省、地、縣三級再作自我批評。宣布會上説對説錯，一律不記帳，一律不戴帽子。打破了過去老一套的開會方法。[18]

沔陽縣的幹部在檢查「共產風」為甚麼老是糾正不徹底時，找到的答案是，沒有徹底反掉平均主義。滿口講的是社會主義，做的卻是平均主義。[19]這次整頓，由於政策兑現，群眾反映説：

過去開會，講的都是群眾傷心的事，如甚麼開夜班，動員投資，分配超支，沒收自留地，沒收小雜糧，反「資本主義」思想等等。現在開會，大不同了，講的都是群眾高興的事。如甚麼「共產風」兑現，「七權」下放，三個「三七開」，冬播兩權（即播種規格權、作物安排權）下放，勞逸結合，不開夜班，每月休假兩天，冬天辦半日食堂，活躍市場經濟等等。[20]

對農村政策十二條的貫徹，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十分重視，對各省的報告一一作出批示。

11月15日，毛在轉發湖北省委送來的報告和材料時，批示強調：

> 必須在幾個月內下決心徹底糾正十分錯誤的共產風、浮誇風、命令風、幹部特殊風和對生產瞎指揮風，而以糾正共產風為重點，……要地、縣、社三級下決心（堅強的貫徹到底的決心），首先要省委一級下決心，現在是下決心糾正錯誤的時候了。[21]

11月28日，在轉發甘肅省委第四次報告時，毛更作了自我批評。他在為中央起草的批語中寫道：

> 甘肅省委在作自我批評了，看起來批評得還算切實、認真。……毛澤東同志對這個報告看了兩遍，他説還想再看一遍，以便從中吸取教訓和經驗。他自己説，他是同一切願意改正錯誤的同志同命運、共呼吸的。他説，他自己也曾犯了錯誤，一定要改正。

關於具體所犯的錯誤，毛寫道：

> 錯誤之一，在北戴河決議中寫上了公社所有制轉變過程的時間，設想得過快了。……這種想法是不現實的。現在更正了，改為從現在起，至少（同志們注意，説的是至少）七年時間公社現行所有制不變。

對將來的發展前景，毛指出：

> 即使將來變的時侯，也是隊共社的產，而不是社共隊的產。又規定從現在起至少二十年內社會主義制度（各盡所能，按勞付酬）堅決不變，二十年後是否能變，要看那時情況才能決定。

> ……總之，無論何時，隊的產業永遠歸隊所有或使用，永遠不許一平二調。公共積累一定不能多，公共工程也一定不能過多。不是死規定幾年改變農村面貌，而是依情況一步一步地改變農村面貌。[22]

毛澤東這段自我批評，雖然仍帶有極大局限，但終究是下了把農村的大躍進（幾年改變面貌，幾年向共產主義過渡）停下來的決心。

但在這些批語中，毛澤東對「五風」造成的慘重後果，如河南信陽地區那樣，幹部為虛報浮誇，購過頭糧，搞反瞞產私分等，竟違法亂紀，摧殘人命，致使農村出現大量餓病逃荒死亡現象的根源，不認為主要是黨內高度集中的體制、不斷搞反「右傾」運動形成的政治高壓，而是用階級鬥爭的眼光去作分析，因而得出了又一錯誤的結論，即所謂「民主革命尚未完成」。要求在問題嚴重的地區，用階級鬥爭的方法搞民主革命的補課。

1960年11月15日，毛澤東在一則批語中說：

> 在講大好形勢、學習政策的過程中，要有一段時間大講三分之一地區的不好形勢，壞人當權，打人死人，糧食減產，吃不飽飯，民主革命尚未完成，封建勢力大大作怪，對社會主義更加仇視，被壞社會主義的生產關係和生產力……。[23]

根據這種分析，12月8日，中共中央針對山東、河南、甘肅和貴州一些地區所發生的嚴重情況指出：

> 其中某些反革命的破壞行為，顯然是封建勢力在地方上篡奪領導，實行絕望性的破壞性的報復。這是農村中階級鬥爭的最激烈表現。要知道，中國農村人口中還有百分之八的地富分子及其家屬，連同城市的資產階級分子，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和上層小資產階級分子及其家屬，總共要佔全國人口百分之十左右。……其中，未被改造或者不接受改造的最堅決的最隱蔽的反革命分子，他們對社會主義極端仇視，有意識地隨時都在準備「借屍還魂」，篡奪領導，實行復辟和瘋狂掙扎。毛澤東同志說，我們不僅要繼續實行社會主義革命，而且還要徹底完成民主革命的未了任務。……這在現在所揭發的事實中已有不少明證。由此可見，整個社會改造是一個長期而艱苦的階級鬥爭任務，反革命分子只要存在一天，決不會自動放棄他們絕望的被壞和掙扎，我們對他們萬萬疏忽麻痹不得。孫中山說：「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我們可以拿來借用。[24]

上述對農村問題根由的錯誤分析，直接導致這次農村整社運動對基層幹部的嚴重打擊，並將一些問題嚴重的幹部當作敵對分子判以徒刑，因而未能取得真實的教訓。

[1]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頁884；陳如龍主編：《當代中國財政》，上冊（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頁185。

[2]《當代中國財政》，頁185。
[3]《當代中國財政》，頁185-186。
[4]《當代中國財政》，頁176。
[5]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頁886。
[6]《當代中國財政》，頁186。
[7] 劉秉勳：〈毛澤東決定解散農村食堂的來由〉，《百年潮》，1997年第6期。
[8]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農業委員會辦公廳編：《農業集體化重要檔彙編（1958-1981）》，下冊（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1），頁353-356。
[9]《農業集體化重要檔彙編（1958-1981）》，下冊，頁357-361。
[10] 王延春：〈關於沔陽縣貫徹政策試點情況的報告〉（1960年9月18日），載《農業集體化重要文件彙編（1958-1981）》。下冊，頁364-369。
[11]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頁361；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逄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 1949-1976）》，下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頁1099。
[12] 毛澤東：〈對中央關於農村人民公社當前政策問題的緊急指示信的批語和修改〉（1960年11月3日，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九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頁336。
[13]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十三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頁660-676。
[14]《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十三冊，頁661、675-676。
[15] 〈中共中央關于貫徹執行「緊急指示信」的指示〉（1960年11月3日），載《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十三冊，頁677-681。
[16] 中央精簡幹部和安排勞動力五人小組：〈關於中央一級機關抽調萬名幹部下放基層情況報告〉（1960年11月10日），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九冊，頁350。
[17] 毛澤東：〈給即將下放的身邊工作人員的信〉（1960年12月26日），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九冊，頁399。
[18] 〈王任重同志的報告〉（1960年11月12日），載《農業集體化重要文件彙編（1958-1981）》，下冊，頁392-393。
[19] 〈沔陽縣貫徹政策第一階段的總結〉（1960年11月3日），載《農業集體化重要文件彙編（1958-1981）》，下冊，頁396。
[20] 〈通海口公社貫徹政策後的變化〉（1960年11月9日），載《農業集體化重要文件彙編（1958-1981）》，下冊，頁401-402。
[21] 毛澤東：〈中央關於徹底糾正「五風」問題的指示〉（1960年11月15日），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九冊，頁352。
[22] 〈中央轉發甘肅省委關於貫徹中在緊急指示信的第四次報告的批語〉；（1960年11月28日），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九冊，頁364-365。
[23] 毛澤東：〈在中央機關抽調萬名幹部下放基層情況報告上的批語〉（1960年11月15日），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九冊，349-350。
[24] 〈中共中央關於山東、河南，甘肅和貴州某些地區所發生的嚴重情況的指示〉（1960年12月8日），載《農業集體化重要文件彙編（1958-1981）》，下冊，頁416-417。

二、確定調整國民經濟的「八字」方針

1.決定退卻的中央全會

十二條緊急指示，終究是應急措施。整個國民經濟如何安徘，有待拿出一個通盤的打算和明確的方針。1960年12月24日到1961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在北京舉行工作會議，討論農村整風整社和糾正「五風」問題；1961年國民經濟計劃問題；聽取中共代表團關於世界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的報告。

會議採取匯報會的形式。參加會議的除中央常委外，有彭真、譚震林、陳伯達、柯慶施、曾希聖、陶鑄、王任重、宋任窮、歐陽欽、劉瀾濤、張德生、李雪峰、烏蘭夫、劉子厚、李井泉、廖志高。[1]大家一邊匯報，一邊討論，面對現實的嚴重困難，頭腦相對冷靜了下來，共謀克服困難的大計。毛澤東插話最多，有關方針政策逐步形成以下概念：

關於全國縣、社、隊和幹部隊伍的情況。毛澤東分析説，縣、社、隊可分為好、中、壞三類，比例是三、五、二。幹部隊伍可分成六類：第一類，五類分子，地主階級復辟的，是反革命；第二類，本來是好的，變壞了，也是反革命；第三類，死官僚主義分子，死也不改，是敵人；第四類，情況不明，頭腦不清，不知道甚麽是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是糊塗人；第五類，知道一些，不甚清楚；第六類，頭腦清楚，事情辦得好，「共產風」很少或者沒有。毛劃線説，前三類屬敵我矛盾（隔了幾天，毛把死官僚主義分子與一、二類區別開來，劃為人民內部矛盾），後三類是好人。對於壞人，要奪權。一定要發動群眾，搞階級鬥爭。

關於整風整社，毛強調，中央和省兩級要擔一些責任。幫助下邊，幫助好人。他説，廬山會議後，有些事情沒有想到會是颳「共產風」。去年幾個大辦，如大辦水利、大辦交通、大辦養豬、大搞商品生產基地，這些都是中央提出的，誰也沒有想到他要一平二調，如果想到就不會那麽辦了。當有人匯報去年農業書記會議強調發展社有經濟有問題時，毛斷然説：「大辦社有經濟，必然颳『共產風』。」

關於退賠，毛態度堅定地表示：破產也要賠。他説：縣、社寧可把家業統統賠進去，破產也要賠。……不痛一下就得不到教訓。毛贊成退賠要有政策界限，在大辦水利、大辦交通、大辦副食品基地等情況下平調的，要由國家退賠一部分；由國家退賠的，不能讓縣、社退賠。

對這段堅持大躍進的經驗，毛頗有感觸地説：「現在看來，建設只能逐步搞，恐怕要搞半個世紀。」又説：這幾年説人家思想混亂，首先

是我們自己思想混亂。一方面糾正「共產風」，糾正瞎指揮風；另一方面，又來了幾個大辦，助長了「共產風」，不是矛盾嗎？廬山會議時以為，「共產風」已經壓下去了，右傾又壓下了，加上幾個大辦就解決問題了。原來估計1960年會好一些，但沒有估計對。1960年天災更大了，人禍也來了。這人禍不是敵人造成的，而是我們自己造成的。《毛澤東傳》的作者評論說：「在这裏，毛澤東把工作中的錯誤稱作人禍，這可能是第一次。」[2]

針對「五風」泛濫，幹部嚴重違法亂紀等問題，會議期間，毛澤東要他的政治秘書胡喬木借鑑紅軍時期的經驗，起草一個普遍適用的「黨政幹部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稿子。他想用這種方法來約束幹部們的行為。胡喬木很快拿出了一個初稿呈毛澤東。1月9日，毛指示：印發各組討論，提出修改意見。胡喬木提出的初稿，言詞相當激烈。八項注意的第一條：「保護人民安全，打人要法辦，打死人要抵命」；第二條：「保護人民自由，隨便罰人抓人關人搜查要法辦」。表明當時對於一些地區基層幹部的胡作非為已經忍無可忍了。但是，這些提法又顯然不便寫到正式文件上去，毛澤東表示：「有幾條執行起來，可能起反面作用。」[3]後來改作從正面要求，如「待人和氣」、「辦事公道」、「買賣公平」等等。經過多次修改，中共中央於1961年1月27日把這個「黨政幹部三大紀律八項注意」[4]下發到公社和生產大隊，成為農村整風整社的重要文件。後來又把它寫進了《農業六十條》。

至於今後的方針，毛提出，對明年要有思想準備，把富日子當窮日子過，當災年過，這一條很重要。陳雲說，我以為要抓三條：一是做好精神準備、思想準備、工作準備。二是今冬無論是人還是牲畜，都要多休息，養精蓄銳，準備明年春耕。三是進口糧食，能進多少就進多少，我以為要「吃飯第一，建設第二」。有人補充說，市場第二，建設第三。毛澤東概括為：第一是吃飯，第二是市場，第三是建設。

接着，聽取李富春匯報1961年國民經濟計劃的設想。從1958年鋼鐵翻番以來，鋼產指標就是大躍進的標誌，是最敏感的話題。對1961年的鋼產指標，李富春說，開始想搞2150萬噸，後來逐步下調，現在降到2000萬噸。毛澤東說：是否搞那麼多，能不能辦得到？首先要保證農業，爾後煉鋼。討論中提出了幾種方案：第一方案是1950萬噸，第二方案是1900萬噸。

毛說，看來1900萬噸比較穩妥，究竟搞多少，還要看煤、礦石、運輸的情況。我想，今年仍然搞1870萬噸，恐怕也難避免去年的苦頭。聽說還有一個方案，就是1800萬噸。

王任重說：是中南組葉劍英提的，搞1800萬噸鋼，提高質量，集中力量搞農業。

毛說：我擔心就是1870萬噸，也還可能出現去年的緊張情況。那樣

搞，實際上是個浪費。去年為甚麼那麼緊張？就是因為由1350萬噸一下子提到1870萬噸。

劉少奇說：看來，去年由1840萬噸後來又增加到2040萬噸，是犯了錯誤的。

鄧小平說：再加上大興水利，大調勞力，就把農業擠了。

李富春說：還有兩個因素，一是基建搞多了，二是生產的面鋪寬了，分散了力量。

彭真說：這三年，生產資料增長了三倍，輕工業生活資料只增長了一倍。

毛說：總之，今年就是要縮短重工業的戰線，延長農業、輕工業的戰線。

劉少奇說：指標搞低些，努力去超過。

毛說，這三年都是指標定高了，後來退下來。我懷疑就是1870萬噸，是否也會緊張。

對鋼鐵指標的討論，儘管保持了較為冷靜的頭腦，認為1870萬噸也會緊張。但因整個工業戰線的問題尚未充分暴露，毛澤東等對將會遇到的困難仍然估計不足，因而仍處在大躍進的慣性思維之中。

毛澤東問李富春，1961年的方針怎麼提法？

李答：是調整、充實、鞏固、提高。

這個八字方針，是1960年8月國家計委在《關於1961年國民經濟計劃控制數字的報告》中提出的，原稿的提法是：1961年國民經濟計劃的方針應以整頓、鞏固、提高為主，增加新的生產能力為輔；壓縮重工業生產指標，縮短基本建設戰線，加強農業和輕工業的生產建設，改善人民生活。8月底9月初，國務院在審議這個報告時，周恩來認為，對方針的提法，與其講整頓，不如提調整，並建議增加「充實」二字，從而形成了「調整、充實、鞏固、提高」的八字方針。這個方針的基本內容是：以調整為中心，調整國民經濟各部門間失衡的比例關係，鞏固生產建設取得的成果，充實新興產業和短缺產品的項目，提高產品質量和經濟效益。[5]當時，正處在煉爭氣鋼的熱潮中，毛澤東的注意力主要還放在中蘇關係方面，對國務院提出的這個方針還不知曉。因此，當李富春說了以後，毛接看問道：這個方針是甚麼意思？

李答：調整就是調整各方面的關係，有調整、充實，才能鞏固、提高。

毛說：是四面八方了，你這個意思就是休整的意思，和部隊在兩個戰役之間的休整一樣。

毛又問大家：大躍進的口號能不能在1961年提？

鄧小平說：今年元旦社論，沒有提大躍進，提的是爭取社會主義建設的新勝利。[6]

大家認為，大躍進，作為一段來算賬，還是大躍進。

毛表示：今年可能是就地踏步，休養生息。（毛終於同意退卻了。）

最後，毛澤東向大家提出，回去以後，「要大興調查研究之風」。他說，要做到情況明，決心大，方法對。首先是要情況明。這是一切工作的基礎，因此要摸清情況，要做調查研究。毛說：「今年搞一個實事求是年好不好？」

「就地踏步，休養生息」；「搞一個實事求是年」，這可以看成是毛澤東終止「大躍進」的信號。也就為中央委員會最後決策作了準備。

1961年1月14日至18日，中共八屆九中全會正式舉行。到會的中央委員八十三人，候補中央委員八十七人，中央有關部門和各省、市、自治區黨委工作人員二十三人列席會議。李富春在會上作關於安排1961年國民經濟計劃意見的報告。

李富春在高調肯定1960年高舉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國民經濟取得「繼續躍進」勝利的前提下，提出1961年國民經濟的安排在貫徹以農業為基礎、把農業放在首要地位方針的同時，對各個部門和各方面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具体意見是：

努力加強農業战线，適当縮短工業戰線。在工業生產、建設的安排中，要先生產、後基建，先採掘、後加工，先維修、後製造，先配套、後主機，先質量品種、後數量，以求在現有數量的基礎上，加強薄弱環節，填補缺門，完成配套，維護設備，增加品種，改善質量，降低成本，提高勞動生產率。

李富春強調：這些安排方針，是多年來經驗的總结，不僅1961年要貫徹執行，有的在兩三年內，甚至在更長的時期內也要貫徹執行。

根據上述方針，提出1961年國民經濟的主要指标是：

農業：糧食4100億斤左右，棉花3200萬擔左右，油料（包括花生、芝麻、油菜籽）7200萬擔左右，猪的飼養頭數达到1.5亿头左右。

轻工業：棉紗450萬件（比1960年減少150萬件），棉布三十五億米（比1960年減少十九億米），食糖五十五萬至六十萬噸（比1960年增加十二至十七萬噸），食用植物油七十五萬至八十萬噸（比1960年減少二十二萬至二十七萬噸）。1961年的商品供應量大約可以達到67016元左右，比1960年減少四十億元左右，主要是糧、油、肉、煙、布、針織品的供應減少約六十五億元。

重工業和運輸業：原煤4.36億噸，鐵2750萬噸，鋼1900萬噸。鐵路貨運量6.75億噸。

基本建設投资167億元，比1960年減少103億元；大中型項目安排900個左右，比1960年減少700個左右。

為了保證1961年國民經濟按照既定方針順利發展，意見要求貫徹全

國一盤棋的精神。據此提出，加強領導，對經濟管理體制作適當改進，把某些放得過多偏下的權力集中到中央、中央局、省、市、自治區三級。在最近兩三年內，權力更多地集中到中央和中央局。

全會討論並批準了李富春的報告和國民經濟的調整方針，建議國務院將1961年國民經濟計劃草案提交全國人大二屆三次會議審議；全會通過了《關於成立中央局的決議》，批準中央政治局1960年9月關於成立中央局的決定。全會還聽取了鄧小平《關於1960年11月在莫斯科舉行的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的報告》，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九次會議關於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的決議》。

應該説，中共八屆九中全會通過的1961年的國民經濟計劃指標，仍然沒有跳出高指標的怪圈。但這次全會批準的調整國民經濟的「八字」方針，標誌着1958年以來的大躍進正式终止，中國的國民經濟進入了建國以後的第一個大調整時期。

2.農村整風整社運動

中央十二條緊急指示的傳達，對穩定農村形勢，總體上取得了好的效果。但具體政策的貫徹，還有待時日和各級組織的工作。僅就退賠工作而言，據財政部了解，各省、市、自治區財政廳（局）估算，全國平調總數110億元左右，按農業人口5.5億計算，每人平均二十元左右。據北京、河北等十三個省、市、自治區3月中旬的材料，已經退賠的實物和現金，佔平調總額的41.4%。據安徽、江西、廣西、湖南、河南、雲南、陝西七個省的材料，公社、生產隊能用本身財物退賠的約佔62%。[7]因此，不少地方退賠沒有完全兑現。據河南省內鄉縣當年的縣委副書記説：

1960年11月，貫徹《緊急指示信》，各公社、大隊又召開了兑現大會，向群眾退賠了一批實物和現款。但是，由於當時各級領導幹部對「破產還債，徹底退賠」的重要性認識不足，決心不大，抓的不緊，使退賠工作出現了許多問題，平調賬沒有徹底清算，兑現數字有虛假，報的多退的少。在算賬和兑現方法上，有些單位沒有放手發動群眾，幹部包辦，誰要給誰，按人平攤，按比例分配，平調實物折款多，給實物少；給幹部多，給群眾少；甚至以平調還平調（即：平調一部分社員的實物或實物折款償還給另一部分社員），繼續犯平調錯誤。[8]

農民群眾對緊急指示中的有些規定也有不同意見，如：對超產主要獎現金不感興趣，要求獎實物；對增產增購有意見，要求定產定購；個別還提到以生產隊為基本核算單位太大，不利於發揮群眾的積極性，私養猪沒有時間，農村幹部要求實行休假制度等。[9]

經過中央工作會議討論形成的《關於農村整風整社和若干政策問題

的討論紀要》[10]，1961年1月20日下發執行。《紀要》要求所有人民公社和生產隊（不論是三類或一、二類社隊），均應以貫徹十二條緊急指示為綱，進行整風整社。在整風整社運動中，要徹底檢查和糾正「共產風」、浮誇風、瞎指揮風、特殊化作風、強迫命令風，要徹底反對贪污、浪费、官僚主義；必須徹底清算平調賬，堅決退賠，並向群眾作檢討。

具體步驟是，首先集中力量整頓三類社隊，把被地富反壞分子和蛻化變質分子篡奪了的領導權奪回來，把佔據領導崗位的死官僚分子撤下來，把那些軟弱無能、思想糊塗、不能貫徹執行黨的政策的幹部調離主要領導崗位。具體做法是，由上面派去工作團，經過深入發動群眾，紮根串連，挑選一批真正貧農下中農的積極分子，同時吸收原有組織中好的和比較好的幹部參加，組成貧農下中農委員會，在黨的領導下，主持整風整社，臨時代行社隊管理委員會的職權，領導生產，安排生活。一、二類社隊的整頓，主要依靠原有組織力量，上面也派工作團去幫助，召開社員代表大會，發動群眾，幫助幹部整風整社。對幹部的處理，要區別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對犯錯誤幹部的處分和清洗壞人，都必須嚴格按照黨和政府規定的手續，慎重辦理。

《紀要》在十二條緊急指示的基礎上，確定了農村工作的若干具體政策，對清算平調賬和退賠，提高糧食統購價格、節約用糧、發展家庭副業、社員自留地、農村集市、農業生產资料價格等一系列問題，作了政策性的規定。

《紀要》還強調，縣和縣以上各級各部門，也必須徹底整風。並指出「縣級領導機關是個關鍵」。只有這些上級機關特別是縣級機關，認真地糾正了自己的錯誤作風，才能更有力地推動社隊整風和鞏固整風整社的成果。

這次整社運動，始於貫徹十二條緊急指示。在做法上大有第二次土改之勢。湖北省委《關於沔陽縣通海口公社整風整社第二階段的總结報告》[11]中說：「也像土地改革工作那樣，一進村，就採取依靠貧農、紮根串連的辦法，組織一支純潔的貧農隊伍（包括新、老下中農），生產隊成立貧農代表會，小隊成立貧農代表小組，讓他們自己起來和五風作鬥爭。」貧農有顧慮，怕工作組一走，受到打擊報復。為了發動貧農，工作團進村後，「一方面主動點火，啟發貧農起來揭發問題；另一方面督促基層幹部登門整改」。同時，抓經濟兑現，解決一部分貧農當前的嚴重困難。

運動一發動起來，群眾對幹部的怨氣就不可遏止了。這個公社部分幹部對待群眾的作風，也確實是可忍孰不可忍！「幹部可以隨隨便便打人、罵人、捆人、吊人、罰款、罰跪、罰曬、罰凍，扣工分、扣工資、扣口糧、扣『五票』，搜查、抄家、『鬥爭』、『反省』、『剝皮』、

『充軍』、『照像』、『辯論』，奪飯碗、關黑牢、戴帽子，遊街示眾……』

群眾意見大的還有幹部的贪污行為和「多吃多佔」。《報告》説，兩年來，全公社各級幹部有貪污行為的佔幹部總數的31%。多吃多佔，最為普遍。社員形容幹部多吃多佔的特權是：「要魚就打，要米就拿，要柴就拉，要菜就拔。」幹部超吃糧食的現象很嚴重，公社幹部個個吃補助糧，生產隊和小隊的幹部「明定量，暗無量」，貪污群眾的節約糧。在那個饑荒年代，這是人們最為痛恨的一件事。要知道，這是從社員嘴裏掏的保命糧啊！《報告》説：「許多地方，群眾批評幹部為『新的剝削階級』，把幹部稱之為土皇帝、活閻王、白龍暴，新恶霸、新地主、新保長，笑面虎、吊頸鬼，陰雷公，……很多幹部都有外號。」

這個公社生產隊以上幹部268人，經過整頓，撤換的幹部：小隊幹部佔22.5%，生產隊幹部佔17.9%，其中支部書記和隊長一級佔14.5%。公社和管理區的正副書記、正副主任也有十九人調離。他們的位置的補充，一是從積極分子中挑選；一是把過去調走的幹部調回來；一是過去被處分錯的幹部平反繼續當幹部；一是上邊下放一批幹部。

中央工作會議的紀要下發以後，各地的整風整社逐步從三類社隊擴展到一二類社隊。2月10日，中共中央專門發出指示，要求立即抓緊廣大面上的工作，迅速發動群眾，組織政策的初步兑現。最直接的辦法就是把幾年平調老百姓的東西退還給他們，損失了的實行賠償。以盡快地扭轉局面。

毛澤東和劉少奇都把退賠作為取信於民教育幹部和剎住歪風的重大問題來看待，態度堅決，逢會必講。1月10日，劉少奇在河南省洛陽地委第一書記紀登奎的一份報告上批示：「必須省、地、縣、社四級下最大的決心，並且派工作隊下去督促，真正發動廣大的群眾運動」，衝破抵抗，認真退賠，使中央政策兑現。[12]

2月9日，中共中央中南局向中央報告了廣東省《中山縣坦洲公社整風整社運動的經驗》。3月1日，中共中央批轉了這個報告，認為對一二類社隊開展整風整社來説，這「是一個比較更完全更健康的經驗」。[13]從做法來看，坦洲公社與海口公社大體相同：工作團一進村就深入群眾進行紮根串連，首先把貧、下中農的階級隊伍組織起來；接着，依靠串連起來的階級隊伍，聯合大、小隊幹部，先反公社的「五風」，然後廣泛發動群眾反大、小隊幹部的「五風」，一級一級的破下去，最後通過選舉，由小隊到大隊，又自下而上地立上來。只是對幹部的處理較為溫和。「做到『放而不散』（群眾不渙散），『放而不亂』（不混亂），『整而不躺』（幹部不躺倒）。」

中央所以認同這種做法，與對農村形勢的估計有關。自信陽事件揭露以後，各地大量反映上來的情況是，農村基層幹部對群眾打、罵、

罰，花樣繁多，而群眾毫無抵抗能力。不造成聲勢，發動群眾，組織隊伍，就無法扭轉局面。對此，劉少奇的看法與毛澤東是一致的。1月9日，劉少奇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說：看來農民在經濟上是很脆弱。經濟上脆弱，對違法亂紀的抵抗也脆弱。這種經濟上的脆弱性和政治上的脆弱性是很容易出問題的。[14]2月4日，劉在為中央起草的一個批語中指出：糾正幹部的命令化和特殊化作風，也很不容易。為了使中央政策兌現，必須有堅強的領導，充分發動群眾，真正依靠貧僱農和下中農，經過幾次嚴肅的鬥爭，真正做到一切權力歸代表會議，才能辦到。[15]2月10日，劉將中央辦公廳一位工作人員回河北省深縣探家後寫的情況反映轉給河北省委，並給省委書記、省長劉子厚寫信說：「看來，下面還有一些幹部向群眾封鎖中央的政策，對生產不聞不問，並且還在進行違法亂紀的事情，在這些地區如不放手發動群眾，直接宣布政策，讓群眾大鳴大放，使群眾翻過身來，一切權力歸代表會議，那裏的情況是不會改變的。」[16]

由此结論，紮根串連，組織貧、下中農的核心隊伍是整風整社最根本的一條經驗，不管是三類隊，還是一、二類隊都必須如此。中南局的報告稱：「這可以説是繼土改、合作化以後的第三次『組織起來』。」[17]

這次整風整社，對徹底剎住人民公社化運動以來的「五風」錯誤，扭轉農村的困難形勢，起了積極作用。但由於認為出現了「地主階級復辟」，提出進行民主革命補課，強調這是一場尖鋭的階級鬥爭，實際是再來一次革命。這就造成對基層幹部打擊面過宽、過重。

上述偏向，下鄉調查的工作組和領導人都有所發覺。中共中央辦公廳秘書室的幹部就曾給中央寫了一個河南情況的反映。劉少奇看到這份材料，於1961年3月25日把它批給中南局第一書記陶鑄，中南局書記王任重，河南省委第一書記、省長吳芝圃。指出：「河南整風運動中對幹部的打擊面是很寬的。」他提出：要「在不損傷群眾積極性的條件下，把大多數犯錯誤的幹部挽救過來」。並且強調：「在整風中必須再三重申不得使用肉刑。」[18]1961年4月間，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長鄧子恢到福建閩西調查，在漳州與率領工作組先期到達的老戰友張鼎丞相會。張鼎丞向鄧談了龍岩縣委在「五風」嚴重的江山公社搞民主革命補課，把公社的各級幹部和老接頭戶〖戰爭年代與紅軍和共產黨地下組織聯係的接頭戶）劃成漏網地主、富農，或「反革命」、「壞分子」，批鬥抄家。弄得幹部都躺倒不幹，無人領導的情況。鄧子恢當即表示：哪有那麼多漏網的地主、富農？張鼎丞説他已提出不要這樣做了。[19]

3.管理體制的收權措施

關於加強集中領導，把在「大躍進」中下放得過多偏下的權力集中到中央、中央局和省、市、自治區的問題，在1960年12月開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就提了出來。12月31日，財政部黨組向中央作了《關於改進財政體制、加強財政管理的報告》[20]，指出目前在財政管理和財政體制方面，相當突出地存在着財政紀律鬆弛、財政管理偏鬆、资金使用分散和財權分散等現象。主要問題是，對專、縣和公社下放的權限多了一些，專、縣、公社和企業的財權過大。據此提出：國家財權應當基本上集中在中央、大區和省、市、自治區三級；國家財政預算，從中央到地方實行上下一本賬，堅持「全國一盤棋」；對各地區、各部門和單位的預算外资金，採取「纳（纳入預算）、減（減少數量）、管（加強管理）」的辦法進行整頓。

毛澤東對此表示認同。1961年1月3日，中央工作會議聽取李富春匯報1961年國民經濟計劃，談到搞建設要集中力量打殲擊戰時，毛説：這句話説了好幾遍了，就看靈不靈。要收回一些權力，把權力收到中央、中央局，省市區三級，下面收缩一下，這樣，就不會層層加碼了。1月15日，中央批轉了財政部黨組的報告，同意報告的基本精神。[21]

1961年1月20日，中央在下發關於農村整風整社紀要的同一天，下發了《關於調整管理體制的若干暫行規定》。進一步從經濟管理體制上解決集中統一的問題。主要內容是：

（1）經濟管理的大權集中到中央、中央局和省（市、自治區）委三級。最近兩三年內，更多的集中到中央和中央局。地區計劃，應在中央統一領導下，由中央局統一安排。

（2）1958年以來，各省（市、自治區）和中央各部下放給專、縣、公社和企業的人權、財權、商權和工權，放得不適當的，一律收回。

（3）中央各部直屬企業的行政管理、生產指揮、物资調度、幹部安排的權力，统歸中央主管各部。中央局、省（市、自治區）委需要調整時，應當取得中央主管部的同意。

（4）根據「统一領導、分級管理」的原則，凡屬需要在全國範面內組織平衡的重要物资，均由中央統一管理、统一分配；在計劃內應該調出的物资，各部門、各地方必須服從國家的统一調度。

（5）財權必須集中。各級的預算收支必須平衡，不許有赤字預算。切實整頓預算外资金的收支。

（6）货幣發行權歸中央。

（7）國家規定的勞動計劃，各部門、各地方不許突破。不足時，由勞動部門統一解決。計劃外增加人，必須報經中央批準。

（8）所有生產、基建、收購、財務、文教、勞動等各項工作，都必須執行全國一盤棋、上下一本賬的方針，不得層層加碼，都必須集中

力量，努力完成和超額完成國家計劃。[22]

根據這個文件精神，逐漸把企業管理、財稅、計劃編制、基建審批、商品收購、文教事業、勞動招工、物资調配等管理權限收歸中央及中央各部委。國防工業一律由國防工委直接領導，過去下放的國防工業企業一律收回。全國鐵路由鐵道部統一管理，鐵路運輸由鐵道部集中指揮。交通部先後收回了原下放地方管理的大連、秦皇岛、天津、煙台、青岛、連雲港、上海、黃浦、湛江等沿海港口，重慶、九江等十個長江幹線重點港口和天津航道局、上海建築工程局等六個工程局；冶金部、石油部、地質部也分別將一些企業和學校收回。各地的郵電局、地質局由各省、市、自治區領導為主改為以郵電部、地質部為主的中央與地方雙重領導。經過幾年的調整，原下放給地方管理的企業基本上全部收歸中央管理。[23]基本上結束了1958年把人、財、物大權層層下放造成的嚴重混亂局面，為調整國民經濟的八字方針的有效貫徹提供了保證。

[1] 張平化、劉建勳、楊尚奎、葉飛、江華、江渭清、黃岩、陶魯笳、黃火青、周林、閻紅彥未參加匯報會，12月31日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成員同與會人員在北京飯店眾餐，毛澤東特邀他們同桌，以便聽取他們的意見。《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頁1112。

[2] 《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頁1111。

[3] 毛澤東：〈對黨政幹部「三大紀律，八項注意（草案）」的批語〉（1961年1月9日）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九冊，頁417-418。

[4] 三大紀律：1、一切從實際出發，2、正確執行黨的政策，3、實行民主集中制；八項注意：1、同勞動同食堂，2、待人和氣，3、辦事公道，4、買賣公平，5、如實反映情況，6、提高政治水平，7、工作要同群眾商量，8、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

[5]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頁892。

[6] 1961年1月1日《人民日報》社論，以〈團結一致，依靠群眾，爭取世界和平和國內社會主義建設的新勝利〉為題。國際部分，主要是呼應1960年11月在莫斯科召開的八十一個共產黨和工人黨會議發表的《莫斯科聲明》，強調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團結，反對帝國主義。國內部分，在肯定「持續躍進」的同時，強調1960年是「同嚴重的自然災害進行鬥爭的一年」。提出，1961年在大力支援農業的同時，必須「適當地調整國民經濟各部門的比例關係」。只有農業生產的發展，使我國國民經濟得到更加鞏固的基礎，我們就可能更加順利地向前邁進。最後號召：「全國人民緊密地團結起來，爭取1961年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新勝利！」可見，這篇社論的基調是：團結起來，戰勝困難。而不再強撐着搞甚麼「大躍進」了。

[7] 〈全国一平二調的退賠情況和問題〉，《內部參考》，1961年4月27日。

[8] 李兆鈞：《歲月憶思錄》（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8），頁119。

[9] 中共中央辦公廳秘書室1960年12月17日整理的關于中央緊急指示下發後，收到各地四十多件來信的材料，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九冊，頁401。

[10] 《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十四冊，頁89-101。

[11] 《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十四冊，頁126-143。

[12]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劉少奇年譜（1898-1969）》，下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頁501。

[13] 《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十四冊，頁188。

[14] 《劉少奇年譜（1898-1969）》，下卷，頁501。

[15] 《劉少奇年譜（1898-1969）》，下卷，頁504。

[16] 《劉少奇年譜（1898-1969）》，下卷，頁506。

[17] 〈一個比較成功的經驗〉（1961年2月9日），載《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十四冊，頁193-194。

[18] 《劉少奇年譜（1898-1969》，下卷，頁510。

[19] 《鄧子恢傳》編輯委員會編：《鄧子恢傳》，（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頁540。

[20] 《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十四冊，頁48-54。

[21] 中共中央批轉財政部黨組〈關於改進財政體制、加強財政管理的報告〉（1961年1月5日），載《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十四冊，頁47。

[22] 〈中共中央關於調整管理體制的若干暫行規定〉，載《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十四冊，頁102-105。

[23] 到1965年，中央所屬企業事業單位增加到10533個，比下放前的1957年還多1200多個。這當中包括中央各部在「大躍進」時期和以後興建的企業。參見周太和主編：《當代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頁100。

三、草擬人民公社六十條

1.毛澤東高倡調查研究

「大興調查研究之風」，這是1961年1月13日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作的主旨講話。這個思想是在會議期間聽取各省對農村情況的匯報中逐漸形成的。毛感嘆說：

「現在有許多情況，就中央和省一級來說，還是不摸底。」「我希望同志們回去之後，要搞調查研究，把小事撇開，用一部分時間，帶幾個助手，去調查研究一兩個生產隊、一兩個公社。在城市要徹底調查一兩個工廠、一兩個城市人民公社。」「要是不做調查研究工作，只憑想像和估計辦事，我們的工作就沒有基礎。所以，請同志們回去後大興調查研究之風，一切從實際出發，沒有把握就不要下決心。」

接着，毛提出，要做到情況明，決心大，方法對。他說：

「提出今年搞個實事求是年，當然不是講我們過去根本一點也不實事求是。……但是建國以來，特別是最近幾年，我們對實際情況不大摸底了，大概是官做大了。我這個人就是官做大了，我從前在江西那樣的調查研究，現在就做得很少了。今年要做一點，這個會開完，我想去一個地方，做點調查研究工作。」[1]

這一席話，可以認為是毛澤東從1958年北戴河會議決定鋼鐵翻番，組織人民公社向共產主義過渡以來，首次意識到三年「大躍進」的災難，源於憑着革命热情和主觀意志決策。因而，要從根上解決問題，還得從調查研究做起。

在接着召開的中共八屆九中全會期間，一篇題名〈調查工作〉的文章，出現在毛澤東面前。這篇文章是1959年中國革命博物館建館，到各地收集文物，在福建龍岩地委收集到的這篇文章的石印本。1960年中央政策研究室從博物館借來。由田家英[2]送給了毛澤東。

〈調查工作〉，是當年為了反對紅軍中的教條主義而寫的。由於時隔久遠，早已丟失，多年來毛一直念念不忘。現在，失而復得，使他激動不已。這不僅是由於他自己珍愛的一篇文章。而且，現在正逢其時，為推動全黨大興調查研究之風提供了思想武器。毛澤東在印發這篇文章時寫道：

> 這是一篇老文章，是為了反對當時红軍中的教條主義思想而寫的。那時沒有用「教條主義」這個名稱，我們叫它做「本本主義」。寫作時間大約在1930年春季，已經三十年不見了。……看來還有些用處，印若干份供同志們參考。[3]

八屆九中全會後，毛澤東派出並親自指導三個調查小組下農村。1月20日，毛就組織調查組一事寫信給田家英，指示：調查組分別由陳伯達、胡喬木、田家英任組長，每組組員六人。以三天時間組成，每人發一份〈調查工作〉，討論一下。田去浙江，胡去湖南，陳去廣東。毛澤東要求，每個組調查一個最壞的生產隊，一個最好的生產隊。時間十天至十五天。「然後去廣東，三組同去，與我會合，向我作報告。」[4]陳伯達、胡喬木、田家英接到指示，雷厲風行。立即組成調查小組，共二十一人，每組七人。組員有鄧力群、許立群、王力、張超、梅行、王魯，楊波、胡績偉、逄先知、吳介民等。1月21日離京分赴廣東、湖南、浙江農村。

2.三大秘書匯報問題

毛澤東把陳、胡、田派出去後，1月26日晚，他自己也帶着急於了解農村真實情況的心情，乘火車離開北京，經天津、濟南、南京、上海、杭州、南昌、長沙，2月24日到達廣州。沿途聽取了河北、山東、江蘇、浙江、江西、湖南和廣東七省省委和田家英、胡喬木、陳伯達三個調查組的匯報。並且向各地大員作調查研究的動員工作。

對當年下鄉調查的情況，逄先知回憶，浙江調查組經與浙江省委商量，決定在嘉善縣（後同嘉興縣合併）選一個差的生產隊，在富陽縣選一個好的生產隊。逄被指派到嘉善那個差的生產隊——和合生產隊，是田家英重點抓的點。逄說：當時下去調查，只要態度端正，發現問題並不困難，實在是問題成堆，俯拾即是。但是要說容易，也並不那麼容易。關鍵在於能不能衝破思想束縛，有沒有提出問題的勇氣。經過反右傾運動，大家思想被束薄得緊緊的，真是不敢越雷池一步。就公共食堂來說，真實情況是食堂難乎為繼，應當解散。再如，造成農業大辐度減產，既不是天災，更不是民主革命不徹底、階級敵人復辟，完全是「五風」造成的。這在中央十二條緊急指示仍強調必須「堅持食堂」，整頓三類社首先要奪回領導權的時候，要向毛澤東反映此類真實情況，是要有相當勇氣的。[5]

毛到達杭州時，浙江調查組已經作了一個星期的調查。2月6日，田家英向毛澤東匯報時，主要反映了三個問題：第一，和合生產隊水稻畝產通常在400斤以上，1960年減產至291斤，主要是由「五風」造成的；第二，生產隊規模過大，這個生產隊共轄十一個生產小隊；第三，社員對公共食堂普遍不滿，不愿在食堂吃飯，食堂實際上成了造飯工廠，不做菜，社員將飯打回去，還得再热一次。

在田匯報以後，毛澤東聽取浙江省委負責人江華、霍士廉、林乎加（參加了田家英的調查組）、李豐平匯報整風整社和召開省委擴大會議

的情況。當談到社隊規模時，毛説，縣、社規模太大，大了搞不好，管不過來。田家英調查的那個隊就管十一個小隊，有幾十里宽。这裏的農民不知道那裏的農民搞些甚麼事情，這怎麼行呢？又説，在一個基本核算單位裏，有富的、中的、貧的，這就有問題，群眾就不滿意。我看把小隊（過去的初級社）改成生產隊，把生產隊（過去的高级社）改成大隊。原來的小隊變成生產單位和消费單位。他要省委研究一下，基本核算單位，放在生產小隊好，還是放在生產隊好？

這是自人民公社出現就強調「一大二公」是其根本特點以來，首次提出要以原初級社為基本核算單位的意見。

關於公共食堂，毛説：食堂劃小為好，幾戶人家辦一個，大了恐怕對生產不利。要多樣化，有長期食堂，有農忙食堂，也有自己燒飯。辦食堂一定要適合群眾的要求。在这裏，毛似乎鬆了一點口，有人可以不吃食堂。

2月8日，毛澤東再次與浙江省委負责人談話，問及「五風」、退賠、社隊規模等問題。毛指出：落後的地方要找落後的原因，是天災，是人禍？嘉興魏塘公社和合生產隊產量只有291斤，主要是「五風」瞎指揮。當林乎加説到，瞎指揮有些是從省裏下去的。毛説：

> 也有從北京下去的。1959年10月開了一次農業書記會議，搞了一套文件，沒有批準就發了。我對譚震林同志説，三年不要開農業書記會議。春耕生產指示，一年一個，形式主義，谁人去看，農民要餓肚子，他不懂得要耕種？[6]

在談到自留地，幾年來幾收幾放，收說收的道理，放説放的道理時，毛説：「兩個道理，歸根到底，只能是一個道理，還是要給農民自留地。」又説：「現在反覆不下去了，再搞下去，就是你把所説的餓、病、逃、荒、死。」接着又談到社隊規模，毛説：「基本原則是要增產，做到不餓、不病、不逃、不荒、不死。當然有正常的死，人也難免要生點病，主要的問題是餓不餓的問題。」

毛還説：要抓緊幹部的教育，使他們懂得甚麼是共產主義，甚麼是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集體所有制，這都是社會主義性質的。自留地是個人所有制的尾巴，並不危險。不懂得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這些道理，就會死人的。

就在這次匯報中，田家英向毛澤東提出搞一個人民公社工作條例的建議，被毛澤東採纳。

通過浙江調查，毛澤東重點考慮了兩個問題：一是生產隊規模要劃小，生產小隊的權力要擴大；二是食堂要多樣化，有的人也可以不參加食堂。

2月11日，毛澤東在長沙附近鐵路支線的專列上，聽取湖南調查組胡喬木的匯報，在座的有湖南省委負責人張平化、胡繼宗、周禮。毛也

主要是了解公社體制和食堂兩個問題。胡喬木調查的是一個好的生產隊——長沙縣的天華大隊。胡喬木說：「開始提的是以鄉為單位，後來不斷加碼，撤區併鄉，小鄉併大鄉，幾鄉一社。實際上，還是小隊的勞動為基礎，大隊作經濟核算，加以聯合，公社恐怕只是一個聯絡組合的形式。」毛又問，基本核算單位放在哪一級好，是隊為基礎好，還是小隊為基礎好？胡繼宗說：「高級社時是五萬個社，公社化後劃成一萬六千個大隊。」毛說：「你們還是大體上恢復到高級社的範圍，五萬個。」胡喬木：「如果這樣，對群眾才說得上民主，大隊幹部才說得上領導管理，不然經營不了。」毛：「而且勢必實行平均主義，吃飯平均，工分平均。」胡喬木：「我去了一個好的生產隊，在長沙縣，叫天華大隊，年年增產，一步一步地走上坡，它有一個特點，就是始終保持高級社的規模。公社的規模要縮小，它的權力也要縮小，權力跟責任都要縮小，這樣，事情就好辦了。過去幾年湘潭的情況比較嚴重，我們有個組在湘潭，到一個壞的生產隊，它的特點是從1957年下半年起，一年比一年壞，根本就是破壞。」毛說：「我看興起來也快。恢復原狀，就是過去的高級社，由若干高級社組成一個公社。」

第二天，毛澤東繼續與胡喬木、張平化談公社體制，張平化說，省委對體制調整決心下得不夠。春耕之前，先解決基本核算單位劃小的問題。毛提出：「基本核算單位究竟是小隊，還是隊。所謂隊為基礎，哪個是基礎？」胡喬木：「可以考慮把現在的公社變成區聯社，恢復區委，大隊變成公社。」毛說：「那麼小隊也成生產隊？」胡喬木：「叫小隊也可以，叫生產隊也可以」。毛糾正說：「不要叫小隊，叫生產隊。」

關於食堂，胡喬木說：「長沙縣的情況很特別，非常明瞭，食堂根本不可能散了，它把好多人家連到了一起去了，一個食堂就是一個屋場，所謂屋場就是一個小隊。」毛問：「為甚麼弄成這個樣子？」胡答：「這是因為拆房子拆得多，搬房子搬得多，已經搞到這一步，再返回去就沒有必要了……。」毛問：「這是併了的，沒有併了的呢？要走那麼遠的路去吃飯，誰人來吃呀？」張平化：「有這個問題。這次我專門回家看了一趟，在大山裏頭。他們那個生產隊原來有五個食堂，以後併成三個。這一次整社，群眾要求分成五個，還有個別較遠的單家獨戶，允許他單獨開伙。」胡喬木談天華大隊的情況說：「我在一個小隊裏面，住了五六天的樣子，他們那個大隊食堂搞得好，食堂都有桌子，一桌一桌地坐，我們在那裏和大夥一起吃飯。吃飯還是有保證，糧食、菜、油、鹽這些都有保證，所以社員對這一點還是滿意的。」毛反問說：「既然社、隊有一、二、三類，難道食堂就沒有三類的？」張答：「去年我們排了一下，辦得比較好的佔百分之十；辦得差一點的佔百分之二十。總的來說，垮食堂還沒有成風。」

2月12日，毛澤東離開長沙前往廣州。2月15日是陰曆正月初一，毛要在那裏過春節。

廣東調查組得知毛澤東一路的談話內容後，表示同意毛提出的把生產小隊一律改成生產隊，生產隊改成生產大隊的意見。陳伯達在2月19日報送毛澤東的《廣東農村人民公社幾個生產隊調查紀要》中說：

「我們同意主席的意見，把現在所稱的『生產小隊』，一律改成生產隊。現在的基本核算單位，有的地方叫做生產大隊，有的地方叫做生產隊，有的地方叫做管理區，以後一律改稱生產大隊。

「現在有的生產大隊把富村和窮村勉強地合在一起，作為一個基本核算單位，原來收入較多的社員意見很多，可以根據不同的經濟條件、自然條件和群眾意見，劃分為不同的基本核算單位。

「公社各級的關係，在解決了自上而下的颳『共產風』問題以後，似乎應當注意更適當地解決隊與隊之間、社員與社員之間在分配問題上的某些平均主義。」

廣東調查組的意見，引起毛澤東的高度重視，他立即抓住了「兩個平均主義」的問題，作為進一步解決人民公社問題的突破口。

春節一過，毛澤東即通知三個調查組組長各帶一名助手來廣州會合。2月25日，毛召集陶鑄、陳伯達、胡喬木、廖魯言、趙紫陽、田家英等開會，討論起草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問題。毛指定，工作條例的起草工作，由陶鑄掛帥，陳伯達為副帥，廖魯言、田家英執筆。要求3月10日寫出初稿。同時決定在廣州召開中央工作會議，討論人民公社的體制問題。

3.《農業六十條》的草擬

3月5日，毛澤東在廣州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出席會議的有：周恩來、朱德、林彪、鄧小平、彭真、陳伯達、胡喬木、陶鑄。周恩來匯報了工業生產和市場供應等情況，毛澤東著重談人民公社體制問題。會議開始，毛回顧了鄭州會議以來的這段歷史，他說：

> 在廬山會議之前，我們對情況的了解還是比較清楚的，但在廬山會議之後就不大清楚了。因為廬山會議之後一反右，有人講真實話，講困難，講存在的問題，講客觀實際情況等等，都被認為是右的東西。结果造成一種空氣，不敢講真實情況了。相反就產生了另外一種情緒，不講實際了，例如河南本來糧食產量只有二百四十億斤，他們說有四百多億斤，這都是反右反出來的。右是要反的，也不得不反，不反，對我們工作就不利。廬山會議是要反右的，但是接着就在群眾中反右，這就壞了。……帶來一個高估產、高徵購、高分配。這個教訓值得我們吸取，這件事也教育了我們，反「左」中間插了一個反右，在群眾中間一反，结果

> 就反出一個浮誇風。廬山會議反右這股風把我們原來的反「左」割斷了。[7]

這段話猶如第一次鄭州會議以後，毛澤東意識到北戴河會議以來頭腦發熱，提出要壓縮空氣的同時，一再強調批反冒進是正確的、必要的一樣。這時，毛同樣意識到廬山會議以後，從上到下反右傾，是導致「五風」再起的禍根，但他不能承認批彭德懷的「右傾機會主義」是批錯了。王若水在他所著的《新發現的毛澤東》中講了這樣一個故事：

> 在「文革」後期，林彪事件發生後，毛澤東雖然意識到，「文革」是搞糟了，但是他不願意承認。……在審訊「四人幫』之後，胡耀邦講過這樣一件事：毛澤東曾對毛遠新談到可能有很多人不贊成「文化大革命」，當時毛澤東說：我是不下「罪己詔」的。還說，要硬着頭皮頂住。……
>
> 封建時代的皇帝都可以向人民認錯，但毛澤東不能。[8]

這就是毛澤東的性格。儘管如此，毛澤東承認在群眾中間反右，「這就壞了」。這在當時，對解除大家的思想顧慮還是有積極作用的。

接着，周恩來匯報鋼、煤的生產情況和市場供應問題。就在周匯報過程中，毛又談起了公社體制問題。針對會上有人擔心社隊規模劃小，對各方面造成負面影響。毛澤東強調說，公社規模要劃小。這個原則是肯定了的，今年不劃小，明年得劃小，明年不劃小，後年一定得劃小，橫直是要劃小就是了。

根據毛澤東的意見，會議決定分南、北兩片討論有關人民公社工作條例和農村問題。3月10日，毛澤東主持，由中南、華東，西南三個大區的中央局書記和各省、市、自治區書記參加的「三南」會議在廣州舉行；3月11日，由華北、東北、西北三大區及其所屬省、市、自治區的書記參加的「三北」會議，由劉少奇在北京主持開會。

3月13日上午8時，毛澤東給劉少奇、周恩來、陳雲、鄧小平、彭真並「三北」會議各同志寫了一封信。向他們提出會議應討論「兩個平均主義」的問題。毛說：「大隊內部生產隊與生產隊之間的平均主義問題，生產隊（過去小隊）內部人與人之間的平均主義問題，是兩個極端嚴重的大問題。」毛批評說：「我看你們對於上述兩個平均主義問題，至今還是不甚了了。……省、地、縣、社的第一書記大都也是如此，總之是不甚了了，一知半解。其原因是忙於事務工作，不作親身的典型調查，滿足於在會議上聽地、縣兩級的報告，滿足於看地、縣的書面報告，或者滿足於走馬看花的調查。這些毛病，中央同志一般也是同樣犯了的。我希望同志們從此改正。我自己的毛病當然要堅決改正。」毛還提出，對他那篇〈關於調查工作〉的文章也研究一下，「那裏指出的問題是作系統的親自出馬的調查，而不是老爺式的調查。」[9]為開好「三北」會議，毛在信中說，即派陶鑄去京作報告並提出建議。

在當天上午的「三南」會議上，毛澤東反覆講了要搞清兩個平均主義和深入調查研究的問題，然後談到食堂問題。他說：有些食堂難以為繼。廣東有個大隊總支會記說，食堂有四大壞處：一是破壞山林，二是浪費勞力，三是沒有肉吃（家庭不能養猪），四是不利生產。這些問題不解決，食堂非散夥不可。沒有柴燒把橋都拆了，還扒房子、砍樹，這樣的食堂是反社會主義的。他再次提出食堂要分幾種形式，大部分人吃農忙食堂；北方冬季可以讓大家回家吃飯，以解決取暖問題。

在北京的中央領導人得知毛澤東將派陶鑄來京傳達他的指示後，鄧小平和周恩來提出，鑑於兩地開會，口徑不一，北京會議不能即時得到毛澤東的指示，建議南北合開為好。毛澤東對此表示同意。14日，參加「三北」會議的劉少奇、周恩來、陳雲、鄧小平四位中央常委和與會人員飛抵廣州。

3月15日，兩會合一，重新編組。毛澤東提出會議討論：公社體制、條例和糧食三大問題。周恩來補充一個商業和外貿問題。

各組討論中，對社隊規模劃小，意見基本一致。如：遼寧省委第一書記黃火青說：「大隊幹部跑遍小隊，得一年時間。將社隊劃小，是群眾的迫切要求。」華東各省的負責人說，公社化後，社隊這麼大，社員「看不到邊，摸不到底」。並具體提出，生產隊不宜過大，一般二十戶左右；生產大隊一般維持原來高級社的規模；公社的規模以相當於原來的鄉為宜。生產管理權交還給生產隊和小隊。[10]山東省委書記處書記譚啟龍認為，應堅決把生產權下放到小隊和農民，讓他們對生產負責，不能再瞎指揮了。[11]江蘇省委第一書記江渭清提出，要把高級社行之有效的一套政策（如按勞分配、多勞多得、自留地、家庭副業等）、制度和辦法在條例中固定下來。湖南省委第一書記張平化說：農民反映，社隊規模大了「不是共同富裕，而是共同遭殃。」

但對基本核算單位是放在大隊，還是放在小隊，則意見不盡一致。東北局第一書記宋任窮帶來東北組在「三北」會議期间討論的意見是，主張大體上一鄉一社，大隊相當於原來的高級社，生產隊相當於初級社。但同意以大隊為基本核算單位。[12]

關於分配問題，是完全按勞分配，還是按供給、工資三七開，主張後一種意見的明顯佔多數。

陳伯達報送的廣東省興縣里洞公社蒙坑大隊的座談記錄明確主張完全按勞分配，文中說：「最近他們按原來高級社的規模，分為兩個大隊，解決了窮村同富村的矛盾，兩邊對生產、積肥都積極了，對耕牛、農具也都愛惜了」關於分配，認為過去供給加工资搞三七開，「事實上不勞動者也可以得食」，提出「全部實行按勞分配』。關於食堂，「主張糧食分到戶，農忙辦食堂」。糧食徵購要定下來，「至少三年不變，能五年不變就更好]。[13]

陳伯達送的另外兩份關於分配問題的調查材料，則是兩種不同意見：

河北省霸縣堂二里的農民主張按勞分配。一位貧農説：「別看現在出勤不少，但不出活」。「主要因為不按勞分配。幹活沒有勁」。另一個貧農小組的代表説：「按勞分配就是好，多勞可以多得，社員幹活就出力了。實行按勞分配，也不能叫困難戶過不去，大夥也要幫助他們，勞力多的也不會幹活不積極。因為那種幫助是明的幫助，他們要領這份情，供給制是暗的幫助，好像是該着替他們幹的。」[14]

廣東省高鶴縣環城公社雲益大隊的農民認為實行三七開好。一位貧農代表説，「實行三七開，不光勞力多的擁護，就是我這勞力少的也擁護。因為不實行三七開，工分不值錢，勞力多的就不好好生產。生產搞不好，供給部分再大也得不到甚麼東西」。另一貧農説：「口糧按人發，有些社員就不出工，實行了工分帶糧，出勤的立即增多了。」高鶴縣委的幹部説：「我們作過調查，有百分之八十的人要求供給與工资三七開，並實行工分帯糧。」[15]

四川省委第一書記李井泉帶來的南充市火花公社第三管理區提供羣眾討論的結果，佔81.29%的人贊成保留部分供給制。[16]

宋任窮反映東北組的意見，也主張保留部分供給制。他們的意見是：實行多勞多吃、多勞多得，適當縮小供給部分，增加工資部分。食堂要積極辦好，自願參加，適當劃小。[17]

以上表明，雖然大家都同意把生產隊劃小，即相當原來初級社的規模，但並不主張把生產隊（原來的小隊）作為基本核算單位；分配方面，主張多勞多得，但仍保留部分供給制；食堂問題，方式可以靈活，食堂仍要堅持。

公社工作條例於3月16日寫出第二稿，21日改出第三稿。22日，會議通過《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條例共分六十條。故俗稱農業《六十條》。

《六十條》草案主要解決了兩個問題：一是劃小社隊規模。一分為二、為三，甚至更多（到1962年，平均每社9.4個大隊，每大隊7.9個生產隊，每個生產隊平均24.9戶。比原來縮小了幾倍）。二是把有關自留地、家庭副業、開放集市貿易等方面的政策，明確載入條例，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和緩解了農民怕政策多變的恐懼心理。

但基本核算單位、供給制、公共食堂三個問題沒有解決。《六十條》草案規定「三級所有、隊為基礎」，還是以「大隊為基礎」。分配問題，還是堅持供給與工資相結合的制度，供給占三，工資占七；關於食堂，規定除特殊情況外，「都要辦常年的或農忙的公共食堂」。這説明在相當一部分人的頭腦裏，這些所謂「共產主義因素」、「社會主義陣地」還是不能退讓。這大概就是3月19日毛澤東與起草班子的陳伯

達、胡喬木、廖魯言、田家英談話時，向他們提出：「這個條例怎麼樣？沒有危險嗎？」[18]的原因所在。擔心退得太多，會引起危險。

在通過《六十條》草案的當天，中共中央向全國農村黨支部和人民公社全社社員發出〈關於討論《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給全黨同志的信〉，[19]要求各級黨委在原原本本將條例草案向全體社員傳達的基礎上，認真聽取他們對草案的修改意見。

4.再次疾呼調查研究

3月23日，廣州會議結束的這一天，毛澤東在會上講話，突然提到鄧子恢的名字。毛說：「鄧子恢同志那個時候頑強得很（指農業合作化問題上的爭論——引者注）。鄧子恢同志，為了說服你，我跟你談過多次話。現在我跟你統一了。我跟你沒有矛盾了。」

毛轉向大家說：「去年他（指鄧子恢——引者注）在山西、石家莊、江蘇南部作了一次調查，作得很好，他的觀點很正確。[20]農村工作後頭犯的錯誤，是譚震林同志他們有份，他沒有份的。你們看不起鄧子恢同志那是不行的，人家現在正確了。」

毛澤東講著講著，忽然兩眼向會場橫掃了一遍，未見到鄧子恢，就問：「鄧老來了沒有？」

這一天的會議，鄧子恢到得稍遲一些，就坐在會場的後邊。大家不約而同用眼找鄧子恢。有的看到鄧子恢驚奇的樣子竟笑了起來。鄧子恢耳朵有些背，沒有聽到毛澤東的詢問，就問坐在身旁的葉劍英：「他們笑甚麼？」葉劍英說，「笑你哩，毛主席表揚你了！」

毛接着說「農村工作部找誰呵，還是鄧老，他有很多意見是正確的。他同我談過，我介紹他去跟總理談。總理讓他起草個文件，叫做人民公社的章程，首先創議的是總理。」

「是他給我說的。」周恩來插話說。

「啊！首先創議的是鄧老，然後總理支持。」[21]

毛澤東讚揚鄧子恢，也是借題發揮，敦促與會者都去作調查研究。廣州會議期間，毛澤東除了具體指導《農業六十條》的討論外，逢會必講調查研究。對這個問題，劉少奇、周恩來在會議期間，都有明確表態。

劉少奇3月19日在會上說，「從1958年以來，在執行三面紅旗的過程中，犯了不少的大大小小的錯誤，受了相當大的損失。……這些損失，有些是不可避免的，有些是可以避免的。如果作好了調查研究，……不至於陷於現在這樣的被動。」他說：「造成目前的被動局面，中央已把責任擔當起來，各省也有自己的責任。下面的報告和幹部的話，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有的根本不可信。如小麥放衛星，報上登出

來，高興了幾天，就不相信了。有些反面意見，吞吞吐吐，也不完全可靠。我們看省委的報告，省委又是聽下面的，省委的報告也是不能全信的。」他最後表示「我本人也要下決心搞調查，搞一個工作組，這比看報紙、聽彙報要好得多。」[22]

同一天，周恩來也在小組會上說：

> 毛澤東同志最近幾次講到大興調查研究之風。講究實事求是；又說，右要反，「左」也要反，有「左」就反「左」。有右就反右。是好是壞。要從客觀存在出發。不能從主觀想像出發，進行調查研究。必須實事求是。我們下去調查，必須對事物進行分析、綜合和比較。……我們下去調查要堅守毛澤東同志的三條原則：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集中起來，堅持下去；堅持真理，修正錯誤。……目前的毛病，還是我們發號施令太多，走群眾路線大少。[23]

23日的會議，最後通過了經毛澤東修改審定的《中共中央關於認真進行調查工作問題給各中央局，各省、市、區黨委的一封信》，[24]要求縣級以上黨委的領導人員，首先是第一書記，把深入基層、親身進行有系統的典型調查，一年幾次，當作領導工作的首要任務，並且定出制度，造成風氣。強調要使一切從實際出發，不調查沒有發言權，「成為全黨幹部的思想和行動的首要準則」。指出：「在調查的時候，不要怕聽言之有物的不同意見，更不要怕實際檢驗推翻了已經作出的判斷和決定。」這封信的下達，對各級幹部下到基層進行調查研究，在基層聽取對《六十條》草案的不同意見，起到了積極作用。

5.老百姓的強烈要求

3月廣州工作會議後，從中央到地方，各級領導人紛紛走出機關，深入農村，深入農戶作調查。

這時，中央常委除林彪外全部轉到農村調查。劉少奇在湖南、周恩來在河北、朱德去四川老家、鄧小平與彭真在京郊。6月至7月，陳雲也回到上海青莆縣老家。除了毛澤東派出的三個中央調查組返回原地以外，中央派出的調查組還有：由公安部長謝富治率領的邯鄲調查組；由中央第一書記胡耀邦帶隊的遼寧海城調查組；由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帶隊的河北徐水、安國調查組；由國務院農業機械部部長陳正人帶隊的四川簡陽調查組。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區都派出了自己的調查組。許多第一書記響應號召，親自下鄉。這是一次絕無僅有的調查運動！

毛澤東希望通過這次調查，徹底摸清農村情況，5月再集中到北京開會，修改《農業六十條》。4月25日，毛澤東給留守北京的鄧小平寫

信，要他起草一個召開中央工作會議的通知。「此次會議的任務是繼續廣州會議尚未完成的工作收集農民和幹部的意見，修改工作條例六十條和繼續整『五風』，不討論工業和城市整風問題。」[25]通知發出後，幾個省的領導提議推遲幾天開會，毛澤東很贊成。5月4日，他又親自起草了一個推遲開會的通知，「以便多做幾天調查研究工作，向群眾尋求真理」。[26]

《六十條》草案下發討論，各級幹部到農村調查，直接聽取群眾意見，很快得到了反饋。

山東省反映上來的關於公社體制的意見是：

> 目前的生產隊。從形式上看權力很大，生產資料的所有權以及計劃、包產、分配等權力都在生產隊的手裏。但實際上勞力、耕畜、農具等生產資料是由生產小隊管理使用，各項生產任務是由小隊承擔，生產好壞和收入多少也都取決於生產小隊。所以生產小隊才是真正的「實力派」。但是小隊又沒有生產隊那麼多的權力，特別是沒有分配權，這是目前生產隊內部所存在的一個普遍的突出的矛盾。經過座談討論，大家認為必須實行四權統一，即生產資料所有權與使用權的統一，生產權和分配權的統一。根據四權統一的原則，核算單位應當就是直接的生產單位。[27]

4月14日，胡喬木向毛澤東報送了關於解決公社食堂等問題的四個調查材料。[28]內稱：

在韶山公社幹部和社員討論《農業六十條》的時候，我們遇到的最突出的問題就是公共食堂問題。從群眾的反映看來，大多數食堂目前實際上已經成了發展生產的障礙，成了黨群關係中的一個疙瘩。……在這種情況下，大多數食堂勢在必散，而且散了並不是甚麼損失，反而對整個工作有利。……韶山大隊旺沖生產隊的一個堅決要散的食堂。經過五個晚上的討論，這個食堂在分散時遇到的種種問題，如房屋、菜地、柴山、養豬、困難戶等，都一一得到了圓滿的解決。這個經驗證明，群眾要求散的食堂不但應該散，而且散得愈快愈好。

5月1日，陳正人從四川簡陽送來一份老貧農邱開銀與調查組的談話記錄：

邱開銀，四川省簡陽縣平泉人民公社社員，五十八歲，貧農成份。聽說工作組在宣講《六十條》，主動跑來反映情況。「我聽娃兒說北京來的工作組帶來了毛主席的《六十條》，我兩夜都睡不着。心頭有些話想向你們說。」

「毛主席一心為人民，想叫窮人過好日子，過去的《十二條》就夠好了，這次又來了個《六十條》比過去更好。」「三年來人民公社辦得好，就是步子跨得大了點。步子不穩，要栽筋斗，一下子把窮富扯平，『相贏』了懶人。……再要平均主義，就硬要餓死人。」「我贊成發展

社員養豬，有豬才有糞，有糞才能有好莊稼。自古以來就是『做官憑印，種莊稼靠糞』嘛。」

邱老漢建議：「生產隊要有一定的權利，這一條規定得好，古代就是『半由天子半由臣』嘛。啥子事都由上邊硬卡，一定辦不好。搞密植，拿尺子比，密得連腳都放不進，怎麼施肥？……」

「按勞分配，多勞多得就是好。『人無利誰肯起早』？」

「腦袋那麼小，帽子那麼大，沒有產那麼多糧食，說那麼多，怎麼不挨餓？」

邱老漢說自己是「老牛筋」，不怕劃右傾，不怕打鞭子。「希望把我的意見反映給毛主席，看看對不對？」

5月6日，毛澤東對陳正人的來信及這個材料，倍加讚賞，表示「很高興」，親自給西南局第一書記李井泉和陳正人寫了一封回信，再次督促各地大員下去作調查。毛在信中問李井泉：「你為甚麼不給我寫信呢？我渴望你的信。你去調查了沒有？」毛說：「我在这裏還有一個要求，要求各中央局，各省、市、區黨委第一書記同志，請你們在這半個月內，下苦功去農村認真做一回調查研究工作，並和我隨時通信。信隨便寫，不拘形跡。這半個月希望得到你們一封信。如果你們發善心，給我寫信，我準給你們寫回信。」[29]

5月8日，胡喬木再次致信毛澤東，向毛報告說：「食堂問題。韶山公社食堂已由原有的一百一十二個減為六個，其中五個不久以後都將不辦……。對於在短短的三天時間內基本上解決全公社的食堂問題，群眾反映的熱烈程度難以想像，有的甚至說這是『第二次解放』。」[30]他還報告：湖南省委對解決食堂問題決心很大，預計最近即可在全省範圍內解決。

胡喬木還提出了恢復農村供銷合作社、恢復手工業生產合作社、解散城市公共食堂和城市人民公社等建議。

期間，毛澤東還收到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朱德等中央常委以及各地調查組的報告，幾乎眾口一詞：百姓強烈要求，解散食堂，取消供給制。張平化說：農民「聽到食堂可以不辦，認為是『松了綁』」。[31]雲南省委第一書記閻紅彥說：「公共食堂問題。群眾反映很強烈。……省委考慮還是根據群眾自願，不能有任何勉強，群眾真正要辦的就辦，群眾真正不願辦的就不辦。……多數地區群眾都不主張實行部分供給制。」[32]謝富治說：群眾說「食堂好比緊身襖，穿在身上怎麼也不自在」。胡耀邦說：「青壯年、婦女、老年人、基層幹部，沒有一個說食堂好話的。」公共食堂和供給制，當年被稱為的「共產主義因素」，在實踐中由群眾給予了否定的回答。

[1] 轉引自《毛澤東傳（1949-976）》下冊，頁1116-1117。

[2] 田家英，毛澤東的政治秘書，兼中央政治研究室的副主任。關於田家英和毛澤東的關係，逄先知回憶說，1959年廬山會議上，田家英與幾個「秀才」討論毛澤東、同情彭德懷，差

點被打入「另冊」。後來，「他向毛澤東當面作了檢討，得到毛的諒解。毛澤東對他説：『照樣做你的秘書工作。』」保他過了關。「那時，他確實感到，毛澤東已離開了他曾經全力提倡和實行的實事求是的原則，頭腦已經不那麼清醒了，聽不得不同意見的情緒也愈來愈明顯。田家英還多次向我（註：即逄先知）流露他在會議後期的心情，感到已無回天之力了！」「會議之後，毛澤東特地讓田家英參加他所領導的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第三版讀審小組，……這表明，毛澤東對田家英仍是信任的。但是毋庸諱言，他們之間再政治上已經開始出現裂痕。」董邊、鐔德山、曾自編：《毛澤東和他的秘書田家英》，增訂本（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頁62。

[3] 毛澤東：〈對《調查工作》一文的説明和批語〉（1961年3月11日），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九冊，頁438。

[4] 毛澤東：〈關於組織三個組下去調查研究給田家英的信〉（1961年1月20日），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九冊，頁421。

[5]《毛澤東和他的秘書田家英》，頁69-70。

[6]《毛澤東傳（1949-976）》下冊，頁1124。

[7]《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頁1134-1135。

[8] 王若水：《新發現的毛澤東——僕人眼中的偉人）》，上冊（香港：明報出版社，2003），頁31。

[9] 毛澤東：〈關於認真調查公社內部兩個平均主義問題的一封信〉（1961年3月13日），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九冊，頁440-441。

[10] 〈華東幾個通知關於當前農村人民公社需要解決的幾個問題的意見〉，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九冊，頁449。

[11] 1961年3月13日編印的南三區會議情況簡報第三號，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九冊，頁447。

[12] 宋任窮報送的〈關於東北地區農村人民公社和農業生產的若干問題〉，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九冊，頁454。

[13] 陳伯達1961年3月15日報送的一個座談會記錄，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九冊，頁443-444。

[14] 陳伯達1961年3月22日報送的關於農村分配問題的調查材料，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九冊，頁456。

[15] 陳伯達1961年3月22日報送的關於農村分配問題的調查材料，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九冊，頁456-457。

[16] 李井泉1961年3月17日報送的〈群眾擁護哪一種分配方案？——四川省南充市火花公社一九六〇年決算分配的經驗〉，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九冊，頁452。

[17] 宋任窮報送的《關於東北地區農村人民公社和農業生產的若干問題》，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九冊，頁455。

[18] 毛澤東同陳伯達等談話的傳達記錄（1961年3月19日），載《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頁1143。

[19] 〈中共中央關於討論《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給全黨同志的信〉，載《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十四冊，頁221-224。

[20] 1960年9、10月間鄧子恢受劉少奇的委託，先後到山西汾陽縣，河北石家莊市郊、江蘇無錫縣的三個農村人民公社進行調查，向中央寫了《山西、河北兩個人民公社三個基本核算單位的調查》報告。經過無錫調查，鄧子恢認為，農村出現的問題，既與某些具體規定不切合實際有關，也與某些規定朝令夕改有關，他認為應該搞一個公社社章。回北京以後，鄧子恢當面向毛澤東、周恩來彙報了三省農村調查的情況，並提議搞一個《農村人民公社內務條例》，得到周恩來的支持。1961年1月23日，《條例》由中央農村工作部報送中央。《條例》分十四章六十六條，著眼於解決公社內部的經營管理問題，特別是公社內部生產大隊之間貧富拉平的平均主義問題。這個《條例》後來成為毛澤東主持制定《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的重要參考。

[21]《鄧子恢傳》，頁537。

[22] 劉少奇：《調查研究是做好工作的根本方法》（1961年3月19日），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共中央黨校編：《劉少奇論黨的建設》（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頁685、686、688。

[23] 周恩來：《調查研究，實事求是》（1961年3月19日），《周恩來選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頁313-314。

[24]《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十四冊，225-227。

[25] 毛澤東：《關於起草召開中央工作會議的通知給鄧小平的信》（1961年4月25日），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九冊，475。

[26] 毛澤東：《為推遲召開中央工作會議起草的通知和批語》（1961年5月4日），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九冊，頁480。

[27]　山東省召開公社體制問題座談會的情況材料，中共中央辦公廳1961年3月24日編印的《情況簡報》第113期，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九冊，頁461。

[28]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九冊，頁468-469。

[29] 毛澤東《關於調查研究工作給李井泉、陳正人的信》（1961年5月6日），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九冊，頁484。

[30] 胡喬木1961年5月8日給毛澤東的信，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九冊，頁489。

[31] 張平化1961年5月13日給毛澤東的信，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九冊，頁495。

[32] 閻紅彥1961年5月9日給毛澤東的信，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九冊，頁502。

四、常委下鄉體察民願

這次中共中央眾常委同時下鄉，深入百姓，體察民情，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以後的頭一次。此前，領導人外出視察，主要是聽各級幹部的彙報，這次則是面對群眾。當他們直接面對面黃肌瘦的鄉親父老，看到農村的破敗景象和百姓一貧如洗的生活，感到震驚和愧疚，對於百姓要求解散公共食堂的願望產生了強烈共鳴，對「大躍進」的錯誤及其帶來的後果有深切的感受。這可能是促使他們與毛澤東的理想主義拉開距離，傾向於採取現實主義政策的重要認識來源。

1.睡在養豬場的劉主席

劉少奇在3月廣州會議之後，回到湖南老家，作農村調查。

搞「大躍進」、向共產主義過渡，劉少奇也說過許多頭腦發熱的話。廬山會議後期，劉少奇堅決維護了毛澤東，批判彭德懷。然而，從1960年上半年起，人民的生活愈來愈困難，糧食緊缺，副食品緊缺，日用品緊缺。不僅在農村，而且在部分城市，也開始出現浮腫病，這使主持中央一線工作的劉少奇感到問題的嚴重性。但對是否取消供給制等問題，也還缺乏認識。直到1961年3月15日，在討論《農業六十條》草案時，劉在會上說：「對『五保戶』實行部分供給制，實際上是社會保險，農民是贊成的。但其餘的統統要按勞分配，多勞多得，多勞多吃。」由於多數人主張保留「部分供給制」，毛澤東沒有表態，劉少奇也未提出異議。應該說，包括劉少奇在內，這時對農村的真實情況，對農民的心願也還是「不甚了了」。

劉少奇深知，在這幾年，即使親自下去搞調查，也難得瞭解到真實情況，聽到群眾的呼聲。因此，他決定這次回自己的家鄉——甯鄉、長沙一帶作調查地點，他相信在那裏能聽到真話。他想摸清三個問題：一是瞭解實行的政策是否正確，如糧食政策、供給制、公共食堂等等；二是已調整的政策夠不夠；三是根據發現的新問題，考慮新政策。

離廣州前，劉約見中南局第一書記陶鑄、湖南省委第一書記張平化談話，說這次去湖南鄉下，我不住招待所，採取過去老蘇區的辦法，直接到老鄉家，睡門板、鋪禾草，不擾民，又可深入群眾。人要少，一切輕裝簡行，想住就住，想走就走，一定要以普通勞動者的身份出現。

4月2日下午，劉少奇坐上湖南省委配的一輛吉普車，與夫人王光美、秘書吳振英等幾個工作人員離開長沙，前往寧鄉。車行過王家灣，路見一處掛著「寧鄉縣東湖塘人民公社萬頭豬場」牌子的院落，劉少奇

下車察看，但見不到幾頭豬。為弄清情況，劉決定在这裏住下。隨行人員選擇了豬場的一間飼料房作為劉的住房和辦公室。

劉少奇從这裏鋪牀找不到稻草，周圍風乾的人糞中看到的多是纖維，直覺告訴他人們在餓飯。他在聽取先期到達的中共中央辦公廳工作組和中共湖南省委工作組彙報時，對張平化說：「寧鄉的問題那樣嚴重，如果說天災是主要的，恐怕說服不了人，沒有調查研究，這個教訓很大。」

然而，要瞭解到真實情況也並那麼容易。從4月12日起，劉少奇來到長沙縣廣福公社天華大隊。這是一個全省出名的「紅旗大隊」，被說成是糧食年年增產，公共食堂愈辦愈好，社員的生活芝麻開花節節高。剛剛出版的1961年4月號的《中國婦女》雜誌，就登有一篇近萬字介紹大隊總支書記彭秀梅和天華大隊由窮走上了富裕的文章。

劉少奇認為，这裏是城鄉結合部，「群眾有點小自由，經濟自然就要活躍一些」。他真希望能從一個好的典型那裏找到一些渡過困難的經驗來。然而，下車伊始就使他大為疑惑。这裏看到的依然是一片破敗蕭條的景象。彭秀梅介紹大隊的情況時，講得繪聲繪色，頭頭是道，內容與報上宣傳的大體一樣，就是不談任何困難。下午，劉少奇召集大隊幹部座談，參加的有副大隊長李言孝、黎桂蘭，婦女主任童若斌，大隊會計彭騰奎。然而，幾位大隊幹部，所談與彭秀梅大同小異。當問起群眾生活有甚麼困難時，大家吱吱唔唔。說：「彭書記已經彙報了」，「彭書記掌握的情況比我們全面」，「彭書記的政策水準比我們高」。實際情況是，就在知道劉少奇要來天華的頭天晚上，彭秀梅就曾召開黨員和生產隊長會議，統一彙報口徑。哪些該說，哪些不該說。治保主任又給地、富、反、壞、右分子開會訓話，警告他們不要亂說亂動。把上上下下的嘴巴都封死了。

座談會沒有收穫，劉少奇決定改變方式，直接到群眾中去。他看了施家沖食堂，又把幾個社員請到自己住處。與大隊幹部所說大相徑庭，群眾向國家主席訴說了種種難處和苦處，並提到原大隊副支書段樹成，因為講了真話，1959年被劃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事。劉少奇決定找段樹成談談。就此揭開了天華大隊的真相。4月18日，段樹山向劉少奇彙報說：天華最好年景是1957年，1960年減了產，只收七十二萬斤，但上報120萬斤，虛報四十八萬斤，除交徵購超購糧，人均口糧不足400斤，打成大米只有280斤，每天每人只有7.6兩米；1960年生豬存欄只有十七頭，卻上報500頭，魚出塘只有幾百斤，上報為7500多斤；全隊患浮腫病的人超過100人，上報只有十幾人，死亡四十八人，上報十一人，少報了三十七人。天華不算最差，但也沒有宣傳的那麼好。省裏早就把天華樹為紅旗，紅旗就得愛護，就得講成績。於是根本不能講缺點。動輒扣帽子，批鬥。段樹成說：「您問我是怎麼打成右傾機會主義

分子的，無非是我講了幾句真話，戴帽子，撤職，批鬥了六次。劉主席，如今講真話真難哪！」說到这裏，段樹成不禁眼淚雙流。

劉少奇找群眾談話，已經引起彭秀梅的警惕和不滿，現在又背著她找段樹成談話，更使她憤怒了，竟直闖劉少奇的住處，高聲嚷道：「劉鬍子不是來抓生產的，是來找岔的。」經劉少奇多次談話，彭秀梅終於認識到自己的錯誤，承認「天華大隊的問題很嚴重」。[1]

5月3日，劉少奇回到闊別四十年的家鄉寧鄉縣花明樓公社炭子沖大隊，住進了自家的舊宅。他在舊宅的堂屋連續召集各種座談會，找人個別談話。劉與小時的朋友李佳生漫步在安湖塘的田埂上，劉問道：「人們說去年乾旱很厲害，安湖塘的水車幹了吧？」

「沒有，還有半塘水。」

「還有半塘水，這說明乾旱並不厲害嘛！你還記得嗎？小時候那一年，塘底幹得曬得穀，那樣天干，每畝田還收得兩三擔穀呀！」

「叫我看，去年糧食減產，乾旱有一點影響，不是主要的。我講直話、主要不是天災，而是人禍、是『五風』颳得咯樣！」

李桂生說著帶劉少奇去看附近的公共食堂，这裏地上、灶上是胡亂堆放的炊具、髒碗筷，李指著一小堆蒿筍葉說，「這是全食堂一餐的菜，炒菜只放鹽，不放油，吃不飽呀！」[2]

這等等情況，使劉少奇感到，首先要解決的是公共食堂問題。於是，找來曾擔任過大隊書記的農民朋友王升平，問：「你說說看，食堂到底好不好？」

王升平是曾被認為「右傾」撤了職的。他回答說：「咯到底是講得還是講不得呢？」

劉說：「怎麼講不得呢？」「把你請來就是要你講心裏話。實事求是嘛，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

「好，講得我就講。」「要是叫我和群眾說心裏話，食堂還是早點散夥的好。再辦下去會人死路絕。拿柘木沖食堂說吧，開夥時一百二十人，眼下不到八十人，死了十多個，跑了十多個，還有幾個得水腫病住在大隊臨時醫院。過去家家戶戶養豬養雞，入了食堂沒得吃，養不成。如今二十戶人家，只剩下集體的一頭母豬，叫鳴的雞公子都沒有……」

從聽到的，看到的，問到的，劉少奇當機立斷，要王升平回去把他所在的柘木沖食堂停掉。

5月7日下午，劉少奇召開基層幹部和社員座談會。面對面黃肌瘦的鄉親父老，劉少奇深感愧疚。他說：「我將近四十年沒有回家鄉了，很想回來看看。回來了，看到鄉親們的生活很苦。我們工作做得不好，對你們不起。」「這次回來，看到这裏工作搞成這個樣子，中央有責任，要向你們承認錯誤。」[3]

在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材料以後，劉少奇對一些群眾最關心和最急切

的公共食堂、農民住房等問題，與寧鄉縣負責幹部進行協商迅速予以解決。

5月11日，劉少奇致信毛澤東，彙報了湖南調查的情況，對解決社員住房，退賠社員財物，鞏固國家、集體和個人所有制，在部分鄉村建立公安派出所和巡迴法庭等一些帶普遍性的問題，提出了處理意見。

2.周恩來在河北農村

4月底5月初，周恩來先到河北邯鄲，聽取河北省委負責人的彙報。5月3日至8日，下到武安縣伯延公社調查。住在部隊營房裏，早晚回營房吃飯，中午在伯延村就餐。這次到農村調查帶着三個題目：食堂、供給制、包工包產。

到武安的第一天中午，周恩來提出到食堂就餐，食堂的人趕快叫社員們先打飯吃。等周恩來一行就餐時，不見一個社員的影子，桌上為他備了豬肉和雞蛋。周恩來知道這是在做假，硬是讓工作人員端走了。村幹部以為周恩來不會再去食堂了。過了一天，他又悄悄來到另一個村的食堂，但還是去晚了，社員已經吃完回家。炊事員一見總理來，措手不及，連忙蓋鍋蓋，説沒有吃的東西了，隨同的公社幹部就叫總理回公社吃。周恩來也不説話，徑直走到大鍋前，揭開鍋蓋，見裏面還剩些玉米糊糊，二話不説，拿碗就盛。這是周恩來來農村吃到真正的食堂飯。玉米糊糊下肚了，周恩來心裏對食堂的情況也清楚了一半。

周恩來召集社員開會，黑壓壓擠了一大屋。周恩來坐在會場的主席臺上。開始群眾不敢説話，説話的人也只説食堂好，能吃飽。周恩來見有壓力，笑著指指身後牆上的畫像，「我叫周恩來，就是牆上的那個人。你們看像不像？這次我來是想聽大家的心裏話，有話只管説，説錯了也不要緊。」場子還是很靜。周恩來見一個農民蹲在他身邊，悶頭吸煙，就問他，「你叫甚麼名字，怎麼不説話？」別的人回答説叫「二廷」。

二廷見總理問，彈簧似的猛地跳起身，直著脖子：「總理，你叫説真話，還是假話？」

「當然是真話啦！」

「要説真話，剛才説的食堂好，全是假話。食堂好，食堂吃不飽。」周恩來立即直起身子，神情異常認真：「為甚麼吃不飽？」

「總理，你算算，一共幾兩指標？司務長、炊事員多吃一點，他們的老婆、孩子、爹娘再多吃一點，到我們社員嘴裏才三四兩，能吃飽嗎？要是自己做，湯湯水水的總能糊飽肚子。別看我死了老婆，一人拉扯幾個娃娃，我還是願意自己做。冬天可以用餘熱取暖。」「這兩年生活一年不如一年。」二廷的話像拉開閘，大家七嘴八舌訴説食堂的苦

衷，有人竟然號啕大哭起來。

接着，二廷指著周恩來説：「如果再這樣下去兩年，連你也會沒有吃的。」

周問：「為甚麼會這樣呢？」

「因為我們當然首先要顧自己，你們徵購不到，當然會沒有吃的！」[4]

會後，周恩來到張二廷家做客，面對和藹可親的國家總理，張二廷將伯延公社遭受的災情和公共食堂等方面存在的問題如實向周恩來一一訴述，並希望周恩來以後還能來伯延。

在伯延的調查中，周恩來發現，社員最不放心的是多徵購糧食，害怕擠掉他們的自留地。社員們要周恩來當場保證：「分下去的自留地再不要收回了，再不要拿自留地頂口糧指標了。」周恩來當著地委、縣委、社委的同志説：「我可以保證。」社員們又要求周恩來以後能夠每半年來一次他們才能放心。周恩來回答説：「自己能否半年來一次，還不能擔保，有時可能忙於甚麼情況去不成，但是工作組總是要去的」。[5]

5月6日，臨離開伯延的時候，周恩來召集社員開會，親口告訴大家一個決定——伯延村解散食堂。滿滿一院子群眾，一聽總理下命令啦，「呼啦啦」地往總理跟前擠，要和總理握個手。總理身不由己被沸騰的群眾簇擁著走出會場大院，擁著他往南走，南面還有好多群眾等著和他握手告別，周恩來就索性繞著伯延的街走了一個圈。

5月7日淩晨3點半，周恩來請秘書孫岳掛通了保密電話，向正在上海的毛澤東彙報了調查的情況：

（1）食堂問題。絕大多數甚至於全體社員包括婦女和單身漢在內都願意回家做飯。我正在一個食堂搞試點，解決如何把食堂解散好和如何安排好社員回家吃飯的問題。

（2）社員不贊成供給制，只贊成把五保戶包下來和照顧困難戶的辦法。現在社員正在展開討論。

（3）社員群眾迫切要求恢復到高級社時的評工記分辦法，但是已有發展。辦法是：包產到生產隊，以產定分，包活到組。

（4）邯鄲專區旱災嚴重。目前最主要的問題是恢復社員的體力和恢復畜力問題。

毛澤東于當日4時40分批轉了周的報告。[6]

3.鄧小平考察京郊

毛澤東和其他常委們都在外地，鄧小平則留守北京，處理中央書記處日常工作，由彭真協助。鄧小平和彭真一面處理日常工作，一面組織

了五個調查小組在京郊順義和懷柔等地農村調查。4月7日至21日，鄧小平親自到順義縣農村考察。

4月15日，鄧小平在北小營召開田上輦、北小營、仇家店三個大隊的支書、生產隊長參加的座談會。鄧小平反復詢問：「公共食堂是吃好，還是不吃好？」誰敢説不吃好，違心地拼湊著吃食堂也不錯的理由。鄧小平夫人卓琳在上輦村孫旺家已經住了一星期，瞭解些情況。她告訴鄧小平説：上輦吃食堂是假的，由食堂分糧食，社員自己回家做飯吃才是真的。鄧小平聽後並無惱色，反而很高興地説：「你們村的幹部對共產風、平調風頂得好，鍋碗瓢盆沒有被颳跑，鎖沒有砸，門沒有拆，是很好的事，而且你們村把生產搞上去了，糧食單產59年達到五百四十多斤，比58年提高六十多斤。副業收入三萬多元。社員生活水準提高了，對國家的貢獻也大了，你們的好經驗應該總結一下，推廣下去。」他還著重指出：「吃食堂光榮，不吃食堂也光榮，吃不吃食堂要由群眾決定。」

鄧小平來到牛山公社白廟村，看到食堂停火，一片荒涼景象，只養著一頭四十斤左右的小豬。深入到農戶訪問，看到一位老大娘喂羊，豬圈卻空著，他問老大娘：「您養羊，為甚麼不喂豬？」大娘説：「還喂豬，人還沒的吃呢！」

鄧小平經過調查，覺得問題嚴重，在桑園村召開社隊幹部會。在會上他明確表態：「吃食堂是社會主義，不吃食堂也是社會主義。以前不管是中央哪個文件上説的，也不管是哪個領導説的，都以我現在説的為準。根據群眾的意見，決定食堂的去留。」隨後，鄧小平對縣委書記説「現在食堂是過渡時期，可以自由一下，不願意在食堂入夥的就不要攤工分了，還要很好地研究一下，食堂種的菜，養的豬，對不入食堂的戶怎麼分配的問題。」一些幹部反映説，有些群眾願意辦農忙季節食堂，冬閒時自己回家做飯吃。鄧小平説：「這樣也可以，一年農忙六個月吃公共食堂，農閒時自己回家做飯吃，還可以解決冬季燒炕取暖的問題，能節約一些煤。」鄧小平説出了幹部群眾不敢説的活，有了他的表態，第二天上輦村就有二百多戶退出了食堂，繼續留在食堂的也只堅持了兩個月。

手工業、家庭副業和集市貿易的恢復和發展是鄧小平關心的幾個問題。在農村走了一遭，看到的是集市一片蕭條，買賣不興旺，品種單調，數量少，尤其是社員使用的小農具和日用品缺得更厲害，為農民服務的專案幾乎快消滅光了。他把商業局、供銷社、手工業社的幹部找來開座談會，他説：「導致這種結果的原因主要是政策問題，是流通管道問題，是過去有人關心的，而現在沒人關心了，自流了。」「手工業、家庭副業無論如何不能丟掉。這兩項收入一般能占家庭收入四分之一左右。……在農村，必須堅持以糧為主，全面發展的方針。」「歸根到底

是把生產發展起來，用經濟辦法而不用政治辦法，把葦編、柳編、荊編、燒石灰、磚瓦、黑白鐵加工、皮匠、瓦木匠、做豆腐、豆絲，養豬、雞、鴨、兔和庭院種菜等手工業和家庭副業統統恢復起來……。不是國家統購統銷的商品都可以拿到自由市場上來賣，把集市貿易繁榮起來，市場上的物品增多，市場也就活躍了，社員生活也就方便多了。農民的收入增加，對國家的貢獻也大了。」「目前的主要問題是把縣和基層的供銷社恢復和建立起來。縣供銷社搞幾個人，只搞供銷，不搞商店，有些人可以歸隊。農村基層供銷社可以先把機構搞起來，再建立各種制度和章程。供銷社的首要任務是組織生產，要把手工業專管起來，一個行業一個行業地抓。」「社員的家庭副業不能丟，應該是六畜興旺，尤其是養豬很重要。」

鄧小平到了張莊，見道邊一塊三角地，翻了一鐵鍬多深，旁邊堆有五大堆糞。鄧小平問原公社黨委書記王志儒：種十邊地有沒有好處？王一時語塞。個人種十邊地，不是單幹嗎？鄧小平看出王的心思。他自己回答說：開墾十邊地有好處，你看看，地翻得這麼深，糞堆這麼大，你說它會不打糧食？打了糧食，就是不賣給國家，人吃了也省了國家供應。

在視察中，鄧小平察看了一個典型的窮村——蘆正卷村，當時被劃為三類隊。1960年全村人均分配僅四十二元，其中30%還是從外村平調來的。社員生活很苦。鄧小平看後十分難過，他特別指示縣委書記李瑜銘、孫振英。要幫助這類窮隊因地制宜，因事制宜，找致富門路。但窮隊面貌的改變，不能依靠平調來實現。必須依靠自力更生、艱苦奮鬥。他說：「像蘆正卷這樣的窮村，沒有人願意同它並在一起，就讓它一個村作為一個基本核算單位吧！這個村沙地多，產糧少，在分配徵購任務時，要適當照顧點。」

調整體制，確定社隊規模，是各級幹部要求迫切的一個問題。多數基層幹部和社員都希望把基本核算單位劃小。對此，鄧小平的基本主張是尊重群眾的意願，儘快把社隊規模確定下來。他在座談會上說：「要根據群眾的要求，把社隊規模早些定下來……也可以採取一些過渡辦法。」這時，鄧小平關注的是「三包一獎」（即包工、包產、包成本、超產獎勵）「四固定」（即土地、勞力、耕畜、農具固定到隊使用）責任制的落實。在幾個座談會上都指出，「調動幹部和群眾生產積極性的關鍵問題就是儘快制定『三包一獎』和『四固定』的責任制。包產單位小一些，便於互相比較生產條件，讓他們在同等條件下搞生產競賽。當然，定產指標要力求合理，還要留有10%的餘地，照顧到有產可超。這樣就會有奔頭，就拼命去幹了。」他反復強調，要克服分配上的平均主義，這樣才能調動起社員的勞動積極性。一定要實行定額包工，「多勞多得是天經地義的事，是社會主義的分配原則」。

當時的所謂分配，很大程度是如何確定吃糧指標，鄧小平說：「不要拉平，人與人之間勞動有強弱，幹活也有好壞，出勤多少也不一樣。為了獎勤罰懶，不僅在勞動報酬的工分上有差別，口糧的差別要相當明顯。這樣就能克服平均主義，農民就放心了，就能刺激生產者搞好生產和克服各種災害的積極性。」「多產多留多吃多購，按勞分配，群眾是會贊成的。」[7]

經過半個多月的調查，鄧小平對恢復農業生產形成了自己的看法，5月10日，他和彭真聯名寫信給毛澤東。他們建議：

——現在實行三七開供給制，帶有平均主義性質，害處很多。廢除這種供給制，只對五保戶和困難戶補助部分實行供給，可以更好地貫徹按勞分配原則，調動社員的生產積極性。

——關於糧食徵購和餘糧分配問題，是不是可以採取對包產部分購九留一，對超產部分購四留六。鼓勵社員像經營自留地一樣，在集體經營的土地上精耕細作、積極施肥。

——關於食堂問題，這個問題比較複雜，不能像供給制一樣一刀兩斷地下決心，要走群眾路線，完全根據群眾自願。吃食堂，不吃食堂的都給以便利。

毛澤東對這封信很重視。5月13日，毛批示：「此信發給各中央局，各省、市、區黨委，供參考。」[8]

4.朱德、陳雲南下調查

1959年，朱德不贊成繼續搞公共食堂曾受到錯誤批評。1960年3月，朱德在視察陝西、貴州和四川重慶後，和夫人康克清一起回到闊別五十多年的故鄉——四川儀隴縣馬鞍場。在家鄉，他問堂兄弟：「你們為啥都這麼黃皮寡瘦，說話都吊不起氣？」堂兄弟直通通地說：「還不是因為肚子吃不飽！」朱德聽後，用拐杖猛敲了一下地面，搖搖頭說：「我知道了。」當時，朱德就囑咐儀隴縣委負責人「你們要老老實實辦事，關心群眾生活，有事多和群眾商量。」[9]

1961年初，毛澤東宣導調查研究，朱德積極回應。1月20日離京南下，先到上海，再下杭州。他登高鳥瞰，面對杭州龍井大隊的條田碧茶心生喜悅，即興賦詩；他發現浙江養蠶中實行「四包一獎」制的經驗很好，1月30日，給中央和毛澤東寫信推薦。接着去了福建、江西、廣東，視察工廠和人民公社。他對發展多種經營、發展手工藝品以促進對外貿易很感興趣。3月6日，他向中央和毛澤東寫了第二封信。3月24日，朱德參加廣州會議後北上，先後到河南、四川、陝西、河北等省考察。回京後，5月9日再給毛澤東寫了報告，反映這次外出看到的情況。他說，《六十條》貫徹後，群眾的生產積極性提高了，農民普遍注意發

展家庭副業；河南雖然向好的方面發展，但困難仍然很大，農民體力弱，患浮腫病的人還不少，牲畜死亡多。信中，反映最強烈的意見是群眾對公共食堂的不滿。他寫道：

> 四川農村的公共食堂是「兩道煙」，即在食堂做一道，社員打回家再加工一道，既浪費人力又浪費物力。陝西的群眾說，農村的公共食堂有五不好：一是社員吃不夠標準；二是浪費勞動力；三是浪費時間；四是下雨天吃飯不方便；五是一年到頭吃糊塗面。據豫東調查，允許社員自己回家做飯吃，不到一個月，浮腫病即下降百分之四十到百分之五十。

陳雲在毛澤東發出「大興調查研究之風」號召的一個月前，就曾到河北、山東、河南、安徽、江蘇，上海、浙江等地，進行了三個多月的調查研究。1961年3、4月份，他又在北京、杭州、南京多次召開座談會，調查研究加速發展化肥工業的具體辦法。通過這些調查研究，使他對農業困難、糧食緊張、經濟失衡的情況有了比較透徹的瞭解，對調整國民經濟的必要性和緊迫性有更深刻的認識，並對進口糧食、動員城市人口下鄉、工業支持農業等具體措施提出了重要意見。

1961年6月，為進一步尋求調整農村政策，解決農業困難的具體辦法，陳雲又一次南下上海來到青浦老家。

陳雲出發前，請著名經濟學家薛暮橋、中國農科院江蘇分院院長顧複生、工會領導人陸銓組成先遣隊，6月19日先到青莆小蒸鄉、觀音鄉摸底。後來陳雲說，之所以選擇小蒸鄉，是因為1927年陳雲與顧複生、陸銓在这裏搞過農民運動，解放後又常有聯繫，對这裏的情況比較熟悉，農民也知道他們，比較敢講真話。

一星期後，陳雲離京南下，先到上海，隨後即赴青莆。來到小蒸鄉，首先印入眼簾的是这裏的生態的嚴重破壞。小蒸鄉地處江南水鄉，是湖蕩中的一個小村莊，原來樹木蔥蘢，茂林修竹，包圍著村莊，遠處看不見房屋，公社化竹林、樹木都歸公了，結果都被砍光。現在是一片荒涼。這使他很不好受。

6月27日，陳雲住在自己娘舅一族的親屬、農民廖開弟的家裏，一住十五天。这裏與全國一樣，糧食肉蛋供應非常緊張，日用品奇缺，商店貨架有樣無貨。陳雲囑咐隨行人員，不許在當地買任何東西。堅決謝絕煙酒茶招待和請客送禮。在小蒸，他每天開專題座談會。十五天時間竟開了十個座談會。包括：公養豬；私養豬；農作物種植安排；自留地；平調退賠；農村商業；公社工業和手工業；糧食包產指針，徵購任務、農民積極性；幹部問題和群眾監督；防止小偷小摸保護生產等等。幾次與公社黨委交換意見，幾次直接向農民做調查。陳雲自己還去農民家中跑了若干次，觀察他們養豬、種自留地、住房和吃飯等情況。

陳雲開座談會，跟農民談話，特別注意聽批評意見。為了讓農民敢

講話，他特意把各種人分開，幹部、農民、中農、富農分頭開座談會。這樣一來，農民顧慮少了，對幹部的意見就直通通地倒出來了，如說幹部「大衣捧了捧，不做三百工」。「幹部吹牛皮，社員餓肚皮。」「幹部出風頭，社員吃苦頭。」「幹部嘴唇兩張皮，翻來覆去都有理。」

青浦縣原來是生活比較好的魚米之鄉，過去農民習慣每天吃三餐，農忙時加一餐。「大躍進」時搞浮誇，搞高徵購，搞得每天只能吃上一頓乾飯、兩頓稀飯。調查組到的時候，社員都到大隊辦的公共食堂吃飯。一天三頓飯，頓頓喝稀粥。膽子大的農民憤憤地對調查組說：「蔣介石手下受難，還吃乾飯；毛主席手下享福，卻要吃粥。」[10]農民吃不飽飯，把大隊種的作為綠肥的紅花草都吃光了。

在小蒸，陳雲關心的主要問題：

一是自留地。這時中央已經決定，農民可以種自留地。可是到了地方就都打了折扣。社隊幹部擔心社員只關心自留地而不積極參加集體勞動；擔心集體耕地減少了完不成徵購任務怎麼辦？陳雲說，自留地是農民的生產生活關係重大的問題，祖祖輩輩農民都得有點自己的地看著。中國歷來農民造反，都是在糧食問題上造反的。有自留地，農民就安定了，自留地要留足！經過討論，幹部們逐漸統一了認識。公社幹部提出把自留地擴大到佔耕地總面積的6%，其中再分大田七百畝，占耕地的3.5%。陳雲十分贊成，把他們的意見寫進了給中央的調查報告。

二是家庭養豬。對於中國農民來說，養豬是家庭日常開支的重要收入來源。然而，三年「大躍進」時期，農民私養幾隻豬幾隻雞鴨也成了小資本主義的表現，不準農民養。三年間，曾兩收兩放，這麼一折騰，嚇得農民都不敢養了。而集體養豬，沒有不賠本的。1961年初，中央規定養豬的方針是「公私並舉，私養為主」。然而，到了地方，又都留個尾巴。陳雲在小蒸，僅養豬一項，就召集了四次座談會，兩次公養座談會，兩次私養座談會。陳雲問老農：「把你們的豬沒收對，還是發還對？」一個老農暗含譏諷地回答說：「上面說沒收、發還都是對的。」陳雲又問：「你們現在敢不敢養豬？」那個老農說：「還不大敢，說不定哪一天又是沒收對了。」陳雲對大家說：「沒收不對，發還才是對的，以後再不會沒收了。」陳雲的明確表態，使參加會議的老農們喜出望外。

三是農作物耕種制度。「大躍進」中瞎指揮，任意改變耕作制度。小蒸地勢低窪，無霜期不夠長，農民向來種一季水稻，一季夏熟作物如大豆、小麥。「大躍進」後上級命令種雙季稻。雖然比單季稻每畝多收二百多斤，但陳雲找他認識的老農算了一筆賬，發現種雙季稻各方面損失很大，實際上不合算。通過調查，陳雲得出結論：歷史上長期形成的耕作習慣，不宜輕易變更，作物安排必須因地制宜，像小蒸這樣無霜期不夠長，地勢較低，人均耕地少的地方，不宜種雙季稻，種夏熟作物也

要看土質情況，多種蠶豆，少種小麥，這樣，也要相應改變口糧年度安排。

7月12日，陳雲一行離開小蒸。為了印證小蒸調查的結論，他到與青浦情況相似的杭州、蘇州找了幾位縣委書記和若干個大隊支部書記座談，後又到浙江蕭山、江蘇無錫兩縣調查。在杭州向毛澤東作了匯報，又向周恩來匯報，隨後與上海市委、江蘇和浙江省委交換意見。8月回京給鄧小平寫了一封長信，隨信附了青浦農村調查的三個專題報告。[11]

中央常委們深入農村基層的實地調查，為在公共食堂、供給制、基本核算單位等問題上取得共識，獲得了第一手材料。這就有助於《農業六十條》的修改和基本敲定。

[1] 黃崢：《劉少奇一生》（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頁358。

[2] 黃崢：《劉少奇一生》，頁360。

[3] 黃崢：《劉少奇一生》，頁363。

[4] 熊華源、廖心文：《周恩來總理生涯》（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頁347。

[5]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金沖及主編：《周恩來傳（1949-1976）》（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頁1591-1593。

[6] 毛澤東：《轉發周恩來關於公共食堂等同胞調查彙報的批語》（1961年5月7日），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九冊，486。

[7] 《北京黨史研究》，1990年第1期；中共北京市黨史研究室編：《社會主義時期中共北京黨史紀事》，第五輯（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頁7-10。

[8] 毛澤東；《轉發鄧小平、彭真調查農村人民公社幾個問題來信的批語》（1961年5月13日），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九冊，頁492-493。

[9]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金沖及主編：《朱德傳》（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頁697、698。

[10] 孫業禮，熊亮華：《共和國經濟風雲中的陳雲》（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頁221-222。

[11] 〈按中央規定留足自留地〉、〈母豬也應該下放給農民私養〉，〈種雙季稻不如種蠶豆和單季稻〉

五、公社體制的再次退卻

1.北京會議再議農村形勢

1961年5月21日至6月12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再次召開工作會議。按照毛澤東的意見，主要是在調查研究收集農民和幹部意見的基礎上，修改廣州會議提出的《農業六十條》草案。與會人員經過4、5兩個月的深入農村調查，「向群眾尋求真理」，心境與3月廣州會議時已經大不一樣了。會議開得比較順利，會上對幾年來經濟建設方面的經驗教訓進行了初步總結。以劉少奇的意見最為尖鋭。

5月24日，劉少奇在第三組（中南、華北小組）討論會上發言，提出了反「左」的問題。他説：

> 右傾機會主義是主要危險，已反了幾年，鄭州會議以後，在農村實際工作上是反「左」的，廬山會議前一段也談過這個問題，不過沒有提出口號。現在，是不是要提反「左」的口號，大家可以考慮。我們黨一方面是經驗很豐富，一方面是建設社會主義的經驗不足。如農業問題，一是大田生產，一是家庭副業把養豬、養雞搞掉，吃了大虧，取消自留地也是個很大的錯誤，使生產、生活都有很大降低，對工業的影響也很大。我們全黨、全體幹部、全體人民都餓了飯，這個教訓是深刻的。[1]

5月31日，劉少奇主持中央工作會議全體會議並作總結講話，對造成當前困難的原因、錯誤的嚴重性及其性質作了深刻分析。他極其尖鋭地指出：

> 這幾年發生的問題，到底主要是由於天災呢，還是由於我們工作中間的缺點錯誤呢？湖南農民有一句話，他們説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我也問了幾個省委幹部。我問過陶魯茄同志：在你們山西，到底天災是主要的，還是工作中的缺點錯誤是主要的？他説，工作中的缺點錯誤是造成目前困難的主要原因。河北、山東、河南的同志也是這樣説的。其他一些省我沒有問。總起來，是不是可以這樣講：從全國範圍來講，有些地方，天災是主要的原因，但這恐怕不是大多數；在大多數地方，我們工作中間的缺點錯誤是主要原因。有的同志講，這還是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問題。現在看來恐怕不只是一個指頭的問題。總是九個指頭、一個指頭，這個比例關係不變，也不完全符合實際情況。我們要實事求是，是怎麼樣就是怎麼樣，有成績就是有成績，有一分成績就是一分成績，有十分成績就是十分成績。成績只有七分就説七分，不要多説。……我們在執行總路線、組織人民公社、組織躍進的工作中間，有很多的缺點錯誤，甚至有嚴重的缺點錯

誤。最近不僅農業減產，工業生產也落下來了。如果不是嚴重問題，為甚麼會這樣減產？為甚麼要後退？難道都是老天爺的關係？說到責任，中央負主要責任，我們大家負責，不把責任放在哪一個部門或者哪一個人身上。我們現在是來總結經驗。好在我們現在能夠回頭，能夠總結經驗，能夠改過來，還不是路線錯誤。但是，如果現在我們還不回頭，還要堅持，那就不是路線錯誤也要走到路線錯誤上去。[2]

劉少奇這一番話，明顯觸動了三根帶政治性的敏感神經：

一是造成困難的主要原因，是天災，是人禍？在1961年初的北京會議上，毛澤東在講到對1960年的形勢沒有估計對時說：「1960年天災更大了，人禍也來了。這人禍不是敵人造成的，而是我們自己造成的。」顯然，他認為主要還是天災。2月，田家英匯報說造成嚴重困難主要不是階級敵人報復，毛澤東並沒有完全聽進去。為扭轉農村局面，他的辦法是雙管齊下，一方面調整農村政策，一方面搞整風和奪權。4月11日，毛請王任重幫助湖南工作的批語中，還批評湖南「相當多的地區，政權還沒有從敵人手上奪過來」。劉少奇原來也有同樣看法，這次講話，他沒有提到階級敵人報復的問題。在農村調查中，劉還為基層幹部說了公道話，錯誤也不完全在他們。根子在上面，在中央。

二是推倒了成績和錯誤是「九個指頭與一個指頭」的公式。強調講成績要實事求是，有幾分就是幾分。這可是一條政治界線，彭德懷在廬山被打倒，就是被認為越了界。

三是提到了路線問題。儘管他還不認為總路線有甚麼錯，但確實對三年「大躍進」有了切膚之痛。

這三條，實際上就是後來在1962年七千人大會上毛、劉分歧的源頭。

周恩來的講話同樣深刻，但語調比劉少奇平和多了。他委婉地說：

廬山會議以來，由於我們缺乏分析，而把反右傾和工作上的問題混淆起來，更重要的是沒有實事求是，所以儘管想搞好一點，結果卻是適得其反。一切都搞全民化，動搖了集體所有和全民所有，得罪了小資產階級。另外，在分配上的平均主義，勞動關係上的命令主義，上層建築上的規章制度一般化、簡單化，認識上的主觀片面性，作風上的「五風」問題……。

為甚麼會產生這些問題呢？周恩來說：「那時，就是有點革命，不能深思熟慮，不能冷靜下來，『欲速則不達』，跌了大跤。」周恩來主動承擔了責任。他說，工作中出現的缺點錯誤，中央應負很大的責任，中央主要是書記處和政府部門，我們做具體工作的人應負主要責任。為克服困難，周恩來提出，一是平反，我們錯的，就要承認錯誤，欠了賬的就要交代，甚麼時候交代清楚，甚麼時候為止。要平反也要有處罰，平反與處罰要結合起來。二是經濟建設要全面調整，看來必須把速度放

慢，把戰線縮短。[3]

6月12日上午和下午，毛澤東作了兩次講話。談到了會上所議的各項議題。他對這次會議解決的問題很滿意，認為「這次會議大有收穫」。

毛説：「兩次鄭州會議開得倉促。我那時對中國社會主義如何搞還不甚懂。」「當然，鄭州會議基本上是正確的，上海會議提出十八條也還是基本上正確的，但對食堂問題、供給制問題是講得不正確的。」「經過三月廣州會議、這次北京會議，今年的形勢跟過去大不相同。現在同志們解放思想了，對於社會主義的認識，對於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認識，大為深入了。」

對何以出現變化的原因，毛分析説：「為甚麼有這個變化呢？一個客觀原因，就是1959年、1960年這兩年碰了釘子。」但對此毛似乎並沒有切膚之痛，他很輕鬆地説：「有人説『碰得頭破血流』，我看大家的頭也沒有流血，這無非是個比喻，吃了苦頭就是了。」「社會主義誰也沒有幹過，沒有先學社會主義的具體政策而後搞社會主義的。我們搞了十一年社會主義，現在要總結經驗。」

對鄭州會議以來的歷史，毛的結論是：第一，廬山會議後應當繼續反「左」，反右錯了（但堅持批彭、黃、張、周的右傾機會主義是正確的）。第二，反右把許多好人、説老實話的人，整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甚至是「反革命分子」，犯了錯誤。對一切受了冤枉的，都要平反。第三，鄭州會議精神、上海會議十八個問題基本上是正確的，關於食堂和供給制的問題是不正確的。第四，幾個「大辦」助長了「共產風」再度氾濫。第五，強調普遍反對「五風」特別是「共產風」。整風整社，開始主要整三類縣、社、隊，強調奪權鬥爭。經過調查研究發現，農村中主要的普遍的問題是「五風」問題。第六，總的説來，現在大家解放思想了，對社會主義、對怎樣建設社會主義，有了新的認識。[4]

有鑑於此，毛澤東強調了訓練幹部的重要。過去毛澤東多次強調嚴重的問題是教育農民，現在他提出：「嚴重的問題是重新教育幹部。」他説，幹部教育好了，我們的事業就大有希望，不教育好幹部，我們就毫無出路。他要求，這次參加會議的同志，思想通了，就要去教育地縣的幹部；他們的思想通了，就由他們去教育社隊幹部。毛澤東認為黨內幹部真正懂得馬克思主義的不多。毛澤東指著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吳芝圃説：吳芝圃同志，我的工作沒做好，你的工作也沒做好。還説，河南、甘肅省委沒有一個人懂得馬克思主義，山東省委只有一小部分懂得，大多數人不懂。

2.《農業六十條》修正草案

由於大家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材料，這次北京中央工作會議修改的《農業六十條》，對公共食堂、供給制等幾個爭論不休的問題終於統一了認識。同時對3月廣州會議沒有提出的問題，如山林保護問題、商業問題、手工業問題，都有了新的規定。會議通過了《農業六十條》的修正草案。

《農業六十條》修正草案的核心是調整人民公社的所有制關係和分配關係。

修正草案重申以生產大隊為基本核算單位的三級所有制，是現階段農村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這樣，多次議論是否把基本核算單位放到生產隊（即小隊）的問題，沒有得到解決。但明確規定了：公社對大隊的生產經營活動不得強加干涉，只能協商和建議，組織隊與隊之間的生產協作必須堅持自願互利和等價交換原則；生產隊的財物公社和大隊都不得調用；社員個人所有的一切生活資料和小農具等生產資料永遠歸社員所有；允許社員發展家庭副業，恢復自留地，開放農村集市貿易。帶有根本性轉變和影響最大的是，關於公共食堂和供給制這兩個問題的認識和方針。

公共食堂在1958年產生，一開始就是服務於「大躍進」和向共產主義過渡的。當時認為，辦公共食堂可以解放大批勞動力投身於「大躍進」，公共食堂實現了「生活集體化」，公共食堂實行供給制，是具有共產主義因素的新生事物。因此，它一誕生，就備受青睞。毛澤東、劉少奇和當時中央的許多領導人對公共食堂都寄予了極大的熱情和期望。但是，嚴重的「五風」使得農民生活處於困難境地，食堂難以為繼。第二次鄭州會議對參加公共食堂有所鬆動。強調自願參加，又不能放任自流。規定口糧分配到戶，糧食交給食堂，節約歸己。口糧分配到戶的口子一開，農民們寧願回到家裏做飯、吃飯，而不願繼續在食堂吃飯。一些地方食堂散夥了。1959年的廬山會議上，公共食堂成為分歧的主要問題之一，辦與不辦，已上升到是否違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高度。公共食堂成了必須堅守的「社會主義陣地」，通過1961年上半年的實地調查，終於認識到公共食堂實際上成了捆綁農民的一根繩索。

與公共食堂緊密聯繫的是供給制問題。人民公社成立後，吃飯不要錢的供給制就被吹成是「共產主義因素」。但是這種平均主義的辦法難以持久，於是退到所謂三七開（三分供給，七分按工分配），在1961年3月廣州會議上，還提出一個新理由，認為保留供給與工資三七開，有利於照顧貧下中農。5月13日，鄧小平和彭真給毛澤東的聯名信中，根據他們在順義調查到的情況，得出了相反的結論。鄧、彭在信中說：

> 許多典型材料證明，這種供給制，不但不一定對貧雇農和下中農有利，甚至是對地富和上中農更有利。因為貧雇農和下中農一般結婚比較遲，子女少，勞動比較好，在他們中間佔這種供給

制便宜的人，比例較少；而地主、富農一般撫養人口比較多，勞動比較差，又有使子女上學的習慣，在他們中間佔便宜的人，比例較大。因此，在這次辯論中，幹部和群眾普遍主張取消這種供給制，而主張只對五保戶生活和困難戶補助部分實行供給。[5]

儘管取消供給制是農民的普遍呼聲，但鄧、彭信中提出的這條頗有針對性的理由，使那些堅定站在貧下中農立場的人也無言以對。這樣，修正草案終於取消了這兩個「共產主義因素」：將原草案規定的公共食堂「應該積極辦好」改為「生產隊辦不辦食堂，完全由社員討論決定」，口糧分配的辦法也改為「不論辦不辦食堂，都應該分配到戶，由社員自己支配。」取消了原草案中關於社員分配實行供給部分與工資部分三七開的規定，改為無論包產收入或包產以外的收入都「按勞動工分進行分配。」

6月15日，中共中央發出討論和試行《農業六十條》修正草案的指示；19日下發《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修正草案）》。[6]這些政策下到農村，逐漸穩定了人心，穩定了農村。

3.落實退賠、解散食堂

北京會議後，各地組織了對《農業六十條》的貫徹落實。為了防止一部分幹部隱瞞或任意篡改不符合自己口味的規定，按照中央的指示，各地基本上做到了「每條、每款，一字不漏地、原原本本地告訴群眾。」[7]各省、市、自治區黨委都召開了三級幹部會議，普遍對於如何貫徹執行《六十條》以及退賠、甄別平反和糧食等問題作出決議、發出指示，有些地方還對社辦企業、自留地、私人養豬等問題作出具體規定。8月中旬前，各地、縣召開了三級幹部會議，8、9兩個月內，以退賠和在夏收分配中堅決落實分配政策為中心貫徹《六十條》。具體落實情況是：

第一，繼續糾正平調錯誤，徹底退賠。6月19日，中共中央再次發出《關於堅決糾正平調錯誤、徹底退賠的規定》。要求各級黨組織必須下最大的決心，堅決糾正平調錯誤，全部、徹底進行退賠。規定：誰平調的誰退賠，從哪裏平調的退賠到那裏，平調單位不但要徹底退賠，而且應該向群眾作檢討。一兩年退賠不完，三年基本解決；三年退賠不完，也必須在五年內完全解決。中央的意圖是，通過退賠，一是取信於民，一是教育幹部。據有關部門統計，全國平調總數為250億元，實際退賠的占平調總數的20%至30%。

在退賠款項中，國家付給農民的退賠款為18.5億元。雖然這只抵平調和損壞的財物的一部分，但足以表明中央領導人糾正自己所犯錯誤的決心。後來，由於各方面投放貨幣過多，物資供應不足，中共中央11月

28日發出通知，決定當年暫停發放退賠期票，並將全部退賠工作推遲到五年、七年或十年逐步完成。此後退賠問題基本不了了之。

第二，初步調整了社、隊規模，全國二十七個省、市、自治區調整後的公社數為55682個，較調整前增加30478個。生產大隊為708912個，較前增加了225098個。生產隊為4549474個，增加1561306個。

第三，進一步確立了生產大隊為基礎的三級集體所有制；在生產大隊與生產小隊之間普遍恢復了「三包一獎」制度，生產小隊內部實行定額管理、評工記分的制度；絕大多數地方把原來實行的供給制改為對五保戶和困難戶實行補助的辦法。

第四，對農民來說，最大的鬆綁要算解散食堂了。據8月24日中央農村工作部給中央寫的情況反映說：截至8月，過去用行政命令方式組織起來的「全民食堂」，大部分有領導地解散了；真正出於群眾自願的食堂鞏固下來了。據估計，參加食堂的戶數，約占20%左右。多數是群眾自由結合的合夥食堂和農忙的勞力食堂。

公共食堂的解散，農民分戶自炊，自己安排生活，加上自留地上生產的糧食和瓜菜的補充以及家庭副業的逐漸恢復，解決了社員的部分口糧和日常生活需要，農民的口糧標準雖然低，但生活困難一般比上年緩和些。老百姓終於有了個家，又像個過日子的樣子了。那「鞏固下來」的20%的食堂，事實上不久都在農村銷聲匿跡。毛澤東聽到這個消息，心情複雜。他說：「這是一件大好事。」

《農業六十條》的貫徹也遇到了一些問題。其中農民最關心的還是糧食問題。農民說：「千錘打鑼，一錘定音」，「糧食問題不解決，條條是空的。」然而，許多地方群眾留糧和國家徵購的數字都不能落實，群眾普遍要求把徵購任務定下來，三年、五年甚至十年不變。有的地區幹部不願按照規定給社員留足自留地，怕社員搞「自發」，對恢復自留地的政策陽奉陰違；相當一部分幹部和農民對集體生產喪失信心，普遍存在「怕變」的心理。

再就是一些三類社隊的整風整社和民主革命補課，對幹部打擊面過寬過重，使一些幹部躺倒不幹。據中央農村工作部的一份材料反映：

> 據各地統計，去冬今春整社中劃分為三類的社、隊，占百分之二十至三十。這部分社、隊，都向各級派工作組進行了專門整頓。……經過檢查，發現在這一部分被整頓的三類社、隊中，把有些「五風」氾濫，造成嚴重損失的，也當作民主革命不徹底來處理，以致把一些本質好只是思想作風有毛病的幹部，也當作階級敵人和壞分子鬥爭了。在重劃成份中，有的錯誤地把一部分勞動農民錯劃為地主、富農，在這些地方，混淆了兩類矛盾的性質，造成了階級陣營的混亂。不少地方，幾年來對於基層幹部撤職、懲辦（拔白旗）過多，加上這次處理不當，大大挫傷了黨員、幹部的積極性。[8]

針對這些情況，各省、市、區黨委普遍作出了的分期分批輪訓幹部的規劃；要求以退賠和堅決實現各項分配政策，加強經營管理作為貫徹《六十條》的主要內容；作好秋後系統地整風整社的準備工作。

4.基本核算單位再下放

《農業六十條》的制訂和貫徹，並不等於農村問題都解決了。8月23日，毛澤東在廬山召開會議討論：糧食、市場、兩年計劃和工業、工業管理、高等教育、幹部輪訓等問題。就在這天，毛召集中央常委和大區負責人開會，安排會議議程。毛問各地的收成、《六十條》貫徹及農村的情況，中南地區負責人陶鑄、王任重等說，《六十條》解決了生產隊的問題，但土地、耕畜、勞力歸生產隊所有，而分配則是以大隊為核算單位，所有權與分配權有矛盾。[9]應該說，這正是毛澤東一直在思考，而始終未拿定決心的問題。因此，毛說這個問題應當加以研究。就在這次會上，毛澤東在講話中說：

> 講到社會主義，不甚了了。《六十條》都是社會主義，這個問題究竟如何，你們說有一套了，我還不大相信。不要迷信廣州會議、北京會議搞了一套，認為徹底解決問題了。……現在搞了《六十條》，不要認為一切問題都解決了。搞社會主義，我們沒有一套，沒有把握。[10]

廬山會議後，毛澤東9月21日一到武昌，與湖北省委第一書記王任重談的就是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單位問題。據王任重日記記載：

> 21日主席到了武昌，下午我去看了他，除談災情以外，著重談了生產隊為（基本）核算單位的問題。主席是主張生產隊核算的。22日下午又找我去談了這個問題。
>
> 23日晚給主席送了關於生產隊改為（基本）核算單位的三份材料。24日午後，主席對我說：按照這兩份材料辦就很好，沒有話說。主席接見了書記處書記和地委第一書記，主席表示了他的看法。[11]

王任重向毛澤東送的是兩個生產大隊的材料，一個叫「大隊委託生產隊進行分配」，一個叫「擴大生產隊核算。」實際做法是：取消「三包一獎」，生產隊的收入除了完成國家徵購任務和上交大隊的公積金、公益金、管理費之外，其餘全歸生產隊進行分配。雖然都沒有明說以生產隊為基本核算單位，實質上是對《六十條》修正草案關於以生產大隊為基本核算單位的改變。這種做法試行的效果很好，解決了生產隊和生產大隊的矛盾、瞞產私分、窮隊與富隊間的「一平二調」問題。而且，簡便易行，比年年吵「三包」、吵分配要省事得多。

根據毛澤東「按照這兩份材料辦就很好」的指示，湖北省委召開常

委擴大會議，討論以生產隊為基本核算單位問題。結果毀譽參半，意見不一。省委向中央報告，請求批準進一步擴大試點。

對以生產大隊還是生產隊為基本核算單位的不同意見，早就存在。毛澤東在3月廣州會議時，曾批發了兩個材料。一個是山東省委農村工作部反映生產大隊與生產隊嚴重矛盾的情況；另一個是廣東省南海縣一個大隊試行上調任務包乾辦法的情況。因認識不統一，這個問題沒有展開討論。一直到北京會議，處理大隊與生產隊的關係都是規定按「三包一獎」的辦法，生產隊組織生產，生產大隊組織分配。

毛澤東從湖北北上，來到河北省邯鄲市。9月27日，他在这裏邀集河北、山東兩省及河北五個地區的負責人談話。參加座談會的有劉子厚（河北省委代理第一書記）、王路明（分管農業的省委候補書記），康修民（石家莊地委書記），寵均（邯鄲地委書記），胡開明（張家口地委書記）、劉琦（邢臺地委書記）、李悅農（保定地委書記）、周興（山東省分管農業的省委書記）、程懷仁（山東省委農村工作部副部長）。

座談會上，反映突出的問題還是大隊與生產隊的經濟關係問題。

河北省委根據在滿城縣的調查反映，推行「三包一獎」，僅在大隊、生產隊兩級，春季搞三包，夏收搞預分、秋收搞結算，最少就要經歷三十七道工序，四十九個百分比，算1928筆賬，光定額就有四百多個。

基層幹部説：「三包一獎有三愁，算帳、吵嘴、熬燈油。」

超產獎勵無法調動超產的生產隊的積極性。社員説：「這好比新出嫁的姑娘回娘家，帶回來的東西少，拿走的東西多。」

「三包一獎」包得了數，包不了心，大隊統一分配，生產隊怕吃虧．互相觀望，互相依靠，各打各的小算盤，出工不出力、瞞產私分。基層幹部説俏皮話；「三包一獎好是好，就是投機取巧管不了。」

保定地區唐縣峒龍公社，十一個生產大隊都實行「大包乾」（群眾叫「老包乾」、「砸估堆」），很受群眾歡迎。「大包乾」實際上就是以生產隊為基本核算單位。這個公社被評為「右傾」，他們也不改。糧食年年增產。牲口比1957年還多。國家徵購一年比一年增多。

毛澤東聽了兩省的匯報，當即表示：「這是一個大問題，不以腳為基礎，以腰為基礎，腳去生產，腰在分配，鬧平均主義。」

9月29日，毛澤東將他親自作的《邯鄲談話會記錄》轉送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時附上河北深縣五公公社耿長鎖的一封信、山東省委1961年3月關於大小隊矛盾問題座談會材料，湖北省委9月25日的報告、以及河北的一批材料。毛澤東在給常委的信中寫道：

> 這些材料表明，我們對農業方面的嚴重平均主義的問題，至今還沒有完全解決，還留下一個問題。農民説，六十條就是缺了

這一條。這一條是甚麼呢？就是生產權在小隊、分配權卻在大隊，即所謂「三包一獎」的問題。這個問題不解決，農、林、牧、副、漁的大發展即仍然受束縛，群眾的生產積極性仍然要受影響。……我的意見是：「三級所有、隊為基礎。」即基本核算單位是隊而不是大隊。……我以為非走此路不可。在這個問題上，我們過去過了六年之久的糊塗日子（1956年，高級社成立時起），第七年應該醒過來了吧。[12]

同時，毛澤東委託鄧子恢召開中央有關部門負責人的座談會，座談實行以生產隊為基本核算單位的問題。毛澤東把這事交給鄧子恢，除因為鄧早就主張起草一個人民公社的條例，受到毛的表揚外，還因為在3月廣州會議上，鄧子恢就明確提出：

> 公社三級所有隊為基礎，把基礎放在大隊一級是不可以的。既名為基礎，就意味著它是一個經營的實體和居於最底的層次。因此，把基礎放在生產隊最為恰當，它是最基層，生產、生活都直接聯繫群眾，又是生產的具體組織者和指揮者。同時，生產隊規模，一般只有二三十戶，以它為基礎和變成經營實體，很適應目前基層幹部的經營管理水準。反觀生產大隊，它不僅居於中間層次，而且多數是由過去的行政村組成的，規模一般都在一百戶以上，很不利於組織生產。[13]

這個意見當時雖未被會議多數接受，卻是毛澤東正在考慮的。10月3日，鄧子恢在懷仁堂召開中央有關部門負責人的座談會。6日，向毛澤東寫報告說：「大家完全擁護主席所提人民公社所有權下放以生產隊作為基本核算單位的指示。」[14]10月7日，中共中央發出指示，要求各中央局、省、地、縣在10月下半月和11月上半月內，進行研究並下鄉試點。

毛澤東再次派田家英專就這個問題進行調查，並為中央起草一個指示，把這個問題提到全黨面前進行研究。田家英選定了山西長治地區的一個農村，作為調查地點。經過調查，他認為毛澤東的意見完全正確，遂即帶着幾個人為中央起草《中共中央關於改變農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單位問題的指示》草案。毛澤東對這個文件看得很細心，畫了很多杠杠，田家英高興地拿給妻子董邊看，說：「我自己認為寫得好的地方，主席都劃了杠杠。」[15]《關於改變農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單位問題的指示》經1962年1月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即七千人大會）討論通過後，中共中央於2月13日下達執行。指示說：

> 基本核算單位下放，這是繼《十二條》、《六十條》之後，調整我國農村生產關係的又一重要政策。……把它簡單地看作是一項臨時性的措施，一種權宜之計，都是不正確的。在我國絕大多數地區的農村人民公社，以生產隊為基本核算單位，實行以生產隊為基礎的三級集體所有制，將不是短時期內的事情，而是在

一個長時期內，例如至少三十年，[16]實行的根本制度，基本核算單位一經確定之後，就要穩定下來，不能任意變動。[17]

此後，以生產隊為基本核算單位的規定，載入了1962年9月29日中共八屆十中全會通過的《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修正草案）》，此後再未作過修改。這個基本體制框架，一直延續到1970年代末。

從1961年3月的廣州會議到6月的北京會議，再到1962年初的中央工作會議，由毛澤東主持起草的《農業六十條》幾經修改，從縮小社隊規模，取消供給制、公共食堂，發放自留地，開放農村集市貿易，把基本核算單位下放給生產隊，步步退卻，人民公社終於塵埃落定。雖仍保留了人民公社「政社合一」，「三級所有、隊為基礎」兩個基本特徵，但與1958年那個「一大二公」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橋樑的人民公社，已相去甚遠，這對中國農民來說無疑是一次重大解脫。對毛澤東而言，退到以生產隊為基礎，已是最後底線。在他看來，農村政策已經定型，但在農民們看來，社員與社員間的平均主義問題並沒有完全解決。

[1] 《劉少奇年譜（1898-1969）》，下卷，頁524。

[2] 劉少奇：〈當前經濟困難的原因及其克服的辦法〉（1961年5月31日），載《劉少奇選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頁337-338。

[3] 《周恩來傳（1949-1976）》，頁1595-1596。

[4] 《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頁1163-1166。

[5] 〈鄧小平、彭真給毛澤東的信〉（1961年5月10日），載《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十四冊，頁326-327。

[6]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九冊，頁519。

[7] 〈中共中央關於討論和試行《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修正草案）的指示〉（1961年6月15日），載《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十四冊，頁378-379。

[8] 中央農村工作部編印：〈各地貫徹執行六十條的情況和問題〉（1961年8月24日），載《農業集體化重要文獻彙編（1958-1981）》，下冊，頁495-496。

[9] 《毛澤東和他的秘書田家英》，頁84。

[10] 《毛澤東和他的秘書田家英》，頁83-84。

[11] 王任重日記（1961年9月26日），見《毛澤東傳（1949-1961）》，下冊，頁1175。

[12] 毛澤東：〈關於解決農村基本核算單位問題給中央央常委等的信〉（1961年9月29日），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摘》，第九冊，頁565-566。

[13] 《鄧子恢傳》，頁538。

[14] 《鄧子恢傳》，頁546。

[15] 《毛澤東和他的秘書田家英），頁85。

[16] 1962年2月8日，田家英向毛澤東報送的指示稿中，關於基本核算單位下放後多少年不變的時間寫為「例如四十年內」。鄧小平主張改為「二十年」。田向毛請示：究竟寫「四十年」，還是寫「至少二十年」？毛澤東將「四十年內」改為「至少三十年內」，並批示說：「以改為『至少三十年』為宜，蘇聯現在四十二年了，農業還未過關，我國也可能需要幾十年，才能過關。」毛澤東給田家英並告鄧小平、劉少奇、周恩來的信（1962年2月11日），載《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頁1181。

[17] 《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十五冊，頁180。

六、責任田的出現和分歧

1.包產到戶的出現

隨着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的出現，如何進行生產管理就成了問題。當時農民們編的順口溜說：「幹部亂派工，社員磨洋工，上工一條龍，幹活一窩蜂。」又說：「出工鷺鷥探穴，回家流星趕月，幹活李逵嘆苦，評分武松打虎。」說明這種集體大呼隆地搞生產，損害了社員的生產積極性。因此，各地都在探索把社員勞動與分配勞動成果聯緊在一起的管理方式，不少地區採取「包工包產」的辦法，其中多數包到了生產組，四川省江津地區的許多農業社一直包到了戶。

但第一次真正有領導地搞包產到戶，是1956年春在浙江省的永嘉縣。時年二十四歲的中共永嘉縣委副書記李雲河，與縣委農村工作部幹部戴潔天從蘇聯集體農莊的歷史、[1]《人民日報》發表的〈生產組和社員都應該「包工包產」〉的文章中得到啟發，明確提出實行「個人專管制」和「包產到戶」的做法。在得到溫州地委農村工作部部長同意試驗的認可（「試驗可以，推廣不行」），以及縣委書記李桂茂的支持後，永嘉縣委常委會決定組成工作組，選定在經營管理基礎較好、領導班子能力較強的燎原農業生產合作社進行包產到戶的試點。對這種做法，社員們開頭也是議論紛紛，勞力強的歡迎，勞力弱的有疑慮，也有人反對。實踐的結果是，1956年遇到了乾旱、颱風、洪水三大災害，但燎原社的莊稼長得很好。戴潔天高興地說：「聯產計酬真靈啊！社員的精神面貌大不一樣了！」1956年9月，李雲河將燎原社試點的《包產到戶總結》送到了縣委領導面前。永嘉縣委召開千人大會介紹了燎原社包產到戶的成功經驗，決定進一步作多點試驗。由於永嘉的做法得到了浙江省委的支持，一時永嘉和鄰近的十二個縣的一千多個社約十七八萬個農戶實行了包產到戶的責任制。[2]

1957年初，廣東省佛山地區一些農業社鬧退社，另一些社則實行了包產到戶。要求包產到戶的農民則更多。波及廣東、江蘇、河南、山西等許多省市。

對包產到戶的辦法，一開始就有反對意見，他們認為這是一種倒退，回到了單幹。《浙南大眾日報》為此專門發表了〈不能採取倒退的作法〉的社論，指責包產到戶是發揚「小農經濟積極性」，是打「退堂鼓」。因此，1957年夏季以後，隨着「反右派」鬥爭的開展，包產到戶受到了嚴厲的批判並被堅決取締。李雲河被劃為右派分子，開除黨籍，撤銷職務，勞動改造；戴潔天成了右派和反革命雙料罪犯，押回原籍管

制，舉家遣往農村。其它人等，或撤職、或降薪、或勞動教養。二百多農民遭批判，二十多人被判刑收監，其中一人死於獄中。

過了兩年，包產到戶1959年又在河南新鄉地區信陽縣、洛陽地區臨汾縣的一些農村出現。廬山會議反右傾後，抓住這個典型，在全國展開了批判。是年11月2日，《人民日報》發表評論員文章——〈揭穿「包產到戶」的真面目〉認為，「右傾機會主義者仍然頑固不化，他們用種種偽裝、想種種『理由』，為資產階級和部分富裕中農反社會主義的私貨尋找道路。」[3]包產到戶再次被壓了下去。

然而，包產到戶屢踣屢起，1961年春再次捲土重來。農民們所說：「我們已經連續五年沒有吃飽飯了，這樣做，是迫不得已的。」「我們的腦子想進步，就是肚子太反動了。」[4]於是，出現了分田到戶、包產到戶、責任田、口糧田、借冬閒田等多種形式，人們稱之為「救命田」。實行包產到戶的，安徽全省占85.4%；[5]廣西柳城縣占65.2%、龍勝縣42.3%；[6]甘肅省康縣、臨洮、武威、通渭等縣、浙江和四川的局部，十中有七；福建連城和貴州全省，十中有四。廣東、湖南、河北、遼寧、吉林、黑龍江，情況大體相同。[7]

安徽省所以發展得規模如此之大，與省委第一書記曾希聖有關。曾希聖與河南的吳芝圃在1958年的「大躍進」中都曾是「冒尖」人物。1960年，就在吳芝圃為河南出現大規模非正常死亡遮遮掩掩的時候，曾希聖已開始反省。他心情焦慮不安，心存負疚，一直在尋找渡過難關的辦法。最初，曾也試圖從加強集體生產責任制入手研究對策。1960年10月，中共中央任命曾希聖以華東局第二書記的身份，兼任山東省委第一書記。11月，他趕回安徽，提出實行劃小包產單位，這套辦法起了一些作用。但仍然沒有解決問題。群眾說：這是大呼隆變成二呼隆，大鍋飯變成二鍋飯。1960年12月，曾希聖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聽到毛澤東說：「可以把高級社時期實行田間管理農活包工到戶的辦法恢復起來。」曾由此受到啟發，明確提出恢復農村經濟「可以考慮走包產到戶的路子」。1961年2月，曾希聖請辭山東省委第一書記，調回安徽。在火車上，又聽到副省長張祚蔭談下面的一個故事：

1960年初，正是廬山會議後的「反右傾」高潮，安徽宿縣一個老農，叫劉青蘭，七十三歲，兒子有肺病，別人勸他進敬老院，他向公社要求，不吃公家飯，帶着生病的兒子上山開荒種地和休養。父子倆開荒十六畝，收穫三千三百斤，扣除自用，上交糧食一千八百斤，現金六十元。他匯報了自己的經驗，並向有關領導建議，最好把田包給社員去種，統一分配，不然不少社員混工，沒有責任心，生產搞不好。

老農的事蹟和建議使曾希聖很受啟發，稱這個老農是很有社會主義覺悟的人，認為「包產到戶」是群眾的創造，應該推廣。2月14日回到合肥，立即召開會議，提出了聯產到戶責任制的設想，這時，「包產到

戶」仍被視為異端邪說，受到批判。大家感到有風險，需請示行事。會後，曾希聖親自向華東局第一書記柯慶施匯報，柯慶施答覆說，這個辦法可以試驗，不要推廣。

不久，柯慶施路過安徽全椒縣古河鎮，休息時與當地幾個老農交談，老農向他當面提出「你們最好把田包給我們種，我們保證種好」。並且質問柯：「為甚麼不相信我們？」柯慶施到合肥後，把這一情況轉告了曾希聖，這時柯慶施似乎並未表示異議。宿縣和全椒兩處老農的事蹟和建議，以及柯慶施的態度，增強了曾希聖的決心和信心，親自率人到市郊蜀山公社南新莊生產隊搞試點。1959年毛澤東視察過這個生產隊，有知名度，試驗成功有號召力。試點結果，很受農民歡迎。

試點雖然得到柯慶施的同意，但要在全省推行，還是要取得最高領導人的認可，至少是默認。

3月6日，安徽省委討論了試點情況，決定全面試行「責任田」的辦法，3月7日，曾希聖帶着這個決定赴廣州，參加中央工作會議。3月15、16日，曾希聖當面向毛澤東匯報了這個問題，毛澤東表態說：「你們試驗嘛！搞壞了檢討就是了，如果搞好了，能增產十億斤糧食，那就是一件大事。」毛澤東與曾希聖談話時，山東省委書記譚啟龍在座，耳聞目睹了談話情景，毛澤東表態後，曾希聖如釋重負。他興奮地打電話告訴安徽省委：「已經通天了，可以搞。」[8]於是省委立即向各縣委第一書記發出一封信，要求全面推行責任田。[9]

然而，如同1956年一樣，不少人認為，這種做法與集體化方向背道而馳。繼續以「公」、「大」、「平」作為衡量是非的標準。有的認為，這是「單幹」，會引起農村兩極分化，對孤寡老弱不利，田家英就是這種看法的代表。

廣州會議期間，田家英將一份安徽包產到戶的材料送給毛澤東，並寫一封信。他看到材料裏反映一些缺乏勞動力的社員，特別是孤兒寡婦在生產生活上遇到的困難，無法控制自己的感情，含着眼淚寫道：

> 寡婦們在無可奈何的情形下，只好互助求生，他們說：「如果實行包產到户，不帶我們的話，要求給一條牛，一張犁，八個寡婦互助，爬也爬到田裏去。」看到這些，令人酸鼻。工作是我們做壞的，在困難時候，又實行甚麼包產到户，把一些生活沒有依靠的群眾丟開不管，作為共產黨人來說，我認為，良心上是說不過去的。

信中還說，為了總結經驗，包產到戶作為一種試驗是可以的，但是不能普遍推廣，「依靠集體經濟克服困難，發展生產，是我們不能動搖的方向。」[10]

田家英的擔憂同毛澤東是相通的。毛立即將這份材料連同田的信批給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幾位大區書記。

中南局書記陶鑄見到田家英説：「家英呀，我赞成你的意見。」

陳雲不以為然。他說：「安徽搞包產到戶，應該允許人家試驗嘛！」[11]

會上，田家英的觀點代表了主流。毛澤東讓柯慶施轉告曾希聖：責任田「可以在小範圍內試驗」。毛澤東的這個指示含義已經與原來有所不同，限制了實驗面。曾希聖感到很大壓力，不得不於3月20日，打電話回去，通知暫停推行。這時，全省已有39.2%的生產隊實行了「責任田」。

同日，曾希聖又給毛澤東並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彭真、柯慶施寫了一封信。信中說：「關於『定產到田，責任到人』的辦法，有些同志有誤解，所以再作一些説明。」他説，這種辦法好處是改變了計算工分只講數量、不講質量的缺點，堵塞了投機取巧、更好地體現按勞分配的政策；提高每個社員對包產的责任心和生產積極性，從而改變了過去對包產只是生產隊幹部關心或包辦，而社員不甚關心或完全處在被動的情況。壞處是：可能發生「各顧各」的危險，有些農活可能會出現爭先恐後的現象，自私自利思想可能發展，困難戶的困難可能得不到解決等。曾希聖特別強調他們的辦法是「定產到田，責任到人」（後來簡稱為「責任田」）與群眾要求的包產到戶不同。具體做法是實行「五個統一」。即：計劃統一、分配統一、大農活統一、用水管水統一、抗災統一。[12]曾希聖想説明這「五統一」將管住農民滑向單幹，也想用這「五統一」來抵擋政治風險。目的是想説服毛澤東，希望他進一步支持。可是毛澤東沒有表態。

3月28日，曾希聖回到合肥，讓省委辦公廳電告下面停止推行責任田。然而，農民品嚐到了甜頭，想刹車也不行了。幹部們都感到難收，沒有採取甚麼收的措施。由於示範效應，由於各級幹部的默許，在夏收之後，又有不少生產隊自動實行「責任田」。曾希聖和安徽省委看到，這種辦法極受廣大群眾的歡迎，反而堅定了自己的看法。

當時，毛澤東正在作調查研究，《農業六十條》還未定型，對安徽的做法未作定論。安徽的責任田引起了整個社會的關注，爭論越出了省界，來信來訪者很多。為了説明真相，爭取中央和毛澤東的支持，安徽省委數次向中共中央、毛澤東和華東局寫報告。

4月27日，安徽省委向中央和毛澤東寫出報告，匯報「包工包產責任制」的情況。陳述了這種辦法在實踐中顯示的好處。分辯説：「這個辦法不是『包產到戶』更不是『分田』，這和《六十條》中所説的『實行嚴格的田間管理責任制』，『有的責任到組，有的責任到人』是完全一致的。」

7月24日，安徽省委再向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報告。對安徽的「責任田」與包產到戶、單幹的區別；會不會造成兩極分化；會不會加重社員

的私心作了長篇解釋。指出：

安徽實行的是「田間管理責任制加獎勵的辦法」，「是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一種管理方法」，它「沒有改變生產资料的所有制」；「沒有改變產品收入的分配辦法」，包產以內的產品收入仍由大隊統一分配，社員仍然是按勞取酬；「沒有改變集體的勞動方式，這不僅表現在大農活是統一做的，而且小農活也是為了完成總的包產任務而進行勞作的，所以仍然是集體生產的一個組成部分。這種生產的集體性與勞作的個別性，在任何社會主義的生產單位中都是存在的」。所以說：「這個辦法不是『包產到戶』，不是單幹。」

由於沒有改變生產资料所有制，沒有改變產品的統一分配。社員所做的工分是生產隊根據生產需要包給的，有一定的限度；承包的田間管理責任田，只要定產恰當，不過於偏低，超產也是有限度的。至於勞力少勞力弱的困難戶，因為田間管理工都是按照他們自己的勞動能力承包的，而且又有許多關照，如幫助搞副業，包近田、好做的田，產量比一般的責任田定得低一些。因此，即使超產比勞力多勞力強的戶可能會少一些，但也不會少的太多。對不足以維持生活的困難戶，還會從公益金中予以補貼，從救濟款中給以救濟，生活是有保障的。所以，這個辦法不會造成兩極分化。

關於是否會加重社員的私有心理。報告引用社員的話說：這種私心過去有，現在也還有。過去的私心是暗的，如混工、爭工分，不關心農活質量，這種私心對生產危害最大；現在的私心是明的，想種好責任田，爭取多得超產糧，這種私心和責任心分不開，對生產有很大好處。至於是否會引發社員對土地的私有觀念，報告指出，責任田是按照每戶的勞動能力來定的，不是按人分攤；每年要根據勞力情況進行調整，不是長期固定不變；社員對責任田只有操作權，沒有私有權。

報告結論說：「田間管理责任制加獎勵的辦法，是適合當前生產力的發展水平和群眾覺悟水平的，是符合當前農業生產以手工操作為主的特點的，只要正確地貫徹執行，它能夠發揮對組織和推動生產的積極作用。」[13]

7月，毛澤東路過蚌埠，曾希聖連夜趕到蚌埠，在列車上當面向毛澤東匯報。據薄一波回憶，毛澤東勉強說了一句：「你們認為沒有毛病就可以普遍推廣。」[14]

有了毛澤東的這個說法，安徽全省上下放開了手脚，責任田迅速推廣。1961年底，全省實行責任田的生產隊達90.1%。安徽的责任田產生了巨大威力，結出了豐碩之果。廣大幹部群眾一直稱頌責任田是「示範田」、「恢復和發展生產的靈丹妙藥」，農民說：「實行責任田算是摸透了我們的心。」

2.責任田風波暗起

責任田，實質就是包產到戶，安徽推行最積極，但並非安徽一省。湖南省採取的是「借冬閒田」的方式，省委指示各公社，允許借一部分冬閒田給社員種植冬菜和冬種春收作物。「借給社員的冬閒田土的收入，全部歸社員個人所有，不交徵購，一般也不抵口糧。」同時指出：這是「為了盡可能多搞點吃的，是為了生產自救」，「決不是分田到戶」。[15]河南省實行的也是「借地度荒」，即借給農民一部分土地，給一把鐵鍬，發一點種籽，讓他們生產自救。借地不計徵購，但要頂口糧，時間定為五年。實際上這種借地的辦法都已「普遍實行開了」。[16]中央各調查組下農村時，幾乎都發現有些農村實行了包產到戶，或者農民要求包產到戶。

责任田的好處，是有目共睹的。搞了責任田的很快解決了吃飯問題，還完成了徵購任務；沒有搞責任田的仍在餓肚子。歷來窮出了名的安徽省，搞了責任田，1961年竟出現了有糧食外調的奇跡。阜陽、宿縣兩個地區取得了四十年來少有的好年成。1961年山芋（紅薯）獲得大豐收，自己吃不完，還支持河南、山東和江蘇的部分災區。安徽省委專門發了文件，要各地不要攔截運往外省災區的糧食，河南省的駐軍出動各種車輛幫助災區運送糧食，蚌埠鐵路分局還增開了運糧專列。後來，中南局第一書記陶鑄、書記處書記金明和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劉建勳等，於1962年2月專程來到宿縣，對安徽的幹部、群眾表示感謝。在安徽責任田起重大的作用的1961年，全省超額完成國家糧食徵購。

當年向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寫信力保責任田的安徽省太湖縣委宣傳部幹部錢讓能，在信中講到實行責任田後發生的新的根本性轉折是：「荒、逃，餓、病、死，一瞬而基本變成熟（荒地變成了熟地）、回（外流回歸了）、飽（人民基本上是吃飽了，有部分地區還吃得較好而有餘）、健（體質健康了，有病的也不多了）、生（婦女懷孕了，江塘公社甘嶺大隊668個人，1962年懷孕的就有六十個婦女）。」他還舉了這樣幾個生動的例子：1961年太湖縣的幹部下鄉，在農民家吃飯，農民都不願收幹部的糧票，即使在原來的重災區，農民們說：「同志，下半年年成好，你們就不要帶糧票了。目前雖比豐收地區差一些，但是比你們二十五斤半還是好些。」劉羊公社一個醫生說：「現在我給群眾看病，每天至少要吃十個雞蛋，1960年看病不講吃這麼多，就連見也見不到這麼多。」再就是徐橋嫁到宿松縣的姑娘們，三五天就往娘家跑，她們的父母說：「那邊吃不飽，叫她回來多吃幾餐，女婿不好意思來，她每次回去總是要帶走八至十斤的。唉！那邊（指宿松縣）不搞责任田，真急人！」[17]

但是，正如錢讓能在信中所指出的，一部分好心人對責任田「不知

底裏」；另一部分人還是以「本本主義」理解社會主義，擔心和指責，包產到戶就是倒退，就是走资本主義道路，或者有滑向资本主義道路的危險。好心人除前面提到的田家英，時任中共中央委員、共青團中央第一書記的胡耀邦，也於1961年下半年向中央寫報告，認為責任田是一種起過作用但具有危險性的做法。他說：這種做法對調動社員的勞動積極性確實起了積極作用，這是一個客觀事實，我們並不否認這個事實，一棍子打死。但是，這種做法已經出現了一些難以解決的矛盾和糾紛。隨着時間的推移，它不可避免地要發生一系列的危險：（1）會發生不等價換工，從而產生剝削；（2）違反簡單協作優於單個的原理，從而降低生產效率；（3）大家既然對集體生產資料不關心，就不可能發展擴大再生產的能力；（4）集體觀念要淡漠下去，集體組織也就會癱瘓。總起來説，這種做法發展下去，最後會引導到降低整個社會生產。

中央農村工作部當時也不贊成包產到戶。1961年8月24日編印的題為〈各地貫徹執行六十條的情況和問題〉的《農村简訊》指出存在十個問題，其中特別談到：

在一部分生產力破壞嚴重的地區，相當一部分幹部和農民對於集體生產丧失信心，以致發展到「按勞分田」、「包產到戶」、「分口糧田」等到變相恢復單幹的現象。個別地方，發現有少數富裕中農帶頭拉馬退社，有的還敲鑼打鼓，放鞭炮，慶祝所謂「土地還家」。更值得注意的，是推行「包產到戶」的作法，儘管這種地區並不佔多數，表現形式和具體作法上也各有不同，但帶有一定的普遍性，差不多每個省、市、區都有發現。個別地方則是有領導地自上而下地執行這種作法。有些地方，集體生產已經搞亂，幹部已經躺倒。馬上恢復為集體生產確有實際困難。

這段話雖然客觀地反映了農村許多地方都實行了包產到戶，而且得到農民的擁護。但把包產到戶看成是變相單幹而持否定態度是明確的。不僅如此，這份材料還認為一些經營管理方面的責任制的辦法也有可能走向變相單幹的危險。材料中説：

> 在經營管理方面，發現了一些錯誤的作法。如在勞動組織方面，還沒有解决集體责任制和個人責任制正確地结合的問題。有些地方在實行田間管理責任制中，把下種以後、收割以前的佔全年農活百分之五十以上的田間農活包工到户，叫做「田間管理包到户」或「田間管理責任制」。结果，引伸到變相的「包產到户」。或者是部分產量包到户，損害了集體生產。在對社員的勞動報酬方面，有的地方採取了單純的物質刺激的辦法。例如規定完成每項農活給多少糧食。结果是糧食多的活，人們搶着幹，少的不幹；今天有糧食，搶着出勤，明天沒有，就不出勤。[18]

這種種聲音，不能不影響到毛澤東的態度。毛在上半年同意曾希聖

試驗一下，大概也只是當作少數地區的權宜之計。據毛澤東身邊的工作人員回憶，毛的態度至為勉強。所以，當形勢稍有好轉，毛的態度就發生了變化。這種微妙變化在1961年秋就流露了出來。9月6日，在廬山會議上，毛澤東在上述中央農村工作部的简報上專門寫了一段批語，印發與會者，並要求他們帶回去，召開一次省委擴大會，「對此件第二部分所提的十個問題，作一次認真的解決」。[19]

11月13日，中共中央發出在農村進行社會主義教育的指示。中心內容，是要提高農民對集體生產的積極性，鞏固和發展集體經濟。要使農民懂得，只有依靠集體經濟的發展，才是唯一正確的出路。要用合作化以來的事實，特別是當地的典型例子，向農民宣傳集體經濟的優越性。強調：「目前在個別地方出現的包產到戶和一些變相單幹的做法，都是不符合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原則的，因而也是不正確的。」[20]要求通過社會主義教育，克服農民的動搖，引導農民改變包產到戶的做法。

12月13日，毛澤東來到江蘇無錫，14、15日聽取江渭清、曾希聖匯報。在談到農村基本核算單位下放問題時，毛説：貫徹要快一點，一傳達下去可以調動積極性。並特別指出：「包產到戶這事，不可幹。」[21]毛還用商量的口氣對曾希聖説，生產恢復了，是否把「責任田」辦法變過來。曾沒有附和。他對毛説，群眾剛剛嚐到甜頭，是否讓群眾再搞一段時間。顯然，曾沒有領會毛的想法。曾希聖所以想出一個「責任田」的名稱，就是想把它與包產到戶區別開來，尤其避免有單幹之嫌。然而在毛澤東看來，它們沒有甚麼不同。

就在這時，為包產到戶上書正名的小人物也大有人在。1961年初冬，著名經濟學家、北京大學校長馬寅初接到一封信件，內容長達一萬字，每一句都在述説包產到戶的必要以及它的好處。作者請求馬寅初把這封信轉交給毛澤東，還在信的最後寫道：「為了黨和國家的利益，我不能停止我的戰鬥。有人講我這樣下去很危除，一鬥、二鬥把自己的腦袋鬥下去。我回答説，這是你們的説法，是你們的觀點方法問題。我鬥得對，我很站得住腳。」這簡直就是一份為捍衛包產到戶的宣言書！

馬寅初與寫信人素昧平生。但從信封上知道，這個人是浙江省嵊縣人，他的同鄉，名叫楊木水，鄉下年輕的蠶桑技術員。楊把信寄給馬寅初，是覺得馬老是位品學兼修的同鄉，有着上達民聲的熱情和威望。哪裏知曉，自從毛澤東質問馬寅初限制人口的理論，是馬克思的還是馬爾薩斯的以後，馬老的處境已很艱難。然而，馬寅初對這封鄉親的來信和重託極為重視。他居然專程回鄉去面晤楊木水。當他把楊木水邀進自己的房間之後，縣委的官員們就驚慌不安起來，不斷派出政府的代表前去敲門，希望加入進去，以此來阻止這一老一少的推心置腹。這令馬老先生極為震怒，他拒絕任何人的參與，直到幫助楊木水把包產到戶的「宣言書」修改一遍才開門出來。分手之時兩位剛剛結成忘年之交的朋友面

面相覷。老的說：「正確的意見不要輕易放棄，真理是批不倒的。」小的想說甚麼卻甚麼也沒有說，後來他對女友說：「說不定哪一天我就會被捕判刑，坐牢流放。我們分道揚鑣吧。」

這封包產到戶「宣言書」的後果，人們不得而知。但在1962年1月的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即七千人大會）上，安徽的「責任田」遭到批評。此後曾希聖被免去安徽省委第一書記的職務（保留華東局第二書記這個虛職）。不久，在「包產到戶」問題上，中共高層引發了重大分歧。曾一度反對包產到戶的田家英，因再次去湖南調查，摸清民情，轉而主張包產到戶，但在向毛澤東匯報時受到了嚴厲批評。陳雲經過調查，就分田到戶問題同劉少奇、周恩來、林彪、鄧小平等人交換意見，大家都沒有表示不同意見。[22]陳雲因此當面向毛澤東陳述了分田到戶的理由。毛澤東很是生氣。[23]曾在廣州會議上受毛澤東表揚的鄧子恢，也曾當面向毛澤東陳述過包產到戶的主張。陳雲、鄧子恢等領導人後來被指责：鼓吹「單幹風」；毛澤東甚至當面指責劉少奇，在包產到戶問題上為甚麼沒有頂住。[24]一批為責任田和包產到戶辯護的不知深淺的小人物，都為此遭到滅頂之災。決策者又一次與上億農民的願望相悖。

[1]　［蘇］奧沙基柯等：《集體農莊的生產組織》（瀋陽：東北人民出版社，1954）介紹了「星」、「鬥爭」、「先鋒」等集體農莊1940年代在分級定額、按件計酬的基礎上，給莊員以固定地段作為計件制的特殊形式，實行了聯產計酬的辦法。這種辦法實行以後，每公頃玉米增產七公擔，鞏固了生產組這個基本勞動組織形式。後來，這種做法被撲滅。

[2] 廖蓋隆：《中國農村改革的源頭——浙江永嘉包產到戶的實踐》的序言之一，載中共永嘉縣委黨史研究室籌編：《中國農村改革的源頭——浙江永嘉包產到戶的實踐》（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5），頁1。

[3]《新華半月刊》1959年第22號，頁21。

[4]　〈中共甘肅省委關於加強農業集體生產領導和適當放寬小自由的報告〉（1962年5月5日），載《建國以來農業合作化史料彙編》（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2），頁705。

[5]　〈中共安徽省委關於改正「責任田」辦法的決議〉（1962年3月20日省委常委會議通過），載《建國以來農業合作化史料彙編》，頁698。

[6]　〈中央監委關於《廣西農村有不少黨員幹部鬧單幹的情況》簡報〉(1962年2月28日），載《建國以來農業合作化史料彙編》，頁695。

[7] 當時搞各種包產到戶的，安徽全省達80%，甘肅寧夏地區達74%，浙江新昌縣、四川江北縣達70%，廣西龍勝縣達42.3%，福建連城縣達42%，貴州全省達40%，廣東、湖南、河北和東北三省也都出現了這種形式。據估計，當時全國實行包產到戶的約佔20%。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頁1078。

[8]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頁1079-1080。

[9]　邱石編：《共和國重大決策出台前後》，第三卷，下冊（北京：經濟日報出版社，1998），頁840-842。

[10]《毛澤東和他的秘書田家英》，頁89。

[11]《毛澤東和他的秘書田家英》，頁90。

[12]　〈曾希聖給毛澤東的信〉（1961年3月20日），載《建國以來農業合作化史料彙編》，頁649-650。

[13]　〈中共安徽省委關於試行田間管理責任制加獎勵辦法的報告〉（1961年7月24日），載《建國以來農業合作化史料彙編》，頁652-654。

[14]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頁1080。

[15]　〈中共湖南省委關於借冬閒田給社員生產的通知〉（1961年8月26日），載《建國以來農業合作化史料彙編》，頁659。

[16]　〈劉建勳關於河南實行借地渡荒問題的報告〉（1962年7月24日），載《建國以來農業合作化史料彙編》，頁719。

[17] 錢讓能：〈關於保薦責任田辦法的報告〉，載《建國以來農業合作化史料彙編》頁721-724。

[18] 中央農村工作部編：〈各地貫徹執行六十條的情況和問題〉（1961年8月24日），載《農業集體化重要文件彙編（1958-1981）》，下冊，頁495。

[19] 毛澤東：〈對各地貫徹執行農業六十條情況簡報的批語〉（1961年9月6日），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九冊，頁548。

[20] 〈中共中央關於在農村進行社會主義教育的指示〉（1961年11月13日），載《建国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十四冊，頁767。

[21] 毛澤東聽取江渭清等匯報時插話的傳達記錄（1961年12月20日），載《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頁1186。

[22] 《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頁1230。

[23] 1982年11月22日，陳雲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講話說道，1962年7月6日下午，毛澤東約見陳雲，陳申述了主張實行分田到戶的理由。「談話以後，毛澤東同志很生氣。」《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頁1230。

[24]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金沖及主編：《劉少奇傳》（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頁909。

第十章

實行全面調整重建社會秩序

一、挽救糧食危機多管齊下

1961年1月，中共八屆九中全會確定調整方針。但在9月以前，整個工作的重點主要還在恢復農業、調劑市場、精減職工等緊急度荒措施方面。

1.全力支援農業恢復

為促進農業的恢復，在先後制定、貫徹《農業十二條緊急指示》和《農業六十條》，解決人民公社的體制問題的同時，還在宏觀政策上採取了向農業傾斜的具體措施。一是減少糧食徵購，減輕農民負擔。1961年糧食徵購量為809.4億斤，比1960年的1021億斤減少了212億斤，佔當年糧食產量的比重由上年的35.6%下降到27.6%，同時調低了農業稅率，從1957年的11.67%下降到10%。二是從各方面精簡和節約勞動力加強農業生產第一線。從上年秋開始，除從農村本身擠出勞動力外，也從城市精簡和動員了一批從農村招收的工人和盲目流入城市的人口回到農村。到1961年春，新增農業勞動力有2913萬人。三是提高農副產品的收購價格，1961年1月，平均提高幅度，糧食為20%，油料為13%，生豬為26%，家禽和蛋為37%。[1]部分地區提高烤煙、麻、茶葉等農產品價格高達30%-50%。4月，又決定對收購棉花、油料、烤煙、麻類、茶葉、蠶絲、糖料等主要經濟作物，實行糧食獎勵的政策。[2]與此同時，中央還將農副產品劃分為一、二、三類，實行不同的收購政策。對一類（糧、棉、油）繼續實行统購統销；對二類產品（猪、牛、雞、蛋、烤煙等二十四種）實行派購，完成任務後允許自由上市；對三類產品，則允其上市出售，自由定價。[3]

盡快恢復農業的另一個措施是，動員各行各業支援農業。主要是加強工業對農業的支援。如增撥鋼材、木材等物资，組織手工業和部分工業企業全力修復、趕製中小農具。千方百計增加化肥、農藥等農業生產資料的供應量，在不斷壓缩基本建設規模的情況下，支農工業投資在全部投资中的比重由上年16.77%上升到18.4%。[4]

對如何增產糧食，負責財經工作的陳雲一直給予很大的關注。增產糧食，除調動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外，主要靠增產化肥，發展水利，改良品種、增加拖拉機等，但是許多措施不是短期所能奏效的。因此，陳雲首先想到的是增加化肥的生產。1960年7月上旬到9月上旬，陳雲在北戴河參加中央工作會議期間，看到美國的一些资料，得知美國除雨量比中國多而平均外，美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幾年中糧食所以能增產

60%，一半靠良種、一半靠化肥。這就更堅定了陳雲通過增產化肥來解決糧食問題的決心。一開始，他主張先推廣小型合成氨廠。陳説：「三年內建設年產八百噸的小化肥廠一萬個，使年產化肥達到六百四十億斤，平均每畝施化肥五十斤。」[5]以每斤肥料增加四斤糧計算，就可在現有基礎上增產二千四百億斤糧食。但是，製造小型化肥廠設備也不是輕而易舉的事。所以，陳雲同時對中型和大型的化肥廠的建設也給予關注和支持。後來經過反覆研究、試驗，證明小型化肥廠在技術上沒有過關，而且不經濟，陳雲便把關注的重點轉到搞年產二萬五千噸或五萬噸合成氨的大型化肥廠。1961年3月上旬，陳雲在聽取化工部負責人匯報情況時指出：

> 现在看來，小型的沒有搞成，只有在大型和中型之間選擇。中型的雖好，但技術上也不能說過了關。大型廠是照搬外國的，技術是過關的，無非需要的設備、材料多些而已，這可以靠進口解決。我的意見是搞大的，大的和老太爺一樣，穩穩當當，有把握。中型廠不能立即推廣，要繼續論證。辯論會要找一些「反對派」，包括化工部以外的「反對派」參加，聽聽反面意見。不聽反面意見，一邊倒，一定要失敗。現在有些同志不敢講話，要诱導他們大膽地講，一百句話中，只要有幾句好的，就可以吸收。

又説：

> 對小型和中型合成氨廠的試驗還是要積極幹，主要是改進設備。有些人反對搞小型的，要充分聽取他們的意見。兼聽則明，偏聽則暗。偏聽，不『左』則右。這是學術上的討論不要戴帽子。[6]

是上小廠還是上大廠，這本來是一個經濟和技術的決策問題，然而在當時卻具有政治意義。因為「大躍進」提倡「大中小並舉」，實際上「小」成了「大躍進」的政治標誌，「小土群」、「小洋群」遍地開花。因此，對棄小上大，不少部門的負責人都心有顧慮，不敢講話。4月上旬，陳雲在杭州主持中央化肥小組[7]關於加速發展氮肥工業座談會。他鼓勵與會人員説：「中國共產黨的特點是不被框子框住。」「你們講話不要怕『左』和右，如果有人説你們右了，我來承擔；要開除你們的黨籍，找我好了。」[8]經過反覆討論，最後確定，1962年至1964年氮肥廠應該搞大的（年產五萬噸），而且集中投點。5月16日，陳雲為中央化肥小組向中央起草了發展化肥工業的報告，提議進口重要材料，集中力量，每年建成年產二十至二十五萬噸氮的生產能力。[9]8月16日，中共中央批發了這個報告，明確表示「中央同意該報告所提出的發展大型氮肥廠的方針、部署和採取的措施」。[10]從此，中國的化肥工業走上了快速發展的軌道，為糧食產量的逐年增長提供了重要保證。

2.進口糧食應急度荒

增產糧食的措施，顯然不能救燃眉之急。陳雲提出的第一個應急之策是進口糧食。他找糧食部黨組負責人陳國棟談了這個問題。陳雲指出：

> 把糧食拿進來，這是關係全局的一個重大問題。進來糧食，就可以向農民少拿糧食，穩定農民的生產情緒，提高農民的生產積極性。用兩三年的時間把農業生產發展起來，國內市場問題也就可以得到解決。農民手頭的糧食寬裕了，可以多養雞、鴨、豬，多生產經濟作物和各種農副產品，增加出口。總之，當前只有首先抓好糧食，整個局勢才能穩定，同農民的關係才能緩和，而且多種經營也才能好轉。沒有糧食是最危險的。[11]

糧食部黨組經過討論赞同陳雲的意見，決定向中共中央提出進口糧食的建議，並將報告送交負责財貿工作的副總理李先念。經過周恩來請示毛澤東，中央採納了這個建議，決定從1961年起進口糧食。

吃進口糧？可是個禁區！搞了三年「大躍進」，搞了人民公社，早已宣布解決了糧食問題，每年還出口糧食，現在突然要進口糧食，這在國際上會造成甚麼樣的影響？但是，不進口糧食，人民就要挨餓，無法渡過難關。時任外貿部副部長的雷任民説：「中國是一個農業大國，吃進口糧是禁區，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周總理和陳雲同志就是要突破這個禁區，解決國家的困難。」[12]當時在糧食部工作的楊少橋回憶説：「進口糧食這個措施是我們當時不敢設想的，當時一些人認為吃進口糧是修正主義。決定進口糧食是由陳雲同志提出、總理同意的，可能總理也跟主席講了，並且很快就決定了。從決定進口到第一船進口糧運到天津只用了一個月的時間，可見事情辦得是很果斷、很迅速的。」[13]

1961年1月2日到9日，周恩來率團前往緬甸訪問。行前，在飛機場，周恩來、陳雲、葉季壯商定，進口糧食150萬噸。周恩來到昆明後，外貿部給隨同訪問的外貿部副部長雷任民打來電話，説中央決定進口二百五十萬噸了。雷任民當即報告周恩來。周恩來説，這件事我不知道。他馬上打電話問陳雲，陳雲在電話裏説，糧食太緊張了，要進口這麼多糧食才能渡過難關。周恩來是了解陳雲的。現在連他都主張增加糧食進口的數量，足見國內糧食緊張達到甚麼程度了。周恩來心裏非常着急，拿着話筒很久沒有説話。訪問結束後，周恩來讓雷任民不回北京，直接去香港安排糧食安全轉運進口的事。

為做好糧食進口的工作，中共中央批準成立了中央進口糧食接運工作組，李先念任組長，葉季壯、陳國棟、牛佩琮等協助。不到兩個月，1961年2月，外貿部從澳大利亞進口的第一船糧食就到了天津港。陳雲十分關心糧食進口，2月7日至11日，他親自到天津塘沽港口，現場調查

進口糧食卸船和接運情況。後來中央決定進口糧食不斷增加，從150萬噸，250萬噸，到350萬噸、400萬噸。3月，中共中央召開的廣州會議決定，糧食進口增加到500萬噸。李先念在會上說：「明年還需要進口糧食350萬噸到400萬噸，看來後年還要進口些。」7月30日，李先念給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報告說：由於「1961年6月30日以前，搶運到國內215萬噸（四十三億斤），用在『刀口上』，避免了京、津、滬、遼和重災區糧食脫销危險」。此後，每年進口糧食500萬噸，直到1965年。

進口糧食，雖然是為了解決燃眉之急，從全局來看，又是貫徹調整國民經濟「八字」方針的一個組成部分。李先念在3月的廣州會議曾解釋說：這兩年進口糧食，主要是「缓和城鄉關係，鼓舞農民生產積極性。這樣做暫時減缓一些工業建設的速度，但是從長遠看，把農業發展起來，將會更有利於工業建設的發展，這是符合中央『調整、鞏固、充實、提高』方針的」。[14]

3.網開一面穩定市場

為了穩定和調劑市場供應，不至於出現更加嚴重的市場恐慌，中共中央同時採取了一系列措施：大力壓缩社會集團購買力，積極恢復和發展日用工業品和手工業品的生產，穩定基本生活必需品價格，以及對部分消費品供應實行高價政策等。

關於壓縮社會集團購買力，1961年初，中央作出決定，當年社會集團購買力從上年的八十億左右壓縮到四十至五十億左右。[15]並先後暫時凍結了機關、團體、部隊、學校和事業單位的存款。1961年底，集團購買力實際壓缩到49.4億，比上年減少二十六億元。[16]

經國務院同意，1961年初，全國各大中城市逐步開始供應高價糖果和高價糕點。2月，高價糖果的供應範圍又擴大到全國，高價糕點的供應範圍也擴大到1.3億人口的所有大中小城鎮。3月，全國一百多個城市開設了高價飯店，後來又陸續決定自行車、鐘、錶、酒，茶葉、針織品等也高價出售一部分。據統計，1961至1962年兩年內共出售高價商品74.5億，增加財政收入38.5億，這為回籠貨幣，調劑市場，抑制通貨膨脹起了積極作用。[17]

由於商品奇缺，儘管嚴格實行計劃價格，物價仍然上漲很快，兩種價格懸殊，同時出現黑市價格。要把計劃市場的價格全部穩住已經不可能，用行政命令把集市價格壓回去更行不通，為保障人民生活必需，唯一可行的辦法是穩住一頭，放開一頭。1961年9月，中共中央確定，穩住十八種基本生活必需品的價格，實行定量供應。包括糧食、棉布、針棉織品，絮棉，食鹽、鞋子、醬、醬油、醋，定量供應的魚、肉，食油、食糖、大宗蔬菜，火柴、煤炭、煤油、文具、紙張，房租、水電、

交通、郵電、醫療、學费等。這十八類基本生活必需品佔職工生活開支的百分之六十左右。[18]在堅持以計劃價格為主的同時，允許一定範圍內的自由價格，這對保持社會穩定，共渡難關，起了重要作用。

4.精简壓縮城市人口

1961年5至6月，在北京舉行的中央工作會議重點是討論《農業六十條》，但在會上，大家反映最迫切的仍然是糧食問題。

5月31日，劉少奇講話，一開始就説：

> 现在，各方面的矛盾，如工業和農業的矛盾，文教和其他方面的矛盾，都集中表現在糧食問題上。總而言之，人人都要吃飯。城裏人要吃飯，鄉下人也要吃飯，讀書人也要吃飯，我們這些「做官」的人也要吃飯。[19]

為渡過糧食難關，周恩來在1961年3月的廣州會議上就曾提出三條措施，其中之一是「在不妨礙生產、而且有利於生產的情況下，要壓縮一批城市人口回鄉」。[20]5月31日，周恩來在北京會議上向與會者説：「1960年至1961年糧食緊張，城市重於農村，這是一個特點。」農業生產不可能很快恢復，而城市每年要供應500億斤糧食，存在一個巨大缺口。根本的方針是「從城市壓人口下鄉」，「三年壓兩千萬人」。[21]

為了解決市場緊張、經濟失衡的問題，陳雲在1959年4月就曾提出，對1958年多招收了的一千多萬工人，必須認真地加以精簡，安置到農村去，以便壓缩現有的購買力的建議。[22]但在當時，誰也聽不進去。因此，當周恩來提出精減職工，歷缩城市人口下鄉的意見後，一開始就得到陳雲、鄧小平、李先念等的支持。會議前夕，5月17日，李先念給毛澤東寫信就表達了這個思想，提出了糧食徵購任務不變或者減少城市人口兩種方案。李説：「反覆考慮還是兩利相權取其重，兩害相權取其輕，把調動農民積極性，發展農業生產放在第一位，採取第二方案可能好一些。」[23]5月31日，陳雲在周恩來講話後，專門為這項牽動幾千萬人命運的重大建議作了詳細的説明，他稱這是「一件關係全局的大事」。陳雲説：

> 面前擺着兩條路要我們選擇：一個是繼續挖農民的口糧：一個是城市人口下鄉。兩條路必須選擇一條，沒有甚麼別的路可走。我認為只能走壓縮城市人口這條路。……應該承認，動員城市人口下鄉是一件很困難的工作。人已經來了，在城市裏生活比裏村好得多，再動員他們回去是很不容易的，搞不好要「打扁擔」。我們要承認這一困難。
>
> 那末，不動員城市人口下鄉行不行呢？不行。因為那樣就會

產生一些更為嚴重的問題。……從全局來看，這兩方面的困難相比，還是城市人口過多的困難更嚴重。我們只能走動員城市人口下鄉這條路子。只有這樣，才能穩定全局，並且保證農業生產的恢復。

他強調：「這個決心早下比晚下好。」[24]

這次中央工作會議，提出了《關於減少城鎮人口和壓缩城鎮糧食销量的九條辦法》。6月16日，經中共中央批準下達執行。中央要求：「在1960年底1.29億城鎮人口基數上，三年內減少城鎮人口二千萬以上。今年爭取至少減一千萬人……；1962年至少減八百萬人；1963年上半年掃尾。」「1961年至1962年度，城鎮糧食销量爭取壓缩到480億至490億斤，比上年減少三十億至四十億斤。」[25]6月28日，中共中央又發出《關於精简職工工作若干問題的通知》，就精簡的對象、被精簡人員的待遇、回鄉後的安置工作等作出具體規定。

其實，精減下放的措施從1960年下半年就開始了。當時認為農業大幅度減產是由於農村勞動力奇缺。因此下放的直接目的是加強農業第一線的勞動力。1960年9月到11月底，二十六個省，市、自治區（缺新疆、西藏），從各方面抽調到農業第一線的勞動力共有2913萬人，扣除15%的虛數，農業第一線增加的勞動力約為2500萬人，農村人民公社淨增的勞動力約為600萬人。這一階段的下放實際是農村內部勞動力的調整，回鄉的本來就是農民。這之後，開始動員城市人口下鄉。1960年11月全國計劃會議確定了精減下放職工502萬人的方案。並且動員幹部下鄉。截至1961年2月底和3月中，全國已精簡下放職工410.6萬人，其中下放幹部101.8萬人。

1961年5月會議以後，由於上下思想統一，措施得力，工作細緻，到10月底，終於完成了1961年精簡職工的計劃。11月，陳雲說：「我們開始下決心在城市減人的時候，也很怕發生很多像自殺之類的情況，會有很多困難。結果七搞八搞，到今年10月底搞了一千萬人下去。」[26]到1962年9月份，下放兩千萬的計劃就基本完成了。這實在是一件有很大風險又很不容易的事情。

毛澤東後來說起這件事，感慨地說：「我們的人民好啊！幾千萬人招之即來，揮之即去。不是共產黨那個能辦到？」[27]

[1] 中共中央批轉糧價問題小組《關於提高糧食收購價格問題的報告》〉（1961年1月15日），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十四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頁59-66。

[2] 〈中共中央關於收購重要經濟作物實行糧食獎勵的指示〉（1961年4月3日），載《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十四冊，頁234-237。每收購一擔棉花，獎勵三十五斤糧食；每收購一擔花生仁、芝麻或烤煙，獎勵二十斤糧食。《當代中國的經濟管理》編輯部編：《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管理大事記》（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1986），頁157。

[3] 〈中共中央關於目前農產品收購工作中幾個政策問題的規定〉（1961年1月15日），載《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十四冊，頁67-72。

[4] 柳隨年，吳群敢主編：《中國社會主義經濟簡史》（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5），頁275-278。

[5]　朱理治傳達陳雲對農業生產問題的指示，1960年7月6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金沖及、陳群主編：《陳雲傳》，下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頁1199。

[6]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陳雲年譜（1905-1995）》，下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頁68、69；《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十四冊，頁234-237。

[7]　中央化肥小組於1960年10月成立，由國家計委領導，組長由化工部部長彭濤擔任，組員由國家計委、國家經委、國家建委、一機部、二機部、三機部、冶金部、煤炭部、電力部、農業部、外貿部的負責人組成

[8]《陳雲年譜（1905-1995）》，下卷，頁73。

[9]　陳雲：〈加速發展氮肥工業〉（1961年5月16日），載《陳雲文選》，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頁146-154。

[10]《陳雲傳》，下冊，頁1252。

[11] 陳雲：〈做好外貿工作〉（1961年5月30日），載《陳雲文選》，第三卷，頁157。

[12]　訪問雷任民談話記錄（1997年1月23日），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金沖及主編：《周恩來傳（1949-1976）》，（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頁1565。

[13]　《陳雲傳》，下冊，頁1226。陳振聲在〈李先念走下廬山之後〉一文中寫道：關於進口糧食，最早是李先念1960年底提出並且得到批準的一條應急措施。11月29日，李先念寫報告給周恩來、李富春、譚震林、薄一波并毛澤東，提出先進口十二億斤糧食或者更多一些的建議，周恩來批示：「已告先念同志辦。」毛澤東批示：「完全同意，能進口二十億斤更好。」《中華兒女》，1999年第6期。

[14]　李先念的講話，均見趙發生主編：《當代中國的糧食工作》（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頁123。

[15]　〈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進一步壓縮社會集團購買力的決定〉（1961年1月23日），載《建國以來重要文獻編選》，第十四冊，頁121-125。

[16]　武力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1949-1999）》，上冊（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1999），頁473。

[17]　　《中國社會主義經濟簡史》，頁280。薛暮橋回憶説：「陳雲同志建議出售高價糖果、點心、開高價飯館，後來又出售部份高檔的高價工藝品作為補充，并借此回籠貨幣，穩定物價，此後三四年間靠出售高價商品共計多回籠貨幣五十億元，相當於1961年貨幣發行總額（125億元）的40%，這就為物價穩定創造了條件。」鄧力群等：《陳雲與新中國經濟建設》（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頁41。

[18]　〈中共中央批轉李先念《關於市場、物價和貨幣流通問題的報告》〉（1961年9月16日），載《建國以來重要文獻編選》，第十四冊，頁694。

[19]　劉少奇：〈當前經濟困難的原因及其克服的辦法〉（1961年5月31日），載《劉少奇選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頁235。

[20]　周恩來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發言記錄（1961年3月21日），載《周恩來傳（1949-1976）》，頁1587-1588。

[21]《周恩來傳（1949-1976）》，頁1597。

[22]《陳雲傳》，下冊，頁1237。

[23] 陳振聲：〈李先念走下廬山之後〉，《中華兒女》，1999年第6期。

[24]　陳雲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61年5月31日。載陳雲：《陳雲文選》，第三卷，頁161-165、169。

[25]　〈中央工作會議關於減少城鎮人口和壓縮城鎮糧食銷量的九條辦法〉，1961年6月16日經中央批準，載《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十四冊，頁412-413。

[26]　陳雲在中央局第一書記會議上的講話記錄（1961年11月10日），載《陳雲傳》，下冊，頁1243。

[27] 1962年8月9日，毛澤東在北戴河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中心小組會上的講話。

二、工業戰線的退卻

1.延誤了的工業調整

1961年初的中共八屆九中全會，雖然正式批準了調整國民經濟的「八字方針」，但不少人對經濟形勢還存有幻想，認為所謂調整，只是把速度壓下來，不再「大幹快上」就行了，不甘心後退；還有的人害怕犯右傾錯誤，害怕否定三面紅旗，違背「以鋼為綱」和大中小並舉、土洋並舉的方針。因此，會上確定的1961年計劃指標仍然不低，規定：農業總產值655億元，工業總產值2310億元，比1960年預計完成數增長10%和8%，如果與核實的上年業績比，則增長58%和40%。糧食、棉花也分別比上年實績增長42%和50%。鋼產量與1960年持平，為1900萬噸，原煤計劃產量比1960年還略高，基建投资略有減少。基本的思想是維持在1960年的水平上，顯然這個計劃是不可能實現的。

現實情況是，1961年第一季度，經濟出現嚴重滑坡。在二十五種重要工業產品中，除食糖外，其餘二十四種產品產量都比上年第四季度分別下降30%到40%；一般只完成計劃的10%到20%。財政收入下降50%。商品奇缺、物價飛漲、货幣急貶。這種形勢，迫使國家計委於4月2日不得不提出對1961年的計劃再作調整。將基本建設投資從167億元壓缩到129億元，大中型項目由900個缩減到771個。但是，這仍然超過當時整個國家的承受力，尤其是關係全局的煤炭日產量只有四十四萬噸，比上年同期下降30%，大批企業由於動力供應不足被迫停產。

要確定工業規模、基建規模、城市規模，關鍵是摸清農業的家底，糧食的家底。周恩來指示有關部門重新核實幾年來農業的實際產量。其結果：

1958年不是公布的5000億斤，而是4000億斤；

1959年不是公布的5100億斤，而是3400億斤；

1960年不是估計的3700億斤，而是2870億斤；

1961年夏收又比上年減少160億斤。[1]

農業的情況見了底，工業困難的癥結也就基本清楚了。

當國家經委副主任谷牧等將農業對工業的嚴重制約情況向周恩來匯報後，周焦慮地說：「問題已經成了堆，不動大手術是不行了。」[2]在5月北京的中央工作會議上，周指出：「現在的問題集中表現在速度上，中心是三年內要放慢速度。」他認為：「現在光有冷靜不行，還要有勇氣。」[3]周提出要「動大手術」，就是說要下決心根據農業的承受力對工業作全面調整。

李富春也認為：「當年生產1840萬噸鋼是不現實的，要適當調整下來。」「如果不採取堅決措施把過高的生產建設計劃落到實處，國民經濟全面被動的局面就不能扭轉過來。」[4]

中共中央北京會議根據國家計委和國家經委的測算，決定將當年鋼產量指標由1840萬噸，調低到1100萬噸。李富春說：「重工業這樣下降，是一個懲罰，是沒有按規律辦事。重工業速度發展過快，基本建設拉長了，城市人口增多了，工農矛盾突出了，所以退也是應該的。你不退，有甚麼辦法？」[5]

劉少奇以沉重的語氣說：「我看在座的同志應該是有經驗了吧！餓了兩年飯還沒有經驗？」「回過頭來考慮考慮，總結經驗，我看是到時候了，再不能繼續這樣搞下去了。」他指出：「重工業戰線不能不缩短。」「有些廠要關，特別是一些『小土群』，還有一些『小洋群』要關。」「現在要解決的問題很多，中心的問題，就是要堅決縮短工業戰線，延長農業和輕工業戰線，壓缩城市人口下鄉。」[6]

毛澤東表態說：「去年1850萬噸銷，現在1100萬（噸），降下來750萬噸，我看可以。無非是外國人罵中國人不行。」[7]

北京會議後，毛澤東決定在廬山召開一次中央工作會議，專門研究工業和城市調整問題。中央書記處和國務院為召開這次會議作了充分的準備。

7月17日至8月12日，國家計委在北戴河召開全國計劃工作會議。由於此前各部門、各地區都做了深入調查，在討論1961、1962年兩年計劃控制數字時，頭腦更加冷靜了。認為1961年鋼至多只能完成850萬噸，只能完成年初計劃的45%；糧食產量預計2700億斤，為年初計劃的66%；預算基建投資完成七十八億元，比4月調整數（129億）還要減少五十一億元，為年初計劃的60%。據此，會議提出，安排兩年計劃，必須堅決貫徹八字方針，並以調整為中心。要堅決壓缩重工業戰線，降低重工業速度，加強農業、輕工業和手工業；在重工業內部，要加強採掘和採伐工業；堅決壓缩基本建設戰線。根據這些原則，提出1962年的計劃指標：鋼擬定為750萬噸，只及1960年的40%；基建投资安排42.3億元，比1961年還要減少35.7億元。[8]8月9日，鄧小平主持中央書記處會議，聽取計劃會議匯報。根據中央書記處會議議定的精神，李富春準備了一份〈目前經濟形勢與調整任務〉的發言稿，上了廬山。

2.該退的堅決退下來

1961年8月23日至9月16日在廬山召開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是中共中央第二次在廬山開會。第二次上廬山開會，自然會聯想到第一次廬山會議。毛澤東說，今年這個廬山會議沒有1959年廬山會議那個急風暴

雨了。他對秘書田家英説：「這次要開一個心情舒暢的會。」逄先知對此時毛澤東的心情評論説：

> 對於錯誤批判彭德懷，毛澤東這時並無後悔之意（「反右傾是正確的」）但對於因反彭德懷而打斷糾「左」過程，從而遭受更大的「共產風」的破壞，則是痛定思痛，心情確實很不舒暢。他決定二上廬山，想開一個心情舒暢的會，是不是也包含着想求得一種心理上的平衡呢？[9]

事實也正是這樣。8月23日，毛在他召集中央常委和大區負責人的會上説：

> 對社會主義，我們現在有些了解，但不甚了了。我們搞社會主義是邊建設邊學習的。搞社會主義，才有社會主義的經驗，「未有先學養子而後嫁者也」。説沒經驗，已經搞了十二年，也有些，但也只有十二年。（鄭州會議犯了錯誤，分三批開，一批開一天，我打你通，略知梗概，不甚了了，經過六個月，到廬山會議。會議頂住了彭德懷的那股風，是對的，不頂不行。但也犯了錯誤，不應一直傳達下去）……搞社會主義我們沒有一套，沒有把握。比如工業，我就不甚了了。計劃工作怎麼搞，現在總搞不好。[10]

毛澤東自稱，對工業「不甚了了」，因此這次廬山會議的主要議程由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人主持。會議的議題是：糧食問題、市場問題、兩年計劃和工業問題、工業企業管理問題、高等學校工作問題、幹部輪訓問題。聽取了：周恩來關於糧食問題的報告，李先念關於市場、物價問題的報告，李富春關於工業計劃的報告，薄一波關於《國營企業工作條例（草案）》的説明，陸定一關於《教育部直屬高等學校暫行工作條例（草案）》的説明。討論的重點，顯然是工業的調整問題。最後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當前工業問題的指示》、《工業七十條》、《高教六十條》，還作出《中共中央關於輪訓幹部的決定》。

廬山會議最重要的是作出了工業要「堅決退下來」的決策。會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當前工業問題的指示》大聲疾呼：「我們已經喪失了一年的時機。現在，再不能猶豫了，必須當機立斷，該退的就堅決退下來，切實地進行調整工作。如果不下這個決心，仍然堅持那些不切實際的指標，既不能上，又不願下，那末，我們的工業以至整個國民經濟就會陷入更被動、更嚴重的局面。」[11]

工業調整首先是降低指標，關停一批企業。《指示》要求：「必須下最大的決心，把工業生產和工業基本建設的指標降下來，降到確實可靠、留有餘地的水平上。」根據國家計委的計算，1961至1962年兩年全國共生產煤炭五億噸以上，鋼一千五百萬噸以上。這就是説，1961到1962兩年鋼產量比1960年一年還少三百多萬噸。當然調整不是一味地

退，而是有退有進。《指示》要求：「在必須後退的地方，堅決後退，而且必須退夠；在必須前進和可能前進的地方，必須積極前進。」所謂「後退」，不單純是降低指標，還意味着一大批工業企業的「下馬」。《指示》規定，工業管理中要實行高度集中統一的領導，在全面安排的基礎上，抓住中心環節，集中力量，解決問題。要求各行各業都必須採取集中兵力打殲滅戰的方法，保重點企業。對於沒有原材料資源、原材料和燃料消耗過多、質量低、成本高，長期虧本的企業，或停產，或關閉。為了缓解人民日常生活的困難，《指示》確定在近兩三年內，盡一切可能增加日用品的生產。《指示》附錄了四十種人民急需的輕工業和手工業產品的目錄。包括火柴、鍋、碗、盆、菜刀、食鹽、布鞋、草帽、肥皂、煤油燈、手電筒乃至小學生用的鉛筆，等等。工業調整再一個關鍵是壓缩工業基本建設規模。

會議期間，毛澤東聽了關於會議的情況匯報，表示赞同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的意見。毛沒有在全體會議上講話，在中央常委擴大會上説：「聽説這次會議開得很好，心情很舒暢，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抓辮子。有辯論，你辯過來，我辯過去，需要。」但在同時，毛卻認為，有了《農業六十條》和這次關於工業問題的決定，整個經濟問題已經解決了，形勢將「會逐步好轉」。他説：

> 問題暴露出來了，將走向反面，現在是退到谷底了，形勢到了今年，是一天天向上升了。達到極點，天下大亂，要轉向治了。困難是暫時的，會逐步好轉的。我們碰了釘子，有了經驗，這是寶貴的，現在向好的方面轉化了。

他還説：「現在指標低，不要悲觀，不會長期的，很快會發展起來。」他甚至如此輕描淡寫地談到這幾年的問題。他説：「錯誤就是那麼一點，有甚麼了不得！人哪能不犯錯誤？人不犯錯誤，天誅地滅。」

毛澤東的這個話雖然有藐視困難的氣度，有打氣的成份，但也説明他對困難、對錯誤的認識似乎已經到了極點，即他所説的退到谷底了，不能再退了。正是在這種輕鬆的心情中，毛澤東有閒遊覽了廬山含鄱口、仙人洞等名勝。9月9日，毛為夫人江青所攝廬山仙人洞[12]照片題寫了一首七絕：

> 暮色蒼茫看勁松，
>
> 亂雲飛渡仍從容。
>
> 天生一個仙人洞，
>
> 無險風光在險峰。

這首極富哲理的抒情詩，既可理解它暗含着戰爭年代歷盡艱險，最终勝券在握的心境；也可看出毛此時對國內困難和前景，以及國際上與

「帝、修、反」鬥爭的心態。

9月16日，毛澤東將李白《廬山遙寄盧侍御虛舟》詩中的四句，書贈中央常委：「登高壯觀天地間，大江茫茫去不還。黃雲萬里動風色，白波九道流雪山。」毛澤東寫道：「登廬山，望長江，書此以贈廬山常委諸同志。」

毛渴望擺脫一年多來的抑鬱沉重的心情，重新回到亢奮的狀態，去迎接新的挑戰。這就潛伏着一種危機。毛的認識既與實際情況有很大差距，也與劉少奇、周恩來、陳雲、鄧小平等人的認識有很大差距。當時，農村政策雖然制定，但落實起來還需要時間，農村形勢不可能立即好轉。城市的問題剛剛暴露，還沒有採取切實行動。不是已退到谷底，而是還沒有退。

對於毛澤東的這種心態，田家英當時就感到不安了。逄先知回憶說：

> 當時毛澤東對國內經濟形勢的估計是已經到了「鍋底」。田認為，在農業方面可以這樣說，在工業方面就不能這樣說，因為工業生產仍在繼續下降。他半夜裏睡不着覺，便到梅行（當時參加起草《工業問題的指示》和《工業七十條》）的臥室去討論這個問題，直至天亮。[13]

[1] 《周恩來傳（1949-1976）》，頁1602。

[2] 谷牧：〈回憶敬愛的周總理〉，載《我們的周總理》編寫組：《我們的周總理》（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0），頁13。1961年1月，中共中央八屆九中全會後，周恩來專門組成了研究工業問題的「十人小組」，成員包括薄一波、谷牧、王鶴壽、張霖之、呂正操、趙爾陸、劉瀾波、彭濤、陳正人、孫志遠。《周恩來傳（1949-1976）》，頁1601。

[3] 周恩來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發言記錄（1961年5月），載《周恩來傳（1949-1976）》，頁1603。

[4]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頁896。

[5]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頁897。

[6] 劉少奇：〈當前經濟困難的原因及其克服的辦法〉（1961年5月31日），載《劉少奇選集》，下卷，頁338、339、341。

[7]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頁897。

[8] 《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1949-1991），上冊，頁471-472；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頁897。

[9] 董邊、譚德山、曾自編：《毛澤東和他的秘書田家英》，增訂本（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頁82。

[10] 毛澤東在中央常委和大區負責人會議上講話傳達記錄（1961年8月23日），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逄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北京：北京文獻出版社，2003），頁1169。括號內一段見《毛澤東和他的秘書田家英》，頁83-84。

[11] 〈中共中央關於當前工業問題的指示〉（1961年9月15日），載《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十四冊，頁617。

[12] 仙人洞，在廬山佛手岩下，牯嶺之西，高約兩丈，深廣各三四丈，傳說為唐朝仙人呂洞賓所居，因而得名。

[13] 《毛澤東和他的秘書田家英》，頁83。

三、各項政策條例的制訂

1958年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盲目搞所有制過渡和管理體制下放；提倡破除迷信，敢想敢幹，使原有的經濟秩序和規章制度全被打亂，帶來嚴重後果。1961年，在《農業六十條（草案）》下發後，中共中央開始調整管理體制，先後出台了商業、手工業、工業、科學、教育、文藝等各項條例，以重建秩序，把各條戰線拖出「大躍進」造成的混亂局面。

1.流通體制的鬆動

「大躍進」當中，農村集市貿易被取締，城市個體工商業被掃光，集體性質的商業紛紛向全民過渡。1957年底，全國還有小商小販三百五十多萬人（其中合作商店一百一十多萬，合作小組一百五十多萬，個體商販七十多萬），到1960年底，留在合作商店和合作小組的小商小販只剩下九十多萬，而且大部分實行了與國營商業統一核算，或按國營商業的辦法進行管理。由於農民的自留地沒有了，社員的家庭副業停止了，手工業生產合作社升级併廠轉產了，國家領導下的有限的自由市場即使不被取締，也基本上自行關閉了。全國真正形成了一個國營商業的一統天下。

1961年4、5月間，胡耀邦帶領調查組在遼寧省海城縣農村調查，發現農村商業在體制和工作上都存在「統得太死」的問題。他在《農村商業要辦活一點》的調查報告中說：1958年公社化以後，農村的商品交換就由國營商業、供銷合作社、集市貿易三條渠道變成一條渠道，所有購銷業務統由國營商業獨家包攬經營（供銷社合到國營，農村集市被取消）。這就使商品生產者的集體和個人之間，無法直接交換自己的產品，不利於生產和消费；國營商業部門的統一牌價，不盡合理，又影響了社員個人和集體物资的出售，造成人為的物資緊張；基層商業部門面向群眾為生產和生活服務的工作，也做得遠不及以前。胡耀邦說：

> 近年我們統得太多，管得太死。農民批評說，近年來農村經濟害了一種「死症」。經濟工作最忌死，我們卻犯了這個大忌。特別是58年以來，提倡大購大銷，甚麼東西都統起來，管起來，統一计劃，統一收購，統一分配。甚至連生豬屠宰也要實行一把刀政策，農民連下水都吃不到。由於我們把農村原有的購銷渠道堵死，把一切商品價格管死，破壞了商品生產規律，结果是，一購甚麼，甚麼就少，少了甚麼，就統甚麼，三類物資都提成二類

物資，最後又變成了「奇缺物資」。[1]

胡耀邦向中共中央和毛澤東提出建議：要改變農村商業體制，恢復供銷社集體所有制企業性質。政策調整的範圍應包括：一、適當調整農副產品的購留比例，以獎勵生產。二、對農村經濟工作，不可統得太多，管得太死。三、調整農副產品的價格。四、減少商品的迂迴運輸。毛澤東看了這個材料，5月29日指示印發中央工作會議，並讚揚這個文件很好，可發到縣、社兩級討論。[2]

胡耀邦報告中反映的情況，並不是個別現象，凡是到農村去調查研究的領導人都有察覺。因此，調整商業體制，黨內形成共識的阻力不大。正是在這種情況下，1961年6月，商業部和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聯合召開了十七個省、市商業廳（局）和工商局代表參加的座談會，討論恢復合作商店、合作小組的步驟、方法和有關的具體政策問題。1961年6月19日，中共中央下發了《關於改進商業工作的若干規定（試行草案）》，簡稱《商業四十條》，重新明確：

> 現階段我國的商品流通應該有三條渠道：國營商業，供銷合作社商業，農村集市貿易。國營商業是全民所有制經濟，是商業的領導力量。供銷合作社商業是集體所有制經濟，是國營經濟的有力助手。農村集市貿易是國營商業和供銷合作社商業的必要補充。國營商業和供銷合作社商業，是有计劃有組織的市場。農村集市貿易是在國營商業和供銷合作社領導和管理下的自由市場。[3]

於是，原有三條流通渠道逐漸恢復：

供銷合作社。1961年年底，全國恢復建立了基層供銷社31000多個，縣供銷社1300多個，省（市）級供銷社十八個。1962年7月1日，全國供銷合作總社與商業部分開辦公。國營商業與供銷合作社的分工基本恢復到1957年以前的狀況。與此同時，通過供銷社，逐漸恢復了物资交流會、廟會、合作貨棧、騾馬大店等货棧貿易。

合作商店與合作小組。據1962年9月統計，從國營商業、供銷合作社退出的小商小販共八十八萬人。這些退出的小商小販又重新組織起合作商店、合作小組，主要經營一些與群眾生活關系密切的小飲食、小土產、小百貨、副食、蔬菜、日用雜品，以及從事修理、服務等業務。1964年底，全國共有小商小販247萬人，其中由國營商業歸口管理的134萬人，由供銷合作社歸口管理的113萬人；合作商店160多萬人；合作小組二十多萬人；個體商販五十多萬人。[4]

重新開放集市貿易。1960年11月中央十二條緊急指示下達後，農村集市開始得到恢復，到1961年底，全國開放農村集市四萬一千多個，相當於公社化以前的99%。[5]農村集市開放的同時，大、中城市也出現了一些集市貿易市場和自發的商販市場。

多種流通渠道和農村集市的恢復，久違了的走街串鄉、送貨上門的货郎擔又出現在老百姓生活裏，使城鄉市場逐步復蘇，經濟生活開始活躍起來。這對於60年代初走出災荒，尤其是恢復農村和農民的元氣，起到了重要作用。

2.手工業的恢復

1958年急於消滅私有制殘餘，不僅表現在商業領域，同時表現在手工業領域。一是，除少數不適合組織集體生產的某些特種手工業品允許繼續進行個體生產外，個體手工業戶一律加入手工業合作社；二是對個體勞動收入加以限制；三是把集體手工業併入或轉為國營工業。到1958年8月以後，在急於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思潮影響下，手工業合作社全面展開了「轉廠過渡」。到1959年，全國十萬多個手工業合作社（組）的五百多萬社員中，「轉廠過渡」的佔總人數的88.7%，其中過渡為地方國營工廠的佔37.8%，轉為合作工廠的佔13.6%，還有一部分轉為人民公社。

在「轉廠過渡」的同時，又颳起了「轉產風」，在大煉鋼鐵和大辦工業的热潮中，各地小商品生產的行業紛紛改行轉業，勞動力、技工和機具設備被抽走。不少農村的農具修配廠、修配組集中合併為較大的機械製造廠。北京有名的王麻子剪刀廠，從1958年9月起，三百多人轉為生產煉鋼用具和翻砂工具，生產剪刀的人只剩下二十人。刀剪產量從月產三萬五千把，降到三千把，剪子從原有二百多種減少到十一種，刀子從原有三百七十種減少到只剩七種。杭州張小泉剪刀廠的情況也大體相同，全國手工業生產的情況由此可見一斑。由於急於過渡，急於改組和轉業，原有的供銷渠道搞亂了，手工業者的積極性嚴重受到挫傷，加上手工業所需原材料供應困難，造成日用工業品嚴重減產，全國各地普遍出現手工業品供應十分緊張的局面。到1961年初，連老百姓每日生活不可缺的一些必需品和用具，如食鹽、火柴、鍋、碗、盆、勺、筷、缝衣針，奶嘴子、衛生紙、木盆、菜籃、竹牀、木桶、拖把、鞋釘、頂針之類都買不到了。

1961年1月7日，中共中央專門批轉輕工業部黨組的報告，指示全國「緊急安排日用小商品的生產」。指示說：

> 最近時期許多地方日用工業品產量下降，供應緊張，……主要是領導上沒有抓緊安排，它同農業的歉收並沒有不可分的關係，只要好好地安排，狠狠地抓緊，就完全有可能迅速地增加上去。……中央要求各級黨委以高度關懷人民生活的態度，滿腔热情地把這件事辦好，一定要爭取在較短的時間內作出顯著的成績來。[6]

事實上，日用小商品的奇缺，雖然與農業減產沒有多少關係，但也不是工作疏忽問題，而是日用品在生產和流通兩個環節都被管死的必然結果。在1961年上半年全黨調查研究的過程中，許多領導人都發覺了這個問題，有些地方還進行了恢愎手工業合作社的試點。5月8日，胡喬木在向毛澤東報告的湖南調查中說：

> 現有手工業工人勞動積極性極低，現行辦法幾乎到了無法繼續下去的程度。同時，只成立供銷社不成立手工業社，農村產供銷的許多問題也不好解決。為了調動手工業工人的積極性，恢復市場供應，中南局和省委都決定，恢復單獨核算的既有集中生產也有分散生產的手工業生產合作社（應當社隊經營農村副業不在內），同時着手解決與此有關的一系列問題。[7]

5月9日，朱德在給毛澤東的信中也指出：手工業在1958年轉廠併社時，由集體所有制轉為全民所有制的面過大，存在不少問題。[8]

由於手工業與城鄉人民的生活息息相關，因此，自然成了5至6月北京中央工作會議上的重要議題之一，並擬定了一個《關於城鄉手工業若干政策問題的規定（試行草案）》，簡稱《手工業三十五條》。重申：

> 我國的手工業，在整個社會主義階段應該有三種所有制：全民所有制，集體所有制，社會主義經濟領導下的個體所有制。在這三種所有制當中，集體所有制是主要的，它對於大多數手工業來説，最能適應生產力發展水平和手工業工人的覺悟程度。全民所有制只能是部分的、過多地過早地過渡到全民所有制，於生產反而不利。社會主義經濟領導下的個體手工業，是社會主義經濟的必要補充和助手。[9]

《手工業三十五條》於6月19日與《商業四十條》一同下發執行，要求根據上述原則對各地手工業所有制進行調整。已經轉為國營工業和公社工業的，凡是不利於調動手工業工人積極性，不利於恢復和增加產品品種，不利於提高產品質量，不便利群眾生活的，都必須堅決採取適當步驟，改為手工業生產合作社或合作小組；農村人民公社興辦的工業，如農業機械修配、農副產品加工、礦產開採和建築材料工業等，凡不適宜於集中生產，不改變所有制就辦不好的，應該改為手工業合作社、合作小組，或者改為生產大隊、生產隊手工業生產小組；某些適宜於單獨經營的個體手工業者，應該允許他們在手工業合作組織或社隊領導下進行獨立勞動，自產自銷，收入歸己；應當積極發展城鄉家庭手工業，允許其自產自銷，收入歸個人所有，歸個人支配。

在調整所有制的同時，還要求調整組織規模，組織原有手工業者歸隊。手工業生產可以集中，可以分散；可以固定設點，可以流動服務；可以在當地串街串鄉，可以到外地串街串鄉。特別是生產傳統名牌手工業產品的企業和技術人員，已經改行轉業的，都必須堅決歸隊，原來的

手工業修理服務人員也必須歸隊。提倡師傅帶徒弟，允許個體手工業者收徒授藝。

《手工業三十五條》還對手工業者的收入、產供銷關係以及民主管理等方面作了具體規定。允許其非計劃產品原則上由企業自銷；提倡手工業與基層商店直接掛鈎，採取前門設店，後門設廠的傳統經營方式；手工業產品實行「優質優價，分等論價」，不搞統一價格。

手工業政策的調整，促進了手工業生產的恢復和發展，尤其是百姓急需的日用品生產和服務的恢復和發展。城鎮個體勞動者也由1958年的106萬人增加到1965年的171萬人。

3.工業體制的調整

在所有這些條例中，《國營工業企業工作條例（草案）》，簡稱《工業七十條》，是一個更重要的牽動全局的文件。它所牽涉的是國民經濟的主體部分，也是「大躍進」中遭受破壞嚴重的領域之一。

建國之初中國管理工業企業，一切照搬蘇聯的。雖然存有弊端，畢竟有章可循。1958年「大躍進」，在「解放思想」、「打倒奴隸思想，埋葬教條主義」的口號下，完全摒棄原有的規章制度；批判所謂「專家治廠」、「白專道路」；提倡「共產主義風格」，批判按勞分配的等級工资和「計件工資制」；反對综合平衡等等。結果造成一片混亂。

1960年底和1961年初，根據中央書記處的意見和響應毛澤東大興調查研究之風的號召，中央和國家機關分別組成調查組到各大廠礦進行調查。[10]1961年5月3日到6日，國家經委邀集各中央局經委主任和北京、天津、遼寧、黑龍江、江蘇等十一個省市主管工業的黨委書記，由薄一波主持在北京舉行座談會。5月底6月初，各方調查材料和座談會材料陸續報到中央。這些材料顯示，工業生產大幅度下降，基本建設工程大批被迫停工，經濟核算制度廢弛，設備損壞嚴重、產品質量降低，成本上升，事故很多，人心不定，企業管理混亂，生產指揮系統有不少處於癱瘓或半癱瘓狀態。以廠長為首的生產行政指揮系統大多解體，第一書記說了算，外行當家，紀律廢弛。嚴峻的形勢迫切要求中央採取重大步驟，迅速扭轉困境。

5月20日，中央書記處會議在聽取薄一波匯報工業座談會的情況之後，討論到搞工業文件時，薄一波表示：現在光發個原則性的指示，一是難寫，二是發了也不解決問題。鄧小平當即表示：「寫各項政策，如責任制、技術政策、工资政策等。」[11]這次議論沒有形成結論性意見。6月12日，毛澤東在中央北京工作會議最後一天的全體會上，談到要用《農業六十條》教育幹部時，指出：「城市也要搞幾十條。」毛澤東的這個意見，實際上成了制定工業企業工作條例的緣起。

6月17日，鄧小平主持中央書記處會議，敲定此事。確定由薄一波主持起草工業條例。隨後，李富春、薄一波、李雪峰等分頭到華北、東北重點企業調查。組織起草班子，擬出初稿。華北的石鋼、太鋼，天津鋼廠由李富春和李雪峰負責；東北的鞍鋼、本溪鋼廠由薄一波負責。鄧小平說：工業比農業複雜得多，究竟如何搞？現在心裏無底。只有結合調查研究，條例才能搞得出來，可從各部抽人，必要時找少數大廠的人一塊來參加。鄧明確提出企業要整頓，下到工廠後，工廠整風不要停；條例搞出來以後，根據條例再整一次。

中央書記處會議後，薄一波組成調查組到瀋陽第一機牀廠、重型機械蔽等單位進行調查，邊調查邊起草條例。參加起草條例的主要執筆人有馬洪、梅行、廖季立、董峰、張沛等。7月初分赴哈爾濱、長春徵求意見，形成了初稿，題為《國營工業管理工作條例（草案）》，共十五章，八十條。7月16日，報送中央書記處。

7月29日，鄧小平在北戴河主持中央書記處會議，聽取薄一波的匯報和說明。與會者認為，搞工業管理條例，現在還搞不出來，還是搞企業管理條例，主要寫企業內部問題。《紅旗》雜誌副總編輯鄧力群建議在條例中加一段序言。鄧小平贊成。修改後的稿子，題目定為《國營工業企業管理工作條例（草案）》簡化了篇幅，共十章、六十五條，8月10日送中央書記處。

8月11日到14日，在鄧小平的主持下，中央書記處在北戴河連續舉行了四天會議，對條例稿逐條討論，邊議邊改，最後定為十章，七十條。8月15日，由鄧小平、彭真、李富春、薄一波四人聯名向毛澤東和中央政治局常委寫一封信，附上條例草案稿，呈請審查，下發試行，徵求意見。最後提交8月23日在廬山舉行的中央工作會議討論，取得六個大區到會人員的贊同。毛澤東也認為「很好」。但毛澤東和周恩來將題目中的「管理」二字圈去，最後定名為《國營工業企業工作條例（草案）》。

《工業七十條》針對「大躍進」造成的混亂，著重規定了以下內容：

國家與企業之間實行「五定」、「五保」。[12]明確國家賦予企業的基本生產條件；企業應保證完成國家交給的任務。

重申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制，限制企業黨組織對生產行政工作的過多干預，禁止把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制引申到車間、工段和科室。建立廠長、總工程師、總會計師的嚴格的責任制。

確定企業實行職工代表大會制度。

明確「技術人員和職員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指出「不能把鑽研技術、鑽研業務看作是『走白專道路』」。

規定企業必須實行全面的經濟核算，講求經濟效果。

重申社會主義分配原則是按勞分配，肯定計時工資制，計件工資制和獎勵制度的合法性。

這樣，就在指令性計劃的體制下，把國營企業的生產秩序穩定了下來。

但是，貫徹執行卻不是一件簡單的事。碰到的根本障礙，是條例實際上否定了「大躍進」那一套，因而為企業黨委負責人所反對。

還在討論初稿時，就有人提出：對「大躍進」的正面經驗總結得不夠，肯定得太少；黨的領導問題不突出；大搞群眾運動問題不突出；對政治是統帥、是靈魂闡述得不夠徹底；對專業管理寫得多，控制得嚴，而對鼓勵企業千方百計地發揮工人群眾的積極性寫得不夠；只提到尊重科學，沒有提到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敢想敢說敢幹；在企業領導制度方面，對黨委領導寫得不鮮明，偏重於廠長負責；寫按勞分配、给錢方面很突出，而對政治思想方面則不突出；等等。後來，在中央《關於當前工業問題的指示》中，把「大躍進」的成就和「經驗」寫了進去。肯定了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和一整套兩條腿走路的方針，吸纳了「大躍進」時期的許多流行口號，並肯定工業企業在「大躍進」中取得四個方面的偉大成績：企業的生產有了飛速發展，企業的技術力量有了迅速增加，企業管理工作有了許多的創造和新的經驗，職工的政治覺悟大大提高。如此，《工業七十條》才得以通過。

《條例》下達以後，受到廣大幹部和職工的擁護，但黨委書記們卻發牢騷說：「今後黨委沒事幹了」，「黨委書記不好當了」。甚至指責：起草人「好像剛從外國回來，不懂中國情況，沒有經歷過「大躍進」，總想恢復過去的一套老辦法」。

薄一波感嘆說：「人的思想一下子就可以搞亂，端正過來卻要花很大的氣力。」[13]

由於工業調整與企業整頓雙管齊下，使一些在「大躍進」中受到破壞的國營工業企業較快地恢復了元氣，促進了生產的穩步增長，產品質量大幅提高，產品品種顯著增加。據有關部門統計，僅1961和1962兩年裏，鋼就增加了大約一百個新品種，機械產品增加了一千五百個新品種，多項產品質量達到或超過歷史最好水平。反映工業企業經濟效益狀況的經濟技術指標，也接近或超過了過去的水平。

4.整頓文教工作秩序

教育工作的調整，是最早提上日程的，1961年初就已經開始。

在1958年「大躍進」中，全國各大中學校一哄而起，出現了大辦工廠、農場；廠礦、企業、人民公社大辦學校的熱潮。高等學校由1957年的229所發展到1958年的791所，在校學生由1957年的44.1萬人，增加

到六十六萬人；中等專業學校（含中師）由1957年的1320所，增加到3113所，在校學生由1957年的77.8萬人增加到147萬人；原來沒有的農、職業中學，一下子發展到兩萬多所，在校學生達200萬人；成人中等學校在校學生由1957年的330萬多人增加到564萬多人；成人小學由1957年626萬多人增加到2600萬多人。1960年，高等學校更猛增到1289所，在校學生達到221.6萬人。[14]教育的這種數量擴張型發展，帶來的一個成就是農村文盲、半文盲人數大量減少。但教育質量嚴重下降，過度膨脹的教育規模大大超過了經濟承受力。根據毛澤東關於教育要革命，教育要和生產勞動相結合的指示精神，全國掀起了師生參加生產勞動以及課程改革、教學改革、半工半讀的群眾運動。這種片面強調生產勞動而否定和貶低教師、書本和課堂教學的作用，導致學生參加勞動和政治活動過多，打亂了教學秩序，降低了教學質量。

1961年初，教育部按照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指示，在鄧小平直接領導下，從調查研究入手，由中央宣傳部、教育部黨組開始草擬《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直屬高等學校暫行工作條例（草案）》（简稱《高教六十條》）、《全日制中學暫行工作條例》（簡稱《中學五十條》）和《全日制小學暫行工作條例》（简稱《小學四十條》）。教育部長楊秀峰負責《條例》起草的全面工作。副部長蔣南翔以主要的精力從事《高教六十條》的草擬，以及《中學五十條》和《小學四十條》的定稿工作。

在《高教六十條》草案報中共中央後，1961年7月底，鄧小平在北戴河主持召開的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上，聽取了蔣南翔關於條例草案的説明，並進行了討論，決定由陸定一負責成立一個小組進行修改。8月5日，鄧小平和有關負責人聯名寫信給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常委，對條例起草工作的有關問題進行説明。8月22日至9月16日，在廬山召開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又進行了討論，9月14日，中共中央畫記處討論通過了條例，並得到毛澤東的核準。毛澤東説：「總算有自己的東西。」[15]1961年9月15日下達執行。

關於高等學校的基本任務，《高教六十條》在重申「教育為無產階級的政治服務、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结合」方針的同時，明確提出了「培養為社會主義建設所需要的各種專門人才」。強調：「高等學校必須以教學為主，努力提高教學質量。」生產勞動、科學研究、社會活動的時間應該安排得當，以利教學。肯定「在教學中起主導作用的是教師」，「課堂講授是教學的基本形式」，「必須充分發揮老教師的作用」。正確執行知識分子政策，團结一切可以團結的知識分子，為社會主義高等教育服務；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提高科學研究的學術水平。明確在高等學校實行中國共產黨學校黨委領導下的以校長為首的校務委員會負責制，充分發揮校長、校務委員和各級行政組織的作用，

做好總務後勤工作，保證教學和生活的正常進行，改進共產黨的領導作風，加強學校的思想政治工作。在教學與勞動的比重上，強調高校必須以教學為主，平均每學年應有八個月以上用於教學，每年參加生產勞動，學生一個月到一個半月，教師半個月到一個月。四十五歲以上男教師，四十歲以上女教師不參加生產勞動等等。這樣，就把學生從生產勞動工地帶回課堂，重新回到系統化的文化學習。

在貫徹《高教六十條》的同時，教育規模作了較大的壓縮，1961年確定現有學校中保留高校774所，中專1670所。其餘學校均予裁併。後來事實上裁併了更多高校，到1963年底，全國普通高校由1960年的1289所壓缩為407所，在校學生由96.2萬人減少為七十五萬人；中等專業學校由1960年的6225所壓縮為1355所，在校學生由221.6萬人減少為45.2萬人；普通中學由1958年2.8萬多所壓縮為1.9萬多所，在校學生由1960年的167.5萬人減少為123.5萬人。[16]

《高教六十條》的制定，以及翌年4月出台的《中學五十條》、《小學四十條》。對於克服1958年「大躍進」和所謂「教育革命」對教育事業和學校秩序造成的混亂起了積極作用。但就毛澤東而言，並沒有就此放棄他的「教育革命」的思想和主張。

5.科技政策的調整

科技工作同樣受到「大躍進」的嚴重影響，在「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理論聯繫實際」、「以任務帶科研」等口號下，基礎理論研究實際被拋在了一邊；在政治掛帥的大旗下，科研時間也得不到基本的保證。總之，「破除迷信」變成破除科學和常識，「尊重實踐」變成崇尚無知，「解放思想」變成唯意志論。

1960年冬，主管科技工作的聶榮臻元帥就組織中國科學院黨組、國家科委黨組、國防科委黨組、中宣部的一批成員着手進行科技工作的調查研究，起草條例。具體起草工作由中科院黨組書記張勁夫、秘書長杜潤生牽頭，參加的有于光遠、龔育之、汪志華、吳明瑜、朱琴珊。在上海、北京召開座談會，聽取科學家各抒己見。1961年4月，聶榮臻把張勁夫、杜潤生和國家科委的韓光、劉西堯，國防科委的安東、路揚等召到杭州，聽取張勁夫關於科學條例草案起草情況的匯報。一連開了十多天會。聶榮臻認為：「十四條很好！不僅科學院，還要擴大，全國都要這樣搞。」這個條例不但是解決科學界的問題，也影響其他部門。聶決定以科學院和國家科委兩家的名義共同搞一個科學條例。杭州會議後，又在北京、東北兩個地區召開黨員所長和黨內科學家會議，在一些部屬研究機構進行試點，中央科學小組、國家科委、中國科學院黨組多次討論，反覆修改，前後易稿幾十次，最後形成《關於自然科學研究機構當

前工作的十四條意見（草案）》，習慣稱為《科學十四條》。由聶榮臻簽署上報中央《科學十四條》是要公開發表的，有一些問題不便講透。為了在黨內統一思想，聶榮臻指示再以他的名義給中央寫一個「請示報告」，6月20日與《科學十四條》一併上報中央。

《科學十四條》明確了科研機構的根本任務，基礎理論研究的地位，科研工作的基本保證等問題。

《條例》規定：「研究機構的根本任務是：不斷提供新的科學研究成果，並且在工作中培養出科學研究人才，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簡單地説，就是出成果，出人才。據此提出要做到「五定」：定方向、定任務、定人員、定制度、定設備。使研究工作相對穩定下來，以保障研究工作逐步走向深入，質量不斷提高，人才迅速成長。

《條例》強調指出：對理論聯繫實際的原則，要有全面、長遠的觀點，不要作狹隘、近視的了解。科研項目，除直接為近期的經濟建設，國防建設服務的應大力發展以外，間接的或在遠期才能發生作用的研究工作，也必須作出安排。「為了保證許多尖端技術真正過關，為了提高與發展技術革新、技術革命運動中的群眾創造，都必須積極開展相應的理論研究。為了提高整個科學水平，基本理論的研究也必須加強。必須重視理論研究把它放在重要的位置上，並且作出具體的安排。」明確科研機構的分工：中國科學院的研究機構主要是研究基本的科學理論問題和解決經濟建設、國防建設中關鍵性的綜合性的科學技術問題；產業部門的研究機構主要是解決本部門生產建設中的科學技術問題，運用和發展新技術，以及進行必要的理論研究工作。

《條例》要求「堅決保證科學研究工作的時間」。明確規定：「平均每周不得少於五個工作日。」重申：「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是黨的發展科學文化的根本政策。」指出：在自然科學學術問題上，必須鼓勵各種不同學派和不同學術見解，自由探討，自由辯論，自由競賽。對於自然科學學術問題的討論，不戴帽子，不貼標籤，不用多數壓服少數。要允許自由地發表意見、堅持意見、保留意見。允許批評，同時允許反批評。通過自由討論、科學實踐和時間的考驗，逐步辨明是非。還明確闡明：自然科學技術，同社會政治學説不同，同樣一種自然科學技術，可以為資產階级、资本主義服務，也可以為無產階級、社會主義服務。不要給自然科學技術的不同學派、不同主張，貼上甚麽「資產階級」、「無產階級的」、「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的」之類的階級標籤。

關於科研機構的領導制度，《條例》規定：黨委是研究所的領導核心，它的主要任務是貫徹執行黨的方針政策和上級指示，研究、決定所內各方面工作中的重大問題；對於經常性的行政領導和業務組織工作，應當在所長領導下由各級行政業務組織和行政負責人來處理。「使擔任學術領導責任的科學家得以專心領導學術工作。」[17]

1961年7月6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專門討綸《科學十四條》和以聶榮臻名義給中央的報告。毛澤東沒有參加會議。兩個文件在會上引起了與會者共鳴。

第一個發言的是李富春，他說：「文件我看很好，文件中所提問題和情況帶有普遍性。不僅科學研究中是這樣，文教、高等院校裏邊也都存在這些情況，工業上也是如此。我建議可發給工業系統參考。對人的政策，主要是個紅與專的問題，這方面有偏向，空洞地要求紅。」

劉少奇插話說：「空談革命是帶引號的革命。」

李富春接着說：「工業方面，在技術政策上自由爭論沒有了，技術責任制也鬆弛了。工廠應該是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制，有些工廠實質上形成了書記責任制了。我看這個文件應發到工廠。」

鄧小平接着發言，他說：「我看是個好文件，可以試行，很有必要。試行後在實踐中加以修訂補充，使其成為科學工作中的憲法。只提一點意見，黨的領導方法，內容可以充實。黨怎樣做工作？要創造一個生動活潑，人心舒暢的局面，出科學成果。黨的領導幹部要和科學家交朋友，關心幫助他們。讓我看，二十四小時都有事情做，怎麼能夠說這樣一來思想政治工作就不好做了呢？我看就是要老老實實當好勤務員，為科學家服務，替他們解決困難。」

周恩來提議，這個文件，財經、文教等系統也都可以發。他很贊成聶榮臻、鄧小平關於為科學家服務的說法，他說：「要向我們的幹部講清楚，我們為科學家服務好了，科學家就為社會主義服務得好。總而言之，都是為社會主義。」

彭真在討論中對在科研機構輕率、頻繁的政治排隊提出了批評。

最後劉少奇發言。他說：「這幾年黨成為執政黨是好事情，是成績，亂指揮，人家也聽你的。但是繼續這樣搞下去要跌下台的，再不能這樣搞了。我們上台了，問題是指揮方法沒有掌握客觀規律，我們的任務是進一步掌握科學技術工作的規律性，不要瞎指揮，不要不懂裝懂。既然有偏向，就要糾偏。正確的當然不糾，有偏就糾，無偏不糾。」[18]

這部被鄧小平稱為的「科學憲法」，在政治局會議上一致通過了。會後送毛澤東批準，7月19日以中央名義正式下發，同時批發的還有聶榮臻的「請示報告」。

《科學十四條》制定和試行，對於把科研人員從頻繁的政治運動、政治學習和體力勞動中解脫出來，安心從事自己的科研工作，起了很好的作用。

聶榮臻回憶說：那時候「中國科學院、國防部五院、二機部九院等許多科研單位，晚上燈火通明，圖書馆通宵開放，一片热氣騰騰，我國真正出現了科學的春天。至今我還認為：如果沒有那幾年的實幹，『兩

弹』也就不會那麼快地上天。我們常説，中國人民是很聰明的，並不比別的民族笨。事實證明了這一點。我們有些科學家的確很有才能，關鍵是怎樣發揮他们的才幹，要有正確的政策，要關心他們的生活」。[19]

三十年後，鄧小平在他著名的南巡談話中，還深情地回憶説：「大家要記住那個年代，錢學森、李四光、錢三強那一批老科學家，在那麼困難的條件下，把兩弹一星和好多高科技搞起來。」[20]

6.重申「雙百」方針

在貫徹調整方針中，文藝是周恩來特別關注的一個領域。早在1959年5月3日，周恩來在中南海紫光閣約見全國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中的部分文藝界代表和委員，以及北京的一部分文藝界人士座談，就對「大躍進」中對知識分子的「左」的偏向進行了批評。然而，在當時的氣氛下，周恩來的這個講話沒有得到響應。1960年11月14日，他在中央文教部門負責人座談會上，又提出文藝要糾「左」，他對自己1959年的講話沒人理睬，表示了不高興。説：有不同意見可以討論，為甚麼「打入冷宮」？他提出要制定文藝條例。進入1961年，中央不少领導人如鄧小平、彭真、陳雲、陳毅等都對繁榮文藝給予了特別的關注。周恩來還約請部分在京文藝家在紫光閣座談，提出發揚政治民主、藝術民主，要糾正極左思潮，鼓勵文藝工作者大膽創作，敢於發表自己的意見。

根據周恩來的講話精神，1961年初，周揚、林默涵等人決定參照由聶榮臻主持制定《科研十四條》的辦法，起草一個文藝條例。隨後，在北京分別召開不同門類領導、專家調查會，並派出調查組到各地調查，組織起草文件並籌備召開全國文藝工作會議。起草工作由周揚、林默涵領導，林具體負責，參加起草工作的有呂驥、蔡若虹、張光年、袁水拍、郭小川、伊兵、黎之等。初稿寫出，經周揚、林默涵反覆修改、打印徵求意見，周揚主持中宣部部長辦公會議多次討論。到會的副部長除周、林二位外，還有張子意、許立群、姚溱等。在中宣部決策會議上思想之活躍，令第一次列席這種會議的黎之「感到吃驚」。他回憶説，會上「講了不少『大躍進』中極『左』思潮和文教戰線的極端的、可笑的事例」。議論最多的是文藝與政治的關係問題。大都不贊成再提文藝為政治服務的口號。許立群説：「為政治服務，這個提法不妥當。」林默涵插話説：「文藝為生產服務就更不妥當。」周揚説：「不提這個口號影響太大，還是沿用過去的提法為好。『文以載道』麼。」[21]

自從1942年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對文藝與政治的關係作了「文藝服從於政治」[22]的結論以後，這就成了一個高度敏感的禁區。1949年新中國建立以後，文藝界的風風雨雨，追根溯源，蓋出於此。許立群這時提出不再使用「文藝為政治服務」的口號，的確是

觸到了文藝領域存在的所有問題的癥結。但在當時，這個觀點不可能為多數人接受。

6月1日至28日，中宣部在北京召開全國文藝工作座談會，6月8日至7月2日，文化部在北京召開全國故事片創作會議，主題都是貫徹「調整、鞏固、充實、提高」八字方針，檢查總结幾年來，主要是檢查「大躍進」以來文藝工作中存在的問題，總結經驗教訓，調整文藝政策，貫徹「雙百方針」，繁榮文藝創作。兩個會議地點都在北京市新僑飯店，故稱「新僑會議」。

全國文藝工作座談會分兩階段進行。參加第一階段會議的是各省市宣傳部主管文藝的負责人。會議的中心議題是談文藝領導和討論《文藝十條》。會議開始時周揚講話，針對「大躍進」以來文藝工作中的「左」的錯誤指出，「大躍進」以來不少作品宣傳了「共產風」，是急就章。真正好的作品很少；「雙百方針」我看基本上沒有很好執行。在談到黨對文藝工作的領導問題時，周說：「胡風說，機械論統治了中國文藝界二十年」，「如果我們搞得不好，雙百方針不貫徹，都是些紅衣大主教，修女，修士，思想僵化，言必稱馬列，言必稱毛澤東思想，也就是夠叫人惱火的就是了。我一直記着胡風的這兩句話。」在談到歷次思想批判運動時，周揚說：「右派深淵、反黨深淵、右傾機會主義深淵，深淵太多了，一下跌入，萬劫不復。以後少搞深淵！」「要以天下安危為己任，培養海瑞上本的精神！」[23]

建國以後文化領域歷次政治運動，周揚都是忠實的執行者。但是，「大躍進」中的種種做法，周揚並非都贊同。特別是經過1957年的反右派和1959年的反右傾，他也似乎有一定的深切感受。然而，周揚的這個講話在會上並沒有得到積極響應，有的甚至對周播的講話有不少意見。參加會議的黎之回憶說：

> 分組讨論中，各省市宣傳部負责人對會議精神看法不盡一致。有不少人是赞成的，也有人想不通。他們認為這幾年上面的精神變化太快，一會兒反右，一會兒糾「左」，不知如何是好。有人借基層幹部的話説：「左」一個坑（諧傾字音），右一個坑，一不小心就掉到坑裏去了。一年以前剛剛在这裏開過「反右倾」「反修」的文化工作會議，今天又來糾「左」，擔心「左」未糾，又反右。……
>
> ……
>
> 對《十條》的讨論也不很热烈。有人認為，即使訂了很好的條文，中央精神一變也不管用。
>
> 周揚很着急，多次動員大家解放思想……會議依然未活躍起來……周揚也很惱火。[24]

會議進入第二階段情況才有了變化。6月8日以後，全國文藝工作會

議與故事片創作會議同時召開。會議召開之前，周恩來就指示，這次會議的主題是要發揚政治民主和藝術民主，解放思想，暢所欲言。有氣可以出氣。文化部的兩位副部長周揚、夏衍在會上作了動員式的講話。尤其是夏衍的講話，給與會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説：「不要總念一個經，總守一條道，而要『離經叛道』。」他説：「毛主席提的六條標準，是有一個中間地帶的。有的作品既無利也不是破壞，都應該允許，這就是無害。」夏衍關於「離經叛道」的説法一時成為引起轟動的名言。會議氣氛逐漸活躍起來。

6月19日，周恩來到會講話。根據前兩天文藝工作者們反映的問題，[25]周恩來講了：物質生產與精神生產、階級鬥爭與统一戰線、為誰服務、文藝規律、遺產與創造、領導、話劇等文藝界關心的七大問題。他開門見山地説：

> 現在有一種不好的風氣，就是民主作風不夠。我們本來要求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敢想敢説敢做。現在卻有好多人不敢想不敢説，不敢做。只許一人言，不許眾人言，豈不成「一言堂」麽？「一言堂」從何而來？是和領導有關的，所以，我們要造成一種民主風氣。我首先聲明，今天我的講話允許大家思考、討論、批判、否定、肯定。「一言堂」，説出一句話來就是百分之百正確，天下沒有這種事情。[26]

當時正在批評電影《達吉和她的父親》的人情味，周恩來卻説：

> 《達吉和地的父親》，我看了，小説和電影都看了，這是一個好作品。可是有一個框子定在那裏，小説寫到漢族老人找到女兒要回女兒，有人便説這是「人性論」。……我昨天看電影也幾乎流淚，但沒有流下來。為甚麼沒有流下來呢？因為導演的手法使你想哭而哭不出來，把你的感情限制住了。……導演在那個地方不敢放開手。這不是批評王家乙同志，而是説这裏有框子，「父女相會哭出來就是人性論」，於是導演的處理就不敢讓他們哭。一切都套上「人性論」，不好。其實關於人性論的問題早在二十年前就解決了。……可是現在還有人在那裏定框子，一個框子把甚麼都框住了，人家所説所做不合他的框子，就給戴帽子，「人性論」、「人類之愛」、「溫情主義」等等都戴上去了。

周批評説：「這些都是從主觀的框子出發的，是從定義出發的，那種定義又是錯誤的，並不合於馬克思列寧主義。」

「人性論」、「人道主義」在當時正是作為修正主義觀點受到批判，是一個非同小可的禁區。周恩來碰了這個禁區。

周恩來説：「要造成一種風氣，使大家敢於講話。只要對社會主義有利，即使思想不一致，也要説出來。允許發表不同意見，允許大家討論、商榷。」他反覆強調必須提倡藝術民主，研究和尊重藝術規律。他批評：幾年來有一種做法，別人的話説出來，就給套框子，抓辮子、挖

根子、戴帽子、打棍子，「五子登科」。這種風氣不好，現在要把這種風氣改過來。他最後說：「我今天所說的這些話不一定對，我是樹個『的』讓大家來射，樹個活靶子，讓大家來攻攻。」[27]

周恩來把自己的話樹成活靶子，讓大家來攻。給文藝界人士以極大的震撼。「這是在一個長久時期的沉悶的政治空氣中打了個驚雷。」一個與會者如是說。

6月23日，周揚在全國故事片創作會議上講話，批評「大躍進」中某些影片「概念化」的問題，他接過此前周恩來的話題，說：「『人性論』也沒有甚麼可怕……在『人性論』爭論上，我們要開展兩條戰線上的鬥爭，一方面反對资產階級人性論，另一方面是反對我們的階級標籤主義。」

6月28日，周揚在全國文藝工作座談會上作總結報告，批評過去有人把政治了解得很狹隘。他指出：

「政治掛帥，政治就不能太多，太多，就削弱了政治，政治不是帥，而變成兵了，政治是靈魂，靈魂要依附在肉體上。業務、藝術就是肉體；沒有肉體，靈魂就無所依附了，不知道它到底在哪裏。」[28]

全國文藝工作座談會上原則通過《文藝十條》，全國故事片創作會議還制定了一個《電影工作三十二條》，只是這個文件涉及的領域比較小，沒有引起人們太多的注意。

8月1日，中共中央將這個《關於當前文學藝術工作的意見（草案）》印發各地徵求意見。經過八個月的反覆修改，壓縮成八條，於1962年4月30日下發實行，改稱《文藝八條》。

《文藝八條》批評了文藝工作領導中不執行雙百方針，進行簡單粗暴的批評、限制和干涉，妨礙藝術創作和學術自由探討，忽視同黨外作家，藝術家合作，進行過火鬥爭，片面追求數量，文藝工作領導幹部獨斷專行，自以為是等「左」的錯誤。規定要進一步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嚴格劃分人民內部矛盾與敵我矛盾的界限，正確劃分政治問題、世界觀問題、學術問題和藝術問題之間的界限。不許用對敵鬥爭的方法來解決人民內部問題。不許用行政命令、少數服從多數的方法來解決世界觀、學術和藝術問題。也不應把學術、藝術問題随便引申為世界觀問題等等。

[1] 轉引自楊獻珍：〈怎樣總結歷史經驗，教育幹部，提高幹部〉（1961年11月7日），載楊獻珍：《楊獻珍文集》，第二集（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86），頁290。

[2] 毛澤東：〈轉發農村商業要辦活一點的材料的批語〉（1961年5月29日），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九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頁507-508。

[3]《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十四冊，頁453-454。

[4] 郭今吾主編：《當代中國商業》，上冊（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頁93。

[5]《當代中國商業》，上冊，頁96。

[6] 〈中共中央批轉輕工業部黨組關於緊急安排日用工業品生產的報告〉（1961年1月7日），載《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十四冊，頁11。

[7] 〈胡喬木給毛澤東主席的信〉（1961年5月8日），載《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十四冊，頁322。

[8]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朱德年譜》（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頁478。

[9] 《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十四冊，頁436。

[10] 據薄一波回憶：1960年底，李富春組織國家計委、經委、一機部、中央高級黨校、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和北京市委等單位的成員，成立調查組到北京第一機牀廠，就工業方面的問題進行系統調查。1961年3月，國家計委、經委又組織人員到石景山鋼鐵公司、城子煤礦、華北無線電廠、天津永利久大化工廠、太原鋼鐵廠、濟南鋼鐵廠等單位做調查。李富春還親自帶領工作組到北京市西城區調查城市工作問題。中央政治研究室也對天津第一鋼鐵廠和天津機牀廠做了調查。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頁953。

[11]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頁953。

[12] 「五定」是：定產品方向和生產規模；定人員、機構；定主要的原料、材料、燃料、動力、工具的消耗定額和供應來源；定固定資產和流動資金；定協作關係。「五保」是：企業對國家保證產品、數量和質量；保證不超過工資總額；保證完成成本計劃，並力求降低成本；保證完成上繳利潤；保證主要設備的使用期限。

[13]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頁974。

[14] 何東昌主編：《當代中國教育》，上冊（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6），頁71-73。

[15] 《當代中國教育》，上冊，頁77。

[16] 《當代中國教育》，上冊，頁76。

[17] 《國家科學技術委員黨組、中國科學院黨組關於自然科學研究機構當前工作的十四條意見（草案）》（1961年6月），載《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十四冊，頁547、548、551、555、561-562、568-569。

[18] 聶榮臻：《聶榮臻回憶錄》，下冊（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4），頁825-827。

[19] 聶榮臻：《聶榮臻回憶錄》，下冊：頁834。

[20] 鄧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談話要點》（1992年1月18日-2月21日），載《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頁378。

[21] 黎之：〈周陽興「文藝十條」、「文藝八條」〉，載王蒙，袁鷹主編：《憶周揚》（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頁288-289。

[22] 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1942年5月23日），載《毛澤東選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頁867。

[23] 黎之：〈周陽興「文藝十條」「文藝八條」〉，載《憶周揚》，頁291。

[24] 黎之：〈周陽興「文藝十條」「文藝八條」〉，載《憶周揚》，頁291-292。

[25] 1961年6月16日晚上，周恩來誰也沒有通知，來到新僑飯店，碰巧遇上趙丹。又由趙丹引領來看望因病臥牀的黃宗英。趙丹一路嚷着把周恩來帶到黃宗英的房間：「宗英，快，快，總理來啦！總理來看你，看大家啦！」周恩來笑盈盈進得屋來，端詳着黃宗英那身打扮，覺得奇怪：素布衫褲、家制布鞋，有點鄉下婦女的味道。他笑着問：「怎麼？連花衣服也不敢穿啦？」黃宗英忿忙解釋：「常下鄉……」周恩來讚許地說了一句：「好。」隨後又說了一句，「改造，也不在外表」。說話間，文化部副部長兼電影局局長陳荒煤、上海天馬電影廠黨委書記丁一、廠長陳鯉庭和沈浮等人聞風而至。小房內氣氛融洽，笑聲朗朗。周恩來衝着黃宗英搖搖頭說：「更瘦啦！甚麼病？讓醫生仔細查查。」黃宗英趕緊解釋：「總理，我沒甚麼大病，一多半是念出來的。老完不成任務，白吃人民的飯。」黃宗英長期當演員。1959年，她被任命為上海電影製片廠的專職編劇。黃宗英當了一年的編劇，劇本絕少成活，一急之下，竟然病倒了。黃宗英向周恩來訴說看一個「五個書記掛帥」的事情。不久前，她奉命創作，電影劇本《好當家》，要求兩個星期體驗生活一個星期交出創作提綱，一個星期交出劇本初稿。為保險起見，市委第一書記親自關懷、過問。上海電影局第一書記、電影廠第一書記、公社第一書記（還加上縣委負責人）層層掛帥，電影廠副書記親自坐鎮。這是一個塑造黨的書記光輝形象的「重大題材」，偏偏這位黃宗英一輩子不認識幾個書記，更役有當書記的體會。……大家私下裏稱：五個書記掛帥，也養不出「胖娃娃」來。黃宗英説：「總理，我們電影這一行，誰都有發言權。而藝術家本身的發言權……就難説了。我們是不怕文責自負、戲責自負的，老實説，歷次運動也沒人替我們負。我們的黨——各級黨委，究竟以甚麼方式、怎樣來領導劇本創作，領導藝術生產，我們認為應該研究、討論。」黃宗英的話引開了大家的話匣，你一言我一語地向周恩來反映會上的情況和藝術家們的呼聲。大家希望周恩來到會講話。見蕭冬連：《共和國年輸（1961）》（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杜，2001），頁256-258。

[26] 周恩來：《在文藝工作座談會和故事片創作會議上的講話》（1961年6月19日），載《周恩來選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頁323-324。

[27] 周恩來：《在文藝工作座談會和故事片創作會議上的講話》（1961年6月19日），載《周恩來選集》，下卷，頁323-328、348。

[28] 第四次文代會籌備組起草、文化部文學藝術研究院理論政策研究室：《六十年文藝大

事記（1919-1979）（澳門：中國現代文學研究中心，1979），頁196。

四、調整政治關係共渡難關

1.黨內的甄別平反

從1958年發動「大躍進」起，由「插紅旗、拔白旗」到1959年「反右傾」、1960年整風整社中的民主革命補課，使一大批黨員、幹部受到錯誤批判和處分。據全國二十七個省、市、自治區和中央、國家機關不完全的統計，僅1958年一年就有五十多萬名黨員幹部受到處分，佔黨員總數的4.357%。[1]1959年反右傾被列為重點批判對象和被劃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幹部和黨員達365萬人之多。不解決這部分人的問題，就無法恢復黨內的生機。

對受到錯誤批判和處分的幹部、黨員進行甄別平反的工作，是随看《農業六十條》制訂和貫徹展開的。1961年6月15日，中共中央在《關於討論和試行〈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修正草案）的指示》中明確闡明：

> 為着發揚民主，有必要對於最近幾年來，受過批判和處分的幹部和黨員，實事求是地加以甄別。過去批判和處理得正確的，應該加以肯定，不再改變。過去批判和處理完全錯了的，要改正過來，恢復名譽，恢復職務；部分問題批判和處理錯了的，就改正這一部分問題的結論。對於生產大隊和生產隊的幹部的處分，應該交給群眾審查。至於錯誤地對群眾（包括富裕中農在內）進行的批判，應該在適當場合向他們道歉：如果作了錯誤處分的，還應該纠正。

並且規定：「今後在不脱產幹部和社員群眾中間，不許再開展反對右傾或者「左」傾的鬥爭，禁止給他們戴政治帽子。」[2]

此後，甄別平反的工作首先從農村開始，重點是縣以下農村。自1958年以來，縣以下幹部在多次運動中被整的人很多。當時估計有1000萬，影響的人總有幾千萬。其中整人最多的有兩次：一是廬山會議後「反右傾」運動被劃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一次是1960年底整風整社運動被劃為漏網地富分子或破壞分子。1959年被整的是反「左」的人，1960年被整的則是執行「左」的一套的人。這一正一反，使農村幹部無所適從，躺倒不幹。

但甄別平反工作，1961年進展缓慢。1962年初舉行的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後，鄧小平主持中央書記處會議，專門討論了甄別平反的工作問題。4月27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加速進行黨員、幹部甄別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加強領導，加速進行」。明確規定：

> 凡是在拔白旗、反右傾，整風整社、民主革命補课運動中批判和處分完全錯了和基本錯了的黨員、幹部，應當採取簡便的辦法，認真地、迅速地加以甄別平反。……其中即使有的有些輕微錯误，也不要留尾巴。[3]

此後，又根據軍隊的經驗，建議對全國縣以下的幹部來個一攬子解決，即對過去搞錯了或者基本搞錯了的幹部統統平反，除個別有嚴重問題的外，都不要「留尾巴」，一次解決。鄧小平還在5月的中央工作會議上強調：

> 甄別平反是一個很重要的工作，不要輕視這個工作。上面的領導同志，要下去幫助承擔责任，這樣搞可以快一些。這件工作，請各中央局告诉各省、市、自治區黨委，凡是開始做了的，繼續做，沒有做的，迅速做。其结果一定要向群眾當面公布。這實際上是我們承認一個錯換，承認我們過去搞得不對。[4]

這樣，黨內外的甄別平反工作才迅速全面推開。到1962年8月，全國有六百多萬幹部、黨員和群眾得到平反。

在決定甄別平反的同時，中共中央還提出了要教育和訓練幹部的任務。

9月15日，中共中央在廬山會議上專門作出了一個《關於輪訓幹部的決定》。《決定》説：中央根據毛澤東在全黨開展一個新的學習運動，重新教育幹部的提議，決定對全黨各級各方面的領導幹部：採取短期訓練班的方式，普遍地進行一次輪訓。輪訓的目的，是幫助幹部進一步認識和掌握社會主義建設的客觀規律，克服某些片面性的認識和在實際工作中右的或「左」的錯誤；克服幹部中脱離實際、脱離群眾，違反政策、違反紀律的錯誤，以便提高幹部的思想政治水平，增加黨性。輪訓的對象，主要是縣委書記和相當於這一職務以上的黨員幹部。訓練內容，為社會主義建設和黨的建設兩個方面，著重解決黨的建設和黨的生活中存在的問題。[5]

1961年中共中央作出平反和輪訓幹部的決定，對於當時理順黨內關係、幹部與群眾的關係至關重要，可謂牽住了時局的牛鼻子。

2.調整統一戰線政策

在黨內搞甄別平反的同時，也開始在黨外人士中進行甄別平反和檢查落實統一戰線政策的工作。

(1)民主黨派的「神仙會」

1957年反右派鬥爭，五十五萬人劃為右派，大多是民主人士和黨外知識分子。1958年「大躍進」興起，民主黨派開展「交心運動」，旋即

展開整風大辯論，一些民主人士又由於「交心」提供的材料而被劃成右派分子。民革成員中右派佔其黨員的比重，交心前為9.4%，交心後上升到12.7%。反地方主義、反民族主義鬥爭都波及黨外人士。在這種壓力下，大小資本家主動提出取消定息，放棄高薪。毛澤東説：「资本家要求取消，我們就不取消。交心可以，不要交錢。」遂作罷。弦繃得實在太緊，毛澤東發話：對资產階級可以一張一弛，緊幾個月，鬆幾個月。1959年廬山會議後展開「反右傾」鬥爭，黨外人士忐忑不安，惟恐波及自身。中共中央統戰部發指示，在黨外人士中不進行反右傾運動，不進行重點批判，不搞交心運動，而用開「神仙會」的辦法來進行自我改造。1960年2月11日，劉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聽取中央統戰部部長李维漢、副部長許滌新關於中國民主建國會全國代表大會、全國工商聯會員代表大會的情況匯報，劉在會上指出：資產階級的大多數人是願意改造的，是可以改造的。現在他們向我們靠攏，我們也要放寬一些，從思想、工作、生活照顧、政治照顧等方面採取積極團結的辦法和措施。12日，劉少奇在同中國民主建國會、全國工商聯領導人黃炎培、陳叔通、盛丕華、胡子昂、孫起孟、胡厥文、施復亮等座談時，針對有人擔心政府對工商業者是否照顧到底的問題，向他們指出：工商業者只要接受改造，為國家做事，同共產黨合作，生活上國家照顧到底，負责到底。「工商業者要顧思想進步的一頭，國家包生活照顧的一頭。」[6]8月22日，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鄧小平等中共中央領導人接見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國民主同盟、中國民主促進會、中國農工民主黨，中國致公黨、九三學社等民主黨派中央全會擴大會議的代表。9月6日，各黨會議代表集體向毛澤東發致敬電，表示「一定要跟上飛躍發展的形勢」。這種馬拉松式的「神仙會」進行了一年多，據新華社1961年5月15日報道，一年來全國各地召開大小規模的「神仙會」數千次，有近百萬人參加。中共中央還多次召集民主人士座談會，向他們報告國內外形勢和黨的有關政策，聽取他們的意見。

據1961年1月在西安閉幕的民建二屆中央常委會、全國工商聯三屆四次常委會反映，儘管人們對國際形勢有所擔憂，對國內經濟困難狀況多有牢骚，但是，中共中央提出開「神仙會」，徹和風細雨的方針，以及「包一頭、顧一頭」對工商界多方照顧的方針，大家還是受到了鼓舞，多數人的情緒穩定了下來。[7]

(2)為右派摘帽

對右派分子的政策是逐批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摘帽」是給出路的政策，與平反性質不同。但「摘帽」畢竟對右派的處境有所改善。1959年9月16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專門作出一個《關於確實表現改好的右派分子的處理問題的決定》，1959年、1960年，兩批摘帽九

萬多人。1961年10月28日，中共中央向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區黨委、中央各部委、各黨組發出指示，提出「再給一批右派摘掉帽子」。根據這一指示，1961年全國為右派摘帽12.9萬人，比前兩次的總數還多。12月16日，中央國家機關和各民主黨派中央機關宣布為三百七十多人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其中有錢端升、馮雪峰、柳湜、黃藥眠、徐懋庸、許資駿、陳達、吳景超、傅鍾蓀、馬松亭、孟鞠如、揚崇瑞、楊逸棠、劉一峰、王一帆、吳紹澍、王枕心、何北衡、李健生，顧執中、邱克輝、吳春選、吳祖光、艾青、白朗、羅峰等一大批知名人士。[8]

在此期間，農村也對部分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進行了「摘帽」。

(3)民族、宗教政策的調整

民族政策也着手進行調整，貫徹「有錯必糾」的政策。影響最大的是對1958年青海平叛中擴大化錯誤的改正。1961年7月，中共中央統戰部在蘭州召集西北民族工作會議，重申了黨的民族政策、统戰政策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民族政策調整另一個大的舉動是防止西藏民主改革中「左」的做法。1960年底，中共中央派民委副主任楊靜仁赴西藏作調查。1961年1月23日，毛澤東接見班禅、劉少奇，周恩來、陳雲、鄧小平陪同接見，毛澤東對班禪説：「我們信任你。」鼓勵班禪有牢骚就發出來，多交流溝通。毛同意班禪提出的保留一部分脱產喇嘛的意見，赞成有幾千人學經，成為佛學知識分子。

在這種糾「左」的空氣下，1961年10月起，班禅額爾德尼·確吉堅贊到青海、新疆等地調查。於1962年5月寫成一份《關於西藏總的情況和具體情況以及西藏為主的藏族各地區的甘苦和今後希望要求的報告》（後被稱為《七萬言書》，系统地、直言不諱地提出了他對西藏及其他藏區工作的批評和建議。周恩來接到報告後，非常重視，認為大部分意見和建議可以採納，遂指定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李維漢主持，針對《報告》提出的問題，制定了四個重要文件。隨後，西藏自治區成立四個小組，由班禪副委員長負責落實宗教政策，阿沛·阿旺晉美副委員長負责糾正平叛擴大化錯誤。

(4)特赦戰犯

1960年11月和1961年12月這一年多時間內，中共中央對蔣介石集團和偽滿洲國戰爭罪犯實行了兩次特赦。1960年11月特赦五十名，其中屬於蔣介石集團的戰犯四十五名，偽滿洲國的戰犯四名，偽蒙疆自治政府的戰犯一名。1961年12月特赦六十八名，其中原屬於蔣介石集團的戰犯六十一名，屬於偽滿洲國的戰犯七名。六十八名戰犯中有將级軍官三十二名。知名者有：國民黨第九兵團中將司令官廖耀湘，國民黨第六十

二軍中將軍長兼天津防守副司令林偉儔，偽滿洲國外交部大臣阮振鐸等。連同1959年12月首次特赦，三批共特赦釋放了一百五一名戰犯。

周恩來十分關心特赦戰犯的生活安排。1961年2月8日，他在統戰部《關於首批被特赦戰犯溥儀、杜聿明等人的情況和安排意見》上批示：

> 在北京的七人（溥儀、杜聿明、王耀武、宋希濂、周振強、鄭庭笈、楊伯涛），第一步一律聘為全國政協文史资料研究委員會專員，並參加社會主義學院學習，月薪可提高到每人一百元。惟溥儀如願留在中科學院北京植物園半工半讀也可以，但專員名稱和待遇應與其他人相同。其他四人可分別在上海、瀋陽、昆明、南京也給以政協秘書處內專員名義，待遇、學習相同。[9]

2月12日，周恩來偕夫人鄧穎超約見溥儀、溥傑及其弟妹等人，詢問每個人的身體、生活、學習、工作和家庭等情況。囑咐他們從生活上、思想上做好嵯峨浩（博傑的日本妻子）的工作。要他們學會用矛盾的觀點看問題，認識到人的思想有進步和落後兩方面，需要不斷改造。改造成新人，當然是不容易的，但人是會慢慢起變化的。針對家族中有人提出對嵯峨浩「得有警惕」事說，對她有警惕是必要的，但也不要過分，要通過她做中日友好的工作。2月21日，周恩來和陳毅接見第二批特赦戰犯，鼓勵他們寫回憶錄。要從頭做起，努力改變舊習慣。6月10日，周恩來再次接見溥儀、溥傑、嵯峨浩及其家族其他成員。闡明中國共產黨的態度是「平等待人，有無相通。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膚色，四海之內皆兄弟」，「我們共產黨的目的就是要把世界搞得美好，使大家都能活下去，而且過得好」。[10]

特赦和做特赦戰犯的工作，體現了統一戰線政策更大範圍的調整，即為祖國统一和打破美國為首的资本主義國家對中國實行封鎖、遏制的局面服務。

3.為知識分子鬆綁

發展教育、發展科學技術，很重要的一個問題是要調動知識分子的積極性。因此，在《科學十四條》、《高教六十條》、《文藝八條》三個條例中，除了調整對有關專業發展本身的政策以外，重要的問題是為知識分子鬆綁。在1957年反右派鬥爭以後，壓在知識分子心頭的「石頭」，一是「资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帽子，二是「白專」道路的棍子。

1961年春，中宣部副部長周揚為抓高校教材的編寫工作，在北京、上海、廣州等地專門拜訪了一些知名教授。在廣州，周揚登門拜訪了中山大學教授陳寅恪，陳問：周先生，新華社你管不管？周說，與我有點關係。陳說：新華社1958年某月某日播發一條新聞，說大學生教學比老師還好，只隔了半年多，現在為甚麼又說學生向老師學習，為甚麼前後

矛盾？周說，這是新生事物，總要經過實驗。比如買雙鞋也要試幾次。陳說：實驗是可以，但是尺寸不要差得太遠，差一點是可能的。周揚拜訪北京大學教授馮友蘭時，馮也談到前幾年的師生關係問題。他說，我們不是老師，是侍讀。這兩件事都引起周恩來，鄧小平的注意。周恩來本人也拜訪過朱光潛，錢鍾書等不少人。[11]

在當年4月召開的全國文科教材會議上，黨內外專家對幾年來在教育領域存在的問題提出了尖銳批評。與會者指出，一個時期發生了忽視知識的現象，不恰當地強調培養所謂普通勞動者。有些人不理解應當教育學生以普通勞動者的姿態，即以真正平等的態度對待勞動人民，和勞動人民打成一片，同時在專業知識上必須不同於普通勞動者，才能符合國家的需要。現在白專道路的概念使用過濫，喜歡讀書而不大喜歡參加某些集體活動的學生，往往被批評為走「白專道路」，以致在學生中造成不敢讀書、不敢鑽研學問等不正常風氣。他們認為，紅和白都是政治概念，只有反對社會主義、堅持個人主義才能算白。如果一個人在政治上是反對黨和社會主義的，那麼就應當批判他政治反動，沒有必要把「白」和「專」聯繫在一起。「白專道路」的說法，容易使人產生誤解，把那些在業務上比較努力，但政治上進步較慢或政治上還在轉變過程當中、處於中間狀態的人，也指為走「白專道路」。[12]

反映強烈的另一個問題是關於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問題。中共中央宣傳部5月19日在向中央的報告中說：會上不少老教師認為近幾年來學生對教師太不尊重，言下頗有憤慨。他們指出在學生和青年教師對老教師的學術批判中有不少簡單粗暴的現象，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政策沒有很好貫徹執行。[13]

關於「紅」和「專」的關係問題。周恩來在1961年6月19日的講話中，就曾批評「白專道路」這個口號，指出「這個口號不是我們提的」。[14]6月20日，聶榮臻在關於當前自然科學工作中若干政策問題向中共中央的請示報告中，也認為「紅必須落實，不能空空洞洞的」，「白專」這個提法「是不確切的」，建議以後不要把「白專」作為批判用語。8月10日，陳毅在對北京市高等院校應屆畢業生的講話中也指出：「從來沒有空頭的政治，政治都是通過業務來體現的」，「我們不能夠拿參加政治活動多少來衡量一個人的『紅』或『白』」。正是根據這些精神，三個條例中都對此作了相應的規定和說明。

《科學十四條》規定：「紅，首先的和主要的是指的政治立場。對自然科學工作者的紅的初步要求，就是：擁護黨的領導，擁護社會主義，用自己的專門知識為社會主義服務。」「紅和專應當统一起來。……我們要求自然科學工作者又紅又專，就必須要求他們自覺地用自己的專門知識和研究成果來為社會主義服務。……在今天大多數的情況下，科學工作者的鑽研業務和努力工作的積極性，正是他們的社會主義

思想覺悟提高的具體表現，必須十分愛護和充分鼓勵。」[15]

《高教六十條》指出：「高等學校師生的紅，不但應該表現在政治思想方面，而且應該表現在他們教學和學習的實際行動中。」「把在業務上比較努力，但是在政治上進步較慢，或者政治上處於中間狀態的人，指為走『白專道路』，是不對的。」[16]

經中共中央批準的聶榮臻：《關於當前自然科學工作中若干政策問題的請示報告》明確提出：不再輕率地進行政治排隊，鼓勵人才冒尖。對全國有突出成就的科學家和一批優秀的中青年科學工作者，都要開出名單，由領導機關親自掌握，給其製造條件；要承認並尊重個人的勞動成果，鼓勵科學工作者著書立説等等。

鑑於上述問題對所有知識分子工作部門的普遍意義，中共中央在批準聶榮臻的請示報告和《科學十四條》時作了長篇批示，其中特別指出：「這個文件的精神，對於一切有知識分子工作的部門和單位，也都是適用的。各高等學校、大中廠礦、書院、報社、雜誌社、出版社等單位的黨委，都應當認真地討論，結合自己的情況，參照執行。」[17]

然而，上述三個條例都沒有對知識分子的階級屬性這個敏感問題有一個明確界定。《工業七十條》中雖然指出「技術人員和職員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18]但並不是就整個知識分子隊伍來説的。周恩來在1961年6月19日的講話中有一段似乎觸及這一問題的話。他說：「有一個時期好像覺得1956年關於知識分子的那些問題可以不講了，不是的，那些原則仍然存在。」這無疑是指1956年1月知識分子會議上關於「知識分子已經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的政治界定，但並沒有捅破這層窗戶紙。再次為知識分子摘掉了「資產階級」的帽子，人們熟知的是1962年3月廣州會議時，陳毅元帥為知識分子「脱帽加冕」的佳話。從現有材料上來看，時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書記的陶鑄，早陳毅半年，在1961年就曾大膽地對這個問題作過表態。

在毛澤東提出大興調查研究之風後，陶鑄從1961年2月份開始，對廣東知識分子情況進行摸底，9月28日，陶鑄邀請廣東一批高級知識分子參加廣東省委召開的座談會。應邀赴會的有在廣東的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有高級知識分子中的全國人大代表、全國政協委員以及廣東省各民主黨派的知名人士。在座談會上，陶鑄作了一次感情充沛的演講。他說：

> 十二年的時間不算短，知識分子可以説已同我們結成患難之交。幾年來物質條件比較困難，沒有豬肉吃，大家還是積極工作，沒有躺倒不幹。酒肉之交不算好朋友，患難之交才算，「疾風知勁草」，「歲寒以後知松柏之後凋」。现在的問題是團结高级知識分子不夠，對他們信任不夠。……现在我們是要把團結提到新的水平，一是尊重，二是關心。所謂高級知識分子，就是比

一般人多讀了一點書。中國有句古話，「士為知己者死，女為悅己者容」，是有些道理的。……今後對於思想認識問題，只能採取關心、傾談、切磋、誠懇幫助的辦法，要把思想問題與政治問題嚴格區分開來，今後不能採用大搞群眾運動的辦法來解決思想問題。……對於過去批判搞錯的，應該平反、道歉、老老實實認錯。「等價交換」，在甚麼場合戴的帽子，就在甚麼場合脫帽子，不留尾巴。凡是三年來鬥爭批判錯了的，我代表中南局和廣東省委向你們道歉、認錯。如果連這一點也做不到，那能談得上新的團結。……同時，我還建議：今後一般不要用资產階級知識分子這個名詞，因為這個帽子很傷害人。其次，凡屬思想認識問題，一律不準再搞思想批判鬥爭會。第三，不準用「白專道路」的帽子。……「紅透專深」這個提法陳毅同志不大同意，我也有同感。甚麼叫紅透？紅透就是優秀的馬克思主義者。共產黨員是不是就紅透了？我就是沒有紅透的，我還不敢有這個要求，為甚麼要這樣要求專家呢？[19]

時隔十二天後，10月10日陶鑄以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書記的身份，約集中央局所轄：湖南、湖北、河南、廣東、廣西五省區的高級知識分子代表102人，在廣州和從化溫泉召開「中南區高級知識分子座談會」。陶鑄在會上再次講話，他說：

我們不能老是講人家是资產階級知識分子，我看要到此為止了。現在他們是國家的知識分子，民族的知識分子，社會主義建設的知識分子。因此，我建議今後在中南地區一般地不要用「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這個名詞了，那個名詞傷感情。……陶淵明「不為五斗米折腰」，你們（指在場的高級知識分子）現在只有二十四斤（不到五斗米）還是跟着我們搞，所為何來！現在，我們的物質條件很差，精神上也對人不那麼尊重，人家還有甚麼想頭呢！[20]

在政治上給予安撫的同時，陶鑄在10月上旬指示廣東省委文教領導小組列出一個兩千名知識分子的名單，在物質生活和學術研究上給予照顧。[21]

據檔案記載，陶鑄在三個月之內先後在廣東召開了五次大型高級知識分子座談會，直接參加會議的先後有兩千多人，陶鑄的構想是要「層層發動，人人傳達」，刻意營造出一個春天。

當陶鑄講話的精神傳達後，「許多與會者痛哭流涕」，比喻為久旱逢甘露，當場「表示今後對黨要鞠躬盡瘁」，各高等院校「一片振奮」，「眾教授表示是枯木逢春」，「歷史上從未有一個政府這樣照顧知識分子」。有人甚至表示：「朝聞道，夕死可矣」。更有不少人當場反省自己的不足，「知識分子也要檢查自身的不足，要更好地改造自己，才能不辜負黨對我們的期望」。「黨給足了知識分子面子，我們也該想想自己是否稱得上是國家的知識分子」！

在中共中央沒有正式表態之前，陶鑄公開表示：「今後一般不要用资產階級知識分子這個名詞」，肯定「他們是國家的知識分子，民族的知識分子，社會主義建設的知識分子」。這在當時是冒了風險的。1961年11月，中宣部《宣傳動態》上發了一條消息，題為〈中南一些知識分子認為黨給他們「摘掉了资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帽子」〉。這只是一個客觀報道，編者未置可否，明顯是持保留態度。

周恩來、陳毅則對陶鑄的意見完全贊同。1962年3月，在廣州召開的全國科學工作會議和全國話劇、歌劇、兒童劇創作座談會上，陳毅在事先徵得周恩來的同意，正式向與會人員提出「脱帽加冕」，即脱掉「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之帽，加「人民的知識分子，社會主義的科學家，是人民的勞動者」之冕。

但在中共高層，明顯存在不同意見，甚至明確反對。對這一歷史情節，薄一波有一段較為詳细的回憶。他說：

> 周總理、陳毅同志在廣州會議上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講話，在中央內部就有少數人不同意甚至明確反對，柯慶施同志在上海竟不讓傳達陳毅同志的講話。在周總理要求毛主席對這個問題表態時，毛主席也沒有説話。到1962年8月9日，當有人在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上提出「摘掉资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帽子是否合適」時，毛主席便説：「资產階級知識分子有些陽魂過來了，但是陰魂未散，有的連陽魂也沒有過來。」這表明毛主席對摘掉资產階級知識分子帽子的做法是不同意的。8月13日，當有的同志提出资產階級知識分子還是有的，不能説资產階級還存在，就沒有资產階級知識分子了的時候，毛主席又插話説：「從意識形態來説，资產階級知識分子還存在。」陳毅同志9月11日談到他在廣州著重批評了知識分子問題上的「左」的倾向時，小平同志明確表示「陳總講的是對的」。而毛主席卻表示了不同看法，他説：人家请你講話總是有目的的，總要沾點光，沒有利益他不幹。我對總司令講過，你到處講話要注意。
>
> 關於知識分子階級屬性問題的不同看法，也反映到了1962年10月至11月中央召開的宣傳文教會議上，特別是中南組，在讨論中分歧很大。11月26日陸定一同志在中央書記處會議上匯報了會上的不同意見，周總理聽後明確表示：「對知識分子，説我們提勞動人民的知識分子是沒有階級分析，我是代表黨作報告的，是黨批準的，不是我一個人起草的，少奇在憲法報告上講過有工人階級知識分子，勞動人民知識分子，资產階級知識分子，我不認為我在廣州會議上講勞動人民知識分子有甚麼錯誤。」小平同志完全支持周總理的意見：「恩來在廣州報告沒毛病，對知識分子問題應照總理講的解释，請定一查一查，澄清一下，講清楚。關於知識分子問題。下次會議還要討論，统一解釋口徑，還是按總理在人代會講的為準，把那一段印一下，那是中央批準的我們黨的正式語言，今天正式決定。」小平同志還説：「上次在主席處

谈了，這次宣傳會議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讨論，不下傳。」但是，這個問題實際上並沒有完全解決。[22]

龔育之在一篇談建國後中共知識分子政策的文章中，談到1962年這次全國文教書記會議（即上面薄一波寫的中央召開的宣傳文教會議）時，根據當年的筆記錄了一段陸定一在會上的講話。陸説：

> 這些年來知識分子政策有些亂，一「左」一右。「左」發生在1957年、1958年、1959年的下半年和1960年的上半年，表现為「拔白旗」，寧「左」勿右的那個綱領，提升職稱的那個文件。右表现為「脱帽加冕」，知識分子都成了勞動人民的知識分子。知識分子只有兩種：资產階級知識分子和無產階級知識分子，按世界觀劃分。勞動人民知識分子的提法不確切，模糊了階級界限。出身於農民、小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不附屬於無產階級，就附屬於资產階級。在社會主義時期，知識分子中的統一戰線，包括無產階級知識分子和资產階級左派，中間派的知識分子，團結的範圍一直要伸展到「中右」的知識分子。用這樣一條界限來防「左」、防右。[23]

作為主管中共中央宣傳部門的主要負責人陸定一都不同意為知識分子「脱帽加冕」，甚至認為這是右傾的表現，那麼，毛澤東沒有表態就不會使人感到偶然了。因此，從1961年開始的知識分子政策調整，並沒有能完全解決問題，以至於不久以後就出現了更大的反覆。

[1]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全鑑》編委會：《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全鑑（1960-1966）》，第三卷（北京：團結出版社，1996），頁2723。

[2] 《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十四冊，頁382。

[3] 《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十五冊，頁361-362。

[4] 鄧小平：《克服當前困難的辦法》（1962年5月11日），載《鄧小平文選》，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頁319。

[5] 《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十四冊，頁608-609。

[6]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劉少奇年譜（1898-1969）》，下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頁478-479。

[7] 《工商界多數人發生程度不同的動搖反復——民建、工商聯常委聯席會議上的反映》，《內部參考》，1961年2月1日。

[8] 〈中共中央發出摘掉一批右派分子帽子的決定〉，載《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全鑑（1960-1966）》，第三卷，頁2745。

[9]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卷（北京：中共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頁390。

[10]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卷，頁391、392、415-416。

[11] 黎之：〈周陽興「文藝八條」「文藝十條」〉，載《憶周揚》，頁281-282。

[12] 中共中央宣傳部：《關於高等學校文科教學方針和教材編選工作的報告》（1961年5月19日），載《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十四冊，頁421-422。

[13] 中共中央宣傳部：《關於高等學校文科教學方針和教材編選工作的報告》，頁426。

[14] 周恩來：《在文藝工作座談會和故事片創作會議上的講話》，載《周恩來選集》，下卷，頁342。

[15] 《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十四冊，頁564-565。

[16] 《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十四冊，頁599。

[17] 〈中共中央同意聶榮臻《關於當前自然科學工作中若干政策問題的請示報告》和國家科委黨組、中國科學院黨組《關於自然科學研究機構當前工作的十四條意見（草案）》的報告〉，載《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十四冊，頁514-515。

[18] 〈中共中央關於討論和試行《國營工業企業工作條例（草案）》的指示〉，載《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十四冊，頁678。

[19] 陸鍵東：《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北京：三聯書店，1995），頁338-339。

[20] 陸鍵東：《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頁339。

[21] 從1961年11月份起，給副教授以上的高級知識分子每人每月補助一斤食油（後又增加一斤），每戶十斤糧食；對陳寅恪、姜立夫等一流著名學者生活上的特殊困難，全部由省委負責解決。陸鍵東：《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頁342-343。

[22]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時間的回顧》，下卷，頁1006-1007。

[23] 龔育之：《育之論中共黨史》，下冊（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頁713。龔在文末附注中寫道：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陸定一復出，發表的第一篇文章，就包含在知識分子問題上對周總理的敬佩和對自己的批評。文章中說：「對於我國知識分子隊伍的情況，周總理也作了實事求是的估計。有人把我國知識分子隊伍説的漆黑一團，周總理不同意這種看法，他說：『我國知識分子絕大部份是好的，他們聽黨的話，願意為社會主義服務。』」周總理著重看知識分子為誰服務，而不把世界觀作為對知識分子階級屬性的標準。……這是很對的。「我在這個問題上的觀點，當時曾經是偏『左』的，所以是錯誤的。」陸定一的文章題為〈懷念人民的好總理——周恩來同志〉，載陸定一：《陸定一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頁697-698。

五、文化領域的短暫春天

階級鬥爭調門的降低，各項政策的調整，使1956年曾一度活躍，1957年以後陷入消沉的思想文化界被重新喚醒，從1961年起，中國文壇又出現了一個活躍和繁榮的短暫時期。

1.《海瑞罷官》與《李慧娘》

文藝對政治的反映歷來最為敏感。由於政治氣候的轉暖，文藝界出現的文壇盛事首推《海瑞罷官》和《李慧娘》的公演。劇本作者，前者為著名明史專家吳晗[1]，後者是老劇作家孟超。

吳晗這位歷史學家，「破門而出」，寫起了歷史劇？原是奉的『御旨』。

1958年，毛澤東發動「大躍進」是從批判1956年的反冒進開的頭，接着又拿出了「觀潮派」和「算賬派」的兩頂帽子，預先作了設防。這樣，「大躍進」無論成功與否，就把所有有不同意見人的嘴給堵死了。1958年底毛澤東已發現大煉鋼鐵和人民公社化運動造成了混亂，但他並不願自己承擔責任，1959年3至4月上海會議期間，他歷數了歷史上他受到多數人反對的事例，證明他本人一貫正確，認為現在的問題：一是計委等業務部門工作失誤，二是黨內沒有人批評他的缺點。於是講了一段海瑞的故事。

當時參加會議的李鋭説：當天晚上，見到田家英。認為，毛這樣談到海瑞，似乎是鼓勵人們學海瑞，敢於講真話，不要今不如昔，連明朝的廷諫之風都趕不上。家英向我反映了喬木的觀點：毛提起海瑞的説法不止這一次，實際上還是要求不要出海瑞。當時我和田都認為喬木這個看法很深刻，他對毛理解得比較深。[2]

後來，毛澤東要胡喬木找幾位歷史學家寫海瑞的文章。於是胡喬木找到明史專家吳晗，吳晗慨然命筆。寫了〈海瑞罵皇帝〉一文，發表在1959年6月。9月21日，又發表了〈論海瑞〉一文。〈論海瑞〉在《人民日報〉發表時，已在廬山會議之後，為表示此文與彭德懷無關，「胡喬木加了一個尾巴」，[3]寫上了一段批判「右傾機會主義」的話。此後，吳晗應京劇表演藝術家、北京京劇團團長馬連良先生之約，七易其稿，苦心孤詣，寫成《海瑞》一劇。1960年底彩排時，友人蔡希陶見劇本並不是寫海瑞一生，而只寫其二、三事，且末尾有海瑞不滿庸官，掛印棄官而去的情節，遂大筆一揮，在《海瑞》劇名中加上「罷官」二字，改為《海瑞罷官》。1961年1月發表於《北京文藝》，並由北京京

劇團上演，馬連良飾海瑞，裘盛戎飾徐階，李多奎飾海瑞母親。

《海瑞罷官》是寫明朝大臣海瑞在任應天府巡撫期間，敢於將曾任宰相的徐階的第三個兒子徐瑛（強佔民田、強搶民女的惡霸）處死，並通令縉紳退田等故事，宣揚了海瑞剛直不阿、不畏強暴、敢於鬥爭的精神。《海瑞罷官》一上演，立即在文藝界、史學界掀起波瀾。文史學界歡呼叫好，毛澤東也給予了肯定。據吳晗夫人袁震之妹袁浦之回憶：「毛主席很高興，在家裏接見了主演海瑞的馬連良，同他一起吃飯，請他唱海瑞，並說：戲好，海瑞是好人。馬連良回來告訴吳晗，說毛主席真偉大，禮賢下士，接近群眾，吳晗聽了非常高興。」[4]受到毛澤東的鼓勵，馬連良也高興地連寫兩篇文章：〈《海瑞罷官》演出雜感〉、〈從海瑞談到「清官戲」〉，談他扮演海瑞的體會。

對《海瑞罷官》喝彩的，更多的是認為它打破了「史」與「戲」的界線，一個歷史學家居然寫出京劇劇本來了。1961年2月26日，《北京晚報》發表繁星（即廖沫沙）的〈史和戲〉一文，廖沫沙是老文化人，他對吳晗「破門而出」，作為歷史家「卻來寫『戲』」，表示祝賀。他並提出三個問題來討論：一、歷史的「真實」和戲劇的「真實」，該不該有個區別，如何區別？二、寫歷史戲中的人物，如何區別又如何統一？三、寫歷史和寫戲，都得講究發展過程。不但情節（其事）有發展過程，人物（其人）也得有發展過程。吳晗是怎樣來寫這兩種過程的？2月28日，吳晗在《北京晚報》發表〈關於歷史劇的一些問題〉，回答繁星的提問。3月9日，常談（侯外廬，一位著名史學家）。以〈從「兄弟」談到歷史劇的一些問題〉為題，在《北京晚報》發表文章，就繁星的提問和吳晗的答覆，發表意見，並表示：「我也佩服吳晗破門的精神」，並說：「海瑞一劇是有收穫的，我祝他從破門起步入堂奧。」《北京日報》、《北京晚報》、《北京文藝》接連發表了讚揚的文章。

6月23日，《北京晚報》發表馬連良的〈從海瑞談到「清官戲」〉。文章說，封建社會的官，給皇帝辦事就難為老百姓分憂，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在某種特殊情況下，他們和最高的封建統治者，專制帝王或其他的封建官僚之間也會產生一定的矛盾與衝突，而對老百姓又不是絶對不能理解或同情的。因此有的官也在戲劇裏表揚『清官』，很可能有微言大義存焉，是在教育當時的做官的，起着『大字報』的作用」。

8月，吳晗自己為《海瑞罷官》劇本寫了一個序，序言說：「這個戲著重寫海瑞的剛直不阿，不為強暴所屈，不為失敗嚇倒，失敗了再幹的堅強意志。表現的是封建統治階級的內部鬥爭，左派海瑞和以徐階為首的右派——官僚地主集團的鬥爭。海瑞是封建统治階級的忠臣，但是他比較有遠見，比較接近人民，他為了本階級的長遠利益，主張辦一些對當時人民有利的好事，限制鄉官的非法剝削，觸犯了本階級右派的利

益，展開了激烈的鬥爭。在這場鬥爭中，海瑞丟了官，但他並不屈服，不丧氣。當時人民因為他做了好事，維護他，歌頌他。海瑞的地位在歷史上是應該肯定的，他的一些好的品德，也是值得我們今天學習的。」

歷史劇的生命力全在於它的時代意義，《海瑞罷官》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功，引起巨大反響，正在於此。

1961年的戲曲界，可與吳晗的《海瑞罷官》相提並論的有老劇作家孟超的崑曲《李慧娘〉。《李慧娘》是由《紅梅記》改編而成的，描寫南宋一個貪贓枉法、賣國求榮的宰相賈似道，一日與其妾（良家婦女，逼迫為妾）李慧娘遊西湖，偶見一少年，當面怒斥賈似道。李慧娘不禁發出兩聲「美哉！少年！」「壯哉！少年！」的感嘆，心有所繫，就被賈似道推入湖中，含冤而死。李慧娘冤魂不散，變成鬼，用頭撞死賈似道。1961年夏，崑曲《李慧娘》在京上演，後到各省巡迴演出，頗受好評，也得到周恩來的讚許。《李慧娘》在舞台上出現鬼魂形象，本是康生的主意，[5]公演之初，也未曾有人提出異議。孟超的好友，中共北京市委統戰部部長廖沫沙觀看此劇後，寫了一篇劇評：〈有鬼無害論〉，登在1961年8月31日《北京晚報〉上，署名「繁星」。其意思是說：《李慧娘》劇中寫了鬼，但它是個好鬼，有鬼無害。

由《海瑞罷官》的公演，引發了一次頗有影響的關於歷史劇的討論甚或爭鳴的氣候。許多報刊發表了戲劇家、史學家和讀者的文章，涉及歷史劇的古為今用，歷史真實與藝術真實、如何評價歷史人物以及如何表現人民群眾在歷史上的作用等重大問題，有一些問題還有針鋒相對的爭論。

由歷史劇的討論引申到對喜劇和悲劇問題的討論。多數人把喜劇分為「諷刺性喜劇」和「歌頌性喜劇」，認為「歌頌性喜劇」是大躍進以來出現的喜劇新品種。大躍進作品《五朵金花》和《今天我休息》就只有歌頌，沒有諷刺。但也有人提出，喜劇也應反映人民內部矛盾，「有批評的笑」。尤其在關於悲劇的討論中，有人提出，社會主義社會也有悲劇。劇作家「可以用今天的社會生活為題材寫成悲劇」；有人提出，人民內部矛盾也可以產生悲劇。如好幹部做錯事，幹部子女墮落犯罪等。[6]

社會科學和文藝理論方面，也出現了活躍空氣。史學界、哲學界展開了清官問題，讓步政策問題、農民戰爭問題、道德繼承問題、美學問題的討論，其深度和廣度為1950年代以來所未有。

正是在這種氛圍下，無論是小說、散文、詩歌，還是電影，音樂、舞蹈、曲藝，美術，都出現了一大批優秀作品。如：小說《劉志丹》；1961年以後的兩三年內攝製的故事片《暴風驟雨》、《達吉和她的父親》、《五十一號兵站》、《風雪大別山》、《北大荒人》、《北國江南》、《李雙雙》、《東進序曲》、《甲午風雲》、《怒潮》、《紅

日》和戲曲片《三打白骨精》、舞劇片《小刀會》、歌劇片《洪湖赤衛隊》、話劇《杜鵑山》、《兵臨城下》、京劇《謝瑤環》等。

2.《燕山夜話》和《三家村札記》

1961年的文壇上，最活躍、最耀眼的明星，不是典型意義上的知識分子，而是北京市領導文化工作的幾位負責人：鄧拓[7]、吳晗、廖沫沙[8]。三位雖然都是從30年代起就活躍在左翼文壇上的知名人士，但現在都是地位相當高的負責人。

雜文的復興，是1961年文壇的一個景觀。鄧拓的《燕山夜話》和鄧拓、吳晗、廖沫沙合作開闢的《三家村札記》專欄，就是這一年開始出現的。當時正值經濟困難時期，彭真領導的中共北京市委除了認真貫徹中央的八字調整方針，解決工農業生產和人民生活的實際困難外，在思想文化戰線也想作出努力。在市委常委討論如何克服困難時，鄧拓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強調解決實際工作中的困難，要有思想工作相配合，他認為，提倡讀書方能使精神振奮起來，多讀書，才能開闊眼界，就不會斤斤計算。鄧拓還傳達了胡喬木的意見，讓《人民日報》多搞一些世界風光，境界高一些，不要計算天天吃幾兩。現在正是學習的好時候，報紙要多發一些古人發憤圖強、發憤讀書的故事。當時大家都覺得這話說得很對，在困難時期，確實需要多讀書，以良好的精神狀態，去克服物質的匱乏。

《北京晚報》的編輯們聽到上述精神後，隨即找到鄧拓，請他給晚報寫文章。據《晚報》的編輯回憶：約請鄧拓為《北京晚報》寫稿，是從《詩畫配》入手的，但是寫《詩畫配》並不是編輯部的「最終目的」。「我們主要是希望鄧拓同志能給晚報開一個欄目，寫一些知識性的雜文。因為那時正值三年困難時期，讀者迫切需要閱讀能夠開闊眼界，豐富知識，振奮精神的文章。」在報社反覆要求下，鄧拓答應每周寫兩篇雜文，為了顧到北京地區的特點和晚報的特點，專欄就定名為《燕山夜話》。題材的來源一部分是作者看書所得，一部分由編輯部代為收集，一部分是讀者來信提供的。「這樣，從1961年3月9日開始，《燕山夜話》的《五色土》副刊正式和讀者見面了。」[9]到1962年9月，共寫了一百五十餘篇。這些雜文，受到了廣大讀者的歡迎，在全國許多地方引起熱烈反響。這就是『夜話』寫作的始末。

《燕山夜話》刊出後，《前線》[10]雜誌編輯部的編輯們認為鄧拓是《前線》的主編，便直截了當地向鄧拓提出，讓他在《前線》上開個專欄。鄧拓開始沒有答應，編輯們一再磨他，鄧拓說：同時開兩個專欄，恐怕有困難。這樣吧，我找些人一塊寫，行不行？於是鄧拓、吳晗、廖沫沙的《三家村札記》就被《前線》編輯部的編輯們拉上了馬。

參與其事的編輯回憶當時的情形說：在1961年9月20日左右，《前線》編輯部約鄧拓、吳晗、廖沫沙三人寫稿，在四川飯店吃了一頓飯。當時邊吃邊談，定下來四件事：一是專欄的名稱。鄧拓說，咱們三個人合開一個雜文專欄，就叫三家村吧。於是起了「三家村札記」這個俏皮的名字。二是署名的問題。鄧拓提出仿效馬鐵丁等合作的辦法每人取一個字如何。吳晗取吳字，鄧拓的筆名為馬南邨，取一南字，廖沫沙取一沙字，於是叫吳南沙。後廖提出用他的筆名繁星的星字，遂定名為吳南星。三是文章的寫法。文章不要太長，以《前線》的一個頁碼為準，千字文，題目自己選擇，按各自的專長隨便寫。每期上一篇，輪流撰稿。四是編輯部指定一人為《三家村札記》的稿件聯繫人。

「三家村」的唯一幸存者廖沫沙的追憶也證實了上述情節。他說：1961年9月中旬或下旬，《前線》編輯部的工作同志來通知我：第二天的中午，邀請我到四川飯店聚餐。「入席以前，坐在沙發上抽煙喝茶，鄧拓同志隨便談起：《前線》也想仿照別的報刊『馬鐵丁』、『司馬牛』之類，約幾個人合寫一個專欄，今天就是請你們兩位（指吳和我）來商量一下。聽說『馬鐵丁』他們是三個人合用的筆名，我們也照樣是三個人取個共同的筆名；既是三個人，就乾脆叫《三家村札記》行不行？他所說的『三個人』就是鄧、吳、廖三人。」關於「三人合用的筆名如何取法，最後確定一人出一個字，吳晗出『吳』字，鄧拓出『南』宇（鄧拓寫《燕山夜話》時的筆名叫『馬南邨』），我出『星』字（我當時的筆名是『繁星』）。專欄的名稱與合用的筆名『吳南星』就這樣定了。至於文章的寫作內容和寫作方法如何，我清楚地記得，當時並沒有任何人提出來作為議題加以討論；只是相約：文字以一千字左右為限度，每期在《前線》刊登一篇；三人輪流寫稿；為了備忘，由編輯部派人在集稿前向作者聯繫、取稿；為了防備臨時因事耽誤寫稿，各人各自先交稿一篇，以為儲備。」[11]

《燕山夜話》和《三家村札記》中的文章，大都通通講述歷史故事來說明事理，從讀書治學，待人接物，到生產建設，領導方法等等，或評論歷史人物，或讚揚新人新事，旁徵博引，議論橫生，把知識性和思想性熔於一爐，引人入勝，發人深省。單單就這種文風而言，就是對「大躍進」以來那種以勢壓人、全線緊張的文風的一個反動，宛如在乾冽中注入了一股清泉，在熾熱裏吹來了一絲清風。

雜文的生命力就在於它的現實性，沒有批評、沒有諷刺就沒有雜文。《燕山夜話》和《三家村札記》上的文筆「都是談所見所聞所感」，這就不可能離開當時的歷史背景。鄧拓雜文中最精彩，最具歷史價值的是一批諷喻性的短文，諸如：

〈一個雞蛋的家當〉，引用一個故事：一個盲人拾得一個雞蛋，浮想聯翩：先借別人的雞孵出小雞，然後雞生蛋，蛋生雞，輾轉生利，又

放高利貸，遂成巨富，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得意忘形，把想娶小老婆的心事也告訴其妻，妻子一怒之下把雞蛋打落在地，於是完事大吉。文尾鄧拓淡淡地道出：只有老老實實，「才能摒除一切想入非非的發財思想」。

〈說大話的故事〉、〈偉大的空話〉。文中引用管仲一句話說：「管子說過：『言不得過其實，實不得過其名』，這就是告誡人們千萬不要說大話，不要吹牛，遇事要採取慎重的態度，話要說得少些，事情要做得多些，名聲更要少一些。」

〈放下即實地〉引用一個有趣的故事：一個盲人過橋，不慎跌落，雙手緊抓橋邊，大呼救命。路人告訴他，橋很矮，橋下無水，放下即可平安。盲人不信，死抓住不放，終至筋疲力盡，墜落受傷。其寓意十分明顯，犯了錯誤要知錯必改，不要硬撐到底，不肯下台，結果是擴大錯誤，十分危險！

〈專治「健忘症」〉，說有一種病叫「健忘症」鄧拓開列了兩服明代藥方。然後指出：「這種人常常表現出自食其言和言而無信，甚至於使人懷疑他是裝瘋賣傻，不堪信任。」

上述短文，以隱喻的方式，抨擊了「大躍進」以來的浮誇風，說假話等惡劣風氣。1962年中共八屆十中全會，毛澤東重提階級鬥爭為綱，再寫這一類的雜文，已不合時宜。鄧拓等人就此擱筆。10月中旬，鄧拓在〈告別讀者〉中說：「近來由於把業餘活動的注意力轉到其他方面，我已經不寫《燕山夜話》了」。

[1] 吳晗，北京市副市長，1957年3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因遭殘酷迫害於1969年10月11日含冤而死，終年六十歲。

[2] 李銳：《「大躍進」親歷記》，下冊（海口：南方出版社，1999）頁473。

[3] 李銳：《「大躍進」親歷記》，下冊，473。

[4] 袁浦之：〈憶吳晗同志二三事〉，《北京盟訊》，1981年第3期。

[5] 劇作者孟超是康生同鄉，改編過程中多次徵詢康生意見。康生發話：「《李慧娘》一定要出現鬼魂，不出鬼魂我就不看。」彩排期間，康生親自將疊句「美哉！少年！」的後一句改為「壯哉！少年！」，正式公演後，康生又親臨觀看。看後甚為滿意。特寫信給作者：「祝賀該劇演出成功。」稱讚孟超「這回做了一件大好事」，指示「北崑今後照此發展，不要再搞甚麽現代劇」。

[6] 《人民日報》，1961年1月18日；《戲劇報》，1961年第9-10期。

[7] 鄧拓，知名的史學家、文學家、美術評論家、新聞學家，更是一位終身的職業革命家。1930年參加左翼社會科學家聯盟，並加入中國共產黨。1937年秋到達解放區，歷任《晉察冀日報》社長，晉察冀新華分社社長。全國解放后出任《人民日報》社社長、總編輯。1957年4月上旬，毛澤東從南方巡視回京後，對《人民日報》沒有及時宣傳他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講話的精神作了嚴厲批評。毛指責說：最高國務會議和宣傳工作會議，已經開過一個多月了，共產黨的報紙沒有聲音。陳其通四人的文章發表以後，《人民日報》長期以來也沒有批評。你們按兵不動，反而讓非黨的報紙拿去了我們的旗幟整我們。過去我說你們是書生辦報，不是政治家辦報。不對，應當說是死人辦報。你們到底是有動於衷，還是無動於衷。你們多半是對中央的方針唱反調，是抵觸，反對中央的方針，不贊成中央的方針的。（鄧拓解釋說：過去中央曾有規定，黨的會議不發消息，主席講話未公布前，也不引用。我對這件事沒有抓緊。）中央什麼時候有這個規定？最高國務會議發了消息，為什麼不發社論？消息也只有兩行，為什麼把黨的政策秘密起來？宣傳會議不發消息是個錯誤。這次會議有黨外人士參加，為什麼不發消息？黨的報紙對黨的政策要及時宣傳。最高國務會議以後，《人民日報》沒有聲音，非黨報紙在起領導作用，黨報被動，黨的領導也被動。黨報在非黨報紙面前丟臉，我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目前不能發表，但可以根據講話的意思寫文章，對黨的政策的宣傳，《人民日報》不是沒有

抓緊，而是沒有抓。（見《毛澤東傳（1949-1976）》，上冊，頁664）此後，鄧拓離開《人民日報》。彭真通過中共中央組織部把鄧拓調到了北京市委，任書記處書記，分管文化教育工作。1966年5月17日，因遭誣陷被迫害致死，終年五十四歲。

[8] 廖沫沙，中共北京市委統戰工作部部長。

[9] 顧行，劉孟洪：〈鄧拓同志和他的《燕山夜話》〉，載廖沫沙等；《憶鄧拓》（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0），頁113-115。

[10] 《前線》為中共北京市委主辦的黨刊。

[11] 廖沫沙：〈《三家村札記》出版後記〉，載《憶鄧拓》，頁140-141。

六、逆境者的批評和反思

1961年，從毛澤東本人開始，黨內不少人都在思考這幾年走過的彎路，都在找尋社會主義究竟怎麼搞的答案。然而，由於處境不同，這種反思的深度也不會相同。身處逆境的彭德懷、張聞天有着自己的獨立思考。

彭德懷廬山罷官以後，1959年9月30日從中南海永福堂遷居頤和園附近的掛甲屯吳家花園。10月13日，毛澤東約彭德懷去中南海談話，指示彭真、楊尚昆安排彭德懷參加中央黨校學習。此後，彭德懷就成了黨校的「特殊學員」。在廬山批彭德懷是「經驗主義」，「不是馬列主義」。彭在讀列寧的《唯物主義與經驗批判主義》時寫道：

「人們如果把認識加以片面誇大，認為只要主觀意識就可以創造出奇跡來——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這就不能不在具體事物中滑進唯心主義泥坑裏。」[1]

在留下的大量讀書筆記[2]中，針對廬山會議後全國普遍開展反右傾運動造成的惡果，彭德懷寫道：

「從1958年8月北戴河會議在經濟建設上提出許多無根據的計劃，就造成了嚴重損失。廬山會議沒有重視這個問題，因而1959年農業減產已成定局。1960年這種形勢仍將繼續。」

「廬山會議既不正視這一嚴重事實，又不懸崖勒馬進行調整。反而想從反右傾機會主義打開一條出路，結果事與願違，愈陷愈深。人民將付出很大代價才能改正這個錯誤。」

「從1959年下半年起，我國生產關係的變革遠遠地走在了生產力發展的前面，這是錯誤的。」

對當時大搞群眾運動來「大辦」這個、「大辦」那個的做法，彭指出：「這些全民大辦並不是人民群眾多數自覺的，而是嚴重的強迫命令、脫離群眾的現象」，「這不是群眾運動，而是運動群眾」。彭認為:「已經發展到了不可容忍的程度。」對報紙上宣傳工人不計報酬，取消計時計件工资；農村繼續推行公共食堂、把富隊窮隊拉平等等做法，彭認為完全是「左的蠻幹」，是「黨的各級機關的有些領導同志一意孤行、脫離群眾……企圖跳進共產主義的問題」。[3]

1960年11月，中共中央下達了《十二條》緊急指示。彭德懷一方面對中央重申糾正「一平二調」共產風「感到高興」，同時明確指出：「緊急指示中，還沒有提出停辦公共食堂，而且還在強調公共食堂。因此，這個錯誤還不能得到糾正。」彭認為：「現在的公共食堂制，是在所謂『吃飯不要錢』的幻想上產生的，是潛存着共產主義庸俗化的觀

點，是超脫現階段生產力的分配形式。」「如不立即停辦……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是調動不起來的，並將繼續遭到一些不必要的破壞。」因此，「緊急指示只是認識和糾正錯誤的開始」。

彭德懷深感有責任把自己這些意見向中央和毛澤東提出，但在當時卻沒有可能。這種無可奈何的心情，使他十分苦悶。彭寫道：

> 作為一個共產黨員的我來説，應該把上述看法，誠懇地向黨中央提出，不應該隱瞞自己的觀點。但是鑑於廬山會議、八屆八中全會對我作出完全離開實際情況的決議，事實上，不僅已經革除繼續工作，而且正在進行從歷史上消滅我這個人的形象。如果現在提出自己的看法不會起到任何作用，反而可能引起不必要的誤會，對實際工作是會毫無益處的。[4]

如果説，彭德懷的批評和反思，主要是處在政策層面；那末，被打成「彭德懷反黨集團」副手的張聞天，則更多地從理論層面提出了問題。

廬山會議時，張聞天知其不可為而為，系統地批評「大躍進」的「左」傾錯誤和黨內政治生活的不正常情況，被毛澤東認為陷入了「軍事俱樂部」而撤销外交部副部長的職務。1960年被安排到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經濟研究所任特約研究員。所長是1920年代在莫斯科的同窗好友孫冶方，兩人很快對幾年來在政治經濟學領域盛行的許多「左」傾觀點，在思想上產生共鳴。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筆記裏記錄了他的思考。僅收入《張聞天文集》的，1961年就有：〈要正確認識和運用客觀經濟規律〉、〈社會主義建設的首要任務是發展生產力〉、〈關於按勞分配提綱〉、〈無產階級專政下政治和經濟關係問題提綱〉、〈當前的主要矛盾已不再是階級矛盾〉、〈社會主義經済若干理輸問題）、〈關於宣傳教育工作中的一個問題〉、〈讀孫冶方同志的《論價值》〉、〈關於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要點〉九篇，對「大躍進」以來的許多錯誤觀點進行了批評。尤以下面三個問題在政治上最為敏感、在理論上尤為深刻：

8月2日，張聞天在筆記中寫道：社會主義建設的首要任務是發展生產力；8月17日至29日，又尖鋭提出：「不能把不斷改變生產關係當做拜物教。」

革命的任務是為了發展生產力，這對共產黨人來説近乎常識。但在實際生活中始终把它放在共產黨一切工作的首位，並不是简單的事。社會主義，就是消滅私有制。這是相當長時期以來形成的一種社會主義觀。1949年新中國成立，1950年開始在新解放區實行廢除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土地改革，這是當時解放農村生產力的客觀需要。但到1951年，為避免個體農民「自發走向资本主義」，農村出現「兩極分化」，於當年12月中共中央下發了關於組織農業生產互助合作的決議草案，開始了

逐步動搖、消滅農民的個體私有制的進程。1955年通過批判「小脚女人走路」掀起的農業合作化「高潮」，這種生產關係的急劇變更，已相當程度地對農村生產力發展造成破壞和阻礙。1958年的人民公社化運動，更使生產力遭到嚴重破壞。但在黨內佔主導的認識一直是「趁熱打鐵」，「不斷革命」。毛澤東在1959年冬到1960年春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中仍認為：北戴河會議關於人民公社的決議的第五段[5]，現在證明是正確的。首先社有化，然後國有化，這是一種必然趨勢。只是說不是一個早晨就能「全部過度」。他斷言「趁热打鐵」，「不斷革命」——不斷改變生產關係，才能為發展生產力開闢道路。

針對當時流行的錯誤觀點，張聞天指出：「現在普遍的論點是，政治經濟學只研究生產關係。」他認為：「離開了生產力談生產關係的發展，必然陷於主觀唯心主義（「唯生產關係論」），正像離開了生產關係而談生產力，必然陷於機械唯物論（「唯生產力論」）一樣。」他分析説：「生產關係」分為二類。一類是所有制關係，分配關係，階級關係；另一類是勞動關係和上下左右的關係（如領導與被領導，中央與地方，這一部分與那一部分）。這二類生產關係原則上有區別，但互相影響。對第一類關係，在一定時期內（相當長時期內）不能不斷改變（或叫「調整」），第二類關係比較可以更多地改變，但也不能過多。張聞天強調：「物質生產，決定一切，這是唯物史觀」[6]。要強調建設社會主義的物質技術基礎。生產力的發展，決定於人對自然力的控制力量。因此，生產關係的調整和完善，必須適合生產力的水平。

張聞天批評那種：只談改變生產關係，而且強調不斷改變生產關係，卻不知歸根到底改變生產關係是為了發展生產力，生產關係的改變最後決定於生產力的發展，是對生產關係的「拜物教」。他說：「不能把不斷改變生產關係當做拜物教。沒有生產力的一定程度的發展，生產關係是不能任意變更的。過早改變生產關係（如「共產風」）會破壞生產力，不利於社會主義建設。」[7]

當黨內不少人仍在迷信「趁窮過渡」的時候，張聞天尖銳指出：「不能把不斷改變生產關係當做拜物教」。強調「發展生產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社會主義建設中的首要任務」[8]。顯示了他不同一般的馬克思主義修養。

8月10日至11日，張聞天寫了〈關於按勞分配提綱〉[9]，對把平均主義當作共產主義，認為供給制具有共產主義因素，把按勞分配作為資產階級法權要加以破除；強調發揚共產主義風格，否定物質利益原則等觀念作了理論剖析。

張文指出：不勞動者不得食，多勞多得，少勞少得，這是社會主義原則，不實行這一原則，就不大可能過渡到共產主義。「按勞分配所帶有的資產階級法權，是必要的，必然的，正是適合於實際情況的。要消

滅這種法權殘餘，就要經過按勞分配階段。」針對按勞分配宣傳上存在的問颶，張聞天指出，一種叫人們只關心個人的物質利益；另一種叫人們不要關心個人的物質利益，而只關心集體利益，這兩種偏向都不對。他拯為：「計較物質利益，並不只是計較個人利益，也是計較國家，集體的利益。我們不是利他主義者，也不是利己主義者，是兩者的統一。」張指出，處理國家、集體、個人三者關係的原則，應該是：「先公後私，公私兩利」。各盡所能，按勞分配。「各盡所能，就是為公；按勞分配，則是為私。……今天的評工計分、三包一獎、勞動定額、計時和定額獎勵等，經濟核算等等，都是要斤斤計較物質利益。目的不僅僅是為了個人，也是為了集體，為了建設社會主義，也就是為了共產主義」。

張聞天批評說：把政治同物質報酬脱離，甚至對立，是不妥當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就是為了人們生活得更好。怕説生活，怕生活好了就會资本主義化，這是一種錯誤的思想。」人民要改善生活，就要提高生產，努力勞動，給社會做出更多的貢獻。集體的利益，同個人利益是密切地結合在一起的，這正是社會主義社會的優越性。不去談多勞多得，怕談多勞多得，實際上對社會主義不是有利，而是有害。既然勞動是光榮的，多勞多得是正當的，那麼勞動好的人生活得好些，生活富裕些，就是應該的，正當的。這樣生活好的人，對社會主義更加積極擁護。「説愈窮苦的人擁護社會主義愈堅決，愈富裕的人愈不堅決，這樣的觀點，應該有適當的修正。」他再進一步分析指出：只追求物質享受，而不願勞動，那是卑鄙的。勞動之後得到一定的物質享受，這有甚麼卑鄙！共產主義的目的是甚麼？為甚麼要為它奮鬥？一定的物質條件，使工人更有可能提高其文化與技術。物質鼓勵同精神鼓勵是分不開的。

由此，張聞天結論說：「按勞分配為過渡到共產主義準備着物質的和精神的條件：提高勞動生產率，鞏固自覺的自願的勞動紀律，提高人民的文化、技術水平和他們的生活水平。按勞分配是一個偉大的共產主義學校。」

8月15日至17日，張聞天寫下的另一篇讀書筆記：《當前的主要矛盾已不再是階級矛盾》[10]在這篇筆記中，張聞天明確地批評和否定了階級鬥爭仍然是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的觀點。

張聞天寫道：「社會主義的基本矛盾、基本規律，其本質應是一個東西：不斷發展的生產與不斷提高的需要之間的矛盾统一……這種矛盾統一，是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矛盾统一的表現形式。」他認為，社會主義和资本主義的矛盾在思想意識上還將長期存在。但今天在思想意識上的主要矛盾，是否在於思想落後或超越於實際，在於不能正確認識客觀規律。在生產關係方面，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矛盾也還多少存在，但

不佔主要地位。在這方面的基本矛盾，能否說是在於生產力發展不足，不能滿足日益增長的社會與個人的需要。

張文指出：「我國的情況是，在從1949年到1957年的時間內，社會的基本矛盾是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鬥爭，但在1958年後，就不能這樣說了。同资產階級思想殘餘的鬥爭是長期的，但不能說今後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鬥爭還是社會主義的基本矛盾。」「把社會主義的基本矛盾，說成是兩個階級（资產階級、無產階級）和兩條道路的矛盾，說在社會主義發展過程中，這一矛盾貫徹始终，這是否把階級矛盾與鬥爭擴大化了？把社會主義建設問題上許許多多不同的意見，都看成是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鬥爭，就必然要亂戴帽子，任意開展鬥爭了。『雙百』方針當然也不可能實現了。」

張聞天說：

> 把社會主義本質的東西、基本矛盾，歸结為共產主義因素和舊社會殘餘的矛盾，把三個差別、所有制的差別，勞動報酬的差別，都說成是舊社會的殘餘，资本主義殘餘，是不正確的。這種差別同舊社會的差別，有根本性質上的不同。這不是资本主義殘餘，這是社會主義生產關係的特徵。要改變這種差別，不能同這些差別去「鬥爭」，而是利用這種差別，去發展生產，最後消滅這些差別。

如果說，在1961年那個時候，批評平均主義，並不只張聞天一人；但鮮明地批評對生產關係的「拜物教」，提出社會主義建設的首要任務是發展生產力，並尖銳地挑戰毛澤東關於社會主義社會主要矛盾和階級鬥爭的理綸觀點，確實還無人出其右。

然而，張聞天的上述基本觀點，恰恰是毛澤東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談話中批評的觀點。此後不久，更在中蘇論戰中被作為修正主義進行批判。由此，中國的社會主義也就在由「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步入的錯誤道路上，愈走愈遠。

[1] 《彭德懷傳》編寫組：《彭德懷傳》（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3），頁655。

[2] 彭德懷從1959年12月中旬到1960年2月末，讀了楊獻珍的《甚麼是唯物主義》，艾思奇的《辯證唯物主義綱要》、蘇聯科學院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毛澤東的《矛盾論》，《實踐論》、恩格斯的《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列寧的《唯物主義與經驗批判主義》，寫了大量的摘記和學習心得。1975年10月，「彭德懷專案組」將這些筆記和寫有大量眉批的書籍，以「防止擴散」的理由給銷毀了。

[3] 《彭德懷傳》，頁660。

[4] 《彭德懷傳》，頁667-668。

[5] 人民公社的集體所有制中，就已經包含有若干全民所有制的成份了，這種全民所有制將在不斷發展中繼續增長，逐步的代替集體所有制。由集體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過渡是一個過程，有一些地方可能較快，三、四年內就可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較慢，需要五、六年，或者更長一些的時間。

[6] 《社會主義建設的首要任務是發展生產力》（1961年8月2日），載《張聞天文集》，第四卷（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5），頁347。

[7] 張聞天：《社會主義經濟若干理論問題》（1961年8月17日-29日），載《張聞天文集》，第四卷，頁362-365。

[8] 張聞天：《社會主義建設的首要任務是發展生產力》（1961年8月2日），載《張聞天

文集》，第四卷，頁347。

[9] 張聞天：《關於按勞分配提綱》（1961年8月10日、11日），載《張聞天文集》，第四卷，頁349-355。

[10] 張聞天：《當前的主要矛盾已不再是階級矛盾》（1961年8月15日-17日），載《張聞天文集》，第四卷，頁359-361。

附錄

大事記

1958年

1月1日 《人民日報》發表社論——〈乘風破浪〉：提出十五年左右趕超英國，再用二十年到三十年趕超美國，以便逐步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戰略設想。

1月1日至4日　中共中央在浙江杭州召開有部分中央領導人和部分地方負責人參加的工作會議。

1月11日至22日　中共中央在廣西南寧召開有部分中央領導人和部分地方負責人參加的工作會議。

1月13日至26日　中國各民主黨派分別召開會議，宣布撤銷被定為右派分子的領導人的領導職務。

1月27日　《人民日報》發表經毛澤東修改的〈奇文共欣賞，毒草成肥料，王實味、丁玲、蕭軍、羅烽、艾青等文章的再批判〉的文章。

1月28日至30日 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發表講話。

1月31日 毛澤東提出《工作方法六十條（草案）》。

2月1日至11日 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在北京舉行。

2月2日 《人民日報》社論，提出國民經濟「全面大躍進」的口號。

2月3日 《人民日報》社論，發出「苦戰三年，基本改變面貌」的號召。

2月12日 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關於除四害講衛生的指示》。

2月14日　中共中央發出通知，要求全國各地區各方面普遍推廣湖北省委關於各級幹部種試驗田的經驗。

3月3日 中共中央發出《關於開展反浪費反保守運動的指示》。

3月5日 廣西僮（後改為「壯」）族自治區正式成立。

3月7日　中共中央提出《對民主人士中的右派分子進行工作的意見》。

3月8日　《人民日報》報導：冶金部、鐵道部提出當年大躍進新指標。

3月9日至26日　中共中央在成都召開中央有關部門負責人和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參加的工作會議。

3月10日　陳伯達在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第五次會議上談哲學社會科學如何躍進的問題。

3月12日　聶榮臻在科學規劃委員會第五次會議上談科學事業和生產的大躍進問題。

3月22日　中共中央同意財政部黨組的報告，決定對稅收制度進行重大改革。

3月24日至4月8日　第四次全國教育行政會議討論「反掉右傾保守思想，促進教育摹業的大躍進」。

4月1日至6日 中共中央在漢口召開工作會議。

4月2日 中共中央發出《關於繼續加強對殘存的私營工業、個體手工業和對小商小販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指示》、《關於高等學校和中等技術學校下放問題的意見》。

4月5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批準成都會議通過的《關於發展地方工業問題的意見》。

4月8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批準成都會議通過的《關於農業機械化問題的意見》、《關於把小型的農業合作社適當地合併為大社的意見》、《關於合作社社員的自留地和家庭副業收入在社員總收入中應占比例的意見》。

4月15日 毛澤東著文〈介紹一個合作社〉。

4月 北京大學開始批判校長馬寅初。

5月5日　　至23日中國共產黨第八次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在北京舉行。

5月5日 《人民日報》發表〈現代修正主義必須批判〉的杜論。

5月6日 中共中央批準1958年國民經濟計劃第二本賬。

5月19日至24日　全國地方冶金工業促進會召開。計劃興建建小高爐12649座；興建轉爐加4座，電爐43座。

5月25日 中共舉行八屆五中全會。

5月27日至7月22日 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舉行擴大會議。

5月27日　　劉少奇提出，中國應該實行雨種教育制度和兩種勞動制度。

6月1日 中共中央作出《關於加強協作區工作的決定》。

6月3日 《人民日報》發表〈向技術革命進軍〉的社論。

6月10日　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成立財經、政法、外事、科學、文教小組的通知》。

6月中旬　　李富春向中央政治局提出《第二個五年計劃要點》的報告。

6月中旬 農業部向中央政治局提出《農業大有希望》的報告。

6月17日 薄一波向中央政治局提出《兩年超過英國》的報告。

6月19日　華東地區召開農業協作會議，提出：今明兩年內把糧食產量提高到人均一千至一千五百斤；三至五年內提高到人均二千斤。

6月21日 《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力爭高速度〉。

6月22日 毛澤東批發冶金部黨組《關於產鋼計劃的報告》。

6月27日　中共中央批轉國家經委《關於增加基本建設投資二十五億元分配意見的報告》。

6月29日　中共中央同意勞動部的報告，決定放鬆國家對招收新工人的審批管理。

6月30日　《人民日報》報導：河北省安國縣南婁底鄉卓頭村農業社創小麥畝產5103斤的全國最高記錄。

6月　中共中央文教小組副組長康生在中央宣傳部召開的教育工作會議上宣布：教育部制訂的教育規章制度一律無效。

7月1日 《人民日報》報導毛澤東接見河南省封丘縣應舉農業社社長崔希彥。

7月5日劉少奇在石景山發電廠同工人座談時說：中國進入共產主義，不要好久，你們大多數可以看到共產主義。

7月8日 《人民日報》刊登題為〈農業社辦食堂促進生產發展和集體主義思想成長〉的專題報導。

7月上、中旬　　《紅旗》雜誌第三期、第四期分別刊登陳伯達的文章：〈全新的社會，全新的人〉和〈在毛澤東同志的旗幟下〉，傳達毛澤東關於人民公社的構想。

7月14日至18日 劉少奇視察山東工廠、農村。

7月15日　陶鑄在《紅旗》雜誌第五期發表文章，駁「糧食增產有限論」。

7月23日 農業部發布1958年夏收糧食作物生產公報，宣布當年夏收糧食總產量達到1010億斤。

7月31日至8月3日　蘇共中央第一書記赫魯曉夫來中國訪問。發表了《毛澤東和赫魯曉夫會談公報》。

8月4日 中共中央、國務院作出《關於教育事業管理權力下放問題的規定》。

8月8日 《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土洋並舉是加速發展鋼鐵工業的快捷〉。

8月上旬　毛澤東視察河北、河南、山東農村。8月9日，毛澤東在山東省曆城縣北園農業社說，還是辦人民公社好。

8月中旬　毛澤東在全國協作區主任會議上講了要破除資產階級法權思想的問題。

8月17日至30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舉行擴大會議。決定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和鋼鐵產量翻一番。

8月20日　中央科學小組和科學規劃委員會向中共中央報告：苦戰三年，爭取提前五年完成十二年科學技術遠景規劃，趕上世界先進水準。

8月22日 《人民日報》報導：旱稻千斤省，安徽頭一炮。

8月23日　　人民解放軍福建前線部隊開始炮擊金門、馬祖國民黨軍

隊。

8月27日 《人民日報》刊登〈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一文。

8月29日　中共中央發出《關於今冬明春在農村中普遍開展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教育運動的指示》。在農村開展「拔白旗、插紅旗」。

9月1日 《紅旗》雜誌發表河南進平縣〈嵖岈山衛星人民公社試行簡章（草稿）〉；《人民日報》以〈徐水人民公社煩〉為題報導，徐水將要發射全縣糧食畝產二千斤的高產衛星。

9月4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布，本國領海的寬度為十二哩。

9月4日晚 中共中央召開全國各省、市委電話會議動員鋼鐵大躍進。

9月10日至29日 毛澤東先後視察湖北、安徽、江蘇、上海等地。

9月16日至18日　劉少奇在河南鄭州、開封兩市視察人民公社和鋼鐵生產情況。

9月17日　《人民日報》報導河南日產生鐵一萬八千多噸，並發表社論〈祝河南大捷〉。

9月19日　中共中央作出《關於成立中央基本建設委員會、計劃委員會、經濟委員會的決定》。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關於教育工作的指示》，規定黨的教育方針是：「教育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

9月25日　　中共中央書記處召開電話會議，研究鋼鐵生產問題，會後，全民大煉鋼鐵運動迅猛展聞。

9月25日至10月26日 中國人民志願軍第三批撤出朝鮮回國，從朝鮮徹軍任務全部完成。

10月1日 《人民日報》報導：全國農村基本實現人民公社化。

10月15日　 中共中央轉發北京市委關於取消計件工資的情況和意見的報告。

10月18日至30日　全國計劃會議在北京舉行，提出1959年工業的中心任務要為生產三千萬噸鋼而奮鬥。

10月22日　 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關於突擊完成農產品收購調運任務的緊急指示》。

10月25日 寧夏回族自治區正式成立。

10月28日 山東範縣規劃三年向共產主義過渡。

11月2日至10日　毛澤東在鄭州召開有部分中央領導人，大區負責人和部分省市委書記參加的工作會議，即第一次鄭州會議。

11月21日至27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武昌召開擴大會議。

11月28日至12月10日 中共八屆六中全會在武昌舉行。

11月 《宣教動態》第145期刊登了部分地方發生浮腫病的材料。

1959年

1月5日 《人民日報》報導：中國煤產量壓倒英國。

1月22日　中共中央批轉山東省委、省府關於信陶縣停夥、逃荒問題的檢查報告。

1月24日　周恩來率中共代表團赴莫斯科參加蘇共第二十一次代表大會。

1月下旬　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討論1959年國民經濟計劃。

2月12日 《人民日報》發表社論：〈為一千八百萬噸鋼而奮鬥〉。

2月17日　《人民日報》發表社論：〈人民公社要建立和健全生產責任制〉。

2月24日　中共中央轉發國家計委、國家經委《關於市場情況和輕工業生產問題的報告》。

2月27日至3月5日　中共中央在鄭州舉行政治局擴大會議（即第二次鄭州會議）。

2月至7月 朱德在各地視察，對農村辦公共食堂提出一系列意見。

3月10日　　西藏上層中的反動集團同帝國主義者和外國干涉者相勾結，陰謀實現所謂「西藏獨立」，在拉薩發動武裝叛亂。

3月11日　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關於制止農村勞動力盲目外流的緊急通知》。

3月25日至4月1日 中共中央在上海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

4月2日至5日 中共中央八屆七中全會在上海舉行。

4月18日至25日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三屆全國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在北京舉行。

4月18日至28日 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在北京舉行。

4月22日　 中共中央書記處提出，7月15日以前，要集中力量打一個鋼鐵戰役。

4月29日　毛澤東用〈黨內通信〉形式，給省、地、縣、公社、隊、小隊幹部寫了一封信。

4月30日 陳雲寫信給中央財經小組談市場問題。

5月7日 中共中央發出《關於農業的五條緊急指示》。

5月25日 中共中央發出對算帳和召開社代表大會等問題的指示。

5月26日　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採取非常措施解決當前食油供應問題的緊急指示》。

6月1日 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大力緊縮社會購買力和在群眾中解釋當前經濟情況的緊急指示》。

6月11日　中共中央發出《關於社員私養家禽、家畜、自留地等四個

問題的指示》。

6月13日 中共中央發出《關於調整1959年主要物資分配和基本建設計劃的緊急指示》。

6月18日至23日 中共中央在上海舉行大中城市副食品和手工業生產會議。

6月29日至7月2日 毛澤東在廬山同各協作區主任該話。

6月 蘇聯政府片面撕毀中蘇雙方簽訂的關於國防新技術的協定，拒絕向中國提供原子彈樣品和生產原子彈的技術資料。

7月2日至8月6日 中共中央在廬山先後舉行政治局擴大會議和八屆八中全會。

7月14日 彭德懷上書毛澤東。

7月21日 張聞天在廬山會議第二組作長篇發言。

7月23日 毛澤東在廬山會議上講話批判彭德懷。

8月1日 毛澤東在寫給王稼祥的一封信中說，一個百花齊放，一個人民公社，一個大躍進，這三件要向全世界作戰，包括黨內大批反對派和懷疑派。

8月7日 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反對右傾的指示》。

8月10日 毛澤東在安徽省委關於《張愷帆下令解散無為縣食堂》的報告上批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中央委員會裏有……；省級也有，例如安徽省委書記張愷帆。

8月18日至9月12日 中共中央軍委擴大會議在北京舉行。

8月24日 劉少奇召集擴大的第十七次最高國務會議。

8月30日 《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得不償失」論可以休矣〉。

9月8日 周恩來總理函覆印度總理尼赫魯闡明中國政府對中印邊界問題的基本立場。

9月9日 《紅旗》雜誌發表社論：〈駁「國民經濟比例失調」的謬論〉。

9月11日 毛澤東在軍委擴大會議和外事會議上講話，批判彭德懷等。

9月16日 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關於確實表現改好了的右派分子的處理問題的決定》。

9月17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發布命令：任命林彪兼任國防部長，免去彭德懷的國防部長和黃克誠的總參謀長職務。

9月23日 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關於組織農村集市貿易的指示》。

9月26日 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發出《關於軍委組成人員的通知》。

9月底 中國石油勘探工人在洞北松遼盆地找到了工業性油流，打破了「中國貧油論」。油田命名為「大慶」。

10月12日　中共中央批轉河南省委關於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幾個典型材料的報告。

10月13日　中共中央批轉江蘇省委《關於立即糾正把全部農活包到戶和包產到戶的通知》。

10月15日　《紅旗》雜誌發表康生署名文章：〈共產黨員應當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不應當是黨的同路人〉。

10月24日　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關於今冬明春繼續開展大規模興修水利和積肥運動的指示》。

10月25日至11月26日 第八次全國計劃會議在北京舉行。

10月31日 毛澤東寫了關於發展養豬業的一封信。

11月1日 中國第一拖拉機製造廠落成典禮在河南洛陽舉行。

11月10日　周恩來總理就中印邊界問題寫信給印度總理尼赫魯，建議兩國武裝部隊立即從東邊的所謂「麥克馬洪線」和西邊的雙方實際控制線各自後撤二十公里。

11月21日 重慶長江大橋建成。

11月27日　中共中央批準軍委總政治部《關於劃分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標準和處理辦法》。

11月至1960年初　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

12月9日　陳毅外長寫信給印尼外交部長，嚴重抗議印尼進行大規模的反華排華活動。

12月15日　浙、皖、蘇、滬四省市舉行座談會，討論人民公社所有制的過渡問題。

1960年

1月7日至17日 中共中央在上海舉行政治局擴大會議。

1月15日　中共中央批準中央直屬機關黨委、中央國家機關黨委《關於在反右傾鬥爭的整風運動中犯有錯誤同志的處理問題的請示報告和關於劃分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標準和處理原則》。

1月20日 中國和印尼共和國在北京互換雙重國籍問題條約批準書。

1月26日　中共中央印發《關於1960年計劃和今後3年、8年的設想的口頭匯報提綱》。

1月30日　中共中央批準國家計委黨組《關於1960年國民經濟計劃的報告》。

2月16日　中共中央批轉國家科委寫組《關於1960年科學技術發展計劃的報告》。

2月19日至21日　中國民主建國會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和中華全國工

商業聯合會第三次會員代表大會在北京舉行。

2月27日 山東省委報告農村中生活安徘上的突出問題。

3月5日 中共中央批轉廣東省委《關於當前人民公社工作中幾個問題的指示》。

3月6日　 中共中央批轉貴州省委《關於目前農村公共食堂情況的報告》。

3月9日 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城市人民公社問題的批示》。

3月18日　中共中央轉發《八個省農村公共食堂情況》，作出關於加強公共食堂領導的批示。

3月22日　毛澤東提出「半修正主義」概念和中國四十年的設想（人均一噸鋼，二千至三千斤糧食）。

3月30日 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反對官僚主義的指示》。

3月30日 至4月10日全國人大二屆二次會議在北京舉行。

4月14日 中共中央批準冶金部提出的鋼產量三本賬的計劃。

4月16日　中共中央在批轉中央監委的兩個報告時，發出〈對壞人壞事要徹底檢查認真處理〉的指示。

4月22日　為紀念列寧誕辰九十周年，《紅旗》雜誌編輯部發表〈列寧主義萬歲〉、《人民日報》編輯部發表〈沿看偉大列寧的道路前進〉、中共中央宣傳部長陸定一發表〈在列寧的旗幟下團結起來〉三篇文章。

4月28日　中共中央發出《關於資產階級分子的高薪、病假期間工資和「退職退休」等問題的指示》。

5月7日　 中共中央批準商業部的報告，決定把1960年全國人均棉布定量減少兩尺，即由原來的二十四尺減到二十二尺。

5月15日　　　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在農村中開展「三反」運動的指示》。

5月16日　中共中央對冶金部黨組《關於繼續大辦鋼鐵「小洋群」和「小洋群」升級問題的報告》批示。

5月28日 中共中央發出《關於調運糧食的緊急指示》。

6月8日 中共中央批轉全國總工會黨組《關於當前城市人民公社發展情況和幾個問題的報告》。

6月14日至18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上海舉行擴大會議。

6月24日至26日　彭真率中國共產黨代表團參加在布加勒斯特舉行的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

7月5日至10日 中共中央在北戴河舉行工作會議。

7月16日　蘇聯政府照會中國政府，單方面決定召回在中國的全部蘇聯專家。

7月30日　中共中央同意北京市委的意見，北京市飲食業實行憑糧票

供應的辦法。

7月 毛澤東提出今冬再發動群眾大煉鋼鐵。

8月1日　中共中央決定從8月份開始，對在京的高級幹部和高級知識分子在副食品供應方面給予照顧。

8月5日 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大力緊縮社會集團購買力的指示》。

8月10日　中共中央決定組織對外貿易指揮部、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全黨動手，大辦農業、大辦糧食的指示》。

8月14日　中共中央發出《關於開展以保糧、保鋼為中心的增產節約運動的指示》。

8月15日　中共中央批轉中央監委《關於解決縣社領導機關組織不純和改造落後隊問題的報告》。

8月19日　中共中央批準國家計委、建委《關於縮短基本建設戰線保證生產的措施》。

8月20日　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堅決地認真地清理勞動力加強農業第一線的緊急指示》。

8月20日 周恩來接見來訪的日本朋友，談了中日貿易的三原則。

8月 「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開始提出。

9月7日 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壓低農村和城市的口糧標準的指示》。

9月8日 中共中央作出關於《廣西壯族自治區人民委員會關於農村的十項政策》的批示。

9月14日至10月20日 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在北京舉行擴大會議，作出《關於加強軍隊政治思想工作的決議》。

9月18日　中共中央批轉全國總工會黨組《關於整頓和鞏固城市人民公社問題的報告》。

9月22日　中共中央批轉人民銀行黨組《關於嚴格實行現金管理制度的報告》。

9月23日　　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壓縮食油銷量和加強油脂收購的指示》。

9月30日 《毛澤東選集》第四卷出版。

9月30日 中共中央基本同意並批轉了國家計委《關於1961年國民經濟計劃控制數字的報告》。

9月 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成立六個中央局。

10月7日　中共中央轉發《晉、冀、魯、豫、北京五省市農業書記會議紀要》。

10月11日　 中共中央批轉文化部黨組、中國作家協會黨組關於廢除版稅制、徹底改革稿酬制度的報告。

10月12日　 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整頓對負責幹部的特需供應，禁止商品供應「走後門」的指示》。

11月3日　中共中央發出《關於農村人民公社當前政策問題的緊急指示信》、《關於不準請客送禮和停止新建招待所的通知》。

11月5日至12月8日　劉少奇率中國黨政代表團赴莫斯科參加八十一個共產黨和工人黨的會議。

11月14日　中共中央發出《關於立即開展大規模採集和製造代食品運動的緊急指示》。

11月15日 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徹底糾正「五風」問題的指示》

11月19日　第二屆人大常委會第三十二次會議通過《關於特赦確實改惡從善的蔣介石集團和偽滿洲國的戰爭罪犯的決定》。

11月28日　中共中央對《甘肅省委關於貫徹中央緊急指示信的第四次報告》作了重要批示。

12月3日 中共中央發出《關於保鋼問題的緊急指示》。

12月20日　中共中央、國務院聯合發出《關於凍結、清理機關團體在銀行的存款和企業專項存款的指示》。

12月21日　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關於保證學生、教師身體健康的緊急指示》。

12月24日 至1961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工作會議。

1961年

1月1日 中共中央批發《信陽地委關於整風整社運動和生產救災工作情況的報告》，並作出批示。

1月14日至18日 中共八屆九中全會在北京舉行。

1月15日　中共中央批轉財政部黨組《關於改進財政體制和加強財政管理的報告》；中共中央批準糧價小組《關於提高糧食收購價格問題的報告》。

1月20日　中共中央發出《中央工作會議關於農村整風整社和若干政策問題的討論紀要》；中共中央作出《關於調整管理體制的若干暫行規定》。

1月23日　中共中央、國務院作出《關於進一步壓縮社會集團購買力的決定》。

1月27日　中共中央發出《黨政幹部三大紀律、八項注意（草案第二次修正稿）》。

3月11日 毛澤東為印發《關於調查工作》一文寫説明。

3月15日　中共中央轉發中央宣傳部《關於毛澤東思想和領袖革命事蹟宣傳中一些問題的檢查報告》。

3月15日至23日 中共中央在廣州召開工作會議。

3月20日　曾希聖給毛澤東寫信為安徽農民的「定產到田，責任到

人」辦法爭取支持。

3月22日　中共中央發出〈關於討論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給全黨同志的信〉。

3月23日　中共中央發出〈關於認真進行調查工作問題給各中央局，各省、市、區黨委的一封信〉。

4月2日 國家計委對1961年基本建設計劃進行調整。

4月3日　 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收購重要經濟作物實行糧食獎勵的指示》。

4月21日 中共中央發出關於西藏工作方針的指示。

5月7日 毛澤東轉發周恩來關於農村政策問題的調查報告。劉少奇同炭子沖農民談話。

5月9日 朱德寫信給毛澤東反映農村公共食堂的問題。

5月21日至6月12日 中共中央在北京舉行工作會議。

6月1日至28日 中共中央召開文藝座談會。

6月15日　中共中央發出《關於討論和試行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修正草案的指示》。

6月16日　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減少城鎮人口和壓縮城鎮糧食銷量的九條辦法》。

6月19日　　周恩來在文藝工作座談會和故事片創作會議上作重要講話。

6月19日　　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改進商業工作的若干規定（試行草案）》、《關於城鄉手工業若干政策問題的規定（試行草案）》，《關於堅決糾正平調錯誤、徹底退賠的規定》。

6月28日 中共中央發出《關於精簡職工工作若干問題的通知》。

6月30日 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四十周年大會在北京畢行。

7月16日　　中共中央作出《關於加強原子能工業建設若干問題的決定》。

7月19日　　中共中央發出《關於自然科學工作中若干政策問題的批示》。

7月24日　安徽省委向中央作關於試行「田間管理責任制加獎勵」辦法的報告。

8月11日　　中共中央轉發中央化肥小組關於加速發展氮肥工業的報告。

8月17日　中共中央轉發教育部黨組《關於資產階級子女升學問題的報告》。

8月23日至9月16日 中共中央在廬山舉行工作會議。

8月26日 湖南省委發出《關於借冬閒田給社員生產的通知》。

9月15日　中共中央發出《關於當前工業問題的指示》、《關於輪訓

幹部的決定》。

9月16日　中共中央將《國營工業企業工作條例（草案）》下發討論試行。

10月7日　中共中央發出《關於農村基本核算單位問題給各中央局，各省，市、區黨委的指示》。

10月9日 首都各界隆重紀念辛亥革命五十周年。

10月15日至31日　周恩來率中共代表團應邀參加蘇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會。

11月 中共中央同意聶榮臻提出的《關於建立學位、學銜、工程技術稱號等制度的建議》。

12月6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發表《關於中印邊界問題的聲明》。

12月16日　第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四十七次會議決定：對於經過改造，確實改惡從善的蔣介石集團和偽滿洲國的戰爭罪犯，實行特赦。

12月16日　中央國家機關和各民主黨派中央機關等單位，宣布對錢端升、馮雪峰，柳提、黃藥眠、徐懋庸等370多人摘掉右派分子帽子。

參考文獻

一、檔案

沈志華、李丹慧收集和整理：《中蘇關係：俄國檔案原文影本彙編》第十二、十三卷（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國際冷戰史研究中心存，2004），未刊

二、文獻資料

人民出版社資料室編：《批判資料——中國赫魯曉夫劉少奇反革命修正主義言論集（1958.6-1967.7）》（北京：人民出版社，1967）

人民出版社編輯：《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論共產主義社會》（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人民出版社編：《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論戰》（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編：《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大事記（1949-1982）》（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1983）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共中央黨校編：《劉少奇論黨的建設》（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四、六至九，十二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1998）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二、四、九、十一至十四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1997）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文集》，第三至八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1991、1999）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領：《列寧選集》，第三至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

中共中央辦公廳編：《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中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中共黨史大事年表》（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學院政治理論教研室編：《黨史參考資料》，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第二、三冊，上冊（南京，1960）

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黨史黨建政工教研室編：《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第二十二至二十三冊（北京：國防大學出版社，1986）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外交文選》（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世界知識出版社，1994）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農業委員會辦公廳編：《農業集體化重要文件彙編（1958-1981）》，下冊（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1）

世界知識出版社編：《中美關係資料彙編》，第二輯（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60）

世界知識出版社編輯部編：《杜勒斯言論選集》（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59）

李桂才主編：《中國工會四十年（1948-1988）資料選編》（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90）

李雲漢等編：《總統蔣公大事長篇初稿》，卷九（臺北：財團法人中正文教基金會，2002）

李維漢：《統一戰線問題與民族問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周恩來：《周恩來選集》，上，下卷（北京：人民出版杜，1980、1984）

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部編：《中國人民解放軍六十年大事記（1927-1957）》（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88）《胡喬木傳》編寫組編：《胡喬木談中共黨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陝西工業大學革命委員會政工組：《林彪文選》，未刊，1968。

國史館史料處編：《金門古寧頭、舟山登步島之戰史料初輯》（臺北：國史館，1979）

國家統計局國民經濟綜合統計司編：《新中國五十年統計資料彙編》（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1999）

張聞天：《張聞天文集》，第四卷（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5）

陳雲：《陳雲文選》，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陸定一：《陸定一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

斯大林：《斯大林全集》，第十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楊尚昆：《楊尚昆日記》，上、下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

楊獻珍：《楊獻珍文集》，第二集（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86）《當代中國的計劃工作》辦公室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大事輯要：1949-1985）（北京：紅旗出版社，1987）《當代中國的經濟管理》編輯部編：《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管理大事記》（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1986）《當代中國農業合作化》編輯室

編：《建國以來農業合作化史料彙編》（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2）
劉少奇：《劉少奇選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鄧小平：《鄧小平文選》，第一至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鄧力群編輯和整理：《毛澤東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註和談話》（清樣本）（北京：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學會，1998）

三、著作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朱德年譜》（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陳雲年譜（1905-1995）》，上、中、下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劉少奇年譜（1898-1969）》，下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金沖及、陳群主編：《陳雲傳》，上、下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金沖及主編：《朱德傳》（北京侈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金沖及主編：《周恩來傳（1949-1976）》，上，下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金沖及主編：《劉少奇傳》，上、下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逄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上、下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科研局編：《毛澤東的足跡》（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3）
中共北京市委黨史研究室編：《社會主義時期中共北京黨史紀事》，第五輯（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0）
中共永嘉縣委黨史研究室編：《中國農村改革的源頭——浙江永嘉包產到戶的實踐》（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5）
中共安徽省委編輯室：《農業社大辦工業》（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58）
中國軍事博物館編著：《毛澤東軍事活動紀事》《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4）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全鑒》編輯委員會：《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全鑒》，第三卷（北京：團結出版社，1996）
丹增、張向明主編：《當代中國的西藏》（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1）
王若水：《新發現的毛澤東——僕人眼中的偉人》（香港：明報出版社，2003）
王泰平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史（1957-1969）》，第二卷（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8）
王焰主編：《彭德懷年譜》（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王毅之主編：《當代中國的輕工業》（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6）
西藏自治區文史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西藏文史資料選輯：紀念西藏和平解放四十周年專輯》（拉薩：西藏人民出版社，1991）
何東昌主編：《當代中國教育》（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6）
餘雁：《五十年國事紀要·軍事卷》（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
李晨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錄》，第二卷（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
李琪主編：《在周恩來身邊的日子裏：西花廳工作人員的回憶》（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84）
沈久泉等選編：《共和國往事——老新聞（1956-1958）》《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
沈志華、李丹慧：《戰後中蘇關係若干問題研究——來自中俄雙方的檔案文獻》（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沈志華：《毛澤東、斯大林與朝鮮戰爭》（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3）
辛子陵：《毛澤東全傳》，卷四（香港：利文出版社，1999）
周太和主編：《當代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
周恩來軍事活動紀事編寫組編，《周恩來軍事活動紀事（1918-1975）》，下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
周傳典等主編：《當代中國的鋼鐵工業》（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6）
林正義：《一九五八年台海危機期間美國對華政策》（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5）
武力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1949-1999）》，上、下冊個（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1999）
邱石編：《共和國重大決策出臺前後》，第三卷（北京：經濟日報

出版社，1998）〈「信陽事件」專題研究報告〉，未刊，1998。

柳隨年、吳群敢主編：《中國社會主義經濟簡史》（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5）

胡繩主編：《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1）

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部：《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七十年》《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97）

淩志軍：《歷史不再徘徊——人民公社在中國的興起和失敗》（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孫業禮、熊亮華：《共和國經濟風雲中的陳雲》（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

袁永熙主編：《中國人口總論》（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91）

高化民：《農業合作化運動始末》（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99）

張培森主編：《張聞天年譜》，上、下卷（北京：中共黨史出版杜，2000）

曹樹基：《大饑荒：1959-1961年的中國人口》（香港：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5）

第四次文代會籌備組起草組、文化部文學藝術研究院理論政策研究室：《六十年文藝大事記（1919-1979）》（澳門：中國現代文學研究中心，1979）

許滌新主編：《當代中國的人口》（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

郭今吾主編：《當代中國商業》，上、下冊（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

陳如龍主編：《當代中國財政》（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

陳清泉、宋廣渭：《陸定一傳》（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9）

陸鍵東：《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北京：三聯書店，1995）

陶文釗主編：《中美關係史（1949-1972）》（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彭德懷傳》編寫組：《彭德懷傳》（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3）

程中原：《張聞天傳》（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0）《粟裕傳》編寫組：《粟裕傳》（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0）

菲力普·蕭特（Philip　Short）著，仝小秋等譯：《毛澤東傳》（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4）

黃崢：《劉少奇一生》（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

楊易辰等：《我們的周總理》（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0）《當代中國叢書》編輯部編：《當代中國的林業》（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

資中筠主編：《戰後美國外交史：從杜魯門到里根》，上冊（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4）

賈斯柏·貝克（Jasper Becker）著，姜和平譯，《餓鬼：毛時代大饑荒揭秘》（香港：明鏡出版社，2005）

熊華孫、廖心文：《周恩來總理生涯》（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趙發生主編：《當代中國的糧食工作》（北京：中國社會秫擊出版社，1988）

劉友于等：《中國二十世紀全史》，第八卷（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1）《劉伯承傳》編寫組：《劉伯承傳》（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2）

劉國新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錄》，第一卷（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

鄭謙、韓鋼：《毛澤東晚年歲月》（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93）

鄧力群等：《陳雲與新中國經濟建設》（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鄧子恢傳》編輯委員會編：《鄧子恢傳》（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穆欣，《辦〈光明日報〉十年自述（1957-1967）》（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4）

蕭冬連：《五十年國事紀要·外交卷》（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

蕭冬連：《共和國年輪（1961）》（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

蕭冬連等：《求索中國：「文革」前十年史》（北京；紅旗出版社，1999）

錢臨照、谷羽主編：《中國科學院》，上、下冊（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4）

戴超武，《敵對與危機的年代——1954-1958年的中美關係》（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

蘇共（布）中央特設委員會編，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譯：《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韓懷智、譚旌樵主編，《當代中國軍隊的軍事工作》，上，下冊（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

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羅榮桓傳》編寫組：《羅榮桓傳》（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1）

蘇格：《美國對華政策與臺灣問題》（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8）

顧準：《顧準日記》（北京：經濟出版社，1997）

顧龍生編：《毛澤東經濟年譜》（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

龔育之：《黨史札記二集》（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

龔育之：《龔育之論中共黨史》，下冊（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

龔濟民、方仁念：《郭沫若年譜》（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

四、論文

丁抒：〈從「大躍進」到大饑荒〉，http://www.xys.org/xys/ebooks/others/history

安廣禮、任達甫，王林強：〈賈家莊農業合作化史〉，《當代中國農業合作化》編輯室編：《中國農業合作史資料》，1990年4期李玉霄：〈楊顯專：揭開夾邊溝事件真相〉，《南方人物週刊》，2004年第5期

李成瑞：〈「大躍進」引起的人口變動〉，《中共黨史研究》，1997年第2期

沈志華：〈1958年炮擊金門前中國是否告知蘇聯？——兼談玲戰史研究中史料的解讀與利用〉，《中共黨史研究》，2004年第3期

沈志華：〈蘇聯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態度和結果〉，《中共黨史資料》，2003年第1期

周承恩：〈人民公社和社會主義建設中的空想論〉，《中共黨史研究》，1988年第5期

金輝：〈「三年自然災害」備忘綠〉，《社會》，1993年第4、5合期

胡繩：〈談黨的「八大懸案」〉，《中共黨史研究》，2002年第6期

陳振聲：〈李先念走下廬山之後〉，《中華兒女》，1999年第6期

劉秉勳：〈毛澤東決定解散農村食堂的來由〉，《百年潮》，1997年第6期

韓俠：〈西藏現代革命史研究概述〉，《中共黨史研究》，1990年第1期

龔育之：〈毛澤東與八大黨章的兩個特點〉，《中共黨史研究》，2004年第2期

五、回憶錄和口述史料

王平：《王平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2）
王炳南：《中美會談九年回顧》（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85）
王蒙、袁鷹主編：《憶周揚》（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
江渭清：《七十年征程：江渭清回憶錄》（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6）
艾森豪威爾《Dwight D. Eisenhower）著，靜海譯，《締造和平》（北京：三聯書店，1977）
吳冷西：《十年論戰：1956-1966中蘇關係回憶錄》，上，下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
吳冷西：《憶毛主席——我親身經歷的若干重大歷史事件片斷》（北京；新華出版社，1995）
李家驥回憶，楊慶旺整理：《我做毛澤東衛士十三年》（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
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下冊（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6）
李鋭：《「大躍進」親歷記》（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1996）
李鋭：《「大躍進」親歷記》，上、下冊（海口：南方出版社，1999）
李鋭：《廬山會議實錄》《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
沈志華、李丹慧採訪朱庭光記錄，2002年6月5日。
谷牧：〈回憶敬愛的周總理〉，載楊易辰等：《我們的周總理》
袁浦之：〈憶吳晗同志二三事〉，《北京盟訊》，1981年第3期
張彤：〈對印自衛反擊戰前後的回憶〉，《新中國外交風雲》（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0）
張震：《總參謀部回憶史料》（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5）
彭德懷：《彭德懷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程華：《周恩來和他的秘書們》（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20。
黃克誠：《黃克誠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葉飛：《葉飛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8）
董邊、镡德山、曾自編：《毛澤東和他的秘書田家英》，增訂本（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

廖伯康：〈歷史長河裏的一個漩渦——四川「蕭李廖事件」回眸〉，載《當代四川要事實錄》（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
廖沫沙等：《憶鄧拓》（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0）
劉中海、鄭惠、程中原編：《回憶胡喬木》（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4）
鄭文翰：《秘書日記裏的彭老總》（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98）
蕭克：《蕭克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7）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杜，1993）
薛暮橋：《薛暮橋回憶錄》（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
聶榮臻：《聶榮臻回憶錄》，下冊（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4）
魏列夏金著，陳春華譯：〈1958年7-8月赫魯曉夫訪問北京〉，《中共黨史研究》，2004年第4期
羅元生：《百戰將星——王尚榮》（北京：解放軍文藝出版社，1999）
權延赤：《衛士長談毛澤東》（北京：北京出版社，1989）

六、報刊

《七一》，1958年
《人民日報》，1954-1961。
《中國青年報》，1958年
《中國藏學》，1988年
《內部參考》，1958-1961年
《甘肅日報》，1958年
《光明日報》，1958年
《河南日報》，1958年
《社會》（上海），1993年
《青海日報》，1958年
《前線》，1961、1962年
《紅旗》，1958、1959年
《新華半月刊》，1955、1959年
《解放軍報》，1957年
《遼寧日報》，1955年
《戲劇報》，1961年



精益制作组
JIN'E
Production team

精 雕·細·琢 益
開·卷·有

制作说明

版本：**1.1**
制作日期：**2013-03-30**
更新日期：**2013-04-22**

1.本电子书由“JinE（精益）制作組”制作。

2.由“crystone”、“hnjz”、“一张xx ”、“heting0122”、“背龟壳的蜗牛”、“linkin_one5”、“corsairliu”、“明客楚山”、“hakju”、“红旗下的蛋”、“tingna2005”、“9422”、“xdb815”、“winderp”、“peterabao”、“雪逝”、“zlith”、“727935110”、“maxrim”、“msoicq”、“luoyang11405”、“zsh989”、“欧阳杼”、“qieziqiao”、“reeftian”、“pu4suit”、“bladeknight”、“tangmagno”、“d貓監獄”、“zyzy512”、“叼铳小鸡”共同完成一校。

3.由“风满楼”、“pao”、“fallleaf”、“bladeknight”、“明客楚山”、“7emper”、“azienda”、“zsh989”、“cool_wind”、“ins1982”、“Apathie_斯拉丁维诺”、“Lancelot”共同完成二校。

4.由“背贝壳的蜗牛”、“reginaldlee”、“tingna2005”、“明客楚山”、“lafuers”、“sxr050325”、“zsh998”共同完成三校

5.crystone提供Ocr文本。

6.明客楚山用Sigil制作Epub。

7.报告勘误信息或查询本书版本更新情况，请访问“JinE（精益）制作組”官方网站（www.jebook.org），如对电子书制作技术有兴趣，欢迎与“JinE（精益）制作組”联系。

8.本电子书制作目的系为学习及交流Ebook制作技术，请下载者在24小时内删除，如对本书有兴趣，请购买正版图书。

校勘説明

1.人名轉換：

熊華山-熊華源

廖山文-廖心文

2.詞汇更正與統一：

这里-这裏、麼-麽、着-着（不转为著）、着重-著重、那里-那裏、鑒-鑑、兑-兊（説、鋭等）、爲-為、尽量-儘量、佈-布

3.用法錯誤或疑誤：

[1]要瞭解到真實情況也並那麽容易

改為「要瞭解到真實情況也並【不】那麽容易」

[2]開除黨籍【，】撤職、留黨察看、記大過

改為【、】

[3]得到了【明鮮】的改善。

改為【明顯】

[4]浙江嘉興地【區】還創造了一種迅速滅病的做法。

缺【區】字

「把當代中國驚心動魄的歲月轉化為歷史著作，是我們這一代人的普遍願望，也是對中國歷史學家的考驗」。（總序•金觀濤）

- 十卷本「中華人民共和國史」1949–1981，總約六百萬字，是目前最具規模的大型中國當代史研究著述
- 十餘位功力深厚的中國當代史家，歷時七年，合力撰述
- 全景式歷史紀錄，通史與專題結合；注重國際與國內重大歷史事件關聯，揭示中央決策與地方、基層之間的互動
- 倚重檔案、考訂詳盡、辨析充分、觀點開放

第四卷
烏托邦運動——從大躍進到大饑荒（1958–1961）

林蘊暉　著

究竟毛澤東提出的超英趕美戰略，如何在中共高層取得統一，又何以得到基層群眾的積極回應？一再縮短的趕超時間表是如何編織出來的？在發動大躍進的過程中，有多少中共省級領導人被打成了右派分子？1958年的中共軍委擴大會議為甚麼要拿粟裕開刀？1959年在廬山罷黜彭德懷的真實原因何在？造成大饑荒的主要原因是天災，還是人禍？大饑荒的非正常死亡人數究竟有多少？為挽救危機，中共中央又採取了哪些措施？本卷依據第一手資料，作出詳盡敘述和剖析。

香港中文大學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出版

